



要目

戰時經濟政策的檢討

「治安強化」運動之透視

明末農民運動研究

「中國到自由之路」

——評湯著「新學論」

關於詩歌的幾個主要論點

許滌新

薛子正

陳家康

沈于田

阮森

日六十月一年二十三國民

本期目錄

時論

加強革命友誼(三) 他們的名字是德國革命(四) 新約加重了我們的責任(五) 限價在各地展開(六) 靜靜的頓河怒吼了(七)

專論

戰時經濟政策的檢討

論事務工作者的業務學習

「治安強化」運動之透視

研究

明末農民運動研究

論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原因

批評

「中國到自由之路」

——評湯著「新專論」

關於詩歌的幾個主要論點

介紹

列寧論藝術及其他

信箱

關於戰後和平問題及其他

編後

許濼新 (九)

于剛 (一四)

薛子正 (一七)

陳家康 (二一)

羅克汀 (二八)

沈于田 (三四)

阮齊 (四〇)

蔡特金作
戈寶權譯 (四二)

(四五)

羣衆

第八卷 第二二期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週刊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西安
各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 一元

六期 五元四角

十二期 十元

廿四期 十九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加強革命友誼

——紀念中國革命的好朋友列寧——

本月二十一日又是「革命的巨人」列寧同志逝世十九週年紀念日。列寧是我們中國革命奮鬥者，最忠實的朋友，同時也是中山先生給予最高的敬意和最大的禮讚的「世界革命導師」，他的紀念日，是我們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尤其是在今天來紀念這列紀念日，更具有深切的偉大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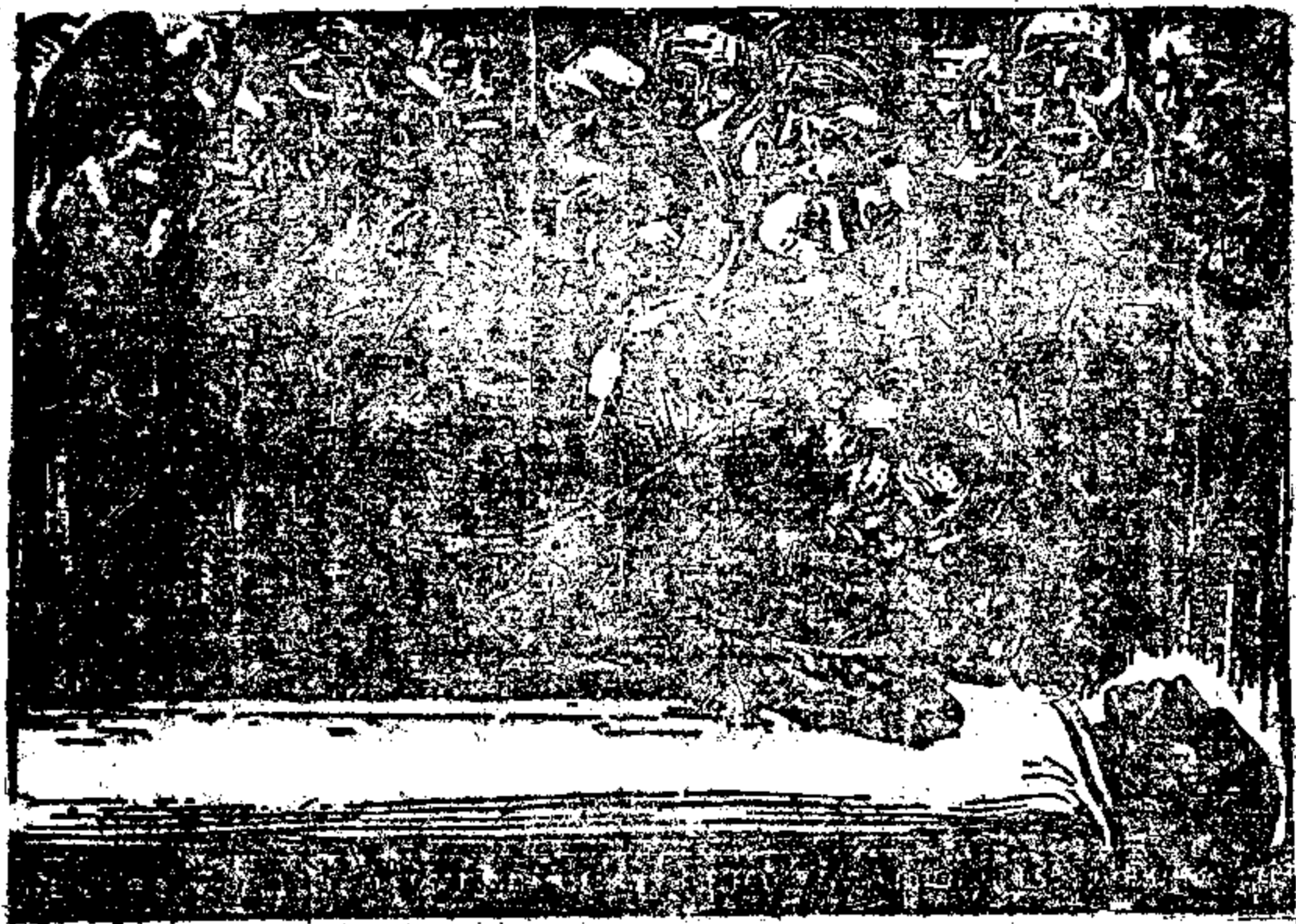
在列寧，很自然地使人想起中山先生在我國革命中的一段話：「我希望國民政府能與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被侵略之歷史工作中，與蘇俄合作。……我願與蘇俄政府亦已締結此種合作之契約。……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實現，而蘇聯政府亦已表示其願與蘇俄合作之契約。……我願在爭取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說來也有點奇怪，中山先生在逝世的時候，好像早已看到了今天我們，在世界上所引他說的幾句話，不是句句都給他說到了嗎？現在不正是中蘇兩國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之歷史工作中合作嗎？不正是全人類要求自由與解放的大時代不久即將破曉的時期嗎？不正是蘇聯在與良友及盟國聯手爭取中嗎？不正是中蘇兩國在爭取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嗎？

其實，並沒有什麼奇怪。中山先生那時候的這些話，是根據中蘇兩大民族已有的革命友誼說的，是根據剛開始的革命導師中山先生和列寧已有的革命友誼說的。在蘇聯，列寧的革命事業有了他最優秀的繼承者斯大林在中國，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也有了他最優秀的繼承者蔣委員長，因此，列寧和中山先生雖已過世十多年，但經由他們二人之手所締結的中蘇兩國的革命友誼則始終勿斷，繼續發展以至於今天，其能恰合中山先生那時候的希望，又有什麼可奇怪的？

正由於有這第一層道理，在今天，反法西斯勝利不久即將破曉的今天，中蘇兩國在爭取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的今天，紀念中國革命好朋友的逝世週年，實不勝其恰切，而感覺到深層偉大的歷史意義。

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之下，蘇聯的政府與人民，在繼承列寧遺志，加強對華的革命友誼上，可說是盡了很大的努力。我們抗日的戰爭，亦已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他們在反法西斯之大戰中又「以良友及盟國」歡迎了中國。為了紀念列寧，中國革命的好朋友，為了蘇聯革命紀念日所給予的深刻而偉大的歷史意義，我們，中國的政府和人民，應當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之下，繼承中山先生遺志，在加強對蘇的革命友誼上，作更多更大的努力。





他們的名字是德國革命

——紀念盧森堡、李卜克內西逝世二十四週年

整整的十年了，在你們心愛的城市——柏林，再沒有人敢大聲叫出你們的名字，因為你們的名字就是「德國革命」，「德國革命」是和德國法西斯匪徒們勢不兩立的。

在過去，年年正月十五，柏林市的工人成羣結隊到郊外去探望你們（卡爾）；紀念你們就是紀念德國的革命；德國法西斯剷平了你們的墳墓，不准德國人民哀悼他們革命的回憶。

然而所有這些努力是徒勞的，因為你們是埋葬在德國人民的心裏，不管怎樣兇殘的暴君也不能把你們從人民的心裏趕掉；你們的光輝將永遠的照耀着他們；你們曾經對他們說「德國人民的敵人是德帝國主義」，有一天，他們是會像巨人一樣地站起來，把他們的敵人粉碎的。

現在，你們的戰友——紅軍（你們的名字曾經給那些英雄們多少力量啊）；正在在北起列寧格勒南至高加索的全線上展開堅強無比的反攻，德國法西斯的軍隊已經在紅軍的鐵錘之下發抖了；戰勝他們雖然還要經過一場艱苦的鬥爭，但是德國人民設新的時候已經不遠了。

看啊，歐洲今天已經變成一個什麼樣子：從奧斯陸到羅馬，從巴黎到華沙，到處都是：一方面是高熱和死亡，一方面是抗爭和流血；冷風過後，幾幾乎可以聽得到那從東線潰退下來的千百萬傷兵的呻吟……歐洲已經變成一個飢寒交迫的奴隸的大陸了。

你們組織的「斯巴達克斯同盟」——德國黨前身——本來就是一個奴隸轉變者的同盟，當全歐洲的奴隸起來叛變的時候，你們的名字一定大書在他們的旗幟之上。（于）

新約加重了我們的責任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是民國史上一個很光榮的紀念日。是日上午十時（華盛頓時間）由華美雙方各派全權代表（中國為駐美大使魏道明，美國為國務卿赫爾）在華府簽訂了一個中美新約，同日午四時（重慶時間）中英雙方全權代表（中國為外交部部長宋子文，英國為駐華大使薛穆）在重慶簽訂了一個中英新約。這兩個新約的內容，是廢除英美在華的特種權益，特別是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在北京締結之辛丑條約。從這一天起，英美已放棄其在華領事權，領事裁判權，北平使館界管理權，內河航行和通商口岸特種貿易權，津浦鐵路入中國領水權等，同時也放棄了上海，廈門，天津，廣州等地的租界。中英新約的附件中，英國更放棄了指派英人為總稅務司和在中國各港口僱用外籍領港人的特權。這兩個新約的簽訂，算把我國百年來在國際上不平等的地位廢除了。這是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成功，自動宣佈廢除中國與帝國間一切不平等條約（一九二四年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後，中國國際關係上的一件大事。

新約的成立，自是我國人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團結一致艱苦奮鬥的光榮成就；同時也是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以大西洋憲章為基礎的英明外交政策的具體成就。我全國人民對此，自然是十分興奮，十分愉快。新約的成立，開闢了中英美三國外交史上的新紀元。從此，中國和英美，已站在彼此平等的地位，三國的邦交因而更加親密。這種國際友好關係的增進，值得全國人民熱烈慶祝。

中央，中蘇兩個新約的簽訂，可說是第一次實施了大西洋憲章的原則。這具體的表現了國際間互不干涉，互相信任的民主精神，平等精神。發揮這種精神，促進和鞏固中，英，美三大國間戰時這種團結，也就會奠定戰後民族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基礎。我們可以說，這兩個新約的簽訂，對消滅日寇，完成了一層保障，戰後新世界已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這些，都是我們所深深慶幸的。
加在中國身上的不平等條約，以中英間所訂江寧條約為始，到去年為止

，已有一百年的歷史。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中國人民數十年來國民革命運動所要爭取到的具體目標之一。直到今天，我全體國民和全體人民艱苦抗戰已五年有半，和英美盟國並肩作戰也已一年多，犧牲了千萬人的生命財產，才擺脫了百年來的桎梏，才爭取到了條約上的國家平等地位。我們雖深為欣幸這與我國平等原則的新約之簽訂，我們却也十分珍視這條約上的國家平等地位得來之不易。這正如蔣委員長所指示：「獨立自由的地位，都是要『求之在我』的，我們對這不平等條約的廢除，『絕不容許有一絲一毫的『驕矜自慢』或『一得自足』的錯覺』。我們要『激發其愛國心，而加強其責任心』。我們要知道『要自立才可以獨立，要自強才可以自由』，『中國的命運，須決之於奮鬥自強今日，而不可坐待於結東戰爭的勝利之中』。（以上所引各語，均見一月十二日蔣委員長為訂立中英美平等互惠新約告全國軍民書）

我們到底有些什麼責任，要從什麼地方求自強自強？蔣委員長曾以「軍事第一」和「經濟第一」兩語告過全國，軍事第一，就是要加強軍備反攻，早日把日寇從國土上打走，經濟第一，就是要發展生產力，儘速把中國推進工業化的大道。準備反攻，加緊生產，就是今天我們自強自強的路途，也就是大家應該負起的責任。

一月十二日倫敦泰晤士報論中英美新約的文章中說：「此次所締新約，結束了時代，創開新紀元。……今者，日寇已驅逐中國遼瀋之區域，非至其被擊敗或逐出中國境外之日，中國人民亦無享受正式條約所予之一切，故當前之急務，厥為勝利」。這個警語，對我們是十分必要的，我們還有廣多的錦繡山河，為敵寇的血腥所污染，還有無窮的易手易姓，在敵寇的槍尖上打滾。敵寇一日未打退，我們的領土就一日不完整，我們的民族就一日不自由，我們不能把淪陷區的那些同胞，從敵寇的鐵蹄下，驅逐和屠殺的血腥統治下解救出來，我們大後方的同胞也就不應解除敵寇所給我們的威脅和苦難，而英美在條約上所廢除了一切特權，也絕不本加地加緊在敵寇的掌心，仍然不能回到中國的手裏來。加緊自主團結，切實準備反攻，保證

國人所應負的責任。

由於新約的簽訂，英美在華政治的和軍事特權，除龍租地外，確都一律勾銷了。而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却還有不少問題，交通商口岸設廠權，採礦權，自由傳教和設立學校等等，則尚有待於今後的磋商談判。雖然中英，美三國平等地位的原則既已確立，則這些問題也就有了合理解決的基礎。但我國自身經濟落後，工業不發達，對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是一個很嚴重的弱點。我們應當切記「革命聖人」的一句名言，同時也是警句：「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根本不能繼續維持我們獨立國家的地位」。蔣委員長在「

限價在各地展開

在蔣委員長親在之下，後方各城市，自本年一月十五日起，先後在實行限價了。

蔣委員長所訂的「加強管制物價方案」，早於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通過了。方案的重要方針，計有「實施限價」、「加強物安」、「增進生產」、「節約消費」、「便利運輸」、「嚴禁囤積」、「管制金融」、「調整稅法」、「緊縮財政」及「改善公用」十項。此案提出後，獲得全體通過，並決議：「凡今日足以導致物價高漲之因素，莫不對症下藥，有詳密之規定。本會深信今後政府必能統一，施行法令，必求簡便，人民必能體察，當即切實執行，良法美意自能澈底推行」。

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國民參政會又通過「實施管制物價之決議案」，決定實施限價，應以物價指數為標準，管制物價之標準。由政府本此原則，分別就當地實際情況擬定其他物價之比例標準，共超過種類比例標準價格之物品，應令停止買賣，並得由政府酌量徵購。凡屬於奢侈品，則應嚴禁止銷售。十中全會這一決議，分明充實了「加強管制物價方案」的。因為它更具體的提出了以物價指數為標準，管制物價之標準。在執行上，應請辦法仍有缺憾的。重慶國民參政會對這個問題就有很明確的分析，他說：「第一、擬定與其他物價之比例標準，根據標準擬定。如某物的比例標準過高，則此物必先停售，或過遲，如比例標準過高，則此物必售不出，而影

月十二日的告全國軍民書中說：我全國軍民如果此後不能各盡其所應盡的義務和負其所應負的責任，則獨立自由的地位，行將得而復失。中國如果不能達成工業化以奠定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所必需的經濟基礎，則獨立自由的地位，確有得而復失的危險。扶助工業，增加生產，把中國建設成工業化的道路，也是今天的當務之急。

加強民主團結，切實組織反攻，保證打勝仗，扶助工業，發展生產，保證有工業，這就是我們今天自立自強的途徑，這就是大家應該負起的責任。

市場最薄。第二、「比例標準」擬定之後，物價價格如果變動，則其他物價似應隨之變動；物價價格如不變動，則其他物價似亦不應變動。但……：如今天甲物的生產成本漲了，而物價則未漲，那末此物不應漲價？假如今天甲物的生產成本未變動，而物價漲了，那末此物又應不漲價？反之，跌價亦同。故「比例標準」與生產成本相聯繫，應有矛盾不難相容之點。」

因為「比例標準」的辦法在執行上存缺點。所以，蔣委員長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致電全國宣佈實施限價的辦法中，決定自是年十一月三十日各地之原有價格為標準。通過中指出：自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起全國各地一律實行限價。限價對象，應特別注重民生重要必需品，如糧、鹽、食油、棉花、棉紗、布疋、燃料、紙張等物，及工資工資。各該當地政府，應督率各該地同業公會，按上述限價標準，妥議上述民生重要必需品及其物價價格，務須達到同一地區，同一時期，同一物品，只有一個價格之目的。蔣委員長所宣佈的辦法，顯然更為切實易行的。

各省市政府便在這一號召之下，進行限價的工作了。作為陪都的重要長從一月三日奉九日從事限價的。在二萬四千餘種物品中，由政府核定六百餘種，連工價運價計算在內，一共有九百餘種，共關八十一行業。到在一月十五日，便實行限價了。

在全國人民奮於動員不斷暴漲的命，政府實行限制，無非是讓各方
 的難題的。除了那些自利而後國難的難題以外，誰不承認這一種難題
 了。他又不願巴巴地請各地方政府切實執行委派的指示——「從速入手，使供
 應逐步增加」呢？——他寧願使此種以減少開支或節省開支為一貫從事生產
 的國家與王法讓亦勿望從此可以減輕生產成本而減少金之困難。但是一
 些地方所實行的限制，仍待值得商討的。以重慶為例，在政府所擬定的限制
 中，極大部份的商品是提價的，有部份的商品，是保持原價的，原狀
 的，只有極小部份的商品降價了。提價價格的商品多為日用必需品，如
 糧食與布匹之類，公營企業的汽車與馬車價格，亦在限制中進行漲價。除
 低價格的商品多是不急要的，如皮貨皮帶等是。一般說來，限市的價格是
 「限」了。

這與政府長所指示的「從速入手，促進經濟平衡」，是不一致的。
 在重慶，我們所擬定的限制，實屬各業生產成本與利潤的苦心，因須該
 限市的當局為獎勵且用必需品的生產與供應的苦心，但既如此，保存及日用
 必需品的勞動力的價格，就不應片面的限制了。特別是那些生產日用必需品的

農業工人的工資，是不應孤立地來考慮的。如果一面系統的合法的提高日用
 必需品價格，而另一面又在實際上抑制那些日用必需品為條件的勞動力
 的價值，那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結果，必將使那些勞動力界同胞，特別是農
 業工人的壓力了，必將會降低他們的生產力與勞動生產率了。為了生產的
 發展，為了限價而得低價的條件，我們希望當局應考慮合理的措施這一問
 題，政府這一問題。

我們所擬定的限制，因為物價而取得太利害，會使這抗戰的經濟基礎，
 但認為限價是一種治標的辦法。(註)從根本上說，必須有充足的商品
 ，然後限價才不致落空，必須使價格停止下跌，然後這些價格限制出來
 的物價，才不至不斷的波動奔騰。因此，提高生產力與勞動生產率是今日最重要
 的任務。要提高生產，就必須給與國家和一般手工業生產者以種種便利與幫
 助，而穩定物價，則應給與以種種貸款為條件的。說到這，我們當然要勸導
 到這些財政經濟政策了。為了限價之切實生效，我們希望當局在限價之外，
 更要在增加資本的問題，更要在改善農村財政經濟政策的措施。

(續)

靜靜的頓河怒吼了

自去年七八月間，德法法西斯匪徒們，乘著歐洲有第二戰場的消息，
 聚集了所有被佔領國家的德軍和它自己的後備隊，遂使前線兵力優勢，向
 頓河軍原猛撲的時候，他們滿以為莫斯科和巴庫是在他們的裝甲中，靜靜的頓
 河更是不在話下了，半年來，不但史大林格勒和巴庫可望而不可即，現在這
 那七個被德軍只知道靜靜的流入黑海的頓河也靜靜地吼起來了。

紅軍的皮攻下這英雄的時期。

截至現在為止，紅軍的反攻在發展上可以分成兩個時期，第一時期從
 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到十二月，這一個時期反攻的主要目標在包圍頓河大
 林格勒的敵軍，第二時期從去年十二月起，這一期反攻的主要目標
 是將敵軍在消滅敵軍的主力，但是由於反攻重心向北高加索和頓河軍原轉

移，這一反攻的戰略意義却最大大的提高了。在這一重大時期，中路紅軍，
 特別是在大馬城一帶紅軍的反攻是未曾停頓的，而不只是因為紅軍反攻的主
 要目標在消滅敵軍的主力，因此在適當的具體條件之下隨時反攻，而且最
 因為只有這樣的配合作戰，才能使得主要的反攻戰場上收到最大的戰略效果。

紅軍在消滅敵人的最後前進。

紅軍收復了什麼呢？在皮攻的第一期(自十一月十九至十二月三十日
)裏，在斯大林格勒區的三階進攻戰中，紅軍平均推進一百至二百公里，解
 放人烟稠密地區一千五百處以上，而其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間，紅軍每
 團了敵軍二十二個師，擊潰敵軍三十六個師，敵軍損失陣亡官兵十七萬五千

名，被俘官兵十三萬七千六百五十名，此外直隸的糧重更無暇一一計錄；在這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敵軍被包圍的數目之大和被俘數目對陣亡數目的比例之高，這說明了紅軍的成就是怎樣的輝煌和偉大。這一種情形並不限於斯大林格勒圍攻的初期，即是最近在西伯利亞一帶的戰鬥中，亦復如此：在這裏，三日（自十三日至十五日）之間，紅軍推進五十至九十里，收復人體稠密地區六百處以上，擊潰敵軍九個步兵師，而在這當中陣亡官兵雖僅一萬六千名，但被俘官兵却達到一萬七千名之多；這說明了今天德軍的失敗是帶上了怎樣一種嚴重的性質。現在，勝利在不斷擴大中：被包圍在斯大林格勒區的二十多萬德軍據報只剩有四五萬了。北高加索前線和頓河前線每日皆有成千甚至成萬的新俘，大弓城前線亦每日皆有進展；一個比較準確的絕對數目字是很難得到的，不過把據了德軍失敗的基本性質，即便是沒有絕對的數目字擺在我們眼前，我們也可以想像到這一帶法西斯德軍是處在怎樣一種掙扎的狀態之下了。

而且，復仇正在開始。

三路大軍正在湧向頓河的出口城市：一路自佛羅內茲向南，已先後於十六日，十七日克復了羅索希和勃勒雷佛，自北包圍羅斯托夫；一路沿頓河和頓內茨河兩河向西南，其前鋒已抵什摩夫尼基一帶，自東北包圍羅斯托夫；一路自北高加索的九山城向西北，其前鋒已迫近阿瑪維爾，自東南包圍羅斯托夫；羅斯托夫四面受敵。

羅斯托夫四面受敵，德軍的戰略形勢是落後得很。這不但是因為德軍的士氣消沉，作戰不力的緣故，而且是由於高明的法西戰略家們太明白了的結果。現在大家都明白了：去年希特勒的夏季攻勢是以奧斯陸、斯大林格勒、迂迴莫斯科和南下高加索，奪取巴庫油田為目的，但是經一九四二年的戰鬥，德國法西軍隊所能得到的，不過伸了兩隻腿出來，一條伸到了斯大林格勒的門外，一條伸到了格羅茲尼的城郊（摩茲多克一帶），形成了軍事上最不利的兩天突出地帶，德軍今日的苦難從那時起就已預定下來了。我們記得在去年九月中，當斯大林格勒的爭奪戰正發展到最高峯，而德軍却在北高加索獲得局部進展的時候，倫敦曾經有一些軍事專家以為蘇聯最高指揮不應該集中太大的兵力到「斯大林的城」，而應該更多的顧及一些高加索，生怕蘇聯顧此失彼；但是戰爭的結果證明了此不能顧而彼亦失之的危險不是虛傳，今天的發展不是這一形勢最好的說明嗎？斯大林同志說得好：「由於這原因，

果平——佔領油區和對莫斯科的包圍——，德國法西戰略家們反而陷於困難的境地了」（十月革命紀念日斯大林報告）。羅斯托夫德軍的四面楚歌正是由於法西戰略家們要遠離庫茲涅茨的後果。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紅軍反攻，在目前，最主要的目的在消滅敵人的主力，而在消滅敵人力量的過程中，一個對敵包圍的戰略形勢是逐漸形成了，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更富於決定性的勝利捷報是會接踵而來的。

世界戰場，像條鐵路通到柏林羅馬和東京，德法法西斯在紅軍的鐵錘之下發抖了，打個趁熱，我們希望英美蘇快肅清北非法西斯，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加強太平洋攻勢，加緊援助中國，組織反攻，發動反攻，大家一齊起來結束世界法西斯匪徒們的狗命。頓河的怒吼不但震醒了蘇聯淪陷區裏人民的解放，而且將激發全人類的黎明。

復仇正在開始，怒吼下去吧，你不再平靜的頓河！

(千)

投稿簡約

- 一、本報歡迎讀者投稿，其內容性質略如下述：
 1. 發揮及解釋抗戰建國的各種政策。
 2. 對當前國內國際局勢的理論分析。
 3. 各種學術論著（政治的、經濟的、歷史的、哲學的、文藝的……）。
 4. 對於時論的批評及書評。
 5. 大後方各地動態和敵後淪陷區各種鬥爭實況的報導（包括各種建設事業和抗敵救亡）。
- 二、每篇字數最好在二千至六千字之間，及不要超過一頁字。
- 三、來稿本刊編者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 四、來稿若不能刊登，如附有足郵票者，一律退還。
- 五、來稿用何種名號，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
- 六、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送酬十元至三十元。
- 七、來稿請用稿紙寫清楚，請將原稿用稿紙或膠紙註明原稿字數、期數、出版處及著作人姓名，重要稿件請附複件，以免遺失。
- 八、來稿請寄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本刊編輯部。

戰時經濟政策的檢討

許滌新

一 根據與任務

日本帝國不但對我施行一種殘暴的軍事政治的進攻，而且配之以野蠻的經濟侵略。爲了打退日寇，爲了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我國的戰時經濟政策，必須把握抗日民族戰爭的性質，必須看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這就是說，決定戰時經濟政策的時候，必須把握住它的根據。

我國戰時經濟政策的根據有三：第一是抗日的。日本強盜使用一切狼毒的辦法，欲將中國爲其殖民地；欲使中華民族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變爲它的牛馬奴隸。神聖的抗日民族戰爭，就是在粉碎日本強盜的這番陰謀的。服役於抗日戰爭的經濟政策，當然以此作爲它的第一個根據。其次是全民族的。因爲在這次抗日戰爭中，除了那些認賊作父甘心當漢奸的奴才以外，除了那些自私自利發國難財者以外，各個社會階層，都是一條心團結抗戰的。這就使我們上有一層不同，但基本上說，絕大部份的人民都在爲民族的解放大業而流着血，流着汗！因此，戰時經濟政策，必須照顧到各個階級的利益。最後一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是一個中小企業佔優勢的國家。小規模的商品生產，佔着極大的比重。農村的生產與手工業作坊固然如此；就是新式工業亦何嘗不然？因此，在把握戰時經濟的時候，必須採取因勢利導的態度。

依據這三個根據，戰時經濟政策的任務是明確的。第一、針對着敵人的殖民地化中國的毒計，我們必須使用一切方法去粉碎它的以戰養戰的計劃，必須實行經濟的封鎖。第二、民族解放戰爭的根據是自力更生（外邊當然要爭取），要自力更生，就必須動員和增加全民族的一切力量。第三、爲了發展生產，必須看準中國的國情，必須採取適合於中國國情的辦法，使無數的中小生產，使新式的民間資本都能發揮積極作用。第四、自給自足工業高度化的國家的方法，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第五、爲了全民族的解放，大家必然要忍受一時的局部的犧牲，但在不損害敵人的原則下，應盡量減輕一般民衆的負擔，加重個個階級財力

的負擔，使人力物力財力的動員，能夠順利地進行。第五、抗戰建國是聯系的，戰時經濟政策，必須作長期打算，培養經濟財政的基礎，使戰時經濟成爲戰後發展的基礎。

爲敘述的方便起見，作者擬從對敵經濟戰、經濟管制與財政政策三方面，去把握戰時中國經濟政策的全貌。

二 對敵經濟作戰的策略

對敵經濟作戰的重點有二：其一是貨幣戰；其二是物資戰。

我方貨幣戰的策略，是阻礙敵人的通貨膨脹逐漸形成的。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政府所實施的外匯審核法和同年四月間的出口結匯辦法，都是針對敵人以法幣兌換外匯的陰謀而來的。審核法的本身，還有一些漏洞。據當時中央金融商業計劃所說：日商銀行亦公開介紹我中央銀行核准的外匯；同時法幣法定匯率表面上雖穩定不變，但核准的數額，遠不敷進口貿易的需要，於是法幣的價值到爲「鴉片」六成之下，並在華中成立偽「華興商業銀行」。政府在這個時期所採取的對策是法幣穩定公關匯市。計在二十八年三月間向英國借款五百萬鎊，成立外匯平衡基金一千萬鎊（其中五百萬鎊是由中交兩行所出的）。三十年四月復與英美兩國先後成立中英美平準基金協定（加上我國提出的三千萬美金與上次中英平準基金總數，共約美金一億元），更設立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支持公開匯率。這一政策，一直維持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才告一段落。

滯留在外匯上的貨幣戰爭，現在已是事過境遷了。但這一戰爭的經濟教訓，是不可不深加記取的。維持匯市的好處，只是博得英美商人一週的匯兌的賜顧而已。缺點呢？那是多得很多的。它便利於敵人之套取我外匯基金，它便利於敵商巨富之逃避資金與從事投機；它支持了孤島的繁榮而加重了我國財政經濟上的負擔。

敵人的貨幣，不但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劃門，而且在淪陷區中進行劃門。為了配合外匯上的統制，政府曾禁止法幣向淪陷區的流出。目的是在避免敵人之擄取法幣與外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局面改變了，政府已經修正這個辦法，鼓勵人民攜帶法幣至淪陷區採購物資。這個辦法，是適當的。以給與敵人的傾瀉法幣入大後方的設計以打擊。

在物資戰爭上，從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秋，我方的戰略是禁運物資，是查禁敵貨。一查禁敵貨條例規定凡是敵國及其控制區域，有敵人資本，供敵人利用的工廠出品，一律查禁。這是一種絕對的、無差別的抵制敵貨的辦法。但事實上，走私的敵貨，仍源源運入大後方的每一個角落。二十九年八月，政府以後方物資漸感缺乏，乃規定鋼、鐵、化學、肥料、電工器材、教育文化必需品等十六類貨物，可以入口。此為對敵經濟作戰轉變的初步。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爭取物資更成為對敵經濟作戰的主要策略了。關於進口貨物，乃重新調整。凡軍需品及日用品，不問來自何國或國內何地，均一律准予進口。這是針對敵大盜取物資所應有的措置。

對敵經濟戰爭，在敵後抗日根據地中，是更為殘酷的。敵人利用漢奸，使偽鈔流入抗日根據地，但在政府與人民努力之下，偽鈔便被打倒了。打倒偽鈔的辦法是破壞其價值。從抗日根據地的中心，逐漸放度貶值，一直推到敵區，拋出偽鈔換回物資。敵後這種經濟戰爭的戰術，是早在一九三九年初就開始了。搶奪物資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敵後抗日政權對敵人的行動，有計劃的對市場通過敵人的據點，有計劃的組織運銷合作社，輸入於我有用的物品，輸出於敵無用的物品。在適當的時候，給與敵人的經濟據點以致命的打擊。如一九四〇年八路軍百團大破的破壞井陘煤礦，便是最光輝的例子。敵大對各根據地進行三光政策之後，這與地方的經濟更為困難了。但是，根據地人民的建設，未嘗有一刻在休息。只要敵人的經濟被切斷，各種建設便在破壞後的廢墟上恢復起來了。消滅敵荒，開闢荒地，修理溝渠的工作是不斷在進行。魯冀察、晉西北和晉東南的人民，在這些方面，是提供了不少成績的。談判對敵經濟作戰，我們是不能無視他們的努力呀！

敵人的經濟攻勢，是越來越劇烈的，我們應當針對這種新設計，澈底的加以粉碎。過去幾年我方的策略，有許多地方是值得警惕的。在貨幣戰方面，最大的弱點是在未能把獨立自衛的原則，貫徹於外匯市場與金融市場，嚴重的通貨膨脹，使準備金的外匯基金，消耗在上海或外匯市場上，送給敵人，送給奸商。在物資戰方面，則失之於不能採取主動，可以輸入的

物品竟有一個時期不許其輸入；而應該禁絕其輸出的東西（如鴉片棉花與糖等），則直到今天，仍然未能根絕。敵偽漢奸之走私。這些弱點，是萬萬不能看淡的。我們贊同政府當前這種對淪陷區拋出法幣換購物資的政策，但認為必須有計劃的組織的進行這一工作。這就是說，必須依靠民眾，必須給與向淪陷區換購物資的商人以種種便利，必須切實禁止大後方物資的傾瀉。在這裏，清除運輸機關的積弊，嚴正各級區軍兵的軍風紀，是十分必要的。

三 管制政策

我國的戰時經濟政策，是以管制為核心的。這種政策並非一下子就形成的。二十六年十月軍事委員會頒佈「戰時禁運工商業條例」，這是管制的開始。經濟部成立（二十七年）之後，這一工作才系統的進行起來。至三十一年底，政府的管制，已經伸入銀行、物資、運輸、糧食、物價各方面了。茲將各方面管制的特點，扼要述之於下：

第一、銀行管制——政府對於銀行的管制，到了二十九年八月才開始。管制的內容，規定於政府所頒佈的「非常時期管理銀行暫行辦法」。它的要點有三：（一）集中各銀行普通存款準備金。辦法第三條規定「銀行應收存款，除儲蓄銀行應依儲蓄銀行辦理外，其普通存款，應以所收存款總額百分之二十為準備金，轉存當地中央銀行」。這一方面，規定「銀行通用存款以投發生產事業暨倒閉，增加物資供應及進行政府戰時會計政策為原則」（第四條）。「其應徵以貨物為抵押之存款，應以經營本業之商人並加入各該同業公會者為限。押款已屆滿期請求展期者，並應審查其貨物性質，如保民生必需品，應即照令押款人贖取出售，不得展期，其非日用品重要物品押款之展期，以一次為限」（第五條）。（三）禁止銀行兼營商業，該法第七條規定：「銀行不得直接經營商業或囤積貨物，並不得以代理、買賣或信託部等名義，自行經營，或代客買賣貨物」。此法公佈之後，財經兩部會同四廳總處，先後派員至滬、蓉、漢、桂各大都市，檢在各銀行帳簿倉庫。至三十年十二月，政府又將原辦法加以補充修正。限制新銀行的設立；對於貨物押款商人，除規定以加入各該同業公會者為限外，並規定押款期限每戶押款數目；禁止銀行僱用人員之親屬行款經營商業。對於國家銀行，三十一年下期實行四行專業化，取消中央銀行三行的發行權；對於地方銀行，則自三十二年元旦起，實行廢除此期制度。

從銀行管制的規定看來，「收縮通貨」，禁止囤積與協助地方生產，應該是它的任務。但事實上，銀行的商業化並未停止；通貨的收縮尚未發生效

果。前一病種之存在，是由於生產事業沒有保障，商業利潤遠在囤積利潤之...

第二、物資管理——根據二十七年十一月修正公佈的「非常時期農礦工...

第三、運輸統制——在二十九年以前，管理運輸的機關有交通部、後方...

交通省接收運輸統制工作後的成績，現在尚不可得而知，但運輸統制局...

(三)「各地統制的辦法，尚未一致，甲地通過的貨物或工具，也許乙地...

第四、糧食管制——從二十七年軍事委員會公佈「各省市縣糧食管理辦法...

第五、物價管制——對於物價問題的措舉，二十八日在重慶年會中，政...

限價限額等，是進了一步的。平價是以經濟的力量去平定物價，而限...

但限價限額等，是進了一步的。平價是以經濟的力量去平定物價，而限...

外，對於生產者的成本，是必須嚴厲的。對於國戶的團體，是必須切實禁止的。如果，我們能從全權去把握這個問題，能把握這個問題的重要前提，那末，限價是可以獲得其應有的效果的。

這就是戰時經濟管制的各方面。在這裏，我們看見了某些成就，同時，亦面對着一些缺點。爲了抗戰的利益，爲了民族國家的前途，我們認爲進行管制，必須認清下列幾個條件：

(一) 談經濟管制者，多以德日或英美的措施爲根據，這是忽視今天中國的現實的。在戰爭的性質上，我們絕不能與德日混爲一談，因而在經濟政策的本質上，我們是不能模倣德日的。就以英美來說，它們是高度集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那種情形之下，進行經濟統制是比較容易的，只要把幾個操縱國民生計的壟斷管制一下就行。中國今天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手工業作坊固然還到不堪言狀，分散到不堪言狀，就是一些新式的工廠企業，亦是薄弱得可憐，分散得可憐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急切的任務是在扶植他們，發展他們；是在擴大他們的生產規模，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在於領導資助，而不在于限制干涉。

(二) 有人以爲戰時時期非進行管制不可，非使政府擁有大量的物資不可。這亦是切欠酌量的。我們今天的抗戰，是爲了全民族的解放的。只要切實實地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只要實實在在提高民衆的抗戰情緒，提高民衆的生產情緒，那末，工業各業的生產量一定會不斷提高的。生產量如果真能提高，那還不是抗戰之利，民族之利嗎？在這種情形之下，縱然這些物資都不握在政府手裏，積蓄的意義仍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今天緊要的事情，是在於如何提高民衆的生產情緒，而不在于物資的掌握在誰的手裏。

(三) 提高民衆生產情緒的主要工作，是改善生產者的生產條件，儘可能減低他們的負擔，特別是改。但租關係與勞資關係。前者應執行二五減租的規定，與取補高公債，但同時保證農民交租交息；後者是保持工人的實質工資不至低落，但同時保證工人遵守勞動紀律。只有調和雙方利益，生產才可大量發展。

(四) 我國並非主張無條件自由放任的。在戰時生產上必須衡量緩急，比較輕重，在交通運輸上必須統一的分配與確定的標準，在金融管理上必須切實使用政府的資金，量長於生產事業之中；在人口貿易上必須鼓勵生產必需

品禁止奢侈品；在出口貿易上必須根據總商會的好壞取貨物而定，很誠實的與盟友進行貿易。這就說，有些部門是應該加以更切實的管理，有些部門則政府只能發揮其補助的作用，而部門與部門之間，才宜互相配合。如果表面，但導向高生產，而稅制上，管理上，財政思想上，均與生產者以種種的留難困難，如果口頭上倡導提高生產，而實行在緊縮信用口實之下，給與廠家以閉門羹，那末，這是一提高生產的計劃嗎？

(五) 欲進行管制，必須有靈活而嚴謹的機構，必須有勇於任勞任怨的人員。因爲在管制制度之下，主管機關如果有一兩處鬆弛，則無數的生產單位必陷於無可補償的停頓；工作人員如果有一處不公不義，則被統制的各方面必定遭災莫可言喻的損失了。此外，機關林立，職責不清，人事牽掣與法令繁複，亦必進行管制的絕大障礙。這不但是理論的推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實。因此，革新機構與慎選人才，是極端重要的。

四 通貨、稅制與專賣

一般說來，戰時財政的籌劃，不外是借債、增稅、發鈔、捐輸與徵稅。這些方法，我們皆行過，但他們並不是平均的。

借債可分爲內債與外債。在抗戰五年中，我們前後所發行的內債，計有十七種計：「民國二十六年度發行的，有救國公債、京滬鐵路公債、開港廣東省港河工程美金公債、整理廣東金融公債四種；二十七年發行的計有二十七年國防公債、二十七年美金公債、二十七年贖回公債三種；二十八年二十九及三十年，則各年度均發行軍需公債及建設公債二種，此外，三十年度並發行同利勝利美金公債一億美元，美金儲蓄券一億元，及勝利公債兩千萬元等三種。」這十七種內債的總額約共一百萬萬元。外債方面則有英美蘇的借款二十四次，計中英借款十二次；中美借款八次；中蘇易貨借款四次；總額共一十萬萬四千七百餘美元，與一萬一千六百五十萬金鎊。

稅制方面，可分爲整理舊稅與推行新稅兩項。整理舊稅，計有下列各端：(一) 關稅方面的設施爲調整進出口稅，擴大轉口稅，增加從價課稅範圍。(二) 鹽稅方面，自三十年九月起，改訂鹽稅稅制，規定產銷兩稅不得併征。(三) 擴大統稅徵收範圍，改爲從價徵稅。新稅方面，則有：(一) 戰時專賣時期對分利得稅之嚴懲，(二) 戰時消費稅與補充所得稅稅收徵收等項。根據孔部長在「抗戰以來的財政」一書中的估計，戰時稅收的總

總計二十萬萬元左右。

除了廢除稅收以外，政府又於三十年決定實行專賣。專賣制度的提議是在國民黨八中全會中通過的，財政部即根據決議，決定就食鹽、洋烟、火柴、茶葉、糖、酒等六種，改辦專賣。當局估計如六種專賣完全實施之後，收益可達十七億元。

從財政的意義來說，整理舊稅與籌辦新稅的收入，大約將達二十萬萬元，如果再加田賦、徵實物的二十萬萬元及專賣十七萬萬元總合起來，政府每年（指最近而言）的收入，可能達到五十萬萬元。在浩大的支出之下，這一筆收入顯然不夠的。因此，債務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友邦借款，主要是以貨，或以信用借款的方式，輸出商品。故其的大部份是物產輸入（在本埠洋戰事以前）。這物產都是軍需品及戰時原料，這對於戰時經濟是有莫大的貢獻的，但國內的餉捐等等，還不能在這邊設法，而且有一部份外債是出之於支持外匯的，因此，外債之借得，還不能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內債呢？五年以來所得總額只有一百萬萬元，顯然亦是不能補足開支之不夠的。

在發鈔方面，抗戰初起時，財政當局聲明我決不走通貨膨脹之路，但因支出的浩大與收入之不能全數應付，故迫不得已而發行亦就日益增加起來。直到最近，已達可憐的數量。這不但指直接發鈔而言，就是以前債之發行方式來說，亦是具有這種性質的。計戰前內債除了二十六年的救國公債與二十九年的建設公債與軍需公債直接向民間購募外，大部份由銀行承購。銀行承購的公債如果無適當的消化，則其所吸收的公債愈巨，其所發出的法幣亦愈巨。這樣，社會便受飽通貨了。

增發通貨是戰時財政不能避的途徑。問題是在於能否控制其用途，能否使其游回國。如果能引導增發的通貨入於生產，如果能舉辦財政稅或強迫公債，使一些發財財而擁有的豪富，能捐獻其一部分財產給國家，那末，通貨膨脹的弊端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我的財政政策還未把握到這一點，致增發的通貨，未能回籠，而這些不回的通貨又不能進生產的部門。這樣，便無法使物價不受刺激而上漲了。「物價繼續上漲，又引起其驚人——特別是那些具有特殊條件的人——之囤積居奇。囤積得越兇，物價便漲得越快；物價漲得越快，就增加了政府與人民之支出。於是，一方面不斷在增加發行，而另一方面，却處處在感覺到錢之不夠；一方面感覺生產

不足，應當增加生產，而另一方面滾滾的游資且儲，却不斷在加強囤積居奇的力量，以穩定生產了。當面財政經濟中的矛盾，就是這樣展開出去的。」

面對着這種情勢，我認爲戰時財政政策的重心應該放在有錢出錢辦事奉出的原則上。這就是說，整理稅收的工作，應該更努力的進行，特別是要用極大的力量在舉辦直接稅上，而直接稅的重心，應該是舉辦財產稅。其次，是舉行強迫公債，雖強迫公債於那些發財財的人。如果這樣辦，就可解決了國家極大部份的開支，就「爲穩定幣值及下堅實的條件。通貨方面，當前的抗戰五年後的今天」的，務是穩定幣值。穩定幣值的方法，一面是盡量減少它的發行額，一面是盡量使法幣回籠。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減少開支，而減少開支是以裁減法幣前說的；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以有錢出錢多。因此原則。這是我剛剛說過的。對於一般稅收，以今日中國的情形而論，眼光必須放遠一點，只把雞殺大，才不蛋吃；殺雞吃蛋，是自斷前路的。因此，在整理稅收時，必須注意到培養稅源；必須注意到出稅之轉嫁。這就是說，我們一面應「重直接稅，但另一方面，必須減輕工商業的負擔，減輕中農小農的負擔。」

至於政府的獨占事業，應以民力所不及者爲限。中國的國情與高度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不相同的。如果不把這事業而抄襲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在財政收入並「怎多，而從社會政策的觀點看來，其對於物價的影響看來，顯然是很不利的。爲了財政的收入，索性在商品上加一筆消費稅，（這當然是轉嫁到人民身上！）又可省設一批機關，發給一批證書。對於收入，不是更有利嗎？」

三十二年九月四日

本刊重要更正

本刊第七卷第二十四期「中國國民黨了中全會決議全文」之「決議」二字係「宣言」二字之誤，特此更正，並致歉意。

論事務工作者的業務學習

于剛

工作者一要參考之處，內容的展開與充實，還有待於大家在業務學習中不斷的實踐。

一

從事業務學習的第一個先決問題，還是先弄明白。

如前所說，從事業務學習就是為了精通工作技術，熟悉業務詳情，精通工作知識，成為內行，成為專家。一句話，就是為了要精通業務。因而我們需要清楚看到：這是一種品質的鍛鍊，只有這樣，才能使得我們不僅僅局限於一般政治的瞭解，而能同時注意專門業務的深入；只有這樣，才能使得我們更能適合革命事業的需要。

業務學習如果有心得，在政治上也就能得到更大的開展，因為政治理論的認識，如果沒有專門的實際經驗作基礎，就不容易認識得深刻與親切。比如普通人對於一個國家政治上的進步、缺點或糾紛所在，即使能知道一驚大驚，終不免浮光掠影，表面得很。如果讓一個實業家、教育家或者農出農家（當然還有更多別種的專門人才）從他們所最熟悉的一個部分或兩部分來即證時，那就必然會深刻得多。這就是因為他們有豐富的業務經驗作基礎的緣故。

業務學習最能把握理論與實際打成一片，最能從實際經驗中提煉出歷史上的遺留下來的理論與實際分家的惡習。在業務學習中，最能清楚看出理論是怎樣被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實際工作經驗又是怎樣被整理、研究以至提升為理論，前人和他人的經驗記錄，又是怎樣在學習過程中被批判地接收和運用，羣衆片段的切身經驗，又是怎樣在學習中被吸收、分析以至變成有用的方法。

從事業務學習，是對於調查研究工作的最好的實踐，因為業務學習的方法和材料，離開調查研究的精神，是會遇到不可解決的困難的。

從事業務學習，可以訓練我們如何去積累經驗、整理經驗、研究經驗。使我們在原來被認為枯燥無味的工作中覺悟新的興趣油然而生，使我們看到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府機關通過的「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中，確切一切在職幹部都須受業務教育，實行「做什麼、學什麼」的口號。

不論在軍事、政治、黨務、黨務、文化、教育、宣傳、組織、民運、鑄好、財政、經濟、金融、醫藥、衛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門的幹部，必須學會與精通自己業務，這是第一個教育任務與學習任務。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就因為要使幹部真正能起決定一切的作用，則必須使幹部有專長，精通業務和高瞻遠矚、通達政治的兩種品質。就是說，他們既要是業務的專家又要是革命的通人。因為要切實領導某一部門的工作，則領導的幹部及從事於這部門的幹部，就決不能僅限於空洞的革命口號和一般辭藻敷衍塞責，而必須精通工作技術，熟悉業務詳情，精通工作知識，成為內行，成為專家。正因為要朝這目標一個目的去做，因而幹部的業務學習與政治學習被同列於幹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

如果把問題的範圍推廣一些，在今天各種社會職業部門中的有志之士，想學肩負一份抗建的大業，發揚「已立立人，已達達人」的影響。除了對於當前政治局勢，力求具有真知灼見之外，亦何嘗不無從加強本身的業務學習入手？試想如果自己一無專長，在社會上尚有飄浮不定、胸腹未穩之感，又怎能使你的說話有力量、作事有信用？你又怎樣能實現那移風易俗、領導羣倫的崇高理想？何況你如果不從本身業務的實際經驗下功夫，則你的所謂亦未必能「真」，所見亦未必能「灼」，甚至還會因為不脫空泛腐爛的毛病因而見笑於人呢？

因此，筆者認爲認真從事業務學習，對於黨員尤其是黨的幹部來說，應該身體力行，這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對於社會職業部門中的有志之士，却也不失其參考的價值，本文的目的，即就一個事務工作部門實施業務教育中初步應有的二三意見，提供黨的事務工作者以及社會職業中偏重事務性質的部門

工作的前途而增強對工作的信念。

在精進業務鍛鍊品質的總目標之下，儘管高我們的政治經驗，實踐理論與實際的聯繫，實踐調查研究工作，培養處理經驗與研究經驗的體力以增強工作信念等等，都是在業務學習中可能而且必備之生的結果，事先看清目標，進行的過程就不把這些弄複雜了，這是精進業務學習的要領。

三

但在進行的初期，總會感到許多困難的，許多事務工作，我們這種工作，總是刻板的、瑣碎的，有什麼經驗可言？又有什麼值得研究之處？還不是做下去好了。在這種看法之下，於是乎方法問題發生了，材料問題發生了，還有其他像時間問題、興趣問題統統發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固然應該從方法、內容、制度各方面去想辦法、求改進，然而真是如此，向後技術，最重要的還是要找出問題的「本矛盾」加以解決。

什麼是問題的「本矛盾」呢？是一部份事務工作者對於事務工作的觀念和態度的問題。我們不可否認，在革命隊伍裏，雖然也有這樣一種人，他認為我是來做革命的政治工作的，不是來做這些雞零狗碎柴米油鹽的瑣事的，因而他對事務工作，抱着勉強態度，當談到上視之為終身事業。也有人想：我今天雖然在做這種工作，可是我將來是要做更大的更重要的政治工作的，因而就把我們的注意力，用去憧憬那偉大而遙遠的「將來」，却不肯專心于瑣屑而細小的「現在」。這種人對於事務工作是抱着不屑的「五日京兆」心理，抱着「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態度。這種觀念和態度，就成為業務學習最基礎的障礙，他壓根兒就不願意學習這種業務，因此，他總是拒絕業務學習，他總看業務前途，越發味不出工作中的系統和條理，於是他總是停留在舊觀念上，認爲所謂工作是沒出息的，是根本沒有所謂系統和條理的，因而他也就越不安於工作，工作也就越做不出名堂來。

對於這種人，任憑你定下如何嚴厲的學習方法與制度，供給如何豐富的資料，只管做到「法良而美」，終於會無補於事。有效的辦法，還是對部下總之先幫助他從認識上有所改變，才能達到使他自覺地改進對業務學習的態度和態度。

在這裏要徹底改變某些人對於革命的政治工作的錯誤看法，這些人，無論是在革命集團裏面或者是社會黨部門裏面，他們所憧憬的革命政治工

作，常常是中了舊社會誤解政治工作之毒藥的，他們認以爲忙於個人的天才手法，單憑一己的雄心大志，奔走呼號，高談政見，縱橫捭闔，叱咤風雲，大幹一通，如是之謂政治。抱着這種看法，當然會對一切事物性質的觀察工作，採取漠視和唾棄的態度。殊不知真正的革命工作，從領導方面講，就在於平實實的八個大字：了解情況，確定政策。從各方面的工作者來講，就在於了解一般情況，特別是自已工作環境的情況，以備于正確地運用政策。情況了解得越充分越透澈，則政策越有根據越可靠。反之，如果不了解情況，則政策勢必錯誤。如果總的政策正確，而某些方面的工作者對情況了解不清，則在運用政策中即有產生缺點或錯誤的危險，這就是革命工作的平實樸素的道理。因此，真正的革命工作，就在於革命理論與實際工作的互相结合，要使理論成爲真正革命的理論，也非對客觀事物作實際的調查研究不可。革命運動中的領導者，決不是僅僅懂得一些一般的政治口號的談話家，如果他本身沒有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做基礎，就不可能正確地把革命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也就不可能做好領導的工作。根據這種看法，就應該率領那些有志在革命事業中獲得更多成就的人，一方面，要好好地堅持這和遠大的志向，另一方面，就要把目光更多注視今天的實際問題，把完成進入志向的全副力量，引到今天的實際工作上來。認真今天一點一滴的事務工作，並不真正是不值得細細的事情，這種工作落在我們手中，應該有一種特殊的「護」——它是爲進步事業服務的，是進步事業的一個組成部份。同時，我們也應該有一種完全不同于一般價值性質的態度和方法去對待這種工作，我們把它看成對進步理論的實踐和印證，在它中間發掘新的方法和條理，搜求有用的經驗而加以系統化，每一項事務工作中都可以用進步的觀點開拓出新的領域來豐富我們實際工作的經驗，使我們的理論學習政治學習更充實、更生動、更加有血有肉的。只有那抱着不起眼的「工作的人，他，真，得不到實際工作中的樂趣，也真正不能把實際工作中開闢前途——把實際經驗逐漸提升到理論階段。這種人只是空想做「大事業」、做「政治家」，其結果是難免遇到一種可怕的幻滅的！

只有勇敢的接受實際工作，耐心地實踐和研究每件帶着事務性質的事實，這，你才談得上有前途；你的前途，並不如你所想像的「踏浪」——這是指有的人擔心他太遠而在他今天那樣「仔細」而煩瑣的工作上，得不到發展而言，這種要求進步的希望，當然，應有的。因爲不論對於工作本身

以及工作者的實際經驗，都是一天天的發展和增長的，這不簡單是經驗的移用，而是經驗的擴大。因此，當你今天在編一個小小的油印刊物，或者在管理幾個人以至幾十個人的伙食時，你不要以為人家勸你把這些工作看成是「終身事業」而去進行業務學習，是對你的一種諷刺，這的確不是諷刺，而恰恰是幫助你研究經驗發展前途，把你的工作變得更重要更有益於整個事業，我們不難想像一個編油印小刊物的人，能够發展成爲一個對黨的機關工作者，老百姓的代言人，同時，一個管理幾個人的伙食的事務員，可以逐漸担負起幾千幾萬人的行政管理工作，實是工作中的經驗，原來是踏踏實實的，只要你開始時不用輕蔑的態度對它，只要你肯用腦力去鑽，一定會鑽出更多道理來，以至成爲「專家」與「通人」的，難道我們不該確定一項業務來作爲我們的終身事業而全力以赴了更何況我們還有着革命理論的正確指導呢？

四

在完全解決上述基本矛盾的過程中，當然需要對進行業務學習的方法問題和材料問題得到適當的解答，才能幫助工作者對業務學習更熱心，培養他們的興趣，加強他們的信心，因爲，進行業務學習的初期，不論集體或個人總是容易遇到這兩個問題的。

我們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根據是什麼呢？是上述「對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這決定中明白指出業務學習的範圍包括下列五項：

- 第一，是關於各部門業務密切聯系的調查研究。
- 第二，是關於黨的政策法令指示決定的研究。
- 第三，是關於各部門業務具體經驗的研究。
- 第四，是關於各部門業務的歷史知識。
- 第五，是關於各部門業務的科學知識。

根據上述的範圍，可以明白業務學習的內容，在實際過程中，我們要把握住：（一）業務學習應着重技術的訓練，以增加技術上的熟練，但決不偏重於技術的訓練，它同時要進行對周圍情況的瞭解和法令政策的研究，因此，它與時事教育（特別是讀報）和策略教育有着密切的關聯；（二）業務學習應着重今天業務上的具體問題，以便與目前工作密切配合，但決不是僅限於今天的問題，它同時要學習本門業務的歷史知識，瞭解各人在今天以

前的實際經驗，而且，還要根據對時事對策略的了解，看見明天的發展前途，只有這樣，才能使業務學習不偏僅等於工作會議，而是較專門較有系統的繼往開來的工作；（三）業務學習所要求我們的知識水準，首先當然應着重能應付當前的需要，但同時還必須打下本門業務的科學知識，才能觸類旁通，不致有狹隘的弊病，因之與文化教育又有不可分處。這也就告訴我們，如果把幹部的業務教育與政治、理論、文化等教育割裂開來，是不合理的。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的具體方法有：

- （一）要有一定的學習計劃，此計劃需要和工作計劃相配合，要有分期的中心問題，問題要力求具體，範圍不大，對準工作計劃中中心一環或者薄弱的一環着手。工作計劃如有變更時，學習計劃也可適應工作計劃而變更。
- （二）要有學習內容的提綱，此提綱將計劃中所學的問題，加以科學的分析，使問題的內容條理化，以作爲搜尋材料、調查訪問和具體研究的骨幹。
- （三）閱讀材料，隨時聯系到本門業務的經驗，加以印證、批判與發揮，並用筆記記載，這樣一方面可以吸收材料中前人的經驗，一方面可以整理自身見聞與經驗的經驗。
- （四）調查與訪問，與本門業務的同事或有關對象交換經驗和意見，參觀與本門業務有關的地方，開調查會，進行個別訪問，最值得注意的是向那些有實踐經驗而受政治文化水準的限制不能從個別的零碎的事例中抽出經驗與方法來的人學習，把他實踐的事例提高，這是在業務學習中實踐向專業學習的最明顯處。
- （五）集體研究與訓練，延請或互推對某一問題有經驗的人，作有系統的報告，根據他的報告來進行詳細討論，整理其結論。同時也可以採用訓練班的方式。
- （六）實習與實施，業務討論或研究所得的新方法，可以隨時在實際工作中嘗試，正確的就可實施起來，以收改進工作的實效，同時也可以採取實習的方式。這樣來把「知」與「行」統一起來。

進行這些方法時，材料將成爲一個難題，特別是事務工作，很少有現成的而且與本身工作合職的材料，因此對於材料，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要看「活」。

（下接第二〇頁）

「治安強化」運動之透視

薛子正

一、什麼是一「治安強化」運動

所謂「治安強化」運動，按它的實質意義來講，就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政治軍事政策的政策。亦即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的「統力戰」。它的主要目的，在於「確切使「匪」／「抵抗日軍」／「民分離」／「掌握民心」／「確保華北佔領」。如果再仔細觀察一察民國二十八年敵在華北其「肅正治安」之初，敵北支派遺其所屬各部發出的重要指示，所謂「治安肅正」，即是「肅正討伐」，加上「治安」的工作和軍便台之總稱，先之以武力「掃蕩」，繼之以「宣傳」／「肅清」，以「肅正討伐」達到「治安」之手段。……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敵在我華北抗日軍民堅持敵後抗戰的威脅之下，感受到「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失望，於是要求「治安」，並要求以「肅正討伐」來達到「治安的目的」。可是歷時兩年的「肅正討伐」，又屢遭我各抗日部隊連年不斷的「反掃蕩」，「反圍剿」，「反圍食」／「圍爭」連串的打擊，敵的繼續威脅其交通線，「平漢，津浦，平綏，同濟，正太等鐵路與其佔領城市——北平，天津，石家莊，太原等之安全，因之「治安」的要求，就特別迫切，更需「強化」起來，把它造成一種運動，這就是敵後控制華北的新花樣。

根據調查研究所得，「治安強化」運動的具體內容，不外乎第一，嚴整保甲組織，重新調查戶口，統制物資，統制商業貿易，實行計口投糧，計口授薪，「務使物資不致散」／「指日軍」。第二「強化自衛」，在佔領各縣設立「保甲團」，加強自衛團，區區警備隊與保甲團，以期「自衛確立」。第三，「併村築堡」，選擇地形優良，易於防守的村落，將附近小村併入堡內，然後在堡內的周圍築起圍牆，以防我游擊隊之「進」在東北各省市已普遍實行而且得到其統治上的便利的辦法。第四，嚴厲圍剿游擊隊，將游擊隊圍剿，兵留兩連門出入，小村暫時不讓游擊隊，則堵截附近道路，僅留游擊隊，以便游擊隊行人。第五，嚴厲「連坐罰法」，肆意搜括，脅

逼民衆自動脫離我抗日政權，拒絕援助我軍。凡中國人對於「皇軍」建設「大東亞新秩序」有防礙者，雖爲民衆，亦以敵視之。」「凡居住於各都市及各村落之民衆，皆有担負確立「治安」之責，如各村中「現有」／「敵性」／「行爲者」，應共負責滅絕之。故宜爲息慮過失者，亦認爲「敵性」／「行爲」。在「連坐罰法」中，更具詳指出，「凡對於破壞鐵路，汽車路，電線，汽船等者，協力行爲者，即以極刑」。第五，推行奴化教育，「發展不圖厚」／「反日」運動，必須從思想糾正過來」。華北特務機關及偽新民會，即爲推行奴化教育的大本營。山西各縣特務機關督導下，恢復的小學，計九千五百七十餘所，包括學生二十萬零七百六十餘人。爲了從思想上糾正「反日運動」，敵在華北大批屠殺知識份子，特務機關督導北道訊中說：「近數月來敵在各地大肆屠殺知識份子，範圍之廣，不啻於今日之「日運動」。……僅在民國三十年十一月×日在大河東門外，一次活埋二百九十六人，迄今先屠殺回批，共八百餘人」。

「治安強化」運動實施以來，迄今已五次之多，它的經過是這樣：民國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六月截止，歷時三個月零十天，這是第一次，當時主要的內容是「加強「治安強化」之宣傳，喚起人民，實行反共，進行調查研究並肅清「思想不穩份子」建設「東亞新秩序」。第二次，自是年七月初至十月底止，歷時四個月，這期主要目的，是使人民能「自覺的」起來剿滅「共產黨」。第三，在對各抗日根據地之「封鎖」，擴張防線佔領，築壘掘壕，切斷各根據地之聯繫，並逐漸縮小我各根據地，以利「分而治之」。第四，是由同年十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告結束，這次時間以短，共計不到兩個月，這時重點在於「併村築堡」，強化「自衛」武裝的組織，確立以縣爲單位的「治安」機構。第五，則在是年（三十二年）三月開始，至六月十五日結束，這時太平縣游擊隊正有極大的發展，所以它的主要任務，是在「華北各省市總動員之準備」下，自「首先完成其「兵站」任務，以削減「共匪」之「據點」，「治安」爲唯一要職」。……（見華北偽政權特務機關特務二期的「方針

之下進行的。因之在我各根據地上大大的減低「三光政策」，「無人區」等慘絕人寰的把戲。第五期由七月初開始至九月一日截止，這次仍本第四次「治安強化」三大任務——促成「東亞新秩序」之實現，「剿共」「自衛」，動員生產，這兩個月的短期間內，重新掃蕩了晉東南，冀察，冀豫邊，冀魯邊各根據地。燒，殺，劫掠百無於往昔。而今也續第六次「治安」運動，又在各地「強化」一起了。

關於「治安強化」運動，在各根據地實地的舉動，與乎各地「治安強化」，反「蠶食」鬥爭的報導，從報紙雜誌上，使我們可以獲得一些片斷的概念，但這只不過概念而已。

二、我們應有的認識

(一) 敵寇爲了達成「治安」，必先「肅正討伐」，爲了達成「肅正討伐」，則利用其交通技術的優越條件，在各游擊區域普遍構築交通網，以利其現代機械化兵力的調集轉移。然而我們只知道所謂交通網，而不知道敵人在這些地區已密佈成了蜘蛛網式的交通網，火線交織了。以冀中區爲例，目前冀中區有幾近萬里的公路，如果把民國二十九年以前冀中公路的密度與現今已有的公路比較一下，很明顯可以看出敵人在這方面的拚扎了。

冀中公路密度比較表

年度	公路長度
民國二十八年	三四〇〇里
民國二十九年	六七五〇里
民國三十年	八七七〇里
民國三十一年(上年)	九七二六里

冀中公路，不僅密度與日俱增，就是在結構的方式上，也日益複雜化了。根據手邊現有的材料，略舉幾個典型的例子，提供對這方面有興趣的人士作參考。(一)「複線路」，這種路的構築方式，是把兩條或兩條以上的公路相並行修築，路與路之間的間距，至多不過四五十里，如博野，蠡縣間，高陽任邱間，河間，肅寧間即是如此。(二)「網形路」，或稱米字形路，這種路的構築方式，選擇一個中心地點——在戰略，戰術方面較有價值的地點作起點，由這個地點起，向着四面八方各據作輻射狀的發展，如以任邱爲中心，北向鄭州鎮，東向肅公營，南向河間，西向高陽，東北向梁各鎮，

東南向臥佛寺，小店，西北向育塔鎮，西內邊武口等處。(三)「十字路」，亦稱蜈蚣形路，這種路的構築方式，主要的是以鐵路作骨幹，而向兩側修築，這在不漢路北段沿線，特別明顯，如以涿州爲中心的安國，蔚山間汽車路，以定興爲中心的新城，易縣間的汽車路，如以保定爲中心的高陽滿城間，安新，完縣間，以望都爲中心的唐縣間，以定興爲中心的安國滿城間，以安國爲中心的，無極行唐間等汽車路是。如果把這些路繼續接成網，則當然蜈蚣虫一樣呈線狀上。(四)「環形路」，亦稱環形路，這種路的構築方式，以一據點爲核心，以十五或二十里爲半徑，環繞據點修築重疊汽車路，大圍套着小圍，再由同一核心據點修築輻射路，遂構成蜘蛛網式的交通網，如安國周圍即是。此外並在重要的兩路交叉點上，還修築吊橋，晝夜巡邏，由此可知敵對交通控制的嚴密了。

(二) 敵人爲便利其「分區圍剿」，「合圍掃蕩」，則對我各根據地，拚命「強化封鎖」，但我們只知道一些「封鎖線」，「封鎖溝」，「封鎖網」等軍事術語，而不知道敵人的「封鎖線」，是用火線交叉射擊，構成的火網，即所謂「火網政策」。敵人的「封鎖溝」，不僅寬度，深度增加了，(寬二丈，深三丈)而且在其某些地區，這種「封鎖溝」竟增至五層，六層，乃至七層之多。儲在冀中區一地，截至三十一午六月止，已築有「封鎖溝」約一二，一四〇里。其中有一部份引水灌入，變成一道一道的水渠。至於「封鎖線」呢，也不是我 想像的一般的圍牆，可以隨意爬過去，或猛力衝破得倒的。而是高至一丈五尺乃至兩丈的土塔式的建築，基礎厚約三尺乃至五尺的高牆，牆下還架設有鐵絲網，或埋有地雷等障礙物，由是可知軍插「封鎖」之難。絕不是偷過，而是要戰鬥。

(三) 敵人爲使我軍民分離，以利「掌握民心」。以於這一點，我們只知道交通沿線的兩側十里路以外，在敵寇強迫之下，建立有所謂「保護村」的組織，而不知道這些「保護村」的人民，不僅要擔任附近道路的修築，而且要輪番派出人來守護。守護的辦法，每夜要由保護村派出三人至五人的巡邏隊，擔任護路巡邏，以馬燈，梆子，銅鑼等爲聯絡和報警信號。據點的日本守兵，一聞警報，立即在戰守準備，或迅速出擊。此外，更規定有一條「路牌」，亦稱「安全牌」，這種「安全牌」的傳達法，由保護村派人持牌由這一據點送到另一據點，敵寇則在牌上蓋押蓋章，這表示「平安大吉」，如果不能按時傳到，則「兇多吉少」，敵則沿途射擊，或派隊出擊。傳牌人

誤時圖者，重則處死，輕則被囚。這有一種「掌握民心」的辦法，如發現這路被游擊隊破壞一天，則在附近村莊捉殺一人，將人頭掛在桿上「示衆」。這叫住「殺一個儆百」。如電桿被拔，或破壞一機，則迫令附近村莊人民繳納罰金一千元，罰去電線一丈，繳納罰金四百元，這比之「連坐罰法」中則更甚其難，使軍民分話的極難設計更難練。

(四)我們只知道敵人固守據點抵抗，「繁瑣據點」，而不知道這據點在冀中區根據地，敵人據點繁瑣的平均密度，以X×X集團軍編三十一一年九月統計，在冀中第五週年一年間，冀中敵據點增至一千五百餘個，平均每十一里內，即有一個，平均每四里內有據點一座。更不知道這些據點是由於敵人現代的科學的軍事技術所構成的，再加上現代機械化的防禦配備，這就不止我們背負的拙劣武器的抗抗日部所能輕易擊毀的。敵人根據現代防禦工事的原理，採取某城或某村的一角，或其中一二個和一二個以上較大的防禦，利用原有的牆壁，加以增設射擊設備，在道周圍再增加鐵絲網，鐵絲網上繫響鈴和手榴彈，鐵絲網外加外壕，壕外敷地雷和鹿砦，鐵釘。壕內面再挖有秘密地道，到壕以外的坑道。當壕內邊我軍擊來不及抵抗時，則敵人地窖以內，乘我軍搜索，嚴政警戒戒勿的時候，則實行反擊。如戰鬥失利，則坑道逃遁，並乘機抄襲我軍翼側或後路。

(五)敵人在「掃蕩」戰術的方面，也有些新的改進。在「掃蕩」準備時，偵查工作較過去更靈活，更周密，除加強勤務份子外，並以高價收買民衆散探，組織偵查偵察，或利用胡胡充奸細混入我各根據地，刺探我方軍情，進行偽組織活動。或乘「討伐隊」進時，起而內應，使我軍後方。(去年春對石家莊「掃蕩」中，曾迭次發現)。在「討伐」時，則以偽軍編隊或偽警隊爲先導，或偽裝我軍方武裝作尖兵，使容易迫近我行政機關和宿營地，或派出小隊主力十幾或二十里之行程前進，以誘我軍偵察或作掩護，乘我之虛，再作第二、第三次的「合圍掃蕩」。或在戰鬥開始之前，即以二部主力扼守一切交通要點，再以全部主力長驅直入，實行「掃蕩」，迫使我主力無路可退而聚殲之，或舉行「三光政策」，毀滅我軍生存條件。敵敵階級階級的「無人區」，縱橫百里成塊，當然就不會有一不穩份，也不會有一抗日。

(六) (全段被略六百餘字)

(七)敵人在各抗日根據地所造成罪孽，是罄竹難書的。冀中平原，在敵人「三光政策」之下，民房燒燬了六萬餘間，糧食被燒燬了五千八百八十八萬餘斤，田禾糟踏了五萬餘畝，人民被殺死或殺傷的在五千人以上。被捉去男女亦有二萬餘之多。在五百餘里，由於敵人「三光政策」所造成的人區，東西寬約五十餘里，南北長約百餘里，是過去有四十三個村莊，三千五百餘戶，一萬五千七百餘人的廣大地區，而今竟成鬼域。在晉東南晉南附近山溝中，敵搜捕了避敵的人民二百餘，該縣縣署門口堵死，全部搜燬活埋。在冀中平原北村地道中，敵將大量惡性毒瓦斯放進去，毒氣蔓延中八百餘人，手無寸鐵的人民窒息而死，從此北村再也聽不到人民的哭聲，聽不到兒啼，聽不到雞鳴狗吠了。

三、敵人不能「掌握民心」

由於敵人無限制的殺，掠奪，不惟不能「掌握民心」，且加深了民族仇恨，緊定了廣大民衆誓死抗到底的決心，使他們更緊密的團結在我抗日武裝的周圍，隨之都能大批出動，配合我軍作戰。如去年三十一一年二月我X×集團軍X×師在平漢路北段高邑至邯鄲間，曾發動民衆萬餘人，破壞了沙河至邯鄲間鐵道及武安至邯鄲間邯鄲至安國，公路數十里，摧毀房屋二十四座。

由於敵人不能「掌握民心」，故一年來(抗戰五週年)我X×集團軍能破壞鐵路六五〇里，破壞公路六，一四八里，一燈火車一〇列，汽車三三九輛，破壞一月船二，一五八里，毀一封鎖橋一三五四里，毀橋一，五一六座，拆電桿六六九，九九〇根。我華中抗日游擊部隊，在一年間破壞鐵路九六里，公路一，一九四里，橋樑二三七座，砲擊一二四座，汽車一〇三輛，汽船五一艘，木船一三七艘，拆電桿六，七一七根，電線一七，一七二斤等。在冀中區晉，深兩縣，曾一次發動民衆四萬餘人，在我軍掩護之下，將滄石路(晉，深)路基金面破壞，粉碎了敵人鐵軌計劃。門爭堅持一星期之久。在深縣一縣，會動員民衆二三五〇餘人，於二小時內，將全縣長約一六五里的公路，全破壞。在安(國)定(縣)公路間，一夜會動員了一七〇〇餘人將安定公路破壞。

由於敵人不能「掌握民心」，所以縱使在敵軍萬大軍的「包圍掃蕩」中，我冀中區某部指揮部及其處部隊，都能在廣大民衆掩護與幫助之下

，跳出了敵人的「鐵壁合圍」，「分區游擊」的掃蕩團，通過了四十餘里的敵佔領區，渡過了漳沱河，而且是在大天白日，經過了三道封鎖線，六個敵人的據點，擊退了被擊我軍去路的敵人，達成勝利的轉移。（見新華日報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副刊。）

由於敵人不能「掌握民心」，我我××集團軍在抗戰第五週年一年間我能獲傷敵官兵四萬九千一百三十六名，俘敵官兵一百四十五名，迄今猶牽制着敵寇十個師團，十二個獨立旅團之衆。

由於敵人不能「掌握民心」，所以偽軍被俘，反正者與日俱增，據××集團軍去年九月統計，僅在第五週年一年間，共俘偽軍官兵一五四四七名，爭取偽軍反正者三三三五名。就是向稱武士道精神的「皇軍」，在過去一年間被××集團軍俘獲的也有二四五名，自動投誠的六六名。

由於敵人不能「掌握民心」，所以我各地自衛軍，農民游擊小組，仍能普遍活動，積極執行站崗，察路條，瞭望，偵察等保衛家鄉，保衛抗日政權及剷除敵探漢奸等工作。在大清河北岸游擊小組，往往追近敵據點周圍活動，對據點以內敵人實施「反封鎖」，不准任何人員接近據點，使敵人得不到任何接濟，因死餓死於據點之內。

由於敵人不能「掌握民心」雖在敵據點以內或其附近，我猶能得到民衆掩護，進行抗日教育和宣傳與一切戰鬥動員，佈置情報網及監視哨，這幾乎成爲敵後普遍的景象。

四、結語

總而敵人對於我游擊戰之「治安強化」運動，必然會繼續下去的，而事實上正繼續着。使「匪」民分離，「掌握民心」的謠言，也必然會愈出愈奇，這也是意料中事。

「沒有英勇的戰鬥，便不會有抗戰的勝利。」沒有親密的團結，沒有充裕的經費，彈藥，醫藥的補充，也無力徹底粉碎敵人的「治安強化」運動，與其佔領華北之企圖。

「但我們也同時向全國全世界伸出我們希望的手，希望給××軍，及敵後抗戰軍民予以經濟彈藥之援助，予以抗戰後抗戰的應有援助。」這是朱德總司令「勝利在望」的結語。

一月三日脫稿

（上接第一六頁）

比如我們第一種最易想到的材料就是書本，但這就很難滿足我們，有時甚至要採用「沙裏淘金」的辦法，去在一大本書中吸收有用的知識，因此，第二種材料應該就是經過考慮較成熟較有系統的提綱，根據提綱去主動吸收材料，而不是被動的跟着材料跑，但單有提綱與書本不夠，所以第三種是筆記，筆記可以按照提綱來吸收書本中的材料，來整理經驗和意見，來記載親身訪問的收穫，來記錄集體的報告等等，因而筆記是進行業務學習的重要工具，同時，它回過來又可成爲業務學習的材料，第四種，就是討論的結論，整理出來，又可成爲很重要的材料，第五種，就是搜集文件，如前述的法令、指示與決議，如報章上有關的消音、章程和廣告，如有關地方的條例規章統計表格等等，這些都說成是原料，怎樣運用，還須經過分析和研究，消化到本門業務的實際問題中去。因此，我們可以說，坐在家裏歎息沒有材料來進行業務學習，是沒有用處的，與外界接觸愈多，則得到材料的機會也愈多，社會上有不少活的材料供給我們來活用，問題就在於我們是否去與這些活材料發生關係，調查研究，大而言之，是決定政策的必由之途，小而言之，是改進業務的不二法門，從這個材料問題上也可以得到具體的證明。

業務性質是各種各色的，因而業務學習的方法與材料問題，要看各項業務的具體情形如何。隨時加以改進與發現，我們決不能用局部經驗來推測，來千篇一律地回答問題。同時，就進行業務學習的環境而言，也就各有不同，有的業務機關能有具體的有計劃的業務學習，有的業務機關則並不如此，縱有亦只是純技術的（但僅是純技術的來話，我們也不應忽視），這就依據那些有志於社會事業的工作人員，本着勤於職業的精神，認清業務學習的意義和內容，根據自己的條件去進行調查研究工作，來幫助自己認清工作前途與工作環境，培養工作興趣與專門技能，鞏固自己的社會職業，奠定自己的社會基礎，一方面要把握好自己的志向，另一方面要從實際工作上用功夫。我們要培養自己成爲千百萬各種業務的專家中的一個，這不論是今天和將來，都是對革命有利的，讓我們相信中國社會的一句老話——「行行裏面出狀元」。

明末農民運動研究

陳家康

中國社會自從進入以封建制度為主要生產方法的歷史階段以後，農民運動就成為重要的社會動力。對內而言是如此，對外而言也是如此。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元代。一般歷史學家所謂元代，實際就是蒙古帝國。中國民族之所以能够從蒙古帝國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主要的是依靠所謂彌勒白蓮教匪和江南羣盜的農民反抗運動。大明帝國的建立者朱元璋從郭子興起兵於濠時，也不過是紅巾軍的一個領袖。同時，還要避用韓林兒的龍鳳年號。明史太祖本紀載：「然念林兒勢盛，可倚藉，乃用其年號，以令軍中。」這年號一直使用到龍鳳十二年，猶有明文可考。據弇山堂別集卷八五詔令雜考所載平周榜，榜末猶注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字樣。龍鳳十二年就是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是年十二月韓林兒卒。明史太祖本紀載：「十二月韓林兒卒，以明年為吳元年，建廟社宮室，祭晉山川。」是見朱元璋於韓林兒死後，始以至正二十七年丁未為吳元年。次年戊申，始建國號曰明，建年號曰洪武。幾都金陵。這種事實已足證明朱元璋與韓林兒父子的出身沒有兩樣。問題就在於至正十五年（龍鳳元年）朱元璋渡江而南以後，逐漸與江左的地主發生，互相結納，而發生一種轉變。這種轉變使朱元璋集團的社會性質，由所謂彌勒白蓮教匪和江南羣盜之流，一躍而為歷史的正統。舊日的彌勒白蓮教匪和江南羣盜，次第在朱元璋的討伐之下，歸於消滅。不過，也就種下了有明二三百年間農民叛亂的根芽。然而，拿歷史眼光看，朱元璋仍然繼承元末農民反抗蒙古外族統治的運動，把這個民族解放事業加以完成。這就是朱元璋的革命性。假使不了解朱元璋的革命性，就不會了解五六百年來的中國歷史。

再以農民為出發點來看。農民運動本來有兩種任務：一個是為反抗外族侵略；一個便是為反抗當時社會制度。元末農民以彌勒白蓮教匪和江南羣盜的姿態出現，完成了反抗外族侵略的任務。但是，由於朱元璋的轉變，並未完成反抗當時社會制度的任務。因此，有明二三百年間，不但彌勒白蓮教匪的叛亂未曾停止，而且新的江南羣盜，甚至河北羣盜也不斷出現。這種

農民叛亂，實際上是朱元璋親手留下來的的大問題。明末農民運動便是這個大問題的清算。正當明末農民們清算這個在明初就未解決的大問題時，另一在明初已經解決的大問題不幸再度發生。這就是滿清外族的侵略問題。於是擺在農民運動面前的仍然是兩個大問題，或者說兩個大任務。

所以，當我們研究明末農民運動時，很清楚的看出，這個運動可以分成兩期。這兩期運動的前期與崇禎時代相終始，因而叫做崇禎時期。這個運動的後期與南明相終始，因而叫做南明時期。前期以反抗當時社會制度為主，後期以抗外族侵略為主。中間以滿清外族入關為轉變點。在這裏，我們所要研究的便是以反抗當時社會制度為主的前期如何轉變而為以反抗外族侵略為主的後期。

（一）崇禎時期

明末農民叛亂是在崇禎元年開始的。明史李自成傳載：「崇禎元年，陝西大饑，延綏缺餉。固原兵劫州庫。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九，宜州賊王左掛，及山虎，大紅狼等一時並起。有安塞馬賊高迎祥者，自成舅也。與饑民王大梁聚眾應之。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李自成。這樣一來，便開始了這個農民大叛亂。

這個叛亂的社會根源很清楚，乃是封建社會制度的產物。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在其青年時代也是這種農民叛亂的領袖。所以，這種農民叛亂在一定的社會基礎之上，自有其必然性。而明末清初有史識的人士對於這次叛亂的重原因也說得極明白。明史李自成傳載：「是時秦地所徵，曰新餉，曰均輸，曰開架，其目日增，吏因緣為姦，民大困。以給事中劉懋謙裁驛站，山陝游民仰驛者，無所得食，俱從賊，賊轉盛。兵部郎中李繼貞奏曰：「延民饑將盡為盜，請以帑金十萬振之。帝不聽。」再看農民方面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和實辦法。明史李自成傳載：「嚴因說曰：「收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為減。又散所掠財物振饑民，民受餉者不辨級

自成也。韓呼曰：「平公于活我。幾復遺毒。曰：迎國王不納。韓使宣欲以相。從自成者日衆。」只要把這兩段文章一對照，我們立刻看出這次農民叛亂的性質，不必另加解釋。所以明史李自傳又云：「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弊賦重，外江內叛，譬如一人一身，而氣脈塞，這毒並發，厥症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劑寒熱互投，病人受育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由，不止於流賊也。」這話見解，不體說錯。因此，我們要把明代致亡之本，與所謂流賊問題弄清楚。所謂「流賊」並非明代致亡之本。反之，「流賊」却是由於明代先有致亡之本。然後產生流賊的結果。

當然，明代致亡之本是一個社會問題。自從明太祖脫離了所謂頑勸白蓮教和江南盜寇的社會性質，而建立一個絕對專制的封建社會以後，同時就排了明代的「致亡之本」。這個「致亡之本」既然存在，莊烈（莊烈之年號爲崇禎）雖非亡國之君，也毫無辦法。所以我說，崇禎時代的農民運動是以反抗社會制度爲主。除非把社會制度改革一下，當時農民運動問題，決不能解決。

(一) 三個段落

崇禎時期的農民武裝運動是從崇禎元年算起至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入據北京爲止。前後十七年，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由崇禎元年至崇禎十年止。崇禎元年，即農民叛亂的第一年，「賊勢」並不大，只有四股。白水王二算一股，府谷王嘉九算一股，宜州王左樹算一股，安塞高迎祥算一股。崇禎二年，即叛亂的第二年，白水王二這一股被參政劉遇清消滅了，王二本人也死了。與高迎祥同夥的王大業也死了。王左樹這一股也被洪承疇擊破。沒有吃虧的只有王嘉九這一股。所以在叛亂初期，王嘉九以及繼承王嘉九的王自用（號紫雲梁）乃是「賊魁」的領袖。崇禎三年，即叛亂的第三年，舊的叛亂未滅，新的叛亂又起。於是一元、不活泥、可天飛、鄭應虎、紅軍人、點燈子、李老榮、混天猴、獨行狼、一賊一賊紛紛出現。同時張獻忠亦起事，稱八大王。先一年，李自成已從高迎祥起事，號顯將，未有名。崇禎四年，即叛亂的第四年，形勢大變。崇禎元二三年的叛亂都在陝西，故稱秦賊，與平天國稱爲晉賊相同。崇禎四年王嘉九死，其黨徒亦自爲寇。自用號稱合老團練、曹操、八金剛、掃地

王、射塌天、關止虎、南天鼠、破甲鑽、那紙鴉、上天龍、蟠子城、混天壽、混世土等及迎祥部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攻略山西。於是這次叛亂，分道四出，攻略各州縣，李自成亦起。崇禎六年，張獻忠仍以山西爲根據地，一軍又由隴北入河北。復由那那摩天嶺西下武安，擊破左良玉。迎祥、自成、獻忠、曹操、老獨漢等集於河北，十月河北山西諸賊二十四營突從毛家寨等處渡河，還陷河東澤州伊陽盧氏三縣。賊入河南後，復分兩路，一路由南陽汝州入汝陽當陽，偃湖廣。一路由巴東等處，破潯州，攻開元，偃四川。崇禎七年，即叛亂的第七年，秦賊復入漢南。迎祥自成一度因於興安之軍竄。其後又由興安竄入今甘肅所屬之平涼臨洮一帶。已而更出，陷隴州、鞏昌、汜水、棗陽。叛亂最初的七年大概這樣過去的。在這七年中，叛亂延及陝西，由秦而晉而燕而豫而湖廣而四川而甘肅。但是秦賊的主力始終是合而爲一，並未分化。同時在這七年中也沒有一個中心人物，能够取得領導地位。李自成經過高迎祥而爲領袖，此七年中，其威望尚在賊眾之下。

第二個段落由崇禎八年至崇禎十二年止。崇禎八年，即叛亂第八年，秦賊張獻忠在秦陽召開了一個軍事會議。明史李自成傳載：「八年正月大會於秦陽，參議劉、曹操、李老榮、左金、改世王、射塌天、橫大王、混天壽、過天星、九條龍、關大王、及迎祥、獻忠共十三、七十二營擁護，未決自成進曰：『夫秦陽，混天壽家也。官兵無能爲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平秦東左金王當川滿兵，橫天壽混天壽當陝兵，曹操橫天壽扼河上，迎祥獻忠及自成等據東方，老獨漢九條龍往來策應，陝兵歸，益以射塌天、改世王。『如果我們站在秦陽，老獨漢九條龍往來策應，陝兵歸和戰時已經死了路綫上的錯誤。當時十三家七十二營的大軍只有一條路綫可走，就是由秦陽北渡黃河，攻略山西、河北、山東，然後可以直趨燕京。當時並非有人提出這種主張。明史張獻忠傳載：「八年十三家會秦陽，議賊官軍，守應欲北渡，獻忠以之，守應以之，李自成爲解，乃定議。獻忠始與高迎祥並起作賊，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與獻忠並，及是遂稱領袖，與俱東渡，遂破河南江北諸縣，焚秦陽。』在秦陽會議中，張獻忠具有決定作用。但是獻忠的路綫却是一個失敗主義的路綫。從秦陽會議以後，獻忠不敢北渡黃河一步。是年（崇禎八年）二月，「秦賊」陷鳳陽，焚秦陽。同時，張獻忠

在秦陽會議中，張獻忠具有決定作用。但是獻忠的路綫却是一個失敗主義的路綫。從秦陽會議以後，獻忠不敢北渡黃河一步。是年（崇禎八年）二月，「秦賊」陷鳳陽，焚秦陽。同時，張獻忠

與李自成同時第一次分發。明史李自成傳載：「自成從獻忠東走，獻忠小爾，彼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借迎祥西趨歸德，即會孫過天恩會（此兩軍原扼河上），復入陝西。獻忠獨東下。自成遣使，我看出「秦賊」已有兩條路。一條以李自成為代表，向黃河以北發展，一條以張獻忠為代表，向黃河以南發展。崇禎八年九年十年，可以說是張獻忠向兩條路的極盛時代。「秦賊」的主力軍部在獻忠的領導之下。同時，李自成的向北路線受到挫折。因為李自成的路線雖對，但力量不大。然而向兩條路是錯誤的，結果崇禎十一年張獻忠的投降之捷，以及十二年十三家七十二營的大失敗。明史張獻忠傳載：「明年（即崇禎十二年）射塌天、混天、過天星、關索、五光、黑等十三家渠帥，先後投降，陝西總督洪承疇，巡撫孫傳庭復大破李自成，自成竄歸國山中，朝庭皆謂賊將死矣。」所謂大破李自成者，有兩次，一次在崇禎十年七月孫傳庭擒高迎祥歸降，磔死。一次在十七年秦孫傳庭洪承疇大破李自成於梓潼。所以叛亂的第二段落，一般說來，是向黃河以南發展的段落，也是叛亂失敗的一個段落。

第三個段落由崇禎十三年起至崇禎十七年止。這是李自成的極盛時代。崇禎十三年，即叛亂的第十三年。魏叔子甲申傳信錄李自成始末載：「是年（即崇禎十三年）自成復招集亡命百餘人，潛渡入豫，計取洛陽，竊盜復聚，自成遂為寇魁，稱關王。」（按自成於十年迎祥死後即稱關王）。又明史李自成傳載：「自成乃竊焚驛，輕騎出郟走河南，河南大旱，解脫萬錢，饋民從自成者萬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啟泰。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脫萬安王榮。攻偃師，知縣徐日泰。賊死，時十三年十二月也。」是年李自成得盧氏人牛金星以為謀主，又李自成（後改名崇）宋獻策以為謀士。崇禎十四年，即叛亂的第十四年自成破洛陽，殺縣王常洵，遂圍開封。崇禎十五年，即叛亂的第十五年，自成收據傳庭兵於南陽。復取襄陽。崇禎十六年，即叛亂的第十六年，自成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改襄陽為襄京，定制度，乃自稱新順王。於是自成召開了一次襄陽會議。明史李自成傳載：「集牛金星等議其所向，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請下金陵，斷蘇郡糧道。從軍顧君恩曰：金陵居下流，恐難濟，失之緩。直走京師，不勝，還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大王孫祥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得向京師，庶幾進取無虞，萬全無失。自成從之。」把這次會議與崇禎八年襄陽會議一加對比，我們便知李自成與張獻忠兩人的優劣。是年（崇禎十六年）十月十四日自成破開封，二十日破西平。是年十一月，「自成大會羣賊，我馬萬匹，旌旗連亙數十里。」（以上皆據甲申傳信錄李自成始末）。崇禎十七年，即叛亂的第十七年，自成由陝西南趨，遂於三月十八十九兩日破破燕京。叛亂至此，又告一段落。

（三）崇禎時期的代表人物李自成

李自成與張獻忠是兩個相反的人物。獻忠一開始就是個失敗主義者。獻忠屢次採取屠殺政策乃是其失敗主義的必然結果。當然，獻忠也還算得一個農民叛亂的領袖，但對他個人而言，却是一個最壞的領袖。李自成與他相反。自成絲毫沒有採取張獻忠式的屠殺政策，反之，他還時時散放財物，以振饑民。破洛陽時，發稱王詔，以振饑民，就是一證。（見明史李自成傳）。自成的軍紀很好。明史李自成傳云：「軍令不許殺白金，過城邑不得室。妻子外不得擅離軍人。農具悉用單布幕。」自成個人生活極其簡樸。明史李自成傳云：「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統綳，腰下女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皆嗤鄙之。」又自成攻開封時，為明將陳永福射中一目，遂眇。後破西安，陳永福不敢降。明史李自成傳云：「陳永福以矢射中自成目，保山嶺不敢下，自成折箭為誓，亦降。」種種故事說明李自成極有度量。

從大處看來，李自成乃是一個極有政治天才和軍事天才的農民領袖。明末的農民運動不拿宗教說詞，而以政治說詞，這在以前的優秀之處。而李自成的政治面目最清楚。自成崇禎十七年二月破無棣，於二十二日令兵政府傳檄郡縣中云：「君非道暗，孤立而煽爾恆存。百靈行私，比鄰而公息絕少。賄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運示紳，國法之誦言皆盡。」（見甲申傳信錄李自成始末）。所以，要弄清李自成的政治面目，却非常容易。至於李自成的軍事天才首先表現在騎兵游擊戰。明史李自成傳云：「一兵得馬三四匹，冬則以茵褥共其暖。」又云：「軍止，即出校騎射，日始晚。夜四鼓，應食以飽令。所一崇禎破城，騎馬直上，水惟懼黃河，若惟泗河，則可乘。是馬背，或抱靈柩，呼風而渡，馬躍所登，水為不流。隨陣列馬三萬，名三塔。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再兵伴取官兵。步卒長鎗三萬，舉刺如飛，馬兵四，無不大勝。」這是極極極而富。戰略方面，則李自成

始極堅持向黃河以北攻略，造成他致勝的基礎。如果從戰略上來看李自成與洪秀全，自成遠在洪秀全之上。

(四) 南明時期

南明時期的農民運動，可以從崇禎十七年（按崇禎十七年即順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與滿清攝政王多爾袞的侵略軍隊接仗時算起，至清順治十八年十二月三日緬甸人執永曆帝以歐吳三桂李定國開報痛死時為止。前後計十八年。這個時期的農民武裝運動以反抗滿清外族侵略為主。

滿清自太祖努爾哈齊於明萬曆四十四年建國號曰後金，建年號曰天命之時起，即有侵略中國之圖。因此，這個外族侵略問題老早存在。到明崇禎帝即位，不但外族侵略問題日益嚴重，又加上一個農民叛亂問題。於是大明王朝就有了兩個戰場。就當時形勢而言，反抗外族侵略的戰場是最重要的。因此，內部戰事應當用政治上的辦法結束。然而當時的歷史却不是按照這種道路發展的。同時，擺在農民運動面前的也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反抗當時社會制度問題；一個是反抗滿清外族侵略問題，此係就客觀而言。若就主觀認識而言，我們不能不說，崇禎帝時的農民領袖，包括最優秀的領袖李自成本在內，對於這個滿清外族侵略問題，也沒有深刻的認識。儘管李自成及其集團，都有民族意識，但他們根本沒有民族政策。

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由於吳三桂勾引滿清外族入關，使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集團碰著了一個外族侵略的新問題。順治三年清肅王西征，射殺張獻忠於西充之鳳凰山，又使張獻忠的農民集團碰著了一個外族侵略的新問題。同時也就使全中國的農民碰著了一個外族侵略的新問題。怎樣辦呢？當然只有反抗。當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四月三十日由燕京西去之後，屯兵真定。吳三桂進之。「自成復派兵援，率諸賊師直逼營前，大罵曰：今日決一死戰，勿令外國來助，乃為漢傑耳。」（引自邵城琉璃廠留雲居士排字本明季稗史彙編卷四吳四王合傳頁五）據此足見李自成的民族精神。因而李自成的集團也就毫無問題的走上了反抗外族侵略之路。

(五) 兩個段落

南明時期的農民武裝運動分為兩個段落。自順治元年至七年為第一段落；自順治八年至十八年為第二段落。第一個段落與第二段落不同。在第一段

落中，農民反抗外族侵略運動與當時南明王朝的反抗外族侵略運動開始聯合。到了第二個階段，這兩個反抗外族侵略的運動，縱聯合為一，於是出現了像李定國這樣的人物。但是南明時期農民集團的領袖中也有個別的思想意識不正確分子，這種人拿孫可望做代表。南明時期的孫可望可以與崇禎時期的張獻忠相比擬。南明時期的李定國可以與崇禎時期的李自成相比擬。

(甲) 第一個段落（順治元年至順治七年）

在這個階段，我們特別着重說明以反抗當時社會制度為主的農民武裝運動，怎樣轉變成以反抗外族侵略為主的農民武裝運動。同時，還要說明新的反抗外族侵略的農民武裝運動怎樣出現。

一、李自成集團反抗滿清外族侵略的運動。順治二年滿清軍隊攻破關，遂陷西安。自成走武功，復走延州。至通城，駐九宮山。九月自成微行，為村民所殺。自成死後，猶有部眾三十萬。仍由自成兒子李過領導，遂與何騰蛟聯合，反抗滿清。明史李自成傳載：「自成兄子過改名錦，借諸侯帥，率高。降於總督何騰蛟。時唐王立於閩，賜錦名赤心，封高氏忠義夫人，號其軍曰忠貞營，隸騰蛟麾下。永明王（即永曆帝）時，赤心對與國侯」。把這件事詳細記載得最詳細的是明史堵允錫傳。堵允錫是當時親與李過談判的人。允錫傳云：「李自成死，衆擁其兄子錦為主（按李錦即李過，隨李自成於崇禎二年起事），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一功。錦避居潯州，擁衆三十萬，言乞降。遠近大震。允錫議撫之，騰蛟亦馳檄至，乃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稱謂賜高氏命服，錦一功。錦王金銀器。賜其家，皆歸錦拜謝。乃即軍中宴之，導以忠孝大義數十言。明日高氏出拜，謂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別部田見秀，劉汝慰等亦率歸。唐王大喜，加允錫兵部右侍郎，兼右叅都御史，總制其軍，手書獎勞。授錦御營前部左軍，一功右軍，並得龍虎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賞賚有差。就其軍曰忠貞。封高氏貞義夫人，賜珠冠綵幣，命不可違。賜曰淑賢中興。允錫遂與赤心等深相結倚，以自強。然赤心實疏濬稱自成先帝，稱高氏太后云。已而袁宗第劉體仁諸黨先歸騰蛟者，亦引與赤心合，聚益盛。允錫以劉體仁等，令駐江北就食。明年正月，騰蛟大舉，期諸軍會常州，濶赤心先至，餘還濶不進。永明王立，進允錫兵部尚書，總制如故。」（見明史卷二百七十九列傳一百六十七堵允錫傳）。這樣一來，李自成的農民集團便成爲南明時期一支強有力的抗戰力量。

二、張獻忠與國反抗滿清外族侵略的運動。張獻忠於順治三年為清順王射死。據明史張傳傳云：「獻忠既死，賊寇可望能奇文秀定國等潛入川南，殺會英李乾德等，後皆降於永明王。」孫可望李定國與永明王（即桂王，永曆帝）合營，係順治八年以後的事，屬於我們所說南明時期的第二階段。但孫可望李定國與永曆帝商議聯合，則始於順治六年己丑（即永曆三年）。

遺中間還有平定阿迷土官沙定洲的一件大事。據明史楊長知傳：「乙酉（係順治二年）秋，武定土官習必至，必至伏誅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繼之，據雲南。」又云：「明年（係順治三年），並在張獻忠死後）孫可望等入雲南，定洲避敵，大敗，還歸阿迷。可望等遂據會城。初，唐王聞長知抗賊，遣使右僉都御史，遵撫雲南，以撫吳兆元為總督。及可望等至，以長知同鄉（長知係陝西寶雞人），甚重之。每與劉文秀西略，長知拒賊，賊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為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民扶明室，非有他也。」長知曰：「我聞之，曰：命我爾。可望曰：不信，當折矢誓。」又云：「己丑（此係順治六年，永曆三年）遺長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魏春赴會，遺可望，請王封，為金備等所持。長知乃曰：可望欲權用劉李上兩（劉指劉文秀，李指李定國），今皆之上公，而昇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親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卿趙鼎為使，加長知兵部尚書，乘兵部侍郎同行。可望允劉李賜名，得便宜行事。是乃就與謀，矯命改封可望平遠王，易殺費以往，武康伯胡恭者，慶國公陳邦傳中軍也。守泗城州，與雲南接。欲自給可望。言於邦傳。先矯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圖李赤心也。邦傳乃請金章曰秦王之寶，壞所給空敕，令執恭肅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長知等卒。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長知曰：此偽也。恭亦曰：彼亦偽也。所封假景國公，故印故在。可望怒，辭散，使下長知及恭恭獄，再遣使召梧州開故，廷臣始知矯詔事。（明史卷二百七十九列傳第一百六十七楊長知傳）。

這一個對王的糾紛到後來也解決了。據黃宗義著永曆紀年云：「滇土略定，而北師下沅，張光壁，侯天錫退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詣行在，請出師賊賊。有為上言不察賜之璽書，直云：皇帝愛書璽玉，則前萬壽斬斷，方可使之盡瘁也。上從之。可望具疏謝恩。」

三、崇禎十七年以後新起的農民反抗滿清外族侵略的運動。李自成張獻忠兩個農民集團在崇禎十七年以後已經由反抗社會制度為主轉變到以反抗外族侵略為主。同時這兩個集團又開始與民族地主反抗外族侵略的運動聯合起來。這個我們已經提到了。現在我們要特別提到崇禎十七年以後新起的農民反抗外族侵略的運動。這個運動有一點點，就是當其開始時就與民族地主反抗外族侵略的運動結合在一起而不能分開。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地主，也有一個優良的傳統。即是：當地主階級遭受外族侵略時，除最少部份，投降外族，變成漢奸而外，最大多數的地主都變成了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地主。在南明時代，這種民族地主多極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可法。明代以前也有，到了南宋時代的文天祥。我們對於中國歷史上民族地主反抗外族侵略的豐功偉績，不能不加以讚揚。

南明時期，由於民族地主與農民結合起來而開展的民族游擊戰爭。自浙東以至於川西，自嶺南以至於河北，無處不有。這些游擊戰爭之李自成張獻忠兩個集團反抗外族侵略的活動，更為顯著。因此，當我們研究南明時期農民武裝運動時，不能不把這個新起的農民反抗外族游擊戰爭與民族地主是不開的。所以我們必須首先從這些各地游擊戰爭中去找農民活動的。就浙東而言，山寨之多，各縣都有。而以黃梨洲王篤庵經營的四明山寨為最著。這些山寨完全得力於農民。反之，由投降的地主所組織的團練，則與山寨為難。

除了浙東山寨以外，還有鄂豫皖等省的山寨（又名山砦）。鄂省山寨，凡三百上下。而以新黃四十八寨最有名。羅田王傑心著新黃四十八寨紀事敘述頗詳。皖省山寨原奉明宗室荆王朱常霖，石城王朱統錡為主。朱常霖為洪承疇所滅。朱統錡據時較久。其時皖地各寨有二十餘處之多，散佈於英山、霍山、潛山、太湖、桐城一帶。鄂省山寨計為開封汝等間列寨百數，體派起最大。南明列寨數十，黨訓最大。洛陽列寨數十，李際遇為大。這些山寨不過是當時千百個山寨中比較著名的例子而已。這種例子說明當外族入侵時，農民羣眾沒有不起來反抗的。

（乙）第二個段落（順治八年至順治十八年）

南明王朝的極盛時代是永曆二年和三年。永曆二年四月十日李成棟（字廷玉，陝西寧夏人亦係出身於所謂秦賊）以廣東反正。八月癸巳朔永曆帝回駐肇慶（今廣東高要縣治，為明府治）。永曆三年，仍駐肇慶。永曆四年正月，桂王因北兵破南雄，遂於九日離肇慶，由水路西赴梧州，肇慶的極盛時

外族侵略為主。同時這兩個集團又開始與民族地主反抗外族侵略的運動聯合起來。這個我們已經提到了。現在我們要特別提到崇禎十七年以後新起的農民反抗外族侵略的運動。這個運動有一點點，就是當其開始時就與民族地主反抗外族侵略的運動結合在一起而不能分開。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地主，也有一個優良的傳統。即是：當地主階級遭受外族侵略時，除最少部份，投降外族，變成漢奸而外，最大多數的地主都變成了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地主。在南明時代，這種民族地主多極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可法。明代以前也有，到了南宋時代的文天祥。我們對於中國歷史上民族地主反抗外族侵略的豐功偉績，不能不加以讚揚。

南明時期，由於民族地主與農民結合起來而開展的民族游擊戰爭。自浙東以至於川西，自嶺南以至於河北，無處不有。這些游擊戰爭之李自成張獻忠兩個集團反抗外族侵略的活動，更為顯著。因此，當我們研究南明時期農民武裝運動時，不能不把這個新起的農民反抗外族游擊戰爭與民族地主是不開的。所以我們必須首先從這些各地游擊戰爭中去找農民活動的。就浙東而言，山寨之多，各縣都有。而以黃梨洲王篤庵經營的四明山寨為最著。這些山寨完全得力於農民。反之，由投降的地主所組織的團練，則與山寨為難。

代計一年有半。永曆二年即順治五年，永曆三年即順治六年。據魏源聖武記第一回國亂與記五云：「及李璠與孫可望，並漢中兵北赴陝，明督將李占春，譚洪文、譚龍，及義勇楊大展，于大海、宣毅、武人等，各以兵數萬，分踞川南川東，附植王，受封號，請官吏。明以錢邦芭巡撫其地，而呂大器統制諸軍。於永曆有重資兩廣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移居慶慶。且要環鄂。由陝，鄭成功名振山沒於閩浙，皆推和，勢頗盛」。但是，鄭成功所佔的敗地，竟使順朝極端局而無法支持。順治七年（永曆四年），清兵節節之逼，於是桂王只得棄慶慶而走南寧。是年九月，孔有德與桂林，大學士吳貞毓，兵部侍郎張同敵死之。自崔式相死後，桂王原有的軍事基礎完全瓦解。

因此，在永曆五年（順治八年），南明王朝又發生了一次決裂。明史吳貞毓傳云：「時順治八年大兵南進，勢日迫。王召諸臣議，有請走海濱就李元尤者；有議入粵南者；有議遷海濱者；有議遷海濱者；惟馬吉翔、龍天壽、孫可望、李自忠」（明史卷二百七十九列傳卷一百六十七吳貞毓傳）。桂王在永曆二年已有七省之地，此時兩廣江西湖南四川五省之地皆失，僅據黔省。據在孫可望、李定國、文秀諸人手中。這些人在清軍外族侵入中國以前，都是反抗明朝的。然而，在清軍侵入之後，却一變而擁護明朝。另一方面，像洪承疇之流的人物，過去都是擁護明朝的，現在又在清軍外族侵入之後，擁護明朝的「流賊」。這些歷史的轉變不能不弄清楚。弄清楚了這些歷史的轉變，然後才可以了解永曆五年（順治八年）以後南明王朝的歷史。

永曆五年二月，孫可望遣使請賀元儀等人南歸。是時遷黔之議尚未決。九月，通江告急，永曆帝由南寧西走。上二月南寧陷。明年（即永曆六年）順治九年正月，孫可望再遣使請賀元儀等人南歸。永曆帝遂以是年二月六日遷安慶所（諱貴州貴安州）居之，詔改安慶所為安龍府。自永曆六年至九年凡四年，永曆帝皆在安龍府。這四年可以說是孫可望時代。

永曆六年以後的安龍朝政，其政績亦不下於慶慶。然而這種偏安局面尚能支持者，不能不歸功於李定國的職權。永曆六年五月，即永曆帝移駐安龍之後數月，孫可望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楚，征虜。孫可望與孫可望之弟孫元璠，討賊將軍王復臣嗣之，以楚地以賊尤急，故請孫可望討賊。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師孔有德赴火死，俘其子定訓，及叛將陳傳（明史誤作郭傳）。孔有德係於順治七年攻陷桂林，殺死吳式相張同敵者。陳邦傳係順

治七年多謀叛，復據清遠進攻肇慶者。孫可望死。是年冬清軍又以數萬兵圍尼塔入衡州，兵數十萬。定國計分其師，而身當衡州，遂於十一月二十三日開道設伏，將敵。魏王殺魏。黃梨洲永曆紀年論之曰：「魏夫李定國桂林州之戰，因敵王王，天下震動，此真歷代平以黃金鑄之天下所不能者，功難成而物敗之，可望之門，足安乎，屈辱所以呵咤而天也」。

李定國兩次被俘以後，不見容於孫可望。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李定國出奔。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馬吉翔以督教督督督督督督，諸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而殺之。於是孫可望與孫可望的錯誤，於是弄得一敗塗地。孫可望與李定國之爭，加之孫可望本人思想複雜的錯誤，於是弄得一敗塗地。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正月，永曆帝仍在安龍。是年孫可望將孫可望降，李定國舉兵攻之，率軍移駐雲南，改爲滇都。自永曆十年至十二年，永曆帝在雲南，完全靠李定國與文秀支持，而其朝政復歸於吉翔。永曆十三年，漢清兵入雲南，李定國出擊北歸。永曆帝南行。馬吉翔堅主人禍。而李定國救之不及。永曆十三年二月永曆帝入緬甸。兩月李定國已遣日文選率兵迎駕，不唯不迎，且下詔誅。五六月間，爲緬甸人隔絕不相聞，文選被擄去。又據黃梨洲永曆紀年云：「永曆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上日欲出緬，李不定一贊。定國派兵與緬甸人攻緬甸於上，而在上左右者，則又皆備安無智之徒，以此皆不屬。九月定國迎駕於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會與與否，今與緬甸約，何地交割。上以答教付緬人，而定國久於消息，復被擄去。是時士君子皆散亡，所從僅獨充一二輩，馬吉翔爲大學士，與司職監李國泰相輔，惟恐定國之至。又據求野錄所載：「永曆十五年（辛丑）二月雲昌王自支還會時王李定國之師，大敗緬兵於緬。四月，王李定國等迎駕不果，引兵還，至而涉嶺山，師大潰」。由於緬波一潰，便引起了緬甸內部的政變。是年五月，緬王之弟莽猛白因兵敗引蠻米五萬入緬，遂殺緬王而自立。六月，緬新王招大小從臣暨殺之。十二月初二日緬人執永曆帝與吳三桂。是時李定國方謀借古剋還緬甸之師代論。雖者以吳三桂執帝與吳三桂，定國與吳三桂食死。古剋還緬之師失望引還。

（六）南明時期的代表人物李定國

爲什麼我們拿李定國作南明時期的代表人物呢？因爲他可算不是以代表這個運動。這個運動是以反抗清滿外族侵略爲主的，這個運動

動是以民族團結為主的。孫可望於順治六年七年八年九年之間，未曾不與國結永曆皇帝，反抗滿清。但在李定國於順治九年兩廣名王之後，孫可望自自己的兄弟李定國都不肯團結，更談不到團結永曆皇帝。所以，孫可望的結果，仍是投降滿清，做了民族叛徒，與吳三桂沒有兩樣。李定國與孫可望完全不同。他是支持南明時期第二段落的領導人物。他把反抗滿清的民族武裝運動堅持到底，同時，他更把民族與民族地主的統一戰線堅持到底。當永曆皇帝被殺於雲南之日，殺他的人是崇禎朝的勳貴吳三桂，而為他痛哭絕食以死的人却是所謂「秦賊」李定國。

李定國，陝西榆林人，農家子，少歲時，從張獻忠，獻忠收為養子。獻忠有四養子，孫可望為長，李定國次之，劉文秀艾奇又次之。定國不讀書，喜聽人講三國演義。他出身行伍，善於用兵，入黔滇後，復善用象陣。定國不輕殺戮，與張獻忠不同，並善結文士。

張獻忠生時，定國已知名，並自謂一軍。獻忠死後，孫可望代領其衆，定國之地位益次於可望。自順治九年數次戰勝之後，定國之威望，頗出可望之上。近人孫雲林著南明忠烈傳，對「秦賊」之活動，頗為不滿。但於定國則云：「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百折不回，殉身楊海。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至其對明室之功，則恢復粵楚，兩項名王，——定南王孔有德，敬世親王尼堪——馳聘東，逃寇嚴城，又護安隆之驛，定孫可望之難；支撐明祚於存亡絕續之交者五六年，雖何騰蛟，堵允錫，瞿式耜亦有所不及。西南半壁，得定國為之結束，雖亡而亦有光。」（見南明忠烈傳下編第十八章）這一段話正如孫雲林自己所云：「於定國亦若深悼惜而景仰之者，可見是非之在人心，終難昧云。」（見同前）

（七）結束語

明末農民運動，自崇禎元年起至順治十七年止，前後三十四年。（崇禎十七年順治十八年，內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實係隔一年，故三十四年）從前研究明末農民運動者，大多數注意這一個運動的前半，我對特別著重說明這個運動的後半，就是特別著重說明這個運動與反抗滿清外族侵略運動的關係。這個運動到順治十八年李定國之死總算告一段落，然而我對這裏提出一個人來，作為這個運動的總結。這個人便是李永寧。

李永寧，係李過之子，李自成之姪孫。清順治八年高必正（李自成之孫

弟，永曆帝對其為孫雲林）李永寧反對走劉，孫可望所建。來李力戰得勝，遂入歸四亂山中，結寨固守，反抗滿清。轉運陽十三家。可望敗，來李復與李定國深相結納。定國死後，來李獨能支持危局。滿清遂以桂王凶問投降來李不聽，且以夷齊餓食首陽故舉自況。其後滿清兵連年圍剿，至康熙三年始略絕境，乃舉火焚寨，與妻子親信投火死。自來李死，然後崇禎時期十三家七十二營之威力始絕。十三家七十二營的威力雖絕。但十三家七十二營的鬥爭，乃是有清一代中國農民反抗外族侵略的開始。這種農民反抗外族統治的運動在順康雍乾五朝，從來沒有停止過，一直到於咸而後的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

新書 再版 圖書 報日 新華

反對黨八股

毛澤東著

每册一元

六月在頓河

愛倫著
戈實編譯

每册四元

論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原因

羅克汀

——兼評幾位史家對於這一個問題的意見——

對於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深入和擴大，反侵略戰爭的鞏固和發展，反映到作爲思想意識一部分的歷史科學的批判的研究上，也必然地深化和擴大起來。而且正是由於對於法西斯侵略主義的歷史觀進行着科學的批判底清算，對於企圖用人類主觀觀念去代替歷史底現實形勢的反科學的歷史觀進行現實的鬥爭，因而必然地使民族解放戰爭，反侵略戰爭和歷史科學底現實的鬥爭結合在一起。

今天我們生長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裏，偉大的歷史課題擺在我們底面前，決定人類命運底反侵略戰爭在全世界的範圍裏進行着。侵略與反侵略，文明與野蠻，民主與獨裁，光明與黑暗，自由與專制，正在蘇聯與法西斯對立着，鬥爭着，爲着民族底自由獨立而進行着正義戰爭的中華民族底命運已經和反侵略戰爭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到了今天，反侵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已經一天天地接近了勝利，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站我們面前的還是具有着強大力量底敵人，我們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爲了使理論能夠發揮它底指導實踐的力量，而使我們民族能夠順利的通過了一切迂迴曲折，轉灣抹角而走向勝利，那末我們必需研究民族解放戰爭和反侵略戰爭發展底規律性。而且必須對於爲着企圖奴役全世界人民而幻想出來的法西斯侵略主義的歷史觀，進行現實的鬥爭底清算。因而歷史科學的研究和討論是有着，總結過去，批判現在，指出將來的現實意義。

我們知道，人類歷史底過程不是以爲事件底堆集，相反的，它是「人類在其生活的長期鬥爭中所展開的社會經濟形勢之發生，發展與更替的相續過程。」（葛蘭生先生語），因而人類歷史底重大事件底發生都是人類社會實踐生活發展底必然結果，因此，今天底民族解放戰爭和反侵略戰爭底發生，把它作爲歷史發展過程底一環來考察時，不但是人類社會實踐生活發展底

必然結果，而且它本身底發展也具有着客觀底規律性。因此歷史科學的批判的研究也必然具有着指導民族解放底偉大的實踐意義。因而歷史科學上底論爭也就不是什麼學院式的煩瑣論爭，而是反映着各個階級底意識形態，反映着他們對於現實底理解，而從這些複雜錯綜的意識形態底鬥爭中，就可以正確地發現人類歷史發展底規律，和它在中國歷史所表現出來底現實形勢。因而就可以粉碎法西斯底走卒對中國歷史底現實形態作觀念的遊戲底歪曲。而指示出了人類歷史底，特別是中國歷史底前程。

由於法西斯是進行戰爭，是全圖奴役全世界人民大眾的金錢資本家的恐怖的工具的專政。所以它是違反歷史底必然法則的。它爲着替法西斯主義披上虛偽的「外裝」，便在歷史科學底領域裏播種着「暴力史觀」，「外歷史觀」，底毒藥。根據法西斯主義底主觀的需要進行歪曲各個民族底歷史，「以便把自己形容成爲這民族史上一切高尚英勇事蹟底繼承者，而對於一切有傷民族觀念的恥辱事實，卻用來反對法西斯主義底仇敵。」他將把自己民族描寫成爲世界上唯一優秀底民族，其他都是下賤底民族。都要接受他的「灌輸文明」，根據他們的意志來「改造自己」。日本法西斯正是由這樣來「證明」他們侵略中國底戰爭是「聖戰」，而大喊「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這一點可以說明了，爲什麼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員秋澤修二特別地寫了一本「支那社會構成」來「證明」中國社會——歷史的「退步」「落後」「循環」……其實，「退步」的詞不是中國底歷史，而恰好是違反歷史底必然法則，而被歷史宣判了死刑底法西斯主義。

隨着民族解放戰爭底深入和擴大，對於法西斯歪曲現實歷史形態的無恥，進行了批判的清算，說明了科學的歷史觀對於歷史發展底一般法則的理解，和在中國所表現出來的具體形態，揭露了秋澤修二之流的「巧妙」的外衣，揭發了他們的法西斯主義底本質，而達到了對於中國歷史底現實形態作正確的理解。他們指出了中國歷史不是「停滯」而且符合着社會發展的一般規

律條的「不過」中，中國歷史底特點使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社會比歐洲在時間上更持久，使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社會，而在「九一八」以後，更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社會。由此他说明了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進步」性及其弱小民族反封建的兩重任務。因而说明了中國歷史並不是什麼「停滯」又不是「退步」，更不簡單什麼「提攜」，簡要的是一「自力更生」，從抗戰中完成反帝反封建兩大任務而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但是，中國歷史研究雖然在「學術中國化」底路向上正確地向前發展着。而得到了許多重大的成績。有些重大的歷史問題抗戰以來雖然得到了更深入的討論而得到了接近正確的結論，但個別的學者還由于不能正確地運用科學的歷史觀，而對中國各個歷史時期，不從中國歷史上大量實地材料中抽出其發展底規律性，說明了對印在中國歷史上的民族特點，而是抽象地去考察歷史的現象，因而也產生了一些新的錯誤。例如：關於「中國社會發展遲滯原因」問題的討論，李達先生（以其在文化雜誌一卷二期上發表的「中國社會發展遲滯原因」一文為討論的對象）和蔡運璠先生（文化雜誌二卷一期），「李達先生論中國社會發展遲滯原因」的論說雖然發表了一些較深刻的見解，但同時又產生了一些新的錯誤。而且，還有着無意地受了法西斯底宣傳員的欺騙的危險，因此作者在本文中對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這一問題發表一些意見。如果能引起了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們發覺意見，而使之一個中國歷史上的重大問題得到了正確的結論，這就是作者之幸了。

二

在還沒有說明李達、蔡運璠、羅爾諾先生的意見以前，我想先把兩位以前的史家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說明一下：

首先我們先說明何幹之先生的意見，他說：

「他」已指出了亞細亞「東方方法」就是原始共同社會末期的過渡期。有了過渡的關係，農村公社底發展在中國社會裏，結果，公社雖然朝着前進的方向前進，可是趨向來却如趨步，如趨行。

「他們指出了有了過渡關係，奴隸制就不大容易去清算公社的基

礎，所以中國或東洋的奴隸制度雖由國有奴隸制發展到家內奴隸制，但家內奴隸制並不發展到成熟的勞動（或古典）奴隸制。換一句話說，中國古代不能發展到成熟的奴隸制，確立私有制度，為封建社會開闢一條康莊大道。

「他」又指出了公社關係不但糾纏着奴隸社會，因為公社關係留在封建經濟中，各地的農行，就一個個孤立起來，死守閉關自守的生活，……所以地租不能正常地通過過渡的三個階段，「工業不能正常地進入人工區手工業時期，等到外國勢力侵入來，中國已失了一「自力更生」的資格了。在那時候，民族資本的生機突起一尺，而殖民地的剝奪又隨着它，同時封建社會底剝奪是瓦解了，而封建社會的剝奪目的盤據在國土裏，這一切，形成了今日新舊勢力決鬥的社會關係。」

——引自中國社會史問題論叢刊三頁至四頁——

總括起來，何幹之先生的意見，認為「亞細亞生產方法」——過渡關係特殊性的存在，便不能清算公社底基礎，糾纏着中國社會，而形成了中國社會發展遲滯。

何幹之先生明確地受了早山二郎及秋澤洋二氏影響，他明確地把握羅爾諾生產方法底問題和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問題實地地聯繫起來去考察，這是何幹之先生底正確的地方，但是，他的結論我們不敢苟同了，我們不明白「農村公社底殘餘」何處有這強大的力量，它的「糾纏」把「封建社會」延長至將近三千年，也不明白，「亞細亞」何處有這強大的力量，把「公社」底關係得這複雜，而且亞細亞生產方法都是原始共同社會末期的過渡期，一個理論，經何幹之先生的解釋以後，也表現出它底錯誤了。公認亞細亞生產方法與現實二卷二期高振羽，「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和所謂「亞細亞」的「過渡性」問題」。

其次，我們來討論高振羽先生的意見。

呂先生是中國的一份科學的歷史家，年來，曾對於法西斯史觀的批判的清算盡了很大的力量，不過，他對於「中國社會發展遲滯原因」一個問題的意見，我認爲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現在我們先將呂先生底意見，介紹出來，他說：

「但我們對於社會的發展之或遲或速的問題不應忽視，不過，我們認爲這不是由于先天的快速性或「停滯性」，而是由于外在影響所到

總的「加速」或「阻滯」的作用，易言之，不為由于內在矛盾的規定，而是由于外在矛盾的影響。」（理論與現實二卷二期：「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

他接着就說明所謂「外在矛盾」就是：
（一）「每次大規模的民族移徙都是和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或外族侵入有關，這從全國範圍是東部和西南的地方誌都能考究出來的，從一方面說，這和中國民族有天淵之別，給予我們以地大物博人多的遺留，從另一方面說，這反給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以阻滯的作用，在這種條件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每由于民族的移徙而變得了暫時的緩和。」
這一點就是說由于外族入侵及農民戰爭引起的民族移徙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而民族移徙主要由于有優良的地理環境。呂先生認為這是主要的條件，其次的條件呂先生舉出了：

（二）「歷史異族，如五胡十六國，北朝，五代，遼，金，元，清等的野蠻侵略和入主，一方面直接以軍事的力量，累次給予中國社會的生產力以殘酷的破壞——如大量地屠殺勞動人口，墾耕地為牧場，危害科學技術的研究等；一方面，在政治上所施行的殘暴壓制和掠奪，不惟國家的機構直接防衛生產力的發展，且在間接上使農民和手工業者在苛重的負擔和約束下，無力改進生產技術，從而又迫使商業資本不斷向高利貸資本轉化……」

（三）「在封建時代的中國，四圍各民族的生產都比中國落後，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封建貴族，官僚，地主等所收取的剩餘勞動生產物超過他們及其家族和左右腸胃消化的容量時，便必然地逐步趨向商業，去消耗那部分多餘的物產，在這一點上，既不能由其對鄰近各國家各民族的交換上獲得滿足，自樂以後，就開始了對歐洲的交通，也由於地理的阻隔及其他條件而不斷受到阻礙……因而刺激起官營手工業的出現。官營手工業的生產完全為滿足貴族，官僚，地主之日常豪華的生活，一方面防衛了私人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一面削弱了商業資本的積極作用——使之偏向消極作用方面去發展——一方面又間接防衛着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四）「鴉片戰爭後，阻滯中國社會發展的主力，是國際帝國主義。——引自理論與現實，二卷二期，「論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和所」

論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

呂先生根據四十年代的史學水準提出了外族侵略和地理環境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這些意見是很可寶貴的，不過我對分析起來，上面四點意見中，其中（一）（三）兩點究竟地說來是由于中國的地理環境的作用（四）點對於封建社會發展特別悠久一問題是沒有直接關係的，因此呂先生的意見歸根到底只有兩點：（一）地理環境的作用，（二）異族的入侵。呂先生認為前者是主要條件，後者是次要條件。

當然，如果呂先生指出了地理環境和外族入侵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阻滯有着相當影響這一個所同意的，如果呂先生就把它當作其因我便不敢苟同了。

呂先生不從「內在矛盾」的分析中去發見阻滯中國社會發展底原因而企圖從「外在矛盾」中去探求，這就忘記了社會學的 A B C 了。「社會生活諸條件」的決定，素是生產力法，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方法而不是地理環境。社會的歷史就是生產方法交替的歷史，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的歷史，我對不明白地理環境（呂先生認為是「主要條件」）的作用何以有這樣大的力量將中國封建社會延長到將近三千年，這一點呂先生顯然受了普列漢洛夫（Плеханов）的影響，隔入了地理唯物論的陷阱，誇大了「外在條件」的作用，而忽視了生產方法對於「社會生活諸條件」的決定作用，我以為地理環境和外族入侵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阻滯是有影響的，但究竟只是第二因而不是第一，其因還要在「內在矛盾」中去找尋，即是需要在生產方法的發展中，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統一的發展過程中去找尋。

三

現在我來檢討李先生的意見。

李先生認為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有八種：戰亂的頻繁，封建的剝削，宗法遺制下聚族而居的農村公社，封建的政治機構，農民階級不能擔任新的生產方法，科學的不發達，與儒家學說的影響，地理環境的影響等（見文化雜誌二卷二期，「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

關於李先生的這幾點意見（見第七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成因」）和蒙達坦先生（文化雜誌二卷一期）與李達先生論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原因（）都曾提出了一些批評的意見。

蘇崗先生指出了李達先生把中國社會發展的「第二因」當作「第一因」，把科學的不發達，和動亂的頻繁當作社會發展遲滯的「第一因」，關於這一點，蘇崗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李達先生忘記了生產方法及對於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科學是其一）的決定作用。只從歷史的表現現象進行分析，而不能正確地進一步把握歷史的本質及其發展的規律性——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發展的規律，因而也就不能看見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第一因」。

蘇達坦先生除了正確地指出了李達先生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第一因」問題以外，並且認為李達先生以宗法遺制下聚族而居的農村公社，封建的政治機構，農民階級不能負擔新的生產方法，科學的不發達幾點為中國社會發展遲滯原因是不正確的。（讀者請參考，文化雜誌二卷一期，蘇達坦：「與李達先生論中國社會發展遲滯原因」）

我以為還要指出李達先生有無意識地受了法西斯史家欺騙底危險，李達先生說：

「我常常有一個假想：假使中國與歐洲之地理間隔一直繼續下去，中國社會再過數百年也許還停留在封建的階段中。」

值得慶幸的就是這只是李達先生主觀上的「假想」，而不是歷史上的真實。其實，中國社會的發展永遠不會像李達先生所「幻想」的一樣，在鴉片戰爭前中國已經出現了具有資本主義性的工場手工業，雖然基礎還是很軟弱的，如果不是帝國主義的大砲在它萌芽的時候把它完全轟碎了，那末，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的大步向前發展，不但可以指望的而且是必然的。這就是說，並不是中國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統一發展不能到達資本主義，而是帝國主義把它完全窒息了。那末又何必與「幾百年」停留在封建階段呢？

中國近百年史就是一部走向殖民地化的歷史（指到七七前——作者），是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阻礙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這就證明了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退步性」，「反動性」，因而要求民族解放，順利地發展民族資本工業，那末，非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任務不可。

而且李達先生在這一話裏，顯然誇大了封建的作用。認為中國與歐洲的地理間隔再繼續下去便可以使中國封建社會再多幾百年的壽命，這完全忽視了生產方法在「社會生活諸條件中」的決定作用，抹殺了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發展的規律，這又陷入了地理唯物論的泥沼。

四

現在我們來檢討蘇達坦先生的意見。

蘇達坦先生認為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主要原因有五項即：特殊的土地所有關係，農民戰爭，共有財產，封建力役，和封建剝削，「而其中尤以特殊的土地所有關係為甚，中國社會單只受着這一特殊原因的妨礙，也就難以發展了」。

對於農民戰爭，蘇達坦先生曾給予以正確的批評，蘇達坦先生的意見說來，領土間的戰爭是為了「擴張領土」，因而對生產手段「保存了許多」。而農民戰爭是為了「反抗苛捐雜稅和力役的苛政，並沒有領土的目的，更由於他們的愚昧對於不屬於他自己的生產手段不帶吝嗇加以破壞」，因而農民戰爭是防礙「國社會發展之一原因」。蘇達坦先生認為是「極合邏輯的」。

蘇達坦先生正確地指出了農民的最低限度的物質生活要求不能維持，對於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剝削而引起的農民戰爭是反對地主階級的統治，「只有這和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企圖破壞在他們身上的沉重負擔，掃除阻礙生產發展的腐舊勢力，才是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因為每次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的結果，都多少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此多少促進了社會的生產關係與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那末農民戰爭為什麼沒有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遲滯呢？蘇達坦先生接着寫道：

「這是在當時沒有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方法，沒有新的社會力量，沒有先進的階級來領導，因為這一些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都不過是階級與先進階級的指導，就是當時的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由於天啟，總是在革命中與革命後被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用了去，當作他們進攻封建的工具，這就使在每次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停息之後，階級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係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見蘇達坦十一十二期合刊華文）

蘇達坦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他還要繼續指出。根據蘇達坦先生的必給結果是認為中國歷史上所開的農民戰爭是「進步的」因而是一「正義的」，因為自蒙先生看來，中國歷史上所開的農民戰爭是頻繁而生產力發展也

最迅速呢！農民戰爭既然阻礙了中國社會發展因而是一「退步的」，「非正義的」，「惡性的」，則農民戰爭，如果農民好好地不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呢？那末中國早已成爲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了，值得阻礙的說是不該好歹的農民大眾，偏偏要起來反抗，……我們真是不明白蒙先生是在弄一委什麼「邏輯」遊戲了。正像的理論告訴我，戰爭有兩種：（一）正義的，非掠奪性的，謀解放的戰爭，其目的或說是保護人民而打破外來的侵略，或打破奴役他的企圖，或者是使人民擺脫奴隸制，封建制，資本制的壓迫，或者是使殖民地半殖民地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或者是民主國家反法西斯的侵略；（二）非正義的，掠奪性的戰爭，其目的或說是侵略和奴役別個國家別個人民，或者是對於革命集團進步勢力的壓迫摧殘。蒙先生的「邏輯」和這個正確的理论是多麼的不同啊！請參看羣衆七卷三期：「論戰爭的本質」（一文）。

因此我們認爲農民反抗地主階級統治的歷史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善性的」，我們應該擁護農民。歷史上的領主間的爭奪戰爭是「退步的」，「非正義的」，「掠奪性的」，「惡性的」戰爭，我們應當反對和揭露他們企圖奴役農民大眾的本質，指出他們企圖把封建制度當作歷史上的永久制度的反動性。

其次，蒙先生指出了「特殊的土地所有關係」一點是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原因。蒙先生認爲是討論中的重大收穫。我認爲蒙先生的這個意見，還有些值得商榷和補充的地方。

蒙先生說：

「中國封建時代的土地所有權，在秦以前，隨大小的領主所分別領有的，自秦起土地從領主獨佔的領有下解放出來，轉移其所有權於民間，並且土地在民間可以自由買賣，這種土地所有權關係，是與歐洲的封建國家不同的。歐洲的封建國家只有當封建社會解體時，土地才從領主的獨佔領有下解放出來，歸到民間，而領主也就隨之沒落，退下歷史的舞臺，中國則不然，土地由領主的獨佔領有下解放出來後，民間便出現了地主，這種地主雖沒有領主那麼威嚇的權勢，但却代替了領主去支持封建社會，成爲封建社會的主要支柱，所以，中國封建社會并不因土地所有權之由領主轉移民間而解體；而且在事實上恰好相反，中國的封建社會更加鞏固起來，形成世上稀有的封建集權國家，中國封建時代

之這種特殊的土地所有權關係，不單只成爲中國封建時代政治制度的特殊的緣因，其給與經濟的影響，決定中國封建時代經濟的特殊性，則尤有過之。」（見文化雜誌二卷一期蒙文。）

接着蒙先生指出了中國封建時生產力的發展以自機到至這一階段爲最快，就是這一個原因。

不錯，中國封建社會由戰國至秦這一階段生產力的發展是很迅速的，而地租也由力役地租過渡到了實物地租。但這一個階段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并不是因爲土地歸大小領主所佔有，而是因爲這一階段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這是在這一個階段，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向前發展，一句話說來，這是封建經濟向封建社會的時期，因而這一階段也產生了偉大的封建文化，這真蒙先生雖然只看到了歷史的現象而忘記了中國封建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統一發展底規律。忘記了把封建社會當作一個發生，發展，成長，和沒落的過程來處理。

不錯，秦以後已經出現了領主的獨佔，而轉入了民間可以自由買賣，地主變成了封建社會的支柱，但這只是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秦代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其底政治制度也只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结果。由于春秋戰國時代領主經濟沒落，新興地主——商人成了支配階級，因而造成了秦代底政治制度及土地制度，而適應新的就出力役地租轉到實物地租。特殊的土地所有權關係是中國封建社會底特點之一，其次由于農工商各業的結合及缺乏土地的農民底小經營而造成了的農業與手工業底直接結合的自給自足經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底特點之一，因而我認爲阻滯中國社會發展的基因不單是土地所有權的關係，當然，特殊的土地所有權關係是有其作用的，因爲土地是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生產手段，但它只引起了對於農民剝削（經濟的和超經濟的）的加強，我認爲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基因是由于中國封建制度的特點（包括了特殊的土地所有權關係，自給自足經濟等）而造成了地租，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三者底強固結合，下面當更詳述，而蒙先生竟沒有提起這三者的強固結合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這就值得奇怪了。

五

最後我們來看看蒙先生底意見，他說：

「在這樣的社會（指秦以後——作者註）中，地主貴族官僚紳士，都是脫離生產與顧客遙遠的「治人者」只有農民與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者

實和創造文化的進步力量。可是中國歷代的農民大眾，却在制度的封建經濟剝削與殘酷的封建政治壓迫之下，過着貧窮困苦的生活，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其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而且……農民與手工業工人都被束縛于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沒有任何權利，造成農民與手工業工人極端窮苦與極端落後，減低了生產力的機能和改進，這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來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阻滯不進的基本原因。(注意點是華崗先生所加)

……而在中國因古色古香，農村公社的殘存，由于農業與手工業打成一片，你離不了我，我也離不了你，農民兼作手工業者，手工業者也兼作農民，生產始終要維持着自足的狀態，生產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滿足極單純的生活。農村成了自給自足的小天地，不論在農業上或手工業上，生產方法的特色是「祖傳」和「秘製」。為了缺乏生產的剩餘，生產力必然如龜步的在爬行，或簡直停滯於同一的水平上。

「中國封建時代底統階級——地主，貴族以至皇帝，他們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在農民則很少土地，或完全沒有土地。農民用自己的工具來耕種地主和貴族的土地，除了以收穫的一半以上歸納于地主貴族以外，還要捐納其他的苛捐雜稅。封建剝削的繁重，必然障礙生產力的發展，使大多數農民都僅能維持單純的再生產，而不能夠進行擴大的再生產。加以中國特殊的土地所有權關係，秦漢以後，土地即可以自由買賣，出現了地商商人地主……而商人地主代替了舊有地主去支持封建社會，成為封建社會的主要支柱。……」

其餘華崗先生還指出了外在因素——歷代民族侵入對於中國社會發展也有大的影響，華崗先生從生產方法的內在分析中，指出了農村公社殘存，農業與手工業的直接結合，形成了只有單純再生產的自給自足經濟，殘酷的經濟及超經濟的剝削，使農民的必要物質生活資料不能夠維持，只能進行單薄的再生產，生產缺乏了刺激，因而形成了生產方法的發展停滯，華崗先生把握了生產力的發展要素——勞動，這就證明了歷史是勞動羣衆的歷史，是生產者的歷史，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發展史。

不過，華崗先生雖然接近了正確的結論而沒有指出自秦以來地租，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三者加強的結合加強了對農民的剝削；
「中國農村中商業資本與封建地主階級的結合，同時保留了中世紀封

舊式的剝削農民的方法和壓迫農民的方法。(斯大林)

因此總結起來作者的意見認為：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包括了特種的土地所有權關係及自給自足經濟——農村公社的殘存，手工業與農業的直接結合)所造成了的地租，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三者的強迫結合，殘酷的剝削使農民必要的物質生活資料不能維持，生產缺乏了刺激，只能以父子相傳的同一生產方法去進行單純再生產，因而造成了生產力的發展的龜步式的進行。更加上了外在因素(條件)——地理環境的影響及歷代民族的侵略和入主——的影響而形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阻滯。

上面是作者在研究批判的方式下提供的一些意見，正確與否還有待研究中國歷史的史家們指正。

(上接第四頁)

這裏我們就明白當托爾斯泰或高爾基作品有三個條件：內容，形式，態度時，他特別強調作者的生活態度的問題。我們是用怎樣一種態度和這世界的一切相處的？我們用怎樣一種態度來生活的？我們不是一個責任，義務，去同情這世界上的受害者，而是用心上同情，用愛去愛他。所謂同情，是同情心，(同情心)——所謂「將心比心」，以及「體貼歷史」，就是這個意思。具有這個基本的條件，才可以寫詩。因為詩人和平常人並無高下之別，一樣應該先做一個好人。在一個形容詞的最大意義上，從平常人中游離出來，絕非「詩人」所可以驕傲的。詩是「親切」(Intimate)的藝術，創作它，我們必須和人民心心相印，和他們一塊兒感受，一塊兒喜，一塊兒樂，一塊兒憂，一塊兒恨，一塊兒哭，一塊兒笑，寫不出詩，乃是其次的問題。並且，如果我們的詩人，不是像今天那樣從知識份子裏產生，以致需要剝奪我們身心之某些氣質，而是直接從人民中產生的，那就更容易具備這種真切的感情了。

我們不僅要觀察現實的各方面，調查研究，生活「一體」；我們不僅要理解現實的發展，窮源探本，生活得「一體」；而且要和這世界的人民緊密的靠在一起，切近「人情」，生活得「一體」。假使詩人和人民的關係不貼近的，那末不單是作品內容，感情上和人民隔離，就是詩的形式也會發生了隔離，詩做是一切藝術中「不隔」的藝術，這「不隔」的要求是應該從作者的生活態度到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一貫貫徹下去的。
藝術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要改造人類的靈魂，必先改造自己的靈魂，在這當中，和「人民」不隔是解決一切其他問題的基礎。

「中國到自由之路」

沈于田

——評馮著「新事論」

「新事論」是馮友蘭先生的「貞元三書」的第二本。在「新世訓」序言中說，「新事論」是討論文化廣會問題的，在本書序言中說，本書是討論當前實際問題的。的確，我們只要把本書目錄一看，就可知道所涉及的問題實在很多：把當前許多文化社會問題都提到書中的有學家的眼睛觸着了。生產建設問題，中西文化的關係與實際問題，家庭問題，婦女問題，教育問題，革命問題，最後抗戰問題，都曾在本書中討論到。而在序言中又有一句話龍點睛的說道：「爲何明明知道宗旨，故又名曰中國到自由之路」。讀者還有後怕不於此嗎？「二十七年爲北京大學成立四十週年，同濟諸子謀出刊物以爲紀念，本書據論清末民初時代之思想，參與北大有關係者。雖原以爲北大大壽」。因爲在本書中讀者不僅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見解，而且批評清末民初的思想，特別對於與北大有直接關係的五四時代的思想，提出了一個新的估價。——這些就是「新事論」的內容的要點。

對於這書所論的一切，我們認爲，有些地方我們很願表示同情，但也有些是我們所不能不提出異議的。但無論如何我們同馮先生是同意者，此地都只得提出基本的觀點來說一下。

基本的觀點

在本書第一篇「別共殊」中讀者提出了一個根本觀點，那就是要從文化的類型的觀點來看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他認爲，無論中國文化還是西洋文化，都是五光十色的金牛，只有從「類型的觀點」來看，才能辨明其中那些是主要的性質，那些是偶然的性質。於是才不會籠統地把西洋東西搬回來，也不會含糊地把中國東西保存下來。他認爲，對於西洋文化的那一類中所包含的種種性質，「其主體是我們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不必取者」；而對於中國文化的那一類中所包含的種種性質，「其主體底是我們所當去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當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頁一六，傍點譯者加）

把這樣的觀點正確地發展下去，無疑的，是比復古論，本位文化論好得多，因爲前者正是主張保存中國舊文化中的主要部分，充其量只肯捨棄一些偶然的成分，而阻礙了中國文化的進步發展之路。也比全盤西化論高明得多。因爲全盤西化論者是連歐洲中世紀文化與近代文化的區別，連希特勒與孟德爾斯威爾的區別都不重視的，以爲要西化，就該把巴力門和聖公會一起都搬來

。而新事論的著者則確定地說，西洋化這名詞不安，因爲它是現代化，中國不是要西洋化而是要現代化，不是要變成和歐美的文化一樣，而是要變成和歐美的國家同屬於一個文化類型。——這說法比復古論的正確。

這還是極端的說法，具體地說，所謂「現代化」一語包含許多內容呢？這從本書第三篇「新家庭」，第四篇「新教育」中可以看見。中國必須從「生靈家庭」底文化「轉變爲」生靈社會的文化」，然後「國才能發展現代化」的意義。在這里，著者所採用的說法，對大家雖然是有啓發的，但不可否認的，著者是用他自己特殊的用語和說法，說出了中國人民這六十年來自覺地在不斷鬥爭中所爭取的目標：民族的獨立和民族平等。這與自己自己的說明，所謂「新家庭」下人正是「不再保留在殖民地的社會和文化中的意思，所謂脫離生靈家庭的文化也就是一個保留在封建、半封建的社會和文化中的意思。

這本是十分清楚的事。只是有良心有骨氣的人都應該看得出來，中國文化之所以落後，不是因爲其他原因，而是因爲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受到的種種障礙。那麼要開闢這些障礙就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樞樞，改變半殖民地

爭辯的態勢就是中國走向自由之路的始點。本書著者雖沒有用一般社會科學家所用的術語，但他是說出了這個真理的，而且他的獨有的說法，在有些地方是顯得非常生動的。

著者在這裏還提出了他的理論的特色，他不去參加那種尋常一些空洞的辯論來區別中西文化的優劣的努力，而從根本上看出這種區別是由於不同的社會物質基礎——生產方法生產制度。他說：

「產業革命使人捨棄了以家為本位底生產方法，說歸了以家為本位底生產制度。經過這個革命以後，人用了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方法，行了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制度。有了以家為本位底生產制度，即有以家為本位底社會制度，以此等制度為中心之文化，我們名之為生產家庭化底文化。有了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制度，即有以社會為本位底社會制度。以此等制度為中心之文化，我們名之為生產社會化底文化」（頁五六）由此，一切中西文化的異同問題顯得相當清晰。本書討論問題雖多，却能使讀者最清楚地系統，處處貫徹着統一的線索，這是不應不歸功於這個根本觀點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指出，著者在這裏所用的名詞的含混，從而引起了概念的模糊。所謂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照著者自己說，是有兩類的：

「生產社會化底社會亦有兩類，一是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產社會化支配亦社會化者。前者是普通所謂資本主義底社會，後者是普通所謂社會主義底社會」。

這段話，在一定程度內，是可以說的，但聯繫到這著者對於社會生產方法的說明就不能不發生問題。按照著者的系統，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都屬於同一類型中，都是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方法。所謂支配形式不同誠然是對的，但支配形式何以會不同呢？倘不從生產方法中間，從何處可以找得到解釋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其實是根本對立的，因為在前者的生產方法中包含着剝削關係，後者則否。但是「新學論」著者所說的生產方法則是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無關的，因此就只剩下了技術的意義。只有把生產方法解釋成生產技術，那麼才可以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屬於同一的生產方法類型中。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因為這既不能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也不能說明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因此，這不是一個名詞之爭，不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因為誰要是把

生產方法看做只是生產技術，誰就會把從一種生產方法向另一種生產方法轉變，一種社會制度向另一種社會制度的轉變，看做只是改進生產技術的事，而用不到我們當前的現實中，就會把「中國對自由之路」，看做只是生產技術的不斷的改進，認為中國脫離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方法就只是應用機器建設工業。問題就單純化了，而問題也就解決不了。——「新學論」的著者就正是這樣做的。

歷史的翻案

因此，「新學論」的著者輕視思想意識的改造在改造中國過程中的作用——於是他抹煞了五四運動（事實上，五四運動還不僅是思想意識的改造的運動，這裏且不談論，就照本書所說明的範圍來講）。他又輕視政治改革的作用，——於是便低價了辛亥革命意義。他所了解的中國對自由之路就只是來一次「產業革命」，而其內容就只是用機器，辦工業，於是便引來新的洋務運動的舊調，而加以再揚。

在本書中受到最顯著的批評的所謂「民初人」就是指這些「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禮教」的「說女人應該穿什麼褲子」的人；無異的，那就是指五四運動時的人。在本書中備受推崇的所謂「民初人」，就是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也是這類的，而並不是指那些已與歐戰的歐戰又歐，著者大開其的廣海，撰仁的深淵的。這只是對付元、開明之潮的人。於是著者說：

「如果清末人的見解，是『禮制而廢』，民初人的見解可以說是一『禮制而廢』。從前看底觀點說，他以為禮制是『用』，而科學技術等是用，但自從社會改革之運動起，則用科學技術等是『用』，而禮制之別方面改革是用。這則部分人的見解都是錯誤底，不過清末人若照著他們的辦法，辦下去，他們可以得封他們所希望不到底結果；民初人若照著他們的辦法想下去，或照著他們的說法說下去，他們所希望的结果却很難得到」。（頁五一）

這裏每一句話都是一半對的，一半不對的。「自社會改革之觀點來看，則用科學與實業等是體，社會別方面改革是用」，這句話裏有一半是對的，因為從社會的整個發展過程看，當然沒有相當程度的物質基礎——就是相當程度的機器的發展，則政治與文化上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句話

也有一半是不對的，因為把社會的一般的發展過程和社會的改革過程混同起來，是不對的。機器實業的發展是漸進的，而漸進的過程到一定程度不能不引起巨大的徹底的改革，這種改革雖有先行於它的經濟變革做基礎，但作為這種改革的中心問題的却是政治上的變革。這正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與舊的生產力相結合的舊生產關係是以舊的政治作為保障而成為僵化了的存在，阻礙着新的生產力。所謂社會的改革正是改變舊的政治，從而改變舊的生產關係，從而使新的生產力順遂地發展起來。由這意義上說，則無寧說自社會改革的觀點看，政治的變革是體，而社會底別方面改革却都是用「清末人」……可以得他們所意想不到的結果」，這句話也有一半是對的，因為「清末人」以爲他「儘管開工廠，用機器，而整個社會，政治制度，思想意識仍可一成不變，但不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實上，他們所進行的那些局部的生產力方面的變革却成了促起一個社會變革的一個因素。但這一句話也仍有一半是不對的，因為說這話的人以爲只以這批清末人按部就班地把舊的漸進地發展起來，不必用任何變革來「擾亂」他，則整個社會自然而然地就會變革過來。於是他就輕視「民初人」，而對於「民初人」的批評也有一半是對的，一半是不對的，假如把五四運動和其前後的歷史關聯斷斷起來看，則其時主張之錯誤或偏狹於新事論中所批評者；但若從整個歷史發展上來看，則五四運動的思想變革運動，正其被當時經濟政治上變革的反映，而並且成爲了推動以後的經濟政治變革的一份力量。上述這點即是新事論者所未曾看過的。他以為五四運動不啻對於中國向自由之路毫無幫助，而且發生了一使清末人的資產計劃晚行了三十年，此即是說，使中國的工業化，晚行了三十年的消極作用。

新事論的作者在上述諸點，是從對的方面出發的，但却越走越遠，就走向不對的那一方面去了。從而他以爲清末人的方向是完全對的，張之洞一班專制主義政權下的大臣的錯誤似乎只在於他們沒有自覺到自己是存在做漸進中國，使中國自由的偉大工作。他以為現在的工作也無非就是「繼續清末人的工作」。却不知道，張之洞等的洋務運動在當時的帝國主義東洋與專制主義政治的壓迫下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李鴻章預備拿來辦海軍的經費不得不移出去做慈禧太后的生辰禮，用以修築颐和園，由此一例也就可以見得與實業，辦工廠在當時的政治社會關係不變的情形下是如何無前途的一件。李鴻章與前後的許多辦工業者的實際經驗也可以證明，使中國從「專制人」地位，從半封建關係下解放出來，並不是工業機械發展的自願結果，而是使工業能夠暢達地發展的原因。

新事論中不僅輕視五四運動，而且也輕視辛亥革命。他將論辛亥革命說：

——中國的辛亥革命是以種族革命始，而以政治革命終。我們現在平心而論，清末當局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所行政策，實不能說是全盤民不對。若果沒有所謂滿漢種族問題，如果當時皇室是絕對開明，就李鴻章，姓趙氏，或姓朱氏，辛亥革命可以沒有，國家的組織中心不致崩潰，則中國的進步即可少一番滯留。」（頁一九九—二〇〇）

這翻了一個封建的專制王朝，使億兆生民開始從專制王朝下解放出來，站立的起來的辛亥革命，在馮先生看來，其意義却只是使中國向進步多了一番滯留，是破壞了國家的組織中心！他所「平心而論」的所謂皇室絕對開明，正是滿清政權爲低消當時革命運動而施行的一點最低限度的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改良政策，這在當時都沒有能使人民滿意，革命者更沒有上述當局開明，却居於能使五十年後的學者認爲這就可證明滿清政權乃是一國值得維護的國家組織中心，而在本質上這乃是一個反動的、專制政權，却似乎反而是不值得重視的事。假如在辛亥當時的人，以爲辛亥革命只有種族革命的意義，那是可以原諒的（就在當時，中山先生已經批評這種人了）。而在今日，仍作如此說法，却實在太奇怪了。難道我們可以說：中國在政治上是一個專制主義的國家這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國家對於中國毫無意義麼？

對近代史的這樣翻案，我們敢斷然說是不合乎歷史的實情的。

清末人的洋務運動對歷史不是沒有意義的事，而它在歷史上的主要意義正在於它給後來的政治與文化的變革開始準備了物質的條件，並且由她第一次實證了若不根本改革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工業的自由發展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在洋務運動之後，緊接着就是戊戌政變；而這種由上到下的政治上的改良運動失敗以後，於是在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又因革命的力量在和其各方面強大敵人對比之下過分軟弱的原故不能完全成功，於是有了五四運動，進行羣衆中的思想意識的民主改革大運動，並從而發展出了民主政治的要求，確定了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於是有了五卅，有北伐大革命，一直到今日的抗戰。這一連串的革命正是一個接一個，一步緊一步的，向着「中國的現代化」，向着「自由的中國」的目標前進的過

程。我們無法想像假如沒有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等，而讓「清末人」的工作一貫發展下去，中國就會自由，正如我們無法想像，假如在五年前不爆發抗戰，只與和平地發展工業，中國就能自由一樣。

而且問題不僅是對歷史的估計。對歷史的估計就是對實踐的態度。假如以為中國過去除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派的工業建設以外，其餘一切都是毫無意義的事，那麼在實踐上當然就不能不把工業建設看做唯一的工作了。但「同派的」工業建設，在本質上却可以有種種差別：滿清封建統治者曾企圖舉辦一些工業，帝國主義也曾到中國來興辦工業，但照新事論中的意思，則只要是工業，發展下去，就能成為產業革命，就能發生改造中國的效果，就能使中國自由。因此，今後的工業建設也就非是清末人的工作的直接的繼承而已！而我們現在要使中國自由，也就只要努力去開工廠，興實業，政治問題不必管，思想意識的改造更不必管。（那麼，抗戰的勝利要不要呢？）——這就把我們的歷史何等簡單地純化了啊！這就把我們的現實任務何等簡單地純化了啊！

圖式的失敗

為什麼會造成對於歷史的實際和當前實際的任務，造成這樣的誤解呢？我們不能不在這許多說上找句。

第一，改造社會是全面的工作，固然從紛繁的頭緒中分辨出何者為主，何者為從，是必要的事，能夠看出在一切社會現象中生產方法，生產制度之決定意義，因而認定社會的改造，在基本上就是生產方法之改造，這也是科學的方法。然而所謂生產方法不僅是表示人用什麼工具去工作，而且表示工具的主人是誰，並因人對工具的關係的不同而發生了人與人的關係——生產關係。那麼，改造生產方法就必然不僅包含改造生產技術以發展生產力的意義，而且包含改造人與人間的生产關係的意義。照馮先生那樣以為只要改造人在勞動中所使用的工具，不必有意地去改變人與人的關係，而結果一切會自然隨着改變，是完全不對的。

第二，事實並不能完全符合馮先生所那樣機械地了解的圖式：「生產方法隨着生產工具而定，社會組織隨着生產方法而定，這也隨着社會組織而定」。（頁六六）試把一輛最新式的耕種機搬到四川農村里去，你看它的生產方法和社會組織不變？人們當然可以說，這是因為一輛機器緣故，要

是有很多很多輛在使用，當然一切就會變動。是的，這話我們承認，但為什麼我們在農村里至今不能使用很多輛的機器。是僅因為我們沒有機器的緣故麼？是僅因為沒有人會使用的緣故麼？當然不是，而是因為我們的農村的生產關係和社會組織中有着阻止機器使用的因素。所以生產關係，社會組織，若沒有相當改變，則新的生產技術（就是馮先生所說的生產方法）也就不能發揮作用。這難道不是很清楚的事嗎？為什麼滿清王朝並不能阻止使中國工業化起來？這並非因為他是滿洲人，而是因為他是封建關係中的統治者；為什麼當時中山先生所提出的革命口號是建立民國，而不是單純的發展工業，那正是因為滿清王朝那個「國家的組織中心」對於新的生產力，新的社會力量，是一種束縛，必須加以打破，建立民主國家，才能使新的生產力獲得順利發展的環境，而實現新的生產方法。（至於辛亥革命的任务並未充分實現，那是另一問題。）我們絲毫也不想否認生產技術改進所起的作用，但這作用是有限度的，是一定的，他只能促進生產力在一定程度內的生長，從而影響到生產關係，使生產關係不能不變動。政治上的民主化正是具有着使生產力在舊生產關係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的意義。所以不能以為政治改革是因生產技術改革而自然地引起的，相反的，政治改革倒是生產技術的充分發展的必要前提。要改進技術，而對政治改革表示不關心，或認為不必要，那是不對的。

第三，馮先生對「民初人」的批評，中心是說：他們「以為人可以隨所意欲，隨行什麼制度即行什麼社會制度」。（頁六六）而不知道舊的思想，意識道德也是在這種社會物質基礎上的產物。他以為五四時代說「吃人的禮教」是不對的，因為禮教會是「某種社會物質基礎而產生的」。這種批評在我看來是至多只有一半對的，五四運動首先不瞭解禮教產生的客觀根源，而幾乎完全歸因於人的愚昧上，這是五四運動的弱點。但是他說禮教是吃人的，就從新的觀點來看，也仍是不不可否認的。因為禮教在封建社會中是會因社會的必要而產生，但更重要的是對於封建統治者而言的。封建統治者就用禮教來在肉體與精神上迫害人民大眾，對於人民大眾而言，禮教正是吃人的禮教。五四運動代表人民大眾而喊出了禮教吃人的口號，這正是他們的光榮。不過因為他們對禮教的了解還不够深切，因而他們的反禮教運動也不够深入而其效力也不充分。我們今天更清楚地了解禮教的實質，那就應該更進一步地推進反禮教運動。然而馮先生不然，相反的他似乎以為找到一物好

其為合理的存在，於是說不應反對他。

固然，馮先生並未明白表示，應該維護舊思想、意識、意識的存在這樣的說法。但只是說，我不必去反對它們，因為只要在「生產方法」發生改變時（就是在機器大量使用，工廠充分發達時），這一切自然會隨之改變。在這里，馮先生也是拿對於社會發展的總方向的圖式來代替具體的社會改造的實踐。事實上，社會的意識與思想的發展不是那麼完全被動地受支配於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的。常常在新的物質生活尚未充分實現之前，新的思想意識已經開始和舊的思想意識鬥爭而促進舊的物質生活與舊的思想意識的崩潰。也常常在新的物質生活已經實現的時候，舊的思想意識依舊頑固地殘存着，成為新的物質生活與新的思想意識的障礙。因此，在整個社會改造事業中，思想意識的鬥爭必然要配合着物質生活的改造而成為一個獨立的陣線，放棄這一陣的戰鬥，實際上就無異於維護舊的思想意識道德的存在。近兩年來，國內有一種存心壓低五四運動的價值的風氣，這種風氣也不僅只是對歷史的一種「新」評價，而且更反映着對實踐的一種「新」態度！——就是否認了在今日的實踐中對於舊思想意識進行改造的必要。在這方面，我們不能不說，馮先生是理論上的先驅者。他不僅否認了五四運動，甚至於辛亥革命，這也就是根本否定了在政治與思想意識上求改造的必要。而他所說到的理論根據卻不過是些空洞無意義的圖式。以為單純生產技術的改造，就自然能地能促進社會的改造，這主張其實是早已在歷史的實踐中被否定！

守舊與革新

但在新學論中究竟是主張，從一種生產方法，生產制度，社會制度，以至道德觀念等變到另一種生產方法，生產制度，社會制度，以至道德觀念的。這和絕對的守舊論，他顯然的遠比起來，在基本上仍是更進步的。因此「判性的」一章中對「民族性」與「國情」的解釋有很多獨到之處。他否認不變的民族性，認為「普通有些人所說的人性，是習而不變性」；他認為，性社會環境變動時改變的，是可以有特性增加的。他以為「國情」也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試問一國或某一民族的歷史，於某一時期截住，他的歷史，在此時以前與此他的國情」。因此國情也是隨時變更的。依照這種說明，就根本堵住了用「國情」——國情不同為理由而拒絕革新的

說法。

而所謂歷史的變革，就是在舊有的基礎上發展新性。這是不否舊有的作用（就是現實的歷史條件的作用），也不否認舊有新性的可能與必要。我們也認為這是科學的見解。但是更進一步，新學論作者却遇到了舊與新性的矛盾，而無法通過。

這話是對的：「一個社會如有一新性，其有新性，雖在一方面不與舊性，但在又一方面，亦須根據舊性」（頁一七四）但是在這新性與舊性的國方面中，我們要把發展新性看為主導的呢？還是把根據舊性看為主導的呢？這實在是不容含糊的問題。

當新學論者說：「一國或一民族在某種情形下必帶有某種新性，否則此國家或民族即不能存在，而此種新性，又非用革命不能得到，則革命雖痛苦，亦是不得不有之」的時候，他是把主導的方面置於發展新性的一方面；雖然就在同一點上，他又承認，因為新性不合舊性，故「守舊者之反對任何改革，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這已經是在自己的立足點上作了某種讓步了。因為我們只能承認，只有從守舊者自己的利益觀點上，反對改革是有理由的；但對於革新者，舊性對他並不合適，新性對他才是合適的；所以反對改革的理由是一點也沒有。

但是一到「釋疑」的一章中，并重點就顯然地從發展新性方面徹底轉到根據舊性方面了。這由原文中所舉的用以說明其理論的實例來看，便可知道。

上面我們已經指出過，本書對於辛亥革命是以為它除了種族革命的意義以外，並無價值。在這里我們可以讀到對於這點的解釋：

「就其是中國近代化所經底步驟說，這個革命是繼往」（頁一七七）「清初以來漢人恢復運動的繼續說，這個革命是繼往」（頁一七七）「不過在建立民國這一方面，辛亥革命在舊情方面，沒有充分根據。辛亥革命後來完全成為政治革命。不過這個政治是跟種族革命來底，是種族革命帶來底。它本身的背後，並沒有實力，至少是沒有充分底實力。……沒有實力或沒有充分實力者，在政治上不能有什麼功用」（頁一七九）

在這里，我們看到，馮先生是以為因為在辛亥以前已有反滿運動，而辛亥革命作為種族革命是繼往的，有舊情的根據的，所以也就有繼承的作用。

是中國現代化之一步驟。而辛亥以前並無建立民主國家的運動，故辛亥革命作為政治革命是無補於事的，亦不能對發展獨性有什麼作用，所以是不必要的。

但是民主政治的提出在辛亥革命時究竟是不合國情嗎？在當時，封建專制帝國已極衰弱，說明自己無法維持統治下去了，農民自發的太平天國運動中已表現出了向民主政策的傾向，在國外華僑的經營和國內的農民的工業建設中已有着新社會力量的萌芽，從歐洲傳來的民主思想已開始動盪着知識分子的腦袋——這些難道還不足以作為一個民主運動的政治革命的現實而根據了假設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辛亥革命還算不得有舊情的根據，那就只能主張，必須等到新的一切已準備的機關中完全成熟了，然後才能進行改革，而若這樣打算，那就根本說不到什麼革新了。

我們當然不反對，發展新性要對舊情有相當的根據。但是「根絕舊情」只是要達到現時的條件，而不是要我在舊情中已經成熟了的東西。新的事物不可能在已經成爲一個完成的東西隱藏在舊的東西之中，而常常只是被壓制在舊事物的機體之中的一些零碎的新的要素。革命的新性是要打破舊機體，使新事物的要素獲得顯露的發展，而長成爲一完整的東西。假如在辛亥革命時的人抱持着馮先生的觀念，那麼他爲了「根絕舊情」一定是在推翻滿清之後另立一個姓馮姓王的人（當時有現成的姓袁的人）來做皇帝，而那樣一來，辛亥革命對於中國的現代化還能有什麼「開米」的作用麼？辛亥革命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具有開米的作用，並不是因爲他推翻了滿清，而且因爲他建立了民國，在今天還來否認這一點豈不是太奇怪了麼？

新學論者給現代史中的黨派翻案，豈不正是在表明他已經不自覺地採取了把根據舊情做革新的主調而觀的觀點麼？
作爲這種觀點的理論基礎的，依舊是他們機械的經濟決定論的公式。他說：「所謂民主政治，即是政治的社會化；政治的社會化，必在經濟社會化底社會中才能行」（頁一七九）這就是說，一個社會必須充分工業化了，換句話說，就是在經濟上充分資本主義化了，然後來談民主政治，才算得有舊情根據，就這國家而言，才算合乎國情。所以他又說：

「一種新經濟制度，在其完全實行以後，雖必引起人的思想以及社會制度的種種變動，但於其初行時，則並不先需要此種變動。生產社會化的開端，始於工業。工業是一個相當進步底社會中所已有底。新式的

工業與舊式的工業，所差在於規模的大小，及技術的優劣。所以所謂生產社會化的開始，不過是生產技術的改良，至於將來所引起底各方面底變動，則是以後底事。」（頁一八六）

真是簡單得很。於是所謂社會的革新就「不過是」把原來已有的舊式工業在規模上擴大一些，在技術上改進一些而已。至於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思想意識都一概照舊好了。因爲那以後自然會跟着變革的。既然這樣，新學論者當然可以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人拉手。他說：

「如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是說組織社會的道德是中國人所有底，現在所須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識技術工業，問此話是說可說的。我們的新學論的意見，亦正如此。」（頁二二八）

這一段話是當作全書結論而寫的。說到這里，恐怕所有的讀者都不能不爽然若失的罷。若者曾主張道德意識是社會物質基礎所變化的，現在却又出現了一種不變的組織社會的道德；若者曾說，在中國舊文化中其主要的我們所當去的，而現在却是中學爲體；若者曾預約指示我們一條中國自由之路，而現在却使我們知道，原來是五十年前張之洞的道路！

新華日報

本訂合份月二十
元五價定册每

新華日報

十二月份合訂本

每册十五元

新華日報
圖書課發售

關於詩歌的幾個主要論點

阮齊

做一個詩人，必須先是一個好人。

——古希臘 斯特拉波

讀了最近的幾篇詩歌理論，「詩創作」(詩論專號)裏胡風，黃藥眠，伍禾，伍辛，這幾位先生的論文，和王亞平，戈茅兩先生合著的一本「詩歌新論」，覺得我與這些研究，討論一下當前詩歌領域裏的幾個主要問題。近年來，中國新詩歌的產量相當多，詩歌理論也發表了不少。創作既如此活躍，理論也並不一致，看法甚至有各走一端的。現在就上述幾篇論文中所討論的：關於世界觀，關於「形象化」，關於感情等幾個主要的問題研究一下。

我們處在今天這個反法西斯戰爭空前劇烈的時代，詩歌作者和其他文藝工作者一樣，感到自己這切需要拿出所有的力量來加入這個戰爭。我們的詩歌作者看到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事物，感到深切的愛和恨，希望憑藉他所運用的武器，把這些事物，這些感覺，告訴別人，更多的人，使他們也看見世界上的真實，也感受同樣的感覺。或者他們本來就見到，感到，我們還想使他們見得更多些，深些，感覺得更強烈些，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理，以至於為真理而去行動，縮短痛苦的歷史行程。

於是詩人和理論家中有一部份就特別看重作品中所具備的正確的意識，科學的世界觀，或者說是進步的思想，這是毫不奇怪，絲毫不錯的。因為，我們只要反面來想，如果作品中所具備的不是這些，而是一些歪曲現實的東西，不正確的意識，世界觀，思想，那末詩歌不但不能達到上面所說的目的，並且加害於人類。但是我們現在的要求比這個還要多一點，不只是反對世界觀錯誤的作品，更要使世界觀正確的作品達到牠有益人類的目的。詩歌，和其他文藝一樣，不只是說明正確的世界觀，而且要具備一種感動人的力量。我們批評一首詩，不會說：「這首詩很對」，而是說：「這首詩很好」。

不僅如此，上面所講「說明正確的世界觀」顯然是有藉口的。假使我們以

為詩人的工作，在於說明世界觀，把世界觀——用一般的說法便是——「形象化」起來，詩歌所表達的祇是詩人的思想，對世界的理解，對現實的認識，或者認為詩歌只是詩人的知識的表達，如果把這樣的看法應用到創作過程中去，我們就會發現：從世界觀→形象，思想→實體，意識→存在，這樣顛倒的命題了。這不單在詩歌創作上，文藝創作上，甚至一般工作上，都是不妥當的，我們都知道：做事不應該從抽象的原則出發，而必須從現實出發。我們不會懷疑：先有現實呢，還是先有哲學？

在詩歌理論中，像這樣明顯的錯誤則沒有，可是有一些嚴重不得當或顛倒的說法還是存在的，譬如說：「詩乃是詩人的世界觀的具體表現」，「詩人必須給主題以形象的創造，情感的滲染。但想像，情感必須建立在正確的藝術觀點上。就是說，詩人必須以正確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去理解或把握現實的主題。然後，把自己的情感儘全力燃燒在主題上……」，「詩人必須有進步的政治意識，才能有強烈的詩的情感。」，「思想，情感，態度互相關聯着，存在着，它們一遇到外界事物的刺激，就發出和諧的共鳴，等到創作主題決定了，當詩人要表現的時候，如何形象的問題就發生了。」(「詩歌新論」)；再如：「把一切抽象的思想觀念和情感，用具體的，活生生的境界事物表達出來，我們姑且這麼說：詩人底創作過程是由抽象到具體。」(伍禾)；「因此，是詩人先有了自己的主觀的想像認識，思想系統，然後才能夠去感覺到客觀的事物。」及「如果說想像和語言創造詩的，這就是胡說，是思想創造詩，正同一切的藝術都是思想，一切的文化也都是思想一樣。」(伍辛)

為了反對世界觀錯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強調作品中世界觀的正確性，但不能強調到一種程度，說是作品的善與壞只要根據牠的世界觀來判斷，或者把世界觀，意識，思想，看做創作過程中的出發點。在這種觀點影響下的作品，我們發現了所謂「口號詩」，「標語詩」的毛病，空洞的，概念的，八股的東西，牠所說明的意識可能正確，但既不能說牠是成功的作品

同時也不能收到社會的效果，而且他所表現的內容，在客觀上也失掉了現實性。

由於從概念出發，從世界觀出發，和看到「口號詩」，「標語詩」的毛病，不幸的事情跟着來，為了挽救「空洞」，另外一個口號就提出來了：「形象化」，把抽象「化」成有形的東西。這理論發展到高度，詩歌裏面只有從概念那邊借屍還魂過來的「一片一片的形象」，「硬貼上去的形象」（胡風說），當然這直直白的感情，原來可以直接說出來的話，也故意轉彎抹角去找一個比喻，一個像徵來裝飾，來堆砌形象出來。胡風先生說：「至於「形象化」，那是先有一種離開生活形象的思想（即使在科學上是正確的思想），然後再「化」成「形象」，那就不是被現實生活所擁抱的，死的思想，形成了思想的論調或圖解的，不是從血肉的現實生活裏面發生的，死的形象了。……我有了多少根據社會科學常識製造出來的「形象」！這一個「形象病」是「思想病」的一個逆症。

具體的現實不是一切藝術所要表現的東西，不獨詩歌為然。藝術家把具體的現實，音波，油，動作，金屬，石塊，語言，文字，表現出來，去感動人心，振撼人們的靈魂。這些具體的現實先使藝術家的心理頭腦發生強烈的感，同時也受到思想的交互作用，通過了他的主觀感情，把這些具體的現實再表現出來，使其他的人們也受到強烈的感，發生思想，和實踐。但在「詩歌新論」中却有這樣的說法：「偉大的詩人，是比小股更勝一籌，」詩之所以成為詩，就因為它有更高的藝術形象。」，「詩是比小說更勝一籌的藝術。」「偉大的詩人，是最高於其想，幻想，想像的。這三種東西乃是造成藝術形象的主要因素。……優美的「詩的境界」多在冥想中構成。」「為了培養豐富的想像，詩人又必須培養自己的思想，情感，靈感。象牙塔中的詩人，以為不必有思想，就能寫出好詩，那簡直是夢囈。因為沒有思想，就沒有正確的藝術觀點；他不能把握主題，更說不到詩的形象了。」

費斐爾先生在「論詩的形象化」中却不是這樣把「冥想」「幻想」「想像」來作為「造成藝術形象」的主要因素，他說「產生形象的基本因素」是「由詩人對於外在世界的緊張關係得來的。」「憤怒製造了詩人」這句話是不錯的。……同樣，詩人對於外在世界的熱愛，也一樣使他把他所熱愛的具體的現實，反映在作品中，使人們對這些「形象」發生感動。實際生活，

客觀的現實，觸引引起感情的反應，幻想和冥想是第二義的。

說到憤怒，說到熱愛，我們就接觸到關於詩歌的第三個問題：感情的問題。強調了世界觀和形象化，為什麼我們仍覺得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呢？這真是一首詩，它的意識，很正確，它所表現的，很「形象化」；但仍覺得它不夠，索然無味，沒有人喜歡聽。於是我們發現了它缺少了另一樣東西，感情。照道理講，這幾乎是不可信的，因為平常我們說「有感而發」，詩大怎麼會「無感」呢？然而事實上却有這種情形，詩人從「思想」「科學的世界觀」出發，經過「提高人生經驗」，「修養知識」，「投」材料」，「我尋主題」，然後「把主題形象化」，以達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發人深省」的目的，在這種過程之中，我們竟沒有發現感情的作用。「有感而發」變成「有思而發」。為了補救這個缺點，就有了這樣的理論：「就是說，詩人必須以正確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去理解並把握現實的主題。然後，把自己的情感全力的燃燒在主題上……」，「情感不但可以加強內容的藝術形象，而且可以使形式起著多樣的變化。」（「詩歌新論」）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先有意識，再把感情去燃燒它，自然會像費斐爾先生所說，發生這樣的後果：「詩人的形象，看起來，像是極其正確的意識所造出來的。這種情形是目前中國詩人的通病，就是作者本人也常能例外。」這裏的「偽造」兩字是值得注意的。「裝做」與「有感而發」，却不是詩人早就有真實的感情，感交這世界。無怪有人創造一種「理論」出來，說感情可以像鹽一樣，幾句幾句地加到作品中去！詩是不假撒謊的，感情是不能偽造的。我們要求真實的感情。

怎樣才能產生真實的感情呢？只有真實的生活才能產生真實的感情，而正確的世界觀只能指導我們去真實地生活，它（正確的世界觀）既不能代替我們的生活，更不能直接地產生形象和感情，形象和感情只有在真實的生活中才能產生。

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中說：「情感不是由習慣硬生生製造出來的。」「並不是因理智而創造，而是因內心需要而創造。」「一個人對於別人的影響，決非單靠言語，而是要用他的生命來感染的。」「真理不是一種由腦子分泌出來的硬性的教條像岩洞壁上分泌出來的鐘乳石那樣。真理是生活。你不當在你腦子裏去我尋，而是在別人底心裏我尋。」「托爾斯泰說：「藝術作品的善惡是從心底所說出的程度上之差異而生的。」

列寧論藝術及其他

蔡特金作
戈賓樓譯

蔡特金的名字，正像盧森堡和克魯斯考亞的名字一樣，是為我們大家所深知熟識而用不着我在此再多加介紹的。

我此地所譯的這篇「列寧論藝術及其他」的文字，是從蔡特金在九二四年所寫的「列寧回憶錄」中節譯出來的。這段文字雖不是出於列寧本人之手，但是蔡特金却用很生動的筆法，將他關於藝術的觀點再現出來，特別是提出了列寧的一個最根本的觀點：「藝術是屬於人民的」。他這樣說道：

「藝術是屬於人民的。它的最廣的根源，應該出自廣大勞動羣衆的最低層，它應該為這些羣衆所瞭解和為他們所熱愛的。它應該將這些羣衆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聯合起來，並把他們提高起來。它應該喚起他們中間的藝術家發展他們」。

從此我們也可以知道：只有對於人民的文學才是勝利了的文學，只有屬於人民的藝術才是勝利了的藝術。

列寧更進而提出了一個問題：「怎樣才能使得人民接近藝術，和使得藝術接近人民呢？」為了要完成這項偉大的任務，列寧就提出了加強廣大勞動人民的教育與掃除文盲的問題，列寧曾這樣肯切地說道：「我們必須隨時刻把工人和農民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首先要推行最廣大的人民教育與訓練。它創造出文化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應將真正生長出一個新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的藝術，這個藝術將創造出一個與內容一致的形式來……」

在列寧關於藝術的觀點上，還有兩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就是接受遺產的問題。列寧在這篇關於藝術的談話中，雖沒有明確地指出這一點，但從中可以看出，列寧是反對那種以「藝術的」都是好的和「舊的」都是壞的人。他認為「我們必須保存那些美好的東西，拿它來做模範，從它再出發，即使它是「陳腐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不應將「陳腐的一切」都拋棄了。要保存它的精華的部分，來作進一步

發展起點。另外一點，就是我們應該從發展，提高與進步的觀點來看藝術，列寧這樣說道：「……我們不要忘記，音樂——這並不是真實的藝術，只是多少一種娛樂而已。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我們的工人和農民……他們不是靠國家的費用來支持生活，反而是他們以自己的勞力來支撐國家的。他們「造出了」革命，保護革命的專業，而流了無盡的血和作了無盡的犧牲。對的，我們的工人和農民應得到比馬戲更多的東西。他們有權利得到真正偉大的藝術。」

蔡特金所寫的「列寧回憶錄」，此地差不多是全部出來了，只有開頭的五六小段，是敘述列寧和列寧夫人的家居生活的，因與本題無關，就完全從略了。

——譯者——

當我們三個女人正在討論關於藝術和教育的問題的時候，列寧趕上了我們（註一）。他立刻對復生動地參加了這個談話。

他這樣說道：

「新的力量的覺醒，他到想在蘇維埃俄羅斯建立新的藝術和文化的工人，這是件好的事情，這是件好的事情。他到發展的飛快的速度，是明顯而有益的。我們必須趕上幾個世紀以來所等閒放過的工作，我們需要這撥撥。混亂的動搖，對於新的口號的狂熱的追求，這些口號在今天對於某些藝術與思想的潮流高呼「體讚」（Hosanna），而明天則高呼「把他們釘上十字架」。這一切情形都是不可避免的。（註二）」

「革命開放了此前所被束縛的一切力量，並且把它們從深深的奴隸制到生活的浮雲面上去。這兒給你舉一個例子吧。想一想沙皇宮殿的時鐘和鐘聲，以及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好及奇癖，會給我們的繪畫、雕刻及建築的發展以什麼影響。在建築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上的社會裏，藝術家是為了

市場而獲得作品的，他需要顧客。我們的革命，將藝術家從這些大殺風景的條件之下解放出來了。他使得蘇維埃國家成爲這些人的保護者與顧客。每一個藝術家，假如他承認這是對的，他就有權利自由的，按他自己的理想去創造，而不管其他的什麼。

這是很明白的，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不應該站在一旁，交叉着雙手，讓混亂的狀態高漲發展就怎樣發展下去。我們必須完全有計劃地來領導這個過程，並且形成它的結果。我們還沒有做到這一點，並且還做得很壞。我覺得我們之間也有辯論的時期希特（註三）。我們太是些「繪畫的廢棄論者」了。我們必須保存那些美好的東西，拿它來做模範，從它再出發，即使它是一陳腐了的東西。爲什麼我們要音樂那這無美好的東西，不拿它來作爲更進一步發展的起點，而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爲它是「陳腐了的東西」呢？爲什麼我們要崇拜新的東西，把它當作是我們應該崇拜的上帝，而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爲「它是新的」呢？這一切都是無聊的，萬分的無聊。在我們這兒，就存在着很多藝術上的偽善，當然，也有對於在西方流行的藝術的無意識的崇拜。我們都是些優秀的革命家，但是爲了某種理由我們覺得必須證明我們也是站在「現代文化的頂點上」。我自己就大膽地說我自己是個「野蠻人」。我不能欣賞那些印象主義、未主義、立體主義以及其他一切藝術天才而表現的「主義」的作品，我不了解它們，我不能從它們得到任何樂趣。

「我不能相信和承認我沒有足夠的感受力來了解它們，但是爲什麼一個充滿了敏感的眼睛，要用一個三角形來代替鼻子作爲藝術的表現；爲什麼對於革命行動的熱望，要造成一個人體；它的五官四肢都聯合成爲一個整體，好像一個軟綿綿的無形的布袋，披在兩根高樑上，此外每一邊還有兩根叉，各有五個尖銳。」

當說了這裏的時候，列寧從心的深處哈哈大笑起來了。
「是的，親愛的克拉克，一點都沒有辦法，我們兩個人都是老壞（註四）。但是我們能滿足的，就是最低限度，在革命裏面我們是年青的，並且是站在最前列。可是我們趕不上新藝術的步伐，我們將退化了。」

他又繼續說道：
「但是，重要的並不是我們對於藝術的意見。同樣地，重要的也並不是將藝術，只給予以千百萬計數的全人口中的幾百個人甚至或者是幾千個人。

藝術是屬於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應該是出自廣大勞動羣衆的最底層。它應該是這些羣衆所瞭解和爲他們所變化的。它應該將這些羣衆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聯合起來，並把他們提高起來。它應該喚醒他們中間的藝術家和管理他們。當工人和農民羣衆正需要黑麵包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只拿甜美的餅乾來給很少的少數人呢？當然，我這說說，並不值是在字面上的意義，同樣地也是形象的說法，——我們必須時刻地把工人和農民放在我們的眼前。爲了他們的解放，我們必須學會了管理和管理。這同樣地，也可以應用到藝術和文化的部門中去。

「爲了使得藝術能接近人民和人民能接近藝術，我們必須首先提高教育與文化的水準。我們在這一方面的事情怎樣呢？你也許爲我們自從獲得政權以來所做的幾個龐大的文化事業而覺得狂喜了。當然，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在這一方面我們是做了許多的，很多的事情。我們不僅「忙拉了頭」，正像各國的孟塞維克和你們國家中的考茨基所「忙拉的一樣；我們同樣地還教育了他們，使很多的人都開明了。但是這這所謂「很多」，還只和過去比較，還只是和過去的統治階級及階層的罪惡去比較而言的。爲我們所喚醒了及開明了的工人們對於教育與文化的渴求，是大得無限的。不僅僅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各工廠中心是如此，就是遠在這些地方以外的，甚至一直到最小的村莊，也都是這種情形。而同時，我們的人們都是會爭的。完全是會爭的，當然，我們正在進行一個真實的頑強的掃除文盲的戰爭。我們在大的和小的城市及鄉村裏，建立起圖書館、閱報室。我們組織起各種不同的舞臺來。我們舉行好的演劇和音樂會；這派一派「展覽會」及「教育列車」到全國各地去。但是我更想說一句，這這工作對於千百萬只在很基本的知識和很原始的文化的人們，能給些什麼東西呢？我們想不想，今天在莫斯科有一萬人，明天又有一萬人，到戲院裏去看一齣優美的戲曲，這高興，同時千百萬人在學習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寫出他自己的名字和學習算數，在想消化教給他們的文化，說地球是圓的而不是方的，說自然法則在管理世界，而不是女巫，男巫和「天父」在管理着世界。」

我指出道：「列寧同志，你對於文盲不應該這樣悲憤地說。在這一方面，它幫助了你使得革命的事業更容易完成。它使得工人和農民更團結，不至被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思想所塞滿了而衰弱下去。你的宣傳和訓練是在一片處女地上播下了種子。那兒容易播種，也容易成熟，用不先來翻動了整個原始的森林。」

列寧同意道：

「是的，這是對的。可是，這只在某種限度內是對的，講得更確切一點，對於我們的鬥爭的某一時期是對的。當然，在我國為了政權的鬥爭，和舊的國家機構必須粉碎的時候，文盲我們是可以容忍的。但是，難道我們只是爲了破壞而破壞嗎？我們之所以要去破壞，是爲了要建設得更好一些。文盲是很壞的現象，它是完全不能和全國復興的任務相配合的。馬克思說得對，復興的工作應該是工人們自己的事情，我更加上一句，也應該讓農民的事情，假如他們都得到自由的話。我們蘇維埃的制度，使這些任務更容易實行。用於這個制度，目前成千萬的勞動者正在各處的蘇維埃中學習，而蘇維埃的機構也正在進行復興的工作。這些是有着一全盤的力量——的男子和婦女，正像你們國家裏常說的。其中大多數的人都是在舊制度下長大，因此，他們就沒有受過教育和習於文化，但是現在他們渴求着知識。我們是採取最堅決的步驟，提出我們的目標，要將這些新的男女吸收到蘇維埃工作中去，和給他們相當的實際的和理論的教育。可是，雖然這樣，我們還不能在創造的領導力量上滿足我們的需要。我們不得不吸受舊式的官僚主義者，結果在我國這兒就形成了官僚制度。我一個人的心憤恨它，當然，這並不是指這一個或另一個個人，其中也許還有其有效能的人。但是我憤恨這個制度。它從上下壓迫了我們和引我們走向墮落。而克謝和根缺官僚制度的最有決定作用的要素，就是最腐敗的官僚制度。」

「我們對於將來的展望是怎樣的呢？我們創立了許多壯麗的學校機關，和真實地採取了許多好的步驟，其目的就是使得無產者和農村的青年能够學習，能够研究和把握文化。但在此地，在我國前而又發生了一個困難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像我國這般多的人口的一個國家是怎樣呢？而最壞的，就是我們沒有足夠數目的兒童園，育兒所和初級小學。千百萬的兒童毫無訓練與教育就長大起來了。他們正像他們的父親和祖父一樣，是愚昧無知和無文化的。多少天才就因爲這樣而被毀滅掉，多少對於光明的企求就這樣被壓制住。從新生的一代的幸福的眼光來看，這是一個可怕的罪行，這個罪行等於整個國家變成共產主義社會的蘇維埃國家的財富一樣。在這裏面就包含着一個可怕的危險。」

列寧的聲言，通常是很平靜的，但這時他帶有些憤激了。
「這個問題是怎樣觸動了他的心」，我這樣想道，「他好像是在我們三

個人面前，作了一個鼓動的演說似的。」不知道我對這話的那一個人，——我不記得是誰了，——講起幾個藝術與文化部門中的特別引人注意的現象，以爲這是「時機的條件」而產生出的。列寧對於這一點反駁道：

「我很知道！有許多人都誠懇地相信，目前時期的困難與危險，是可以拿 Pater noster (「麵包與馬戲」) 來克服下去的。『麵包——』這當然可以！至於說到馬戲——讓牠們去吧！——我也不反對。但是請牠們不要忘掉，馬戲——這並不是真實的藝術，只是多少一種娛樂自己。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我們的工人和農民，並不和羅馬的流氓無產階級一樣。他們不是靠國家的費用來支持生活，反而是他們以自己的勞力來支持國家的。他們『造出了』革命，保護革命的遺產，而做了無盡的並作了無盡的犧牲。對的，我們的工人和農民應得到比馬戲更多的東西。他們有權利得到真正偉大的藝術。因此，我們首先應進行藝術，的人民教育與訓練。它創造出文化的基礎，當然這是在糧食問題解決了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在這個基礎上，應該真實地生長出一個新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的藝術，這個藝術將創造出一個與內容一致的形式來。在這個路途上，我『的』知識份子——要解決許多最重要和崇高的任務。在實際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就完成他自己對於無產革命的義務，因爲這個革命在他面前敞開了門戶，把他們從低微的生活條件引向到更高空闊的地方。……』

在這一夜裏面，——已經是很晚了——我們談到一些其他的問題。但是關於這些問題的印象，和列寧關於藝術，文化，人民教育的這些問題所作的最精采的意見比較起來，是有些減少了。當在這一團寒冷的夜中，我帶着一個熾熱的頭腦回家去的時候，有一個思想在我腦海中閃過去：「列寧是怎樣真誠而熱切地在愛着勞動的人們呀！」

(註一) 從這回回憶錄的前文看來，此處所指的三個女人，即德金特金本人，列寧夫人克魯普，卡亞和列寧的妹妹瑪里亞·烏里亞諾娃。
(註二) 「哈爾濱」(Helsingfors) 是希伯來人翻譯上帝的呼聲或祝福之語。

(註三) 卡爾斯泰特 (Doctor Karlstadt - 1483-1541) 是德國宗教革命運動的領袖，反對加特利教會甚烈，並攻擊高等教育，科學及藝術。

(註四) 克拉拉是德金特的名字。

信 關於戰後和平問題及其他

戰後和平問題

XX先生：

(上略)日來報上時常看到討論戰後和平問題的
文字，尤其英美人士對於這個問題的熱心，似乎
比到對於民主勝利如何獲得的問題更熱心些。試
問我們中國人對這問題應有怎樣的認識，採取怎樣
的態度？(下略)

冀敬亭敬上

敬亭先生：

來信提到的那個問題——戰後和平問題，自然
是目前的重大問題之一。戰後和平問題，就是民主
國家作戰目標問題，對這問題如無明確的答覆，就
是對作戰目標缺乏明白的認識，這就要使得在動員
人力物力來參加作戰上，在發揮加強各國各民族的
積極性上，都難做到充份。你說對這問題英美人士
最熱心，其實我國也不乏熱心之士，其熱心程度也
不減英美朋友。這種熱心，自然不能說不好。但我
們實在不能不有過多的時間，力花費到這問題
的討論上去。這是怎麼講法的呢？為什麼我們
一方面既說這問題很重要，另一方面却又說不應花
費過多的時間去討論它呢？這是因為：(一)這問題
問題，就是擴大民主自由問題，確保各民族之間的
自由平等問題。這在被稱為大西洋憲章的蘇聯宣言

上已經說得明白，無需乎再來多所討論。(二)
現在大家討論的也已經不是這種原則上的問題，
而是根據這種原則應當採取些什麼具體上的辦法的
問題。但這樣的問題，不是討論討論就能解決，它
的解決，有待於某些實際條件的備具，其中最基本
的一種條件是爭取解放的民族它自身的實際力量。
我們試看，自從戰後，貝當等向希特勒投降以後
，法蘭西國家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而巴黎工人的
罷工鬥爭和法艦艦士的英勇不屈一經表現，法蘭西
正字又在世人心裏召回了敬意；南斯拉夫雖然目前
還在淪亡之中，但由其人民游擊戰爭的力量是在一
天天的發展壯大，牠所得到國際上的尊敬也就一天
天的增高。蘇聯在今天可說是有極其崇高的國際
地位，這是因為牠有「斯大林格勒人」那樣新的人
，表現了史所未有的新的精神，新的力量。中國，
如果她沒有堅持下來五年又半而仍屹立不搖的團結
抗戰，也決不能獲得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友邦
為什麼要盡力援助蘇聯，「雖冒萬險也要援助中國
」？這不是因為蘇聯與中國打得可憐，而是因為
中蘇自己已能挺起腰來。這種「天助自助之人」的
道理，在戰時是如此，在戰後更其是如此。所以，大
西洋憲章上所標出了的原則，到底到了戰後將怎樣
具體實行，實行到什麼程度？這不是用唇舌筆墨來
爭論的問題，而是要用自己的行動，自己的力量來
爭取的問題。(三)尤其重要的，戰爭還未勝利，
要對遠勝利還有相當長的征途，還有許多迫切的事

情要做，還有許多困難問題要解決。我們應當多花
一點時間，多費一點精力到解決困難，爭取勝利這
上面去。我們今天的中心問題，當務之急的問題，
還是怎樣才能把敵人徹底打垮的問題。切不要因為
眼睛望着明天而把今天反而放鬆了。有人說，「凡
事總則立」，明天的事情，今天得早有準備，莫到
了明天倉皇無措。是的，我們是應當早有準備。但
我們要多在實際上準備，多從實力上準備，才是真
的準備。否則「築室道謀」，好謀而不能成。我們
只有對全面反攻有了充份的準備，在打退敵人上表
現出了堅強的力量，我們才能在國際上站穩一個地
位。而且，只要我們能對全面反攻確有充份的準備
，只要我們能在打退敵人上表現出堅強的力量，我
們也就不怕不能在國際上站穩一個地位。至於觀念
上的問題，自然也是重要的。但既已有了大西洋憲
章一類的文件，我國則蔣委員長也已在先鋒論壇報
上發表了文章，主要的問題，目標和方案的尚問題，
可說已經確定。即使不時尚有一些不正確的論調出
現，那可在必要時給以答覆，但切不可把這事強調
得太高，好像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似的，致使我們
所應集中努力的方向，中心，因而模糊起來。
總之一句，戰後和平問題，就其本身來說，是重
要的問題，我們全國上下五年半以來乃至還要長下
去忍受一切苦痛，不怕一切犧牲，所為何事？我們
對此自不能有絲毫馬虎，絲毫放鬆。但這個問題的
最終決定者，並不是唇舌舌劍，而是自己能不能打
勝仗，能不能把自己的生產水準向工業化提高上去
的真實力量。所以我們應當從這方面來爭取自己對
這問題的優越地位。

列寧主義的特點

又先生：

(上略)「列寧主義問題」這本書，我已看了好幾遍。但為什麼不用列寧主義這一名詞，我實在弄不清楚。是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總發展裏，是放過了許多時期的貢獻。但既然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這名詞也常用以指列寧主義，那麼，有了馬克思主義這名詞不是已經够了嗎？為什麼還要到列寧主義的名詞呢？譬如說，恩格斯對於馬克思主義也有極大的貢獻，但就沒有用過恩格斯主義的名稱來稱述恩格斯所貢獻的一部份。關於這一點，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關於列寧主義基礎」和「關於列寧主義問題」兩篇著作都有過解釋，但在我，至今還是不大了解。有非用列寧主義這名稱不可的道理否？希望你能解開我這個疑團！(下略)

民安先生：

張民安上

(上略)關於信上問到的一個問題，列寧主義問題中的那兩篇文章，可說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要解開你的疑團，最好的方法還是去把那兩篇文章細心多看幾遍，如果那兩篇文章還解決不了你這問題，我就只好將其所知以作貢獻。至於能否解決問題則不敢說。

你用恩格斯來稱述恩格斯，這倒給了我一個啟發的想頭，我們說從這書裏引起吧。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也有其很多的貢獻，但列寧對馬克思主義

所作貢獻，比較起來，却有不同的之處。這主要是發展階段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質，是辯證唯物論的宇宙觀，唯物辯證法的方法，歷史唯物論的社會觀，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革命導師，科學社會主義社會的工程師。這同時也就說明馬克思主義的事業。這一事業，不須須經時長的歷史時期，而且還須經極短不同的發展階段。在這事業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同一個階段上(資本主義前期)的工作，列寧則是做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上(帝國主義時期)的工作，前者底特點是理論系統

的建立，思想意識上的武裝，後者底特點是行動的組織，策略的完成。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是擴大了它的方面，打通了它所遇到的障礙，列寧的貢獻，則是把它提到更高的階段，使它更向前發展一步。我只要看「關於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便具體的說明列寧把馬克思主義更向前發展了的有些重要問題(如無產階級專政，農民問題，民族問題，戰術與策略，黨的工作等)就可獲得，用列寧主義這名稱，不單是為的要敘述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有些什麼特別的，新的貢獻，主要的還是為的要把馬克思主義底列寧階段到底有些什麼特點(這可說無階級專政，農民問題)直到工作作風等六個問題來說明)。

朋友，你還是去把這篇文章多看幾遍吧，要我說，我也只有這這篇文章裏我些話來說說，除此以外，實在不能有更好的解答。(下略)

編者

理論怎能跑到實踐的前面去？

編者先生：

我有一個問題解答不了，不知你肯同我解答否？問題如下：

「幾項學風黨風文風」那篇文章中有這樣一句：「一般說來，我們的理論總不能與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能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這就是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但從同一篇文章裏，我們知道，理論是根據實踐而創造出來的，就是說實踐在前理論在後，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但既是這樣，理論又怎能跑到實踐的前面去呢？上述問題如蒙賜答，不單個人欣幸，我們這裏有許多人在等候好音呢！此致

史風展上

風展先生：

你提的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有許多人都會問到過它，我們很願意把它公開出來，讓大家都來討論一下。

(一)一般說來，理論雖根據實踐而產生，是後於實踐而有，但一經產生以後，就能對於隨後的實踐發生領導的作用，就能跑到實踐的前面去。

(二)但這還不夠解答這疑團的問題。在馬克思的那篇文章裏，顯然是說，我們的革命理論是落在我們的革命實踐之後，這只要看「看來何所引證句」的上文就可了然。上文是：「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總線以非常之不精確，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把這一句和下一句(即來信所引)連起來讀，就是在說，我們的理論是落在實踐之後。根據了這一層意思我們不是還可以像有些人所解答，把理論的領導作用作為「理論跑到實踐前面」的解答呢？

(三)如果那樣的解答，除非說中國的革命實踐根本就沒有革命理論在領導，否則就解答不過去。因為那那樣解答時，只要有理論在領導，理論

就是說在實踐的目前。但假說中國的革命實踐沒有理論指導，又顯然不是事實。而且我們所據的這篇文章本身，就在所引語句的後面，明明在說：「事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過去高了一些」，我們不但有理論指導，而且理論水平還在提高。但儘管這樣，却仍然應當承認我們的理論還落在實踐之後。那麼，理論到底要怎樣才能跑到實踐的前面去，在實踐之前呢？

（四）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把握住理論與實踐的關係。說理論跑到實踐的前面，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實踐產生理論，理論又回過頭來指導實踐，這是一般的說法。實踐如何產生理論？理論是從實踐經驗的系統研究中，把經驗所得的真理，更加深刻化，普遍化了的東西。因為它已深刻化了，普遍化了，所以可使下一步的實踐，在它的領導之下，更有保障地得到正確的方針與方法，收得更充分的效果，獲得更快更曲折更大大小小損失的發展。但下一步的實踐，如及時地加以研究，又可使已有的普遍真理內容更充實，真實性更深刻，水平更高，更有力量地，更妥善地來領導再下一步的實踐。從另一方面說，已有的普遍真理，雖對於同一範疇內的各種，各階段的實踐，總是有領導的作用，但如果不時時用實踐的研究來加以補充，發揮，以至代替，它就會在實踐的後面顯得落後，顯得力不從心。這就是說，理論要從實踐產生，實踐又有待於理論的領導，理論再有待於實踐的證實，發揮，提高——這是理論的發展過程，也就是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係。

（五）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應交互發展，理論與實踐與革命實踐應相互配合。革命實踐展開到哪裏，理論與實踐也展開到哪裏，二者就平行發展着。

二者能平行發展，有什麼革命實踐就有什麼理論研究，任何實際都和普遍真理相結合，任何實際都有自己的理論指導着（如我們現在，軍事理論比較充份，政治理論也已有了一些，經濟理論則較差），如此，理論水平就提得很高，跑到實踐的前面去了。上面我們這樣解答，並不作為最後的結論，只是提供一點意見，作為大家討論時的參考。

編者

道德也有唯心唯物之分嗎？

XX先生：

（上略）從朋友處借到一本「登載XX文獻」，看了一遍又一遍，愈看愈高興，愈看愈有味道，真像鏡子一樣，每對它照一次，總可發現自己面上或衣上某處有污點或不整之處。但也有些自己不大容易看顧的地方，看了好幾次也沒看懂。只好向你請教，雖然你未必都還不認識，你總可以允許我問吧？要問的地方很多，且先請你回答下面這個問題。文獻七一面上說：

「……從來的這種『道德』觀，都是唯心論的。把道德建立在辯證唯物論的科學的基礎之上，公開的建立在無階級解放與人類解放鬥爭的利益的基礎之上，只有共產黨人……」

據我的了解，道德完全是人的主觀的表現；有沒有道德或道德好不好，就與有沒有良心或良心好不好有關。換句話說，道德問題就是人心問題。因此，別的問題可有唯心唯物之分，唯道德問題不能有唯心唯物之分。現在文獻上竟這樣說，真

可點不懂解。建立在辯證唯物論上的道德觀，到底是一樣的一種道德觀呢？可否舉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講一講？（下略）

友竹先生

友竹先生：

所問關於道德的問題，據我所知，試答如下：（一）道德問題，決不是人「心」問題，而是人的行為的問題，說一個人有沒有道德，是說他的行為能不能適合於他所處的那個集體或社會的共同要求，說一個人的道德好不好，是說他的行為對於那個集體或社會的共同要求適合得不够。這就是說，道德不是就人的存心來論，而是就人的行為來論的。

（二）道德是人的主觀的表現，思想意識，知識了解等又何嘗不是人的主觀的表現。思想方法和認識方法有唯心唯物之分，道德為什麼不能有唯心唯物之分？所謂主觀的表現，並不是主觀無端的表现，憑空的表现，而是主觀對客觀的某一反映。既是对客觀的一種反映，就必有符合於客觀或不符合於客觀的分別，符合於客觀的就是唯物的，不符合於客觀的就是唯心的。所謂主觀的表現，這個作某種表現的主觀，並不能表現了就算完畢，他還要看自己的表現對客觀發生些什麼作用，有些什麼效果，並且他自己也會吃到這後果——客觀給予這個表現的回饋。所以，道德也和思想、知識等一樣，不是表現者個人（主觀自身）的問題，而是表現是否適當，主觀和客觀的關係是否切合的問題，其有唯心唯物之分，是毫不足怪的。

（三）辯證唯物論的道德觀，就是革命的道德觀，科學的道德觀。這可分別來說明。說它是革命

的，是因為它不因為舊的傳統，不為舊的生活習慣社會風尚所拘束，而要適應於新現實的新要求；設它是科學的，是因為它不尚虛文，不尚形式，而唯求切合於實際。這是說它是唯物論的。其次，正因為它能追上新的要求，切合新的實際，所以它善能把對立的東西統一，把矛盾的東西解決，就是說，它是辯證的。具體地說，道德的基本要求是要把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對立統一起來，對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得到一種解決。真能滿足這個要求的，正是那辯證唯物論的道德觀。例如共產黨人的道德，無產階級的道德，其總的要求是階級社會的消滅，人類個人？人壓迫人制度的消滅，和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的成立。它所要求的忠勇是對於這樣一種事業的忠勇，它所要求的信義是對於

這樣一種事業的信義，它所要求的仁慈以及其他的德目也是對於這樣一種事業的仁慈以及其他等等。在這樣要求之下的道德行為，是使集體利益，社會利益能夠完備起來，發展起來的行為，同時也是使個人利益，行為者本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得到提高的行為。其次，它也不修談良心，修談「動機良善」等等，而坦白地說這為「什麼利益」。在辯證唯物論的道德觀裏，個人的利益和公共的利益是統一起來了；個人的利益固然只有在公共的利益有了保障之下才有保障，而公共的利益也不能於個人利益以外去空談。例如整個民族，得解放以前，其中的一階級就難有解放可言，整個階級未得解放以前，其中的某一個個人就決無解放可言。但是，離開了個體的解放，整個的（全體的）解放也就變成空話，

虛偽。因此，共產黨人的道德，決不要求個性的專制，相反的，它正要求個性能夠獲得充分的發展；因為它懂得，只有在個個人都健全的發展之上，全體才能真的健全起來。但它可也決不允許把個人提到全體以上，讓個人跑到全體以前去。它有時還要求個人為了全體的利益而犧牲一己的利益，不過在這裏的全體利益是很具體的，全體利益把犧牲者自己的利益也包括在內也是很明確的。例如抗戰的利益要要求個人犧牲，有時甚至要求犧牲生命，但抗戰的利益（民族解放）是人人可以看到的，同時也是對犧牲者本人有利的。進一步說起來，就是我們的道德，要求大家為抗戰利益而忍受犧牲，同時也要求抗戰勝利能為大家增加福利。

編者

後編

者編

這是我們革新後的第一期。

開宗明義，先說一說我們的革新方針。配合着我們黨中央整風的號召和當前現實的要求，我們的理論工作不能不有進一步前進。概括的說，那就是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特殊，從原則的論陳到事實的分析，一言以蔽之，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分別的說，我們要把每一個領域裏的原則和理論，應用到中國的生活和現實裏；在道當中，中國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都在我們注意的範圍之內；不過，有幾個限制：第一，我們的對象限制於社會科學；第二，社會科學的範圍太廣，我們的刊物不是一個所謂純研究的刊物，因此只有那些和當前抗戰的現實有密切或直接的關係的理論問題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我們重視中國的今日甚於我們重視中國的昨日，而在中國的昨日——中國歷史中，我們尤其重視中國歷史上農民運動的研究，因為它是和我們當前的現實——抗戰息息相關的；至於中國近代史，特別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類的問題，更不用說，是在我們最關心的範圍之內了。處理當前問題亦復如此，任何一個直接有現實意義的理論問題都在我們的注意

之列；有最大的現實意義的就是有最大的理論意義的。

簡單地說，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在這一期裏，值得向讀者特別提出介紹的有薛子正的「治安強化」運動之透視一文，它剖析了敵人在華北倒行逆施的各種措施，這些材料都是我們經常不容易看到的，而它的重要性却又是我們每個人所必須牢記在心頭的。陳家康的「明末農民運動研究」一文指出了作為中國歷史支柱的農民運動在明末當時的兩重歷史任務——民主改革和抵禦外侮的任務，而在外族侵入的時候，他們又怎樣企圖和當時的「民族地主」團結在一起，完成他們的抵禦外侮的歷史任務；李自成——明末農民運動的天才的領袖失敗了，然而罪過不在他們身上；這是一篇真正的歷史悲劇，它的教訓，是我們應該深深警惕的；從這一篇文章裏，我們不但可以得到嚴重的歷史教訓，而且還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人民的領袖是怎樣一種光輝燦爛的人物。

革新伊始，各方面一定有很多照顧不到的地方，我們衷心地期待讀者們的建議，批判和指正。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出版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本期零售貳元



要 目

自由獨立新中國的起點

高揚

中國工人與民族解放運動

華崗

反對羣衆工作中的宗派主義傾向

吳克堅

實際與實際

陳家康

日一月二年二十三

目錄

時論

人民的力量是永遠不能克服的

卡港會議

論瀨田戰局

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文化

專論

自由獨立新中國的起點

中國工人與民族解放運動

反對羣衆工作中的宗派主義傾向

批評

實際與實際

介紹

列寧論文學及其他(上)

(五一)

(五二)

(五四)

(五五)

高揚(五七)

華崗(六〇)

吳克堅(六三)

陳家康(六六)

V. 謝爾賓娜作(七四)
史實權譯

群衆

第八卷 第三期

三十二年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群衆週刊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經售 新華日報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西安
各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 一元

六期 五元四角

十二期 十元

廿四期 十九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人民的力量是永遠不能克服的

——祝蘇聯紅軍成立二十五週年——

二十五年來，年年此日（二月二十三日），全世界愛自由愛光明的人士無不歡慶一次蘇聯紅軍的光榮傳統，吸取他們的戰鬥教訓，來加強自己的戰鬥意志。然而，二十五年來，蘇聯紅軍的豐功偉績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燦爛，蘇聯紅軍對於全人類和全歐戰沒有像今天這樣偉大——是他們開始打退了那快要淹沒這一個世界的法西斯的狂瀾，是他們最後扭轉了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奠定了同盟國家全面反攻的基礎。

近兩個月前，我們還看到一片黑壓壓的法西斯戰車蜂湧在列寧城——莫斯科——斯大林城——三大名城之外；曾經何時，列寧城解圍了，斯大林城之戰結束了，高加索的德軍陷於重圍，烏克爾德軍在嚴重威脅之下；未來的更偉大的勝利且不必說，單在斯城的一戰（自去年十一月十九至今年二月二日）中，德軍被擊潰者就有三十三萬，被俘者九萬，而其中將級軍官竟達二十四名之衆，歷史上有過不少著名的戰役，而那些戰役和斯大林格勒之役比較起來，是必遜色白啊！

蘇聯紅軍的力量是從那裏產生的？

首先我們不能不指出的是，近代戰爭是一個物資戰，沒有源源不斷的充裕的槍械，彈藥，裝備和給養的供給，任何英勇的部隊，赤手空拳，是不能取得勝利的；蘇聯在十九個月的戰爭當中，雖然失去了相當大的土地（特別是工業地區），但是：一方面由於撤退每一個城市前，有系統地，將所有可能遷移的工廠設備，機器和原料都遷移到後方，不能遷移的加以澈底的破壞，不能澈底破壞的，發動游擊戰爭，加以不斷的襲擊，使敵人幾百萬大軍盤踞在俄羅斯的平原有如住在荒涼的沙漠，而且隨時經常地遭受游擊隊的破壞和搶掠區人民有組織的怠工，另一方面由於後方平時生產迅速地向戰事生產的扭轉，戰時生產不斷地加強，人人節約，事事爲公，十九個月來蘇聯的戰時生產不但沒有削弱，而且是加強了，據一位中立觀察者的估計：「目前

他們（蘇聯）軍火飛機之產量，竟能超過戰前」（史諾著「蘇聯戰時生產」，一月二十一日「費城星期六晚報」）。這是蘇聯紅軍勝利的基礎。

其次，紅軍不但有全蘇聯人民做他們的後盾，而且有天才的戰略家——斯大林同志在領導着他們，即如在這一次的新大林格勒區之役中，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英雄格爾可夫將軍就說過「德國人並沒有戰術的錯誤——但當希特勒自任最高統帥的時候，在戰略上就有了一個大錯誤。希特勒給斯大林打敗了，斯大林是親身領受這些攻勢戰鬥的——這一種情形不僅對於斯城之役爲然。事實上，在整個蘇德戰爭中，德國冒險的攻勢戰略是失敗了，而蘇聯的攻勢防禦——消耗——反攻的戰略却是輝煌的成功了；在攻勢防禦中，我們看到了列寧城——莫斯科——斯大林城的堅守；在消耗戰中，我們看到了德軍後方的有組織的廣大的游擊戰爭；在攻勢防禦轉變到反攻中，我們又看到了列寧城的解圍，斯大林格勒的大殲滅，高加索的逐步光復以及在目前展開的對頓內茨盆地的德軍又一包圍殲滅戰的形成。在這一聯串的發展中，特別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從攻勢防禦到反攻的迅速的轉變。這種轉變的迅速的進度，會使倫敦星期報的加爾文先生驚嘆爲「四個禮拜之前做夢也不曾想到」（大意，十四日同報）。事實上，這是很簡單的：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是德軍實力的消耗，一方面是紅軍力量的增長。在消耗德軍的一方面，除掉那三大名城光榮的保衛戰而外，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普遍于所有德軍後方的蘇聯人民游擊戰爭的活躍；德軍防禦（奧察爾、庫爾斯克——羅斯托夫——）的崩潰不但是在蘇聯紅軍的重砲下，而且是崩潰在蘇聯游擊隊員堅持了十九個月的艱苦奮鬥中；蘇聯游擊隊的敵後戰鬥打下了紅軍正面反攻的基礎。在紅軍力量增進的一方面，我們不僅要看到一般戰時生產的加強，而且要注意到在戰爭期間，他們是怎樣不停的，緊張的，嚴肅的，編練新軍和組織大規模的機械化部隊，他們雖然不斷希望英美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但是他們從沒有一刻放鬆自己的努力，他們努力的結晶表現在最近的光輝的反攻上

這一次閃電性的輝煌大反攻沒有在戰爭當中組織成和訓練成的龐大的機械化部隊和動力化部隊做基礎是不能想像的。

天才的戰略，還必須有能貫徹這些戰略的指揮人員。在這裏，我們就不能不想起組織這些。蘇聯的紅軍指揮官，特別是在最近的反攻期中，許多過去對我軍是生疏的名字，現在好像都黃昏過後地大放光輝。天上的繁星一樣，一個個射出光輝來了。這種巨大的規模的指揮官的出現，在戰爭史上恐怕只有拿破崙的軍事戰爭時代才能比擬；那是言如其實的一英雄自民間來，蘇聯紅軍的擢升制所真正做到的拿破崙提出但是不能完成的口號：「憑着作戰的才能，每一個士兵可以做到將軍」。

真正的戰鬥主要地自然還是紅軍戰士們來擔當。我們知道由於政治教育在紅軍部隊中的普遍和深入，蘇聯紅軍士兵的素質的優秀。他們的堅決，他們的敏捷，他們獨立作戰，他們勇往直前，奮不顧身，他們流至最後一滴血的精神和事業早已爲這一個世界所同歌頌；這崇崇高品德的發揚，沒有部隊外和部隊中刻的政治教育不是能想像的。政治教育不但是紅軍部隊的靈魂，而且已經變成了他們不可分離的血肉，因爲他們不但澈底的認識了他們

卡 港 會 議

卡港會議是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的第四次會晤。共繼續了十天。公報是一月二十四日發表的。參加人員有英美兩國的海軍和空軍的總司令。來賓的有英、美在北非及近東的軍隊的總司令和指揮。羅斯福的隨員，有租借法案總統特別代表，邱吉爾的隨員中，有戰時運輸部大臣。討論的問題，各方措詞頗多，照公報中所發表的，是「彼等已在二九四三年之攻勢計劃方面，商得意見一致，彼等主要目標，乃在最後西之地點，盡其擊倒敵軍猛烈作戰，俾獲儘量減輕蘇軍之重大負擔」。用羅斯福的話來說，是「吾人已具決心，欲獲得和平，惟有完全消滅德日兩國之實力」。或可推測與邱吉爾商談之「軸心無條件投降之會議」。這次會議的「重要」是可想而知的。聯合國家的輿論，一致讚揚，認爲這次會議是極重要的作。會議，是在政治上對軸心國的重大打擊。只有美國的「經常批評政府之人士及孤立派」，則對會議未予重視，且間有微詞」。(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七日專電)

的事業是神聖的，而且學會了「不從真心去憤恨敵人是不敢打敗敵人的」。(一九四三，斯大林五一文告)。好像是黑白一樣分明的是非，好像是烈火一樣強烈的愛憎，這就構成了蘇聯紅軍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他們把傳統的自犧牲的精神由個人的自犧牲性提高到集體性的自犧牲性，把兩者都提到自古未有的高度，在列寧格勒的保衛戰中，他們產生了列寧格勒人，在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中，他們又產生了斯大林格勒人，這些「新人」的產生，不但是在戰爭史上，而且是在人性發展史上，有着劃時代的意義。

自從蘇聯紅軍，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之下組織以來，到現在已經爲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的歷史，到頭來證明了它是一支保衛人類自由爭取人類解放的主力軍，在列寧和斯大林的旗幟之下，蘇聯紅軍是永遠不能戰勝的力量；他們的教訓不但豐富了他們自己，而且給與一切反法西斯民主的國家以一個歷史的啓示：人民的力量是永遠不能克服的。

隨着法西斯的屍骸前進吧，偉大的蘇聯紅軍，我們因說你們更偉大的勝利！(黎) (二月十三日)

會議的結果，會通知斯大林及蔣委員長。一月二十六日晚間，美國駐蘇大使斯丹德和英駐蘇大使格魯，曾以羅斯福及邱吉爾的聯合照會遞交斯大林。該照會內容不詳，據斯丹德說「其作戰努力有關」。這些事實，說明了斯大林(總略)蔣委員長均未參加卡港會議是和中國是有關係的(被略)。

究竟卡港會議談了些什麼問題？我們固然急需知道，却沒法探知，只聽從卡港會議後的事實，來逐漸明瞭。從歐洲和太平洋兩側主要戰場來看，英美有了什麼決定和佈置呢？

儘管美國的孤立派在叫囂，羅斯福和邱吉爾是決心和德意法西斯帝國作戰到底的。那麼，放開希特勒在今年的戰略不談，開闢歐陸第二戰場的問題，不論遲早，總要解決的。在這個問題之下，就首先要肅清北非軸心軍，確保英美在非洲的地位，在地中海，近東和中東的優勢；並且加強對蘇聯的援助。

。以動而論，就國際地位非盟軍的統一指揮，而北非法軍，以及吉維德和
 以商標的合作，也對予以解決。所以，和卡港會議同時進行的，有吉維德和
 戴高樂的會晤，卡港會議以後，舉行英海軍軍的作戰會議。這些會議，是有
 成效的。吉維德與海軍的協同作戰，不論政治意見，只求法國的自由。
 結果，以兩位總司令的軍隊，分工合作的方式初步解決了問題。自然，政治問
 題還沒有一道解決的。北非盟軍統帥，已擬定為艾森豪威爾，而海軍由大副
 之。這些收獲，都是英、美、蘇協力進攻奧尼西亞的實效。

卡港會議之後，羅斯福和邱吉爾的訪士，舉行阿
 達那會議。這個會議，有重要政治意義。阿達那會議的結果，是英美加強
 對土耳其的援助，使土國能加強其一般的國防安全。這是使英土關係更趨親
 密，使土耳其更趨親盟國。這是英美外交上的一個成功，是對德國挑撥土
 耳其和盟國的關係，以至破壞土國的中立，進而侵略土國的陰謀的一個打
 擊。從這以後，英美在東地中海的憂慮可以減少，北非英軍的後顧可以減輕
 此外，我們也不要放過這些事實：羅斯福曾訪問利比里亞，和南非連勝爾
 對面的巴西，邱吉爾曾在塞浦路斯逗留，並曾會晤埃王。這些都是英美各自
 經過與自身有友好關係的國家，來增進盟國的協力的活動。而羅斯福到地檢
 團來自本國的要求更足以提高士氣，和有助於增進他們和駐在國的關係。西
 地中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經傳說也是邱吉爾訪問的國家，但是，看
 到邱吉爾於二月五日離開的黎波里後，七號的倫敦電報就報道已抵英京，而並
 無邱吉爾在現地的活動消息，知所傳或並非事實。

講到援蘇，不外乎採取開闢第二戰場的具體準備和增加物資援助。
 前者，我們已在上節敘說，而且，現在英美正在討論歐洲的盟軍總司令問題
 。開闢第二戰場的時間與地點，在卡港會議上是否討論到，不得而知。但是
 ，斯退丁紐斯一再發表租借援助蘇聯的數字，並主張延長租借法案一年，是
 可以證明美國將繼續加強物資援助的。同時，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蘇
 斯德哥爾摩和諾克斯的話。羅斯福於二日在招待記者會上說：「吾人將以無
 盡之炸彈，投向其軍火工廠及海港，此為實踐此次會議之聲明。」諾克斯
 於一月三十一日說：「在大西洋方面，潛艇戰對於吾人仍屬嚴重之問題」
 。邱吉爾於十一日在議會中演說，也強調「英美政府在其一切計劃中，必首
 先擊破德艦。故吾人應付潛艇之任務甚重，且妨礙與德延吾人之行動」。這
 樣看來，擊破德美援蘇，仍將是盟軍炸敵艦及展開反潛艇戰，增強造船能力

，以提高運輸能力和海上力量。

我們根據羅斯福所說：「卡港會議主要性質係討論海空軍問題」及邱
 吉爾所說此乃彼所知之「最重要作戰會議」，「卡港會議中，所決定之主要
 目標，在以可能之最大規模可能之最早時間與敵激戰」可以說卡港會議以
 軍事問題為中心，而以後的阿達那會議等，是政治性質的。

關於太平洋方面，從英美出席的人員來判斷，在卡港會議中不是主要的
 問題。從羅斯福恰恰在卡港會議期間在南太平洋作兩週的視察，而卡港會議
 的結果也會通知中國，月中，傅聞重慶也有英美出席卡港會議的高級軍事人
 員與我國當局商酌的某種協商看來，似乎加強物資援助與收復緬甸問題，或者也
 是「一切戰場均在討論範圍」內不可缺少的部份。

綜觀卡港會議和以後的發展，都證明了這次會議的重要性。這次會議是
 在蘇軍反攻捷捷，正當斯大林格勒的德軍完全被包圍消滅後舉行的。是這
 樣的反攻勝利，促進了這次會議，也是這樣的勝利，更提高了開闢第二戰場
 的重要性，和使土耳其有可能主動的邀請邱吉爾訪士。而卡港及阿達那會議
 的結果，也證明了蘇軍的勝利，先發制人的打擊了希特勒在「三月三十日演說
 中的挑撥盟國的陰謀及和平攻勢（被略）今後英美在作戰努力上的演進和
 發展，會更加證明卡港會議的重要性的。然而，要使卡港會議對一切戰場的
 討論更有效，更便一九四三年的攻勢計劃切實實現，則在歐洲還有待於趕快
 肅清突尼西亞軸心軍，進而開闢歐陸第二戰場；在太平洋區域，還有待於加
 強在中緬印的軍事等，增加對蘇援助，認真準備和進行收復緬甸。

我們不必對卡港會議結果多加猜測，也不以斯大林及蔣委員長未出席而
 抱憾，因為羅斯福的好：「有若干人認為羅斯福委員長極易港會，且渠等
 忘却蘇聯並未與日本作戰，中國已對德正式宣戰，但因地理關係，對於進
 攻德國，則無能為力」，羅氏復勸一般人士，再加思索，以迄將來鑄成錯誤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各聯合國國家在應為力及「能為力」之廣盡其全力。
 卡港會議是英美決定力量的一次會議，而蘇聯也在卡港會議結束之次日，斯
 大林激勵三軍繼續攻勢，驅逐納粹匪軍出國境，我們中國，也應該自立自強
 ，認真切實準備反攻！（完）

（二月十一日）

論滇緬戰局

緬寇犯滇，時已逾月，開始係從滇西滇南兩方面進犯，滇西稍有接觸，即行停攻，轉向滇南，在大猛龍方面近復發生激烈戰鬥，但同時滇西滇南亦復發動。此兩方忽緊忽弛，顯示敵寇之戰術企圖，尚屬試探性和跳躍式之進攻。

滇西滇南，爲山岳地帶，除滇緬公路外，所有之山僻小路，均不利於大兵之運動。故敵寇於上月六日，由騰衝分投北犯，遭我軍痛擊，立即回軍。繼在騰衝前線，大肆焚殺，破壞農村，實行其殘酷之報復。繼是把它在華北所施行的燒、殺、搶「三光政策」，又在滇西重演一次。上月八日，敵寇另由緬東緬西分路進犯：一路由緬東以打洛，肅征板，並以一隊由緬西迂迴至緬板以南，企圖襲擊我軍側翼；一路由打洛企圖渡南果河東犯；一路由緬東果犯大猛龍。這三路的分進合擊，其企圖在佔領滇南之軍事儲備地。爲達此目的，敵另向緬南活動，一中區某軍據緬南，一由緬北犯猛龍。此二路之目的，殆爲進佔緬之戰後迂迴，企圖由緬南包圍庫里和佛海。自上月底起，敵寇更在大猛龍方面增援泰軍兩師，並配屬飛機多架，輪番轟炸，戰況益趨激烈。

就敵寇在滇緬兵力說，敵酋飯田祥二郎所統轄之第十五軍，據聞有六師團之衆，其第五十六師團，似據緬西，第十八師團，則分駐景東一帶，其餘之第三十三，第五十五，第三十八及陸續增援的約一個師團，均分佈緬境以內。又聞泰軍三師團增援緬南第一線。總計緬境內，約有日泰兵力九個師團。依據上述情況，敵軍之主力，似在緬北，而滇南前線則由泰軍任其主力。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目前敵寇由於陷入緬海多面作戰之形勢下，復遇我盟軍在各戰線紛紛告捷，遂使其戰略矛盾，不得不不在緬緬戰線上找出路，一方面敵相東條於其議會中特別強調建立傀儡「緬甸國」的意圖，另一方面則於同時期內向我滇西滇南實行試探性的進攻，並在印緬阿薩密方面進行小接觸。這些事實證明，敵寇在希特勒於歐非兩戰線相繼慘敗之時，已暫時失

其東西互爲聲援之勢，而我同盟國又在準備收復緬甸，這不能不使日寇於保全主力之餘，特重其滇緬戰場。故敵寇這次在滇緬的試探，其目的是在企圖於有利條件下，奪取先機之利，以打破我國收復緬甸的計劃。

目前滇緬戰事形勢，敵寇已深入緬北及滇西，戰線上是處在中印兩面作戰的難勢。過去敵寇侵略滇西，所以不敢輕於深入者，並非由於印度方面有何威脅，而是一方面由於我軍堅守有利之騰越線（怒江、高黎貢山），另一方面由於敵軍困於地形，不能發揮其機械化的優勢武器，而前線基地（如騰衝、龍町、猛董等處）與後方補給線，又時時受盟國空軍的轟炸。致使其前進不利。現在則因其戰術需要，必須奪取先機之利，故其向滇西滇南發動試探性之進攻，端在窺機而動，伺隙而入。其對於我國，則企圖佔領車里佛海兩地，以解除其側翼之威脅，而逐漸打破我之戰略屏障線。其對於印度，則企圖襲擊後方據地，以便在未形成兩面作戰之前，而先向一方下手。我們對於此，固應嚴加防範，不使敵人在滇西或滇南有任何得手，以鞏固我將來的反攻基地，但同時，我們更應注意於收復緬甸的戰略準備，以破壞敵寇的戰略企圖。這種戰略準備，我們認爲應該注意於下列諸事：

第一、在軍事上，裝備上，供給上，指揮上以及聯合行動上必須有充分的切實的準備，所謂「謀定而後動」，在今天，應該是一切準備好了再動的意思。敵人可以以試探式的進攻來破壞我之戰略計劃，我則必須以有準備有把握有計劃的部署和行動，不受其進攻影響，來一步一步地達成我之戰略要求。

第二、在政治上，我們必須與盟邦尤其是美國合作，發動緬甸人民的抗日鬥爭和游擊戰爭，以破壞日寇建立「緬甸國」的陰謀和影響，並爲將來我之戰略準備作一內應的準備。

第三、滇西滇南的人民游擊戰爭及少數民族中工作，也必須有很好的籌劃和配合。

第四、中英美印的團結、互助和配合，是保證這一條戰略要求的根本前提。在這裏，各方應發揮其力，各盡其力，善用其力。不論大家出力多少，出品多少，凡是需要的，只要有，就應該拿出來，讓敵運得來，不應該有所規避，也不應該有所推諉。

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文化

時代，的確是在新起來。蘇聯前線的輝煌勝利，不斷勝利，在人類歷史上劃出一個新的時代；法西斯德國希特勒的潰敗已成定局，世界規模上的民主勝利已經顯露其端倪。中美中英平等新約的簽訂，在中國外交史上劃下了一個新的時代；中國的國際地位，已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國父畢生努力爭取其實現的最大目標之一，今已在野委員長手裏開始實現。的確的，時代是在新起來了。

新時代之所以為新，是由於今後的世景景象，該有個煥然一新面貌。侵略併吞之風，不再受人欣羨，向往，而要是遭人唾棄，痛惡。把某一民族凌駕於其他民族之上的那種什麼主義，把人口或地理條件當作侵略理由的那種什麼主義，不再是受人讚揚，贊揚，而要是遭人唾棄，厭惡。那種什麼人，應得什麼人的現象不再見於人世。科學，藝術，應能獲得它們的暢通；作家，學者，應能獲得他們的自由。今後的世界，應該是專橫獨斷的法西斯主義絕跡，合天理順人情的新民主主義昌光的世界。

新時代之所以為新，是因為今後的人們，對於時事，世態的看法，想法，該有個耳目一新的變則。如果過去有把希特勒橫蠻蠻幹的統制和蘇聯準情的理的集中制，統一的辦法，認為一談的，今後應該知所區分了。如果過去有把於希特勒橫蠻西歐武功，認為他的軍閥現代權權的，今後應該知道那種閉關方法實在不足為訓了，如果過去有看到希特勒能有那樣橫蠻的準備，雄厚的軍事工業，認為納粹統治結構為一世之雄的，今後應該知道，離開了人民福利的請求，離開了人民生活的切實改善，終於是不會有什麼富強可言了。如果過去有認為民主政治已成過去，寡頭獨裁才能當行出色的，今後應該知此種想法原來大謬！

反攻準備，收復準備，解放準備的戰略要求，不僅是東方的戰略要求，而且是世界的戰略要求。這一要求的實現應是我們今年急迫的課題，也應是同盟國在東方真正反攻的開始！

（二月十一日）

新時代既然是煥然一新的時代，要做個新時代的人物也須是煥然一新的人物。如果時代已新，我們自己的生活態度，思想方法，工作作風，却還是依然如故，那就或者這個已經開了頭的新時代，終於無法新下去，或者時代是照舊它自己的法則在日新又新的新起來，而把我們這種不能捨舊謀新的人物，毫無顧惜地拋棄一旁。

我們需要新的生活態度，新的思想方法，新的工作作風，一句話，我們需要新的文化。

新文化是什麼？做起來雖有千頭萬緒，歸根結蒂講起來也只有一端，即把不科學的變成科學的，把不民主的改為民主的。科學與民主就是新文化的金科玉律。

科學與民主，事情是兩番，精神是一體。真能懂得科學的人，一定要主張民主，真能實行民主的人，也一定會尊重科學。這是因為科學與民主，同樣都是重視客觀的道理。

科學，就是對於使各個客觀事物發揮出它們自己力量來的一種學問。不懂科學的人，常是不懂得客觀存在着的客觀事物，它們的身上備具些什麼力量，或者不懂得有些什麼方法可以讓這些力量自己發揮出來，以利用厚生。他們一方面在崇拜天物，一方面又在敵視天物，對天物發生恐怖。科學替人們把整個世界改變了。它會把過去需要崇拜天物的因循，變成到任何地方都能為人服務的忠僕；它會使又難又臭的瀝青中找出芬芳撲鼻的香料和美麗的彩目的顏料來；它也會把衆人不備讚譽人身，使人樂於治之症的一些病菌培養而轉變成爲抗抵傳染的抗毒素。科學愈發達，就是爲所識得的客觀事物愈廣，可供利用厚生的各種力量愈多，能夠去把這些力量發揮出來的方法愈種

所以，在科學面前，是地無靈材，物無用。

這種重視客觀的精神，在於讓客觀事物發揮出自己的力量來的方法，用之於科學，用之於人則為民主。如果說，科學是所以使物各盡其用，那麼，民主就是所以使人各盡其才。科學的所以能使物各盡其用，首先是在於它能夠尊重事物本身的規律而信守勿論，民主的所以能使人各盡其才，首先也在於它能夠尊重各人自己的品德而循循善誘。就是說，要使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向前發展，最中心的方法是在於讓這個國家，這個社會裏的人人都能發揮出各自所有的能力，而不要有所拘持。羅斯福總統於卡港會議後對新聞記者說：「聯合國家無偏倚軸心國人民或軸心國所統治的各國人民之意」，就這道精神。羅氏此言和大西洋憲章上所規定的民族平等的原則是前後一致的。法西斯統治下的國家，所以為禍人類，阻礙歷史前進，就是因為有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等混世魔王，把他們自己以外的人都看成只配服從他們的命令的人物而加以剝削。唯法法西斯，不但是所以謀被侵略國家的解放，同時也是所以謀德日意等侵略國家自己人民的解放。

總之，新時代所需要的新文化，就是科學與民主，就是要能重視客觀，尊重事物物人自身所具有的規律，品德而循循之，誘導之，發揮之，一切自高自大，對自身以外的種種不知尊重的生活態度，思想方法，工作作風，都是不科學的，不民主的，不合於新時代的潮流的。(任)(二月十二日)

(上接第五九頁)

(四)在文化教育上，掃除文盲，提倡科學，提高國民文化水準，堅守信教自由原則，以便在友邦文化科學技術援助下，達到國際間科學的互助，文化的交流，而消除過去不平等的痕跡。

X X X

百年枷鎖，一盪而除，慷慨鼓舞，人之常情。不過，放眼天涯，我們還有廣大的純純河山被敵人佔領，千百萬同胞在淪陷區嗚呼，我們今天在大陸後方能享受到的對於他們還只是一種空想。我們的抗戰已五年有半，我們前途的困難還多，我們必須堅持抗戰，克服困難，鞏固國內團結，切實支援後方，準備反攻，打走日本帝國主義，撥亂反正及其他一切無窮艱辛，收復一切失地，才能將淪陷在敵僑手中的同胞從火燒火熱中救出，才能將英美放棄的特權轉歸到我們手中真正的收回。只有這樣，中英中美新的約才不是一紙空文，而是由獨立新中國的起點。

新華副刊

每本訂價八元

合訂本 一月份

本刊內容包括文化方面的評論，簡短而深刻的短論、書評、劇評，反映各階層人民生活的描寫以及各種文藝作品，並經常轉載後方邊區的文藝作品與報導。茲為便利讀者保存查閱起見，自三十一一年九一八起特每月印行合訂本，「團結」一青年生活「婦女之路」亦均合訂在內。

列寧城的故事 梯浩諾夫著

游擊札記 依里亞·庫仁著

目擊記 班菲諾夫著

這些文藝作品，里面描寫着蘇聯人民，在偉大的愛國戰爭中的英勇事蹟，可歌可泣，動人肺腑。中文譯本裝印精美，新近直接由莫斯科轉運到渝，讀者們應人手一冊。

新華日報圖書課經售

自由獨立新中國的起點

高揚

——中英中美新約的歷史意義——

去年十月九日英美政府宣佈準備放棄其在華所享特權，廢除不平等條約，對於我國之東轉，及至最近（正月十一日），中英中英新約乃告簽字；這是在蘇聯對我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九二四）後，我國外交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它一方面結束了我國百年來的恥辱，另一方面又開闢了中英中美關係上的新紀元。這首先是五十年來我全國軍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團結抗戰，英勇奮鬥的結果，同時也是百年來我民族爭自由求解放的一個初步成功。其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先回溯一下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極端是怎樣加在我們身上的。

(一)

統觀百年來不平等條約演變的歷史，概括的可以分成三個時期：第一時期自鴉片戰爭後的江寧條約（一八四二）至馬關條約締結（一八九五）之前；第二時期自中日戰爭後的馬關條約（一八九五）至辛丑條約締結（一九〇一）之前；第三時期自庚子事變後的辛丑條約（一九〇一）直至抗戰的爆發（一九三七）。從表面上看，我們今天所取消的不平等條約，主要的還是從第一個時期遺留下來的；事實上，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是愈來愈緊的。

在第一個時期中，滿清政府與當時列強所簽訂的一些不平等條約（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寧條約，一八四四年中美望廈條約，一八五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條約，一八六〇年中英中法北京條約……）裏，雖然已經具備了破壞領土、行政、司法、警察權的各方面的不平等條約，然而，總歸這一時期不平等條約的基本精神，列強所企圖的，所獲得的，主要的還是以經濟為中心的特權，一切其他特權都是為着輸出商品和開闢市場而存在的。在條約的簽訂的順序上，江寧條約則居其首，在條約的內容上，它也是一個典型，因為以

後逐漸出現的各種不平等特權大部份都在江寧條約以及和它有關的望廈條約裏，具備着端倪了：如領事裁判權（一八四三），如關稅協定（一八四二）如租界等。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擴大了通商口岸的範圍，在明文上肯定了治外法權；在特權的增設上，只有中法天津條約「法政府得派兵船停泊內地，游弋各通商口岸」一條是江寧條約所沒有的。這一條文以後就變為內河航權和沿海航權。北京條約擴大了天津條約的範圍，在基本精神上，這兩個條約是相同的。

到了前一個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機構改變了：以前是要求市場的，現在是要求殖民地了；以前是輸出商品的，現在是輸出資本了；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中國將離日創（一八八五年中法關於越南之約，一八九四年中英關於緬甸之約），而最後則爆發了那動搖了清廷統治機構的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九五），戰爭失敗後，清廷被迫和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一八九五），這一條約深刻的留下了這一個時期中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特點。在特權的增設上，馬關條約和以前一切其他不平等條約的不同之點在於：它開闢了外人在中國通商口岸的設廠權，「日人得向內地自由購買及輸入各種貨物，租棧存貨，并免除稅鈔及一切派徵費，日人得在各口通商，從事各種工業製造，所用各種機器，備約進口稅，即得製成各地，所製各貨照輸入貨納稅（免納厘金）」（同約第六款大意）。由於這一特權的東移，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是更加困難了。

其時，以干涉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為藉口，英法德日帝俄各自在中國劃分了勢力範圍，中國已經不再像一個獨立國家了。義和團事變是對於這種狀態的一個抗議，而在義和團失敗，八國聯軍破北京後，清政府和列強所簽訂的辛丑條約（一九〇一年）則又十足的表現了那一個時期中帝國主義列強所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特質：以前所要求的特權是以經濟為中心的，而現在

所要求的則已是以政治和軍事為中心的了。

辛丑條約而後，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更加厲，但不平等條約的形式却是改變了；以前帝國主義者採取在華特種選擇用公約的條約形式，而現在竟連一個形式也不要了，不平等條約一變而為「不平等合同」，袁世凱與各國之簽訂大子條約，而在這一轉過程中，當時的滿清政府和以後的北洋軍閥們自身的昏庸腐敗和賣國求榮，實不能辭其咎。他們只知道向列強借款維持他們自己的政權，而不知道中國的主權却在這些借款合同，悄悄的被喪失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想想辛亥革命爆發的直接動機在於反對清廷將中國的路權大權讓予外人，就可以知道所謂「不平等合同」對於中國人民的打擊是怎樣的重了，更不要說袁世凱時代的發後大借款以及北洋軍閥的軍事借款參戰借款等合同了。

在這當中，由於客觀形勢的改變，特別是第一次歐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爆發，日本侵襲的變成了宰割中國的主要劍子手。這在條約上，表現於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而在事實的演變上，則一直引導到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引到一九三七年「七七」至民族救國的總爆發。

（二）

一方面是荒淫和無恥，一方面是飛殿的鬥爭。百年來資本帝國主義者得寸進尺，侵略無已時，直欲陷我為殖民地而後已；一方面我們看到了清政府、北洋軍閥的昏庸無能，喪權辱國，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了中國人民，前仆後繼，流血抗爭。早在鴉片戰爭當時，廣州三元里市民的抵抗英軍，就已經打開了此後一百年從未停止過的華人民族爭自由求解放的運動史。緊跟隨着片戰爭和英法聯軍之役爆發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就是中國人民對於當時列強侵略的一個歷史的抗議。中日戰爭結束後，國事日非，列強侵略更有喧賓奪主之勢，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了，於是而有義和團事變。義和團事變，雖然由於當時為反動者所利用，未有能夠循着正確的道路，得到預期的效果，然而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這一點上，它的歷史意義是不容抹煞的。

辛亥革命是法戰爭以來，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的第一次成功。雖然辛亥革命爆發的直接動機是在於反對清廷將路權讓與外人，但其革命的實質是反對列強不平等條約不閉的。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它的歷史任務，解決不平等條約的枷鎖；而且相反，由於當時北洋軍

閥的昏庸腐敗和賣國求榮，不平等條約對於中國的束縛却更加厲了。因為忍無可忍，於是發展了在中國近代史上劃時期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一開始就是有意識的針對着不平等條約的廢除的。

中國在巴黎和會中失敗，爆發了五四運動，然而五四運動並未能完全實現它的目的；其後，一九二一年，當時的北京政府鑒於國內民衆的力量，又在華盛頓會議上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中某些部分的要求，然而正如在巴黎和會一樣，失敗了。

其時，國內人民大眾的覺醒已一發而不可遏止。在這覺醒中，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偉大英明的領導之下，實行改組，發表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政綱之首，一九二四年孫先生北上，於其宣言中更取消不平等條約之決心。迨一九二五年孫先生病危，又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列入其遺囑遺囑之中。從此廢除不平等條約，遂成爲中國人民家喻戶曉之誓言。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後，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高漲，遂使北京政府不得不於同年向北京公使團提出修正不平等條約的照會，以圖和緩當時革命運動。這就產生了名不符實的一九二五年的關稅會議，一九二六年的法權會議。這關稅會議的會議之無結果，是一開始就清楚的。

一個人的幸福要用自己的手去爭來，一個民族的枷鎖也只有用人民的手才能掙脫。緊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的發展，在孫先生國共兩黨合作政策的之下，一九二七年初，我們就主動的收回了漢口和九江的租界；在對外關係上，這是國民革命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被略兩段，計二百五十餘字）

現在，內而由於「七七」抗戰的發動，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國共合作兩軍，各黨各派均團結，五年半來全國軍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英勇卓絕的奮鬥，外而由於歐戰爆發，德國進攻蘇聯和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建立，以及隨着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美國的參戰，中國對德日寇的宣戰和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擴大和鞏固，英美蘇聯對中國的同情和援助增加了，中國國際地位空前的提高了，於是中英中法中蘇的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乃有如冰消雪融；在這當中，蘇聯，因為它在一九二四年即已自願取消帝俄時代的對我不平等條約，更是起了示範的作用。這是值得我們慶祝的一件歷史上成功的大事！

(三)

現在我們不妨稍為分析一下新約的內容。

中美新約因尚未經美總統批准，全文尚未發表，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個概要；因此，我們不能不把我們的分析主要地局限在中英條約上。中英新約共九條，除第一條規定用辭含義及第九條規定此項生效日期與內容無關外，其餘二條原文為：「現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閣下與英王陛下閣下之條約與協定，凡授權英王陛下或其代表實行管轄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英王陛下之人民或公司之一切條款，茲特撤銷作廢。英王陛下之人民或公司在中華民國領土內，應依照國際公法之原則及國際慣例，受中華民國政府之管轄；這就是取消英國政府及其人民或公司在中國所享受的領事裁判權及其一切有關特權。第三條內容主要是廢除一九〇一年的辛丑條約。第四條內容為交還上海廈門公共租界及天津廣州英租界的行政權和管理權。第五條規定一切特權廢止後關於不動產之保持或轉移之法律手續。第六條簡略規定兩國人民有互相在締約一方國家中旅行居住經商之權。第七條簡略規定領事官之權限。而第八條則規定于現在抵抗共同敵人之戰爭停止後至滿六個月內，進行談判，簽訂現代廣泛之友好通商條約。

總觀全約，無疑問的，第二款內容最廣泛而性質又最重要，唯其廣泛，所以有進一步規定之必要，這些都記載在中英條約的附件裏。根據這一附件，我們可以看到除本約內所載各項外，英政府放棄的特權有如下數項：

- 一、中國通商口岸制度之一切現行條約權利。
- 二、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特別法院一切現行條約權利。
- 三、各口岸雇用外籍引水人之一切現行條約權利。
- 四、軍艦駛入我國領水內之一切現行條約權利。
- 五、要求任用英籍臣民為中國海關稅務司之任何權利。
- 六、在我國領水內關於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之特權。

這樣，我們看到，中英新約，連帶附件，所廢除了的特權有：①租界及使領區特權；②內地駐兵權；③軍艦自由駛入權；④領事裁判權；⑤通商口岸特權；⑥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權；⑦外籍引水權；⑧海關雇用外籍等。在這當中，關於協定關稅制，因為一九二八年中英關稅新約已經在法律上承認中國關稅完全自由，所以略而不談。假定我們將九龍香港的問題置之不論

，中英新約的確是把我們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種種從政治上軍事上廢除了。雖然在各條款及附件中關於經濟和財產部分的某些有利於一方的權利，還給了不少法律的保障。

中美新約的概要，在基本內容上和中美新約同，不過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關於通商口岸制度廢止的一節，在中英新約附件的第一項甲款下，只規定：「通商口岸廢止後，一締約一方之商船，許其自由駛至締約彼方領土內對於海外商業已或將來開放之口岸地方及領水」，這裏的「已或將來開放」的已字含義，還相當含糊。但是到了中美新約概要裏則已變為「鑒于通商口岸制度之廢止，中國同意在中國境內，凡平時對美國海外商業已開放之沿海各口岸，將繼續對此項商運開放」。中國工業落後，在在需要保護，此種海關開關的辦法，對於我國工業前途的影響如何，實在值得我們極大的注意。

事實上，這一個問題並不限於通商口岸。一般的說，新約的簽訂的確是奠定了我們一切領域上爭取實質平等的法律基礎，然而法律上的平等，不就是實際上的平等，更不就是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平等，何況即就法律觀點來說，也還有若干值得商榷之處。尤其是當我們想到在過去所謂「不平等合同」給予我國的打擊之深，我們就可以體會到一個國家縱即在法律上的地位平等了，假如政治不進步，內部不團結，工業基礎不能確立，近代科學水準太低，不願和不能去充實這法律平等的內容，一切平等條約還是一紙空文，無濟於事。在這裏，我們就想起了蔣委員長的那句名言，「要自立，才可以獨立，要自強，才可以自由」，今天的問題就是自立和自強。因此，中英中美新約縱然還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我們是沒有吹毛求疵的理由的，更何況中英中美新約還只是個初步的原則性的條約，而「現代廣泛之友好通商條約」之簽訂還有待於戰爭結束後之將來呢？

責人不如責己，為了適應新約簽訂後的新形勢，做到真正自由獨立平等的地位，我們以為，必須：

- (一) 在政治上，力求進步，勵行民主，加強團結，爭取勝利。
- (二) 在軍事上，加強動員，準備反攻，爭取國際援助，貫徹自力更生
- (三) 在經濟上，扶助民族工業，增加戰時生產，一方面克服目前的物資困難，另一方面確立將來的工業基礎；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戰後建設，利用外資的情況下，使其對我有利，不致太阿倒持，而在國際上取得經濟合作和平等的地位。

(下接第五六頁)

中國工人與民族解放運動

——紀念「二七」事變二十週年——

華崗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大意義的「二七」事變，到今天已整整二十週年。

「二七」事變，不僅是中國工人自己為反抗軍閥摧殘工會的壯烈鬥爭，而且是代表中國人民爭自由爭人權的重大標幟。「物質的力量似乎具有精神的生命，而創造這些物質力量的人，却降為飢寒交迫，甚至完全喪失了人的地位」。這種現象不能忍受下去，二十年前的現在，京漢鐵路（即平漢鐵路）工人，在長沙華資紗廠工人「一七」罷工（十一月七日）、香港海員罷工（十一月十三日）、及三月間上海紗廠工人罷工、七月漢陽鋼鐵廠工人罷工、九月安源礦工罷工之後，繼續樹起正義的旗幟，由要求國會通過勞動立法案，一直演變到「二七」大流血，不惜犧牲生命以力爭的，就是最低限度的人權。其事實經過，我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二卷第八章，已有詳細記載，本刊亦曾引用過。現在為使是非曲直益昭大信起見，特再轉錄馬超俊先生所著「中國勞工運動史」敘述「二七」流血經過一段如下：

「武漢各業工會，為集中力量起見，於十一月十日在漢口成立湖北工團聯合會。自該聯合會成立以後，平漢路沿路各工會，亦有全路總工會之籌設。經過各工會之兩度代表會議，決定於十二年二月一日，在鄭州舉行成立大會。并推定楊德甫史文彬凌楚藩等為總工會籌備委員，積極進行。不意軍閥首領曹錕、吳佩孚，懼於已不利，先設詞恫嚇，加以阻撓；繼因工人不報，如期開會，竟用武力強制解散。工人憤激，達於極度，彼等以同盟罷工為最上之革命訓練，尤深信惟藉同盟罷工，始可完成其鬥爭之使命；乃自江津起，實行罷工，不旋踵而波及於全路。當局於此，狼狽周章，無法收拾，轉而惱羞成怒，大施屠殺政策，計二月七日，全路工人被軍隊槍殺者不下百人（最先被殺者為江岸分會會長林祥謙），傷者無數。沿路之工會，概被解散，即援助工人罷工之湖北工團聯合會與真報館，亦同遭封閉。律師蕭祥，無辜被害，其倖免者，則歷實通緝，此即我國勞工運

動史上有名之「二七」慘案」（見馬著中國勞工運動史九四頁）。

這個短短的記載，包含着一個歷史的真實。即工人們在鬥爭中需要運動的自由，而北洋軍閥縛住他們的手足；工人們需要集會自由、結社自由，而北洋軍閥以屠殺、監獄來摧毀一切爭取自由的必要要求。但是世界上沒有什麼力量能够擊破日益覺悟和日益團結的工人，他們所遇到的每一個失敗使更廣大的羣衆獲得覺醒，使最落後的人們也睜開眼睛，看出當前政治制度的真實性質，使新的戰士不斷走進革命戰線。「二七」流血之後，表面上好像工人運動一時消沉。但事實上，正如馬超俊先生所估計：

「道二七罷工失敗，工人為武力所鎮壓，革命之怒濤，漸告平靜，北洋軍閥之專暴，復橫行一時，然而工人組織工會之熱情，並未稍快，且經過失敗之教訓，不再徒注重于形式之組織，而對於組織之內容，亦知力求充實。又因經濟鬥爭之結果，提倡其政治意識」（同上）。

最明顯的事實，就是「二七」流血之後，全國鐵路總工會的成立，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產生，五卅、省港等罷工運動的發展，特別重要的，就是工人運動與國民革命相結合，因而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偉大勝利，終於打倒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

但是，如果認為「二七」鬥爭的意義祇限於反對軍閥，那當然是皮相之見。因為不懂北洋軍閥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兵，而且平漢鐵路還有大部分的外國資本在內，事實上，當時吳佩孚屠殺南屠殺工人，也是秉承帝國主義者意志而執行的。所以二七鬥爭的意義，除了打倒北洋軍閥，爭取人權之外，還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中國工人階級是懂得小我與大我的關係的，他們決沒有祇顧階級利益不顧民族利益的狹隘思想。他們不僅懂得「凡要達到社會主義而不要經過民主政治的人，他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會必然的走到反動的結論上去」的真理，而且堅決認定在半殖民地中國，工人

階級的利益與中國民族的利益，不但不相衝突，而且可以溶合一致。

事實是良好的證明，二十年來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祇有加強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推動愛國運動向更澈底的解放方向邁進，證明中國國民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說：「凡民族革命運動，欲求成功，必須有廣大的民衆參加。而農工民衆，尤爲必須。過去民族革命運動之失敗，由於參加者限于知識階級，故不能得廣大之基礎，與廣大之勢力。」現在及將來，爲民族革命運動，必須以其意義普及于田間與工廠，且必須使之組織于反帝帝國主義的奮鬥中」，實爲「理名言」。「二七」以前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雖然開始了不久，可是自五四以來，這一運動的極大部份還只在學生羣衆中，一直到「二七」以後，五卅運動時上海香港等處的大罷工，才深廣的滲入工人羣衆，使勞動者如潮水一般湧入國民革命的隊伍。「九一八」事變之後，上海及其他各市的反日罷工，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實在不小。抗戰五年半來，中國工人也以他們自己的血肉和生命，來保衛祖國，表現出他們是中華民族最優秀兒女的一部份。最顯著的事實，有如上海南京我軍撤退時，鐵路員工不顧敵機狂炸，不分晝夜地幫助運輸，上海工人有極大部份參加抗戰，國軍西撤，而竭力幫助工廠內遷，使民族工業不致完全淪于敵手；平津淪陷之後，唐山五礦工人，因激于民族義憤，實行武裝起來，將開採煤礦破壞，使敵寇一時難于利用，起義工人並自動參加游擊隊，堅持了敵後的抗戰；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經常破壞敵人交通，曾經創造了許多光榮記錄；成爲現實生動的詩篇；至于才後方的工人，則含辛茹苦，爲增加生產而流汗流血，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勞動羣衆是民族的真正骨幹，是民族生存與民族革命運動的基本力量。曾經有人這樣詆譭：「在勞動羣衆中，我們每每只限于指其名，舉其事，分而觀之，只看見有若干的平凡的生產活動，與無數的陌生姓名，合起來，則令我們感覺着民族偉健的生命力，大部份都由工蜂職蟻來創造。有名的偉績是水上的壯闊的波瀾；無名的偉績，則是水下的動流，非要有動流，不能激起可觀的波瀾。一個民族的新生，必須找到力量的源泉，而且要愛護這個源泉，使水下的動流能够更有力地激起可觀的波瀾。」這當然不是詩人偶然的靈感，而是客觀現實的寫照。因此我們對於勞動力量必須加以愛護，不可加以浪費和摧殘；對於勞工組織，必須根據抗戰建國綱領，加以改善和充實；對於勞工生活，必須加以改善和安定，不可任其飢寒交迫；對於勞動者的人

格和國家法律所賦與的權利，必須加以尊重，以便提高他們參加抗戰和生產的熱忱。

去年十月社會行政會議通過了勞工政策草案八項：(一)健全勞工組織，(二)提高勞工地位，(三)安定勞工生活，(四)調節勞工分配，(五)促進勞資合作，(六)增進生產效能，(七)適應國防需要，(八)加強國勞工合作。這些原則比較戰建國綱領所規定的較爲具體，問題不在坐而言而在起而行，究竟如何運用，才能使工人與國家民族都能得到實益。本文願就幾個中心問題略加論列，以供社會人士的參考和採擇。

首先是健全勞工組織的問題。草案中規定勞工有集會結社之權，規定勞工可組織各業工會，這是天經地義，完全符合「三民主義及現代民主政治立國的原則。惟在條文中與在所附非常時期勞工政策實施原則中，有所謂特種工會與一般工會組織的分別，縱的組織與橫的組織混合採用，工人應一律加入工會，官署指派工會書記等原則，這都是僥倖商權的。(被略一百八十餘字)

其次說到安定勞工生活的問題。草案中所規定的同工同酬原則，工資按照當地生活指數公允評定，女工童工之保護，女工在生產前後，應給予相當假期及醫藥補助，舉辦托兒育幼設備，學徒童工不得受補習教育及國民教育之機會，鑄鍊健康保險與傷害保險等，以及最近立法院所通過的職工福利金條例，如能一一見諸實施，自均爲工人羣衆所歡迎。因爲職工生活，在不時已感不安，戰時更加困難。由于法幣貶值，物價高漲，職工資薪，遂落在名義薪資之後。而且有許多職工的實薪，現在也更不如前。職工對吃飯、穿衣、住房等日常用度，已大感吃力，自然更無法顧及到婚喪疾病應酬等開支。(被略六十餘字)而且社會上有一種錯覺，即完全不經過對客觀事實的調查研究，竟主觀的得出「物價上漲就是由于工資上漲的影響」的見解。最近朱學範先生等所主持的中國勞動協會，對於此項問題曾經召集勞動問題座談，對於上述見解已經給了正確的回答。一談認爲物價與工資的關係：物價上漲是工資上漲之因，而工資上漲是物價上漲之果。物價上漲，必引起工資上漲；物價穩定，工資亦必隨之穩定。如抗戰以來，物價上漲指數，平均達七十倍以上，而熟練技工工資上漲不過四十倍，職業工人工資上漲，則未達三十倍。可見工資上漲之速率，遠趕不到物價上漲之速率。職工工資自應加以限制，但必須先做物價穩定，才是合理的措施。

安定勞工生活，舉辦勞工福利事業，是克服「恐慌」現象，增加生產效率的有效辦法。最近由于勞工生活的不安，工作流動性也就增加，如重慶附近某某兩廠，純粹技工的轉廠率，平均每月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九到百分之二十三點六，其他副工小工等，尚未包括在內。假若再把這些轉廠工人在廠工作期間的長短來考察一下，那情形尤為嚴重。據田文彬先生調查的結果（見新經濟六卷九期），在甲廠二十五人及乙廠四十五人當中，工作不滿四個月者，各為十七及四十人，二者均佔絕對的多數，若能工作至半年以上，便成了很老的資格。這件事情，說明清工人的流動速度極高，也可約略看出他們在生活上不安是到了什麼程度了。工人流動性這樣厲害，必然影響到工作效能和生產率的提高，工人本身固然蒙受很大的不利，廠方也要受到嚴重的損失。工人生活的不安，既足以招致莫大的損失，則很自然的結論，便是如何設法安定其生活了。勞工福利事業，安定工人生活，均與增加生產效率密切相關，而一般工廠當局每每把它看做慈善性質，這實在是要不得的。我們希望社會行政會議所導出的勞工政策草案，與立法院所通過職工福利金條例，能夠嚴格的執行到實際生活中去，對於勞工生活的安，與生產效率的提高，必有相當裨益。

最後，我想對於搶救淪陷區勞工與國難工人團結問題，再提供一點意見。日寇由于損失的加劇與人力的不足，早就設法在中國搶奪勞工，例如今年一月十二日天津路「救北勞工協會」，就發給了一百餘名「救北勞工協會」會員證，據該會說，這一百餘名會員，是去年一年間淪日勞工，計團體去的有三十三萬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個人去的有七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九人，這已經是一百萬人以上的大數目了。在逆風組織「對英並立戰」後，又和日寇簽定了我淪陷區抽調一千萬壯丁到日本去的賣國協定。當各淪陷區我愛國同胞對於日寇這種人工掠奪的殘暴行為，必然會起而反對，上海工人與同蒲路工人已經因此舉行反日罷工，以後這種愛國戰爭將日益增加。這一千萬人的運命與苦難，我們政府與全國人民的身上，都負有一份解救他們的責任。當然，最根本的辦法，是要加強我們的力量，積極準備反攻，以便早日打退日寇，救同胞于水火。同時我們在敵後的抗日政府與附近淪陷區的政府軍民，應立即發動一個搶救人力的運動。這不是一個實質意義的救民之戰，因為一個勞工壯丁的內歸和救奪，在敵我力量對比上意味著雙倍的得失。為要更加堅定淪陷區勞工內向之心，我們對於救濟勞工建設救國福利事業的進行，更應百倍的努力。否則對於救濟回國難區勞工的工作，亦應更切實進行，不要辜負他們流離失業，因為我們既要求

陷區勞工內向，首先就不容讓內地勞工外流才對呀！

關於國際工人團結互助的問題，近年以來已有很大進步。自國際勞工大會通過「一、二七」與動員金世界勞工力量，來擊退法西斯侵略者，是今天世界工人的「大任務」。偉大決議之後，更開闢了世界工人運動的新紀元，這特別表現在蘇美英盟國工人團體互相訪問與團結互助上。最近美國產業職工大會戰爭救濟委員會及美國工人聯合會與盟國救濟委員會，已與公共救濟委員會基金委員會簽訂協定，按照該協定，美國工人決捐助中國、蘇聯及英國各美金六十六萬六千元，作社會救濟事業之用。其捐助中國之款項，特別指定用作援助淪陷區中之熟練工人遷至內地，使彼等之技術能為中國之戰鬥力量服務。這項計劃將由中國勞動協會負責執行之，由中國工業合作社及美國救濟委員會監督協助。我們看到外國工人對於中國工人的關懷，更覺深切，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本來我們中國工人在「二七」之後，就已走過世界工人運動的行列。二十年來，中國工人鬥爭的偉績，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一直維持着光榮的地位。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海員在英美各盟邦，不怕任何困難，幫助盟邦運輸。據宋學禮先生回國談話，中國海員在英倫一地，於運輸中被納粹特務機關因而斃命者，即達五百人以上，其英勇犧牲與前種種作戰無異。由于這種犧牲精神的感召，盟邦亦不得不提高對於中國工人的待遇，把過去不平等待遇加以相當修改。為了和世界工人更進一步的團結合作，中國工人應該更加鞏固自己的團結，健全工會組織，充實工會生活。因為祇有自己的努力進步，才能取得世界工人更有效的援助合作，正像中國抗戰祇有自己努力進步，才能取得盟邦更有效的援助合作一樣。

「二七」事變到現在已經二十年，在這二十年當中，中國社會和民族業已經歷許多變動和艱難，五年中的抗日民族戰爭，更發雷電般的閃耀着未來新中國的輪廓。回顧過去的二十年，我們不僅充滿了對於自己力量和尊嚴的意識，而且還充滿了對自己在民族苦鬥中先進戰士的偉大責任感。中國工人在這二十年當中學得了三大基本課程，即經濟與政治的關聯，中國與世界的關聯，以及階級與民族的關聯。現在應該把這三大課程加以綜合與提高，獲得它們相互之間的發展規律與主導方面。並在實際行動上把握這種發展規律與主導方面，以推動解放事業的發展。蘇聯英美等國的勞動人民，已經用他們自己英勇鬥爭與生產的模範，發動並團結了巨大的力量，吸收更廣大階級參加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希特勒德國已開始走向下坡，民主國家的勝利業已在望。中國工人有「二七」以來的光榮傳統與豐富經驗，應該更進一步團結一致，并推動民族團結和進步，衝破困難，縮短黑暗，迎接黎明，使抗戰建國的大業更勇前進。

反對羣衆工作中的宗派主義傾向

吳克堅

毛澤東同志在整頓三風報告中，尖銳的指出對黨外的宗派主義的傾向，在一部份同志中，還很嚴重的存在着。因此，妨礙我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實有整頓之必要，肅清之必要。

我們怎樣來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呢？它的主要表現是什麼？怎樣來克服它？我想分做下面幾部份來講：

一、黨與羣衆的關係

黨與羣衆的關係，有如魚與水的關係，魚祇有在水中，才能生存和發展。魚一旦離開了水，失掉賴以生存的倚靠，就會很快的斃死。黨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情緒是什麼呢？是羣衆。黨祇有與羣衆保持密切的聯繫，鞏固這種聯繫，才能生存和發展。黨如失掉了這種聯繫，黨將喪失自己生命力的源泉，而陷於滅亡。斯大林同志曾經把羣衆當作布爾塞維克的母親。他說：

「布爾塞維克之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爲他們與自己那生育、撫養和教導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保持着聯繫，而只要是他與自己的母親，與人民保持着聯繫，即他們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戰勝者。」（斯大林演講玉作缺點）

二十多年中國共產黨，正是能够與他們自己的母親，與中國人民保持着經常的聯繫，所以它能够發展成爲羣衆的政黨。成爲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在民族解放戰爭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有些人說：共產黨只顧無產階級的利益，不顧其他階層的利益，無產階級在中國是少數，非無產階級在中國是多數，所以共產黨只顧少數人的利益，不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說法完全是錯誤的。對的，共產黨是要堅決的爲無產階級的利益奮鬥到底，但無產階級的利益，必然要包括最廣大的農民、手工業者，城市和鄉村的貧民，勞動的知識份子，以及一切勞動人民的利益。而這些勞動者，在中國正佔着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他們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沒有基本的矛盾和衝突之處，相反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正是真正和這些勞動者的代表這些非無產階級的勞動人民的利益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

——中國共產黨，正是這些最廣大的人民的利益最具體的維護者和代表者。不特，廣大的勞動人民，有他們特殊的利益，而且這些特殊的利益，在某種意義上講，在某種時候，可能發生暫時的局部的矛盾。但是因爲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與一切勞動階層的永久的基本的利益相符，所以這種暫時的局部的矛盾，是可以採取正確的政策，採取示範、教育和說服的方法，加以調整和克服的。這並不妨礙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爲一切勞動人民永久的基本的利益而代表者。

同時，中國共產黨不僅是爲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奮鬥，而且更重要的還在爲全中國民族的利益而奮鬥。很明顯的，我們現在進行抗戰，要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我們建國，要使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標實現，這不僅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同時也是全中國民族的利益所在，也是國家的利益所在。只有漢奸偽政權，才不以這些利益爲利益，而專做反對和背叛這些利益的事。所以中國共產黨，不僅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同時還是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政黨。它除了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的利益外，並無另外的自私自利的利益。

中國共產黨既然是本着人民的立場，救國救民的立場，既然要爲全人類謀解放，而這種偉大的歷史任務，又是極其複雜而艱鉅的，那麼他就需要以不顧不換的意志去長期奮鬥，他就需要採取正確的政策和去法去力行，然後才能達到目的。這種偉大的歷史任務，幾千萬萬人的共同事業，決不是共產黨人一黨的事，更不是一黨一派所包辦得了的。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一條真理說：

「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的比例，無論何時都是佔少數，假定一百人中有十個共產黨員，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中，就有四百五十萬共產黨員。即使到這樣大的數目，共產黨員也還是只佔百分之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黨員，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與非黨員合作呢？對於一切願與我們合作及可能與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一部份黨員卻不懂得這個真理。革命的事業，是幾千萬幾萬萬人的事業，共產黨在他們

中間，無論何時，只是佔着比例的少數，不和無數千萬的黨外羣衆合作，革命事業就不能達到目的，就決沒有成功的希望。因此，共產黨人祇有和黨外羣衆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並且，共產黨現在既然以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事業爲己任，那麼，他必須有正確的政策、方針和辦法。要使政策和方針正確，首先就應要清楚的了解和分析客觀的情況，了解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政治覺悟、革命情緒、以及組織的能力和鬥爭的決心。同時，也應清楚的了解革命敵對方面的狀況和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祇有細心去調查研究，去了解這些情況，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這些情況，找出其中發展的規律和特點，才能定出正確的政策，配備和佈置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後備力量，進行正確的進攻或退守，革命事業，才有獲得成功的希望。

爲要達到這種目的，其關鍵就在於黨要能保持與羣衆的經常聯繫。因爲只有按照羣衆的意志、願望和要求定出來的革命的政策和方針，才是正確的，才能獲得羣衆的同情和擁護，才能使羣衆下決心，出大力，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惜。否則，祇自黨，羣衆自羣衆，黨與羣衆脫節，黨就變成了空架子，變爲官僚主義的機關，變爲孤立無援的黨；這樣，不僅談不到革命的成功，連黨的存在和發展也成問題了。

因此，結論就是黨要與羣衆經常保持密切的聯繫，並要鞏固這種聯繫。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黨要與羣衆融成一片。這樣，黨才能存在、發展和鞏固，才能爭取革命事業的成功。

二、幾種不正確的對待羣衆的觀念和態度

馬列主義者，對待羣衆的觀念和態度是錯誤的。

有些人認爲：「羣衆是無知識的，」他們是「下層的普通人」，「無關重要的人」，「他們曉得什麼！」這種觀念是極大的錯誤。羣衆是社會實際活動的主人，他們有各種實踐的知識和經驗，這種實踐的知識和經驗，是從昨日和前日的羣衆生活和羣衆鬥爭中所積累下來的，是被羣衆在今日的實踐中所豐富所充實了的。把這種實踐的知識和經驗綜合和歸納起來，又經羣衆生活的實踐所證明，就是真理。這就是說：真理是從羣衆實踐中產生，羣衆是易於懂得真理的。一個革命者或革命的政黨，自身的知識和經驗是有局限的，拿有限的知識和經驗，是決不能適應複雜環境的需要，解決複雜問題

的。故須吸取羣衆的知識和經驗，來豐富自己，以補自己之不足。因此，黨一個革命者和革命政黨，作出自己的決定和政策時，如果使自已不是閉門造車，那麼，最要緊的，就是要向羣衆那裏求得指教，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心地是坦白的，是真正能够分真偽，別善惡的。因此，羣衆會告訴我們們所知道的真實情況，提供我們解決問題的對症下藥的辦法。羣衆是我們的老師，如果我們「的決定和政策的規定，是根據羣衆的意見的，經過羣衆的考驗的，那麼，這種決定和政策的本身，就會被羣衆所公認爲正確，再加工的努力，就可以行得通，就不致犯主觀主義的錯誤了。

又有些人，對羣衆採取不信任的態度，不相信羣衆有創造的能力，不相信羣衆有偉大的力量，不相信羣衆能改變環境，改造社會，這是極其危險的，托洛斯基不相信農民有偉大的力量，不相信工人階級能够領導農民的力量，取得革命的勝利，他終於不得不從革命隊伍裏，滾到機會主義的泥坑中，滾到反革命的營壘，充當反革命先鋒了，這是最好的例證。

羣衆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他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裏生活着，在社會的每一個崗位上參加各種不同的生產和工作。他們親身體驗着種種苦難，經歷着種種事變；使他們的地位和生活，使他們認識黑暗，追求光明，使他們充滿着革命熱情，鬥爭決心，他們易於齊心協力，步伐一致，向着共同目標努力。羣衆這種潛伏的力量是極其偉大的，只要革命者和革命政黨加以發揚，組織和領導，就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既可以摧毀腐朽的舊社會，也可以建設新的社會。中國抗戰能支持五年之久，主要是倚靠羣衆的力量，蘇聯之所以能够抵住強大的敵人，進行反攻，取得勝利，也是主要倚靠羣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將來最後的復興和建設，沒有羣衆的力量，更是不行的。所以誰能够倚靠羣衆，誰得羣衆擁護，誰就能够取得勝利。羣衆是力的源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開源者昌，盜源者亡，這是中外古今不易的道理。

因此，馬列主義常常教導我們，不要驕傲，不要向羣衆擺架子，不要看不起羣衆，而是要向羣衆學習。只要我們向羣衆學習的態度謙虛、誠懇；只要我們不只是在求助於羣衆的時候，才去向羣衆學習，而是做到經常向羣衆學習；只要我們仔細傾聽來自羣衆方面的意見，重視這些所謂來自「下層普通人」的意見，那麼，我們就可以從羣衆那裏，得到很多很多的教益，所以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要把羣衆當做先生，自己有做小學生的決心

，就是這個道理。

三、宗派主義傾向的主要表現

宗派主義者，在羣衆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有各種各樣的傾向。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1) 自立門戶，自以爲是。這是宗派主義的表現，同時也是主觀主義的表現。自以爲是，即以爲自己什麼都好，別人什麼都不好，自己什麼都好，別人什麼都不好，只看到自己的長處，看不到人家的長處，不去學習人家的長處。不放心人家去做，只是自己單獨的去幹，這種做法，正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來，自己把自己關閉起來。我們必須了解，完全的人是沒有的，人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以己之長，補人之短，才能相互發揮長處，相互補救短處，這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2) 將自己與羣衆隔離起來，忽視羣衆的情緒和切身要求。各種羣衆各有他們的情緒和切身的要求，我們如果漠不關心，熟視無睹，結果羣衆就認爲我們不是他們利益的代表者，對我們冷淡疏遠起來，或竟離開我們。因此，共產黨員要時刻注意和研究羣衆的情緒，羣衆今日所喜惡愛憎的是什麼，那怕是一點小事所引起的情緒，我們都不應加以忽視。要瞭解羣衆的迫切要求，爲他們這些要求而奮鬥，是我們共產黨人對羣衆應有的責任。

(3) 自懸標準，不客觀的去估計羣衆的政治水準和組織能力。這表現出兩方面：一方面是硬把自己的願望，當作羣衆的願望，硬把自己認爲已經過的東西，當作羣衆過時的東西，把自己認爲不成問題的，當羣衆也不成問題。這樣，結果必然是誇大了羣衆的政治水準和組織能力，誇大了羣衆革命化的過程，縮小了羣衆中所受的落後的或壞的影響的程度。這樣，就在決定自己的方針的時候，必然做出過「左」的政策和口號來，結果脫離了羣衆的實際要求，弄得政策錯誤失敗，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去仔細分清革命的真正民族敵人和一般的動搖分子，模糊他們中間的差別，把他們等量齊觀，認爲他們中間都是反革命的，因而採取以對待敵人的策略手段，去對待動搖分子，不是去爭取他們，而是拒絕他們參加革命，客觀上，便是逼着他們離開革命的道路。事實上，(3) 絕大多數的人，是願意或可能和共產黨人團結合作，共同奮鬥的。

(4) 孤高自傲，不善於脫離落後羣衆。抱有宗派主義傾向的人，眼裏往往只顧着少數的進步份子，對大多數落後的羣衆，常熟視無睹。這些落後羣衆，比較不容易接近共產黨，比較不容易接受共產黨的主張，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這是由於他們自身經驗之不足，由於共產黨沒有採取細心耐煩的態度去對待他們，沒有採取必要的步驟，去引導他們從自身經驗中，來了解共產黨政策的正確性。對待進步份子，因爲他們已經進步了，爭取比較容易，甚至不去爭取，他們與我們也無多大距離。而落後份子，却是需要時間，需要說服，需要花許多精力，才能爭取到革命道路上來。但有些共產黨人，却是走慣了容易走的道路，走慣了阻礙較少困難較少的道路，而對於多花時間，多費精神，多走曲折麻煩的道路，則不願走。這種不善於去說服落後的羣衆，客觀上等於把落後的羣衆，置之於前，甚或置之於民族敵人。其實我們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凡有羣衆的地方，便一定要進行工作。」列寧曾經教導我們：「共產黨人底全部任務，就是善於說服落後羣衆，善於在落後羣衆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一味提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來把自己與羣衆隔離。」(見列寧著：左派幼稚病)

宗派主義之爲害，是很顯明的，它阻礙着羣衆與共產黨建立正常的關係，使羣衆的政治影響，不能擴大和深入，使黨的政策和決議，不能貫徹到羣衆實際生活與革命實際生活中去。

四、如何克服宗派主義的傾向？

宗派主義同時也妨礙着黨的組織本身的发展。因爲如果羣衆沒有廣大羣衆作基礎，黨就困難從羣衆鬥爭中，發展和提拔新的幹部，鍛鍊和教育新的幹部。這樣，黨組織的本身，也就無法發展和鞏固了。沒有發展和鞏固的黨，革命事業就休想獲得成功。

上面已經說過了在羣衆工作中宗派主義傾向的主要表現，及其爲害之烈。雖然，宗派主義在現在我們黨內，已經沒有佔着統治地位，而祇是殘餘，但肅清它仍然極端必要的。那麼，採取什麼辦法，才能正確的糾正這些宗派主義的傾向呢？我以爲：

首先要實踐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整頓三農的工作。這就是說，要從思想意識上，工作方法上，肅清宗派主義的殘餘。

(下接第七三頁)

真 際 與 實 際

陳家康

馮友蘭先生「新理學」商兌之一

(一) 實際以實際為出發點

馮友蘭先生所著新理學一書，乃是取諸實際的一個哲學系統。然而他所講的實際，又是完全脫離實際的實際。我們認為實際雖然與實際有別，但不應脫離實際。所以有商兌的必要。

凡是商兌一個問題，必須有一個雙方共同承認的客觀標準。不然，就無從商兌。我們與馮先生之間，是否有一個共同的客觀標準？我們認為有的。不但我們與馮先生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客觀標準，我們與一切哲學家之間，都有一個共同的客觀標準。這個客觀標準就是實際。馮先生說：「照以上所說，哲學可以說是不切實際不實事。就哲學之本身說，誠如此，但就我們之所以得到哲學之程序說，我們仍是以事實或實際底事物為出發點。我們是人，人的知識，都是從經驗中得來。我們經驗中所有者，都是有事底存在。在底事物即實際底事物。哲學始於分析，解釋經驗，換言之，即分析解釋經驗中之實際底事物。由分析實際底事物而知實際。由知實際而知實際。」（新理學緒論第五節）。據此，馮先生的哲學仍以實際為出發點。我現在和馮先生商兌也是以實際為出發點。這樣一來，我和馮先生之間就有一個雙方共同承認的出發點。實事有實際的系統，馮先生仍以實際為出發點，其哲學系統必須合乎這個出發點，必須合乎實際的系統。如果我證明馮先生的哲學不合乎這個出發點，不合乎實際的系統，則其哲學就難於成立。此則自明，不必多加解釋。

馮先生又說：「我們以為理學即理學之學。」（新理學緒論第一節）。我們認為理學也是一個客觀的標準。何謂理學？王國維說：「說及解字第一節：「理，治玉也；從玉，里聲。」段玉裁說：「鄭人附玉之末理者為璞；是理為剖析。」由此類推，凡種種分析作用，皆謂之理；中庸所謂文理密察，即指此作用也。由此而分析作用之對象，事物之可分析而條然有系統者，亦

皆謂之理。邊論語曰：「孔子曰：美哉璠璵，璵而璵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爭勝。」此從理之本義之動詞一變而為名詞者也。更推之而言他物，則曰地理（易繫辭），曰勝理（韓非子），曰色理，曰聲理，曰氣理（荀子），說一切物而言之曰條理（孟子），然則理者，不過謂吾心分析之作用，及物之可分析者而已矣。」（論理文總釋理）。可見理，就其作為分析之對象而言，就是物之條理。理是客觀存在之理。不待吾人之分析而始有，亦不因吾人之不分析而即無。理即物，即理。物不二。馮先生的哲學既以理為宗旨，其哲學必須合乎理，必須合乎客觀存在之理。如果我證明馮先生的哲學不合乎理，不合乎客觀存在之理，則其哲學系統難於成立。此則自明，亦不必多加解釋。

至於馮先生的哲學系統究竟承什麼哲學系統而來，這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譬如馮先生說：「我們現在所講之系統，大體上是承宋明道學中之理學一派。」（理學緒論第一節）。宋明理學也是合乎客觀實際的哲學系統。馮先生承之，當然跟着程朱說實際。脫離實際說不通行不通，說不通行不通，就不能叫做實際。馮先生不行不通，但是不能不相說不通。

(二) 脫離實際的先聲

馮先生以脫離實際為其哲學的特點。脫離實際不但行不通，而且說不通。我們還要詳細討論。現在先講一講馮先生脫離實際的先聲。這就是把哲學與科學的聯繫切斷。

馮先生說：「我們現在先要說明者，即哲學與科學之分別。所謂科學，其意義亦很不定。有人以為凡是依邏輯底確切底原理，都是科學。如果所謂科學是如此底意義，則哲學亦是科學。本書所謂科學，不是取其如此底意義。本書所謂科學或科學底，均指普通所謂自然科學。就自然科學說，哲學與科學完全是兩層底事。」（新理學緒論第二節）。自然科學以實際為出

發點，誰都承認。哲學也以實證為出發點，馮先生自己也承認。既兩者都以實證為出發點。為什麼又是兩類異物。馮先生何以自解。

在我們看來，一切學術都是由實證出發的一類東西。部門儘管不同。本質總是一樣。馮先生把實證和實證分家，於是不能不把科學與哲學分家。設科學研究實證，哲學研究實證。馮先生說過，由知實證而知實證。是否馮先生也要承認由知科學而知哲學。以馮先生之理推之，如無科學，則哲學從何而來。根據馮先生所說，必然得出哲學必然以科學為基礎的結論。因為馮先生以實證為哲學的出發點。但研究實證者不是哲學而是科學。然則哲學在其出發時，必以科學為基礎，豈不明顯。但馮先生又反對哲學以科學為基礎（說在新理學緒論第七節），又豈非自相矛盾。

我們認為哲學固然研究實證。但何嘗不研究實證。科學固然研究實證，但何嘗不研究實證。哲學與科學同時以實證為基礎。哲學乃係科學之一種。就其相互關係而言，哲學雖不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也離不開哲學。這樣一來，非常通。沒有說不通的手柄。

(三) 馮先生的思想方法論

哲學家的思想方法論是一個根本問題。討論一個哲學系統而不涉及其思想方法論，是絕對要不得的。因此，我們特別注意馮先生的思想方法論。

馮先生的思想方法論是形式邏輯，或者說新形式邏輯，其特點就是承認思想可以與實證脫離。馮先生說：「照我們的看法，哲學乃自純思之觀點，對於經驗作理智底分析，總括，及解釋，而又以名言出之者。哲學之有於人之思與辯。」（新理學緒論小三節）。又說：「照上所謂我們可知哲學中之觀念，命題，及其推論，多是形式底、邏輯底、而不是事實底，經驗底。」（新理學緒論第四節）。這裏提出一個哲學上的大問題，就是邏輯與實證的關係問題。馮先生認為哲學是形式底邏輯底，而不是事實底，經驗底。這等於說，邏輯底不是實證底。其實，說邏輯底不是實證底，是說不通底。邏輯與實證不能脫節。

關於邏輯底不是實證底這個問題，馮先生有詳細的解釋。他說：「我們現在暫先舉普通邏輯中所常舉之推論之例，以明此點。普通邏輯中常說：『凡人皆有死，甲是人，甲有死。』有人以為形式底演繹底邏輯。何以能知『凡人皆有死』？何以能知『甲是人』？如欲知『凡人皆有死』，則必須具備的

法，如欲知『甲是人』則必須具備歷史底知識。因此可見形式底演繹底邏輯，是無用底，至少亦是無大用底。其實這種說法，完全是由於不了解形式邏輯。

於此所舉推論中，形式邏輯對於凡入是否皆有死，及甲是否是人，皆無肯定。於此推論中，形式邏輯所肯定者只是：若果凡人皆有死，若果甲是人，則甲必是有死底。於此推論中，邏輯所肯定者，可以離開實證而仍是真底。假令實證中沒有人，實證中沒有人之甲，這個推論，所肯定者，還是真底。不過若使實證中沒有人時，沒有人說它而已。不識推論如此，即邏輯中之普通命題，亦皆不肯定其主詞之存在。不過普通邏輯中，未明白表示此點，所以易引起誤會。新邏輯中普通命題之形式與普通邏輯中不同。例如『凡人皆有死』之命題，在新邏輯中之形式為：『對於所有底甲，如果甲是人，甲是有死底。』此對於實證中是否有甲，並不作肯定。但肯定：如果有甲人之甲，此是人之甲是有死底。上文說：哲學之觀念命題及其推論多為形式底，邏輯底，而不是事實底，經驗底。我們必了解上所謂說邏輯之特點；然後可了解此言之意義。』（新理學緒論第四節）。據此可知馮先生主張邏輯可以脫離實證。亦即思想可以脫離實證。思想一經脫離實證之後，實際在一定程度便管不着思想。思想便可任意釋放。實際只好登報聲明，說這種思想早已與實際無關。如有錯誤，實際對之，概不負責。不但實際要出來聲明。實際也要出來聲明。因為馮先生把實際、老家拋棄了。

馮先生哲學思想的程序說起來也很簡單，只有三個步驟，所謂性、類、理便是。

第一個步驟是求得性。何謂性？馮先生說：「例如我們見一方底物，我們說：『這是方底』。此一命題，可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普通邏輯中所說對於命題之內涵底解釋。照這一種解釋，我們說：『這是方底』，即是說：『這』有『方』之性或是說：『這』是依照『方』之理者。我們剛纔所說之『方』即是指『方』之理說。關於方之理或其他理，我們以後詳說。現只說：我們說：『這是方底』之時，我們的意思想，若是說：『這』有方之性，則我們所以能得此命題者，即因我們的思之官能，將『這』加以分析，而見其有許多性，並於其許多性中，特提出其方之性，於是我們乃得到『這是方底』之命題，於是我們乃能說：『這是方底』。」（新理學緒論第三節）。據此，我們明白馮先生思想方法的第一個步驟是求得物之性。如果說：我們必須得物之性。這句話並不算錯。然而，實證的物，不僅有性，而且有質。馮先

生將「這」加以分析，而見其有許多性。殊不知將「這」加以分析，還有許多質。馮先生所見者，乃係實際之物之一面，而非其全面。這一點姑且不論。現在研究馮先生怎樣把「性」發展而為「類」。

「類」是馮先生哲學思想的第二個步驟。何謂類？馮先生說：「這是方底」之命題之另一種解釋，是普通邏輯中所謂對於命題之外延底解釋。照這種解釋，我們說：「這是方底」，即是說：「這是屬於方底物之類中」。依此解釋，則我們所以有此命題，乃我們知有一方底物之類。我們不知在實際中果有方底物若干，則我們可知一方底物之類，將所有方底物，一概包括。（此上是馮先生所謂類的第一層意思。）我們並可思及一類，其類中並沒有實際底份子。此即邏輯中所謂零類或空類。例如我們可思及一絕對地方底物之類。但絕對地方底物，實際中是沒有的。（以上是馮先生所謂類的第二層意思。）我們並可思一類，其中底份子，實際中是否有，我們並不知之。例如我們可思及「火星上底人」之類。我們並不知火星上果有人否，但我們可思及此類，如火星上有人，則此類即將其一概包括。（以上是馮先生所謂類的第三層意思。）此所謂「理智底總括」。何以謂為理智底總括？因為這種總括，亦惟於思中之行之一。（新哲學論點三節）。總之，分析而得性。總括而得類。類乃性之總括，性僅管是實性，但類可能是空類。此就是馮先生思想方法的中心。何以見得？再引馮先生自己的話作證。馮先生說：「總括是與分析相對者，總括一普通所謂綜合不同。綜合是把不同底事物或觀念合而為一。總括是把相同底事物，即事物之有同性者，作為一類而觀之。綜合是「類」工作，「類」手續；總括是一種看法」。又說：「就我們用思之程序說，總括在分析之後。例如一方底物，我們的思將其分析，見其有方性。再將所有有方性底物，總括思之，即得方底物之類之觀念。我們不知亦不能知，實際上方底物，果有多少，但我可將其一概總括而思之。此階段之思是及於實者。即我們對於上文所說，由分析實際底事物而知實際」。以上說明馮先生尚未脫離以實際為出發點。馮先生又說：「於有類之觀念後，（於有類之觀念後一語，表示馮先生完全脫離實際，而以觀念為其哲學之基礎）我們又可見，我們於思及某類，或說及其類時，並不必肯定某類即有實際底份子。如果我們只思及其類或說及其類而並不肯定其中有實際底份子，則我們所思，即不是某種實際底物之類，而是某之類。例如我們如不肯實際上果有方底物而但思及「方類」，則我們所思，即不是實際底方底物之類，而是

方之類。所謂某之類，究極言之，即是某之理。例如方之類，究極言之，即是方之理。關於理我們以下詳說。現從從類之觀念討論，所以我們不稱某之類，而稱爲某之類。一（以上所引俱見新哲學第一章第二節）馮先生所謂類開始時仍然是物類，是實類。不料總括之而這種物類實類一變而爲沒有物沒有實際的類。這種沒有物沒有實際的類，在我們看來，纔是所謂零類或空類。例如方底物，這明明是一物類是一實類。雖方物而言方，則方是一零類或空類。此理自明，不用多加解釋。當馮先生以實際爲出發點時，他何嘗不承認先有方物然後有方，他何嘗不承認先有方物之類然後有方之類。因而方物不能不是物類或實類；所謂方不能不是零類或空類。誰知馮先生的思想走到半途，忽然把物類實類與零類空類的位置顛倒過來。他認爲方之類不是零類不是空類，反而方物之類却是零類是空類。馮先生說：「若實有方之理而無實現之之實際底物，則方之理即只有真而無實。『方』即是純實底。方底物之類，即僅是一可有之類，一空類」。一（新哲學第一章第四節）從前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差人解着一個犯人和向。晚上宿店。和向把差人的頭髮剃了，穿上和向的衣服，和向反而逃走了。第二天早上差人醒來，不見了和向。後來差人看見自己身上的和向衣服，又用手向自己頭上一摸，光光的。於是差人大聲叫道：和向我着，在這裏。但是他自己到那裏去了呢？馮先生的思想方法就是這道位和向學來。他把物類實類變手變成零類空類。反而把零類空類變成實有之類。假使這位置差先生並不知差人之糊塗，大聲叫道：我不願做馮先生加上我頭上的這頂零類或空類的帽子。馮先生其將如何。因此，馮先生思想程序第二個步驟就出現了比第一個步驟更爲顯然的漏洞。

再說第三個步驟，即理。馮先生說：「就我們得到知識之程序說，我們已知屬於每一類之事物皆有同性，例如屬於方底物之類之物皆有方性。每類物所同有之性，我們可將其離開此類之實際底物而單獨思之。（按每類物所同有之性絕對不能離開此類之實際底物而單獨思之，馮先生誤之處即在此）在中古哲學史中，公孫龍最先注意此點。公孫龍所主張之「離堅白」，即將堅或白離開堅白石而單獨思之也。此單獨爲思之對象之堅或白，即堅白之所以爲堅或白者，即堅底物或白底物之所以然之理也」。一（新哲學第一章第四節）據此，由馮先生得到其哲學知識之程序言，馮先生所謂理是由類轉變而來的。故謂「所謂某之類，究極言之，即是某之理」。一（見前引）。是

見理是由類來的，類是由性來的。但一轉手之間，馮先生便把這個程序顛倒過來了。馮先生說：「凡方底物必有其所以為方者，必皆依照方之所以為方者，此方之所以為方，為凡方底物所皆依照而因以成其為方者，即方之理。凡方底物依照方之理而為方，其所依照於方之理者即其性。凡依照某所以為之理而成其為某物之某，即實現某理，即有其性。理之實現於物者為理。」（新理學第一章第四節）。據此則類是由理來的，性是由類來的，或者說，性是由理來的。可見馮先生認為有兩種程序：（一）得到知識之程序由性而類而理，（二）哲學程序，由理而類而性。這兩個程序是相反的，其中必有一個是順行的，必有一個是逆行的。馮先生當然認定哲學的程序是順行的，得到知識的程序是逆行的。我們認為馮先生以實際為出發點，即其得到知識的程序，還不失為順行。馮先生的哲學系統，則完全是逆行。

經過這一番討論，我們對於馮先生的思想方法論更多一層了解，原來我們了解馮先生思想方法論的第一個特點，即思想脫離實際。現在我們了解馮先生思想方法論的第二個特點，即在思想脫離實際之後，便顛倒過來，把思想放在前面，實際放在後面；把思想放在上面，實際放在下面。馮先生的思想脫離實際，不是偶然，而是經過所謂得到知識的程序，一步一步實現的。等到馮先生的哲學系統完成之後，便離開了他的出發點（即實際）達十萬八千里之遙。

再者，馮先生說過：「哲學之有非人之思與歸」（見前引）哲學家必須依其思想，這是大家公認的。豈獨哲學家，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也要依其思想。不過，根本問題在於思想方法。如果思想方法是以實際為出發點，同時又能堅持這個出發點而不任意脫離。則思想作用，只會加強，不會錯誤。如果開始時雖以實際為出發點，但走到中途，便要脫離實際，拋棄自己的出發點，其思想一定錯誤。思想錯誤，則思想作用，一定減弱。這是至理。

何況離開實際之後，雖有思想亦不能求得真理。關於僅僅依其思想不能求得真理一點，前人已先我而言之。顧澤陽云：「孔子七十從心不違矩，始可以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何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後，尚不知如何也。若漫曰心即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短長，幾何不顛倒而失措哉。」（明儒學案卷五十八論學問與李見羅）。僅僅依其心以為理，僅僅依其思想以求理，而不問思想方法如何，吾人幾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這一點的確是一個

大問題。

更進一步說，思想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實際，最後仍逃不出實際之外。馮先生說：「如此看來，我們的思，分析則細入毫芒，總括則貫通各時各地。程明道的詩：『心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可以為我們的思詠了。」（新理學緒論第三節）。好像馮先生真能游心於物之外，游心於實際之外。但是細加分析，馮先生的哲學思想，那一點不是實際的產物。這企圖游心於物之外，游心於實際之外這一主張的本身，都是實際的產物。何況其他。歷史上多少哲學家企圖逃避實際，結果逃避不了。我曾為企圖逃避實際的哲學家作一偈曰：「心如孫悟空，物如如來佛，風翻筋斗雲，手掌敲不出。」不知馮先生以為然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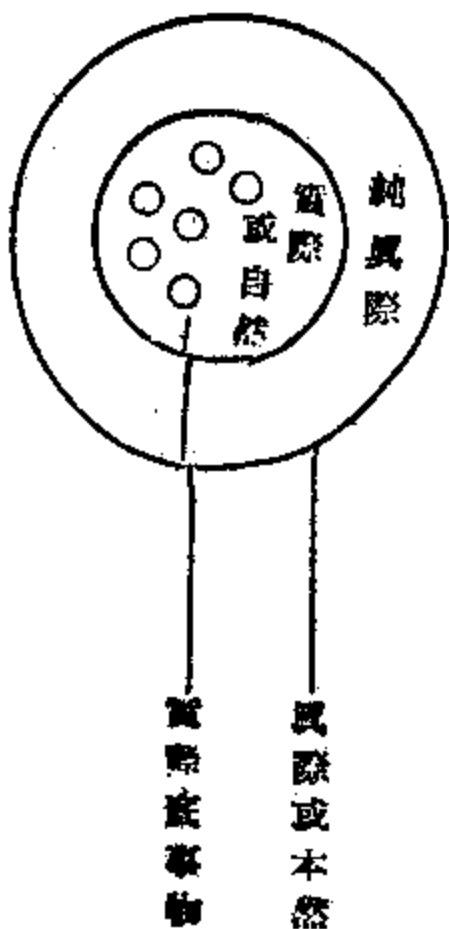
再說辯。馮先生所謂辯是從名辯論。他說：「哲學是說出或寫出之道。此說出或寫出即是辯。」（新理學緒論第三節）。我們所謂辯雖然也是辯論，但其目的在於發現矛盾。首先在於發現實際之中的矛盾。思想是反映實際的，從而發現思想之中的矛盾，以便進入思想之中的矛盾與實際之中的矛盾，究竟如何聯繫。正因為思想是反映實際的，以故思想不但有與思想互相矛盾之可能，而且思想有與實際矛盾之可能。從而思想與實際之間的矛盾，亦在發現之列。辯之目的既在發現矛盾，故必有所爭。爭必有所是非。是非既明然後有所當。墨經謂：「辯，爭也。爭勝，當也。」（墨子經上第四十）。就是這個意思。可見這種辯論的方法，在中國是古已有之。我和馮先生辯論哲學，就是辯。還有一層意思，我們是唯物論者，馮先生不是唯物論者，我們不能拿唯物論來強人同己。但是客觀的真理只有一個。我們不問馮先生的哲學系統合不合乎唯物論。我們只問馮先生的哲學合不合乎客觀的真理。如果馮先生新理學所講之理並非客觀的真理，那末，馮先生的學說便站不住。假使我們唯物論所講之理並非客觀的真理，那末，我們的唯物論也站不住。一切以客觀的真理為標準，就會得到好結果。因此，我們除了說馮先生的哲學系統不合客觀的真理而外，不說他不合乎唯物論，蓋馮先生本非唯物論者，怎能強求其合乎唯物論。

（四）何謂「最哲學底哲學」

要弄清馮先生哲學的內在矛盾，必須懂得馮先生名其哲學為「最哲學底哲學」。何謂「最哲學底哲學」？馮先有一段文章是其最哲學底哲學所從

出。亦其矛盾所從出。錄在下面。

「哲學對於真際，只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實地有所肯定。換言之，哲學只對於真際有所肯定，而不特別對於真際有所肯定。真際與實然不同，真際是指凡可稱為有者，亦可名為本然；實然是指有事實的存在者，亦可名為自然。真者，言其无妄；實者言其不虛；本然者，本來即然；自然者，自己而然。實際又與實際底事物不同。實際底事物是指有事實底存在者，例如這箇椰子，那箇椰子等。實際指所有底有事實存在者。有某一件有事實底存在底事物，必有實際，但有實際不必有某一件有事實底存在底事物。屬於實際中者亦屬於真際中；但屬於真際中者不必屬於實際中。我們可以說：有實者必有真，但有真者不必有實；是實者必是无妄，但是真者未必不虛。其只屬於真際中而不屬於實際中者即只是无妄而不虛者，我們說它是屬於純真際中，或是純真實際。如以圖表示此諸分別，其圖如下：



就此圖所示者說，則對於真際有所肯定者，亦對於實際有所肯定。但其對於實際所肯定者，僅其「是真際底」之方面，而不及於其「是實然底」外之他方面。例如對於動物有所肯定者，亦對於人有所肯定。但其對於人有所肯定者，只其「是動物」之方面，而不及於其「是人」外之他方面。我們說哲學對於真際有所肯定，而不特別對於實際有所肯定，特別二字所表示者即此。」（新理學緒論第四節）。

這一段文章，凡研究馮先生哲學系統者必須熟讀。馮先生哲學系統的中心點，就是實然與真然分開，實然說：把實然與真然分家。馮先生是否肯

定這種說法的真然，是否肯定這種說法的真然合乎客觀真理呢？根據馮先生所謂「哲學對於真然，只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實地有所肯定」一語看來，是見馮先生沒有從實然上肯定真然，僅僅從形式邏輯上肯定真然。然而當我說明馮先生所謂真然完全不是真的，以及完全不合乎客觀真理時，我仍然從兩方面解釋：第一方面，從實然上解釋；第二方面，針對形式邏輯來解釋。

第一方面，從實然上解釋。從實然上看來，馮先生所謂「真際」，即脫離實際之真際不是真的。何謂真？有據之謂真，無憑無據之謂不真。實際都是有憑有據的。脫離實際之真際，無憑無據，怎樣談得上真。馮先生雖然聲明：「而不特別對於實然有所肯定」。（見前引）。但是馮先生對於實際已有最重大的肯定。他肯定客觀的實然合乎他所謂真際。他說：「……亦對於實際有所肯定。但其對於實然所肯定者，僅其「是真際底」之方面……」（見前引）。難道這不是一個最大的肯定嗎？既然馮先生對於實際有所肯定，我就可以根據實然來檢討客觀實然與馮先生所謂真際之間的關係。如果我根據客觀實然說明客觀實然並不是依照或者依據馮先生所謂真然而來的，那末，我就能夠說明馮先生所謂真然完全不合乎客觀實然。當然我能夠證明馮先生所謂真然不合乎客觀實然，那末，馮先生認為實然與真然底這箇重大的肯定，就站不住。所以我和馮先生商兌的文章，都是根據實然來攻破他的所謂真然。

第二方面，針對形式邏輯來解釋。馮先生的哲學基礎既然是形式邏輯，因此，形式邏輯如果對，馮先生的哲學系統必然對；形式邏輯如果錯，馮先生的哲學系統非錯不可。就馮先生所謂「哲學對於真然，只形式地有所肯定」一語看來，是見形式邏輯乃是所謂真然的基礎，如果形式邏輯錯了，真然非錯不可。因此，攻破形式邏輯，必然成爲我和馮先生商兌的第一個要點。怎樣攻破形式邏輯呢？我仍然根據實然。有人說，形式邏輯對於實然並無肯定，你却根據實然來攻破形式邏輯，豈非隔靴搔癢。我回答說，縱然主張形式邏輯的人口口聲聲說明對於實然無所肯定，但是，他絕不肯承認形式邏輯與實際根本沒有關係。假使主張形式邏輯的人肯於承認形式邏輯與實際根本沒有關係，肯於承認實然有實然的邏輯，這樣一來，形式邏輯絲毫不能離開實際的發展，形式邏輯豈不變成了文字遊戲。所以形式邏輯對於實際必

要作一個基本的肯定，即肯定實際標準依照和依據形式邏輯所規定的形式以爲標準。馮友蘭先生的哲學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馮先生所講理，是邏輯的，形式的，但是實際必須依照這個標準。馮先生所講理，是邏輯的，是形式的，但是實際必須依照這個標準。馮先生所講理，是邏輯的，是形式的，但是實際必須依照和依據這個標準。馮先生所講理，是邏輯的，是形式的，但是實際必須依照和依據形式邏輯所規定的形式以爲標準，而且他認爲自古至今一切實際已經依照和依據形式邏輯所規定的形式以爲標準，因此，我們就能根據實際來檢討形式邏輯。但我們我們根據實際，並且證明實際並非依照和依據形式邏輯所規定的形式以爲標準，證明自古至今一切實際並未依照和依據形式邏輯所規定的形式以爲標準，這就證明形式邏輯站不住。主張形式邏輯的人明明知道形式與實際的關係乃是他的致命要害，所以不願人家從此處進攻。我們反對形式邏輯的人既然找出這個致命的要害，試問我們不從此處進攻的要害楔入，還從何處楔入？試問我們不從此處進攻的要害楔入，還從何處楔入？試問我們不從此處進攻的要害楔入，還從何處楔入？試問我們不從此處進攻的要害楔入，還從何處楔入？

形式邏輯，無論新的也好，舊的也好，都是一樣，只要形式，不要實際。形式邏輯的毛病就在於把形式與實際分開，馮先生把實際與形式分開，就是應用這個辦法，所以他認爲對於實際只形式地有所肯定。結果，使實際完全變成一個形式。其實，形式與實際內容是分不開的。如果把形式的實際內容完全挖空，結果形式就成爲空洞洞的形式，不代表任何實際內容的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就無意義，還能夠過渡到實際來嗎？這種形式還有用嗎？

形式與實際的分裂，或者說思想與實際的分裂，這是任何一種形式邏輯所共有的毛病。這是一一個老毛病，從古代形式邏輯之基礎到古代的亞歷斯多德起，就有這個毛病。康德有這個毛病。來布尼茲有這個毛病。福來格與維素也有這個毛病。反對福來格，羅素的偉更司坦以及發揚偉更司坦而在少數中國大學教授中流行的莫利茲石里斯的學說，同樣有這個毛病。舊形式邏輯有這個毛病，新形式邏輯也有這個毛病。馮先生自命其邏輯爲新形式邏輯，當然也有這個毛病。還有咱們古代的公孫龍有這個毛病，爾宋的程朱也有這個毛病。

至於我們反對形式邏輯，並非反對形式，而是反對形式主義。任何邏輯都有判斷，有判斷就有判斷的形式。我們當然要形式，不要形式是講不通的。我們不但要形式，而且還要最精確的形式，最有實際內容的形式。今天講形

式邏輯的人，不是誤於形式，而是誤於形式主義。今天的形式邏輯，老實說，不過是形式主義的邏輯而已。而且反對形式主義的邏輯，也不必請外國的哲學大師來講話，把我們古代的學家請出來就夠了。學家對於名實問題講得最透徹。名就是我們所謂形式，實就是我們所謂實際。墨經謂：「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又謂：「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見墨子經說上第四十二）又謂：「一名實合爲。」（見墨子經說上第四十一），又謂：「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見墨子經說下第四十三），又謂：「舉，擬實也。」又謂：「言，出舉也。」（以上見墨子經說上第四十）。據此，足見我國古代的哲學家認爲名與實是分不開的，即是說形式與實際是分不開的。名的作用就在於舉實擬實。「文名」和「文實」的「文」字可作之字解，因此，有之實而後謂之，纔有之名。無之實則不能謂之，便無之名。無實則無謂，無謂則無名。實乃名之主，名乃實之賓。人類之所資者莫過於知識。何謂知？墨經謂：「知，接也。」（見墨子經說上第四十）。又謂：「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其名取。」（見墨子經說下第四十一）。是知必須接實，而名乃是知之工具，用以取實而已。所以名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脫離實，形式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脫離實際。就其出發點而言，名不能脫離實，形式不能脫離實際。就其歸宿而言，名也不脫離實，形式也不脫離實際。形式邏輯使名脫離實，使形式脫離實際，無論如何不對。不知馮先生以爲如何？再者，馮先生所謂新形式邏輯並不稀奇，不過比舊形式邏輯多一個「若果」，「如果」，「假令」而已。（見新理學緒論第四節第一段）。馮先生說：「不過舊邏輯中，未明白表示此點，所以易引誤會。新邏輯以普通命題之形式與舊邏輯中不同。例如「凡人皆有死」之命題，在新邏輯中之形式爲：「對於所有底甲，如果甲是人，甲是有死底」此對於實中是否有是人之甲，並不作肯定。但肯定：如果有是人之甲，此是人之甲是有死底。」（新理學緒論第四節第一段）。怎樣「甲是有死底」，於是不能不有他種新形式邏輯的命題。即：「若果凡人皆有死，若果甲是人，則甲必是有死底。」（新理學緒論第四節第一段）。可見新形式邏輯不過多用幾個若果的字眼而已。

若用幾個若果的字眼，是否可使新形式邏輯說得通呢？我肯定的回答上實說上說不通。因爲「若果」仍須合乎實際，不合乎實際的「若果」，仍然站腳不住。假使我們說：「若果凡人皆是無死底，若果甲是人，則甲必是無死底」。這個命題完全合乎馮先生所謂新邏輯的形式。馮先生能說這個命

題的形式錯嗎？當獨馮先生，恐怕全世界新形式邏輯的大師也不能說這命題的形式錯用，但是客觀實證證明「若果凡人皆無死」這命題錯了，你又有什麼辦法說它不錯？是見形式上認為對的，實際上不見得就對。形式，認為真的，實際上不見得就真。形式上認為說得通的，實際上不見得說得通。

馮先生從其形式邏輯上認定實與真與的關係是「若果——則」的關係。他說：「實與真與物類實與；實與真與也真與。此所謂真與，即「若果——則」之關係。有實與真與必有實與；有實與必有真與。但有實與不必有其一實與真與物類，有真與不必有實與。」（新理學第一章第一節）。所謂「若果——則」者，即若果有實與則此實與必須依照和依據真與，若果無此實與則無所謂依照和依據真與。「若果——則」是馮先生替實與規定之義務。若果有實與而不依照和依據馮先生所謂真與，請問馮先生有什麼辦法強求實與服從「若果——則」的肯定。

更進一步說，馮先生何以能知真與是真的？假使馮先生必須找出許多真與實與來證明真與是真的，這就是實與的有所肯定。假使馮先生對於真與僅作形式的肯定，而末，他只能說：若果真與是真的則如何如何。至於真與究竟不是真的，馮先生並不能予以肯定。再進一步說：宇宙間究竟有真有真與個個真與？馮先生也不能予以肯定。馮先生只能說：若果有真與則如何如何。再進一步說，形式邏輯本身究竟是不是真的，馮先生也不能予以肯定，馮先生只能說：若果形式邏輯是真的，則將如何如何。這種形式邏輯有什麼好處呢？其所以沒有好處，就因為形式脫離了實與。

我們認為 真 與實與在本質上沒有區別。我們說在本質上沒有區別，並非說沒有任何區別。實與是客觀的存在，實與則是人類用腦力勞動由實際中提煉出來的主觀存在。實與是客觀的真與，實與是主觀的實與。主客不二，以故實與不二。所以，我們在本質上說，實與與實與之間並無區別。這在頭頭與實與，我也來畫一個。不過很簡單，只是一個圓圈（見上圖）。這就叫做實與。



與實與的本質圖。就此圖所示者說，實與不外於實與，實與不外於實與。實與不外於真與，真與不外於實與。越實越真，越真越實。不實者不真，不真者不實。馮先生所辯真與實與說離了實與，所以不為真與，嚴哲學家哲學說離了實與

所以不是實理，同時也不是真理。

(五) 出發點與分歧點

馮先生以實與為出發點，我已經說過了。這個出發點是不錯了。馮先生之說離實與不在這個出發點上脫離，而在一個分歧點上脫離。這個脫離實與的分歧點，我已找出來了，就是「既已得之之後」。馮先生說：「哲學中之觀念，命題，及推論，之係形式底邏輯底者，其本身雖係形式底邏輯底，但我們之所以得之，則靠經驗。我們之所以得之雖靠經驗，但我們既已得之之後，即見其並不另需經驗以為證明。其所以如此者，因此種觀念，命題，及推論，對於實與，並無所主張，無所肯定，或最少主，最少肯定。」（新理學第五節）。我不是說馮先生在實與為出發點時本無脫離實與之打算，我只說馮先生在實與為出發點時，雖有脫離實與的打算，但其完全脫離實與，則在「既已得之之後」，不在尚未得之前。

(六) 哲學之有用與無用

「既已得之之後」是一個新的階段。不但馮先生要求這個新的階段，我們同樣要求這個新階段。因為尚未得之前，不是未經腦力勞動所提煉的實與。既已得之後，纔能產生由腦力勞動所提煉的真與。以故，問題不在於「既得」，而在「既得」之後，是否「得之真與」。說離實與生真與的實與。分歧點就在於馮先生於既已得之後，毫不疑心的脫離實與，至於我們在既已得之後，仍然不肯脫離實與。

馮先生說：「哲學所以不切實與者，因其本不注重實與也。其所以不切實與，因其所講之真與，本非我所能用也。」又說：「哲學對於其所講之真與，不用之而只觀之。就其只觀之而不說，哲學可以說是無用。如其有用，亦是無用之用。」（以上俱見新理學第六節）。

(七) 關於中國哲學的遺產

馮先生自認其哲學是承接宋明道學中之理學一派而講的，這涉及了中國

哲學的遺產問題。我們當然主要接受中國哲學上的賢貴遺產。但與馮先生之間獨有取捨之不同。馮先生把接受中國哲學遺產問題叫做「上繼往聖」。這句話有點中國味道，顯而易見。現在「上繼往聖」一點來尋馮先生的哲學。馮先生說：「在中國哲學史中，我們應該注意，派別甚多，未可一概而論，自秦以降，漢人最富於哲學底精神。」又說：「晉人則較富於哲學底精神。先秦所有之邏輯底觀念，此時人又恢復其邏輯底意義。」又說：「晉人雖有一不齊實然」之傾向，而對於實然並未作有系統底肯定。所以晉人雖等談名理，而未能有偉大底哲學系統。」又說：「在中國哲學史中，對於所謂真或純真，有充分底知識者，在先秦唯公孫龍，在以後推程朱。」（以上見新理學緒論第五節）。由此可見馮先生所謂「上繼往聖」，係以先秦的公孫龍與兩宋的程朱為主。而旁及於莊（周）老（聃）何（晏）郭（象）。馮先生有收於程朱，亦非程朱全部。僅取其講理一點而已。故謂：「因為在許多點，我們亦有與宋明以來底理學，大不相同之處。」（新理學緒論第一節）。假使有人企圖把馮先生哲學歸納在程朱學派之中，我們也覺得並不適合。因此，我們還是說得詳細一點，把馮先生哲學分成三個來源而觀察其取捨之所在。第一個來源是先秦名學，取公孫龍一派而捨其餘。第二個來源是莊老哲學（此所謂莊老即本來的莊老，西漢以莊老歸納於黃老刑名之學之內，另立德家或道家之名，提倡其所謂君人南面之術。以故黃老之學的莊老與本來的莊老不同。老子一書晚出。此書是否老子原有思想，亦成問題。但老子一書與莊子一書的思想顯然不同。老子一書崇無，莊子一書仍崇有為。魏晉時代諸莊老者分為兩派，一派本老子一書，提倡貴無，以何晏王弼為代表，而流為玄術之誤國，為世所詬病。一派本莊子一書，提倡崇有，以郭象裴頠為代表，而存莊老哲學之真。馮先生雜引何晏郭象，而各有所取捨。其在新世訓中解釋無為，有取於郭象者，似多於何晏，故馮先生思想猶不致流於崇無賤有。至於馮先生尚無所取於黃老刑名之學，可不言而喻。）第三個來源是程朱理學，取其講理一點而捨其餘。這三個來源造成了馮先生的哲學系統。這就是馮先生所說的較新的哲學系統。

我們和馮先生一樣，努力於接受中國哲學的遺產，或者說「上繼往聖」。然而與馮先生之間既有取捨之不同，所以對馮先生所引用的「往聖」，不免附帶批評幾句。同時，我們也引用幾個「往聖」來說明我們的論據。而且接受中國哲學遺產仍是一個新問題，多多討論幾句，也不致令人生厭。根據中國哲學的遺產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哲學系統的馮先生還是二三十年來的第一。所以說在「上繼往聖」的問題上，我們也願意和馮先生多多討論。

（上接第六頁）

犯了這種毛病的人，應該好好的整理整風文件，好好實行反省，認識那種自以為是，自立門戶底宗派主義同時也是主觀主義的錯誤實質，然後從實際工作中，去作真正的轉變。

次之，是要善於掌握黨的政策。團結全國人民，共同攜手為抗戰建國的偉業奮鬥，單就一般的宣傳和鼓動是不夠的，必須還有正確的政策才行。譬如說，我對指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為中國人民今日奮鬥的目標。這種正確政策的實施，就可鼓舞我們去團結全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各黨各派各界的力量，一致的為此目標而奮鬥。在這種方針下，我們為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就應根據各地情形，定出各地的具體施政計劃，以推行政策。自然，這種政策的正確運用，是一件極複雜而艱鉅的任務，但是只要我們堅持和貫徹黨的方針，堅持和貫徹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善於同黨外人士商量問題解決問題，那麼，我們就可以而且能夠克服我們為中國人民謀解放的任務。

再次，除了正確的政策而外，還要有正確的羣眾工作方針。抗日高於一切，那裏有羣眾，那裏就應有我們的工作，這應該是這一方針的中心內容。我們應不管羣眾的信仰、黨派、職業和性別的不同，不管羣眾的組織名稱和工作方法的各異，我們都應該和他去接近，去聯繫，去求得友誼的結立，去求得合法的公開的民主合作，為擁護他的日常切實要求而不應努力。經過相當時間，經過相互了解，我們逐漸的去求得羣眾運動和羣眾組織的發展與統一。只有統一的羣眾運動和羣眾組織，才能最大限度的發揮和組織羣眾的力量。自然，這是一一個艱鉅而長期的過程，也是一個不平靜發展的過程。但，基本上我們一定要向着這個方針邁進。同時，羣眾工作的深入與廣泛，更有待於羣眾工作幹部的培養，這種幹部的品質，是要具有決心深入到各階層羣眾，特別是下層勞動羣眾中去長期工作的，是要善於向羣眾學習的，是要善於用老百姓所樂聞的話去與羣眾接近，以誠懇的幫助的態度，去加緊與羣眾的聯系的。是要善於根據羣眾的情緒和切身利益，提出一定的要求去為羣眾的。

徹底克服在羣眾工作中宗派主義的傾向，是一個艱鉅而長期的工作，需要我們在黨內進行有系統的廣泛的教育工作，使大家懂得羣眾與羣眾保持聯系的問題，是黨和革命的成敗的問題。『要牢牢記住：假如老百姓擁護我們，日寇就無法打我們；假如我們說離了羣眾，我們就會失敗。』（中共中央七五週年紀念告抗日根據地將士書）黨中央這一指示，不僅在抗日根據地應如此認識，即在全國範圍內也應如此認識。不依抗日偉業上應如此認識，即建國事業上，也應如此認識。

列寧論文學及其他(上)

V. 謝爾蓋耶夫
戈 實 譯

列寧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同時還是一位偉大的文藝愛好者。假如更過分一點，我們也可以說他是一位偉大的和深刻的文藝批評家及理論家。

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亞在她所寫的「列寧回憶錄」中，曾這樣告訴我們：

「在晚間，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慣常地讀一些關於哲學的書籍——像黑格爾、康德和法國唯物論者的著作，或者是當他很疲倦的時候，就讀普希金、萊蒙托夫和尼克拉索夫的作品。當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最初在彼得堡出現的時候，我僅從閱讀中知道他，和從拉鋸會社那兒聽到一些關於他的事，說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只讀些俄國的書，而從來沒有讀過一本長篇小說。我非常覺得驚奇：就是後來當我和他相識的時候，也沒有幾次會談過這件事，只有在西伯利亞時，我纔知道這純粹是傳說。烏拉地米爾·伊里奇不讀俄國，而且將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著作，以及乞爾尼謝夫斯基的小說「何為！」返俄地讀過很多遍。一般地講起來，他並不知道並且不喜歡古典作家。後來，當布爾喬維克取得政權時，他給了國家出版局一個任務——就是以低廉的版本重印古典作家的著作。在烏拉地米爾·伊里奇的照相簿子裏面，除去他的肖像和許多老的誠實者的照片外，還有赫爾岑的照片，及乞爾尼謝夫斯基的好幾張照片」。

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就知道列寧是怎樣喜歡文藝作品，和尊重俄國思想界的前趨——赫爾岑和乞爾尼謝夫斯基了。當在西伯利亞的放逐期間，他經常把普希金、萊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等人的作品，和黑格爾的作品一齊放在床邊。列寧不僅喜歡文藝作品，他還常將文藝作品的入物，對話等引用到他的著作中去，像奧布洛摩夫和「死魂靈」中的幾位地主，就是時常在他的作品中出現的。

列寧在他的「一生」中，除去論黨的文學及藝術關於托爾斯泰和赫爾岑的文章外，就很少寫過專論文學及藝術的文字，但他在「唯物論與經驗

批判論」等書中，却奠定了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哲學基礎——認識論中的反映論，和在各種文章中直接地或間接地論到俄國及外國的作家及其作品等。從這些論述及段片的文字中，就能看出他對於文藝藝術的瞭解和批評之深刻了。

講到有系統地來研究列寧與文學及藝術這個問題的人，盧那契爾斯基可說是最早的和最有貢獻的一個人了。當一九三一年的時候，盧那契爾斯基曾為「文學大辭典」寫過一篇「列寧與文學」(發表於「文學大辭典」第六卷第一九四—二六〇頁，一九三四年)曾由共產主義學院文學與藝術科學研究所(即現行的蘇聯科學院)的論文，從列寧的哲學觀點，列寧關於文化的學說，列寧論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道路，以及列寧對於個別作家的批評與論述，來研究了列寧的文學與藝術的理論，盧那契爾斯基最後更這樣提出：「列寧所有的遺產，應該由文化理論家們用最精細的方法來加以研究，從烏拉地米爾·伊里奇的哲學基礎，從他無產階級觀念，他的政治觀點，一直到文學的論述為止」。在這種研究中，可以發現出列寧的文學與藝術的最寶貴的資料來。

除去盧那契爾斯基的這篇論文外，編印成書的，還有蘇特林的「關於列寧作品的文學引用文句」(一九三四年版)，吳希希支所編的「列寧論文化與藝術」(一九三八年版)。一九四一年時，蘇聯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又編印了一本「列寧論文學」，這本書的內容大體如次：

- 一、列寧論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
- 二、列寧論赫爾岑、拜林斯基、乞爾尼謝夫斯基、屠格涅夫、勃爾喬夫、謝爾蓋耶夫、托爾斯泰及高爾基，
- 三、論文學中的真實性的問題，
- 四、論俄國解放運動中的三個階段，
- 五、論社會主義文化與文化遺產，
- 六、論民族文化與語言，
- 七、克魯普斯卡亞、蘇特金及盧那契爾斯基對於列寧的回憶。

此外並附有謝爾賓斯基寫的一篇序文「列寧與文學」，現特介紹於此供我們作一個參考。

——譯者

一 列寧的文藝理論的哲學基礎

列寧的學說，豐富了人類知識的所有部門。列寧主義的思想，即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文學，和現代科學的文藝理論及批評的基礎。在列寧的著作裏面，我們不僅發見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批評的一般原則，我們還發見了這種批評的最經典的範疇。列寧關於赫爾岑、拜林斯基、乞爾尼謝夫斯基、杜布羅留波夫、莎爾蒂科夫——謝德林、屠格涅夫、格羅布、烏司本斯基、索夫、托爾斯泰及高爾基等人的評述（註一），在對於這些和其他一些作家的認識上，以及更進一步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這些作家的創造上，是具有特殊的意義的。

在「萊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這篇文章裏面，列寧這樣寫道：「假如在我面前的是位真正偉大的藝術家，那麼，他至少應當在他的作品裏面，反映出革命的某些實質方面。」（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二卷第三三一頁）。托爾斯泰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能在自己的藝術作品裏面，忠實地反映出俄國革命的一些實質的方面來，更進而也反映出他自己的時代的社會生活中的。一些主要的現象。列寧所提出的文學上的現實反映之真實性與深度的這個問題，是確定藝術作品的真實性的一個最主要的和基本的標誌。

作為藝術與文學之認識論的意義的這個觀點的哲學基礎，就是唯物論的反映論。反映論——這是一個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就建築着現代科學的藝術論的一切主要的原理。同時，列寧對於文學現象的見解的特點，也只有靠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的「靈魂」——反映論，才能完全明白瞭解。

列寧的反映論有着這樣的一個界限，這個界限將我們關於藝術的學說，和各種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及庸俗的反映論的學說區別開來。文學是人的認識的一種形式，它雖然有着各種特性，但它最服從於唯物論的認識論的一般法則的。在研究人類認識之真實性的標誌這個問題的時候，列寧這樣指出：「這樣說起來，唯物論的理論，經過思想來反映出對象的理論，是十分明白地敘述於此了：這就是說，物是存在於我們之外的。我們的知覺和

觀念——這就是它們的形像。實踐則設置了這些形像，和將真實的形像與虛構的形像區別開來。」（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三卷第八十九頁）。

藝術和文學的幾百年來的發展史，光輝地確定了列寧的這個著名的指示，並且使得我們可以更深入而完整地解過去許多世紀的藝術遺產的偉大的價值：「從現代唯物論的觀點看起來，這就是說，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起來，我們對客觀的、絕對真理的認識之接近的界限，在歷史上是有條件的，但這個真理的存在是無條件的；至於我們接近它，這個事實也是無條件的。一幅畫的輪廓，在歷史上是有條件的，但是這幅畫所反映出的客觀存在的輪廓，却是無條件的。」（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三卷第一一一頁）。這几句话充滿了對於生活、對於人的感力的深刻的信心，表現出我們對於人類創造性的活動的狂喜：「……對於一個唯物論者，世界要比它本身所顯示出來的還更加豐富、更加有生氣、更加多樣化；因為科學的每一步發展，都發現出世界中的許多新的方面來。」（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三卷第一〇五頁）。

在應用到文學方面去的時候，列寧的反映論的這些原理，就幫助我們了解許多大藝術家所創造出來的藝術的偉大性。假如有很多人在過去的文學裏面，只看到許多心驚肉跳的描寫，只看到許多錯誤與覺醒的堆集，那麼從列寧的觀點上，我們就學會能更深刻地和多方面地，去了解藝術與文學作品的積極的思想上的和認識論上的意義。

列寧認為一個偉大的真實的作家的每一種作品，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文件；反映出社會現實的真實的圖象。舉如他選在他早年的作品「俄國資產階級之發展」中，當他講到烏拉爾一帶的閉塞，講到它和中部俄羅斯的脫節，以及講到這個冶金區是烏拉爾工業出產最主要的形式的意義的時候，他這樣寫道：「比較一下瑪明——西比略克的小說「戰士們」中對於這個冶金區域的描寫吧（註二）。在這個作家的作品裏面，烏拉爾所特有的生活情形，是浮現地呈現出來了。」（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卷第三七九頁）。在同一本書中，當講到俄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和生活條件的特點的時候，列寧就引用過謝爾賓斯基——謝德林（「生活教育」）和瓦勒沙也夫（「里莎爾」）的作品中的文字（註三）。列寧利用這些作家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農民無出路狀況的真實描寫，來作為他自己的思想的證明。在同樣的意義上，他也時常引用格羅布、烏司本斯基的作品，和提起這位天才作家的

藝術作品的真實性與現實性。在列寧看來，文學——首先是人的認識的一種形式。唯物的反映論，指出了人的認識形式的多樣性，而其中文學的「特性則是一種特別複雜而複雜的意識形態。瞭解藝術家們的階級的與思想的立場，特別在瞭解他們的創造的個性，這具有重大的意義的。對於我們所研究的現象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這個要求，則運用真實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認識事物的必要條件。現代的科學認識論，在應用到文學方面去的時候，並不忽視文學的特別的規律，和作家們的世界觀及藝術個性的特點；相反的，仔細地研究這一切創造特點，正是真正的科學研究的必要要求。

列寧在他關於文學問題的評述中，對於文學與社會分析的多面性及精細性上，曾作出了一些經典的規範。在這一方面，列寧關於尼克拉索夫時評價，將對於這位詩人的個性最好的了解和對於客觀歷史環境的深刻的分析打成一片，可說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尼克拉索夫（註四）本人雖然有着很多的弱點；和在乞爾尼謝夫斯基及自由主義者之間搖擺着，但是他整個的同情則是站在乞爾尼謝夫斯基的一邊的。尼克拉索夫正因為有着這種個性的弱點而犯了自由主義的傾向，但他自己又爲自己的「罪過」而悲泣，和公開地懺悔這些罪」（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四卷第一三二頁）。在這個簡短的描述中，但又是相當於表現性中，光輝地反映出尼克拉索夫——這位作家與政治活動家，以及六十年代革命民主運動的領袖——乞爾尼謝夫斯基和杜布羅留波夫的朋友的面影來。

列寧認爲人的認識，是對於真正的現實的反映。但是認識過程的本身，並不是一個死的，單是像一面鏡子似的，直接的反映，而是帶着辯證的和矛盾的性質的。在文學創造中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反映，這就是藝術形象的創造，換句話說，這就是經過了藝術創造的個性而產生出來的現實的圖畫，並且帶着這個藝術家的思想的觀點與感覺的痕跡。藝術與文學中的對於現實認識的過程，是完全可以列舉下列的一個指示來解釋：「認識是自然現象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直接的，和毫無變化的反映，而是許多觀念及法則等的抽象化，方式化及形成的過程……」（見「列寧論文集」俄文本第九卷第一八五頁）。

在要定辯證唯物論的基礎的時候，列寧指出：「人的認識不是（Reflective）——不從從）——一條直線，而是一條曲折，是有着無盡的轉彎和旋轉的」（見「哲學筆記」一九三三年俄文本第三二八頁）。這個認識論的

一般原理，由藝術與文學的歷史，以及它們發展的矛盾性及不平衡性所光輝的證實了。歌德的意識的兩重性，可以完全拿十八世紀落後的及分裂的德國的歷史情形，以及「德國革命」的特點來說出。巴爾扎克的創造的世界觀的複雜性，則完全有賴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後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形式和資產階級意識的形成而定的。托爾斯泰創造中的顯著的矛盾，是俄國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的生活所造成的許多矛盾條件的反映。馬列主義的反映論，使得我們能用全部的深度來認識人類藝術發展的特點，以及過去許多偉大作家的創造中的矛盾性及複雜性。他們的創造中的這些特點，就是現實社會的矛盾的反映，而這些矛盾已經更進而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中得到了它的解決。

列寧用新的綜合的理論，豐富了辯證唯物論的反映論，並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的整個社會鬥爭的經驗和科學來充實了它。

反映論——我——解釋出世界文學史中的兩個主要的思想——現成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哲學基礎。列寧非常重視普希金、尼克拉索夫、乞爾尼謝夫斯基、謝爾林、屠格涅夫、蕭斯塔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歌德、左拉、拜朗謝、和巴比塞等人的著作（註五）。

上面所列表的這許多作家，是批評的現實主義、和用真實的創造來描寫批判者的社會的代表人。

列寧是反對那種塗抹和曲解了現實的藝術的。他敵視那一切將真理從人掩隔開的企圖，敵視那種將人從真理中引開而鬥爭吸引開去的全圖。列寧和古萊爾、謝里丹的談話，是具有特別的意義的（註六）。古萊爾、謝里丹當時把自己的作品的照片，都拿給列寧看，其中有一張就是「勝利像」。謝里丹寫道：「他尖刻地告訴我：他不喜歡「勝利像」；他說我把他畫得太美麗了。軍國主義和戰爭，都是無恥的，反動的；無論是英雄主義，無論是我犧牲，是都不能改變這一點的。」

「在這兒就存在着資產階級階級的藝術的缺點：它時常都是虛飾的。」

「我急燥地看了他一眼。」

「你非難我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藝術家嗎？」

「我這樣非難你」，他答道。

「繼而他又看了一眼涅斯頓的半身像（註七）」

「這是誰的肖像？你把他畫得太好了。」

「這個思想，好像是深深地固着在他的腦中。」

「我不專指讀你這像子照得太好，但是我讀這像不盡把我讀得太好」。

列寧之重視文學的認識論的內容這一點，更可以從他對阿卡地·阿威爾青科的小說集：「插在革命背脊上的十二把刀子」的批評中看出來。阿威爾青科，是位白黨僑民，他並沒有掩飾他自己的反革命的信念。可是列寧却認為阿威爾青科的著作是天才的和有趣的。列寧帶著讚揚的口吻說道：「據我看來，某一些小說是值得翻印的。天才應該加以獎勵」。列寧對於阿威爾青科的著作的批評，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使我們更加能了解列寧的藝術的標識。列寧解釋道：為什麼阿威爾青科的有些短篇是表現得很明顯，而另一些則是非藝術的，蒼白的。當阿威爾青科寫他所熟悉的現象，寫他所體驗過，所反覆思想過和感覺過的現象的時候，他就寫得很好。當他寫他所不知道，寫他所不確實認識的東西的時候，則在藝術上就失敗了。

列寧對於與工人運動敵對的和有害的文藝現象，曾作了無情的批評。所有一切異己的東西，都應該從我們的報紙和雜誌中驅除出去。關於這一點，列寧在給高爾基的信中曾這樣寫道：「假如我們慢慢地把作家們都聯合在一起和推動『教育』雜誌，這將會是件極好的事情。這真是好極了！讀者是新的，是無產階級的，我們要使得這個雜誌的定價低廉，——至於所發表的應該代表民主主義的作品，其中既沒有嘆息，也沒有背叛」。

克魯普斯卡亞曾這樣告訴我們：列寧對於藝術與文學中的一切虛偽具有着怎樣的敏感性：

「在他去世的前兩天的晚上，我把傑克·倫敦的小說——『生命之戀』讀給他說聽——這本小說現在還放在他房間裏的桌子上（註八）。這是篇很有力量的作品。一個餓得要死的病人，在一片人跡不到的雪地上，向一個大河邊的碼頭爬過去。他的力量衰弱下去了，他不是走而是在爬，和他並排爬着的，則一頭餓得要死的狗；在他們之間開始了鬥爭，人終於勝利了——他半死不活地，半瘋狂似地一直爬到了目的地。伊里奇特別喜歡這篇小說。第二天，他又要我再讀倫敦的其他短篇。第二篇小說完全是另外一個典型的——充滿了一種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伊里奇笑起來，並且選擇了一下手」。

列寧很喜歡那些充滿了積極的革命浪漫主義，和孕育了人類對於自由，對於美好的將來的幻想的作品。當在巴黎的時候，他熱心地讀了維克多·雨

果紀念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詩「Ode to the Revolution」（註九）。在這些詩裏面，有着很多的誇張，但是却能感覺到革命的浪潮。克魯普斯卡亞也告訴我們，說列寧在失眠的時候，有時候就讀魏哈倫的作品（註十）。

列寧對於革命浪漫主義的詩歌的同情，也是特色的。唯物的認識論，認為有益的創造的幻想，是人類活動的一個必要的因素。這遠在一九〇二年的時候，列寧就說過：「……應該幻想！」（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四卷第四九二頁）。他提出革命的創造的幻想，來和合法馬克思主義及尼巴主義的代表人的政治上的無原則性對立起來。革命的幻想推翻了自由資產階級的冷淡，而向前進。列寧覺得惋惜的，就是這種幻想，在俄國的社會民主運動中還是太少了。

馬恩列斯的學說，在人類之前，提出了許多空前未有的龐大的歷史任務來。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鬥爭中，沒有創造的革命的幻想是不行的；在任何一種科學的發展上，也是不能沒有這種種幻想的。列寧在俄羅斯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曾這樣講起幻想：「這個工具特別有價值的。有許多人以爲只有詩人才需要幻想，這是錯誤的。甚至就是在數學中它也是需要的，甚至就是在發現計數中的微積分的時候，沒有幻想也是不行的」（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七卷第二六六頁）。

列寧提出了有用的幻想，對於工作能有推動力的幻想，來和「空洞的」幻想，反動的浪漫主義的幻想對立起來。列寧是說：「空想的幻想的」。『有用的幻想』，可以幫助人去作鬥爭和改造新社會。

在『做什麼？』這本書裏面，列寧引用了比沙勒夫（註十一）的最有名的評述，來肯定了革命幻想的重要性：

「比沙勒夫在講到幻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而問那時，他曾這樣寫道：『有各種各樣的差異。我的幻想可以追趕到事實的自然過程，或者牠可以完全跑到另一方面去，跑到任何事變的自然過程始終都跑不到的地方去。在第一種情形之下，幻想是沒有什麼害處的；它甚至還可以幫助和加強勞動者的精力。……在這些幻想中，沒有什麼可以破壞和麻痺工作力量的東西，甚至會完全相反的。假如一個人完全沒有這種種幻想的能力，假如他不能不跑上前去，用自己的想像力完滿徹底地來推想那種在他面前正在形成的創造，——那時候我更不能想像：推動人在藝術、科學和實際生活方面進行和徹底進行廣大而勞苦的工作的，到底是什麼刺激力！……假如幻想的人只與

與此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細地考察生活，把自己的閱歷和自己的空中樓閣相比較，努力去實現自己的幻想，那麼，幻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是沒有什麼奇處的」。(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四卷第四九二—四九三頁)。

附註

(註一) 勃爾岑(一八二二年——一八七〇年)是俄國十九世紀的一位偉大的社會思想家，作家及自由民粹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創始人，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及放逐至西伯利亞，後移身亡命國外。當亡命期間，曾編印過「北極星」(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九年)及「鐘聲」(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七年)兩刊刊物。反對沙皇專制政體，要求解放農奴及鼓吹民主主義的思想。這兩種刊物的影響滲透入俄國的，在當時的解放運動上起了很大的影響，列寧曾寫過一篇「紀念勃爾岑」的文章，稱勃爾岑是一位「在革命的準備上起了偉大作用」的作家。又勃爾岑的名字，依俄文發音譯出，寫為「格爾贊」(Герзэн)，但國內現在通用的譯名，俱為「勃爾岑」(Берсен)，故以下均用此名。

拜林斯基(一八一二年——一八四八年)是位俄國的大文藝家，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俄國民主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並創有文藝批評刊物「同時代人」，奠定了俄國文藝批評的基礎。

乞爾斯謝夫斯基(一八二八年——一八八九年)是位俄國的大思想家，批評家及作家，又是位傳教主義者，反對奴隸制度及君主專制甚烈。當一八六二年曾因為寫了一篇「普魯士書」而被沙皇當局逮捕，判處了兩年的徒刑，但在這兩年的牢獄生活中，乞爾斯謝夫斯基却寫成了一本著名的小說「何為」，此後乞氏又過渡了多年的放逐生活，但無論怎樣艱苦的生活都毀不了他的志向。馬克思和列寧都極重視他的著作，馬克思曾稱他是位「俄國的大學者和大批評家」。

杜維羅爾波夫(一八三六年——一八六一年)是位著名的文藝批評家，不幸早死，死時僅二十五歲。其最著名的論文，為「黑暗的法國」及「何謂奧布洛摩夫主義」。

沙爾蒂科夫——謝德林(一八二六年——一八八九年)是位著名的諷刺小說家，代表作有「一個城市的歷史」，「政治雜記」等。
烏司本斯基(一八四〇年——一九〇二年)是位著名的民衆小說家，代表作有「土地之力量」。

(註二) 瑞明——西比路克(一八五二年——一九一二年)是位俄國小說家，生於烏拉爾，作品有「賤士」，「山嵐」，「黃金」及「烏拉爾小說集」等，內容多為描寫烏拉爾及西伯利亞的生活的。

(註三) 威勃莎也夫(一八六七年生)是位俄國作家，著有「廢師懺悔錄」，並編有「生活內的普希金」及「生活內的果戈理」等書。

(註四) 尼克拉索夫(一八二二年——一八七八年)是位俄國的大詩人，其著名長詩「嚴冬通紅的鼻子」及「誰在俄國供養自由？」

(註五) 鮑勃羅夫(一八一二年——一八九一年)是位和屠格涅夫及托爾斯泰同時代的著名小說家，其代表作有「奧布洛摩夫」及「廢屋」等書。奧布洛摩夫也正像「廢屋」一樣，已是一位典型的人物，在俄國凡是生活懶惰、懶散、敷衍、隨便和腐爛的人物，即當被認為是種奧布洛摩夫型的人物。

拜朗謝(一七八〇年——一八五七年)是位法國的大詩人。

(註六) 克萊爾·謝爾丹是位英國的雕刻家，著有列寧的半身像。

(註七) 溫士頓是邱吉爾的名字。

(註八) 傑克·倫敦(一八七六年——一九一六年)是位著名的美國小說家。

(註九) 雨果(一八〇二年——一八八五年)是位法國的名作家，代表作有「巴黎聖母院」，「九三年」及十大卷的「可憐的人」(「孤星淚」)等。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保衛當年六月開巴黎的無產階級起義而奮鬥。

(註十) 魏倫倫(一八五五年——一九一六年)，比利時著名的人。

(註十一) 康梭列夫(一八四一年——一八六八年)是位俄國乞爾尼維斯基及杜布羅留波夫而起的文藝批評家。

內政部警備局警備部警字第六八八六五號
京川警備司令部第八七〇號
警備部警備部第一一七號

本期零售貳元



要目

論蘇軍勝利反攻及其意義

曹蒙

反法西斯的旗幟

陳坤元

列強在華經濟力量的消長

許滌新

物質與精神的關係

梓年

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目錄

中共中央慶祝紅軍成立二十五週年賀電

紀念「三八」與反法西斯鬥爭

論敵寇動向與敵後鬥爭

敵寇的新攻勢

一個戰爭·一個和平

專論

論蘇軍勝利反攻及其意義

反法西斯的旗幟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德奧維十週年紀念——

研究

列強在華經濟力量的消長

批評

物質與精神的關係

研究的對象和生活的對象

——評艾蕪著「文學手冊」——

介紹

列寧論文學及其他(中)

群衆

第八卷 第四期

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群衆週刊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理 新華日報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西安各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 一元

六期 五元四角

十二期 十元

廿四期 十九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V. 謝爾賓娜作 (一〇六)
戈寶權譯

中共中央慶祝紅軍成立二十五週年賀電

斯大林同志，聯共中央和紅軍的將士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表全黨黨員與中國人民熱烈地慶祝紅軍成立的二十五週年與紅軍反攻的偉大勝利！

經過了二十五年的奮鬥，特別是經過了二十個月的反法西斯侵略的奮鬥，紅軍節已經由國際勞動羣衆的「狂歡節」發展爲全人類的「狂歡節」。五大洲一切反侵略民族，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都已由親身的經驗，一致公認紅軍和蘇聯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創造新的和更美好的世界的先鋒。紅軍近三個月來的攻勢，在全世界到處都引起歡呼和讚美，全世界到處都在研究着紅軍勝利的軍事和政治教訓。紅軍的攻勢，無疑是歷史上空前的，並且其規模和速度還在不斷加大。紅軍從十一月十九日在伏爾加河上的危城發動反攻，三個月後就一躍而至六百多公里以西的魯賓河附近。紅軍將希特勒匪徒完全驅出國境，只是時間問題了。自從紅軍開始對德戰爭，世界形勢就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現在由於紅軍的勝利，新世界的未來面目，也更加明朗更加確定了。一切形式的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已經在全世界永遠失去存在的餘地。民族的自由，政治的民主，已經成爲新世界新時代的原則。我們中國人民歡迎這個新時代的到來。我們歡迎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爲爭取這個新時代的團結而努力。我們慶祝紅軍的勝利，同時，英美在北非，美國在南太平洋，也都得到了重要的勝利。英美正在積極準備實踐歐陸第二條戰線的諾言。對於中國，英美都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中國人民對於這個新時代的首要任務，就是更加團結自己，準備像紅軍驅逐德國侵略者一樣地驅逐日本侵略者。我們相信，由於中國人民的團結奮鬥，由於蘇聯英美的勝利和對於中國的援助，我們也一定能將敵人反攻，并取得最後勝利的。

紅軍和紅軍的最高統帥斯大林萬歲！

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勝利萬歲！

中蘇英美的團結萬歲！

紀念「三八」與反法西斯鬥爭

「三八」，這個偉大的國際婦女節，正當國際反法西斯戰爭頻傳勝利捷報的時候，又來到全世界婦女的面前了。全世界婦女將熱烈地歡舞，歡欣地迎接這個節日。這不僅是消極地紀念過去婦女解放鬥爭的勝利，而且是積極地爭取反法西斯鬥爭和反法西斯鬥爭是有着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法西斯侵略者是全人類的，也就是婦女的壓迫者，摧殘者，不單是法西斯侵略者，不消滅法西斯主義，婦女不僅是得不到徹底解放，過去鬥爭的勝利，且有被推翻的可能。

由於這，為了紀念「三八」，全世界婦女們必須為爭取反法西斯鬥爭而努力。

事實上，在反法西斯戰爭的過程中，中美英蘇等反法西斯國家的婦女，都曾和男子同樣地直接間接參加這種戰爭，不僅從事於宣傳，救護，偵察，運輸，及生產，而且身為海陸空軍的戰鬥員，特別是在蘇聯，他們便有英勇殉難的女游擊員，身經百戰的女射擊手，長空萬里的女飛行員可泣可歌的戰績。這些英勇的蘇聯婦女，是使蘇聯成爲全世界反法西斯最堅強的堡壘的建築師。她們不僅保衛了她們的祖國，而且保衛了全世界。

很明顯地，任何一個不替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或半殖民地國家的婦女，不參加反法西斯鬥爭，不努力消滅法西斯主義，自身的自由就不能避免受着威脅和剝奪。法西斯主義是不把婦女看爲一個人，而看爲一個工具，一個奴隸的。

希特勒曾經運用一切陰謀，欺詐，陰惡誘騙的技術，利用婦女，把她們當做佈「法西斯網羅」的工具。他說：「有婦女牽涉在內的事，男人大都是傻瓜。我們一定要利用婦女。」這是坦白的自白。里賓特羅夫的女人就是被希特勒誘騙成功的一個。法國那些在最後黑暗給希特勒操場的貴婦人們都已成了希特勒的無代價的工具。不僅對於德國的婦女，對於法國的婦女，希特勒也在紐倫堡納粹頭目的密秘集會里說過這樣的話：「法國將要而且必定要做一個試驗場。在法國可以找到婦女，我們效勞。她們必須被鼓勵，被誘騙，最後被威脅，假若必要的話，對於任何不聽話的婦女，一定不能仁慈。」這樣，他在法國建立起了第五縱隊的基礎。希特勒利用婦女達其內而攫取政權，外而實行侵略的目的。在平時，他提出所謂「婦女回到家庭去」的口號。要使婦女們完全過「家庭奴隸」的生活，使她們完全「爲最瑣碎，最粗笨，最勞苦而最無味的廚房勞動以及孤立的家庭經濟所折磨」。在戰時，他縱容野獸般的法西斯軍隊，對婦女們實行着慘無人道的姦淫屠殺。東方的法西斯侵略者日寇採取和希特勒採着同樣的手段和同樣的暴行。波蘭在日寇鐵蹄下的淪陷區的女同胞，不知有多少被屠殺，被犧牲，更不知有多少人忍辱含垢，過着非人的生活！這就是法西斯侵略者所給予婦女的「恩惠」！中美英蘇各國婦女的參加反法西斯戰爭正是對於這種「恩惠」應有的答覆。

但是如果我們不自矜誇，不自欺騙，那我們就

應該承認我們還沒有能像蘇聯那樣，充分運用婦女的力量，使她們成爲建立反法西斯堡壘的有用的一員，也就建立新中國的有用的一員。在抗戰的六年過程中，佔全國人民半數的婦女們的力量究竟發揮了多少（被略）我們國內還竟有些人（就略），大唱「賢妻良母主義」，要把婦女拴在家庭里，專去「治家育兒」，不問「外事」。他們的理由是由男女在生理上和能力上生來便有差別，因而在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就是命定的。女治內，男治外，這是天然的分工。婦女的天職就是在家庭內，做一個「賢妻良母」好好地「治家育兒」，不必也不該跑到社會里去找職業，問政治，那都是男子們的事。甚至這說，五四運動以來，婦女已經與男子平等而有些婦女已經獲得比男子優越的地位，但其結果，對社會毫無益處，只是破壞和阻礙了性的發展。爲了矯正這種流弊，應該把婦女「趕回家庭去」。像歌德在他的「威廉馬思的修養時代」(「一個美的靈魂的自白」)中所說：「人們將有學識的女人，當作滑稽，他們不肯對有教養的女人忍耐，因爲他們以爲使多數沒學問的男人羞恥，是一件無體的事」，這「是根本上，不承認婦女和男子同樣是人，而只是男子的奴隸的。這顯然是錯誤的見解。儘管男女在生理上，有些差別，因而婦女必須負繁殖人類的特殊任務即「育兒」。但這並不能說明婦女的能力就只適於「治家育兒」，而不適於「外事」。實際上，男女的能力之間決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男女的社會地位也不是天生的

的。

不平等。歷史和現實都已告訴我們，婦女同樣可以担負任何任務。男女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不是男女能力有差別的结果，而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五四運動以來，一部分婦女雖然獲得相當解放，但一般地說，真正的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的人的權利是沒有得到的，從而男女的地位也還沒有平等。

更不用說，婦女的地位比較男子更優越了。現在正應該發展和完成五四運動以來，沒有徹底成功的婦女解放運動，而不應該反要把五四運動以來僅有的一些收穫也推翻。特別是在爭取我們的抗日戰爭的勝利上，正需要動員廣大的人力，決不容許把有用的婦女的力量完全消耗在家庭之內。國父孫中山先

生曾經勉勵婦女們說：「希望你們聽了我的講演後，都變成革命黨」。今天我們希望婦女都變成直接間接參加抗日戰爭也就是反法西斯鬥爭的戰鬥員。

(塔) 二月二十四日

論敵寇動向與敵後鬥爭

我們要估計日寇的動向，不能不把據着日寇的戰略方針。日寇的戰略方針，依然是保存主力，待機而動。保存主力，是準備在必要時候的決戰；待機而動，是尋求良機以便實行少付多得的戰鬥。

亡我中國奴役我人民為政策，在目前更強化其「以華制華」以「以戰養戰」的毒計。在淪陷區，敵寇增加對汪逆等傀儡組織的支援，抽調壯丁，編練偽軍，改組華北偽府，直接控制各地物資生產，以強化其統治。在敵後游擊區，敵寇仍繼續其「治安強化運動」和「三光政策」，掃蕩我敵後部隊，破壞我敵後根據地，掠奪我敵後人民財產，而尤其着重於華北，近更深入於山西。在正面，敵寇不斷進行其破壞性的戰鬥，不論美談漸續戰事，大別山戰事，今年演習邊境戰事，以及今後將要發生之戰事，深入的程度或有不同，而殺戮、焚燒和搶掠的破壞地位則決無不同。配合這種戰鬥的，更有法幣內流、物資外流、經濟封鎖，和挑撥離間我國內外團結的政治攻勢。日寇這一切行動，都為的是強化其在華佔領，增加其戰時生產，增長其軍事力量，打擊我作戰能力，破壞我國國際援助，以求達到其控制大陸的目的。為實現這一企圖，日寇從各方面對我的進

重企圖。日寇這一切企圖和一切準備，都只是為着達到他一個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全面的滅亡中國和獨霸亞洲。然而由於英美生產力的強大發展，和美國在南太平洋的開始反攻，由於蘇聯空前的偉大勝利以及保有廣大領土和龐大的軍事實力，由於希特勒德國的崩潰已見端倪，由於中國堅持不屈的抗戰意志和堅苦卓絕的敵後鬥爭，預示了日寇前途的暗淡，預兆着中華民族前途的光明。可是日寇決不會因此而認輸，更不會因此而投降，反會因其預感前途之暗淡，而更加緊進行其最後掙扎的準備。

在這種戰略之下，敵人在國內，是加強軍事生產，加緊壓榨人民，在國外，是以鞏固佔領，加緊掠奪，打擊和分化對方為主。關於日寇究竟將北進、西進、南進，還是專攻中國的問題，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北進西進過去都有可能，但在今天這種可能比較減少了。在希特勒走下坡路的時候，在希特勒今後動向已經處於被動的時候，日寇北進或西進的姿態，在牽制和誘惑的作用上，將較其真實的意義為大。西進攻印，今天看來也不成熟。東線在議會中說，日寇對印「無領土野心」，此話不可盡信，其中包含了一個陰謀，就是分化印度內部團結，挑撥英印關係，這對他更為有利的。南進對澳，在我們久已看為交通戰。這次日寇公開宣佈從布納和瓜島撤出，愈益證明日寇於挫敗之餘，不得不縮短戰線，求能保住南洋佔領，加緊物資消化，以準備將來南進之決戰。至於中國，則日寇一以滅

敵我戰線反攻的前進基地和準備向我內地進攻之嚴

份人力和物力。只要我軍在敵後能展開更強大的戰

亡我中國奴役我人民為政策，在目前更強化其「以華制華」以「以戰養戰」的毒計。在淪陷區，敵寇增加對汪逆等傀儡組織的支援，抽調壯丁，編練偽軍，改組華北偽府，直接控制各地物資生產，以強化其統治。在敵後游擊區，敵寇仍繼續其「治安強化運動」和「三光政策」，掃蕩我敵後部隊，破壞我敵後根據地，掠奪我敵後人民財產，而尤其着重於華北，近更深入於山西。在正面，敵寇不斷進行其破壞性的戰鬥，不論美談漸續戰事，大別山戰事，今年演習邊境戰事，以及今後將要發生之戰事，深入的程度或有不同，而殺戮、焚燒和搶掠的破壞地位則決無不同。配合這種戰鬥的，更有法幣內流、物資外流、經濟封鎖，和挑撥離間我國內外團結的政治攻勢。日寇這一切行動，都為的是強化其在華佔領，增加其戰時生產，增長其軍事力量，打擊我作戰能力，破壞我國國際援助，以求達到其控制大陸的目的。為實現這一企圖，日寇從各方面對我的進

後能多保持一份人力和物力，也就使敵方少佔用一份人力和物力。只要我軍在敵後能展開更強大的戰

份人力和物力。只要我軍在敵後能展開更強大的戰

門，也就使敵人減少向我內地進攻的可能。我們在敵後造成的形勢愈有利，也就對我國未來的全面反攻和太平洋上同盟國的決戰更有利。因此，我們希望全國及全世界人士應從戰略的眼光上，來衡量敵後戰爭的意義。

敵人爲着達到在我淪陷區內治安的鞏固，達到人力物力的掠奪與利用，達到造成向我內地進攻以及和同盟國作戰之更廣大的根據地，所以自太平洋戰爭以來，其大陸上的活動，特別着重於對我敵後進行全面的不斷的掃蕩。敵寇採用了一切巧妙的惡毒的方法，希圖消滅我國在敵後奮鬥的抗日武裝和根據地。他不僅任何地帶向我進行反覆的進攻，他不惜人力財力，在華北各地建築起堅強的防禦工程，其工程之大，單以鐵路工程來說，即常有六七層之多。

敵寇的新攻勢

我華北華中的敵後抗日軍隊，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在全國人民的熱望之下，在淪陷區和敵後人民的協助之下，雖困難萬端，然始終以無上頑強的鬥爭精神，堅持了敵後的抗戰。在戰鬥中，我們牽制了在華敵軍的一半，給了敵人極大的消耗，使敵人對我莫可如何，而且大量地保護了我淪陷區和敵後的人民，同時也把自己的戰鬥技術和戰鬥精神，提到中國軍事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

世界戰局正向新的情況轉變，日寇爲着加速完成他的戰略準備，實行他的戰路企圖，也日益加強了他在淪陷區和敵後的掃蕩行動。我們爲着擊破日寇的這一根本企圖，擊破當前敵寇的準備步驟，我們應該不僅以保持華北華中現有的鬥爭局面爲滿足，更應擴大和加強華北華中方面對敵人的消耗和牽制作用。我們如能給他們以物資上和軍火上的援助

，將毫無疑問地會大大展開華北華中的鬥爭，將更能縮短日寇開始新的行動的時間，將更能削弱他的力量，以至於破壞他的根本企圖。反之，如果我們對於敵後抗戰部隊不能給以有力的援助，華北華中一帶的抗日鬥爭，雖決不會因此而趨於消滅，但至少會比現在更加艱苦，而所起的作用，也會比現在減弱，這將給敵人以進攻我內地和向同盟國作戰的便利。

爲着阻止日寇更大的進攻和企圖，爲着實行我同盟軍有利的反攻，爲着抗戰的全面勝利，我們不僅要繼續華北華中的艱苦鬥爭，而且應該援助與配合這一有關全國和有關整個同盟國勝利的重要鬥爭，這就是我們今天嚴重的任務！

(二月十三日)

敵寇曾以泰國軍隊爲主力，於一月八日分三路侵入滇南，企圖佔領我車馬、佛海兩地。(關於滇南戰事，已於上期時論「論滇緬戰局」一文中詳細論及。)到了本月十一日，我軍委會發言人即在招待重慶中外記者席上稱：「滇西南兩境境線上，我與泰敵已陷於膠着狀態，僅局部有拉鋸戰」。滇南戰事，至此暫告一段落。

從十二日起，日寇和(略)，便在我國各地發動新攻勢。敵寇對這次攻勢，稱爲「中日戰爭中之最大的一次攻勢」。

粵南敵於十一日開始開始發動，分路進犯。然而，日寇所誇耀和染的新攻勢，是在華中的鄂、贛、湘、蘇北及蘇、魯、豫邊，廣州灣和滇西。從華中來說，敵寇於十二日在鄂中河陽及江陵一帶先動，隨即有潛江方面的進攻，向南進發，同時，湖北方面，自麻城及若山敵則北犯。經過幾天的戰事，敵寇乃於十五日陷於麻城，十六日佔我麻穴，並繼續南犯。二十二日電訊，敵勢已不若以前之猛。而敵方廣播亦已在總結此次「戰果」，似有暫告一段落的模樣。而鄂北方面之敵，於十二日從安嶺分路進犯，十四日圍攻於奉新以南地區，十八日便在奉新、高安間激戰了。到十八日，軍委會發表了奉新撤守的消息，至二十二日，敵我仍激戰於高安附近。至於鄂北方面，敵寇調集二萬餘大軍及海軍艦

隊一部份，於十三日分路進犯，當在麻城西北，淮安以東及寶應東北激戰。於十九日「淮安、寶應、豐城、甯國地區，共與敵血戰，迄未稍緩」。關於蘇魯邊境的情況，報道頗少。但日寇在二十一日即廣播「戰果」，該地戰事或亦將結束。此外，滇西方面，敵寇也是在十二日分路進犯的。十六日，敵寇便已從高黎貢山西麓，越山而東，並分路進攻，十八、九兩日，已抵怒江邊而圖渡江。到二十一日，我在高黎貢山之馬面關及明光附近仍與敵激戰，敵寇另一部則北向蠻畔進犯。廣州灣方面，十五日有敵艦五艘駛來，於次日在海康東北之雷州港及通明港登陸。十八日，海面敵艦已增至十五艘。

而，日寇所誇耀和染的新攻勢，是在華中的鄂、贛、湘、蘇北及蘇、魯、豫邊，廣州灣和滇西。從華中來說，敵寇於十二日在鄂中河陽及江陵一帶先動，隨即有潛江方面的進攻，向南進發，同時，湖北方面，自麻城及若山敵則北犯。經過幾天的戰事，敵寇乃於十五日陷於麻城，十六日佔我麻穴，並繼續南犯。二十二日電訊，敵勢已不若以前之猛。而敵方廣播亦已在總結此次「戰果」，似有暫告一段落的模樣。而鄂北方面之敵，於十二日從安嶺分路進犯，十四日圍攻於奉新以南地區，十八日便在奉新、高安間激戰了。到十八日，軍委會發表了奉新撤守的消息，至二十二日，敵我仍激戰於高安附近。至於鄂北方面，敵寇調集二萬餘大軍及海軍艦

敵艦隊登陸，便於十七日侵入海康城。十九日又陷遂溪。

據說這旬日來敵艦的攻勢，分佈之地區，不算不多，作戰之範圍，亦不寬廣。這便攻勢的企圖是什麼呢？這個攻勢的特點是什麼呢？

本期時論「陸軍部向與陸軍部爭」一文中指出：「……今年海軍戰事，以及今後陸軍發生之戰爭，深入的程度或不同，而殺戮，焚燒和搶掠的情形則並無不同」。這便估計是完完全全正確的，對敵寇的這次攻勢，也是完全適用的。因此，我們估計這次敵寇的攻勢，是採取其「三光政策」的破壞性的戰事。

為什麼敵寇在這種時候進行這樣的攻勢呢？我們知道，這次是在汪逆僥倖對英美「宣戰」後及羅馬行卡港會議之後發動的。在汪逆僥倖「宣戰」後，日寇就加緊其對我淪陷區的軍事奴役，訓練偽軍，強征壯丁。為了要使汪逆繼續執行他已接受的「徵調」一千萬人的命令，不能不表示其「急於」，所以就發動攻勢，給汪逆一點樣子看看。敵寇（敵路五十餘字）發動攻勢的特點正在卡港會議結束

一個戰爭，一個和平

——英美的戰略動向

由於蘇聯紅軍輝煌的勝利反攻，擊傷德法西斯侵略軍已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一頁以繼之，盟國國防戰的時期已經過去，同盟國間的當前條件已不該是如何防禦，而是如何組織和發動反攻了。

卡港在盟國會議中，英美，根據蘇聯反攻所形成的有利形勢，組織反攻的一個最高作戰會議。

卡港會議結束後，英美二大領袖先後發表了關於這一次會議經過的演詞，根據這兩大演詞，我們可以約略看出英美反攻戰略的動向。在這當中，英

及羅邱演說之後，便尤有其相當的政治作用。因為敵寇及汪逆僥倖對卡港會議不願的加以嘲笑，且譏諷所說在中國及日本本土上空採取「有決定性的行動」為「禁制」，「禁制」中國的「吹牛」，「禁制」其挑撥離間中國和英美間關係的詭謀。敵寇採取新攻勢，正是它利用英美尚未及實現卡港會議的決定以前，進行其挑撥的陰謀。它企圖藉此「證明」在中國天空採取攻勢是「紙老虎」，從而把其一部分人對英美盟軍不滿的情緒。

同時，我們不能不千百倍的警惕，敵寇的這次攻勢，常常是乘隙而入。它總要尋找和利用我方某些弱點，實現其「少付多得」的陰謀。渝市安徵同鄉會救災委員會負責人曾對記者時曾說過：前次（六月）敵軍進攻中，空軍實處於疏忽懈備，致遭敵突襲，敵入遂大施燒、殺、搶、掠政策（見二月十七日新華日報），監利之失陷，據中央社軍事委員會發表德十七日電，是由於「我守備部隊以寡敵眾」。（敵路六十餘字）我們抽引報上的材料（敵路）來推斷原因，決不是指謗，而且也相信這些並不是普遍的現象。但是，應該從這些事實中得到教訓，應是防範國土，保衛人民，是萬萬萬萬萬不得，博忘不得的。

一旦敵寇發動，我們全力反攻。此外，我們也應該注意：敵寇在中國是以「以華制華」，利用偽軍充其利刃，其敵我民族的自相殘殺，其漢奸則利用偽國偽軍為其利刃，以「漢族主義」家號召，一則當偽國偽軍為其利刃，一則以自利誘惑偽僑。其偽僑則利用其利刃，似也有其分化的意味。

凡此種種，都說明我們必須緊固團結，要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而作優勢的配備。我們和英美盟軍合作，要從合作，不單是政治上的合作，而且要從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而作優勢的配備。我們和英美盟軍合作，要從合作，不單是政治上的合作，而且要從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而作優勢的配備。我們和英美盟軍合作，要從合作，不單是政治上的合作，而且要從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而作優勢的配備。

首相邱吉爾十一日在下院發表的演詞大部份是關於歐洲方面的作戰的，而十二日林肯遜反美總統的演詞則着重於亞洲，兩相配合，正好描繪出一幅英美反攻的全面圖畫。大概早在卡港會議之前，由於蘇聯輝煌的勝

敗，希特勒早已利用他在英美的第五縱隊播送和平攻勢的謠言了。卡港會議的第一個結果是揭露了希特勒這一半劣陰謀，堅持作戰到底，直至法國全體（希特勒）「無條件投降」，「聯合國家在柏林羅馬東東之博道作勝利遊行爲止」，因此，卡港會議亦名「無條件投降會議」，在粉碎希特勒和平陰謀的這一點上，甚爲適當。關於這一點，羅斯福總統說得最爲明快：

「其宣傳家（指德意）又極力施展其伎倆，企圖分化盟國，彼等製造一種觀念，以爲吾人於戰勝以後，中蘇英美又將互相衝突。此乃煽動一國對付他國之最後努力，希望彼等能及時解決一二國家。彼等希望吾人之中有愚昧健忘至於被引誘以吾人才能及爲犧牲與軸心從事交易者。吾人對於此等逃避犯罪之惶恐企圖，所告之曰：吾人與任何軸心政府或黨徒談判之唯一條件，乃卡港會議時所宣佈之條件即「無條件投降」是也。」

作戰到底，是卡港會議第一個重大的決定。作戰的條件怎樣呢？

「英美場會聲明其贊同一年以前之決定，即應首先擊潰德國，再對日本決戰，屆時英帝國所有部隊將儘速趕進東進攻日本」（十一月日吉爾演說），然爾這只是戰略上的先後，而不是對於歐亞戰線有所軒輊，關於這一點羅斯福總統說得較爲明晰，即：

「吾人毀滅歐洲與非洲等蠻力之決心固完全一致；吾人對於日本人之政策與對於納粹敵人之政策完全相同，此即在一切戰場猛烈作戰，并無條件投降之爲妥協條件。儘速結束戰爭。一。當言之，即「一而便希特勒趨於毀滅，何時使日本困於作戰」。怎樣使日本困於作戰呢？

「吾人不希望僅在廣火之太平洋上，從此一島

至彼一島以浪費最後幾個月日本之時間，而將採取偉大而決定性之行動，將侵略者驅出中國土地之重要之行動將在中國及日本本部之天空進行之。雖然我們認爲此一島至彼一島之海上鬥爭是破壞日本的作戰程序中的重要環節之一，但不致至於浪費；不過值得我們警惕的是，英美二大領袖都更中了加強後進，擊潰日本的既定政策，作戰程序上或有先後，而戰爭却只是一個戰爭。

怎樣使希特勒趨於毀滅呢？

在歐洲，不啻是爲了加強蘇聯也好，爲了肅清北非的船艦威脅都是必要的，因此加強反潛艦戰爭便成了英美在歐洲反政計劃中第一道課題；英美必須打勝了交通戰，才能在大陸有所作爲，英美的地理環境決定他們不得不如此。

其次，正如同在亞洲，英美必須加強援華組織反攻，擊潰日本的一樣，在歐洲，加強援蘇是他們在歐洲作戰程序中的基本工作，尤其是在蘇聯紅軍舉行的反攻已趨爲同盟國進出了空前有利的反攻條件的今天，或吉爾首倡說：

「吾人目睹蘇聯之戰爭及蘇軍之偉大收績，如在全之良心中，而不確然竭人力之所能及，使英美軍隊以最大之速度與力作最大規模之行動，則余誠將感覺落後矣。」

援助蘇聯首先是物資援助，但是最緊要的還是開闢歐洲第二戰場，而這一方面固然是爲了減輕蘇聯壓力，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英美自己，爲了共同擊潰希特勒。沒有入敢於預言英美什麼時候或大在什麼地方開闢第二戰場；不過，根據當前現實形勢，每一個人都能了解，除了開闢第二戰場，英美必須首先肅清突尼西亞的軸心部隊，在這一重慶上，我們也可以說卡港會議就是如何解決突尼西亞的一個會議。卡港會議閉幕後，北非英美法聯軍統一指揮的確定和法國開始出動的初步解決都是

這一決定是直衝敵人的要害。英美首創報告，在突尼西亞的軸心部隊有二十五萬，雖然英美已使軸心部隊喪失其越過海洋通突尼西亞的各項軍事的百分之三或三分之一，軸心國家對於突尼西亞的部隊不放縱，而英美亦正在加強圍攻突尼西亞的部隊的實力，決定性的戰鬥不久即將展開。只有當突尼西亞的問題解決了，卡港會議決定的所謂「九國聯合計劃」才能在我們眼前一一展開；和羅斯福總統說：

「本報在我們眼前一一展開；和羅斯福總統說：

我們確信「在本年告終之前，全世界必將將希特勒會議將產生大變局，對於德日愈趨愈趨。這一切問題，當前的問題不啻是坐而論，但是起而行，不啻進攻，而是一加強進攻的「刀架」，「一掃早進攻的日趨」，猛烈進攻，迅速進攻。」

馬不停蹄的進攻！毀滅法西斯，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正如同戰爭造一戰一戰，和平也只有一個；反法西斯的戰爭，民主的和平。這就說得好：

「全世界能自由選擇之國家，均不啻自願生活於法西斯政府，納粹形式政府或日本軍閥形式政府之下。此等形式均爲自由被剝奪之後，攫取政權而產生者。聯合國家對於此等政府形式，可以簡單之字句形容之，即「不再發生」是也。大西洋兩岸所包括之自決權並未包括有任何國家之政府均有從事大規模屠殺之權利，或以其本國人民，或以世界其他任何民族爲奴隸之權利，全世界都可斷定此一全面戰爭（此種全球生命之犧牲）決不能爲是爭目的或甚至爲使吉斯林或俄代無辜在此地球任何區域保持權力之最後理想而予以繼續」（羅斯福總統十二日演說）。

我們完全同意美國總統對於大西洋兩岸的這一新肯定；民主國家的作戰與和平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徹底消滅一切法西斯，建立真正的民主；法國「不再發生」，主權「僅在英法」，一個戰爭——反法西斯，一個和平——民主。

（梨）

（二月二十二日）

論蘇軍勝利反攻及其意義

曹蒙

斯大林格勒是着如其實的地震的中心。

繼空前偉大的斯大林格勒包圍戰滅亡的結束而展開的蘇聯紅軍的勝利反攻，不但震動了整個德蘇前線，搖撼了柏林和羅馬，迷惑了東京，而且改變了這一個戰爭的全部面目；一九四三年消滅希特勒，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希望了，斯大林格勒的大地應打開了到柏林，羅馬和東京的大門。

在戰爭發展的過程中，蘇聯紅軍的勝利反攻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斯大林格勒區蘇軍發動反攻起至今年正月二十五日蘇軍攻佔伏羅內茲舊城止，第二個階段從正月二十五日斯大林格勒區蘇軍發動反攻起，至目前的發展正是第二階段反攻的勝利展開。在第一階段，蘇軍反攻的主要目的在消滅德軍主力，解放一九四二年德法西斯匪幫所佔領的三大突出地帶，而在第二階段中，消滅德軍主力的目的雖未變，但是紅軍反攻的地區已經從一九四二年德軍佔領區，進入到一九四一年德軍佔領區了，第一個階段是解放高加索和頓河流域之戰，而目前則已決定的進展到解放（首先是）烏克蘭和西伯利亞之戰了。從解放德軍那年的佔領區的領區的時間上說，那是從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一，從解放德軍那年的佔領區的空間上說，那是從高加索——頓河到烏克蘭——西伯利亞。頓河的怒吼聲和頓河的怒吼，慢慢的但是不可抗拒的打成一片，而且那怒吼聲傳到更遠的地方。

總一九四二年（至今年十一月十九日蘇軍發動反攻時止），德國法西斯匪軍們在戰場上所獲得的成就是在北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州形成兩大突出地帶，在北高加索尚未達到格羅斯尼油田裏一滴油，在斯大林格勒州裏未能佔領那法西斯們早已宣佈在他們使中的「鋼鐵」，更談不上突破斯城，迂迴莫斯科了；法西斯匪軍們的戰略是從頭至尾是準備進攻了。

不但如此，「由于連續兩季——德領產油區和包圍莫斯科——德國法西斯匪軍們因而陷于困難的境地了」（一九四二，十一月六日，斯大林報告）。

困難到什麼程度呢？蘇聯紅軍自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起在斯大林格勒區的大反攻解答了這一個問題，斯大林格勒區之役中德軍三十三萬被擊潰的事實解答了這一個問題，北高加索之役中二十幾萬德軍被擊潰的事實解答了這一個問題。

斯大林格勒區的反攻發動于十一月中旬，中間經過了好幾個階段的發展（自十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初，在斯城外圍圍城；自十二月初至正月初，在頓河流域及斯城西方圍城，使敵軍不能脫圍和馳救），到了正月初，斯城區德軍實際上已完全被圍了。接着，蘇軍在德軍後方的兩翼就發動了兩次光輝的反攻：在北翼，蘇軍于堅強奮戰之後，攻佔了馬斯城（正月一日）；而在南翼則開始了北高加索的反攻，收復奧利西斯（即日）展開了北高加索反攻勝利的第一頁；南北兩翼的反攻勝利，互相輝映，正月十八日列寧格勒解了圍，而北高加索的捷報則有如雪片飛來。其時，斯大林格勒區蘇軍于正月十日開始對包圍中德軍的殲滅戰，到正月下旬，無論是在北高加索區或斯大林格勒區，蘇軍反攻的勝利結果都已在望了。

正月二十五日，斯大林格勒區長特魯索夫報告說：「紅軍在斯城大的陣線上突破德軍防線，擊潰敵軍一百另二師，捕得二十萬以上俘虜，繳獲大砲一萬三千尊以及大量其他作戰物資，向前推進四百公里，我軍已獲得重大勝利，我軍攻勢在繼續展開中，我軍在西南方——南方，頓河，北高加索，佛羅內茲，喀爾斯，佛爾霍克和列寧格勒各路的紅軍戰鬥員，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們在斯大林格勒，在頓河，在北高加索，在佛羅內茲區，在大馬城以及在拉多加湖以南對德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奴僕們——蘇聯國庫所取得的勝利……向前邁進，擊潰德軍佔領區，把他們逐出我們祖國的疆界！」把法西斯侵略者逐出蘇聯的國境——這是一個勝利的號召，在這一個號

之下，蘇軍的勝利更以前進了一步。和斯大林的時候同時，德軍內政方面蘇軍（此方面蘇軍反攻發動于十三日）克萊斯佛內政的舊城，這是德軍一九四三年所開夏季攻勢開始時所佔領的一個據點——它的陷落是德軍進入一九四三年攻勢的起點。它的收復則指明蘇軍的反攻已經從解放一九四二年德軍佔領區開始結上了解放一九四一年德軍佔領區的階段了。

二月二日史達林的斯大林格勒的包圍戰最後結束，緊接着，羅爾斯克（八日）羅斯托夫（十四日）和哈爾科夫（十六日）先後掛起了紅旗。蘇軍粉碎了德軍一九四一年就已開始經營的據點（德軍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佔領哈爾科夫），及後的洪水在拘烏克爾奔流。

二

現在，我們進一步展望蘇軍反攻前途之前，先分析一下蘇軍勝利的意義。

這不是一個尋常的局部勝利，這是蘇聯蘇聯戰爭形勢改變的開始。我們知道蘇聯戰爭到現在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到同年十一月初，在第一階段中蘇軍退避；第二階段從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初，在這一階段中蘇軍退避；第三階段從一九四二年五月初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在這一階段中又是蘇軍退避；而目前，第四階段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起，則又是蘇軍進退。不過，正如向第三階段中的蘇軍進退不同於第一階段中的蘇軍退避的一樣，目前，第四階段中的蘇軍退避，其規模在基本上不同於第二階段中蘇軍的退避。

在開戰最初的五個月裏，德軍是怎樣能獲得某種地域上的進展的？設想而且最重要的因素是德軍的意外性，德軍早已完成了動員，而蘇聯的動員則剛開始；這二個因素支配了開戰之初的幾個月，形成了對德軍有利的決定因素之一。此外德軍還有兩個優點是不容我們忽視的，那就是德軍在兵力和裝備上的優勢。裝備方面特別是坦克和飛機的優勢最為重要；表現在部隊的構成上，德軍機械化部隊和動力化部隊在全作戰部隊所佔的比例在蘇軍之上，每一個部隊所能得到的空軍支援亦比蘇軍為多——雖然德軍的坦克和飛機自身在質量上遠不如蘇軍的坦克和飛機；表現在作戰上，則為德軍的運動力較蘇軍強，它比蘇軍更迅速地在決定的一點集中更大的兵力；因此我們看到在運動戰中德軍時常佔到暫時的優勢，而到戰爭一發

展為持久的爭奪戰時，德軍的優勢馬上就消失了。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保衛戰中，德軍的運動戰術——坦克失了靈，而蘇聯的掘壕却發揮了強大的威力。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斯大林總結了第一階段的蘇德戰爭得出了如下的教訓，他說：「（除掉了歐洲沒有第二階段的出現德軍兵力佔絕大優勢而外）我軍（指蘇軍——以下同）暫時失利的原由是我們的少數調當數目的坦克和部份地缺少適當數目的飛機。在近代戰爭中，沒有坦克和飛機的保護，步兵是很難作戰的。我們的飛機在質量上優于德軍的，我們空軍的飛行員已經在他們光榮的戰績裏，證明了他們是無畏的戰士；不過，我們空軍飛機還是比德軍少。我們的坦克在質量上優于德軍的，我們光榮的坦克手和炮兵已經不止一次把那些擁有更多坦克的德軍趕出去；不過我們的坦克馬力的還是少幾倍，這裏就存在着德軍暫時成威的秘訣。

「只有一個方法能取消德軍的坦克優勢，而基本上改善我軍的地位，那就是我們不但要獲得地增加我們的坦克生產，而且還要大大地增加我們的反坦克飛機，用坦克槍和砲，以及坦克手榴彈和臼砲的生產，儘量減少可能的坦克陷阱和阻礙障礙物」。

換句話說，在戰爭的第一階段中，德軍之所以能獲得成功的原由，一方面由于歐洲沒有第二階段的出現，德軍能對蘇聯的防禦自己和他國防禦的部隊到前線造成兵力上的優勢；另一方面則由于它三項裝備上擁有更多的飛機和坦克——特別是坦克造成了火力和動力，特別是在動力上的優勢。火力和動力屬於作戰機構上的質的一面，兵力優勢是屬於作戰機構上的量的一面；而作戰能力的總和則等于兵力火力和動力三者相乘之積；在第一階段作戰中，德軍不但在量上有作戰機構上的優勢——兵力上的優勢（雖然紅軍戰鬥的素質和它比較起來有天淵之別），而且還有質的優勢——動力上的優勢。

到了第三階段的作戰，由于第二階段的消耗和蘇軍坦克飛機生產的增加，德軍在作戰機構上的優勢已不如第一階段的顯著了，而德軍之所以仍能在一路獲得某種進展者主要地是因為他集中了一路，造成兵力上的優勢。表現在作戰上，第三階段的特徵是德軍的運動範圍已不復如第一階段之廣，而每個戰鬥的性質已帶上更多的陣地戰的性質了。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德軍在第一二兩階段中消耗之巨大，它的力量的優越和蘇軍力量的生長，另一方面則表示，由於德軍大量坦克武裝的使用，蘇軍坦克的增加，戰爭

的補給基礎已經改變，光榮已不完全是屬於德軍。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德軍所願以獲得的進展者，大抵都是因為兵力上量的優勢，雖然這優勢已日漸其小。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斯大林總結第三階段的作戰特徵道：「東歐洲沒有第二種之類，德軍和他們的同盟軍，把他們一切可能調的後備隊都調到這個戰場上來，把他們集結在西南路，形成了兵力方面很大的優勢，並且取得了大體上的戰術的成就。很明顯的，德軍已不強大了，不足以在所有三路，在南路，北路和中路同時進行攻勢，像去年夏季德軍攻勢的最初幾個月中的那種情形了；然而，他們還是強大的，他們還是強大得足以在某一點組織猛烈的攻勢的」。

由於在第三階段中，德軍「追擊的夢見子」的後果，德軍的企圖是極慘地失敗了，而且前線軍的進攻，在蘇聯軍隊的發展過程中，正是建築在德軍作戰機械在兵力和裝備上的優勢日趨消失了。戰術形勢「困難」不堪，士兵意志逐漸動搖的基礎之上。

德軍在兵力和裝備上的優勢是怎樣逐漸消失去的？

由於希特勒對戰局的錯誤，由於這一戰線所產生的不能挽救的巨大的消耗。德軍是以其對戰局錯誤的，它會以此而為歐洲；但是那時他的對手是歐洲國家，而現在卻是蘇聯；它是德軍前線的英雄，但是在真正的英雄之前，它却是一隻綿羊。攻勢戰術成功而秘密戰術以較大的戰役中的犧牲完成更大的戰術上的包圍戰；不如此，第一次歐戰時攻勢消耗大於守勢的法國（第一次歐戰時攻勢消耗大於守勢的法國）第一階段作戰中，德軍是不斷被包圍而殲滅多少的，但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底至十一月初的這五個月中，實際上德軍沒有完成過一次真正的包圍戰。從前德軍不得不忍受攻勢的犧牲，而卻得不到攻勢成功的果實。德軍大抵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的報告，第一階段中，德方損失（陣亡，失蹤及受傷）為一、七四〇、〇〇〇人而德方損失則為四、五〇〇、〇〇〇以上。德方損失與蘇方損失之比約為三比一，和前一美歐戰時的比約為三比一。在第三階段的作戰中，我們沒有確定的數目字可資引證（據斯大林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的報告，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起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德軍損失在八、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不過由於這動戰在這一個階段裏所佔時間的短促，斯大林格勒的光榮的堅持，戰爭的技術基礎的改變

，戰鬥的更加複雜化，在蘇聯損失的比例中，你誤問的，德方的損失是極高的，最低限度應當在三比一左右。

正如同德軍在西南路中一團突破，包圍，殲滅的攻勢戰時是徹頭徹尾地失敗了的一樣，德軍在時間上集中一點，空軍遠征隊實際作戰時間，確實休息補充時間，準備集中最大可能的兵力於第二次攻勢上的時機是同樣地失敗了。我們知道，在一九四一年緊接着德軍所謂「停止攻勢」之後，蘇軍發動了第一次的冬季反攻，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斯大林總結第二階段作戰的經驗道：

「由於紅軍的勝利，我們（蘇聯）以下同）偉大的愛國戰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使前線利用冬天期間作為休養和在我們的防禦線上組織的企圖是失敗了。在它的攻勢過程中，紅軍消耗了敵人的兵力和裝備的巨大部份，俘獲了不少敵人的裝備，逼着敵軍（蘇聯軍用者加）消耗了準備在夏季應用的從後方調來的後備部隊」。根據前二次歐戰的經驗，最好的進攻形式是反攻，因為在「攻勢防禦」以及「攻勢防禦」中，反攻是可以在攻勢防禦收得守方消耗小而攻方消耗大的果實，又可以使敵人耗其巨大的消耗，力量薄弱的條件下，攻勢是攻勢的戰術效果，雖然蘇軍第一次的冬季反攻，由於兵力的懸殊和裝備的不足，還不能取得重大的戰術效果，但是在消耗德軍主力，逼使它不得不早日退出它的攻勢戰線，粉碎了它在時間上集中一點的戰術上，它是光輝地成功了。不獨如此。在第二階段作戰中，蘇軍還發動了：「德國法蘭西戰線」的進攻，却具有在戰術上的優點（重點引用者加）給予蘇聯軍隊有利的條件，可謂引起德軍的進攻（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斯大林報告）。雖然這時期蘇聯的攻勢戰術第二和第三階段作戰中沒有引起更重大的攻勢，但是這時期包含了蘇聯在第四階段作戰中的勝利的萌芽。

在這些中，蘇軍不但在戰術上獲得了進展，而且其戰術，一戰內說，德軍雖然佔了很大的代價，他則更獲得了不少土地，那些土地和土地上的設備和工廠最低限度可以用來以戰養戰；但是，其進攻不熱，蘇軍激進，總是把能搬移的工業設備搬得一乾二淨，搬不走的破壞，破壞不了的（包含一部份的工業設備，鐵道，土地和土地上的設備）組織蘇聯軍隊破壞，給德區人民自動怠工，弄得德軍在佔領區一無所得。例如，邊科普是德軍營在已

久而且的確使他們佔領了半年左右的，但是最近這科費的克復證明了，由于蘇聯游擊隊經常的襲擊和破壞，德軍未能從這裏得到一滴油珠。不獨此也，青島活圍在德軍後方的廣大游擊戰區不但不能使人以戰事，而且不斷威脅着他們的交通，毀滅他們的給養，打擊和消滅他們的兵力，使他們沒有一刻喘息的時間。這些都是無從計算的對於德軍的消耗，然而在質上却是轉變力量對比內決定因素之一。

一方面是在嚴厲的消耗，另一方面是飛躍的增進，和德軍的力量消耗成比例，蘇軍的力量在相對地加倍增進着。關於開戰以後蘇聯後方生產增加的情形，我們沒有確切的正確的數字可資引證，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位中立觀察者的意見，他說：

「希特勒對蘇聯之貯備素表懷疑，而德人之一般印象亦認爲蘇聯國營工業區所佔地的三分之一業經損失，它便沒有復蘇之望了。然而事有大不然者：在以前是靠着工廠動員的，而今天則無婦女參加動員，敵人對於這般工人婦女的估價甚至比對士兵還低；但是由於他們的辛苦努力和犧牲，生產力爲之大增，而蘇聯的戰時工業得以在歷史上空前的大戰中維持不墜。蘇聯人士宜稱他們可以在六個月以內把一切工業改爲適應戰爭之用，而在希特勒却非六年不辦。根據蘇聯設計委員會工人雇用組主任報告，在一九四三年，蘇聯技術工人之數字，當較前益見增加。蘇聯損失之大，惟有中國差可比擬，但目前它們軍火飛機之產量，竟能超過戰前」（史諾：蘇聯的戰時生產，見一九四三，一月二十一日「費城星期六晚報」）。

由於德軍在作戰期中巨大的消耗，由於蘇聯在作戰期間力量的增進，過去蘇德（及其附庸國家）間兵力和裝備上的懸殊，是接近地（還不是最後的），德軍在兵力和裝備上直至現在還享有優勢，不過那優勢已經大大地減弱了，減弱了，這是這一次蘇軍勝利反攻的物質基礎。

其次，我們不能不稍加分析一下這一次對蘇軍勝利反攻有利的技術條件。一如以上之所分析，在蘇德戰爭第一階段的作戰中，德軍擁有坦克和飛機多於蘇軍的決定優勢。到了第二階段作戰，蘇軍發現了德軍「具有嚴重的組織上的缺點，給予紅軍若干有利的條件」，雖然由於敵人的優勢兵力，未能將這一有利條件「轉變爲決定性的有利條件，但在第三階段的作戰中，德軍這一嚴重的弱點已經暴露無遺，在這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它的裝甲部隊和步兵隊的合作中，步兵成份的薄弱，而另一方面由於反坦克武器發

用的普遍化，步兵的作用却是提高了；另一種形勢發展下去，終於使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大勝利形成了「蘇軍步兵的大勝利」（崔可夫將軍語）。其時，在戰爭的考驗當中，蘇聯紅軍不但光輝的打擊了敵人這一弱點，而且在技術上獲得了一項作戰經驗，改變了近代戰爭的技術基礎，那就是動力化砲兵的大量配備和使用，這一經驗本來是他們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在莫斯科附近的反攻中就已獲得的，但是它的大量應用却是在這一次反攻的基本特點。在第一天敵軍中，由於砲擊的普遍使用，造成了陣地戰的物質基礎，坦克的發明突破這一形勢；在第二次敵軍，特別是蘇聯戰爭中，坦克的優勢效果逐漸爲反坦克武器（包含陷阱在內）的普遍應用而削弱，戰爭又有趨於陣地化的傾向；動力化步兵和砲兵則有起而突破這一傾向的趨勢。兩條不同的路徑可以同樣達到砲兵動力化的目的，第一，是加強重坦克的生產，提高它在一般坦克部隊中的比例，把坦克上使用的砲位加重，第二，把砲兵動力化；無論從那一條路徑出發，蘇聯紅軍都具有基礎；我們知道，紅軍是素來重視砲兵，而在坦克的製造和使用上，比較更重視重坦克的性能（和德軍重視輕型和中型坦克以及以空軍代砲兵的理论完全相反）；因此紅軍把動力化砲兵發展爲大量使用的武器正是蘇聯作戰經驗進一步的發展。在這次光輝的勝利反攻中，配合着英勇的步兵，動力化砲兵發揮了絕大的威力；關於這一點，倫敦泰晤士報軍事記者曾經表示過如下的意見：

「蘇軍戰術顯比德軍優越，此種給予砲兵部隊之價值，絕不下於德軍之失地。東線似已發展至一新階段，兵力配合之新方式，蘇軍已創造成功。砲兵之優越久爲蘇軍之特長，今因砲兵動力之增加及蘇軍將領利用此優點之更加勇敢，已變爲決定因素。蘇軍前鋒中之若干部隊會爲參加保衛莫斯科之役而獲得榮譽者，上述優點之一部本爲其所棄具，今則由其他部隊根據新方法加以運用，德軍之戰術更相形見絀。德軍用以阻撓蘇軍之工事，在蘇軍堅韌不拔之大砲下，迅告破碎，德軍防守部隊原有支持數月者，數日之內即被克復，撤退之德軍，常見其退路爲蘇軍所遮斷。此種實戰中之優越性可使人以爲：最近之勝利可爲完全勝利之試金石」（十五日倫敦路透電）。

在一定的限度之內，這種意見是正確的。在這些基礎之上，蘇聯紅軍建築起輝煌的勝利的宮殿。上面我們說過，德軍的攻勢，由於它不能取得戰略的效果，其結果是德

軍的消耗總達三倍於蘇軍，在作戰過程中，這就表現為：在決定的一點上，德軍的進攻既不能突破，亦不能包圍，更無從殲滅——戰場上的迂迴更談不上。蘇軍的攻勢却正好與此相反，蘇軍這一次的反攻從開始的第一天起就以側擊包圍的形態出現，由無數戰術上的包圍殲滅戰形成了空前偉大的戰術包圍殲滅戰。在斯大林格勒戰區如此，在北高加索如此，在頓內茨盆地亦莫不如此——其結果是蘇軍以極少的代價完成了空前的勝利。這要現在敵人的估計數目的成份之高和被擊潰的師團之衆上。在斯大林格勒戰區的包圍殲滅戰中，紅軍就擊潰了德軍三十三萬，而其中被俘者就佔了九萬之多，將該軍官被俘者則達二十四名。在北高加索的反攻中，我們雖然沒有確切的數字（那裏的戰爭尚未結束）可資引證，不過，據一般形勢推測，被圍在那裏的二十幾個師團很難有逃出戰場的可能的。羅斯太林一月二十五日文告，自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今今年正月十九日的二月反攻中，紅軍已擊潰德軍一〇二師，佔其在東線總數二四〇師百分之四〇，在現當中被擊潰俘獲者達二十萬而其陣亡總數則達五十餘萬；換言之，在其被擊潰的一〇二師中，被殲滅者當在百分之四〇左右——這在戰爭史上固然是空前未有的現象，而和德國的攻勢結果比較起來，則殆顯出異樣的光輝。

這種空前偉大的勝利一方面固然有它一定限度的物質和技術上的基礎，然而在真正的作戰過程裡，蘇軍最高統帥斯大林委員長大膽而穩健的戰略決定，窺見而適當的作戰計劃，實起着決定的作用，這有如斯城保衛戰的英雄壯舉可與將軍之所說「這是斯大林打敗了希特勒，因為貫串斯城大膽的三階段，斯大林是親身領導這些攻勢戰鬥的」；事實上，這不獨於斯城之戰為然，在目前所有蘇軍的攻勢戰鬥中，斯大林都是領導着的。

在這種輝煌的戰鬥中，我們不但看到了斯大林遠見之縝密、穩健而大膽的計劃，而且看到了蘇軍指揮官們光輝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的英勇和練達。沒有驚人的組織天才，這種龐大複雜的作戰計劃是不能貫徹的。這首先是在現存各路軍隊在廣大地區上若合符節的配合作戰上。由於近代戰爭運動性的加劇，一個大規模的包圍殲滅戰的完成非常困難，被包圍的部隊太龐大，作戰地區太廣泛，敵人隨時隨地有突圍的可能，要完成一個大規模的包圍殲滅戰，非有關於各路軍團而靈活的配合作戰不可；紅軍指揮官證明了他們尤有這個能力。在斯城之役中，我們知道參加作戰的就有三方面軍：葉果門科將軍指揮下的斯大林格勒前線部隊、高利科夫將軍指揮下的佛羅內茲前

線部隊和羅科索夫將軍指揮下的頓河前線部隊，總共成於西南路總指揮瓦圖丁元帥。斯城之戰如此，緊跟着斯城之戰展開的兩路戰鬥亦莫不如此。羅斯托夫和哈爾科夫的光復都是在幾方面軍配合作戰之下完成的。

然而單從正確戰術計劃和任務的勝利進行着，還不能道破紅軍反攻勝利的秘訣。經過了二十個月實際戰鬥的教訓，在戰術上，蘇軍已經獲得了空前的成就，這首先是表現在各兵種的協同動作上；在這裏：空軍和砲兵（特別是動力化砲兵）負着巨大的任務，這非破壞敵人交通，阻止敵軍增援，摧毀敵軍防護的三大主要武器；其次是坦克和動力化步兵，它負有側擊敵人兩翼，深入敵軍後方，完成側面包抄的主要擔當者；再其次是步兵的實際戰鬥。在這一序列的各兵種的協同動作下，蘇軍戰術上的特點，和它的戰略一樣，同樣是避開正面攻擊，而採取側面包抄，深入敵軍後方，瓦解敵人，使其首尾不能兼顧，處境陷入包圍的境地。完成這種戰術，每一個作戰士兵都有高度的機動性是不能想像的。斯大林格勒的包圍殲滅戰不但是蘇軍作戰的一個戰術上的典型，而且是一個戰術上的典型。蘇軍反攻的劍頭所到之處，那裏就會出現斯大林格勒的陰影，斯大林格勒無所不在。

至於蘇軍戰士們作戰的英勇和練達，個人的和整體的自覺犧牲精神的發揚，那更是早就寫上歷史的篇章，成為萬人敬佩的對象了。事實上，在整個戰爭中，蘇軍戰士的戰鬥素質就是蘇軍戰術的一個決定因素，然而這方面備和兵力優勢的壓力之下，蘇軍戰士的英勇雖然提出了可歌可泣的史詩，但是未能獲得充分發揚，爭取決定勝利的機會；現由於各個力量對比的開始改變，作戰技術基礎的改善和作戰經驗的積累和利用，那象徵着第一期紅軍作戰能力發展到最高峯的「赤色騎兵迂迴進沙」的軍運已經不是不可能了。

二

蘇軍勝利反攻的意義和特點既如上述，蘇軍反攻的前途又怎樣呢？

目前，由於哈爾科夫的克復，德軍在南路所據有的最大據點已經沒有了，繼在蘇軍眼前的課題是，包圍和殲滅哈爾科夫——馬留波爾一線以東頓內茨盆地二十五萬德軍和庫班草原諸佛羅斯克附近的德軍殘餘部隊；其時，哈爾科夫方面蘇軍正在向西南波羅太瓦攻擊前進，而庫羅斯克方面蘇軍則在向奧萊爾包圍，奧萊爾一克復則莫斯科——奧萊爾——庫羅斯克——哈爾科夫——羅斯托夫的大動脈即將暢通無阻，蘇軍反攻的前途將是無限制

的擴大了，不僅南方的邊境是在蘇軍反攻的情願之內，即是北部的瓦爾台山一帶，中斷斯捷斯和自利安斯莫不有隨時反攻烽火的可能。

在目前的形勢下，根據蘇聯新徵，希特勒在蘇德邊境似有轉而採取守勢在邊境以東，蘇伯河河一帶全圍住關橋，而西不可為，德軍的最後防線只須移到歐羅巴河——有里河——新斯河一線了。最近外訊所傳關於德軍在波羅的海諸國，東部波蘭和羅馬尼亞邊境建築防禦工事的消息正顯示着這一線。自然，希特勒在蘇德邊境所採取的防禦之為攻為守，將大大地影響着蘇聯的形勢的發展；而且，一方面德軍的進攻，則戰以來最嚴重的失敗，它的主力還沒有完全垮台，官足之由死而不屈，愈是絕望，愈是掙扎，另一方面蘇聯的力量雖然在驚人地增長了，但也還沒有達到決定的優勢——我們不能忘記一件事實，德國擁有全歐洲的人力和資源，而蘇聯直道現在還是在單獨作戰；——不過，我們相信，在蘇軍反攻的鐵錘不斷的打擊之下，在同盟國全力的共同努力之下（特別是南滿北非，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不管希特勒採取怎樣的策應，今年蘇德邊境形勢是確定了。

X X X

斯大林格勒是一個其地處中心，以斯大林格勒為起點的蘇軍勝利反攻的大地，不想發動了蘇德邊境前線，抽離了柏林和羅馬，迷迷了東京，而竟改變了這一戰線的形勢。它向全世界展示了法西斯的同盟國提出一個口號：「一九四三年消滅希特勒！」這一個口號就顯露出當前的行動任務，在西方（對英美）是一滿清奧尼斯——開闢第二戰場，一在東方（對中英美）則是一解放滿洲——加強邊境，組織反攻。

我們說希特勒的反攻不斷勝利，紅旗蘇聯的插上羅斯托夫，哈爾科夫和庫爾斯克的戰線，我們自不禁歡欣鼓舞，不過，對於我們，最重要的還是蘇聯的防禦和反攻一再地證明，只要以蘇聯努力，法西斯是絕無解決，而且必將是被打滅了的；蘇聯的哈爾科夫和羅斯托夫能收復，我們的武備和南京也可以收復，蘇聯勝利反攻的戰線不但重佔了他們自己，而且為全歐盟軍指示出一條勝利的路線；現在，是我們切實準備反攻的時候了。

(二月二十日)

(上接第九頁)

民國三十一年國慶前夕，英美通知我國取消領事裁判權。到了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分別簽訂新約。新約的內容，是取消李伍伍所規定的英美在華特權。從這一天起，英美就放棄其在華特權，租界及領事裁判權，軍備自由輸入權，領事裁判權，通商口岸特權，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權；外籍引水權海關稅關用客等。在這些，關於領事裁判權，因為一九二八年中英國稅新約，已在法律上，承認中國領事裁判權。所以廢除不談。如果將九龍香港的問題置之不論，那末，中英中美新約的確把中國自來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從政治上基本上解除了。不過，在法方面，尚口津漢膠濟與平漢鐵路等，尚未提到，而關於財產部分的權利，則仍有一方的權利。還在法律上給了一些保障。這都是有待於我們的努力，而待於今後的磋商。

中英中美新約在法理上奠定了中國在國際間的平等地位。我們解決經濟文化問題以合理的基礎。如果大家都能善於利用這新的平等地位，才可以獨立自主自強，才可以自由。的自強，努力於自強與自強，在政治上，力求進步，加強團結；在軍事上，加強動員，加強反攻；在經濟上，扶助民族工業，提高戰時生產，那末，我們就能克服困難，更使的把日本強迫趕出中國。而且，只有這樣，才可以在國際上享受對等的權利。一些利益；才可以在利用外交的時候，不致再陷於阿爾巴尼亞的悲劇。

抗戰成功之後，在開發中國資源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外交，必須歡迎外資；但是，過去那種讓與中國元氣的做法，那種讓與主權的形勢，那種不合於中國國策的外資活動，是不能繼續下去的。這就是說，以及外人的投資，必須以不損害中國的主權為前提，外資所經營的範圍，必須受中國政府的監督指導。至於將利用外資的方式、方向與技術範圍，那更須要我們更精細去考慮的，致略而不論。

日本強國的變弱，美列強在華的經濟力量，發生着顯著的變化。它這種明目張膽的行動，分明是欲把華北與華南殖民地歸於它的統治的。跟隨它的侵略戰爭的擴大，就英美在華的經濟力量亦被削弱了。但是，中國民族的抗戰與世界經濟的危機，是必然會打敗它。這一個肯定的決定所產生的新會肯定日寇經濟的崩潰，這一個不定的決定所產生的新會，並不是在國際上取得經濟合作平等地位的新中國。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而且也是必然的趨勢。

反法西斯的旗幟

陳坤元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德萊維十週年紀念——

(一) 反希特勒統治的鬥爭的前奏

十年前，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年，有一個人單槍匹馬，出現於恐怖森嚴的德蘭萊布齊法庭上，他高舉着反法西斯主義的大旗，智勇地和全副武裝的法西斯作頑強的搏鬥，得到了輝煌的勝利，這個人就是共產國際的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同志。

一九三三年德國國會選舉前的八天（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法西斯卑劣的陰謀家縱火焚燒國會，想利用焚燒國會的烟霧，迷惑世人的眼目，嫁禍於德國共產黨。於是，白色恐怖展開了。法西斯瘋狂地拘捕德國共產黨的領袖和黨員，搜查德共中央機關，宣佈「發現了幾百個主張破壞的傳單，找出了用布刺殺希特勒方式，採取共產主義的恐怖步驟的訓令」。在這一白色恐怖的逆流之下，於三月九日，他們逮捕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希特勒饕餮的謀臣策士們費盡了心機，做好了精巧的陰謀陷害的準備工作以後，於九月二十一日，在萊布齊開庭，審判季米特洛夫同志了！他們企圖利用這個審判來打擊德國無產階級和德國共產黨，反對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國際！

但是，出乎法西斯的意料之外：季米特洛夫同志英雄的布爾塞維克的鐵拳，粉碎了德國法西斯帶一切卑鄙下賤的惡劣手段，使陰險的自以為得計的法西斯陰謀家的猙獰面目，在全世界人士之前原形畢露。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鬥爭，不僅得到全世界的工農與知識份子的贊揚，同時爭取了廣大人民羣衆到革命的、反法西斯戰線方面來。在全世界勞動羣衆空前的憤怒與示威之下，法西斯不得不於十二月廿三日宣佈季米特洛夫同志無罪。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季米特洛夫同志乘飛機返俄，乘機飛機，回到了莫斯科。這就是當時轟動全世界的德國國會被焚案和萊布齊審判案。這個案件是希特勒剛上台時第一個可恥的失敗，是全世界人民反希特勒主義鬥爭第一個光榮的勝利，這個勝利，顯示出工人階級反法西斯的聲威和力量，同時表明了法

西斯統治的殘暴和無恥！

今年三月九日是季米特洛夫在德蘭萊維被捕的十週年，二月二十七日是他獲得自由後回到莫斯科的九週年。

(二) 季米特洛夫審判了希特勒

希特勒的惡劣手段破產了，季米特洛夫的光榮勝利了，當時一個外國報紙評論說：「在萊布齊法庭上，不是希特勒審判季米特洛夫，而是，相反，季米特洛夫審判了希特勒！」是的，季米特洛夫戰勝了法西斯，審判了希特勒，但是他究竟是怎樣戰勝和審判的呢？怎樣在這幕歷史的演出中，把法西斯法庭，變成革命宣傳的講壇呢？這是異常豐富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大家好好的學習！

首先就是大無畏的勇敢和剛毅的精神，爲主，爲主義，爲革命事業奮鬥的自我犧牲精神，法西斯的手段，恐怖，威嚇不足以撼其志，因社黨律師的龍辯更不足以動其心，「我寧願受冤屈而被判處死刑，却不願有那樣的國社黨律師而得撤銷罪案」。在法庭審判這個過程中，他一貫的理直氣壯，毫無所懼，誰令人不能忘記的是在法庭上，當衆斥責普魯士總理戈林，嚴厲指責戈林的面孔說：「戈林先生啊！你該怕我提出的問題。」使戈林及法西斯黨徒們驚惶失措！不難設想，在希特勒那樣的殘酷統治下，一個經不起威脅嚇，就意志動搖，理智喪失的人，一個胆小如鼠，意志薄弱的人，一個一經恐嚇就嚇得像綿羊，盡得像豬狗一般的人是堅強不屈的，是不配成爲革命家的。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勝利，正由於他具有臨死不懼的剛毅與勇敢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法西斯法庭無措，使世界人士讚嘆不已。季米特洛夫初到莫斯科，回答一個新聞記者問題時說：

「是的，我在萊布齊法庭上的鬥爭是艱苦無情的，是自始至終遊歷二頁的，你們都稱道在法庭上的勇敢，稱道剛毅的行爲，臨死不懼，這

不是個人的英勇精神，這裏正是共產黨員，革命無產階級，布爾塞維克的本質。資產階級不能再在自己隊伍中產生這種勇敢和英勇精神。這個階級正日趨於死亡，不會再有將來的前途。

共產黨員的這種勇敢和剛毅精神，不是偶然的，而且僅僅具有這種英勇不怕死的精神是不夠的，季米特洛夫在為「台爾曼同志」一書作序時說：

「只是有革命的情懷不夠，還要有革命理論的武器，但是純粹的理論知識也還不夠的，要有不斷鬥爭以反對階級敵人，克服一切困難和危險，更能夠自己有革命的極端和鋼鐵，有布爾塞維克的堅強意志，剛毅堅忍。

只知道爲要達到共產主義的勝利而必要怎樣做，這還不夠；還需要勇於爲所當爲，應該具有決心，不惜任何犧牲，謀無產階級的利益。應該能夠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和行動，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利益。」

這是共產黨員修養的最主要內容，是共產黨員黨性的最高表現！也就是我們共產黨員目前整風運動的任務和目的。

(三) 戰勝法西斯的革命武器

要粉碎法西斯的陰謀，把法西斯法庭變成革命宣傳的講壇，變成爲揭發希特勒戈林等罪惡的舞台，不僅要善於「鬥勇」，而且更要善於「鬥智」。要智勇雙全并恰當配合。就是說：不僅要有布爾塞維克革命家的堅定，毫不動搖的意志，和大無畏的精神，而且要有馬列主義理論的最好的鍛鍊，不僅要有布爾塞維克的英勇精神，而且要有布爾塞維克的鬥爭方法，并能使兩者最恰當地配合起來。季米特洛夫同志正是這樣的模範。他在被捕審判的整個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有一種的戰略路線和戰術計劃。這就是：揭發焚燒國會的法西斯放火者，揭破他們的陰謀目的，精心抓住敵人的弱點，步步追擊，毫不放鬆，喚起與發動廣大德國的以及全世界勞動羣衆和正義人士來注意這事件，來進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鬥爭。

看吧，季米特洛夫同志，怎樣在法庭上實行自己的策略計劃：

「我是共產黨員，是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是共產國際執委，所以我根本反對個人恐怖，反對這類無意識的放火行爲，因爲這些行爲是同共產黨的基本原則，同其黨的工作方法，同其政治上經濟上的羣衆鬥爭——不能相容的，并且因爲這些行爲只有害於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有害於共產主義的事業……照我的堅固信念看來，焚燒德國國會只會

出之於瘋子或共產黨死敵之手，他們想用這種事件製造順利的空氣，以便破壞德國工人運動和共產黨，但是，我不是瘋人也不是共產主義的敵人……」

接着，他提出許多證人和材料，用真憑實據來證明：

「在這時期德共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是要進行日常羣衆工作，進行擁護工人和勞動者利益的具體鬥爭去奪取工人階級」又說：

「我在二月二十八日從慕尼黑到柏林的火車中，從報上看到國會被焚的消息時，我馬上斷定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人，他不用卑鄙手段誣陷別人的人，那就是精神上政治上都是尖銳的人，至少都是德國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的敵人，而現在我的指測，德國國會這種反共產主義的行爲，是結合政治上階級鬥爭和政治上的瘋人行爲而成的。」

這樣，不僅推翻了法西斯關於季米特洛夫同志本人的罪案，而且推翻了他們關於德國共產黨及其領袖的罪案，季米特洛夫同志更進一步要求傳集許多證人，搜集許多材料，來作證明而彼法庭拒絕時，季米特洛夫同志立刻說明這種拒絕，就證明法庭不願獲得真正放火焚燒國會的罪犯！季米特洛夫同志步步進攻，指着法官和戈林的面孔，提出許多問題，而又被法庭禁止時，便當堂聲明說：

「因爲我本無罪而偶然成了被告的人，更因爲我是共產黨員和共產國際執委，我就極願將國會被焚案件，弄得水落石出，并同時將指擊匪徒的「放火者」使其原形畢露。

我在法庭上的一切發言，只是爲了這個目的，而并非其他，我并不需要我在法庭上作宣傳工作，一切共產主義的論點，我都已經做過了，而且并不是我這番宣傳，做這番宣傳的，就是把無辜共產黨人當作焚燒國會的放火者而交給法庭審判，以及……「特別以內的」這些……等事實本身！」

這就是季米特洛夫同志在法庭上的「供詞」，這是一個絕妙的布爾塞維克的「供詞」，它是何等生動有力，何等深刻明確，就是這個「供詞」，便已把法西斯打得頭破血流，使它在光天化日之下，醜態畢露！

(四) 光榮的保加利亞工人階級之子

革命的國際主義與革命的愛國主義是一致的，季米特洛夫同志是模範的

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保加利亞人民的優秀的子弟和領袖。

季米特洛夫同志，於一八八二年生於保國一個革命的工人家庭，當他二十歲離開學校，去做印刷工人時，便積極參加了保加利亞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一九〇二年加入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三年社會民主黨分裂時，他積極反對改良主義派，堅決站在革命的馬列主義的旗幟方面，他是保加利亞全國總工會的首領，創造了革命的職工會，領導了工人羣衆的罷工鬥爭，一九〇九年被選爲保共中央委員，一九一三——一九一五年被選爲保共在國會中的代表，一九一四——帝國主義大戰時，他始終是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領導羣衆的反戰運動，一九一七年，因革命的反戰工作而被捕，在獄中繼續進行革命的反戰工作，一九一八年底被釋出獄，一九二〇年他被選爲保共執行局委員，一九二一年被選爲國熱執委，一九二三年九月，在保共領導下，實行了保國工農武裝起義，他便是這個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起義失敗後，他英勇地領導自己的隊伍，經過殘酷的戰鬥，退到南斯拉夫境內。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萊布齊法庭上，作第一次有歷史意義的發言時，他曾回答九月起義的問題，他說：

「我只可惜的是，我和我的黨在當時還不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因此，我們不能順利進行這次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有歷史意義的人民起義。我們的未有完全布爾塞維克化的組織、政策和策略，我們的缺乏革命經驗，尤其是六月九日軍閥法西斯政變時我們那種機會主義的中立態度，這些就更幫助長保加利亞殘民以逞的劊子手，攬奪國家權柄者，來壓迫羣衆起義。」

「但是，我們黨從這次流血事變中得到了教訓而能利用之，而且在共產黨指導之下的保加利亞工農的解放鬥爭，既得到九月起義的偉大經驗，就一直前進，而將達到最後的勝利。」

他是保加利亞工人階級的子弟，是保國人民的子弟，他痛惡保加利亞的法西斯主義者，但是他深愛着保國的勞動階級與人民大衆，當法官侮辱保國人民的時候，他很憤憤的提出抗議說：

「在這里還侮辱我國人民，稱我國人民爲『野蠻人』爲『未開化者』這使我不能默而不言。對的，保加利亞法西斯主義是野蠻人是未開化者，照實說來，別些國家的法西斯也是一樣。但是保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份子絕不是野蠻人，也不是未開化者……我決意不以我是保加利

亞人爲可恥，我很自豪我是保加利亞工人階級的子弟，即是那樣勇敢的反對法西斯主義，那樣勇敢擁護共產主義的工人階級的子弟。」

這地一個何等光輝的抗議！

但他同時是國際主義的模範，他在法庭上直率的宣佈：

「我實在熱烈崇拜蘇聯共產黨的人，因爲這個黨管理世界最大的國家（全球六份之一的土地），而且有偉大的領袖斯大林同志爲領袖，那樣英勇地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

（五）堅苦卓絕的學習模範

季米特洛夫之所以能光榮的戰勝法西斯主義，成爲國際無產階級的出色人物，不僅因爲他具有偉大的天才，優美的品德，而且由於他是個學求是勤勤學習和刻苦工作的模範，我們只要看看他在德國蒙難時期，在牢獄中的學習與工作情形，就可見一斑了。爲了準備在審判中的答辯和供詞，爲了加強反法西斯鬥爭的武器，他異常積極刻苦地忙於看書和閱讀。他看了很多的書，改進自己的德文知識，閱讀過的書將近百種，單單關於德國歷史就有六千七百頁（其中包括有一千多頁的德國史，九百多頁德意志帝國史，十大卷的革命時代史，十大卷的俾士麥回憶錄……）。爲了改進德文而讀了許多大文豪大詩人的作品，（其中包括有哥德的十二卷，以及荷馬兩大史詩，沙士比亞，莫里哀的戲劇，但丁的神曲的德譯本……）。此外，還研究德國的法律等。

應該注意，這是在極困苦條件下，從四月四日起的五個月中，法西斯帶殘酷地將季米特洛夫同志雙手用鐐扣着，當時，只要手指稍爲移動一下，都是苦痛不堪的！季米特洛夫在給法庭推事的聲明中寫着：

「我的雙手是整天整夜都被手鐐扣着。被手鐐扣着的我，需要書寫，又要閱讀，坐時扣着，睡時也扣着。難道我受這種精神上肉體上的拷問已快將一月，而你還以爲不夠嗎？難道取消這種野蠻對法的時期，還未到來嗎？」

在八月廿八日致大理院院長的信中，他說：

「從四月四日起，我是連日連夜被手鐐扣着。我屢次請求取消這種

辯法，仍舊是毫無結果，七月廿八日我又請求過最高法院的推事，假若不能完全取消我的手續，至少只是到夜裏上手拷，如通常已判決死刑的囚犯一樣。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該文件中指出：

「甚至依照德國的刑事訴訟法，這種扣手拷的辦法也是非法的。」
從這些文件裏，我們可以想像當時他是生活在何等苦痛的情況下，然而法西斯殘暴的錄，能够束縛他的手足，却不能消滅他的學習和工作的熱情和精神。

(六) 高舉反法西斯的大纛

季米特洛夫同志是馬恩列斯的優秀門生，是斯達林同志的親密戰友，是全世界共產黨的舵師。

他是共產國際執委最老的領導者之一，一九二一年便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時，當選為共產國際的總書記。

他在法庭上，打擊了國社黨律師對於共產國際的惡毒誣蔑，他說：

「各國共產黨都直接對之負責的共產國際，並不是進行陰謀改變的組織，而是世界的政黨。這個世界政黨不以起義和革命為見解。這個世界政黨不能向千百萬擁護他的人民隱瞞，而同時却私底下做着相反的事。我們的阿克博士啊，這樣的政黨是不會口是心非的！」

季米特洛夫同志是反法西斯主義的象徵，反希特勒統治的先鋒。在十年前的萊布法法庭上，在八年前的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他高舉反法西斯主義的大旗，他向全世界控訴說：

「無論法西斯主義所戴的假面具怎樣，無論它的活動形式怎樣，無論它上台執行的方法怎樣，可是：

法西斯主義——就是資產階級向勞動羣衆施行的最殘酷的進攻；

法西斯主義——就是瘋狂猖獗的民族優越主義和強盜的戰爭；

法西斯主義——就是工人階級和全勞動羣衆的死敵！」

他向全世界宣佈：「法西斯主義是殘暴的，但同時却又是不能鞏固的政權

！他號召組織國際無產階級和人民反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他用一切精力為實現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為戰勝法西斯主義統治而不懈的工作和鬥爭！

德國希特勒專政的十年，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十年，完全證實了季米特洛夫的天才和預見，完全證實了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

在偉大的斯大林英明領導下，蘇聯紅軍與希特勒的鬥爭已經開始獲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全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統一戰線正日益鞏固與擴大，法西斯統治已受了嚴重的失敗，它正總懸着不可克服的危機，現在是以血債還血債的時候了，在世界人士前面，審判希特勒及其軸心奴僕們的時候快到了！

是的，我們要清醒看到，法西斯統治尚未打倒，還不會被征服，他還可重裝旗鼓，還會耍弄死掙扎，我們要緊記着，法西斯主義是殘暴的野蠻的，它不分東南西北都是一樣的，德國的國社主義，第五縱隊，日寇軍閥法西斯主義，特務機關，都是一樣的，在歐洲，在太平洋，在中國，法西斯毒所到之處，還會用盡他們的殘暴，野蠻，卑劣，血腥的手段，來摧毀人類精華。他們越去死亡，便越加瘋狂，看啊！日寇不是和德國法西斯帶一樣，在佔領區，在上海，在平津，大肆逮捕，拷打和殘殺中國的工，農，學生教授和革命戰士嗎？

但是，列寧預言過我們，反革命統治儘管在某個短時期內瘋狂掙扎，但它總是要陷於滅亡的！實際生活是沒有力量的東西，反革命的法西斯帶，儘管拚命掙扎，行兇發狂，倒行逆施，胡作亂為，逮捕，屠殺革命黨員，打死幾百數千幾萬個明目的或昨日的革命黨員，可是法西斯帶這樣的行動，正好像以前被歷史判決死刑的一切反革命階級一樣，是沒有前途的。我們革命黨員應當相信，將來的世界總是屬於我們人民大眾，因此，在偉大的革命鬥爭中，我們可以並且應該表現莫大的熱忱，同時，還須用最冷靜的頭腦，和最清醒的眼光來觀察法西斯帶反革命階級的瘋狂掙扎的行動。

季米特洛夫同志！今天，當你在德國家鄉的十週年紀念日，當你戰勝德國法西斯而獲得自由的九週年紀念日，我們謹向你致敬。我們將接受你的教訓，按照你的道路前進！

十年前你舉起的反法西斯的大旗現在已經飄過這一個世界，在英雄紅軍的鐵錘之下，希特勒已離走上滑鐵盧的道路，讓我們一同前進吧，復讐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三月三日寫於重慶)

列強在華經濟力量的消長

許滌新

一 戰前的陣容

在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法則支配之下，列強在華的經濟力量，無論在那一個時期，都是呈現着起伏軒輊的狀況的。一般說來，一九一四以前，英國資本在中國佔着絕對優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與英美列強無暇

國別	投資額	百分比	投資額	百分比
英國	二六〇・三	三三・〇	六〇七・六	三六・七
日本	一・〇	〇・一	二二九・六	一三・六
美國	一九・七	二・五	四九・三	三・一
法國	—	—	—	—
德國	—	—	—	—
蘇俄	—	—	—	—
其他	—	—	—	—
合計	—	—	—	—

戰前陣容的統計，一九三一年日寇在華投資，將與英國分庭抗禮了。一九三一年以後，日寇在華投資更加踴躍。截至「七七」事變之前一年，日寇在東北的投資，增加十一萬二千餘萬元；英美法等國原在東北七萬萬日元的投資，却在這個時候陸續撤回了。白山黑水間的經濟命脈，就完全被敵寇所獨佔；其在關內，敵寇的勢力，亦大大增強。據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天津益世報的估計，日寇在這個時期的新投資，在華北共達七萬三千三百萬元；在華南共達三萬九千三百萬元。總計起來，從一九三一年至「七七」事變以前一年間，日寇在關內新增投資為二十二萬二千六百萬元。把這個數目與雷納氏的統計數字合在一起，那末，日寇在華投資的總數，是超過英美的。（「七七」事變前夜，英國在華投資額，據英國海軍大將 O.V. Dobbie 的估計，只有二萬四千四百萬鎊，而「財政與商業」雜誌則估計為三萬萬鎊，如折中作二萬萬六千萬鎊計，約值美金十三萬萬元，比一九三一年只多一萬一千餘萬元而已。）但日寇對華投資，有一半左右是投放在東北的。故以本部而言，還是英國佔優勢。美國遠東經濟調查團的報告，亦證明了這一點。這個報告謂一九三五年列強在中國本部投資，英國十萬萬美元；日寇五萬萬美元；美國二萬萬美元（實際不止此數，在雷納統計之後，美對華投資，僅稍遜於

英國，對於中國的掠奪與榨取，拚命的幹起來。它的在華的投資，飛快地在增長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資本在華的發展，亦非常迅速。因為日美兩國的分庭抗禮，英國亦就無法保持那種絕對優勢的地位了。據雷納氏的統計，列強在華投資的消長（截至一九三一年），其趨勢如下（單位百萬美金）：

款五千萬美元，航空公司三千萬美元，公路建設借款一千五百萬美元，航空建設借款四百萬美元四項而言，差不多增加一萬萬美元，與雷納的數字合計，美對華借款達二萬萬九千餘萬美元。這些數字，雖不能說完全與事實吻合，但戰前列強投資的陣容，是從此得到一個梗概的。

自「七七」事變以來，日寇的侵略不但摧毀了東亞沿海中國同胞的資本與經濟據點，而且亦推翻了英國資本在本部佔優勢的基礎，使英國的投資與其在淪陷區中存在的。不過，敵寇對於英美資本的打擊，並不是一下子。如東亞通商條約，太平洋戰爭以前與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敵寇對於英美在淪陷區的利益，是採取迫脅的態度，有時在表面上，盡敷衍的能事。如二十九年十二月廿日，敵寇為與英美日商約之重續，表示開放長江口至南京一段，准許三國商輪行駛，就是例證。但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敵寇與英美就站到了對立的地位。它所採取的，再不是敷衍，更不是敷衍，而是公開的佔取與沒收了。這與前一時期，是截然不同的。

二 敵排斥英美在華權益

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敵寇除了利用軍事優勢加強投資額以壓倒英美之外

以較卑劣最無恥的手段排斥英美在華的權益，其方式如下：

第一是利便砲火摧毀英美的企業。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敵寇從未與英美公開敵對，但在它的侵略進程中，中國的產業固然遭到摧殘，英美在華的產業亦何嘗能逃過這種打擊。以上海為例，在戰爭的三個月內，英商紗廠棉織廠與烟草公司等，美商棉織廠火柴公司與蘇聯廠等，都受到日寇砲火的損害。有些工廠的廠屋完全毀壞了，有些公司的存在倉庫（滬東一帶）的貨物完全被敵人搶去了。這是日寇尚未與英美敵對時所幹的勾當，這是日寇侵略砲火所送給英美的禮物。

第二是通過偽組織，增加外商貨物捐稅（中國廠家的出品自然不會省去這種勒索），禁止輪船運送外貨，向外債借款不還則以禁止其產品在領事館販賣為要脅。上海英商中州藥公司的停工，就是一個例子。更進一步的做法，則為迫令外商廢業，交際關係斷絕。河南焦作煤礦就是敵寇從英商手中奪去的。開採煤礦呢？這個時期保持存在，但業務是受英商支配的。它的煤礦成爲「日本鐵道會社」與「日本礦業會社」的獨占物。

第三是利用種種藉口直接佔領。如上海英商中國染料公司在二十九年秋季購得蘇州河邊的蘇染紗廠，戰事轉移後，敵寇認爲已有，竟令豐田紗廠接辦。這種做法，證明敵人是何等卑劣，何等無恥！

第四是亂炸。在敵寇的慘炸之下，不但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屠殺與摧殘，就是英美在華僑民的生命財產，亦遭殃了。從許格森大使的被炸傷與英女島號被炸沉起，英美在華的工廠房屋學校，便不斷遭到轟炸。英美僑民被炸了多少次，損失了多少東西，現在尚未有完整的統計，但我們可以相信，數量是一定不少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英美在華的投資，不但因爲敵寇的增加而呈遞減，並且因爲敵寇的掠奪而急形衰落。英美在華的投資是集中於鐵路、航運、開礦與紡織業的。在「七七」事變以後，英國投資的這些部門，無一不受敵人的摧殘。以鐵路來說，英國對華向鐵路借款，計有北寧、京滬、滬杭甬、廣九、滬甯、平漢、津浦、道清等路。這些鐵路幾乎完全給敵寇佔去了。以礦業來說，英國的幾個主要據點，如上面所說的焦作開採等等，不是設法搶去，就是設法支配。以紡織業來說，上海幾家英商紗廠，都換過了日寇砲火的摧殘。英商紗廠在數量上其比重之更加降低，是無足怪的了。美國對華的事業投資，出入口貿易與「公益文化事業」最佔主要，但是，貿易事業因日寇之

對領海與內河而衰落，公益文化事業，亦因日寇之摧殘而大受打擊了。

綜合各方的估計，因爲日寇之摧殘，英國在華二萬六千餘萬的投資，這個時期恐損失一萬萬二千餘萬以上，倘其投資額百分之四十四，共損失九千九百萬美元。這個時期要損失一萬萬餘美元以上，佔其投資額百分之三十五。

在這一時期期中，敵寇除了在投資上給英美以打擊之外，在貿易與金融各方面，亦無一不使英美蒙受損失。在淪陷區內，敵人以其種種辦法破壞英美對華的貿易。它除了大規模的武裝走私以外，又公開的禁止貿易。淪陷區的稅則，使其便利日貨的銷流，而對華的稅則，則使英美對華貿易的損失。據海關年刊，二十六年對華出口貨物總額一萬五千餘萬元，佔入口總額百分之十五強，到二十九年竟增至四萬四千六百餘萬元，佔入口總額百分之二十三左右。美國在二十六年對華的進口貨一萬八千八百餘萬元，佔入口總額百分之二十左右，爲是年進口之首位。二十九年增至四萬三千五百餘萬元，百分比增至二十一強，但日貨之地位更下。英國的棉織品，更是淪陷區二十六年對華入口，猶有一萬一千一百餘萬元，佔百分之十一強，到二十九年跌至八千餘萬元，百分比降至三。九了。在這一時期，對華人口比美國多了一千一百餘萬元，比英國多了一萬六千餘萬元。金融方面，敵人除了大量發行軍用票之外，又設立多數偽銀行，大量發行偽鈔。在華北，從二十八年三月起，敵寇便開始管理外匯，正金銀行就在這個時期，從滬寧銀行手續奪去支配外匯的權力了；至於正金之獲得華北關稅存款保管權，則早已是二十七年五月間之事。在華中，敵寇對於金融的支配力量，更有在華北那麼大，但是對英美的壓力是與日俱進的。它強迫華中商人把出口貨所得外匯，賣給敵寇的金融機關，藉此以削弱英美銀行的勢力。

這就是敵寇在淪陷區排斥英美的經濟力量。在淪陷區內，在這種時期，儘管日寇的手段多變，但在表面上，總不能不承認英美對華經濟權益之存在。特別在上海，當它仍保持其孤島的地位的時候，英美在那兒的金融與工商業的力量，仍爲日寇的障礙物。可是，這種局面是不能持久的。一九四一年的冬天，第七號風球掛起來了。侵略的日寇又在太平洋上捲起海嘯來！上海公共租界被佔領了；香港不久亦告淪陷。在這種情形之下，敵人對於英美在華權益，不復採取任何敷衍或敷衍的態度，而是直接了當採用佔領與沒收的辦法了。

三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敵軍即進入上海租界，捕拘同盟國僑民。平津等地亦復如此。從那一天（三十年十二月八日）起，淪陷區各城市的英美僑民，都成爲日寇集中營中的俘虜了。對於英美在華的產業銀行與商行，則在「管理」的名義之下，進行實質上的沒收。日寇侵入初期，對於華北的一百餘家工廠，亦曾施行過什麼「軍管理」。它對於英美在華企業的「管理」，就是這種「軍管理」的延長。上海的英美荷比的銀行，就是在敵寇的管理之下。到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敵寇又宣佈將英美等國在滬七十五家重要企業，置於日寇委任的日籍監督的管理之下營業。這個監督掌管各該企業的財務，各該企業出品之銷售與分配，亦歸其分配。用這種辦法，敵寇使英美在滬的重要企業爲它生產了。

爲了搜取英美銀行的資金，爲了挖空這些銀行的基礎，敵寇在管理之後，又進行清理了。敵寇海軍司令部於三十一年一月七日宣佈在敵管理下的英荷比銀行十四家，自八日起停業三天，進行清理。清理之後於一月十二日復業，即辦理「首次提存」。所謂首次提存者，即指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以來，存戶未提足二千元者可以提足，其已提足二千元者則須持「二次提存」時再行提提。提存辦法，英美荷等國存戶每週仍只限五百元，其他各處存戶可以一次提提。計辦理首次提存有十家，辦理二次提存有七家。在二次提存中，存戶可自首次提存後之存款餘額提去一半，其餘半數存款轉存日籍銀行開戶。惟以後一切往來，仍由原行辦理。在這種清理之下，英美在滬各行完全被挖空了。英美在滬的存戶，存額完全握在敵寇手裏了。到了是年五月二十八日，敵與盟國又宣佈同盟國其餘的一百家商行，予以清理或管理其營業。敵人對於企業之清理，其目的亦不外是更清楚的調查這些企業的財產與物資，以便於敵寇之利用而已。經過敵寇這種清理，英美在滬及淪陷區各城市的企業、工廠、礦山與銀行，均完全變成敵寇的財產了。

在太平洋戰爭以前，如因爲日寇的搜括，英國在華的投資，損失了百分之四十四，那末，其餘百分之五十六的投資，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被日寇用武力強佔去的。因爲英國在滬的投資佔它在華投資總量一半以上。上海公共租界內的英國財產都被日寇搶去了，這不是證明這一點麼？如果因爲日寇的搜括，英國在華的投資，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損失了百分之三十五

，那末，其餘百分之六十五的投資，亦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被日寇用武力強佔去的。因爲英國在滬的投資，佔它在華投資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上海公共租界內的英國財產都被日寇搶去了，這不是證明這一點麼？

日本強盜除了用槍刀奪取英美的實際權益之外，並且發動漢奸汪精衛在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江寧條約百年紀念的那一天，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驅逐英美在中國的影響力。據這樣，在敵寇的槍刀所能及的地區，英美的權益都被日寇搶去了，英美在淪陷區的經濟特權與經濟力量，被日寇一筆勾銷了。日本強盜的侵略，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毀壞了最近半個世紀英美日在中國資本戰的局面。

四 英美在大後方

在大後方，在敵後抗日根據地，日本強盜的特權，它從馬關條約以來所加諸中國人民身上的桎梏，是被取消了的。六個年頭的艱辛的奮鬥，把國家民族交給而淚交迸的戰爭，目的很清楚，就是在把民族敵人——日本強盜驅出中國領土。不但現在在大後方，在敵後抗日根據地，粉碎了敵寇加在我們身上的桎梏，而且在反攻的時候，一定讓強盜加在淪陷區同胞身上的枷鎖。在過程中，雖要遇到種種困難，但我們一定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如果以當前情形而論，英美在淪陷區中的經濟力量是被摧毀了，而日本強盜在大後方的經濟力量與特權，亦是破壞否定了的。這是一個對照的局面。

英美在大後方——西南西北各省的經濟力量，沒有它們在東南沿海那末雄厚。因此，從全國的範圍來說，從抗戰以前和以後來比較，英美在華的經濟力量是減弱了的。可是，我們並不是說：英美友邦與「自由中國」的經濟關係比以前減弱了。事實是在可以證明這一點。從二十六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一月，中英借款十二次，總數共一萬一千八百五十萬英鎊；從二十七年十二月至三十一年一月，中美借款八次，總數共七萬四千七百八十萬美金。這些借款主要是政治性質的，與戰前的投資，性質上並不相同。雖然貸款的性質與以前不同，但事實上，處處證明中國與英美，特別是與美國的經濟關係，比以前更爲密切的。美國在西南西北大後方的經濟力量，是比以前提高了。

物質與精神的關係

梓年

反對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人，常常是用這樣一種論證方法：先是把唯物主義者說得好像只承認物質的存在不承認精神的存在的，或者至少好像是不承認精神有真正作用似的；接着再說明精神有如何的重要，精神作用有如何之大；然後做一個結論，說唯物主義是錯誤的，「世界上是沒有它的立足之地的」。這種論證方法，可說完全是一種無知，是一種向壁虛造的辦法。

他則說：「在整個宇宙之內，無窮的礦物物質與植物動物現象的存在，而物質力量固可影響精神，精神力量亦可影響物質；因此，我們要解釋任何事物，以至於解釋歷史，便非將物質與精神兩者，同時並重兼顧不可；否則，如果忽略任何一方面，便必是一偏之見，而終陷於不可救藥的錯誤」。意思就是說，唯物主義就忽略了精神的一方面，所以是「一偏之見」，所以要「陷於不可救藥的錯誤」。

他則說：「精神作用的重要及其力量的偉大，實非任何人所否認的」，意思是說，唯物主義者就正是否認了這一點，所以他們可以「在有形無形之中，給與馬克思唯物史觀以無情的打擊，使之無立足之地」。

這如「打擊」的方法，是莫須有的打擊方法，覺得好一點，是扎了草人當箭靶的辦法，說得不好一點，是殺賊誣陷的辦法。

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但沒有忽略了精神的一方面，恰恰相反？正還復重視精神的一方面；不但沒有否認精神的作用，恰恰相反，正還復強調精神的作用。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本小冊子中，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且看他怎樣說明這一點：

「至於說到社會觀念，理論，觀點，政治制度底形成，至於說，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歷史唯物主義就不僅不否認，而且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們在社會生活中，在社會歷史上的嚴重作用和意義。」

「可是，當它們已經產生出來以後，它們就成爲最嚴重的力量，能促進解決由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新任務，能促進社會前進。」（着重點是原有的）

你們看，在唯物主義者看來，觀念，理論，觀點等等精神的一方面，在社會生活中，在社會歷史上，不但有作用，有意義，而且還是有「嚴重作用」和「意義」；在社會前進上，不但是一種力量，而是一種「最嚴重」的力量。總之，說唯物主義者忽略了精神方面，否認了「精神作用的重要及其力量的偉大」，算有什麼根據呢？

這還不算，在另一小冊子內，斯大林還從反動說明了「精神」的重要。他說：

「經濟主義者」和孟什維克所以屬於反動，說中也是因爲他們不承認先進理論，先進

觀念底動員的組織的改造的作用，而他們則將黨綱庸俗唯物主義中去，於是就把先進理論，先進觀念作用看做等於零——因而也就無力圖使黨綱於消極無爲，陷於萎靡不振。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強有力和生氣勃勃，就是因爲它源於正確反映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需要的先進理論，把這個理論搬到它所應有的高度，並以徹底利用這個理論動員的組織的改造的力量爲己任。」

原來忽略精神作用，輕視精神作用的，倒不是唯物主義者，而正是反唯物主義者或者說庸俗唯物主義者。那麼，拿反唯物主義者「罪狀」列到唯物主義者的頭上來，不是雙重誣陷的辦法嗎？

這樣一種觀點，不但不能給精神的作用和意義，而且還非常輕視精神的作用和意義的觀點，當然不是斯大林才是如此，而是一切反對主義者無一不如此。例如列寧爲了要領導俄國革命而從事於建黨工作的時候，首先就力求黨的與非黨的右派什維克在思想上，理論上的統一，作爲建黨的重要條件之一。又如恩格斯，他說：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從必然的王國走進自由的王國。所謂自由，就是人類的主觀作用也就成爲精神作用獲得自由發揮與發展的空間；把這一點作爲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他便是把精神作用提到它應有的高度了。至於一切馬列主義者，唯物主義者，沒有一個不把或教自己的頭腦看做頭等重要的事情，也就把精神作用看做

頭等重要事情，那是無稽多說的了。

既經這樣，既然唯物主義者對精神作用如此看重，那麼，唯物主義者之所以為唯物主義者，其特點又在哪裏呢？

唯物主義的特點是在於：唯心主義者以能有美妙的理想為滿足，把它掛在天上叫人去膜拜，把它安放在明天作為一種希望；唯物主義者則不以只有美妙理想為滿足，而還要求得理想能夠見之於實際，更把它從天上拉到地下來，更把它從明天的變成今天的。

說詳細些，根據斯大林的規定，唯物主義的特點是：

(一)唯心主義認為世界是「絕對觀念」，「宇宙精神」，「意識」的體現，唯物主義則認為：按其本質說，世界是物質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現象是運動着的物質底各種形態；世界是按物質運動規律而發展着，它並不需要任何「宇宙精神」。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瞭解，而不需要任何外來的附加」。

(二)唯心主義認為只有我們的意識才真正存在着，物質世界，自然界，只在我們的意識中，只在我們的感覺，觀念，概念中存在，唯物主義則認為：物質，自然界，是在意識以外並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物質是第一性的現象，意識則是第二性的現象，是物質的反映；恩格斯是發展到完備高度的物質產物，即人（意識產物）。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凡斷定精神先於自然界而存在的……，就組成唯心主義的體系。而凡認為自然界是基本起點的，即屬於唯物主義的體系。」

(三)唯心主義者認為世界及其規律的可

能性，不相信我們知識底確實性，不承認客觀真理

，認為世界是充滿着那些為科學所永遠不能認識的「自在之物」，唯物主義則認為：世界及其規律是完全可以認識的；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物，只有尚未認識之物，而且它們是總要被科學和實踐力量所揭露和認識的。如恩格斯所說，「既然我們能夠以這樣一種方法來證明我們對於自然界某一現象的瞭解正確，就是說，我們自己把它創造出來，依它的條件而把它產生出來，並且強迫它服務於我們的目的，——既然如此，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要完結了。」（參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據此可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區分，並不在於後者只承認精神，前者只承認物質。物質與精神，兩者都是一種客觀存在，誰也否認不了其中的任何一種。唯物與唯心之分是：於後者把精神認為是先有的，根源的，前者則把物質認為是先有的，根源的；後者是要把精神作為一切事物的最後解釋者，推動者，而前者則把物質作為一切事物的最後解釋者，推動者。精神是不可捉摸的，所以把它作為最後的解釋者，就常常會有不可知之物，即所謂「自在之物」，把它作為最後的推動者，就常常坐而待斃的不能起而行，因為無從着手；物質是有途徑可尋的，所以把它作為最後的解釋者，就必有不可知之物，把它作為最後的推動者，就一切都可以有找到解決的着手處。

如此，而是事實上就是如此。這一點，恩格斯已解釋得很明白。他用在精神現象出現以前不知幾千萬年就已有的生物存在，在生物存在以前不知幾千萬年就已有的地球存在，在星雲存在這樣的事實來解釋了這一點。而且，一種理論或學說或主義，是與之相連，是正確是錯誤，應由實踐來考驗。要問為什麼，就只好去問問實踐先生。堅持抗戰，努力建國，精神與物質，自然兩者重要，必須同時並顧，但必勝必成，則必須要經濟，軍事等物質力量中樹之基礎。蘇聯保衛斯大林格勒的勝利，反以德國的不斷勝利，像斯大林格勒人那樣的新精神，自然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如果沒有後方充足的經濟力對其支持，沒有如大炮之類足夠的火力為後援，則這精神也將無由發揮其作用，無從表現其力量。不但如此，試問像中國人民這樣全國一致同仇敵愾的精神，是否有其根源呢？為什麼敵人就不會有這樣的精神呢？像蘇聯人民那樣大家都願捐所有力量都貢獻到前線去的精神，是否有其根源呢？為什麼朝鮮統治下的人民就不會有那樣的精神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精神決不是飄浮在空中的自雲，它們都是有其根源的。中國人民百年以來所受外強凌弱的苦痛，已水深火熱到無法再忍，再不起而抗戰，就只有死路一條。這就是全中國人民所以不顧一切犧牲起而抗戰的決心（精神），在物質方面的根源。蘇聯人民三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使大家從自己的生活上清清楚楚地看到，這種社會主義的工廠與農莊是決不能讓私利者侵奪了去的，誰要想來侵奪就要把廠打爛去。這就是蘇聯人民所以願用一切力量以保衛社會主義建國的熱誠，在物質方面的根源。日德法西斯統治下的人民所以不會有如中國人民這樣的精神如蘇聯人民那樣的精神，就是

因。他們在物質方面沒有產生這種精神的力量。反過來，要培養一種精神，也必須從物質方面培養起。中國有倉廩實而後知禮義，救死不遑矣。禮治禮義之說，西哲有強健的精神宿於強健的體中之說，都是積了許多實際經驗而後獲得的不刊之論。

我們必須弄清楚，「根源的」和「重要的」這兩語之間，決不能混上一個等號。我們不能從連兩文人談同宗說或猿為人祖說，得出猿比人重要的結論，也不能從古人倉廩實而後知禮義這句話，得出實倉廩比知禮義重要的結論，不能從強健的精神宿於強健的體中這句話，得出強健的體比強健的精神重要的結論。說它是重要的，是說它的作用大，說它是根源的，是說它從根源起。根深者葉茂，樹必從根上下功夫。但樹葉的重要却在根上，大多是在花和果上，有的則在幹上。就抗戰說，勝利第一，經濟第一，致勝之基，是在軍隊的戰鬥力和物資的供應力上，國人必須在這兩方面痛下功夫，而這兩方面都是物質的，但便抗戰必勝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則是我們的抗戰是正義的戰爭，進步的戰爭這一點，而這一點是精神的。

話再說回來。根源的，不一定比那派生的重要些？有時後者的作用常比前者大，後者也就比前者重要，這是指那派生的已無產生以後說。例如倉廩實後已知禮義，身體健後精神已強健，樹葉者所要求得的花果已經收穫，那時，禮義比對倉，精神比對身體，花果比對根株，作用更大，意義更重要。但一點也不是說，後面那些倉廩，身體，根株等等，那時就可不去顧，如果不顧後者，前面那些重要的東西也就會跟着消失去。所以，如果說「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的意義來說，則後者的作用仍舊又是大的，其意義仍舊又是重要的了。這就是唯物

主義者，所以對於精神雖然也和對於物質一樣的重視。有時還把精神（思想、觀念、理論、等等）的作用估計得很高，對它的意義估計得很重要，但終究要重點點在物質這一方面的道理。

的確的，唯物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於精神的作用估計之高，對於它的意義估計之重，比到別的人是有過之無不及的。馬列主義者有這樣一句話：歷史應由人類自己來創造。這意思是說，到今天為止，人類的歷史還是一個必然的王朝，一切還都在受自然性的歷史法則支配，人類自己無能加以控制；自然性的歷史法則決定要來的事，不管對人類是如何慘重的災難，如水旱災，如瘟疫，如生產過剩，市場混亂，如戰爭，等等，要來的終於要來，拒絕不了，逃避不了。自然性的法則沒有決定要來的事，不管人是如何的想望，如豐收，如康寧，如昇平，等等，不來的還是不來。人類開始處於被動的地位，沒有掌握到主動權。馬列主義的事業，就是要使人類把這主動權扭轉到自已手裏來。自然科學的發達，已使人類對自然現象的主動權逐漸扭到自已手裏來了，馬列主義就要使人類把對社會現象的主動權也逐漸扭轉到自已手裏來。社會歷史科學，不管社會現象如何複雜，總都能夠成爲例如生物學一樣準確的科學，它能夠利用社會發展規律來供實際的應用（斯大林），使我們對於社會現象，也能够像對自然現象那樣，「我們自己把它製造出來，依它的條件而把它產生出來，並且強迫它服務於我們的目的」（恩格斯）。譬如說，生產事業中的那種無政府狀態是首先須要克服的，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那樣的關係是首先須要克服的，各民族之間的對立關係以及至於仇視是應當叫它休止的，大多數

勞動大眾受不到文化教育的春風化雨的現象應當叫它消滅的。一切現象，需要的把它產生出來，不要的，把它消除掉，都要由人類自己作出分期完成的計劃來，按部就班的做去。如蘇聯的幾次五年計劃那樣，不管經濟建設也好，政治建設或社會建設也好，文化教育建設也好，都有一定的計劃，都能按照計劃去做，按照計劃完成。這樣，人類就真的能夠把對社會現象的主動權逐漸扭轉到自已手裏來了，就真的能強迫它服務於我們的目的了，就真的能由自己來創造歷史了，就真的能由必然的王朝一步一歩的走入自由的王朝了。把一切現象，自然的，社會的，都由自己來創造，來控制，對一切現象都能強迫它服務於自己的目的，這還不是把精神的作用擴張到最大限度了嗎？這還不是把精神的力量發揮到最高程度了嗎？這還不是把精神的意義估計得極重要了嗎？試看一看看蘇聯五年計劃到四年完成時，各處突擊隊員那種工作競賽的發奮精神，副後類達哈諾夫運動工作者那種把工作速率提高到幾十倍幾百倍於一般工作速率的創造精神，今日莫斯科保衛戰中，索巴斯托波爾保衛戰中，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紅軍將士所表現的那種斯大林格勒人的精神，其後方人民父子，妻代夫以加緊生產的那種只知有國不知有他的愛國精神，其意義之大，力量之高，真是曠古罕聞，人間少有。

然而，唯物主義者所以能把精神作用，精神力發發揮到如此之高的道理，正是因爲他們首先承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首要作用。社會主義建設首先是把人民生活改善了，剝削取消了，壓迫沒有了，斯泰哈諾夫運動之所以成爲可能，是因爲現代化的生產技術條件備具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關係沒有了，蘇聯人民的愛國戰爭所以勝

換英勇，愛國精神所以那樣輝煌，是因為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已達到了空前的完善。精神是重要的，偉大的，但它不能自己生長，自己發展，而要因物質的生長而生長，因物質的發展而發展。

上面所講的這一些，無非說明這樣一個真理：在唯物主義面前，精神是重要的，但物質却是首要的，物質是根源的，精神是派生的。

最後可以講一講唯物主義的遺傳問題。反對唯物主義的人說：「依照唯物主義者的主張，人類的意志與精神價值，既被其否認，所有一切的行为與動向，完全為物質環境所支配，其結果將使各人的人格可以不講，奮鬥吃苦的精神更可不講什麼實話。」

研究的對象和生活的對象

——評艾蕪著「文學手冊」——

嘉梨

艾蕪著「文學手冊」，共分三篇。第一篇論文學的基本原則；第二篇論文學的構成；第三篇泛論創作。在這裏，作者擺脫了一般文學概論的方式。他不從廣泛的抽象的理論入手，而接近讀者。作家在表現中的直接性，一貫的支配了他；具體的，經驗的事實是這本書從頭至尾的血肉。讀者他，感覺到作者是在自己面前，也許是低着頭，用平和的，可是執拗的聲音不倦的談着一些和自己十分親切的問題。他談的切實，精細，豐富，使人願意聽他講下去。

在第一篇第三節裏面，作者首先注意到了文學工作者的創作態度和生活。開宗明義，他引證了羅曼羅蘭一段深刻的話（增訂本頁五），接着他就自

說，大家都以個人目前的私利是圖，既無所謂道德，亦無所謂正義，完全聽受環境的支配，入於富貴則淫，陷於貧賤則移，遭遇威則屈，遇無人格精神之可言」。說這樣話的人，他自己的人格精神大概總是高尚的了吧！但，對什麼是唯物主義還未摸清，就信口雌黃，而且破口罵人——這就叫做王婆罵街，而王婆罵街是常常罵在自己身上的。

如前所述，唯物主義者一點也沒有否認「人類的意志與精神價值」。既然如此，那麼根據了這點所發出的一切議論，批評，就都落了空，所發出的許多惡罵就都罵在罵者自己身上，這裏無端對此多講什麼實話。

已說：「一個人肯對社會留心，肯注意大多數人的生活，則他自己一定有不少的感慨和意見發生，想對人吐露他的見聞，披瀝他的愛憎」（頁六）。此後，他特別提到了浪漫生活，他以為「：儘可不必，而且應該儘可能地加以革除。因為現在從事文藝的人，是拿文藝來服務人生的正和一個流汗的勞動者努力作工沒有兩樣」（頁七）。這樣，他把嚴肅的向着社會的生活態度與真實的，為人的創作態度規定在文學工作者的第一頁課程裏面，這又是他有別於一般理論家的地方。

第二篇，他主要的特點在於強調了當代詩人在文學作品上的重要位置。其次，是他對於技巧的重視。這些，對於方在成長中的中國新文學，很是要

照證唯物主義者的戰鬥精神，犧牲精神，忠於自己的主義的精神，忠於人類解放事業的精神，刻苦奮鬥堅強不拔的精神，世有公論，無庸爭辯。我們所要講的是：唯物主義者一方面非常講究氣節，講究道德，但同時他決不空談氣節，空談道德，他認為氣節，道德等等是有物質基礎的，是從一定的利益出發的。唯其因為唯物主義者講道德筆直指出道德的物質基礎指出道德所附帶的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又是怎樣的關係，所以他對於道德的認識就毫無模糊之處，他對道德的態度就非常堅強，因而他所表現出來的為道精神也就比別的人有過之無不及。於此也證明了唯物主義的真實性。

緊。並不是說其他的理論工作者沒有注意，沒有把牠們提出來，不過，由於作者自己愛好口語，注重技巧，說得分外具體和詳盡。特別是關於民衆語言和藝術語言那一段（頁五七——五六）以及講技巧中關於字句的那一段（頁一〇二）值得大大的鼓掌。對於他的努力，他是不會失望的。

第三篇，在廣論創作中，作者極其的注重到了寫人物和人物的講話，他寫出了不少精彩的意見和例證。怎樣寫個性（頁一四四——一四五）和人物講話的運用（頁一六四——一六七）這兩節令人不能不頻頻點頭。講到背景，他提出了應多用社會生活（頁一七二）。那些常常為風雲片所顛倒的人們讀了該覺得前腦換了一副模樣吧。

到這個地步為止，我們感謝作者。我們從他手裏接過了一根棍子，用這根棍子可以敲着那塊坑坑窪窪的道路，放開腳步向前走去。

讀過一本書的優點，並不是說一本書，即便是很分量的，我沒有他的缺點。並且，有時候，讀過一本書，也許就在於更深的體會那點點。

我們對於這本書的第一個意見是從上面我們首先提到的第二個要點出發：對社會留心，注意多數人的生活。這是一個極大的命題，有待於作者用關心的態度去加以說明，闡證，發展，使之成為全書的靈魂。然而，可惜的是一點意見只提過全書一次，只是這麼的句簡單的話，其後，就在他那茫茫的二百二十頁上沒有再浮現出來了。這上面假如我們回觀他的第一篇，第一頁去，那點意思彷彿是要被取消的。

這是否怎樣一個問題存在呢？為了便於說明，我們不妨把作者的方案簡單地列出來：

- 一、起點 「對文學有興趣，立志創作」(頁三)這是在第一篇，第一節裏面提出來的。
- 二、出發 「研究人生」(頁七四)。研究的方法是觀察，分類，比較，參加生活，記錄，讀書。

三、創作

我們看，他這一個方案裏面受羅蘭的那一段名言影響了有多麼。羅蘭說：「第一個動機：除非你迫切地感到由於社會責任和修飾的良心，或在某一種內心的需要所驅使，決不要寫作。……一個作家所寫的一切事物必須是，或者至少要似乎，必須的才行。」(頁五)羅蘭的起點是做人，自己的社會責任和良心，由於內心的需要驅使去寫作。我們的作者的起點是對文學的興趣，立志(不是內心的

驅使)創作。

我們相信作者對於一個作家的基本要點：做人的良心，生活的態度，是想到過的，但是，他好像沒有感到他的基本的真確性，或者，至少，這方面沒有能像羅蘭那樣，使他從頭至尾地抱得緊緊的。使這筆上筆下這筆流瀉去說明，去例解，去比喻，去傳播，釘牢基礎的把地地讀者的心靈去。事實上，他他發瘋的是生活的廢品——文學。人，是研究的對象，不是生活的對象。

談到生活，有幾點我們應該先說明一番。通常人談到生活，往往把這當作事實的經過看待。常常的，一提到生活兩字，就包括了可憐過去，到工廠或者農村去有意思，好像人的確有不少人是這樣看。除了這些地方，一個人就沒有生活，他過的日子就不是生活了，然而所有到了幾點，到了工廠或農村的女學愛好者不是個個人都能寫出能感動人的作品來呢？我們的作者或許會回答說：「那是他他不作研究」。其實他首先對人沒有感到興趣的人，就是這研究的工夫也不容易做的。不久，不管如何立志，他的文學興趣很容易悄悄的拉住他的手把他領到那不是為大衆為人的幽僻路上去。我們以為創作只是人的工作方式之一。一個作家基本上還是一個生活在種種條件之下的，種種人物之中的一個人。因此，人，基本的他生活的對象而不是他研究的對象。對人發生生活上的興趣，是第一個要點。

第二、我們說的是關心人。我們必須把人當成一個人看待。在關心他的時候，決不把這當作一個空裏插出來的一個四無樂棋的權宜，而是把他當作一個歷史的，社會的，具體的人。正因為是這樣，我們就愈加的尊重他，親近他，把他當作我們對等的

同伴看待。提出這一點對於我們的作者原是多餘的。可是，正因為作者對於他是理解和感覺得非常過習，一部分，也許是大大分閱讀者，反而無從得到他的提示了。目前的一些具體狀況，加上歷史所加之於我們靈魂上的鎖鍊，事實上把許多人從他們的同伴們分開了。就是在我們文學的人們身上，現實的烙印依然可以蓋上去。我們把人，人的生活，人的戰鬥，人的命運僅僅當作研究的材料，而不當作是生活在我們中間，與我們自己血肉相關的人看待，結果將有可能使我們愈發從人羣中出來，而站到生活的彼岸上去。

第三、這樣說，是不是我們就絕對的不能研究呢，沒有的事。留心的，經常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生活得較廣，較深，而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正是我們自愛的作家所必需的。所謂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我們找到了幾個日常生活的用語：廣度就是世面，深度就是世故。平常人說：「他見世面大」，指生活的廣度；「閱歷的世故深」指生活的深度。一而一故，把入間的縱橫兩端都包括了。研究這正一層層試探着去見世面的方法，他所能做到的常常也只能到此為止。不過，到了這地步，並不能保障一個作家必然寫出震動人心的東西。事實上，反而有可能發展到連的意義上去的。什麼世面都看過了，什麼世故都閱歷了，談起來，想起來，百戰百勝，寫起來袖手旁觀，不冷不熱，這基本的做人的條件都沒有了。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怎樣去對社會留心，怎樣去注意大多數人的生活呢？這，還在天邊，近在眼前。人與人之間有一種自然的，一脈相通的聯絡，那是人情，那是我們所稱謂的生活的密度。日常生活用中的三個用語：見世面，歷世故，近人情，是

個作家所必需具備的。切近人情，感覺人情，也就是關心人。有溫度，有深度并不够，他必須先有溫度——關心人的命運，不能逃脫一種社會責任感，一種良心的壓迫，關心人的命運，和他有了生死不解的融合，不能懸避那種內心的需要；要寫，非寫不可。作者兩次提到了巴爾扎克的言語（頁八〇，頁一二二）。那些言語是何等輝煌的寫出了巴爾扎克關切人民的內心！那豈是研究所能達到的靈魂的宮殿？把他的和後期莫泊桑的對法比較起來，是怎樣的不同了？從這裏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巴爾扎克能夠違反他自己的世界觀，寫出那比歷史更是歷史的作品。

第二個意見，有了這層本質上和作者不同的看法，對於他所列的一個文學的公式，我們也有不同的見解。那個公式是這樣的：

社會生活取來的材料（包括
動物思想感情）（客觀的）
通過形象的（言
語文字）的形
象表現（主觀的）
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主觀的）

情真一點，我們便可以把他寫成這樣：

材料 + 主觀的思想感情 × 形象化 = 文學

依這個公式去寫，寫得成功并不一定是有用的文學。寫者做我們的作者所追求的為大眾的文學，寫不好，就根本不是一篇文學作品，無法和人發生聯繫。因為材料原是一「搜集」來的，主觀的思想感情可能是化石了的世界觀，形貌的文學可能是堆砌，鋪排。牠們都去和文學創作不相干的。

這一個公式的毛病在於：第一，把客觀材料和主觀態度（思想的，感情的）絕然分開，於是主觀態度（思想的，感情的）不得不於材料既已「搜集

」之後附加上去；第二，因為材料和態度絕然分開，那材料既失去了生命，那態度也就很難達到抽象化了，怎麼能呢？再把形象尾追上去。其結果：生活——生活態度——表現，這一個有機的動力的過程就變得支離破碎了；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種沒有任何生活態度的生活內容，更沒有一種非感性的現實生活（感性的現實生活是產生形象的泉源），而所謂主觀的生活態度和一定程度的形象表現早已具備在那所謂材料當中了；當前的問題不在於把這三個分開來的東西如何合起來，而是根本就不應該把它機械地絕然分開。

第三個意見，因為作者的重點在於研究人生，因為他愛好技巧，所以這本書表現了很大的自然主義的傾向，而和現實主義却距離得相當遠。

我們看他所舉的例子十之八九都是用來證明搜集語言，摘取現象，研究材料。特別是在材料和技巧二方面，他所引的主要是法國自然主義作家：左拉，羅曼羅蘭，福樓拜，莫泊桑這幾個。他再三再四的引這幾個人的說話并非偶然，而是從一個一貫的觀點：研究和技巧出發。這一個觀點限制了他，使他不能由生活與創作的態度的看法去選取我們所應有的教訓。一個很顯然的例子是他把巴爾扎克的那兩段話也當作研究方法去解釋。像希臘人的生活與中間所說的一個詩人首先必須是一個好人，只有好人才能够寫出好詩，這種例子他就沒有注意得到。（在這裏，我們并不小看自然主義。這一個重要的傳統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精心的體會，不過她的分量是當要好好安排的，這一層現在無法去講。）托爾斯泰，高爾基，陀思妥夫斯這些人都有生活上極其光輝和沉重的例子，他並沒有舉出來。

他的自然主義傾向的第一個表現是搜集語言。好的文學，有用的文學必須用當代語言寫出來；這一個命題，我們和作者是一樣的看法。但是，對於語言的興趣從那裏發生？不要人民，不十分貼緊的關切人民的生活，感情，感覺，念頭，和行為，如何能夠去愛他們的語言？這是一。好的文學作品是不完全是以語言的魔力在動人，以口語在動人呢？左琴科用口語，高爾基也用口語，但是，以高爾基比左琴科，他的撼動人心的力量該到了什麼地步，左琴科是何等慘白可憐！莎士比亞並沒有全部用口語，只在寫他的小丑的時候才運用。即使他用以語，以他比之於前一個時代英國那些用口語寫西班牙悲劇的人們的作品比較起來，何以他們的會那樣薄薄蒼白？還是二。走路，坐電車，吃飯，上毛房都帶着本子，帶着筆抄，而關於語言的，貼緊的觀察，推想，體驗這些者的心理，感情，生活，思維卻談到得不多。言語對生活是獨立起來了，這是三。

我們所以注重言語，并非像那些好玩弄文字的魔力的人們一樣，僅僅在於其動聽，漂亮，有魅力。牠的最大要點是真實，是寫了牠能够表達真實。牠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也就在於真實這一點。牠不是能夠獨立的東西。深厚的，具體的生活，人情永遠主宰着牠，從發音到形成一句話。這一個生活與人的情却不是僅僅抄抄寫寫能够得到的。

第二個表現是他對於生活所用的兩個字：參與生活，而不是忠實地觀察地生活。參加生活的最好例子當然是左拉，他寫這些人了。他寫了寫作「參加生活的」，他寫了寫作「自然主義者」。至於托爾斯泰，法捷耶夫，康拉德這些人都是生活在先，寫作在後，具體的生活在自己所有的環境中間，生活的所積使他們不能不寫。托老和法捷耶夫我們大要都讀過，（下接第一〇八頁）

列寧論文學及其他（中）

V. 謝爾賓斯基
戈實 譯

二 列寧論文學的黨性問題

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出客觀的世界，同時也是改造這個客觀世界的一個有力的工具。列寧揭發出人的認識的積極的和創造的性質。列寧的反映論，是將社會的實踐，作為認識的過程的一個必要的和最主要的因素的。在應用到文學方面去，這就是說：它不僅反映出現實，並且還積極地影響了這個現實。列寧關於文學的論著，揭發出藝術認識的社會的和階級的性質。而列寧的一個最偉大的及具有歷史意義的貢獻，就是他製定出科學與文學的黨性的學說。生活在藝術中的反映，並不帶着被動的性質，反而是社會實踐的一個最主要的原素。

關於人的認識具有着被動的及直覺的性質的這種見解，是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的一個主要的缺點。馬列主義認為認識，是一種有感情的人的活動，因為「……人的本質，並不是一種什麼抽象的各個個人天生的東西。在它本身的現實中，它是一個各種社會關係的綜合」（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四卷第五九〇頁）。一個藝術家，時時刻刻都是一個社會鬥爭的參加者。列寧在「民粹派論爭的時候曾這樣高道：『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註一）這樣斷言說：歷史是由「具有所有各種思想與感情的活生生的個人」創造出來的。這完全是對的。但是這些「思想和感情」又由什麼東西來決定的呢？我們能不能真正地擁護這樣的一個意見，說它們是偶然出現的，而並不一定要從某一個固定的社會環境中產生出來呢？而這個社會環境正是個人的精神生活的資料和對象，它是帶着肯定的或是否定的一面，以及作為這一個或是另一個社會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反映在這個個人的「思想與感情」中的』（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二七九頁）。

作家同樣地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同樣地也是和他自己時代的社會鬥爭相聯繫着的，這就是說：文學在過去和現在，與生活之被動的鏡子式的反映絲毫無共同之處的。「思想家」和歷史的任務及社會的矛盾的關係，這可以拿許多優秀的俄國作家的活動證明出來。像赫爾岑、拜林斯基、乞爾

尼謝夫斯基、沙爾蒂科夫——謝維赤、萊夫·托爾斯泰——都是些熱烈的社會鬥爭的參加者。

列寧對於文學的觀點，是以對將文學從社會的與政黨的任務孤立開來的一切企圖的。至於講到每個作家的價值，可以拿這個作家對於大類之社會的及藝術的發展所給與的影響來定。列寧在他對於作家的評價中，時常都指出這些作家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列寧直接地講出，這一個或是另一個作家的作品，對於革命和人民有什麼益處或是有什麼害處。他這樣地對謝爾賓斯基道：「你以自己的藝術家的天才，帶給俄國的工人運動——其實不只是一個俄國——這樣龐大的貢獻，你還會帶來很多的貢獻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八九頁）。列寧對於藝術家的高爾基的評價，是把高爾基的作品在俄國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廣大作用指明出來的。

高爾基這樣回憶起列寧對於「母親」這本小說的意見：「這是不必說的，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覺地來參加工人運動的，但是現在他們讀了『母親』，這對於他們是有着很大的益處的。」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寫給「鐵匠」的作者塞拉菲莫維奇（A. B. 波波夫）道：「……你的作品和小說，引起我對你的很深的共鳴，我很想告訴你，工人們和我們大家是怎樣需要你的書……」（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九卷第五一八頁）。

列寧認為謝爾賓斯基、拜林斯基、杜布羅留波夫、乞爾尼謝夫斯基的活動及作品，在形成俄國社會的社會主義世界觀這一區上，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這些作家教育了整代的人。沒有他們這批人，則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是難以想像的。

列寧時時刻刻都認為文學的任務，是應該和勞動者解放鬥爭的任務相聯繫着。

高爾基說：列寧在偉天才的托爾斯泰這樣許多俄國舊時代改革者的身上，感覺得到一種值得稱讚的情感。高爾基這樣寫道：

「列寧細細地睜眼問我：

「在歐洲能拿誰來和他較量？」

「他自己回答道。」

「沒有一個人！」

「他滿足似地，搖了一下手，笑起來了。」

可是，這種驕傲的情感，並不能將托爾斯泰主義的弱點和反動的一方面從列寧掩蔽開。列寧在一九一一年寫道：

「四分之三世紀以前，托爾斯泰的學說的批判成份，還能够在實際上有時候給民衆的某些階層一點利益，不管托爾斯泰主義有着反動的和空想的特點。譬如說吧，最近的十年，這就不能够了。因爲從八十年代到過去這一個世紀的末了，歷史的發展稍爲前進了些。而我們現在，在上面所說的許多事實結束那「東方的」不動性之後，在這種時候，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之中那些自覺的反動思想，——狹隘的階級意識，自私自利的階級意識的反動的「道標派」思想得到了廣大的流行（註二），——這些思想甚至於傳染了一部分所謂馬克思主義者，造成了「取消派」（註三），——在我們這時候，任何一個企圖，要將托爾斯泰的學說理想化，辯護或是軟化他的「無抵抗主義」，他的向着「精神」的呼號，他的號召「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他的「良心論」和普遍的「愛」的教條，他的禁欲主義和無爲主義的說教等等，就會發生最直接的深刻的害處」（見「列寧全集」第五卷一〇三頁）。

列寧的文學論文——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最重要的文獻。列寧關於文學和作家的論述，是建立在具體分析俄國革命的動力，事實和現象上的。列寧的論文中的政治的正確性和透徹性，是和深刻的歷史性相結合着，它給了我們以前所未有清楚地認識過之藝術資產階級中的一切實質的東西。列寧並不爲托爾斯泰、創造的特性所限制着。他明確地指出了那些可以從托爾斯泰的作品中引出來的，對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運動含有教育性的東西。列寧所寫的關於托爾斯泰的論文，宣傳了革命的思想，並將羣衆團結在布爾塞維克黨的周圍。從這些論文裏面，讀者可以得到一個堅實的確信，只有在爲了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的道路上，只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勞動者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文學的黨性的原則——這是列寧對於文學科學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文學正像歷史科學、哲學和經濟學一樣，同樣是黨性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這篇文章，更明顯地表示出列寧對於文學本質的觀點，並提供出一個建立馬列主義的文學理論的基礎。關於無產階級應該提出來的文學的原則，將它發展並以最完善而完整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個思想，列寧會在他所有論文學的文字中——如論高爾基，如論爲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及組織布爾塞維克

出版事業而鬥爭的問題上——實際地表現出來。大家都知道，他現在「無產者」，「星」，「真理」等幾種黨報（註四）和合法的黨的刊物「教育」上，設一個文藝批評欄，並邀請高爾基負責主編的責任。列寧在回答文藝的黨性的原則之所在這個問題時，他會這樣說道：「……文學事業不能是個人或是集團的賺錢的工具，它……：……應該成爲無產階級的總的職業的一部分，應該成爲一個統一的偉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械的「齒輪與螺絲釘」，這個機械是由全體工人階級的整個自覺的先鋒隊所推動的」（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八卷第三八七頁）。

在俄國和四歐的貴族——資產階級的文學裏面，到處流行着藝術創造是有着絕對自由的這種見解。它是根據於一切反動的文學思潮，而和文學的黨性的學說對立起來的。資產階級的擁護超階級的、提倡絕對自由的藝術論的人們，遭到了列寧的最有力的打擊。宣傳反動的反民主思想的人們，他們想將藝術從人民分開，他們在過去利用過「藝術自由的」這個公式，而現在也還是利用這個公式。列寧稱「文學創造的自由」的這句要求，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個人主義的表現。列寧說道：「不用說，文學事業和知識的平衡，平衡及少數服從多數是有些不同的。不用說，在這一方面，必需保證給個人的計劃、給個人的傾向以廣大的自由範圍，必需保證給思想與幻想，給形式與內容以廣大的自由範圍。這一切都是毫無爭執的，但這一切只不過是說明了一件事實：就是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中的文學部分，不能用刻板的看法來與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中的其他部分等量齊觀」（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八卷第三八七——三八八頁）。

作爲思想活動之形式的文學的特性，並沒有推翻文學的黨性的原則，也沒有推翻這樣的一個觀點，就是文學應該和政治鬥爭及黨的工作相聯繫着。列寧聲明道：「我對黨不要宣傳什麼單調的系統，或者用幾個決議來解決任務，我對黨不要宣傳什麼單調的系統，或者用幾個決議來解決任務！」（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八卷第三八八頁）。在藝術家及作家的工作中最主要的一點——這就是複雜的教育與學習的工作。布爾塞維克黨，在嚴格地執行着列寧的教誨。這一個工作的最好的證明，就是黨在教育天才作家、藝術家、演員及音樂家中的老幹部 and 培植新的幹部上所展開的龐大的工作。在我們國家裏面，是重視天才的，並爲他們創造了一切發展的條件。

列寧在批評資產階級——孟塞維克的客觀主義的時候，指出前者的革命階級的觀點的黨性，是客觀的和根本的瞭解生活現象的前提。可是像普列漢諾夫這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了解這一點，他認爲文學批評的任務，只在於研究這一個或另一個藝術事實產生的原因和條件。據他月意見，評價

是不願認為研究的任務的。他對於現實研究的客觀性，來和對於現實的黨性的評價相對立——這就是普列漢諾夫的哲學觀點和藝術理論的最嚴重的缺點。列寧和普列漢諾夫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指出了藝術的評價的意義，是研究的客觀性的必要的前提。在列寧的瞭解中，藝術是客觀性的最高的形式，要求作家有最大的真實性和前進的世界觀。真正的黨的文學，首先應該是真實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認為文學作品對於社會的影響力量，是有賴於所描寫的歷史真實性。文學中的黨性和真實性的要求，是不應分開來的。馬克思曾經這樣指示過拉薩爾，「假如他在『法蘭茲·馮·金根』這個悲劇中（註五），能更正確地描寫出歷史的現實，『那麼你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在最純粹的形式中……』」（見『馬恩選集』俄文本第一七三頁）。假如拉薩爾對歷史處理有更嚴格的觀察，那麼他的悲劇所起的藝術的及社會政治的影響力量也會更大。

列寧關於文學的黨性的學說，是綜合了世界文學史的命題經驗。反映論和文學的黨性的學說，——是統一的馬列主義世界觀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文學科學中的真實性和黨性的要求，以及對於這類要求的理論上的認識，——這是馬列主義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正確而有義的道路。

（上接第一〇五頁）

廣拉特主要是因為在體地上面插不下去，下海去當水手。苦苦的十年無法脫離。他的『颶風』，『黑水手』，『吉爾希』，『勝利』正是海上生活的人們苦痛奮鬥的復現。左拉就和他同樣。參加是爲了研究，而生活自身却是一個動力，牠可以完成牠自己，也可以完成其他的工作。一個是靜的，一個是動的，一個是消極的，被動的，一個是積極的，生動的。自然主義者們之表現得平板，瑣碎，缺少動力，原因就在這裏。

第三個表現，還是回到我們在第一個現象裏所提出的那一點：人被當成了研究的材料而沒有當做生活上與我們自己血肉相關的人看待，雖然在第一篇第三節裏面，這一點是重疊邊的小星那麼亮了一

當做材料，自當研究，研究實力，就可以達到生活的廣度和深度——社會的，歷史的觀察。這是一個自然主義者所完成的最高點。但是，人，生活，終於是材料，牠所需要的是搜集，處理，組織，自然用不着生活的密度，內心的接近了。然而這密度的一點却是每一個現實地生活着的人，每一個文學上的現實主義者所必要的，決定的一點。牠要求我們超越自己，設身處地的關心旁人，懷念旁人。那兒有人的苦痛，那兒沒有自由，那兒就是我們所在的地方。

事實上，自然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中間的分水線就在這人我之間的一點上。自然主義出於十九世紀的法國，基本的是個人主義的立場和同情的表現。這個立場，能够限制許多有才能的作家們。然而當前的社會的苦痛又壓迫着他們使他們不能安於自

（註一）米哈伊洛夫斯基（一八四二年——一九〇四年）是俄國民粹主義的一位理論家，主編『俄國財富』雜誌，宣傳民粹主義的思想，自稱爲是『人民之友』，與馬克思主義者作鬥爭，列寧在一八九四年所寫的『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就是批評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思想的。

（註二）『道羅』是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斯時魯威等人所編的一本論文集，一九〇九年出版，表現出反動時期的自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許多反動和神祕主義的傾向。

（註三）這是俄國革命反動年代中（一九〇八年——一九一四年）的一羣孟塞維克所形成的的一個派別，包括瑪爾托夫、馬丁諾夫、唐恩、阿克雪羅德等人，主張取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在斯時魯威的統治之下取得合法化的活動。

（註四）『無產者』創刊於一九〇五年，『星』創刊於一九一〇年，『真理報』創刊於一九一二年，俱是代表布爾塞維克的報紙。

（註五）拉薩爾是一位德國工人運動的領袖及組織者，是威爾遜的革命家。『法蘭茲·馮·金根』是他所寫的一個歷史劇本，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會寫過信給他，批評這個劇本的缺點。

己。他到接受了自己靈魂上的限制，其努力無何破那物質上的阻礙，所以他們必須參加進去，而且必須抱着研究的態度。他們的努力是十分值得注意，值得珍惜的。但是對於我們，對於一個現代的現實主義者，至少是傾向於現實主義的學徒，這個辦法却并不在第一位的地位。現實主義者有自己具體的立場，動力的表現。現實的人道主義的關切應該成爲我們的起點和道路。

再說一次：我們以爲這一本書是有分量的，有作用的，作者的精力并不白費。我們也不是說作者是一個自然主義者，不，有些地方，他批評過他所引證的人。從他的作品看，他也不是一個瑣碎的自自然主義作家。不過，爲了完成一本書的作用，我們不得不把牠可能發生的影響指出來以便讀者能够在實用上得到牠的真正益處。

內政部重發新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東川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爲第一類新聞紙
 重慶市警察局登記證警字第二八二一號

本期零售一元



要目

日本國內現狀

吉川勇

戰時日本獨占資本的發展

黎韋

日本空軍實力

V.L. Ortelov 作
趙敦譯

物與理

陳家康

——馮友蘭先生「辯理學」簡述之二

日一月三年二十三

目錄

時論

紀念巴黎公社七十二週年

希墨令較

甘地絕食與印度政局

限價實施後的工作

日本國內現狀

戰時日本獨占資本的發展

日寇空軍發展的概略

日本空軍實力

批評

物與理

——馮友蘭先生「新理學」商兌之二——

介紹

列寧論文學及其他(下)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四)

吉川勇(一一五)

黎韋(一一八)

北君(一二九)

VI. Gruber 作
黃教譯(一三三)

陳家康(一二六)

謝爾賓娜作(一三三)
黃實權譯(一三三)

群衆

第八卷 第五期

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群衆週刊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理 新華日報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西安
各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 一元

六期 五元四角

十二期 十元

廿四期 十九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紀念巴黎公社七十二週年

「巴黎公社」的光輝旗幟，今天已是距它飄揚在巴黎城頭的七十二週年了。

「公社」的鮮紅大旗，指示了全世界勞動者解放的道路；法國勞動大衆在「公社」旗幟下反抗普魯士侵略者與反動的梯格爾政府的英勇鬥爭，永遠不會被年代的悠久而湮沒它的光彩。尤其是在目前人類和平的大敵希特勒奴役了歐洲廣大的領土和民族，反法西斯鬥爭正處在最後決定勝負的關頭，「巴黎公社」的革命傳統，正被蘇聯武裝的軍民發揚着，不斷地打擊着希特勒的毒氣，在今天，蘇聯的紅軍，已成爲世界人類爭自由最堅強的堡壘。

「巴黎公社」的革命傳統，也正被法國西的勞動大衆發揚着。在蘇聯與七十二年前相似的情況之中，他們高舉着反納粹德寇的旗幟，與法國資產階級的鬥爭大衆。我們今天來紀念「巴黎公社」的誕生，不期然地嚮「公社」的「孫子」法國西勞動大衆幾年來不屈不撓的鬥爭，致以最高的敬禮。

法國西勞動大衆幾年來反抗奴役主希特勒的鬥爭，其英勇和壯烈，非書不盡言，是難以用筆墨來形容的。大的示威罷工，幾乎是在法國各大城市不斷發生，巴黎、里昂、克拉克、里昂，到處都展開了反侵略者反賣國賊的政治鬥爭。納粹屠殺「人質」的罪行，嚇退不了他如焚如渴的爭自由的赤忱。

法國工人組織英勇的舉動，我們只要引一段法國共產黨領導人托米尼的談話，就可明瞭其子侵略者打擊之深重。她說：「最近運動極其普遍，最近一星期內，單是第戎車站就燒了六十個火車頭，

不論大小工廠皆有共產黨員組織的怠工運動，譬如德軍運送到東歐線上的罐頭食物，其中就有許多是放了毒藥的。坦克車和卡車出廠之後，往往馬上就壞」。納粹掠奪法國資源與生產物品，顯然是不顧利的。

不僅這樣，法國西的勞動者，不管納粹與賣國賊如何威脅利誘，始終拒絕了赴德做工，贖代爾的征工赴德的工作計劃，受到了慘重的失敗，納粹利用法國人力的幻想，也終未能如願以償。

法國勞動者這種鬥爭的進行，是一天一天發展的，法國西淪陷以後，在反抗侵略者與賣國賊和光復法國獨立的口號之下，廣大的包括各種組織的勞動者團結起來了，顯成了更堅強巨大的力量，由於勞動者反侵略者鬥爭的英勇和其政策的正確，使廣大的統一戰線運動發展，法國的工人與許多愛國的民族資本家，已形成了共一戰線的基礎，法國民族團結，是更進一步了。這一股壯大的洪流，如今不僅在破壞敵人的生產與交通上揮動着鐵拳，更進一步，已展開了與敵人武裝的搏鬥，法國的游擊運動，正逐日擴大。

法國西勞動者的偉大鬥爭之展開，我們一點也不能遺忘法國共產黨——巴黎公社的後裔繼承者，他們在領導這一鬥爭中所起的巨大無比的力量。

格來尼說得好，法國淪陷後，「在恐怖統治之下，法共是唯一能够保存其組織機構的政治團體，也是第一個進行有組織的反抗的政治團體」。法共的領導人摩利斯·多萊士，至今還是堅持在淪陷的

區域領導人民作反法西斯奴役者的鬥爭。

法國共產黨在其堅定英勇的領導反納粹征服者與賣國賊的鬥爭中，付出來最昂貴的代價。法共黨員因參加游擊戰爭而被槍斃，被虐殺，被判處死刑的已達一萬人，現在還在獄中的尚有黨員四五萬人。法國共產黨人憑着這種崇高的犧牲精神，做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單就以「人道報」與小冊子的發行來說，已在萬分危險情況下，發出了六百萬份。雖然因此而被捕槍斃的人數，達參加發行工作者的十分之一，但敵人仍無法摧折這一莊嚴的事業。

法國共產黨已與自由法國的領導者高舉成立其了戰鬥的協定，這是法國西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一重大事件。我們從上述幾項事實來看，已經清楚地說明了，法國共產黨在這一重大考驗中，真正配稱得這一布爾什維克的黨，總能在最困難環境下步驟一步，能够發揮英勇犧牲的精神，能與羣衆密切聯系，並且能够正確的運用戰鬥的民族團結的策略。法國共產黨，法國的勞動大衆，憑着他們幾年來鬥爭的偉大經驗，已經不愧稱許爲「巴黎公社」的「子孫」，法國西是終於要獲得解放的！

法國西的工人階級，在戰鬥中鍛鍊得更堅強了，他們時時記着大詩人雨果的話：

「我們來爲了祖國，開始恐怖的戰鬥吧！法國游擊兵，斬除前面荆棘；波越奔騰溪流，穿過山谷，以倒斃者，消滅侵略者！」

「巴黎公社」永遠活在全世界勞動者的心頭！永遠是勞動者的力量，這力量，正如怒濤般澎湃在反法西斯鬥爭的最前線！（操）三月十一日

希 墨 會 談

蘇軍反攻連獲大捷中，希特勒有不少頭痛的問題。重要問題之一，就是意大利。德意關係問題不解決，希特勒的軍事，會受影響。

墨索里尼的軍隊，真是常敗軍。在東線，南路的意軍完全被蘇軍消滅了；在北非，也是敗得片甲不留。墨索里尼在上月改組內閣，就含有繼續作戰和準備後事的兩層意思。也就是說，意大利退出戰爭的可能性，已經成了希特勒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希特勒在納粹執政的十年中，沒有到柏林，以後的幾次照例他應狂吠的機會，他沒有露過面。可是，解決意大利的問題，他是親自出馬了。這也說明希特勒對它的重視，也反映出這個問題的棘手。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會談，始於二月二十四日，而於二十八日結束。希墨會談在德意邊界。這一天的會談，顯然決定了德意之間合作的幾個基本原則和辦法。細節是由里賓特洛甫在柏林而進行的羅馬會談時討論的。

希特勒對意大利究竟提的什麼基本原則和辦法呢？塔斯社伯爾尼二日電告訴我們：「據外交界說：里賓特洛甫以照會致送三國公約之各國政府，要求各國慎勿進行兩邊之談判，並不得由公約簽字國締結地方性之協定。里賓特洛甫代表德政府建議：凡與公約簽字國一國或數國有關之外交、內政及戰爭政策之一切問題，統應由所有簽字國共同討論。希特勒說這是「建議」，而且「主採納」，這就是說意大利和其他軸心國應該完全聽命於希特勒，——「共同討論」云云，只是外交詞令而已。

在這種基本原則之下舉行的希墨會談，就具備了三點計劃：一、恢復意大利在地中海之海空活動；二、意大利積極參加東線方面之戰事，以便阻止蘇軍之進展；三、意大利實行人民動員以後，應再以勞工供給德國工廠之用。以後，「里賓特洛甫奉命前往羅馬與墨索里尼商談會談」，而「索信里賓特洛甫羅維之行目的之一即係討論由德政府所提出建議而引之義務」。

從這些報道看來，可知希特勒對意大利所採的辦法是使德國對其各方面的控制和指揮「合法化」，並使德國對其各方面之控制，實際上，這就是希特勒以空言安慰墨索里尼，加重了他對意大利人民的榨榨。對墨索里尼的壓力。勝利者是希特勒而非墨索里尼。

希墨會談，表面上解決了希特勒所希望解決的問題，而實際上呢？「據瑞士首都蘇黎世：羅馬、柏林新基及布達佩斯對里賓特洛甫照會之反映，已在柏林造成不利之印象」（塔斯社伯爾尼二日電）。希墨商定的三項具體計劃所引起之德國國內的印象，是也會在反映到柏林的！這樣看來，這次會談不僅不會消除德意矛盾，且將更加促進，同時，也將促進德國內部的矛盾。會談之後，意大利就要執行這三個具體計劃，而其中無一項計劃不會增加德國的困難，特別是人民之憤怒和反抗。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地中海上恢復活動，他並沒有充分的力量，也不見得有拚的胆量。恢復活動既以恢復刀為前提，這就不容墨索里尼主動決定了。如果他冒險而

拚，或聽命而拚，結果是活動固然恢復了，刀也總是再也恢復不了啦。這是一。其次，蘇軍在東線繼續意軍團的事，本來就是墨索里尼改組內閣的一個重要因素，現在還要意軍去「阻止蘇軍之進展」，也就只剩了不被消滅或投降的出路，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命令去做，就是自戕其力，不僅阻擋不了蘇軍的進展，還要損兵折將，更要加深德意之間的矛盾。再其次，人力的動員及以人力供給德國工廠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這是意國人民最殘酷的辦法，也是使德國工業失去勞動力而更趨落後的辦法。墨索里尼這樣做去，不說實行困難，其後果定是一顆炸彈的爆發。所以，墨索里尼步維以地中海為內湖，得到的定投入更大的困難。而希特勒的「題更難，墨索里尼所處在的矛盾，也更顯得更尖銳。

過去希墨的會談，是德意軸心將有大動作的徵兆，是兩法西新國家抱負勝利夢想的握手。在蘇聯反攻勝利聲中的希墨會談，是軸心國走下坡路時希特勒極端掙扎，極端驚慌中對墨索里尼的「威壓」了！是希特勒用公約的威逼和利誘來挽救危局的措施了。性質不同，內容不同，一次次的會談，越來越明顯的現露出自掘墳墓的性質了。

然而，希特勒的殘暴力量還很強，墨索里尼還是聽命於希特勒的，而希特勒的做法，也絕不聽從絲毫不能收效。要便意大利的大山爆發，決使希墨同歸於盡，就決不能等待，更不能對墨索里尼有所企望，而只有英美趕快開闢第二戰場，和反攻中國的蘇軍配合，打向柏林和羅馬。（三）三月十日

甘地絕食與印度政局

自去年印度國民大會領袖被捕後，英印之間，即淪入僵局。甘地先生就在這僵局之下，實行了三個星期的絕食。

甘地的絕食並非突然的。在絕食之前，他曾與印度總督林里查哥往返函商。函商的结果，甘地認爲除以絕食方式來表示自己的堅決意志而外，已無他途可尋。二月十日，甘地即以函件正式通知印督，於即日起，開始三個星期的有期絕食，自二月十日上午四時算起，至三月三日上午四時止。算起來，這已經是甘地平生的第六次政治絕食了。

甘地絕食後，英印政府曾將甘地與印督往來函件公佈，並加以說明。據新德里十日路透電：「公佈信件中續稱：甘地表示如獲釋放，彼願放棄絕食抗議，否則即行絕食，足知除無條件釋放外，已無法阻止其絕食」。這就說明甘地絕食的第一個重大要求便是立即釋放被捕的印度政治領袖。

甘地今年是一個七十三歲的老人。一個七十三歲的老人，能不顧生命危險，來爲他所代表的民族解放事業，進行絕食，的確是感動人的。這首先表現在印度羣衆的反響上：阿麥達巴德所有之紡織廠，曾於十日十一日完全罷工，孟買商場亦同時罷市，暨投甘地。十一日英國印緬大臣亞梅利在倫敦下院，答覆工黨議員索倫生之詢問時謂：去年以來，印度騷動時期，共逮捕六〇、二二九人，其中三九、四九八人仍未釋放。並謂，同時期內，警察被迫開槍四七〇次，採取軍事行動六十八次。足見去年甘地及尼赫魯領袖被捕所引起的騷亂規模之大。

此次甘地絕食的最初數日間，由於阿麥達巴德及孟買的罷工罷市，立刻使人發生印度是否又要引起騷動的顧慮。工黨議員索倫生對於亞梅利的詢問，恐怕就是出于這個動機。

甘地絕食是一件大事。它首先對於印度各黨各派的政治態度有所考驗。據新德里十三日路透電：「印度主要人物約一百五十人，業已被邀於下星期四（按此係二月十八日）出席新德里之會議，以便考慮因甘地絕食而引之局勢。諸東中著名之發起人有馬德拉斯前總理孟買，孟買前民政廳長兼希，勞工領袖車希，自由黨領袖孔蘇魯等，自由獨立黨領袖薩泊魯已允出席。其他被邀者有國教聯盟領袖真納，孟買拉者總理拉登等」。新德里會議按期於十八日開始舉行。十九日，該會議之起草委員會草定要求立即釋放甘地之決議案。由於局勢緊急，在此種決議案尚未提交政治領袖會議最後通過之前，即已送印度總督之私人秘書。

二十日，印度總督之私人秘書復函自由獨立黨領袖薩泊魯，說明總督之態度。二十一日，政治領袖會議即對總督私人秘書之覆函加以討論。據中央社新德里二十一日專電：「印度政界領袖會議，關於釋放甘地之要求已遭總督拒絕。其秘書復函時答覆薩泊魯稱，關於甘地絕食一事，完全由甘地負責，以故結束此一絕食之決定，亦必須在甘地，而非政府。是項拒絕，令大部份領袖深感遺憾」。是日（二十一日），政治領袖會議又通過決議：致電邱吉爾，要求立即釋放甘地。據孟買二十四日路透電

：「印度政治領袖會議發言人薩泊魯，頃得英相邱吉爾來電謂：「甘地固是絕食前得條件之釋放，但英政府不能對人民負責任」。於是甘地之不能因絕食而獲得釋放，遂成定局。

現在，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這次印提各黨各派對於甘地絕食問題的態度。據同上電載：「蓋印度政治領袖會議先曾致電邱吉爾首相稱：來自印度各地之三四人士，其代表團體，包括各階級社會，各種信仰與利益，舉凡工商學，地主，工人，共產黨，印度教，回教，基督教，錫克教及英印政府團體，無不有人參與，昨在新德里集會，一致通過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甘地，因其絕食狀況已瀕危境，吾人相信設非立即釋放，甘地生命將不保矣」。由此證明，印度內部，不論那一民族，不論那一階級，儘管思想不同，利益不同，但對於要求釋放甘地，以及釋放其他國民大會領袖，則是一致的。這在印度民族解放運動途程中的重大問題，就是全民團結的民衆統一戰線的問題。此次爲甘地絕食而召集的印度政治領袖會議，正是印度民衆統一戰線前進一步的表現。毫無疑問，印度民族統一戰線並未停止，它是在積極地發展中。

英印方面，同樣有廣大的人民羣衆要求釋放甘地，以便重開英印談判。據孟買路透電二十二日電：「哈利·波立特今日代表英國共產黨致電印度總督，電文稱：此間進步方面意見，深望地關心甘地度危境的利益嚴重。我們要求釋放甘地，以恢復大會的領袖們，數重重開談判以結束政治上的僵局

，爲了聯合國家的利益成立一致的協定。波立時又以同樣之電文一份發交印緬事務大臣亞梅利。這一個電文的確可以代表英國廣大人民的意見。

現在，甘地第六次的絕食已經結束，但是印度

政治的僵局，並不因甘地絕食之結束而結束。事實上，解決印度政治僵局的方案，不是沒有，印度共產黨在去年即已提出一個切合實際的方案。然而問題在於英印雙方未能站在互相諒解，互相信

賴的基礎之上，討論一種切合實際的辦法。我們希望，英印當局，能以大局爲重，打開僵局，展開談判，這不但關係於英國的作職前途，而且關係於整個同盟國家的得失。（康）三月十日

限價實施後的工作

限價政策的實施，快速個月了。各地實施的情形不同，有的是全省各地一律實行限價的，如湖北，江西，陝西，甘肅等省；有的則先從都市入手，逐步推行的，如四川，湖南，廣東，廣西，貴州，河南，新疆等省。在限價的對象上，各地也不盡同，有全體限價的，也有從生活必需品着手的。經過這五十多天的努力，各地限價的成績，頗可觀。最主要的是，限政限制了一部份商業資本的囤積居奇的活動。不過，因爲這一工作在中國是以前例的，所以，在施行之初，不免有些不正常的現象發生。

最容易覺察的一件事是有行無市的現象。這是物資匱乏的反映。有一些地方，陰丹士林布失蹤了，百貨店在缺貨，花紗市場在停滯，糧食和燃料亦不易買到。物資匱乏並不是不出賣，奸商的目的在於賣得好價錢。於是，限市就波動起來了。所謂「界外貿易」，就是這一事情的發展。豬肉一斤卅元還不易買到，紅糖早已超過規定價格，達到廿元一斤的程度；茶油每市担漲至一千四百元；山米每担漲至九百元以上。除此之外，還有商品變質，以低價貨冒充上等貨，偷工減料，改變質量等現象之發生。據報紙的記載，違反限價案件已達七十餘件。當局雖然極力檢舉，但這些缺點，遠未完全克服，市場商業市場，無形中籠罩了灰黑色的帷幕；人民的心頭，也籠罩了沉重的鉛塊。不要說人民，就是機關的小職員亦好久不知肉味了。（略）

限價的這一些缺點，是由主觀客觀各種因素形成的。在限價的辦法中，本身固有缺點，而客觀的因素，也正促成這些缺點的發生。如果我們加以研究，則可看出下面各點：

一、限價工作人沒有充分的準備。如對於農產品，產地價格與銷地價格的規定，事前缺少週密的調查。因爲產地的價格規定而銷地的價格規定得低，故商人不願販運，因而造成銷地的供求失調的現象。以棉品的成本來說，原料的價格有不少是超過製成品的。如棉花，棉紗和棉布的價格，就是明顯的例子。因爲原料與製成品的價格沒有很好的調整，所以生產者就感到困難而不能增加了。以運輸之運近而言，交通不便，運費較多的地方，物價自應高一點，但有些地方入口貨的價格核定得比入口地價格爲低，因此運商就不樂意運入了。

二、（全段被略）

三、商人的投機舞弊，是限價困難的重要因素。限價施行以來，政府雖然嚴令取締囤積居奇，但奸商並不放棄他們的狡猾手段。他們一面奉命限價，另一面則從中搗鬼。譬如棉紗的價格核定得過高，政府爲調整價格起見，特令存貯棉紗去年價格出賣後，新棉才依一月十五日核定，但商人和某些不肖份子，便於此時大量囤積棉紗，以備將來買充新棉，多獲厚利。因此在最近這時期，陪都的棉紗，便悄然不見於市面了。上面所說的物資逃避，界外貿易，以至變更質量等病態，都是這些成類「別出心

裁」的感劇。

四、在限價實施時，缺乏提高生產的配合，再加以原料價格與成品價格的不協調，形成原料來源的困難，於是生產額便未能顯著增加。上面所說的一些困難，便環繞這一點而開展了。同時，幣值的跌落，又在物價上反映出來。這是物價問題繼續之所在。對於這個難題之解決，我們的努力分明是不夠的。爲了克服限價的缺點，政府近來正在設法。計在進行的工作，有登記物資，重新議價，及定章分配等項。從治標的眼光看來，這都屬輔助限價應取的辦法，但主要的事情，是積極的大量的增加生產。因爲要掌握物資，要限量分售，都必須以豐富的物資爲前提。假如生產不發展，物資的供給不豐富，那末，掌握物資就沒有前提，限量分售亦就落空了。至於重新議價，尤須注意已發生缺點，對準這些缺點，使限價的具體辦法，更切實，更合理。切實合理，就容易執行。最後在物資登記方面，除了慎重經濟檢查隊的人選與嚴密其組織之外，還要使各地行政機關能與民衆打成一片。上下協力，爲進行限價而工作。在這些工作內容中，是在於使商人長法，使他們沒法子作奸犯科，使人民却罷了解限價的意義，積極幫忙政府執行限政，大膽的檢舉囤積居奇與投機操縱。只有從上述各方面去努力，才能收平抑物價，杜絕黑市的實效。（芬）

三月十一日

日本國內現狀

吉川勇

日本法西斯軍閥在昏睡中。

它的軍需生產顯著地在低落。

在西南太平洋上和同盟國軍隊的接觸點——所羅門、新幾內亞等地，已陷日本于其受不了的大量消耗戰的悲觀情態之中。這使日本不得不一面以其可憐的生產力去支持龐大的大量消耗戰，同時不得不使美國龐大的人的生產力的壓力及其反攻力的刺刺增強之前發料起來。

因此，對於日本，從軍事看來，當前的急務，就是鞏固南洋佔領區，開發資源，增進實力；同時不惜一切的犧牲，遮斷西南太平洋美澳間的航路，削弱其反攻力量；並於大體戰場的危險地點，作必要佈置，使其雄厚的反攻力量無法結集，去收拾中國戰場。

他們（指日本軍閥）自去年年底就拚命地向着日本國民訴說將來的困苦和危險。他們也明白地承認要避開同盟國方面的威脅，必須採取上述的戰略。例如：

「總而言之，為日本設想，要制澳洲之生命，必須遮斷其運輸之路；在日本今日，向着這方面進行是最必要的。」

「若失掉澳洲，從美國看來，對日戰爭就非常困難的了。」（引自「時局雜誌」十二月號「世界戰局大觀」）

又如：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日戰爭的解決，就帶上了新的重要的意義了。」（引自「東洋」八月號「支那事變解決的諸問題」）

如此，就不得不使軍事上去增加同盟國的反攻的困難，並同時使軍需生產的困難，加強佔領區的掠奪，以解決自己軍事生產上的困難。

日本的軍事生產為什麼今日會低落呢？簡單地說，這是因為從軍事生產的材料，主要仰給於美國方面的輸入，現在不能不迅速地確立起能夠自給這些材料的生產機構，而實際上直到今日甚至連充分的意見也沒有建樹起來。因為如果這種生產機構沒有確立起來，就連那從西南太平洋佔領區掠奪得

來的原料，也不能成爲軍需品生產的材料。

日本的軍需產業的特徵是加工工業的龐大。它有巨大的加工工業的機構。但是，譬如吧，即使儘量把加工而變成大砲，如果它的基礎的製鐵工業業貧弱的話，在鐵的輸入已經不可能的今日，這種巨大的加工工業的機構，就不得不投閒置散了。所以「由於材料不足而現存設備的能率低落」這種呼聲，就和「國內勞動力的缺乏，因經濟封鎖而生的資材的減少，過去的儲存品的減少」等等一樣，被強詞地喊叫着。同時，基礎產業又因爲運輸船力的不足，甚至連照常供給也陷於非常困難的地步。於是，當面的問題就在於：首先拚命調整生產機構，使它能夠確立自給的生產，同時拚命加強運輸力；而在調整之前，對於「現存的設備」，採取一切非常手段，供給它材料，來彌補這個過渡時期。

什麼叫非常手段？那就是剝奪國民乃至佔領地住民所有的生活物資，轉用於軍需加工工業的材料的意思；也是把所有一切運輸力用於這些物資以及從南太平洋掠奪得的原料的輸送；不管國民大眾的喧嘩號泣，停止他們的生活物資（衣食所需的物資）之類的一切運輸，使國民大眾忍耐着極大的困苦。

這就是他們所以大聲疾呼着「使不可能變成可能吧！」的原故。

由此可見，日本國民是陷在怎樣的飢餓缺乏的泥濘之中！

現在讓我下面來介紹一個士兵——一個屬於豐島部隊到去年五月爲止駐紮漢口附近，曾一度歸國的士兵——的一篇關於日本國內的暗澹情形的報告吧：

「我們「歸還兵」從上海出發，記得是去年的五月十五日。那時的高興，真是不能形容的！經過了一切檢查之後，就上船。在駁貨船狹窄的甲板上，高興得像小孩似的跳躍起來。和戰友們像夢似的交談着已經有四年沒有會面的父母、兄弟、和朋友們的事體。經過兩天三夜的愉快的旅程，終於在宇品上岸，受着嚴重得可怕的身體檢查和裝備的檢查，跨上了走向內地的

第一步。但是，事實和期待相反，食品是極其冷淡啊，連歡迎也沒有。先到名古屋的原隊，回到值得懷戀的東京已是六月四日了。

我環視完全變了樣的東京的姿態，不得不吃驚起來。美麗的夢被打得粉碎了。代替美觀的東京，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因汽油統制的影響，圓形的動車沒有了；「巴士」（公共汽車）減半，而且全部變成木炭車子，向街道上撒布着不肖生的炭屑和灰塵而駛去。同時，人力車增加了。還有在自行車側面裝着箱子的奇妙腳踏車，等等。宛然是「文明開化」的明治初期的電影。街上穿着洋服，個個而顯着木履的紳士。據說渡邊自從前年又被許可了，到處可見摩登頭髮但不擦脂粉的黑臉孔的姑娘們。電車搖蕩蕩那發出吱吱怪響的舊車在行駛，從車窗望出去，兩傍街上的商店，都冷落得「門可羅雀」，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悲哀。

無論怎樣說，在內地，衣食住的必需品是最感不足的。一切都歸統制，配給制度是徹底的。

米，因甲乙丙級和職業而分其不同。當時，我是討還兵沒有職業，屬於甲級配給，一日約得二合強。這對於剛從戰場歸來的我，是難堪的苦痛，在戰地聽說已由六合減少到四合半，但在這裏，還多不上它的一半。

加之，每月還有二三天是代用食品，即是配給麵與出芋之類，只好對付對付。副食物如青菜類，也是三日四日配給一次，只有一點點，據說主要原因由於農村生產工具的缺乏和戰後結果的勞力不足。魚類的影子從魚店裏消失了，四日一次可以得到一點鹽醃鱈等不良品的配給。原因是軍部徵發了漁船。

在乾菜店頭，看不到一切葷類的影子，罐頭之類更不消說。糖，以前行憑券制以來，照規定是每人一月可購十來兩（〇・六斤），但因缺貨，實際差不多沒有配給。糕餅類只配給七歲以下的小孩子，八歲以上就得不到。想起在戰地每星期二次的下賜品來，真不勝今昔之感。

牛乳、雞蛋之類，依據醫生的診斷證明，配給少量給病人，因為手續困難，不易入手；但你自己養起雞來，每次生蛋還須向警察和公署呈報。強迫國民浪費了這樣麻煩的時間和精力，這說是不謀不謀保有國內的食糧！

米的統制，必要要派及到酒類的統制，每人每月可以購買酒五合，啤酒三瓶，購買時須拿瓶子去交換，顧客們還須低下心機能購買得到。不幸把瓶蓋弄壞，就不行了，白讓他的瓶蓋一頓，酒利神酒落了空，一個世味幸虧

的世界。醬油、薑醬、鹽，不消說都是配給。一點多餘也沒有，不自由之至

街上，傍晚從五點到八點，拿了飯票去可以買到一碗飯。酒排和咖啡店，減了一半，午後五點開店至十點打烊，顧客像洪水似的湧來，讓你等待二個鐘頭之後，才把水樣的酒一人發你一合！要麼多飲一滴也不能够。香烟也統制了，和以前大不相同。拿空盒子去，可以買一盒。也要跑很遠去我有香烟賣的商店，有時只看了「賣完了」的牌子空手回來。經過二三日，能夠用一角八分錢買到一盒「光」牌，算是幸運的。

聽到「壽司」（一種用魚酢和飯捲成的飯捲子）變成了麥飯，你會吃驚吧。出去旅行時候，訪必要帶點青菜和米，到了宿頭，才能夠臨旅館或旅館親戚家裏替你備飯。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今年的正月，費年禮品不消說是禁止的，年糕是每八二合預先發票了的；有的地方，從一早天還未亮就擁擠着一大堆人，喧嘩吵鬧，剛到警察隊出動才得排成長長的一列，站著等滿直到晚間，能夠買到的只有半數人。得不到手的，還不是算了！有許多想起家裏的孩子在等著正月的年糕等得焦急的，父母到也只好懷着悲哀的心情空着兩手回去。水菓也只因為是新年才配給到幾個桔子。

東京的房租平均由三成漲到五成了。房子還是不易租到。炭的配給，我們家裏一共五個人，每月只分到一袋。這是配給不用瓦斯（煤氣）的人的份量。若用瓦斯，就只能得到三分之一。街上老是半明不暗的寒冷。只有從事軍事生產的工廠，得到電力的充分的配給。

關於家庭用的雜物，肥皂每月一塊，火柴分小、中、大、特大四種，依照人數配給。橡皮製品完全被禁止了，在去年的明治節，配給過一次橡皮球給孩子們，是四五個孩子共有一個的。橡皮製或金屬製的玩具完全配給銷燬了。拿鐵來說，從剛裏的大舖開始，在都市，從水道檢到檢站站口的鐵板，下水道的穴蓋，交叉路口備用的機械，通通配銷了；還有家庭用的鍋釜乃至鐵快子，差不多都用木材或陶器去代替，金屬配給政府了。一切配銷了彈丸、兵器，被送到戰場去。從前，築地一帶的空地，到處散佈着空鐵罐盒子之類的破銅爛鐵——皆於無法收拾；現在呢，連一橫針也再不會落掉在那兒了。那些廢物的蒐集，由各個婦女團體及小學生們，作為勞動服務在擔任，小學生們拾起者似的數著看在那些空地上到處配銷。一想到對於

子們的教育上的影響，真是令人寒心。

衣類的統制，是每年一人給你一張一百分的購買券，例如，規定洋廉一套值五十分，國民服、和服三十分，外褲衫十五分，這樣，如果你做了二套洋服的話，那末，這一年就不能再購洋衣了。其他襪子、洗滌巾、手巾、防霉口罩、線類等等，都是規定好了分數的，而且衣服類雜品類，一切都換了入換雜類，是極容易換的。其中，手巾一年只規定三條，白布丈四，襪子四雙，醫生所用的小繩帶類，現在都用過了又再清毒的舊東西。在戰地發下來的襪子之類，在東京是找不出來的。皮鞋是較革代用品，價格從四十圓到五十圓，一歲着下雨弄濕了，就廢棄不穿，毫不經穿。

一切都受着嚴格的統制，商店之類約有三分之一被合併了。小的商店都被合併於大商店，小店經營者的大多數都沒有飯吃。這些老板們，有一部分去充軍事工廠的臨時工，其餘的則走投無路的時候，只好去麻煩警察署請教苦情請求介紹職業。但是，警察署會替你介紹職業嗎？這不是從國內放逐出去的政策，給你一個「在內地沒有飯吃的，到內地去罷」的鼓勵拉倒。

在公司、工廠裏，還被強迫實行「國民儲蓄」。男工三圓以上，女工一圓五角以上。在隣近（像保甲之類的小組）也因為政府的獎勵，儲蓄額予要互相傳觀。到納稅時向郵政局或儲蓄會，就奉會儲到「來支錢的只有你一個！」這樣的真話，結果把郵局的儲蓄排在前後。分紅是一半用債券一半現款，就是那一半現款，也不免要用儲蓄會購買債券的方式繳納給政府。在國庫的交際中，總是被催促儲蓄，分派公債，勞動服務之類的事體，所以，現在的日本人民的實際收入已經快低到一半了。

結婚制度也完全變樣的了。男女雙方想結婚的話，首先就要呈報區公署，區公署即便兩人給醫生診斷，通過了就可以結婚。如果男或者女有疾病的嫌疑，婚姻就不成立。這是執行着政府增進生殖的政策。雙方由愛情而自由結婚的事，現在已談不上，甚至連父母的意志也被抹殺，在機關中，知道那裏的孩子滿了二十歲，這裏的姑娘已滿十八歲，恰好是一對就讓他們結婚吧，事情就這樣定規，人類究竟是像家畜的增殖似的被處理着。

最近社會對於出征士兵的家屬是極其冷淡了，在彼此都沒有顧到別人的臉色的今天，這也是無法的事體。
內地寄給戰地的信件，和兵士寄回故鄉的信件一樣，都要在郵政局裏經

過官憲的檢查，就是這裏也和在前線的情形一樣，真實的話一句也不編寫。士兵出征的時候，住時是萬籟寂寂像神似的熱鬧地去送行，可是現在呢，叫做「昏夜召集」，就只隨身衣服，被在秘密指令下被召集了去。所以，近國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被召集到什麼地方去的。只覺得最近現在這裏的歸居的青年已經不見了，直至隔了些時，郵局送到一張寫着「幾百幾十幾萬」，連地籍也不明白的明信片之後，纔曉得是該召集了。

戰死者的葬式，現在是在炮鎮內許多名同時舉行合葬的。自去年春大東京被轟炸以來，防空演習的次數，想來了，今年從正月六日起就是防空演習，不是慶祝新年。誰知道什麼時候不會像去年那樣地被轟炸呢！戰禍已經不在前方，後方也不斷地陷在不安裏。

關於內地的悲慘情形，就此帶住吧，我不忍再寫了。只是，軍部和政府都說：戰爭是現在開始的，而不一不意識的巨大的困苦和缺乏，還是以後的事。還有比現在更困苦缺乏的事嗎？如果像政府所說那樣，百年戰爭是真實的話，日本會變成什麼樣呢？

國民是決不懷抱着像政府所說那樣的空虛的希望。他們正在想憂着經濟的現在和更可怕的不幸的將來，不過他們想說的話一句也不說出來地苦悶着吧了。

這是今日日本的一幅地獄變相圖。日本國民最後忍受不了，自己起來揮手的時候，已經不遠了。

大審院檢察官野利，在去年年終關於思想犯保護院察法實施的報告中，陳述了近年來左翼運動事件裏出不窮的事實。人民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已經開始。刻地在威脅着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的基礎了。

日本法西斯軍閥在把全部負擔加在國民肩上的情形底下，其強盜當前愈趨的政變與獲得成功嗎？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政策，已經受到同盟國方面反抗的壓力，和日本國內人民鬥爭的機運成熟而兩面的威脅而深刻地動搖起來。戰場上士兵的，尤其是在中國戰場的士氣敗壞，近來已經快變成全而性了。

陷於這種「彌縫」的苦境的日本，正在向同盟國方面提供着絕好的反攻機會。如上所述，我們的勝利條件，在於第一同盟國有效的反攻，第二日本國民的革命的反抗法西斯鬥爭，而這兩者的適切的配合，是擊潰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保證。
一九四三、二、二二

戰時日本獨占資本的發展

黎 章

戰時社會經濟，在遠幾年當中，是朝着「國家資本主義」的趨勢發展的。這表現現在：一方面是廣大的中小工商業者，被剝奪了生產手段，人民大眾的生活更加貧困化；而同時，一切資源和生活資料完全為國家所壟斷，資本更加高度集中。根據東京商工會議調查，「七七」後到太平洋戰爭前，中小企業被攫去了生產手段的，佔全部的四二%；而其餘的五八%，都直接或間接的附屬於各大財閥的企業。人民的一切生活資料，在壟斷購買制度底下，全部被壟斷。對於國內與我東三省、及「七七」後的淪陷區的資源，在國家資本壟斷下的，約佔全部的五三%；而其餘的則完全為日本十六個大財閥所壟斷（美國「亞細亞雜誌」在太平洋戰爭前的估計）。從一九三六——四〇年的期間，壟斷企業的資本增加四·七倍；其生產額，佔日本重要物資生產總額三九%；生產集中率，一九四〇年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三六五%，而同時期（一九三六——四〇年）十六個大財閥的企業資本增加三六一%；其生產額佔日本總生產額的四五%；其集中率較一九三〇年增加二五七%（據美國「財政與商業」雜誌的估計）。在銀行方面，根據日本大藏省的公佈，一九三七年日本有銀行五百家；到一九三九年減少到三百八十八家；一九四〇年尚存三百五十七家；而到一九四二年三月底，根據去年四月六日同盟社電訊，只有二百四十五家。同時，銀行的大部分存款，是集中在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滙豐（即第一銀行）等五家銀行的手中（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東京「朝日新聞」電，該年七月杪，這五家銀行所吸收的存款，佔全國存款的四分之一）。而銀行對工業的放款，在一九四一年上半年，與業銀行（國家銀行）的放款額，佔全國銀行放款的四七%；而道五大銀行則佔有三一%；較一九三七年上半年的增加率，前者增加四倍，後者增加二倍半。根據這些材料，顯然可以看出日本國家資本，與財閥資本在出幾年的戰爭中，是向何處發展，而支撐着整個日本的社會經濟生活了，那末，這幾年來，日本國家資本的發展，如何沿着「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呢？

「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政策。日本採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和納粹德國不同。在納粹德國的所謂「國家資本」、「國家獨占」實際上便是幾個獨占資本家的「托拉斯」的獨占。而日本的「國家資本」，却有自己的相對的固定性。這是因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較晚，而且較為脆弱的緣故。因此，日本的獨占資本，在廣義上，是由財閥資本與國家資本組成的。在歷史上，國家資本起了扶掖財閥資本發展的作用，而且，許多國家資本的事業，是和財閥合作，或交給財閥去經營的。不過日本國家資本，自己却可以成爲一個範疇，有自己雄厚的支配力量，這是日本軍閥的掌握下的。因此，日本採取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不該同納粹德國，一切重要資源的開發，或各種重要物資生產的調整，而直接通過幾個「托拉斯」的系統去進行；而是經過獨占資本聯合的「辛迪加」，即所謂「政策會社」去進行的。這種會社，是由政府出一半資本，聯合各大財閥組成的組織。近年來，在各種重要物資的生產部門裏，都成立了這種會社，以壟斷其生產。在表面上，這些會社的大部分股票，是操在政府手裏的，好像是爲國家資本所壟斷，但按照各會社的實際經營看來，各會社的生產，仍舊是通過各財閥的企業去經營的。這幾年來，日本在本國以及我淪陷區的資源開發，和重要物資的生產，都爲這些會社所獨占經營，而這些會社的實際經營權，又多半在財閥的手中。因此，這幾年來，日益膨脹的日本「國家資本」，却助長了財閥資本的發展。

日本獨占資本，在遠幾年當中的迅速發展，是怎樣促成的？

日本獨占資本幾年來的迅速發展，是不能由一般資本主義集中法則來說明的。因為他不像在和平時代，由於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不是以「自由競爭」爲集中的契機；而是由於擴充軍需工業的要求，以「超經濟」的動力，促進資本的更加高度集中。這表現現在：「七七」以來，日本爲了適應戰爭的擴大發展，統制了物資與資金供給過程。特別是一九四〇年起採取了所謂軍需主義政策，使物資、資金、勞力集中供給具有「優秀」生產技術組織的大軍需企業之後，更加速了中小企業的破產，造成了日本獨占

資本更進一步的發展。到了一九四一年，日本企業類別，從中央到地方，普遍設立了各種企業部門的「統制會」以後，則更進一步用政治的壓力，使「七七」以來條件苛惡的中小企業，附屬於各大財團的企業，以完成軍需工業的剝削任務。

現在，進一步來看太平洋戰爭以後，日本獨占資本發展的情況吧。

太平洋戰爭一年來，日本獨占資本的支配更加強化了。這表現在，不僅是加強了各「國策會社」對於各種重要物資生產的剝削；而且，新近又設立了許多所謂「營團」的組織。這些營團，是日本獨占資本更加露骨的支配着整個社會經濟生活領域的一種主要不依靠經濟力量，而依其政治壓力的日本獨特的「辛迪加」的組織。如一年來，相繼成立的「產業設備經營團」，以控制全國所有的工業部門的生產手段；「糧食營團」，從原始生產地市場，到消費結算市場，將日本全國糧食的生產、配給、消費加以控制；「船舶營團」，以統制日本全國的船舶生產與使用；「森林漁業營團」，以控制全國的農田、山林、漁業的經營；以及半個月以前，針對「物資管理營團」和「貿易營團」加以合併，而設立「交易營團」，以統制與調整日本與各個地區的物資交流。今天，日本獨占資本，便是通過許多這樣的「營團」來剝削一切的。根據現有的材料估計，日本獨占資本的支配網的擴展率，今天較一九三〇年增加百分之四百五十以上，這在日本獨占資本的歷史，是空前的。特別是這一年來經過「農地開發營團」、「住宅營團」，進一步與日本半獨立性的農村土地資本結合。如果過去日本獨占資本對於農村的支配，主

要是通過價格的決定，使農村經濟受其影響；那末，在現在，便經過土地的獨占，更進一步的支配着日本農村經濟生活了。

尤其是一年來，在所謂確立「長期戰」的經濟、資源剝削的過程中，日本獨占資本更顯加速地發展了。今天在南洋資源的剝削上，完全為日本獨占資本所結成的壟斷式的分贖聯盟——「東亞資源開發會」所包辦。但這種即不心由於國內「過剩資本」的找出路，而是由於對華所設的，日本由於軍事獨占和領土的獨占，補足着近代化的、最新式的壟斷資本的獨占。因為，一般的殖民地掠奪規則，軍事的侵略，是保證了壟斷資本的侵略；而日本恰相反，資本的應用，是隨着軍事的後盾，依靠軍事的發展而發展的。如日本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石原等五個財團，在對南洋的投資額，只佔南洋各國投資額的百分之十五（一九四〇年東京經濟調查會調查）；而今天，這五大財團獨占全部南洋資源的一大半。同時，今天日本國內却不是「資本過剩」，而是資本「充分就業」的時候。

很顯然，日本獨占資本的發展，在國內的剝削和經濟政治的壓力，在國外的進出是依其軍事侵略的。在今天，日本獨占資本更顯剝削日本及各佔領地的一切經濟和資源。因此，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無非是日本獨占資本的「大東亞壟斷團」罷了。那末，不難明白，今天日本的軍部法西斯體制的完成，也如季米特洛夫所規定的，是獨占資本更露骨、更殘暴的政治支配的完成。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對於日本軍部和財閥今日的合作，將有更深刻的認識。

日寇空軍發展的概略

北君

不用說，日寇空軍的發展是很遲緩的。無論其技術及器材等等，若與歐美各先進國的比較起來都是離乎其後。直至現在為止，它所用的航軍物品，除劣造和模仿者外，大部份還是仰給於外國，所謂「發明和獨創，簡直是微乎其微。現在且讓我們看看它的發展吧。

可以說，日寇對於航空發生興趣，最初也是受了美國熱氣兄弟飛翔的影響。大約在熱氣兄弟飛翔之後的幾年，日寇國內對於航空已有了很大的興趣。在明治三十七年間，日寇就有日野大尉（已亡）及德川大尉二人往法國學習飛行操縱術了。日野大尉二人學成歸國後不久，他們曾在東京代仗木練兵，並也在日新月異。因此空軍在戰爭上的地位，也

進行了初次的飛翔表演，當時還引起很多市民注意，這算是日寇航空史的第一頁。

這第一次飛翔爆發前，歐洲各國對於航空的研究

究已很著成績。及歐戰爆發後，各國（尤其是德法

）利用飛機協助軍事的行動已日漸展開，而飛機的

製造也在日新月異。因此空軍在戰爭上的地位，也

漸漸的發達起來。當時連在東洋上的日寇，好像也感到將來的空軍的絕對的重要，所以在那時起，對於飛機的仿造及空軍的設備，也見其積極的動起手來。

據說自最初設立空軍，不過是一個海軍飛行中隊，及兩個陸軍飛行大隊而已。並且那些飛機都是從外國原形購入的。其備的完，都是以後慢慢的發展和擴充。現在再談我國空軍的發展和擴充的經過說說吧。

從大正三年（一九一四）起，至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止，這十年間，我國的空軍已發展到陸軍六個大隊及海軍軍之個大隊了。那時起這所採用的機器有甲式四型戰鬥機，與乙式一型偵察機兩種。甲式四型戰鬥機是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從法國購入的。發動機是伊士巴科V型液流式三百馬力，最大速度每時二百三十公里，續航二小時，上昇限廣八千五百米，單座複式。乙式一型偵察機在大正八年（一九一九）也是從法國購入的。發動機是沙因姆遜乙型液流式，二百三十馬力，最大速度每時一百八十公里。

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一三式機上攻擊機製造完成，發動機是伊士巴科V型液流式四百五十馬力，最大速度每時二百公里，三座複式。

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陸軍飛行大隊完全改稱為飛行聯隊。同時陸軍第七聯隊（駐靜岡縣濱松），第八聯隊（駐青森縣），及第九聯隊（駐神戶會場）成立。

同年，橫濱實工廠製的一四式水上偵察機完成。昭和三年（一九二七）廣海軍工廠製的一五式飛行機完成。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川崎製的八七式重轟炸機與三菱重工株式會社製的八七式輕轟炸機（均隨空軍用）完成。

至是以前所有的新飛機則完全撥歸民間航空學校使用。雖然如此，但是昭和五年以前日寇的飛機大半還是由法國購入的，其後又從德國購入不少。

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川崎製的八八式甲型偵察機，八八式乙型偵察機，與八八式輕轟炸機（均隨空軍用）先後完成。同年中島製的三式機上轟炸機（海軍軍用）完成。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三菱製的八九式機上轟炸機，愛知時計廠製的九〇式甲型水上偵察機，中島製的九〇式乙型機上偵察機，以及其廠製的九〇式甲型飛行機（均海軍軍用）等完成。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中島製的九一式驅逐機（隨空軍用）完成。同年，川西製的九〇式丙型水上偵察機，中島製的九〇式機上驅逐機，及其廠製的九〇式乙型飛行機（均海軍軍用）完成。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川崎製的九二式驅逐機與三菱製的九二式偵察機（均隨空軍用）完成。

以上所列機種，除一部份是金屬製造外，大半都是木製布造的。自昭和八年以後的機種，則完全是以金屬製造的了。

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川崎製的九三式單座轟炸機與九三式重轟炸機，及三菱製的雙座轟炸機（均隨空軍用）完成。九三式單座轟炸機是B.M.W. V型一二氣筒液流式，七百馬力，最大速度每時二百五十公里，上昇限七千米，炸彈搭載量三百公斤，俯衝機作用，複座複式。九三式重轟炸機亦是B.M.W. V型一二氣筒液流式，七百馬力發動機二個，最大速度每時二百三十公里，續航九小時，上昇限五千米，炸彈搭載量二千公斤，六座下置式，仿德福容克式製造。九三式雙座轟炸機是耶畢機，星型九氣筒，氣流式，四百五十馬力發動機二個，最大速度每時二百五十公里，續航六小時，上昇限八千米，炸彈搭載量四百公斤，水平轟炸與俯衝轟炸兩用，四座下置式，亦是仿德福容克式製造。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日寇空軍改組，飛行聯隊全部撥歸海軍管轄。

同年中島製的九四式偵察機（隨空軍用），川西製的九四式水上偵察機與九四式機上轟炸機（均海軍軍用）完成。九四式偵察機是V型氣流式，七百五十馬力，最大速度每時三百二十公里，續航二小時，單座複式。九四式水上偵察機是九一式液流式，五百馬力，巡邏力每時一百七十公里，最大速度每時二百三十公里，續航六小時，三座複式。九四式機上轟炸機，是將雙氣流式，五百馬力，最大速度每時二百六十公里，俯衝機作用。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川崎製的九五式戰鬥機（隨空軍用）與川西製的九五式水上偵察機（海軍軍用）完成。九五式戰鬥機是B.M.W. V型液流式，七百五十馬力，最大速度每時三百二十公里，續航三小時，單座複式。九五式水上偵察機是光型氣流式，六百五十馬力，巡邏力每時一百八十公里，最大速度每時二百五十公里，續航六小時三十分，複座複式。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陸軍軍已發展到第十四聯隊，同時航空兵團成立，陸軍軍飛行聯隊又脫離海軍統制交航空兵團指揮。

同年三菱製的九六式驅逐機及九六式機上攻擊機（海軍軍用）完成。九六式驅逐機是耶畢機，星型氣流式，六百五十馬力，巡邏力每時三百五十公

四，最大速度每時四百公里，航航四小時。九六式
 陸上攻擊機是星型氣流式，八百五十馬力發動機二
 個，巡航力每時三百八十公里，最大速度每時三百
 三十公里，航航十二小時，炸彈搭載量七百五十公
 斤，七座下單翼，伸縮脚。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日寇陸軍軍已發展到
 第十六聯隊了。

同年三菱製的九六式飛行機（海軍軍用）完成
 機是星型氣流式，八百五十馬力發動機四個，
 巡航力每時二百四十公里，最大速度每時二百八十
 公里，航航十六小時，複座單翼。同時又從意大利
 購入B9式式式轟炸機一批，該機是雙引擎二十式
 引擎，氣流，一千馬力發動機二具，巡航力每
 時三百公里，最大速度每時三百六十公里，航航八
 小時，炸彈搭載量一千公斤，七座下單翼，伸縮
 脚。

以上機種，多在中日戰爭初期使用。至現在止
 ，除海軍的九六式陸上攻擊機及九六式飛行機還保
 留外，其他已經全部改換新式的了。因為自昭和九
 年十二月間，英美德各國的機種，早已多數改換
 單翼，伸縮脚，流線型的了。而且這呢，除九六式
 陸上攻擊機是單翼，伸縮脚，流線型外，其餘大多
 是從前所遺留，露出脚的舊型。所以說，日寇的飛
 機若與外國的相較，最少要差三年以上。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海空軍已發展到第二
 十五大隊。同時陸軍航空總司令部及飛行集團司令
 部成立。而航空兵團又改稱為飛行集團，飛行聯隊
 又改稱為飛行聯隊。

同年三菱製的九七式轟炸機與九七式重轟炸
 機（均陸軍軍用），其機翼的九七式偵察機（陸空
 海空均用）與九七式戰鬥機（陸空軍用），及中島

製的九七式陸上攻擊機（海空軍用），與川崎製的
 九八式轟炸機（陸空軍用）完成。九七式重轟炸
 機是星型氣流式，八百五十馬力，巡航力每時二百
 六十公里，最大速度每時三百三十公里，航航六小
 時，炸彈搭載量四百公斤，複座下單翼。九七式重
 轟炸機是星型氣流式，八百五十馬力發動機二個，
 巡航力每時二百八十公里，最大速度每時三百三十
 公里，航航十小時，炸彈搭載量一千公斤，七座
 下單翼，伸縮脚，仿德國格布羅日式製造。九七式
 偵察機是與神風號同型，巡航力每時三百七十公里
 ，最大速度每時四百八十公里，航航七小時，複座
 下單翼，伸縮脚。九七式戰鬥機巡航力每時三百五
 十公里，最大速度每時四百四十公里，航航四小時
 ，單座下單翼，伸縮脚。九七式陸上攻擊機是光型
 氣流式，一千馬力，巡航力每時二百六十公里，最
 大速度每時三百四十公里，炸彈搭載量五百公斤，
 複座下單翼，伸縮脚，俯衝轟炸用。九八式輕轟炸
 機是星型氣流式八百五十馬力，巡航力每時二百七十公
 里，最大速度每時三百三十五公里，炸彈搭載量四
 百公斤，複座下單翼。

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海軍聯合航空隊成
 立。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陸軍第十七聯隊成
 立。

同年三菱製的九九式輕轟炸機（陸空軍用），
 要知時計製的九九式陸上轟炸機（海空軍用），
 及三菱製的〇式輕轟炸機（陸空海空均用）完成。九
 九式輕轟炸機是氣流式，九百馬力發動機兩個，巡
 航力每時三百五十公里，最大速度每時五百公里，
 複座單翼，伸縮脚，此機似仿德國密沙，邱塞德
 式製成。九九式陸上轟炸機是金——星四型，氣流

式，九百九十馬力，巡航力每時三百二十公里，最
 大速度每時四百五十公里，複座單翼，伸縮脚，炸
 彈搭載量四百公斤，俯衝轟炸用。〇式輕轟炸機是
 星型氣流式，八百四十馬力，巡航力每時四百公里，
 最大速度每時六百公里，航航七小時，若加副油箱
 即可增加航程時間，單座單翼，伸縮脚。此機雖
 機體較重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使用或模仿從
 美國購入的發動機製成。所以它的性能，聽說與
 美志願隊所使用的鱈魚頭式的戰鬥機其相似，但
 是它的速度還是對不上鱈魚頭式的。

此外聽說還有一種新〇式，此種新〇式大概是
 最近一二年中製造的，因為尚未大量使用，所以它
 的性能如何，至今仍未曉得。

直至今年昭和十七年為止，日寇陸海軍航空
 隊，大約已發展到如下的數目。

陸空軍：國內（包括台灣朝鮮）約十二個聯隊
 ，每聯隊有三中隊，每中隊有機十二架，共有飛機
 四三二架。備有約六或七個聯隊。每聯隊平均四
 中隊，其中三中隊，每隊有機十二架，一中隊有機
 十架，共約飛機二七六架或三二二架。中國及南洋
 各地約二十六個聯隊，每聯隊二中隊，每中隊有機
 十二架，共約有機六二四架。陸空軍總共約有飛機
 一千三百餘架。

海空軍：國內（包括台灣朝鮮）及遼東半島共
 約三十二個航空隊，每隊平均三六架，共有一一五
 二架。其中尤以千歲號海軍航空隊已因為太平洋
 戰爭的關係逐漸增加。至於中國及南洋太平洋各
 地約十五個航空隊，每隊平均三六架，共有五四〇架
 。海空軍總共約有飛機一千七百餘架。

其他尚有陸上航空隊，其中航空母艦八艘，及
 水上機母艦十一艘。航空母艦每艘平均有機四十架

，共三百二十架。水上飛機總數平均有機十五架，共一百六十五架。艦上航空隊總共約有飛機四百餘架。

此外在各重要都市及海港的防空機隊，總共也有飛機數百架。

以上就是日寇空軍發展的概略。至其第一線的實力，依照上述的估計，最多不過五千架。據某次倫敦泰晤士報的估計，「日寇現有各式飛機約八千架，分隸於陸海兩軍」一語，我們實在難於估計過高。何以見得？據說本年四月十八日，同盟國飛機第一隊轟炸東京，橫濱，神戶，名古屋等處的時候

，日寇國內確實是慌張得很，儼如大難臨頭。同時他們的軍閥也感到自己空防的薄弱，急欲從西南太平洋各地抽出一部份飛機回國作為保衛本國之用。由此可見日寇空軍的實力是有問題的，是不足畏的。

何況日寇空軍的消耗也極其巨大。過去它被中國空軍所擊燬的三千餘架姑且不說，單說就在太平洋戰爭最初的幾個月內，它被同盟國擊燬的也在八百架以上了。航空母艦及水上飛機被擊最少也被擊沉了四份之一的。至其航空人員的損失，以最低的估計，平均每機二人，總共也當在一千六百人以上。

雖然日寇飛機的生產量，至現在已能勉強達到每年四五千架的數目，但是若與美國年產五、六萬架的數目比起來，真是小巫之見大巫。試想，像日寇這點小小的生產量能與同盟國賽嗎？還能夠維持今後更大的消耗嗎？雖然飛機可以維持，然而航空人員的大量消耗，在日寇絕對是沒有辦法補充的。所以說日寇的空軍是不足畏的。希望同盟國趕快派大量的空軍到太平洋及中東地區來，提早的實行反攻。那時不但日寇空軍容易受圍剿，就是日寇的糧食，也很容易使其實現的。

日本空軍實力

W. H. O. G. B. 譯

「東方共榮計劃」這一齣長戲，隨著日本配合軸心爭霸於世界舞台，而開始了第三幕，也就是它的最後一幕。開場是一九三七年對中國的侵略，第二幕是用了種種殘虐的手法佔領法屬安南，現在這第三幕更趨劇烈化了，最後的結局，簡直要把那「習慣的切腹」來代替「快樂的結局」。

日本空軍與海軍實力的配合作戰，在遠東所能發揮的力量，是演着並繼續演着重要的角色；不過他的空軍力量，並不如海軍他會企圖統制太平洋沿岸國家為強。

面對着日本初期的一些成績，輿論就幾乎變態以外，對日本的攻擊力量也失去了判斷，但是日本人這種成就，只是由於他在太平洋戰爭中佔先了一陣，並不能證明什麼日本空軍實力，在這種戰爭中，有一些因素是嚴重的與日本結合在一起的：第一

是先下手所佔的便宜，第二，沒有充分準備的抵抗以及同盟國軍備沒有適當補充，第三，日本第五隊與情報工作的普遍深入與高度效果。

創始的情況

我們要是懂得日本在戰時上的龐大計劃，以及由許多小生產結合而成發達的生產機構，我們就不會想像日本空軍有什麼了不起，說日本空軍超出或甚至相等於同盟國空軍力量，那就更非他所能想像的了。

雖說神祕的祕密掩蔽日本空軍編隊的增長，但大家知道：日本在這次軍事行動一開始的時候，就在戰場上盡力集中飛機，使它在數量上超過同盟軍所擁有的以上，而後，日本利用這個優勢已達於極限，但飛機數量的集中只是在軍事行動開始時有

效，與空軍實力強弱關係無關。空軍實力強大，必需是深層的根據，這根據包括各種效用型的飛機，以及各種補充的工業的生產力，航空人員的來源，製造的工作者，以及生產所必需的物資。

熱誠技術人員的缺乏

日本在開始建立空軍時就依賴外國的輸入，當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日本全部飛機還是從法國自費購買或向歐洲國家購買而來，以後集中力量進行發展本國的航空工業，但是由於設計知識與工程師的缺乏，日本只有求之於外國的顧問和式樣，因此不只在公開的合同中，日本飛機工業要付出已成為飛機價值的百分之廿五至三十，而且外國的製造商還把那些最次的樣式讓給他們，日本飛機在技術的發展上不能與任何歐洲國家和美國並列。

一九四二，一〇，二五，補作完

急起直追

一九三二年軍事行動的開始，一個極大的工業膨脹計劃也實行了，這反映在日本軍費中增加了空軍一大筆支出，在圖表的數字上這種趨勢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有一種存實感不可看漏，雖然它已經充分表明日本軍備增加了空軍的增長，但這只限於購買現成的公開支出這一面，另一方面日本空軍的發展，還有航空公債和人民的捐款，都未包括在圖表數目之內。

事實上，日本飛機的飛躍發展是在一九三七年，所謂「中國事件」的暴發之後，三藩，哈和，以及其他廠家在進行擴大生產，許多機器製造廠，腳踏車製造公司等，都轉有利於航空工業，接濟政府在戰爭機噐下武裝了它的工業，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公佈了「航空法」，凡是飛機，引擎，機身，以及其他飛機零件製造商，只准製造統一的形式，除非得到政府特許，不准購買外國飛機圖樣，一切重要的設備允許依照需要自由裝置，並且飛機製造廠在五年內完全免徵稅收，儘管如此，外國飛機進口雖然少了一些，但仍保持很大的數目。

日本從Orion式的炮，HispanoSuiza式的摩托炮，一直到轟炸機和戰鬥機，都是求之於外國的轉許購買，雖然這種購買費佔了很大的一筆支出，但是並不影響的競爭，使日本航空工業得從享有種種專利法的外國工業統治下解放出來，同時也使得日本用不着長期的發展和化費，而能在極短時期中把裝備近代化，因為日本既無經濟的又無技術的基礎。

生產量

日本飛機的生產量，局外人觀察是很難判斷的

日本人的誠實，經常封鎖任何有關軍事情況的宣傳，他們用的限制說話辦法，給航空工業一這單上神秘的封鎖，只有用比較的方法和所得的不精確數字，可能做一些估計。

前面說過，一九三六——三七年，日本的飛機生產得到政府的領導，以及工業在法令的推動下而刺激起來，蘇聯方面估計，一九三七年日本飛機有三千架，這個數目包括各式飛機在內，要重指出，從那時起，他用一切方法在努力使它更加膨大，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四〇年七月中間，私人工廠所僱工人數目冷金工廠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機械和用具工業百分之二百，生產精確儀器的工廠百分之四十。

在一九三六——四〇年間，與此有關的日本工業，購買外國機械器材價值增加了百分之五百，假若把日圓的匯兌率同時期機械器材價值約增加一併計算，差不多也增加了百分之四百。現在，自從機械器材禁止進口以後，除了軍火和出口工業以外，總算飛機工業的利潤，單從進口的機械器材上就增加近百分之二百。

從這些數字中，很難對日本的飛機製造得出什麼結論來，只有生產機噐的固定比例是較可靠的，其他都存有不可測的性質，但是我們根據航空器材的增加推測飛機的生產，可以得出，日本飛機工業在一九四〇年全部生產大約一萬架。

這樣的數量分派在私人的與政府所有的設備上，對日本似乎是一個很恰當的數目，雖然大的公司像三菱，昭和（一九三七年成立分陸軍海軍兩部），立川，中島，都是生產飛機的主要公司，還有些其他的，不是受三菱財閥所控制，就是屬於政府所保證的集團。

最近意大利的一個估計，日本飛機製造公司達到十五個的數目，其中有十個是生產飛機引擎的，倘若進行生產飛機引擎的所有設備都包括在這數目裏的話，可以斷定這數目是近乎日本飛機工業的全部實力。

熱練工人的來源和技術發展的限制，使日本飛機工業技術效率受着很大的束縛，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的「經濟學者」雜誌還把日本飛機工業的困難，歸之於原料供給的不充足和機械工業發展的不夠。從那時起，情形是有極大的改進，但實際上直到它捲入了戰爭以前，還有一個長時期是依賴外國的複雜機械器材與特種合金的供給。政府為了克服這種不足狀況，完成了一種對重工業設備的特種訓練，使一大批工人在各種熱練的部門上成爲專家。

就是如此，熱練工作者的問題，仍舊是留給日本空軍發展的一個經常阻礙的因素，日本的飛機工業是缺乏對熱練工作者來源的根據而困難的基礎，這基礎，使西方國家的飛機工業能在極短時間內飛躍發展。雖然在現在，歷史的一個時期內還不迫切感到，但是當戰爭繼續發展下去，向這有限的熱練人員和技術工作者需要急迫的增加時，它就會在日本空軍地位上蓋上一個深淵的烙印。

分配制度

從以前的落後地位到現狀發展的情形，這個過程是很清楚的，但是日本國內缺乏必需的車牀，使摩托工業的發展受到極大阻礙，這使得爲戰時生產的工作裝備與大量設備的集中使用，受到限制，工業的生產組成部份和工具，有極大比例是掌握在小廠家手裏，這些小工廠家佈滿全國各處。這種組織

是建在一種商人小僱主的工作分配制上，每個小工廠備上五個到三十個工人，裝設有壓榨機，車牀和一些機械用具。這些廠家的生產品然後再集中到「母親公司」裏去，同時「母親公司」也供給他們以必須的原料和藍圖等等。

當我們從空軍處於劣勢的方面看來，這樣分散的生產是有利的，但是這種分散小生產所帶來的損害卻是極大，它要增加極大的浪費在檢查之中，在生產成品上使統一性減低，防護生產過程的平衡，並且阻礙生產加速度的進行，這個制度最主要的障礙，還在不能很好的培養熟練工作者，關係日本空軍發展的遠大前途。

實際上日本對珍珠港炸好的襲擊與戰事發動，還是由於機械受惠於美國的寬大與英國的供給，雖然出口禁令是公佈在那裏，可是「精神的」與各種軍用物資，仍是源源輸向日本而去，這些既非日本管轄地區，也非軸心作戰國家控制範圍所能供應，許多超過日本當時需要的大量物資，繼續輸送了數年之久，這完全要感謝美、英、與荷蘭出口商的幫助，日本今日對抗同盟國家，建設其本國空軍，就是用的這批國貨。

這就是對「自由貿易」的鐵的教訓，但是日本在作廢物查上依靠外國的來源，實在也漸漸削弱其本國的空軍地位，因為雖然他佔領了馬來亞和荷屬東印的廣大物資，這也還存在着如何真能用之於航空工業的問題，囤積的東西不管你有多少，可是並不能保證在現代戰爭重裝備下，保持工業生產量與需要的平衡。

不僅是物資的來源日本要依靠於他的敵國，就是技術人材和設計方面也是如此。沒有疑問的，日本航空工業發展的遲緩，是被

那些出賣藍圖給他的人弄落後了，日本政府必須向那些大量出產的國家購買飛機，譬如一九三八年向意大利買了八十架雙引擎的 Fiat 式雙引擎轟炸機，一九三九年夏，德國有五架 Heinkel He 111 式轟炸機率命飛往日本，其中至少有兩架是確實到達了，一九三九年十月，美國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把 B-1 的藍圖賣給日本製造（這是出口禁令所禁止的），另外他又宣佈已經取得德國米式一〇九機的製造權，或者還有亨克爾 He 111 式的單引擎戰鬥機，米式一〇九機，容克 Ju 87 單引擎俯衝轟炸機，和容克 Ju 88，甚至亨克爾 He 111 一式。

裝備

我們應當十分細心的看待這些公佈，以上那些式樣的飛機，似乎還不大可能有任何一種進行大量生產，日本空軍是許多完全過時的飛機的「膠膜混合」，這個重大的缺點，使他一直是落在英美現代發展之後。

或者他們是想要在外界對於其飛機來源的極有限知識上，造出更大的混亂，日本人用了一種極聰明的辦法來分別他們的種類：把各式飛機標上號碼，用日本紀元後兩個數字表示飛機出產的年代。譬如「九一」式，就是日本紀元二五九一年，因為日本紀元二六〇〇年等於一九四〇年，所以「九一」式就表示這是一九三一年的飛機。這樣常使兩種不同設計的类型，標上同樣的名字，如果在一年內改變一種型式，也並不再換上一個數目來表示其不同。

新式飛機

雖然日本現在還有大量的複製飛機在服務，但自從一九三六開始出廠一種新的低翼戰鬥機以後

，漸漸的就開始代替前者，其中有中島九七式的單翼戰鬥機，陸軍和海軍都在用着，這種精美的式子是在歐洲與美國的戰鬥機之後，日本最好的是三菱零式的設計，它表示一九四〇年的出品，這是日本空軍中現在最普遍使用的精裝戰鬥機，比類英式的四引擎噴火式來要差些。它與德式四引擎米式一〇九機差不多，並且非常像德式的設計，零式出色的是它的極佳的起飛，因為它特別適用於太平洋廣闊的上空。

很可能的，由於英美空軍的增長，日本將生產更多的秘密形式的飛機，但是這種新式飛機的數量，其代表日本裝備的力量，所附的日本飛機性能表（附表因印刷條件之限制，無從列出，編者）——並不是完全的——但也可以看出日本現狀飛機的型式，簡單一看這個表就可以曉得：日本最少是雙引擎的，並且沒有一個發動機有超過千匹馬力。

這只是在日本飛機工業上發展的發達，並不為其他國家普遍的現象，在這許多新式飛機中沒有什麼非驚人的東西，也沒有什麼新穎可以使人有希望表現表現東西。確實，在許多新式飛機中，我們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日本航空工業發展的標準，完全結實，在英、德、法、美的設計家腳步後面的。飛機結構和引擎兩方面都是依賴外國。

日本人在技術方面是吸收其他國家的成果，至今也遠超出原有設計多遠，他曾宣佈三菱公司發明一種新式的偵察機，並且在馬來亞的戰爭中使用了，並且說這飛機試驗良好，其速度超過日本任何飛機，很可能這種飛機的構造將在日本飛機型式的發展上，得到強烈的反應，日本極為重視這種新式的飛機，可以從這兩個設計師得到日本政府的酬勞和二元英金的獎金中看出。

至今日本的飛機工業在飛機設計的發展上，沒有產生過一種型式，是够得上稱為先鋒的，事實上這種競爭的趨勢正存在於飛機引擎與飛機結構的製造中。

「金星」引擎正在逐漸普通化，它是在獲得了克羅米遜式與西第來式引擎製造權之後，根據它的技術，而發展的。

仔細的考查了日本飛機的各種型式，就不難探察其傳統，特別顯著的是陸軍航空用的四引擎轟炸機，它是兩種型式併合而成的，三菱九二式長距離轟炸機，有四個三菱「金星」十四氣缸雙排冷氣的輻射式發動機，每個九百五十四馬力，非常像德國的老容克 D 引擎，陸軍用九六式四引擎長距離轟炸機，速率每小時二六〇哩，航程二、〇〇〇哩，總重量三千磅，完全是意大利費亞脫 B.F.20 式的翻造，（意外的，後者在對英戰爭中很短時期命運就完結了），如果仍要把這些式子當作日本的第一線飛機看，是不能說的，特別三菱九二式，如果這種過時的三菱九二式在陸軍航空機名單上被取消的話，似乎它又發展了一種型式較现代化的四引擎轟炸機，很可能它是買來的道格拉斯 D-40 引擎商用機的藍圖，加以一番改造，成為軍用機了，福克羅夫 F.V.230（鷹式機），也已成為發展軍用機的本了。

政治上的交結，並不能阻礙日本在技術的進步上得益於美國，當然在意大利和德國這一邊，他也得益不少，在蘇俄和平這一邊，「備戰期間」裏，他是毫無騷擾的取得軸心盟國的幫助，這種合作不僅限於這段期間，並且要一直在他中立旗幟未放下以前，繼續維持。

一九三六年七月廿六日頒佈改組日本空軍的命令，

一個新的機構在變略行動下建立起來，在日本，朝鮮，台灣的軍用航空，分別由陸軍航空指揮，日本陸軍航空隊因此分割開了，海軍航空隊是另外一個分枝，由海軍總司令部指揮，從此以後，空軍獨立問題就在日本軍事將領的躊躇中，佔下一個位置。

日本的陸軍海軍都有根深蒂固的武士和武士道傳統，並且各將領與一些家族都有聯繫，空軍倒沒有這些束縛的，空軍的一切存在與效率都仰賴人的選擇有極大關係，這要看個人所特有的精神和操縱技術的熟練——這是日本軍事組織的一個新的力量因素。為了避免抗爭情形發生，空軍同海軍和海軍，特別同海軍聯繫起來。

陸軍航空隊除有其自己的參謀部，直接對天皇負責，受命於戰時大本營空軍指揮部，後者分為四部份：（一）指揮部，（二）調查研究，（三）飛機審查，（四）軍需供應，其中軍需供應這一部總機關設在東京，另外在青島，朝鮮及其他帝國各重要區域都有分機關，航空研究的中心東京的帝國大學，而由守澤的陸軍飛機廠，東京海軍航空實驗所和一個研究所屬於飛機製造廠的研究所以輔助。

訓練與組織

日本航空人員的訓練，一向是著稱特別嚴格的，出事的比率特別高，一九三五年差不多有全部飛機的百分之十，因訓練不良而墜地失事，這種比例，在一九三六年僅有極少的改進，雖然這個數字表示日本空軍發展時期的困難，今天並不如此，可是在訓練官的裝備上和訓練的方法上，不比別的國家差得多，現在日本有一個最完善的航空學校在熊谷，又在關原和濱松設有陸軍專門學校，陸軍航空訓練中心在稻毛町，並且有一個最高的航空學校在下靜，陸軍航空隊訓練中心已經在長崎，神戶，總體三地成立。

陸軍航空隊的組織是根據於法國的方法，戰鬥單位是中隊，包括十至十四架飛機，兩個到四個中隊組成一個飛行團，三個到六個飛行團組成一個飛行旅團，駕駛員的任命有委任的與非委任的兩級，前者較佔優勢。

配合對中國的侵略，三十年代日方更加重視海軍航空的發展，雖然這種政策陸軍航空隊在中國大陸作戰的需要而略有改變，但是可以判斷，在日本空軍中，海軍的力量更為充實。事實上由於三菱集團在海軍中專業中的利害，以及擁有日本最多的商船使它可以左右海軍航空部，使海軍能在三菱飛機製造廠的新機優先權。海軍航空隊已成為日本侵略的槍頭，日本個戰政策的徹底執行，無疑的是它更加改進海軍航空部隊。

日本的海軍戰鬥實力會宣佈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包括幾個以陸上根據地為據點與以航空母艦為據點的兩單位，日本的太平洋上軍航空力互的偉大作用，日本老早就已認清，並且不顧一切的增強它的實力。

這就是日本空軍構成的實況，直到現在它還沒有遇着一個強而有力的對手，但是如有一天出現的話，日本就要換上一副新的情況，實力將漸漸接近於枯竭。

（譯自 "Flight" April 23rd-1942）

物與理

陳家康

——馮友蘭先生「新理學」商兌之二——

一 論「既已得之之後」

「既已得之之後」，有兩字，上之字有所指，此所指即理，即真象，下之字係介系詞。此語見於新理學材料論哲學與經驗一節。凡我引「既已得之之後」一語時，即引自該節。

「既已得之之後」之思想，淵源於公孫龍「離堅白」之說。有人初讀本文時，對這句話或不解，但馮先生本人必以我為抓住要點。公孫龍究係墨家之外的一派，抑係墨家之內的一派，牽扯太多，此處不多辯。公孫龍全部哲學思想如何，我亦有說，但與馮友蘭先生所見不同，此處既非研究公孫龍，似可不必多談。公孫龍之說固不無有偏執，但我對離堅白之說亦有所推釋，與馮先生所見者亦不同，此處仍不必多辯。此處所辯者乃係馮先生淵源於離堅白之說而創為「既已得之之後」之說。凡物有以同，有以異；有以合，有以離，此墨經之說也。見物有以同，有以異，而遂謂為異同異者，偏也。此墨經之說也。見物有以合，有以離，而遂舍其有以合，執其有以離，亦偏也。此公孫龍之說也。凡學術不可偏，以偏為正，誤也。故堅白論曰：「離也者，天下皆獨而正」，以偏為正也。公孫龍偏，馮友蘭太偏，偏於不可，豈不大偏。馮先生新理學已成一家之言。我只送他一句批評：「馮子蔽於離而不知合，蔽於理而不知物」。不知馮先生以為何如。

總之，問題的癥結就在於真象是否可以離開實際而獨立。堅白論曰：「離也者，天下皆獨而正」。是見公孫龍以為離而後，可以獨立。馮友蘭先生發揮這種思想，亦謂真象可以離開實際而獨立。我對馮先生的主張提出三點意見。

第一點，離合相盈。凡物有以離，有以合。不離不見其分，不合不以其盈。離不可謂之離離畢合，盈之乎不可謂之盈向畢異。公孫龍與惠施固殊兩

派。「合同異」與「離堅白」固為兩說。但亦有相同之點，蓋「離堅白」者，因其異而執其畢同之一端而誇之，遂成爲公孫龍之哲學。然公孫龍亦未嘗不誇畢異。「白馬非馬」者，畢異之說也。「有馬如已耳」者，畢同之說也。屬白非白者，畢異之說也。「白者不定所白」者，畢同之說也。（見公孫龍子白馬論）。是故，因其異而造爲畢同。此公孫龍與惠施固不無相同之點也。不定所白之謂離。充不定所白之說，於是而有「不定所白」之馬，「不定所白」之牛，以至有「不定所白」之人。夫馬必有色，白馬非馬，則

我謂非馬，黑馬非馬，花馬亦非馬，取天下之馬而一之，如左陽明之稱竹子，則天下無馬。天下無馬，而馬有一不定所白之馬。此馬在天下之馬之外，則之不可也，謂之不可也。夫牛必有色，如謂黃牛非牛，則黑牛非牛，花牛亦非牛，取天下之牛而一之，如左陽明之稱竹子，則天下無牛。天下無牛，而牛有一不定所白之牛。此牛在天下之牛之外，則之不可也，謂之不可也。人必有色，取五大洲之人而一之，如左陽明之稱竹子，白人非人，黃人非人，黑人非人，檢通之人亦非人，則五大洲之人。公孫龍知此說之不可盡也，故尚確定有物指。公孫龍曰：「天下之物，謂之謂非指？天下之物，謂之謂非指？天下之物，謂之謂非指？天下之物，謂之謂非指？」（公孫龍子指物論）。天下有指，而指之者物也。見其物爲指之主宰，指非物之主宰。馮友蘭先生亦不能不承認天下有一不定所白之人，則此人即係被指，而非主指。被指者，指也。指之者，物也。被指之人，實也，亦真也。所指之人，即不定所白之人，非實也，亦非真也。

實者，真之實。真者，實之真。即實即真，即真即實。豈不能大於真，大於實，則實而無真。真亦不能大於實，大於實，則實而無真。實之共相固真，實之殊相亦真。在此爲殊者在彼爲共，舉共則殊在其中。在此爲共

者在被遺殊，則殊則共在其中。然共相殊相皆不能獨立。謂殊相不能獨立，共相能獨立，則獨立者，誤也。此謂三足，牛羊五足之說也。獨之足實為二，二足皆足，此係共相。如謂共相可以獨立，則共相為一足，而獨本有二足，加之非三足而何。牛羊之足實為四，四足皆足，此係共相。如謂共相可以獨立，則共相為一足，牛羊本有四足，加之非五足而何。以故共相者，共有之相，非另一相也。謂共相與實際相外，不相立者，必隱生另一共相，此另一共相，實係蛇足。以其相為實際，與實際相外不相立，則必產生另一實際，此另一實際，不但係蛇足，實係太虛幻境，既不實，亦不真。故馮先生之異說，太虛幻境耳，既不實，亦不真。

因此，物之共相與殊相，皆有以離，離則見其分，皆有以合，合則見其全。謂不能離不能合者，非哲學之見也。謂既離之後，馮先生謂為「既已得之後」，即可相外不相立者，其說備也。

第二點，即物定。天下之白皆有所定。如謂白有所白即非白，不定所白始為白，則天下除不定所白之白而外，無一白也。此純白也，非實白，亦非真白。不定所白之白如果有，則係共相。共相者，屬於不同之物所共有之相，非另成一相。所以我主張即天下之白物而定其所白。自有以異。故馬白不可謂非白，但馬白之白有以異於羽白之白，羽白之白，有以異於雲白之白。有以異，既非異，必有以同。同者，馬白，羽白，雲白，皆有以同，然亦不可異。有以異，言其殊相，有以同，言其共相。合其共相而執其殊相之一端，遂謂天下只有指定所白之白，而無不定所白之白，則偏而不全。合其殊相而執其共相之一端，遂謂天下凡指定所白之白皆非白，或係不完全的白，只有不定所白之白才是白，才是完全的白，亦偏而不全。我執其兩端兼其偏而用其全，乃自即物定白起。我執其兩端，兼其偏而用其全，乃自即物定理始。

試以馮先生亦舉為例之圓以為例。我即天下之圓物而定其理，一圓物一圓理，萬圓物萬圓理。此萬圓理中，不必是圓，所謂殊相也。然而太陽之圓，以同於地球之圓，地球之圓有以同於圓樹之圓。此不定所圓之圓乃共相也。我執萬圓之殊相一一送還於萬圓物之中，我又執萬圓之共相，一一送還於萬圓物之中。我手中不捏一物，我心中不捏一理。萬物自圓，我不為之另立一圓。萬物自理，我不為之另立一理。一物一理，萬物萬理。理有以同，我不為之異同，理有以異，我不為之異異，既已得之之前物不少，既已得

之後我不多。何等遺殊，何等自然。馮先生既已得之之後，就不肯把這遺還。他把握，留在心中，打在桌上，何等異說。

第三點，理有生成。一般人認爲物有生滅，理無生滅。殊不知物生則理生，物滅則理滅。古代無今日之理，是理生也。今日無古代之理，是理滅也。一牛生，則此牛之理，亦隨之而生，一牛死，則此牛之理，亦隨之而滅。此牛生，此牛之理生，他牛生，他牛之理亦生，此兩牛所以為牛之理，實以是兩個有以同有以異之理，但決不是一個理。因此兩牛所以為牛之理有以同，亦有以異。即令合其有以異而就有以同而言，也不能說兩個有以同之理即是一個理。譬如兩個有以同之牛，決不是一個牛。雖者曰：兩個同之牛是否一個牛。答曰：兩個同之牛實是沒有的。假定有兩個同之牛，則此兩個同之牛之理，實是沒有的。假定有兩個同之牛之理，則此兩個同之牛，仍是兩個。實是沒有的。假定有兩個同之牛之理，則此兩個同之牛，仍是兩個。學問之理，不能合併而為一個理。理有共理，有殊理。物共理則共，物殊則殊。殊理者，殊物所有之理，並非在殊物之外，更有此殊理。共理者，共物所有之理，非在共物之內，更有此共理。凡謂共理者，必有與共此共理之個體者在。共理不能離開個體而各立門戶。故共理就是共理，不是一個單獨的理。譬如天下之牛，皆各有所以為牛之殊理，亦皆共有所以為牛之共理。共理與殊理同在。一牛生，則多一所以為此牛之殊理與共理。於是所以為牛之共理中，亦多一份共理。一牛死，則少一所以為此牛之殊理與共理。於是所以為牛之共理中，亦少一份共理。假使天下之牛皆死，則所以為牛之殊理與共理皆滅。雖與共有此所以為牛之共理。故共理亦必滅。如謂天下之牛雖全死，但仍有不定所牛之牛在，此牛究在何處？如謂天下之牛雖全死，但仍有不定所牛之牛之理在，此理究在何處？

更深刻一點說：理不能生物，物不必生理。天下本無理，物之所以為物就是理。有人說理是非物質的，理在物之外，固然錯了。企圖反駁者曰：理是一物質的東西，理在物之中。這也錯了。理不是另一個東西。如謂理是一個物質的東西，如謂理在物之中，好像另有一個東西在物之中。這都不對。然則物與理的關係究竟如何呢？理者，物之理。即物即理，理物不二。如謂物為一物，理又為一物，是二之也。理既然是物之所以為物，故理即是物，而不是另一物。遺物之所以為物仍是物。理是物，物生則理生，物滅則滅。離合相盈，即物定理，理有生滅三者，故之四海而皆準。根據此三者

，可以說明新理學第一章第一節實際與真象之立論站不住脚。再者，馮先生謂：「我」說：「有方」，即對於真象作一形式肯定。「有方」並不蘊藏「有實際底方底物」，更不蘊藏「有實際底方底物」。故說「有方」，並不對於實際有所肯定，即只是對於真象，作一形式肯定。就我們的知識之獲得說，我們必需在經驗中見有實際底方底物，我們纔能說「有方」。但我們既說「有方」之後我們可見即使實際上無實際底方底物，我們仍可說「有方」。（新理學第一章第一節最後一段）。「既說「有方」之後」，就是既已得之之後。既已得方之後，就有一不定所方之方單獨存在，此是幻覺。方乃天下一切方物之共相共理。方之共相共理存在於天下一切方物之內，相盈而不能相外。離天下之方物而言方，則失之方矣。故「有方」則對於天下之實際的方物，必有所肯定。既已得之之前如此，既已得之之後亦如此。既已得之之前，真象與實際合一；既已得之之後，真象與實際亦不能相離。公孫龍離白之說與馮友蘭先生論真象之說，皆非也。

二 物之類與全

新理學第一章第二節類第三節全，在馮先生的哲學中是最重要的兩個概念，故合併討論之。馮先生的真象假使完全與實際分開，則馮先生的哲學系統便異常薄弱。然而馮先生認為實際不能包括真象，反之，真象可以包括實際。這樣一來，實際就是不全，真象反而大全。其立說極思，頗為精奇。馮先生說：「以上所說實際，有，及廣義底物，均是一大共類，亦即均是一類。我們不知宇宙間底事物，共有若干，亦不知其間之類，共有若干。但我們可知其有一大共類。我們所謂真象，有，及廣義的物，均指此類說。我們又可知此類必有實際底分子。因其如無實際底分子，即無實際，亦即無「我」，一切經驗，均不可能。」（新理學第一章第二節）。這中間便有許多問題。我們可以提出許多意見。

第一是大有（包括有以同有以異，此係大全）。馮先生所謂「一切底有」，我謂之大有，新名詞謂之存在。大有與存在二者一實，各隨其所便而用之。大有這個名詞是從周易上借用的，很覺頹口。大有與普通所謂物之外延與內涵完全吻合，不多亦不少，不大亦不小。但馮先生：「一切底有」即其廣義的物，普通所謂物，馮先生謂之狹義的物。何謂廣義的物？馮先生說：「物，以其字之廣義說，不惟指普通所謂東西。郭象說：「有之為物」。

老子曰：「道之為物」。易象辭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道及陰陽均可謂之物。我謂可用以指一切底有。不過本書中於別處所謂物，皆用其字之狹義，即專指普通所謂東西。（新理學第一章第二節）。凡我用物字均用狹義，即用其本義。至於道及陰陽，均不是物。道及陰陽均不存在。若果存在，則道及陰陽亦係物之性，而不是物之質。馮先生的哲學主性不主質。我們的哲學主質不主性。我們認為性係質之所屬。故質曰本質；性曰屬性。質精而粗，質衰而衰。此種衰及精粗之論，與馮先生大概不同。總之，我們的大有只有有以之物，決無無質之物。我們也論性，但天下只有有質之性，決無無質之性。

第二是大大共類（包括有以同而不涉及有以異，故非大全）。我們的大共類真正配稱爲一大共類。至於馮先生之一切底有，及廣義底物，實際有兩大共類：一是理之大大共類，用以總括天下一切理；一是普通所謂物之大大共類，用以總括天下一切普通所謂物。馮先生還要加上一個零頭，那便是氣。氣風馮先生的說法是私名，不是類名。氣不能屬於理之類，又不能屬於普通所謂物之類，其本身又不能自成一類，只好叫做一個零頭。要把理之大大共類，普通所謂物之大大共類，外我一併算作一個零頭。而統名之曰一大共類，終屬勉強。在我們看來，馮先生之氣根本不存在，談哲學用不齊找零頭。至於理之大大共類，係總括一切共相而成。共相不能獨立門戶，前已言之。故理之大大共類所總括之一切共相，即可一一透達於普通所謂物之大大共類中。剩下來只有普通所謂物之大大共類是顯不顯的。故我們所謂大大共類即普通所謂物之大大共類。

第三是實際之外延不比實際之外延大。馮先生的弱點就在於認爲實際之外延要比實際之外延大。馮先生說：「共類所有之分子，即其所屬之別類所有之分子。別類之實際底分子，亦爲共類之實際底分子。所以共類所有之實際底分子必不小於其所屬之別類之實際底分子，此亦不可依理而知之。」（新理學第二章第二節）。然而共類所有之實際底分子必不多於其所屬之別類之實際底分子，此亦可依理而知之。再就「理」論之。天下之方物之方理，都爲一類。每一別類之方物，有一別類之方理。所以，共類之方物之方理，必不少於其所屬之別類之方物之方理，此可依理而知之，但亦不能多於其所屬之別類之方物之方理，亦可依理而知之。故外延決不爲於內涵，亦決不多於內涵。所謂馮先生的說法，實際出於實際，此一點，我認爲，不反對。

但馬先生之真際出於實際，而其外延較於大於實際。這一點，就其思而不得解。馮先生認爲實際包括實際，實際比實際之外延廣，有實際可能無實際。我們決不敢提出恰恰相反的意思，說，實際包括實際，實際比實際之外延廣，有實際可能無實際。殊不知有實必真，無真不實。實際與真乃是二名一實。一言實言，一說真言。實與真不二，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是一大共類，其大有，是物。

再說大全。我們所謂大有就是大全。我們所謂大有，包括有以同，有以異而言，故是大全。至於其共類僅指有以同而言，並包括有以異，故非非大全。馮先生說：「以物爲一類而思之，與以一切爲一類而思之，其所思不同。蓋物爲一類而思之，其所思只及一切物所公共有之性。而以一切物爲一類而思之，其所思乃及一切物及其所有之一切性。」（新理學第一章第三節）。其說與我們頗指有以同，不與指有以異而言之說，頗相類似。但馮先生之大全，究非我們所謂大全。馮先生說：「天有本然自然之美，其美是本然而有；實是自然而有。其美是本然，實際是自然。天象本然皆然。即是大全，即是宇宙。」（新理學第一章第三節）。馮先生設實際與實際之別，本然與自然之別。故其說並非大全，實際亦非大全；本然並非大全，自然亦非大全。必兼其美與實際而有之，兼本然與自然而有之，始可謂之大全。也許馮先生還忘記了一點，必須兼其美與實際，本然與自然而有之，再加上一切零碎的氣，始可謂之大全，始可謂之「有」。我們既不設實際與實際之別，本然與自然之別，於是用不着這般囉嗦。只指出「物即是一物，如物之一指花一笑。物有以同有以異，故物是大共類又是大全。物即是真即是實，故物是大全。物爲所本，亦爲所自，故物是大全。此之謂物一元論。

馮先生說：「我對於上文說我們因分析實際底事物而知實際，因知實際而知實際。我們的知實際，我們即能超經驗。」（新理學第一章第三節）我決不敢超經驗。我們不重經驗。經驗也是知識，而且是最好的知識。經驗是知識的也可能是知識的，經驗是未成熟的，也可能是成熟的。把經驗整理一番，弄得有條有理，就是理論。理論與經驗不二。超經驗而求理論，是把經驗與理論當作兩個東西。人類的科學愈發達，則人類之本領愈大，人類之本領愈大，則人類所能經驗者，較之往昔，日益擴大；而往昔之所謂「超經驗」者日益縮小。譬如天空，對於古人是所謂「超經驗」的。但今人有飛

機，故對於天空之經驗，今天已公於古人。足見所謂「超經驗」者隨科學之發達而縮小。可知愈進步即愈能超經驗者，非也。然而，經驗愈多，則對於尚未經驗者之揣測亦愈多。但此對於尚未經驗者之揣測，係由於經驗愈多而來，並非由於超經驗而來。如有好心人企圖反駁說，謂科學愈發達，則人類之知愈多，知愈多則所能經驗者，相對上雖比古人多，絕對上必更比古人少。我亦必以友好之態度爲此人曰你真覺覺扭。蓋「超經驗」與「尚未經驗」之區別，並不相同。「超經驗」乃「不另需經驗」之謂，「尚未經驗」乃「有所待於經驗」之謂，相差何天壤。如謂知愈進則愈能超經驗，那末，將來即可取消經驗。如謂科學愈發達則愈能經驗，爲何所待於經驗，那末，經驗不能取消。反之，還要教人在經驗上用工夫，把經驗整理一番，弄得有條有理，變成理論。

三 天下並無此理

此節係針對新理學第一章第四節而發。馮先生說：「所謂方之理，即方之所以爲方者，亦即方之理之所以爲之理也。凡方底物必有其所以爲方者，必皆方之理之所以爲方者。此方之所以爲方者，爲凡方底物皆依照而因以成其爲方者，即方之理。凡方底物依照方之理而爲方，其所依照於方之理者即其性。凡依照其所以爲之理而成爲種種物之性，即皆現其理，即有其性。理之實現於物者爲性。」（新理學第一章第四節）我們認爲物不依照任何物外之理以成其爲物。若謂物外之理，則天下並無此理。夫理者，物之理。大有之內沒有無理之物。大有之物，沒有此理，便沒有理，沒有理，便有此理。物之所以爲物即其所以爲之理。所以者並非依照物外之理而然，乃係自然而然。凡什麼物與物有關係呢？這表示大有之物並非亂七八糟，牛頭不對馬嘴的東西，而是有條有理的。理係指物的本身之條理。有人說，物是其然，理是其所以然。我與不同於此說，然有然之理，所以然有所以然之理。物是其然，理也是其然，物有物之所以然，理亦有理之所以然。理之所以理亦係自然而然。我們所謂理，係有物有質有直有肉之理，理即物。但理字有兩用，一指客觀存在的物之理，一指人類針對客觀存在之理，從而理之。這就說理。學術無他，便是說理，便是說明物之理。但客觀存在之理，與主觀說明之理，乃是一理，不是二理。

馮先生設爲答客難之言曰：「有人以爲，所謂方者，不過人用歸納法，

自其所見之許多方物中，所抽象而得之概念，在客觀方面，並無與之相當者。實際即是實際，實際之外，別無實際。（以上係馮先生設問，以下係馮先生作答）對於此主張，我們說：我們對於此所謂理之知識，可以名曰概念。自知識之得到方面說，我們對於方底物，必須有若干知識，然後可得方之概念。但既得方之概念之後，則見方，即所謂方之理，亦即方之所以為方者，並不只是一個概念。（新理學第一章第四節）理不只是一個概念，而是「客觀底有」。我與馮先生相同。但馮先生所謂主張「實際即是實際」實際之外，別無實際」的人。理是客觀的存在，但不能外於物而存在。如果有人說，馮友蘭先生主張理在物之外，我則主張理在物之中，我必謂此人誤會了我們的主張。主張理在物之中，好像理是一個東西，此個東西馮先生放在物之外，却披我們撒在物之中了。其實，理就是物之理，並非另一東西，我要反覆叮嚀此意。如果有人說：馮友蘭先生主張物不是理之一部分，我們主張理乃物之一部分，我亦反對。如謂理乃物之一部分，好像物之另一部分尚不是理。其實，物之一絲一毫都有理。物之至大無外，至大無外亦有理。物之至小無內，至小無內亦有理。馮先生把理與物分開，故謂物不是理，只是「相對底料」。（見新理學第二章第一節）這就是把物看得一錢不值。物不能自理，而要依照物外之理以為理。試問這種物外之理究在何處？馮先生從何處覓來？

四 沒有形上形下之分

我們的哲學決不作形上形下之分。若謂形上是廣義底物，形下是狹義底物，是取物而二之也，我們不作如此主張。物有形，大有之中決無無形之物。形有非肉眼所能見者，終不得謂為無形。馮先生作形上形下之分。其所謂形上形下者，並非西洋「買轉非昔可司」(形而上學)所謂形上形下者，而自有其新解釋。簡單言之，馮先生所謂形上者即其理，而所謂形下者即實際。我們既不作實際與實際之分，故亦不作形上形下之分。這點不必多講。此處既不討論西洋的「買轉非昔可司」。故對於「買轉非昔可司」所謂形上形下者，亦不必多講。

不過朱子所謂：「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語類卷五十九)。馮先生引之作爲立論的根據。但此點在明清之際早已有人反對過。王陽明曰：「形而上者，非無形之謂，既有形矣，有形

而後有形而上；無形之上，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皆所未有者也。」又曰：「器而後有形，形而後有上。無形無下，人所言也。無形無上，顯然易見之理，而邪說者淫曼以衍之而不知慚，則君子之所深惡其愚而惡其妄也。」又曰：「君子之道，盡乎器而已矣」(周易外傳卷五)。王陽明反對普通所謂形上，但仍不能打破形上形下之分，我們則完全打破形上形下之分。

五 燒香惹得鬼叫

此節係針對新理學第一章第六節太極而發。我們想問有句俗話，燒香惹得鬼叫。太極，無極，兩儀，四象，八卦等等概念，姑無論周易經傳原文作何解釋，(我對周易的解說不在此處多講)，但自西漢以後，特別在魏晉以後，這些東西都變成了一羣玄學鬼。馮先生對它們加以引用，加以新解釋，就等於對它們燒香。五四時代，我們既未把這羣玄學鬼一一打倒。現在馮先生又對它們燒香，其結果必至於引起這羣玄學鬼到亂叫。本來借用幾個舊名詞，是弄哲學的人共有的嗜好。我也從周易上借用大有二字。但是燒香惹得鬼叫的事情，總覺不大妥。

馮先生的太極，只能根據馮先生的話來解釋。所以我在此處並非討論一般所謂太極，而是討論馮先生的太極。馮先生說：「太極即是衆理之全，所以其中是萬理具備。從萬理具備之觀點以觀太極，則太極是「沖漠無朕；真象森然」。沖漠無朕，以言其非實際底；真象森然，以言其萬理具備。萬理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亦可用佛家所說真如名之。真者一切衆理，皆從真有，並不虛妄；如者，一切衆理，各如其性。不過此真如中萬理具備，並不是空。朱子以此區別儒釋。」(見新理學第一章第六節)。太極是衆理之全，可見一切理都在太極之中。至於普通所謂實際的物則在太極之外，因爲太極是「非實際底」。實際的物，其本身沒有理。實際的物，其本身不過是「相對底料」，而且不修資格成爲「絕對底料」。這樣一來，所謂實際的物者，就不能不依照太極之理以爲以理。這樣的太極，就不是馮先生所說的「無用」，「無能」。反之，這樣的太極就是物的主宰。甚至於物的本身也沒有資格存在，假使太極之中沒有存在之理，物便不能存在。在馮先生的哲學中，物連自己存在的資格都沒有，物便成了附屬於理的殘渣。物是有動有變的，有生有滅的，有盈有虧的。在馮先生哲學中，物必依

太極之動以爲動，之變理以爲變，之生理以爲生，之滅理以爲滅，之盈理以爲盈，之虧理以爲虧。但太極有動之理，太極本身並不動，有變之理，但太極本身並不變，有生之理，但太極本身並不生，有盈之理，但太極本身並不盈，有虧之理，但太極本身並不虧。馮先生說：「實際上依照其理之實際底事物，其理不因之而始有，無依照其理之實際底事物，其理不因之而即無。實際上依照其理之實際底事物多，其理並不因之而增，實際上依照其理之實際底事物少，其理不因之而減。」（新理學第一章第六節）。這種理，這種太極，互古今，通萬變，窮天地，窮人窮物，都是說不出來的。

六 日生日成之謂大全

馮先生在第一章第七節中，反對「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之說，謂爲「神秘主義底說法」，但太極本身亦是一種「神秘主義底說法」。馮先生謂太極爲衆理之全，不生不滅，不增不減，這就有點神秘。太極無論此處彼處都是全，無論已來未來都是全；太極是超空間的，同時又是超時間的，這就更神秘。

何謂大全？我們所說的大全就是大有。現在以空間時間論之。馮先生說：「有人以爲將時間空間中所有之事物抽去，仍有空底空間，空底時間。」我們當然不是這種人。馮先生說：「又有人以爲這些空底空間，空底時間，并不是外界所實有，而是我們的知識之一種形式」。當然我們也不是這種人。最後馮先生說：「照我們的看法，時間空間是兩種關係之類，而並不是兩個實際底物。」（以上所引均見新理學第二章第五節）。我們也不同意馮先生的見解。我們認爲空間不能先於物之存在，亦不能後於物之存在；時間不能先於物之動變，亦不能後於物之動變。空間就是物之大小，物大則空間大，物小則空間小。時間就是物之動變之久暫，動變久則時間長，動變暫則時間短。離開物之存在而言空間，離開物之動變而言時間，都是不對的。假使無物則無空間。假使有物而無動變，則無時間。再者，有物就有動變。所謂以談哲學時一提起物便是指動物（此係哲學上之動物，非生物學上之動物）而言，用不着再加解釋。因此，我們合併說一句，有動物就有空間時間，也決不會錯。從空間上看物，則物之大是無外的，物之小是無內的。從時間上看物，則物之始是無前的，物之終是無後的。何謂大全，必須就無外之大，無內之小，無前之始，無後之終而言，始可謂之大全。如果單就空間上說，

今天可能有大全。如果就時間上說，則今天決無大全。因爲到了明天，物之一切空間也動變了，一切時間也動變了。這謂大全只好等到明天再說。明天之後還有明天。明天之明天之後，還有明天。所以明天也決無大全。至於昨天沒有大全，更無論矣。何謂大全，日生日成之謂大全。以此原則推之，亦可謂日生日成之謂物，日生日成之謂理。王陽山以日生日成論性，我所謂日生日成者，即取之於王陽山。

我們以日生日成論理，故謂物有生滅，理亦有生滅。馮友蘭先生以不生不滅不增不減論理，故謂太極乃衆理之大全。今天可能如此，亦可能如彼，視昨天之如何以爲斷。明天可能如此，亦可能如彼，視今天之如何以爲斷。我們認爲今天是有已經有的實際，明天是必然有的實際。今天是有已經有的實際，明天是必然有的實際。今天與明天究竟有區別。假使把這個今天與明天的區別取消了，就是超時間。超時間就是超動變。超動變就是超實際。超實際就是超物。超物就是超空間。一超百超，非常明顯。超乎一切而談大全，而談太極，此非神秘而何。

七 「理一分殊」也不對

何謂理一分殊？馮先生說：「先就一類之事物說，此類之事物，皆依照一理，雖皆依照一理，而各有其個體。此一類之事物，就其彼此在本類之關係說，可以說是理一分殊。」（第一章第八節）。理一分殊，又可用一與多來解釋。故馮先生說：「圓是一，許多圓底物是多一。又說：「蓋一與多之問題之所以起，亦由於誤以想像形下底圓者想像形上底圓。但形上底圓，即「圓」，不過是圓之所以爲圓，圓之所以然之理，凡具體底物，合乎此理者，或有合乎此理者，即成爲實底圓。知此則可見圓之理之一，並不妨依照之者之多。」（以上俱見第一章第五節）。因此，我們認爲馮先生所謂一就是理，所謂理與多就是事物；所謂一就是實際，所謂理與多就是實際。

在我們看來，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多一不二。並非在多之外，另有所謂一。合則爲一，離則爲多。合亦不添，離亦不減。合亦不減，離亦不添。墨辯曰：「俱，俱一。」又曰：「若數指，指五而五一。」又曰：「五有一焉，一有五焉。」（以上俱見墨子經說下）。公孫龍子不然，當其難也，得一相。此相可以單獨存在，是離而後另添一相也。就天下所離之千個萬個「一相」，合其可共者而共之，則得一相。此共相又可以單獨存在，是合而

後更添一井權也。譬如說天下之圓而離之，則得一圓，此一圓與圓物不相盈，而能自外於圓物，是離而後另添一相也。合天下千個圓而離之，則得一圓，此一圓與圓物不相盈，而能自外於圓物，是離而後另添一相也。合天下千個圓而離之，則得一圓，此一圓與圓物不相盈，而能自外於圓物，是離而後另添一相也。合天下千個圓而離之，則得一圓，此一圓與圓物不相盈，而能自外於圓物，是離而後另添一相也。

解決一與多的問題，用不着找科學家，數學家也鬧得清。指五而五一，一即五，五即一。五與一相盈不相外，數學家決不會弄錯。如果謂其原有一箇指之理，此理是一。實原一有五個指之物，此物是五。此之謂理一分殊。然則一手非有六指不可。指之理是一指，指之物是五指。加起來非六指而何。所以馮先生的哲學算來算去，總多了一個所謂「一」。

八 我們所謂理與理論

馮先生離物而講理，我們則物而講理。講理彼此相同，我們的哲學也是最講理的哲學。然而物與理物與理有一線之差。今日所學者，即此一線之差。我們認爲物不是七八種，而是三個個的物，而是有條有理的物。所謂理就是物的本身。理是理，理又是名，以理之名爲理之實。何謂其理是實，其亦是名。以其之名爲其之實。墨子曰：「昔以名爲名，墨彼實也。」（墨子經說下）。即是此意。其實用絲不相外，理與物相盈不相外。正因為實即理，物與理，以故實物與理相盈不相外。我們非常願望把實物叫做理，以便使人鼓舞。強橫說的哲學核心是氣，氣即是物。但是怕這怕「氣」這個名稱，不能令人鼓舞。所以有時把氣叫做天，又把天叫做神。其實天也是氣，神也是氣。橫曰：「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說神。」（正蒙神化篇）。姑無論橫說把氣叫做神是否對的。但命辭鼓舞，必須學習。

人與物相盈不相外。人即物，物亦人。人乃物之一部分。物有全部決定作用，則人亦有局部決定作用。局部決定作用不能大於全部決定作用，但亦不至於絲毫沒有決定作用。反之，人的決定作用，由於人能把握生產工具而愈見擴大。我們的哲學第一指出物的決定作用，第二指出人的決定作用，第三指出人的決定作用必然擴大。如果讀了我們的哲學，不能興奮，不能鼓舞，不能擴大人的決定作用，則此人就該沒有讀懂我們的哲學。

人類的決定作用何以這樣大呢？其關鍵就在於研究物。人類用物之名以舉物之實，此係研究的初步。接着我們對物必須有解釋。但是我們對於物不

必另加解釋。就其爲物而以物解釋之，此之謂唯物論。人類用理之名以舉理之實，此係研究的初步。接着我們對於理必須有解釋。但是我們對於理不必另加解釋。就其爲理而以理解釋之，此之謂理論。

因此，理就是客觀存在的條理，理論就是人類主觀對於客觀條理的認識。人類沒有產生以前，當然沒有人類主觀的解釋。但是客觀存在的條理仍然存在。人類既已產生之後，對於客觀存在的條理有主觀的解釋。但法人類主觀的解釋，客觀存在的條理並不因而而盈，人類主觀的解釋不對，客觀存在的條理並不同之而虧。初學的人不識條理是何物時，我可以告訴他，理就是物之條理。但是既已證明理是物之條理之後，就其已經立案。此後提及理時，不必每事都要證明一次。但爲了慎重起見，我還是規定一個原則，即理論應當從實際出發。

條理這個東西最重要。語其實，則天下沒有比它再實的東西，故謂之實理。語其真，則天下沒有比它再真，故謂之真理。其實則真在其中，真則實在其中。謂理可真而不必實，妄也。初學的人不識理爲何物，我可以告訴他，理就是實理，真理即理是條理，條理即物之條理。但既已證明之後，我也不必屢次聲明。今後我們說理，就實際的真理。

對於客觀存在的條理，我們要發生濃厚深沈的感。頭可斷，血可流，但對於物不可不加研究。物是真理的源泉，凡要真理者，必須愛物。物是狂風暴雨，足以濺濕乾坤。物是光，足以除黑暗。物是一切，終不致舞，則不足以爲物。以故唯知便是我的理論。

更正

本刊第八卷第三期「中國工人與民族解放運動」一文第六十一面「上欄第九行」……遺只在「生靈塗炭」，遺只「二字之下漏」停留「二字」，應補入。又同欄第十七行「實行武裝起來」之「不」字係「義」字之誤，應予更正。

列寧論文學及其他(下)

V. 謝爾賓娜作
戈實 譯

三 列寧論俄國文學及俄國作家

列寧的歷史觀點，是建立新的、異於的科學文學史論的基礎。列寧對於拉維爾夫(註一)、謝爾賓、拜林斯基、杜布羅留波夫、乞爾尼謝夫、斯基、尼克拉夫、沙爾蒂科夫——謝德林、萊夫、托爾斯泰及高爾基等俄國作家的評論，將俄國文學上的許多主要的現象光顯出來，並將列寧關於文學批評的歷史觀點更加具體化。列寧的這些歷史觀點和具體的歷史觀，是完全用新的方式光照出俄國文學發展的階段，指示出文學中的階級鬥爭，文學派別的階級傾向，以及它們的歷史聯繫和相續。列寧的歷史觀點和他關於俄國作家的見解，是解決許多歷史文學問題的指南，並提供給我們一個俄國文學史的社會內容的最恰當的觀念。

確定文化的階級性質——這是馬列主義的、最重要的原則。列寧堅強地指出資產階級所說的「統一的民族文化」的許多概念的錯誤。列寧說道：「在每一個民族文化裏面都有兩種民族文化。有清教徒與希克維奇、古奇科夫和斯特魯威之流的大俄羅斯文化(註二)，同樣地，也有以乞爾尼謝夫、斯基及普列漢諾夫的名字為特徵的大俄羅斯文化。在烏克蘭、以及在德國、法國、英國、及猶太人之間等等，同樣地也有兩種文化」(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七卷一四三頁)。存在著資本家、地主和傳教士的文化，但是也有著人民勞動大眾的文化。列寧寫道：「在每一種民族文化裏面，都有著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文化的成份，即使這些成份是沒有發展出來的，因為在每一個民族裏面，都有著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這些羣衆的生活條件，不可避地要滋生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來。但是在每一個民族裏面，也有著資產階級的文化(大部分還是黑色百人團(註三)和僧侶的文化)——它不僅以「成份」的形式，而是以整個統治者的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七卷第一三七頁)。

資產階級和貴族的社會，積蓄了許多偉大的文化與藝術的寶藏。列寧關

於文化的論述，顯明地和確切地指出：在過去的重大的文化寶藏，都是封建主義和人民的文化的代表者所創造出來的。出身自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優秀的藝術家，總總對自己的階級裏面他們經常是被迫害的，正因為他們的作品有助於人民的解放鬥爭，是反對剝削階級的階級的。

謝爾賓、沙爾蒂科夫、拜林斯基、杜布羅留波夫、乞爾尼謝夫及高爾基這些偉大的俄國作家，在列寧寫起來，他們不僅只是文學的活動者。他們還是人民解放鬥爭的參與者和領導者。沒有這許多人的名字，俄國人民的歷史，俄國解放運動的歷史是難以想像的。列寧指出，在馬克思時代之前的俄國的革命運動上，拉維爾夫、謝爾賓、拜林斯基、杜布羅留波夫、乞爾尼謝夫、斯基——都是些重要的政治的和歷史的活動家。他們將俄國的革命思想向前推進，保存了革命傳統，將社會主義的思想投入民間。

請到列寧怎樣重視俄國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的政治的與文學的活動，可以從列寧所說的這類的話中看出來：「……只有由先進的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完成一個先進戰士的作用。爲了更多多少少具體地了解這句話的意義，請讀者去想一想像謝爾賓、拜林斯基、乞爾尼謝夫這些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先驅，和七十年代的革命家的光輝理想；請讀者去想一想現在俄國文學所獲得的全世界的聲譽吧……」(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四卷第三八〇——三八二頁)。

上一個世紀的四十五至六十年代的俄國特殊的歷史條件之下，文學是個唯一的論壇，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從這個論壇宣傳出來的。因此我們在謝爾賓、拜林斯基、乞爾尼謝夫斯等等的活動中，看出了將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與先進的革命理論聯繫起來的模範。以謝爾賓、拜林斯基和乞爾尼謝夫斯的名字為代表的俄國文學，宣傳了他們當時的最進步的思想。馬列主義就從這些偉大的作家、戰士及革命家的作品中，繼承了一切最珍貴的東西。列寧天才地揭發出俄國文學的社會內容，因此他說俄國文學是「具有全世界的意義」的這句話，並不是徒然的。同時，列寧稱乞爾尼謝夫斯這位作家和革命家，

是位對於祖國有無邊和獻身的愛的模範，也並非是偶然的。赫爾岑、拜林斯基和乞爾尼謝夫斯基的革命思想，在很多方面都確立了俄國文學的具有全世界歷史的意義。這些思想，表現出俄國和世界革命思想的前進的運動來。因此列寧稱這些俄國作家，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先驅。

列寧關於俄國解放運動的幾個主要時期的學說，是了解俄國民主主義文學的思想內容的一個鎖鑰。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出俄國解放思想的發展的相續與各階段的關係，這許多階級是以自己的出版物來影響這個發展的。俄國的進步的古典文學，是直接地有繫於這種解放思想的運動，和描寫這個運動的。因此，列寧將俄國的解放運動分成三個階段的學說，應該是建立俄國文學史的一塊奠基石。

列寧關於俄國革命思想史的三個階段的學說，在「論俄國過去的工人出版事業」及「解放運動中各階級與各階層的作用」等文中，是更加完整和多方面地敘述出來了。列寧指出，俄國的解放運動是經過了三個主要的階段，這三個階段是應合着俄國社會中參加俄國革命的三個階級的活動的：（一）是貴族革命家活動的時期，大約自一八二三年至一八六一年；（二）是平民革命家的時期，大約自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五年；（三）是無產階級的時期，從一八九六年一直到現在。十九世紀的解放運動，很快地就民主主義化了，它的社會成份也迅速地改變了。列寧在一九一二年寫道：「在紀念赫爾岑的時候，我們清楚地看出了在俄國革命中行動着的三代和三個階層。最初是貴族和地主，十二月黨人（註四）和赫爾岑。這些革命家的圈子是狹小的。他們和人民的距離是遠得可怕。但是他們的事業並非徒然的。十二月黨人喚醒了赫爾岑。赫爾岑則展開了革命的鼓動工作。」

「從乞爾尼謝夫斯基這些平民的革命家起以至「民意黨」的英雄們（註五），他們把掘了、擴大了、鞏固了和鍛鍊了這個工作。戰士們的圈子更廣了，他們和人民的聯繫也更密切了。赫爾岑稱他們，是「行將來臨的暴風雨中的年青的能手」。但這不就是暴風雨的本身。」

「暴風雨——這就是革命本身的運動。無產階級是個首尾一致的革命階級，這個階級起來引導他們並最初將千百萬的農民鼓動起來參加公開的革命鬥爭了。暴風雨的第一次的襲擊，是在一九〇五年。繼此而來的襲擊，將開始在我們的眼前發生出來」（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五卷第四六八—四六九頁）。

在列寧的這些語句裏面，就揭發出革命思想的相續性。在列寧的這一個指示裏面，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史，就解決了十九世紀俄國社會思想史上的許多最複雜和最嚴重的問題。

列寧關於赫爾岑、拜林斯基、乞爾尼謝夫斯基和其他俄國作家的評述，是充滿了一種為復興歷史的真理，為正確估計文學遺產而鬥爭的激情。

自十二月黨人以後，赫爾岑是貴族時期的一個最傑出的活動家。列寧曾寫過一篇「紀念赫爾岑」的文字來紀念他；在這篇文章裏面指出了赫爾岑的世界觀，和他在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社會鬥爭與文學上的作用。「紀念赫爾岑」這篇文章，是為紀念一九一二年赫爾岑誕辰百年祭而寫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出版物「在紀念」赫爾岑的時候，他們是曲解了這位戰士和作家的面目。而列寧則光輝地，指出了這位在俄國革命的準備上起了很大作用的作家的歷史地位。

在講到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理論的時候，列寧特別着重指出，馬克思主義裏面是沒有什麼「宗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全世界文化發展的大道上產生出來的。馬克思的天才，就在於他對於此前人類進步思想所提出的許多問題，作了一個答覆，並且他的學說，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及社會主義的最偉大的代表者的學說之直接的繼承」（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四卷第三四九頁）。

列寧就從這些立場上，估計了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文學遺產，估計了赫爾岑、拜林斯基及乞爾尼謝夫斯基和杜布羅留波夫的遺產。在講到社會民主黨的思想與俄國革命的文學的遺產的聯繫時，列寧肯定地說，布爾塞維克比起自由主義者和民粹派，是些更價值的「遺產的保存者」。列寧又補充道：「但是保存遺產，這完全不是說為遺產所限制住」（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卷第三三二頁）。革命家保存遺產，並不是像古董家們保存舊的文件一樣的。

拜林斯基——這是俄國解放運動中的一位先驅。列寧就這樣確定了這位天才批評家在俄國革命思想發展上的地位。根據列寧關於俄國社會運動史的三個階段的學說，更表示出拜林斯基這位社會思想與文學批評中的革命民主主義的先驅者的歷史作用。請到拜林斯基的文學活動的歷史意義時，列寧說道：「他所寫的「發果戈理」這封著名的信（註六），已將他的文學活動作了一個總結，可說是不合法的民主主義的出版物中的一篇最好的作品」（見

「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七卷第三四一頁。在這位「憤怒的維沙里翁」（註七）的大段的自白中，列寧是看出了被地主和專制政體所壓迫的農民的革命情緒的反應。同樣地，列寧也引證了其他許多俄國的傑出作家（如乞爾尼謝夫、杜布羅留波夫、尼基塔索夫、謝德林、托爾斯泰、高爾基），指出俄國文學的思想內容與廣大人民羣衆的密切的關係。

列寧斷言進步的藝術與人民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也是從他對藝術和文學的性質的瞭解中產生出來的。人民不僅有權利享受藝術；並且人民還是藝術的創造者。克拉拉·蔡特金在其回憶中所寫的列寧論人民藝術的名言（註八），早已說成爲社會主義藝術學中的綱領式的要求了：「藝術是屬於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應該出自廣大勞動羣衆的最低層。它應該是爲這些羣衆所瞭解和爲他們所熱愛的。它應該將這些羣衆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聯合起來，並把他們提高起來。它應該喚起他們中間的藝術家，發展他們的志願。列寧在此地指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中藝術與文學發展的完整的綱領。當拜林斯基、乞爾尼謝夫和杜布羅留波夫的時代，人民羣衆是被壓迫的、無組織的和無知識的。但是人民的情緒和希望，是已經表現在這些先進作家的著作中。在這兒就存在着他們作品的人民性，在這兒就存在着他們和羣衆的聯繫。

一九〇九年的時候，有一批著名的立憲民主黨的作家，出了一本「道標」文集，在這本集子裏面，這批立憲民主黨代表資產階級，感謝專制政體壓迫革命。這一本集子的作者們，想儘可能地毀謗革命思想，並且想證明出拜林斯基、乞爾尼謝夫、杜布羅留波夫所表現的並不是人民大眾的思想和情感，他們僅僅是些知識分子情緒的代表者。

列寧所寫的論「道標」文集的文字，反對了這種對俄國革命民主主義領袖們的遺產的曲解和污蔑。

這篇文章着重指出先進的俄國文學及政論，是和人民羣衆的利益相聯繫的。在反對「道標派」的鬥爭中，列寧發展了俄國文學與政論的人民性質的原則，他會將這些原則應用到和蔡特金關於藝術的談話以及其他論文化問題的文章中去。列寧寫道：

「照「道標派」的說法，拜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信，是「知識份子情緒的大較的表現」（見第五十六頁）。「我們的政論的歷史，從拜林斯基以後起，從生活的理解的意義來講——則是完全胡說八道」（見第八十二頁）。

「這樣說起來，農奴反對農奴法的情緒，明顯的，是種「知識份子的」情緒。一八六一年至一九〇五年廣大人民羣衆在俄國生活各方面反對農奴制度殘餘的抗議和鬥爭的歷史，明顯的，是胡說八道。或者，也許，在我們這些聰明而有教養的作者們的意見，拜林斯基在給果戈理的信中所表現的情緒，是並不有關於農奴們的情緒嗎？我們政論的歷史，是與受農奴制度殘餘壓迫的人民羣衆無關嗎？」（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四卷第二一九頁）

拜林斯基、乞爾尼謝夫和杜布羅留波夫以及其認爲作家，總是在自己的活動中所表現的並不是知識份子的情緒，而是千百萬受壓迫的人民的利益。同樣地，列寧也引用了我「這個時代的偉大作家高爾基的創造者作例證，證明出先進的文學和人民的的生活，和人民的思想與希望的聯繫，這位偉大的作家表現出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進步的思想，並且他本人也是和革命的工人運動緊相聯繫着的。

對於研究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的史家們，列寧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路線的學說（註九），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在社會鬥爭的許多例證中，列寧特別揭發出「一八六一年至一九〇五年俄國歷史進程的特質來。

列寧論乞爾尼謝夫、杜布羅留波夫、尼基塔索夫、謝德林、托爾斯泰的文字，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路線的一般原則配合起來，是研究俄國歷史進程的一個基礎，並給我們一個發現出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的許多階級矛盾的出發點。

列寧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路線的學說的一般原則，在他所寫的「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土地政綱」一文中，是完全地敘述出來了。

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路線的學說，揭發出十九世紀社會發展的歷史真理。資產階級的歷史，煽起了農奴主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分歧；說自由主義者是反對農奴制度的敵身的戰士。根據這一個歷史觀點，資產階級與民粹派的文學史，就創造出俄國文學具有統一的「英雄主義」性質的論調。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們，宣佈了自由主義者是俄國十九世紀歷史中的主要的進步的社會力量，而忽視了俄國文學中的革命方向或者是曲解了它。列寧則指出，十九世紀俄國歷史中的主要的社會矛盾，並不是自由主義者與農奴主——地主之間的鬥爭，而是被壓迫的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鬥爭。

舊的資產階級的文藝理論，是用貴族的自由主義的思想來局限了俄國文學的一切進步的內容。在資產階級的文藝史家看起來，乞爾尼謝夫斯基和杜布羅留波夫只是些市民。屠格涅夫在農奴解放的時期，是爲了解放而鬥爭的一位比較偉大和徹底的戰士。托爾斯泰只是一位抽象的道德法則的說教者。人民的作用，千百萬勞動羣衆的鬥爭的作用，以及他們的情緒對於進步的文藝與政治的影響，是被忽視的。時代的主要的歷史矛盾，也沒有人提起了。

馬列主義則將俄國歷史發展中的被壓迫的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提到第一位。自由主義者和農奴主之間的鬥爭，不是並且也不可能時時代的主要的矛盾，它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馬列主義認爲人民羣衆是歷史的主要動力。這些人民羣衆，以及他們的歷史意識的發展的複雜性，決定了我們先進文學的基本內容。

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路線的學說，指出了歷史進程的一條主要的路線。但是列寧對於發展出一個具體情況下的發展的特點和矛盾性。他並且對十九世紀的文學與社會生活的分析，作了一些經典的示範。

列寧在他一八九四年所寫的第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如何反對社會民主黨？」一書中，摘錄了八十五至九十年代的民粹派。指出了他們的觀點的資產階級的性質。他澈頭澈尾地揭破了民粹派的真面目，是反動的「人民之友」。他們實際上反對人民的。八十五至九十年代的民粹派企圖自己把六十年代革命傳統的繼承者。列寧則憤激地揭破了他們與六十年代的「啓蒙運動」及革命民主主義者——乞爾尼謝夫斯基及杜布羅留波夫——的關係。

列寧在批評民粹派的雜誌「俄國財富」中的許多論時，他這樣寫道：「……這批先生們却高談闊論，說什麼「祖先理想」，自負不凡地聲稱，說他們正是他國保存着舊時代——當時法國把社會主義的思想傳佈於全歐洲，當時這些思想的接受就在俄國產出赫爾岑和乞爾尼謝夫斯基的理論和學說——的傳統。這已經完全是件不像模樣的戲事！而如果你「俄國財富」雜誌不是太滑稽可笑，如果這批聲稱在這樣一個雜誌的篇幅上面不是只能引起荷馬式的哄笑，那麼這件戲事就會令人氣憤多麼了。是呀，你們是在糟塌這些理想呀！」（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一六四頁）。

在比較「六十年代的啓蒙運動者」的立場和民粹主義的原則時，列寧明

顯地指出：乞爾尼謝夫斯基和赫爾岑的真正的繼承者，是社會民主黨。民粹主義的基本特點，和六十年代者——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思想上的遺言，是處於矛盾的地位的。

在審判六十年代的遺產以防民粹主義的侵襲時，列寧又做了一件最重大的事情，指出了俄國社會民主黨所繼承的歷史的革命傳統。列寧及其戰友們反對民粹派的鬥爭，還遠在九十年代的時分，就給了民粹主義以最後的思想上的粉碎。

列寧在講到格萊布·烏司本斯基的時候，表現出他對於這位作家的天才特點的深刻的了解。列寧關於烏司本斯基的評語，是他對於藝術創造的詳細而深刻的了解的好範。大家都知道，烏司本斯基是有一些民粹派的偏見的。可是列寧並沒有集中注意於這一點。對於他，重要的還是烏司本斯基創造的客觀的內容。在這種意義上講起來，作爲藝術家的烏司本斯基，是一個有力的現實主義者，真實地反映出當時俄國農村中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生長。烏司本斯基的作品，雖然有着許多主觀的錯誤，但總算對於民粹主義的教條的最好反駁。

列寧在烏司本斯基對於農民有着卓越的知識，以及他洞悉現實的偉大的藝術天才上，指出了他的力量。列寧對於這位藝術家的認識，是這樣概括地明白，並且表現出烏司本斯基成爲一位偉大的俄國現實主義作家的本質的東西來。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如何反對社會民主黨？」及「俄國財富」這兩本書中，都有很多的地方談到烏司本斯基。

格萊布·烏司本斯基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指示出民粹派理論上的破產，並且有助於和民粹派的鬥爭。列寧在他自己的政論裏面，是時常引用烏司本斯基作品中的入勝的。

赫爾岑和自由主義的民粹派劃分開來，這批人是想將這位天才的作家拖到他自己的一邊來的。他認爲必須使這位民主主義的偉大的諷刺小說家的作品更加普及化。正因爲這樣，一九一二年九月八日他因爲與赫爾岑的論戰德林的文字，曾寫過一封信給「民衆報」的編輯部。

從這有一作家像赫爾岑那樣會說列寧多次引用過，也從沒有一個作家曾經被引用過這樣多的人物形象。他指出了這位諷刺小說家的藝術的明證

性，對於專制及農奴制的國家作了無情的批評。

十九世紀的俄國革命文學，拜林斯基、乞爾尼謝夫斯基、杜布羅留波夫、沙爾蒂科夫——謝德林、尼克拉索夫、烏司本斯基的文學，是農民與平民的民主主義情緒的表現者，這就使得它具有人民性，使它具有偉大的藝術的意義。天才的托爾斯泰，就表現出千百萬的農民的情感。列寧認為托爾斯泰的創造，是面「俄國革命的鏡子」，是上一個世紀六十年代起以至一九〇五年的俄國社會矛盾的反映。在「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這篇文章裏面，列寧寫道：把托爾斯泰的名字和他顯然所沒有了解和避開的革命聯繫在一起，初看起來這也許是奇怪而勉強的。但是托爾斯泰是位天才的藝術家，他不能不在他自己的作品裏面，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來。「藝術家，思想家和說教者的托爾斯泰，主要的其屬於一八六一年到一九〇四年的時期，他以驚人的忠實，把整個第一次俄國革命的歷史特性，它的長處和它的弱點，都一齊顯示在他的作品裏面了」（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四卷第四〇〇頁）。托爾斯泰創造和學說中的「顯著的矛盾」，列寧曾用反映論來加以解釋，指出這些矛盾的條件，是十九世紀後三十年的俄國生活所造成的。

在列寧的歷史觀中，我們同樣地也發現了瞭解十九世紀社會與文學現象的基礎。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在此地是有着決定的意義的。列寧曾將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分成三個主要的時期、三個時代：「第一個時期，是從法國大革命一直到普法之戰，是資產階級上升和它完全勝利的時期。這是資產階級上升的路線；一般地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特殊的是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的時期，同時又是過了時的封建專制制度迅速崩潰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資產階級完全統治和下降的時候，是從進步的資產階級過渡到反動的和最反動的金錢資本的時期。這是新的階級，現代的民主制度聚集力量的時期。第三個時期還剛剛開始，它使得資產階級已處於這樣一個「情勢」，正像第一個時期中的封建主義一樣。這是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也包括由帝國主義所產生的）震動的時期」（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八卷第一〇八頁）。

在帝國主義的時期，在社會思想和文學的部門裏，就產生出新的特殊的現象。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起了反動的蛻變，反對民主主義的理想。這一點馬上就在文學部門中表現出來。我們只要指出列寧曾經粉碎過的「道標派」，就是一個例子。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時期，是「社會主義革

命的前夜」，它的特徵就是階級矛盾的極端尖銳化。資產階級的貪慾和利己主義，它的階級利益與最大數人民的對立，是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了。這一切是更敏銳的作家們不能不觸到的。他們漸漸地開始了解，人類解放的唯一道路，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其中有許多作家——是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但是這些事變的邏輯，也在他們其中很多人的身上起了作用。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徹底了解社會主義的基礎的，有些人是拿感情而不是拿理智來接受它的。列寧在論到辛克萊（註十）的小冊子「社會主義與戰爭」的時候，他這樣寫道：「辛克萊是一個從感情出發的社會主義者，他是沒有受過任何理論上的教育的。他把問題看得「很簡單」。他對於正在來臨的戰爭感到憤恨，並且想在社會主義裏面找到避免這戰爭的出路」（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四一頁）。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明顯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的整個腐朽和動搖。小資產階級的羣眾及其作家，了解資本主義崩潰的不可避免性。這時候有着成千的預兆，都指出羣眾的革命自覺的增長。列寧在巴比塞的「火線下」及「光明」等小說中，看出了這種過程的反應，而這位作家「參加到戰爭中去的時候，還是位最溫和的，嚴正的，順從的小資產階級，俗民和庸人」（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四卷第四〇四頁）。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巴比塞更進而就成了一位偉大的革命作家。列寧「在回答一位美國記者的問題中」（一九一九年），就這樣指出了巴比塞的作品特點。

帝國主義的時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是更加鞏固了。這一切都在文學中得到它明確的表現。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偉大的代表者，俄羅斯人民及全世界勞動者的詩壇，就是高爾基。高爾基是列寧和斯大林的至友，他們是特別珍視這位作家的創造的。列寧時常着重指出最主要的一點——就是高爾基和革命工人們的聯繫，以及高爾基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重大的意義。列寧曾經多次地指出高爾基在文學上的權威。他在「一個政論家的時評」（一九一〇年）中寫道：「高爾基，無疑的是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偉大的代表者，他對於無產階級藝術已經作了許多貢獻，而且仍能有更多的貢獻。社會民主黨的任何派別組織，都應當正當地因為高爾基是屬於自己這一邊而驕傲……」（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四卷第二九八——二九九頁）。

高爾基最新的文學，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的創造者。高爾基——
是世界藝術發展上的一個新的時期，列寧和斯大林曾很好地指出了這一點。

高爾基的作品，這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真正的黨的文學，這種文學也
正是列寧所幻想的。列寧這樣寫道：「這將會是自由的文學，因為這並不是
貪慾和地位，而是社會主義的風氣和對於勞動者的同情，將那一批批新的力
量調到它的隊伍裏來的。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為它將服務的，並不是飽滿
的女英雄，並不是獲得過獎章而受苦的「幾萬高爾基人」，而是幾百萬幾十
萬的勞動者，他們是國家的精華，是國家的力量，是國家的將來。這將會是
自由的文學，它要用社會主義無階級的經濟與活的工作，去充實人類革命
恩的最新的字句，建立過去所遺留的經驗（從原始到空想的形式發展到完成的科
學的社會主義）與現在的經驗（工人同志們現在的鬥爭）之間的經常的相互
關係」（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八卷第三九〇頁）。

附註

（註一）拉法爾夫（一七四九年——一八〇二年）是俄國民主主義
思想的一位最早的和傑出的作家，曾寫過一本「彼得堡至莫斯科的旅行記
」，其中敘述了他沿途所見到的農奴的生活情形，特別
是攻擊了當時的農奴制和批評了專制的政府的。當加泰文皇看
到這本書的時候，認為拉法爾夫是一個比布加喬夫（當時的一位農民革
命的領袖）還要危險的人物，立即命令將他處決，並將拉法爾夫充軍
到西伯利亞的庫拉。及至後來拉法爾夫被赦回國時，看到俄國的政
治仍無改革的希望，即自殺而死，成了俄國文學史上的第一位犧牲者。

（註二）蒲里希克維奇，古奇科夫和斯捷潘威是三位反對思想的代
表人物。蒲里希克維奇（一八七〇年——一九一九年）本是一位拜沙拉比
亞的地主，同時又是「俄羅斯人民同盟」的組織者，這是一種和「黑色
百人團」類似的極端反動的秘密組織，專吸納革命工人及過激革命者、
工人與進步的知識份子。一九〇六年時又組織了「米哈伊爾同盟」，比
「俄羅斯人民同盟」還更加反動。古奇科夫（一八六二年——一九三五
年）是位莫斯科的大實業家及商人，當一九〇五年時，曾組織了「十月
十七日同盟」，進行反對及破壞革命的工作，後來曾任臨時政府的軍
政部長，十月革命後即逃往國外，組織反蘇的活動。斯捷潘威（一八七
〇年——）是位「合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及代表人物，並且是「道
德」文集的編輯人之一。他最初先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變成自由主義

者，一九〇五年後傾向於「黑色百人團」的民族主義的烏想，蘇聯國內
戰爭時即參加了白黨軍官丹尼金的政府，又曾過白黨軍官烏蘭格爾的部
隊，後逃往國外。

（註三）是一九〇五年沙皇政府所組織的一項反動的秘密團體，專
以破壞革命事業及殺害革命者為業。

（註四）十二月黨人是俄國的貴族革命家。當十九世紀初時，特別
是在拿破崙戰爭（一九一二年）之後，俄國有許多進步的貴族分子及軍
人都受了西歐自由思想的洗禮，想對本國的政治制度進行改革，而身建立
起一個新的共和政體的國家。當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沙皇亞歷山大
一世逝世和哥羅尼古拉一世即位時，他們便在彼得堡的亞歷山大山
舉行起義，結果是失敗了，五百名主要的貴族革命家（其中有一百名是詩
人李泰也夫），共被判處了死刑。十二月黨人的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它的
影響卻是深遠的，這正像普希金所說的：「十二月黨人的起義，是俄國上
上的確證，證明了這一個時代的青年」。

（註五）「民黨黨」成立於一八七九年，是俄國民主黨「自由
山」黨的一派，以實行階級及階級鬥爭為原則，曾於一八八一年在沙
皇亞歷山大二世時，一八八七年又在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時，曾兩次
個別起義，但均失敗了，雖然失敗了，但對沙皇專制制度的作用，此處所謂「民黨黨」的起義，即含有此意。

（註六）這封信是拜沙拉比亞一八四七年七月十號寫給蒲里希克維奇
自書恩威寫成的，其中敘述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時期的起義。這封信曾在
俄國的青年人中引起過巨大的影響，陀思妥也夫和普希金等都在一個晚會上
讀了這封信，並對其內容，表示極大的興趣。

（註七）維沙道維奇是拜沙拉比亞的名字。

（註八）蘇聯黨的回憶文字，請見本報第八卷第一二兩期各刊。

（註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路線的問題，可參閱「列寧選集
」中譯文第五卷（解放版）。當時俄國正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途徑，
但列寧說這種發展可以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普魯士式的，一種是美國式
的；換句話說：一種是改良的方法，一種是革命的方法。前者以大地主
經濟為主腦，逐漸變成資產階級的經濟，用資本主義剝削的方法來代替
農奴制度的剝削方法，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後者以小農經濟為主腦
，用革命的方法消滅地主式的剝削，而消滅資本主義的「法衣」（農民
）的道路自由發展。

（註十）是位著名的英國作家，「石炭王」、「煤油」、「賭場」
、「波斯頓」、「小鋼鉄」、「汽車王」等小說的作者。

內政部重慶新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重慶市國稅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第一類新聞紙
重慶市國稅局結算查處查證渝安執字第三二二二號



要目

敵汪關係的演變

史明操

論日本本年度的龐大預算

香汀

論中國佃農問題

華崗

蒙古帝國統治下的中國社會

高丕萊

歷史、歷史劇、鬧劇

余作約

日六十月四年二十三

目錄

時	認清誰是我們的敵人	(一四一)
論	蘇德戰爭的新形勢	(一四二)
	艾登訪美之行	(一四三)
	東條赴寧的內幕	(一四四)

專論

敵汪關係的演變	史明操 (一四五)
論日本本年度的龐大預算	香 玎 (一四九)
研究	
論中國佃農問題	華 崗 (一五四)
蒙古帝國統治下的中國社會	高元萊 (一六〇)

批評

心理因素與物價	方卓芬 (一六八)
歷史、歷史劇、鬧劇	余伯約 (一六九)
物與氣	陳家康 (一七一)

介紹

馮友蘭先生「新理學」商兌之三	戈寶權譯 (一七八)
列寧論托爾斯泰(其一)	
信箱	(一八三)
	(一八四)

關於宗教自由
精神是客觀存在嗎？

群衆

第八卷 第六七期合刊
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發行所 新華週刊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理 新華日報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西安各營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局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	一 元
六 期	五元四角
十二期	十 元
廿四期	十九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匯加

認清誰是我們的敵人

英美和蘇聯，在制度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她們現在是合作了，結成同盟了。當她們結合在一起攜手並進的時候，全世界人士都稱道她們的領袖，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斯大林委員長莫武魯智，讚嘆不已，決沒有說他們是蠢或糊塗的。為什麼了因為他們面前有一個共同的敵人，他們認清了這一個共同的敵人。這一認識是够偉大的，因為這一個敵人不但最極其凶惡，而且還非常狡猾；如果大家不同心合力來打擊他，他就會鬼計多端，來各個擊破，使全人類不替你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墮入阿鼻地獄，廢盡災難。

他們雖是同盟合作，雖在攜手並進，他們可並沒有放棄各自不同的主義，——不同的主義，並沒有妨礙他們合作。什麼道理？因為這個人太強大了，要打倒他，頗不容易，非大家把全付精力都用上上去不可；正在打倒他的當兒，沒有功夫，也不應當分心於別的問題，如「戰勝以後對敵對誰的利益益大些？」或「今天的戰友明天是否又成敵人？」等等，一分心於這種問題，敵人就有空隙可鑽，就不能把敵人徹底打倒。這就是說，在敵人還沒有打倒以前，沒有任何別的話可講。不但如此，就是敵人已經被打倒了，大家還要恢復戰前的元氣，也需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所要打掃的戰場，浩浩無垠，這裏的天地寬闊得很。

對這個共同敵人認識清楚，是不容易的，然而是非常必要的。當你把握認清時人心就立見振奮，儘管烽火連天，槍聲遍地，人們的眼前仍是閃着光

明，希望在使無邊的力量從每一個人的身上湧湧而出。當你對他略覺糊塗時，人心就立見灰冷，儘管已是山崩地裂，已是山崩地裂，已是勝利在望，人們的眼前也會飛舞着黑影，憂慮，酸楚，悲觀，失望，也會沉重地壓入不同的心坎裏，而使人失去了一切的力。試回憶一下吧，當大西洋羣羣，英蘇同盟，美蘇協定等等宣佈的時候，雖然那時正是希特勒的默路島跡跡歐陸，聲震不可一世，但全世界人士却是如何的歡欣鼓舞，堅信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人人精神抖擻，為爭取光明的前途而奮鬥！——到有什麼區域問題，什麼國際友邦援助之類的話發生時，雖然那時希特勒軍隊已遭挫敗，蘇聯紅軍正在對它追奔逐北，但人們聽到了這種談話會是如何的心焦，各國的輿論又是如何的表示了鬱悶和憂慮？

為什麼英明的領袖能那樣的給人以信心，鼓之勇氣，而不適當的發言則會造成那樣陰森可怕的氣壓呢？其關鍵就在於能否認清一個共同敵人。而能否認清共同敵人的關鍵，則又在於能否當當考慮問題時先把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全人類的命運擺在第一位，而不顧或乎為一派一系的利害去打算。

像國際上這樣一個團結一致打擊共同敵人的局面，在我們中國國內也是存在着的，而且還是早就存在了的。蘇俄的炮聲，把主義不同的兩大政黨以及其他各黨各派都結合在一起了；全國上下都傾其全力於「把日本法西斯一直打到鴨綠江邊去」這個共同目標上面去。這樣一個精誠團結，振奮了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人心，奠定了全國同胞定能克敵致

勝的信念，奠定了全世界友邦中華民族定有其光輝前途的信念。積弱中的華民國，國民的民族意識於以發，國家的國際地位於以高。

然而，也正如國際那樣，白廷廷不免於有玷，在國家民族的榮耀前途上，常會有人投以或濃或淡的陰影。始而我們看到一些不相干的印刷物，飛短流長，散佈一些親痛仇快的蜚語，最近又在帶有代表性的機關刊物上公開用「奸匪」字樣來污蔑抗日武裝，善戰軍年的抱源；而「奸匪」之聲，也常會出之於這或視為負責人物之口。這種「言論」，除了灰人之心，希人之意而外，試問還會有什麼後果？古人云「瑕不掩瑜」，這種有如燭火的微疵，固不見得有傷於經天之日月——辯論團結之大局。然而，星星之火，未嘗不可以燎原；「為惡不推，為蛇將若何？」吾人不禁涕泣而道：大敵正在當前，千萬要認取清楚，不容有片刻模糊，有絲毫糊。現在雖說已經勝利在望，然而，在望只是在望而已，並沒有已經來到，我們自己的困苦艱難，且還在來日方長，敵人的強大凶頑迄今還是依然故物，國際的戰局還正向持久的方向拉去，友邦的援助不容我們在什麼奢望。我們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打擊敵人，準備反攻上去，這還嫌不夠，哪有功夫來打其他的算盤！不要說「繕之事不許有，即閱之也絲毫存不得！」

國人乎，其認清我們的敵人！

(任) 四月五日

蘇德戰爭的新形勢

「敵人（德國法西斯軍隊，以下同——引者）已遭受到潰敗，但是它還不會被征服。由于紅軍的打擊，德國法西斯軍隊現在正經歷着危機，但這並不是說它已經不能重整旗鼓了。我們（蘇聯）對德國侵略者進行的戰鬥還沒有過去，——它正在展開着，正在驟然起來。以為不去打仗，德軍就會放棄我們一公里土地，那一定是愚蠢的想法。紅軍面對着奸詐的、殘酷的、而且迄今還是強大的敵人，進行決不能手的鬥爭。這種鬥爭將需要時間、犧牲、使用我們的力量，並且動員我們一切的可能性。」

——二月二十三日紅軍節斯大林文告

早在蘇軍的勝利反攻接近高潮的時候，斯大林就已經提出警告，指出：德國法西斯軍隊雖然遭受了潰敗，但是它還不會被征服，它雖然經歷着危機，但是它還有重整旗鼓的可能，它奸詐，殘酷，而且迄今還是強大，擊敗它需要時間，犧牲，動員和使用一切的力量。

事件的發展證實了斯大林同志的遠見。

由于南路反攻長足的進展，早在二月下旬，爲了鞏固南路的既得陣地，爲了不使蘇軍在這一方面的進展，過份突出，爲了執行戰略上更好的配合，蘇軍指揮部即已決定在南路採取守勢，而將其反攻重心轉移到中路。但也就是在這蘇軍反攻重心轉移的當兒，德軍決定了在南路發動掙扎性的反攻，爲了解救南路頓內次盆地一帶德軍的危局，爲了牽制蘇軍中路的反攻，爲奪取了整個戰場上的主動權。

在自三月初起的兩週中，德軍在頓內次河中游比爾哥羅德——哈爾科夫——楚古耶夫一線集中了二十五師以上的兵力（其中有十二師，內有坦克三師，新自西歐調來）造成了局部的兵力優勢，在蒙受慘重的損失之後，于三月十六日佔領了哈爾科夫，二十一日佔領比爾哥羅德。誠如斯大林同志之所預料，在表面上德軍是把它的旗幟重新豎起來了，但是它收到它所預期的效果沒有呢？自然我們不能否認，德軍在戰術上是獲得了某種局部的進展，現在我們要問的是，這種進展是拿什麼樣的代價換來的，它具有什麼樣的戰略意義。關於德軍所付的代價，據三月二十四日蘇聯情報部所發表的報告，截至當時爲止，德軍在反攻中的損失已達五二、〇〇〇人，而蘇軍損失則爲三六、〇〇〇人，從人力的消耗上說德軍是得不償失的。從戰略意義上看，德軍既未因此而完成任何突破包圍，直至今日它們還被阻在頓內次河的西岸，更未因此而牽制了蘇軍的中路反攻，使蘇軍的中路反攻無從展開。這從三月初以來蘇軍在北路和中路一帶的進展看，是極其明顯的。三月初，北路蘇軍在捷摩辛將軍的指揮之下，恢復了伊爾曼湖以南一帶的陣地；在中路，蘇軍連續的克服了塞夫（三日），培利（九日）和維亞茲瑪（十二日）等重鎮，目前正在一步緊一步的迫近斯摩棱斯克。

現在的問題是德軍是不是因爲它的反攻奪取了整個戰爭的領導權了呢？關於蘇軍增援哈爾科夫的消息，初見于三月十九日的瑞典京城路透電，不過

很顯然的，這一種戰後後的調動絕不致于——最低限度在目前不致于影響到蘇軍的中路攻勢，這從三月以來蘇軍在中路和北路攻勢不斷有所進展看，是極其明白的。自然，較之于蘇軍反攻的初期，蘇軍在這一帶的進展速度是緩慢下來了，但是，這主要的並不是因爲南路德軍反攻之故，而是因爲：第一，春來冰解，到處泥濘，目前的氣候條件不利于大兵團的運動；第二，這一帶地區是德軍早在九四一年八月九月間就已開始佔領，他們在這裏經營了十八個月以上的時間，這一帶的德軍防禦工事是不能和頓河河曲的防禦工事同日而語的。

自然，這不是說德軍在南路就不能再有進展了，不，德軍還很強大，它還可能獲得若干戰術上的進展，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過去，德軍的攻勢，多少還是一種戰術上主動的攻勢，而現在，它的攻勢却不能僅僅乎是一種戰術上主動的攻勢了，戰略的主動權在蘇軍的手中；在過去的希特勒的所有攻勢中，德軍是攻，蘇軍是守，而現在却是雙方都有所攻有所守了，這和德軍攻勢只在一方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過去希特勒的攻勢最大限度不過是調集了歐洲所有的後備隊，而現在却不得不連一向來留作最高統帥部後備之用的突擊部隊也決定調上戰場了。這些都是目前蘇德戰場上的基本特點，這足以說明德國法西斯雖然還很頑強，可是那頑強以建立起來的基礎已經是脆弱不堪了。根據各種客觀條件的估計，不管希特勒怎樣掙扎，一九四三年是完全可以擊潰他的；當前的問題是：要一九四三年擊潰希特勒非英美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不可；爲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國家的利益，爲了使這一個世界不要多受一天不必要的苦痛，我們由衷的希望，英美迅速的開闢西歐第二戰場，完成一九四三年擊敗希特勒的歷史任務。

（蒙）四月八日

艾登訪美之行

艾登抵華府的消息，是三月十二日發表的。到了廿九日晚，會談結束，美國國務卿赫爾設宴歡送。艾登在華府住了兩個星期，和英、中、蘇方面人物，都進行了會談，中心自然是英美會談。

艾登華府之行的重要性是不待言的。在他去華府之前，倫敦就已經在注意世界戰局和政局者注目的中心。眼光敏銳的人們，已經把這時間內國際上連串的發展，很自然的聯系到倫敦。

(被略兩段，計二百餘字)

人們對盟國的團結抗戰，沒有疑義，但是，總像在企待點什麼。希望弄得更明白清楚些。尤其是卡港會議開不久，英美規定了一九四三年九個月內協助擊潰希特勒的戰略，人們的腦海不免浮起一個疑問：究竟局勢向着什麼方向發展？

艾登是「應美政府之邀」赴華府的。許多人推測他此行的任務，都不免側重於政治外交方面問題的商討。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卡港會議側重的是軍事，而有不少政治外交問題的確實要緊商討解決。可是，這個推測，馬上就被證明不完全正確。艾登在十三日招待記者席上，就將若干政治外交問題說得清清楚楚了。而且，這時候他還沒有會見赫爾或羅斯福。他說：「吾人如欲具有和平之鞏固基礎，則美英中蘇間之合作，係屬必要」；「余認爲吾人對於德國與日本，須同樣予以注意」；「吾人尚未能達討論若干國家間未來疆界問題之時期」；「英國政府樂見此兩將軍（指吉羅德及威爾遜）暨全體法團團結一致，對德作戰」；「帶了這些原則去美國談話，自然很圓滿融洽。這像是艾登是爲了說明這些問題而去的。在他的談話中，有一句話在當時並未引起多大注意，就是「在彼等（指德

國）之舉動結束以前，吾人尚須行經綿長之途程」。這句話的重要性，和具體內容，到了十五號赫爾與艾登談話後發表的聲明中，才有所說明。聲明中說：

「戰爭就各合理方面計算之結果，較諸以倉卒判斷爲基礎之所期望者，時間將更爲延長」。

到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艾登與赫爾會談，中心之一是英美的戰略問題。而赫爾與艾登一次會談後，迅速的同意戰爭將長期化。這是卡港會議的決定約須大修正。英美從九個月爲期的歐洲戰爭的速決，轉到了長期化的趨向。

赫爾這個聲明發表後，似乎艾登訪美的主要任務已告完成。在他赴紐約（十九日）前的四天當中，一切活動似乎都是在這個戰略決定下的外交。他在十五日會晤了華萊士，威爾遜及諾克斯，並與我國家部長會談，十六日又與赫爾會晤兩次，同日報載「艾登將於明日與蘇大使李維諾夫共進午餐」，次日却又未見電訊，艾登去紐約前，似曾與羅斯福於十七日會談一次，但事後亦未見電訊。到了二十日艾登從紐約回華府，羅斯福原擬會見，可是「爲避免加重總統之感覺，週末約會均已取消」，就未晤談。羅斯福與艾登的會談，廿七日及廿八日連續兩次，第二次則說明「英國之蘇聯問題專家史特蘭」亦在座，他與赫爾最後一次會談是見之於廿九日的電訊。此外，他並於廿九日會見羅斯福，並有報載稱將與宋部長顧大使及李維諾夫大使會晤。至本文執筆時止，尙未見關於會晤的報道。

從這一串瑣瑣的記載看來，艾登在美的會談，

主要的是他和赫爾的談話。除了英美戰略，大體關於戰後問題亦會交換意見。至於他和中國外交人物的會談，似乎外交多於實際。而他是是否會與李維諾夫會談，還要更多的材料才能下結論，就是會晤了兩次罷，怕也是共進午餐及行前告別的交流。

艾登在美商定的什麼？主要的要從赫爾的聲明裏去看。而邱吉爾在廿一日發表的廣播，可以說艾登與赫爾會談時所提出的主張的藍本讀，或者可以看作是赫爾聲明的註腳！

艾登和邱吉爾之間，像有出入，實爲相互補充。他們都說戰爭可能長期化，邱吉爾則說擊潰希特勒要在明年或更後一年。他們都說對付德國和日本是一樣的。邱吉爾則說回師東向將在擊潰希特勒之後，而那時英國將部分復員。他們都說國際反侵略國家要在戰時和戰後團結。邱吉爾強調了英、美、蘇三國，艾登則加上了中國，並且在邱吉爾廣播後，特別說明英國將助我抗戰到底，並聲明「願中國勿以此懷疑吾人」。他們都說明現在談盟國問題是急務是過早，都強調要努力作戰並警惕仍有重大困難在前面。

艾登不虛此行。他和美國規定了新戰略。他去對「政治上之意見分歧」，使之簡單化，使之緩和了。但是，並未完全一致。羅斯福對艾登訪美之行的觀感是兩國意見已百分之九十五同意。而美國觀察家也說：「此次談話已使英美兩國對於戰爭與和平問題之意見，更近於完全一致」。究竟兩國間還有什麼問題的意見不一致，我們未便妄加揣測。但是，總還至少有百分之五不一致，或者說，對各項問題都還是更近於完全一致。

英美新戰略是定了，政治意見的分歧是緩和了。前者對世界戰局和政局的重大影響，非本文的任務，而後者的成就，是對盟國的團結有裨益的。

(英)三月三十一日

東條赴寧的內幕

東條東條於三月十二日飛往南京訪問汪逆。從敵偽關係上講這是一種新的動向。日寇自太平洋戰爭長期化以來，宣稱對汪偽組織實施「新政策」，口口聲聲的「道義」「平等」「親善」，一再的宣稱「撤廢」特權「交還」工廠等等，這些表面的肉麻的動作，對汪逆總要顯出日寇的親暱與「尊重」。東條之來華，何嘗又不是想在汪逆的臉上多塗上一層粉，假裝一些使偽臉上的「光輝」，偽裝出所謂「中日兄弟之邦的親密姿態呢？

東條自訪問偽滿洲到東京之後，日方廣播傳出「此行會與汪政權討論了聯合作戰事宜」，並稱「日政府已決定根據新政策調整中日關係」。從這兩句話聽起來，也就知道，東條之訪寧，一方面固是企圖為汪逆抬高身價，一方面也就是為了加緊勒索，把中國淪陷區的資源充份的搜括掠奪，以補其物資之不足。這是東條來華的主要任務，也是敵人對汪偽組織「新政策」的中心內容。

掠奪淪陷區的資源物力，這是日寇不變的一貫政策，今天為什麼要有所謂「新政策」呢？這原因是由於舊的掠奪辦法已經發生困難。我們知道，日寇對淪陷區的經濟掠奪，是佔據了許多中國人民的工廠，統制了物產的價格與運銷，發行了軍用票以便利其搜括，這是典型的「新政策」的掠奪方式。在這種掠奪方式之下，中國淪陷區的物資被數一空，人民的生產熱情極度冷落，生計一天天貧困，這樣下去，便是殺雞取蛋的做法，目前只有一條出路。日寇為了維持其不絕的物資供應，

就不得不表面上採取一些「讓步」，改換一下方式，把工廠「退還」了，把偽幣的信用抬高了，軍用票決定收回了，再加上政治上的一套「尊重」汪偽的戲法，這無非就是誘惑淪陷區人民投資於生產事業，提高生產的熱忱以達發展淪陷區的生產增加物資掠奪的目的。這就是日寇注意之的，沒有道，日寇就無從談起將中國做為牠的「兵站」。

日寇很懂得，歷年來汪逆高唱誘惑偽滿洲資本與中國資本從事生產的調子雖然很動聽，結果總是失敗的緣故。因為淪陷區一切經濟命脈全操縱在日寇手裏，偽幣又不穩定，中國資本家即使拋開民族意識來說，就以資金的安全與獲利觀點而論，他們也不願輕易下水的。目前日寇的所謂「新政策」，便是給偽組織以許多偽裝裝出「獨立」「自主」的面貌，並藉「繁榮」「幸福」的語言，來欺騙淪陷區人民加緊為日寇生產軍需民食等一切物資。

日寇的「新政策」決不限於經濟一面，軍事上特別是政治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日寇對汪偽的舊政策，是無意為汪逆建立比較大規模的偽軍的，而新的政策，則是積極為汪逆建軍，這也是新的形勢之下，需要日寇自華抽調深陷泥淖的兵力用於它方，所以不得不訓練一批偽軍替代。在政治上，日寇對汪逆的所謂「尊重」，也正是藉此加緊對我大後方的「和平攻勢」，散佈謠言，同時也正是對印度對緬甸菲律賓人民的一種引誘，表示日寇真正是為了解放東亞民族的解放，日寇對他們也一樣「尊重」其「獨立」的。

東條來華以後，日寇報紙曾這樣說：「身負重責之首相，訪華之舉動實史無先例。是以表示日本熱切扶植「南京政府」之發展，此種對「中國」之熱誠，不僅造成「中國」極深之印象，亦且使全大東亞共榮圈感動至深」，這完全顯露其對中國和對東方各民族政治欺騙的用心。

東條對汪偽所採取的「新政策」，按其實際來說，仍是日寇的老辦法「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新利用。這種新的做法，表面上其採取和緩，客氣，尊重一大套，實際上是愈趨愈緊愈來愈凶，如果偽偽奸謀獲得實現，那末，我們的淪陷區真正要淪為日寇的殖民地了。

日寇這個滅華的新陰謀，我們一點也不能忽略。東條這一劍子手，此者來華，除了佈置這一毒計之外，還特意向在華日寇偽民指示如何來實行這一「新政策」。日寇對華偽使汪逆光榮最近會說，「日本對華新政策的影響，即將分明」，這就是說，日寇願為自信其新陰謀能獲得良好的結果的。事實上，由於日寇表面對汪逆的捧場，感激主子之餘，汪逆也正拚命為日寇賣氣力。最近最近情形來說，舉偽正舉行了所謂糧食會議，積極籌謀增產。又成立了所謂商業統制總會，進一步為日寇壓榨中國淪陷區人民的汗血。不過淪陷區廣大的人民，身受日寇掠奪搜括的痛苦，他們必不會被汪逆新陰謀所騙，這是必然的，敵汪的幻想一定要受到無情的打擊。汪逆在日寇牽線之下，在日寇親自化裝之下，特別賣弄風騷，裝成一個「愛國」份子，「和平」使者，對我大後方的奸謀一定愈來愈多，我們廣大軍民應加倍提防這一妖魔的活動，並從積極方面粉碎敵偽的新鬼計。（操）

敵汪關係的演變

史明錄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汪逆於逃出重慶一年又三個月之後，在南京樹起了「和平」「反共」的杏黃旗，在日寇壓迫下成立了一個小朝廷。從這批袍笏登場的漢奸醜劇演出至今，已有足足三個月頭了。

日寇之對汪逆近來獲得似乎復趨勁，去年九月，平沼有田等敵酋曾稱「特使」訪問了南京，接着有敵「大東亞省」大臣齋藤實，到了今年一月間又宣佈了「廢除在華特權」，最近東條更親赴南京作汪逆「貴賓」，日寇宣傳說：「這是日本歷任首相中第一次正式出國訪問」。日寇做出這些表面姿態究竟爲的什麼？我們自然急欲知道，但是爲了進一步了解起見，對汪逆政權成立以來的敵偽關係的演變，首先須要弄清楚。筆者特在汪偽「組府」三年的前夕，試對敵偽關係的演變略述，加以簡潔的敘述。

敵汪關係的演變，我們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來說，第一個時期是從汪逆逃出重慶高唱「和平」「反共」到南京成立偽組織之前；第二個時期從南京偽組織成立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第三個時期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到目前爲止。我們先從第一個時期說起。

自二十七年武漢會戰結束，我全國軍民一致堅持繼續抗戰之後，日寇看清楚了兩件事實，即是中日戰爭已呈長期戰化，同時又看到光武武力決不能征服中國。根據這兩個認識，日寇爲了達到「速戰速決」的夢想，不得不開始較陶德曼調停更大的和平攻勢，企圖以政治進攻爲主來瓦解我國的抗戰，「近衛聲明」的出現，正是日寇新政策開端的開端。汪逆便在這「釣餌」之下，無恥地逃出了抗戰陣營，到河內去發表其「談話」了。

汪逆發表所謂「談話」之後，一方面積極投奔主子之門，表示效忠；另一方面拚命散佈失敗情緒和中傷抗戰國策的論調，以圖展開其所謂全面的「和平運動」。汪逆在這一時期的陰謀，可說是毫無什麼結果的。除了他在上海組織了偽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之外，最多也只有唆使丁默邨李士羣之流漢

奸，在滬組織暗殺團體，屠殺愛國份子爲日寇張目。他的「和平運動」受到全國軍民的共棄，日寇所希望於汪逆的急進的瓦解抗戰陣營的陰謀，毫無成績可言。這個時期的汪逆，內受「臨時」「維新」兩偽組織的排擠，外受日本主子的冷淡，環顧左右，也只有自嘆憫容。汪逆在那樣苦悶的日子中，作了一首詞，題目叫憶舊遊（落葉），原詞說：「曉鏡愁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漢清，猶作留連意，奈鷓鴣不管，催化清萍，已分去潮俱渺，問沙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擊空枝老，同訴飄零」。這詞如泣如訴的心境，正是當時彷徨無路，自嘆命薄的汪逆的寫照。

汪逆當時的苦悶，最主要的自然感到「主子不諒」而起。我們能夠回憶到民國二十八年六月間，汪逆第一次到東京向近衛平沼哭訴乞憐憫的情景，儘管汪逆見了主子終日以淚洗面，可是日寇對野莫不對汪逆大加奚落與挖苦。有人說他「有女性的嬌媚」，敵軍部機關報國民新聞則老實說不起他說「汪兆銘之脫出重慶，不要懷着奢望，實則汪某在政治上並沒有力量，估計太高，是一種不明瞭中國政治形勢的錯覺」。敵寇雜誌「東亞」更不容氣了，以破口大罵的姿態，教訓汪逆說：「汪兆銘對日本所希望的，是時常強調讓與以外之撤兵，……撤兵問題不過是一句空話，想來汪某未必不知道」。

汪逆在自怨自艾中換了不少的日子，一直到了二十八年九月以後，由於國際風雲丕變，歐洲爆發了大戰，平沼內閣在風雲急變中垮台，日寇「解決中國事變」的需要更加迫切，汪逆的命運才有轉機。同時另一方面，汪逆自身也知道過去賣身求祿，要價過高，也就更馴伏起來，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汪逆組織偽政權的醞釀，才能一天表面化起來。

日寇這時爲什麼又突然對汪逆加以「厚禮」呢？首先一個原因是：根據國際情勢的變化，樹立汪偽政權，企望在戰爭困難中的英國，甚至美國，承認汪逆偽政權，進一步藉英美力量來促進我抗戰陣營與汪偽「合流」，以遂其「解決中國事變」的目的，夢想出現一個遠東的「慕尼黑」。日寇當時認定英法忙於歐戰，顧不到遠東，特別是張伯倫尙掌權，

一定願對日本讓步，美國雖站在戰局之外，但一方面鑒於德國希特勒的擴張，另一方面蘇芬戰爭的爆發，日寇也認定美國對日也有讓步的可能。當時代表外務省的「外交時報」曾經說：「如果英國對於內戰時期的西班牙兩方政府都加以承認，軸對於德荷當然沒有理由而不予以法律上同等的方便，因為汪氏之具有代表中國人民的權力，至少也不下於拿破崙以來的其它地方政府」。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英下院議員普萊士更有「日本有無企圖請英國居間斡旋重慶國民政府與汪精衛間的接觸」之詢問，這些都可證明日寇當時妄想之大。

除掉國際情況的演變而形成的這一因素之外，尚有另一因素，這便是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汪逆更進一步奴化。中國國內形勢，自民國二十八年國民黨五中全會以後，已有新的變化，日寇看準這一變化，「和平」「反共」的旗子，認爲是張掛出來的時候了。至於汪逆的進一步奴化，我們知道，偽組織成立之先，敵汪訂定了密約和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這一要綱協定的內容，此處暫勿多述，不過主要的就是承認了日寇駐軍，經濟掠奪，以及領土割裂的特權，汪逆在「體電」中所唱的：「更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音過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地點爲限」等花言巧語，一概收起不談了。

不僅如此，日寇之所以扶植汪逆，還有一個主要原因，便是汪逆能够煽動偽三民主義偽國民黨的旗幟，這是日寇瓦解中國抗戰最需要的工具。日寇自發動對華侵略戰爭之初，對中國國民黨與三民主義與對中國共產黨一樣的仇恨萬分，認爲必須摧毀的抗日意識大本營。但是，從武漢戰役以後，狡猾的日寇改了一副面貌，從仇視國民黨與三民主義轉爲盜用和曲解三民主義與國民黨。自汪逆逃出重慶之後，他盜用了國民黨與三民主義，散播了種種謬論，日寇也提倡起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相唱和。平沼內閣時期，敵議會中曾有如下的問答：

議員安藤質問：「三民主義是否可爲新中國建設之指導原理？」
平沼答：「尙在檢討中」

議員山本質問：「中國之三民主義，深入人心，牢不可拔，內閣對之取何態度？」

荒木答：「三民主義須加修正，方可採用」。

這兩段問答可以看出敵寇企圖盜用和修改三民主義之陰謀。這一陰謀汪

逆是最好的執行者，因此自然認爲「上選之材」了。

一一

汪逆組織偽中央政權的活動，既獲得主子允准以後，進行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幾次的「佳期」皆延誤了，這主要是反映了傀儡內部的搶奪權位。汪逆偽府的一再擱淺，首先是由於分贖不勻。照汪王（揖唐）梁（鴻志）諸逆在南會聚議的結果，所謂「中央政治委員會」的人選，共計二十八人，由汪逆推荐十八人，王梁各佔五人，可是汪逆大爲反對，主張各佔三分之一，王逆後台有喜多士肥原等做擔腰，互不相讓，汪逆最後無奈，只得又派周逆佛海去東京請示乞憐。

無論如何說，南京偽中央政權的成立是汪逆對「維新」和「臨時」兩漢奸系統，特別是對「維新」系的勝利。日寇在扶植偽政權的口號之下，做了如下幾件事：

- 第一，敵寇相當支持了汪逆「一黨中心勢力」的樹立，譬如偽興亞建國本部之宣告解散，偽大民會之併入偽黨，武漢偽兵和寇之宣告解散，全體黨員參加汪黨爲黨員。
- 第二，敵寇將蘇浙皖鄂諸省偽政權交與汪逆，以促進其行政之「一元化」。
- 第三，敵寇在經濟上作了某些表面的「讓步」：（一）宣佈發還「軍管工廠」事實上發還了一部份。（二）取消「國策會社」及若干負有特殊使命會社以外之日人企業之優先權利。（三）設立偽中央儲備銀行。（四）允許中國人的工商業加入各種販賣協議會及販賣組合等機構。（五）一度解散「華中輸出會社」，允許獸腸豬毛桐油茶葉等自由販運等。

- 日寇所予汪逆的任務是什麼呢？
- 第一是發動和平攻勢，瓦解中國抗戰。
- 第二是爲日寇維持佔領區治安，發展生產，爲日寇增加物資以達消化佔領區的目的。
- 第三是利用汪逆誘致民族資本與華僑資本，開發佔領區。

敵汪關係到了汪逆登台以後，照理說，應該一主一奴平順的發展下去，但按其實際却不盡然。我們知道，日寇對佔領區，經濟上早已樹立了直接掠奪的機構，這種機構主要者爲「物資統制組合」與「國策會社」。佔領區的市場全由日寇統制，食料，肥料，工業原料之輸出，盡操在日人手中。所有

「物資統制組合」，就是佔領區農商出品出入的獨占機構。至於生產事業方面則全由「華中振興公司」獨占。所有礦產，鹽業，水電，水產，交通，蠶絲諸業皆為敵人獨占。不僅如此，日寇在華中更推廣其不值一文的軍用票，藉軍用票來便利其掠奪。

這裏便產生出敵我之間的一個矛盾。這個矛盾是什麼呢？首先從日寇方面來說，對中國淪陷區政治軍事經濟的直接控制與直接掠奪是牠決不放鬆的，但是為了發動對華政治攻勢達到「以華制華」目的，政治上需要樹立一個表面上獨立的汪偽政權，予汪逆以某些表面上的政治權力。軍事上的控制則是不放鬆的，至於經濟上呢？日寇為了吸收中國民族資本與華僑資本之參加開發佔領區，也不得不表面上做出些「讓步」，可是這是有限度的。汪逆呢？他基本上當然是為了其國家利益，但是他念念不忘於在效忠日寇之際，從日寇方面取得一部份權力特別是經濟上的權利，藉以培植其一派系的力量和培養其社會基礎，這却是日寇所不願的。

由於這一矛盾，汪逆與日寇在下列諸方面始終未能有很好的解決。

第一是通貨問題。汪逆希望其偽中央儲備銀行券能成爲淪陷區一般通貨，由敵人處獲得支持，而與我法幣鬥爭。但是日寇對偽中儲券的發行力予限制，地域上只許其在蘇浙皖滬區內流通，同時又盡力強化「軍用票」，以限制偽儲券之擴大。

第二是物資的統制方面。在華中一帶淪陷區敵物資統制極為嚴格，設立了種種配給和販賣組合，一方面規定以「軍用票」爲唯一日本輸運物資的支付手段，而另一方面則謀藉城市嚴格的物資統制而間接支配鄉村。這便使汪逆自立經濟基礎的幻想無法實現。

第三，是敵人對產業和交通的直接與間接問題，上面說過「華中振興會社」直接支配着東南一帶的交通，公用事業，鹽，礦，棉花，蠶絲，茶葉等全部產業活動。較大的工廠，敵人也遲遲不肯「發還」給偽組織或原來的東主人，就「發還」的一部份工廠來說，改頭換面，無不變成中日合辦了。汪逆發展經濟力量的妄想，又受打擊。

第四，汪逆企圖恢復淪陷區的農業，這當然是日寇所需要的，但爲了達成這一目的，必須日寇減低對農產品運銷和價格的統制以及支配偽幣及各種統制機構，而日寇又不願爲日寇所接受。

以上四種矛盾是在汪逆所最感苦悶的所在，當時的汪逆小朝廷面對着一個

最嚴重的財政危機，每月稅收收入只有二千萬而支出却得四千萬。如何籌措呢？就是發偽幣吧，可是偽中儲券由日本印刷，主權控制在日寇手裏，始終未蒙主子允許。汪逆的爪牙們便在漢奸報上一再強調並以乞憐憫要求日本：解除物資統制，退還一切軍管工廠和改組國策會社。汪逆這些哀告，雖然也曾引起日寇一部份人的「同情」，例如本多喜太郎曾說：「南京政府統治下民衆之生活水準，較之戰前約低落三分之一，其原因實在於日本軍隊物資搬入限制……吾人實有深加考慮的必要，又側面增加民衆生活痛苦者，則爲各地所設立之各種國策會社」。可是這種「同情」也僅僅是空言而已，食慾成性的日寇，怎願放下已經獲得的一塊肥肉呢？

汪逆儘管表示了許多的怨艾，而日寇却同樣對他也是老大的不高興。自汪偽政權出現以後，事實的演進，一方面英美對汪偽一致抨擊，「遠東慕尼黑」陰謀不遂，同時另一方面無論在吸引華僑與上海民族資本上乃至分化我抗戰陣營上的毫無成績，日寇陰謀的失敗，也只有向汪逆奴才預上去出氣。

日寇對汪偽政權的不滿，我們可引一段日人岩井英一的話來說明。

「南京政府成立二年來，雖有表面上的國府機構調整，中日基本條約的締結，及三萬萬元借款等，惟該政府之發展，縱未得言貧弱，但坦白言之，亦不無缺憾之處」。接着他以主人口吻揮霍偽政權之「缺乏和平信念」「徹底日信念不充份」「自私自利的機會主義觀念」等等，岩井英一把南京偽組織中人的以發財爲念，以珠寶玉器等醜態大加臭罵，並且露骨地教訓汪偽說，不要儘管理怨日本不支持，而是汪偽自己得不到人民愛戴，這是要自己反省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汪逆自登台後，一方面感於日寇主子的種種限制，制肘，對自己一派系勢力的擴張，蒙受巨大的阻礙以至鬱鬱無歡；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從主子方面獲得更大的賞賜，是還須要起勁的幹出些令主子歡心的成績來才說得上其它。所以偽政權在自怨自艾中，也會努力的引誘華僑與民族資本，也會努力於「清鄉」工作，也會努力於「復興」農村，這些努力，結果是接連的失敗，失敗之後，汪逆與日寇又加深了相互間的怨詞。總而言之，汪逆登台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這一階段，日寇對汪逆雖然基本上是支持着，並予汪逆以某些利益，可是這種賞賜，除掉政治上擴大了汪偽若干地盤之外，經濟上的「讓步」很少，而日寇在經濟方面對汪逆的引誘投資發展農業的要求甚大，至於軍事方面汪逆僅無由組成，「清鄉」工作的進行，主要仍靠日寇

軍隊，不僅不過時引致敵軍與叛亂諸區民衆而已。在這一時期內，敵在關係因在偽政權的無力，迄未見有何開展。

三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以及戰爭的長期化，日寇對中國的侵略，在政治上的更進一步瓦解我抗戰以迄其結束「中國事變」；在經濟上加緊榨取我淪陷區以迄其「以戰養戰」；在軍事上進一步「肅清」敵佔區我軍，鞏固其佔領區徵發中國人力，補充軍力不足，以遂其「以華制華」，所有這些要求俄然轉趨。東倭於慶祝星洲陷落會上，曾經表示「日本在大東亞戰爭的進行中，將以中國為兵站的地點」，這便是日寇在新的戰爭形勢下，對華新的要求。敵「大東亞省」的成立，其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在經濟上加緊對我淪陷區進行掠奪。

在這種新的形勢下，日寇對汪逆「一偽華工具，轉而又感到有加以「強化」的必要，日寇如何來「強化」這一偽政權呢？其具體說來有如下幾項事實。

第一，表面上積極提高汪逆的聲望，在日寇率領之下，汪逆偽組織獲得種種等項心願的承認，這便是提高汪逆的國際地位。

第二，擴大了汪逆政權，進一步支持了汪逆的「行政一元化」的要求，譬如偽滿院省政府改組，各地維新系偽縣長之大批撤換，偽中央對地方政府統制之加強，將豫魯等省的偽政權劃歸汪逆偽府統制，以及汪逆勢力伸張至華南華北等等。

第三，允許和支持了汪逆建立偽軍與偽警，並以改組，收買等辦法擴充偽軍。汪逆於去年十月間改組了偽軍事機構，成立了所謂軍事委員會，日寇更「撥遣」一部份軍火軍械之類，並積極支持偽軍事訓練機關之組織。維新系軍隊日益汪化。

第四，強調「東亞以解放」，首先宣佈「交還」廣州天津兩英租界，並於今年一月宣佈「廢除」對華特權。

第五，強化汪逆的金錢機構，提高偽幣價格，排斥我法幣在淪陷區流通，藉此加強汪偽政權財政基礎。周旋佛海赴日哀求的結果，日寇尤「借款」一萬萬。最近日寇更表示停止軍用票的流通。

第六，「交還」大部份在華中的「軍管工廠」，截至最近止，敵方宣佈「已交還」百餘廠，達所占工廠百分之九十以上。

除掉上述六項主要事實之外，從敵方對汪逆的一貫態度來說，上自東條起下至御用輿論止，一再強調「應尊重中國獨立地位」之類的浮辭，這種所謂「尊重」，更以平沼等三特使之訪華，以及東條親自來華，尤其渲染得厲害起來。

假使從奇貨的敵人方面說，這些對汪逆的扶植舉措，確實是很大的一次「放炮」，可是我們知道，這正是日寇最惡毒的陰謀所在，這些表面「讓步」，在日寇是正為的要達到它所謂關於進一步掠奪中國淪陷區的釣餌，是「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新鬼計。不是真對汪逆的一種「器重」。

日寇為什麼要對汪逆的政治地位加以抬高，做出許多「國際承認」，「取消不平等條約」，「擴大在偽中心勢力」，以及敵偽僕僕東京與南京道上呢？這無疑地要顯出汪偽政權的「政治獨立」的性格，以便利日汪逆更有力的對我抗戰陣營發動和平攻勢，和迷惑淪陷區我同胞，在「東亞民族解放戰爭」的欺騙之下「協力」日寇的侵略戰爭。

日寇為什麼在經濟上做出許多「交還」軍管工廠支持偽銀行，協助汪逆發展經濟力呢？也無非是要吸引中國人民的人力物力與資本，為日寇補充經濟上的不足，而開發與消化淪陷區。

至於軍事上的「建軍」的支持，也就是為了進行「以華制華」利用偽軍來代替一部份日寇陸軍的任務，使日寇得抽出一部份軍力，同時利用汪逆收買與瓦解我抗戰部隊。

日寇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的這種做法，是一種最惡毒的侵華方式。在日寇表面上做了極多的「讓步」，而實際上由一條條實質的陰謀——汪逆偽政權的「參戰」，全部收回，不但不收回，事實上敵偽今後既是盟國，在汪逆與日本共甘苦，共存亡」的效忠赤忱之下，日寇事實上是更高度的控制了中國淪陷區的一切。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汪逆對日寇的效忠，是格外的勤懇。

首先是發動了一個廣泛的「和平攻勢」。日寇侵略之師發動不久，汪逆於十二月十八日向「全國」廣播，謂「自和平運動發起以來，所遵守而申明的大亞洲主義，自大東亞戰爭發生後，已經由理論時代進入於實行時代」了。

接着便是在淪陷區普遍舉行所謂東亞民族解放宣傳週，向我後方濫發通電，企圖造成一種「全國的和平攻勢」。(被略一百二十餘字)

(下接第一五三頁)

論日本本年度的龐大預算

香 玎

日本昭和十八年度即一九四三——四四年度的龐大預算，已經所謂八十一屆議會通過了。預算總額為四百七十四萬萬一千零六十萬日元。就中，一般會計部分為九十九萬萬九千五百萬日元，第一次追加預算二十三萬萬四千六百萬日元，第二次追加預算九萬萬三千四百萬日元，合計一百三十二萬七千五百萬日元。此外，再追加臨時軍費特別會計二百七十萬萬日元，則為四百零二萬萬七千五百萬日元。除去由一般會計轉入臨時軍費特別會計的軍費數字四十二萬萬五千九百萬日元，實際是三百六十六萬萬零一千六百萬日元。但這並不是預算的總額，而只是一般會計和臨時軍費特別會計的合計。若再加以其他各種特別會計，則為四百七十四萬萬一千零六十萬日元。這總之預算的總額。關於這一點，二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向眾院預算委員會提供的參考資料即「昭和十八年度預算統計額的調查」，曾有如下的詳細解說。

即：

「昭和十八年度總出預算統計額概算，總四百七十四萬萬一千零六十萬日元。較上年增加一百二十三萬萬六千六百萬日元。即十八年度的一般會計預算，歲入，歲出總額為一百三十二萬萬七千五百十五萬日元。若加入臨時軍費和臨時財產資金兩個特別會計以外的其他四十七個特別會計歲出預算五百一十三萬萬四千四百五十八萬日元，則為六百四十六萬萬一千九百七十三萬日元。就中，除去重複部分，實際為五百一十四萬萬一千八百零四萬日元。再除去在臨時軍費和臨時財產資金兩個特別會計間重複的金額二百四十五萬萬五千八百零四萬日元，則統計額為二百六十八萬萬六千九百萬元。若更除去在國債整理資金特別會計內的借換債總額，則所餘僅為二百零三萬萬九千四百零四萬日元，最後，加入臨時軍費和臨時財產資金兩個特別會計預算的總額，則昭和十八年度

的預算統計額，在歲出上，為四百七十四萬萬一千零六十萬日元，而在歲入上，則為四百八十七萬萬六千六百萬日元，較上年增加歲出一百二十三萬萬六千六百萬元，歲入一百三十萬萬八千九百萬元。」
一年的歲出總額達四百七十四萬萬一千零六十萬日元之強！這在日本，真不能不認為是一個驚人的龐大預算！東京廣播說：

「四百七十萬萬日元的總預算，如以十元一張的鈔票平鋪起來，長幾千里，如舉堆起來，便要高過富士山！」

這並不是誇張的話。

這種龐大的預算，在日本歷史上，還是空前的。「九一八事變」的那一年，日本的預算即一九三二年度預算，歲出總額不過十四萬萬九千八百萬日元。一九三二年度增加到十七萬萬八千八百萬元，不過總額僅於本年度預算總額四百七十四萬萬一千零六十萬日元的約二十七分之一。即加以所謂「滿洲事變」也還不能和本年度的龐大預算相比。當時，日本人已驚嘆為「對時期的龐大預算了。一九三六年即「七七事變」爆發的前一年，其預算總額較一九三二年度，增加約三分之一，而為二十二萬萬八千二百萬日元。由於「七七事變」的爆發，一九三七年度預算總額一躍而為五十五萬萬二千一百萬日元，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指摘和反對。其後，逐年增加：一九三八年為七十七萬萬一千七百萬元；一九三九年為八十九萬萬六千四百萬元；一九四零年度竟突破一百萬萬元，而為一百零三萬萬四千六百萬元；一九四一年度更增加到一百三十八萬萬九千四百萬元，而在太平洋大戰爆發的前夕，又經臨時議會通過追加預算四十三萬萬一千六百萬元；去年度即一九四二年度，原為一般會計預算八十六萬萬九千八百萬元，特別軍費預算二百八十萬萬元，合計二百六十六萬萬九千八百萬元，加入各種特別會計，則為三百五十萬萬四千四百六十萬元，即每日平均約支出一萬萬日元，已不可不說是極龐大的預算，乃本年度更比去年增加一百二十三萬

萬六千六百萬日元，而為四百七十四萬萬一千零六十萬日元，其龐大的程度真可謂空前了！

自然，要判斷一個國家的預算是否算得龐大？不能僅片面地以預算的數字本身為根據，而必須同時注意到這個國家的經濟力量，特別是國民的總所得。如果這個國家的經濟力量大，國民的總所得多，則預算所列的數字縱使龐大，而實際上，並不能算是龐大。例如美國的預算便要比較日本龐大得多，但沒有任何人因為美國的預算龐大而表示驚異。假使日本的經濟力量像美國那樣大，國民總所得像美國那樣多，則四百七十四萬萬一千零六十萬日元的預算，便算不得是怎樣龐大了。無如日本國民總所得為數極微，不足以担負這個預算的重壓，所以這個預算就特別顯得龐大了。

日本的國民總所得，在一九二八年度，據摩利頓氏的統計，不過一百二十六萬萬二千二百萬日元。到一九三零年度，據日本內閣統計局的統計，更減少到一百零六萬萬三千六百萬日元。其後，自然隨着通貨的膨脹，物價的高漲，而國民總所得在數字的表現上，可能逐漸增加。據日本官方統計，一九三三年度，已增到二百萬萬日元；一九四一年度更增到三百萬萬日元；一九四二年度則一躍而為四百五十萬萬日元了！今年度呢？據估計，可達五百萬萬日元。這些統計原不可信，例如岩崎英恭就以一九三三年度，日本國民總所得，僅有一百四十八萬萬二千一百萬日元；而一九三九年度，也不過一百九十二萬萬八千萬元。東洋經濟新報已估計一九三七年度，日本國民總所得為一百五十四萬萬日元，而一九三九年則約為三百萬萬日元。那麼，今年度能否達到五百萬萬日元？實在大成問題。即使真能達到五百萬萬日元，但其中，四百七十四萬萬一千零六十萬日元，要被政府拿去支付龐大預算的歲出，所剩的只不過二十五萬八千九百四十萬日元罷了！據日本統治者的計算，在五百萬萬日元的國民總所得中，可分配為以下的用途：即國稅八十二萬萬日元，地方稅十萬萬日元，某項特稅十萬萬日元，本年度發行公債二百一十萬萬日元，生產擴充資金六十萬萬日元，共計三百七十二萬萬日元，其餘一百二十八萬萬日元為國民生活費！以全日本人口來分這一百二十八萬萬日元，每一個人所得幾何？怎樣能在米珠薪桂的日本現狀下，維持生活？要維持值免於凍餒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便不能像日本統治者所打的如意算盤那樣，負起起國家所需要的經費，而納賦稅，購公債。因此，日本本年度的預算，不僅是在數字上，而且是在實質上，成為名符其實的龐大預算。

一個國家的預算，如果是用以完成共和平建設，則縱使龐大，不足為慮。因為它不僅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且不是消耗國富，却是增加國富，這對於國家和人民，都是有利的。例如蘇聯在三個五年計畫的實施期間，其預算不可說是不龐大，但結果，是使國家愈來愈富強，人民也愈來愈舒適了。不過，像日本的龐大預算，則不可和蘇聯同日而語。因為它不是用以完成共和平建設，而是用以擴大侵略戰爭。這在預算的內容上，表現得非常清楚。如前所述，本年度日本的預算總額為四百七十四萬萬一千零六十萬日元，而臨時軍費便佔有二百七十萬萬日元，即相當於預算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已不可謂不多。而在一般會計預算內，還包含着大部分軍費。一般會計預算的內容，原為：經常費四十九萬萬三千二百萬日元，臨時費五十萬萬六千三百萬日元，合計九十九萬萬九千五百萬日元。依各省分配如下表：

各省別預算概數表（單位百萬日元）

省別	經常費	臨時費	合計
皇室費	四、五	〇	四、五
外務省	一三、〇	三三、〇	四四、〇
內務省	六三四、〇	三三九、〇	九九七、〇
大藏省	三、一四八、〇	二、九二五、〇	六、〇七四、〇
陸軍省	〇、六	〇	〇、六
海軍省	一、〇	〇	一、〇
司法省	五七、〇	一三、〇	七〇、〇
文部省	二六四、〇	一一一、〇	三七五、〇
農林省	七一、〇	五〇九、〇	五八〇、〇
商工省	九、〇	七二三、〇	七三二、〇
逓信省	五〇三、〇	一〇六、〇	六〇九、〇
厚生省	一八〇、〇	一五一、〇	三三二、〇
大東亞省	四二、〇	一五、〇	五七、〇
總計	四、九三二、〇	五、〇六三、〇	九、九九五、〇

（因小數略去結果，故與細數不合）

即在臨時軍事費外，在一般會計預算中，還列有陸海軍二省的經費一百六十萬日元，這自然是屬於軍事性質的經費。此外，其他各省的經費也大都和軍事有關。例如內務省的經費九萬七千四百六十四萬三千日元，較上年度增加了八百七十四萬三千元，但新規定的支出中，和防空局有關的僅為三千五百九十九萬一千日元，即不僅新增加的經費，而且連原來的一部分經費也用在和軍事有關的「防空」上去了。又如遞信省的經費用在航空人員養成費者便有三百零四萬日元，用在海員養成費者也有五百萬日元。還有在農林省的預算總額五萬萬八千零八萬三千日元中，用在所謂米穀生產獎勵設施的便達三萬萬餘日元。據日大藏省今年二月十二日，向衆院提供的參考資料說，本年度對於米穀麥等的補助金，獎勵金，合一般會計和各種特別會計預算，共為五萬萬三千一百餘萬日元，較上年度增加九千九百萬日元。在一般會計預算中，屬於農林省的為三萬萬八千六百六十九萬二千日元，屬於內務省的為三百六十七萬二千日元；在特別會計預算中，屬於朝鮮總督府的為九千五百六十一萬四千日元，屬於台灣總督府的為二千八百零四萬四千日元，屬於樺太廳的為九十三萬七千日元，屬於南洋廳的為四十一萬八千八百日元，此外，食糧管理為一千六百三十一萬一千日元，合計五萬萬三千一百六十九萬二千日元。只要我們了解糧食問題和軍事的關係，那我們便不能不承認這五萬萬日元以上的經費也是間接的軍事費了。至於作為侵略機構而新設的大東亞省的經費完全是一種變相的軍費，而外務，大藏，商工，厚生，甚至文部，司法等各省的經費，也有一部分是間接的軍費，尚無待詳述。

固然，在預算大預算中的一部分經費也可說是用在擴充和增加生產上。但其所生產的東西並非供戰爭消耗的軍需品，並不能真正增加國家的財富，也不能真正增加國民的收入。敵酋東條英機二月十七日，在衆院「戰時行政特令法案委員會」中，答覆該會委員長前田房之助的質問，說：

「根據前此陳述的計畫，將購置有條件的設施方案，以儘量增產軍需物資。因之，也有大規模企業整理的必要，故需要相當巨額的費用，亦屬當然之事。關於此項費用，已在預算中規定相當數額，並準備相當金額的預備金。如有不足，則予以緊急處置。決不致發生因費用不足，而使增加生產的工作有所停頓的事實。」

這說明在龐大預算中，的確有一部分經費用在整理企業，增加生產上。而且在費用不足的時候，還可隨時採取緊急處置，以增加經費，決不使增加

生產的工作，有所停頓。但其所謂「整理增產」的，却是「軍需物資」！像這樣，日本今年度的龐大預算，可以說，完全是直接，間接，用在擴大戰爭上。只有消耗，沒有生產，以有限的金錢，投於無用的虛費！縱使國庫充實，也有用罄的一天；縱使人民是胡麻，也有榨不出油的一天。這就是這個龐大預算所包含的嚴重危機。

二二

這樣空前的龐大的歲出預算，拿什麼來支付呢？「羊毛出在羊身上」，還不是憑着像榨胡麻取油一樣，殘酷地榨取人民的血汗！如前所述，日本統治者是要拿徵收賦稅，發行公債，來取他們所假定的國民總所得的百分之七十，以供其揮霍的。

依這個龐大預算所列的歲入，則在一般會計預算方面，經常部為六十四萬五千三百萬日元，臨時部為三十五萬萬四千二百萬日元，合計九十九萬九千五百萬日元。就中，租稅（包括印花稅收入一萬萬六千萬元在內）為六十九萬萬六千八百萬元，較上年度的五十九萬萬二千一百萬元（同樣，包括印花稅收入在內），增加十萬萬四千七百萬元。其他普通收入為十四萬萬二千二百萬元，較上年度的十三萬萬三千六百萬元，僅增加八千六百萬元。至於公債的發行則為十二萬萬七千四百萬元，較上年度的十五萬萬二千六百萬元，反減少二萬萬五千二百萬元。特別稅「赤字公債」而言，則已減少二萬萬五千萬元。此外，尚有上年度剩餘金三萬萬三千萬日元。這表示本年度的歲入預算是以租稅收入的增加額，作為大部分歲出增加額的支付，並用上年度剩餘金來減少「赤字公債」。因此，日本統治者自誇這是他們對於長期戰財政的基礎強化上的努力。其實，第一，在目前日本國民經濟的情況下，大量增稅，無異竭澤而漁，不見得比較激發公債為能使財政的基礎強化；第二，減少發行公債的真實原因，不是能發行而不願發行，乃是要發行而不能發行，因為公債市場的消化能力有限，已不能消化過多的公債了；第三，這裏，所說到的增稅，減債，只限於原預算案的一般會計預算的範圍，但在這個範圍以外，還有追加預算，特別預算，尤其是所謂臨時軍費特別預算便達二百七十萬萬日元之鉅！在這些範圍內，不僅要依靠增稅，而且也要依靠公債。日本的長期戰財政的基礎，實是不見得多麼強化。就增稅而言，由於「七七事變」以來，迭次增稅的結果，日本人民担負

已重，過分誅求，必致惹起社會的不安和騷動。爲了欺騙人民，寧以採取朝四暮三之術，增發紙幣和公債爲得計。因此，日本統治者雖以增稅，減債自謂，實際上，所增的稅不過十一萬萬日元左右。這對於鉅額的歲出，能有多大的裨益呢？

結果，還是不飽於公債。如前所述，在一般會計預算中，雖僅列公債發行額十二萬萬七千四百萬日元，但臨時預算費這樣的開支，向來是不能不依公債爲它的來源的。假使二百七十萬萬日元的臨時預算費，都發行公債，則本年度發行公債的總額當爲二百八十餘萬萬日元。據日政府於今年一月底公布，現有公債總額爲五百二十八萬萬七千八百萬日元，內計內國公債五百一十六萬萬五千七百萬日元，外債十二萬萬二千一百萬日元。因一部份上年度預定發行的公債尚未發行，故到今年三月底，年度終止，當達五百六十萬萬日元。如果本年度再發行二百八十餘萬萬日元，那其可謂債台高築了。今年二月十七日，日藏相賀屋興宣在所謂戰時特令委員會上，表示：

「在以英美爲對手而作戰的今日，佔領地區，在南方若地之廣闊，則發行公債三百萬萬或五百萬萬，也不足爲訝！如有必要，即增至一千萬萬日元，我以爲也未嘗不可。」

這說明，日本統治者對於公債的發行，實際上，是無法減少的。

但是不難地，增發的巨額的公債，究竟是不是能夠被完全消化呢？不能。日本公債市場的消化能力是極其有限的。一部分公債是堆積在日本銀行的庫裏，變成了膨脹的通貨；又一部分公債是由所謂儲蓄部拿人民的儲蓄去購買，這並不是真正銷售出去。例如在「九四零年度」的公債總額二百八十二萬萬五千三百餘萬日元中，日本銀行便擁有約四十萬萬至六十萬萬日元，而儲蓄部則購去六十七萬萬三千九百餘萬日元。因此，日本統治者不能不大聲疾呼地，鼓動人民購買公債。賀屋興宣說：

「現在的戰爭需要充分的裝備，其補給之力必須成爲無限。老實說，若戰敗，則所有公債，股票，債券一切都化爲烏有。要保存它，就只有打勝仗一途。日本現正向勝利之途邁進。自「中國事變」以來，「人的資源」，「設備」，「天然資源」，都已增加。因此，這次經過「蘇贊」的預算也可能實行，國債也可消化三百五十萬萬日元。而欲最後勝利，則國民必須都購有公債，換句話說，購買公債乃使敵人完全屈服的唯一途徑。」

看他一面威脅，一面勸誘，是怎樣地情急！另一方面，日大藏省曾於去年十一月間，擬定所謂「完成二百三十萬萬日元儲蓄的特別計畫」，自二十日起，全國展開所謂「必勝儲蓄運動」。這運動到去年十二月底爲止，作爲第一期，以獲得五十萬萬日元的儲蓄爲目標。第二期，第三期還將繼續進行。這正是推銷公債的手段之一。然而如前所述，日本人民大眾連最低限度的生活且難維持，那裏還有餘力儲蓄呢？

最後，稅既不可多增，債又不能暢銷，則唯一的辦法只有名運於印圖機，濫發紙幣，以救燃眉之急。而且上面已會述及，大發公債的結果，也就必然會引起通貨的膨脹，因爲日本銀行拿到大批公債後，勢必要把它轉化爲紙幣。據「日本銀行週報」的統計，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當時，日本銀行發行紙幣總額爲五十八萬萬五千九百萬日元，較前年十一月月底，膨脹九萬萬五千餘萬日元。到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更增加至六十九萬萬二千一百萬日元，突破前年十二月底的六十二萬萬三千一百萬元的高額，而創一驚人的新紀錄。加以朝鮮銀行和台灣銀行發行的紙幣，據說，共達八十六萬萬六千萬元。這數目當然不盡可靠，因爲日本統治者是不肯真正不折不扣地，老實公布它的紙幣發行額的。

通貨膨脹的結果，一方面，貨幣本身的價格愈益跌落，他方面，物價的高漲更不可遏止，而國家的預算也就不能不隨之而愈趨龐大一途了。假使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命運能維持到明年的話，我敢說，明年度的預算將要比本年度的預算，更龐大的多。

四

執行龐大的預算的結果，是過分加重人民的負擔。這是不是可能引起日本政府和財閥之間的激烈衝突，甚至由財閥起而領導反對政府的運動，進而顛覆政府呢？這是不可能的。衝突是有，但決不至破裂。日本的軍閥法西斯政權雖然是軍閥站在主要的地位，但並沒有抹殺財閥的權利，甚至也還多少受着財閥的影響乃至支配。這道理，在這裏，不能詳細闡述。只要看日本軍閥侵略鋒刃所及的地方，財閥的腳跡也隨之而至，且在軍閥的保護之下，擴張他們的經濟利益，以及束縛其後進次雖然從八十一屆議會裏，獲得了干涉有關重要軍需物資的一切事項的特權，但立刻便延緩財閥巨頭爲內閣顧問，使在實際上，主持一切事項，便可以明白日本軍閥和財閥是如何合作

，至少，力謀合作了。因此，龐大預算的執行，決不會給予財閥以不得了的嚴重打擊。剝削的對象不是財閥，而是人民大眾以及一部分中小資產階層。公債的發行既不是由財閥大量購買，通貨的膨脹又主要是影響到人民大眾的生活，而本年度增稅的中心，也不是以財閥為對象的直接稅，而是加重一般人民負擔的間接稅。這還不是很明顯的例證嗎？不，這還樣，即便表面上，財閥也由龐大預算的執行，而加重了一些負擔。但他們一方面，可把這些負擔轉嫁到人民大眾的肩頭，他方面，可拿從侵略中所獲得的利益去補償。儘管他們有時也發一些反對政府的怨言，但他們將會起而顛覆政府，實在是不可想像的事。願日本軍閥法西斯政權的，將是革命的、人民大眾，而不是財閥。

無疑地，由於龐大預算的執行，加重了日本人民大眾的負擔，加緊了日本人民大眾的痛苦，而使日本人民大眾更走向反法西斯，反侵略的革命的道路上。但目前，革命運動還沒有成熟，革命力量還不夠壯大。而且日本統治者還可拿侵略和榨取民族，以緩和其內部的革命於一時。賀屋說：

「佔領地區，在南方若若之廣闊，則發行公債三百萬萬或五百萬萬，也不足驚訝！」

這就表示，他們是要依靠榨取南洋來進行龐大預算的。豈只榨取南洋？我們中國也同樣是他們的榨取對象。只要中國和南洋被他們順利地榨取着，則他們便可能一時緩和其內部的革命。因此，為了促使日本人民大眾革命運動的實現和成功，我們自己的抗日鬥爭，是不可稍懈的。坐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自己崩潰，那是懶漢或傻瓜的做法。

本刊啓事

本期合刊，篇幅增加，零售每本貳元。

羣衆週刊社啓

（上接第一四九頁「敵汪關係的演變」）

其次，強調「中日協力」。汪逆為了實現其子將中國佔領區成爲他的兵站基地這一使命，在生產上就是發展農業以解決日本農產原料的不足，恢復鐵礦工業及其它小工業，以補日寇擴充戰時軍需生產進行下層工業日用品之不足。這是「協力」的中心工作，針對這一要求，汪逆更積極提出增加生產的口號，他一方面誘導中國資本與華僑資本（在上海租界被日寇佔領，南洋鐵礦惡化情形下，汪逆認爲這時是引誘中國資本與華僑資本最有利的時期），特別是引誘華僑資本參加日寇開發南洋這一計劃，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汪逆以此款騙活動是更加積極了。在農業方面，汪逆曾提出安糧食物資三者，規定爲僑會討論的中心問題，通過了食糧增產，農業改革，墾荒水利等計劃。以上是經濟方面的計劃，在人力方面的供應方面，敵汪已訂了密約，由汪逆徵集三百萬壯丁，供敵利用。（被略九十餘字）

所以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寇對汪逆表示極大的轉變，與汪逆在日寇指使下的種種賣國活動，應該看做是日寇對汪逆的深謀遠慮。我們一點也輕視不得敵汪這種活動，在我們和敵汪的鬥爭中，人民和對我們黨的政治攻勢（被略四十字）嚴重作用。

日寇自發動南進，到西甸戰役結束，告了一個段落，在這第一階段，日寇想以經濟上的困難，與敵軍的勝利，來誘捕我們，自設種種謀略以收效，接着便以不斷的軍事進攻，來打擊我們的實力，破壞我經濟，同時對其經濟的困難並配合汪逆的「和平長治」與分化政策，對我們進行進攻。自今年年初以來，日寇對華用兵，始終未曾停止，敵汪更一再表示「以一切可能想像辦法征服中國」，這種陰謀，非常可以注意的。

從敵汪關係的演變，與日寇現階段對汪逆的新作圖看來，我們在政治上來揭發敵汪關係的真面目，來揭發敵汪的新陰謀，這是非常迫切的工作。特別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更加強援助敵後的戰爭，支持敵後的抗戰力量，這是打擊敵偽消化淪陷區強徵我淪陷區人力物力的最有力武器。除此而外，刷新政治，發揚朝氣，鞏固前線，皆是擊破敵汪陰謀必要之圖。

日寇已經給汪逆帶上「民族主義」的假面具，固然，淪陷區的人民在日寇傀儡屠殺榨取之下，他們不會被這種鬼計所迷惑，我抗戰軍民也決不會被敵偽這種花言巧語所動搖，這是可以自信的。但是若不露我們自己的空發有爲，團結進步，是不能真正拆穿他的假面具，暴露他醜惡的真形乃至最後粉碎這些鬼計的，這是我們當前的使命。

論中國佃農問題

華崗

中國佃農的分佈及其增加趨勢

在土地私有制度之下，土地關係的主要特點，就是土地的所有與使用漸漸分離。地主們通常都是把他們所占有的土地劃成小塊拿去租給農民，因為如果僱用工人來自己經營的話，那怕是最低賤地去剝削廉價的勞動力，其所得收入都不及出租土地的地租這樣多。而苦於缺乏土地或土地不夠耕種的農民，則不能不接受最苛刻的條件去向地主租得土地。佃農租得土地之後，必須把自己所生產出來所生產出來的勞動生產品，當作地租，交給地主。這種地租，不管是採取定租、活租或夥種的形式，也不管交的是租金，或各種工役地租，或實物地租，總之交給地主的地租，往往非常之重，致使佃農難免地勞動，曾風霜，受暑雨，費了繁重不堪的勞力，却祇能過着半飢半飽的生活，不但不該進行農業上的擴大再生產，而且連着單純的再生產也少有可說。我國歷史上的農民問題，大半以佃農問題為中心，緣故就在這裏。

關於我國佃農的分佈狀況，向無精確統計。據民國十九年六月立法院統計，關於我國佃農的分佈狀況，向無精確統計。據民國十九年六月立法院統計，關於我國佃農的分佈狀況，向無精確統計。據民國十九年六月立法院統計，關於我國佃農的分佈狀況，向無精確統計。

各類農戶佔農戶總數之百分率

區域	佃農%	自耕農%
東北	三〇.〇	五九.〇
黃河流域	一三.〇	八八.〇
華中東南	四〇.〇	三二.〇
全國平均	二六.二	五二.一

另據中央農業實驗所民國二十四年二十二省的調查，可以計算出旱耕區與水耕區域各類農民之比例如下：

耕種區域	佃農%	自耕農%
旱耕區域	二一.三	五九.〇
水耕區域	四一.六	二九.八

由上表，可見北方旱耕區域，佃農與半佃農合計佔全體農民百分之四十，南方水耕區域則竟達百分之七十。何以兩個區域的佃農百分比有這樣大的差別？其主要原因在於：水耕區域的溫度與雨量，均適宜農業，加以土壤肥沃，收穫次數較多，歉收風險較小，有錢者多樂於投資土地以獲鉅利；佃農租種土地，亦較易得到利益，故購地租地者多，佃農發達。同時及因南方土地肥沃，人口密度較高，人多地少，奪取土地較烈，許多農民陷於無地之境，而爭租小塊土地，故租佃盛行。

關於全國佃農歷年消長情形，據中國農業經濟研究所二十六年十二月調查報告五卷十二期，及二十九年七月農報第十九一—二十一一期農情報告，會有兩個調查估計，茲將全國平均百分率摘列如下表：

年份	佃農%	半佃農%	自耕農%
民國元年	二八	一一三	四九
二十一年	三一	一一三	四六
二十二年	三一	一一三	四六
二十三年	二九	一一三	四六
二十四年	二九	一一三	四六
二十五年	三〇	一一三	四六
二十六年	三〇	一一三	四六
二十七年	三〇	一一三	四六
二十八年	三〇	一一三	四六

(註)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係後方十五省之平均數

綜觀上表，可知中國佃農與半佃農的百分率是漸趨增加，而自耕農的百分率，則漸趨減少。不過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前，增長比例還不顯著，自民國二十六年之後，則佃農與半佃農的增加趨勢，就更明顯了。

以上所述是全國的情形，現在再來看後方重鎮的四川怎樣。關於佃農消長趨勢，前四川稻麥改進所經濟組曾經作過調查估計，發在建設週訊三卷十二期上，特轉錄如下：

年 份	佃農%	半佃農%	自耕農%
民國二十年	四九	二一	三〇
民國二十一年	四九	二一	三〇
民國二十二年	四九	二一	三〇
民國二十三年	四九	二一	三〇
民國二十四年	五〇	二二	二九
民國二十五年	五二	二〇	二八

由上表，可看出民國二十三年以後，四川佃農亦呈現增加之趨勢。

佃農百分率的增加，表示地權集中與農民喪失土地的加劇。中國所有可以耕種的土地，極大部分，尤其是肥沃的土地，都是集中在地主階級的手裏；農民自己所有可以耕種的土地，原來就非常之少，他們是歷史上地主兼併土地的結果。土地的兼併過程，就是使土地集中在非生產者手裏的過程，也是農民失去最重要的生產手段和維持生活來源的過程，而且除了地主階級兼併土地的過程之外，土地被集中在金融資本家手裏的過程，也日漸明顯。這樣，就使農民所有的土地，一天一天更加減少。例如抗戰以前根據河北保定十一村一千五百六十五農家的調查，佔農家總數百分之十一點七的地主，竟有耕地百分之四十一點三；可是佔百分之六十五點二的貧農中農，反而只有耕地百分之三十五點九。浙江平湖地主以百分之三的人口，而佔有百分之八十的耕地。江蘇無錫二十農村一千另三十五農家中，地主富農以百分之十點三的人口，佔有耕地百分之六十五；而佔人口百分之六十八點九的貧農中農佔有的土地，僅有百分之十四點二。廣東百分之七十四以上的貧苦農民，所有耕地僅佔百分之十九，而占人口百分之六的地主，却佔有耕地百分之六十六。

如果說個別調查還不足以完全表示全國地權集中的趨勢，那我們可以再根據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民國二十二年對陝西、河南、江蘇、廣東、廣西、浙江六省的調查結果來看一看：六省的地主富農以百分之九點九的人家，佔有百分之六十三點八的耕地；而百分之七十點五的貧農和中農，却僅佔有土地百分之十八點四。又據陶直夫氏民國二十三年的估計，佔農村戶數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共有耕地百分之六十八，而佔有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農，只有耕地百分之十七。

上述情形足可證明中國農村並不以大土地私有制為出發點而發展現代農業經營，而是以大土地私有制為基礎來維持古色古香的小農經濟。土地所有的集中和使用的分散，就是中國土地問題的根柢矛盾。在土地使用關係上，中國耕地是分割得極小，貧農手上的小片的瘦瘠的土地，不勝維持自己的生計，而地主有了大片的肥沃的土地，却又不願意自己來耕種。破產失地的農民，如果仍要經營農業生產，只有忍受苛重地租及其他種種負擔，把自己變成佃農或半佃農，去租種地主的土地。有地的自己不願意去耕種，想耕種的自己又缺乏土地，這就是產生大量佃農的基本原因。

各國經濟發展的情形並不一，佃農的地位也就頗有不同。地位最高的佃農是租佃企業家，可以英國的一般佃農為代表；其次是有機會升登較高地位的佃農，可以美國的一般佃農為代表。

二 中國佃農的社會地位

中國佃農佔全國農民一半以上，且有增加的趨勢，而其經濟的社會的地位却是最低的。中國的佃農，絕少像英國那樣的租佃企業家，最大部分是貧苦的農民，租進小塊土地，親自耕種，以求維持最低限度之生活。中國佃農的地位，與美國的佃農也不相同。因為美國的佃農，有些是暫時存在租佃的階級，尚有可能靠自力積蓄資本，攀登較高的農業階級。中國佃農的地位，却是很有固定性的，很難有上升的機會，因為工資太低，地租過重，借貸利息高昂，苛捐雜稅繁重，商人層層剝削，天災頻仍等原因，致使終年勞苦所得，僅堪糊口度日，絕難積蓄資本，購置田產，每每幾代都是佃農。

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根據鄂豫皖贛四省農村經濟調查結果，曾指出佃農上升較高階級的百分率及其年齡，有如下表（見該校所出鄂豫皖贛四省之佃農制度，一〇——一一頁）：

省 別	保農升為佃農		升為半自耕農		升為自耕農	
	%	年 齡	%	年 齡	%	年 齡
河南	六·五	三二·八	二·〇	四〇·九	〇·九	四六·七
湖北	六·一	三三·二	一·三	四二·四	〇·三	四八·四
安徽	九·三	二九·八	一·九	四〇·四	〇·八	五〇·〇

江西 四·七二八·八一〇 三九·五〇·七 四六·〇
 總平均 七·〇三〇·九 一·六四〇·九 〇·六四八·一

由表可見，農民升為佃農還有百分之七的可能性，升為半自耕農的，便只有百分之六了，再升為自耕農，更只有百分之〇·六的可能性了，由此也就可知佃農登較高階層的困難。

中國佃農是在極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生產，這是因為中國農村中資本主義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和落後的半封建式的剝削農民的方式，互相勾結着。一方面，固然也有一部分資本主義式的富農經濟的出現，別方面，農民替地主做勞役的制度還是存在，很多農民受地主的束縛，甚至喪失身體的自由。例如中農月刊第三卷第七期所載「康藏經濟調查」一文，就有如下的記載：「地主壓迫剝削農民的程度，可由下面事情看出來：農民得不到地主的允許，便不許離開土地。農民要出外，必須申具理由書，向地主請假，並須付出一大筆代價，假如農民要離開家，僅只幾個月的光陰，也是要向地主請假，並須寫告地主，承認決不拖欠地租。倘若逃亡了的農民被捉着，他必須繳清地租，並且還要受一種懲戒。這種經濟的封建剝削，在康藏是普遍的現象」。其實地主用這種經濟的方法去剝削佃農，在全中國也是普遍的現象。有許多地方，地主可以任意壓迫和驅逐佃戶，可以自由剝削佃農甚至屠殺佃農，大部份佃農，實際上是被地主強迫束縛於土地之上，長期受着地主之無情的剝削。

佃農租入土地是要出代價的，土地的代價就是地租。在地租的交付和收納之中，可以表示出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生產者的關係怎樣，即地租是近代式的還是封建式的？人與人的關係，是地主與企業家的對立，還是地主與農民的對立？在包租萬象的中國，自然也沒有清一色的地租。地租有舊地租、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三種。舊地租，在中國，現在都還存在着，而且互相勾結混合着。中國各地，尤其是川康雲貴等邊疆地區，至今還殘留着舊地租，這是封建地租的最原始的形式。在大城市附近或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地方，相當流行着貨幣地租。但是這兩種地租，都不是支配的形式，全國各地最普遍最一般的形式是實物地租。至於納租方法，亦有各種不同的種類：

(1) 定額租 地主只出土地，其他一切生產成本，全由佃農負擔。地租由主佃雙方議定，按照土地面積計算。這種定額租裏面，又可分為兩種：

一種遇到水旱災荒，佃農在收成之前，尚可請地主查看災情的減地租。另一種則規定租額之後，不論遇到何種災荒，均須照規定租額納租，所以又稱死租，或鐵板租。

(2) 分益租 又稱活租制，即地主與佃農按一定比例共同分配農產品，分配方法或是二八分，或是三七分，或是四六分，或是對半分，這要看各地情況與押金多寡而定，例如四川江北一帶，名義上雖是對半分，但押金特別重，合計起來也和二八分差不多。

(3) 膠租 出租人除出土地之外，並供給承租人以種籽及生產工具之一部或全部，有些並借給承租人以糧食草房等，到收穫時雙方按成分配，這是分益租的另一種方式。但這種制度，地主對於佃農的束縛更厲害，實際上乃是農奴制的殘餘形式。

中國各地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無論是產物納租或貨幣納租，一般都在收穫量百分之六十以上，租額以外，還有許多附加的剝削。有些地方，雖然已經採取貨幣納租形式，但其剝削方法與殘酷程度，並沒有絲毫變更和減輕。交租去了半數以上的收穫，留在佃農手上的部分，如果再加上生產成本，剩下的連勞動力的支出也抵補不了。所以地租實在包括，除了全部剩餘勞動（等於利潤）以外，還有一部分必要勞動（等於工資）在內。陶直夫氏曾估計江蘇無錫農家收入是二十一兩三錢，而支出是二十五兩〇四錢，收支相差是三兩七二錢，這筆差數，就是被剝削的工資部分。這種過度的剝削，自然要逼使中國廣大農民羣衆更加迅速的貧困化，使他們更不能恢復自己的勞動力，因之也就沒有餘力來改進生產技術，甚至不但沒有能力來改進生產技術，就是連教育技術水平，也都不維持下去。

中國農業經濟受到多重的壓迫，佃農甚至連一部份必要勞動也沒有代價，這種情況使佃農日趨窮困，因而也就造成了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發展的條件。

中國農村高利貸制度，有各種不同的形態。最普遍的貸借形態，是貸者付借者一定額貨幣，約定到一個相當的期限由借者將原本償還，並交付約定的利息，通常都在三四分以上。如果是短期無力償債，要求延長債期，則須利上加利，名爲滾滾債。但這種種借貸，通常都須以不動產的抵押爲條件，如果是一個純粹的佃農，本不出不動產的契據作抵押，就不得不採用別種方法借債。在租谷是主要生產物的地方，租谷就會成爲借貸的對象。土地所有者們

在七八月間從佃農手裏收進糧谷來了，但不把自己必需量以上的剩餘售賣於人，却到明年四五月份青黃不接時，把它借給農民。佃農向糧谷，借還給佃農自己了。糧谷由佃農手裏到土地所有者手裏時，它是當作地租的實物形態，但同一糧谷由土地所有者手裏到佃農手裏時，它却是當作原本的實物形態。這種原本帶着利息，到新谷登場時，就必須償還。以一石五斗償還一石，已成通例了。在產糧極豐富的地方，還常常成爲貸借的担保和手段。例如四川內江一帶，預賣青山的現象，就很普遍，結果也是債主取得高利息的利息。據費孝通先生調查，江蘇太湖邊上有一個農村，村中農民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佃農，大部份都落入高利貸的羅網，永遠不得翻身。下面是調查所得的可怕的事實：

「一個不能交付地稅的人，假如他不願在監獄中過冬，就非借錢不可，高利貸者的門戶，對他是開着的。從高利貸者那兒借來的錢，是以桑葉的數量計算。在借貸的時候，根本便沒有桑葉，也沒有桑葉的市價，高利貸者以已發斷桑葉的價爲七毛錢一担，譬如借七塊錢，就說借了七担桑葉。借款在清明就要還清，至遲不能在穀雨之後。借錢者要付還的錢，其數目的多少，決於當時桑葉的市價。譬如市價是三塊錢一担，那末在十月借了七塊錢或十担桑葉的人，到了第二年四月，便要還三十塊錢。在這五個月之內，這位債戶所付的利息，是每月六分五。到了絲季才開始，村裏的人，是拿不出錢來的。在冬季要還債度日的人，到了這個時候，大約也沒有力量還債，因爲在冬季的幾個月內，村民並無有生產的工作，除却做點小本生意之外。在這種情形之下，債戶可說高利貸者，延長借款的期限，所借的錢又以稻米的數量來折合。不替市價如何，稻米以五塊錢三浦式耳計算，還債的期限，於是延長到十月。到了十月，米價便以七塊錢三浦式耳計算。總計起來，在十月借七塊錢的人，第二年十月，要還四十八塊錢。平均起來，借貸的利息爲每月五分之三，假使債戶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能把債還清，期限可就不能延長了，他只能把田契移交給高利貸者。田地的價格，是三十塊錢一畝，從此，他不是債戶而變爲永久的佃農了」（用吳景超先生譯文，見新經濟一卷十一期）。

當然，這了佃農，還是要做債戶，而且變成更悲慘的債戶。沒有了田契做抵押，就不得不把自己僅有的衣服和棉被，送進當舖去。我們知道典當並

不是一兩錢的債，地租在當時已把農民看死，預先除去利息上兩項上使用的損失，因此給予當價，計算起來，只等於物價的幾分之幾，而當者拿了這幾分之幾的當價，要付二分、三分以至十幾分的利息。

中國地主階級和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代表，差不多是有血肉關係的。一個入做地主的商業資本家及高利貸資本家，一個地主，他一方面壓榨佃農的地租；別方面，便是債主，拚命的用高利貸盤剝農民，結果地主簡直將自己的佃戶和債戶，變成了債務上的奴隸和像牛馬似的對待他們。喪失了自己土地的地租，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和租地，往往所租得的就是自己原有的土地。

三 抗戰以來的中國佃農

抗戰六年以來，在中國農村造成了許多新現象。首先在淪陷區域，由於敵寇的殘酷掠奪和蹂躪，地租和捐稅的加重，災荒的人工製造，生產工具與生產力的破壞，人力的掠奪和摧殘，「以勞役地租之強制徵用爲中心的開發方法」的實行，以及包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在內的所謂「農村建設方案」，使廣大羣衆和地主，都受到了空前的災難，陷入飢餓死亡的深淵。但是，災難往往使人們的覺醒，高壓推動人們不得不進入鬥爭。現在淪陷區與游擊區的農民，已經有不少組織成抗日游擊隊，或直接或參加抗日軍隊，不顧一切犧牲，與敵寇作堅決的鬥爭。因此，正像一位批評家所說：（以下被略一百五十餘字）

在大後方，抗戰以來對於農村的最大影響，是糧價飛漲，地價飛漲，地權集中與地租加重。而這些變動，對於佃農都有密切的影響。糧價高漲與地價高漲，對於地主當然是有利，當然有莫大利益，使他們大獲其國難財，但佃農則大多數是貧苦的小農，很少有餘糧可賣，有些甚至還要買糧進食，反而不利。而且糧價高漲的結果，刺激了其他日常用品日益昂貴，與生產成本的提高，都使佃農地位益趨困難。

至於地權集中與地租加重，那自然更直接打壞到佃農的生活。抗戰以來，由於東南工業區的淪陷，而西南工業基礎還很薄弱，於是商業資本便向兩方面傾注：一方面向囤積商品，抬高物價；另一方面即競相購買土地，以土地爲投機對象，使地價扶搖直上，比抗戰前漲起一百倍以上，於是商業資本與地主經濟更互相勾結，妨礙工業的發展，造成地權更趨集中。同時由於敵寇肆虐與人事不修所造成的災禍，如去年以來，河南山東浙江等地的災荒，

使廣大農民陷於水深火熱，農村生產停滯。「在災情最嚴重區域，土地價格一落千丈，有不及原價十分之一者，獲利極得者因之大量購進，土地兼併的現象正嚴重地滋長着」（見今年一月九日大公報通訊：「饑饉的中原」）。

地權的集中，意味農民喪失土地，因而也就擴充佃農的隊伍。大部分土地既然集中在少數的地主手裏，而地主將他們的土地分租給農民耕種的目的，又無非為要收得高租地租，需要土地耕種的農民既然有相當龐大的人數，當然就形成了土地之供給少而需求多而不平衡現象，在這種狀態之下，自然是便利了地主對於租額的提高。據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與西南經濟調查合作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都可以充分看出，近年以來，大後方各省地主對於佃戶的地租，不但沒有實行政府「二五減租」的法令，相反地，他們還用種種方法實行「二五加租」，甚至如參政員楊輔成先生的觀察報告：「川東萬縣一帶的租額，常常採取主八佃二的比例」。中國農民銀行民國三十年五月所編的調查報告也說：「萬縣一帶的谷租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縣多為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較為普遍」。又據「三十兩字」同時，由於糧價高漲，原來繳錢租的現在都要繳實物租了。田賦主收實物以後，有些地主又給佃農加上不少負擔和轉嫁，如使佃農代地主運送挑了糧食去繳納等等。再者，由於地權變動之頻繁劇烈，也使佃農受到許多損失。譬如地租變動一次，土地持有者改換一次，常常發生退佃或加租情事，佃農即須担負許多過錢、抵擋、批頭錢、頂錢及重寫契約等的損失。抗戰以來農村關係這種新的變動，大大引起了佃農羣眾的不安，例如大公報記者曾書欄中寫佃農呼籲的投資益不不少。現在姑引大公報去年七月二日所載與民短函一則如下：「抗戰軍興，戰區擴大，後方人口增多，市民流散下鄉，於是形成土地少而佃農多的現象。農民爭奪土地耕種，地主乘勢大加押租與租谷。地主在鄉中皆為有勢力者，佃農俯首聽命，任其增加，例如每年能生產十四石稻谷的田地，地主所收租谷為十石左右，押佃銀在五千元上下，計算起來，收益已超過百分之七十，再加上押佃銀的利息，地主收益超過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地主囤積租谷，待價而沽；而此項游資非撥作農作，即高利貸放。且地主還附收所謂「工作租」「高粱租」「荳租」等等，名目甚多，他們真越來越富了。土地集中之風愈演愈烈，民生前途，實堪憂慮。佃農除負擔過重之租額外，保甲臨時派款，鄉鎮民工征調，多屬佃農負擔，壯丁抽調，也總是佃農先去，富紳之子殊少當兵者。佃農勤勞已極，而其生活亦不過年年食雜糧耳。希望政府主上政策未澈底進行前，概規定保障佃農有效辦法，明白規定地主應收租谷部份，以改善佃農生活」。

又如新蜀報去年八月十日成都通訊中有云：「省垣附近各縣鄉村，近來發生租佃糾紛案件頗多。糾紛原因為地主增收押金，往年每畝十元者，現竟加至五百元至六百元。如此，租種二三十畝的佃戶，竟須付出一萬以至二萬元的押金，普通佃戶如何有此負擔能力，事實上即使有付出現金，高租現金的押金，亦將使佃農減少了生產資本，甚至完全要投到高利貸的剝削下去。地主堅持增收押金的理由是幣值跌落，可是當佃農根據同樣理由，將戰前所付押金每畝十元，升算為目前的法幣數五百元或六百元，或者要求退還現大洋，地主却堅不承認，這無異要佃農單獨負擔幣值跌落的損失，而地主却可獨得好處。抗戰以來，由於糧食的需要增加，價格暴漲，土地持有者，確已獲得豐厚利益，而佃農却因此增加了許多負擔。最近成都發生的增加押金和退還大洋的事，不過是租佃糾紛的一面，而且凡是進行押金的區域，都會發生同樣的問題」。

平心而論，抗戰六年以來，佃農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不可謂不大。如果說，抗戰兵士中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來自田間的農民，那末這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民中，就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佃農。同時，抗戰以來，於烈日炎炎或冰天雪地之中，在各地從事修築公路及飛機場的民工，亦至少有十分之七是佃農。其他輸財輸力，佃農亦決不落後於地主。佃地主却利用戰時的有利條件，對佃農加緊榨取。例如田賦征實征購，本應由地主負擔，但地主却往往利用現有租佃關係，將田賦多方設法轉嫁給佃農去負擔。由於地權集中，現在農村中已經發生一種嚴重現象，即大批自耕農變為佃農，而佃農則漸漸變為雇農，這對於中國農村經濟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一種很有害的因素。

四 應如何改善佃農地位？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三講中曾說：「照道理來講，農民應該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產品，應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來耕田，所生產的農產品，大半都是被地主奪去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又在「耕者有其田」講稿中說：「我們要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讓農民得到勞動的結果，要使這國

勞苦的結果，不被別人奪去了」。又說：「現在的多種生產，都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回四成或更少。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獲的糧食，結果還是要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種田，許多田地，便漸漸荒蕪，不能生產了」。

這種現象，現在只有更趨嚴重。我可以舉出今年三月十一日中央日報縣政建設欄所載的一個事實為例證：當民國二十九年山北天旱，一般自耕農，便日以繼夜的澆水去灌自己的田畝，人力不敷，便出高價去請人來幫忙。但是一些佃農呢？却坐在田邊上吸旱烟，默默地看待收的禾苗，或者更甚而「舍己為人」的去幫別人灌田去了。問他們為什麼如此？他們說：「照今年的情形來看，就是我們費力在澆來澆去的結果，恐怕也不够上租，何苦毫無代價的幫人家忙呢？」這個事實，充分證明了現行租佃制度如何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少數地主，佔有了大部分土地，可是土地所有者，對他自己所佔有的土地，却不當作農業的生產手段去使用，他們坐收高租地租，不是拿去囤積商品，或繼續購買土地，就是拿去過糜爛淫逸生活之用。至於說到墾墾開墾，排水築堤，及病虫害之防治，和耕農其肥料，與生產方法之改良，則十都不聞不問。另一方面，佃農關心農業生產，但因租額過高，負擔太重，缺乏生產成本，因此又變得無力去改進技術，也無力去克服旱災災荒。所以國父孫先生強調指出：中國要發展農業生產，必須改變現行租佃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

但現行租佃制度，實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沒有廣大羣衆力量的發動，與其他條件的配合，難以立刻廢除，而農民沒有相當組織和力量，也不容易立刻就能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要求。至於中國國民黨九中全會通過的「土地政策綱領實施綱要」第八項所規定：「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爲原則，嗣後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爲耕作之人民爲限。不依照前項規定移轉之農地，或非自耕農所有之農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償還地價」。按其實質來看，這當然不失爲計劃實現國父遺教「耕者有其田」的一種漸進辦法，然而如果沒有更實際更初步的保護佃農政策的實施，就是這樣一個溫和的漸進辦法，在目前也很難求其實現。

目前抗戰時期，抗戰利益高於一切，而抗日戰爭的勝利，還正待我們羣衆努力去奮鬥爭取。農民是抗日與生產的基力，根據這個前提，我們必須快刀斬亂麻，即廢地主的剝削，實行減租減息，保障農民的人權地權地產

和財權，藉以減輕農民的痛苦，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佃農佔農民中最大的比重，所以保障佃農，也就應該包括在這個扶助農民的政策裏面。但中國目前的地主階級中，有些也還有抗日要求，尤其是淪陷區與接近淪陷區的地主，因爲身受或日擊日寇三光政策的摧殘蹂躪，容易激起民族義憤，有些較開明的地主士紳，甚至願意對農民讓步，以便能夠合力打擊日寇。在大後方的地主，除少數激進例外，一般的也還沒有這種覺悟，有些地主還利用戰時條件，加緊剝削佃農。可是既然他對還沒有喪失民族立場，還願意把日寇打出去，我們還是需要努力爭取他的。告訴他：如果大敵不能合力把日寇打退，佃農固然受殃，地主也受其害，不能保持，而要合力打退日寇，就必須互忍互讓。所以我們主張於實行減租減息之後，又須實行交租交息；於保障農民的人權地權財權和財產之後，又須保障地主的人權地權財產和財產，藉以聯合進步地主一致抗日，這是對於少數情勢不穩固或作父的漢奸份子，才能採取收其土地，立刻消滅其剝削的政策。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知我們目前要達到增加抗戰力量與提高農村生產的目的，必須切實扶助佃農，提高佃農的地位，同時又不能不採取手段來抗日。因此目前土地政策的實際內容，應該是減租減息，提高佃農地位，改善佃農生活，以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減租的標準是要做到一切佃農實行減租的地區，其租額應照抗戰前租額減低百分之二十五，即以減租低三原租額百分之二十五（二五減租）爲原則，而且不論公地私地，不論佃租地或夥種地，也不論錢租物租活租固定租制，均適用之。如果認爲二五減租，尚有保留人爲的差等的缺點，那就不妨實行土地法第一七七條所定租額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七五的辦法。其實，如果以抗戰前租額減低百分之二十五來計算，兩種辦法的內容，可說大體相同，不過土地法的規定比較剛性，二五減租的辦法，則比較富有彈性，實行起來比較方便。而問題的實質，則是目前租佃制度必須加以改變，租額必須減低，否則佃農負擔不能減輕，農村經濟即難以發展。同時，地租應一律於產物收穫後交納，出租人不得向承租預收地租，並不得索取額外報酬。租地時地主向佃農收取押金，殊不合理，佃農負擔太重，而且糾紛最多，應立刻加以廢除。

（下接第一八二頁）

蒙古帝國統治下的中國社會

高元萊

蒙古帝國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西曆紀元後一二九七年）征服南宋起，到元順帝妥懽帖睦爾至正二十七年（西曆紀元後一三六七年），即明太祖朱元璋建元洪武之前一年止，統治中國，共計八十九年。在這八十九年中，漢民族失去了秦漢時代以及隋唐時代的光榮，在蒙古侵略者的馬蹄之下，忍受最痛苦最黑暗的生活。所以當我們研究中國歷史時，必須把蒙古帝國歷史和中國歷史分別加以研究，而不能把蒙古帝國和中國完全混同起來。

蒙古帝國的建立是一個歷史上的豐功偉績。然而這是蒙古侵略民族的豐功偉績，不是漢民族的豐功偉績。而且蒙古帝國的存在，就空閒而言，乃是跨歐亞兩洲的大帝國。這就是說蒙古汗除了佔領中國，建立大元帝國而外，還佔領了歐亞兩個大陸的其他領土而建立了其他的汗國。就時間而言，蒙古帝國在並未佔領中國之前，就已存在。而當蒙古帝國失去所佔的中國領土之後，又由於其他汗國的存在，這個帝國並未立即滅亡。

一 蒙古帝國興亡的輪廓

元太祖鐵木真於西曆紀元後一二〇六年稱成吉思汗。宋濂元史太祖本紀載：「元年丙寅帝大會諸王於斡難丸斡白旗，即皇帝位於鄂諾河之源，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青吉斯（原作成吉思）皇帝，是歲寶金泰和之六年也」。這段文章完全是中國史臣的筆法，把一羣遊牧貴族在一次選舉大會中公推鐵木真做強者之汗的故事，描寫成中國歷史上羣臣勸進做皇帝的故事。其實，鐵木真只做過蠻族的可汗，並未做過中國式的皇帝。多桑蒙古史的記載就與此不同。多桑寫道：「塔塔兒諸遊牧部落既平，鐵木真應有適合其權勢之尊號。一二〇六年春，遂集諸部長開大會（Qonrat）於塔塔兒河附近之地，建九斡白旆。或謂或下者開闢出（Kendukon）者，當代神發言，素為蒙古人所信奉。茲莊然告衆曰：『具有古兒汗（Gur Khan）者，蒙古語古兒猶言全體，則古兒汗猶言全體之汗。』或曰汗尊號之數目既已敗亡，不宜採用此有污跡之詞一稱號。今奉天命命其為成吉思汗（Tengis Khan）或曰之汗。』（蒙古語Tengis猶言剛強，Gis表示多數之語尾助詞。汗為可汗之縮寫）諸部長羣贊其議，乃上鐵木真尊號曰成吉思汗。（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史集——馮秉世譯第九冊四一頁——夏風特撰譯元史及綱目三五

及四〇頁）。時年四十四歲。（刺失德云時年五十一歲，——元史紀元始於是年。）（引自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三章商務印書館版頁六一。）多桑的筆法比中國史臣的筆法高明得多。這段文章把鐵木真的真面目刻畫出來了。他不過是一個蠻族的酋長而已。蒙古帝國就由這個強大的酋長奠定基礎。鐵木真稱強者之汗的一年乃是一二〇六年，此係金章宗泰和六年，夏襄宗應天元年，又係南宋寧宗開禧二年。下距南宋帝昀祥興二年（一二七九年）的覆滅還有七十五年之久。

帝國的分割

鐵木真稱汗之後，乃於十四年（西曆一二一九年）大舉西征。我們把這大西征叫做成吉思汗的西征。成吉思汗於十七年（一二二二年）秋旋師東還（此據柯羅德新元史西域傳）。復於西曆一二二五年（此據新元史太祖紀下）將其佔領土地分封四子。據新元史西域傳上所載：「太祖東歸，定四子分地，以和林封拖雷，以葉密爾河濱之地封窩闊台，以錫爾河東之地封察合台，鹹海西南貨勒自彌之地并鹹海裏海之北封長子朮赤」。又據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一章載：「成吉思汗曾以地分封諸子及諸親屬。長子朮赤對地在鹹海（Aral）之北，西抵撒馬哈辛，不里阿爾兩部邊界。據史家阿拉丁之說，則謂成吉思汗曾以薩馬爾罕所屬西方之地封與朮赤。察合台之封地東

起見見之地及海河立了西極只河(阿河)兩岸。高台台之封地亦在東極
定河一帶。拖雷則承襲其家所保有哈刺和林諸山與塔里河之源之故地。(見世
系圖考卷第一冊)這次西征分封極關重要，蒙古帝國之規模就是在這個
時定定的。

帝國的擴大

蒙古於一二三七年死後，遺命其第三子窩闊台為主。窩闊台即位之
後，於一二三三年及四四年，併吞女真的金國。中國北部原為女真這一外族
所據，至此遂為蒙古這個外族所佔領。然而代表中國的南宋尚未滅亡。
窩闊台除兩征金國，東征高麗外，復繼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之後，組織第二
次西征。這次西征以尤赤之子拔都為元帥，皇子貴由，拖雷之子蒙哥，及諸
王驛馬諸子為戶之長子皆從行，當時叫「長子出征」，我們把它叫做拔都
的西征。這次西征的結果使拔都得以擴大尤赤的封地而成立欽察汗國。

大元帝國及伊兒汗國的成立

窩闊台於一二四一年(宋理宗淳祐元年)死後，由其子貴由繼立為漢。
貴由時代，蒙古帝國的版圖已經不小。欽察汗國已經在拔都的統治之下開始
發展。察合台汗國由於成吉思汗的西征，早已奠定規模。窩闊台汗國不但存
在，而且這時是山窩闊台系的貴由繼承成吉思汗的汗位。只有拖雷系諸王除
了原有的分封地而外，尚無多大的發展。貴由於一二四八年死後，遂發生汗
位之爭。窩闊台，察合台兩系諸王要求擁立窩闊台系的後裔。尤赤拖雷兩系
諸王要求擁立拖雷的後裔。由於當時最有力量的是拔都擁護拖雷系的蒙哥，於
是蒙哥得以繼承汗位。在一二五一年據立蒙哥的大會上，決定了兩次西征。
據多桑蒙古史所載：「選舉蒙哥為大汗之大會，曾決議兩次西征。一為南征
金國(按此係南侵宋國之誤)以忽必烈為主之。一為西征波斯，由皇弟旭烈兀
主之」。(見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第四卷第四章，商務印書館版頁四九)。
旭烈兀的西征乃是繼拔都第二次西征之後的第三次西征。這次西征的結果是
再旭烈兀建立了伊兒汗國。至於忽必烈西征的結果就是消滅了南宋，而建立
大元帝國。

一二五九年蒙哥親率大軍入四川，以合州不下，遂收重慶。八月，蒙哥
死於合州城東十里之釣魚山(此據宋濂元史憲宗本紀)。蒙哥死後，忽必烈
乃一二六〇年在上都(開平府今察哈爾多倫縣東南)繼承汗位。忽必烈即位
後第十二年即元八年(西曆一二七一年)始建國號曰大元。至元十六年歲

了南宋。這次建立新國號乃是受了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儒家的孔子，
本是讚於「與夏之辨」的，其末流每有以補助外族做皇帝者，實失去儒家屬
有之精神。這種實的研究：「世祖至元八年，因劉宗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
(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其語有曰：「誕膺景命，必有
美名。唐之為晉也。虞之為夏也。嗣至禹與而湯造，五名夏大以殷中。
世孫以還，君姓非古。聘秦稱漢者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即因所封之爵
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今特建國號曰大元，取易
經乾元之義云云。」(見廿二史劄記元建國號始末)又據近人韓儒林
的研究云：「而且每一代的太祖皇帝建立國號，是中國的舊俗，蒙古人初不
之知(參閱蒙兀傳年表)」。蒙古源流的著者薩穆撒所本的史源，大
概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故有此說。窩闊台時，但稱大蒙古國(四都統刊
號編孔元攢孔氏阻庭記三頁十六上)大蒙古國(同上洪七頁三十二下)
。忽必烈建立中國式的國號，仍出於漢人的請求(參閱元王德潤先生大
集八十六建國號條)。在成吉思汗時，如何會有「國號」的觀念。(引
自中央大學文哲季刊第一期韓儒林著蒙古的名稱一文)。從這裏我們可以
看出忽必烈雖然建立了一個中國式的國號。然而所謂大元帝國者，不過是「
大蒙古朝」或「大蒙古國」改換名稱而已。

蒙古帝國的極盛時

忽必烈時代的蒙古帝國或大元帝國是由一個本部和四個藩屬的汗國構成
的。藩屬的四大汗國就是成吉思汗長子尤赤系的欽察汗國，次子察合台系的
察合台汗國，三子窩闊台系的窩闊台汗國，四子拖雷系的伊兒汗國。至於蒙
古帝國本部也在拖雷系的忽必烈統治之下。多桑蒙古史載：「忽必烈領地之
廣，為前史所未見。當時列其版圖者，有中國、高麗、土番、安南、占城、
恆河外之印度一大部份，南海中之數島，大陸北方自東海達於的泥堆兒河岸
之地。當忽必烈在位之時，雖有杭刺山以西成吉思汗系諸王之不奉朝命，要
為蒙古帝國之疆域。復次波斯為其屬國，旭烈兀之後王君臨此國者，須受大
都之冊封。其諸大藩之領地，據於地中海及東羅馬帝國國境。世人得謂亞細
亞亞洲幾盡率大汗之號令也」。這是就蒙古帝國的全部版圖而言。中國本部
在蒙古帝國的全部版圖中，不過被佔領的一個國家而已。而且中國本部還不
等於蒙古帝國的本部。忽必烈直接君臨的蒙古帝國之本部仍僅大於中國本部
。多桑蒙古史又云：「忽必烈直接君臨之地，分為十二大區域，各區域設一

同僚組合之官署治之，漢語名之曰省。其一省統治諸良合（Soulang）肅良合疑是女真舊境耕種而有城郭村莊之地）及女真之地。第二省統治高麗。第三省統治安南。餘九省統治中國本部（見史集）。諸省及一班行政官署，皆以蒙古人或外國人為之長。回教基督教等教信徒皆有之。其諸省室者居其大半」（以上兩則均引自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四章商務印書館版頁三四二—三四三）。是見中國本部在蒙古帝國本部中也只是一部份。我們中國當時是在蒙古帝國的統治之下。

蒙古帝國的瓦解

蒙古帝國瓦解的根本原因是在其壓迫下的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掀起了反抗蒙古外族的革命運動。首先說中國。在蒙古統治下的八十九年，中國的農民沒有一年不掀起叛亂。到元順帝至正八年（一三四八年）方國珍便在江蘇台州（今浙江臨海縣）起義。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贛州（今安徽贛上縣）白蓮教徒劉福通起義。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年）郭子興又起義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朱元璋依郭子興為都將。這次農民戰爭的結果便推翻了蒙古外族的統治。元順帝於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年）逃他「汗八里」（今北平）向北退走。順帝的退走造成了蒙古帝國的瓦解，然而蒙古帝國並未完全消滅。現在我們還要看中國民族解放以後的蒙古帝國。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年）八月順帝由其「汗八里」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走上都。明兵進攻上都。至正二十九年（一三六九年）順帝駐居湖廣之應昌府。至正三十年（一三七〇年）四月順帝死於應昌府。時為明洪武三年。是年五月明兵攻克應昌。順帝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此據海蘭多桑蒙古史第三章第七章譯名，宋濂元史順帝本紀譯名作阿剌答答孫達喇）遁走哈刺合林故地，繼承順帝之汗位。自此以後，蒙古汗廷都哈刺合林。一三七八年愛猷識理達臘死，子脫古思帖木兒立。此時大元帝國之帝號固依然存在，不過版圖縮小，退回老家而已。其後傳至坤帖木兒時，有名鬼力赤者篡立，始去帝號，專稱可汗（按元史諸帝除擁有汗語帝號外，仍各有其蒙古語的可汗尊號，例如世祖忽必烈之蒙古語的可汗尊號為薛禪汗，順帝愛猷識理達臘之蒙古尊號為兀哈篤汗），去國號，專稱可汗。鬼力赤篡位後，即攻瓦剌，一時稱雄漠北。再後，至達剌汗時，蒙古復大，史家稱爲蒙古的中興。因此，蒙古帝國雖然瓦解，不過勢力縮小，分成許多汗國而已，其傳統並未消滅。終明之世，中國與山

蒙古帝國瓦解而形成的蒙古諸汗國是相對峙。當時遼河漢北漢西仍依然蒙古諸汗的領土。

再說到蒙古帝國的西方領土即四大汗國的瓦解。其中除窩闊台汗國因海都的叛變，爲忽必烈的後嗣及聯合台汗國所併吞外。其他三汗國都有很長的歷史。伊兒汗國至十四世紀中葉漸行瓦解。欽察汗國的歷史更長，統治後國南部達兩百年以上，直至一四八〇年，伊兒三世繼位後始行瓦解。十四世紀中葉以後，解脫出來。察合台汗國也傳至十四世紀中葉始行瓦解。十四世紀中葉以後，蒙古帝國雖然瓦解而爲許多汗國。但是在蒙古民族中又有一個新的發展者出現。此人便是帖木兒。帖木兒生在中亞細亞，建立了自己的汗國，其後嗣巴魯剌又入印度建立莫臥兒帝國。這個帝國直至英國侵入印度時，始行瓦解。

蒙古史與中國史

蒙古民族——我們兄弟民族的歷史是一部偉大的歷史。不但是——部偉大的歷史，而且是一部偉大的歌。這部歌就是李德裕行幾十萬行的詩句也寫它不完，就是請希伯來人荷馬來也歌唱不盡。當十三世紀和十四世紀蒙古馬蹄轉動的時候，全世界都跟着它在轉動。這偉大的蒙古民族對於全世界所起的作用是一個部份的破壞作用。這破壞乃是對於當時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中最殘酷最黑暗的封建制度加以部份的破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在蒙古馬蹄的破壞之下，引起了極大的變化。如果僅就對中世紀最殘酷最黑暗的封建制度加以破壞這一點而言（雖然是部份的破壞，部份的破壞也有歷史意義），蒙古民族在世界史上起了——個極有利的作用。這個極有利的作用，連當時最有學問的人也不會想到。但是蒙古民族除了破壞而外，並沒有創造新的生產方法。正因為他們沒有創造新的生產方法，所以，他們除了破壞中世紀封建制度的部份破壞而外，仍然沒有根本消滅當時的封建制度。根據歷史唯物論的運理來講，不能建設新生產方法的階級或民族，永遠無法消滅舊的生產方法。至於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民族雖然沒有發展成爲實行封建制度的民族。但是在以游牧爲主，以農業爲輔的生產基礎之上，這個民族已經有了父系社會，已經有了奴隸主與奴隸階級劃分，已經有了顯赫的使臣。即令如此，這個民族與實行封建制度的民族在實質上却有極大的差異。這是說明他們之所以能夠破壞中世紀最殘酷最黑暗的封建制度，並非由於他們有進步性，而是由於他們有落後性，或者說野蠻性。

世界上被征服者總是一樣的受害者。但征服者的方式，則各有各的不同。

蒙古民族的征服與現代法西斯的侵略所採取的方式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蒙古民族的征服對於中世紀最黑暗最愚昧的封建制度起了破壞作用，我們認為有利。反之，法西斯的侵略則是對於目前世界上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各民族的進步的生產方法，加以破壞，這種破壞作用與蒙古民族的破壞作用毫無相同之處。蒙古民族的破壞是對於反動方面的破壞。法西斯的破壞乃是對於進步方面的破壞。其次，法西斯的侵略是要改變其佔領土地上的經濟結構，按照法西斯的模型來改變。至於蒙古民族的征服基本上不採取這種方式。蒙古民族沒有改變任何民族的經濟結構。正如歐洲人所說的，上帝叫他們來做皇帝，上帝並沒有交給他們以改變經濟結構的任務。蒙古民族的征服方式就是要求納貢，要求納稅。以故，他們雖然部份破壞了被征服民族的封建制度。但是，被征服民族的封建領主和地主也會翻過頭來用納貢和納稅的方式去腐化他們。再者，他們雖然部份破壞了被征服民族的封建制度，替農民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條件。但是，這只是一個客觀上的有利條件。至於農民經濟在蒙古民族的壓迫下，不但沒有改善，而且更加惡化。

研究蒙古民族史和蒙古帝國史，估計蒙古民族和蒙古帝國在世界社會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裏邊牽連中國社會，俄國社會，波斯社會，印度社會，中亞細亞各民族社會，甚至歐洲社會來研究。我們深信從蒙古民族史和蒙古帝國史中可以接受豐富的文化遺產。不過我們今天還沒有充分的條件來研究蒙古史。我們所要研究的乃是蒙古帝國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史。

二 蒙古帝國統治下的中國

中國自從隋唐的極盛時代以後，便逐步走入中世紀的黑暗時代。由於中國社會內在的衰弱，因而招致了外族的侵入。五代時就有契丹（遼）的興起。後來宋帝真明二年便是遼太祖神宗元平（西曆九一六年）。宋太祖建隆元年乃是遼穆宗隆慶十年（西曆九六〇年）。此時上距遼之滅國已有四十多年。北宋偏安於黃河之南，南宋偏安於長江之南。有宋一代，無時不有外族壓迫之下。而外族的發展，由進而進而而聚古，一個比一個厲害。到了蒙古帝國的極盛時代，中國就完全失掉了自由和獨立。現在我們看一看在蒙古帝國統治下的中國，其實際情形究竟如何。

民族的壓迫

中國人提起馬可波羅遊記，每每引以自豪。但是中國人忘記了馬可波羅描寫過當時中國人所受的壓迫。馬可波羅云：「大汗之取得中國主權，不以正當權利，而以兵力，因不得人民之信用。職是之故，諸省及其行政位置，皆授於可以信任之鞏租人，回教人，基督教人，及其他屬於帝室之外國人。是以普受中國人之嫌惡，蒙古人奴視中國人，而回教人待中國人尤惡，故皆惡之。」（見行記第二卷第八章。引自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四章附注）。

一 蒙古統治中國時，把人分成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係蒙古征服西域諸地之降人。第三等是漢人，係遼金所統治的舊族，其中除契丹，女真，高麗，渤海諸種人外，也包括原在遼金統治下真正屬於漢民族的漢人。第四等南人，係南宋統治下的屬於漢民族的先後來分的。錢大昕云：「漢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為斷。江浙湖廣江西三省為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諸路為南人（見十駕齋養新錄卷九）。這種劃分不但把蒙古人色目人放在漢人南人之上，而且把契丹女真諸族人放在南人之上。同時，這種劃分又把漢民族的一部份劃作漢人，另一部份劃作南人。於是在完整的漢民族中造成了漢人與南人的差別。

蒙古帝國壓迫漢民族分發漢民族政策的具體表現實在太多了。就刑法而言，對於蒙古人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加區別。漢人南人殺蒙古人色目人，則處死刑，蒙古人色目人殺漢人南人，僅處罰金，令其出征。就禁令而言，漢人南人不得私藏兵器，蒙古人色目人則許收藏。就朝廷用人而言，對於漢人南人更加歧視。據新元史百官志序載：「然上自中書省下逮郡縣，親民之吏，必以蒙古為之長，漢人南人貳之。終元之世，奸臣悉踞於上，貪吏皆克於下，痛民蠹國，卒為召亂之階」。這都表示蒙古帝國對於漢民族的壓迫。蒙古人的壓迫不僅施之於漢民族，同樣施之於其他民族，不過當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特別強調此點而已。

武裝的解除

沒收兵器，解除武裝，乃是蒙古帝國對付中國人民的第一着。宋濂元史世祖（忽必烈）本紀二十二年載：「分漢地及江南所拘勇兵為三等，下等毀之，中等賜近居蒙古人，上等貯庫」。又二十六年載：「蒙古汪惟和等

，近將漢人兵器，自管內悉已禁絕，自令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庫。帝曰：汝家不與它漢人，此弓矢不汝禁也，任汝執之。」又二十七年：「江西行省言，吉慶湖南廣東兩處，以禁弓矢，賊益發，乞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忽必烈是統治中國的第二個蒙古皇帝。蒙古帝國除中國人外的武裝，也就從忽必烈開始。以後，任何蒙古皇帝無不對於漢人收繳兵器之事，嚴加申禁。

唐掠農民以為奴隸

奴隸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之前出現的一種制度。這種奴隸制度在中國社會中已經崩潰。然而在古蒙部中並未崩潰。因此，當蒙古侵入實行中世紀封建制度的宋代社會時，就發生奴隸及自由農民，以為奴隸的事情。這種掠人為奴的運動當然沒有把當時中國封建社會一變而為奴隸社會。但是，這種掠人為奴的運動對於當時中國封建制度的確是一個大破壞。這不是用進步的生產方法來進行破壞，這是用落後的生產方法來進行破壞。這種破壞是異常嚴重的。

根據趙翼的研究：「元初起兵朔漢，擄以畜牧為業，故諸將多掠人為奴，隸以畜牧之事，其不慘然也。及取中原，亦以掠人為事，并有欲塞中原之地以為牧場者，耶律楚材當面時，將和大臣有所勸，往往欲諸郡。楚材因按戶口，並令為民，蒙古者死。立法未嘗不嚴，然諸將恃功牟利，迄不為止。而尤莫甚於阿爾哈雅（舊名阿里海涯）蒙古之多。張維熊傳：「阿爾哈雅行省轄地，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自置吏治之。徵收其租賦，有司其數。雖飛為官備用，察之，乃詔還籍為民。」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詔阿爾哈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為民。」十九年御史奏又言：「阿爾哈雅古降民為奴，而以爲稅計所得。有旨，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猶其數賜臣下。」宋子貞文為阿爾哈雅所處逃民千人清出屯田，可見其所占之戶以千萬計。蓋自破獲後，臣等（伯顏）須夫兵趨杭州，留阿爾哈雅等平湖廣之未附者，兵種在難，乘勢徵稅，故志行停廢，且此逃民，占降民，無不據為己有，遂至如此之多也。他如宋子貞傳：「東平將改占民為部典戶，謂之脚夫，遺其賦，幾四百所，子貞嘗為贖貨，乃歸歸州縣。」張德輝傳：「兵後，歸民依庇聚右，歲久掩覆家數，德輝為河南宣撫使悉遣為民。」常勝傳：「江南新附諸將往往掠籍民為家奴，常勝為湖北提刑按察使，出令遣民等數千。」王利用傳：「都元帥趙鼎等掠山民數百口為奴，利用為提

刑按察，出之。」袁德惠：「南京總管劉克與掠良民為奴，裕勳之為民。」此皆散見於各傳者也。兵火之餘，遍地塗炭，民之生於是時者，何以爲生耶？」（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元初諸將多掠人為私戶）。根據趙翼的研究，我們還不敢斷定蒙古大所掠漢人南人，全部都變成奴隸，也可能有一部份變成農奴，但是大部份變成奴隸，則是無疑的。

這種掠人為奴的普遍現象可能引起一種怪論。就是認為元代實行奴隸制度。這種怪論是不值一駁的。因為元代實際上並沒有實行全中國範圍的奴隸制度。我們今天指出元代掠良民為奴隸為普遍現象，乃是為了說明兩件事實。第一件事實說明當時中國人民所遭受奴隸掠奪的慘苦。第二件事實說明當時中國中世紀的封建制度遭受嚴重的破壞。奴隸掠奪是一種不利的實際，而封建制度的破壞則是一個有利的條件。這個有利的條件並不能抵償不利的實際。

阿佔耕地以為牧地

蒙古人對當時中國封建制度的另一種破壞就是阿佔耕地，以為牧地。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也有一種阿佔耕地以為牧地的事情，這也是對封建制度的一破壞。但其性質與蒙古人的阿佔完全不同。英國人用進步的生產方法破壞本國的封建制度。蒙古人則用落後的生產方法破壞中國的封建制度。宋濂元史雜錄云：「元帥在蘇魯爾據民田為牧地。」又和尙傳附齊魯傳云：「東平大名諸路，有諸王牧馬草地與民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強弱為手奪，連年爭訟不能定，乃命起齊魯諸路之，其訟悉息。」又王構傳云：「蒙古田為牧地，雖牛馬填民禾稼桑棗。」又續文獻通考田賦考云：「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牛羊。」這都說明當時中國耕地有一部份淪為蒙古人的牧地。這當然又是一種破壞。

土地的侵佔與莊園的破壞

上面所說阿佔耕地，變為牧地，僅僅是破壞當時封建的土地制度之一種方式。還有一種更普遍的方式就是大規模的土地侵佔。南宋以前的中國封建制度，我們把它叫做中世紀的封建制度。這種封建制度與明代以後的封建制度在本質上相同，而在形態上大不相同。中國中世紀的封建制度是以莊園制度佔優勢為其特徵。租佃制度雖然存在，但這種制度在南宋以前並未成為最主要的土地制度。由隋唐至南宋之間，最主要的土地制度是莊園制度。

宋以前，莊園制度尚未形成。魏晉南北朝所實行的乃是貴族佔田制的封建制度。何謂莊園？在這裏，我且從文學作品上引用材料加以說明，或者使大家更有興趣。水滸第四十六回載：「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圍着三座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趙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座莊上，三村裏，算得總有一二萬家戶人家。惟有祝家莊最甚榮傑。為頭家長叫做祝朝奉，有三個兒子，名為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個教師，喚做鐵棒驢王。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莊上有一二千丁的莊客。」又第五十九回載：「徽宗去了四五日，回來對來頭領說道：『這個官頭市，共有三千餘家，內有一家，喚做曾家府。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科為村長者，生下五個孩兒，號為曾家五虎。大的兒子喚做曾密，第二個喚做曾密，第三個喚做曾索，第四個喚做曾魁，第五個喚做曾昇。又有一個教師史文恭，一個副教師蘇定。去部曾頭領上，約集着五千餘人，聚下糧草，這下五千餘騎，發願要與我們曾家立，定要與金人爭奪。』」又第五十回載：「徽宗三年曾有討捕宋江等人之舉，徽宗討捕。」按宋江叛亂在北宋末年。宋徽宗三年曾有討捕宋江等人之舉。因而水滸故事最初見於大宋其和遺事一書。現存水滸這部文學作品，則是南宋以後逐漸形成的。由南宋開始形成的水滸，不能反映南宋社會。水滸一書所描寫的祝家莊官頭市就是代表當時的莊園制度。

莊園制度盛行時代的農村與明朝以後租佃制盛行時代的農村大不相同。南宋以後的封建領主住在莊園中。莊園成爲一個割據的細胞。莊園中是莊院，此莊對莊領主及其家屬的住宅。莊院之外是莊院和佃客的小屋。莊園的四周是屬於封建領主的土地和森林。莊園有防禦的堡壘，有武裝。水滸上的祝家莊便是一個典型的莊園。近人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一書（正中書局出版），於其第十四章中提出「何以大宋官軍反不如祝家莊及官頭市的鄉團」的問題（見該書十四頁一二五）。因爲大宋官軍打不過梁山泊的英雄，反之，祝家莊和官頭市和武裝組織却與梁山泊對抗。薩孟武對這個問題的解答認爲實行徵兵爲兵的鄉團組織，自有其優越性。他說：「他們的組織（鄉團的組織）不怕死，他們有犧牲的精神，他們的戰鬥力比之國家的軍隊，當然要強得多」（見前書頁一二七）。同時，薩先生又認爲宋代官軍組織與軍隊制度的腐敗，不能與梁山泊的英雄對抗。可惜薩先生沒有把祝家莊和官頭市的經濟基礎等找出來。南宋的經濟基礎是莊園制度。莊園領主各擁其武裝。有所武裝與明代以後的團練，在形而上學不同。明代以後地主武

裝先固而後練，地主之間不能團結，則農民決不生其練。明代的王陽明是以辦團練出名的，清代的曾國藩是以安命團練起而創維新軍的。至於南宋以前的莊園領主根本用不着辦團練。因爲莊園領主各有各的武裝。因此，南宋的國家軍隊安得而不衰弱。

蒙古帝國的軍隊侵入中國之後，用一個侵略戰爭解除了中國人民的武裝，同時也解除了莊園的武裝。不但解除了莊園的武裝，而且用大規模的土地侵佔，破壞了莊園制度。所謂大規模的土地侵佔，有由蒙古遊牧貴族佔有的，有由寺院僧侶佔有的，有由官僚武人佔有的，也有由漢族地主自行佔有的。宋濂元史列傳第七十九回傳云：「鄭真字從吉，高唐人，爲建寧崇安縣人，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七都官爲之，六都民爲之。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無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起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倍日而家日破。」這就是莊園制度破壞之後大規模土地侵佔所造成之結果。

在莊園制度之下，土地兼併雖然同樣盛行，但是還有一個經濟條件的限制。因爲莊園領主是以親自經營莊園生產爲其必要的經濟條件。蘇洵云：「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田，地大業廣，阡陌相聯結。召募佃客分耕其中。墾墾墾，視以奴僕。安坐四顧，而擇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獲其節度以歸。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蘇老泉集卷五）。這說明明宋代的莊園領主，雖然自己不耕田，但必須指揮佃戶，加以經營。不但自己經營，而且要指派管莊的奴僕，幫助經營。莊園制度破壞之後，租佃制度取得優勢，地主根本用不着親自經營莊園生產，這樣一來，更便利於兼併。租佃制度，把它當作一個經濟制度而言，乃是一個最易發生兼併的制度。這種租佃制度對於蒙古遊牧貴族的嗜好非常適合。因爲遊牧貴族一方面不願親自經營農業，另一方面又希望增加地租的收入。所以，我們認爲蒙古統治時期乃是中國封建制度內部的一個轉形期，乃是由宋代以前莊園制度佔優勢，變到明代以後租佃制度優勢的轉形期。

紙鈔的發行與自然經濟的破壞
蒙古統治中國的重要經濟政策之一，就是他的貨幣政策。所謂貨幣政策的中心就是紙鈔的發行。趙翼云：「元太宗八年，始造交鈔。中統元年又造

物之值，並從絲例。鈔之文以十計者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以貫計者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二貫準白銀一兩。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元二十四年，乃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抵中統鈔五貫，武宗時又造至大銀鈔，後廢不行。元之世，常用中統至元二鈔。魚泉印造之數，自數十萬至數百萬不等，亦見食貨志。鈔雖以錢為文，而元代實未嘗鑄錢也。武宗時曾行錢法，立泉貨監領之。仁宗以錢鑄弗及仍廢。故有元一代專用鈔。又云：「古者以米絹為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銀錢已謂之虛，乃又欲以紙鈔代之。虛中之虛，其能行之無弊哉！」（以上俱見廿二史劄記元代專用交鈔）。

紙鈔政策不過是蒙古制創中國人民的一種方式而已。然而這種紙鈔政策與商業資本的發展是分不開的。所以紙鈔政策對於莊園制度的自然經濟，也是一種嚴重的破壞。

田課商稅的搜括

元世祖時先後任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為計臣，盡搜括。趙翼云：「中統三年，即以財賦之任委阿合馬，與鐵冶，增鹽稅，小有成效，拜平章中書政事。又立制國用司，以阿合馬領其事。已復罷制國用司，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察括天下戶口，下至粟材榷茶，亦纖細不遺。其所設諸，專以括取財為事，史天澤安重等爭之，崔斌等劾之，皆不能勝。以察括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鐵木兒於死。有秦長卿者，欲發其奸反為所噬，歸於獄。擢用私人，不由都選，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據財賦重地，并搜引奸黨郝積秋仁等騷擾同列，隲與交通，專事搜括，捕賦不饒，征斂愈急，內貨賄，外示刑威。天下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有益都千戶王著發機憤擊殺之。阿合馬之奸始上聞。雖命剖棺戮屍，而流毒海內，已二十年矣。阿合馬既殺，又用盧世榮，亦以增多歲入為能，鹽鐵榷醋，商稅田課，凡可以圖利者，益務搜括。察用阿合馬之黨皆列舉職。凡肆惡二年。御史大夫孛速帖木兒盡被其奸，始詔誅之。未幾又用桑哥，專立尚書省。改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特授其君，皆學殿參政楊寬郭佑及臺吏王良皆皆奏誣至死。遂以丞相領尚書統制使。以沙不丁為江淮左丞，烏馬兒為參政，察違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廿二史劄記元世

祖時利賦武）。世祖號稱「英明」，尙且如此，世祖以後，不同可知。新元史食貨志一載：「元中葉以後，課稅所入，視世祖時增二十餘倍，即包銀之賦，亦增至十餘倍，其取於民者可謂悉矣。而國用日蹙其不足。蓋廢於佛事與諸王貴戚之賜資，無幾無之。而禮以俸賞，濫出於窳例之外者為尤甚。」八十九年中，無一年不搜括，無一日不搜括，這就我蒙古帝國的一德政」，這就是蒙古帝國統治下中國人民所遭受的剝削。

三 宋以前與明以後

如果把中國社會發展史詳細研究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宋以前的中國社會，與明以後的中國社會大不相同。所謂大不相同者，並非社會性質不同。宋以前（前封建社會為止）是封建社會，明以後（後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為止）也是封建社會，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同。所謂大不相同者，係指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發展階段大不相同。據著者近年來研究中世紀社會的初步意見。東漢以前仍然是奴隸社會。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以貴族世襲制為主的封建社會。隋唐宋元時代是以莊園制度為主的封建社會。明清時代（鴉片戰爭以前）則是以租佃制度為主的封建社會。宋以前莊園制度占優勢。明以後（鴉片戰爭以後除外）租佃制度占優勢。元代是由宋以前過渡到明以後的轉形期。不能單獨成爲一個時代。至於這個轉形期究竟應當劃歸前一個時代，抑或應當劃歸後一個時代呢？我們主張應當劃歸前一個時代，作為隋唐宋元時代的最後一期。並且把這些時期合併起來叫做隋唐宋元時代。

何以故？因為中國社會自晚唐五代以降，即不斷發生外族侵略。遼太祖（此時尙名契丹）的建國在後梁末帝貞明二年（西曆公元九一六年）。北宋太祖的建國則在後穆宗應曆十年（西曆公元九六〇年）。所以，北宋開始時，即與契丹外族的遼國，形成南北對峙之勢。於是北宋不能不偏安於黃河之南。由遼而金，外族更強，代表漢民族的宋朝，更加衰弱（這種衰弱當然是封建莊園制度的必然結果）。於是南宋不能不偏安於長江之南。所以從晚唐五代起，中國社會即已走入了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南宋就處在這個黑暗時代的當中。蒙古帝國的統治乃是這個黑暗時代的延長，並非這個黑暗時代的結束。既然中國在蒙古帝國統治之下，仍然是一個黑暗時代，所以，我們就把蒙古帝國統治下的中國歷史，劃歸前一個時代，或者說劃歸中世紀的黑暗時代，而不劃歸於後一個時代。這種劃分完全是按照中國社會發展本身舉

劃分的。如果有人不肯按照當時中國社會發展本身來劃分階段，而要按照蒙古帝國的強盛來劃分階段，那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堅持，劃分中國歷史的階段，必須由中國社會的發展着眼，而不能由外族統治與否着眼。

近代中國歷史學家把元代當作中國歷史新紀元的原由之一，就是認為元代打通了中國的歐洲的陸路交通，而造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這一點我們承認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的確有其不可磨滅的作用。但是，這道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乃是暫時的。中國與歐洲的交通在漢代已經開始。中國的絲在漢代已經能夠出現於羅馬的市場。在唐代，中國與歐洲的交通，更加頻繁。所以，就造成了中國與歐洲的貿易。中國與歐洲交通的中斷，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斷，乃是由於中國經濟的衰弱，以及外族壓迫的結果。就歷史事實而言，隋唐五代以後，中國雖然無不與西的國際交通路線。蒙古帝國的興起，就使中國對於東西國際交通路線的壟斷完全喪失。在另一方面看，乃是蒙古帝國打開了中國與歐洲的交通，造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另一方面看，乃是蒙古帝國從中國手中奪去了中國與歐洲交通的壟斷權，以致造成了阻礙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這就是說，當中國民族由蒙古帝國統治下解放出來建立帝國之後，由於蒙古汗國的佔領西北交通要道，以致明代向前的國際交通路線，始終無法打開。這道西北國際交通路線被蒙古汗國壟斷的事實，可以作為說明明初中國國際貿易不能向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發展的原因之一。

在隋唐五代以後的黑暗時代，中國文化並沒有重大的發展，我敢說一個個實例于來說明。首先拿錢板術來說，中國木板印刷在晚唐似有萌芽。據石林燕語引唐柳詒說，中和三年在蜀見字書雕本，但是沒有用夾大量印刷書籍。後唐長興三年（西曆紀元後九三二年）中書門下馮道李處恭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這是中國以木板大量印書之始。假使一個現代的中國人能夠到唐代去，居然難於找着木板印刷的書籍，想讀幾卷詩抄，豈不要大吃一驚。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國社會，即在黑暗時代，仍有變化，並非「長期停滯」而已。

再拿木棉做例子。據趙翼陔餘叢考：「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葛之。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陶九成輟耕錄記：「松江島泥涇，土田鹼薄，謀食不給，乃覓木棉種於閩廣。初無路求種者之制，率用學夫其子，織絃竹編，按掉而成，其功甚艱。有黃道婆（亦作黃婆）自崖州來，教以紡績，人遂大獲其利。未幾，道婆卒，乃立廟祀之。三十年間，婦人思慕新

重立云。」九歲元末人，當時所記立廟始末如此，益可見黃道婆之事未虛。而松江之有木棉，實自元始也。鄭師代醉編又謂棉花乃魯使黃始所傳，今廣東人立廟祀之。各語說觀之，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於粵，及於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於松江耳。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浙西湖南廣福建木棉提舉司，實民歲輸木棉布十萬疋。木棉特設提舉司，則其初為民利可知。假使一個現代的中國人跑到宋以前去，居然難於找着棉花和棉布，豈不要大吃一驚。再研究一下明代以後棉織業在中國手工業經濟中以及整個中國經濟中所佔的重要地位，而這個最重要的棉織業在宋代以前居然沒有，其吃驚的程度，豈不更大。這就使得我們了解宋以前的中國社會經濟與明以後的中國社會經濟的確大不相同。余棉花布來做例子，正正是我們研究的開端而已。或者說蒙古帝國統治時代，不是宋以前轉運到明以後的轉運過程。我們之所以要詳細研究蒙古帝國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就是為了要研究這個轉運過程。

投稿簡約

- 一、本刊歡迎讀者投稿，其內容性質略如下述：
 1. 經濟及社會建設問題的各種政策。
 2. 對當前國內國際局勢的理論分析。
 3. 各種學術論著及政治的、經濟的、歷史的、哲學的、文藝的……。
 4. 對於時論的批評及書評。
 5. 大後方各地動盪和敵後淪陷區各種鬥爭實況的報導（包括各種建設事業和抗敵戰況）。
- 二、每篇字數最好在二千字至六千之間，最長不要超過一萬字。
 - 三、來稿本刊編者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 四、來稿若不能刊登，如附有足夠郵票者，一律退還。
 - 五、來稿用何種名稱，惟須註明真實姓名與詳細住址。
 - 六、來稿一經發表，每千字發酬十元至三十元。
 - 七、來稿請用稿紙書寫清楚，請稿簡附原文或詳細註明原稿章、期數、出版處及著作人姓名，重要稿件請寄雙份，以免遺失。
 - 八、來稿請寄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本刊編輯部。

心理因素與物價

讀報雜感之一

方卓芬

好久以來，物價像大海的波浪一樣，不斷地在澎湃着。這波浪又引起了整個輿論界滔滔不絕的論潮。平日不大關心物價問題的我，這時候也把看報的中心移到這問題來了。在這當兒，第一件事是找出物價上漲的原因。每天遇到報上的社論和專論談到這一點時，我總愛看一會。使我最為費解的是幾家報紙對於心理因素的過調。這種過調對於平抑物價是沒有利益的。因此，把幾個月前的這種論調提出來檢討，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事。舉例作個說明：

「物價上漲具有貨幣數量增加與物資缺乏兩層性質的，却是心理恐慌的因素，心理恐慌一方面造成貨幣流通速率的增加，另一方面造成物資數量人為的減少，一般人預料物價必上漲，在賣者不肯脫售，在買者急於購進，於是市場上貨物便愈形缺乏。」

「生產機構之努力於囤積原料，貿易商人之努力於購銷日用必需品等等都抱的是在物價上漲中多賺幾少花錢的心理，這種心理便促成了已在上漲中的物價之更漲。」

用心理因素解釋物價，是奧國學派的拿手好戲，現在竟有人把這個因素拿來直接解釋物價了。一切落後，連經濟學也落後的中國，如今也來這一套，豈不是「青出於藍」麼？

看到一些人在發生心理恐慌。但這種恐慌，主要是流行在一般中小人家。他們恐怕物價飛漲不已，將來再買必更吃虧，故手頭有一點錢時，就想多買一點生活必需品。從柴米油鹽以至牙刷，牙膏，毛巾肥皂之類，都是大家搜集的對象。幾年前誰家在室內掛着一串肥皂呢？誰人會把薩丹士林當寶貝呢？現在却成爲居家的辦法了。大多數人家如此，市場的商品，自然就呈現着供不應求的現象了。可是，這並不是能起決定的作用的。在供求上發生主要作用的不是他，而是那些富商權貴。這些大國戶大量的囤積物資，從五金原料，棉布，棉花，棉紗一直到糧食，都應有盡有的囤積起來，如果回想三四年前的滬市物價開始漲的時候，銀行錢莊的跑馬在茶館裏的活動，便可瞭然。就是因爲國戶在囤積所以引起物價劇烈波動，而物價的波動，才造成中小人家的恐慌心理。這兩種心理的動機和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說，小市民買商品的恐慌心理是以大奸商的囤積壟斷爲前提的。如果沒有奸商的囤積，如果物價不漲得這麼奇特，那末，誰又會起了心理恐慌呢？如果把心理因素看成絕對的主要因素，那就是倒果爲因了。

某報更說明供不應求的現象是心理造成的。一切市場上某種貨品本無供不應求的現象，而價格突然高漲了或顯然的發生一種人為的供不應求現象，都可歸納於心理因素。那麼，我們就要問國戶囤積物價，預料物價上漲的心理是從那裏來的呢？是不是想空幻想？在抗戰前我們也看到某種商品因受投機家的壟斷而上漲，但這種上漲是波紋狀態的，有起有伏，有時某種物價雖跌得厲害但這種狂跌的物價，復甦時也在一定的水平線上，現在的市場，已再也找不出這種現象了。原因很明白，今天是戰時的環境。因爲戰爭的摧殘，因爲消耗的增加，物資便大感缺少了。中國的工業，本來就貧弱得可憐的。敵人侵入之後，各都市先後淪陷了，工廠被破壞了。運到後方的廠家，又因機器的缺乏，交通的阻礙與稅項及資金上的種種問題未能合理解決，使生產事業未能大量發展。這種供不應求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並不是誰想出來的。自從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國際交通線被切斷了。物資來源更加缺少，大小商人看到這種情形便預料到未來的市場狀況，因而更拚命的囤積，拚命的抬高市價。於是乎物價的波浪，便高高湧起，再不見其低落了。現實的環境是囤積居奇的條件。國戶們固然會無中生有製造空氣，但這個客觀存在的事實，並不是虛構的空中樓閣呀！強調心理因素的人士，不但以心理解釋市場的供求，而且以爲心理因素造成了貨幣流通速率的增加。他們的解釋是：

「有錢的人覺得幣值日下跌與其存款銀行得百分之五的利息，還不如購存貨物，可得百分之十的利息，因此人們均急於將手中錢很快購成物品，而貨幣流通速率就因此大形增

歷史、歷史劇、鬧劇

余伯約

在一個時候曾經被毒舌的批評家叫過「路易十四之倖臣」的拉辛，也會在他耽讀過的希臘悲劇上寫過一些憤語式的批評：

「社會是一頭巨獸，牠會踢蹴跳躍，除非你能用牠的言語對牠講話」。

「一個人就不能不隨波逐流，……哲人和聖賢是生活在狂獸羣中的人……他假如不願意被裂為齏粉，那他就祇能緘口不語。他祇能退居于自己的小天地中，袖手旁觀那些被雨淋泥濘的人，而自以終身之能潔身自保為慶幸。」

這是一個藝術家的歧途，緘口不言，用默語請語，或者甘犯「被裂為齏粉」的危險，在拉辛，我們覺得憤語終于還是憤語而已，即使是一「懂得用默語向默語話」的他，也還是不能心安理得地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而旁觀同時代人的雨淋泥濘的。在無意中，他不是也會刻劃了許多暴君的可怕的圖像，在不意中，他不是也會讚頌了反抗殘暴保衛國土的英雄麼？

時人忿忿于歷史劇家的描繪暴虐的君王，其實自有歷史劇以來，這就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在英國，伊莉沙白曾經禁止過戲劇論及帝王的短處，但是在沙士比亞面前，這防柵是如何的無力啊！莎士比亞的筆，是峻烈而不可禦的。看，這是一羣如何煥發的人物啊，馬克白，理查二世，理查三世，凱撒，

克勞狄，……他們的結局是什麼？千秋萬世的觀眾和讀者，不是都用拍掌和歡呼來接受了這些英雄們的悲劇的結局麼？

雨淋泥濘的人自有他們自己的好惡與愛憎，對受難者有同情心和 Fellow feeling 的藝術家往往是待思素而能決定他們自己所站的地位的。換句話說，他們不是懂得人民歡喜這樣的結局而用這樣的結局來迎合他們，相反的是因為在處理題材的時候他們早就已經憤憤不白禁的和人民同樣地為着這樣的一個結局而歡喜。人民為什麼歡喜悲劇？為什麼歡喜悲劇人物的悲劇的結束？十七世紀的一位法國哲學家 Jean de La Bruyere 在他的名著「性格論」中說得最為清楚：

「人民在悲劇中發現了快感，這是因為在現實，在社會劇場的舞台上，他們看到了他們所不認為最可恨，最有害于他們，而為他們所深惡痛疾的那些人物的毀滅」。

是與非，正義與邪惡，這是愚人民的感覺可能判斷的事情，戲劇家割去了一切偽裝，整理出一個對照，于是而人民為着自己所厭恨的人物之毀滅而拍掌了。

歷史會使人物走向他必須走向的終結，歷史劇家呢，那不過是將歷史重新翻作成為一個作品，而把什麼是決定歷史的因素更明白地提示給當代和後世的觀眾而已。

的。……這些現象實在都是心理恐慌造成

在某種程度之內這段話是有點道理的。因為一般中小人家總覺得錢不值錢，存錢不如存貨，買些布和日用品存起來，再過一些時就可以賺加倍的利潤，何必拿存款放入銀行呢？銀行更做發財夢，覺得投資於生產部門不如投資於囤積，生產機關也感到與其努力生產不如努力於囤積原料還合算些，這要一來，人們便把通貨隨手拋出，通貨便「僕僕風塵」在流通界的途中往返了，市場，就充滿了。單從這種現象孤立的來看，自然可以說貨幣流通量的增加，是由於人民之不儲蓄通貨，但是這只是說到問題之一半。論者明明指出：「有錢的人覺得幣值日下下跌」這就說明了幣值下跌是大家買貨不存錢的原因了。幣值下跌難道不是客觀事實麼？是心理作用麼？事情明白得像秋夜的月一樣，幣值下跌是由於發行額過多而來的，是由於通貨不能回籠而來的，而這事實正是當前財政經濟的癥結。

如果綜合來說：物資缺乏與幣值下降刺激了囤積居奇，囤積又使物價漲得像出海的瀑布似的又快又急，造成物價波動的局勢。物價漲得快，使游資的活動也加快，於是法幣的流通率，因而而增加起來了。所謂「心理恐慌」，只能說是幣值下降的一個結果，不能說是貨幣流通率增加的原因。

限價已經實行了，但事實證明得很明白，只有治標而無治本的限價是不能使病根消除的。只有具體的找出病根，只有針對游資物資缺乏與通貨膨脹這二個基本因素，才能取得實在的效果。治病難有就醫吃藥才能痊愈。難道廿世紀五十年代的人仍祈求菩薩來治病麼？

在這裏我們接觸到歷史和歷史劇的問題。

歷史不會是完全地反覆，但是，在某些共同的社会經濟條件之下，歷史也真可以以現實酷似到可怖的程度。

作家筆下的史劇可以常常被認為影射，說：這和現實太相像了；但，作家筆下的史劇也可以被認為歪曲，說：這和正史太不相像了。

俗語說：舌扁而話圓。隨着個人的好惡和利害，中國人甚懂得用不同的尺度來衡量不同對象的伎巧的。我們覺得，個明歷史家任務和歷史劇家任務少異同，有着急迫的必要。

亞理士多德在「詩學」裏告訴後人：

「詩人的任務，不在敘述實在的事件，而在敘述可能的——就是依着真實性和必然性的法則而可以發生的事件。歷史家和詩人的不同，不在前者用散文而後者用韻文之點；他們的相差，可以說是前者敘述實在的事件，而後者相反地敘述可能的事件這一點。」

「依着真實性和必然性的法則而可能發生的事件」，這就是比「實在的事」更真實的真實。亞理士多德勸詩人與其使用那顯得不合理的或然的事（就是：事或有，但背情理），毋寧使用那顯合情理而未必然的事（就是：事雖或無，理則必有），就是：要詩人不必拘束于或有的「實在的事件」，而應努力接近「更高的真實」（Higher Reality）的意思，這一點，幾乎是古來一切優秀的詩人和劇作家所共同把握了的訣要。「不成問題，荷馬、莎士比亞，乃至聖經的作者，都遠自更易，而沒有完全按照文件記錄中的事實，但我以為即使是他

們的杜撰，也比歷史家批判考驗過的所謂實情還要生動」（L. Fouchetman）。歷史家不僅許可而且須要誇張，不僅許可而且須要補改，「莎士比亞常常自由地把握事實的倒後，使他的主人公們年青或青年老，甚至他還「發明」了一些事實。例如「亨利第四」中的理查第三是一名成年的武士，建立了許多功勳，可是實在，亨利第四在位時他才是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同樣，凱撒死後安東尼和布魯特之爭亂了相當的時光，而在劇本「凱撒大帝」中沙翁把「凱撒」寫了很長的一段。」（狄納萊夫）莎士比亞的史劇比「文件記錄」更輝煌，莎士比亞的史劇比歷史更更多地給了人民以教訓，也可以說，重新安插了「的藝術品比憑着支配者的好惡而記錄下來的文件更真、更深、更大地表現了人民的喜怒哀樂，也就是說，這樣的史劇更深地發掘了歷史的秘奧，道破了歷史的真實。」

在一個現實的，用全副心腸貼近人民大眾的藝術家的安排之下，依着真實性和必然性的法則而得創造出來的歷史悲劇，無疑的可能更進一步的迫近歷史的真實，可能更典型地表現出互相爭鬥着的兩個鬥爭集團的輪廓，兩種代表者的性格，容貌，乃至可更正確、更簡明地指明這兩者的前途與運命的！在這種藝術的照明之下，由于明白地看出了自己的悲劇而悲劇的人，遷怒于藝術而指責為影射和曲解，這不正是可以設想的事嗎？

歷史家的工作是記述，保存，說某一件事情如此如此，某一個人在什麼時候做了些什麼。而歷史劇作者的工作，却是整理這歷史，刪除偶然的、表面的枝葉發見，歷史發展的法則，從某人某事之間存在着怎樣的成因，「某一特殊人物在某一特殊環境中，他會做出些什麼來的事情」（G. B. Shaw）

辛，「漢傑演劇評論」。

現在，我引進一步談談悲劇和鬧劇的問題。

和平凡的日常生活比擬，歷史上被採用劇題材的故事總是那樣的曲折奇離、波濤壯闊，和實生活中的人物比擬，歷史劇中的英雄總是那樣的性格鮮明，豐富多彩，于是，不滿意史劇的人又把問題混淆起來，說：這不是悲劇而實是鬧劇的變質了。

鬧劇本來是人生的「戲」的一部分，因之採用波濤壯闊的事實和性格鮮明的人物也許可以說鬧劇的本分。鬧劇需要煽情，需要對落後的觀眾之干預性的操縱，所以他就不能不故事發展的是否合理，人物的性格是否人情，祇用出奇制勝的戲法，類型化的——可是有特色的。人物，或目的，「為戲劇而戲劇」地造成一個緊要劇敵而又適合有意的劇本，這，與其對人民「同情」對真理的嚮往，為着真的的是愛憤而寫作的歷史悲劇，有什麼一點共同的地方？

亞理士多德在「詩學」再三強調「事件」的次序，總言之就是事件和人物性格發展必「依循的必然律和必然律」，事件一定要按事件發生，行動必須從行進出來，依着這「更高真實」的途徑，不為緊要的場面所阻礙而放棄人物性格的刻劃，不用不合理的類型和俗套來迎合低級的情緒，這就是史劇！莎士比亞的史劇之所以不同於庸俗的鬧劇，除出前述的藝術家在歷史事件中所站的地位和所抱的心腸之外，這是最基本的，最訣要的地方。

三

祇要封鎖主義的毒藥還在中國發存，祇要人類的神頭領域還有須要淨化的積垢，我們就還有充分的權利和義務來發掘歷史的真實。「歷史是為詩人而存在的，歷史用戲劇表現出來，歷史轉化成了劇白」（Novais）

物與氣

陳家康

——馮友蘭先生「新理學」商兌之三——

一 先說「絕對底料」

馮先生企圖在他自己的頭腦中，建立一個與實際不同的宇宙。為了建立這個頭腦中的宇宙，馮先生把物與理離開。從實際中抽出理來，作為這個宇宙所依照的規律。同時又把物與氣離開。從實際中抽出氣來，作為這個宇宙所依照的基礎，或者說，作為造成這個宇宙的材料。在批評新理學第三章進與天道時，馮先生將對馮先生頭腦中的宇宙底作全面的檢討。在本章，我們只討論馮先生用以建立其所謂宇宙的材料，即「絕對底料」，即氣。

實際的材料，無法替馮先生建立頭腦中的宇宙。於是馮先生不得不在實際的材料之外，另覓其所謂「絕對底料」。何謂「絕對底料」？所謂「絕對底料」，有絕對相對之分。何謂「絕對底料」？馮先生說：「絕對底料，在柏拉圖，亞力士多德哲學中，謂之「質特」。此「質特」並非科學中及唯物論中所謂「質特」。科學中及唯物論中所謂「質特」即物質。此所謂「質特」則並非物質。若欲自彼所謂「質特」得此所謂「質特」，則至少須從其中抽出去其物質性。我們說：少，因為或者還有底性，須自彼所謂「質特」中抽去。所謂「質特」，本身無性。因其無一切性，故不可名狀，不可言說，不可磨滅」。馮先生又說：「這所謂「質特」，我們名之曰氣。此所謂絕對底料，我們名之曰真元之氣，有時亦簡稱曰氣」。以上俱見新理學第二章第一節。

由此可見：馮先生所謂「絕對底料」，所謂真元之氣，就是一個東西。然而，照馮先生的說法，這種料，這種氣，又不是一種東西。不是一種東西，究竟是什麼呢？答曰：這種料，這種氣，只是一個「邏輯底觀念」。何以見得？馮先生自己解釋說：「在我們的系統中，氣完全是一種邏輯底觀念，其所指既不基理，亦不是一種實際底事物。一種實際底事物，是我們所謂氣依照理而成者。」（見新理學第二章第一節）既然馮先生着重說明所謂氣完全是一種「邏輯底觀念」，因此，我們不能不首先在「邏輯底觀念」上來檢討

氣。

就馮先生的「邏輯底觀念」而言，氣無一切性。如有任何一切性，這就不成其為氣，不成其為「絕對底料」。然而馮先生不懂得任何「邏輯底觀念」都不能不有「性」。這就是說，在邏輯上找不出來「無一切性」的「觀念」。例如「無」，這是一個「邏輯底觀念」。所謂「無」是謂「觀念」究竟有性否？我答曰：如有「無」，則所謂「無」者，即有「有性」。如無「無」，則所謂「無」者，根本不能存在，也就不能成爲一個「邏輯底觀念」。今天所謂「無」者，既然能成爲一個「邏輯底觀念」，其當然明「無」有「有性」。以故在邏輯上找不出來一個沒有「有性」的「無」。如果「無」在邏輯上失去了「有性」，這個「無」便站腳不住。由此可見，邏輯上最基本的「觀念」不是「無」而是「有」。「有」的「觀念」比「無」的「觀念」更高一級。「有」的本身固然有「有性」，無所謂「無」者，也不能不有「有性」。有「有」，同時有「無」。因而我把「有」名之曰大有。至於「無」，我們只能把它當作「無彼有此」或者「無此有彼」來解釋。以上不過拿「無」來做一個極端的例子。

現在說到「氣」。馮先生認爲氣在邏輯上無一切性，這就違反了邏輯所謂「觀念」我出來了兩種「性」。讓我引用馮先生的一段話，然後加以解釋。馮先生說：「先說「未有無理之氣」，這是很易證明者。我們所謂真元之氣，無一切性，這就完全就邏輯方面說。就事實方面說，氣至少必有一「存在」之性，若無存在之性，它根本即不存在，氣若不存在，則一切實際底物，俱無有矣。氣若有存在之性，他即依然「存在」之理，他至少須依照存在之理，所以「未有無理之氣」。」（見新理學第二章第三節。）在這段話中，馮先生把邏輯方面與事實方面分成兩個毫無聯繫的層次。他在邏輯方面仍然堅持氣無一切性。我現在就從馮先生本人的理論中找出來氣有兩種「性」。

第一，氣不但在事實方面，而且在邏輯方面，必須有存在性。因為馮先生在上邊已經肯定有氣。既然有氣，就證明氣有「有性」，或者說有「存在性」。如無「有性」，如無「存在性」，氣在邏輯方面同樣不能存在。再者，馮先生認為「氣至少須依照存在之理」。但是，氣在依照存在之理時，必須已有存在之性。如無存在之性，則氣早就不存在，何以能夠依照存在之理。

第二，氣必須有依照之理。馮先生認為氣必須依照理，繼而如何如何。然而氣在依照理之時，必須已有依照之性。如無依照之性，怎樣能夠依照理。即使馮先生答覆道：「氣係依照『依照之理』，然終總能有依照之性。這仍是有解決他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我還可以追問，馮先生所謂氣如無依照『依照之理』之性，又怎樣能夠依照『依照之理』。」

氣既然在邏輯上至少非有這邏輯性不可，是見馮先生所謂氣無一切性，實在不能自圓其說。不過，我這種駁倒馮先生的辦法，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已。僅僅用這種辦法，還掃蕩不了馮先生邏輯思想上的差錯。以下我仍然從正面來說明馮先生思想方法的不妥。

馮先生的思想方法，每每拋開實際，專在邏輯上打算盤。所以馮先生特別注重所謂理智的分析。他把理智的分析與物質的分析之別，弄得毫無聯繫。他說過：「物質底分析，需將所分析者實際拆開，理智底分析則不需將所分析者實際拆開，且依其分析方法，亦不能將其所分析者實際拆開。」（見新理學第一章第二節）。固然，理智的分析不必將所分析者實際拆開。但是，理智的分析也不能將一種根本不能拆開的東西，任意拆開。氣與性，怎樣能夠勉強拆開。豈獨氣與性不能拆開，氣與質也不能拆開。沒有性之氣，沒有質之氣，在實際上已經不成其為氣。在邏輯上也未見得說得通。而馮先生其所以一定要拆開者，未嘗不是上了公孫龍謬堅白的大當。

也許馮先生感覺到了氣無一切性之說之不妥，所以他用一種問答體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馮先生說：「或有謂：一實際底物，即其所有諸性所合成。若抽去其一理性，則即成爲無，更無有可以爲絕對底料者。然若無絕對底料，則無以說明何以實際底物之能成爲實際。若專求所以然之理，不能有實際，上文曰：『理無氣則無掛搭處』，即說此義。」（見新理學第二章第一節）。這一節問答體的辯論文字可以分成兩段來看。自「或

有謂」至「更無有可以爲絕對底料者」，乃是馮先生自行設問。自「然若無絕對底料」至「即說此義」，乃是馮先生自行解答。問的是：如果「絕對底料是『無』」一切性，然則這種「料」豈不「即成爲無」。馮先生並未針對這個問題回答。馮先生並未回答，這種「無一切性」的「絕對底料」，或者說「氣」，由於甚麼理由能夠不「即成爲無」。馮先生回答的是：若無「絕對底料」，則將碰見「無掛搭處」的困難，則將碰見「無以說明何以實際底物之能成爲實際」的困難。這樣一來，就弄成了所答非所問。同時，「絕對底料」爲甚麼不「即成爲無」的問題，依然不得解決，首先，馮先生自己就「無能」加以解決。

既然馮先生微感感覺到了氣無一切性之說之不能盡通。爲甚麼又要提出不這種說法呢？我認爲馮先生的苦衷的確是要找着一個「掛搭處」。不過，他不願找着一個最實際的「掛搭處」。反之，他卻願找着一個最不實際的「掛搭處」。假使所謂「氣」，所謂「絕對底料」仍然有性，甚至仍然有質，就不免逐漸歸於實際。所以，他寧可冒邏輯上不能說得盡通的危險，硬要提出一個所謂「氣」來。

二 究竟成不成

馮先生在新理學第二章第一節中說過：「一實際底物，是我們所謂氣依照理而成者」。在這句話中已經提出了一個成字。在新理學第二章第二節（此節標題爲「道家所說之道」）中，對於生字與成字又加以區別。馮先生說：「我們只說，道家所說道，有似於我們所謂真元之氣，而不說他即是我們所謂真元之氣。因爲道家所說之道，在其自身，即能生萬物，而我們所說真元之氣，若無可依照之理，則不能成爲實際底物。道家所說之道，自身無性，而能使物有性，持有此道者，亦是對於實際有所肯定。」可見馮先生樂於用一個成字，而不樂於用一生字。何謂成了成字在馮先生哲學中可作造成解。馮先生只說理無造作，並未說氣無造作。用造成釋成字，也許不失馮先生的原意。所謂氣能成或者說能造成，但是離開了所依照的理，也不能有所成，有所造成，所謂氣必須依照理，纔能有所成，有所造成。根據「一實際底物，是我們所謂氣依照理而成者」的基本原則，足以證明馮先生認爲實際的物是由氣依照理而成的，而造成的。氣至少是非物質性的東西，因而，造成的物乃是而非物質性的氣依照理而成的，而造成的。這

樣一來，馮先生不啻替自己找了一個非物質的非實際的「掛搭處」。同時他還替物質找了一個非物質的根據，替實際找了一個非實際的根據。這一個根據便成了馮先生哲學的出發點。馮先生的哲學有兩個出發點。就「得到哲學之程序說」，馮先生「仍是以事實或實際事物為出發點」。(見新理學緒論第五節)。就馮先生的哲學系統，則以「氣」為出發點。氣依照理，就能成物，就能造成宇宙。

然則究竟成不成呢？究竟造成了物，造成了物呢？究竟造成了宇宙，造成了宇宙呢？我說不成，說造成了不成。因為馮先生又在邏輯上把物質與物質性兩個不同涵義的「觀念」弄混了。哲學上有一個比「性」更為重要的問題，就是「質」的問題。所以我們在哲學上，必須使用「物質」一名來代表實際。為甚麼以「物質」一名來代表實際，而不以「物性」一名來代表實際呢？因為質是物的內核，性不過是物的屬性而已。馮先生所謂「相對底料」，還不失為一種物質。例如他說：「磚及瓦有磚性及瓦性；又有其料，如泥土等」。又說：「泥土雖對於磚瓦為料，然仍是相對底料，而非絕對底料」。(以上俱見新理學第二章第一節)。足見馮先生仍認為性是性，料是料，並非毫無區別。再以泥土為「相對底料」而言，足見馮先生仍認為「相對底料」乃是物質。所謂泥土非物質而何。但是，馮先生誤以質乃性之組合，甚至誤以為質乃性之一種。何以見得？馮先生說：「科學中及性物論中所謂「質」即物質。此所謂「質」則非物質。若欲自彼所謂「質」得此所謂「質」時，則至少須從其中抽去其物質性」(見前引)。上兩句所說的是物質，下一句話也應當說抽去物質。為甚麼不說抽去物質，而說抽去物質性呢？足見馮先生把實際的物質，也當作一種性來處理。殊不知物質是物質，物質性却是物質性，兩個名詞的涵義並不相同。所謂物質性，並不等於物質。

當馮先生說「至少必須從其中抽去其物質性」一語時，他在邏輯上抽去了兩個觀念：一種是物質性的觀念，一種就是物質的觀念。但是，當馮先生所謂氣依照理而成甚麼甚麼時，他在邏輯上僅僅取回了一個觀念，即物質性的觀念。還有一個物質的觀念，始終無法取回。以致馮先生所謂氣依照理而成者，就是「性」而已矣。無論如何成不了質，成不了實際的宇宙。馮先生在「抽去物質性」的關鍵上，把實際宇宙與他的觀念宇宙之間的聯繫，一刀割斷。他把實際與觀念(或者實際)之間的橋樑，用自己的手炸毀了。他絲

毫不替自己的謬論打算。等到他再想回到實際時，他便遭遇沒有橋樑，不得通過的困難。他抽開了物質抽開了質，等到他需要質，需要物質，以便造成實際宇宙時，便再也不能取得質，不能取得物質。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馮先生說：「氣若不存，則一切實際底物，俱無有矣」(見前引)見馮先生認為氣的存在造成了實際的物的存在。然而，根據馮先生的理論系統，所謂的氣的存在及其發展，並不能造成實際的物的存在。這就是馮先生說「實際的必然結果」。

再者，馮先生所謂「成」與道家所說的「生」，到底有甚麼區別呢？我也研究了一番。我發現馮先生所謂「成」仍然是從道家哲學中取來的。本來馮先生的哲學接近於道家，特別接近於老子(此處係指今本老子一書中的老子)；至於今本老子一書是否老子其人所著，係另一問題)以及屬於老子一派的何晏王弼。而且馮先生還引用何晏的話來說明自己所謂「成」。他說「何晏道論云：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蹈之全焉。故能昭著而無氣物，色形神而無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此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列子天瑞篇注引)。「此所說完全可以說我們所謂「成」之氣」。(見新理學第二章第二節)但是，馮先生沒有把「夫道之而無語」與「道無名」引出來。我現在不妨引出來。何晏云：「有之為有，特無以多。事之為事，特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云云」(亦見列子天瑞篇注引)。「何晏所說「特無以成」便是馮先生採用成字的來源。馮先生所謂成就是「特無以成」。馮先生對於何晏郭象的解說本不加區別。所以當他有取於郭象時，雖不致流於崇無賤有。然而，當他有取於何晏時，就接受了所謂「特無以成」的老子基本思想。這種由老子一書開端而由何晏王弼郭象助瀾的「特無思想」，在魏晉當代，早已有人反對。反對者中有一人曰裴頠。晉書裴頠傳云：「悠悠之徒，解乎若茲之費，而尋規乎所緣，察乎偏質弊者，而規備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魏晉當代，都有人反對，何況我們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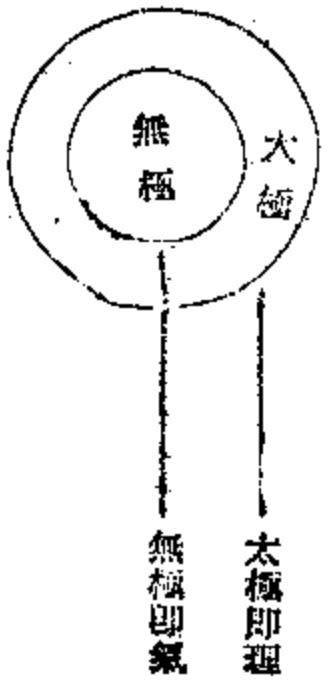
三 兩重宇宙

馮先生的哲學中，有兩重宇宙：一重是實際的宇宙，一重是觀念的宇宙或者說實際的宇宙。馮先生身在實際的宇宙之中，而心在觀念的宇宙之外。馮先生沒有辦法把這兩個宇宙聯繫起來。不過馮先生既然脫離了實際的宇

由而乘於浮於真際的宇宙之中，我們也只好跟着把這個真際的宇宙考察一番，看看它究竟如何。

馮先生的觀念的宇宙，有兩個極。一個是太極，一個是無極。馮先生說：「我們的系統所講之宇宙，有兩個相反底極，一個是太極，一個是無極。一個是極端地清晰，一個是極端地混沌。一個是有名，一個是無名。每一普通底名詞皆代表一類，代表一理。太極是所有之理。所以所有之名，無論事實上已有或未有，皆為太極所蘊蘊。所以太極是有名而無極是無名。由無極至太極中間之過程，即我們的事實底實感世界。此過程我們名之曰「無極而太極」。○（見新理學第二章第三節）。據此，則知馮先生的觀念宇宙，乃是太極與無極而已。

馮先生的觀念宇宙中，雖然有「太」一「無」一兩極。不過，馮先生仍以太極為主，而不以無極為主，也就是說：仍以理為主，而不以氣為主。馮先生說：「『未有無氣之理』，此語不能理解為凡理皆有氣。如此則凡理皆有實際底理，即無具有真而無實之理。此語只是說：『必有些理有氣』，或『未有所有底理皆無氣』。○（見新理學第二章第三節）。據此，則馮先生在這一方面是認「有些理有氣」，在另一方面必然承認「有些理無氣」。說得更清楚一點：有氣者必有理，有理者不必有氣。理是太極，氣是無極。以故，有無極者必有太極，有太極者不必有無極。太極與無極的關係，根據馮先生的說法必然如下圖所示。



據此圖所示，可以推知馮先生心目中太極和無極的關係，與真際和實際的關係，恰相符合。假使有太極必有無極，那末，不免「即無具有真而無實之理」。然而，馮先生甚極都不追求，他竟要追求這一個「只有真而無實之理」。所以，馮先生的新理學必定叫做新理學，而不能叫做新氣學。既然，「未有無氣之理」，不能解釋為凡理皆有氣，那末，當然還有無

氣之理，或者說，還有無「無極」之太極。這種無氣之理，這種無「無極」之太極，便是馮先生觀念宇宙中最高境界。馮先生認為這種最高境界，不僅可以脫離實然而單獨存在，甚至可以脫離他自己所謂所謂無極而存在。所以，我說馮先生的觀念宇宙中，仍以太極為主，而不以無極為主。如果沒有「無極」，並不礙事。因為沒有「無極」，其實還不過在於無所據而據成實罷了。這與太極之仍為太極，實際之仍為實際，理之仍為理，毫無關係。即令實然完全消滅了，即令氣完全消滅了，然而馮先生之太極，之真際，之理，依然松柏長青。

正因為馮先生的宇宙以理為主，不以氣為主，所以，他反對氣一元論。中國哲學上的氣一元論也有幾種，未可一概而論。例如董仲舒的氣一元論，便毫無可取之處。相反，張橫渠的氣一元論，則可取之處甚多。至於馮先生反對氣一元論的目的，却在於氣一元論不能把真與實實際際開。真與實如果不與實實際際開，就要受實實際際約束。馮先生為了不肯受實實際際約束，為了離開實實際際而追求一個所謂真際，乃不得不反對氣一元論。馮先生說：「假使有主張所謂氣一元論者，我們須先問：其所謂氣是否我們所謂真元之氣？若我們所謂真元之氣，則所謂氣一元論者，根本即不通。因我們所謂真元之氣，乃是絕對底料，料只是料，若無所依照之理，料根本不能為實底物」。○（見新理學第二章第四節）。據此，馮先生不主張氣一元論。馮先生不主張氣一元論，但也不能堅持理一元論。因為有理而無氣，理畢竟成了不了他的觀念宇宙。這樣一來，馮先生的哲學就只能說是理氣二元論。用馮先生受用的名詞說，就是理氣二極論。

馮先生理氣二元論的新理學是承接程（此處係指程頤），明道稍有不同。朱理氣二元論的發源而來的。程朱的理氣二元論乃是心物二元論。朱子說「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文集卷五十八答黃道夫書）。這種理氣二元論，當然是心物二元論。馮先生想跳出心物二元論的窠臼。於是，他把程朱所謂氣改變一下。程朱作形上（心）形下（物）之分，馮先生不作程朱式的這一修正，就把心物二元論的舊理學一變而為純粹唯心論的新理學。不幸，仍然拖着一條心物二元論的尾巴。因為馮先生所謂氣本身是唯心論，却硬說成是唯實論其為唯物論。氣非非物，却硬說成是唯心論。馮先生的觀念宇宙還有兩

個極。一個極是太極，是理，是心。一個極是無極，是氣，是物的影子。這
豈不仍是心物二元論的老套。所以馮先生這氣二極論的哲學系統並不稀奇，
不過是由心物二元論改造而成的純粹唯心論而已。

四 說到王船山

馮先生在新理學第二章第四節中，說到了王船山。他說：「有一真五底
問題。即王船山所提出關於所謂道器先後之問題。王船山以為『無其器則無
其道』。他說：『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
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周易
外傳卷五）。船山此言，如係謂未有弓矢，即無射道，則自無可爭論，如係
謂未有弓矢，即無射道，而所謂道，若是指理之實現說，則亦是我所主張
者。未有弓矢，則射之理未得實現，自然無射道。但如指道，乃指理之本
身說，則無其器則無其道之說，是我所不能承認者。即無其器而無其道之
說，則無弓矢即無弓矢之道。如此則則射弓矢者，不但創製實底弓矢，並
射弓矢之理，而隨其創製，則射弓矢之理即所以為射弓矢者，若謂創製
之物，不合乎射弓矢之理者，則即非射弓矢。所以我們主張射弓矢之理，是
有底。創製弓矢者，我主張其理，彼則以射弓矢之理，不必有弓矢，因
可無創製弓矢者發現之。但有弓矢即必有射弓矢之理，因製弓矢者，必有所
依照者可以製弓矢。』（見新理學第二章第四節）。王船山的道器論，乃是
即重器論，即器道論的進路論，並非非道後論的進路論。這一點，馮先生駁
不謂船山。宇宙未有無理之物，亦未有無物之理。理物不二，以故船山認為
道器不二。如有人在強後器先，我們必反對。可惜作如此主張者不是船
山，以致馮先生的批評，沒有着落。

再進一步研究：船山所謂器就是物。我們也用器這個名。但不用以表示
大有之物之全部，僅用以表示大有之物之一部而經過大細加工製造者，其未
經過大細加工製造者，我們仍謂之物，而不謂之器。以故，物就是自然之物
，器就是生造之物。人之所以為人，處在於以物作器。人之所以為人，就
在於根據自然之物之理從而創發生造之物之理。馮先生說：「理若何可以創
製？」（見前引）。我們的回答是：自然之物之理，不能由人創製。但是生
造之物之理，則係保人創製自造之物之理而創製者。以故，創製弓矢者，

不但創製了實際的弓矢，同時，並創製了所謂以爲弓矢之理而亦發現之。人的
能力，不僅在於製器，而且在於發現製器之理。馮先生就誤了這種觀
力。

五 從無非物之氣

中國哲學上所用的「氣」字，大多數可作物質的氣解。所說大多數者，
也許還有少數可作精神所用的氣字不作物質的「氣」解。如果不作物質的「氣」
解，必作非物質的「氣」解。所以，對於「氣」，始終只有兩種解釋，一
種物質的氣，一種非物質的氣。基本上沒有第三種解釋。至於，我們當然把
氣字，當作物質的「氣」解，並且認為：

氣乃物之一種形態，從無非物之氣。

我們既然認為氣乃物之一種形態，因此，我們對於肯定即氣理，即理
即氣。理氣不二。所謂理氣不二者，也就是理物不二。我們的宇宙，
具有一重，此理即此宇宙，此即此理與實際相融不相外的宇宙。這宇宙就
是我們的。如果說宇宙非不滿意人，我們說這人力改變它。我們用不着從這
個物的宇宙逃離出去，而另覓一個不滿意人（既不滿意又不滿意）的宇
宙。

六 陽對自己，也對他人；陰對他人，不對自己。

陰對他人，不對自己。

馮先生不着邊際的宇宙中，除了太極無極兩外，又有陰陽。陰陽出於
動靜。馮先生說：「我們所謂動靜陰陽，在事實上就是對於一物說。由此方
面看，則所有動靜陰陽，就是相對區」（見新理學第二章第六節）。馮先生
所謂相對者，係就對外而言，不是就對內而言；係就此物對他物而言，不是
就此物對本身而言。如就此物對此物本身而言，一概都是陽，無所謂陰
。如就此物對他物而言，則此物始有所謂陰陽。所謂此物者，可能依照動之
理而有陽性；此陽性對此物本身發生助成自己存在之作用。同時，也可能對
此物之外的他物，發生助成其存在的作用。其次，所謂此物者，又可能依照
靜之理而有陰性。但此陰性只對此物之外的他物，發生阻礙他人存在的作用
，却不對此物本身發生任何阻礙自己存在的作用。陰陽作用之不同如此。

這只有拿馮先生所舉的實際例子來說明。他說：「例如此房子所依據以成其房子者，有瓦力士多德所謂質因及力因，質因如磚瓦等，力因如工程師及工匠之努力等。此二者雖有分別，但皆是依照房子之理以便此房子成爲房子者，所以對於此房子皆是其氣之動者，皆是其陽。凡是使此房子能存在者，無論在其本身之內或其外，對於此房子，皆是其氣之動者。對於此房子說，其氣之動者，即是與其氣之動相對而阻礙之者，例如風雨之消蝕者。風雨之本身，雖亦是動底，但對於此房子說，他是阻礙此房子之存在者，所以對於此房子說，他亦是其氣之靜者。我們說他是靜底，是從房子存在之受阻礙之觀點看。若從風雨能破壞此房子說，則是從風雨之本身之觀點看，如此看則風雨是動底。一切底事物，若從其本身看，皆是一動，若從受其影響之事物看，則或是一動，或是一靜，視其所與其所影響之事物之影響，是助成其存在，或阻礙其存在，而定。」（見新理學第二章第六節）。

看了這極實際的例子，我們纔懂得馮先生的用意。風雨是氣之動者，是陽。同時，風雨又是氣之靜者，是陰。風雨是陽，係對風雨自己而言。風雨是陰，係不是對風雨自己而言，乃是對房子而言。這就叫做陰對他人，不對自己。正因為陰對他人，不對自己，所以一物之本身，即其內部，並無陰陽的動靜。根據所謂「一切底事物，若從其本身看，皆是一動」的原則，則此物之存在之所以受到阻礙，都是由於遭受了外來的阻礙。此物自己決不會阻礙自己，此物自己決不會毀滅自己。我們想下有一句話，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馮先生這話對自己也對他人，陰對他人，不對自己，的陰陽學說，恰好運用了我們想下所謂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原則。

在馮先生的觀念宇宙中，陰與陽的聯繫，都是外在的聯繫。何以見得都是外在的聯繫？因爲，馮先生專在兩個物之間的外在聯繫上講陰陽，而不是從一個物之內在聯繫上講陰陽。馮先生認爲一物既可依照動之理而有陽，又可依照靜之理而有陰。陽陰集於一身而無衝突。馮先生說：「一物亦依照動之理，亦依照靜之理，而無衝突，其所以不衝突者，亦因其是動底或是靜底，不是自一觀點看也。」（見新理學第二章第六節）。所謂不自一觀點看者，即不自一物之內在聯繫看，如自一物之內在聯繫看，則陰陽非衝突不可。此馮先生之所不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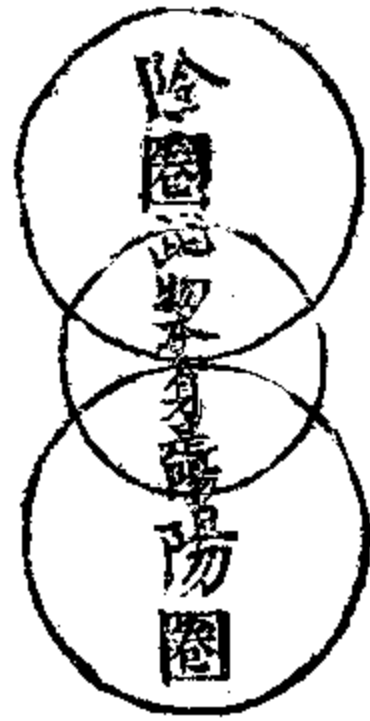
我們與馮先生不同。我們並不反對在兩個物之間的外在聯繫上看問題，

但是必須先從一個物之內在聯繫上看問題。這就是說，先看內在而後看外在。一般人對於內字，最難了解。無窮之大，謂之大內。大內之內，至於無窮。無窮之小，謂之小內。小內之小，亦至於無窮。無窮不害大者。任何一物都有一內，或爲大內，或爲小內，或爲較大之內，或爲較小之內，或爲最大之內，或爲最小之內。任何一小內之內都有生滅的兩部份，或者說，新舊的兩部份。方生方滅，方滅方生。方新方舊，方舊方新。所以，在任何一物（即一小內）之內，都有其定本身存在之生的新的部份。也都有否定其本身存在之滅的舊的部份。這兩種相反的部分是對立的。然而，此兩部分，就在此一物之本身，之內部對立起來。馮先生認爲：「一切底事物若從其本身看，皆是一動。」（見前引）。這就是，若就一切物的本身，具有生，也只會生，沒有滅，也不會滅。自己毀滅自己，自己否定自己的事情，在馮先生看來，是決不會有的。至於毀滅他人，否定他人，則是陰的唯一作用。馮先生所謂陰陽，便是如此。

七 成盛毀滅與外來的陰陽

再者，所謂陰陽，在馮先生看來，乃是一切變化的原理。一切變化，在馮先生看來，又與經過成盛毀滅的四種階段。馮先生說：「我們常說及一物之盛衰，或一物之成毀，若將此四字聯合用之，則可說一物之存在有成盛衰毀四階段，相當於所謂成住壞空。」（見新理學第三章第七節）成盛衰毀，謂之四象。四象不過是陰陽的消長而已。成盛毀滅，就是陰陽的消長。

然而，所謂陽者有兩種：有本身之陽，與外來之陽，根據前引「無論在本身之內或其外，對於此房子皆是其氣之動者」一語，即可明白。所謂陰者，只有一種，有外來之陰，而無自己否定自己之陰。就一物而言，此物本身是陽。在此物之外，有對此物助成其存在之陽，如果陽多了，就構成一個陽圈。在此物之外，有對此物阻礙其存在之陰，如果陰多了，就構成一個陰圈。馮先生說：「每一物皆有其陰陽與其陽陰，兩圈中之物，又各有其陰與陽。如此重重無盡，頗有似於華嚴所謂因陀羅網境界者。」（見新理學第二章第六節）。如說馮先生的原意，並按所謂「成」的階段，作圖一圖，此圖如下：



據此圖所示。一物除就其本身而言皆是一陽之外，還有外來的陽與陰。而一物之變化，便按照外來陽與陰之消長而定。一切消長，特別是消，完全由外來的陰陽而決定。

馮先生說：「我則用一之符號，表示一事物之陽，用二之符號，表示一事物之陰。以二，二，二，二，二之符號，表示一事物存在之四階段相當之陰陽變化。二是少陽；於此階段，有陰未克陽，但陽正在增長，故畫陽於下。○（易卦畫皆自下向上看，在下表示增長之意）。此是一事物之陰陽，在其成長之階段所有之變化；亦可說，一事物之陰陽，若在此種變化，此事物即入成之階段。二是太陽；於此階段，陰已完全克陽。此是一事物之陰陽，在其成之階段所有之變化；亦可說，一事物之陰陽，如有此種變化，則此事物即入盛之階段。二是少陰；於此階段，陰對於陽之阻礙又顯著，陰有力，故畫陰於下。此是一事物之陰陽，在其衰之階段所有之變化；亦可說，一事物之陰陽，若在此種變化，則此事物即入衰之階段。二是太極；於此階段，陰陽，在其變完全為其阻礙所消盡，此即是說，此物已不存在。此是一事物之陰陽，在其變之階段所有之變化；亦可說，一事物之陰陽若在此種變化，則此事物即毀。一事物之陰陽之變化，自少陽至太陽是「息」；自少陰至太陰是消。程朱又以自少陽至太陽名曰「變」，自少陰至太陰名曰「化」。（見《論理學第二章第六節》）。

馮先生所謂消息，所謂變化，非常簡單，不過說得神祕，其實並不神祕。馮先生的基本理論，便是陽與陽相生，陰與陽相滅。所謂成毀衰毀四階段，便是陽生陽，陽滅陰，陰滅陽而已。馮先生一旦忽見兩個對立之物，一方面彼此相生，另一方面又被此相滅，他便無法解釋。因為他沒有說過，陰能

滅陽，又陽生陽，陽能滅陰，又能生陰這一個話。大有之中的事物，都是相成相成，相滅相生的。統一於一個大內或一個小內之內的兩個對立之物之間既相相反，又要相成，這種叫做矛盾的統一。既相相成，又要相反；這種叫做矛盾的統一。統一於一個大內或一個小內之內的兩個對立之物之間，既相相成，又要相成，這種叫做矛盾的統一。既相相成，又要相反；這種叫做矛盾的統一。如果兩個對立之物之間，僅僅只有相成而無相反，那就該它們相反好了，還有什麼矛盾之中之矛盾。如果兩個對立之物之間，僅僅只有相反而無相成，那就該它們相反好了，還有什麼矛盾之中之矛盾。然而，相反相成也不是循環的，等到對立之物之一方能够完全掌握相反，而無所謂相成時，這個矛盾就能解決。相生相滅，亦復如是。因此，馮先生所謂陽生陽，固然無內在的統一。所謂陰滅陽，陽滅陰，也無內在的矛盾可言。總之，馮先生取消了實際宇宙中內在的統一與矛盾。以致在他的觀念宇宙中，僅僅只有簡單的「助成」與「阻礙」而已。

馮先生所謂成毀衰毀的最後一個階段是毀，是完了。最多不過再來一次循環。對於我們的宇宙，多麼消極，多麼悲觀。這就是老莊哲學的寄處。我們不然而。一句話，相成相生。舊的不滅，新的不生。我們所需要的是新生，不是滅。

三色套版西道林紙精印

蘇德戰爭形勢圖

每幅定價十元

外埠加郵一元五

新華日報館總經售

列寧論托爾斯泰 (其一)

戈爾權譯

在列寧論文學及俄國作家的文字中，他所寫的篇幅論托爾斯泰的文字，可算最豐富的文字了。他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用正確的觀點，去估量托爾斯泰。大體上說，同時也會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去接文他的思想及作品。托爾斯泰一方面，而去否定了反動的一方面。在「萊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這篇文字裏，他這樣說道：「假如站在我們對面，那是一位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家，那裏他至少應當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來。」。但列寧本人並沒有說托爾斯泰的思想是絕對的無限制性，他明確地指出了那些可以從他的作品學引出來，並且是對於社會主義運動含有鼓勵性的東西。他在「托爾斯泰與無產階級的鬥爭」的這篇短文中，則更這樣明確地指出：

「研究托爾斯泰的藝術作品，俄國的工人階級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敵人，而批評托爾斯泰的學說時，俄國人民將會了無遺憾；他們的觀點是在什麼地方，這個觀點不應他們將自己解放的事業推遲到底。為了要前進，就應該了解這一點。」。

列寧論托爾斯泰的文字，根據一九三五年版的「列寧全集二三版索引」，除散見於各文中之不計外，能成爲專文的共有六篇，這就是：

(一)「萊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一九〇八年九月，見「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三三三——三三五頁。

(二)「L. N. 托爾斯泰」，一九一〇年十一月，見「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四〇〇——四〇三頁。

(三)「L. N. 托爾斯泰與現代工人運動」，一九一〇年十二月，見「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四〇四——四〇六頁。

(四)「托爾斯泰與無產階級鬥爭」，一九一〇年十二月，見「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四〇七——四〇八頁。

(五)「「覺醒」的英雄」，一九一〇年十二月，見「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五〇——五四頁。

(六)「L. N. 托爾斯泰及其時代」，一九一一年二月，見「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一〇〇——一〇三頁。

此外在「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九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卷，第十六卷，第十七卷，第二十八及第三十卷中，都有關於托爾斯泰的片斷的文字。

講到這些文字被介紹到我國來的情形，要從手邊所有的參考書，大概最早的是何畏所譯的「俄國革命底鏡子」的萊夫·托爾斯泰」，發表在一九三〇年的「新力雜誌」上。穆爾克又譯了「L. N. 托爾斯泰」，「L. N. 托爾斯泰與他的時代」，「L. N. 托爾斯泰與現代的勞動運動」等三篇文章（根據自譯本重譯的），加上何畏的譯文及普列哈諾夫的幾篇文字，編成了一本「托爾斯泰論」，於一九三三年出版。

一九三六年時，又有趙夢芳的譯文出現了，共譯了「托爾斯泰，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托爾斯泰之死」（即「L. N. 托爾斯泰」），「托爾斯泰與近代的勞動運動」三篇文章，是根據英文譯的，編在「恩格斯等論文學」中，上海亞東版。

在同一年中，許又復對社稷的「海上森林」出版了，在上卷「森林」中，載了羅秋白的兩篇譯文「列寧·托爾斯泰像一面俄國革命的鏡子」，「L. N. 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並附譯了羅克拉茨基的註解，這都是根據俄文譯的。

一九四〇年延安的「魯藝叢書」中，出了一本「馬恩列論藝術」，其中載了曹葆華根據英文譯出的「托爾斯泰·俄國革命的鏡子」，「論托爾斯泰之死」，「托爾斯泰與現代工人運動」，「托爾斯泰與他的時代」一文則是借用「海上森林」的譯文。

當一九四一年，我譯了「托爾斯泰與無產階級的鬥爭」，曾載「新華」及「文藝陣地」的六卷一期中。此外又有蘇凡根據俄文所譯的「列寧論托爾斯泰及其時代」及「天

根據英文所譯的「列寧論托爾斯泰與近代工人運動」，俱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第三四兩合刊的「中蘇文化」中。

這許多譯文，在文字及語句上各有出入，其中覆秋白的譯文，是據俄文直譯的，也就更接近原文了。我現在因為許多文章，差不多已成為論托爾斯泰的經典的和文獻式的文字，同時更爲了研究托爾斯泰的創造及思想以及研究列寧論文學的文字起見，所以就不厭其煩地做了一個重復的工作，將這許多文字根據俄文原文再度編譯出來。因爲這個工作是在前面的許多譯文之後，所以我就能參考了各種譯文，採取了其中不少的優點及字句，並且能加上詳細的註解，好使我更容易了解這些文字的原意。

這一次所介紹的，是列寧所寫的一篇最早的文字：「萊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這篇文章係作於一九〇八年九月，最初發表於當年九月十一日（新曆二十四日）第三十五期的「無產者報」上。此地的譯文，則是根據「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的原文譯出的。

六卷本的「列寧選集」的編譯者亞它拉茨基，在這篇文章的註解中這樣寫道：

我選這篇文章，是「爲的要表示列寧怎樣一貫地應用唯物辯證法，來考察社會生活的最複雜的現象之一——藝術的文學。」

「這篇文章的原因，是托爾斯泰的八十歲壽辰（一九〇八年）。」爲着這壽辰，政府派和自由派的刊物，充滿了許多關於托爾斯泰的論文。自由派的資產階級，無限制地把他托爾斯泰理想化起來，不把他當做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而且還當他是個思想家和導師，說他是俄國以來的社會政治的預言家。

「如果以前，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整個反動的出版界加緊的辱罵托爾斯泰，當他是現存制度的惡毒而有害的批評家，無神論者等等，那末，現在，在革命之後，這些個反革命向出版界都恭維托爾斯泰，當他是純潔的無可非難的道德家了；自由派的資產階級竟恭維托爾斯泰的事實是最高的理想，——而無這嘲諷說不應當有革命，因爲革命是粗魯的強暴力量。」

這也正如列寧所說：「他們假借這個有名望的名字，是爲了增加他們自己的政治資本，是爲了要扮演全國反對派的領袖的脚色」，而用

情和喧嘩的調劑，來掩蓋了托爾斯泰主義中的一切矛盾和弱點。只有列寧才正確地估量了托爾斯泰，說他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在他的身上反映出俄國社會與俄國革命的整個弱點與矛盾。

當編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參閱了幾種譯文，發現在覆秋白的譯文中遺漏了一句話。列寧的原文這樣寫道：「想要徹底掃除官辦的教會，地主和地主的政府，消滅所有土地私有的舊形式和舊制度，消除地租，建立起一種自由平等的小農的共同生活來代替警察的階級的政府，這種願望，正像一條紅線貫穿了我們革命中的農民的每一個歷史步驟」（加邊點者，爲覆氏遺漏之字）。

但是覆秋白的譯文變成了：「想徹底掃除官辦的教會，地主，以及地主的政府，消滅一切土地佔有的舊方式和舊秩序，消滅這種思想，像一條鮮明的線索似的，貫穿著我們革命之中農民的每一個步驟」（見「海上述林」上卷第二四六頁到第六行起）。

又「海上述林」上卷第二四七頁到第六行，有這樣一句話：「這就永久是那樣的了」，這句話按照原文譯出來，應該是：「而且正像在這情形之下所常有的情形一樣」，證之其他幾種譯文，也覺得是覆氏的譯文稍有錯誤，現特順便指出來。——譯者

萊·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

把這位偉大的藝術家的名字，和他所隱然沒有了解的革命，和他所隱然避開的革命並列在一起，初看起來，這似乎是顯得奇怪和勉強的。分明不能正確反映現象的東西，怎樣叫它是鏡子呢？但是我們的革命——是一個異常複雜的現象；在這個革命的直接的實行者及參加者的羣衆當中，有許多社會成份，他們雖然沒有了解發生了的事實，也避開專變的過程在他們面前所提出的真正的歷史任務。假如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家，那麼他至少應當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來。

俄國合法的出版物，都充滿了紀念托爾斯泰八十誕辰的論文，信箋及紀念等（註一），可是却極少有人有興趣從俄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動力的觀點，來分析他的作品。所有這些出版物都充滿了令人作嘔的虛偽，兩種形式的虛偽：官方的和自由主義的。第一種虛偽，是那些被收買了的文人的粗魯的虛偽，他們昨天還奉命要迫害工·托爾斯泰，而今天呢——却在托爾斯泰身上發

現了愛國主義，並企圖在歐洲的前面維持自己的體面。至於這一批文人之受了金錢來寫文章，這是人所共知的，他們是搖擺不了任何人的。比這更虛偽更加巧妙，因此也就更加有審判和更加危險的，這就是自由主義的虛偽。聽一聽「言辭報」裏面的立憲民主派的吹鼓手們的話吧，（註二）——他們對於托爾斯泰的同情是最充實而最熱烈的。實際上，他們對於這位「偉大的精神主義者」的那篇阿諛的宣言和堂皇的詞句，只不過是種完全的作偽，因為俄國的自由主義者既不和托爾斯泰的上帝，也不同情托爾斯泰對於現存制度的批評。他們假借這個有名望的名字，是為了增加他們自己的政治資本，是為了要扮演全國反對派的領袖的角色，他們想用這等喧嘩的詞句，來掩沒了對於下面這個問題作直接和清楚的要求，這個問題就是：「托爾斯泰主義」應有的助著的作用是什麼？並且這些矛盾表現出我們革命黨的一些什麼缺點和弱點？

托爾斯泰的作品、觀點、學說和學派中的矛盾——實是顯著的。一方面，這位天才的藝術家，不僅給俄國的生活作了一些無與倫比的圖畫，而且也供給世界文學以頭等的作品。另一方面，這是一位狂信基督而變得癡呆了的地主。一方面，對社會的謊言和虛偽作了非常之有力的、直接而真誠的抗議；另一方面，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這就是一個疲憊的、歇斯地里的在泥濘中打滾的人，是所謂俄國的知識份子，他大庭廣眾地運着自己的胸臆說道：「我壞透了，我糟透了，但是我正在實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我再不吃肉了；我現在只穿麻布衣服。」一方面，他清楚地批評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暴露出政府的腐敗、法庭和國家管理機關的滑稽可笑，揭示出在財富增加和文明的成就與工人羣衆的貧困、野蠻和苦痛的增加之間的矛盾的深度；另一方面，熱烈地宣傳「對於惡的無抵抗」，對於強暴的無抵抗。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揭穿了任何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宣傳世界上「一種最討厭的東西，這就是：宗教，企圖拿真有道德確信的神甫來代替官方的神甫，這就是對套出一種最巧妙的，因而也是特別惡劣的種神主義的的確：

「你既貧窮，你又富足，
你既強壯，你又無力，

——我的俄羅斯的母親呀！」（註三）

在這些矛盾之下，托爾斯泰絕對不能夠了解工人運動和它在為社會主義

而鬥爭中的作用，也不能夠了解俄國革命，這自然是清楚明白的。但是托爾斯泰的觀點和學說中的這些矛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中俄國生活所處各種矛盾條件的反映。宗法社會的農村，昨天剛剛從農奴制度之下解放出來（註四），現在又完全交給資本和國庫的手掌來剝削了。農民經濟和農民生活的腐爛，那些的確確地維持了好幾百年來的舊制度，是非常迅速地崩潰下去了。因此，托爾斯泰觀點中的矛盾，不啻專從現代工人運動和現代社會主義的觀點去估量（這種估量當然是必要的，但這還是不夠的），而應當從那種對於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的抗議出發，和那種對於羣衆的破產及喪失土地的抗議出發去估量，這種資本主義是必然從宗法社會的俄國鄉村中產生出來的。托爾斯泰之所以可笑，是在於他是一個發現了拯救人類的新藥方的先知，——因此，那些想把他最弱的一方面變成教條的外國的和俄國的「托爾斯泰主義者」，是更加可憐了。托爾斯泰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表現了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來到的時候俄國成千百萬農民中所形成的思想和情緒。托爾斯泰是獨創的。因為他的觀點的總和，整個說起來雖然是有矛盾的，它恰好表現出我們革命黨是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種種特點。在托爾斯泰的觀點中的矛盾，從這個觀點來看，——的確是我們革命黨中的農民的歷史行動所處的許多矛盾條件的一面鏡子。一方面，幾百年來的農奴制度的壓迫和幾十年來的改革時期之後的加速破產（註五），聚集起如山的憎恨、怨怒和革命的決心。因此，想要徹底掃蕩官方的教會、地主和地主的政府，消滅所有土地私有的舊形式和舊制度，消除地租，建立起一種自由平等的農業共同生活來代替警察的殘酷的政府，——這種願望，正像一條紅線貫穿了我們革命中的農民的每一個歷史步驟，並且毫無疑問的，托爾斯泰的著作的思想內容，與其說是適合於那有時被估量為他的觀點「系統」的抽象的「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不如說是更適合於這種農民的願望。

另一方面，農民雖然期望着新的共同生活的方式，然而，他們却依然還是想不自覺地，用宗法社會和農奴的態度來觀察這些問題；這種共同生活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應該用怎樣的鬥爭來為自己爭取自由呢？在這種鬥爭中他們應該有怎樣的領導者呢？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對農民革命的利益又是採取什麼態度呢？為什麼為了消滅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就必需用暴力去推翻沙皇的政權呢？農民的過去的全部生活，都教會了他們去憎恨老爺和官

更，但沒有教會他們，並且也不能教會他們在什麼地方能對所有這些問題的答覆。在我們的革命運動中，小部分的農民與實地鬥爭過，甚至多少爲了這一個目的把自己組織起來過，而且有極少數的一部分，曾經手執過武器去掃除他們的敵人，消滅沙皇的奴才和地主的護法者。大部分農民則是哭泣着，祈禱着，發着憤和夢想，寫請願書和這派「請願代表」，——這完全是符合萊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的精神的！而且正像在這這些情形之下所常有的情形一樣，托爾斯泰式的避開政治，托爾斯泰式的拒絕政治，對政治不感興趣和不懂，就使得只有少數的人跟着覺悟的和革命的無產階級走，而大部分的變成那些無原則的、無恥的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的戰利品，這批知識份子，就在立憲民主派的名義之下，使勞動派的會議一直奔跑到斯托雷賓的門房裏去（註六），哀求，討價還價，講和，答應可以和解，——直到丘八的靴子把他們踢出來爲止。托爾斯泰的思想，這是我們農民運動的弱點和缺點的一面鏡子，是宗法社會的軟弱性和「經濟的地下化」的平庸愉快的一個反映。

拿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的兵士起義來說吧。我似乎革命裏的這些戰士的社會成份——是介於農民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無產階級是佔少數；因此在軍隊裏面的運動，沒有表現出像無產階級所表現的那種全俄的團結性，那種黨性的覺悟性，——而無產階級在一羣手之間就變成了社會民主黨的，而在軍隊裏面甚至連一點相近的軍方都沒有。另一方面，說兵士起義的失敗的原因，是在於沒有軍官的領導，這是一面再錯誤也沒有意見了。相反的，自從「民主黨」以來的革命的巨大的進步（註七），正是因爲那些拿武器來反對長官的人是「灰色的畜生」，他們的獨立行動已嚇壞了自由主義的地主和自由主義的軍官；兵士們是完全同情農民的事業的；只要一提起土地的時候，他們的眼睛就燃發亮了。軍隊中的政權會不止一次地轉移到兵士羣衆的手中，——但他們差不多沒有一次堅決地利用過這個政權；兵士們動搖着；過了幾天，有時候只過了幾小時，他們殺死了某一個痛恨的軍官，把其餘被捕的人都釋放出來，進而就去和當局談判，然後站好來給人家檢校，睡下去給人家鞭打，再重新帶起被奴役的車輛，——這完全是符合萊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的精神的！

托爾斯泰反映了那痛心的憤恨，那對於生活得更好的成熟了的願望，那要憑從過去擺脫開的志願，——也反映了未成熟的幻想、政治上的缺乏訓練

和革命的軟弱。歷史經濟的條件，說明出羣衆革命鬥爭發生的必然性，同時也說明出他們對於鬥爭沒有準備，以及托爾斯泰式對於惡的無抵抗，是第一革命鬥爭失敗的最嚴重的原因。

平常說：打了敗仗的軍隊會好好學習。當然，把革命階級和軍隊相比較，這只有在一定限度的意義之內才是正確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每一個階級都引起許多條件的變化和尖銳，這些條件推動了幾千百萬的農民在仇恨地主、農奴主及他們的政府的情形下團結起來，去實行革命民主主義的鬥爭。在農民自身中間，因交易的增長，市場的統治和金錢的勢力，是更加排斥了宗法社會的古董和宗法社會的哲學思想。但是革命的兩派爭和在羣衆的革命鬥爭之中最初的失敗，毫無疑問的是一種成績的：這就是羣衆以前的散漫性和軟弱性過受到一種致命的打擊。界線的劃分是更加明顯了。階級和政黨的開始分辨出來了。在斯托雷賓的教訓的鐵槌之下，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不斷的堅強的鼓動之下，不只是在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中，甚至就是在民主主義的農民羣衆中，也不可免地產生出許多更加堅強的戰士，他們是不至於再掉到我們的托爾斯泰主義的歷史罪惡中去了！

——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附註

（註一）托爾斯泰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蘇歷是九月九日）生於圖拉縣附近的雅斯拉亞·波里亞拉。一九〇八年正好是他八十歲的誕辰。

（註二）「哥爾察」（Golts）是立憲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參加編輯者有米留科夫等人，出至一九一七年爲止。

立憲民主黨的俄文名稱是「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係從「立憲」、「民主」這兩個字的頭兩個字母K、D變成的。這是俄國自由主義的大地主、大資本家及知識份子所組成的一個黨派，成立於一九〇五年十月，綱領中主張建立一種「英國式」的議會君主制。此黨後與沙皇政府妥協，自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則成爲反蘇維埃政權的黨派之一。

吹鼓手的原文是Balalaika，係自Balalaika一字而來，原意是俄國特種的一種三角形的頗有些像「吉他」的絃樂器。我此地把它譯成「吹鼓手」，趙季芳的譯文就譯成「三絃琴手」。

(註三)這是引自俄國大詩人尼克拉索夫(一八二一年——一八七八年)的「誰在俄國快樂而自由？」詩中的句子。

(註四)俄皇亞力山大二世於一八六一年二月頒佈了「解放農奴」的法令，在形式上農奴是獲解放了，而實質上却受到地主的壓迫。地主當解放農奴之時，將農民本來所享用的大部分土地完全奪去，並強迫農民繳納「解放」的贖金，這筆贖金即達二千萬萬盧布。在「解放」之後，農民不得不在最苛刻的條件下向地主租佃田地，除付租金外，還要用「工役」或「勞役」的形式來幫助地主工作，因此農民的生活就每况愈下了。

(註五)改革即指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而言。

(註六)勞勃派(Proletariat)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後俄國國會中的一部分，大半是農民羣眾，但他們是屬於「立憲民主黨」及工人黨(即布爾塞維克派)之間的。勞勃派這種動搖，是由小資產階級地位中必然產生的結果，列寧當時認為布爾塞維克的任務，是幫助農奴對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使他們擺脫自由派的影响，團結其主黨去反對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人。

斯托雷賓(一八六二年——一九一一年)是位大地主，一九〇五年以後任沙皇政府的內閣總理，並且是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間大革命的領導者之一。他進行了培植富農分化農民的政策，採用了各種損害革命的方法，所以當斯托雷賓反動的年代，是俄國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時代。「聯邦黨」上曾有這樣的話：「苦工監獄，囚禁所，流放地，均為革命家所充滿。無窮的恐怖，狂熱的刑罰。沙皇內閣總理斯托雷賓把刑罰者佈全國，革命家被執行死刑者，達數千之多。被刺者在當時被稱為「斯托雷賓的預備」」。斯托雷賓最後是死於時勢的變遷之手，在蘇聯被暗殺。

(註七)「民權黨」見「政教」第五編第一三八頁註五。

(上接第一五九頁「論中國佃農問題」)

定租制或包租制，倘遇天災人禍，其收成之全部或大部被毀時，應得付或減付地租，多年欠租應予免交，使佃農可以稍喘一口氣，並有勇氣去克服災禍，使前所引川北對災荒坐視不救的不幸現象不再發生。

地租應約定以貨幣支付者，倘紙幣跌價而發生爭論時，政府或農會應召集業佃雙方協議調解，在佃農不受損失的條件之下，并得雙方同意之後，得將貨幣地租之一部或全部，改為產物地租。在租佃契約上及電報上有未備者，應保留之。無永佃權者，自不能強迫規定，但可獎勵雙方訂立較長期限的契約，例如五年以上，俾佃農能敢於發展生產。佃農在租地進行耕種改良，出租人不得反對，在上述耕種改良有效期間，出租人不得收回土地。在佃農沒有實績耕種改良的土地，出租人於契約期滿招人承佃或出賃時，原承租人使同等條件，有承佃或承買之優先權。出租人出賃有承佃權契約期限未滿之地，原承租人有繼續租佃之權，非以約期滿，新主不得另租他人，使佃農可以避兔各種困難損失。

佃農不僅吃沒有耕地的苦，而且吃缺乏生產資本的苦。佃農為獲取必要的生產成本，不得不借入高利貸的錢。因此，減租之後，佃農必須減息，或租息同時並減，才能改善佃農的地位。減息是對抗抗租前，抗租後至今所成立的借貸關係，為適應佃農人的要求，亦為團結佃農人一致抗租起見，而實行的一個必要政策。減息標準應以高以一分半至二分為限，超過這個限度，即為高利貸，應加以嚴禁取締。如付息合計已超過原本一倍者，應停止付息。如付息合計超過原本兩倍者，本利均應停止，債務關係即行取消。同時，政府及金融機關應擴大農貸範圍，並改善農貸方法，通過農貸得益最多者，為地主富農，貧苦佃農得益最小。今後農貸方針，應以扶助佃農，直接增加生產為原則。

此外如改善征賦政策及方法，使地主不得轉嫁于佃農，以及改善兵役工役措施，以糾正地主過重，使佃農負擔等項，均為目前中國佃農最迫切之要求，因得于篇幅不及詳談。總之，佃農問題和農地問題，實為目前農村問題中最重要之一環。佃農地位如能改善，則農產必高，不僅可以發展農村生產，增強抗戰力量，而且也是實現國父遺教——耕者有其田與平均地權的實大步驟。

關於宗教自由

真諦和尙：

來函敬悉，願在這裏答覆如下：

一、關於一位來自論階級的貴友所說是否可信的問題，我們可以十分肯定的回答，此說決不可信。『做和尙』決不會成爲一個人的罪名；對於一個人，決不會有任何其他的理由，只因爲他是和尙就要捕殺。這是一種常識；這是一個人根據常識的判斷。出於常識之外的事實也不是沒有。譬如當時勒，他是只應聽說誰是猶太人就要下令把誰捕殺的。但他也說因爲已經不入人倫之列，而入了生番籍了。你想，說那裏已出了希特勒是可信的嗎？不！決不可信。這雖決不可信的『宣傳』，我們是常常可以聽到的，如鴉片，生活奢侈有如巴黎等等。反正你我都不能跑到那裏去看個究竟，還不是只能由他們說去。

來信提到江西彩雲老和尙的事情。我會用以普通詢問所能問到的朋友，大家都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情，自然更不能知道這事的原由是什麼和其辦得合理與否了。不過，如果這事辦得極不合理，那倒是很可能的，因爲那正是張國燾領導之下所幹出來的事情（在時間上來信怕弄錯了一年，否則就根本不必提到那和尙的事）。拿這種情形來推斷貴友所說的是否可信是不適當的，因爲兩者之間絲毫沒有可以相提並論之處。

二、我們對於佛教，也和對於一切宗教一樣，

認爲應當個人自由。從理論上講，我們認爲宗教它的所信是否屬實是另一個問題，確是有其社會基礎的。而且在它起源的時候還帶着很強烈的革命意味的。那時的教徒，其組成份子，主要是從屬於最下層民衆之間的『疲乏者和勞苦者』——具體說來，是城市中的破落戶自由人，是大農莊裏的奴隸，是戰時的俘虜，是一天比一天受債務壓迫的貧苦農民。這些份子都背負着沉重的十字架，政治的，經濟的，過着苦難生活。他們先前的或他們的祖先都曾有過自己的己天國，現在喪失了，被強有力的征服者奪去了。有何方法可以補救呢？有何地方可以爲被征服，被壓迫，被剝削的窮人逃避之所呢？有何共同出路可爲這些複雜的利益不同或相反的人羣走去呢？應該有一個巨大的革命運動將這些人都捲進去。然而，在當時的實際狀況下，要反抗那個強有力的征服者並沒有希望的。只好另找出路。這樣一條出路終於找到了，但不在這世界，而在另外一個新的世界上——肉體死後精神存在，逐漸變成了這些苦難人羣普遍承認的信仰。這就是宗教的起源。這就是宗教的社會基礎。在這種社會基礎還繼續存在的時候，要用強迫的手段消滅宗教是不可能的。所以對宗教應聽人自由。用暴力摧殘宗教，壓迫宗教，不但是愚蠢的事，而且也是不應該的。

在我們看來，宗教徒也是普通人民中的一部份。一般人民所應享受到的權利，宗教徒也應享受到；有自由信之權（佛教，回教，基督教，在東北，河北都有他們的組織），有自由宣傳自己信仰之權（他們在那裏都可以傳教），有保有財產之權，有武裝自衛之權（在河北有一隊完全由國民組成的抗日武裝），有選舉被選舉之權（魯察冀的參議會中有一個和尙參議員）。一句話，人民所有的權利他們都有。反過來，如果他們的行動違了抗戰背的利益，他們也要受到一般人民所應受到的處分。但這也不就一捕殺。舉例來說，有個『京師濟佛會』，在沂水，臨沂等處都有它的分會。這分會曾有一部份爲敵利用。去年舊曆五月五日在天津召開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將『京師濟佛會』改名爲『未來和平宗教會』，以適合敵人『東亞和平的目標』。同年舊曆九月九日，又召開一次會議，進一步的改名爲『資財救濟指導委員會』，更進一步的加入敵人的軍備。敵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他們來作破壞運動。去年夏季曾破壞或減租減息的工作，去年冬季『掃蕩』中，也會在敵人指使下製造謠言，恐嚇民衆，並作過不少的收集情報等工作。這些活動，在沂蒙區（靠近江蘇邊境）不久就被當地公安局破獲。銅井一帶通敵有組織的該會領袖張賢太也就被捕。經過深刻的揭發和誠懇的教育，並指明我們要共同反對敵人，求得中國人民的解放；我們所反對的是被敵利用的佛教會，不是所有的佛教會。於是張賢太領事下的五百餘會員都幡然大悟，一致向政府，向羣衆聲明：『今後再不給敵人利用了』。當時就把敵人所發的『證明文件』完全交給政府，並自願解散了他們的組織。

所能回答的，暫止於此。如有商兌之處，請不吝指教！

編者

精神是客觀存在嗎？

粹年先生：

頃在羣衆第八卷第四期上得讀大作「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一文，至感興趣，覺得文中所指出幾點，確爲吾輩平素欲說而未及說出者；拜讀之餘，爲浮一大白。尙有似可商兌之處，坦率上陳，望望于有以教我！

一、原文第二面（列物一〇二面）第三欄第十五行有「物質與精神，兩者都是一種客觀存在」一句。說精神也是一種客觀存在恐怕不妥。因爲「存在」一詞，英文爲 Being，是哲學上的一個學術名詞，有其一定的含義與用法，相當嚴格，不能隨便用。據恩格斯所說，「關於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質的關係問題，即整個哲學的根本問題」一語看來，顯然是把思维和存在對立起來看的，就是說，物質是存在，精神不是存在。就宇宙論來說，「按其本質說，世界是物質的」，就是說，整個宇宙全是物質，精神只是物質的一種屬性，是某些物質發展到最高度時一種特殊的運動形態，而不是來和物質平分世界的一種東西——存在。就認識論來說，物質是客觀存在，精神是主觀對這客觀存在的反映，或者說，是客觀存在在腦子裏的再現，不會也是客觀存在。

二、原文第四面第一欄第六行有「精神是重要的，物質却是首要的」之句，語意似欠明確；到底「是物質比精神重要呢，還是精神比物質重要？」上陳

二義，心有未安，不敢緘默。進而致之，幸甚！肅此 謹頌 撰安！

沈虎臣拜啓

虎臣先生：

惠函拜讀，感佩莫名。所示第一點，即不能說精神也是客觀存在這一點，大教極是；其道理，來信上已指點得非常明白，拜祇有拜頌而已。惟尙有不能已於言者，那篇文字，只想對時下一些反對唯物主義的人，硬說唯物主義不承認精神及其作用，給以一個明白的問答，沒有預備在這上面把那個題目作爲宇宙論問題或認識論問題來研討，因而在這詞造句上還不自覺其流於繁瑣。我們做學問，確應如先生這樣謹嚴，一字不苟，才對。這是一。其次，說我們不能把物質與精神並立爲二，把它們看做是同樣的客觀存在，是對的，但「對精神絕對不能用客觀存在一詞，那我就是爲未必。根據是：（一）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提出那個哲學的根本問題時是這樣提法的：「究竟是精神先物質而存在呢，還是物質先精神而存在呢？……由於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同，哲學家就分成二個大營壘」。可見唯心唯物，問題不在是否承認精神是一種存在。（二）說物質是第一性的現象，精神是第二性的現象，是物質發展到完善高度時的產物。精神既已從物

質產生了出來，就應有存在（這當然不是 Being 而是 Existence）。這就是說，精神決不是虛幻的，而是實有其事的。（三）說辯證法不是從外面裝到客觀事物裏面去的，而是從客觀事物的本身中抽繹出來的。這所謂客觀事物，是指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精神現象三者而言。（四）質的規定性，各種屬性，如顏色，硬度等，機械論者說它只是主觀上的東西，在客觀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們說，客觀上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差別。辯證唯物主義者則力闢此說之妄，堅持屬性是客觀上存在的東西。精神是物質的一種屬性，也就是在客觀上存在的東西。根據這四點，我認爲精神是客觀上存在的東西，不是虛無飄渺的東西，不過它的存在和物質不同：物質是獨立地存在着，精神的存在則不是獨立的而是依存——依靠於某一物質而存在的。所示第二點，即精神和物質，到底那一樣較爲重要的問題，則私意原文還算明確。例如「質」的非常重要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確足以吞山岳而鑠古今。但我們不能認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要一個人勒緊了肚皮講貞操，也決不能認爲擱着理像就可以去打退敵人的大砲，說精神可以補物質之不足。精神是重要的，但沒有了其基礎的物質，精神就無由產生，無法繼續存在下去。

路陳所見，上讓清致，不知能否有當。肅復，敬候

敬祺！

潘梓年謹啓

本期零售貳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重慶市警察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爲第一類新聞紙
重慶市國貨雜誌審查處渝安路字第四八三號審查



要 目

論現行工礦放款政策

于 雪

論辯證法的法則與方法

胡 繩

軍隊的組織問題(上)

許光達

陝甘寧邊區工業建設和

蔡書彬

勞工生活的概況

日 一 月 五 年 二 十 三

目錄

時	長期戰爭長期打算	(二八七)
論	產業界在活躍着	(二八八)
	沒有比他更真實的人	(二八九)

專 論

日本政府的糾紛與日本今後的動向

(二九一)

論現行工礦放款政策

于 雪 (二九三)

研 究

論辯證法的法則與方法

胡 繩 (二〇一)

軍隊的組織問題(上)

許光達 (二〇六)

邊 鑑

陝甘寧邊區工業建設和勞工生活的概況

蔡書彬 (二一〇)

介 紹

列寧論托爾斯泰(其二)

戈寶權譯 (二一四)

群 衆

第八卷 第八期

三十二年五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群衆週刊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西安
各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	一 元
六 期	五元四角
十二期	十 元
廿四期	十九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長期戰爭 長期打算

——慶祝國際五一勞動節——

一

轉瞬之間，已屆是抗戰後第六個勞動節了。當抗戰開始的時候，很少有人料想我們要在抗戰中紀念第六個勞動節的。然而，時局大變，形勢的推移，我們還不能不作更長期的打算；因為由於六年來戰爭的錯綜演變和目前整個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特點，抗戰更長期化的趨勢已經確定了。

中國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組成部份，世界戰局對中國自有重大的影響。希特勒對德雖然已經在蘇德戰場上受了慘敗，但它還有力量進行局部的冒險進攻的可能，蘇聯人民直至現在還是單獨的負荷着反希特勒國家的重負；而與我比肩作戰的英美，在戰略上雖然是集中力量於歐非戰場，暫時不能在遠東戰場上，有決定性的作爲；但第三戰場至今仍未開闢，因此，打垮希特勒德國，還有一段更艱苦的路程，更何況擊敗希特勒後，再來共同擊敗日本？同盟國家的勝利是確定了的，但是勝利的到來抑可能是長期的，這是一。

日本強盜佔領我東北已經十二年，而我國許多中心地區也淪陷六個年頭了。太平洋戰爭中，（被略二十九字）日寇困難，雖然隨着戰爭的長期化而增加，可是日寇在這次戰爭中，是消耗得較少的一個，它的主力仍然存在，並且正在準備自己的力量，與英美決戰，和進一步的進攻中國。敵強我弱的形勢，仍然存在，這是二。

我們的抗戰，由於許多中心地帶的淪陷，更由於我們主觀上努力的不夠，嚴重的困難，正有增無已，克服困難，渡過難關，蓄積力量，準備反攻，還有待作更多的努力，而這也是還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努力。這是三。

這三點就是戰爭更長期化的主觀原因。然而戰爭的更長期化，絕不等於勝利的渺茫，因為克服困難，爭取勝利的基本條件是存在的。蘇聯和盟邦的勝利，已經是確定了的。而我們也仍然保有廣大地區，擁有廣大人民和必要的資源，作戰必需的武器，我們可以生產，軍糧也可以自給，我們可以而且應該自力更生，支持長期戰爭，爭取最後勝利。請到外後，由於國際交通線的斷絕，實際困難日增，是不容諱言的。但英美已與我比肩作戰，利害一致，將收與共，蘇聯始終是中國抗戰的忠實朋友，空中的國際交通線一時雖不能大事擴張，但陸上的國際交通線，正可以加以應有的注意和及時的運用。因此，我們認爲，凡是想打敗日寇，恢復國土的任何一人，決沒有可以悲觀失望的根據和理由的。

然而，這不是諱言困難，抹殺困難。物資缺乏，物價高漲，民生痛苦，團結有待加強，政治有待刷新，軍力有待培植。如果再加上敵人的可能進攻，漢奸的可能搗亂，我們還會遇到更大的困難。

因此，堅持長期抗戰的信念，立下自力更生的決心，比過去任何時期來得更重要。

二

中國工人是中華民族的中堅份子，六年來，中國工人及其先鋒部隊共產黨員，在敵後前線的堅持作戰，在淪陷區與敵人進行不屈的鬥爭，在大後方努力增加生產，表現出他們無畏的考驗，換得艱難的磨折，担得起解放戰爭的歷史重任。中國工人這種以天下爲己任，自我犧牲的精神，在今天，在戰爭長期化的今天，在長期戰爭必須長期打算的今天，尤其值得發揚光大。

中國工人應作長期抗戰的堅強砥柱。第一，我們必須反對悲觀失望的情緒。因爲戰爭的長期化，困難的增加，悲觀失望的情緒就易於生長，這種情緒，表現於對自力更生爭取勝利的前途失掉信心，表現於倚靠外援與等待外援心理的增長，表現於不積極努力於抗戰的實際工作，而忙於私人的打算，表現於對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不去急求克服，而是得過且過，聽其自然。甚至有物人主觀上雖想長期抗戰，爭取勝利，惟僥倖於目前之困難，遂認爲只有經過破釜沉舟的辦法，才能得到精神的再生，這都是悲觀失望情緒的反映。古人云，「哀莫大於心死」，悲觀失望的情緒，就是「心死」，如果這種情緒不加克服，抗戰決難堅持。中國工人應該以自己

產業界在活躍着

續幾天，後方的產業界在活躍着。四月二十日工業建設計劃會議開幕；二十二日全國工業協會舉行成立大會；五月五日又是生產會議開幕的日子。在這個期間，與產業界有密切關係的中國經濟學社亦在北碚舉行年會，討論戰後經濟問題。這些日子，更形熱鬧極了。不久以前，為了慶祝新約，產業界在「過年」；到現在，為了團結本身，為了排解困難，產業界可說是在「過節」了。

產業界是怎樣在「過節」呢？這些節的節目是什麼呢？大致說來，這四個會議所討論的主要內容，可以分爲二項：其一是着重於如何解決目前的困難；其二是着重於戰後有關諸問題。

戰後經濟問題之值得重視，是很明白的。因爲建國時期，工業建設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爲了將來的建設，在目前就來進行準備工作，這是可以的。特別是國營與民營問題，如果能獲得合理的解決，則其對於當前發展生產，固然含有積極的現實的意義。爲什麼？因爲目前許多從事於生產的廠家，正爲着這個問題之未得合理解決而感到煩悶，感到企業的保障有所欠缺。所以，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很關懷工業建設計劃會議的貢獻；我們亦希望中國經濟學社在這方面，能提供切實而具體的意見來！

可是，我們的目光並不能全部射在這個問題上。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夠跨過現實，不能夠以將來代替現在，以希望當作事實。抗戰的目的是在建立

一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國；沒有抱着這大的光明的希望，要堅強抗戰的信心是不可能的。但是這遠大的光明的希望只有通過現實的道路，才可達到。沒有解決今天的困難，便不能迎接明天的勝利。

今天是什麼一個狀況？自從三月卅日吉爾宣佈了戰爭長期化以後，運東打敗日寇的決戰，顯然是會拖下去的。在戰爭長期化的情況之下，戰時經濟問題，亦就會更加困難起來。以目前的情形而論，物價不斷地在上漲。物價上漲，一面增加了政府的支出，促進通貨更進一步之膨脹，而通貨膨脹又是使廠家多得一點貨幣，但，這是不償失的。因爲加倍的貨幣，不但不能買得加倍的原料，甚且不能補償上次生產過程的消耗。於是廠家就無法維持其生產了。此外，銀行錢莊爲國貨而緊縮其對廠家的放款；財政方面，因爲開支浩大而提高直接稅及間接稅；交通方面，因爲關卡林立與管理不善而感覺到貨物不能暢流。這一切，又是在加重生產界的困難的。生產越困難，則物資之供給越減少；物資之供給越減少，則物價之上漲，亦就不容易殺住。物價上漲的結果，又再來加重上面所說的一些影響了。這就是戰時經濟的困難，亦就是產業界所感覺的困難。這個困難如果不加以解決，產業界固然無法作長足的進展，就是反攻上經濟的準備，亦就難以完成了。

因此，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困難，以極大的力量

的堅定的革命意志，去克服這種艱難失望的情緒；以自己的積極抗戰的主張和工作，去振作抗戰的精神；以自己的刻苦耐勞的作風，去作克服困難堅持抗戰的模範。第二，從工人本身來說，我們應該堅持自己的工作崗位；在長期戰爭中，勵行自我教育，精通工作技能，團結全體職工，把自身的意志鍛鍊得更堅強，力量更結得更堅實，眼光看得更遠大，不屈不撓的擔當起無與倫比的使命。

自然，中國工人要完成目前的艱鉅工作，必須合理的改善目前生活上的困難。在抗戰時期，過艱苦生活是肯定了的；但工人目前的艱苦，是不得一飽的艱苦，是無法養活家庭的艱苦；物價不斷上漲，工資遺落在物價後面。（以下關於民國二十八年年至三十年的生活指數上漲與工資指數上漲的比較數字被略），可見工資指數是大大地落後於生活指數之後。此外，再加之以包工制的存在，廠方的剝削，工時的延長，獎金退休金的取消，年關分紅的停止等等，都使實際工資急劇的下降。廣大的勞動羣衆，在此種情形下，普遍的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吃飯不能一飽，穿衣是補上加補，那裏還談得上營養衛生，和應酬與娛樂？整天忙碌，整天愁吃愁穿，工作情緒因之低落，工作技術因之降低，工作效率因之減少，工人跳廠現象增加（竟有某某廠每月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是完全可以想像的。此種情形如任其繼續存在，所謂培植民力，所謂增加生產，都會徒託空言，而無補於事！這是必須積極加以補救的。

補救之道，最要緊的，除改革財政經濟政策外，首先就是使工資按物價標準規定，不然付給工人以實物工資，即是以定量的日用必需品，代替貨幣工資，也不失其爲有效辦法之一。此外廠方價

去解決這些困難。只有解決了這些困難，只有順利的開展軍事上的反攻，才能談到戰後建設。否則，不將成爲「紙上空談」麼？

要治理戰時經濟問題，有幾個原則是必須改正的。在經濟政策方面，我們認爲政府的任務是在於領導而不在于作過度的干涉。目前那種民製官收的制度似有討論之餘地。在財政政策方面，應使其與經濟政策一致。增稅與增產的抵牾，是不能讓其再拖延下去了。金融方面，必須克服它的投機性，使其

面向生產。對於後方工業必須切實加以獎勵和保護，使其放心擴大規模。對於交通運輸，必須革除那種中古式的作風，使其能發揮貨暢其流的作用。對於在生產中流汗的工人，必須改善其待遇，保障其工資之不低落，合理的措施使政府中的技工問題。

這些原則是增加生產所不可不注意的。我們希望：活躍的產業界，要以清醒的眼光去注視這些問題，要以堅毅的努力去爭取這些問題的解決！

(瀚)四月廿四日

沒有比他更真實的人

——紀念馬克斯一二五年誕辰——

五月五日是卡爾·馬克斯一百二十五週年的誕辰，這一位歷史的巨人——共產主義的創始者，他的學說已經爲全世界的進步人士所公認，他的理想已經實現在全地球六分之一的人士地之上。正如同他的一生是一幅和一切殘廢與貧窮的勢力鬥爭的繪卷一樣，民主世界，目前正和人類文明最大的敵人——法西斯進行着英雄的鬥爭，因此，在今天來紀念他是有其特殊意義的。他是一個海洋，還要用來作爲紀念他的，只是他的一面——人的馬克斯（原文見李卜克西西「馬克斯回憶錄」，載馬恩二卷選集第一卷英文第一一二頁至一二五頁）。

對於馬克斯，政治是一種研究。他感應政治的空氣或政治的空氣，有如蛇蝎。事實上，我們可能想像得出，在這一個世界上，有比空談政治更爲笨的事嗎？歷史是人類和自然界中一切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人的思想，人的感情，人的需要。從理論方面說，政治是對於這一切在「時代的機體」上的千百萬種因素的認識，從實際方面說，它是根據這種認識而決定的行動。因此，政治是一種理論科學，而同時又是一種實用科學。

當馬克斯談到那應用一些空論的口說來解決問題

題的沒頭腦的傢伙和那些把自己的混亂的慾望和概念當事實，想坐在咖啡店裏決定世界命運的傢伙們的時候，他是怎樣的憤怒啊。他停的是，這一個世界並沒有注意這些傢伙。這些「沒頭腦的傢伙」實際上包含了不少非常著名、非常吃香的「偉人」。在這一點上，馬克斯不僅消極的批評旁人，他自己就是一個積極的模範，特別是在他關於法國的時局，拿破倫政變以及他爲紐約論壇報所撰述的一些著作中，他爲歷史的政治分析提供了一個古典的模範。

例行的獎金應該按期發給，醫藥衛生與文化娛樂，應給予保證。凡有關於改善工人生活的福利事業，都應該逐漸舉辦。如果從各方面設法，使實際工資增加，工人獲得最低限度生活所必需的，工人生產熱忱，生產效能自然會更加提高，自然會更加增進，這對於克服目前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固有其重大作用，而一方面，工人羣衆也將更加熱烈地團結在政府的周圍，堅持着長期戰爭。在長期戰爭中起清中流砥柱的作用。

(緊)四月廿六日

五月的幾個重要節日

「五一」國際勞動節——一八六六年，第一國際工人協會，於日內瓦舉行第一次大會，通過「爲獲得每日工作八小時而奮鬥」的決議案。一八八四年，美國勞工組合主辦者，在芝加哥所領導舉行的國際工人聯合代表大會中，規定每年五月一日舉行「以進行一日工作八小時制度爲目的」的總同盟罷工示威運動。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全美工人舉行示威遊行，結果在很長時間內，美國社會黨以上述勞動羣衆得到每天八小時的工作制度的保障。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勞動同盟在巴黎開會，決定五月一日爲國際勞動紀念日，以表示國際工人的團結。并決議：各國應注意勞動法，使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禁用童工，不分國籍、種別，同工同酬。在中國，直到民國十三年第一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才開始舉行「五一」大示威，并提出反對壓迫殖民地口號。

「五三」濟南慘案——民國十七年五月一日，我革命軍北伐，克復濟南。三日，我軍士兵一名，

這裏我不能不想起一個對比。關於拿破崙的政變，馬克思在《拿破崙政變記》一書中處理過，法國最新進的派的小說家維克托·雨果也在他的第一部小說《九三年》中處理過。但是，那是怎樣不同的兩部著作，怎樣不同的兩個人啊！一方面是，怪誕的語言和毀譽語言的怪物；另一方面是有條有理按排的事實——一個冷靜的科學家和政治家，他憤怒，但他清晰的判斷從不讓他的憤怒來攪亂。

一方面是：流動着的閃爍着的泡沫，病態的詞藻，怪異的漫畫；而另一方面却是：每一個字是一枝百發百中的劍頭，赤裸到一看就叫人信服的真理——絕無主觀的歪曲，而是把事實展開，讓他的憤怒之火在展開的事實之上熊熊燃起。雨果的「小拿破崙」很快的出了十版，但到今天已被遺忘；馬克思的「拿破崙政變記」即是到千年以後，還將被人傳誦而嘆服不止。雨果的「小拿破崙」是一本一燃即熄消滅的紙火，而馬克思的「拿破崙」却是一部歷史的著作；對於將來的文化史家，這一部著作和荷舍第的斯（註一）關於比羅奔尼蘇之戰的歷史一樣地不可缺也。

當馬克思估量旁人的價值的時分，他是一切人中最具有最偉大的心腸和最強烈的正義感的人。他太偉大了，偉大到不知嫉妒和虛榮為何物。但是他傲頭傲尾的厭惡那些名不符實的偉大和矯揉造作的榮譽——表面上是偉大和光榮而實際上却是無能和卑鄙——正如他厭惡一切不真實和假冒的東西一樣。在我所知的大大小小人物當中，馬克思是不知道虛榮的極少數中的一個。他太偉大了，太堅強了！同時自然也是太高貴了，他不能虛榮；正如同一

切天真的孩子一樣，他不可能帶上一付假面具，或者是假裝他自己。除非是由于社會或者政治環境所必需，他總是全部的、無保留的說出他的思想和感情，他的那些所感和所感早就在他的面部表情上表現無餘了。當他非保留一點不可的時候，他就像一個孩子一樣顯得不自在，以致常常引起朋友們的哄笑。

世界上再沒有比他更真實的人了，——他是真理的化身。任何一個人，眼睛一看到他，馬上就可以知道他會遇到什麼了。自然在我這一個經常處于交戰狀態下的「文明」社會裏，一個人是不能常常講真話的；不過，不能講真話並不是就講假話的理由。我不能常常地把我所想到和所感到的東西講出來，那並不是說我不得要講我所未會想過和未感過的東西。說出自己的所感和所感是智慧，說着自己所未思和未想的却是虛偽，而馬克思却永遠不能虛偽的，很簡單，他不能這樣做，正如同一個天真的孩子不能這樣做一樣。事實上，他的夫人常常叫他做「大孩子」。沒有一個人——連恩格斯在內——比他的夫人更理解他，更知道他了。當他跑到所謂「社交」場所——那裏往往是在付與生人以更大的注意，一個人不得不束縛自己的——的時候，我對的「黑人」（註二）竟會上變成了一個「大孩子」，他可以羞到臉蛋發紅，像一個孩子一樣一樣。

（註一）荷舍第的斯是希臘的著名歷史家。

（註二）「黑人」是馬克思在家庭中之渾名。

經過日軍警戒線，被日軍開槍擊斃，并用機關槍圍我軍射死傷匪眾。同日，日軍將我交涉員蔡公時等十六人，全行拘禁殺害。我軍為避免事件擴大，將濟南駐軍調往前方，城內僅留三千人維持治安，日軍猶感不滿，于五月八日開始攻城，九日，我軍全部退出濟南。

「五四」學生運動——民國八年，歐戰結束，巴黎和會開幕，日本在會議中獲得德國在山東一切權利的繼承權，激起了我國人民的憤怒。五月四日，全北京的學生三千餘人，舉行示威遊行，放火焚燒曹汝霖的住宅，毆打了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學生講演團千餘人被捕，各地學生及工人商民紛紛響應，罷工、罷市。北京政府見風潮擴大，不得已釋放被捕學生，并下令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風潮始告平息。中國青年經過此次政治鬥爭，思想激變，開始接受世界革命的新思潮，由理想而進入實際行動。同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亦以「五四」為啓蒙時期，如文學革命、反封建、反玄學以及婦女解放等運動，均在此時期開端。

「五五」革命政府紀念——民國十年，直系軍閥企圖新帝制主義援助，撲滅南方的革命勢力，廣州國會議員，于四月七日召開非常會議，通過中法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并選舉孫中山先生為非常總統，成立革命政府，中山先生于五月五日宣誓就職。

「五五」又為馬克思的誕辰紀念。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這位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革命的導師，誕生于普魯士萊茵省特利城，到今年，已是一百廿五週年了。

「五八」母親節——一九一九年，美國加維絲

日本政府的糾紛與日本今後的動向

一

東條內閣成立以來，已有一年半的光景。這期間，日本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的糾紛與聯合，經過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這時代法西斯革新派右翼（德派）的東條一派，獲得了法西斯革新派左翼的支持，積極準備發動太平洋戰爭，為什麼主張配合德國之對華作戰的左翼竟支持了東條呢？這就是因為搶奪南洋的資源，乃日本對蘇戰爭必要的準備。但現狀維持派對於東條一派南進政策，採取了反對或者是不完全支持的態度。現狀維持派所努力活動的不是和英美戰爭，而是想覓求妥協之道。於是東條一方除任總理大臣、陸相之外，又兼任了內務大臣，準備鎮壓反對派；同時另一方面，爲了使現狀維持派滿意東條的做法，採取了外交談判步驟。這就是派這來補特使赴美作「和平」之最後的努力，好使反對派認爲「暴戾的美國」損壞了「和平的日本」，不得已才拿起干戈。這個調計獲得了不少的成功。第二個階段從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開始。戰爭初期的「赫赫戰果」，滿足了現狀維持派，而南洋豐富的戰利品，又分給了屬於現狀維持派的大金融財團。現狀維持派由親英美政策一變而爲反對英美政策，於是現狀維持派和東條一派之間，開始了緊密的聯合。東條一派左手拉着法西斯革新派的急進份子，右手拉着現狀維持派的X(X(號碼不明)份子，竟然組成了一「舉國一致」的陣勢。這種狀態，一直繼續到去年夏天。

在這以後，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聯合發生了變化，這就開始了第三階段。原來革新派左翼，要支配德國在去年春夏對蘇聯採取攻勢，發動侵略蘇聯和遠東邊疆的戰爭，並將此希望寄托在東條內閣身上。然而東條却滿於德國進攻斯大林格勒的失敗，背棄了他的希望。因此，革新派左翼對東條的不滿和失望，便高漲起來了，而他們反對東條內閣的運動，在今年正月不久達到最高潮。這時流傳着對蘇作戰派的指導者石原莞爾中將代替起而相關的謠言，重臣會議X(X(號碼不明)，東條突然生病來，議會召開延期一週，德國駐日大使換了，日本駐德國的武官也換了，駐蘇公使調了……這些事件說明日本政府正進行着深刻的內部鬥爭，這一鬥爭表現爲革新派左翼攻擊東條一派和現狀維持派的聯合。這個鬥爭的中心問題是什麼呢？革新派的左翼攻擊東條一派在戰爭政策上的失敗和退縮，即在所羅門羣島方面的敗退，對進攻印度的猶豫，對俄軍迂迴的過分利用，和解決中國問題的失敗等等。在國內，革新派左翼反對東條一派對現狀維持派過分妥協。但以上諸問題，都不是鬥爭的中心，中心問題是對德對蘇的政策。革新派左翼的主張如下：社會主義的蘇聯是日本的宿敵，而且又是反極心國的一

女士在菲列德爾菲亞地方，發起五月第二個星期之第一日爲母親節，以安慰歐戰中陣亡將士的妻母，嗣後各國逐漸推行。

「五九」國恥紀念——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款，至五月七日向袁氏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五月九日袁世凱正式簽訂賣國條約。其主要內容爲：(一)承認日本繼承德在山東省所享權利；(二)延長旅順、大連及南滿、安奉兩鐵道之租借權爲九十九年；(三)中國不得將滿洲島嶼讓與他國；(四)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五)中國聘用各種日本顧問，并在必要地方，由中日合辦警察。

「五卅」慘案——民國十四年五月五日，上海日商內外棉紡織會社，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將工人領袖顧正紅槍殺。工人大憤，一致罷工，并聯合上海學界，沿途講演顧正紅被殺事件，爲公共租界及捕房捕去學生多名。至五月卅日上海學生更組織先鋒隊，後備隊出發演講，均隨被逮捕。因此，更激起公憤，乃集合二百餘學生向南京路老關捕房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並巡捕向羣衆開槍，死傷廿餘人被捕五十餘人。工部局更調集萬國義勇軍分佈各要口，并佔領各大學。於是上海八十餘萬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學生商人亦起而罷課罷市，全國各地，相繼響應反帝示威。五卅事件以後，上海各界特組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向對方提出條件，同時北京政府派蔡廷幹等來滬交涉，因各使團恃強凌弱及北京政府之屈意示弱，致使此悲壯的慘案，未得圓滿結果而終結。

員，並且日本還早必須和蘇聯作戰。為了援助作戰中的德國，也必須和蘇聯作戰，同時，這也是日本救自己的方法。因為德國的失敗，即表示着日本不久也要失敗。雖然日本去年已失去了對蘇作戰的好機會，但今天形勢並不是十分險，要幹起來，還不算晚。如果日本與德國配合起來幹的話，日本自可操勝算。這就是革新派左翼的主張。

東條這一派，即不願容納現狀維持現狀的意見，提出了如下的主張：現在日本當面的敵人是英美，他們的力量日益增長，並頑強地進行反攻日本的準備，日本非集中起來對付這個勁敵不可。因此，日本不能向蘇聯挑戰，再樹一個勁敵。德國雖然困難，如果歐洲沒有第二條戰線，尚可長久維持着。即使將來德國戰敗，日本也沒有和它一樣垮台的必要。日本必須先謀自救之策，援德而戰的方法要在對蘇聯以外去找。蘇聯目前仍處於守勢，日本立條約，蘇聯和英美之間關於對日政策尚不一致。利用此種矛盾（排二十餘字）是準備對英決戰；……這是東條一派的主張。

在上述的革新派內部左右兩派的鬥爭中，左翼處在劣勢的地位。國際方面，德國在蘇聯和北非戰場陷入窘境，而太平洋英美已開始反攻。在國內，政敵的力量又相當雄厚。東條一派以東部上層作基礎，並有現狀維持派，皇室重臣，大金融財閥，舊政黨領袖等，和海軍在政治上已有很大的發言權等的積極支持。對着東條方面如此雄厚的力量，革新派左翼雖將親德派（山下大將等）反蘇派（荒木大將、石原中將等）的陸軍軍人和××中野一派等動員起來，也有相當大的壓力，但究竟不能與東條方面對抗。兩派鬥爭的結果，勝利已歸於東條一派。

這樣一來，今年一月間日本內閣的危機便消滅了，東條的期也好了。從一月二十八日起，議會也開起會來了，這就是第四階段的開始。議會當中，東條和現狀維持派的聯合成功。在開始聯合之前，反對派（如中野一派）被壓得沒有發言的餘地，尤其是議會通過了「戰時行政特命法案」，東條獲得擴張軍人的新武器，東條一派的地位遂比前更為加強。不過東條與現狀維持派聯合的弱點，即在東條本人是一個反蘇主義者，其與蘇聯對蘇作戰現狀維持派的聯合是有某種限度的。

一一

圖過上述曲折的過程而保持着政權的東條一派，實行着什麼樣的政策呢

這可以概括如下：①東條一派和革新派左翼不同，在對德國的關係上，堅持日本的半獨立性，避免替德國火中取栗，只在自己有利的場合幫助德國；採取配合德國的行動。東條一派認為太平洋和印度的戰爭，牽制了英美的力量，而蘇聯一滿一國境屯駐重兵，將蘇聯力量牽制於東方，這就是日本對德意很大的幫助。②英美能以全力進攻日本，是在歐洲第二條戰線實現，德意崩潰以後的事。因此，在此期間，日本須乘機收英美對日反攻的根據地，并增強生產力與武力以備與英美決戰，同時日本還要利用反軸心的內部的矛盾，努力找尋不「決戰」而與英美「妥協的道路」，此時現狀維持派所希望者。③不斷注視着蘇聯戰事，北非戰線，歐洲第二條戰線實現的可能性，并特別注意蘇聯和英美的關係，以維持和鞏固蘇聯偽滿國境的軍備，絲毫也不放鬆對蘇聯的監視。④為準備與英美「決戰」，積蓄力量，同時又不能不陳兵於蘇聯以警之。⑤為準備與英美「決戰」，積蓄力量，同時又不能不陳兵於蘇聯以警之。這就是限制了日本，使其在其他方面發動新的巨大的軍事進攻感到困難，但利於尚未「決戰」的時期，作「決戰」的準備，日本正打算發動新的軍事行動，這首先是對中國的行動。日本一方面加強偽滿政權，通過它來掠奪中國淪陷區；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打算發動新的軍事進攻，以解決「中國問題」。東條的訪問偽滿就是這種打算的表示。⑥在印度方面，進行政治的攻勢及局部的軍事活動，例如緬甸傀儡頭子訪問日本和「承認緬甸獨立」，日本飛機在印度方面的活躍等；但是，以攻佔印度大部為目前之軍事進攻是不可能的，因為太平洋的現狀，不允許日本有這種打算，而且這對日本是非常危險。在緬甸的軍事活動，主要是為進攻英國在印度對緬反攻的根據地，確保緬甸，并配合對印度的政治攻勢。

以上是東條一派及現狀維持派的政策，而且是日本最近的動向。總而言之，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方面為濟和英美「決戰」，拚命培養實力，同時對於中國打算實行進攻。但他們對於作戰勝利並無把握，所以當其經濟軸心國陣容一舉一動即思相顧，拼命找尋反軸心方面的空隙，想藉此發覺他們的生路。於是目前日德及德意可利用的宣傳機關，書報雜誌挑撥離間的狂吠，然而猶像大海破舟呼救一樣，四面皆是滿腔的悲鳴。反軸心國陣營喊得聲嘶力竭，愈來愈緊的反攻波瀾，將把柏林和東京沖個粉碎。

（解放日報時評）

論現行工礦放款政策

于雪

一 引言

我國目前執行工礦放款工作的機關主要的有兩個，一個是四聯總處，一個是經濟部的工礦調查處，這兩個部門，除却做工礦放款貸款工作外，還都做一些工礦投資的工作，做投資的工作，在四聯總處，做得比較的多，因為四聯總處的中心任務是金融，不是工礦，從金融方面來幫助中國工礦事業的發展，這是最近四聯總處才確定了的任務。工礦調查處的主要工作是在調查工礦，而金融上的調查，也是調查工作的一部份，祇是當各工礦有資金上需要加以調查的時候，工礦調查處有時介紹去同四聯總處請求，不過從工礦調查處這一部份，我們可以對民營的小工礦放款作一初步的研究，故將本文中在討論工礦放款政策時，把工礦調查處的放款特另列一節。

四聯總處產生於戰事甫起之時，當時各銀錢業皆取緊縮政策致使社會資金缺乏，全國產業有停滯的危險，財政部乃任命四行於二十六年八月九日成立四行聯合放款委員會，初時僅辦理同業放款，後因籌兼顧及金融及農工礦商業資金之流通，乃改為辦理之放款業務，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財政部頒佈四行內地聯合放款辦法，明定工業品及礦產品皆得用為貼放之押品，以謀工礦業金融之流通，是為四聯總處放款之始，在抗戰的五年中，四聯總處的放款政策，並不是一貫地注重於工礦事業發展的補助，直到三十一年，放款政策之側重於工礦事業，才有新的決定。

經濟部工礦調查處的原始任務，可以說是在該處的放款，起初都用在遷移費用的補助，到後來應擴充了，或是某些廠礦過定了，需要建築，需要營運資金，需要招募工人的費用，需要保證工程或礦產的費用，這是由工礦調查處去放款補助，這就是近來工礦調查處工礦放款總任務，工礦調查處的放款，主要的這備用在民營小工業方面，公營的礦業大部直接由四聯總處或支處申請貸款，不再假手於工礦調查處。

事實上四聯總處的放款，除去二十九年外，每年放款均保以民營礦業公營

為多，因為整個的中國工業，大半係民營的中小工業，國家資本經營的工業，固屬不多，而且事業上亦均未見十分開展，這不僅因為國家工業的歷史淺，而經營上未能盡符經濟原則，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祇是不在本文範圍之列，這兒也不必細說。

二 工礦放款的政策和計劃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財政部所頒佈的「中交農四行內地聯合放款辦法」中，規定貼放之範圍包括抵押、轉抵押及財政部命令之放款，對於貼放之押品，在該辦法中第四條乙丙兩項會有規定，茲摘錄如左：

- 乙、工業品 五金、棉紗、布疋、顏料、水泥、綢緞、電器、工業品、化學原料等。
- 丙、礦產品 煤、煤油、汽油、柴油、錫、鐵、銅、鐵砂、銅、鐵、錫等。

上面兩條所規定的貼放押品是關於工礦者，代工礦業開了一個資金的來源，抵押的折扣，按市價八五折計算，其無市價者，由當地聯合放款委員會估定，但遇有押品價值低落時，應照數追補，這樣就對工礦產品的抵押運銷等，有所便利，而生產業能繼續發展。

在二十九年三月間，四聯總處會經會同財政經濟兩部，擬定了一個經濟三年計劃，對於工礦建設所需資金之籌措，有著三個方式：(一)由國庫撥款，(二)由四行投資，(三)由四行貸款，規定了由四行貸款的原則是：(一)業已完成之事業不必再參加新設者，(二)各項事業週轉所需之流動資金，四聯總處近年來的小工業貸款，均以此原則為標準。

關於民營工業以及內地的小型工業借款，政府也曾有著特殊的規定，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四聯總處會經通過「民營工業借款原則」七項：(一)提供確實押品，(二)利息至少月息七厘，(三)期限以一年為度，(四)押品須保是火險及地產兵險，(五)四行派稽核押品監督員，(六)由經

濟部為承運保證人，(七)借款時須具備計劃書。可見政府對於民營借款的限制條件，是比較地嚴格一些，民營工廠的困難，大半係由工廠調整處解決，我國民營工廠，在抗戰之初即由工廠調整委員會(屬軍事委員會即現在工廠調整處之前身)協助內遷，而目前其財務仍係由工廠資金之籌措，及工廠借款之審核定約，本息之收問，抵押品之保管等等，年來內遷工廠，該處有相當功績。

四聯總處為補助小工商業之發展增加日用品之供給，曾於二十八年十一月通過「地方金融機關辦理小工商業貸款通則草案」，並經行政院於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明令公佈，其中規定製造軍用或運輸國外或屬於日用品之小工業，可由當地金融機關請求貸款，至於地方金融機關辦理小工業貸款，資金如不足時，得向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處商借之，此為政府補助小工業的規定。

當太平洋洋戰爭爆發之後，我國國內金融和經濟上起了一個大的變動，在本年一月底四聯總處對於核辦投資放款有了新的決定，無論是投資或是放款，都強調了以協助國防有關及民生必需品之生產為主旨，在技術上和民營經營事業放款的稽核方面，都有着新的決定，約可分為三點，述之如左：

- 一、投資放款的條件方面：工廠農林等生產事業投資借款申請案件，一律由四聯總分支處指派專門人員，或委託有關主管機關切實調查各該業之人事組織、業務廠產設備及經營成績，凡適合下列條件者方予放款：(一)業務適合戰時需要經營具有成績者；(二)組織健全技術及出品優良者；(三)機器設備原料能繼續補給並已正式開工或最短期內開工者；(四)借款用途正當者。

二、公營民營事業之管理方面：民營事業由四行投資放款協助者，應守列下各點：(一)四聯總處對於投放款各機關之財務業務會計應負稽核之責，如認為有須改善之處，承受投放款各機關，應儘量接受；(二)承受投放款機關生產物品應達一定銀度，其每月產銷數量價值應按規定期限報告四聯總處查核；(三)產品不得囤積居奇；(四)出品之配銷及售價之規定應受物資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公營事業方面略加緊縮，凡中央地方政府機關所屬工廠事業對於強行自負債務關係者，應由四聯總處調查其業務，必要時得於未到期前收回放款之一部或全部。

三、獎勵地方及商業銀行從事工廠放款，注重抵押與轉貼現，並由銀行及商業銀行應貸款協助地方工廠事業，如資金確有不敷時，四行得以其抵押或轉貼現方式重為貸款協助，惟最高數額，以原貼放款額之六成為限，且在修正非常時期管理銀行暫行辦法中亦特別對於工廠放款加以限制，並該辦法中第五條對銀行承做以貨物為抵押之放款，其身份、期限、利率、展期等條件均加以限制，惟該辦法第六條特別規定，前條關於放款期限及展期之限制，於工廠業以原料為抵押，而經濟部主管機關證明該原料係屬生產必需者，不適用之，諸此皆鼓勵各銀行業多從事工廠放款，而減輕商業放款。

於此可見，我國之工廠放款政策，在抗戰之初原係以內需為目的，而後為營建資金，而並未嘗以貼放款作為發展工業之主要方法，蓋主要之由，尚在於國家主辦生產事業，且即在抗戰初年，實放款項亦多以公營為限，而對民營者則限制較為嚴格，而小工業之貸款，則付諸地方金融機關，尚未知其詳。

四聯總處廿六年以來核定專案貼放款總額及工廠事業放款額比較表 (單位千元)

放款類別	二十六年9月至26年年底		二十九年		三十一年上半年		合計	
	數額	百分比	數額	百分比	數額	百分比	數額	百分比
工廠事業放款	552,396	100.00	586,642	100.00	1,553,535	100.00	3,539,840	100.00
工廠放款通項	33,492	5.64	109,547	19.33	213,644	12.91	899,405	25.46
工廠放款通項			34		197		159	
放款總額連項			106		274		57	

(材料來源四聯總處)

四聯總處核准工礦事業放款 按地域統計

由民國二十六年九月至三十一年六月底

承放分支行處	放款數(單位千元)	百分比
前總處	10,000	1.410
漢口貼放分會	1,970	.277
廣州貼放分會	683	.096
廈門貼放分會	50	.007
重慶分處	595,623	83.825
中央信託局	9,000	1.265
北碚支處	1,300	.183
瀘縣支處	2,000	.281
成都分處	6,760	.950
萬縣支處	6,300	.863
嘉定支處	11,876	1.663
內江支處	7,850	1.103
雅安支處	8,000	1.124
合川中農二行	300	.042
南充中農二行	200	.028
西昌中農二行	600	.084
廣元中農三行	700	.097
宜漢農行	2,000	.281
浙江分處	370	.052
貴陽分處	11,249	1.580
梧州支處	680	.095
桂林分處	2,500	.351
衡陽支處	5,670	.797
沅陵支處	840	.118
香港分處	1,000	.141
零陵支處	440	.062
洪江支處	50	.007
江西分處	9,213	1.295
吉安支處	562	.079
太和支處	20	.003
西安分處	9,235	1.298
南鄭支處	3,250	.457
蘭分處	30	.004
鄧州分處	200	.028
天水支處	200	.028
合計	711,628	100.000

材料來源四聯總處

三 四聯總處的工礦貼放實況

在戰事初起之時，財政部為調劑內地金融起見，通令頒佈「四行內地聯合貼放辦法」，謀各業資金之流通，歸四行聯合貼放委員會辦理，至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四聯總處改組成立，四行聯合貼放委員會亦歸併於四聯總處，於是四行聯合貼放機構，更趨健全，其主辦之聯合貼放之業務亦漸轉為主動方式，惟其放款政策，歷年均有變更，加強工礦事業之協助，實乃近年之方針。自二十六年九月至三十一年六月，四聯總處核准之貼放總額約在三十五萬萬三千九百八十四萬元，其中工礦事業放款約有六萬萬九千九百四十四萬元，合計放款總額百分之一九·七六。

從前表可見歷年放款中，以今年之工礦事業放款所佔之百分比為最大，二十九年次之，三十年次之，而二十八年以前為最小。在連續指數一項，吾人可見歷年放款之趨勢，其中三十一年度僅舉出半年數字，故在連續指數上，可以估計方法，作縱橫立論，而二十六年九月至二十八年年底一項，其中兩年多之數字亦僅列有一項，各年詳細情形不明，從放款總額上吾人可見

二十九一年較以往之兩年多之總額尚多一數，而三十一年則較二十九年又增大二·七倍，按今年之趨勢恐較去年所增有限，總之放款數字，在價值上雖是與年俱增，尤以三十年度所增者多，惟若以物價指數測之，恐實際價值是與年縮小，蓋物價上漲即在三十年度，亦不止三倍，故放款實值，並未普能增，而今年數字之小，恐多少受了緊縮論者之影響所致。至於工礦放款，在二十九年一年增加最多，該年一年之中即較以往二年多之放款增大三·六倍，在抗戰初三年中我國物價之上漲尚有限，此項數字，即使按物價指數折實，恐亦仍較上年為大，至三十年則較二十九年所增加之倍數約大兩倍，而該年放款總額大增，故在百分數中乃降至一三·九一，為歷年最小的百分比，至於今年則又開始增大，今年上半年間之工礦放款較去年全年數大至一倍半，預料全年可增大三倍，而今年之放款總額較去年所增者，今年工礦放款在放款總額中所佔之百分比特大，這一點可以說明今年我國放款政策上甚相當的繁榮，而工礦放款則別加重視也。

若就工礦放款之區域別而論，則多半集中於四川一省，尤以重慶為最近

說上表觀之，工礦放款總額之七萬一千一百餘萬元中，即有五萬九千六百餘萬元係由重慶分處放出，約合總額百分之八四，換言之即百分之八十四的放款是放給重慶附近的工廠，若更以四川其他各地加入計算，則將佔工礦放款總額百分之九十以上，可見歷年放款，都嫌太偏重於重慶，本來邊廠設廠，多半集中重慶，重慶形成工業的腦充血病態原不相宜，我政府若不力圖矯正此弊，將來後悔莫及，矯正之法，放款政策，亦未嘗不可有所幫助，今後放款宜視該地之情況而定，配合着國家經濟政策，不能失之畸輕畸重，有如戰前之各工廠集中於上海沿海諸省及香港附近，第一次戰爭給吾人之教訓已經不小，覆轍不宜重蹈，且即以重慶、交通，以及整個的工業發展計劃和國防上的安全性而論，四川之工業偏重，實無理由可言，國家宜積極分散工業，擇條件較優之地帶，促使工業發展，這種單純因政治力量而造成的工業偏重，宜立即糾正。

本來我國後方工業，分佈得很不平衡，百分之六十的工廠集中在重慶及四川其他各地，僅在重慶市附近者尚佔總數百分之四十，就資本而論，後

四聯總處核准工礦專業放款按地域統計表 31年上半年

分處	工礦放款額	分處	工礦放款額
重慶分處	300,988	重慶分處	100
中央信託局	9,000	重慶分處	270
北碚分處	400	重慶分處	160
成都分處	400	重慶分處	50
成都分處	2,850	重慶分處	768
成都分處	5,460	重慶分處	178
成都分處	7,506	重慶分處	26
成都分處	2,000	重慶分處	300
成都分處	360	重慶分處	6,360
成都分處	300	重慶分處	1,708
成都分處	3,260	重慶分處	280
成都分處	650	重慶分處	200

計 344,122 元 (單位千元)

重慶分處 四聯總處

方工業資本中，重慶區之工業資本佔總額百分之四十七，若就四川境內而論（包括重慶），則約合資本總額百分之七十二，按理想四聯總處的工礦放款，即使按各廠廠數及資本比例平均分配，亦不宜超過現在廠數及資本數之分配情況，而目前重慶廠數僅佔大後方廠數總數百分之四十，就資本論重慶僅佔大後方百分之四十七，而重慶一分處之工礦放款竟達全部工礦放款百分之八十有餘，此種偏重趨勢，實有討論之餘地，尤以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我國四聯總處之工礦放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皆集中於重慶附近，如此偏重，似乎未能顧到工業發展的其他條件。

上表中重慶分處中央信託局及北碚支處皆在重慶市附近，合計工礦放款有三萬一千餘萬元，佔工礦放款總額之百分之九十，此為三十一年上半年之情形，較以往集中之趨勢，更為嚴重。

至於工礦放款之各業分配情形，歷年來以冶煉為最多，鹽業次之，其次則為化學、機械、紡織、電力、電器、其他，飲食品等工業，而以文化工業為最少。

此種分配情形，尚稱合理，放款數額之分配一方面是反映各業之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放款政策之執行，現在的分配以冶煉鹽業為最多，足見此兩業之需款孔多，亦復證明四聯總處之放款在業別上執行得頗為正確。

從下表（一九七頁的附表）中對於民營與公營的問題，也有着一部份的特徵，在二十六年九月至二十八年年底的工礦放款中，除去其他工業，鹽業和紡織業而外，均以民營借款多於公營者，工礦放款總額中亦以民營略多於公營，至二十九年，則情形逆轉，除去電力工業紡織工業飲食品工業及文化工業外，均以公營工業之借款多於民營者，在工礦放款總額中，公營借款約佔百分之六十五，而民營借款僅佔百分之三十五，此種趨勢固反映該年公營工業需要資金之較多，而亦可見放款政策轉行着重公營工業，但此種比例至民國三十年則依然如故，在三十一年中，各業放款除除電器工業外，均以民營復多於公營矣，且放款總額中，民營借款佔百分之七十有餘，而公營借款則僅約佔總額百分之三十，故從歷年之合計數觀之，僅電器工業及其他工業之放款民營少於公營，其他各業工業放款對象，皆以民營者佔多數。

可見放款政策在二十八年以前，民營公營之區別尚小，至二十九年則工礦業放款以公營者特多，而至三十年則復行減少，至三十年度緊縮論之影響及工礦業，若以充分就業而論，中國工礦業本多半係民營者較經濟，二

四聯總處核定工礦專業貸款統計表

單位：千元
材料來源：四聯總處
26年9月至30年12月

時期	冶煉工業	化學工業	機械工業	電力工業	電訊工業	紡織工業	食品工業	文化工業	其他工業	總計
26年9月	450		100	310		1,135	250		14,923	20,495
至	4,000	22,815	1,900	2,550	12	309			250	28,827
28年年底	1,430	22,815	2,000	3,160		580			14,020	49,322
29年1月	16,682	7,210	6,500	5,245	10,165	3,040	100		3,000	65,962
至	11,600	3,090	5,490	9,325	300	4,238	225		160	37,138
29年12月	28,232	10,300	11,932	14,570	10,465	7,253	325		3,100	103,040
30年1月	10,600	7,820	12,456	2,535	8,585	1,000	100		5,100	58,760
至	36,935	8,950	18,250	3,582	700	32,255	9,380		6,877	155,864
30年12月	47,505	15,770	30,700	5,917	9,235	33,235	9,320		11,777	215,144
小計	27,732	15,020	19,050	8,190	18,730	5,135	280		23,020	143,157
合	7.35	4.09	5.13	2.23	5.10	1.40	.08		6.26	39.77
百分比	49,595	34,855	25,640	15,457	1,000	36,535	12,189	3,310	6,777	221,849
小計	13.49	9.48	6.98	4.21	.27	9.94	3.31	.90	1.84	60.23
百分比	77,327	49,885	44,090	23,647	19,730	41,670	12,460	3,510	28,787	367,506
小計	21.04	13.57	12.16	6.44	5.37	11.34	3.39	.93	8.10	100.00
百分比										

附註：其他工業係指上列各款工業以外之工業，同時無須分類之工業貸款，亦將其列入此類。

十九年之放款政策偏重公債，結果成效不大，而三十年則仍處於自然狀態，民營工業資金之需要較多也。

自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四聯總處之放款政策重新改變，一方面緊縮放款，一方面加強協助國防有關及民生必需之生產事業，緊縮範圍，嚴行審核，執行方面，成效尚佳，工礦專業貸款，上半年計核准放款者七十六筆，平均每筆放款為三百五十五萬餘元，准許展期者三十七筆，平均每筆放款為二百餘萬元，最近該處正擬定辦理戰時生產專業貸款實施辦法，以謀對國防有關及民生事業優先予以協助云。

四 經濟部工礦調整處之工礦放款實況

抗戰發生之初，政府為避免使產業淪於敵手起見，二十六年十月由財政部向四行借款一千萬元撥予前軍事委員會工礦調整委員會作為營運基金，以協助工廠之內遷，二十七年春，工礦調整委員會改為工礦調整處隸屬於經濟部，在工礦調整委員會成立之時，即通過各廠息借款項原則，並議決以後工

廠遷移之原則，規定全國各地補助總額暫定為五百萬元，設在民國二十六年時，工礦調整處資金之運用實係限於遷移借款，及至二十七年始有建築及添購設備借款，營運資金借款等項，而疏建及保護工程借款則二十九年下半年始有之，指撥技工之借款則僅二十八年上半年有之。

至三十年放款額乃漸增大，僅以三十年上半年計即較以往歷年半年期的總額多增四分之一，計該年上半年放款總額為二千零七十萬，下半年為二千三百七十四萬元，在三十年上半年放款筆數為二百八十九筆，平均每筆借款為七萬一千餘元，三十一年上半年放款筆數為二百六十四，平均每筆借款約為九萬元，計三十一年上半年共放款二千七百七十餘萬元，於此可見放款總額固增而放款筆數反較減少，蓋每筆平均數略增，此乃由於物價日高，借款數大小則難以運用，惟筆數減少，勢必能得款項之廠數減少，我國小工業為多，尚希望此後之放款筆數不能減少，最好能擴大範圍，普施恩澤，能使小手工業亦得向工礦調整處借得款項，蓋中國之工業，目前之基礎固尚建築在小手工業上面也。

工業調整處放款一覽表

單位：元
材料來源：重慶工業建設局

業種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合計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建築	3,172.00	170,088.40	263,749.00	465,713.43	204,787.30	348,890.00	824,950.00	911,879.00	3,237,919.70
機械	6,700.00	18,816.87	465,713.43	154,918.93	46,420.08	50,000.00	75,903.90	815,100.00	1,407,853.90
電力	6,940.00	311,174.70	154,918.93	321,200.00	712,148.30	941,544.00	1,598,028.79	1,288,622.76	8,016,372.40
紡織					40,000.00	152,000.00	230,000.00	814,500.00	1,637,232.00
化學					64,000.00		98,390.00		1,97,800.00
紙業					22,000.00	35,300.00	16,000.00	79,000.00	218,000.00
食品					45,000.00	180,000.00	300,000.00		1,025,000.00
日用品					29,000.00	305,000.00	40,000.00	400,000.00	1,414,000.00
其他					2,218,356.00	2,262,434.00	3,258,882.69	5,061,901.76	16,414,635.00
合計	26,812.50	790,171.67	3,796,076.38	1,218,356.00	2,262,434.00	3,258,882.69	5,061,901.76	16,414,635.00	

該處之放款，自三十年以後即適有遷移放款，建築及增購設備放款，及營運資金借款三者，其餘各類放款，自三十年後則均已停止，尤以建築及增加設備之借款為多，而營運資金借款反較少，以三十年度之上半年及三十一年上半年三個月時期而論遷移借款，三十年上半年為八十九萬元，下半年為二十一萬餘元，三十一年上半年為十一萬七千餘元，可見各廠遷移多半已定，借款漸少，借款或已逐漸歸還，而建築及增加設備之借款在三十一年上半年為九百九十四萬四千餘元，下半年為一千一百三十五萬五千餘元，至三十一年上半年則增為一千六百五十八萬五千餘元，此項數字逐年增大，且其數額也相當的大，而營運資金在三十一年上半年為五百四十一萬六千餘元，下半年為七百八十四萬四千餘元，至三十一年上半年則反減至七百三十二萬七千餘

元，合不到該年建築設備貸款的二分之一，目前因為物價高漲，大家爭先購料或建築，因為建築或購進資產，即使不動工，依然可以因物價之上漲而有盈餘，所以真正因為營運困難，想從事動工的廠家借款反而較增購設備和建築用的借款為少，記得去年因為緊縮而提到充份就業問題，目前工業不振，所缺乏者為如增加營運資金，使工業營運裕如，以便增加生產，利於抗戰，決不應把公家的錢借給廠家增加建築設備，坐候物價上漲，因之增值得利，我想這一點是值得考慮的。

就地域上說，工業調整處的放款也是大部份集中在四川，尤以近年來中之趨勢，更加嚴重，三十年下半年四川的放款額已佔總放款額將近百分之九十，而三十一年上半年之放款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集中在四川境內，我國

經濟部工礦調整處歷年放款表百分率比較表

材料來源：工礦調整處

業別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平均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鋼鐵業	11.90	21.60	17.10	6.90	5.80	11.10	16.20	14.80	13.60
機械業	24.90	1.70	10.70	6.90	16.80	15.40	12.10	18.00	14.00
化學工業	25.90	39.40	30.40	10.70	3.30	2.20	2.80	16.10	8.00
紡織業	5.00	8.50	30.40	58.50	41.60	48.90	25.60	26.60
食品工業	1.10	8.50	3.30	6.80	7.10	16.10	9.70
教育用品工業	0.90	1.10	5.20	2.90	1.20
其他業	13.20	0.90	1.80	1.50	0.30	1.50	1.30
合計	37.30	27.20	11.20	13.20	3.70	7.90	9.50	6.20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遷移放款	100.00	38.60	19.80	3.60	1.70	2.30	1.10	1.10	7.80
總業設備放款	29.40	52.80	86.10	56.10	66.40	31.90	49.30
購置資金放款	6.70	16.90	28.60	29.00	30.10	15.20	21.00
撥款放款	0.10
其他放款	25.30	10.70	1.60	13.10	1.20	7.90	7.90	8.40
建設工程放款	43.90	12.50
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小工業之發展，實非並不僅限於四川一地，我想如果放款當局能把握他們的工
作做得深入一些，決不致大都集中在四川一省，希望工礦調整處能從各區
域全面發展業務，不能單單祇在首都附近工作，恐怕小手工業並不在四川
一省之內也。

五 結論

在目前工礦資金極度困難的時候，政府用放款的方式，促使工礦資金流
轉，協助工礦業的發展，原是極好的辦法，歷年來政府對於此點，並未嘗疏
忽，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增加生產，自力更生，這微微的一紙，就整頓着
整個國家的命運，可惜年以來，生產事業尚未能如理想的發展，並且由於

財政政策上的不安，致使物資缺乏，物價飛騰，而一般的好商，更與波作涌
助長增高，最近國民黨十中全會已經明白通過限價的法案，政府也正在切實
執行，限價固為治病之一法，惟病之由來，營養不足，實一主因，我國
生產事業之不發達，致使國家的營養不足，物資缺乏，而投機囤積，高利貸
等等百病叢生，挽救之法固宜一而治源，更不能忘記治本，從事切實發展生
產事業，自抗戰以來政府固然也興辦了許多工廠，可惜在經營方面為官僚
腐化所侵蝕，以及戰時的許多條件所限制，目前實在不能再對民間團體的
工礦事業加上什麼障礙，惟有儘量設法扶助它們成長繁榮，物資充足，價格
的病態問題，自可能解決大半，我們的物資充足，士氣也自然更興奮，打勝
仗的可能性，也更容易實現，所以我在敘述了工礦放款政策之後，願意在

這兒針對放款現況提出一些意見，作本文的結論：

第一、我們希望擴大放款額。 限下物價高漲，市面利息奇昂，長期借款不易到手，而工礦需要的原料多半甚貴，週轉時期又長，加上目前工礦利潤微薄，各工廠向市面借款，幾成不可能，因為用高利貸借一點錢來開工，結果賺的錢會不夠償利息，筆者曾分析過各廠礦的資金負債表，大概一個廠礦販賣的資金僅能佔全部營運資金的十分之三，還有十分之七的款項須向廠外活動，大致至少要借的款項比股東們自己所有的錢（連公積金盈餘股本都算在內）還要多三分之一，目前全國後方的工廠有一千三四百家，這筆款項有動力或規模較大者而論，至于小的手工業家庭工業以及原始式的礦業，尚不知若干，就這一千多工廠資本已達九萬萬元（見金融雜誌第一卷第五期楊博如「論建立證券市場問題」），其股東資金當在十五萬萬元以上，則其所需借款每年至少也在二十萬萬元，而全國的放款，現在每年連四聯總局和工礦調整局算在一齊，也不過四萬萬元，至於商業機構撥給工礦業的款項更是微乎其微，據計算三十餘家商業銀行的工礦放款，尚不到數千萬，資金之缺乏，於此可見一斑，限下物價高漲，在戰事初起時成立的十萬元資本的廠，到現在每年營運資金至少在百萬元左右，工礦所需資金可按其資本乘上一個比例數，再乘上物價指數而定，總之二十萬萬元的放款，也祇能使各廠維持營運，談不上擴充與發展，工礦之既無其他資金來源，勢必由政府儘量設法補助，至於資金來源，倒不一定全在國家預算下撥補，不妨發行高利率的工業貸款儲蓄券，由政府以高利吸收存款而以低利貸給各工廠，對工礦之補助，當然以儘量儘力為是，預算上決不應緊縮到這一部門。

第二、我們希望政府多放小額民營工廠放款。 目前的放款政策，似乎對內國礦業多準備處於較大型的工業，三十一年上半年僅核准放款七十六筆，而總筆平均有五百五十五萬元之多，未幾筆數太少，而平均每筆數額較大，因為數額小時則監督審核比較困難，工礦調整處的放款多半以民營為對象，數額亦較小，但半年來亦僅二百餘筆，總之以三十一年度上半年而論，總計放款不足四百五十筆，而一般小手工業和家庭工業，資金上無路可尋，而一般大的國營工業，終日與充設備不事生產，規模龐大，氣象森嚴，一若與建廟宇，而在工作上有時因某部門之配合不善停工數月，如國營某大鋼鐵廠之停工數月，即其一例，至於用盡氣力，代國家打掃子的製匠舖子，要想國家借一價錢給他們勞苦工作下去，倒反而不可能，這一點我們希望當局

鄭重考慮，應該把工礦調整處的放款更普及到民營的小手工業，這才是腳踏實地，發展國民工業的辦法，單是妄想天高，謀大不成，那樣祇不過是多養一批廠長股長，多建一些工廠的辦公廳，於工業的發展並不能如補助小工業之反來得中肯些。

第三、我們希望政府工礦放款普及各地。 目前的工礦放款大集中二個區域，就是祇在重慶附近放款，工礦放款是國家建設大業，整個的大後方，要全面發展工礦生產事業，才能支持抗戰，爭取勝利，單在四川一省或重慶一市發展工礦是不能完成這個目的的，現在工廠已搬遷重慶，加上放款的政策，又都着重在重慶一區，在首都眼前面做文章，更加使長工礦集中的趨勢，統觀四聯總處三十一年上半年三萬萬餘元的放款，百分之九十在四川境內，物價是整個大後方都在漲，資金之困難，是整個大後方有着同樣的苦痛，而政府之工礦放款也是整個的國家大計，可是結果工廠之得益，因區域而厚薄不均，未免失當，即以工廠數及工業資本數，在四川重慶附近分配得較多而論，正該以放款的政策幫助治此腦充血的病態，安能任工礦放款集中的趨勢，再超過工礦數及工礦資本集中的形勢，我們希望政府要切實實視工業條件而定放款政策的寬嚴，疏散工業，擇最適宜的區域作工業中心區，不能祇在首都附近做表面文章。

第四、我們希望政府多放營運借款少放建築借款。 因為物價日益高漲，大家都希望手頭上物資多存一點或是固定資產多增加一些，等到過一些時物價漲了，自可方不勞而獲的利潤，譬如建築借款，借一筆錢來造一幢房屋或是買一些動產，不必動工，過一些時物價漲了，抵押建築而還還這筆借款祇要付低微的利息，這種方法，依然於工業毫無補益，祇能促進物價的漲勢，全無關於生產，現在目前有人對出產工業的興趣，現在應該要如何就原有的工業範圍內，添一些營運資金，使各業充份動工，增加生產，決不能從事擴張工業範圍，反而任其停滯或在半休息的狀態，必定要充分就業之後，才能再謀擴大發展，就工礦調整處之放款而論，三十一年上半年，大半是建築及添購設備的放款，較營運資金的放款，大至二三倍，我們認為這一點不好，一定要放出去的錢是從事業起，才能配合到增加生產的目的，否則是不會補益於生產的，並且放款之前手續要簡便，審核要快，放款以後要切實監督和指導各工廠，從速營運，以免發生流弊，以免浪費公帑，有誤國是。 總之我們希望政府增大工礦放款的數額，多做民營小工廠放款，普及全國的工礦業，督促各工廠借款後切實從事營運，增加生產，這就是我檢討了放款政策後的一點希望。

三十一年十二月號稿

論辯證法的法則與方法

胡繩

一、法——法則，方法

辯證法之所謂「法」，有兩層意思，一是法則 (Law)，二是方法 (Method)。

法則是客觀的事物在其自身發展中所表現着的規律。方法是我們為了對付客觀的事物所採取的手段。

唯物辯證法的諸法則——如恩格斯所說，——乃是「自然和人類社會這兩個發展領域最普遍的法則」。而這最普遍的法則在現象界底各種特殊部門內，又表現為各種特殊的法則。但是不論最普遍的法則，還是特殊的法則，都是隱蔽在事物底內部的。光從事物底外表看來，則一切都是那樣地紛繁複雜，高深莫測，簡直似乎是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規律可尋。怎樣從事物表面現象中探究出其內在的發展規律，這正是方法底首要任務。

也許有人以為，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現象界底最普遍的法則，那麼只要從這最普遍法則出發，就自然能演繹得到各個特殊的法則。假如事情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探究事物的內在法則的研究方法就不如何去研究具體的現實的問題，而只是頭腦中的概念遊戲了——是從較高級的概念如何自動引道到低級的概念的問題了。這種想法是和唯物辯證法底精神根本違背的。事實上，最普遍的法則並非「先天」地存在於人類頭腦中的，人類並非先有了辯證法法則，然後去研究事物，而是從研究事物中發現了辯證法法則。到了現在，雖然辯證法的基本法則已被證明普遍適合於自然與社會的歷史底各方面，但是到底在某一特殊部門的現象界中，辯證法法則表現為何種特殊的狀態，那却是基本法則本身不能告訴我們的。要找出特殊的法則，仍必須認真去研究具體的對象，而不能只是把普遍的法則拿來套用一下。雖然在研究過程中，普遍的法則可以有指導與指示的作用，但是普遍的法則畢竟並不是研究底出發點，並不是特殊的法則由而生成的源泉，恰恰相反，倒是由特殊法則底發現，更充實了普遍的法則底內容。

在研究有了結果，了解了所與對象底具體發展規律之後，於是本來是依賴我們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法則現在成了為我們主觀所能把握的東西了。於是我們就應該用言語或文字來加以敘述。這所謂敘述並不是把客觀事物按照其外部形象而加以描寫，不是瑣碎的，且細不盡的，也不分別偶然現象與必然現象的紀錄。進行敘述當然要用邏輯的語言或文字，但也不是像形式邏輯那樣的做法，他們只注重於語言文字自身底邏輯性，他們只顧到敘述的文字前後不相抵觸，以能自圓其說為滿足。這樣的一種辭句其實是最貧窮的。我們所要求的，是把客觀的現象，按照其發展內部的規律而敘述出來。固然要能很好地敘述，必須首先很好地研究，但是也不能以為敘述只是研究底附屬，因為敘述既不是研究底紀錄，也不是把研究所得的結果歸納成幾個簡單的公式，使得活潑豐富的現實，在敘述出來時，變成了空洞抽象僵死的邏輯文句。所以敘述並不是技術的問題，而也有着方法的意義，是知如何使活潑豐富的現實在其內部的規律性的把握下再現出來的問題。

但辯證法之為方法，其內容並不盡於研究與敘述二方面，更有一方面是關於行動的。我們去研究客觀現實並不是站在現實外面冷眼旁觀，而是要積極地進入現實中，對於現實有所行動。行動越深，認識也越深。我們用語言文字來敘述出客觀事物底發展法則，也並不是只為了在思想上把握這法則，更是為了在行動上掌握這法則，根據這法則來對現實進行改造。——因此我們在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以外更有實踐方法。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法則與方法雖是兩樣東西，但又不是絕對不同的兩樣東西，因為方法無論從那一個意義上說，都是服從於法則的。辯證法既是法則，同時也是方法。換言之，辯證法表現在客觀現實中，就是法則，客觀現實中的法則反映到主觀上來就可以成為對付客觀現實的手段，也就是方法。我們通過研究方法來找出客觀的法則，通過敘述方法來使「自在」的法則表現為我們所把握的法則，最後通過實踐方法來在行動上掌握客觀底規律，控制事物底發展。

二、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

研究、敘述與實踐的方法，因為都是以客觀事物底法則為基礎，為依據，所以在實質上，三者自然是一致的。既然客觀的事物都在發展中表現着辯證法的法則，那麼我們的研究方法，敘述方法，實踐方法自然都同樣是辯證法的方法底應用。但是在實質上的相互一致並不能妨礙在形式上的相互區別。這種區別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

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都可說是屬於理論的方面。理論的方法與實踐的方法在實質上相互一致而在形式上又相互區別，都是極易於明白的。但大家往往不注意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之間的區別。這種區別雖然在形式上的，但若不把它弄清楚，却有可能損害到辯證方法底實質。

對於先驗的理性論者，研究的方法常常和敘述的方法沒有什麼不同。像笛卡兒，在他的書中他從「我想，故我在」這一個原理出發，由這個原理原理抽繹出其他的原理，用來解釋他所要解釋的許多問題。他以為「我想，故我在」，這是一個「自明」的公理，他開始他的研究過程，也是從這個「自明」的公理出發。他對一切都表示懷疑，最後竟到了這個「不待任何證明而然存在」的「真理」，於是他的敘述與研究的過程自然都不能不從這里出發了。

另一方面，對於狹隘的經驗論者，敘述方法也常常和研究方法完全一樣。因為他們只是把零碎的經驗累積起來，縱然他們也從這中間歸納出似乎一般性的結論，但他們至多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像那些繁瑣的歷史考據家，只是鑽在故紙堆中，做一字一句的檢註，一事一物的考訂，這固然也是作研究工作，但他們研究的方法始終不能上升到帶行法則性的理論。於是當他們把研究底結果敘述出來的時候，所敘述的也就只能是他們如何進行研究的過程。

辯證唯物論無論在研究方法中，還是在敘述方法中，自然和先驗的理性論與狹隘的經驗論都是判然不同的。我們必須嚴格地尊重客觀現實，因此我們的研究底出發點，決不是空中掉下來的先驗原理，而是客觀存在的具體事物。這使我們和先驗的理性論者完全不同。但是我們又決不滿足於對個別事物一一加以分析，然後在形式上加以歸納，而要進一步構成足以揭示對象發展底內在規律的理論。這使我們又和狹隘的經驗論者不同。既然我們在「

究過程中，開始就以雜多的具體事物做對象，其中並存在着必然的現象與偶然的現象，主要的現象與次要的現象，通過研究過程，最後我們得到了事物內在的必然的法則，和那足以反映事物全面形勢的最單純的因素，而我們的敘述過程常常就是從這裏開始。所以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在形式上也就不可能有所區別。

我們固然不能因為辯證唯物論要求在研究過程中從雜多的具體事物的分析着手，便以為其研究方法其實就是經驗論的方法；又因為辯證唯物論在敘述過程中着眼於一般性的法則，便以為敘述方法其實就是理性論的方法。假如做這樣的看法，那便是認為唯物辯證法的研究方法是單純的歸納方法，分析方法，而其敘述方法則是單純的演繹方法，綜合方法，於是在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之間，不僅在形式上有着區別，而且在實質上也完全不同了。這種看法當然是不對的，因為無論是在敘述過程或是研究過程中，實質上我們所用的都是辯證方法。但是同樣的辯證方法在運用於研究過程時與運用於敘述過程時則必然有着顯著的差別。我們為辯證法的方法的總原則所指導，在研究過程中，首先要從事物的全面形態中歸納有關的具體事物，加以具體的分析，使我們能從具體的事物上升到一般的理論，但也要隨時進行綜合，使這一般的理論永遠與現實中的新的發展相符合。另一方面在敘述過程中，常是從研究所得的一般性的法則與原理出發，來展開說明事物全面的形態，但也仍要隨時分析歸納具體事物來加以充實，使得敘述過程不是空洞的概念的遊戲。

像這樣的在形式上有所區別而在實質上相互一致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正是唯物辯證法底特色。

三、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運用辯證方法的經典的著作。但這部書底第一卷剛出版以後，就被許多人誤解與攻擊。著者在第二版跋言中說：「資本論應用的方法常不為人理解，這一點可由各種關於本書的解釋底互相矛盾而知之。那些評論家底自相矛盾的難免非常有趣的。有些評論家說，馬克思底方法是「分析」的。甚至有一個雜誌既責備「資本論」作者「以形而上學的方法探究經濟學」，同時又責備他「滿腔熱衷於一定事實底批判的分析」。最後，

還有一個評論者說：「顯然他照它（指「資本論」這書）的敘述底外形來判斷，我對它一定會說，馬克斯是一位最大的觀念論哲學者，並且是德意志式的從忠實方面來解釋的觀念論哲學者。但在經濟學批判的工作上，他與任何一個先驅者比較，都更是實在論者。……我們決不能稱他為觀念論者」。這些批評者底混亂，無非是由於對唯物辯證方法的不了解，並把「資本論」底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完全混同了起來的原故。所以馬克斯，為了答覆這些批評，在說明了自己底方法正是辯證方法之後，接着說：

「敘述的方法，當然須在形式上與研究的方法分別。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底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究這種形態底內部關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於現實的運動，必不能有適當的敘述。不過，敘述一經成功，材料底生命一經觀念地反映出來，那就像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這一段話對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是有着很大的啓示性的。

大家都知道，馬克斯的「資本論」是爲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底發生、生存、發展、死亡底法則。人們也都可以想像，一個曾經受了黑格爾影響的人，在進行研究什麼的時候，大概是首先在心目中存着辯證法的普遍的概念與法則，從中抽繹出幾個適合於目前所要的特殊法則就寫了。但事實上，馬克斯不是這樣做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斯從資本主義生產力底最簡單的原理——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矛盾——出發，展開資本主義經濟全部結構，從最根本的矛盾——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矛盾——出發，說到促使資本主義整個崩潰的恐慌，並這樣的敘述過程由一個概念與另一個概念，一個判斷與另一個判斷，一個法則與另一個法則是如此謹慎地聯結在一起，好像是從前一個判斷後一個來似的，使得後來的人在敘述馬克斯底經濟學時，除了用他的結構系統外，別無其他方法。這就使人看起來，好像這樣的邏輯系統是馬克斯底辯證法所作出來的「先驗」的結構。那些評論者說馬克斯底方法是演繹法，是形而上學的方法，是德意志式的觀念論也就是由這里產生的誤解。他們都不了解「資本論」底邏輯如此謹慎完裝只是因為他是嚴密地對對象自身底邏輯，而這種邏輯，在馬克斯進行敘述時，雖然是最初就存在於他的心目中，但是在他的研究過程中却是最後才達到的。馬克斯爲了進行這種研究會特別勤於當時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中的英國，他在進行研究時，並沒有一開始就把什麼辯證法的法則擺在自己面前，當做研究底出發點，他所做的却是，如

在上引文中他自己所說的：第一，搜集一切有關的歷史材料與現實材料；第二，分析這些材料，考察牠們在發展中相互關聯的紐帶；第三，探究這種發展形體底內部關係，以是現出這形體的發展形體。經過這樣約分析研究之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發展法則就在馬克斯的腦中呈現出來了，於是在他拿起筆來進行敘述的時候，他自然用不着一開始就把全部材料成堆地送到讀者面前，而可以把他所需要的材料，按照對象自身所具有的發展法則，一一安置於書中適當的地方了。

由此可見，我們不應當曲解馬克斯底研究方法，以爲這就和「資本論」中所表現的全都敘述過程相同，好像馬克斯不是先去全面地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底一切現象，却是一開手就「天天地」我到商品這一個最單純的東西，而在其中看出價值與使用價值間的矛盾，認定這是一切矛盾底基礎，於是從這里一步步地演進下去，就把一切問題研究清楚了。這種看法，正是把馬克斯底辯證方法歪曲成爲形而上學的方法，也就是把馬克斯方法歪曲成爲被恩格斯所批評了的杜林底方法。

「杜林先生底方法——恩格斯說——就是在於，把認識對象當作一種類，分解成似乎最簡單的要素，而對這些要素，應用同樣簡單的似乎不解自明的公理，以爲就把這樣得來的結論繼續用下去。……這個方法就是當時所採用的觀念論的或稱爲先驗的方法之變相，他不是從對象本身，認識對象底實質，而是從對象底概念中，辯證地得出一些特質。起初從對象上作出對象底概念，以後把對象——轉，得到對象底反映，即從其概念上，去調度對象。不是概念應該與對象相適合，而是對象應該與概念相適合」（反杜林論）。

我們不單杜林底方法，而要馬克斯底方法，那我們對說必須把馬克斯底研究方法從他的敘述方法在形式上分別開來，而以搜羅與分析豐富的具體材料爲出發點。

就是這個杜林，他還反咬一口，說馬克斯在研究中不是依據客觀事實，而是依據着幾個抽象的辯證法的法則的。照他說起來，馬克斯之得到若干說明具體事實的規律，不過是直接從「量變到質變」「否定之否定」這些公式中演繹出來的。對於這種「批評」，恩格斯也根據「資本論」原書給了很有力的答覆：

「馬克斯說：『觀念價值達到各該場合上一一定的最低限度（雖然此量因情形而異），牠方能轉成資本——這一事實正是辯證法底法則底止極的

證明。杜林先生却替馬克斯加上了這樣思想：因為根據黑格爾法則，量轉成質，「所以，借款一達到一定的界限就……變成資本」。所以，恰巧相反。」（同上書，注意點原文有）

同樣的，杜林攻擊馬克斯是謂全依據着否定之否定的公式，才能得到私有財產將被廢除的結論，也是不合事實的，如恩格斯所說：「當馬克斯把這個過程形容為否定之否定的時候，他並不是想用他去證明這個過程歷史的必然性，相反的，他是在歷史上證明，這個過程，一部分已經在事實上完成，一部分一定將要完成，以後他更指出這是按照辯證法則而完成的過程。」（同上書）

由這裏可以知道，單純用辯證法法則來證明什麼，這不是馬克斯所做的工作，也不應該是何馬克斯所讀者所做的工作。我們絕不能說：因為量變會促成質變，所以貨幣積蓄到一定數量，就會變成資本。這種推理方法就是在「資本論」的敘述過程中也是被排斥的。馬克斯所做的只是具體地研究資本與貨幣底現實材料，研究財產制度底產生與發展底歷史材料，然後得到了牠們的具體的發展規律的認識，而在敘述過程中就按照這種規律來說明從貨幣到資本的發展，以及私有財產制度底建立與將來的崩潰，最後並指出了，這些都是符合於辯證法的普通法則的。

四、辯證法的三大法則與四個特徵

以上我們從辯證方法應用於一個特殊對象內的模範例子說明了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的關係，現在我們再來從一般的情形看以下。

我們已經知道，所謂敘述方法，就是怎樣把客觀的事物按照其內在的法則再現出來的問題。我們又知道，辯證法的法則，最普遍地適用於一切事物的，有三大法則。那是由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定型化，而為後來的大多數辯證法「教科書」所襲用的。恩格斯是這樣說的：

「辯證法的法則，是從自然和人類社會底歷史中抽取出來的。它們並非別的，即是這兩個歷史發展底領域最普遍的法則。就實質論，它們可以歸納為下列三大法則：

- 量變質和反過來質變量的法則；
- 對立統一與否定的法則；
- 「否定之否定的法則」（「自然辯證法」）。

但因為事物內在的矛盾是事物發展底根本動因的原故，所以恩格斯所舉三大法則中的第二點，後來是被移置為第一點了。這三大法則是從最大的概括性上表明了事物發展中的一般的過程：由於內在的矛盾鬥爭引起運動，在運動中由量變引起質變，更由第一次的質變引起第二次的質變。

但是這樣的法則對於我們到底有什麼用處呢？當然我們不能因為牠們只是一般地表明事物底發展法則，並沒有特殊地表明各種事物底發展法則，就把它們看做是無用的東西，但假如以為從這些一般的法則中直接可以推論出麥子是怎樣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怎樣發展的，抗議是怎樣發展的，那期待言也是極蠢的打算。

所以我們不能把這三大法則底形式直接拿來做研究方法底依據。只有在我們具體地研究了麥子底歷史，資本主義社會底歷史和抗議底歷史之後，我們才可能直接應用這三大法則底形式來進行敘述，我們才可以指出麥子，資本主義社會，抗議由於怎樣的根本矛盾而發生發展，而在發生發展中又是經過怎樣的質變五變的過程，否定與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可見倘若把三大法則保存其形式而轉化為方法，那只是屬於敘述的方法，而不是研究的方法。假如不弄這一點，就會在接觸到某一特殊部門的對象，首先就想一下子把其作為運動發展底根本動力的內在矛盾。但是，這種矛盾既然是隱藏在事物底最內部，若不先從表面現象一層層分析下去，如何能夠把握得到？同樣的，人們也在還沒有詳細地佔有材料，分析其具體發展形態的時候，就想去慧眼一瞥地看出質變相互轉化的關係，正反合三階段底體系。這樣一來，這三大法則非但不能幫助具體的研究過程，反而成了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了。

把普遍的發展法則，直接拿來當做某一特殊部門底現象底研究方法，不去分別研究方法在形式上和敘述方法的區別，其結果，就一定是使辯證法在實質上墮落為教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

所以我們要把辯證法當做研究方法，就不能在形式上運用那三大法則，而要在實質上運用那三大法則。

斯大林在聯共黨史第四章第二節寫了有名的一點「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一個著作，在這里，他不用三大法則，而於舉出了四個特徵，來解釋辯證法。人們也許以為，這四個特徵是代替那三大法則的，但實際上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代替，當然更不足以以此來推測他。我們只要注意到斯大林在原文中會分明地寫道：這四個特徵乃是「馬克斯主義的辯證方法（Dialectical Method）

「底基本特徵」，那麼這問題就容易得到解釋。原來斯大林在這些所提出來的不是法則，而是方法——研究方法。

當然，方法和法則不是絕對分開的兩回事。斯大林處四個特徵和恩格斯底三大法則在實質上也是沒有任何差別的，同樣那是在最大的概括性上把辯證法底根本精神揭露了出來。二者底差別是：前者因為着眼於現實發展底過程，所以不能不由最基本的矛盾開始，後者因為着眼於從對象中找出其發展規律來的方法，所以不能不由對客觀具體現象的考察出發。

按照斯大林所舉出的四個特徵，我們運用辯證方法於具體對象的研究上，首先就應注意到一件事物與其他事物的聯繫，這也就是馬克思在前引文中所說的「搜集豐富的材料」，其次就要去考察對象底運動發展以及更具體的量的質的變動，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分析材料底發展形態」，最後才能從這種運動發展過程中深掘出其內在的矛盾與鬥爭，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探究這種形態底內部關係」。由此可見，這四個特徵底列舉和馬克思底研究方法底要求是大體上一致的。這正是要求我們，在進行研究時，不拿任何空洞的原理原則做出發點，而要拿「與其周圍現象密切聯系着，受其周圍現象所制約的」具體現象做出發點，這也就是要求首先研究具體的對方時間及其他條件，要求首先在所研究的範圍內以及有關的部門愈多愈好的掌握材料。

所以這四個特徵的提出，雖然只是在形式上和那三大法則不同，但其意義又不僅在形式上。因為這樣的提法，就根本消滅了那種以抽象的法則做出發點，以正反合的三段論做萬應丹的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了。

五、克服教條主義

當然，我們不能以為辯證法的三大法則本身就是教條主義的東西。只是因為人們不適當的加以運用，才使她常常成方法時發生了教條主義化的情形，而應該反對這種教條主義化的傾向。那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與「反杜林論」中其早已明白地說到了。反對辯證法的人就常常運用杜林所用過的老武器，故意把辯證法描寫成好像只是根據幾個抽象的概念與法則來演繹地推論各種具體的結論似的，這種實質並不能傷害到辯證法本身。

但因此我們更當提出警告，假如我們對於方法與法則之間的一致與區別，以及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之間的一致與區別不能弄得很清楚，那就一定

會在許多方面，造成教條主義的傾向，以致妨礙到理論水平不能迅速提高。這種現象是必須澈底地加以克服的。

提出進行調查研究的要求，提出了解情況的要求，用來克服教條主義與教條主義，這完全符合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二版跋言中所說的研究方法底基本精神，也完全符合於斯大林所指出的辯證方法底四個特徵底基本精神。

應該反對把最普遍的辯證法法則直接當做研究方法的出發點。許多初學辯證法的青年，以為只要能精通辯證法的基本法則，就算是有了進入一切科學的敲門磚，他們成年成月地背誦三大法則，卻不去費點精力研究當前的現實和具體的科學，他們只是想從書本中所讀到的辯證法原理直接引中關於現實的社會問題以及自己底生活問題的答覆。但是在脫離了具體的實際問題底研究和科學知識的情形下，三大法則實際上成爲了廢物，不能幫助人解決任何實際問題。

就是在特殊科學部門內，也應該反對把在這部門的範圍內一般性的法則直接當做研究方法底出發點。比如關於社會歷史發展，我們已經知道了某些根本法則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法則，幾種社會形式的轉化的法則，關於現代的國際關係，我們也懂得幾種根本的矛盾，這些矛盾是貫徹在一切國際形勢的變化之中的。但是在我們研究特定的一個社會歷史，歷史變遷以及特定的一個國際問題的時候，我們假如只是搬弄這些原理原則，當做一個預定的框子，置在我們所處理的事件上，以得到預定的結論，那麼我們就不過是預備了一套教條主義的魔術而已。

很明顯的，假如我們進行研究，只是從抽象的法則出發，縱然看起來也好像通過了某種具體的事實，但結果所得到的也仍舊只能是抽象的法則。比如人們固然有權利這樣說，因為一切事物的量變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會引起質變，所以抗戰的相持階段持續進行到一定程度，一定會進入反攻階段，他這儘可以前以爲非常現實地運用了辯證法，對現實說出了非常正確的判斷。這正是因為他既沒有認真去分析在相持階段底具體情勢的變化，他當然無從得到從相持階段進入反攻階段的具體的法則，便只好以這抽象的法則來做結論了。從這樣的「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拿來敘述出來，那就必然是「八股」的敘述方法。——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與八股的敘述方法，在實質上以及在形式上都是互相一致的。

軍隊的組織問題 (上)

許光遠

一 軍隊的組織原則

「兵力還是要用經濟情形來決定的，因經濟情形供給他以製造及保
 護門等工具的資料。但是這不止如此，任何東西，沒有像軍隊和艦隊那
 樣利害地依靠於經濟條件之上。軍隊、人材、組織、戰術、戰略等等，
 首先就要依據目前所有的生產和交通發展的程度」(恩格斯：反杜林論
 二〇八頁——生活書店版)。

武裝力量的組織，是由兩種原子組合而成的，第一，活的力量這就是人，
 包括指揮員，戰鬥員和一切工作人員；第二，物質、技術工具，這就是武
 器(槍、砲、刀)，軍事技術(有線與無線電話、有線與無線電報、坦克、
 飛機、化學)，運輸(汽車、火車、輪船)，資料(彈藥、糧食、錢、礦、
 油)等。這種活的力量與物質工具的配合，成爲武裝的組織，以求實現統治階級
 的政策。由於這兩種原子的配合不同，而發生軍隊組織的變化。由於階級基
 礎的廣狹，及其物質技術工具的可能性，決定了軍隊活力的數量與質量及其
 組織與裝備。

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神聖同盟反對波蘭底戰爭之可能及其前提」一
 文中，就天才的分析了軍隊的組織問題，他說：「軍隊大意的進攻工具與其
 運動性，也是高度文明之必然的結果；特別是現代之武裝力量對人口總數的
 比例，是與象徵資產階級——自由制度之社會發展的階段不可分割的。因此
 ！現代的軍事藝術，以資產階級及農民的解放爲前提，而且成爲這種解放的
 表現。無產階級底解放，自然也必定有它的軍事表現，且創造它嶄新的作
 戰的方法，這是不待言的。甚至現在還可規定，什麼樣的物質基礎是新的作
 戰方法的基礎」。

「鐵路與電報，現在已給有才幹的將軍及陸軍部長一個動機，在西歐戰
 爭進行趨向新的結合了」。
 恩格斯在波蘭戰爭的說明：如果改革生產，將生產至少增加兩倍，祇有在

利用機器以後，而每個工人，中等的勞動生產率比現在增加二倍時，當兵的人
 數才可因工作的解放而增加，那麼動員的兵力，決不止是百分之五，而是
 可以武裝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六的人民。他說：「倘若這些條件具備了
 話，倘若民族的生產將來充分地加強并集中，倘若在社會上不再有階級分
 歧的話——這是絕對必要的。那麼可能召集來當兵的人民，必然完全能由配
 備武裝的人數來規定了。這就是說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人民中，可有
 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五的兵士，開到戰場上與敵人作戰。但這種龐大的軍
 隊的運動性，比目前的軍隊的運動性大不相同了。如不具備完備的鐵路網，
 那麼就無法集中并供給給養與軍火，也無法調動這樣的軍隊了。沒有電報的
 設備，一定是不能指揮這樣的軍隊的。同時也不能再由一個戰術家或戰術家
 (直接在戰場上的指揮員)來指揮這樣龐大的軍隊了，所以分工是必要的。
 戰略的動作，即各個兵團相互策應的動作，將來一定要借助於電報，而由一
 個中央機關來指揮；而各方面的指揮官，則担任戰術的動作……」(恩格
 斯：軍事問題論文及通信集，引自馬克斯列寧主義論戰爭與軍隊二十五頁到
 二十六頁，軍政雜誌社版)。

恩格斯的指出這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講的話，然而現代軍隊的組
 織與指揮正是按照這個方向發展着的。

其次，戰爭的政治性質與軍隊當時的任務，也可能影響於軍隊的組織。
 例如德意志爲了急於重分殖民地，而英法則爲了保持殖民地，因之採取了不同
 的政策，是影響着它們軍隊組織和裝備的(當然它們是以技術的可能性爲限
 的)。

單從軍事觀點上來區分戰略，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進攻的戰略；一種
 是防禦的戰略。進攻的戰略一般的要求是：準備在敵人的領土內作戰，採取
 速戰速決的方針，因此要求在軍隊的組織上，適合於進攻的靈活性和運動性
 ，多武裝以進攻的武備。現代進攻的武備，當然最好的是曲射砲、坦克、空
 軍、機械化的兵團和戰車上的步兵，在運輸上要有大量的汽車和摩托。

例如德、意、日爲了侵略弱小民族和重新瓜分殖民地，他們採取了進攻戰略的方針，他們軍隊的組織是符合於這種要求的。防禦的戰略一般的要求是：準備在自己的領土內抵抗敵人，採取持久戰的方針，因此要求在軍隊的組織上，適合於遠陣地的防禦，多武器以防禦的武器。現代防禦的武器，當中最重要的是平射炮、重機關槍、高射炮、和堅固的堡壘。例如英法就採取了

國別	全師人數	步	槍	輕機槍	重機槍	榴彈槍	平射砲	曲射砲	三七砲
日本	二一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四六四	一一九	六二四	五〇	五四	二四	
德國	一八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三八四	一〇八	六八〇	六二	三九	四二	
英國	一八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三六一	二五八	三二二	三六	二四	—	
法國	一七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三四一	一七六	三七五	三六	二四	二七	

由上表可以看出德日的輕機槍、榴彈砲、砲，都是多於英法的，因爲這是便於進攻的武器，雖然日本的數量上還少於英法六門，這是由於日本經濟力量受到限制，可是對於不設防的中國是足夠了的。英法的重機槍多，這并不表示，德日沒有可能武裝同樣多的重機槍，而是由於他們戰略任務決定了他們的武裝配備。

進攻與防禦的戰略，可能影響於軍隊的組織與裝備，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而更重要的要看所進行的戰爭的性質。

戰爭的性質不外分爲兩種：一種是侵略的、野蠻的、非正義的戰爭；另一種是解放的、進步的、正義的戰爭。

非正義的戰爭，懼怕龐大的軍隊，當士兵們一覺到危險的時候，可以變爲他們的掘墓人。因此他們軍隊的組織，要求武裝力量在數量上並不大，由「可靠的一軍事職業家募集起來，以質量代替數量，充分的配置以一切現代的鬥爭工具，整個的機械化起來，仍然保證其最大的靈活性，這種軍隊的突擊力量組成於龐大數量的快速度坦克、摩托化砲兵與戰鬥空軍。人，基本上，不這是服務於這些機械的步兵部隊，充分裝備着新式自動武器，備着着佔領被征服地方的目的。可是戰爭的經驗教訓了他們，這種建設武裝力量的方法，是不合理的。

軸心統治階級明白職業動員的危險性，同時也知道在戰爭中佔優勢的，是會利用高度的技術，和能出動大量的軍隊到戰場上去的一方面。因此不能不強迫龐大的後備人員入伍，用巧妙的宣傳與鼓動來欺騙羣衆，說是爲了什麼「東亞和平」「聖戰」，「建立世界新秩序」或者是爲了保衛「民主」。

這種方針的，因爲他們爲了保持第一次大戰後所取得的贖物，因此它在軍隊的組織上，只求得如何鞏固自己的陣地，建立了馬奇諾的堡壘，以防止敵人攻入自己的領土。

從現代各國步兵師人數武器的比較上（根據一九三六年的材料），可以得到顯然的證明：

自由「國際公法」和保障什麼弱小國家與弱小民族的獨立而戰。採取法西斯的極端組織來監視士兵，用兵營的隔離，可惡的幹部，嚴格的軍事紀律，以防止士兵們行動的軌軌，政治上沒有絲毫的自由和平等，用最嚴厲的手段甚至屠殺來鎮壓士兵們的反抗。

這就是進行非正義戰爭的軍隊的組織原則。

正義的戰爭則相反，它不惜用龐大的軍隊，它要求全國兵役義務制，和大量的、差不多是全體的勞動民衆的動員，甚至沒有參加到戰場上的那部份勞動民衆都應當軍事化。因爲這種戰爭的目的與勞動羣衆利益相符合，而沒有矛盾存在的原因。這種戰爭要求建設千百萬的軍隊，因爲戰爭需要高質量的和充分數量的軍隊。

這種軍隊的戰士不受到強迫，而是自願參加的；不是欺騙，而是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告訴他們的真理，智識愈增長，戰鬥力愈強，絕無能違守。因此有政治機耐之建立。指揮員與戰士在政治上是平等自由的。相互間建立在階級團結與友愛的基礎之上。有創造性，有自覺性，能利用一切的武器，武裝自己，能使人與武器很好的配合起來，充分的發揚它們所有的力量，而不受到任何的局限性。

這就是進行正義戰爭的軍隊的組織原則。

第三，軍隊活動的地域和其間的敵人，這就是說戰場性質，是山地或平原，是森林或湖泊，是溫帶或寒帶，交通的情形如何，敵人的裝備與戰略的方針如何等等，也都可能影響於軍隊之組織。

在山地作戰，則須適合於山地運動和指揮的軍隊，一般的砲兵很少只能

使用山砲，主要是依其強有力的步兵火力工具，機械化與騎兵兵種很少運用，甚至是不可能的。意大利爲了進攻亞比西尼亞，曾經專門編制了，訓練了便於山地作戰的阿爾卑斯山岳部隊，平原地作戰的軍隊則與之相反。

在森林地帶多的地方，則須編制以曲射砲，一般的平射砲在森林內不能作爲火力陣地的。湖沼多的地方，不利於龐大軍隊的運動，必需具備強有力度的架橋隊和渡河的工具。在寒帶作戰，則須適合於寒帶的銀鍊，寒帶運動的技術和工具，如滑雪滑冰等。日本爲了進攻蘇聯，曾在庫頁島專門訓練了進攻蘇聯的適合於寒帶運動的部隊。

交通的情況，如河川多寡，鐵道、公路有無，大大影響軍隊之組織與編制，交通方便則可以組織龐大的軍隊，充分的使用各種技術的兵種，否則，龐大的軍隊無法展開，大批的供給無從輸送，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

活動的地域，是根據具體的敵人來決定的，有了具體的敵人，就可決定軍隊活動的地域。如德意之攻英法，日本進攻中國與蘇聯，早就在他們戰略計劃之中的。

其次是根據敵人的戰略和可能的裝備，如敵人是防禦的戰略，則我須以便於進攻的組織和武器，相反，則我應有防禦組織之準備，敵人有何種裝備之可能，則我應有克復敵人那些裝備的組織。

	步兵	砲兵	騎兵
第一次大戰時	75-80%	10-15%	15-20%
現代生產水平高的	33%	24%	2%
現代生產水平低的	46%	14-16%	8.8%
蘇聯	40-50%	20%	20%

二、指揮的組織。所有這些兵種，都必須有統一的指揮和管理訓練的機關，這就是參謀部。它指揮、管理、組織作戰。由於現代軍隊之龐大與技術之複雜，參謀部是否健全，在作戰中起着決定性的意義，要求大批的各種專門家和工程師，集中在參謀部裏，才能順利的進行現代的戰爭。

三、勤務的組織。這是指一切兵種的彈藥的供給，對技術兵種的機械和汽油的供給，及衛生勤務，消毒勤務，獸醫勤務，給養供給等，它們都是輔助的機關，可是沒有這些勤務的保證，進行戰爭是不可能的。

四、後方工作的組織。軍隊後方可分兩種：從運至軍團於近後方，軍以上關於整個軍隊的供給，稱爲遠後方。關於軍事的各種生產，軍事工廠與各

最後，根據敵情，管理部隊的條件，要求組織簡單，運動靈便，便於迅速指揮，便於培養幹部，及時的得到補充等等。

這些就是現代各國軍隊，一般組織的基本原則。

二 武裝組織的組成部份

所有武裝力量的組織都是由下列四個原素組成的：

一、各個兵種的組織。

1. 主要的兵種 步兵、砲兵、騎兵屬之。

2. 專門的技術兵種 工兵、化學、通信、鐵道、汽車、衛生等屬之。

3. 輔助的兵種 後方的、醫衛的部隊屬之。

4. 單獨的兵種 空軍、機械化兵團、海軍屬之。

主要兵種與專門兵種，是按戰術上的區分，單獨的兵種則是按戰略上的分別。這些兵種成份多少的配合，是根據各國的經濟條件，戰略任務，軍隊活動的地域和具體的敵人而決定的。例如國上的國家，長於陸空軍，而海上的國家則長於海軍等。

在西歐國家的軍隊，各兵種間的比重大概有如下表（就陸空軍而言）：

空軍	軍工兵	輔助軍隊
0.3-3%	10-15%	—
5%	9%	29.5%
2-5%	5%	28-30%
10%	10%	—

應軍需工廠，軍隊人員之補充，統籌其籌劃、管理與訓練之，以供給軍隊之近後方，它是軍隊一切供給的基礎。

三 各兵種之組織及其初級單位之確定

一、各個兵種組織的確定。由於各種武器的性能不同，步兵有冷器、火器，只能進行肉搏和近距離的火力突擊。砲兵有巨大的威力，可以摧毀敵人的火巢和工事。可是砲兵受着運動性的限制，還不能滿足步兵進攻及時的請求，因此產生了坦克。空軍則更加補助了砲兵，坦克之不足。騎兵在過去是利利用騎馬的突擊力量解決戰鬥命題，在今天則是利用其迅速性，盡其最大

力預備隊的作用。由此可知它們所能完成的任务是各且不同的，因此各部隊的指揮、指揮、管理的工具也不同，所以必須把它們劃歸在各個不同的兵種裏。

二、各兵種初級單位的決定。因為武器的不同，使用的方法與人員也是各異的，例如步槍只一人使用，而機關槍和炮則須集體的使用，且一門炮最少要七人，根據不同型的坦克和飛機而決定使用的人員。總之根據各兵種的進步，和各式武器的不斷產生，在使用上盡量節省人力，及能充分的發揮它的效能，求得管理和指揮的方便，這樣決定各兵種初級單位的組織。它和實際上已經過了很多變動的。如步兵在米爾槍未發明之前，初級單位是三〇〇—五〇〇人，因為當時的槍射程不遠，部隊可以密集，一人足以指揮之。至米爾槍發明以後，還有了炮，射程較遠，且增大了效力，部隊不能密集了，而米爾槍發射的正面，因此以連（一〇〇—一五〇人）為初級單位。至第一次大戰時，各種武器的改良，增加了火力殺傷的效力，要求部隊更趨正面更加散開，均以排四十到五十人為初級單位。至戰役到現在，由於技術上其猛烈的發展，如坦克空軍化學等，步兵有了七種以上的武器。射程幾四公里以上，輕重機關槍，手榴彈，炮兵有極大的火力，戰鬥隊形不是成爲一線散開，而是要求正面和縱深了，因此排成爲了初級的單位（七—二〇人）。現在任何國家的軍隊，均是以班為初級單位。

（上接二〇五頁「論敘述的法則與方法」）

我們可以從資本論以及其餘運用辯證法的模範著作中，學習怎樣克服敘述主義。但敘述主義仍仍處處在。這不要把我現在這一篇著作中的敘述方法，形式當做就是他的研究法的形式。假如我們看那，那麼我們的研究方法也仍舊述不盡敘述主義的泥坑。這固然是不是說，資本論中的敘述方法本身有意變成敘述主義的可能。而是說，我不能只是學習他的敘述形式，並拿公當做研究的方法。資本論在敘述中固然好像是遵循着一定的法則，但法則並不是抽象的法則，而是從具體的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研究中所得的具體的法則。我們倘若研究某一特殊對象，首先不去調查研究，不去掌握材料加以分析，則我所所有的法則就是空虛的，而只是抽象的。以抽象的法則為出發點來進行研究，這種研究就只能敘述主義的，來進行敘述，這種敘述就只能敘述八股。

反對八股的敘述方法當做不是中張把在調查研究中所得理的一切瑣細的東西都搬出來，以表示內容充實，而是按照着具體的法則加以選擇與整理。我們必須使我們的研究工作開始於具體情況的調查研究，終止於具體法則的發現，這樣才能使敘述主義與八股形式根本消滅。

投稿簡約

- 本刊歡迎讀者投稿，其內容性質略如下述：
 1. 發揮及解釋抗戰建國的各種政策。
 2. 對當前國內國際局勢的理論分析。
 3. 各種學術論著（政治的、經濟的、歷史的、哲學的、文學的、……）。
 4. 對於時論的批評及討論。
 5. 大後方各地動盪和敵後淪陷區各種鬥爭實況的報導（包括各種建設事業和抗戰情況）。
- 二、每篇字數最好在二千字至六千字之間，最長不要超過一萬字。
- 三、來稿本刊編者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 四、來稿若不願刊登，如附有足夠郵票者，一律退還。
- 五、來稿用何署名隨便，惟須註明真實姓名與詳細住址。
- 六、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致酬三十元至五十元。
- 七、來稿請用稿紙精寫清楚，請將附原文或詳細註明原稿章、期數、出版處及著作人姓名，重要稿件請註明原稿號，以免遺失。
- 八、來稿請直寄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本刊編輯部。

本刊啟事

本期為紀念五一勞動節轉載艾青的長詩「吳淞有」，紀念五四青年節約稿出版的「從五四運動說到文化、民衆和政治的關係」，這檢尚未發還；又本期時論「希特勒的和平攻勢」與「接受歷史的教訓」，奉命發還，均無法刊出，敬祈作者與讀者諒察！

陝甘寧邊區工業建設和勞工生活的概況

蔡書彬

一 工業發展的雛形

自政府以積極的態度從事於新西北的建設以來，陝甘寧邊區便從實際上來擁護政府這一建設計劃。在環境極端困難的情形下，在戰前不但沒有任何工業的基礎，甚至發展工業的生產手段也非常缺乏的條件下，經過數年來努力奮鬥的結果，大致上已克服了物質條件的困難，戰勝了人為的阻礙，沖破了交通的障礙，使邊區工業尤其是在輕工業的建設上，獲得了相當的發展，替自給自足的經濟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據目前現狀觀察，除了農村手工業及家庭工業外，公營工廠，工業合作社與民營工廠，根據三十年的統計，已經有了二百五十四廠。其中公營工廠和工業合作社的工廠，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茲將民國三十年所統計的公營工廠的百分比分類列表：

- 紡織廠佔百分之三十一
- 煤炭廠佔百分之三十一
- 造紙廠佔百分之九
- 機器廠佔百分之六
- 印刷廠佔百分之五
- 化學廠佔百分之四
- 製革廠佔百分之三
- 其他油廠鹽廠鐵礦等佔百分之十一

這裏必須說明的：第一，工廠內部的設備全部是木質機械，機器設備改良和改進，其生產技術

和勞動組織，仍然帶着手工業形式；第二，因為避免空襲，許多工廠還是深居密洞或分散各地，故其組織範圍受到很大限制；第三，邊區的民營產業數字非常微弱，所以邊區政府在加強發展農村手工業和家庭工業的自給自足的工業政策時，不但注意公營工廠的發展，同時，特別注意民營工業的發展，在原料供給上，都予以極大便利。如政府對綫織分區的民營紡織事業的扶助和棉紗不斷的供給，使去年（三十一年）的洋布出產了一萬八千餘疋，民營紡織廠亦較三十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對紡織生厝合作社的扶助，據邊區政府建設廳可統計，在去年（三十一年）至少生產洋布六萬餘疋。對延安民營煤業的扶助，月能產石煤一百七十餘萬大斤（二十四兩）。對冶金業的扶助，月能產熟鐵四千餘斤等。在輕工業發展已具雛形的條件下，是利於大量投資，去開發一切天然財富的。所以邊府號召國內熱心工業家與海外僑胞對邊區投資創設實業，這也正因為這裏有着豐富的蘊藏：石煤和鐵礦，大量的皮毛，取之不盡的鹽田，源源不絕的油礦，遍山的藥材和化學原料，廣袤的土地都正急待開發。

二 職工會在工廠裏的任務和工作

邊區工廠無論公營（包括軍事工業在內）或民

營均有職工會的組織，凡屬職工沒有任何人甘願站在職工會的組織之外的。就是說都參加了職工會。職工會與工廠的關係，廠方負責領導職務，維持生產秩序，規定管理規則（按該項管理規則不得與勞動合同有所抵觸，並取得職工會同意），嚴禁勞動紀律等。職工會則是職工的羣衆組織，並且是他們的代表機關，它在廠內的中心任務是：監督勞動合同，代表職工與廠方交涉。它的日常工作是掃除勞工中的文盲，把他們的文化水準與政治常識提高；團結勞工以保證生產計劃如期完成，負責維持勞動紀律，適當的改善職工物質條件，如辦理職工福利事業等。因此，邊區勞工不獨對工會抱着無限信賴，並且把工廠當作自己生活的源泉。極的樂觀。

要增加生產速度，改良生活設備，提高工業產品的數量與質量，一定就要注意職工的改善勞工的質條件，調整工資與物價的平衡水準，以安定他們的生活。如果忽視這個前提，強行所謂「抑平物價制工資」，不但對提高生產效率毫無裨益，而且會造成勞工跳離，以及熟練技工脫離生產線，使生產能力與品質趨於低劣等惡果。

三 工資工時與待遇

陝甘寧邊區政府早已感到持久戰中的困難，必然會使物價逐漸地增加，影響勞工生活，故特通令各公營工廠將原規定之工資制，一律改為實物與貨幣的混合工資制，就是說把勞工的工資分成伙食衣

服工資三部份，由廠方分別以實物貨幣發給。關於伙食，是按月每人發給米（有時發麵）四十五斤，其餘鹽油肉類以及普通蔬菜柴炭等，均按照勞工實際需要，具體規定發給，稍有剩餘的勞工，可以將自己應得之份如數領回。關於衣服，由廠方每年內每人發給甲等布單衣棉衣按季各一套。關於工資，在這裏，公營工廠的勞工，所獲得的報酬，是根據時工資制（即按工資標準，勞動者盡了若干勞動力量，就應領取相應之勞務報酬）。因此，根據勞工實際生活的需要和自覺程度，具體規定。在重工業部門的勞工，按月每人發給實物——米一斗到兩斗，每斗以延安市幣（十六兩）卅斤算，每斤合糧食機關的價格法幣二元五毛；輕工業部門的勞工，按月每人發給實物——米八升至一斗六升。職員薪水，則按實際情形決定之。但工資之大小須根據技術高低與熟練程度，勞動熱忱和效率以及未來年齡為標準，如果操件工，其工資大小應根據成品數量與質量，以及原料節省的程度如何而定，且均須由估價委員會，本月份年終以前向工部商酌的原則，予以估價，然後再經廠方核准實施。

陝甘寧邊區的勞工，對工資之規定的公正，甚為滿意，這就由於估價委員會能正確判斷，而不是由廠方單獨決定。因此，估價委員會在各個工廠裏，都有了它的組織，黨委對其威信很高，它的組織原則也很民主，它是由廠方與工會協同組織，再選舉或聘請專家勞工代表參加的。它的工作任務，除負責解決臨時困難外，還依照各級工會會的實際需要，規定集體估價，原則上每半年進行估價一次。估價根據黨委實情，不但有權決定提高模範工人的工資，同時還可以降低懶惰而不負責任的工人的工資。

邊區勞工的工資一般的並不大，同時，這裏的生活標準也不見得很高，而且工人家屬生活均由廠方供給，所以要是同邊府一般工作人員現錢的津貼費比較起來，他們就覺得裕得多了。

工作時間，邊區向來是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自政府頒佈了新的勞工政策以後，全區均自動由八小時變為十小時工作了。還有些特殊情形，如像八路軍印刷廠等，幾個工廠的全職職工，提出增加抗戰義務勞動一小時，一直到抗戰勝利時再行取消的要求。此外，因工作需要而趕工時，就是說在規定工作時間以外做加工，這種工作時間均以八小時為一工計算，每加一工，廠方必須發給勞工貨幣工資三天，但這種額外工，在原則上，每星期不准超過十五小時，以免妨礙勞工身體的健康。夜間工作時間為八小時，懷孕婦女及未滿十六歲的兒童，則均禁止做夜工，有危險性和繁重的工作，亦禁止由女工與童工担負，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嚴禁僱用。至於例假，廠內的習慣是每月四個星期日休息，新年休息一天，春節（農曆年）休息三天，京漢鐵路工人紀念日（二、七），國際勞動節（五、一），抗戰紀念日（七、七），國慶紀念日（十、十）各放假一天。星期日如遇加工，亦以十小時計算，但須發給貨幣工資三天。此外，並規定每年得連續休息兩星期，如不休息者，另發給例假工資。以上這些權利，都在政府勞動保護條例上有明文規定，並在邊區各級工會及勞資全體擁護之下，在各工廠得到了完全的實施。

資制以前，勞工家庭都受有政府的代耕優待，軍事工業部門的勞工，按照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辦法實行代耕。

第二、優待條例——該條例全項內容有：凡（一）勞工在廠工作過程中結婚之妻子或所生之子女，（二）依照勞動合同，廠方允許勞工所帶來之家屬，（三）主管機關命令攜帶之家屬，均由廠方按該條例負責供給該家屬等生活資料。凡廠內女工，在工作過程中生有六歲以下之三個小孩者，准其脫離生產，專門撫育孩子，其衣食住均由廠方供給，但遇職工子女在七歲以上，而仍不送往學校讀書者，廠方得停止其一切幫助。

第三、職工解僱——廠方因故需解僱職工時，必須於十日以前通知工會，以便提出意見，如經同意，廠方得發給一月之工資，作為解僱金。職工自動辭退者亦須事前通知，但不發解僱金。惟抗日抗戰榮譽軍人，須預先呈報政府批准，不得隨意解僱。

第四、俱樂部與工會——邊區所屬工廠幾乎都建立了工人俱樂部，這是職工工餘時作娛樂活動的機關，故一切設備均由工廠資助。凡有職工會組織的工廠，該廠均為其添設俱樂部，該會教育費與辦公費均由廠方按全廠職工應得貨幣工資的總額，按月再抽交百分之六，作為職工會津貼。職工代表在工作時間內，要去參加上級工會會議或其他重要會議時，經由廠方允許者，其開會時間內的工資亦照原給。

第五、疾病傷亡——勞工染病，醫藥住院費概由廠方担任，並酌予津貼。因公受傷，除醫藥住院費與工資照發外，另發一定的保養費。因傷殘廢者，失其一部分工作能力者，另分配適當的輕便工作。

第一、代耕優待——公營工廠尚未完全實行工

工資照給。其失去全部工作能力者，除發給半年之平均工資外，並根據政府所頒佈之撫卹條例辦理。因公死亡者，廠方除負責安埋外，並按照政府的勞動保護條例，予以從優的撫卹；因病死亡者，如其家屬無力安葬，廠方亦須負責安埋，並酌予撫卹。

第六、女工特殊福利——邊府對女工特殊利益尤其注意，規定女工分娩前後，共給假兩個月，除工資照發外，還給產後津貼。因分娩而患病或產者，以病假論。哺乳時每三小時一次，時間為三十分鐘，不扣工資，每月都給生理假（月經）和另發衛生費（草紙）。

第七、宿舍宿舍——職工宿舍陳毅的家俱消耗，如床鋪、櫃、桌、凳、燈油、茶水，及一切衛生設備，均由廠方供給，並相當清潔整齊。

正因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實施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次於頒佈了新的勞工政策、勞工保護條例、保育條例、撫卹條例等，使勞工利益在法理上，得到了保障；因此工人在工廠裏也獲得了合理的待遇。

四 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的發明和改進

要保障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必須先充分動員人力，盡量使用物力。邊區的工業發展，經歷了許多外來的狂風暴雨的摧折，終於成長起來了。這裏，起了推動力量的，一則是技術研究委員會，再就是技工連成訓練班。在技術員主的口號下，勞工都積極地參加這些組織；除了經常要上的技術課程、自然科學、數學等外，並着手實際研究，提供了改良技術的建議，培養了大批熟練技工，供給了各工廠的需要。諸如此類，都獲得了顯著的成績。譬如

建設機器廠吧，馬達運不進來，引擎也運不進來，一切機器都被阻絕了，而我門所用的動力，却是人門早已拋棄了的那些已經爛得百孔千瘡的廢汽車頭啊！爲了維護政府建設新西北的號召，他們獨出心裁地創造出多樣的精巧的小型機器，如車床、床、鑽床等。這種小型機器，正適合於戰時環境的要求。爲了滿足各方面的需要，一方面加緊生產，一方面還進一步的加深研究與改進，以便對專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棧橋的難城紡織廠，全部設備都是些簡單的舊式生產工具。問題不在於使用這些舊工具，而在怎樣善於改造這些舊工具，使它能夠節省物力和人力，以提高生產效率。因此，該廠勞工能在生產技術上、工具上、原料的節省和發明上，都獲得了顯著的成績，舉例如：

- 一、改進了西安紡毛機，減少了人力一倍，同時，使機件運動也增大了一倍，結果毛線生產量遂大大增加了。
- 二、發明了打緯機，使生產增加了三倍，而緯管之紗非常勻整，織時並無絞紗現象，使土經土緯完全成功。
- 三、發現了染料代用品。染料是邊區最難解決的物品，需要的數量又比較大，過去使用的外來品，早已斷絕了來源。大家苦心研究的結果，發現了一種黑格蘭樹根，可以製成染料，其色彩和光澤，並不亞於舶來品。這不僅克服了困難，而且與民國三十年的顏料價格相比較，使成本減低至少是十二倍。而這種樹根在陝北遍地皆是，取之不盡，對發展染料工業，實大有貢獻。

因爲解決了生產工具和染料的困難，使產品的質量精美堅耐，使生產數量也與日俱增。如洋布一項，單在延安，每年產品總量：二七年產洋布一四〇疋；二八年產洋布一、四二六疋；二九年產洋布一四、四七〇疋。並產毛毯四三〇條；三十年產洋布一八、七五〇疋，並產毛毯七、六六一條；三一年產洋布二二、八三二疋，並產毛毯一八、八〇〇條。今年因棉紗一項的計劃，便更達到五〇、〇〇〇條，且種類更速成，的確很快，而且在供給上說來，也漸漸可以達到需要之量。

自給自足自振華紙廠，自其工務科發明了以馬蘭草作爲造紙原料以後，繼續發明改良礱粉大鍋，使生產工具和勞動組織都有很大的改進。女勞動英雄高世清學會了一般社會上所謂「秘而不傳」的織簾術，能在三天內織一床，完成了該廠生產工具的困難，保證了生產的不間斷性。現在不但生產品在基本上已足夠供給全邊區印刷事業之需要，而且質量也比以前潔白耐用。全區印刷事業，按出版局之訂購數字，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七之二強。

印刷方面，曾發現了一種岩石，質細而堅，經試驗的結果，可以代替舶來品石版；同時，還發明了許多其他代用品。

化學工業方面，僅藥品化學方面，化學藥廠去年八九兩月便生產小蘇打等九片五十餘磅，約一萬三千磅；注射劑約二十餘種，共四萬餘支，其他化學藥品，如苛性鹼、土耳其紅油、甘油、碳酸銨等共十餘種，約萬餘磅，至於疫苗也出了數萬支。

日常用品，如蠟燭、火柴、精鹽、牙粉、香皂等都有大批出產，其中成績最大的是肥皂，僅光華一廠，去年（三十一）共產三十萬餘以上，不僅可以自給，且能以一部分外銷，大大地爲邊區足供供給各縣之需要。文化用品如油墨粉筆等等，

以上所舉，概是爲的說明勞工的生活安定了，自動的勞動創造性和勞動熱忱增加了，所以便能够獲得這樣成績。

在工業建設中，還有許多生動的故事，如在邊區人所共知的典型的農工勞動英雄吳有等，工業勞動英雄趙占魁等，發明家和創造家：紡織廠的朱次復，造紙廠的羅壽俊，機器廠的趙連孝等。政府爲了要鼓勵在生產技術上有所發明和改進，常按照技術發明條例分別予以物質獎勵。在不久以前，還獎勵過新華化學廠九人，難民紡織廠八人，振華造紙廠五人，鑛具工廠五人，機器廠三人，光華印刷廠二人，光華製版二人（獎金最高的二千元，最低的五十元）。

五 文化水準的提高與政治地位的改善

提高勞工文化程度及其政治常識，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是增加生產的生產力三位一體的任务。所以邊區與邊區工會盡一切的努力，首先決心在各個工廠進行掃除盲文盲現象。大家都知道，陝甘寧邊區在抗戰以前沒有工廠，就是識字的人在一二個份裏，一百個人中也難找到兩個，有些縣份（如華池，鹽池等）甚至到百個人中難找到一個識字的。因此，要將工廠裏的文盲掃除淨盡，也並非容易的一件事。這種工作是要有長期的，耐心的艱苦精神的。這裏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一下吧。

難民紡織廠的職工約計有六百左右，青工就佔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文化程度該廠教委會的統計，住過大學的兩名，中學程度的百分之二，小學程度

度的百分之十；初級文字約百分之十八，完全不識字的人，就佔了百分之七十。經過五年來不斷的艱苦努力，文盲現象是掃除了，所有工人最低限度都能認識三百個字左右，大部分且能作短文或寫簡章等。

這些不容易獲得的成績，首先應歸功於文化教育委員會的艱苦努力。該會經常研究教材與教法，按程度編理，保證集體自修，組織小組討論，並舉行定期測驗，經常對學習檢查與督促。這樣組織及領導，使得不願意學習的或對學習不感興趣的勞工，都熱烈地學習起來了，天剛破曉，他們就拿着書本在田野上，樹林邊，土炕旁，窯洞裏，低着頭讀書識字，工餘時間習字，記筆記，做討論提綱，看小說等。文化程度低的，開始上課字課或讀報課，文化課的內容是：國文、算術、史地、藝術及一般的科學常識和政治常識。文化程度高的，選自動的組織文藝、圖書和各種學習小組以及時事座談會等。文化程度的提高，學習的進步，自然會使勞動熱忱隨之增高了，政治認識隨之開展了，因此，廠內的民主生活也就大大的活躍起來了。在工會領導機關的選舉運動中，在會議生活中，民主方式和作風是非常淳厚的。

不僅如此，邊區勞工在邊區第二屆參議員選舉運動中，他們很熱烈的參加競選，結果，在二零五名的參議員中，勞工出身的參議員就有二十名，直接由工廠選出來的有四名，參議員李平（印刷工人），吳生秀（難民紡織廠的廠長），候補參議員趙占魁（鑛具工廠的勞動英雄）等。縣參議員中有農業工人六十五名，手工業工人三十二名。鄉參議員共三千九百二十八人，其中就有農業工人一千一百八十二名，手工業工人三百七十四名。參加民意

機關的勞工代表被選行政負責人員的數字，同樣不少。

在這裏，由於工業經濟很快的發展，致引起勞工尤其是技工的缺乏，迄今仍未解決，因此，政府在建軍方面，對勞工參加兵役的動員頗感困難。可是他們以當十八集團軍戰士爲榮，不僅自己要求參加，還宣傳別人一同參加；據去年的統計，勞工入伍的仍佔百分之二十，不說生產的勞工，均成爲自衛軍與少先隊的骨幹。

這些事實，證明了：祇有民主政權才能給勞工大衆以必要的和應有的民主權利，而勞工大衆取得了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政治自由之後，一方面使他們的生產熱忱提高了，政府廠方都可得到增加生產的好處；另一方面也使他們的生活改善了，而大大有助於他們的勞動效率和文化的提高。

六 文化娛樂運動

邊區文化娛樂運動，完全由工廠工會文化教育委員會領導的，其組織分：（一）職工教育（上段已略述其工作情況）；（二）壁報，每月一次到兩次；（三）圖書室，供應書籍課外報章雜誌等；（四）俱樂部，青年人參加極其踴躍。晚會每月舉行一次或兩次，內容有歌詠雜耍話劇等，有時則組織歌隊跳舞晚會。初時由於不慣，大家亂跑亂跳，還有害羞的。自引起黨衆的興趣後，每當晚會開時，他們與她們便興高采烈的成羣結隊的跳起來了，這也說明青年勞工只要能使他們發生興趣，未有不樂於參加的。（五）體育組，徒手運動，每早晨有組織的上午操；球類運動，有各種球隊如籃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等，只有乒乓球因月前購買困難已無形取消了。「打日本」遊戲很時興，既對身體有益，又很節省，各廠都很盛行。這種文化娛樂運動之推廣，不僅增加了勞工的生活興趣，而且必能提高了他們在工作時的生產效率，在抗戰中發揮精神。

列寧論托爾斯泰 (其二)

戈寶權譯

托爾斯泰晚年的思想，曾有過很大的轉變，他不僅厭惡舒適的貴族生活，並且還放棄了自己的私有財產及著作版權等。去世之前幾年，他秘密寫好遺囑，將所繼承的田地分贈給農民，將其生平所有的著作無代價的公之於世。可能這都是他，並沒有得到他夫人的同意，再加上家裏中文新引起許多不愉快的糾紛，所以托爾斯泰幾次想離家和自殺，但終未遂成爲事實。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九日的深夜二時，托氏的夫人走過他的書房搜查文件，爲托氏所發見，托氏忍無可忍，就採取了最後的步驟，在天未黎明之前就將家人出走了。當時托爾斯泰的計劃，是想由南俄出逃，但這時他已八十二歲的風燭殘年，再加上旅途中的辛苦就患了肺炎，於十一月二十日死在一個名字叫做阿羅斯波伏的小火車站上，遺體則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葬於托氏的故居——耶爾加雅。波里而拉莊園中。

列寧所寫的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於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社會民主黨」報中，後經上邊另有一題題目：「L. N. 托爾斯泰在俄國革命及俄國社會主義歷史中的意義」，但編入「列寧全集」時即改用今名。現此文係根據「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四卷第四〇〇——四〇三頁譯出。

L. N. 托爾斯泰

——譯者

察夫·托爾斯泰逝世了。他作爲藝術家的世界意義，他作爲思想家和說教者的世界名聲，這兩者是按照各自的方式反映出俄國革命的世界意義。

這是在農奴制度時代(註一)，L. N. 托爾斯泰就作爲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出現了。在半個世紀以上的文學活動中，他寫成了許多天才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所描繪的，主要的是那個舊的革命以前的俄羅斯，就是在

地主和農民的俄羅斯。在描繪這一階段的俄羅斯生活時，托爾斯泰善於提出了許多偉大的問題，善於達到極高的藝術力量，以致使他的作品在全世界的文學中，佔了一個首要的地位。由於托爾斯泰的天才的光輝的照耀，一個被壓迫民族所追求的國家中的革命準備時期，竟能在全人類的藝術發展上進了一大步。

藝術家的托爾斯泰，甚至在俄國也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道。爲了要使他的偉大的作品真正成爲所有人的財產，就必須要有鬥爭，就必須向那使千百萬人陷於黑暗、愚昧、貧役和貧困之中的社會制度作鬥爭，就必須要有一個社會的變革。

並且托爾斯泰不僅創造了許多藝術作品，可供大眾在推翻了地主及資本家的權權而爲自己創造出人的生活條件的時候永遠重新和閱讀着，——他還善於用爲人的力量，表達出被現代制度所壓迫的廣大羣衆的情緒，描寫出他們的境况，反映出他們自覺的抗議和不滿的情緒。作爲藝術家、思想家和說教者的托爾斯泰，主要的是屬於一八六一年至一九〇四年的時期(註二)，他以爲人的浮遊的筆法，把整個第一次俄國革命的歷史特性、它的長處和它的弱點，都顯示在他的作品中。

我們革命的一個主要的顯著特點，就是當資本主義在全世界達到極高程度的發展和在俄國達到相當發展的時候，我們的革命是一個農民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它之所以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爲它的直接的任務，是推翻沙皇的專制政體，沙皇同君主政體和殘廢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而不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農民是特別沒有意識到後一個任務，也沒有意識到後一個任務和其他許多更急迫更直接的鬥爭任務的不同之處。並且，我們的革命之所以是一個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因爲客觀的條件，將改變農民的本身生活條件的問題，將發達舊有的中世紀的土地私有制問題，將爲了資本主義「開闢道路」等問題，提到了第一位，客觀的條件並且使農民羣衆走上了多少帶有獨立性的歷史活動的舞台。

在托爾斯泰的作品裏面，這種農民羣衆運動的長處和弱點、力量和限制性都給表現出來了。他對於國家和警察的官方教會的那種熱烈、憤慨而且是常常無情和銳利的抗議，表現了原始農民的民主主義的情緒，由於幾個世紀以來的農奴制度，官吏的橫行和掠奪，教會的狡猾、詭計和欺騙，在農民的這種情緒裏堆集了如山似的苦痛和憎恨。他對於土地私有的堅決的反對，表現了一個歷史時期的農民羣衆的心理；在這樣的一個時期中，古老的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就是地主的和官方的「國地」制度，已成了俄國進一步發展的一種終於不能再忍受的障礙，而且這時候這種古老的土地私有制度，已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最急遽而無情的毀滅之路了。他對於資本主義的那種充滿了最深刻的感情和最激烈的憤怒的不斷的描寫，表現了宗法社會的農民的全部恐懼；一個新的，看不見的和不可理解的敵人在農民的面前出現，這個敵人是從某一個城市或是某一個外國來的，他毀壞了農村生活的一切「基礎」，帶來了空前未有的破產、貧困、飢餓與死亡、野蠻、賤賤和梅毒——「原始積蓄時期」的這一切災害，是因為「股票先生」（註三）所創造的許多最新的掠奪方法，被移植到俄國的土壤而來而更加百倍地尖銳化了。

可是同時，這位熱烈的抗議者、熱情的控告者和偉大的批評家，在他自己的作品裏面，又暴露出他不懂得那近逼俄國的危機的原因和逃避這個危機的方法，這種不懂得只有對於宗法社會的機密的農民才是自然的，而對於一個受過歐洲式的教育的作家則不合適了。反對農奴制和警察制的國家以及君主制度的鬥爭，在他的身上就變成了否認政治，宣傳「對於惡的無抵抗」，甚至完全避開了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註四）的羣衆的革命鬥爭。他和官方教會的鬥爭，是和他宣傳純淨的新宗教，即是宣傳那種純淨的和精製過的麻醉被壓迫羣衆的新毒藥同時並進的。他否認土地的私有制，並沒有引導到要集中全力去反對真正的敵人，去反對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度和它的政治權力的工具——君主專制，而只是引導向幻想的、液態的和無力的悲嘆。他一方面對於資本主義及其帶給羣衆的災害加以非難，同時又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所領導的全世界的解放鬥爭，採取完全冷淡的態度。

在托爾斯泰的觀點中的矛盾——不只是他個人思想的矛盾，而是些極其複雜的矛盾現象、社會的影響及歷史的傳統的反映，這一切曾經決定了改革後和革命前的俄國社會中各階級和各階層的心理。

因此，對於托爾斯泰的正確的評價，只有從一個階級的觀點才有可能。

這個階級當社會矛盾第一次在革命中求取解決的時候，它以自己的政治作用及自己的鬥爭，證明了它是爭取人民自由和將羣衆自剝削之下解放出來的註定了的領袖，——證明了它是絕對忠誠於民主主義的事業的，而且能夠和資產階級的（其中也包括農民的）限制性和不穩定性作鬥爭，——對於托爾斯泰的正確的評價，只有依據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觀點才有可能。

讓我們來看一看政府報紙上對於托爾斯泰的評價吧。他流瀉了一些虛偽的眼淚，確言他對於這位「偉大的藝術家」的尊敬，同時又否認了「最神聖的」宗教會議（註五）。而那些最神聖的領袖們，又作了一件特別卑劣的「下賤的事實」，他們派了幾個牧師到這幾位行將天逝的人的面前去，以便來愚弄人民和向人民說：托爾斯泰「懺悔了」。最神聖的宗教會議，曾經將托爾斯泰開除了教會（註五）。這樣到更好。當人民將來和穿制服的官吏們、和信奉基督的憲兵們，以及和那些贊助沙皇黑惡百人團迫害猶太人等偉業的黑暗的宗教裁判所算賬的時候，他總會記得宗教會議曾經做過這樣一件偉業。

再來看一看自由派的報紙對於托爾斯泰的評價吧。他們說了一些空洞的、官僚自由主義的、陳腐不堪的教義式的語句，就了事，舉如什麼「文明人類的呼聲」呀，「世界一致的悶響」呀，「真和善的觀念」呀等等，可是也正因为這些東西，托爾斯泰才痛斥了——而且非常正確的痛斥了——資產階級的科學。他們不能坦白和明瞭地說出他們對於托爾斯泰關於國家、教會、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觀點的意見——這並不是因為檢查制度阻礙他們；相反的，檢查制度是在幫助他們解除這些困難呀！——而是因為托爾斯泰的批評的每個原則，對於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都是一個打擊；——而是因為托爾斯泰無畏地、公開地、尖銳地提出了我們這個時代最麻煩和最討厭的問題，這對於我們的自由派（以及自由主義的民粹派）的政論之陳腐的詞句、庸俗的巧辯、和動搖不定的「文明化」的謊話，是迎面來了一個痛擊。自由派像一座山似的擁護托爾斯泰，也像一座山似的反對宗教會議，可是他們同時又擁護「道標派」（註六），據他們看來，「可以」和「道標派」們「爭論」，但也「必須」和他們站在一條線上，「應該」在文學和政治上同他們「齊工作」。而安東尼·伏林斯基（註七）就和「道標派」們合氣為一氣了。

自由派特別重視托爾斯泰——是個「偉大的良心」。難道這不是「新時代」（註八）以及這一類的報紙所曾經反覆過千百遍的空話嗎？難道這不是

這說托爾斯泰所提出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具體問題嗎？難道這不是強調那表現托爾斯泰的偏見而沒有表現他的理智的東西嗎？強調他的屬於過去而不是屬於將來的東西嗎？強調他否認政治和鼓吹道德上的自我完成而不是他對階級統治的猛烈的抗議嗎？

托爾斯泰逝世了，而革命前的俄羅斯，以及表現在這位天才藝術家的哲學裏和描繪在他的作品中的俄羅斯的弱點和無力，也已經過去了。但是在他的遺產中，卻有一些沒有成爲過去而是屬於將來向東西。這個遺產將由俄國的無階級接受過來和再加以整理過。它將向勞苦的和被壓迫的羣衆，解釋出托爾斯泰對於國家、教會和私有土地制的批評的意義，——它的目的並不是將羣衆只局限於對宗教生活的自我完成和憧憬，而是爲了使得他們起來給沙皇專制政體和地主土地私有制以一個新的打擊，這些制度在一九〇五年只受了一個小小的創傷，此後是必須將它們徹底破壞的。它將向羣衆解釋出托爾斯泰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這不是爲了使羣衆只局限於對資本主義及金錢勢力作各種阻咒，而是爲了使他們在自己的生活和鬥爭的每一個步驟上，吸取資本主義的技術的和社會的成果，學會了組成一枝社會主義的統一的大軍，去推翻資本主義和創造出一個沒有窮人，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的新社會。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新曆二十九日）「社會民主黨報」第十八期上——

附註

（註一）俄國於一八六一一年實行農奴解放，農奴制度的時代即指此前的時期而言。關於農奴解放的情形，請參閱本刊第六七期合刊第一八二頁註四。

（註二）一八六一一年至一九〇四年的時期，即指農奴解放至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國大改革之間的時期而言。

（註三）原文(Goethe in Kunon (Mr. Coupon)，意譯即爲「股票先生」。克已的譯文，誤譯爲「原始的積蓄」的時代的這一切的問題，比克波斯奈德所計劃的掠奪方法移殖於俄羅斯地盤上所及的影響，更加百倍激化」。

（註四）這是俄國革命高漲的一個時期，繼之而來的，就是托爾斯泰的反動時期，是俄國革命上最反動的時期。

（註五）宗教會議(Synod)式宗教院，是俄國自一七二一年後所建立的「個宗教的最高管理機關，參加這個機關，多半是由政府所任命的大主教組成的，但負責權的，則是政府的官吏「總檢察長」。

（註五）托爾斯泰因爲修改四福音書及反對正教的許多愚昧的制度，曾於一九〇一年爲「宗教院」開除出俄羅斯正教會。自此時起，托爾斯泰的著作不僅受政府的檢查，同時還要受教會當局的審查，方可出版。當托爾斯泰逝世之前，宗教院曾派了人去查托爾斯泰，要他在逝世之前懺悔，大主教安東尼還發了一個電報給他，內容說：「當閣下和教會決絕的最初，我就不斷地祈禱上帝，要主將閣下召回教會，就是現在我還是這樣祈禱着。主不久就要將閣下召回來審判了吧。因此，當閣下現在臥病床榻時，我是切望閣下與教會及俄國正教教民和解的一個人」，可是這一切都失敗了，當時托爾斯泰已經病危，醫生及親族都拒絕有人再去看他，趕到托氏逝世地點的一位主教是到邊了，就是安東尼的電報也沒有能交給病人。因此，當托爾斯泰逝世的這一天，宗教院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通過了一個「不許爲托爾斯泰伯爵供奉」的決議。

（註六）見本刊第四期合刊第一〇八頁註二。

（註七）安東尼·伏林斯基 (Antonii Volynsky) 原名赫拉波維支基 (A. P. Kirapovitsky)，生於一八六四年，是位無色白人團的大主教，同時又是位「戰鬥的僧侶主義」的理論家及沙皇政府反動政策的執行人之一。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間，曾任過烏克蘭許多教區的主教，當蘇聯內戰時，與白黨將軍丹尼金合作，在烏克蘭各地組織保皇黨小組，從事反革命的活動，內戰結束後，即逃亡至南斯拉夫，企圖返俄恢復君主制。

（註八）「新時代」(Novoye Vremya) 是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彼得堡所出版的一種反動的報紙，是保守派的貴族及官僚的機關報，主持人爲蘇伏林。

內政部雷發新登報字第六八六五號
東山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
重慶市國貨雜誌社第五五六號

本期零售一元



要目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建議

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全文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

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

科學與民主

陶希聖的「論道集」批判

伍明

止戈

陳家康

三十二年六月一日

目錄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建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全文	(二一九)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的決定	(二二一)
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二二二)
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	(二二九)
時	
團結，堅持，必獲勝利	(二三三)
羅邱第五次會談	(二三四)
鞏固國內團結	(二三五)
太行山血戰	(二二六)
論	
關切前線，幫助前線	(二二七)
專	
論	
科學與民主	止戈(二二八)
研究	
軍隊的組織問題(下)	許光遠(二三〇)
批評	
陶希聖的「論道集」批判	陳家康(二三五)
邊	
編	
陝北的「變工隊」	曹任(二四〇)
靖邊的水利事業	惠中權(二四一)
介紹	
列寧論托爾斯泰(共三)	戈實權譯(二四四)
讀報札記	
談經濟上的遠景與近況	卓芬(二四六)

群衆

第八卷 第九期

三十二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群衆週刊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理 新華日報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各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	一元
六期	五元四角
十二期	十元
廿四期	十九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匯印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建議

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全文

五月二十一日其理報刊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決定如下：

一九一九年由絕大多數的老的職前的工人政黨在政治上破產的結果而組織的共產國際，其歷史任務是在於保護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使它不被工人運動中的投機份子庸俗化和歪曲，在許多國家內，共產國際曾幫助把前進的工人們的先鋒隊組織成真正的工人政黨，幫助他們動員勞動大眾，爲了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法西斯所準備着的戰爭而奮鬥，爲了支持爲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機關的蘇維埃聯邦，以保障勞動大眾的經濟和政治的利益。共產國際曾及時地揭發了希特勒匪幫把「反對共產國際盟約」當作戰爭準備的武器的真正意義。早在戰爭以前，共產國際曾不倦地揭發了希特勒匪幫在外國的卑劣陰險的活動，他們以斷言共產國際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的故事來掩飾這些活動。

但是早在戰爭之前，即已經變得日益明顯，個別國家的內部和國際形勢既已變得更加複雜，則經由某種國際中心來解決每個個別國家內的工人運動的問題，會遇到不能克服的阻礙。

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發展的歷史道路的深刻差別，它們的社會秩序的各種不同的性質以及甚至矛盾，它們的社會和政治發展的水平 and 速率的差別，以及工人們的自覺程度和組織的差別，也是決定面對着每個個別國家的工人階級各種問題的條件。

過去二十五年來各種事件的過程和共產國際累積的經驗已經明確地證明，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所採用的團結工人的組織形式，符合於工人運動復興的初期的需要，却已漸漸不能適應工人運動的增長和每個國家內增加的複雜問題，而且證明這個組織形式甚至已經變成進步加強各國工人政黨的阻礙。

希特勒匪幫引起的世界戰爭更使各國內部形勢的差別尖銳化，在接受希特勒匪幫的暴政的國家和愛好自由的團結在偉大的反希特勒聯盟之中的民族之間，劃了深刻的分界線。在希特勒匪幫集團的國家和愛中，工人們、勞動者們和一切誠實的人民的根本任務是以一切想像得到的方法從內部顛覆希特勒匪幫的戰爭機噐，協助推翻負責戰爭的政府，以打破這個集團。在反希特勒聯盟的國家之中，爲了儘快摧毀希特勒匪幫集團和獲得各民族之間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之上的友誼的合作，最廣大人民羣衆的，首先是進步工人們的神聖責任，是以一切方法支持這些國家的政府的作戰努力。同時一定不要忽略，有些個別的依附反希特勒聯盟的國家也有它們的特殊任務。譬如在希特勒匪幫佔領了的和喪失了國家獨立性的國家內，進步工人和廣大人民羣衆的基本任務是發展武裝鬥爭，使它發展爲反對希特勒德國的全民解放戰爭。

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

伍明

這期本刊刊載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這個決定不只是國際勞工運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標誌，同時也爲今後國際工人運動的進一步增長和團結，以及國際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展開了一個新的起點。正因爲這樣，這個決定就更加值得我們的重視和研究。

講到國際工人運動的增長和國際工人的聯合組織，是有一段很久的歷史的，就拿最早的一個國際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來講，也已有百多年以上的歷史了。在這一百多年中，國際工人運動在不斷地增長着，發展着，因此國際工人的聯合組織也隨着它在不斷地演變着，變化着。我們只要看一看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的發展歷史過程，就知道國際工人組織是隨着國際工人運動的增長和情勢而在變化着的，我們從此也可以看出這次共產國際解散的原因和意義。

還遠在一八四七年時，在倫敦就出現了第一個國際的革命團體：「共產主義者同盟」，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直接參加了這個組織的工作的。這並不是一個廣大的公開的組織，但它却爲國際工人組織種下了一顆種子，它是第一國際的前身和萌芽。由於各國工人階級意識和國際工人聯合的意識的增長，這樣到了一八六四年九月廿八日，在馬克思的積極參加之下，第一國際就在倫敦正式成立，它還另外有一個名稱，就是「國際工人同志會」。它的任

同時，愛好自由的各民族的反希特勒政的解放戰爭，使最廣大的人民大衆活動起來，他們不分黨派或宗教，都團結在強大的反希特勒聯盟的隊伍裏。這個戰爭更加明顯的說明，爭取對敵人的最迅速的勝利的民族高潮和羣衆動員，能够由每個國家的勞工運動的先鋒隊，在它的國家的範圍內，最好的有成效的實現。

一九三五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考慮了在國際形勢和勞工運動中所經歷的變化，而這些變化要求各支部在解決他們面着的問題時需要更大的伸縮性和獨立性後，當時就已經強調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勞工運動的一切問題時，需要「從每個特定國家所具有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出發，一般的要求避免直接干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的組織事宜」。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考慮和批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美國共產黨退出共產國際的決定時，就是以此爲指導原則的。

共產黨人在馬列主義的創造者的學說的指導下，從來不主張保存已經變成陳舊了的組織形式的；他們總是使勞工運動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從整個勞工運動的基本政治利益，服從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及從這些條件直接產生出來的各項問題。他們記起偉大的馬克思的榜樣。他曾將進步的工人團結到國際工人聯合會的隊伍裏來。在第一國際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奠定了歐美各國工人政黨的基礎以後，馬克思鑑於創造民族的工人的羣衆性的政黨的日益需要，乃實行解散第一國際。因爲這種組織形式已不再符合這個需要了。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從上述的各項考慮出發，並估計到各個國家的共產黨及其領導幹部的成長和政治上的成熟，同時也由於在此大戰爭中，有若干支部提出解散作爲國際勞工運動指導中心的共產國際的問題，更由於在世界戰爭的情況下，無法召開共產國際大會，乃由其本身提出下列建議，交由共產國際各支部批准：解散作爲國際勞工運動指導中心的共產國際，解除共產國際各支部對共產國際的章程及歷屆大會的決議所產生的各種義務。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號召參加共產國際的全體成員，集中他們的力量於全力支持並積極參加反希特勒聯盟的各民族和國家的解放戰爭，以儘快的摧毀勞動人民的死敵——法西斯主義及其同盟者和附庸。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署名)哥特瓦爾德、季米特洛夫、日丹諾夫、柯拉洛夫、柯羅萊尼格、庫西寧、曼努伊斯基、馬爾科、皮克、弗洛林、麥爾柯利。

附隨此決議者，有下列各國共產黨代表：

比安柯(意大利)、伊巴露麗(西班牙)、蘭汀寧(芬蘭)、波克爾(羅馬尼亞)、拉柯西(匈牙利)。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擬定

務是在於廣泛地宣傳革命社會主義的思想和領導各國工人階級的鬥爭運動。這個國際的綱領是馬克思起草的，它的第一句就是「工人的解放，應該是工人本身的事業」，而宣言的結束語，則是這樣一句戰鬥的口號：「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

第一國際前後一共存在了九年(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三年)，舉行過五次代表大會，它領導了當時歐洲的、特別是美國的工人運動，其中更有許多的人參加過建立巴黎公社的光榮事業。它的偉大的歷史意義就在於它是國際工人階級的第一個獨立組織，並進一步推進了各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共產國際的綱領中這樣寫道：「第一國際奠定了國際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鬥爭的思想基礎」。至於第一國際在一八七三年解散的原因，正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所說：「在第一國際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奠定了歐美各國工人政黨的基礎以後，馬克思鑑於創造民族的工人的羣衆性的政黨的日益需要，乃實行解散第一國際。因爲這種組織形式已不再符合這個需要了。」

這樣過了十六年，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第二國際在巴黎正式成立。在這十六年的時期中間，資本主義有了強烈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統治也日加強固，同時作爲政治的(工人政黨)和經濟的(職工會)的工人階級組織也隨着增長起來。這就使得各國的工人政黨不得不走向國際聯合組織和行動的道路，第二國際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出來的。這個國際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舉行過八次代表大會和一次非常會議，國際五一勞動節和八小時工作制，就是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在最初的幾次大會上，除去制定了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的基本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

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一) 中共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自即日起，中國共產黨解除對於共產國際的權權和權次大會決議所規定的各種義務。

(二) 共產國際曾完成了它自己的歷史使命。它不僅在歐美及日本保護了那被機會主義者所糟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幫助了先進工人團結成真正的工人政黨，支持了社會主義的蘇聯，百折不撓地反對了法西斯主義與法西斯戰爭，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幫助了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先進工人，組成自己的政黨。

(被略十九字) 特別使中國人民不能忘記的， (被略八十八字) 最後，

在一九三七年以後的六年抗日戰爭中，它號召各國支部和各國勞動人民，幫助了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總之，在共產國際存在的一切時期中，對於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是盡了它一切可能之力，來加以援助的。時至今日，正如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提議書上所說，因為各國內部和國際的情況變得十分複雜，這個原有的組織形式已經不能適應各國工人運動的繼續增長，因為在當前的反法西斯主義同盟的解放戰爭中，各國共產黨更加需要根據自己民族的特殊情況和歷史條件，獨立地解決一切問題，爭取更加廣泛與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和羣眾動員，藉以達到澈底的完全的勝利，因為各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幹部的成長和政治上的成熟，——由於這種種原因，故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向各國共產黨提議解散共產國際。在現在的各種條件下，共產國際之解散，是比較其繼續存在更加有利的。由於目前戰爭情況不允許召集國際代表大會，討論共產國際解散的問題，故由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向各國共產黨作出此種提議。因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這一提議書上所說的理由，批准共產國際之解散。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並提出：在馬克思主義第一國際之後，各國工人運動是更加發展了；現在第三國際之宣佈解散，無疑的將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與全人類的解放更加迅速的到來。

(三)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結果，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也是那裏有無產階級和工人運動，那裏便會有一天出現無產階級政權。假使從來沒有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歷史必然的定律。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創立時起，即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的向全中國人民指出了反帝鬥主戰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黨同志以身作則

本原則之外，同時各國的工人政黨也脫離了經濟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站到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來了。從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起，資本主義已開始進入了帝國主義的階段，隨着鬥爭的尖銳化和工人運動的加強，一部分工人實業就轉在改良主義的道路上去求取解決革命鬥爭的方法，這樣他們就開始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種下了機會主義的毒害。這種情形在第四次倫敦大會（一八九六年）、第五次巴黎大會（一九〇〇年）上都很明顯地表現出來。

從一九〇四年以後，布爾塞維克開始參加了第二國際的代表大會，像一九〇七年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一九一二年代的巴塞爾大會，一九一五年的齊美瓦德代表會議等，都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因為在每次會議上都表現了布爾塞維克派和機會主義者的激烈鬥爭。舉如在巴塞爾大會上，布爾塞維克派就提出了對於將來臨的非正義戰爭的態度，認為社會民主黨人和無產階級應該反對這種戰爭的。

列寧還從戰爭初起時，就指出了當時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的危機，和它形將潰滅的徵兆，認為第二國際已不能再負起國際工人革命運動的責任。而列寧想發給組織一個新的共產主義的國際的思想，就在這時被成長了。同時由於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和革命情勢的需要，一九一九年的三月，在莫斯科舉行了第三國際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奠定了第三國際的基礎。

第三國際又名共產國際，自一九一九年一直到這一次解散的決定為止，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這二十五年中間，它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一個最統一、最堅強的組織和樞紐。它先後一共舉行過七次代表大會，其年代是：

第一次代表大會 一九一九年三月

，忠心不貳的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業而奮鬥，流血犧牲，前仆後繼。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會經獲得共產國際的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够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自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不干涉各國共產黨組織事宜之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即遵照此種決定，沒有干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事宜。中國共產黨（被略二十二字）

在隨後進行歷史上空前艱苦的鬥爭，這完全是中國共產黨赤手空拳不假任何外力而獨立創造起來的，而自抗戰以來，即

（被略一百四十六字）

（被略三十字）

支持國民政府的抗戰，直至戰勝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獨立民主新中國的大業。

（四）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是（被略四字）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揚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中國共產黨也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做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的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這一運動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上的創造才能，以及他們在革命實踐上的創造才能，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能够和中國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國人民所賦予的各種歷史天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深信我黨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團結起來，克服自己的缺點，發揚自己的創造性積極性。果能如此，那末，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雖然還很強大，我們前進路上的困難雖然還很多，我們的任務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一九四三年五月廿六日

「……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接受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提議，……英國共產黨保證繼續努力爭取戰爭的勝利，加強反法西斯主義的民族戰線，並建成反法西斯主義的各地工人運動之間的最密切的團結」（倫敦二十六日電）。

「墨西哥共產黨政治局……批准這個提議（指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譯者）……墨西哥共產黨將繼續為民族反法西斯團結，為加強反希特勒聯盟，為動員全國，堅持作戰，直至完全摧毀希特勒主義為止而鬥爭」（紐約廿七日電）。

「美共總書記白勞德對新聞界發表聲明稱：『共產國際主席團提出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在組織上並不影響美國共產黨地位，因為從一九四〇年起，美國共產黨就不參加世界以外的組織。但我的意見是，美國共產黨願對這提議及其動機表示贊同，因為美共自己的經驗已經指出了同樣的方針』（紐約二十四日電）。

「斯德哥爾摩訊：每日新聞報發表公報如下：『瑞典共產黨政治局在研究了所談這的原因之後，一致贊同並擁護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提議』（莫斯科二十四日電）。

- 第二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月
- 第三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月
- 第四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月
- 第五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四年六月—七月
- 第六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月
- 第七次代表大會 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月

我們從它的組織中也可以看出它的力量，當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它只有十九個支部，到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時，就增加到五十八個支部，同情組織也增加到十八個。再從它所包括的各國黨員的數目來說，在一九三五年時即達到了三百一十四萬八千人以上。

從它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它是粉碎了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的思想，負起了國際工人階級的真正的歷史使命，這也反映這次大會的宣言中所說：『它的歷史任務是在於保護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使它不被工人運動中的技術份子庸俗化和歪曲。在許多國家內，共產國際曾幫助把前進的工人們的先鋒隊，團結成真正的工人政黨，幫助他們動員勞動大眾，爲了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法西斯所準備的戰爭而鬥爭，爲了支持作爲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堡壘的蘇聯，以保障勞動大眾的經濟和政治的利益。……』從它的各次代表大會，我們也可以看出它的偉績，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共產國際宣言』，總結了過去的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和指出了今後的任務：『假如第一國際預示出未來的發展和指出它的途徑，假如第二國際聚集了和組織了千百萬的無產者，那麼第三國際就是一個作公開黨活動的國際，就是一個實現革命的國際，就是一個『專制的國際』。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會之間的時期，是戰後革命運動迅速增長的時期，在第二次代表

團結，堅持，必獲勝利

——紀念「五卅」十七週年——

「五月三十日這一個日子，在我們腦子裏留下印象，比五月七日五月九日這兩個日子更難以忘却；……而五月三十日却是中國民族獨立運動開始的日期」。這是當年一個記者錄下他對「五卅」所有的印象。他說：「我們必須認清……五卅以後各地所起的反響，是中華民族要求獨立與生存的大運動」。

的確，五卅事件決不是什麼「細小的」，偶然的或「局部的」事件，而是中華民族要求獨立解放的總爆發。而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死敵則是日本帝國主義

十七年前的五月，上海在日本帝國主義蹂躪下的內外棉織會社工廠工人，因要求改善待遇而全體罷工，日本帝國主義對於這種出於不得已的工人運動，時而用高壓手段，時而用欺騙方法，終且亂開手槍，擊斃了工人顧正洪。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從來就不當做人來看待的。打死了人，還不准別人聲張，禁止報紙登載這件事情。就是這種橫暴的帝國主義統治，激起了青年學生的悲憤，激起了上海市民的公憤，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而造成怒不可遏的「五卅」運動。

帝國主義者是既橫暴而又狡猾的。運動開始的時候，帝國主義者想用壓迫或抵賴的方法來堵住或竄死這個運動。由於各階層的團結合作，由於全國

人民的團結一致，他們那些壓迫和抵賴，未能收到什麼效果。

五卅事件發生後，上海市民身受暴力的壓迫，覺非以全民族的力量起而抗爭，不足以達到目的。學生方面最為活躍，事變一發生，上海學生聯合會立即召集緊急會議，上海華界及租界內中等以上各學校一律罷課，學生分頭請願，為外交後援。罷課之後有罷市。上海納稅華人會及各商業團體，於三十一日在總商會開會，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多主張即罷市為工人學生聲援。當時雖有總商會的主張，但終於從六月一日起，公共租界內各馬路商舖一律閉門停業。銀行錢莊，初尚遲疑，但為各方情勢所迫，至六月三日也宣告停業。

給予對方最有力的打擊的是工人的罷工。電車，公共汽車，電燈廠，印刷工人，電話接線生，外人僕役，奶媽，清道夫，電報路工，均於六月一日罷工。日人所設工廠全體罷工，其後，公共租界華捕，碼頭搬運夫以及日輪海員也一致罷工。罷工人數共達十五萬六千餘人。這使租界內的統治者處於無法支持。

六月二十五日，經北京各公團議決，定為全國總罷工的日子，那天，全國各地一律舉行示威遊行，各界停業一天。正在那時發展着的一些政治上的爭執，也因五卅事變而中止，大家把精力集中於民族獨立的爭取

大會上除制定了關於農民和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決議之外，還粉碎了國際內部的許多「左派」份子的思想，列寧所寫的「左派幼稚病」就是在這個時候完成的。第二次至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期間，還是一個革命運動繼續增長和資產階級加強進攻的時期，因此，第三次大會集中全力於革命的戰略與策略的問題，並提出了「走向蘇俄」的口號。第四次大會的前夜，法西斯蒂在意大利獲得了政權。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則又是托洛茨基反對派陰謀活動的時候，所以第五次代表大會就提出了各國黨衛衛隊維克化的口號，來和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從第五次至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四年中間，是共產國際最活躍的時期。這一個時期，一方面是在資本主義暫時得到穩定的時期，另一方面則是階級矛盾和革命鬥爭最尖銳的時期，在我國則爆發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同時這也是一個與托洛茨基及齊賓諾也夫派展開了最激烈的鬥爭的時期。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共產國際綱領」，分析了整個資本主義的形勢和危機，並指出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就和共產國際的新戰略與策略。從第六次到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期間，一方面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已獲得偉大的勝利，另一方面則是法西斯蒂在德國登臺和新的戰爭的危機正在增長的時期，所以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召集，是已近臨在戰爭的前夜。這是一次最成功的代表大會，又是由共產國際的總書記季米爾諾夫同志所領導的，參加大會的有來自七十六個國家的代表五百十三人。在這次大會上，季米爾諾夫作了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指出了「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的意義，和指示了全世界各國進行反法西斯主義的一戰線的新任務。這一次代表大會

上。

團結就是力量，這在五卅運動中就給了我們很明確的教訓。一方面，我各階層和全國上下的團結一致，使各國當局對中國所提解決事變的辦法，包括修改不平等條約在內，表示極重考慮並有願予接受之意。尤其日本當局在這團結的局面之前充分表現出戰慄的狀態（如願意先行解決槍殺顧正洪案）。另一方面，上海總商會不願加入當時由工商學三界所組織的「工商學聯合會」，使對外交涉碰到了不少困難，使這個運動發生了好些障礙而延緩下去，終於給對方乘隙而入的機會。這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引為殷鑒的。

五卅時民氣的激昂，運動波瀾的壯闊，民族解放的事業是有所成就的。但那時的中國還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政府怯懦，軍人昏愚，交涉竟少效果，宣戰徒托空言，全國人民乃自力更生，持久抗爭之計，而提出所謂經濟絕交的辦法。一方面加緊對外宣傳，經各公團及社會知名之士向全世界

界通電，揭發「五卅」事件真相。經此努力，各國勞動團體多對我們作同情的表示。尤其是蘇聯人民，全國舉行大示威，為被壓迫的中國人民聲援，且募集鉅款，救濟中國罷工工人。英國工黨在國會中向英政府提出數次質問，尤注意於上海工潮問題，美國參議員波拉，則正式宣言，認定取消領事裁判權為解決五卅事變的根本要道。那時的「五卅」運動實已成為震撼全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了。

縱觀「五卅」的經過，使我們今天紀念它的十週年的時候萬分感奮，覺得「團結就有力量，堅持必獲勝利」，乃是它留給我們的寶貴教訓。我們今天抗戰已屆六年，為民族的獨立而鬥爭，雖然困難重重，而國內外的條件却沒有一樣不比往昔為有利。問題的關鍵只在於我們的團結够不够鞏固，我們的堅持够不够堅韌。細懷先烈的戰績，凝視在望的光明，國人唯有戒除恐懼，不為團結的罪人，勿作民族的不肖子孫，無負爭取民族獨立千載一時的機會。

（任）五月廿日

羅邱第五次會談

邱吉爾首相於五月十一日抵華府，現正與羅斯福總統舉行第五次會談。

目前世界戰局的特點是：「蘇德戰場上又激起激烈的戰鬥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北非戰爭實際上已告結束。西南太平洋上，盟軍轟炸激烈，日寇則在加強鞏固佔領，並集結大軍於澳洲附近。種種日寇集結重兵，並在中國境內擴張其對我游擊區的掃蕩，和洞庭湖沿岸的新的進攻。

在這種環境，擺在英美面前的問題，是下一步

會不僅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從思想上，同樣地也在實際上武裝了各國的黨，準備他們來迎接法西斯主義的襲擊。

自從第七次代表大會一直到這一次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止，共產國際時時刻刻都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運動中的號角和旗手，並不斷的表現出它光輝的偉績。最近由於這一次反法西斯戰爭所形成的許多國際形勢，以及各國工人運動的增長，共產國際的組織已不能適應於新的形勢的需要。同時我們也應該知道：「共產黨人在馬列主義的創造者的學說的指導之下，從來不主張保存已經變成了陳腐的組織形式的」，正因為這樣，共產國際根據各項國際形勢的考慮，估計到各國的共產黨及其領導幹部的成長和政治上的成熟，以及在世界戰爭情況之下不易召開大會等許多原因，特於五月十五日作了一個解散作為國際勞工運動指導中心的共產國際的決定，交給各國共產黨批准，從此我們就能知道這個決定的重大意義了。我們還應該知道：共產國際的解散，不僅沒有減弱了各國反法西斯的鬥爭，却反而更加鼓勵了各國的黨用全力去進行反法西斯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並儘快地和最終地粉碎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公敵——法西斯主義。

代郵

衛平先生：

大作「理性與文化」不擬刊登，即請告知通信，以便寄還。

編者

的報告，和巴爾幹各國的不安及它對巴爾幹各國加緊直接控制的措施，就可以知道軸心對第二戰場的焦慮和畏懼。同時，盟國不僅要看軸心加緊歐陸的防禦，也還要警惕到「決不能妄想德軍在行將到來的戰鬥中不會企圖奪還主動權，不會從事新的冒險」（真理報社論）。德國仍在堅守諾曼底，並特別注意保加利亞和保土邊境，這是不應忽視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善用時機，制敵機先，大膽猛攻，和蘇聯的軍隊配合一致，「打斷法西斯野獸的脊骨」，實為盟國會議中應有所決定的問題。我們不再詳論開闢第二戰場的時間和地點，祇是提出必須以能制軸心死命為前提。

再者，此次隨同邱吉爾前往蘇聯的，有盟國的遠東盟軍的將領。據電訊報道，史迪威將軍或將參加討論作戰計劃。而蔣夫人，宋外長，蔣納德將軍及澳外長也都還在美國。這足以說明此次會談，實為商討盟國遠東戰局的好機會。盟國重組遠東戰局，我們非常興奮。英美在遠東方面，目前最重要的應該是消耗日寇的軍力，破壞日寇的生產，增強英

美的海空軍，同時，增加對中澳的援助，使中國能獲得充分的飛機軍火和物資，增長力量，準備反攻。就前線而言，最主要的是認真從空中打擊日寇。勿令日寇坐大。以援華而論，英美兩國，特別是美國，現在飛機生產空前增加，地中海航線漸告恢復，正宜增加援華物資。而中英美協力收復緬甸，解放緬甸，以重開滇緬路，也應該放在蘇聯會談的議程上。我們再向英美盟邦保證：我們在敵後和前線的部隊，無論在何等艱苦的條件下，都要堅持抗戰，殺敵致果，以粉碎敵寇的掃蕩和新攻勢。我們覺得還得克服一切困難，鞏固前線和後方，盡情發揮戰力，我們也確信在全國堅持團結抗戰中，一定能夠克服困難，打更好的仗。如果盟國能以更大的力量，協助我們作戰，以更多的物資，援助我們軍隊，我們一定要用來改進裝備，給敵人更有力的打擊，以加緊準備反攻。

各方面，都增加了一些新的困難，特別是物價高漲，生產低落，各地嚴重的災荒，人民生活的艱苦，和外援因交通不暢，而一時不能大量的獲得。在這些情況下，擺在我面前的急迫任務，主要的有兩個：一個是粉碎敵人任何新的陰謀企圖，一個是克服財政經濟方面的困難。這兩者的主要關鍵，則在於鞏固國內團結。從第一個任務來說，敵人正在找尋空隙，製造謠言，挑撥離間，破壞團結。針對敵人的這個陰謀，我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人民，就都要警惕敵人這種陰謀，團結無間，不予敵人以任何可乘之機，打破敵人的政治攻勢。同時，在軍事上敵人既是全面的和配合的進攻我們，我們前線與敵後的軍力，中央與地方的軍力，也是全面的協同的作戰。否則，敵人是全面進攻，我們則分散應戰，敵人是配合作戰，我們則各自為戰，就很可能被敵人各個打擊，就更困難打退敵人的軍事攻勢。而且，我們也不應該等着挨打，而一定要主動出擊，殲滅敵人。所以，全國軍隊要在最高統帥有計劃的領導下，做到各戰區積極戰鬥，協同出擊，互相呼應，到處進行局部反攻。從第二個任務來說，我們曾經提供不少的具體意見，如實行精兵簡政，增加生產，疏暢交通，調濟有無，嚴禁貪污囤積等辦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又無一不需要各方面的團結合作。因為只有在全國團結的基礎上，才能集思廣益，羣策羣力，為貫徹政府政策，克服困難而努力。

鞏固國內團結

蔣委員長說：「現在抗戰方酣，建國伊始，而內外環境，艱阻重重」。這話，把目前形勢的特點，畫了一個輪廓。

最近以來，敵人所謂行的「以華滅華，以戰養戰」的政策和行動，發生了很可注意的變化。日寇在集中力量，準備決戰的基本方針下，首先對中國採取了更積極的行動。它打算發動對蘇聯的軍事進攻，以「解決中國問題」。在政治上，日寇加緊挑

撥國共關係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在軍事行動上，採取對我全面性和協同性的進攻，企圖鞏固和擴大其佔領區，消滅或削弱我軍事力量。日本內閣的局部改組，東條訪問偽滿洲，敵佔區統治的加強和懷柔與騙政策的實施，各地大批徵抽我壯丁，對內地嚴密的封鎖，都是敵人想因死我們和準備對我進行新的進攻或具體表現。

以我國國內情況來說，無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

（新華）五月十四日

照顧各軍的意見，照顧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同時，也要求各地方和人民，對政府少作消極的批評，多作積極的贊助，多提供具體的意見，多道些實際的辦法。政府越能體地方與人民，尊重他們，幫助他們，他們也就越能團結在政府的周圍，反映情況，提供意見，出錢出力，協助政府，克服困難，支持戰爭。同時，組織人才，協助人事，也是增強團結的有效步驟。因為大家相處既久，接觸既多，就容易於增進了了解，提高互信，並發覺其患難相共，休戚相關的精神。

太行山血戰

「太行山血戰方殷」，每個人的心，都會更關切到敵後的殘酷戰爭！

這次敵寇結集了四萬大軍，於四月十六日起，在豫北及晉東南分三路發動攻勢。西面敵由晉東南靈關、高平、晉城等地分段向陵川進犯，陷該城後，繼續東犯。東面敵由安陽、湯陰等地向林縣進犯，已佔臨淇。南路敵由修武、焦作、博愛等地北犯。現正在林縣、淇水、冶鎮、南及陵川以東地區，進行血戰。

敵寇在這次攻勢中，顯然結集了若干精選的部隊，以突擊兵團的姿態，由三路十幾路同時進犯，並以飛機數十架輪番轟炸助戰，屬於最短期間結束戰鬥。它的目的，是在突擊進襲中，造成圍攻我軍某部份主力的任務。敵寇的這種戰術，曾在「春季攻勢」中使用。而它在「春季攻勢」中大軍宣傳的「圍軍」並「圍作戰」以及動搖我軍心和離間我軍隊的陰謀，在這次太行山戰役中，也更發揮到了極點。

抗戰快滿六年了，時間是並不等待我們的，完不成國難反法西斯的共同任務，要求我們鞏固團結；粉碎敵人新的陰謀，要求我們鞏固團結；克服困難，渡過目前的嚴重局勢，更要求我們鞏固團結。抗戰的勝利和建國的成功，都需鞏固我們的團結，這和人們需要空氣和飲食一樣重要。只有鞏固的團結，才能生長力量。只有生長力量，才能切實準備反攻。只有有準備的反攻，才能打回日寇，收復失地。說鞏固團結，是抗戰勝利的關鍵，道理就在這裏。

（新華）五月五日

敵寇在這次戰役發生之初，就宣傳山西為軍「協力合作」，「實為戰役中之最大特色」，隨後不斷宣傳某也投降，某也被俘，某也戰死的消息。所有這些，都是敵寇「以華制華」，「以華滅華」的毒計！敵寇一方面驅使偽軍進行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慘劇，另一方面宣揚和誇張戰果，動搖我軍鬥志，並將此造成一種錯覺，以為友軍坐視不救。晉冀一帶，多為我第××集團軍部隊，敵寇正企圖利用這點，來挑撥我第××集團軍與其他部隊的關係。這是敵寇的慣技，現在我敵後部隊已發動猛烈攻勢，協同作戰，以事實粉碎敵人的挑撥陰謀，但是，我們還需要睜開毒霧的巨眼，嚴密注意！

今天太行山的戰事，真是緊張到了極點。我們要立下大決心，粉碎敵寇的攻勢，消滅敵寇的陰謀。關於軍事上的佈置，不加論列。我們要再三強調的，是務需鞏固部隊，堅定作戰意志，積極努力戰鬥，要認真作到勝固不驕而敗也決不認、決不潰的

地步，萬萬萬意不得。而真正重要的，是敵後抗軍各部隊應團結一致，協同動作，互信互愛，萬萬萬不得。一懈怠，一猜疑，就上了敵寇的圈套。不僅打不退敵人，還引起部隊間鬥爭上的暗影，也就給了敵寇以進一步發展和進一步挑撥的圖謀。其為慘之烈，是不堪設想的。

中國共產黨和第××集團軍，在豫北以東支線艱苦抗戰，始終沒有一刻鬆懈。當敵寇調集友軍的時候，也組織最大的力量，策應支援，予以解救，使敵寇的軍力受到打擊，使敵寇的補給全部癱瘓。因為今天全民族的敵人只有一個——日寇，今天的任務也只有一個——殲敵。回憶去年夏季，敵寇也曾曾晉東南結集兵力，發動攻勢，當時本報率北戰地通訊隊對我第××集團軍配合友軍作戰，收復陵川的事實，有這樣的報道：

「首先在晉東南，敵從七月十日起，集中了萬餘的兵力，向我涉縣、東陽關、黎城、微子鎮，長治之線合擊，我軍轉戰於張家莊、任村等地區，予敵重大殺傷，敵潰退黎城，我軍乘勝追擊，殲敵大半，遂將黎城克復。同時我某支隊協助太南友軍，打擊進佔陵川林縣敵人，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急襲陵川，摧毀敵砲堡五六座，當即協助友軍攻克陵川」（三十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在友軍最困難援助的時候，予以一切援助，是中國共產黨和第××集團軍及××軍在敵後堅持抗戰中所信守和力行的團結抗戰的原則。這應該是一切抗戰部隊信守和力行的原則。這也是獲得勝利的原則。現在豫北及晉東南血戰方殷，我們決不放鬆自己的責任。渴望各友軍部隊深明大義，以「民族第一」「勝利第一」的主旨，而團結無間，發力殺敵，在血戰中爭取太行山的勝利！

（新華）四月二十八日

關切前線，幫助前線

敵寇對太行山進攻未已，又於本月四日集結四萬之衆，發動湘北洞庭沿湖的進攻。戰事已達兩週，現又日趨激烈。

敵寇攻佔南縣、安鄉後，一方面分股乘艇竄擾洞庭南岸，到處企圖強行登陸，一方面由安鄉及藕池口出動之敵，西向進襲津市。同時，鄂境彌陀寺方面，敵寇南下攻公安，而江北董市之敵，則不斷渡江而南，襲洋溪，攻枝江。據電訊所傳之戰況估計，敵寇此次新進攻之重心，似在湘北沿湖各縣，鄂境戰事固亦激烈，似爲牽制作用。目前的情況是：公安附近，戰鬥仍烈，且正向西齋發展，枝江我仍固守，巷戰方酣，津市外圍，激戰未已，敵寇曾積極增援，連前已達二萬人。同時，湘境各地敵機的轟炸，也在殘酷的繼續着。關於湘鄂戰事之軍事形勢，日內另當專文論述。從敵寇此次對湘鄂的新攻勢看來，它的主要企圖，當在攻佔和破壞這一片富饒的米棉產區，而破壞或尤重於久佔。

我們曾一再強調的指出，敵寇這會有新的進攻，而它的新進攻，將以掠奪及破壞爲主要的目的。洞庭沿湖一帶的米，是我們大後方若干地帶，如鄂西、川東、粵北、及桂西北等地的主要來源。而津市等地的棉，又是久負盛名的。敵寇此次進攻湘北的陰謀，是企圖用破壞手段，增加我們大後方的糧食困難，來困死我們，更進而促進市場上的波動，擾亂我們大後方的商業，和一般的經濟，並動搖我們大後方人民的抗戰意志。

我們對敵寇的這個毒辣的陰謀，一定要嚴密的注意！當我們每天要用更高的價錢購買糧食的時候，就要問一聲究竟誰使我們的生活，日益艱難？我們接着也就應該懂得，最主要的是敵寇！當我們親身經歷到不穩價格，而是所有百物的價格，都在不斷的飛騰的高漲時，我們也都要這樣問，都要找出主要的罪魁——敵寇來。更要由此而深切的認識到這個殘酷的真理：不把敵寇趕出中國去，我們就不能活！更要因此而反省自己對驅逐敵寇出中國，盡了多大的責任？從而加倍自勵勵人，努力各盡其責。

其實，國內任何一處的戰爭，都在影響着大後方的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對個人日常生活的關切，不能擴大到祖國的戰爭，還是表示關切的不夠親切，不夠深摯，也可以說這種關切只是出之於個人經歷，而沒有深入到追求起因。我們不是說不要改進每個人的生活，不要減少在改進生活的進行中，可以避免的一些人爲的阻障，而是說，不從基本原因上努力，就不能使個人的生活，走上安樂幸福的坦途，也不能將蘊藏在每個人心的深處的，對同胞，對前線，對國家民族的熱愛，和對敵人，對漢奸，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憎恨，澎湃的發放出來。

如果人人都認識到今天生活的艱苦，是敵寇的「賜予」，而今天還能夠生活在自由的比較安定的環境裏，却完全是前方敵後將士的血肉換來的，那個人還能夠不將關切自己柴米油鹽的心情，來關切

將士們的飢寒溫飽，和創傷與生命呢？
湘鄂血戰方殷，讓我們以艱前方共甘苦的精神，來關切繼戰於江湖之間的健兒罷。我們每個人都要注視戰爭的每一步發展，具體的明瞭敵寇階級階階了祖國的那一寸那一尺土地，精確的知道中華健兒爲我們灑的鮮血，是在那一寸那一尺祖國的土地。更要在「一則爲了前線」的口號下，過最艱苦的生活，努力於現在崗位的工作，並且以慰勞，捐款等等的辦法，給前線將士以幫助和安慰。文化勞軍運動即將在七月底結束，而端節勞軍和鞋襪勞軍，那將自下月初開始。趕快積極的參加罷！同時我們爲了爭取湘鄂戰事的勝利，應該不局限於這年這節和戰事告捷時的慰勞，應該在前線作戰最艱苦的時候，也就是前線最需要關切和幫助的時候，最熱烈的給他們以一切！

(新華)五月十八日

△關於第三國際決議解散事，陪都各界人士咸認爲有裨反侵略戰爭之一極合時宜之舉動。一般意見，會謂此舉不僅有裨益於聯合國目前之抗戰，對於未來之世界和平，亦將有重大之貢獻，而尤足以增強聯合各國內部之團結。其爲對於侵略寇盜之一嚴重打擊，殊無疑義。領導此舉者之賢明，爲陪都各界所一致贊佩(二十五日中央社訊)。

△「……此一事件(指解放共產國際的提議)——編者)爲劃時代性的世界事件，不僅有利於加速盟國最後勝利的降臨，且可保證戰後盟國間的精誠合作。……一舉而使軸心國家的宣傳與離間技術無所應用。……」(重慶時事新報五月二十五日社評)。

科學與民主

正戈

此係本刊上期紀念「五四」之特約稿，因收到稍遲，未及列入文，茲特補載。

——編者

「五四」運動到現在已二十四年，在這二十四年中，我國內部生活和它的外形，都有了極大的變化。特別是抗戰六年，變化更速。政治由北洋軍閥的統治，變為國民黨的政權。人民絕大多數對政治的漠不關心，變而為奮起抗戰。民元以來的政黨，唯國民黨僅存，如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第三黨，國社黨等，都是「五四」後產生的。破碎的局面，敵對的黨派，一變而為統一的國家，共同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抗戰建國。經濟則交通發展較快，沿海城市的繁榮改向內地的開發。文化則自衰老的軀殼中煥化出新的嫩芽。日寇九一八、八一三的武裝侵略，破損了我國錦繡河山，英美友邦繼續聯之後自動廢除不平等條約，解除了我國百年束縛。上述一些變化，都是顯而易見的。在這些變化中，任何一個革命的戰士，任何一個前進的青年，沒有不懷憶「五四」，追慕「五四」的。自從有了那樣一次轟轟烈烈的運動以後，每年的「五四」，就成為我國革命戰士前進青年最高興紀念的一日。儘管紀念的規模有大有小，紀念的形式有的公開，有的秘密，二十四年來，沒有那一個「五四」被國人忘却過或抹殺過，則是鐵一般的事實。為什麼這樣？可能有各種解釋。若就「五四」運動這一事件本身來看，是無法了解的。「五四」運動所標明的口號，除「還我青島」有點積怨的意味外，其餘都是消極的。如「拒絕和約簽字」，「罷免曹汝霖陳宗輿章宗祥」，「取消二十一條」等等，這些消極的口號，固然喊出了當時人民蘊藏在心坎上的要求，所以能轟動全國。但這祇是問題的一面。人民心坎上蘊藏着向往積極的一面，「五四」運動直接的口號中是沒有喊出來的。「五四」是羣衆自發的一種革命運動，雖然喊出了幾個符合人民大眾要求的消極的口號，而運動的精神，是代表了人民要求的積極一方面的。「五四」運動所代表的積極方

面的精神，是要求解放，要求進步。進步的實際內容，正如大家所公認的，是德模克拉克和賽因斯，即民主和科學。我國二十四年來的變化，無論政明或暗，或遲或速，總是沿着要求解放，要求進步的方向發展的。「五四」精神所要求的進步，有它的特殊的新的意義。它所要求的德模克拉克，不是十八九世紀歐美資本主義那種狹隘的德模克拉克，而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更廣泛的適合於各階級發展的德模克拉克。後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解釋它的民權主義，正確的明白的反映了這一點。如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公有」。一般平民所公有的民權，正是「五四」所要求的德模克拉克。「五四」所要求的賽因斯，也不同於昔日祇供少數人享受的賽因斯，而是要它爲大眾服務。「五四」運動指出了這樣進步的方向，這就無怪我國革命戰士、前進青年，年年熱烈的來紀念「五四」了。

今年的「五四」，正值全世界民主同盟反抗野蠻殘暴生番似的法西斯強盜，已臨決戰的前夜；我國反抗那夥強盜中軍方的一股，也快六年了。我們現時所直接反抗的強盜，正是二十四年前激起我國「五四」運動的日寇。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民族革命戰爭，正是要從日寇法西斯壓迫下解放出來。日寇法西斯尚未受到應有的打擊，它還在強梁跋扈，乘著英美友邦還沒有全力東顧之際，對我國的侵略，是更加緊而決不會放鬆的。我們戰勝這一強大兇殘的敵人，還要經歷一段艱苦的道路。我們紀念「五四」，我們必須更發揚「五四」求解放的精神。

今年的「五四」，也可以看出我們求進步的精神。政府當局的腐蝕圖治，是有目共睹的。行政三聯制的實施，當可增加大後方的行政效率。自力更生的政策，貫徹到各方面，必能在堅持抗戰中，渡過種種困難。（被略七十餘字）而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努力，科學不僅沒有萎縮，而且有其極程度的發展，實用上有許多發明。這些進步是不夠的，但是很可寶貴的。我們紀念「五四」，我們必須更發揚「五四」求進步的精神！

「五四」進步的精神，所孕育的原是一對孿生子，即德模克拉克和賽因斯，也即是民主與科學，這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必有其密切相互的關係。

(被略七十餘字)

民主與科學既是「五四」進步精神所孕育的孿生子，若談其畸形的分離的發育，失掉其應有的聯繫，必然會影響到可能獲得的成果。試就科學來說，自抗戰以來，上有政府的竭力提倡，下有人民的盡情擁護，中有企業者、科學家、技術人員在實際中苦幹，所以能有若干的成就，然而這些成就，比其客觀所需要的遺落後很遠，即在現有的物質基礎上也還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用。爲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還不能獲得應有的順適發展的途徑呢？也許有人以爲我國在抗戰，戰爭阻礙着科學的發展。誠然不錯，整個科學各部門全面的發展，需要平靜的環境，但某些特定部門的科學，因受到戰爭需要的刺激，反而發展比平時更速，這是數見不鮮的。我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不是在抗戰中所發明的東西比平時還多嗎？至於世界上那些交戰各國，有些國家的科學原來就很發達，現當戰時，某些特定部門，更是加速的大踏步前進。戰爭不全是科學的敵人，是不言而喻的。但科學要順適的發展，要有一些先決條件。最要緊的恐怕要算政治條件。沒有學術自由的條件，科學是不會順適發展的。我國最適宜於科學發展的條件，就是它的孿生兄弟：「民主」。實際上世界各國科學最發達的時候，總是在比較民主的時期。(被略九十餘字)世界上科學最發達的幾個大國如英美蘇聯，科學都是在其國度民主較發達時發軔起來的。(被略一百二十餘字)由此可見，民主與科學爲「五四」運動的孿生子，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是如何值得我們注意了！

沒有民主，科學不是不能發展，但它決不能很快很順的發展。這是一。科學服務於民主，科學之利，才有可能爲大眾所享受。科學不得民主攜手並進，它本身的發展不但不快不順而已，而且必定會與大眾利益相反。這是二。因此，我們紀念「五四」，必須在發揚進步的精神上發展科學，同時也要發展民主！我們必須記着：科學和民主，是「五四」進步精神所孕育的一對孿生子，而且前者的發展程度與速度，是以後者爲主要條件的！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四前夜寫於重慶

(上接第二四五頁「列寧論托爾斯泰」)

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的代表，曾打了一個電報給在阿斯塔波伏的乞爾特科夫(托氏生平之摯友)：

「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僅代表俄國及國際無產者，對天才藝術家——這是一位與官方教會永不妥協和不可戰勝的戰士，這是一位反對壓迫與奴役制度的人，他高聲地叫出反對死刑，並且還是一位被放逐者的友人——的痛，表示無限的悲痛」。這個電報，現藏在莫斯科的托氏博物館中。

又這句話在趙季芳和曹蕪華的譯文中都有錯誤，趙譯爲：「整個的說來，他們的態度可以從工人代表致第三國會的電報中看出來……」。曹譯爲：「整個說來，他們的態度表現在工人代表給第三國會的電報當中……」。他們兩個人都將第三國會工人代表們發出的電報，誤爲工人代表發給第三國會的電報了。

(註二)趙曹兩人的譯文，都譯爲「直接的經驗」。

(註三)「八六一」手內農奴解放，只是在形式上解放了農奴，但地主還是繼續壓迫農民。他們當時把農民們向來所享用的許多土地割去了，這部分的土地農民就稱之爲「割地」，並且這些「割地」常是四分五裂的，將農民的土地和牧場及水源隔斷開來，農民們爲了生活，不得不在最苛刻的條件下租地主的土地，甚至還要用自己的農具和馬匹替地主去白白地耕種。

(註四)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後，沙皇政府立即召開國會。在性質上這是種「諮詢性的」組織，實際上沙皇想用國會來分化羣衆和將羣衆離間革命。

(註五)「我們的道路」是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下的一種半合法的報紙，自一九一〇年六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出版，而於翌年一月二十二日停刊。

(註六)此處想係指巴扎羅夫的文章「托爾斯泰與俄國知識份子」一文而言。

軍隊的組織問題 (下)

許光達

四 現在各兵種組織的概況

根據一九三六年的材料各國兵種的組織有如下列情形(無疑的它們在今天是會有變化,可是並不妨礙我們作為研究的參考):

一、步兵

日本排的編制:步槍班三,輕機槍班三,排長一,每班九人,七個下級士(副排長一,班長六),兵四八,全排共五十八人,步槍四十九,自動步槍六,輕機槍三,全排一分鐘可以發出火力一千發。

美國排的編制:每排兩班,每班三環,每環七人,輕機槍一枝。排有一指揮處,聯絡兵二,瞭望兵二,全排四十八人,輕機槍六,步槍四二,擲彈槍六,全排一分鐘可發出火力一七二〇發。

英國排的編制:步槍班二,輕機槍班二,排有指揮處,排長一,副排長兼瞭望一,聯絡兵(兼)一,每班七人,全排三十人,步槍二八,輕機槍二,擲彈槍二,全排一分鐘可發出火力八八〇發。

德國排的編制:步槍班二,輕機槍班二,排長一,傳令兵二,腳踏車兵一,担架兵一,每班八人,全排共三十七人,輕機槍二,步槍三三,全排一分鐘可發出火力九〇〇發。

由上列國家初級單位看來,火力最強的是美國,次為日本,再次為德英,這是因為她們經濟的力量、任務和地域而決定的。從戰術的觀點上來看,日本排與火力表面上比英國強,實際上是用多數的人力來補助了它技術上的不足而已,美國有高度的生產力和技術,因此成為最強火力的軍隊。

排的編制分突擊班,火力班,有的是分開的,有的是混合的。從戰術上看,當然是混合的好,可是也因軍隊的訓練和供給的力量而決定了。

連的組織一般的是由三個步兵射擊排,機關槍排,管理排(指揮排)而成。機關槍排有重機槍二至四挺,如蘇聯(日本的連則無重機槍),管理排內包括聯絡,瞭望九人,衛生員六人,化學兵二人,給養員,軍需員等,不

論有無管理排之名稱,而這些編制都是必須的。

各國步兵連在一分鐘內可能發出之火力如下:

美國五一六〇,英國四三二〇,日本三〇〇〇。

德國四七〇〇,蘇聯五〇〇〇。

營的組織,一般的是由三個步兵連(英國是四個步兵連),一個重機槍連,一個砲兵排,一個指揮排,組織而成。重機槍連有六——八——十二挺,砲兵排有二——四門砲,口徑是二十、三十七、四十二厘米的平射砲,和七十二、七十五、七十六厘米的迫擊砲,指揮排是包括聯絡、瞭望、運輸、工兵、化學、給養班等。由於現代技術之複雜,在營裏已經建立了參謀部,幫助營長管理指揮各個部隊,和組織戰鬥。

從上面的編制看來,現代的排已經是戰鬥的單位,連是戰術的單位,營則是步兵戰術高級的單位了。團以上則為聯合兵種的組織。

現代的步兵團,西歐國家,均不是純步兵的,而是各種兵種混合的最低的單位。團的組織,各國大體上是相同的,以三個步兵營,一個砲兵營(或砲兵連),化學排,工兵排,騎兵排,聯絡排,高射機關槍排,衛生隊等而團的人員和各種武器如下表:

戰鬥員三〇〇〇,馬四五〇〇,輕機槍八〇,重機槍五〇,砲一八——二五,積極的步槍一五〇〇——一八〇〇。

步兵師的組織:
日本的師:四個步兵團(組成兩個步兵旅),一個砲兵團(三個重砲營,一個輕砲營),一個騎兵團,工兵營,運輸營(汽車連一,馬車連二)加上高射砲隊,交通隊,化學隊等必須的組織。

德國的師:三個步兵團屬於步兵副師長,兩個砲兵團(重砲團,輕砲團)高射砲隊,偵察隊(由坦克,裝甲車,飛機,輕汽球等組成,爲了砲兵的偵察和射擊而用的)屬其砲兵副師長,工兵團(四個營),通信混合隊,航空隊(六——十二架飛機)偵察隊和運輸,化學等必須

的組織。

英國的師：三個步兵團，偵探隊（由坦克，裝甲汽車，騎兵組成）

，砲兵團，工兵團，交通營各一，此外有化學隊和各種運輸隊等。

蘇聯的師：三個步兵團，砲兵團，高射砲隊，防坦克砲隊，騎兵連

，坦克營，工兵營，通信營各一，和化學隊，衛生隊，運輸隊等。

各國師的人員和武器的數量，詳第一節中的比較表。從上述的比較中，

可以看出各國師編制的差別是相當大的。有兩個砲兵團的（如德國），有機

械化營的（如英、德），有坦克營的（如蘇聯），而日本則有四個步兵團和

三個騎兵團，這是由於它的經濟力量薄弱，只能用人力以補助火力之不足

，用騎兵以代替機械化的部隊了。由此可知經濟力量薄弱和戰略任務決定了它們

軍隊的編制和裝備。

軍是由二個到四個師組成的，一般的是以三個師編成的為多，再編以軍

的砲兵（砲兵團或砲兵師），坦克營或坦克團，飛行隊（九——十五架），

機械化的營或團，工程營（機械化的）和化學部隊等，以上是屬於軍本身編

制之內的，在作戰的時候，必要時軍團可附給以砲兵部隊，坦克，機械化部

隊，飛行兵團，騎兵師等，共同聯合作戰。

由於軍隊組織的龐大，兵種的複雜，它又有高度的機動性，因此現代的

二、砲兵

砲兵的基本組織為單門的砲，它的作戰單位為砲兵連。

一門砲的使用須有七人，連砲長八人，第一名為砲準手，第二名為機手

，第三、七名為舵手，第四名為裝彈手，第五、六名為彈藥手。砲兵連的組

織分為火力排（一至二個排）和指揮排，火力排有二——四尊砲，指揮排則

為聯絡班，偵察班等組成之。三個連組成砲兵營，三個營組成砲兵團，三個

團組成砲兵師，在營、團、師的編制裏均有偵探和運輸等之組織，不過其編

制之大小具有差別而已。

砲兵不能成為獨立的兵種，它不能獨立的作戰，必須與步兵、騎兵、或

機械化兵團（摩托化的砲兵）共同的作戰，因此砲兵總是編制在步兵、騎

兵、或機械化兵團的組織裏，有砲兵師的國家，是不多的，它也是編制在軍

、或軍團的組織裏。

編制在步兵營的砲兵，稱之為營砲，可以由一個排到一個連，其口徑為

二十、三十七或四十二米厘的平射砲（多為防坦克砲和七十五、七十六米厘

的迫擊砲均屬於輕砲之類，可以用人力拉走的。）

編制在步兵團的砲兵，稱之為團砲，由一個連到一個營，其口徑為六十

五、七十五、七十六米厘的輕砲或迫擊砲。

編制在步兵師的砲兵稱之為師砲，由一個連到一個團，有兩個團的（如德

國），其口徑為七五、七六、一〇五、一〇七、一一五、一五五米厘的重砲

和輕砲。

編制在軍的砲兵稱之為軍砲，砲兵團或砲兵師，有各種口徑的，大至二

百一十米厘的重平射砲，和曲射砲等組成。

高射砲隊是另外的組織，可以附屬在團砲，師砲的組織裏，但一般的高

射砲是由各參謀部直接指揮的。

除了要塞砲在此不述外，還有大威力的和特大威力的砲，其口徑為二百

四十、三百四十、四百米厘以機械牽引和火車裝載，用之於遠射程（五〇—

一二〇〇公里）和破壞堅固的堡壘，英德雙方在波蘭對岸所使用的砲，就是

屬於這類的。

三、騎兵

騎兵按其任務來區分有二種：一是戰略的騎兵，如騎兵軍、師、旅執行

單獨的任務，騎軍團或軍指揮的，二是編制在步兵與騎兵，如步兵師中之

騎兵團或連，團中之連或排，執行這個部隊所給的任務，但它們基本的組織

是相同的。

騎兵最低的組織，初級單位是班，能單獨的負起個別的戰術任務，其組

織原則是混合的，每班分為兩組，各組六人，第一組班長一，優等射手一，

擲彈槍手一，助手一，馬夫二，第二組輕機槍手一，助手一，彈藥手二，馬

夫二，各人除上述所負專門任務外，均有馬步槍與馬刀。

排的編制，由兩班而成，第一班一八人分為三組，第二班十二人分為二

組，班之組織如上述，惟第一班內，加上排長的聯絡二，瞭望一，馬夫三，

多一組而已。全排連副排長共三二人，步馬槍二十八支，輕機槍二，擲彈槍一

，馬刀三二把，馬三二匹。

騎兵在組織上戰術上的單位是連，連在火力上，獨立性上基本的單位

，它的編制是四個騎兵排，一個指揮排，在指揮排內包括瞭望，聯絡七人，

後方班（子彈車，給養車，衛生車等）連的馬夫等，由副排長指揮之。

騎兵團是由四個騎兵連，一個重機槍連（由八挺如日本，到二十挺如蘇聯），一個兵連（七十五米厘三尊，日本則無之），此外有防坦克砲隊（二—四尊砲），團有參謀部和各種通信通線的必須組織。

日本騎兵旅的編制：是以兩個騎兵團，一個砲兵營（八—十二門砲），一個汽車摩托坦克混合隊組織而成，其是它的最高騎兵組織，戰前共有五個旅。

蘇聯騎兵師的編制：是以四個騎兵團，一個砲兵團（二七門砲），一個機械化團（三連坦克四十五輛，一連裝甲車十五輛），一個航空隊（約十架），一個高射機槍隊和工程隊運輸隊等組織而成。

四、坦克及機械化的部隊
坦克的基本組織是以單個的坦克。根據各種不同型的坦克，駕駛的人員從二至十六，內分坦克車長、駕駛員、瞭望員、射手等。

排是由三輛至五輛坦克組成，三排成爲連，加上指揮排和修理、運輸、彈藥等，每連坦克由十至十六輛，排連是戰鬥單位，營才是基本的戰鬥單位。

各國坦克營的組織，大體上是相同的，不過坦克的數量有差別而已。均是以三個坦克連，一個工兵排，一個摩托化場（包括技術後備隊、彈藥供給、修機作坊、停車場、糧食、物料、衛生等）。在參謀部指揮之下，有防空排、聯絡排、運輸調整排，和偵探排（五—七輛偵探坦克），全營共坦克三一—四九輛。

日本坦克最高組織是營，以坦克營附屬在步兵師內，在戰前有十九個營，在戰爭中當有增加，可是由於它經濟力量的薄弱，也不會有多的數量。團，一般的其坦克最高的組織，團以上則與其他機械部隊混合而成爲機械化的旅或師團了，坦克團通常是以三個營，偵察隊和工兵、化學、修理、運輸等組織而成，全團戰鬥坦克共一五〇—二〇〇輛。

機械化旅是由三個坦克營，一個機械化步兵營，一個機械化砲兵營，一個偵探隊（由坦克與裝甲車合組而成），一個航空隊（九—十二架），此外由工兵、化學、交通、運輸等合組而成。

德國機械化的師團有兵員一一〇〇〇人，坦克四二五—四七五輛，摩托卡四〇〇—七〇〇輛，戰車二七〇—二八〇輛，迫擊砲二四尊，野戰砲七〇尊，平射砲二七—三六尊，高射砲八—十六尊，飛機十二

架，在作戰時，則附屬以飛行兵團。

五、飛行兵團

空軍的基本組織也是以單個的飛機。以不同型的飛機，決定駕駛的人員，由三至五架組成分隊，三個分隊組成支隊，是現代空軍基本戰鬥單位；三個支隊成爲中隊，三個中隊成爲大隊（或稱聯隊），有飛機九四—一四八架，大隊一般的是空軍的最高組織。

各國的軍隊都認爲現代的步兵師或機械化的師團，應當有它的定員的空軍，可是事實上，編制在步兵師或機械化師的定員的空軍還是少有的，至多也僅只是一個空軍支隊由十到十五架，作爲偵察聯絡的工具。

由空軍大隊，組成該團的飛行兵團，直屬於空軍司令，由最高統帥根據情況，集團使用於某一方面。

六、工兵、化學及其他特種部隊

工兵的編制從班起至獨立的排、連、營、團止，編制在步兵、騎兵、機械化兵團各級的組織裏，連、排、班編制在上述兵種的團、營、連裏，一般的他們只負責對工程技術的指導，和比較小的破壞與建築，工兵營與團，則由各種專門技術的部隊，如建築、破壞、偽裝、架橋、鐵道等組合而成，它們都是機械化了的。

化學隊的編制是從單個的化學兵（負責防毒的指導）到獨立的化學連和營止，編制在各兵種的組織裏，負責放毒防毒、消毒的任務。

其餘通信隊、運輸隊、汽車隊等，一般的它們都是電氣化與摩托化了的。根據各國生產力的水準，而決定其工具之多少，編制在各兵種裏面。

這就是現代各兵種組織的一般概況。

五 抗日軍隊的組織問題

關於抗日軍隊的組織只講到以下的三個問題：（一）抗日軍隊的組織原則，（二）步兵的編制，（三）騎兵的編制。

一、抗日軍隊的組織原則，根據現代各國軍隊的組織經驗和中國今天具體的情況，我以為抗日軍隊的組織，應該根據以下的原則來決定：

第一，抗日戰爭是正義的，求民族的獨立和解放，除少數的漢奸外，符合於全國人民各個階層的利益，因此全國人民可以總動員，能够組織龐大的、數量衆多、而且人的質量又優越的軍隊，官兵應該是建立在政治平

等基礎之上，不須要任何訓練和強迫。須要強有力的政治教育，戰士們的政治覺悟愈高，抗日智識愈豐富，則戰鬥力愈強，軍隊的組織愈鞏固。沒有加入軍隊到前線作戰的人民，也應該一律軍事化，施以抗戰教育，並盡可能的武裝起來，以便直接或間接幫助作戰，實行自衛，他們是正規軍的廣大的後備軍。

第二，根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落後，技術較差，交通不便，鄉村不依城市，可是領土廣大，人口衆多，又在我們領土內作戰，可以組織廣大的游擊隊，利用一切武裝，消耗敵人，同時也須要正規化的軍隊，進行運動戰與陣地戰，以殲滅和消耗敵人。總之，在這樣的經濟技術水平和作戰地域的條件之下，軍隊的組織主要是依靠人力和發揮人力。

第三，敵人是法西斯軍隊，戰爭是持久的，必須使游擊隊在一定階段上，即經過相當的戰鬥與整訓後逐漸正規化，逐漸成長為正規軍，同時保持必要數量的游擊隊（由舊的基礎與新的擴展而來）才能持久。同時要建立相當數量現代化的兵團，武裝並訓練以新的技術，才能最後的驅逐日寇出中國。在國際的幫助和抗戰過程中努力加強軍事工業的條件之下，相當數量的技術工具是可以取得的。

第四，要求部隊有高度的運動性和靈活性，因為敵人依靠着技術工具，它的運動性是大大的，而我們軍隊的運動性，在目前只能建立在人體的訓練和組織的簡便的基礎之上。這種組織又便于培養大批的幹部，能不斷的補充幹部傷亡的損失，因為我們的軍事學校太少，不能滿足作戰的需要。

二、步兵的編制，因為我們技術的缺乏，步兵是主要的兵種，雖然沒有其他兵種的協助，步兵必須以自已堅決的行動，保存自己的戰鬥優勢，以決定戰鬥的結局，因此我們必須有堅強的步兵。

根據目前的經濟技術水平和敵人的火力（每一分鐘一千發）可以採取下列的編制：

每班戰士十一——十五人，班長副班長在內，步槍十一——十五枝。

排由三個步兵班，兩個輕機槍班組成，輕機槍班的人數也可以十五人，除射手、助手、彈藥手外，其餘的都武裝以步槍。排有排長一，副排長一，聯絡員一，如按照班以十一人計算，則全排共有五十八人，步槍四十八支。如有擲彈槍時，武裝二支，輕機槍二支，這樣用人力以補充技術之不足，則每分鐘可發出火力七九〇發。

連由三個步兵排，一個管理排編制之，管理排長由司務長兼任，管理排內編制下列人員，副排長一（上士），聯絡員四人，瞭望員二人，看護員二人，彈藥員二人，給養班炊事員七人，驢子二匹（給養運輸之用），連有連長一，副連長一，政治指導員一，化學指導員，全連共一九一人，每分鐘可發出火力二五四〇發，每個戰士手榴彈的火力在外。如此的火力，一般的已經不算是弱了，按照連的防禦正圓五〇〇米遠計算，則每平方公里一分鐘可發彈五。一發，在這種火力密度之下，敵人是無論如何不能通過的，如果再加上營的重機槍的補助，和火力的機動，則每平方公里遠可增至六——八發，第一次大戰時，每平方公里遠是五發，現在也不過是七——十二發，而我們如果有六——八發的火力密度，是足夠對付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在進攻時以三個連的火力與突擊力，也足夠克服敵之一個連的。

在輕機槍的數量不能達到每排兩支的時候，則可編為輕機槍排（三至四支）歸連長直接指揮，以便於火力的機動，在目前排級幹部軍事素養還弱時，這種編制是適當的。

營由三個步兵連，一個重機槍連組成，一般的我們的營還沒有砲兵，甚至團也沒有，當然這是由於物質的原因。可是目前戰爭的主要形式是游擊戰（指正規軍所採取的游擊戰術）和運動戰，而通常以營、團獨立行動為多，則儘可能的將反坦克砲，編制在營、團裏是必須的，以對付敵之裝甲車和坦克。因為敵人「因其數量不多，於連絡及偵察時仍多個別地使用」裝甲車，「當急襲街路上的中國軍，使其潰亂，並遺棄或搜索敵所位置的區域等場合，則宜單獨使用」坦克，「在夜間利用其裝備之探照燈，實施搜索或強行夜襲」（見支那駐屯軍司令部參謀部所編之日軍在華作戰要領）。敵人輕蔑我們，謂為「山無知對新兵器之怯懦性甚大」而毫無顧忌的使用各種新兵器，其實這也正是敵人的弱點，我們的營團裏，如果有一二門防坦克的砲，也就可以對付它。

敵人常以極少的兵力，利用險峻地作頑強的抵抗，或支持很久的時間，如果我們有迫擊砲，敵人的這種頑強抵抗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的營團裏編制一門二十或二十七厘米的迫擊砲和一門迫擊砲，組成砲兵排，在團裏編制二門反坦克砲，二門迫擊砲組成砲兵連，是必須的。

在今天很少進行陣地內攻防戰，很少敵的砲兵營和砲兵團，射擊的技術又非常差，被敵人指出的缺點，計有「一、射擊通常依直接標準，每一門或

二門分別使用，能指揮四門，依集合準而指示射向者甚少；二、能由遮蔽陣地射擊之砲兵少；三、因固定架尾，故命中精度不良；四、破裂高度一般的過高，榴霰彈之效力殆無；五、射擊規律不良。

因此，據說「在河南戰場曾於千米遠內外之近距離，由壕溝陣地採取着發射擊」（見「日軍在華作戰要領」，三十四頁，軍政雜誌社版）。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則不如將反坦克砲，輕砲分散在團營裏，索性單個的使用，而將重砲留在較高級的司令部，加緊訓練，提高技術，以待來日之反攻。

因為營裏有重機關槍和砲兵，必須加強營指揮部的組織，雖然目前不可能像西歐的管理、組織那樣健全的參謀部，然而至少也應有參謀長（或由副營長兼），兩個參謀，一個管理作戰和教育，一個管理偵探和情報的收集及聯絡，營須有戰術監察的組織。根據敵人對我軍的批評：「戰鬥教練不純熟，故多不能預會選擇隊形及選擇目標的要領」；「步砲，機關槍「協同動作不良」；「警戒搜索非常鬆懈」；「近距離搜索、戰鬥搜索、夜間搜索等均不充分」；「攻勢防禦無重點」；「聯絡差，不能互相援助」；「易為伴攻所動」；「射擊不準確」；「夜間沒有射擊的設備」等等。應該承認這些批評有許多是正確的。這當然是由於我軍軍事教育的不够，指揮員戰術素養差的原故。可是這樣繁雜的工作，依靠一個指揮員，自然是顧慮不週到的。因此必須有參謀來幫助指揮員的工作，以挽救當前的弱點。

也許有人說，今天在軍、師的參謀工作，都是那樣的不健全，那裏還有力量顧及到營呢？我以為軍、師的參謀工作暫時弱點（不是說不重要）而營的參謀工作，倒應該先建立起來。因為：

第一，目前軍師的作戰，並沒有很多的聯合兵種須要去組織（如坦克、空軍、砲、騎兵、機械化兵團等），而營則直接指揮重機槍、輕機槍、步槍、砲，如果它們不能很好的協同動作，是不能發揮其應有效能的（我們主要的是依靠這種步兵武器）。

老實說，我們今天營以下的組織與西歐軍隊比較倒相差不甚大，而團以上的組織則相差太遠了。

第二，今天通常是以營、團獨立作戰的時候為多，而軍以上的作戰較少，因此更須健全營的參謀工作。

第三，在抗戰過程中，部隊的教育只能以營團為重心，一般的不能以軍

師為重心，以軍師為單位來進行集中的教育，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第四，正因為參謀工作人員不夠，因此必須從營團裏去培養，應該提拔最好的連長擔任參謀，這樣才可以培養出健全的參謀工作者。

第五，要使整個的參謀工作能真正正確的建立起來，也必須從下層的基本建立起。

我國的團，差不多還是純步兵的組織，有砲的話也只是步兵砲；關於通信，聯絡，偵察的組織，根據現有的工具，大體上可仿照西歐的軍隊，團裏編制騎兵排甚至騎兵連是很有意義的。

三、騎兵的編制。騎兵在抗戰中還沒有提到應有的地位，雖有少數的騎兵，也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因無騎砲，搜索傳令之訓練不充分，故多不適用於戰鬥。雖常採取迂迴而威脅背後連絡線等，但因缺乏騎兵應有的精神，故其效果甚小」（見日軍在華作戰要領），這不能不是我軍的嚴重弱點。

蘇聯國內戰爭的經驗，騎兵是起了極大作用的，現代西歐國家騎兵之未被重視，只是因為她們有了機械化的部隊，日本的步兵師裏編制有騎兵團，正是補充它機械之不足。中國既然沒有摩托，而馬匹則儘有，正可以大批的利用騎兵，以增加部隊的運動性，和騎馬的突擊力量。

騎兵的基本組織班、排、連甚至到團，都可以仿照西歐軍隊的經驗，如果輕機關槍數量不足時，排可以編為四個班（三個騎兵班，一個輕機槍班），四個排組成連。團的重機槍連，編為四個排，每排重機槍二挺，在作戰時每連平均可以得到兩挺重機槍的火力援助。在旅與師裏，最低限度的砲兵是必須的，因為沒有最低限度的砲兵，不能發揮騎兵的威力。

其他的兵種，因為我們今天還很少，即算有一點的話，迫切的是使用問題，因此從略。至於有少數的技術工具如何使用，則是屬於戰術問題了。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於抗大

「共產國際（一名第三國際）諸領袖提議並通過了：「解放作爲國
際勞工運動指導中心的共產國際，解除共產國際各支部對共產國際的
忠誠及對大會的決議所產生的各種任務。」這是一件好事，對目前的反侵略
戰爭，及對同盟國家的戰時合作，都有極好的影響。我們的基本態
度，是與國際公報所已表現的一樣，熱烈而熱烈的歡迎着這個消息。
（重慶大公報五月二十六日社評）。



陶希聖的「論道集」批判

陳家康

陶希聖著「論道集」(此係指第一集而言)包括五篇文章，即孔子論道，孟子論道，荀子論道，董仲舒論道，揚雄論道五篇。這五篇文章，都是所謂「道」，「德」，「性」，「命」之學，讀時不免令人要打瞌睡。而且讀了之後，對於陶希聖的思想方法，仍然摸不着頭腦。好在「論道集」前面還有一篇自序。這篇自序却是一篇「絕妙文章」，頗能代表陶希聖今天的思想。爲了使後世能夠窺知今天學術思想的一幕古裝新戲起見，我把它全部鈔在下面。

「中國政治思想史在陪都改訂重版之後，我隨手檢讀歷代思想家，搜求他們論「道」，「德」，「性」，「命」的語句，每一人，成一篇。今先寫成古代的儒家，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揚雄五篇，作爲第一集。以後要陸續搜求，陸續會集，陸續成書。」

論道集有一貫的方法，由這個方法，來看歷代思想家的思想。這個方法，是由「道」與「器」或分而合，或合而分，以推求各個思想家自己的思想方法。中國的思想家的思想方法，由這方法來推求，可以有下面的幾派：(一)道與器分而合，合而分，得其平衡與會通者。(二)道與器分，而主於道以道器者。(三)道與器分，而主於器以道道者。(四)道與器分，而偏於道者。(五)道與器分，而偏於器者。(六)道與器合，即道即器，而主於器者。(七)道與器合，即道即器，而主於道者。二與三爲一對比。四與五爲一對比。六與七爲一對比。而都出於第一派。第一派的第一人即是孔子。孔子以降，各思想家都不免偏於第二至第七的一派。如孟子的思想方法，是道與器合，而即道即器，偏於道的方面。如荀子的思想方法，是道與器分，而偏於器的方面。如董仲舒爲哲學，而陷於數理的煩瑣的圈子。如揚雄則道與器由分而合，而偏於道。

偏於器的思想家，於自然則帶科學的氣分，於社會則講求制度與政策。偏於道的思想家，於自然則主玄想，於社會則講求道德與性命。至於主道而講器者，爲避世派。主器而道道者，爲實踐主義者。

有的思想家，專生的學問，只是爭道器的分合。主分者，不獨道與器，理與氣，性與情，必分爲二，乃至天有二天，心有二心，性有二性，命有二命。主合者，不獨天止一天，心止一心，性止一性，命止一命，乃至於情即性，性即命，氣即理，器即道，心即性，心即理。由此以立門戶，起門爭。

惟孔子得共全，所以論道集即以孔子論道爲始。

這篇序言，是陶希聖於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在重慶寫的，是以代表他最近的見解。他在研究了中國歷代思想家的思想方法之後，發現了七個公式。按序，他就按照這七個公式來分派中國歷代的思想家。孔孟荀董揚，分派已定。其他的思想家，也正分派中。孔子的分派最好，是得道之全。其他的人都不免得道之偏。因此，我們還是先研究陶希聖心目中的孔子。

二

陶希聖對孔子的認識，與我們對孔子的認識當然不同。我們認爲孔子，只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大哲學家而已。而且孔子在當時並非一個徹底的守舊派。反之，他却是一個維新派。孔子的辦法乃是把舊有的宗法制度與新起的君臣制度巧妙的聯繫起來。不否定親親而強調賢賢。不否定受命，而強調秉德。不否定事鬼，而強調事人。孔子是春秋時代的產物，其學術思想，接近西周。孔子口中提到道字，但孔子並未把「道」字總括一切。陶希聖說：「道」是萬事萬物變化的法則的總體」(見論道集孔子論道篇)。在論道中，找不出這種關於「道」的思想。反之，却找得出不以道爲本而以德爲本的思想。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引自論語集解疏本第一)。有子的話足以證明原始儒家以德爲本，而不

以道爲本。拿一個「道」字來概括一切，這是戰國時代所謂道家的思想，不是原始孔家的思想。再者，器在孔子口中，也未成爲一個哲學上的名詞。孔子的及門弟子，也從未對「器」字有所發揮。陶希聖預先規定了道器分合的公式，然後割裂孔子的學術思想填入這個公式。這種辦法，無以名之，名之曰「機械的唯心論」而已。原始孔家的哲學並不全。拿論語來研究，孔家哲學是以人生哲學爲主，而涉及於自然哲學者甚少，以政治哲學爲主，而涉及於歷史哲學者亦少；以倫理爲主，而涉及於論理者甚少。陶希聖謂孔子論道「一方面由器至道，一方面又由道至器，好像孔子原有一個道器分合論的系統。其實，這個道器分合論的系統，乃是陶希聖的「託孔改制」。孔子本人的思想系統，並不如此。

孔子的思想，接近西周。論語中屢屢說到天。例如八佾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雍也所謂「天厭之，天厭之」，子罕所謂「天喪予，天喪予」，憲問所謂「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這些文字所指者都是主宰之天，並非自然之天。天的意志叫做命。論語中也屢屢說到命。例如爲政所謂「五十而知天命」，雍也所謂「亡之命矣夫」，憲問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季氏所謂「畏天命」。這些命字所指者都是天的意志。西周的王者自稱受命，就是說，根據天——這個最高主宰的意志來做王。新王推翻舊王，叫做革命（與我們今天所謂革命的意義大不相同），就是說革去舊王所受之天命。行和將廢都歸天命。此後中唐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是把天命放在道之上。孔子所謂「下學而上達」，乃是下學於人而上達於天，根本不是下學於器而上達於道。陶希聖當教授時，本以研究歷史自命。爲什麼把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史，特別是原始孔家思想史，弄得這樣顛倒錯亂？由此可見，論道集中所謂孔子，並非孔子的本來面目，乃是陶希聖心目中的孔子。論道集中所謂孔子論道，也並非孔子論道，乃是陶希聖在那裏大論其道。陶希聖論道，其所以要依託孔子者，無非爲的是一個道統問題，非拉孔子做道個道統之祖不可。然而，儘管陶希聖要拉孔子，但我們認爲論道集中所謂「孔子之道」，仍係陶希聖之道，並非孔子之道。

陶希聖認爲「一道與器分而合，合而分，得其平衡與會通者」，乃是「第一派」，乃是「得其全」的一派（俱見前引）。足見陶希聖本人必以此派自命。其實，所謂第一派的道器論根本就不高明。這一派的道器論，不過是

心物二元論的一種新說法（附註：心物二元論，實際上就是唯心論）。陶希聖謂「下學的「下」，就是一形而下者謂之器」的「下」，又謂「上達的「上」，就是一形而上者謂之道」的「上」（俱見論道集孔子論道）。這種形上形下之分，與程朱哲學完全相同。鑿穿了說，形上之道是心，形下之器是物。陶希聖所謂下學於器而達於道，就是下學於物而上達於心。這不是心物二元論是什麼。然而孔子的哲學却是一個純粹唯心論的系統，不是心物二元論的系統。孔的人生哲學以「崇德」爲主，這是唯心論。孔子的政治哲學以「正名」爲主，也是唯心論。孔子的宇宙哲學（這一部分孔子講得最少）以天命爲主，仍然是唯心論。孔子所持的是唯心論，而陶希聖把孔子的哲學硬說成心物二元論，可謂牛頭不對馬嘴。

當然，今天的問題並不在於辨明孔子本來是唯心論，而陶希聖硬說他是心物二元論，所以不對。這雖辨明在研究中國哲學史時，是必要的。但在研究陶希聖的思想方法時，則不能不辨明其中的差異，作爲第一等工作。今天的問題却在於研究：爲甚麼陶希聖忽然跑來曲解孔子，依託孔子，而造成這心物二元論，即道器二元論的系統。我們明確地問：陶希聖的目的，是爲建立一個器變道不變的理論。陶希聖謂：「禮的道，是一以貫之。禮的器，是隨時變化的」。又謂：「禮的義運不變，禮的器數是隨時變化的」（以上俱見論道集孔子論道）。這就說明了所謂器變道不變的理論。陶希聖所謂孔子之道，又有大道小道之分。小道就是科學的技術的「道」，大道就是哲學的倫理的道。陶希聖說：「意思是說，由小道至於大道，祇須看誰得傳授，誰最後停頓；只要有始有終，是必定可以至於大道的。這個爭論，是出於具體的科學法與抽象的倫理法則兩者之間的分界而來的」（見論道集孔子論道）。這就證明陶希聖把科學的技術的「道」叫做小道，而把哲學的倫理的道叫做大道。據陶希聖便認爲小道變，而大道不變。他說：「天地萬物是變化的，變化故無常。天地萬物的變化是合法則的。合法則故有常。知者見其變，仁者觀其常」。又說：「簡括的話，知者所見的道，是科學的技術的。仁者所見的道，是哲學的倫理的」（以上俱見論道集孔子論道）。這也就是說，科學變而哲學不變。於是陶希聖便以不變之哲學，應萬變之科學。

在抽象的名詞中兜圈子，這是沒有益處的。我們要把問題弄得更實際一點。陶希聖所謂哲學的倫理的道，實際是封建的東西，而所謂科學的技術的道，實際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陶希聖今天在學術思想上的企圖，是要把封建

約哲學論理，與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結合起來。以封建的哲學管理價值，以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為用，這提議之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舊方案，替大紳士大貴階級建設一個輪廓的體系。這種倒退的理論體系，與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革命的理論體系，絲毫沒有相同之點。

三

從孔子到孟子的中間，中國學術思想的變化極大。最主要的，就是在孔孟之間，出現了一個墨家。孔子的哲學是維護封建的，孟子的哲學是革命的。孟子繼承孔子，反對墨子。孟子不但繼承孔子，而且把孔子的唯心主義，更加發展。以故，孔孟之間，不無異同。拿孔子的時代做標準來研究孔子，我們認為孔子仍然是進步的。拿孟子的時代做標準來研究孟子，我們認為孟子却是退步的。

孔子講天命，孟子亦講天命。但孟子所講之天命與孔子所講之天命不同。孔子所謂天命與西周時代所謂天命，意義相同。孔子所謂天，就是一個有意志的主宰。所謂命，就是這個有意志的主宰所發出來的意志。孟子對天命有新解釋。他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萬章上）因此，孟子所謂「天命」與孔子所謂天命不同，與後世所謂「天志」不同。與莊子所謂「自然之天」也不同。孟子所謂「天命」與後世所謂「天」，「先天」知有異同。孟子所謂「思」，「心」與「性」與「天」與「人」之分別，「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也。」（告子上）是見孟子並無「即器明道」的思想。陶希聖要談孟子「即器明道」（見論道集孟子論道），其實不過重複孟子來談他自己的公式而已。

孟子最大的錯誤就在於此。孟子以本不該「天」與「人」之間的分別，也就是說本該「自然」與「社會」之間的分別。孟子與荀子的論爭，其主要的之點，還不在此。一個主張性善，一個主張性惡。在我們看來，主要的點却在於孟子不分別天人，荀子則認為「天」與「人」非加以分別不可。荀子批評孟子說：「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能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能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荀子性惡論）。儒字古訓作為字解。凡非天性而由人為者，皆謂之偽。在荀子書

中，偽字不作「偽君子」之偽字解。善與惡皆係偽者，與天性無涉。孟子道性善固然錯了，荀子道性惡也不對。人之天性無分於善惡。故告子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見告子）「生之謂性」。又舉例謂：「食色性也。」（以上俱見孟子一書告子上）。然而荀子仍有優於孟子的地方。就是荀子認為所謂禮義，所謂善，都是人為的，不是天生的。因此荀子也不主張有所謂良知。

孟子主張良知。他說：「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良知又是「先天」的東西。這當然與唯心論之明代王陽明以良知為主的心學，流於發展了孟子的唯心論。這種唯心論的流弊在於把人為的東西當作天性。這種唯心論者，如果不要支持一種人為的思想，他偏說這不為人為的思想，而說這是人的天性。大不會說話，他偏說這得自天賦。他偏說這得自天賦。於是他在「託古」的本領之外，還有一套託天之本領。最後，他們便要求「以人道合天道」，就是合乎他們所謂「天道」。陶希聖說：「行所無事，即人道之有言者為者，合於天道之無言無為。」（見論道集孟子論道）。我們真不知道，除了言而外，還有什麼天道。

四

荀子對於「天」的解釋又與孟子不同。荀子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天論）又謂：「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又謂：「唯聖人為不求天。」（以上俱見荀子天論）。這些則荀子與孟子的思想完全相反。孟子以「天道」為主，用天道來支配「人道」。荀子以「人道」為主，用人為來破壞「天道」。故荀子謂「治亂，天將自之；自月星風雨，是禹桀之所制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天論）「天有常道矣。」（以上亦見天論）。荀子所謂天道，完全是自然之道。天既無有常道。所以聖人就令人造天。禮義在荀子看來，只是人道，不是天道。荀子謂：「然則禮義積偽者，聖人之本性也哉。」（見荀子性惡論）。陶希聖說：「荀子道術自分析形上的道與形下的器，道器為「義」，器稱為「數」。」（見論道集荀子論道）。這簡直是曲解。荀子所謂義乃是「積偽」，並非天性，更非形上之道。

孔子而後，孟子形成儒家的左派，荀子形成儒家的右派（一個古代的唯物論者，當然不是徹底的唯物論者）。陶希聖要利用孟子，比較容易。利

取孔子，就有困難。利用孔子，要為困難。不過，陶希聖的目的原不在研究孔子。所以他不妨斷章取義。他說：「我對知道天地萬物是變化不已的。變化是無常。變化的法則是有常的。荀子天論說：『天行有常』，據說天道而言。天道有常，人道亦有常。故荀子屢說：『君子道其常』」（見論道集荀子論道）。陶希聖的本意就在於尋求這個「人道之常」。什麼是「人道之常」？那就是陶希聖在論道集自序上所說的「道」，「德」，「性」，「命」而已。一句話，就是與復古。

五

儒家哲學有一大缺點，孔子也好，孟子也好，荀子也好，都以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為主，而缺乏宇宙哲學。由荀子開端的陰陽家則於天文學地理學有極淵博的知識，雖然帶有神秘的色彩。關於是否出於儒家，姑且不論。但是儒家與陰陽家的密切結合，則自董仲舒始。董仲舒並非一個了不起的哲學家。但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來看，他畢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論陰陽之後的第一人，董仲舒不是一個唯心論者，反之他卻是一個機械的唯物論者，或者說庸俗的唯物論者。他是個氣一元論者。他說：「氣一元者，大始也。……氣一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間」（春秋繁露五經行相生篇）。他亦加以解釋說：「氣一元者，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見春秋公羊傳何休注）。足見董仲舒何休一派的分文學家都認為氣是宇宙萬有的根源。宇宙在董仲舒所著書中，有廣狹二義。狹義之天指與地相對之天而言，廣義的天係指宇宙萬有而言。春秋繁露天地陰陽篇謂：「天地陰陽水火土金水九，為人而十者，天之數也」。上一天字係狹義之天，下一天字，係廣義之天。董仲舒筆下的天道，就是他所認爲的宇宙萬有的規律，而不是宇宙萬有的本身。董仲舒和孟子一樣，都是主張天人合一的，都不懂「天人之分」。所不同者，孟子以其所認人道來替天道，而謂之天道。董仲舒則以其所謂天道來代替人道，而謂之天道。當時所謂天人關係之爭，實際上就是自然與社會的關係之爭。

天人之間——即自然與社會之關係，有其所以同，亦有其所以異。執其所異而異之，固不可；執其所以異者而問之，更不可。董仲舒是講「天人合一」的，陶希聖也講「天人合一」。講「天人合一」，就等於講自然與社會合一。

。如果講天人之間有聯繫，講自然與社會之關係，總都不會反對。如果講「天人合一」，講自然與社會合一，我認爲都會反對。天道與人道，尚不能完全合一而毫無分別，總則「道」，「德」，「性」，「命」之學，又怎樣講得通。陶希聖講了「道之在人者，謂之性。性與德都是道之在人者的。但是兩者有分，這是由人經驗累積而得之於道的。性是自然承受之於道的」。又謂：「道之在人者，謂之命。命與性都是道之在人者的，又都受人自然承受於天的。然命與性有分。性是可變的，命是固定的。性是在我的，命是在天的」（以上見論道集孔子論道）。據此，則陶希聖所謂道德性命四者之中，「道」與「性」爲根。德也，性也，命也。三者皆出於道。何謂道？陶希聖謂「道是萬事萬物變化的法則。就自然的方面來說，爲天道。就社會的方面來說，爲人道。人是自然的一現象，故人道可以說與天道爲一體」（亦見孔子論道）。人道與天道爲一體，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陶希聖天人合一的論調，就是故意要把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之間的分別完全搞亂。其目的則在於使一般人把社會規律當作自然規律來了。陶希聖利用主張天人合一的董仲舒，可謂無怪其然。但是他更想利用荀子，就非破壞不可。因爲荀子最反對人道當作天道。

六

陶希聖在楊雄論道一篇中，說得更顯露。他說「天道，人性，物理，莫非是道」。又說：「即此一心，可以測天道，測人性，測物理，這就是神」（以上俱見論道集楊雄論道）。總之，萬事萬物，莫非由於所謂道所謂天道。怎樣纔能測得天道呢？照陶希聖的說法，不必外求，即此一心，即可測道，即可明道。講到此處，陶希聖也就自行撕破了道器二元論，即心物二元論的外衣，完全表現了機械唯心論的本質。

最妙的一點，就是陶希聖忽然翻調「時中」。他在孔子論道中說：「道的變化要權。權就是『時中』」。就中來說：「道與不及極是不對的。就時而論，伯也之清，柳下惠之和，都是教偏補弊的，都是致用於時的。無過無不及，就是中。無可無不可，就是『時』」。無過無不及，無可無不可，謂之「權」。又在楊雄論道一篇中說：「故處理事物，必須隨時，時可則行，不可則止」。同篇中又說：「不及於中，應再進。已過於中，應再退。這種是處事理物之道」。陶希聖今天雖然提倡「守常」，但是他是一定「從權」的時候

太多。無可無不可，正是「夫子自道」。

七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學術思想，是以接受外國的東西為主。對於清算舊有的東西沒有大量去做。以致復古思想，時時作祟。一一反對中國原有的文化的人，每每玉石不分，老嘆一切打倒。至於中國人民對於中國原有文化之好的方面，當然需要。不但需要，而且最大多數中國人民仍在原有的文化中過日子。如果我們不來清算，必然有人來利用。因此，清算中國原有的文化思想，在今天，已有頭等意義。對於這種性命之說，我們必須加以清算，不能避而不談。

(一)何謂道？古書中的道字，一般說可作規律解，但也有例外。我們仍把道字作規律解。古書中的天字，一般的說，可作自然解，當然也有例外。我們仍把天字作自然解。古書中的人字，一般的說，可作社會解，當然更有例外。我們仍把天字作社會解。天是自然，天道就是自然規律。人是社會，人道就是社會規律。人以天為基礎，社會以自然為基礎。人雖然以天為基礎，社會雖然以自然為基礎，但是，人之所以為人，是出於使用生產工具與製造生產工具，社會之所以為社會，是出於人之使用生產工具與製造生產工具。道雖有天，有人的祖先動物（猿類），如果不能使用生產工具與製造生產工具，乃產生不了人。僅僅有自然，有社會的物質條件，如果不能用生產工具與製造工具，仍然產生不了社會。因此，人與社會之所以產生的根源，不是天與自然，而是出於使用生產工具與製造生產工具。天與人之間，自然與社會之間，誠然有共同的規律。但是在認識這個共同的規律之先，必須弄清天與人之間，自然與社會之間的不同規律。要不然，拿天道來解釋人道，拿自然規律來解釋社會規律，那就搞錯了。

(二)何謂德？孔子謂樊遲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論語語淵）據此則孔子並不認為德是天生的。不過孔子有時也把德解釋成天生的。我們仍把德解釋成人為的。德是一種人為的思想。德是一種人為的感情。德是一種人為的行動。德的根源不是天而是人，不是自然而而是社會。德是一個人的品質。但這不是天生的品質，而是人為的品質，不是自然的品質，而是社會的品質。人的德或者說品質，是根據社會形態之發展而發展的。以故沒有千古不變之德之品質。舊的德不斷消滅，新的德不斷產生。譬如忠信，在君主制度之下，叫做德。現在君主制度消滅了，忠君之德也就非消滅不可。

譬如夫死守節，在不准離婚或嫁的制度之下，叫做德。現在寡婦改嫁的教義消滅了，夫死守節之德，也就不必要。譬如貴賤之德，在貴族制度之下，叫做德。現在貴族制度消滅了，還有什麼貴賤之德。這都證明舊德不斷消滅。因而所謂德者，並不是教條。我們現在提倡新德。在抗戰期間，特別提倡民族之德。當漢奸，就叫做違反中國人做人之德。而且這種民族之德，也不是天生的，而是人為的。

(三)何謂性？人性有兩種，一種是生性，一種是習性。生性又叫做自然之性。人是自然的動物，當然有自然之性。習性又叫做社會之性。人是社會的動物，當然有社會之性。自然之性乃是社會之性的物質條件，而社會之性的根源。生性是習性之物質條件，而不是習性之根源。我們特別注重人的習性，即社會之性。德也是一種習性。我們時常說德性，即指德是一種習性而言。人的生性，無所謂善惡。人的習性，則有善惡。習於善，久而久之，就有善性。習於惡，久而久之，就有惡性。如果到了今天，還要討論人之生性究竟是善是惡，那就等於不識哲學。

(四)何謂命？古書中的命字，一般的說，可作「必然」解。當然也有例外。我們仍把命字作「必然」解。天命可以解釋為由於自然規律所造成之必然性。那這是由於自然規律所造成之必然性，人類必須了解。因為了解由於自然規律所造成之必然性，就有可能改變這種必然性。一切認為命是不可變的思想，都是有害的。中國古代哲學中，只有墨家講「非命」，墨家能可貴。儒家中荀子一派不講天命，而講化性。化性當然就是改變天命。除了荀子以外，周易上也有改變天命的思想。革卦九的爻辭云：「改命吉」。又革卦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我們今天所說的革命二字，就是取之於周易。在一個革命的時代，來說天命不可變，未免荒唐。由於自然規律所造成之必然性，固然可以改變，由於社會規律所造成之必然性，更可改變。問題仍然在於我們人類了不了解這種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的必然性。而且人類不是為了了解規律而了解規律。反之，却是為了改變規律而了解規律。最後，我們還要說到才。才有兩種，一種是天才，一種是人才。天才是自然所生成的才，人才是社會所培養的才。人才是培養出來的，用不着解釋。至於天才，當自然科學——即醫學和衛生學發達之後，同樣可以造成。天才不是命定的。

總之，這幾年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潮流，特別抬頭。也就是說，以科學思想為體，以資本主義科學思想為用。潮流，特別抬頭。陶希聖在這種潮流下，不過跑跑龍套而已。跑龍套的站出來了，一尊古裝新戲也正在此間演。

陝北的「變工隊」

曹任

變工隊與節約生產，是自然有因果，莫原困難，渡過難關的中心工作。因此，我們打聽比較有系統地介紹陝北方面關於執行這一工作的情形和辦法，藉供大後方人士的參考。

本刊上期刊載的「陝北以經濟建設和勞工生產的概況」，是關於增加工業生產方面，這期我們介紹關於農業和水利方面的「陝北的變工隊」和「陝北的水利事業」。

——編者

新的變工隊亦有特點：

自政府公佈了今年生產計劃以後，勞動委建議
期內，及現有和應建設員中及今後應建設員中
大變工隊，並各縣長派員督促各鄉變工隊，配合生
產計劃，以期收事半功倍之效。××省農會也視變
工隊而論，認爲如能推廣到全××省廣大農民中間
去，今年的農業生產任務定可完成並有超過，因之
××省政府特將這等特種變工隊法，印發各縣，並
通電各縣長及區長，而尤為各方重視者是變工隊法
並各縣長信傳的新變工隊法，是根據舊變工隊法
加以改良的。在陝北農村中原來就有「變工」的
組織，是民間因調劑勞動力而形成的。其特點是結
合，在急難之時，得能彼此互助，節省勞動力浪
費，進行耕種收穫等農作。比如不願變工方式，一
個人耕地就讓一個人做，實行變工後，則兩個人
耕地也只讓一個人吃飯。又如不變工，一個牛具
農地，同時一個人耕種，變工之後，則可用兩個牛
具農地，一個人耕種，若變工之前，勞動力越多
，則耕種的農地也就越多。

但舊變工法結合對象，多屬於親戚或知交鄰居
，結合的人口最多三戶五戶，變工的形式，約有
下列四種：

第一是人工變人工。其組織形式爲：今天由甲
幫乙做工，明日則由乙幫甲，或是一主一工，半
工半工，每天多用者由少出者按工付值（或俟收
穫之時以糧食折合工值）。

第二是牛工變人工（或稱人工變牛工）。組織
形式是，農戶中有牲畜而缺乏人，或有人力缺少注
畜者，在人力畜力俱用上，使二者收到調劑互助之
效，按照民間習慣，多是三個人工抵兩個牛工。

第三是技術上的。因爲農戶中有的善於翻地不
會下種，有的擅長鋤草却不能下種，於是便彼此取
長補短，進行互助，交換技術。

第四是變工有時限的。有經常變工（如自歸地
至收穫）與臨時變工（只限於某項合作）之分。有
講究情面自願多出工者與講究者（多是親戚朋友
，有在事前須講好條件者）。

多少年來這種自發的勞動互助組織，便通行於
陝北各地，但名稱則不止於「變工隊」，「變工」
之名只流行延安一個地區，其他地區則另有名稱，
如在關中一帶則稱爲「換工班子」，「互助班子」（
註）。

爲了發揚集體互助精神，動員所有勞動者參加

第一、是有計劃的有意識的，在作工上較有
的變工隊相同，但它的組織擴大，因之工人較專
限於狹小範圍（朋友、親戚、鄰舍等關係），因而
變工隊則以自然村爲單位，每個自然村的變工，可
結在一個或幾個變工隊內，至少可包括五百戶。
而且，依此還可以推廣，使之範圍自然村範圍，行
行甲村與乙村的互助。這種新的變工隊，其作用
，可超過舊的多少倍。舉例說明：根據舊法，每個
工經驗，一個勞動力，一年可以耕種十五畝地，三
個勞動力一起工作可耕七十畝地，因以自耕一
塊，那末在新的變工隊組織之下，其生產量將高
大大的超過舊形式，比如新的變工隊十二個勞動力
同時耕地（牛工在外），每天可耕十二畝（五畝一
畝），一年即可耕四十三百畝（約八百六十二畝
）。

第二、較之舊的形式更可大量節省勞動力
。舊的變工，在人力使用上多只限於少強壯的勞
丁，新的變工隊則可組織一切勞動力，不僅是老年
婦女兒童，以合理的分工分配工作，調劑勞動力，
因之組織上更節約勞動力的例子，新的變工組織，
必然能更大大節約。

第三、通過政治動員組織愛國力。如上所述，

黨的變工隊是自然的，新的變工隊則主要依賴政治

的力量推動，共產黨員與青年加入變工隊起積極

作用，黨的農村支部則以組織變工隊為農村工作

的中心工作，但在開始進行組織之時，鄉村政府或

黨支部對於變工隊不加絲毫阻礙命令或抄名單的辦法

，仍是極普遍的，因為只要變工隊的去職，或是否

通過，或中斷，或成廢，皆由份子去進行，黨政從旁加

以幫助，農民則見到有便宜可學且又與己無損，他

們自然會參加的。況且他原來就熟悉變工的好處

第四、新的變工隊容易在農區中發現和提拔

農民幹部，激發農民的積極性，灌洗農村中的一些

懶散、遲鈍的積習，從而養成一種勤快的新生活，

變工互助精神，如在變工隊進行工作期間，再配合

工作競賽運動，地所收效果更趨變工隊之上，又

若在變工期間，選便於農運工作者進行識字、抗戰

宣傳等工作，較之在農閒期間單收事半功倍之效，

而農民也在無形中增加了對抗戰建國的認識。

，秋收得糧按所出勞動力均分。

◎有勞動力沒有牛具的變工隊，在秋收時其具

有鋤頭或耨耨沒有牛具的農戶，它的條件是自備糧

食和農具（沒有者可向政府借），現荒生熟期開某

種吃飯，現種勞動，秋收按勞均分，但後種糧食費

具須自己備，這種形式又叫做「撥兩半變工隊」。

◎勞動力少的小變工隊，只適宜於本村的小塊

土地開荒生產，又有以下三種條件：第一是集體開

荒，自吃自，只均分土地，不分收穫。第二是集體開

荒荒即吃誰，土地所有權是誰的，收穫也是誰的。

如土所說，變工隊是陝北農村中出現的一種自

發的勞動互助組織，變工的變工隊實是大同小異，

但是為什麼變工隊當不另外組織一個勞動互助組織

代替變工隊呢？

這是因為舊的變工隊它的優點——集體勞動

了勞動互助作用，而且又是長期帶着性質的，便只

有保留舊的形式，加入新的內容，才容易為農民接

受，所以在組織形式上仍採用變工的名稱。

現在，×區當局已將延安縣長提倡的新變工隊

的辦法，通告全邊區及陝西各根據地，詳加介紹，

希望×區及以後根據地加以研究，根據當地實際情

況，利用當地原有的一種勞動互助形式，加以改進

，有計劃的去組織勞動互助隊或農民總隊建設工作

中去。

（註）「撥兩半」是邊區中有一種變工隊

助組織，他的性質有一部分是變工性質（即向

於扎工），有一部分是換工性質（只給以人工

換人工，和變工隊的以牛工換人工為不同）

，遇到雨天，第二天的伙食由地主供給，第三

天由包工供給，第三天以後由工人自管。它的

人數自十二人至十六人，其中有一個包工，一

個領頭，當班一人。包工領管全班一切事務（

如包工招活，供給工人食宿費等），不參加

勞動，在工人工費中領百分之十作為生活費，

靖邊的水利事業

惠中權

靖邊的農業，就全×區說來，是比較不發達的

。沙地氣候，雨水缺少，地質瘠薄，灌溉困難，這

些是促成農業比較不發達的自然條件。於是，在農

土地大量地被追荒棄置；另一方面，靖邊的農民缺

乏耕種的土地。凡被開墾出來的新地，由於地質薄

薄，一般地只能種植耕種兩年。所以靖邊的糧食產

量增進的農業，而更發展靖邊的農業，與否全視是

否增進的農業。而要發展靖邊的農業，與否全視是

否增進的農業。而要發展靖邊的農業，與否全視是

事業發展，共計修復水地二萬五千畝，水浸地五萬畝。設若平均每畝水地產一石糧，水浸地產三斗糧，那麼七萬五千畝水地與水浸地，每年共可產糧三萬二千五百石。可惜這方面政府最近兩年來的水利事業，似與民衆無涉，最近兩年來的水利事業，似與民衆無涉，最近兩年來的水利事業，似與民衆無涉。

我們怎樣修水地？我們所謂水地，就是人工灌溉的耕地。興修水地的水利工程，主要的是修築壩壩，其次是修「退水」（即水閘）。所謂壩，類似堤，其作用在於阻攔河水使之不流入河道，造成人工的蓄水池。所以壩的大小由水力的大小決定，最大的壩（如楊橋壩的壩），高三丈，寬五丈，上下成梯形，壩底甚至寬達十餘丈。爲着保護壩，使水力不易沖決，在壩的內外周圍建立護壩牆。這樣的壩，有的是石壩（如楊橋壩），工程較大，有的是木壩（如胡家壩），工程較小。只要經常保護得法，不備石壩耐久數十年，即木壩亦能耐久十餘年。

然而築壩之目的，倒不在於阻攔河水，而在於使水注入水地。所以在壩和水地之間建一壩，壩的容量同樣按水力大小規定，必要時甚至可修兩條壩。但水地並不經常需要水，常常發生水過多的現象，特別是山洪暴發的時候，前使水地淹沒。爲着解決這一困難，便沿壩築「退水」（水閘），

當水地不需要水或水過多的時候，就將「退水」開放，讓水從壩裏退走。這樣的「退水」普通每隔三四丈修一個（最好是用石塊砌成），出口量同樣按照水力的大小決定，「退水」的流道必須比壩更低，否則就有「退水」，但水仍不能沿「退水」退去。

要使壩壩耐久，壩壩內不宜經常蓄水或過多蓄水；其次，當山洪暴發時，如果沒有「退水」分水力，壩壩可能爲水力沖決。因此修「退水」在全壩水利工程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是間接保護壩壩的重要部分。

在壩壩許多地方，我們也修水地當中，這就必須設法推移。這樣的沙堆甚至有三五丈，廣達數百畝。如果我們用人力推移，雖然耗費幾萬個勞動日，未必能竣工。對於這樣的大沙堆時，我們獲得了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即大規模利用水力。我們築一水道，出口準對着沙堆，在出口處打幾個鞏固不拔的木樁，壩壩便得水流通暢，這樣逐步推移過去，經過相當時間，就將三五丈高數百畝廣的沙堆完全沖平。壩壩接近於沙灘地帶，這樣的大沙堆時常可以遇到。這是壩壩與修水地中的特殊的困難，但我們在這上面所耗費的勞動力却並不很大。

其次，我們怎樣修水浸地？壩壩有很多這樣的環境：三面是山，中間是沙灘。每年山洪暴發，就將這沙灘衝成泥灘，中間佈着歪歪斜斜的流道。要將這樣的沙灘改造成爲理想中的耕地，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水浸地有下面兩個特點：第一，地勢多是沙地，地質很薄，以至於不適合耕種；而水浸地由於河水淤塞的結果，使地質增厚，土質經過了人工的改變，利於耕種。

第二，山洪暴發時，山上的牛羊糞便，一起沖下，汙穢於水浸地上，使得土地肥法。水浸地有以上兩個特點，所以它的糧食出產量要比一般旱地多一倍以至於三倍。譬如旱地每畝產二斗，水浸地可產三斗以至於四斗。至於水浸地的興修，使國家不能耕的土地變爲可耕地，擴大可耕地的面積，那更不用說了。

綜合上面所說，這只是我們壩壩與修水地中所謂自然條件的困難及其克服的辦法罷了。事實上，在發展水利事業中，我們還遇到社會的困難。這社會的困難是（即使荒地也罷）：許多荒地地價極低，地主掌握在地主手裏。地權既屬於地主而不屬於農民，那麼要發動農民興修水利是不可能的；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規定興修水利後所得的地利全部歸農民，那麼地主也不願將土地讓給農民耕種。或者說：興修水利，誰就有租種權，但農民爲什麼不可以向別的地主租種現成的熟地，而要去租種先虧本的荒地？經過較長時間的討論研究，我們得出一個適當的解決辦法，就是：修築水利工程勞動費用由農民負擔（政府自然必須給農民若干幫助），修成後，水地地權實行地主農民共同再分配。地權再分配的標準，基本上依照工程大小，同時參照當地工資之高低決定，譬如壩壩土壩，工程很大，

壩壩與修水地中，我們還遇到社會的困難。這社會的困難是（即使荒地也罷）：許多荒地地價極低，地主掌握在地主手裏。地權既屬於地主而不屬於農民，那麼要發動農民興修水利是不可能的；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規定興修水利後所得的地利全部歸農民，那麼地主也不願將土地讓給農民耕種。或者說：興修水利，誰就有租種權，但農民爲什麼不可以向別的地主租種現成的熟地，而要去租種先虧本的荒地？經過較長時間的討論研究，我們得出一個適當的解決辦法，就是：修築水利工程勞動費用由農民負擔（政府自然必須給農民若干幫助），修成後，水地地權實行地主農民共同再分配。地權再分配的標準，基本上依照工程大小，同時參照當地工資之高低決定，譬如壩壩土壩，工程很大，

勞動力的缺乏，工資較低，其結果則十幾工，因這參加興修的農民所得的糧十分之七，地主得十分之三，又譬如柳樹灣工莊較小，農民占百分之五，工資較低，決定地權由地主農民平分。除此而外，我們還允許並鼓勵地主開墾荒地。在開墾時，地主出除地稅以外的地稅，農民出除地稅以外的地稅，這與農民開墾的土地。

水利興修後，土地的分配，這在現時我們不難與修水利中解決地權問題相聯繫起來。在修水利前，地主出地稅，農民出糧食，解決了水利事業和農業的聯繫。

然而這還是一個人口稀少，勞動力量缺乏的條件，我們雖然解決了地權問題，使得地主與農民雙方協調，但如沒有足夠的勞動力量，不僅工程修築困難，即便修成了，土地會無人耕種。楊樹灣只可修水利一萬畝，原來居民只有六十家；去年從別處移民四十家（而且都是半家），總算目前不過一百家。這就是說，楊樹灣全只有二百個勞動力量。楊樹灣已經修成的水地連五千畝，平均每個勞動力量種五十畝地左右，是否能夠要求這一百個勞動力量種五千畝地地耕種呢？這自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合理解決了地權問題，在柳樹灣，還只解決了水利事業中社會問題的一半。我們還必須解決勞動力的問題。在解決了地權問題後，如何解決勞動力的缺乏，獲取足夠的勞動力量，這就成為柳樹灣水利事業中的主要任務和主要工作。

獲取勞動力量，最主要的而且可能的辦法，是移民。所以今年柳樹灣發展水利事業的計劃書中，我們把移民列到第一項，即決心拿很大的力量來實行移民，以獲取勞動力量，以發展水利，因而發展邊疆的農業。

農村而不論其地權問題以邊疆邊境，同時我們直接與間接移民而與修水利的地區遷移。這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工作。要能這一工作做好，必須注意一件事，即：政府必須保障移民的生計。

我們應該保障移民的生計呢？第一、我們幫助他們解決居住的地方。除了發動當地居民出地方讓步到移民地外，我們政府還幫助移民建築房屋，打井。我們在楊樹灣發動居民準備打一百個土窖，這今年移民居住之用，這些就是我們解決移民居住問題的方法和辦法。

第二、幫助移民解決給養與工具的困難。我們幫助當地老農戶借給移民工具與糧食。我們統計當地糧食工具，這行計劃。政府供給移民以糧食工具。今年，員商得××××××的同意，準備給移民貸款。

第三、幫助移民解決當年的耕種。因為初修水利，當年是不能耕種的。因此從公地或私地中抽出若干畝與移民耕種（普通每戶三畝至五畝），以保證今年的糧食給養。

第四、切實執行移民優待條例，減輕其負擔。如果移民的生計有了保障，爭取移民自能積極得成功。然而有了移民，為着有計劃地興修水利，對於新移民的組織與領導就非常必要。最初興修水利，因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曾經吃過大虧。我們把計劃弄好，讓移民自己管理，自己修築，但等到滿期去檢查時，發現他們居然還有動工！因為修築限期，影響修築不能完竣，去年秋收收成有限。所以在水利工程的組織與領導方面，我們一邊要反對政府完全包辦（這會造成低效的創造性與積極性），另一邊又要反對放任自流，放任移民自發活動。只有政府與移民的共同努力，才可能使得水利事業迅速有效地向前發展。

這就是我們在柳樹灣水利事業中所獲得的幾個主要的經驗總結。

（上述第二四六頁談經濟上的邊境與近境）
可是假如我們不能利用這個良機，儘可能的會得到相反的結果。

這是不求解決，而能成的。假若經濟的聯繫，如果不求解決，而能成的，就沒法談起。假若如何在不與人爭的氣氛之下開掘。勞動力量在減少，農產品（被略一百二十餘家）。問題的嚴重不是不可抵抗的自然力。從世界觀的另一方面話亦是這樣。因為它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一個企業家要將一項工業品由原料運進以至製成銷售，不知跑了多少衙門，辦了多少手續，托了多少人情。個中痛苦與困難是局外人不能想像的。檢查制度原來是好的，但如果是實行有流弊，却會造成很大的惡果。我們曾經到一個企業家，他都會列舉許多具體的事實。所有這些都反映了工業的正常發展，同時也是工業生產問題的焦點。」
談到這裏又要回到傅先生的「盛衰危亡」上

「我們這次抗戰，好比新舊交鋒，最後勝利是早經決定了的，一如唐伯倫鎗之新舊交鋒，雖然在如來佛面前說好了的。但是，真功行之間，不得不經八十一難，因為不知此不能勝。真果，在將來則不能勝法常光。所以我們過了一難又一難。」
經濟上的難也並不少，「火燒山，無底洞」，這得我們去拚命，這些問題如果未能妥善解決，會可能延誤了勝利的時期的到來，可能消耗了更多的人力財力，因此認識現時經濟極點的存在，解決現時經濟的一些困難是目前最急切的工作。而不解決它，最後經濟的建設就失去了前提，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了。我們目前的努力應該是根據現實情況，為未來的經濟建設開闢一條康莊大道。

列寧論托爾斯泰 (其三)

戈寶權譯

這裏共譯了兩篇文章：一篇是L.N.托爾斯泰與現代工人運動，原文發表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我們的道路」上，署名是「V.伊林」；一篇是「托爾斯泰與無產階級鬥爭」，發表在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工人報」上。現此兩文，俱自「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四〇四頁——四〇八頁譯出。

L.N.托爾斯泰與現代工人運動

在俄國差不多所有各大城市裏的工人，對於L.N.托爾斯泰的死都已經起了反應，並且用這一種或是另一種方式表示了他們對於這位作家和思想家的態度。作為作家，他曾提供過許多最優秀的藝術作品，使他得列於全世界偉大作家之林；作為思想家，他以龐大的力量、確信和真誠，提出了許多有關現代政治與經濟結構的基本特點的問題。一般地和整個地講起來，他們這種態度，可以從刊載在報紙上的第三國會的工人代表們所發的電報中看出來。(註一)

L.托爾斯泰開始他的文學活動，是還在農奴制度存在的時候，但就在那個時候，農奴制度也開始地快走到它的末日了。托爾斯泰的主要活動，是正落在俄國歷史關於兩個轉變點——一八六一年和一九〇五年——之間的時期；在這兩個時期當中，農奴制度的遺跡和它的直接的殘餘(註二)，滲透了俄國整個經濟的(特別是農村的)和整個政治的生活。並且同時也正是這個時期，是俄國資本主義從下而不斷生長和從上面普及起來的時期。

農奴制度的殘餘究竟要現現在什麼地方呢？最大而又最明顯地，是表現在這種的一件事情上：在俄國這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中，這個時期的耕作是落在政府與貧困的農民手裏，他們是用陳腐的原始的方法，在一八六一年廢除了地主利權而分割了的舊日農奴的土地上工作。從另一方面，耕作又是在地主的利權下，在中俄羅斯，這些地主則農民的勞動，用農民的木犁，用農民的馬車耕作，而農民就這能取得一些「剩餘」，牧場和水源等等。在實質上，這就是舊的農奴制度的經濟(註三)。這個時候的俄國的政治制度，也

是整個地滲透着農奴制度。這可以從一九〇五年最初企圖改革以前的政府體制中看出來(註四)，從貴族與地主對於國庫有絕對的影響中看出來，從那些由貴族與地主出身的——特別是高級的——擁有大權的官吏身上看出來。在一八六一年之後，這遺古制的宗法制度的俄羅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影響之下開始迅速地崩潰了。農民們餓着，死亡着，陷於空前未有的破產和放棄了土地而奔到城市裏面去。由於這些破產了的農民的「廉價勞動力」，鐵道、工廠和工場就緊張地興起起來了。龐大的財政資本，巨大的工商業在俄國發展起來了。

這就是古舊的俄羅斯的一切舊「基礎」之迅速、劇烈和尖銳的崩潰，並且這種崩潰也反映在藝術家托爾斯泰的作品中，和反映在思想家的托爾斯泰的觀點中。

托爾斯泰很知曉農村的貧窮，以及地主和農民的生活。他在他自己的藝術作品中給這種生活作了很好的描寫，以至成為世界文學中的最優秀的作品。農村俄羅斯的一切「舊基礎」的尖銳的崩潰，加強了他的注意，加強了他對於他週圍所發生的事情興趣，使得他的整個世界觀中有了了一個轉變。從用身和教育上講起來，托爾斯泰是屬於俄國最高的地主階級的階層，——但他和這個階層內所有傳統的觀點決裂了，而且在他後來的作品中，以熱烈的批評攻擊了整個現代國家的、教會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秩序，這些秩序是建立在奴役羣衆、羣衆的貧困、農民和一般小農的破產，以及暴力和偽善的基礎之上的，而這些暴力和偽善，又上上下下地滲透了整個現代的生活。

托爾斯泰的批評並不是新創的。他沒有說過一句以前在歐洲和俄國文學上，那些站在勞動者方面的人們所沒有說過的話。但是托爾斯泰對此在均持

點和它的歷史意義，就在於他用了一種只有天才的藝術家才有的力量，表現了俄國這一個時期，特別是農村和農民的俄羅斯的廣大人民羣衆的觀點的崩潰。因爲托爾斯泰對於現代秩序的批評，和那些現代工人運動代表者們的批評是不同的，這正因爲托爾斯泰是站在宗教制度的模範的農民的觀點上，托爾斯泰把他們的心理移植到他的批評和他的學說之中去。如果托爾斯泰的批評的長處，是在於他以這樣感覺的力量、這類的熱情、確信、清新、真誠、和「追根窮源」的大無畏的精神，企圖找出羣衆貧困的真實原因，那是因爲這種批評真正地反映了千百萬農民的觀點的轉變，這些農民剛剛從農奴制度之下解放出來而得到自由，而這種自由又是種破產、飢餓和死亡，以及在城市的「鬻子」之間過着無家可歸的生活等等的新的恐怖。托爾斯泰這種正確地反映了他們的情緒，而他自己也把他們的模範，他們對於政治的疏遠，他們的神秘主義，他們逃避現實世界的願望，「對於惡的無抵抗」，對於資本主義和「金錢勢力」之無力的阻咒，都帶進他的學說之中去。千百萬農民的抗議和他們的失望——這就是托爾斯泰學說中所包含的東西。

現代工人運動的代表者，知道他們有許多事必須抗議，可是沒有什麼事是值得失望的，失望是屬於那些形將毀滅的階級，而在每個資本主義社會中雇用勞動者的階級（其中包括俄羅斯），却不可免地在生長着，發展着和鞏固起來。失望也是屬於那些不知道惡的原因，看不見出路，和不能鬥爭的人們。現代工業的無產階級，是不屬於這些階級的。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一日（舊曆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七期的「我們的道路」（註五）上。

托爾斯泰與無產階級鬥爭

托爾斯泰以龐大的力量和真誠，鞭撻着統治階級，以偉大的明確性揭破了現代社會所賴以支持的那一切制度——教堂、法庭、軍國主義、「合法的」婚姻、資產階級的生活——的內在的謊話。但是他的學說，和現代制度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的生活、工作及鬥爭，是完全矛盾的。在托爾斯泰的說教中所表現的，是那一種的觀點呢？幾個千百萬的俄國人民羣衆，都用他的嘴脣來講話，這個羣衆已經憎恨現代生活中的主人們，但是他們還沒有達到與他們作有自覺性的、廣泛的、堅持到底及不妥协的鬥爭的地步。

偉大俄國革命的歷史和出路已指示出，正因爲這個羣衆是這樣的羣衆，

他們是處於自覺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及舊制度的堅決的擁護者之間。這個羣衆，——主要的是農民，——他們在革命中表示出，在這個羣衆中對於舊制度的憎恨是怎樣大，他們怎樣活生生地感觸到現代制度中的一切苦難；他們又表示出，在這個羣衆中想從舊制度中得到解放和追求好的生活的自覺的願望是怎樣大。

但同時，這個羣衆在革命中又表示出，在他們的憎恨中他們還不夠自覺；在他們的鬥爭中他們還不够徹底；在他們追求好的生活中他們還只局限於狹小的範圍。

偉大的人民的海洋，一直波動到它最深的底層，將它的一切弱點和它的一切強點，都反映在托爾斯泰的學說中。

研究托爾斯泰的思想，俄國的工人階級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敵人；而批評托爾斯泰的「弱點」時，整個俄國人民應該了解到，他們的弱點是在什麼地方，這個弱點是不認他們將自己解放的事業進行到底的。爲了要前進，就應該了解這一點。

但是那些把托爾斯泰解釋爲是「社會的良心」和「人生的導師」的人們，妨礙着這個運動前進。這個謊話，是那些想利用托爾斯泰學說的反對革命一方面的自由主義者所傳播的。有幾個舊的社會民主黨員，也跟在自由主義者的後面（註六），重覆關於托爾斯泰是「人生的導師」的謊話。

俄國人民要得到解放，要在他們明瞭到：不應該跟托爾斯泰學習得到好的生活的方法，而應該跟着無產階級學習的時候進行；托爾斯泰還不了解無產階級的意義，這個階級是唯一的能粉碎那托爾斯泰所憎恨的舊世界的。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舊曆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期的「工人報」上。

附註

（註一）國會或都馬（Duma）是帝俄時代的一種議會形式的政治機構，第三國會在本質上，是「黑幫和「立憲民主黨人」的國會，其中勞動派的代表十三人，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十八人。當托爾斯泰逝世時；

（下接第二二九頁）

談經濟上的遠景與近况

讀報雜感之二

卓芬

「三萬里河東入海，八千仞嶽上摩天。」

讀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

五月二日大公報登載了傅孟真先生的「盛世危言」，在這篇文章中，傅先生引用了許多詩來形容淪陷區的人民如何在等待國軍之反攻。這是實在的情形：在血淚生活中熬煎着的同胞，那怕是生命被敵人毀滅了，也會帶着一顆希望的心死去。在失去了自由的土地上生活着的人，誰都會渴望着反攻。

淪陷區的詩，雖在一千餘年前描寫當時景况，但用來描寫今日淪陷區的人民所期待的，還是一首活生生的具有現實主義的詩。毫無疑問的今天我們的國策應該是準備反攻。只有反攻勝利才是我們的出路，傅先生實在說得好：

「這次交戰的經驗，皆遠超過上次大戰的交戰，勝利之希望既絕之後，其支持之能力是大的，而且以食糧之缺乏使日本潰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更應準備反攻；……這固有關於盟國之接濟，也在乎我們的布置，我們的努力，我們的如何用力而不浪費力量。」

我想：我們應該有一個口號，這口號便是一切為反攻。既然一切為反攻，則反攻與反無直接關係者理應從緩辦理，而為反攻所需者不論事實如何困難，如有缺陷，皆當整頓，不論環境如何艱難，如當改正，則須改正；……從背向說，其與反攻無直接關係者，縱有關於十年大計，百年樹人，也不妨從緩。因為失地早收復一

年即等于十年建設之效力。」

這是多麼實際的見解。是的，為了祖國早日去鎖鍊，為了解救淪陷區苦難的民衆，眼前的一切都應為反攻而努力，反攻的準備工作比其他都急切的！

從盟國接濟的頻傳，預兆着敵寇潰滅的時期快要來臨了，然而在黎明之前，尚須經過一段又冷又黑的時間，我們要衝破黑暗必須足踏實地，正視現實，為爭取勝利而充實自己的力量。一切問題都應作如是觀，經濟問題也不例外。可惜的是還有人竟在烽火際中談風月。文藝上早有人提倡與抗戰無關的寫作；經濟問題上現在也有人持着只管將來不顧現在的論調了。這次經濟學社年會所預定的議程，就是例子。年會中所宣讀的三十多篇論文，有那一篇不是關於戰後經濟的呢？有那一篇能對戰時經濟作深刻的分析，能提出具體的辦法來呢？

戰後的經濟計劃當然可以談，但不能把它孤立起來。離開現實而空談將來，就會將迫如燃眉之急的現實的經濟問題變為中世紀的僧侶在修道院中的論道了。沒有現在那裏談到將來？事實上戰後經濟問題，無一件是與抗戰無關的。現在讓我們把這些問題抄在下面吧：

「各項經濟設施的緩急如何定其先後？各種經濟事業的聯系如何求其貫通？各個經濟區域的發展如何求其平衡？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的部門如何劃分如何聯絡？國際需要的產業如

何分工聯系？如何合作互助？國際自由貿易與統制貿易的思潮在我國應如何抉擇？如何運用？國內的勞資爭執如何解決？勞資利益如何協調？他如經濟中心問題，貨幣制度問題，社會保險問題，生活程度問題，資本節制問題，勞力投用問題，工作效率問題，經濟行政機構問題」。

這些問題與其說是戰後經濟建設應研究的，毋寧說是當前必須進行研究的。以國營事業民營事業來說，何嘗不是今天急待解決的問題？以民族工業資本，增加生產與訓練技術人才來說，又何嘗不是今天急待解決而必須解決的問題？如果談到經濟行政機構，談到貨幣，談到勞資關係，又何嘗不是如此？未來經濟建設的成績如何，應以今天的基礎為出發點。根據薄弱的資本沒有經過一番辛勞的增產，那能有未來的繁榮景象呢？是的，人必須有遠見，必須善於把握前途，必須善於用遠處的眼光，同時也不要忘了用顯微鏡去觀察近狀。難道陶醉着美麗的遠景就可以代困難的現實麼？益世報的意見是很可同意的。

「要計劃未來，必須檢討過去。毫無憑藉的空想計劃，或偷襲敵人的雜亂計劃，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在計劃時必須對目前問題的救濟，有徹透徹的認識，然後始可針對時弊，予以解決。我們如更現實一點說：未來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必須在這次抗戰中奠定基礎，這次抗戰，是民族工業建設的基礎。」

（下接第二四三頁）

內政部 重慶新登記證 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東山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第一類

本期零售一元



要目

共產國際結束聲明
論共產國際的解散
共產國際解散與世界戰局
向偉大的高爾基學習
怎樣領導幹部？
思想的漫步（其一）

于懷
少寶
馬
胡

日六十月六年二十三

目錄

共產國際結束聲明

(二四九)

時

論共產國際的解散

(二九四)

辛苦了，鄂西的英勇將士們！

(二五一)

祝生產會議

(二五二)

論黃金解禁

(二五二)

專論

共產國際解散與世界戰局

于懷(二五四)

向偉大的高爾基學習

戈寶權(二五五)

怎樣領導幹部？

馬特(二六一)

批評

思想的漫步(其一)

胡繩(二六九)

紅棉屋札存

林柏(二七〇)

介紹

列寧論托爾斯泰(其四)

戈寶權譯(二七二)

美國求實精神和俄國革命廣度

矢健(二七五)

譯家

第八卷 第十期

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編譯者 發行所 新華週刊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理 新華日報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各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 二元

六期 十一元

十二期 二十元

廿四期 三十八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論共產國際的解散

最近我們發表了兩項重要文獻：共產國際決議、關於組織形式要求作無條件的修改的考察，必須從這一個組織形式，由於革命發展的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主觀地作無條件的修改。共產國際的決議書和中共中央關於「一週題的決議」工人運動的決議書等，這是一件事，這是一件事，這是一件事。

共產國際結束聲明

六月十日蘇聯莫斯科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聲明如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議中，討論了各國支部要求解散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舉行的共產國際的決議書，並且決定：

- 一、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書，已由俄國共產黨、澳洲共產黨、奧地利共產黨、比利時共產黨、保加利亞共產黨、加拿大共產黨、加拿大共產黨、加拿大共產黨、智利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哥倫比亞共產黨、古巴革命共產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芬蘭共產黨、法國共產黨、德國共產黨、英國共產黨、匈牙利共產黨、愛國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墨西哥共產黨、波蘭工人黨、羅馬尼亞共產黨、蘇聯（布爾雪維克）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瑞典共產黨、瑞士共產黨、敘利亞共產黨、南斯拉夫共產黨、烏拉圭共產黨、及青年共產黨（他是參加共產國際的支部之一）批准。
- 二、共產國際各支部中，沒有任何支部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決議提出反對。
- 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基於上述各點，茲特宣佈：

一、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書，業經所有各有權宣佈決定之支部（包括最重要的一個支部在內）一致批准。

二、自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秘書團以及國際監察委員會均告解散。

三、指令由季米特洛夫（主席），愛爾利利，曼努斯斯基及皮克所組織之委員會結束已解散各支部的決議書，並處理共產國際的職員和資產的事宜。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G·季米特洛夫（簽字）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

最近我們發表了兩項重要文獻：共產國際決議、關於組織形式要求作無條件的修改的考察，必須從這一個組織形式，由於革命發展的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主觀地作無條件的修改。共產國際的決議書和中共中央關於「一週題的決議」工人運動的決議書等，這是一件事，這是一件事，這是一件事。

何組織形式，由於革命發展的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主觀地作無條件的修改。共產國際的決議書和中共中央關於「一週題的決議」工人運動的決議書等，這是一件事，這是一件事，這是一件事。

何組織形式，由於革命發展的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主觀地作無條件的修改。共產國際的決議書和中共中央關於「一週題的決議」工人運動的決議書等，這是一件事，這是一件事，這是一件事。

舊的工人階級大多數變了，社會主義在政治上完全破產了，在歐美各國（除在俄國）工人運動中已完全消滅。這時雖然很薄弱，又沒有廣大的聯繫與組織，不能有力地來抗拒機會主義的出沒和領導工人階級的革命戰鬥，而帝國主義戰爭，使革命勝利，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將階級鬥爭提高到空前的高度。這些條件，在工人運動向前，提出了在各國組織和改良主義的工人政黨截然不同的新型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之迫切需要，和在全世界組織一個統一的集中的國際組織，以領導和幫助新興的薄弱的各國共產黨之迫切需要。共產國際擔負着這個偉大的歷史使命而出世了。在其存在的二十五年內，共產國際不僅幫助各國工人階級先進行子，團結爲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而且培植培養了這些政黨的獨立戰鬥的能力和創造的天才，使他們能够最好地和最成功地解決各個國家面前的複雜艱難的任務。這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上，得到最鮮明的例證。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曾在中國社會內部有其深刻的根源的，故中國革命發展是必然結果。但我們黨的黨之所以能够從馬克思主義者的小組變成爲全國政治生活最重要因素，所以能够在今現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獨立地創造地依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和客觀條件正確地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對於這一點，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是會經過重大作用的。

可以知悉在新興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初期，在各國黨組織和形成的時期，以及在資本主義相對穩定，各國領導鬥爭的任務比較單純的時期，集中的國際的中心是必要的、合適的、能够促進運動發展的話，那麼，在世界局勢變遷，各國工人運動而前問題愈益複雜多變，而各國共產黨已成長，有着

豐富的經驗和創造的獨立作戰能力的時候，這個原有的組織形式已經顯得陳舊了，不適宜了，它的繼續存在便將成爲運動發展的障礙。試設想一下，今天的世界狀況，那是怎樣一幅複雜的圖畫。今天的世界，有着以鐵與血揮灑的希特勒主義及其同盟者的侵略集團與偉大的愛好自由的民族的反希特勒同盟；在這對峙的營壘之旁，站着若干中立的國家。不論在侵略集團之內，反侵略集團之內，在立國之間，各個國家的地位，亦是懸不相似。以德國集團說，德國是完全的主人，日寇是半獨立的主持同盟者——意大利是附庸，羅甸芬蘭是應徵。以同盟國來說，有社會主義的蘇聯，資本主義的美、英、法、中、印、荷、菲律賓等國。以中立國說，有親軸心的西班牙，亦有遠離戰場熱火的南美洲國家。姑不論各國內部情況極大的懸殊，工人運動主觀力量各不相同，即就這複雜萬分的國際關係和狀況來說，要一個國際領導中心來集中地解決一切國際的各種問題，是如何不可設想。一九三五年的共產國際七大大會，有鑑於國際形勢之日益複雜，就已經決定要使各國共產黨能够獨立地根據自己的具體條件和特殊狀況來解決本國各種問題。八年來的經驗，已經充分說明了各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幹部已經成長到能够不犯重大錯誤地正確地決定其本國的內外政策的水平了。

運動發展的客觀條件，影響國際國內的集中領導，已經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而其主觀條件，則已成熟到使這種遠離本國中心的領導，成爲多餘的了。這樣舊的形式廢棄，只會使新的內容更順暢的發展起來，使運動更向前推進一步。從上所

述，亦就可以明瞭這個英明的措施，將必然會使各國的工人運動更進一步的發展，使得各國共產黨更能够適合本國的具體條件和歷史情況，來解決本國革命運動目前的任務，而使它更成爲與千百萬羣衆相聯繫的民族的工人政黨，使得它的領導幹部及全體黨員在提起了的責任感的基础上，能够更進一步地依據本國的高級條件來應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而於高地的創造了。我們可以期待今後各國共產黨，不論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不論在革命實踐上，將會有迅速的飛躍發展和偉大的成就。至於各國工人階級底偉大與共產黨相聯繫的意義，如要，恩格斯的關於第一國際的論述，若至沒有暫時已經變爲極端的形式，以爲「社會主義」的「前進」的話，在今天是要更加重了。

對於目前的世界局勢，它的影響也是十分重大的。目前的世界局勢，正處在極其複雜的決戰的前夜。毀滅希特勒主義及其匪幫乃是今天頭一等的任務，一切力量應集中於完成這一任務。而希特勒的情況愈加危急，他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愈加無出路，那麼，他愈加想挑撥分裂而向德國的營壘。在希特勒匪幫手中的挑撥工具之一，就是「反共產國際公約」作爲準備戰爭的工具，而在目前四面楚歌的環境中，戈培爾輩又聲嘶力竭地叫喊莫須有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危險」和「共產國際干涉各國內政的陰謀」，來找尋逃脫死亡的出路。共產國際底解散，給了希特勒匪幫以當頭一棒，使他們的「反共產國際公約」落了空。國際公約「將來如何的問題，只能回答「將來自知」，已經充分暴露了軸心集團之圖謀叛亂。相反的，同盟各國滿腔的

文日精華，證明了蘇聯對於盟國團結和促進徹底摧
毀軸心集團的勝利這到來的重大貢獻。

總之，共產國際底解散，是為客觀主觀條件的
變化所準備了的歷史條件成熟了，新的內容生長了
的一個必然發展。已經陳舊了的變成枯槁的舊形式
之拋棄，只會使新的內容更迅速更順利地茁長怒放
。同時，共產國際底解散，將使中國共產黨人以更
大的責任感，更大的自信心，更大的創造性，堅定

辛苦了，鄂西的英勇將士們！

辛苦了，鄂西的英勇將士們！是你們的血肉頭
腦，粉碎了敵寇「摧毀四川門戶」的企圖，撲滅了
敵寇的「滅文絕種」，把敵寇數萬之衆「打得落花
流水，狼狽回竄」。是你們的英勇犧牲，堅韌作戰
，收復了鄂西祖國的領土，保障了後方的安全。

辛苦了，祖國神勇的飛鷹！是你們的精銳技術
，和爆炸威力，炸毀了敵寇的輜重接濟，阻礙了敵
寇的變通運輸。是你們的偵察巨眼，發現了敵寇之
寇主力部隊，在各處用小火輪拖帶木船約百餘艘，
狼狽渡河逃命，是你們的神機槍手，將敵小火輪
及木船大部擊沉，餘亦起火焚燒，造成了敵寇一
千五百餘的輝煌戰果，完成了殘敵泗水潛逃，「一
時浮屍如萍，流水爲赤」的傑作。

辛苦了，盟國的飛虎！是你們的密集攻勢出
擊敵寇供儲交通與軍隊集中地的方法，完成了擊
毀敵寇運兵卡車、油庫、火車、船隻的任務，給了
我軍以最大的幫助。是你們的「空中藝術的優美表
演」，在劇烈的空戰中，以中美飛行員的合作擊毀
了敵機二十餘架，使敵寇自傲的零式機的戰鬥力，

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站在革命鬥爭的先鋒
崗位上，來更好地更有成效地工作，來加強與千百
萬人民的聯繫，來進一步鞏固黨的組織，和提高黨
的戰鬥力，藉以服務於抗戰建國大業，首先，最迅
速地摧毀我們民族的死敵——日本法西斯及其德意
同盟者。戰鬥罷！中國共產黨人，勝利是我們的！

(解放)

名符其實的等於零。沒有你們的協助作戰，鄂西的
大捷，不會這樣迅速，這樣盛大。

同時，我們也不能不向鄂西的民衆致敬，向他
們說一聲：「辛苦了，鄂西的同胞們！」軍委會發
言人把「民衆均益勝助軍」爲所以致勝之由
之一，是完全可以了解的。是你們的踴躍幫助，使
國軍能得到作戰時必要的一切便利。這益加證明抗
戰以來頑強不滅的真理：沒有民衆的幫助，是不可
能打勝仗的！

鄂西大捷證明，指揮有力，將士用命，軍民合
作，盟國援助，就能够打勝仗。要打勝仗也非這樣
不行。

鄂西大捷給了敵寇的挑撥離間以嚴重的打擊。
它以事實警告敵寇：我們決心抗戰到底，直到敵寇
無條件的投降。我們的軍隊是有殲滅敵寇的戰鬥力
的。我們的將士，是充滿了對祖國的熱愛，對敵寇
漢奸的憤恨，而決心爲民族解放流最後一滴血的。
中華民族優秀子弟的字典裏，決沒有屈服和投降的
卑劣字眼。全國民衆，是擁護政府，擁護蔣委員長

，擁護和協助國軍的。我們只有團結抗戰的鋼鐵意
志，沒有畏懼動搖，受敵誘惑，貪生怕死的惡濁觀
念。我們的盟國始終和我們站在一道，並肩作戰
，從空中打擊日寇，並不斷增加其對蘇援助的。雖
個對這還有疑慮，請看這次鄂西的大捷！

鄂西大捷振奮了全國同胞，也取得了盟國的讚
揚。這是以血肉構成的活生生的事實，告訴全國和
全世界，中國是能打勝仗的，而且，正在不斷的打
着勝仗。

後方的同胞，隨時都在關切前線，對前線有無
限的期望。每天每時都在守候前線的捷報。現在
鄂西的捷報來了，我們愉快，我們歡躍，我們對將
士們的期待不虛，我們對將士們的信心益堅。我們
益加相信，只要積極戰鬥，只要軍民合作，一定會
勝利。

辛苦了，鄂西的將士和民衆們！各地祝捷的電
報，不足以表示我們對你們的敬佩和慰勞之一。
陪都各界所起鄂西將士慰勞團和空軍志願隊大會
，或者能使你！從握手，談話和慰勞品裏，比較親
切的感到後方同胞的敬意和慰勞了。這又那
裏是我們內心所表示的一切呢？我們只有
更努力的工作，使後方運往前線的一切，後方生產和
所徵的一切，都結晶了我們的敬愛。我們是隨時刻
刻在你們的旁邊的啊！請告訴我們你們需要什麼，
我們將供獻你們所需要的一切。

戰鬥啊，鄂西的英勇將士們，全體的英勇將士
們！緊接着鄂西的大捷，又傳來了湖北，鄂東，鄂
北豫東太行山北部等地的捷報。我們益加興奮了。
現在湘鄂戰事仍烈，太行血戰又起，敵寇的攻勢和
陰謀，還在層出不窮的發展，我們要緊跟追擊，要
主動出擊，不要放鬆一步，不要懈怠一刻。只有積
極戰鬥，才能打擊敵寇。我們以最熱烈和崇高的期
待，寄予更多更大的勝利。 新華（六月五日）

祝生產會議

久為各方所渴望的生產會議，今天在陪都開幕了。

這一次生產會議，較上二次更加被人重視。第一次生產會議舉行於二十八年五月，那個時候，選廠越廠的浪濤，風起雲湧地從後方各省開展着。廠家對於前途，多抱着極大的希望，充滿着高度的興奮。因為那時的物價開始上漲，給與生產事業以不少刺激；而糧食及其他農產品，亦還沒有什麼大的變動。從第一次生產會議到現在，已經四年了。在這四年中，戰時經濟起了極大的變化。物價的暴漲，已經到生產而變為影響生產了。建廠開工之後，廠家，在惶惶不安與困苦中，遇到極重的困難。第二次生產會議，是在這種情況中開幕的。

這一次生產會議的內容，也與上次不同。上次會議以發展生產為中心，這一次會議則以工廠生產為中心。因為工廠生產自去年以來，漸漸走上萎縮之路。新建廠數目少，出頂和減工日日益增多。生產量呢？自然跟着縮小。生產量既縮小，物資的供給就必然降低，於是物價也就更難於控制了。如果能夠除去生產的障礙，能增加物資的供給，那末，當前經濟的危機，一定可以減少許多。物價暴漲是物資缺乏的原因之一。故解除工廠的困難提高生產的能力，乃為當前基本任務之一。不能說先解決物價問題才能解決生產，倒應當說先增強生產，然後才能解決物價問題（當然，解決物價尚有待於財政金融與運輸等等之配合）。因此，我們本屆生產會議以工業生產為討論之中心，是有它的根據的。

以討論的內容言之，此次會議將以資金運用、價格管制、原料來源、稅捐問題與工業管制等五項為主題。這是很中肯的。這些問題，委實給與廠家以無限的困難。對於這些問題的分析與解決的辦法，本報曾分別論及，當此生產會議開幕之時，謹再次貢獻一得之見，以供參考。

第一是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了解客觀的實況。截至目前，閉會前曾已接到提案三百餘件。廠家之踴躍提案，證明他們之對此次會議的熱忱及重視。提案中把問題提出後，為了使問題弄得清楚，還有待於具體的資料，還有待於深切的討論。因此，對於切中時弊的提案，必須展開透澈的討論與研究，始能得出適當的結論。

第二是從個別問題歸結到原則上去。聞各方提出的提案都很有實。自實際面不能托空談，這是廠家的優點。但是，只注重與本廠有關的問題，只顧前幾天，財政部分行各機關洽照，特將原額取辦買賣資金各項法令暫時停止施行，准許人民自由採售，惟邊境出關及前往淪陷區，則予禁止。在物價上漲幣值下落的今日，這一規定，自會引起各方人士的深切注意。

論黃金解禁

提出與自己有利無損的辦法，對於工廠生產之利益是不大的。因為與自己有關的問題，只是整個工業生產的一部份而已。只有從全國的觀點，從聯繫的觀點去措理問題，才能不致有枝節節節，而陷於死地，脚踏腳的毛病。所以，我們以為在提案中，無妨各從個別的問題出發，但須在商量討論之後，把這些問題歸結於总的原則，求得原則的目的，是在於證實或改善現行的政策與財政金融政策。苟能如是，則提案舉法，各部門的問題便可一迎刃而解了。

最後，應請到原則的目的，並非祇求空論，而是根據所得的結論，以便擬定具體的辦法，使具體的辦法之後，能夠切實加以執行。這一點當政府與廠家之協力合作。我們希望出席的廠家與專家能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揭開弊端，提出意見，同時，更希望政府能傾聽各方意見，重新行現行政策與客觀情勢，切實實為廠家解決困難，那末，這一屆生產會議將獲得極大的收穫，目前經濟困難亦必能逐漸解除，財政經濟政策的執行之下，隨之而寬展不少。

（新華）六月一日

增大的通貨發行額，如果能通過回籠，則問題還沒有什麼嚴重；如果發行出去的通貨，變成永不復返的黃銅，則通貨就可因為得到原料而漲長起來，物價亦因為游資之更加猖獗而益形波動了。所以，設法使幣幣回籠，乃是措理物價問題必須採用的一個途徑。

使法幣回籠的方法很多。增加稅收，募集公債

與發動捐輸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增稅還須增發稅源，這就緩不濟急的；公債的發行，如果不採用強迫的方法，效果恐亦不大，至若發動捐輸，情形亦大致如此。我並不忽視上列辦法的作用與意義，但從法幣迅速流通、觀感看來，還須要更大的努力去推動，還須立刻在社會經濟上發生影響。故退一步而論，法幣法，乃是今天橫在我們目前的問題。

收法幣而能立刻生效的治標辦法，是利用某種物品或證券，使其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因為這種物品或證券如果是為一般人所珍貴的話，則游資就會迅速地在這一物品或證券的週圍，那末商品投機之風，就可稍殺；而因為這種物品或證券之吸收作用，法幣就可源源回籠。這便一來，幣值便可穩定了。去年秋間之發行美金外匯期票，就是這一辦法之實施，借發出的數甚不大，故其在市面所發生的影響亦尚微弱。目下黃金之解禁，可以說是這一辦法的發展。因為黃金的價值比外國期票來得高，黃金在一般人的觀感中比外國期票來得珍貴，更實在。黃金解禁後，將會吸收巨量的法幣，將會使一部份法幣轉為黃金。

關於這問題，有人在擔心着黃金的自由買賣，可能加強金融市場的投機性。這種看法分明是以二十九年五月初上海的投機風潮為前車之鑒的。對於這一點，我們認為問題還須從對的眼光去看。黃金自由買賣當然會使一部份人醉心於投機，但沒有黃金買賣便沒有投機？何況黃金投機畢竟沒有商品投機那樣影響物價？有些人又以買賣黃金不一定能前趨國積蓄，因為買賣黃金的利益不一定能大過囤積居奇的利益。其實，這也是過慮的。黃金是商品中的皇冠，它的價值和吸引力比任何商品為大。對於目前所發生的信譽，我們謹作如是解釋。

為了使黃金的自由買賣能發生更積極更擴大的效果，我們提議：

第一，增加黃金的產量並繼續在市場上拋出黃金。我們既然知道黃金解禁的作用是在穩定幣值，那末，黃金的供給量如果不多，則其影響難免其宏大。故產量與拋出量應使其繼續增加。在價格方面，似亦不宜作嚴格的限制。如果把握着法幣歸政府黃金歸人民的方向，則金價之提高，是無害於大體的。反之，如果限制得太嚴，黃金的買賣就難望其活潑了。

第二，後方的採金事業，雖年有進展，但因種種原因，產量並不怎麼大。為了使黃金能大量拋出

，我們認為利用美英借款在外國購回黃金，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同時還須黃金出國之當否，也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因為只限於國內，黃金的買賣仍極有限。苟將若干與我國有密切經濟關係的盟國及其一定口岸，劃入黃金自由流通的範圍，則黃金的買賣自會擴大，其可以吸收的法幣自會增多。當然，對淪陷區，是絕對不能輸出的。

此外是繼續發行外匯期票，而一些財政上的本辦法，亦應作為努力的鵠的。如果這樣，則法幣的回籠，便可源源不絕了。

新華（六月八日）

投稿簡約

一、本刊歡迎讀者投稿，其內容性質略如下述：

1. 發揮及解釋抗戰建國的各種政策。
2. 對當前國內國際局勢的理論分析。
3. 各種學術論著（政治的、經濟的、歷史的、哲學的、文藝的……）。
4. 對於時論的批評及書評。
5. 大後方各地動態和敵後淪陷區各種鬥爭實況的報導（包括各種建設事業和抗敵戰況）。

- 二、每篇字數最好在二千字至六千字之間，最長不要超過一萬字。
- 三、來稿本刊編者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 四、來稿若不能刊登，如附有足夠郵票者，一律退還。
- 五、來稿用何署名聽便，惟須註明真實姓名與詳細住址。
- 六、來稿一經登載，概以現金奉酬。
- 七、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譯稿請附原文詳細註明原稿章、期數、出版處及著作人姓名，重要稿件請掛號寄下，以免遺失。
- 八、來稿請直寄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本刊編輯部。

共產國際解散與世界戰局

于懷

正當反法西斯戰爭臨到決定的關頭，全世界處於暴風雨的前夜的時候，五月二十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建議「解散作爲國際勞工運動指導中心的共產國際，解除共產國際各支部對共產國際的忠誠及應屆大會決議所產生的各種義務」。

這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從歷史發展的方面來說，一如南美洲古巴革命共產聯盟主席及古巴政府不管部長瓊·瑪利約維博士之所指出：「共產國際的解散，對於留置共產國際自七大大會（一九三五）以來的局勢的人，這並不是意料之外的事」。至于決定解散的原因，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建議書本身就是一項好的說明：「據我的說，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於當前的現實形勢以及這些現實形勢爲其發展的鬥爭需要了。那些是這些現實形勢和鬥爭需要呢？一、各國內部與各國之間的鬥爭比之過去更爲複雜，其變化亦更爲迅速，統一的國際組織無法適應這種非常複雜而且迅速的變化的情況；正確的指導，要從仔細研究情況出發，這就更加要各國共產黨自己來做，遠離各國實際鬥爭的共產國際，在過去情況比較單純，變化比較還不很迅速的時候是適合的；但是現在却是不適合了。二、法西斯強盜在法西斯集團與反法西斯集團各民族之間，劃分了深淵的鴻溝，反法西斯國家中，有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各種類型的國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國中，也有很大的差別；此外還有各種情況的中立國。爲了迅速地與有力地組織一切國家的反法西斯鬥爭，國際性的集中組織，早已感到不大適宜于這種情況，至近來乃特別顯著。三、各國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已經成長起來，在政治上已經成熟」。

共產國際的解散雖然不完全爲了加強國際間反法西斯鬥爭的團結，但其解散反法西斯鬥爭的團結而推遲了決定的一步是顯而易見的。就其共產國際解散的建議一說，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士莫不認爲這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而予以衷心的熱烈的歡迎。

事而予以衷心的熱烈的歡迎。

建議發表之日（五月二十二日）：「倫敦方面對於解散共產國際之舉明極歡迎，認爲足以掃除美國及其他國家對蘇聯戰後目標之誤解與阻礙」（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合衆電）；「白宮及國務院方面，歡迎此舉，認爲係友好表示，尤其對於美國當然；此舉顯示聯合國在進行作戰時，將有更爲密切之合作，其用意在於解除若干美人對共產國際戰後政策之疑慮」（五月二十二日華盛頓路透電）。而二十三日紐約無線廣播員則謂「第三國際之解散，乃聯合國更爲密切合作之表示，且係對戈培爾反赤宣傳之一重大打擊」（紐約二十三日路透電）。

的確地，共產國際的組織解散，最重要地是打擊了德意日法西斯，自從該項建議發表以來，不論是倫敦還是紐約，其重要地是華盛頓，只要其要自由，爭民主反法西斯的人士，縱有見仁見智的不同，沒有不對此一劃時代的大事表示熱烈的歡迎的。那些人不高興呢？柏林的戈培爾，德高的蓋達，東京的發言人，美國的孤立主義者（赫斯特——霍華德系報紙），英國工黨派的頑固份子。

柏林——羅馬——東京的一羣不必說，這一個圈子以外的一羣，他們怎麼說呢？他們說這是假的，即便承認它是真的，也以爲它不足重視。說它是假的，認爲共產國際名亡實存，不過換換方式而已，說它不足重視的，認爲共產國際之有無一視蘇聯之要求而定；不辯其時取消它，需要時恢復它，不能恢復，另外成立一個來代替它。這一羣人，名目上是站在同盟國的立場，實際上，他們早已投身於柏林羅馬，在客觀上做了戈培爾的宣傳員了。這些人到處都有，紛紛閃閃，時隱時現，他們的表現方式則有巧妙不同，有的聰明半點，有的簡直笨拙得不值一笑。

爲了回答這些，五月二十九日大林發表了答路透社莫斯科記者金氏問的復函，在那裏他分析了，全面的分析了共產國際解散所起的作用。他說：「共產國際的解散是適當的，因爲（A）它把希特勒份子硬說「莫斯科

「在重要主權國家的生活，並且有意要使他們「波爾塞維克化」的綱領，現在已提議而制止了；(B)它把勞工運動內部共產主義的競爭，使各國共產黨不是以本國人民的利益，而是遵照外來命令行動的這種辦法，使各國共產黨出來了。現在這種辦法制止了；(C)它有利於愛好自由的各國中愛國志士們的工作，不問為派或宗教信仰，而把各自本國的前進勢力團結成民族傳教的單一的陣營，來展開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D)它有利於所有各國愛國志士們的工作，把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團結成單一的國際陣營，對希特勒主義獨霸世界的威脅鬥爭，這樣子來為以平等為基礎的將來各國同志組織清道。我以為所有這些情況綜合起來，結果就一定會使盟邦和其他聯合國在對希特勒主義爭取勝利而戰鬥中的統一戰線，更進一步鞏固起來。」

在這四點中，(一)(二)兩點是關於消極的一面的，(三)(四)兩點是屬於積極方面的，在(三)(四)兩點中，第三點是關於各國國內的，而第四點則是關於國際方面的；在第四點中，又可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關於當前：「把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團結成單一的國際陣營，對希特勒主義獨霸世界的威脅鬥爭」；一部份是關於戰後的，所謂「為以平等為基礎的將來各國同志組織清道」。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斯大林這一簡單的答記者問是包含了怎樣豐富的內容了。無怪乎這一答記者問一發表，立即引起國際上的交相稱譽，倫敦稱之為「有力的政治打擊」，美國譽之為「犀利坦白的文件」，而巴西方面則簡直認為這一文件的發表為「大西洋憲章之勝利」了。

四點中消極方面的第一點有關於積極方面的第四點，(一)(四)兩點都是有關於國際的；四點中積極方面的第二點有關於積極方面的第三點，(三)(三)兩點都是有關於各國國內的——特別是反法西斯各國國內的。關於(二)(三)(三)兩點，阿根廷報紙認為：「自此以後，任何其他政黨，均可與共產黨人合作，對付極權主義，並假借維護歐洲文化，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之名義，而另有所企圖者，均歸於無效」。這的確是一針見血的論斷，我們可以想像到緊跟着共產國際的解散，全世界各國內部，首先是反法西斯國家內部，其次是歐洲納粹本國，附庸國及其佔領區內部的反法西斯民族統一戰線必將有進一步的開展，而這都將有利於最後勝利的更加迅速的到來。不過，我們在這裏要研究的還是有關於國際方面的(一)(四)兩點。

爲要了解這兩兩的意義，我們必須先瞭解自從希特勒在蘇軍的冬季攻勢中遭受慘敗以來的策略的轉變。

這種轉變是怎樣的一種內容呢？三月六號的倫敦「經濟學者」有一篇評論，足爲此一轉變的說明。

「目前德國的策略是被兩個可能性支配着，一個是馬上被蘇聯打敗，一個是最後被聯合國打敗。因此德國策略第一個前提必定是穩定東線……穩定東線僅僅僅乎是一個前提而已。最近幾週來希特勒最重要的策勵不在軍事上，而在政治上。」

從德國宣傳和外交活動有意做出的混亂當中，一個長期的計劃實現了。納粹相信他還可以發動同盟國家的聯合戰線。在德國的歷史中這樣的策略得到成功已不止一次。在七年戰爭當時，腓特烈大帝粉碎了那聯合起來反對他的同盟，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德國國內宣傳近來常常說：「腓特烈大帝的戰爭」。現在的反希特勒同盟是一個成份複雜的同盟。它自身就包含了向左右兩極分化的傾向。要鞏固這個同盟，人必須有耐心，能堅持，互相瞭解。假使希特勒還像慕尼黑協定和法蘇同盟時一樣，把反對他的力量分化起來，他不僅有希望可以毀滅和平，而且他希望可以獲得勝利。

所有德國最近一切的策勵，其目的皆在逼出同盟國家向左右兩極的分化。在宣傳上，他們強調布爾塞維克危險的嚴重；他們不遺餘力地說：「軍事成功，而且說誇大它；他們願意自己拋棄馬尼拉據點和洪水的最後一道防門。羅馬公報曾言「軸心國家將滅絕歐洲布爾塞維克化的危險」。在外交上，他們的技術是提出和平條件，通過瑞典，通過瑞士，通過蘇聯和中國中心的梵語網」(三月六日倫敦經濟學者)。什麼是這些策勵的口案呢？共產國際；軸心國家是在反共產國際的口號(反共公約)之下團結起來的，他們「硬說「莫斯科」有意要干涉他國的生活，並且有意要使他「布爾塞維克化」。由于共產國際的解散，希特勒的新策略益發變得可笑了。

關於第四點、積極方面的：倫敦方面甚爲注意關於戰後問題的一部份；六月一日倫敦路透社報告道：「英國政界人士，刻正重新討論創立「歐洲戰後會議」之廣泛原則，該會議將可免於受首領國際聯盟之覆轍，渠等之所以發此議者，係受斯大林致路透社首席記者覆函中「爲以平等為基礎的將來各國同志組織清道」一語之提示而發；此語曾經蘇聯考慮，並特爲表達，係更進一步發揮一年以前英蘇同盟條約中所稱之兩國「擬聯合其他思想相同之各國

採取在戰後期間以共同行動保障和平及抵抗侵略之建議」一語。該盟約訂於五月，斯大林曾稱美蘇之結合，係為「各國之平等」而設。自由主義新聞記者報謂斯大林之條件具有歷史的重要性，且係以表示將來之國際事務，不應受挑撥或排斥性觀念之支配；而應受各愛好和平民族基於常識之共同行動之支配」(六月一日倫敦路透電)。

倫敦方面注意蘇聯對於戰後問題的態度是有道理的。第一，蘇聯已經提出決戰的口號，戰爭的發展在實際上已到了決戰的關頭，在決戰到來的日子，英美蘇加緊團結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歐洲戰後問題，一級的就假如對於歐洲戰後問題，英美蘇不能獲得一致的理解，英美蘇進一步的加強團結，協同作戰是相當困難的。第二，自從蘇聯完成了冬季攻勢以來，德蘇間所發生的一連串不幸的事件，特別是德波問題，莫不與戰後問題有關，在事情的發展上，這些問題不澄清(最低限度在原則上)，英美蘇進一步的加強團結是相當困難的。

英美蘇進一步加強團結英美蘇在歐洲協同作戰，夾擊希特勒的前提；只有英美蘇協同作戰，夾擊希特勒才能迅速的取得最後勝利，避免戰爭長期化的危機；而今天擺在盟國面前的是歷史課題，一如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它的五月二十四日決議中所指出，却正是「集中全部力量打敗法西斯，避免長期戰爭的危險」。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共產國際的解散，其意義之重大及影響之深遠是不能局限在那一方面的；不過，表現在盟國關係上的，無疑的，却是集中在一個問題上，即它將如何影響盟國，特別是英美和蘇聯的團結，由此而促進協同作戰的實現，提早夾擊希特勒的形勢的到來，從而避免戰爭長期化的危機。

二

由於北非戰事的結束(五月七日)而召開的華府英美參謀會議(英首相十一日到達華府，會議十三日開始)到了五月二十二日，亦已到了宣告結束的階段；二十二日英首相邁出白宮，在同日對駐美英大使館的演詞中，他說「吾人殊無理由可以希望戰爭不致延長」；同日，美戰時情報局長台維斯招待記者，發表談話，亦謂「戰事或可在聖誕節前後結束，但絕非本年之聖誕節」；若再證以五月十九日英首相對美國國會所發表之演詞，可以證明至二十二日左右，英美對於戰爭長期化的看法，雖在北非戰事結束之後，是一致

的。

二十二日共產國際解散消息發表後，翌日，二十三日，英首相又邁入白宮，自同日十一時至翌日晨二時三十分，與美總統恢復戰時會談。二十四日竟日會談未已，二十五日英首相與美總統招待記者，發表談話，內容著重指出，「若戰爭繼續，英美將以同等力量在東西兩戰場作戰」(大意)；字裏行間，英美對於在較短期間的擊敗希特勒的信心已經提高——總之，在這一談話中，英首相不再提出戰爭將長期化的暗示是值得注意的。

二十七日英美參謀會議結束，與前所預料者相反，會後只發表了一句的公報「最近在華盛頓舉行之英美聯合參謀會議業已結束，對每一戰場之未來作戰已具有完全之協議」。

本來英美對於歐洲的整個作戰計劃是早就有了的，而且每一個計劃本身都是具有伸縮性的；這一次的華府會議，有如歐洲區美軍總司令德魯斯將軍之所指出，不過是就原有之計劃中，「選擇最有效之計劃並作最主要之修正而已」(二十三日倫敦路透電)。我們不必探究華府會議選擇了什麼「最有效的計劃」，而其所作「最主要之修正」為何，一句公報的背後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因為這軍事秘密，這是應該讓關心國家來備的東西，不過，由於共產國際的宣佈解散，英美的戰時計劃和蘇聯戰時計劃互相配合的可能性是提高了；一句公報不但具有戰略意義，而且可能藏有政略內容。

台維斯的訪談及其所得的滿意結果，更加提高了這一充滿了蘇聯希望的

可能性。

五月二十日美總統訪蘇特使台維斯抵莫斯科，遞交羅斯福總統致斯大林的親筆信，自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台氏與蘇方首領，迭有往還。二十六日斯大林以致美總統封口信一通交與台氏，二十七日台氏停程歸國，一日抵達西雅圖，三日安抵華府，到後即邁入白宮。

羅斯福和斯大林交換的函件內容既未發表，我們自不便妄加揣測；不過，可以斷言的是，它將有助於英美蘇間團結的加強，而團結的加強却是英美蘇在歐洲協同作戰，夾擊希特勒不可缺的前提。

自然，事件的發展不會是直線的，不過，希望之門既然打開，我們是有理由拒絕去眺望那遙遠的遠景的。

三

一方面是有着希望，一方面是有着憂慮。

北非戰事結束了，希特勒在戰場上再沒有牽制迂迴的餘地，他在忙於建
築「歐洲堡壘」的防禦工事，但地下火却是從堡壘的內部熊熊上昇。聽一聽
法國人道報在四月十五日對游擊隊發出的號召吧：

「盟軍登陸，立刻動員，武裝起來，破壞一切經濟，舉行罷工，阻礙一
切交通運輸；逮捕維琪警察，他們反抗，就消滅他們；打開一切監獄及集中
營，釋放政治犯！」（新華日報二十三日倫敦電）。可以想像的，在共產國
際宣佈解散的今日，這火炮將以加倍的力量來震憾「歐洲堡壘」，報導歐洲
又一火的一七八九的來臨。

希特勒怎樣辦呢？直至現在希特勒還在高加索的庫班橋頭負隅頑抗，而
另一方面他的陸軍參謀長最近還到過芬蘭，所有這些都指示着他還沒有放棄
對蘇發動攻勢的企圖。為什麼遲遲還沒有發動呢？一方面固然是因爲在東線
和北非損失太大，補充需要時間，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主動已經不完全掌握在
他的手裏，他的下一步要看一看盟軍的作戰計劃而定。希特勒今天所最恐懼
的是英美蘇聯協同作戰，因爲今天他的力量（最大估計約爲五、〇〇〇、〇
〇〇作戰兵）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維持兩線作戰的。自然，希特勒的力量還很
強大，不過那強大與其說是在他的現實的軍事力量上，毋寧說是在他的潛在
工業力量上。因此今天擺在盟軍面前的課題，第一是加強團結，協同作
戰；第二是爭取時間，掌握主動。果如是，希特勒在歐洲是玩不出什麼花樣
來的。

四日報載希特勒的所謂閃電專使李斯特將軍又回巴黎去了，最近二三
月來，希特勒在那裏策劃動靜，說不定他可能向近東發動一個以攻爲守，攻
進攻退的牽制攻勢；不過，只要同盟國家——英美和蘇聯協同作戰，爭取主
動，就是這一點的主動權也不完全在他的手裏了。

希特勒是在邊巡視，他正在探看風頭。假如軸心國家的首魁，在基本上
已經茫然不知所措，那麼他的東西兩小囉嚨不問可知了。「宛如一座要傾了
的燒燬的羅馬城」，我們不去描寫，我們現在要談的是日本。遠在邱吉爾抵
達蘇府的同日，五月十一日美軍在阿留申羣島中的阿圖島登陸，作戰十八日
，三十日該島日軍宣佈停止抵抗。五月二十七日，華府會議結束，二十八日
日內閣即決定美對天皇自六月十五日起召開臨時議會三日。很顯然的這一次
臨時議會討論的議題不能完全是關於加強作戰準備的，日本還有冒險的可能
。不過，那冒險決不能在歐洲決戰展開之前。

（六月五日）

美國共產黨對解散共產國際

決議之反響

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發表了政治委員會的決議，這決議將提交
六月二十日在紐約舉行的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這決議是政治委
員會於五月二十五日通過的，內中說：「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茲代
表美共宣佈完全批准並同意共產國際主席團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解
散共產國際的決議。美國共產黨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起退出共產國際
。因此並沒有被邀請與這個決定。可是這個提議具有最偉大的政治上
的重要性，因爲它深切地影響着一切政治關係，促進着反希特勒聯盟
的團結，解除了軸心國的最有力的離間武器——反共妖言，並且在各
國內部開闢了走向更團結的各國團結以進行戰爭取得勝利的道路。它
也替戰後的民主團結掃清了道路，這樣來增加作戰努力的动力。它有
利於國際勞工團結的更有效的諸形式的產生，而當前首要的任務，是
配合着各民族各國家的聯盟，完成英蘇美職工會的團結」。決議繼續
說：「在美國國內，這個世界關係的新時期，把新的急要的重心，放
在今天的許多任務上。最重要的，是共產黨人及民主陣營中其他一切
負責的團體和領袖對有組織至今仍爲反對全權團結和作戰努力的武器
——反共妖言的毀滅之共同責任。爲達到此目的，就當要在美國民主
機構的全國規模內予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以完全承認，這樣，在與
作戰努力相協調之下，採取自由的政治結合的一般權利。美國共產黨
願以全部努力來完成這個任務，並且歡迎美國人民的民主的愛國反軸
心陣營中之任何和一切階層爲達到此目的而盡的一切合作的努力」。
決議的結論說：「美國共產黨將以全力像過去一樣地爲聯合國家的完
全團結，爲國際勞工的團結，爲我國內部的團結而戰鬥，以爭取希特
勒統治及其同盟國日本和意大利的無條件投降，及在戰爭勝利之後的
有秩序的和平世界」（紐約六月十一日專電）。

向偉大的高爾基學習

戈實權

——紀念高爾基逝世七週年——

「我的來，是為着要照耀全世界，溶化這世界的神秘的隱秘的黑暗，找尋世界和自己之間的和諧，創造出自己之中的和諧；在這苦難的大地上，像皮膚上的疥瘡似的，蓋着一層不幸、悲哀、惡痛的硬殼；要照耀這大地上的生活的全部陰黯的混亂——而把一切兇惡的污濁，全部掃進過去的墳墓！」

——高爾基：「人」——

六月十八日這個日子又來臨了，這是高爾基逝世七週年的紀念日。回想在七年前的這一天，這位巨人，這位偉大的受難者，這個在暴風雨將來臨之前掠過白色浪沫的「勇猛的海燕」，就遠遠地離開我們而去了。但是高爾基這個「人」，却是活在人們的心中；高爾基這個「人」，却要求永遠被人們敬愛着。

「為什麼大家要這樣來敬愛高爾基呢？」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這正因為在人生旅途上受過磨難的人們，都在高爾基的身上，看見了他們自己的過去，看出了他們的現在，也看出了他們的將來。高爾基的名字，是活在一切正義的人們心中的。

馬克斯說過：「對於人，最高的存在就是他自己」，高爾基也講過這樣的一句話：「人——這個字的聲音是高傲的」的確，「人」，這是一個可驕傲的字眼，它的聲音是響亮的，而含有「苦痛」和「受難」這些字義的高爾基這個名字，是更外顯傲的，是更外響亮的。

為了紀念高爾基，我想在這篇文章中，把他一生中的，也可以說是他精神上的幾個特點浮現出來，我想：這些特點是應該成為對於我們生活的啓示，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來自人間底層的人·

高爾基是來自人間的最底層的，他是深知道這個人間的。他知道人們的卑鄙、下賤、無恥，他也知道人們的不幸、辛酸和淚。在那些被壓迫、被剝削、被侮辱、被損害和被遺棄了的人們的身上，他看見了他們的善良的心靈，看出了大家渴望求生的心，所以高爾基是把自己的命運和這些人的命運連結在一起的。

高爾基本人的一生，就正像他的筆名的含義一樣，是「苦痛」，是「受難」。在「高爾基童年」那部影片結尾時，我們看見童年的高爾基走到了遙遠的東方，那並不是一條通常的大道，那是一條苦難的人生的途徑。在外部，他看見了年小的「高爾基」就親眼看見了私有的財產的剝奪，他透入了人們的心；在鞋子縫裏，在書師家中，在伏爾加河的輪船上，以及後來在麵包店裏，在碼頭上，在車站上，高爾基都親身體驗到入世的炎涼，許多人因為貧窮而墮落得無恥了，許多人則破碎得可憐，此外還有更多的人在受着苦難要走向光明。

輪船上的廚司斯派斯給了他一把智慧的鑰匙，喀山城裏的長官波羅和費多德也夫，領他走上鬥爭的路。從這時候起，高爾基把自己的命運和人民的命運連在一起，任憑多次的監禁、放逐、亡命、迫害，都並不能削弱他的意志，衰弱他的心。高爾基是以身體給人民的事業的，他看到兩個現實：

「一個是臨危的、腐爛的、發臭的；另外一個是新鮮的、健全的，在穩的「現實」之中生長出來，而且是否定了舊的「現實」的。」

高爾基的一生，是堅定地站在後一個現實上，並且是爲了爭取後一個現實而在勞作和鬥爭的。遠遠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高爾基的名字就和「革命」這兩個字同義了，並且他本人也成了革命的化身。他像「勝利的預言家

「給風雨的通知書」——海濱，他狂呼道：「讓風雨來得再厲害些吧！」沙皇的暴色百人團會談經過，但是自身變的一個燈盞正往利刃，但還是活下去了；這知識，只顯出沙皇政策的無恥，和增進了高爾基的偉大。高爾基是經過過俄國三大革命的暴風雨的，他把他精力全部獻給了這人類偉大的事業；高爾基在寫給蘇聯「機械師公民」一信中所說過：

「公民們！願使的說，我向前就不見停頓的。先前的階級占有了我，已過二十五年……」

「真正的革命性，我正是從苦難的階級中覺悟到，在列寧的文章裏，在照到列寧的那些偉大份子的生活和工作中。我「附和了」他們，那是在一九〇三年。沒有猶豫，一直做「游擊隊」。而實際上，永久地忠於工人階級的偉大事業，對於他們說「右世具」的「最」勝利——是不復收回」。

伊里奇的一段話中也說得對：「無疑的，高爾基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天才，他帶了，並且還將帶給全世界無產階級這許多寶貴的寶藏」。

可惜的是高爾基死得太早了，疾病和文化的劍子手，沒有能讓他多活幾年。在他逝世不久之前，他在病榻上還有說到：「希望病早些好，我還有更多的事務要做呢……」

高爾基這種獻身和至死不屈的精神，應該是對我們的第一個啓示。

偉大的愛和偉大的恨。

正因為高爾基是來自人間的最低層，所以他是懷着最深和最深的恨的：他的愛是偉大的人間的愛，他的恨也是偉大的人間的恨。他愛那些受苦受難，被壓折被損害和被侮辱的人們，爲了他而獻出他的一生；他恨那些市儈、食利者、那些剝削及壓迫人的人，那些壓折人性的人們。

什麼是「市儈」呢？他下了幾個再好的也沒有定義：

「市儈——是這像一部份東西，它被早就製定了的習慣、思想的狹小的圈子圍住了。他們就在這個圈子的範圍內，自動地地思想着。家庭、學校、教會、「人道的」文學的影響，資產階級的「法律精神」和「傳統」的一切種種的影響，像鋼鐵的機器，發條一樣，這種發條推動着市儈觀念的輪軸，推動着市儈要求安妥的那種吸引力。市儈的一切理

由，可以說不該管與的花言巧語而歸到兩個簡單的字眼：「上帝保佑！」

「大家都知道，照他的思想，感覺的本質上來說，市儈是深刻的國家主義的。他們也不會是別樣的，因為他們的個人主義是「私利」的。所謂制度」所造成，這制度是市儈社會的根柢。市儈的一切種種哲學，目的都在於鞏固和保護這制度，彷彿這是唯一的，把人引導到「博愛、平等、自由」，引導到「全世界人類合作」的基礎」。

「市儈的個人主義的兩面心腸和虛偽，在它們對於個體的態度上，是完全明顯的。市儈主義用死而消滅各個別個的個性，一般地還在阻礙個性的力量和才能的正常發展，而使它們畸形化」。

高爾基是憎恨這一切市儈，憎恨一切形成市儈主義的基礎，憎恨出市儈所形成的文化，假惡善和虛偽，還憎恨資本制度。他曾用福瑪，高爾基也夫的嘴，說出這話的話（福瑪·高爾基也夫是他的一本著名的小說中的主人翁）：

「你們不是在建設生活，你們是創造了一個地獄，你們用你們的手造成了這個地獄和地獄。你們有意識嗎？你們記得上帝嗎？你們的上帝是污濁的。你們殺死你們的靈魂……你們用別人的手做工。因爲你們的「大」事業，有多少人斃了鮮血。就是在地獄裏，也沒有你們的位置，沒有你們服務的地方……你們這種變態的行爲，是沒有虛罪的時候了……」

高爾基這又憎恨人類的愚昧和文化的劍子手。一九三五年初高爾基曾這樣寫道：

「我們若生活在一個戰爭的狀況之下——這事我們要記在心裏，一分鐘都不能把它忘記掉。目前有很多的無恥之徒是隱藏在我們中間，這些無賴漢是善於叛變，出賣和暗殺人的。……這種敵人應該毫不憐憫和毫不留情地把他消滅掉，而不必去關心那些唯唯諾諾的人道主義者的嘆息和呻吟。我們必須記住，這個世界，是爲一種純正的人道主義的光所照射着，它的目的是要把全世界的被壓迫者從資本的鐵籠中解放出來的」。

高爾基本人也曾說過：「假如敵人不投降——那就把他消滅掉」。不幸的就是高爾基正爲這敵人（托派布哈林派）所毒害了。

我們對這股，市儈主義也存在於我們中間，民族的敵人也在我們眼前，我們要把槍來消滅它，「假如敵人不能消滅——那就把他消滅掉！」

爲了保衛文化。

高爾基是來自人間的最底層的，高爾基是愛先進的人類的，他也爲了保衛這個先進人類的文化而鬥爭。

「什麼是文化呢？」有人會告訴您：「這是少數有偉大天才的人所創造的東西。」他還會告訴您：「理智——這是少數人的特徵，不能夠在羣衆裏面去找理智的。」而高爾基對於文化是另有一種解釋的，他會很糾創者的文化，奴才的文化，市儈的文化；他看見文化，首先就在於他認爲文化是人類偉大的創造的工作的表現。他會寫文化下了一個定義：

「一切稱爲文化的，都是人類反對自然界的「後母」的鬥爭過程裏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結果；文化——這是人類要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理智的力量去創造「第二個自然界」的結果。」

正因爲這樣，他認爲文化應該是人民的，大衆的，是使人民中所發生的，是爲了人民的，而不是爲了少數私利者和在試驗室中的教授們的。他會很清楚地提出：

「你們，文化的巨匠，究竟同誰在一起了同着文化的苦力工人的力量，來創造新式的生活呢？還是反對這種力量，爲着保存不負責任的野獸的等級？那個等級已經從頭顱起，只剩得一點渣滓的作用，因此，還差幾行動搖了。」

同時他也指出了人民才是文化的真正創造者：

「人民不僅造成了創造一切物質寶物的力量，在他們的身上，我們還可以看出所有精神寶物的唯一的無盡的泉源……」

但我們應該注意到，高爾基並不否定一切過去文化的成果，他又指示過我們應該怎樣去接受遺產：

「我們應當仔細審查一下混亂的過去所留給我們的一切，而挑選出有價值的，有益處的東西，——至於無價值的，有害的，都應當擯開，放進歷史的檔案裏去。」

我們在確切還不妨請到高爾基對於寫作的態度？高爾基的全部寫作動機，就是「爲了人類，爲了羣衆，爲着被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而感受痛苦」，我

再引用幾段高爾基在「青年時代」中寫的語在此吧：

「記起野蠻的俄國生活裏的這些錯似的醜惡，我有時候這樣問自己：值得說起這些事情嗎？而重新深深地回答自己：值得的，因爲這是活着的卑劣的事實，它到今天還沒有斷氣。這樣的真實，必須澈底的知道，爲的把它從自己的記憶裏，從人的心靈裏，從我們這艱苦的可怕的全部生活裏連根拔盡。」

「還有一個別的，更積極的原因，使我要描寫這些醜惡，雖然它們很討厭，壓迫着我們，壓碎着許多非常之好的心靈，——而俄國人始終還有青年的健全的心靈，足以克服它們而且一定要克服它們的。」

「我們生活得奇妙，不但在於這裏面有着繁殖的濃厚的一層——那種犧牲生活的硬殼，而且在於穿過這層硬殼，始終勝利地在生長着那種明顯的，健全的，創造的，始終必與長着善良的——人性的，爲醒着的不可動搖的希望，使我們回復那光明人性的生活的希望。」

高爾基這話爲人生，爲羣衆的態度，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我們也要學習高爾基，來保衛文化，來反對文化上的孟賊，和迫害文化的創子手！記住高爾基的這句句話吧：

「出全力來組織最後的決死的戰鬥，去反對破壞文化的敵人，這文化是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的工人們幾百年來努力所形成的。」

反法西斯的戰士。

同時我們還應該知道，正因爲高爾基有着偉大的愛和偉大的恨，正因爲高爾基一生爲了保衛人類的文化而鬥爭，所以他也是一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士。高爾基早已就知道：法西斯主義是反文化的，是反人類的，並且法西斯主義正準備着起新的戰爭來奴役所有愛自由的人民。

高爾基曾經這樣讚揚德意志的工人們：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幻想着羅馬的政權會統治全世界，希特勒在宣傳，說在法西斯主義一響就得德國人民高升到全人類之上……我們簡直找不到適當的字來形容這種卑鄙無恥已達到什麼的程度……」

高爾基在一九三二年又這樣講到法西斯主義的本質：

「德國的法西斯派，正想用「封建制度的形式」，來破壞波蘭、捷克、比利時、挪威和其他許多被他們所佔領的國家的生活，想把人的存

在變成一種難以忍受的夢魘狀態。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者想利用征服者的身
歸來鎮壓人類所有美好的慾望和藝術文化的。」

高爾基又痛斥過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野蠻的種族理論：

「法西斯主義提出了德國種族有少利統治全世界所有種族的理論
。這是病夫尼采關於「金髮白膚人種」的超越極限早已過了時的思想」
。……

「今天他們宣傳——並且已經在卑鄙的宣傳中實現了——猶太人主義
，明天他們又會宣傳反猶太人主義……，但他們却忘記了波蘭人，波
羅的海人，捷克人曾經給了德國文化多少天才的人物。」

高爾基認為法西斯主義是「對文化的否定，是戰爭的說教，是無力者空
想願望成爲強者的吶喊」，更進而法西主義「是準備摧毀起新的狂烈的戰
爭，爲着千百萬更健康的人，用火來毀壞掉多少世紀以來的文化寶藏，毀滅
許多城市，和消滅掉人民大眾的艱苦工作的許多成果，這些人曾經建立了無
數的工廠和工廠，耕耘了無數的田地，建築了無數的藝術道路……」特別自
從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和德國獲得了政權之後，高爾基更親身看見了無數人類
文化的寶藏被毀滅掉，無數優秀的文化種子被殺害了；無數優秀的作家被殺
進了集中營或者是逃亡到國外去。高爾基曾經寫過不少「國際文壇」，並且號
召和聯合全世界最優秀的作家回爲了保衛全人類的文化來和法西斯主義作鬥
爭。高爾基更多的警告了蘇聯的人民，說法西斯主義會進攻蘇聯的，因此
蘇聯的紅軍，應該是「第一枝……真正的人民的軍隊，它不是爲了侵略，而
是爲了自衛才組織起來的」。高爾基並且這樣預言過：

「這將會是一次反對保衛非人類權力的軍隊的戰爭……。那時候會
出現一枝軍隊，這個軍隊的每一個戰士都須知道和感覺到，他是爲了自
己的自由，是爲了他自己變成爲自己祖國的唯一的主人的權利而鬥爭的
。並且對個戰士一定會勝利的。」

高爾基甚至這樣說過：

「……假如一旦爆發了戰爭，我一定要去做一個士兵……因爲蘇聯
的偉大的正義的事業——這是我合法的職業，是我的義務」。
從此我們就可以看出：高爾基不僅是一個反法西斯主義的戰士，同時還
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雖然他已經年老，但還準備挺身於保衛祖國
的事業。

高爾基逝世已滿七年了，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及其幫兇反對蘇聯的戰爭，
在他逝世五週年紀念之後的幾天就爆發了，但在這次蘇聯人民保衛偉大的社
會主義祖國的神聖戰爭中，他們是記得高爾基生前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號召的
。在這次戰爭中，高爾基已經成了他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一面光榮的旗幟，
他們也記得每一個爲了保衛「蘇聯的偉大的正義的事業」的戰士，「一定會
勝利」。同樣的，在這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戰爭中，高爾基的語言和號召
也響在我們的耳旁，因爲高爾基的精神是活在每一個正義的人的心中，是活
在每一個爲全人類正義的事業而鬥爭的人的心中。

我們要從高爾基學習的是太多了，也正因为這樣，這個導師，對於我們
永遠是親近的。
高爾基逝世七年了，但是他的聲音還響在我們的耳邊，用他在「磨之歌
」中的話來說：

「哦，勇敢的老鷹！你在同敵人的戰鬥裏流了血……然而，時候是
要來的——你的熱血的感傷，要像火犀似的，在生活的陰暗裏發出光來
，燃燒着許多勇敢的心對於自由光明和瘋狂的渴望！
「即使你是死了吧！然而在勇敢的，精神上壯健的人的感傷裏，你
永久是活的榜樣，是向着自由，向着光明的奮鬥的呼號！」

本刊調整價目啓事

- (一) 本刊自本期起調整價目如下：每期零售二元，預定六期十一元
，十二期二十元，二十四期三十八元，外埠郵費免收。
- (二) 爲優待舊定戶起見，本埠定戶在六月份內及外埠定戶在七月份
內續定者（以郵戳爲憑）仍照舊價。
- (三) 舊定戶預定期滿，照舊寄足，並不縮短。

怎樣領導幹部？

馬特

領導是一件藝術

幹部是羣衆和領導者間的一道橋樑，沒有幹部，工作計劃的實現是不可想像的，這正如機好的一架機器，沒有人力的推動，它的運轉是不可能的。然而幹部正因為是跟推動機器運轉的人力一樣，它也有藝術熟練與否的分別，由於我們的工作不是一架死的普通機器，而是一件像萬花筒般的千變萬化的東西，它對於技術熟練的要求較之使用一架機器還來得大，我們可以這樣說，幹部的好壞，他對於工作技術的熟練與否，和對於政治認識的正確與否，成爲決定工作成效的首要條件。

但幹部的好壞，並不是定型化了的天生如此的東西，他，幹部，對於工作的忠誠和積極，機動和敏捷，常有賴於領導者善良的教養和指導，特別在工作方面，沒有領導者的針對客觀現實要求的周詳規劃，機動的動員和妥善的分配工作，而同時又不忘利用幹部所經驗的訓練來改進自己的計劃，則雖有好的幹部也不能有好的表現，因此，我們又可以這樣說：領導的好壞，是決定幹部好壞的前提條件。

這樣說來，領導幹部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一件藝術，它需要長期開在實踐的過程中去考驗，領導也不是片面的單一的事情，它應是工作、生活、學習各方面的綜合。不難了解，一個好的領導者，他應是從無數艱苦工作中奮鬥出來的戰士，同樣也不難了解，沒有政治內容的純事務化的領導

，和沒有工作內容的純流情化的領導（即所謂好好先生之類的領導），都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工作、生活、學習缺一不可的綜合的領導，只有這樣的領導，才是正確的領導，只有這樣的領導，才能指引幹部走上健全的工作者的正軌。

但領導正爲其是一件藝術，它決不是任意創造出來的東西，它必須有爲實踐所根據的一般原則，也必須有從這些原則所產生，爲客觀現實所容許的具體方法。一個好的領導者必須懂得：如何使一般的領導原則和具體的領導方法相配合，沒有這機科學的地有機的組織和運用，領導的任務是難望完滿地達到目的的。

認識幹部的本質和他的

全歷史全工作

領導幹部的第一個任務，第一個要求是認識幹部。道理很顯然，一個領導者沒有主觀上對幹部的澈底了解，知道幹部的本質和種種性能，欲正確地使用幹部，把幹部分配到適當的工作崗位上，這是不可能的。然而現在却有不少的領導者把這件重要的事情忘記了，這是急需糾正過火的錯誤。

認識幹部同樣不是簡單容易的事情，它要求領導者自身首先被幹部認識，一個不願意把自己的真相在幹部面前暴露的領導者，他同樣也不能獲得幹部的真相，隱秘在這裏是有害的。人們常常有這樣

的誤會，以爲認識幹部是單方面的事情，領導者本身是無須被幹部認識的，甚至有這樣一種人，以爲領導者自身應該保持相當神秘性，這樣才能發揮應有的權威，這種說法，無庸廢斥是錯誤的。幹部對於領導他的人，和領導者對於他自己的幹部，沒有交互深透的了解，是難望澈底執行各自的任務的。

然而要怎樣才能認識幹部呢？簡括的辦法就是：「不但看他的表現，而且看他的本質；不但看做的一時一事，而且看他的全歷史與全工作」。不難了解，一個人的表現，在基本上雖然他的本質之外顯的發展，但假如只看到他的一時一事，這很有可能是「一種假象」。有屢見不鮮的例子給我們提示：常常有這樣一種人，當環境順利的時候，便興高采烈，表現得比任何人都積極，當環境逆轉的時候，便垂頭喪氣，意志消沉，甚至消沉怠工，取消一切。像這樣一種人，我們是難以他的表現和一時一事來判斷他的好壞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不爲表面的現象所迷惑，不被一時一事所蒙蔽，根據現象的本質，從整個歷史和工作，客觀和主觀去認識自己的幹部。

不要把幹部當作捉摸不定的東西，要從歷史和發展的觀點去了解自己的幹部。如果這領導者是年輕純潔的，則他目前的單純質樸，對事對人缺乏經驗和練達，只是一時的現象，他往後的發展也許是不可限量的。也常常有這樣一種人，他過去的表現

都好，目前的工作也極佳，但有一點要提防，他可能因為意志薄弱，抵擋不住外間的誘惑，而向自己的工作退却。在這里，領導者就需要用更大的注意力去瞭解自己幹部可能的發展，即使是一點小小的危機也不要讓它生長，萬一成為一個不可克服的禍害。

這里還有一個認識幹部的辦法：好大誇功，何諛逢迎，對工作避重就輕，對命令陽奉陰違，專門打擊別人，抬高自己，這樣的幹部，縱使他的工作能力強，工作做得好，也不能算是好幹部。想頭苦幹，不求回報，說話懇切，不掩飾自己的短處，無論在任何環境下，他都始終如一，幹部這樣的幹部，就是工作能力弱些，在工作上有某些缺點，他也是是一個很好的幹部。

總之一句話：社會上沒有一成不變的人，也沒有十全十美的幹部，一個人有優點也有缺點，領導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在於徹底認識幹部的優點和缺點，把他的優點加以發展，缺點加以克服。

出主意、用幹部、同時

自己也成爲一個幹部

認識幹部還不過是領導幹部的第一步驟，或者可以說是在先決條件。作爲一個領導者，他的更主要的任務是在於「出主意，用幹部」。這是領導幹部的具體的中心內容，一個領導者如果在這方面沒有正確的方針和辦法，便不是一個好的領導者，他不是陷入於純粹事務化，便陷入於純溫情化，這兩者任何一面，對工作都是致命的損害。

不難了解，出主意用幹部並不等於簡單的命令，它是一個過程，一件行血有肉的事實。它首先是

工作的方針和作法的決定，這決定是工作的開始，也是工作重要關鍵，一個架空的不切實際的工作方針和作法，對工作本身將產生怎樣的結果，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因此，在方針和作法決定以前，領導者必須根據過去的經驗，現在的情勢，主觀力量的強弱，慎重地作出正確的決定。尤其重要者是：這一方針和作法，應該通過幹部的意見而決定。因爲無論一個領導者有多大的才能，也不能對任何工作作出完整無誤的決定，沒有幹部的經驗和意見，決定的正確性是沒有法子可以保證的。

但這也不是說，領導者應該跟着幹部的尾巴走，以幹部任何意見的意見，而自己完全失掉領導的作用，這同樣也是不正確的。一個好的領導者應該隨時聽取幹部的意見，以爲參考的意見，這是起碼的條件，但他自己必須有自己意見。一個好的領導者當自己的意見發現了若干缺點而幹部所校正時，他應該不吝惜地放棄自己的意見；但當幹部的意見爲某種事物所障礙而逸出了正軌時，他應有明確的意見，而領導者可能走上兩個前途：不是變成幹部的尾巴，便是變成工作上的狄克推多。

這是關於出主意方面。但這還不過是領導過程的一個階段，整個行程還沒有就此完結。一個不用說明的理由，工作的方針和作法決定了之後，跟着來的是怎樣去組織這決定之具體的執行，而這就牽涉到分配工作，動員工作，和檢查工作的問題上了。

要獲得工作計劃之徹底的執行，首先要要求工作分配之合理化和科學化。無數經驗告訴我們：沒有工作人員之適當配備，雖有好的工作計劃也是無法徹底實現的。這里有兩個工作分配的原則：第一、

分配工作要根據具體的客觀環境，困難是順利，困難之點在什麼地方，順利之點又在什麼地方，然後能以適當的人選。第二、分配工作要根據工作的性質、範圍、和具體內容，何種工作適合於那一個幹部，何種工作不適合於那一個幹部，必須有周詳的估計。第三、分配工作必須根據幹部的主觀條件，如幹部的政治水準，幹部的工作能力，幹部的工

作作風等等，沒有這些根據，工作分配就難不難得適當的解決的。第四、分配工作要民主地決定，領導者自身固應有整個的計劃與估計，但幹部的意見也不可忽視，沒有通過幹部自己的意見，工作分配的合理性是沒有保證的，沒有通過黨衆幹部自己的意見，工作執行的徹底性是有問題的。

工作分配決定之後，首要的問題是工作的動員，就是說，要把所有幹部動員起來，爲實現工作決定而奮鬥。工作的動員包含了如下的內容：首先是幹部對工作方針和作法的了解，其次是幹部工作情緒的保持。這兩者是互有作用的，沒有對工作方針和作法的徹底了解，工作情緒的保持是不可能的；反過來，沒有工作情緒的繼續保持，工作方針和作法的了解是表面的，沒有用的。領導者的責任，在這里是如何使幹部徹底了解工作方針和作法，而同時又永遠保持着工作情緒的飽和狀態。

選擇，問題便轉到檢查工作的上面。工作的檢查至少有下列的意義：第一、它可以幫助領導者認識幹部的本質和性能，從幹部的工作表現去瞭解幹部（自然這只不過是一個斷面的了解）。第二、它可以及時幫助幹部解決工作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及時糾正幹部可能發生的錯誤。第三、它可以幫助幹部更透澈的了解工作方針和作法，使幹部能夠具體地機動地靈活運用這個方針和作法。第四、它可

以考驗工作計劃本身的優點和缺點，而及時把它糾正過來。有了這上面四點注意，不難說明，檢查工作做得好，它就是工作計劃實現之最大保證，同時也是工作動員之有效的辦法。

領導者的任務並不到此就算完結。主意是出了，幹部是用了，然而尚有一事却依然不能忽略，這就是領導者自身同時必須是一個好的幹部。這正如一個戲劇導演者一樣，他是導演，但他同時也必須是一個演員，不隨時隨地作為一個演員給演員們一個示範的作用，他決不能成為好導演，也不能為演員們所尊重所愛戴。一個工作上的領導，他不但是指導幹部怎樣幹，而同時他自己也隨時隨地準備與幹部一齊幹，特別是當幹部不知怎樣幹的時候，他應該示範地替幹部幹，這並不是我對不要分工，原因是領導者的注意必須貫注於全工作過程。

不但教導幹部，而且向

幹部學習

一個領導者在工作上表現的好壞，間有賴於領導者在工作上的正確領導，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從政治和業務上訓練幹部的重要。我們上面說過，領導是工作、生活、學習各方面的綜合，它不能忽略任何一方面。原因很簡單，不從政治和生活上對幹部不斷的教訓，工作上的領導是無法達成任務的。比方，一個政治訓練上有着不正確傾向，在生活上有着不良作風的幹部，能夠期望他在工作中有好的表現嗎？

因此，一個好的領導者，他不但從工作上教導幹部，而且必須從政治和生活上教導幹部。

從政治和生活上教導幹部，使之在工作上的

幹部更困難，它首先要求領導者本身有豐富的政治素養，正確的政治觀點，嚴謹的生活作風，旺盛的學習精神，同時不能不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要能真誠、坦白、純樸、仁愛，去對待他的幹部，成為幹部的思想意識和生活習慣的真正楷模。

從政治和生活上教導幹部，是一種長期的思想意識和生活習慣的鬥爭過程，這要求領導者必須有堅強的韌性，超凡的耐心，不操之過急，也不放過一經微小節。顯然不用證明，幹部的出身、社會關係家庭環境、生活歷史、文化教育、政治水準、年齡、習慣、性格、希望、慾求等等，各不相同，因此，領導者在這方面所採取的鬥爭方法也不完全相同，他必須從各方面去了解自己的幹部，從各方面去幫助自己的幹部，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一點一滴去教導自己的幹部。一個有經驗的領導者必定會知道，引導幹部走上思想和生活的正軌，是一條崎嶇曲折的羊腸小道，操之過急，會使幹部從隊伍中落下來，粗心大意，也會使幹部忘記清洗自己的塵垢和殘渣。

假如一個領導者他只會指摘幹部的缺點和錯誤，而不知當幹部有一點點成績表現時，不吝的給予適當的讚揚和鼓勵，那他所犯的錯誤並不小於看見幹部的缺點和錯誤而不及時給予糾正。意大利歌唱家卡魯蘇少年時，在一間工廠里當學徒，他渴望做個歌唱家，第一個先生却阻止他，說他一顆嗓子都沒有，喊出的聲音像風吹破板一樣的聲音。但他的母親，一位農婦，却攔着他胸頭，誇獎他，說他能唱，因為她已經聽出來有一些兒調子了。她並且每日赤腳來做工，為的節省下錢來付他音樂班的學費。由於他的母親的讚美和鼓勵，改變了卡魯蘇的一生，使他成為世界著名的歌王。世間還有比這

更愚蠢的麼：當自己的幹部有了好的成績表現時，却像沒有看見般的，把它隱藏起來，不給予適當的讚美和鼓勵？

當然，獎勵幹部並不能限於口頭上或書面上的獎勵，而應當給予工作和實質上的獎勵。當幹部在工作中已經表現了某種特長和工作能力時，領導者就應該法給予更適當的崗位，信任他，幫助他，使他發揮更大的能力。人們不難了解，沒有一批批的新的幹部從群眾中提拔出來，沒有一批批的新的幹部從較低的地位使他站在更負責的地位，工作的開展是不可能的。新的幹部是支持工作和發展工作的生命索，這正如人體上的血液，沒有新陳代謝，人體的長成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提拔幹部也不是任意的事情，對不但要根據幹部的工作，也要根據幹部的政治熱情和日常的生活。不要以為他說話漂亮，文章寫好便信任他，主要的還要看他的行為是否與他的說話和文章相符合，更不該以為他對自己好而信任他，還要檢查他是否和別人是否都好。沒有這些根據和慎密的態度，任意的把幹部起來，這對工作和對幹部都會有不良的影響的。

教導幹部，不應當是批評和獎勵，更重要的是訓練幹部，訓練幹部的利益，幫助其解決困難。人自本難自強，一個冷眼如冰的領導者，對幹部的生活和切身利益漠不關心的領導者，他對幹部的期望是怎樣的？一個圖景了望如一個幹部在私人生活上受了些什麼挫折，而領導者却給予一頓無關痛癢的教訓，那對這個幹部的打擊將是難以言喻的。一個善良的領導者，必定會知道，使自已領導的集體成爲一個溫暖的家庭，使被領導的幹部在這里不論在精神上生活上都能獲得穩妥的安妥和寄托，這比什麼都重要的事情。人總不是一件機械，他前

情感，也有理想，他更生活，他更要磨練，領導者如果不在這些方面給幹部以必要的滿足，工作上的領導就成爲像是沙漠上的行旅，艱難之味，見不到有效的成績。

然而教導幹部也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它要求領導者同時向幹部學習，一個人的知識技能究竟是有局限的，如他固步自封，對於自己的成就自滿自足，他就不能前進一步。這對於一個幹部是如此，對於一個領導者也是如此。因此，向幹部學習，向偉大的羣衆學習，既成爲領導者的重要課題。總之，這是一點，誰都不是好的領導者，他就會被幹部和羣衆所遺棄，而遠遠落在幹部和羣衆的後面。不難了解，向幹部學習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可恥的是當幹部已經走在前面，而自己却落後而摸索。向幹部學習也不是一件瑣屑而機械的事情，它只是深入幹部和羣衆中去，傾聽幹部和羣衆的意見，檢討自己所定的工作方針和計劃，用經驗和教訓去校正自己的錯誤，去充實自己知識。假如自己的生活和意識還保存着舊時代舊社會的殘渣，他就應該毫不吝惜地清洗它，在自己年青的幹部面前，坦白的承認自己的快慢和錯誤。這就是一個領導者所應有的態度。

自然，向幹部學習也不是一時一地的事情，它也跟工作過程一樣，是一件長期而不斷斷的鬥爭過程。必須注意，一個人的情性是進步的最大障礙，不跟自己的情性相鬥爭，愈惠自己的情性成長和發展，這個人的進步是頗成問題的。向幹部學習雖然不是艱難的事情，但它必須有耐心，不間斷，馬虎虎的作風，可有可無的態度都是要不得的。

處理幹部私人問題的方針和態度

幹部不是機械，除了工作和學習之外，他還有

自己的生活，因此，在幹部中間常常發生一些私人問題。對於這些事件的方針和態度，也是領導者所不能忽視的問題。

在這些私人問題中，戀愛問題是青年男女最常見而爲幹部自身不易解決的問題。有不少的幹部常因到這問題而處理得不當，在羣衆面前失墜了工作的威信，也會有不少的幹部對這問題處理得不當，而妨礙了內部的團結，更有不少的幹部因醉心戀愛而忘記了自己的工作……這些都不是穩妥的解決。因此，問題在這裏便發生了：處理幹部的私人問題，特別是戀愛問題，便成爲領導者的主要課題的一部份。

一個領導者他總比幹部看得更遠一點，他應具有對事物發展之預見性和警惕性，他必須在事件還沒有發生而已有發生的徵候之前，便防止事件的發生，在事件發生之後，他必須想法子把它熄滅，或者不讓它生長和發展。這是十分必要的。假如一個領導者以爲這些事情是幹部私人的事情，不必採取干涉的態度，則其發展的結果，其影響是不能想像的。

當然，我們不是反對幹部間談戀愛之類的问题，正確的戀愛態度和關係，我們不但反對，而且應認爲這是增進同志間的友愛和工作熱情的一種辦法，一個人不是木石，在工作中，在生活上，在無盡長的人生旅途上，他需要愛情的潤澤，這是不能否定的應有的權利。我們反對的，只是對工作上有妨礙，在團結上起破壞作用的不正確的戀愛，對於這樣的戀愛，一個領導者爲了珍惜自己的幹部，爲了團結自己的幹部，爲了使工作獲得更有利的開展，他總有而且必須採取干涉的態度。

但一個領導者在處理這些私人問題時，即必須

有慎重周詳的考慮：首先，他必須具體了解這個問題產生的根源，它可能發展的方向。其次，必須聽取各方對這事件的意見，如果這些意見是正確的，我們應該拿來做處理這事件的參考，如果這些意見是錯誤的，我們就應及時的給它糾正。再其次，就是慎重考慮處理，處理的辦法應徵得有關各方的同意。最後，要確實弄清這事件的後果，最緊要的是不用打擊的態度，而用勸導的態度。

瞭解明白，處理幹部的私人事件也是一種鬥爭，這鬥爭，所取的方式是緩進還是急進，是直線還是曲線，這就視當時的情況而定。如果以爲處理幹部的私人事件的鬥爭是暫時的，「一吹過」的，那就錯誤了。雖然不用說明，幹部的私人問題的發生必然有它的根源，這根源是與幹部的思想意識和生活作风血肉相連的，如果與幹部開辦發生的私人事件作鬥爭而不從它的根源着手，而不從其發生發展的過程上去清算，那錯誤比其於見樹不見林，見現象而不見本質，無從當時處理從怎樣的當，也其不過是暫時的，往後的禍根依然潛滋着，準備伺機會而再度爆發。

因此，我們處理幹部的私人事件應該當作是與轉變一個人的思想意識和生活作风一樣艱苦的長期鬥爭過程，除了團向當事人解釋問題的嚴肅及其寬厚辦法之外，不要忘記從思想意識和生活作风上去教育幹部，縱使幹部所犯的錯誤不是原則的錯誤，而是技術的錯誤，也不要忽略它產生的根源，更不要因爲它是技術的錯誤而粗心大意起來。有不少的經驗告訴我們：技術的錯誤如不及時給它糾正，跟它作耐心的耐心的鬥爭，也常常可能長成爲原則的錯誤的。在這里，領導者就不要放過一些極微的小節。

(下頁二七一頁)

思想的漫步（其一）

胡繩

一、關於「人本主義」

近來很多人說到真元交會，真元起元這類的话，其意蓋謂中國處在現在的時代，正是在文化上承先啓後的時期。這樣的說法是可以承認的，但是我們不能不問，到底承什麼先，啓什麼後，也就是說：要怎樣地接受中國舊文化的遺產？要創立怎樣的「新文化」？對於這兩個問題，向來就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回答。

就前一個問題看，那麼就必須對於三千年來的中國舊文化作一番檢閱。看這裏到底有什麼好東西沒有。清末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是以為中國「自古以來」關於義理性命的學說與倫理觀念是永遠不會變的。但他們卻不出什麼理由來，不過是說：這些東西是先聖先賢所傳下來的道理，不可輕易變動。這種說法，禁不起幾門歷史上的大風浪，至今就像李長之先生也說：「一般人很熟讀中國西用這句話。我對於這句話也一向沒有好感，我一見這句話，就宛然像看見清末民初的那些留半截辮子的維新黨，或者那些既懶又放的女人脚一樣。」（註一）但是李長之先生其實也是主張「中西用」的，他說：「我覺得中西用這句話的毛病，不在這話不對，是在當時人並不懂得其中的意義」。由此可見，李長之先生不過是不滿意於張之洞所說「中學為體」的說明含糊，而企圖加以新的解釋，所以他向自己問道：「中國的體到底是什麼？……中國文化傳統的長處到底是什麼？以此為體，到底是基於它的本身價值，還是只由於吾人愛國的情緒？……」答覆自己提出的問題，他說：「中國過去的文化特長是在人生方面，其精義是無窮的。樂記上有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本主義就是我們一切文化的根本。本來文化不過是為人生的，講人生須就「人」的立場，並須就「生」的立場。中國過去的文化特點就是如此。」（旁點引用者加）

照李長之先生的說法，中西用說得到了一個新的護符。他所指出的兩點，其中第二點說，中國文化以人情為本位，而與西洋文化之以理知與意志

為本位相對立，這點，我們暫不加以討論。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他所指出的第一點，那便是說：中國文化是以人為本位——「人本主義是我們一切文化的根本」——而與西洋文化之以物為本位相對立。這種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但這種說法又不僅出於李長之先生一個人，我之所以取李說者，不過是當做這種說法的一個代表而已。倘舉另一例，我可以舉出謝扶雅先生的文章，他說：「我民族五千年來思想的過程，實在是條條一貫；它的本質漸漸地是「人本主義」(Humanism)。人本主義原是一個西洋名詞。西洋歷代常有「人本主義」的思想，例如古代的智識派 (Sophists) 及蘇格拉底，中世文藝復興期的「人文主義」，近代英美的人性主義 (Humanism) 及實用主義 (Pragmatism)，皆以人生為中心，皆對「人」發生特殊興趣，反乎傳統的「物」或自然中心的思想。不過中國的人本主義更側重人的倫常方面，致力於人我相互之和諧，不像其他民族的偏重個人性或轉而偏重集衆性了。我國人本主義的表現便是數千年來的儒學。」（註二）（旁點引用者加）這段話更是分明地認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本主義」，而這所謂「人本主義」正是西洋 Humanism 一字的翻譯。

用做西洋名詞的翻譯，「人本主義」的原文可以有兩個字：Anthropocentrism 假如是後者，那就不過是一種重視人的思想，在西洋思想史上是一種複雜的思想。假如是前者，在中文里也有人譯做「人文主義」或者「人道主義」，那是到了歐洲文藝復興期才動興的一種新的思潮，其內容却不是用重視人這一點就可以包括得了的。因此很顯然的，謝扶雅先生對「人本主義」(Humanism) 的解釋是很混亂的，而無論謝扶雅先生還是李長之先生，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說明都不足以證明其在「根本」上或在「本質」上是 Humanism 的人本主義，充其量也只是「一種抽象的具有一定歷史內容的人本主義而已」。

假若把「人本主義」當做 Humanism 的譯文，那麼「人本主義」就不能不和歐洲

近代的黎明期——文藝復興期的「人的發現」運動有着密切的聯繫。所謂「人的發現」，也可以說是「人的自覺」：自覺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人，有獨立的思想能力，有自主的決定能力，對於一切週圍的事情，自己可以負責任。不是像在中世紀那樣，一個人應該想些什麼，做些什麼，都已由宗教的教條死板地規定着了，相反的，一個人在思想與行動上是應該有自由的，是要不斷地發展、探索、追求、前進的。所謂「人的發現」，又包含着人與人的相互承認與尊重，那也就是說，每個人不僅把自己看做是一個獨立的人，而且也將旁人看做是獨立的人，也同樣有獨立地思想與行動的權利與能力。把「人」看做「人」，這正是人本主義的根本精神所在。因為從人本主義的精神里發揚了思想的自由，於是就使科學的產生成為可能；又因為人與人相互承認與尊重，則從人本主義的精神中必然發展出民主的觀念。

從這像的人本主義的意義上來，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豈不是必然會得到和季長之先生與謝扶雅先生以及其他持類似論調的先生們完全不同的結論的麼？

固然從中國過去的文化思想中並不是根本找不出一點人本主義的要素來。但是根本上說來，中國舊思想中的無聊那一個流派都並不是人本主義的。墨家思想比較上還多帶人本主義的成分，但是他們講上同，講天志，講明鬼，那又是非人本主義的了。只有從他們那熱愛尚賢的思想和行俠的精神中還透露着人本主義的氣味。從印度來的佛教思想，不用說得，更是和人本主義完全對立的；而從本國土壤中生出的道家思想，雖然像是嚮往於獨立自由的生活，但其實却是出發於以人為獨有的悲觀心理，而企圖在心理上得到超脫的境界。這種思想與人本主義也是根本對立的。至於儒家思想——那是謝扶雅先生所認為是「我國人本主義的表現」的，固然可以從中找出若干人本主義的成分，但是從根本上看，我們不能不說：儒家思想並不是人本主義。以儒家思想是人本主義的唯一理由就是：儒家不談天，不講自然，其思想學說是以人倫觀念為中心。但是在我們看來，儒家的人倫觀念，不僅不足以證明其為人本主義，相反的，恰恰足以證明他不是人本主義。因為，凡人的思想行為由獨斷的教義所嚴格地規定着，無論這教義是宗教的還是倫理的，那都是反乎人本主義的。

要說明這一點，我想不妨舉出一位贊美儒家思想的先生的文章來看一下，這便是陳定國先生的文章：「要社會根本不動，即要使其根本沒有解組

的現象，只有將一切成訓、習俗、行為、規則、制度等，使其能為真正的控制手段，要牠們具有真實的控制功能，這些制度風俗控制心的力量不減少時，社會便不會解組。孔子頗能知道社會控制的重要，所以提出他的「樂」的主張」。(註三)我想，有了這般贊美者的忠實自白，我們是可以不必再加以什麼說明了。既然「禮」成爲了控制的手段，人只有服從牠的義務，既然一切思想的方式和行為的法則都在禮的名義下成爲了僵死的不變的存在，人們只能在這中間打圈子，那麼還有什麼人本主義的精神呢？

謝扶雅先生一方面說他所講的「人本主義」就是西洋之所謂 Humanism；一方面又說儒家的人本主義比西洋的任何一派的人本主義更為完備。照他看來，西洋的人本主義或者是重個人，或者是重團體，「儒學則恰居其中，不偏於個人，亦不偏於團體，只是中正的『人本』」。但是既講人本主義，而又不重個人，也不重團體，那還剩下什麼呢？所剩下的就只是人與人之間的抽象關係了。而當把這個人與人的關係，固定化成為不變的倫理，那還剩下什麼功能時，於是人並不是獨立自主的人，而只是對對的倫理關係的担当者了，於是個人與團體都降到了抽象的倫理關係之中，雖然這倫理只是那三綱五常的金字了。這是什麼人本主義呢？

由此可見，倘以爲一種思想，只要她講到人，就可算是人本主義。那對人本主義的歪曲。謝扶雅先生甚至說，連「孝莊楊朱兩說皆謂人本主義」也都是人本主義，不過那是偏於「個人性」的而已，倘所謂人本主義的意義不過如此，也就沒有什麼值得推重的價值了。其實一切思想，既然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其歸結總不能不牽涉到人，那豈非一切思想都可以叫做人本主義了麼？歐洲中世紀的思想又何嘗不講人？豈謂中國思想是「人本主義」的呢？

季長之先生還說，中國過去思想的長處是講人，這處是「對於物太忽略」了。這也正是張之洞的理論的新說法，也是現在許多人所最津津樂道的話。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以爲西洋的科學發展是由於「重物」的思想所致，而中國則因爲不重物而重人，所以科學不發展，這是皮相的見解。從歷史上看，歐洲科學的發達正是在文藝復興期的人本主義思潮發展以後，人本主義的思想解放了人的思想，提高了人對客觀界的作用，於是人才不斷地而自然探索，而創造出科學來。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科學的不發達，不是因爲人本主義的思想過重，而恰恰倒因爲思想沒有經過人本主義的洗禮！

爲了科學的發展，爲了民主生活的發展，中國在文化思想上是非常需要接受人本主義（Humanism）的洗禮的。正因爲過去中國文化中缺少人本主義的傳統，因此在接收遺傳時，就決不能原封不動地拿來，而也必須從人本主義的立場上，對於過去中國的思想文化加以批判的改造。但假如只是利用人本主義的名義，假過去中國思想在本質上澈頭澈尾地都是人本主義，而加以全盤接受，那豈不是張之洞的說法的翻版而已！

註一：李長之：「中國文化的現階段」（新認識六卷三四期合刊，三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註二：謝扶雅：「我國的人本主義——哲學」（時代精神七卷四期，三十二年一月出版）

註三：陳定閔：「孔子學說與當代思想」（三民主義半月刊二卷四期，三十二年二月出版）

二、「不變」的倫理

是不是有永遠不變的倫理規則，道德規則？這個問題在復古論者看來很簡單，一切倫理規則，道德規則都是永遠不變的。

但實際上社會生活是在日新月異地變化着，使得絕對的不變論不能不起動搖。於是產生了一種企圖，想從變中找出不變來。

有一種很幼稚的說法，也可以說是老說法。那是說：倫理道德的實際內容固隨社會的變化而變化，但其抽象形式却是永遠不變的。這種說法雖然可以成立，但其所死死拉住的却不過只是一個無內容的空洞的東西。對於這種說法，我們可以隨便舉一個例，如袁月樓先生說：「……倫理道德的實際內容，祇是一時代一社會所公認的行動法則，而非萬世不變的規範，譬如中國古代殉葬風之風，在今日已認爲不是正當的合法行爲，就是這個道理」

但祇就倫理道德的實際內容來說，至於它的合理標準，則不受時間性的影響，可以快讀百世而不變，推之四海而皆準，此類合理的倫理道德，無疑是必存在於的。因爲這種道德都是從人與人的合理關係中所得出的抽象化的標準，可以古今不易其道，泛行全世界而無不得其宜」。（註一）從這段話里也可看出其立論是何等欠強。——在實際內容以外，另有合理標準，怎樣說得通？如何證明這合理的標準是存在着的呢？就因爲那是「合理的」，所

以「無疑是必存在的」。這是什麼邏輯！

對於上述這種自己說不清楚的道理，我們也不值得加以理會。我轉過來看一看馮友蘭先生的意見。他在「新理學」、「新學論」、「新世訓」諸書中都討論過這個問題。不久前在重慶又作過一次總結是「當前倫理思想問題」的連續演講，其中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當前倫理思想問題」。馮先生承認有新道德，也有舊道德，道德既有區分之分，當然其變動時，但馮先生又承認在可變的道德之外，另有一部「而道德是不變的」。馮先生的說法就是，跟着「某種社會」而來的某種道德是可變的，但保留「社會」而來的道德，却是不變的。這種說法，看起來，似乎是言之成理的，因爲這既顧到了社會的變動，而又顧到社會無論怎樣變動，總還是一個社會，既然總是社會，則其中就應該有共同的道德規律。但假如細加考究，就知這種說法本身就有很大的矛盾。馮先生之所謂社會不過是對於各種不同「社會」抽象掉其中的特殊性，而得到的共相，馮先生自己也在「新舊道德問題」的演講中也說：「『社會』不是某個社會，不是某種社會，只是社會。說到這裏也許有人要拿出二個來看，這倒是不成的；……單單只是社會的社會，是不能拿來看的」。（註二）這正是說：我們所看看到的，所生活於其中的，總之某社會，某種社會，而不抽象的「單單只是社會的社會」。既然我們不能只是生活在社會中，而必須生活在某種社會，某個社會中，則總之採用馮先生對道德的定義，「道德是某社會的分子爲了要維持其社會的存在，所必須遵守的基本規律」，那麼人與人也只應生活在某種道德，某種道德之中，而不能只是生活在道德之中。這講了社會生活的具體內容的存不變的道德規律，事實上仍舊只能是「抽象的合理標準」，其爲空洞的東西，正和「只是社會的社會」一樣。

但是我們也應該指出馮友蘭先生對道德內容的具體說明，比了一般的復古論者，中體西用論者，還更有其進步之處的。他所指爲「不變的道德」的例證的於仁義禮智信，他所指爲「可變的道德」的例證的忠孝。他認爲過去人忠於君，孝於親，現在人忠於國家，孝於民族，這並不能證明忠孝也是不變的規律，因爲這只是「沿用忠孝兩字，但實質已有不同」。這種說法雖然是对的。但復古論者先生們却是把忠孝也看做不變的規律，他或者只是抓着一個空洞的名詞，或者——更多的場合——是在表面上換用新的意義實際上却是在舊名詞之中把舊意義也一併輸入。馮先生的邏輯的破綻是在於，我

們固然也要在、要戰、要鬥、要鬥、要鬥，但是從今天的社會生活內容來看，我的問題可以說，這些名詞的實際意義就和孔子那時所講的完全一樣了。

我相稱，其中是有不同的。這不同，要用最簡單的話來說，那就是如前一節裏所說，這些道德標準，在今天運用起來，是必須經過現代的人本主義（Humanism）精神的洗禮的。假如不注意這不同，我們就會或者和復古論者走入同樣的陷阱，或者也只好到了這相空禿的名詞和抽象的規律而對於現實的生活不能有所幫助。

但是對於道德的變化與否的問題，我固還應該更進一步追究。因為問題不僅是是否道德標準社會的變動與否，並且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對於社會的變動採取什麼的態度？可能的態度不外乎三種：第一是阻止社會的變動，第二是消極地順應社會的變動，第三是促成社會的變動和向上發展。儒家的態度屬於第一類，道家的態度屬於第二類。而這兩種態度，特別在社會的變動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時候，又常常是互為表裏，以與第三種態度相對立。

因此，要討論道德的問題，極不能不看出，一方面有在實質上只是為維持這個社會的存在而道德，一方面有為發展改進這個社會的道德。——所謂新舊道德的問題，不從這點出發，也是說不出所以然來的吧？

適應於中國社會現階段抗戰建國的道德，不用說得，是必須從不承認變動而且對變動採取積極態度這一點上出發的。因為抗戰建國本身就是變革與創造的大事業。人們為抗戰建國而服務，就不能建立舊軍的，創造的道德倫理的觀念與規律。

但也有人認為在道德倫理上是不可能變革與創造的。如上一節所引陳克明先生的文章就說，道德的功用是作為一種控制手段來使社會根本不變動。從這里出發，就必然得到道德永遠不變的結論了。再如胡一貫先生，他把人的行為分成經濟行為與倫理行為，經濟行為是對付自然的，倫理行為是對付社會的。而照他的看法，則只有在對付自然的經濟行為才可能是變動的，而在「倫理的社會行為」中則只能「服從」，不能創造。（註三）同樣的意思，劉厚載先生的文章更說得明白，他說：

「一個革命家，往往錯誤地以為社會的變革，這是錯誤的，尤其是危險的。青年們並不宜於鬥爭性，只是宜於活躍好動性，好動性遇到障礙，方成爲鬥爭的現象，所以，鬥爭乃是一種後天的變態，惟好動性才是先天的

常態，當然，革命事業是會遇到無數的障礙，但障礙有大自然的與人爲的，遇到大自然的障礙，應當鬥爭，這不會有過錯，遇到人爲的障礙，就不宜鬥爭。……」（註四）

固然，青年先天地就富於鬥爭性，那本來是說不通的事，也沒有什麼「革命家」這樣說過。假如不遇到實際的障礙，難道也是一味地要去「鬥爭」麼？但是若說，只能向「自然的障礙」鬥爭，而不能向「社會的障礙」鬥爭，那實在是自有革命二字以來的最新的解釋了，孫中山先生「武力革命，鬥十餘年」，難道不是向社會的障礙鬥爭麼？全民族現在就戰了六年，難道作爲鬥爭對象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不是社會的障礙，而是自然的障礙麼？假如說，對社會的障礙不必鬥爭，那麼應該怎麼辦呢？劉先生回答說，「遇到人爲的障礙，只用仁愛去感化，發動軍民至誠懇仁厚愛的偉大精神，去使頑石點頭，決不用武力陰謀去鬥爭。」——對於在革命行動中而同時當然要發揮仁愛的精神，但也不僅是空泛的仁愛，更要有實際的互相寬容互相尊重的精神，但對於敵人，對於革命的障礙，對於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敵寇漢奸，我們也是用仁愛去感化麼？而且把革命的戰爭（包括今天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在內）看做是「武力陰謀」，那是何等的侮辱啊！

從這樣的對於社會行為取消了創造與鬥爭的觀點出發，來談倫理道德問題，其趨向是如何，那還用說麼？但走胡一貫先生與劉厚載先生的文章的問題一個是「革命的人生觀」，一個是「人生與革命」，但取消了在社會活動上的創造與鬥爭時，革命豈不就只是空洞的幌子了麼？

註一 袁月樓：「力行哲學與倫理建設」，《時代精神》七卷四期，三十二年一月出版。

註二 馮友蘭：「新舊道德問題」《新華稿》（文化光輝一卷二十五期，三十二年三月出版）

註三 胡一貫：「革命的人生觀」，《三民主義半月刊》二卷七期，三十二年四月出版。

註四 劉厚載：「革命與人生」，《三民主義半月刊》二卷七期，三十二年四月出版。

紅棉屋札存

林柏

一 六經註我

主觀主編者，真說客觀，既說客觀，不以客觀為標準。故其所編理者，常是當下在心，恣意說話。其引用和解釋前人的言論，也在往斷章取義，任意附會，不惜強使古人遷就自己。陸象山就是最典型的人物。有人勸他著書，他竟答道：「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說：「學有知本，六經皆我註脚」。（象山語錄）。他的原意，就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所以，主觀主義，必然是觀念論。

這種「六經註我」的傳統，一直流傳下來，直到現在還沒有止絕。例如春秋公：「元年，春，王正月」。元，就是始的意思。所以，公羊傳云：「元年者何？對之始年也」。這原來是很明白的事體。可是，「胡文定（安國）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與胡康侯第六書）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原註：東萊集解亦不取）」（見國朝紀聞卷六）。而近人熊十力先生著新唯識論更恣意地說：「春秋正人心之隱隱（原注：隱，謂邪惡或迷妄。隱，思習潛存也。），謂其能以轉移，其義弘，一本於元」。他自註云：「由元言之，則萬物一體。故世界終歸大同。元者，萬物之本真。所謂純粹至善者也。其在於人，則為本心。而抉探是非善惡者，即此本心為內在的權威」（新唯識論論語原文卷中頁二八）。

這就把「元年」的「元」和易經「乾元」及「元者，善之長也」的「元」，混在一起，把「元」說為一切物的本體（所謂「本真」，「本心」，在新唯識論中即作本體的意識解），硬把玄而又玄的意思加諸孔子，然後把春秋來做自己玄學的註脚了。在新唯識論中引用易經和中庸，都充滿着這樣的作風。從學術上說來，終是不妥。至於以「本心」為「抉擇是非善惡」的「內在的權威」，勢必至「其所謂無非善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顧斯民者」（錢東原語）。可見主觀主義必然又是獨斷論的。

二 天上與人間

論語自給補注云：「三皇之時，堯舜于行者居居，午自以為馬，午自以為牛，趨德行而民隨，馳驅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尚蒙，不知預譴告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推况之也」。

這就是說：上古民智未開，勞而自養，所謂飢而食，飽而游，「不慮不知，順帝之則」，尚不知道互相責備，雖有災異，也看做「雲行雨施」一樣，不叫做上天的「譴告」。到了後世，有了「上下相非」實的事情，一遇災變，便把人間這種互相非責的情形（尤其是上頭責備下面的情形），來搬度天上，才造出「譴告」的說法，以為災異是上天譴

告人主的。這可是古人的天有厚薄，而是古今即大有「懸懸」和「懸懸」的不同。王充說：「緣地說明了災異隨官的起源。試問：也就揭開了天上的秩序情形是人間秩序情形的反映，換句話說，就是人類自己把人間的關係搬到天上去。在中國，有些學者老喜歡說「天人之際」，反正是得「天人關係」的，恐怕要算他第一人吧！

三 以天地理天地

宋朝楊萬里（約生於一一二三年，死於一二〇六年）著誠齋易傳，多引經傳以證周易。他解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說：「易之未作也，法天地之道，以為易之道。故曰：準一。準之言，法也；如太玄（按楊萬里著太玄）準易之準也。易之既作也，還以易之道而測天地之道；故曰「綸」。綸之言，經理也；如君子以經綸之綸也。一綸」之言，謂也；經理之而該備也。惟其準則乎天地，故能擬乎天地（按經字疑係理字之誤，或經字下脫理字）；非以易而測天地也，以天地而測天地也」（商務印書館影印集成本，頁二五二）。

這是誠齋易傳的根本見解。這意思是說：易書的道理法則（即「易之道」），是根據天地的道理法則（即「天地之道」）而獲得的。正因為它是拿天地的道理法則做根據，所以翻轉來，這些法則才

普通地支配天地，才能用它們來經理天地，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改造世界。他恐怕人們發生誤會，故又申說道：並不是拿易書的法則去經理天地，實在是拿天地自身的法則去經理天地的。而他的天地觀念，則可以由下面這幾句話看到：他說，「至高曰天，至健曰乾。天，言其象。乾，言其性。元、亨、利、貞，言其德。象而後有性，性而後有德。」（同書，頁一）由此可見，他把「天地」，和「天地之道」，以及人所理解的「天地之道」——即「易之道」，區別得很清楚；而且所謂「易之道」，還是出於「天地之道」的。用現在的話說：他是承認先有存在，然後有意識；意識是存在的反映。

這由其解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句，也可以看到。他說：「然聖人之與天地，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有心，故愛一物不棄其仁；無心，故聽萬物之自生自遂。聖人仁萬物而獨任其憂，天地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同書，頁二五五—二五六）由此可見：他不承認有主宰天地的神，因為「天地無心」。所以，他的易的概念，只是「易者何物也？生生不息之理也」。在下文還有：「乾也，坤也，占也，事也，此易之陰陽可得而知也。至於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之神乎！非易書之神也，易道之神也；非易道之神也，天地之神也」（同書，同頁）。但是，這裏的所謂「神」，不外乎所謂「陰陽之妙」的「妙」的意思，可由上下文推知的。

由於這樣的根本觀點，所以，談論易傳以人事說易，沒有提「舍人事而談天道」的毛病（四庫全書提要）。所以，他反對「以空言性命為元，其究實乎孝之用」，而斥之為「異端」（同書，頁二

）。又斥「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擾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見同書自序）。這種見解，在那「先天後天」，「太極無極」正說得天花亂墜的易學空氣中，是難能而可貴的。可惜一般中國哲學史的多把它壓殺了！

附註

楊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鎮閣學士，致仕。寧宗朝，體任實用事，舉南園，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及家居，嘗言事體我，萬里憂憤成疾。會族于官，嘗言用兵事，萬里痛哭失聲，呼紙書其罪狀，又書十四言別妻子，擲筆而逝，年八十三。諡文節。有誠齋易傳，誠齋集，詩話。

說易傳，初名「易外傳」。據其子長孫申送易傳狀云：「自淳熙戊申（按即淳熙十五年四曆一八八八年）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按即嘉泰四年四曆一二〇四年）四月脫稿，開十有七年，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可見其用功甚勤。雖相信繁辭等十篇為孔子所作，不免時有拘迂之見，然其明白踏實，平易近情，實於先天後天等玄談遠矣。四庫提要謂「其書究不可廢滅」，信然。」

（上接第二六五頁「怎樣領導幹部？」）

必須注意，照犯錯誤的幹部作鬥爭，應該是在服和勸導，隨便用打板子和戴大帽子的方法跟幹部作鬥爭，這是最愚而無效的方法。應該明白，強迫力只能使人屈服，而不能令人心服。屈服是迫於威勢，表面跨屈服，而骨子裏却無絲毫認錯的影子，反而增加了互相敵視的成分，種下一錯再錯的因子。心服是教育的感化，是仁愛的關切，不但能使幹部心悅誠服的認錯，而且能使幹部對於改正錯誤。這兩者間的距離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一個有經驗的領導者，必定會知道用幹部的私人問題來教導其他的幹部，是教育幹部的最好的方法，也是防止錯誤重犯一個角落發生的最好方法。用堅決明瞭但知警意的態度向自己的幹部宣佈某個幹部的錯誤，指出從這事件中所得的經驗教訓，不要以為這是某個幹部私人的事而將事件的真相隱瞞起來，應當明白，假如這件事需要隱瞞的，它所要隱瞞的對象並不是自己的幹部，而是幹部以外的人，對於自己的幹部，應該以同志的坦白的態度去處理一切，隱瞞，對於教導自己的幹部這一點的莫大的障礙。

總之，幹部的私人事件與處理的當與不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粗心大意在情緒性所能解決的，這需要領導者的長期經驗和慎重態度。一個良好的領導者，在各方面，他應從工作、學習、生活各方面去領導幹部，在消極方面，他也必須替幹部解決不合理的私人事件和錯誤。

列寧論托爾斯泰 (其四)

戈實權譯

此地所譯的這篇「L. N. 托爾斯泰及其時代」，是列寧在一九一一年二月所寫的，署名是「V. 伊林」，發表在當年二月四日(舊曆爲一月二十二日)第六期的「星報」上。此地的譯文，則是根據「列寧全集」第十五卷一〇〇至一〇三頁譯出的。

L. N. 托爾斯泰及其時代

L. 托爾斯泰所屬的時代，和在他天才的藝術作品中以及在他的學識中以驚人的浮羅筆法所反映出來的時代，是一八六一年以後一直到一九〇五年之前的時代(註一)。誠然，托爾斯泰的文學活動的開始和結束，比這個時期是開始得早些和結束得遲些，但作爲藝術家和思想家的托爾斯泰之期，完全是在這個時期裏形成的。一個時期的過渡性質，就產生了托爾斯泰的作品和「托爾斯泰主義」中的「托爾斯泰」的特點。

L. 托爾斯泰在「安奴·卡列尼娜」裏面，借用了「列文」的嘴(註二)非常之明顯地表現出這半個世紀以來的俄國歷史的轉變是在什麼地方。

「關於收成，雇用人等等的談話，列文是知道的，向來都認爲是種很卑賤的事情，……但現在對於列文，這却是些重要的事情了。」
 「在農奴制度之下，這也許是不重要的，或在英國這也是不重要的。在這兩種情形之下，條件本身都是鐵定了的，現在我們這裏，當一切都翻轉了一個身和剛剛在安排下來，那麼這些條件怎樣形成起來的問題，就是俄國唯一重要的問題了。」——列文這樣想道。(見「托爾斯泰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五頁)。

「現在我們這裏，當一切都翻轉了一個身和剛剛在安排下來」，——除此之外，關於一八六一年至一九〇五年這個時期，我們是得繼續用更確切的說明了。那些已經「翻轉了一個身」的東西，是大家都很知道的，或者至少

也是每一個俄國人所十分熟悉的。這就是農奴制度以及和它相連合的「舊秩序」。至於那些「剛剛在安排下來」的東西，是極廣大的民衆所完全不熟悉的、無關係的、和不了解的。在托爾斯泰看來，這個「剛剛在安排下來」的「資產階級的制度，描寫得極其詳細，好像一個嚇人的怪物——英國——的樣子。這還是個嚇人的怪物，因爲任何一種想弄清楚這個「英國」的社會制度的基本特點，以及這個制度和資本的統治、貨幣的作用、以及交易的出現與發展之間的關係的企圖，可以說托爾斯泰是在原則上否定了的，他正像民粹派一樣，不願意看見什麼東西，他閉上了眼睛，逃避開那種在俄國所「剛剛安排下來」不是別的正資產階級制度的思想。

公正地說：對於一八六一年至一九〇五年這個時期的俄國(同樣地也對於我們這時代)(註三)，從整個社會政治活動時最迫切的任務的觀點來看，假如說這不是「唯一」重要的問題，也的確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一個在「英、德、美、法、俄國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的表現出來的制度——資產階級的制度」，是「怎樣形成起來的」。但是對於托爾斯泰，這樣確定地、和具體地及歷史地提出來的問題，是完全毫無關係的。他是抽象地判斷着，他是承認道德的「永恆的」原則和宗教之永恆的真理的，而沒有意識到這種原則只是舊的(「翻轉了一個身的」)制度，農奴制度和東方各民族的生活制度的意識形態上的反映。

在「琉桑」(註四)裏面(一八五七年作)，托爾斯泰說：承認「文明」是種幸福，這是種「就像出來的知識」，它會「消滅了人類天性中，對於『善』的出於本能的和最高尚的原始的慾求」。托爾斯泰將嘆道：「我們有二個，只有一個無罪過而無罪者，這就是貫穿我們過身的『全世界精神』(見「托爾斯泰全集」第三卷第一二五頁)。

在「當代的奴隸制度」裏面(一九〇〇年作)，托爾斯泰更熱心地重覆着這些對於全世界精神的呼號，而說政治經濟學是種「假的科學」，因爲它本「在特殊例外狀況之下的小小的英國」，作爲「根本」，「——而沒有把

「整個有史時期以來的全世界人民的狀況」，作為學本來研究。這個「全世界」是怎樣的情況呢？他那種「進步與教育的定義」的論文（一八六二年）就告訴了我們。托爾斯泰引證了「所謂文明的東方」（見「托爾斯泰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二頁），來打擊那種「好像進步是人類的神律的歷史家們的」觀點。托爾斯泰說：「人類進步的規律是沒有的，那些不變動動東方民族已證明給我們看了」。

托爾斯泰主義在其實質的歷史內容方面看來，就是這種東方制度、亞洲制度的意識形態。因此就產生了禁慾主義，及產生了對於惡的不抵抗，就產生了深沈的悲觀主義的論調，就產生了「一切都是空，一切物質都是空」的信念，是「虛無主義之意義」（第五二頁），和對於「精神」，對於「一切的本源」的信仰等等。——至於人和這種本源的關係，只不過是「被指定來拯救自己心頭的罪惡的」一個「工作者」而已。托爾斯泰在「東萊萊爾奏鳴曲」中也是急於這種意識形態的，他說：「湯文的解放並不在學堂裏面，也不在議會裏面，而是在臥室裏面」（註五），還有在一八六二年的一篇文章裏（註六）他說大學所教出來的，只是一批「易怒的狗和自由主義者」，這些人「是民衆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他們無窮的議論了此的『環境』，『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等等……」（見「托爾斯泰全集」第四卷第一三卷——一三七頁）。

樂觀主義、無抵抗主義、是「禁慾」的呼號，是這個時代所不可避免地要出現的意識形態，這時候，整個舊制度已經「纏繞了一個身」，而在這種舊制度之下所教育出來的羣衆，他們從吃母親的奶的時候就吸收了這種制度的根源、習慣、傳統和信仰；他們沒有看見並且也不肯看見「安排下來」的新制度是什麼樣子的。是什麼樣的社會力量把這種「安排」這種制度，有公認社會力量能夠免除掉「崩潰」的時代所特有的無數特別利害的災禍。

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〇年的時期，正是俄國這種崩潰的時期，這時候，舊的東西可以回復在大眾的眼前崩潰下去，而新的東西則剛才安排起來，這就創造這個崩潰的社會力量，又有在一九〇五年時，才在實業上的羣衆公開活動中初次表現出來。而跟着俄國一九〇五年的改革之後，在那許多所謂「東方」的國家中發生了類似的事變，——托爾斯泰在一八六二年是引證過這種東方的「不變動性」的。一九〇五年是「東方的」不變動性的終結的開始。正因為這個原因，這一年是托爾斯泰主義的歷史的終結，是那個可能

並且必然產生托爾斯泰的學說的整個時代的終結，——托爾斯泰的學說不是某個人的，也不是種無定見或新奇的東西，而是實質的幾千萬萬幾千萬萬的人在一定的時期之間所存在過的生活條件的意識形態。

托爾斯泰的學說，無疑地是烏托邦的，但按它的內容說來，從這層用語的最確切而最深刻的意義上說來，則它反對的。但並不因此就說這層學說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因此就說這層學說之中沒有批評的，足以作為教育先進階級的實質的成份。

有這道一種社會主義，也有另外一種社會主義。（註七）。在所有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國家裏面，都有一種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表現出將取資產階級而代之以的階級階級的意識形態；此外還有一種社會主義，是適合於資產階級所取而代之以的階級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舉如，封建的社會主義就是後一種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的性質，還遠在六十年以前，就被馬克思在估計其他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的時候所估計過（註八）。

更進而說，托爾斯泰的烏托邦學說中所固有的批評的成份，也正值這些成份對於其許多烏托邦學說的體系是固有的一樣。但我們不應忘記了馬克思的深刻的指示：就是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評成份的實質，——和歷史發展的關係是背道而馳的」（註九）。那些「安排下」新俄國以及為除掉現代各種社會災害的社會力量，其活動是為發展，是趨向具有確定的性質，那麼，批判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就更加迅速地「失掉一切實際的意義和一切理論上的理由」。

在四分之三世紀以前，托爾斯泰學說的批評成份，不管托爾斯泰主義中的反對的烏托邦的時期，還是在實際上有時給其階級一些利益。譬如拿最近的這十年來說吧，這就不行了，因為從八十年代一直到一個世紀的終了，在這個時期中間歷史的變遷是向前跨了不小的一步。而在我們今天，在上面所指出許多重要變遷結束了那「東方的」不變動性之後，在這種時候，當那些自覺的階級思想——具有狹隘的階級意識，自私自利的階級意識的「道標派」的思想，在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之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時，——當這些思想逐漸傳染了一部分所謂馬克思主義而造成了「取消派」的時候（註十）——在我們這時候，凡是任何想托爾斯泰的學說理解為「想將他的『無抵抗主義』，他向『精神』的呼號，他向『道德』的呼號，他的『自我完成』的號召，他的『良心論』和普遍的『愛』的教義，他的禁慾主義

新和無爲主義的說教等作開端，或是將其軟化的企圖，都會帶來最直接或最深刻的害處。

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舊曆二月二十二日）
第六期「星報」上——

附註

(註一) 即農奴解放至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大革命之間的時代。
(註二) 「安第斯。卡列尼耶」是托爾斯泰在一八七四年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原文是其中的男主人公之一。中譯本有周寬所譯的「警上冊」。

(註三) 即秋白所譯文中，遺漏了「符」中的一句話。

(註四) 這是托爾斯泰所寫的一篇小說的名字。琉森 (Lucern) 或 Luzern 係一地名，在瑞士中部之琉森湖旁。蘇凡的譯文，將這個地名誤譯爲「種花名」，「紫花首飾」，大概是譯者將俄文的 *Flower* 與此字相混了。

(註五) 「瓦萊克奏鳴曲」(Kreutzer Sonata) 是悲多汶所作的曲名，托爾斯泰即取此曲名爲書名，中文有孟長之的譯本，書名爲「波尼雪夫的戀愛」。列寧此地所引錄的文句，僅見於當時非流傳行的手抄本及油印本中，上面注明的日期是一八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至其他版本者此句已遺漏矣。

(註六) 此處的句子，係引自托爾斯泰論「培養與教育」的許多文字。見一八八七年「托爾斯泰伯爵文集」第五版第四部分的「教育論文集」第一三〇及一六三頁。

(註七) 蘇凡的譯文是：「社會主義總是社會主義」。

(註八)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的「論封建的社會主義」的一部分。

「英法貴族由於他們的歷史地位，是本黨寫出反對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小冊子來的。在一八三〇年法國的七月革命裏，在英國的國會改良運動裏，他們又一次被可恨的新興者打敗了。此後已經談不上嚴重的政

治鬥爭了。對於他們所餘下來的只有文字的鬥爭了。然而就是在文獻的領域上，復辟時期（指法國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三〇年的復辟——恩格斯原註）的陳腐詭詞也已成爲不可能的了。爲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被壓作勢，似乎他們忘記了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爲着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來寫作他們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書。使他們感覺到痛快的報復就是：對於他們的新的統治者唱着讚揚的歌詞，並且，以或多或少可怕的語言，向新的統治者耳語着。

「這樣就形成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其中半是哀歌，半是諷刺，半是過去的反響，半是未來的憧憬；時時以酸軟的巧妙而痛心的笑語打中資產階級的心靈；可是經常因爲完全無能力了解近代歷史的進程而使人感到可笑。」

「正像僧侶總是與封建主攜手同行一樣，僧侶的社會主義也與封建的社會主義同行的。」

「給與基督教的禁慾主義以社會主義的外觀，這是很容易也並沒有的事。難道基督教不是也熱烈地反對私有財產、婚姻與國家麼？……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只是僧侶用來混淆貴族的憤恨的洪水罷了。」

除去對封建的社會主義之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書中還批評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德國的或「真實的」社會主義，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等等。

又列寧所寫的這一段文字中有一句話，蘇凡及克巳的譯文俱有錯誤。列寧的原文是這樣的：「此外還有一種社會主義，是適合於資產階級所取而代之的那些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蘇凡的譯文是：「有一種社會主義，它是相當於將取資產階級而代之的階級意識的」，克巳的譯文是：「並有取布爾喬亞而代之的那些階級之意識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註九) 引自「共產黨宣言」。

(註十) 見「資本」第八卷第四期第一〇八頁註二及註三。又「蘇維埃」這個名字，在蘇凡及克巳的譯文中，俱是音譯的，蘇凡譯爲「費希之流」，克巳則譯爲「威希派人」。

美國求實精神和俄國革命廣度

矢健

讀戴維斯「出使莫斯科記」

美國前駐蘇大使戴維斯先生的「出使莫斯科記」，可以說是戰爭中的世界最動人的一本著作。蘇聯前外長現駐美大使李維諾夫和前駐美大使托洛雅諾夫斯基，及我前駐蘇大使邵力子先生，對此都有很精利的評介。但是我為這本書所深深的感動着，仍然覺得有說出我的意見的必要。

戴氏在序言中說：「在我們國內，關於蘇聯有着許多粗魯的看法，若干偏見，而更多的是誤解。沒有黨派立場或論證性質，我希望包含在本書內的材料將供給了解蘇聯政府，它的領袖和它的人民的一個事實基礎和一個可能較正確的概念。」「沒有黨派立場或論證性質」，戴氏在這里只陳述了一個「最大的正確性和真實性」(李維諾夫的序)的週密的事實，從這事實裏得出一個「較正確」的概念，這是至少限度的謙遜的話。這正確的概念是什麼？我們這里且不說，為我所最感動的是戴氏的思想、人格、和他的為學方法，從這里我們看出這世界兩個最偉大的民族——美國和蘇聯的堅厚的不同凡響的友誼，和聯系於這兩個民族身上的將到來的一個和平的世界的光輝前景。

但我在這裏要插入斯大林說過的一段話，在加談論到列寧的工作作風時，曾說過：

「……列寧主義是理論和實踐的學校，這個學校造就特別式樣的黨國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這作風底特徵在那裏呢

？它的特點怎樣呢？

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的革命廣度；第二，就是美國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作風，就是黨和國家工作裏這兩個特點的集合。」(「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八五頁)

這段話，蓋然地說明了辯證法的一個本質問題。辯證法對於一切世界和歷史的文化文明遺產的謙遜的學習態度和他自己堅定的原則的關係就是這樣的。為戴維斯先生所着重指明的蘇聯對美國友誼的重視和信任，也就是從這兒出發。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光」，她有着價值寶貴的民主的新鮮生活力和思想力，憑着這種力量，在未來的世界的創建中，美國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價值。

「出使莫斯科記」以一個美國的求實精神的立場說明了上引斯大林從辯證法立場說明的同樣的道理，這不是很有趣味的奇聞！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闡明這點：首先我們從作為美國求實精神最好的代表的戴維斯身上看看他所考察的蘇聯的事實是什麼？

「用可能的個人觀察，這源於政制的實力，根據軍事和經濟的觀點」，(十六頁)這是羅斯福總統所決定的戴氏出使蘇聯的任務。更具體說來，首先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奧文·楊格先生告訴了戴氏蘇聯在國外的金融信用：「蘇聯政府在紐約和金

美國銀行界和商界有着特別高的款項信用；他們對於金融的責任異常謹慎，支付迅速，甚至未到日期便償清，這事久已就有盛譽。」(十八頁)

國外的金融信用基於國內經濟的健全，戴氏在蘇聯考察了全國各工業區，結果印象也是很良好的：「我的觀察證實并活生生地喚起了你(指羅斯福總統——筆者)和李維諾夫關於他們往那裏去的談話。這些人民過去七年來在重工業上所做的是舉世無匹的。他們會「用蘇基頭髮的剃子畫了一張三十哩長的油畫」。無論在計劃上和實行上都是非凡的。赤裸裸的平原在六年內被變成巨大的工業區。我所看到的工廠和設備都是頭等的，是綜合資本主義國家最好的工程知識的結果。主持這些工廠的人大部分在三十五歲左右。他們的性格是嚴肅的，好學的，看來極有修養而強壯。工人們一般地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婦女，整整百分之八十在三十五歲以下。這些工廠的工作者百分之二十五從既有的工業工場來，其餘百分之七十五是來自鄉間，原來是雇來建築工廠的，但是在夜間被傳授手藝教育，在工廠完成時便變為工廠的工作員。所有這些工廠都有實驗室，技術圖書館，夜學等，它們的廠價會計被編成了圖表，標出了最近一分鐘的作業和趨勢。每一工廠都有它的幼稚園，工人俱樂部，餐館，以及其他工人們的社會設備。平均工資每月二百五十盧布，約值美金十二元五角。」(三九頁)這一段話引得太長，簡述起來，便是整幅的蘇聯工業史畫了。我們覺得最有意義的，還是戴氏在一切方面非常注意人的作用，這是和庸俗的經驗主義完全相反的。無疑的，蘇聯最大的力量是在於蘇聯人民和領袖的優秀高尚的戰鬥品質上，一切經濟政治軍事的發展都是通過這種偉大的人性而推動的。戴氏考察了在蘇聯

上，青年、工程師和工人們的優良氣概，轉到政治上來，生動地描繪了他和斯大林的會晤：

「我離開加里寧主席的辦公室而去到首相府之後——剛剛在桌旁坐下來幾分鐘之後——我看見房間另一端的門開了，斯大林單獨一個人進來，這使我完全驚倒和嚇得幾乎說不出話來。我連想也沒有想到這事情會發生的。首先，他不是國家的元首，而他們以及他們的目的顯然是要使他與國家分開，此外，像你所知道的，沒有一個外交官會正式或以私人的資格見到過他。事實上，他避免任何這種會晤。他是那樣嚴密地從公眾中隱藏起來，他接見任何外國人便差不多成爲歷史的事件。」(八二頁)

斯大林給他的印象是：「帶着微笑和極大的率真，但同時也帶着真正的尊嚴。他給人的印象是精神堅實，那是包含鎮定和聰敏的。他的臉色眼睛異常誠懇而溫和。」「他有發刺的脾氣。他有偉大的心智。那是尖銳，機敏，而在一切其它之上是聰明的，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如果你能指出一些和任何地方反對斯大林最激烈的人所能想像的剛正相反的人心，那你就可能指出這個人。」(八三頁)

說到軍事，作者發表了一系列的數字，我們這裏不再徵引了。所有這一切，還有蘇聯的忠實于和平的國策，使他認識了蘇聯在世界歷史舞台上的重大作用，這就像美國 O'NEIL 版序言所說：「當大家差不多一致認爲紅軍是弱小的時，戴維斯先生告訴總統說紅軍是強的。別的人認爲蘇聯的工業不能支持它的軍隊作戰時，他說能。甚至當林白嘲笑蘇聯空軍實力時，戴維斯大使發現在數量上是雄厚的，在人員上卓越的，而在品質上比最優良的也差多少。」當希特勒和斯大林看來是不可和解的仇敵時，戴維斯先生向華盛頓報告說如果法國和英國繼續忽視莫斯科而縱容柏林，他們會聯合起來。」(七—八頁)

這種遠見真真動人的，但一方面却也非常之自然，就像潮汐的週期激動一樣，因爲它完全以事實爲根據，這是美國現實精神思想的光輝的必然結論。

戴維斯先生做到了上面這一步，在政治遠見上，已經證明出他是如何傑出的人物了。但戴氏還有他另外的一面，這一面使我們從現實精神之外還看見了別的更可寶貴的東西。

戴維斯先生和蘇聯政府官員以及斯大林的談話，都坦白地說明他是一個資本主義者，但他又同情蘇聯所做的事情，這如在本書中所表現的，這種同情是熱情而深刻的。這是一面要點。這種情形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可看到另一個要點：「我去莫斯科所帶的信念，我毫無改變地帶了回來。可是，我曾看到和學到許多我以前沒有知道的，我見對於將來社會的和政治的情形必將有極大影響的力量存在和發展。這重新振作了我的認爲基督教是不可消滅的以及我們政府的形式和我們自己的生活道路是幸福和信心的。」(十四頁)

力量的「存在」，無疑的是指蘇聯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她的強固力量。他還說：「依據我母親在我身上所培養的信仰，我覺得接受有關共產主義思想毫無困難，因爲所有基督教的和基督教訓的信仰者都是理論的共產主義者，由於他們擁護人類友愛。」(十三頁)

「問題是在于基督教能够被引入共產主義的原則中而不損害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目標，因爲這些目標的基本一個是建立在兄弟愛上面。」(一五頁)

從美國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土壤上發出的這種對共產主義社會如此衷心地善意的重視，和崇高的人格的話語，真是值得我們高興的。自然，戴維斯先生始終認爲美國所走的道路要比蘇聯好，這一個，我想是不必爭論的事，每個民族都有權選擇他自己應該走的路，假使那條路對於他更有利。一個人的主義的基本考驗不是財產。而是思想。上和機會上的個人自由。資本主義只是個人主義的一面。」(十三頁)

內政部重發新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東川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爲第一類新聞紙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登記證字第七四二號



要目

加強國際團結

對軸心軍的大攻勢

我們應該怎樣表現中國作風

與中國氣派

正還有待於創造

民族奮鬥想

于筌

M·威爾約作

華崗

任厂

東君

日六十月七年二十三

目錄

時	華府會議與世界戰局	(二七九)
	希特勒的神經戰	(二八〇)
	日寇的臨時議會	(二八一)
	積極援助敵後	(二八一)
論	限價與議價	(二八二)

專論

加強國際團結 對軸心軍的大攻勢

M·威爾遜作(二八七)

略談創造新的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
關於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我們應該怎樣來表現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
我們還要大胆的攝取
正還有待于創造
向大眾學習
中國的民族性
怎樣接受中國的文化遺產
民族化斷想

批評

紅棉屋札記

于 筮(二八四)	勁 秋(二九二)	華 尚(二九三)	余 約(二九四)	任 厂(二九六)	香 汀(二九七)	鍾 耳(二九八)	卓 芬(三〇〇)	東 君(三〇一)	蘇 柏(三〇三)
----------	----------	----------	----------	----------	----------	----------	----------	----------	----------

群 衆

第八卷 第十期

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總經售 發行所 群衆週刊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各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	二 元
六 期	十 一 元
十二期	二十 元
廿四期	三十八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加

華府會議與世界戰局

成爲舉世之懸的華府會議的一句公報(五月二十七日)終於找到了更多的註脚。

五月二十七日華府會議結束，英首相邱吉爾即偕美國陸空軍總司令馬歇爾將軍啓程返國；道出北非召開北非軍事會議，對華府會議的戰略決定作進一步的確定，會議二日(六月三日至四日)，五日英首相返抵倫敦。

英首相離倫敦才不過一月，一月之間，這一個世界改變了，用英首相自己的話來說，那是：「若干日前，余於旅行及事務繁冗中曾謂『吾人前途有光明之展望』，現余欲改爲『吾人前途有更光明及切實之展望』，余認爲在此渴望之時日中，此語更爲適當合宜」。

這一個世界變得更加光明了。

怎樣更光明的？華府會議決定了些什麼？

八日英首相的下院演說，提供了一些解答這一問題的暗示。

首先是在華府會議的十五日談話(自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中，英美兩大領袖充分討論了「英美之政策，戰略及經濟諸問題」，並「對於進一步之辦法已完全一致」。「進一步之辦法」的具體內容，屬於軍事秘密的範圍，自無從臆度；不過從緊跟着華府會議即有北非軍事會議之召開的事實看，英首相演說中所謂「以最激烈之方式，將武力加諸敵人」和「大規模的特別繁複而又冒險之海陸軍事行動」顯然是暗示着：地中海的暴風雨即將來臨。

在全盤戰略上，英美的決定：

◎對蘇聯——「減輕其負擔」

◎對中國——「予以更迅速有效之援助」

◎對澳洲——「予以較大限度之安全」

在這全盤戰略決定的背後，兩大基本事實是不容忽視的：第一、盟軍的空中優勢已無可動搖；第二、軸心的潛艇攻勢已不足畏懼。

關於空中優勢的前一點，英首相說：

「敵人原以空軍爲其勝利之武器，而今則已發覺其爲彼失敗之第一原因。余所必須表明者，即就英國各自治領，美國與蘇聯政府而言，吾人決以空中之轟炸，毀我諸敵國，任何事件，均不能改變吾人之努力與意向」。

關於潛艇攻勢的後一點，英首相說：

「我聯合船艦建造率，超過我方船隻損失約三比一強……吾人所消滅之潛水艇數量，已超過軸心之潛艇生產量頗多，此或爲命運所繫之因素」。

總結此兩大基本形勢之所趨，英首相謂：

「德國似以其一切希望，寄託於潛艇戰爭，彼等希望能在海面，以潛艇復其在空中所受之轟炸，彼等倘認此項希望，能拯救其自身，則結果或必大感失望。世人於大感失望之餘，而其理智又告其大禍無法避過時，往往無法應付此行將來臨之大禍」。根據這一段暗示，英美的戰略好像是在大規模登陸戰門未展開之前，先集中全力于空中轟炸，而待德國「政迷之時機」，再作第二步之打算。

盟軍戰局前途，英首相說：

「余雖始終期望本身爲一有利於吾人之時期，然吾人亦有或理敗；其次，敵人或將拒絕戰鬥，或轉待其最眩迷之時機」。說到這裏，英首相對德國的戰略動向的問題了，好像英美的攻勢計劃還沒有貫澈到：假如德國「拒絕戰鬥」，英美(蘇)「強迫其戰鬥」的地步——這是我們認爲美中不足的地方。

這「美中不足」的來源在戰略上是由於英美作戰任務的規定——「減輕蘇聯之負擔」，不充份積極，而在戰略指明了一件事實，即：爲了爭取戰爭迅速的勝利，英美蘇的團結還有待於進一步的加強。威爾遜先生說得好：

「吾人必獲勝利，唯勝利速度則視團結堅決與自我犧牲精神以爲斷」(十五日威爾遜致紐約白馬人聯合大會函)。

然而，事件的急流往往把人們帶到更遠的地方。突尼西亞軸心部隊出乎意料之外的迅速的崩潰，將英美的作戰計劃向前帶進了一步，誰又能担保地中海的暴風不演出同樣的奇跡呢？

光明從地中海來。

光明從地中海來，一方面是誠吉合作，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成立，在政治上加強了盟軍在地中海戰區作戰的基礎；另一方面是盟軍在北非戰事結束之後展開的攻勢，有如春潮，一浪一浪推地中海的彼岸——意大利；十一日盟軍佔領亞齊利亞，意軍宣告投降；十二日再佔拉姆塔杜薩；十三日又佔墨諾薩和蘭比亞。再向前進，就是西西里和撒

了尼亞，盟軍雄偉的機羣不斷在上空盤旋，意大利半島的潛艦眼看將完全失去，墨索里尼已經被推上了懸崖。

本來突尼西亞戰事一結束，盟國的地中海航線即可通行無阻的；唯一足以嚴重阻礙這一交通路線的是近在臥榻之旁的班島，因此，從嚴格的戰略形勢上說，班島之戰略中說是意大利之戰的前奏，無寧說是突尼西亞之戰的尾聲，雖然這兩重意義它都具有。

班島投降，地中海航線通行無阻（在一定的限制之下）從這一個意義上說，英國戰時情報局長戴維斯的評論是正確的，他說：「班泰雷利亞島之投降，即德里及重慶方面亦感此舉在軍路上之重要性」（十一月廿一日戴維斯廣播）。

然而班島的投降，其軍路上的意義，遠不及其在政治上的意義；由于班島的投降，意大利的危機益重，德意間的矛盾益深，從而意大利人民反德反戰的情緒也就更加增漲了。因此，美總統于班島投

降之同日（十一月）即向意大利人民發出呼籲：「彼等法西斯之領袖一旦被推翻以後，即可自由選擇其政府……盟軍對意作戰，乃墨索里尼從殘酷而途徑所產生之合理而必然之結果……意大利人民僅有待逐出德人，廢棄法西斯主義後，其正確之判斷，始告顯然」。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樣強力的號召之下，意大利內部會發生怎樣的反響。

然而班島投降，其軍政二路的意義，還不及它的象徵意義，因為那指示着：意大利已經不復是一個怎樣了不起的軍事力量，盟軍是能够而且應該進一步的作進攻意大利本土的打算了。

前而就是西里和撒丁尼亞，從軍事技術上說，這兩個島的克復是不難像班島那樣容易的；不過，前而的二十幾萬的軍隊既然可以投降，為什麼這一個奇跡不能在意大利的門口再演一次了？聽說直布羅陀的船艦如雲，我們屏息等待接踵而至的捷音。

（于懷）（六月十九日）

希特勒的「神經戰」

目前國際間的「神經戰」，可說已經發展到了極點。軸心國方面，主要的是兩個「法寶」，一個是宣傳「歐洲堡壘」防務的鞏固，這裏面包括「大西洋長城」和南歐防線。同時，還宣傳集結陣地鞏固和集結攻勢的必要。另一個是「和平攻勢」，不是說羅馬尼亞向英提出和平，就是說蘇德正在經過中立國家談判和平。在這些所謂和平談判或方案中，都包含了對蘇聯領土要求。軸心國在這兩項「法寶」中，前者是「嚇人」戰術，目的是告訴英美

，歐陸是難得進攻的，如果來攻，也不惜全力對抗。希特勒企圖藉此引起英美的躊躇和等待。後者是挑撥離間。希特勒企圖挑撥英蘇關係和同盟國的團結。反「布爾塞維克化」的藉口，既經解除，於是乎就着重對蘇聯的「領土要求」，進行挑撥。這一個「神經戰」的兩個「法寶」，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爭取時間。總之，今天希特勒的「神經戰」的中心，是分裂團結，爭取時間，避免兩面作戰，企圖各個擊破，至少也想到敗而不潰的地步。

同盟國方面呢？當蘇聯空軍發揮轟炸威力，英

美在地中海上着着勝利的時候，同盟國最重要的一着，是要使軸心國內部混亂，對歐洲第二戰場的時間地點，揣測不清，使軸心國不能不在北起北歐南迄東南亞的漫長防線上處處防備，東西調動，手忙腳亂。而盟軍正可在這個當中選擇最適當的時間與地點，予軸心以打擊。

雙方「神經戰」雖愈演愈烈，其中却有一個基本差別。就是軸心國是在大敗之餘，製造和等待時機，以便最好的使用仍然強大的力量，尋我出路，挽救頹勢。而同盟國則相反。是在大捷之後，力量生長之中，善用主動，爭取儘快的擊潰軸心國。而且，軸心國對外對內政策中有矛盾。對外，他要從宣傳戰爭沒前途中找出路，對內，却要從宣傳戰爭有前途中實行其「總動員」。這個矛盾，將發展成軸心國致命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同盟國則相反。他的對內對外政策，是一致的，就是要團結一切力量，消滅軸心國。同盟國關於歐洲第二戰場的宣傳，只有更使國際國內的團結，加強和緊密。

「神經戰」的展開，說明了現在的確是暴風雨的前夜。不過，這次暴風雨的發動，應該來自同盟國。現在不應再回軸心國的下一步驟是什麼？而應問同盟國什麼時候採取下一步驟，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因為前一種問法，就有等待、遲疑和應戰的含意。「神經戰」的時期，正是局勢複雜多變的時期，在希特勒以爭取時間為主的現在，趕快停止讓步，發揮主動，該是同盟國最重要的事。

「神經戰」的時期，是最好的鍛鍊自己的時候。一方面要我們堅定信心，決不動搖。另一方面對許多動態，要注重新事實，不可輕信。輕易相信，就容易受騙上當。根據語言作判斷，就更容易錯誤。再

若依照主觀的願望去分析事端，也是錯誤的根據。現在對歐洲戰場要集中注意的，是時間的因素。時間對誰有利，誰就能勝利。同盟國現在要解除軸心國拖時間的武器——「神經戰」，並提早實行消滅

日寇臨時議會

日寇八十二屆臨時議會，為期三日，匆匆於十九日晨舉行了閉幕式。這次臨時議會中通過的議案，為預算案三件及立法案八件，包括企業整備及增加糧食等在內。會期中間，照例是官式演說，拍手，賀詢，秘密報告，乃至通過議案。除了在眾院會發生過懲罰代議士赤尾做的事件之外，並無別的糾紛，就是赤尾做的事件，也在秘密會中解決，由議長岡田出而宣佈依議會法加以譴責，卒未形成軒然巨波。日本反動統治者如願地導演了這一場戲。

日寇這次召開議會，最重要的意義是在什麼地方呢？這正像美國評論家羅斯福所說：「這次議會本身沒有什麼重要性，最有重要意義的是那套經濟動員計劃」。而其中最中心的問題，首先就是關於企業整備。據日寇宣佈，日本的工業將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紡織工業及其它屬於第一類的工業，將依照法令受整備，餘下不用的房屋及設備由第二類工業加以利用（第二類工業為日寇所謂超重點生產的工業部門），第三類工業，主要為中小工業，將依照現狀，予以適當之處置，因其企業整備的結果，所餘設備資金總值將達三十八億日元之多。此外並規定停止對實業家的補助金，而將此項政府津貼，轉用於救濟因企業整備而失業之工人。

從日寇官方發表的這一消息看來，就是一種竭

希特勒的戰略——歐洲交鋒，兩面夾擊！為了打破目前僵滯的局勢，就得以登陸粉粹希特勒的神經戰！

（新華）（六月二十日）

力或減輕工業生產，並徵用其資產設備，另外又徹底清理中小企業，集中全力於軍需生產的具體表現。我們從他的規模上，也可看到是一個很大的變動；這種瘋狂地將整個日本變為「兵工廠」的策劃，其趨勢是很值得注意的。

再從企業整備後的經營形態來看，固然我們尚不清楚它具體的辦法。可是我們知道，日寇國內統治層中對增強生產的主張，一向有三類，一類是主張國營的，其中有的主張由國家管理民營工廠，有的則主張採取國家租借的辦法，第二類，則是主張繼續採取民營方式，第三類則是折衷上述兩個辦法，主張在國家監督與統制下仍由民間經營。今年春八十一屆議會所決定的是第三種辦法。這一次企業整備，是帶着清算折衷辦法而來的，日寇宣佈：「這一次企業整備，國家將由『腳色家』的立場，進而成為相當全部責任的『演出者』」，由此不難想像，在日本國民經濟進行一個大變革之下，政府勢將控制全部生產大權，企業經營形態，必然有極大變化。

積極援助敵後！

在敵寇「掃蕩」頻繁，音訊隔絕的情況下，我們對堅持華北敵後抗戰的健兒們，實寄予無限的懷念！而最近的捷報傳來：「華北敵後各地「春季政

其次，臨時議會閉幕後，東京廣播說：「此次議會業已完成澄清日本關於建設『大東亞』之政策，及通過增強日本戰鬥力，以確保勝利等重要使命」。照日寇宣佈的議會這兩項使命來觀測，前面所說的企業整備，便是增強戰鬥力的基本內容，至於所謂「澄清日本關於建設『大東亞』之政策」，則在東條和重光奏的演說中也具體地說出了它的內容。這首先對南京的傀儡政府，表示將修改所謂「中日基本條約」，加以積極援助，對菲律賓與緬甸，宣佈今年內使獲得「獨立」，對泰國宣佈加強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關係，對爪哇及其他南洋人民，宣佈「將依彼等之能力，獲得參加政府之特權」，對印度則加緊煽惑，印奸德新近抵日，成為日寇「上賓」，所有這些表示，無非在加緊欺騙東方各屬小民族，供其驅策。

對國內加緊軍需生產，對佔領區各民族積極放出發柔與欺騙，這就是日寇為了完成其準備決戰與鞏固「東亞堡壘」戰略目標的三大支柱。

在與懲罰赤尾事件同時，日寇議會又通過了所謂「英美擊碎一億戰鬥」的議案，赤井柳太郎在說明提案時，狂言日本要繼由志道志，殺到自宮，逼美訂城下之盟。這是日寇的冒險一逞的心理。對日寇的冒險心理，我們仍須警惕。日本內部對戰爭懷着悲觀和不滿的份子，是潛存着和滋長着，我們與英美盟邦應從軍事上乃至政治上來擊破日寇的陰謀！

（新華）（六月十三日）

勢」，俱已慘敗，僅僞軍及正者即在三萬以上。又此次太行戰鬥中，我××集團軍不僅與當地民兵緊密合作，擊潰了對太行北區「掃蕩」的敵偽三萬

之乘；同時並配合友軍作戰，在敵軍以主力北向威脅我領地的情況下，還是以一部分軍力馳援豫北友軍，並有規復林縣的戰果。這一連串的捷訊，不僅更堅定了我們堅持華北抗戰的信心，也興奮和鼓舞了大後方憧憬捷音的民衆。

可是，這些勝利的戰果，其獲得之艱辛，誠如友公報所說的：「中國許多戰地與後方隔斷，在那種地區作戰的部隊，他們不能按時得到後方的接濟，……而我們軍隊所需的彈藥，却要向敵軍去索取，……這是何等艱辛的打法？」我們真不能想像：在敵偽的「第十六次治安強化運動」的熬煎下，今日華北敵後的健兒們，面臨着怎樣艱苦的一種戰鬥？還在去年，他們就提出了「備戰工作經常化」的口號；正因為敵寇一刻也沒有放鬆華北敵後，它們要將這一帶變成其所謂「兵站基地」，反覆運用三光政策，在劫掠性的「掃蕩」以後，又採取逐步分割的蠶食進攻，秋冬間的「搶糧掃蕩」才過去，接着便是以破壞春耕為目的的「春季攻勢」，在這種情況下，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戰爭，而我們便只有提高警覺，經常備戰，來迎擊敵人的每一可能進犯，這是何等緊張的一種戰鬥生活！而今捷音傳來，華北敵後我軍已粉碎了敵寇的「春季攻勢」，我們不禁替敵後的同胞慶幸！

從華北敵後我軍的迭捷頑敵之中，又一度說明

限價與議價

日前渝市當局，正式宣佈「調整限價限價物品種類辦法」。在這種辦法之下，限價物品祇限於八種民生重要必需品；與行政院所指示的房租地租；

了：中國共產黨人是無忝於中華民族解放的大任的，我們堅持了艱辛的敵後抗戰五年多，今後一定還要繼續堅持，而且也一定能够堅持下去！就因為我們有着與人民血肉相連的軍隊，所以我們在此次太行北區的勝利戰鬥中，能有着協同作戰的民兵，以地雷炸破敵軍，使得敵軍寸步難移，卒致折兵毀羽而逃；也正因為我們的堅持敵後戰鬥，是和敵後的同胞們呼吸相通的，在軍民合作的情況下，自然能够打勝仗。

這次鄂西告捷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獲得了民衆的協助，因此，我們要再次陳述：唯有與人民結合的武力，才是不可戰勝的武力，才能完成驅逐出境、解放民族的重任！

當敵寇召開臨時議會，強調建立「大東亞堡壘」之時，在盟國增強援華呼聲正高的今日，我們不能忘記艱苦奮戰中的華北及其他地方的敵後戰士！當我們擊退敵寇的設施，救助淪陷地帶的難民，或是救護難民，援救災區的同胞時，我們也不要忘了在頻年鋒鏑之下，與敵寇作殊死戰鬥的華北同胞！他們將是粉碎「大東亞堡壘」的強大力量，給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他們就能更好的打仗。轉眼就是神聖的抗戰第六周年，我們高呼「一切爲了前線」，同時也要提出「積極援助敵後」！

(新華) (六月十六日)

新收穫

據沈秘書長的說明：限價「係以政治力量為主，經濟力量為輔，非至生產發生困難時，寧由國庫賠累，決不輕易變更」。事實上，限價的確以政治力量為主，不過經濟條件仍是不容忽視的。這就是說，要使限價能獲得良好的效果，必須物資能源源供應。物資源源供應的條件，乃是國家資本的生產力極為堅強，民營的生產事業，亦極為宏大而集中。在目前，中國是缺乏這些條件的；要以財政的力量來支持，則因戰時「國庫的賠累」，又不能無限度的做下去。這些前提，不是說明限價之進行，並非容易的事嗎？何況各地辦法又不一致，訂定價額又多缺乏斟酌呢？(被略)中央政府乃先後頒佈「限價議價物品補充辦法」及「各省市重要物品價格調整辦法」。

限價是以經濟力量為主，政治力量為輔的辦法。依照這種辦法，在訂定價格時，比較有彈性；比較能照顧到物品的生產成本與合法利潤。這比較適合今日的實際情形。因為中國今日的王商業，乃以營利為目的。在這裏，利潤顯然是一個主要的刺激力，一些深明大義的王商界人士，可以爲抗戰而努力，可以爲抗戰而從事於增加生產與便利運輸，但是，利潤如果低落，收入如果不能抵補原銷，成本如果不能保持得住，那末，誰又能「粉服」經營，繼續在做虧本生意呢？經濟現象自有它的規律性，指理經濟問題是應當了解這種規律性，掌握這種規律性的。因此，以經濟力量為主的議價，不能不說是較為適合實際的辦法。

實行議價，將以同業公會為核心。各地工商界的使命，將因此而更加重大了。在這個時候，我們希望各地工商界，不要因爲可以議價，便在保障成

工資漲價週以一月十五日實施限價重要種類為限。其他極大部份的商品，則列為議價。這是指理物價問題的一個新時期；這是融化了經驗教訓而得到的

本國利潤的名義之下，無限的把物價提高起來。某些民族敗類一向利用種種便利的條件，從事囤積居奇；又利用囤積居奇所形成的既成事實迫使物價上漲，這種事實，過去已經教訓了我們，在繼續實行以後，他們何嘗不可翻新其花樣呢？因此我們希望各地的工商界在購價時要注意這些問題，在營業時不要陷入黑市的泥坑。

讓價以各地的同業公會為核心，但，政府的責任並未因此而有所減輕。在取締囤積居奇方面，我們希望各地經驗要審慎人選，要做到嚴格而不擾民，迅速而不延擱，在重訂限價的時候，要改正過去那些缺點——如原料與成品價格之協調，各地價格的協調等等，在整理工資與運價的時候，要注意各項物價的變動。最近本市公營交通機關，如公共汽車與馬車，已先後加價了，為着各項物價之上

限與開支之增大，我們對此不能有什麼批評，但工資方面，亦當適應着這種形勢而加以提高。如果在過去所規定的水準之上，則流着血汗直接從事生產的工界同胞，是難以保持其體力與情緒的。事實上，不是工資決定物價反而是物價決定了勞動力的價格——工資。因此，工人限價的工資，是必須依據實際情形而時加以調整的。

限價與讓價都是治標的辦法，物價問題的癥結，乃在增加生產與穩定幣值。這是大家都看得清楚的極其平凡的真理。如果忘記了這個真理，則治標的辦法，雖能在改進中獲得一些效果，但效果仍是不大的，所以在調整限價與讓價的今日，我們希望政府與工商金融各界要以更大的力量來治理這二個平凡的問題。

（新華）（六月二十四日）

本刊啓事：

本刊自七月份起改出半月刊，并已蒙主

管機關核准

敬希

讀者諸君

垂鑒

（上接第二八六頁）

但自五月二十二日共產國際宣佈解散後及斯大林發表答復路透社記者關於解散共產國際問題的信，斯大林更明確的肯定了戰時和戰後國際團結的前途，國際間一片團結的呼聲聲浪，一片要求開闢第二戰場的海浪又起來了。而邱吉爾與羅斯福初度會談結束之後，即五月二十二日還說：『吾人殊無理由可以希望戰爭不致延長』；但到得知共產國際解散消息，羅斯福再度會談之後，即邱吉爾於五月二十五日又表示倘戰爭延長，將以同等力量在東西兩戰場作戰了，而六月八日，邱吉爾與英後，發表演說稱『顯然大規模之特別繁複及冒險之海陸軍行動，即將蒞臨』。

這些傾向，或者不妨說預示着即將展開更進一步的加強英美蘇國結的國際局面，及協同作戰夾擊希特勒，實行全面戰略反攻，避免戰爭長期化的危機，從速取得最後勝利的前途。

但是，進步的人士們爭取這局面的到來和發展，還是極端必要的，就是說加強和發展上述那一個有利團結的因素和力量，仍是極端必要的，因為這才促成實現那一局面到來和發展的主要因素。

台維斯在一篇文章中，在他斥責了那些破壞英美蘇國結的孤立帝國主義分子、和指出國際團結堅持抗德的真理之後，他說道：『我要年輕三十歲，我一定別的事都不做，到處傳道似的去宣講這個真理！』

好個可敬的台維斯先生！你已經以一個美國傳道家的精神向世人宣講了消滅希特勒法西斯的真理了啊！

加強國際團結

于筌

因爲一九四二—四三年冬季在蘇聯戰場上，紅軍把希特勒軍隊打了個大敗，隨後在北非戰場上，英美聯軍又把希特勒軍隊打了個大敗；於是歐洲戰局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希特勒在力量對比上不再是優勢，希特勒在戰略形勢上也不再是優勢；兩個優勢都轉到盟軍方面來了。

因爲這一個優勢形勢的變化，在英美蘇面前便提出了決戰的問題，在英美蘇面前便提出了開始全面戰略反攻的任務。

因爲優勢形勢的變化，因爲提出了開始全面戰略反攻的任務，這就意味着着勝利的戰後世界，勝利的戰後歐洲就要到面前了。

因爲勝利的戰後世界，勝利的戰後歐洲就要到面前，於是戰後問題就更富實際意義而重被提出來了。

英美蘇對於戰後問題，一般說來是應該獲得一致瞭解的，應該不發生澄清問題的。爲什麼？因爲：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羅邱大西洋宣言已經把戰後問題的基本原則予以規定了，規定了民族自決，民主自由，經濟合作，與國際協同作爲處理戰後問題的基本原則；而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聯合國共同宣言又把這些原則給以肯定，所有同盟國均予公認了；至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英美蘇成立同盟條約，及同年六月十一日英美蘇成立互助協定，英美蘇三國又再度的把大西洋宣言所規定的原則加以肯定，設贊同「大西洋憲章中所包含的宗旨與原則之共同綱領」，蘇聯更特別聲明這些原則「本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所堅守者」；不止此，英美蘇更來得具體，也可以說發展了這些原則，如說雙方「遵照決不爲自身追求領土之擴張及決不干涉他國內政之兩項原則而行動。」

這些事實就足以說明英美蘇在戰後問題上根據這些已爲大家所公認的基本原則，一般的是可以達到和應該達到一致瞭解和澄清的；也就是說不應該離開已定的上述原則再重提所謂戰後問題——不合理的戰後問題的。可是「戰後問題」還是被提出來了，而且影響到團結，影響到作戰，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台維斯說：「近來我意外的遇見一些人，他們對於蘇聯打勝德國的事大驚小怪。他們說紅軍快要衝到柏林了，這之後我們就要看到共產主義的歐洲了。」（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美國「時代」雜誌）

威爾基說：「我看到我的幾個美國朋友常爲一種幻想所縈繞，他們覺得這一個相當爲人所不知道，而實力雄厚的國家（蘇聯——引用者），會把它的共產主義思想散播到世界上的廣大區域。有的甚至相信，我們現在的作戰不過是摧毀希特勒而另外創造一個被蘇聯威脅的新世界。」（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紐約時代週刊載「論美蘇合作」。譯文見本年三月十三日重慶中央日報）

本年五月二十八日重慶中央日報所譯載英國名作家哈里斯著「戰後的英國」一文（原載本年四月新共和國週刊），對於英國的外交政策有如下的敘述：「真够奇怪，撒爾斯巴利的小冊子（撒爾斯巴利侯爵是英國保守主義的元老，現爲上院保守黨議員領袖，他刊行了一本小冊子，是討論戰後英國保守黨的政策。），對於外交政策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在這一方面我們那一批忠實的保守黨議員顯然陷入迷團之中了。他們知道，他們依然眷戀着的政策（指張伯倫時期的緩進政策——引用者），英國大部份輿論再也不能忍受一時刻了；他們知道，這種政策如果沒有美國與自治領的協助，無論如何，也不能付諸實行，而美國和自治領也不會協助他們。……文西泰爵士在許多方面可以認爲是英國外務部幕後人物，他曾經表示過一點保守黨對這些事物（外交政策——引用者）的思想，但對於保守黨想洩漏更多的勿事說最十九世紀評論報——一個很恰當的名稱——主張法格特先生……他爲將來所擬定的方案，乃是成立均勢，而以成立波蘭領導的東歐聯邦爲基礎，並且關心的要在西歐成立一個包括半法西斯的意大利、維琪法國、佛朗哥的西班牙的集團，以便一方面壓倒德國，而在另一方面可以拒蘇聯的勢力於歐陸之外；至於他反對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我們就着不着說了；同時，他以為這一次戰爭乃是爲了保衛帝國，而且我們也必須以一切代價，收復陷落敵手的帝國」

各區域——尤其是香港。」

上述台、威兩氏所指出的那部份美國人的思想是否可能反映到其國家的外交政策裏去呢？如果是的，那麼它將發生什麼影響呢？

這些不利因素會使戰後問題又被提出來，並且妨害到團結和作戰；然則是不是這些不利因素將成爲主導，而使英蘇的關係按着它所支配的道路而發展下去呢？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爲什麼？

因爲國際生活當中還有一種有利因素，還有一種有利力量，在和這種不利因素相抗爭，在和這種反對力量相抗爭，結果必然後者佔先，而把前者壓下去。

這種有利因素是什麼？有利力量是什麼？

我們還是引用台維斯諸人的話來說明吧。

台維斯在「出使莫斯科記」裏說：「對蘇俄共產主義發生恐懼的人們，實在是對於美國國家及政體估計過低。我信任美國政體超越世界任何制度；同時我更相信容忍任何其他任何制度公開組織，更可確信美國政體之優越超羣性。這種機會對共產黨及其他各黨皆取開放態度。……無論對於任何主義，平等機會而無偏重趨勢，民主主義定然得勝一切。」

他們還認定蘇聯也決不會把共產主義革命輸入給美國和去侵犯美國的。台維斯說：「與英國在一九三三年承認蘇聯同時擬定之羅素協定，蘇聯政府應許決不侵犯美國內政，同時亦保證美國僑民在蘇聯之宗教自由權。此二項協約均已遵守。那麼蘇聯能否由利害關係，而對美國內政持有不侵犯態度？答曰然。斯大林爲一現實主義之信徒，彼亦知美國人民對於共產主義的態度，亦知蘇聯需要強大美國之合作，正如美國亦需要強大蘇聯之合作一樣。」

（同上）威爾遜說：「現在蘇聯到底在做些什麼呢？它將成爲世界和平的新擾亂者嗎？……它只是要把它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哲學參入旁的國家內部嗎？我可以很坦白的說：我覺得沒有人能夠知道這些問題的答覆；我甚至懷疑連斯大林先生本人也不能全部知道。」（同上）威氏說沒有人以及斯大林也不能瞭解這問題，這是因爲他知道（他也知道斯大林知道）共產主義革命是各民族內部發展的問題，不是由外部隨便輸入所能引起的；因此他相信斯大林也不會向美國輸出共產主義革命的。第三，他們還從現實需要的觀點上

說明必須和蘇聯合作。台維斯說：「也許有人以爲戰後政策將有其他變動；但吾輩深信今日抗德戰爭中，美蘇二國合作關係愈密切，則將來避兔困難之可能性亦愈大。今日大難當前，在美國之共產主義之威脅簡直不值注意。……對於共產主義在美活動之恐懼即爲打擊軍心而抑敵愾。」又說「假如我們在任何不能獲得全世界和平的條件之下和德國講和，這將是最大的悲劇；……明顯的事實是：國家也好，個人也好，對別人總要言行一致。」威爾遜基於敘述蘇聯的人口之衆多，資源之豐富，社會組織的良好，文化教育的發達和從上至下的熱狂的忠誠建國的精神之後，說「我不知道關於蘇聯問題的問答（指共產革命輸入問題——引用者），但是，有一件事我想知道：就是對於這一種力量，對於這一種人民，我們絕對不能予以忽略。這便是我爲什麼常常講給我的美國朋友，在我們攜手共同擊敗公敵的時候，要和他們發生密切的合作。……還有一件事我也知道，就是在地理上，從一個商業的立脚點上，從對於許多問題的接近上，美蘇兩大民族是應該攜手並進的。」

我想不必再去引述福爾福，威吉爾及艾登等從現實要求的觀點出發也說過的一些國際團結的話，也不必再去引述英國輿論界所常見的一些國際團結的話，更不必再去引述那盡人皆知的大西洋憲章宣言，二十六國聯合宣言，一九四二年五月和六月的英蘇同盟條約及美蘇互助協定這些個國際文件從現實要求觀點出發所規定的關於國際團結的原則了；但是必須指出一個事實，即是：上述台、威兩氏從三個觀點出發所發表的團結思想，以及羅、威、艾等人和國際文件中所表現的團結思想，都是真實的反映了英美人民的願望，和真實的反映了英美當局者的願望；也就是說那些個思想是英美人民和英美當局者所支持着的。（應當說明台、威兩氏的第一三觀點是反映英美當局的思想，第二三觀點是反映英美人民思想的。）

這就是團結英美蘇共同作戰的有利因素之一；英美人民和其當局就是有利的和支持團結英美蘇共同作戰的兩股主要力量。此外，還必須指出蘇聯來，它也是有利的因素之一，有利的主要力量之一。蘇聯在戰爭一開始就確定它的外交政策，就確定了團結各反希特勒的民族國家共同作戰的原則。斯大林在開戰後首次文告（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中說：「我們爲我國的自由解放而進行的戰爭，必將和歐美各國爲獨立爲民主自由而進行的鬥爭，打成一片。它必將成爲擁護自由而反對被希特勒法西斯軍隊奴役或有被奴役的威脅的各國人民的一條統一戰線。」這里（一）指

說明必須和蘇聯合作。台維斯說：「也許有人以爲戰後政策將有其他變動；但吾輩深信今日抗德戰爭中，美蘇二國合作關係愈密切，則將來避兔困難之可能性亦愈大。今日大難當前，在美國之共產主義之威脅簡直不值注意。……對於共產主義在美活動之恐懼即爲打擊軍心而抑敵愾。」又說「假如我們在任何不能獲得全世界和平的條件之下和德國講和，這將是最大的悲劇；……明顯的事實是：國家也好，個人也好，對別人總要言行一致。」威爾遜基於敘述蘇聯的人口之衆多，資源之豐富，社會組織的良好，文化教育的發達和從上至下的熱狂的忠誠建國的精神之後，說「我不知道關於蘇聯問題的問答（指共產革命輸入問題——引用者），但是，有一件事我想知道：就是對於這一種力量，對於這一種人民，我們絕對不能予以忽略。這便是我爲什麼常常講給我的美國朋友，在我們攜手共同擊敗公敵的時候，要和他們發生密切的合作。……還有一件事我也知道，就是在地理上，從一個商業的立脚點上，從對於許多問題的接近上，美蘇兩大民族是應該攜手並進的。」

出了蘇聯和歐美各反希特勒國家的團結作戰的基礎，(二)指出了蘇聯負有團結各反希特勒國家作戰的任務，即抱團團結的對外政策，(三)指出了國際團結共同對希特勒作戰的必然發展。到十月革命節(一九四一年)他在文告中更肯定的說希特勒必敗的基本因素之一，就是「蘇聯、大不列顛和美利堅合眾國，反德國——法西斯帝國主義者的大同盟。」而「英、美、蘇的大同盟，便是正在發展而且必將繼續發展的，對我們共同解放的事業有利的一個真正的重大事件。」蘇聯對於團結英美作戰估計如何高和堅信其必然發展，由此可知。但尙不止此，斯大林還進一步更深一層的指出對於懷疑英美蘇團結的人的錯誤。他在一九四二年十月革命節文告中說：「有人說，英美蘇同盟具有一切勝利的機會，而且，如果沒有足以使它削弱並且解體的一種組織上的缺點的話，一定已經勝利了。據這些人的見解，這種缺點，就是這種同盟是由抱着不同觀念的龐雜的分子組織的，這種情況將使他們不能對共同敵人組織一致的戰鬥行動。我想，這種論斷是錯誤的。要麼否認構成英美蘇美同盟的各國間在觀念上和社會制度方面的差異，那是很可笑的。但是，這就會使這種同盟的構分子方面，對那使他們受到被奴役的威脅的共同敵人，排斥採取一致行動的可能和方便了麼？當然決沒有排斥這種可能和方便呀。而且這種威脅的存在，必然的迫使這種同盟的構分子更有採取一致行動的必要，以便從野蠻的和中世紀的獸性的遺留中把人類拯救出來。」

對於團結英美的觀點和信念，斯大林表白的是如此真實，明晰和堅定，是不需要我們再加什麼贅語了。

但如上述斯大林的話還不能夠完全說明對於戰後團結建設和平的問題，蘇聯所抱着的態度，那麼我們就再引述一點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節的文告上所說的話吧：「我們並不懷抱着，而且也決不能懷抱着，像霸佔外國領土，征服別國人民之類的戰爭目的。不獨是歐洲各國的人民和領土，還是亞洲各國的人民和領土，包括伊朗在內，都和我們的戰爭目的無關。」又說：「我們並不懷抱着，而且也決不能懷抱着，使那些正等待我們援助的斯拉夫各族，以及歐洲其他被奴役的各國人民，跟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制度發生同化作用之類的戰爭目的。我們的目的是要援助這些國家的人民，對希特勒進行解放戰爭，然後更使他們享有在自己的領土上，依照他們認為適合的方式，絕對自由的安排自由生活的可能性。對別國的內政絕無任何的妨害呀。」這里斯大林再清晰明確不過的表明了態度，對於別人常常害怕或者

蘇聯蘇聯佔領區領土，干涉他國內政，赤化世界的事情表明了態度，同時他還聲明了作戰綱領：「種族排斥作為的廢止；民族的平等和他們的領土的完整；被奴役的各民族的解放以及他們統治權的恢復；每一個民族都享有按照它願望的方式安排自己的事情的權利；給予曾受苦難的各民族的經濟援助，以及幫助他們取得他們的物質的福利；民主自由的恢復；希特勒統治權的消滅。」這里斯大林再清晰明確不過的表明了態度，對於戰後建設什麼樣的和平世界，什麼樣的平等的國際關係表明了態度。

我想也不必再去引述莫洛托夫在一九四二年六月最高蘇維埃大會上報告英蘇盟約及美蘇協定時，所表示的關於英美蘇團結作戰及英美蘇團結建設戰後和平，蘇聯懷抱的態度和精神了。但是必須指出一個事實來，即斯大林這里所說的一切，所具有的基本觀點和信念，是不僅真實的反映了蘇聯各族人民的願望(我不去指出這還反映蘇聯統治者的願望，因為在蘇聯是沒有這一個區別的了)，而且它還真實的反映了世界進步人民的願望。同時還必須指出一個事實，即斯大林這里所說和信念是為蘇聯各族人民強大的團結力量，和紅軍的強大的武裝力量所支持的，以及為世界進步人民所支持的。

因此，我們就不僅僅僅說，這也是團結英美蘇共同作戰的因素之一，力量之一，而且應當說是最主要的最有力的沒有矛盾的和最可靠的因素和力量。那麼，把台維斯和威爾遜所反映的觀點和信念，同斯大林所反映的觀點和信念，綜合起來；也就是說把英美當局的力量和英美人民的力量，同蘇聯的力量以及世界進步人民的力量，綜合起來，就是有利英美蘇團結對希特勒共同作戰的因素和力量了。這個因素和力量便是對那個不利的有害於英美蘇團結作戰的，會無事生非的假問題——不合理的戰後問題，以認為手段的妨害當面團結作戰的因素和力量相抗爭的。

很明顯，有利團結的力量是大的，因而能够戰勝不利團結的力量，是沒問題的。兩年來英美蘇團結的發展就是證明，兩年來英美蘇團結的發展證明着那有利團結的因素和力量是佔主導的地位，今後還要證明下去。這是可以斷定的。

從蘇聯的軍隊在斯大林格勒把希特勒的軍隊打圍至共產國際宣佈解散，這約四個月期間，可以說是兩年來國際團結發展中多波折的期間。

(下接第二八三頁)

對軸心軍的大攻勢

M·威爾納作

大攻勢的規律支配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所進行的一切戰鬥都是預定作為決定性的行動，給敵方以一蹶不振的打擊的。德軍在一切攻勢之中，從波蘭戰役起至高加索戰役止，都獲得了領土上和戰略上的主要成就。而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高峯的，則是軸心國的四次大規模的攻勢：西歐之戰，一九四一年德軍對蘇第一次攻勢，日軍的太平洋攻勢以及一九四二年德軍對蘇第二次攻勢。西歐之戰和西南太平洋之戰結果都是軸心國的完全勝利。德國第一次對蘇攻勢獲得了許多領土上的成就，可是它的原定的戰爭計劃是被打破了。在德國第二次對蘇攻勢中，德方的一切事情都在危險中。

在一九四二年夏季，聯合國方面對着發動攻勢的必要性。大攻勢的規律也要求他們這樣做。他們進行守勢戰爭的可能性現在已經完全沒有了。在一九四〇和一九四一年，英國的守勢是權宜之計，因為守勢是惟一可行的道路，也因為皇家空軍正在英倫上空擊退德軍登陸的初步企圖。蘇聯在一九四一年的守勢戰略是故意的，因為這守勢阻止了德軍的閃擊戰，逼得德國進行持久戰。但是從一九四二年夏季起，蘇英美聯盟的繼續着的守勢態度就顯得缺乏遠見，而且有着致命的危險。戰爭的過程迫使聯合國採取質量方面和敵人相等並且能夠制敵人的戰略。法西斯帝國主義聯盟的實力只能用大反攻來擊破。現在已經造成了這樣的形勢，在這個形勢之下，只有偉大的配合好的對德攻勢才能克服目前同盟國戰爭行為的危險。

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末尾，聯合國國家的戰爭在嚴重危機的痛苦之中。其時戰事的主要形式還是東線的守勢和西線的等待。德軍的攻勢迫使紅軍後退並進行守勢戰爭。紅軍被德軍攻勢力量的頂點威脅着，蘇聯的供應和交通線也在危險之中。雖然如此，在西線，英美對德戰事的規模還是微不足道。英美對德戰鬥的有效程度究竟如何，可以用下列問題來衡量：兩軍交戰的真正戰事有多大？戰鬥的激烈性如何？英美軍究竟擊斃了多少德軍？德軍被英美軍擊斃所消耗和消滅的，有多少？在一九四二年夏季，英軍在利比亞擊斃德軍三個師團，而美軍尚未加入對德戰鬥。

盟軍在一九四二年夏季的正當任務不僅在援助紅軍，而是在把戰爭轉變成為真正的聯盟戰爭，這聯盟戰爭包括英美積極地對德作戰，包括英美採取攻勢援助紅軍，包括蘇軍反攻以援助歐洲大陸上的英美部隊，也包括英美蘇共同的攻勢戰略。

英美蘇同盟的最好的防禦是聯合進攻。這並不是因為戰略教科書上這樣說，而是因為孤立地對抗第三帝國的民族戰爭是一定會失敗的。蘇聯的抗戰，英國的戰略和美軍的轉入積極的戰爭之間有着相互的關聯，只有聯合的攻勢戰略才能解決每個同盟國的危機，這危機必須用共同的行動來消除。聯合國必須進行和軸心國大攻勢規模相似的攻勢，這是它們的聯盟戰爭的中心作用所在。

三種情況使聯合國國家轉入攻勢戰略較為容易：

一、美國的參戰給反軸心方面以新的，補充的力量，這也改變了英國的戰略地位。在法國崩潰至蘇聯參戰這一段時期中，英倫三島是個被圍困的堡壘。蘇聯加入戰爭之後，英國得救了，但它以有限的攻勢實力，依然守着歐洲戰爭中的外國陣地。由於美國的參戰，英國變成了英美軍隊大量集中的地點和躍進歐洲大陸的跳板。

二、一九四一年的許多經驗說明了德國軍事能力是有限度的。當一九四一年年底德國結果不得不和蘇聯一國作戰的時候，德國的戰爭指揮方面就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一九四一——四二年的冬季戰役，顯示了紅軍的潛伏着的攻勢作戰的有生力量。

三、自從一九四二年夏秋以來，聯合國國家已經能看見它們自己的日益增加物質上的優勢。在一九四二年夏季，德國失掉了軍需方面超越同盟國的有利之點。但德軍當時能集中一切力量對付蘇聯，進行一線作戰，那是有着戰略上的有利之點的。

對於聯合國國家，大規模的攻勢和聯盟戰略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聯合國比起軸心國來更有賴於這樣的步驟，因為和德國比較起來，聯合國的力量

是沒有中心的。

聯盟戰爭包括各種力量為最大程度的配合，共同的戰爭計劃和戰略計劃。下面所述，是聯盟戰略的原則：

第一，同盟國間的分工。它們必須按照自己的資源和位置來發展作戰力量。蘇聯早已註定是聯盟中的陸上的大力量；英美集團則必須竭力擴充空軍和海軍。但更主要的，是英國陸軍必須是為西歐和南歐陸上戰爭準備着的機動預備隊，而美國要供給這一方面的不時之需，並且為聯合國採取物質優勢。

第二，力量的配合。這就是說聯盟國的軍事力量要在統一的計劃之上同時行動。

第三，戰略的補償。這就是說聯盟國的努力、動作和犧牲應該有某種平衡。在聯盟的成員之間，各成員所追求的戰略目標和實力的大小應該有合式的比例。東歐前線必須有西歐前線來均衡一下。

英美蘇同盟能够被打敗，只有在它不能實現聯盟戰略的時候。希特勒的整個戰略是建築在擺脫蘇聯的聯盟戰爭之上的。它的目的是在各個擊破敵人，一次一個。聯合國間的聯盟戰略會失敗，假如其中主要的參加戰的時間表有分歧的話。蘇聯的時間表是根據德國的時間表計算出來的，其中包括蘇軍打倒並粉碎德軍的作戰計劃，按照那計劃，德軍要在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至遲一九四三年春季，不惜一切犧牲以全力進攻蘇聯。（譯註：此文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十月，尚在蘇軍開始其勝利的冬季攻勢之前。）因此，現在盟國的戰略必須調整英美和蘇聯的時間表。

聯合國間的攻勢大戰略，早就被它們的戰略地位決定了。和軸心國比較起來，它們佔據着外線。這樣，它們的戰略必須是外線戰略，需要集中的攻擊——同時在許多方向重重地打擊敵人，而且目的要在敵方實力的中心所在。要從東方和西方同時打擊德國。為了進攻歐陸，英倫三島有着特別的——現在是決定性的——地位。從英倫三島開闢西歐戰場並不需要很大的力量。但是英倫三島的根據地可以變成戰略的樞紐，其作用也許會改變整個歐洲的戰略形勢，使各方面所有的反希特勒的力量全都活動起來。

以為歐洲第二戰場的唯二功用，是在援救紅軍，那是錯誤的想法。第二戰場並不是蘇聯的支柱。它首先就是英美對德國的戰爭的開始，並且是反希特勒大攻勢的手段。紅軍得到援助，不過是第二戰場的後果之一而已。另一

個後果將是紅軍的攻勢實力為了一個反軸心同盟的利益而開展。

聯合國間的聯盟戰略會在一九四二年夏季遇到危機，這是事實。其時聯合行動的機構還沒有起作用，希特勒的七月大攻勢之後並沒有緊接着英美的反攻。有人打算把技術上的困難，船隻的缺乏以及許多其他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蘇聯戰爭的時間表和英美戰略的時間表之間會有罅隙。這其實是倒果為因的說法。阻礙同盟國的聯盟戰略的充分發展的，並不是技術上的困難，而是由於聯盟計劃的延擱，這阻止了克服技術上的困難。聯盟戰略的迫切性總是被拖延下來。如果聯盟國預先定好戰爭計劃，假如進行聯盟戰爭的機構及時成立，那麼船隻的分配可以有不同的辦法，準備的速度也可能增加。德國和日本的統帥部在籌劃和準備戰鬥的時候，首先規定好目標和攻擊點，然後以無情的精力去集中與攻擊的目標相配合的技術手段：如日軍在太平洋登陸用的船隻，德軍在挪威和克里特島戰鬥用的飛機以及德蘇聯用的坦克。轉心國的技術是被軸心戰略所決定的——並不是技術決定戰略。德國和日本並不讓它們的戰略由於技術上最初的難關而呆板起來。

同盟國方面的遲緩有許多原因。英美蘇並不是同時參加戰爭的，它們從前並沒有團結成軍事同盟。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間的大半時期的外交危機阻止了它們為真正的軍事合作打下一個基礎；張伯倫的政策，和美國的中立會是主要的障礙物。開初的時候，它們的聯盟戰略不過是暫時的。雖然，在蘇德戰爭爆發以後，侵入歐洲大陸曾是英美集團的決定性的任務，那是毫無問題的。但是迄今時間已經損失了一年多，在這一年來希特勒繼續有着戰略行動的自由。這個時間上的不能補償的損失，一部份可以歸源於英美陣營中對於聯盟戰爭的各戰場之間的相互關係沒有立刻認識。

蘇聯戰場和西歐的陸上戰場之間的相互關係具有決定的重要性。西歐戰場一開闢，整個歐洲戰場的力量平衡將因為英美實力的積極干涉而起變化。在這個情形之下，德軍將不能對蘇聯戰場進行攻勢，東線方面德軍的危機就無法避免。這危機要比一九四一年冬季更嚴重。我們知道當時德軍幾乎打敗。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德方軍事發言人第特瑪中將會在希特勒生日廣播演說中說：

在冬季之初，東線德軍是處在不可思議的嚴重局勢之中。它面對着嚴重的決定。德軍幾乎決定了轉進遠離敵人，而且把敵人造成的焦土地帶放在敵方和我們的陣地之間。

這個聲明如果翻成簡單的話語，就是說德軍統帥部事實上曾經決定過放棄其佔領的蘇聯領土，撤退到從前的德蘇邊界附近，因為焦土區域是在那邊開始的。德國參謀本部的發言人歌爾夫上校寫了一篇文章論及一九四一——四二年冬季德軍統帥部的心情，發表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的國社黨機關報「人民觀察報」上：

有人問，是否應該開始大規模的撤退，以縮短交通線呢？一八二二年德軍的困境，開始影響到軍官和士兵了。

在一九四一——四二年冬季，英美如果侵入大陸，能使德軍走到崩潰的邊緣。希特勒在戰爭的這一階段中的戰略，和以前諸階段一樣，是以集中力量於一線為基礎的，目前就是集中力量於蘇聯戰場。德軍在東線的攻擊力，有賴於攻勢武器比紅軍佔上風——一旦這個優勢被西線束縛了，德軍在東線的戰略就失掉基礎。這就是說不備德軍的攻勢可以遏止，而且紅軍的攻勢實力也可以自由。早在一九四一——四二年冬季戰役中，紅軍的攻勢實力就已顯初試鋒芒了。攻勢中的紅軍將頭頭來策應西歐的英美戰線。東線的蘇聯戰場和西線的英美戰場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互相支持和互相援救。第二戰場的戰略作用因此就在推翻德國的戰爭計劃。在一九四一年，紅軍使德軍的攻勢停止了。但是德軍還有運動戰，那是具有決定性的和德軍事實上唯一的攻勢方法，那必須永遠停止，不僅以紅軍所用的戰術方法使它停止，而且要用聯軍戰略——用包圍第三帝國和取得整個歐洲戰場的盟軍的優勢的方法來使它停止。

第二戰場的效用是會增加的，因為這是另一個方向的打擊。把英美軍隊開到蘇聯去可得不到同樣的效果。第二戰場的作用是在分散敵軍的力量，在西方和南方分裂並擾亂德軍的後方，搞垮東線和西線之間的德國內線。第二戰場即使開闢在沒有德國佔領軍的地方如法國未佔領區（譯註：盟軍在北非登陸後，法國的未佔領區也被德軍佔領了。）和伊比利亞半島，也會有點效果，德軍就不得不延長交通線，增加佔領軍。第二戰場也會使強有力的政治武器發生作用，點燃起歐洲革命的火，增強被佔領各國內的抵抗和破壞力以反對第三帝國。

同樣的相互關係也許發生在地中海戰場和北非戰場，東歐戰場和西歐戰場之間。利比亞也能成為第二戰場的「中心網」的，但這需要兩個前提：第一、利比亞戰事必須能把大量的德軍從東線吸引過來，第二、利比亞戰事必須

推向西去，推向北非去，這樣來形成對於德軍佔領下的南歐的威脅。假如北非和地中海變成了盟軍干涉南歐的戰門根據地，那麼從地中海登陸甚至要比從英倫渡海登陸作戰還要容易。因為在這個情形之下，盟軍可以在西班牙和巴爾幹之間選擇打擊的地點，而南歐海岸和西歐不同，是沒有設防的。

軸心軍順利地使利比亞戰場成為孤立的英軍戰場，和蘇聯前線之間沒有戰略上的相互作用。軸心軍獲得了地中海交通線的安全，使少數英軍部隊從利比亞退到埃及，這樣來做成一著。惡劣的命運軍在民主國家的頭上，又使他們屢次無法結束地中海之戰。一九三九——四〇年的英法聯盟並未及時利用其遠超過意大利的優勢實力。對英美聯盟而言，地中海也可說是一個以歐洲為目的的理想戰場。當初「威爾斯親王號」，「攻擊號」，「奧克拉登瑪號」和「阿利初那號」假如不在太平洋里在守勢行動中等待擊沉，而用在地中海從事攻勢行動，而且加上別的生力軍的話，那麼地中海上的戰爭過程是會不同的。

開闢第二戰場有兩個方面：技術方面和戰略方面。技術方面包括物質上和戰術上的策劃，譬如登陸作戰的可能性等等。戰略方面包括戰鬥雙方實力的對比。在一九四一年春季，英國遠征軍是能夠開到希臘的，當時英軍在技術上可能在巴爾幹開闢戰場。英軍可以實行登陸，因為在希臘和南斯拉夫有立足點。但是在戰略上，這個登陸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其時德軍的全部重量可以放到英——希——南前線，它並不受任何陸上戰場的牽制，能夠自由而有效地對英國遠征軍及其軟弱的同盟軍作戰。希臘登陸也許有道德上和心理上的原因，但在戰略上，那是一開頭就是極其冒險的事情。

現在開闢西歐第二戰場就不同了。必須事先考慮到技術上的困難。必須解決船隻的問題，克服登陸的困難。可是在戰略上看，這是能夠實現的。開闢西歐第二戰場是可能的，因為東線蘇聯戰場早已堅強地對付着德國；因為絕大多數的德軍被牽制在蘇聯；也因為英倫三島上駐紮着的英國、美國和加拿大軍隊在數量方面要比德軍可能使用在西歐和北歐的軍隊來得佔優勢。

在一九四一年春季，歐洲的戰略形勢不能夠有變化，但是現在，足以阻礙開闢第二戰場的困難是能夠克服的。

光靠海岸工事不足以防止敵方的登陸。任何「西線長城」，都不能保障德國稱霸的海洋——大西洋上從法屬的別雅里茲起至挪威的納維克止，地中海上從西班牙的馬拉加起至希臘的匹刺斯止。希特勒須調德方海岸線的堅不

可破，可以說是德國看法的「馬其諾情結」，要不然就是一種對盟方的心理威脅。納粹很懂得以一切方法建築海岸工事，但海岸防禦的主要問題是機動後備隊。在這一方面，力量的對比有利於英美部隊；因為德軍被牽制在蘇聯戰場，因為在蘇聯戰場上德軍的死傷日益增加，因為由於東線作戰的需要，德軍的後備隊正在枯竭中，也因為德方在西線的駐軍一天比一天少了。駐在英倫三島的英國美國和加拿大部隊將在任何情形之下比西歐和北歐的德軍強大。

還有一個因素有利於四歐的登陸戰鬥。登陸也許會受到德國海軍威脅的可能，現在幾乎完全沒有了。使第三帝國侵入英倫的企圖成爲太危險的，主要是由於其海軍的薄弱和英國海軍的優勢。海上力量的對比，使英美軍登陸成爲可能。

許多經驗說明了登陸作戰是可能的。日軍曾在無數的登陸戰鬥中獲得了驚人的成就。他們已經證明了良好的組織和海陸空軍合作在經山海洋登陸作戰之中的重要性。日軍的登陸，事實上，是面對着軟弱的敵方。但這裏又有一個在強大的敵方——德軍之前登陸的典型實例。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當刻赤和費奧多羅夫淪陷之後，蘇軍在克里米亞的登陸。紅軍及紅海軍隨隊所攻克的刻赤半島並不像西歐區域一樣是德軍的內地，而是德軍的前線。不僅如此，那是攻勢的德軍前線的一部份，德軍打算從那邊跳過刻赤海峽到塔曼半島去。蘇軍在一個狹窄的地帶實行登陸，在那裏德軍有着海岸巡邏和海岸防禦的一切必要條件，而且密佈駐軍。這個登陸之所以成功，由於出奇，由於攻擊的動性和近距離戰鬥，由於蘇方空軍和海軍的掩護。至於德軍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第二次奪得費奧多羅夫，那並不是阻止登陸的戰鬥，而是陸上戰爭的反攻了。蘇軍佔據刻赤，直至五月中旬。

現實的聯盟戰略要求正確地估計蘇聯的軍事力量。對紅軍戰鬥力的錯誤的概念，在一九四一年夏季決定了英美戰略的發展。正當的聯盟計劃爲什麼延遲，這個錯誤的估計要負一部份責任。他們以爲紅軍也許只能抵抗三個月至六個月，以爲這之後紅軍或則垮台，或則撤退到烏拉爾山脈，這結果就使他們對於聯盟戰爭的任務和可能性採取不正確的態度。一支軍隊只能進行短促的拖延性的戰鬥，爲什麼要和他合作呢？在這樣認識的基礎之上，有蘇聯在內的長期聯盟戰略是不會實現的；蘇聯戰爭的意義，不過是給與英國和美國的片刻的喘息時間而已；對於紅軍的攻勢力量不存什麼希望，也不考慮聯盟

戰略。盟國過低估計聯盟戰略的前途，沒有比這個時候更有害的了。

偉大的攻勢戰略能修而且必須建立起來，一方面建立在紅軍已經成爲了功業之上，另一方面建立在美國和英國蓄積起來的軍事資源之上。雖然有計劃的聯盟作戰機構尚未成立，紅軍已經以其抗戰努力對聯盟的事業有了驚人巨大的貢獻。它阻止了德軍侵略英倫。它使德軍完全佔領北非和近東成爲不可能。英美獲得了寶貴的時間來作軍事上的準備。更重要的是，是紅軍消耗了並消滅了德國戰爭機構的很大的一部份。德軍在蘇聯究竟被消滅了多少？百分之三十還是百分之四十呢，這難於準確地說出來。這些損失，在人員和物資之外，包括難於計算的許多戰略上和心理上的因素。但德軍攻勢力量的頂點已經過去了，德軍再不能像一九四一年那樣擁有集中了的巨大部隊，還是無疑的。德國戰爭機構在蘇聯的巨大消耗和部份毀滅，是迄今爲止反軸心聯盟的最大的、實質上的和唯一的軍事資本。紅軍在大攻勢戰略中所起的作用，不僅僅在於替同盟國贏得了時間。它的決定作用是在進行偉大的陸上攻勢。蘇聯抗戰的意義不僅在自衛，而在以積極的防禦戰準備反攻和全力從事於聯盟攻勢。

大攻勢戰略需要盟國戰鬥部隊的統一行動和各種武器的戰略合作。武器的戰術合作——戰場上坦克、空軍、步兵和砲兵的合作以及海軍戰鬥中水雷船艦、潛艇和空軍的合作——是不夠的。同盟國的任務是要計劃整個陸空海軍的合作。日本會在這樣的戰略中顯示了堅韌和才智。但同盟國的任務更大：要獲得各國在不同的、分得很開的戰區中一切部門的武器的戰略合作。盟軍的戰爭技術必須和聯盟戰爭的需要取得協調。

對付第三帝國的聯盟戰爭的任務，要以海上、空中和陸上的戰鬥來保證陸上戰爭的勝利。英美陣營之中已經認識了大陸戰爭應居首位。邱吉爾在加拿大議會中演說，講起聯合國國家對德戰爭的三個階段：第一、積蓄力量；第二、攻克德軍佔領的區域；第三、把戰爭移到德國的土地上，最後擊敗敵人。三個階段之中，兩個是必須在歐洲大陸上進行的。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奧欽萊克將軍說：

如果要正當地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到歐洲，也到德國去爭取。德軍必須在他們的本土上被打倒，像拿破崙一樣。

英美集團的任務是在適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高要求，利用海空兩方面的優勢來對付決定性的敵人。

同盟國的軍事戰略有兩條前提。第一個前提是把英美海軍力量集中在大西洋，大西洋的形勢有利於民主國，要比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太平洋上的情況更有利。當日本不得不設法在太平洋上對付美國海軍的時候，軸心國的海軍不能集中在大西洋。大西洋是盟軍大攻勢的天然集中地。

第二個前提是：英美海軍必須配合起來用在這個攻勢中。單單是英國海軍不能進行大攻勢，必須英美兩國聯合進行。

英美海軍戰略必須對準歐洲大陸。它應該努力為了陸上的勝利而控制海洋。在一九三九——四〇年，英法海上的霸權未能阻止德國在歐洲得勝。在一九四一——四二年，英美徒勞無功地空襲着大西洋，因為陸上的攻勢並沒有跟着到來。相反地，日本在太平洋的海軍優勢——雖然決不是壓倒的優勢——却獲得成就，因為日本海軍是日本整個戰鬥部隊所進行的攻勢的有機體。同盟國需要在大西洋上有一支登陸艦隊。封鎖不過是消極的海上優勢。積極地在海上編織，那就要使陸上戰鬥的供應線暢通，為了登陸而清掃海道和為了奪取海岸而作海戰。海上的機動戰和船艦沿着海岸線的大規模運動可以掩護登陸戰鬥。海軍使實行遠距離的同時登陸成爲可能。假如我們把英倫三島作爲起點，和日軍從海上登陸和實行海陸軍聯繫的距離比較起來，那麼相當於英美軍隊在佩查維、納維克、卡迭茲、里斯本、瓦倫西亞、巴萊摩、勃林的西、阿爾及爾、突尼斯、阿爾及斯、卡薩布蘭卡、達喀爾、安卡拉和吉布底等地登陸作戰。海軍的保守性的教條，總是忽視了海軍在海陸空聯合戰鬥之中的真正力量。

和海軍作戰的任務一樣，民主國必須爲了對準歐洲大陸的大攻勢而充分利用空中戰鬥。盟軍比起軸心軍來，更能實行總體性的、廣泛的、一切形式的空中戰爭。孤立的空軍戰術是不可能有的。個別的空中戰鬥基本上有着不同的目標。獨立的戰鬥——遠距離轟炸的目標是敵方的工業中心和運輸中心。實際空戰的目標在海上是敵方的海軍，在陸上是敵方的陸軍。這樣，總體性空戰就包括對敵方陸上和海上部隊的積極戰鬥。空軍只有和自己的陸海軍合作，才能完成戰鬥。空中的總體性戰術是一切作戰力量總體戰術的一部份。

對軸心國的大攻勢不備要求空軍發揮一部份的特別作用，而且要求它和其他兵種合作中發揮它的一切作用。以獨立作戰爲基礎的孤立的空軍戰術實在是消極而沒有效力的戰術。遠距離轟炸敵方的經濟和運輸中心只有當繼

續不斷而且大量集中地實行時，才有明確的效果。在軍事上，這樣的轟炸只和其他兵種的攻勢同時進行，才有效力。譬如說吧，解放了巴黎，之後再炸毀德國的飛機廠、化學廠、汽車廠，把柏林炸成廢墟，那才有效力。空軍的獨立戰鬥並未打擊敵方的作戰力量，並不能直接幫助自己的作戰力量。一九四二年夏季對科倫、愛森、勃萊門、杜塞爾多夫等地的轟炸並沒有絲毫改善埃及的英軍和蘇聯紅軍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許多巨大的戰術成就就是空軍配合了陸上戰鬥造成的。第三帝國進行獨立的空中行動只限於小範圍。——日本簡直就難得幹。可是由於良好的陸上空軍的協助，德國佔領了歐洲大陸，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上獲勝。在聯合國國家方面，最有效果的空軍是蘇聯的陸上空軍——尤其是在守勢戰鬥中。英國空軍在英倫上空之戰中的成功是很重要的事，但它僅僅打擊了德國空軍，而蘇聯空軍的成就，特別是在偉大的莫斯科之戰中，却在基本上協助了粉碎整個德國戰爭機構。

在反軸心的大攻勢中，各種飛機之中，最優秀的，是能夠最有效地協助克復歐洲大陸的，能夠最嚴重地打擊德軍的，能夠最靈活地掩護英美部隊的，能夠最好地幫助他們把戰線推向前去的飛機。那就是戰鬥機、輕型和中型轟炸機、俯衝轟炸機、暴風式飛機和反坦克機。在偉大的盟軍攻勢之中，空中優勢是必要的，不僅是爲了空軍，而是爲了挺進的陸軍。

西線和東線的合作可以給予盟軍的空軍戰術以新的方向，使空軍的特別機動性成爲可能。英美的大批轟炸機這就能趕到蘇聯戰場上來打擊德軍的交通線。一旦蘇軍進行攻勢，它們就能在東線給敵人有效的打擊。這種空中兩線攻勢能使盟軍的空中戰爭達到最大的強度。

德國的安全有賴於隔開德國控制下的區域和英倫三島的一衣帶水。從前這一條水保衛了英國；現在保衛着德國。一旦英美集團渡過了海峽——假一點點，是希特勒歐洲周圍的一圈水——德國的安全就完了。希特勒是招架不住兩線的戰爭的。

聯合國國家戰略的最後結論是：首先，德國不會僅僅被較強的武裝所擊敗，要打垮它，更需較其威力的戰術，需有計劃而大膽的主動性。

其次，在聯合國國家的聯盟戰爭中，特別是對於兩線作戰，戰術應該放在一切技術和軍事的需要之前。兩線作戰應該是盟國計劃上的第一項節目。

(以沛譯)

民族化問題討論特輯

略談創造新的中國氣派與作風

勁秋

中國文化的新氣派新作風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能憑着人們的願望硬造出來，而是要全副已有

文化教養的人們聯合不會得到過文化教養的人們，共同努力，現在有的中國氣派中國作風的基礎上創造起來的。

說到從現有的基礎上創造，不成問題，要接收歷史的遺產和現在民間流行的氣派與作風。有五千年歷史，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遺產是堆集得很多的，民間的寶藏也非常豐富，可是這裏面有好的，也有壞的，有值得我們誇耀的，也有使我們怕拿出來見人的。我們反對舊國粹派的「維古爲善」，也反對新國粹派的一味迎合大眾，而是要接收那些好的，美的，足以促進中國文化進步，發展的，拋棄那些壞的，醜的，拖着中國文化的腳跟的氣派與作風。

由於中國文化多年的停滯，遲緩；選擇，取捨一下之後，是所剩不多，不能趕上現今複雜多變的世界文化，也不能

滿足中國文化的需要的。當然還要吸收一些歐美資本主義的與蘇聯社會主義的文化成果。在這一點，我們反對「原封搬來」與「囫圇吞棗」的辦法，而是要吸收那些合乎中國的特點，適于中國的國情，有助於中國文化向前發展的東西。

這樣，把傳統的，民間現存的，國粹的，都加以批判，取捨，增減，改造，那就已經是新氣派新作風創造的開端——也就是搭上一個新氣派新作風的骨架，剩下的祇是隨時充實以活潑的血肉了。

也許有人要問：倘若加進一些外國的和新的東西，那不就不能爲老百姓「喜聞樂見」了嗎？我的答覆是「不會的」中國老百姓並不像一般洋大人和高等華人們想像得那末「沒出息」，「不長進」，他們是很願意——而且也能够吸收新事物，創造新事物的。看：很多的農村中不是早已用脚踏車代替了騾馬嗎？全國所有大小工廠中新式機器的使用者，掌櫃者，不就是我们農村中來的老百姓了？須知

「喜聞樂見」與「習聞常見」不同，老百姓歡迎的是於他們有益——幫助他們改進與提高生活的氣派與作風，憎惡的是於他們有惡——逼着他們往死路走的氣派與作風。

開始，爲了普及，當然要注意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接收程度，不能不有所遷就。但遷就是爲了提高，在普及的基礎上，倘不時充實進新鮮，活潑，生動的實際生活，實際鬥爭的新因素去，是談不上新氣派新作風的創造的。

在老百姓「習聞常見」而又「喜聞樂見」的氣派與作風中，不斷地遞增從他們「稀聞罕見」而也能「喜聞樂見」的氣派與作風——這就是說：在傳統的，外來的和民間現存的許多優良氣派與作風搭起的骨架上，不斷地充實以活生生的實際生活，實際鬥爭的血和肉，那末，中國文化的新氣派新作風就創造成長起來了。

關於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瀚若

應當先說明作風與氣派是什麼。作風是對人對

事對物的方式或體裁，相當於英文之Style或manners；氣派是對人對事對物的氣概或風度。據漢夫或喬木兩兄的意見，此詞相當於英文之Style，我想，這或許不錯吧。氣派含孕在作風之中，兩者是不能隔離

，不能對立的。有一位同志舉一例來說明兩者的關係云：一個有名士派的人，做事吊兒郎當，在這兒，吊兒郎當是他的作風，名士派是他的氣派。氣派與作風是聯系着遞進着，似不能脫離他們互爲表裏，因爲牠們並不是本質與現象的關係，如果從個人來

說，牠們都是以某一個人的品性為本質的。

氣派與作風之養成，固不能與一個人的生理，地理環境及氣候無關，但我認為最重要的因素乃是一個人所處的環境。社會環境不同，政治經濟的體制不同，那末，文化與風習亦就不同了。文化與風習之不同，就會產生着不同的作風與氣派；在同一社會中，人羣在生產體系中所佔的地位，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以及他們取得社會財富的方法與擁有這一社會財富的份量等情況，如果不同，那末，他們彼此間的風習與意識，亦就不同了。但是，在某一社會裏佔統治地位的人羣，其作風與氣派，是或多或少可以影響那些與他們對立的人們的。

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是不能離開中國的社會經濟而獨存的。中國近百年雖有資本主義的萌芽與生長，但農業與手工業的小商品生產，還是極為普遍。封建社會的風習，在一般人中，還有極大的力量，談到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是必須先弄清這個問題。

題的。(但我在這兒，還沒有把這個問題弄得清楚！)

中國作風的特點，我認爲有下列幾點：第一是規模宏大，大而化之；第二是粗線條，樸素；第三是速度迂緩，遲鈍；第四是色彩凝重，第五是音調低抑。這幾點，我大半同意郭沫若先生的意見。

中國氣派的特點，我認爲有下列幾點：第一是中庸之道，這是梓年同志的主張，所謂中庸的本質是養雞吃蛋，由此便引伸爲「適可而止」或「有節」；第二是寬恕，這與仁愛是不能分離的；第三是單純質樸，這是農業手工業在生活中的反映，第四是氣勢渾厚；第五是忍耐持久。在這裏，氣勢渾厚與規模宏大是互相滲透着；單純質樸與速度迂緩，粗線條，色彩凝重及音調低抑是互相滲透着；中庸寬恕與大而化之是互相滲透着。

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有優點亦有缺點，往往優點與缺點是聯接着的，如中庸發展下去便成爲折衷調和，寬恕發展下去便成爲不分敵我一視同仁的仁

愛，質樸發展下去就成爲瑣碎及簡單化，忍耐發展下去就成爲苟且偷安——這都是偏向，必須防止的偏向。

要提倡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必須採取批評的態度。這就是說，必須發揚優點，克服缺點。例如對於中庸，可以發揚其「適可而止」或「有節」，但須克服那種離開原則的調和傾向；對於寬恕，可以發揚其對同胞對同志的愛，但必須提高對敵人對盜賊的恨；對於質樸，可以發揚生活上的簡單化，但必須克服工作上的粗枝大葉；對於忍耐，可以發揚我們的堅韌性，但必須革除那種苟且偷安的習氣。在作風方面，對於速度音調與色彩，亦應適當的使其逐漸提高與複雜化。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是不斷地在發展着。我們不僅要接受好的東西，而且要進一步的使這種好的東西更加發揚起來。

對於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我只能提出這些問題來，所謂意見，是談不到的，希望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朋友，多加批評指教！

我們應該怎樣來表現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華 崗

作風又稱風格，是人們在對人對事對物等場合所作用着的方式。氣派又稱氣度，是人們在對人對事對物等場合所流露出的態度。這種方式和態度，反映着現實世界之客觀的、物質的、具體的內容。所以人們在一定生活鬥爭的發展過程中，都有它們各自特有的作風和氣派。一個民族或國家，也是如此。

不同的個性，不同的階層性，不同的民族性，

相應着也就有不同的作風和氣派。例如中國的儒家主張守舊復古，按照固定的等級分配生產資料，所以它們的作風和氣派，一般都以中庸爲主，崇尚節制，寒梅寒尤，不要說固執的話，不要做特異的事，免得招禍受辱。道家思想，以清靜無爲爲相號召，內藏陰謀權術的骨子。所以道家的作風和氣派，一般都是冷酷的、狡詐的、沒有溫情的。和老子同道的楊朱，甚至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多麼卑劣的個人主義！墨家主張兼善博愛，要求人類平等，所以它們的作風和氣派，一般都和儒家道家不同。墨家崇尚刻苦勤勉，自我犧牲，言行一致，團結互助，這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歷史，有優良的傳統，也有因襲的重担，有各種各樣的作風和氣派。加以社會結構的特殊，經濟、政治、文化的繁複及其發展的不平衡，所以反映出來的作風和氣派，也就五花八

八門和新舊雜錄，其中有許多值得發揚光大的作風和氣派，如胸懷開闊和大公無私的作風，是非分明和獎善懲惡的作風，豪俠正義和團結互助的作風，謙遜樸素和勤勉堅韌的作風等等；但也有許多應該反對或揚棄的東西，如自高自大，好高騖遠，自以為是，華而不實，獨斷包辦，守舊復古，不求甚解，文人相輕，色彩凝重，音調沉抑等等。我們對於這許多作風和氣派，當然不能兼收並蓄，而應給以科學的批判和清理，剔除其封建性買辦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科學性的精華。而且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作風和氣派，主要是要真正適應抗戰建國的需要，同時又要新鮮活潑，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呢？或者說，要創造這樣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應該具備怎樣的要素和條件呢？我以為下面這幾點是最主要的：

(一)根據科學的立場和方法，來認識和把握中國的國情，這是創造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首要條件。為什麼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的工作態度和著作，以及魯迅先生茅盾先生的著作，能够那樣恰當的表現現代中國的作風和氣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們對於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特質，都有相當深刻的研究和體認，所以才能提煉鮮明出斯鮮活潑，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各種中國要素。他們也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精神食糧的原料，但是他們不像洋八股先生和教條主義者那樣，不顧中國的國情，只知生吞活剝地搬取外國；相反地，他們吸收外國的進步東西，却是經過一番消化作用，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點即是說，按照中國民族的特點去應用它，所以我們和它接觸的時候，也就感到十分親切，簡直和中國的東西一樣。

(二)根據歷史的批判眼光，繼承和發揚中國民族的優良傳統。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把歷史的秘冊揭開、解剖，使過去提出而未解決，尤其會用戰鬥代價而爭取未到的東西和問題，抽引出來，繼承起來，用正確的科學方法給以批判和總結，是我們創造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另一任務。前面已經說過，中國歷史傳統中，有許多消極的因襲重阻，但也有許多留給我們的寶貴的遺產，在這些遺產中，可以發掘出不少帶民主性、科學性、大衆性的積極因素，而且是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我們必須給以批判的接收，或者給以某種程度的改造，使之發揚光大，使其適合今天中國的需要。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和其他著作，郭沫若先生的棠棣之花和屈原，在這方面，可以作為模範。

(三)對於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必須有高度的愛，而對於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敵人，必須有深切的憎，這也是創造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因為無論何事理物，無論作文演說，要能真正打動老百姓的心坎，取得老百姓的共鳴或響應，就必須具備這種分明的愛和憎，而不能站在漠不關痛癢的旁觀地位。例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大家一致公認這是表現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最佳典範。因為在魯迅筆下的阿Q，不僅是一個被侮辱被虐待的這地中國農民，而且刻劃出了現代中國人的真正靈魂——阿Q主義是中國人精神方面各種

毛病的綜合。魯迅先生為什麼能夠有這樣偉大的成功，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更因他對於中國深長的樸實的底層人民，是真正具有無比的熱愛的。他愈愛他們，對於他們所遭受的失敗和失敗主義的毒藥，便愈加引起憎惡和憤怒。由于這種熱愛和憎惡的交流，及其深切的鬥爭，才能孕育和創造出阿Q這偉大的典型人物，而這正是真正這地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四)跟老百姓同呼吸，虛心學習老百姓的語言，尤其是現代中國老百姓的活語言。因為這種活語言，是有血有肉的，是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

(五)為老百姓所有，並在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道路上增加新東西新力量。一切都在運動中和發展中，新東西不斷在產生，新東西復興又有新東西。如果我們所創造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只能籠統而不能開來，仍舊不能被老百姓所喜聞樂見。因為老百姓在生產和生活鬥爭中，要不斷產生新鮮事物，如東我們不能不斷去接觸新鮮事物，發現新鮮事物的特質和發展規律，我們就會被歷史所拋棄，還談得到什麼創造？過去曾有人提出高舉樂見須以習見常聞為基礎，這不既合邏輯，也不合實際生活。「理論帶灰色，而生活則常青」。這在創造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問題上，也值得我們細細吟味。

我們還要大胆的攝取

余約

編者先生：昨天在啟友A君那邊看到了貴刊關於中國化問題的徵稿印件，使我有了一種新的感想。這問題雖則不提出於今天，但是這問題最近依舊不失為意見最紛歧的問題之一。貴刊此徵稿徵文雖則未

會物及下走，但是慶親朋友們議論的問題的態度，總覺得心有所危，深以能得一個傾吐的機會為快，現在不揣冒昧地把我的意見敘述出來，希望得到大方的指正。

我老是覺得，中國人看問題的態度很像一個繭。抗戰前後文藝家大談「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活剗生吞，「言必希臘」，造成了極端脫離中國現實的一時現象，可是一轉眼，「中國化」問題一提出，於是而文藝青年的視線從繭左邊到極右，言必「民族」，甚至連文章裏有一兩句講得精確正確一點的語句，也被認為太洋化，不啻中國氣派了。

「歐化」變了不潔亮的名詞，性急的朋友趕快去找民間形式，即便在文藝的範圍之內吧，五因以來好容易勉了下去的歐化形式乃至思想，又開始蠕動了，編者先生，老實說，早得很呢，說歐化吧，中間連一個「歐」字的皮毛都還沒有學上，更說不上「化」了，拿我們的盟邦蘇聯做一個例子，淺見的人們都人云亦云地談着革命成功之後的蘇聯文藝，他們有了「鐵流」，「毀滅」，有了「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有了愛倫堡也有了夏斯它科維支，但是，實在說，今天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土地上開花的這文藝的花園，是從普希金萊蒙托夫時代就開始耕耘播種，它是勇敢不怕一切地吸收了西歐文明的成果，施肥乃至播種，先有了一大羣在俄羅斯大地上生長的——可是大羣地吸收和接種了西歐文明之成果的——花草，於是而在革命之後的自由天地裏才能如此茂盛地開花結果的。他們，是真實的歐「化」了的，把為了俄國進步所必需的——一切歐洲文明的成果吸收過來，「化」成俄羅斯人民自己的東西，自由而壯健，吸收了外來的而變成自己的血肉和靈魂……回頭來看中國吧，我

們從五四以來吸收了些什麼？「化」了沒有？別人是吸收，咀嚼，消化，而有機地變了自己，是東西，而我們呢？不是吸收消化，而是機械附體，這種情形，正像一個沒有受過現代文明洗禮的人，穿上一套西裝，既不實用，又不好看，現在，開始不滿意這種情形了，要改一改，這是一件再好沒有事情，但是，先生，問題要從這個人「人」做起，要使他個人現代化才好，否則，四肢不週身而再穿上十八世紀的古中國衣服，這也算得是中國化民族化嗎？

過去有人怕中國人穿了西式衣服就失去了中國人的民族性，以為上國衣冠才代表著中國的民族性，其實，中國人穿了半世紀的西裝了，膚色沒有變，性格沒有變，甚至還穿了西裝打拱作揖伏地叩首呢？先生，我再說一遍，問題是在中國人，在本質不在外表，在內容不在形式，——而從本質上說，今天的中國人還落後得很，千萬不要怕歐化，為了中國的進步，向上，離開歐洲文明的根本精神——科學與民主還有十萬八千哩，赤了腳還怕涼不及呢。

我絕不是一個「全盤歐化」論者，我也絕不否認中國民族有着很多優良的傳統，同時，也堅定地相信，中國人民一定能够發揚和再創造出民族自己的光輝燦爛的文化，但是，我更堅決地要說，要使長期開闢萎滯了的中國民族文化再度發出光輝，必定要大羣地，多地方地吸收歐洲先進國家的文化成果！我們中國民族是有着值得驕傲的優秀傳統，但是，誰能否認，我們也還有着許多不值得一提的惡劣傳統？在對人，將人不當人看，專斷，頑固，不民主，不坦白，不負責，自私，卑怯……在對事，不求甚解，馬馬虎虎，不附庸，不科學，道

一切是不是支配着大部份中國人的心？在一個長期貧困，外侮內亂，閉塞，僵化的情形之下，是不甚至於可以說我們的惡劣傳統已經佔了上風，優良傳統已經被淹沒而不彰？在今天，要發揚這種狀，要發揚優秀的傳統發揚，要發揚科學精神發揚，我以藥方只有一個，吸收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服了這一服藥之後，病去了，胃腸開了，於是吃進去的東西才能真消化，中國民族文化才能真消化。編者先生：歐化與民族化絕不是兩個不相容的詞，只有真誠愛民族的人，真誠希望自已民族進步的人，才膽虛心坦懷地看出自己的病症，才能真吸收消化世界人類最珍貴的東西而使之化成自己民族的血肉。特別重要的一點，我們千萬不要把所謂「中國化」，「民族性」這些當作一成不變的教條。說言之，極表面的言語，語言，句法，表現形式……；固然依循歷史的進行而不斷地變化，總得有一點，有些人下意識地認為自古不變的民族性在血和氣派，那何嘗不跟着時代和生產關係的變遷，而徐徐地在演變之中。舉一個例子，譬如「氣派」，應該姑且定義為：「在待人接物對事對物中流露出來的精神着民族特質和民族慣習的一種生活態度」，在這生活態度（也許可以叫做生活模式）中，構成民族氣派的民族的特質與民族生活中的慣習，就我們中國說，例如農業生產的緩慢，亞細亞型封建專制所遺成的獨斷，長期苦難所養成的忍耐與鈍感，固然只要社會機構一變革，生存方式一改變，必然要隨之而變化，就是更本質一點的血型，氣質，音調，乃至對於色彩，圖案，音階……等等的風尚偏好，也將因為交通的改進，種族隔障的撤除，風土氣候的變化，最重要的生產的進步，而不能不有所演變。這像蘇聯所來做一個例子，沙皇時代的奧皇何天

一切是不是支配着大部份中國人的心？在一個長期貧困，外侮內亂，閉塞，僵化的情形之下，是不甚至於可以說我們的惡劣傳統已經佔了上風，優良傳統已經被淹沒而不彰？在今天，要發揚這種狀，要發揚優秀的傳統發揚，要發揚科學精神發揚，我以藥方只有一個，吸收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服了這一服藥之後，病去了，胃腸開了，於是吃進去的東西才能真消化，中國民族文化才能真消化。編者先生：歐化與民族化絕不是兩個不相容的詞，只有真誠愛民族的人，真誠希望自已民族進步的人，才膽虛心坦懷地看出自己的病症，才能真吸收消化世界人類最珍貴的東西而使之化成自己民族的血肉。特別重要的一點，我們千萬不要把所謂「中國化」，「民族性」這些當作一成不變的教條。說言之，極表面的言語，語言，句法，表現形式……；固然依循歷史的進行而不斷地變化，總得有一點，有些人下意識地認為自古不變的民族性在血和氣派，那何嘗不跟着時代和生產關係的變遷，而徐徐地在演變之中。舉一個例子，譬如「氣派」，應該姑且定義為：「在待人接物對事對物中流露出來的精神着民族特質和民族慣習的一種生活態度」，在這生活態度（也許可以叫做生活模式）中，構成民族氣派的民族的特質與民族生活中的慣習，就我們中國說，例如農業生產的緩慢，亞細亞型封建專制所遺成的獨斷，長期苦難所養成的忍耐與鈍感，固然只要社會機構一變革，生存方式一改變，必然要隨之而變化，就是更本質一點的血型，氣質，音調，乃至對於色彩，圖案，音階……等等的風尚偏好，也將因為交通的改進，種族隔障的撤除，風土氣候的變化，最重要的生產的進步，而不能不有所演變。這像蘇聯所來做一個例子，沙皇時代的奧皇何天

，奧勃莫洛夫，這些可笑可憐可鄙的人物，不是已經因為社會生產的革命，而漸漸的從今天的蘇聯絕跡了麼？再拿英美這兩個同文同語的國家來做一個例子，同文同語的「民族」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自然環境中生活繁衍了不到兩個世紀，到今天，Xenophobia 氣質不已經成爲一種世界上特有「美國氣派」，Uncle Sam 和 John Bull 不是已經變成完全不同的兩個民族了嗎？

我的話也許已經拉得太遠了，你們徵詢的是文化，特別是文藝上的民族化，中國化的問題，對於這，我也和上面所說的大體一致。人在饑餓和需要補充的時候才吃東西，吃進去的東西有適合於營養這個人身體的成分才被同化和攝取。我們民族正在空前的饑餓狀態之中，而在我們眼前，歐洲的民主制度，科學方法，機器生產電化生活，實在是比我們古老的遺產更堪稱起我們的食慾，也可以說更有益於我們的身體。也在文藝上舉個例吧，俄羅斯是在俄羅斯，全世界的藝術批評家不是都公認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雷平，是三個最能代表俄羅斯民族靈魂的藝術家嗎？可是，柴可夫斯基在短篇小說，柴可夫斯基在作曲，雷平在水彩畫，不都是完完全全的採用了西歐的形式麼？有誰能說托爾斯泰，高爾基，所描寫的不是俄羅斯人民的活生生的現實？他們的氣派作風可不必說，即使他們的文體，有誰能說不是俄羅斯的文體？可是，他們自己就不諱言從西歐的大作家們學得了最珍貴的東西。回到自己身上，說我們魯迅吧，他筆下的人物是十足的中國人，他文章裏散發出的是道地的中國氣派，他用的筆調是完完全全的中歐筆調，可是，他是個徹底地接受了西歐科學和民主精神的中國人，只因為他徹底，他接受了歐洲的人文主義民主精神，所以他的心

能够那樣地接近人民，只因為他徹底的受過歐洲的科學洗禮，所以他的思想方法，他的文體能够那樣的精確，緊密，恰適，而又富於生命。

水一定要從高的地方向低處流，空氣一定要向稀薄乃至真空的地方流，文化不能例外，較高較進步的文化一定要向較低較落後的所在感染，在需要者這一方面是吸收，在傳播者這一方面是一種帶有擴張性的壓力，對於這種自然現象，阻止不可能，偏

正還有待於創造

任 厂

朋友閒談，常常提及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問題：中國作風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作風，中國氣派又是怎樣的？一種氣派？作風與氣派又是怎樣的關係？到底要備具些什麼條件就可算得上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其間也有朋友列舉一些歷史上的代表，指出它們的優點或特點，說，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怕就是如此這般吧？好像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是已經存在了的東西似的。

其實，這作風，這氣派，還並未存在過，還正有待乎大家來努力創造。就因為如此，所以才把它提在我們的開幕日程上。如果已經有了的話，那何必還要我們來提倡呢？今日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創造出這樣的作風，這樣的氣派來的問題，而不是這作風，這氣派的具體內容，具體條件到底是些什麼的問題。因為區區沒有掛起，上面到底有些什麼字，是無法評論的。

要創造出一種作風與氣派來，難道可以不先有一個標準，作爲努力的方向嗎？難道可以一任大家亂碰亂撞，到那裏是那裏嗎？難道不應當先來討論

狹的民族自尊心是沒有用的。問題是在善導，在善用，善用者，一切皆爲我，善導者，一切皆無害，中國民族要有強固的自信心，要有大膽吸收一切外來文明的寬廣的胸度與氣派。

中國文化永不會滅亡，正像中國民族永不會絕滅一樣。但是，我們也必須坦白承認，我們病得久了，我們虛弱，我們要醫，我們要補，大膽的吃西藥，大膽的吃科學製成的營養品！（下略）

一下，我們所要創造的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嗎？

是的，這問題是必須預先有個確定的問答的。但我們所預先有的，是方向，是目標，而不是具體的內容與條件；而這方向，這目標即是確定了的，就是：老百姓所喜聞，所樂見，就是說，如果你的勞作爲老百姓所喜聞，所樂見，那你就在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如果不爲老百姓所喜聞，所樂見，你就不是中國作風，中國氣派，至於要有些什麼樣的具體條件就可爲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問題，你問我，我不能回答你，我問你，你也無法回答我，我們都去就教於老百姓自己，才不至問道於盲。

這方法是有成就的作家曾經採用過的。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詩，首出「嘗試集」，要讀者加以批評指正，使白話詩漸漸臻於完善。戈果里一稿寫成之後，必先讀給並無文化修養的女傭們聽，看她們聽了是喜是厭來決定那裏可留那裏應改。據說，像「水滸」那樣的名著，元曲那樣的傑作，也都曾一再

的經受老百姓的考驗與修改而最後寫定的。這我看倒是值得我們發揚的一種「作風」，是使自己在作品走向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一種「作風」。

到底要怎樣才能創造出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來呢？要怎樣就能使自己的勞作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多了解祖國，多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情況，他們的苦難和他們的要求——多了解中國的昨日和今日。且舉一個例子說明此意。二十年光景以前，有些研究過農業的洋學生，回到家來，很熱心的提倡新法，如何滅除田裏的寄蟲，如何改良和桑種棉，如何改良青蠶等等，把洋學堂裏所教給他們的套套都搬回來，轉贈給家鄉的農民農婦們了。起初是讚；因為裏面夾了許多新名詞，鄉下人聽了莫明其妙，就信之以為真，實驗給他們看。但結果慘得很，不但大家不願再採用他們的新法，就是他們的實驗地竟是一敗塗地，讓大家笑他們是書呆子。原來他們從洋學堂裏學來的只是一套洋作風，洋氣派，故不受老百姓歡迎。就是說，中國農村，其經濟情形，技術條件，文化水準，生活習慣等等，都和先進國家的農村不能相比，因而外國可以行得通，很有成效的辦法，搬到中國來就不一定行得通。要怎樣才能行得通呢？首先要掌握住關於農業生產的科學方法的實質與精神，再來具體研究一下中國農村經濟能力，技術條件，農民們的文化水準，風俗習慣，然後把人家所用的方法加以修改，修改到適合於那些具體條件，實際情形而後止，這樣，你的辦法就可慢慢的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就可以形成一種中國作風，中國氣派。

動也好，改進生產方法也好，如果你所說的，所做的，能够切中老百姓的生活內容，適合於他們的生括條件（經濟，技術，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就將為他們所喜聞樂見，就是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否則就是洋作風，洋氣派和老百姓格格不相入。單就文藝創作來講，要創造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作家就只有親自跑到農村或工廠，或兵營裏面去，去和老百姓一道生活，不是為了去搜集題材，而是為了去把自己變成他們中的一份子，這樣來了解你的祖國是在怎樣呼吸着，了解你祖國的兒女們是在怎樣生活着，讓你的筆尖蘸在這個呼吸裏，生活裏，而水到渠成地把它們寫出來。這樣寫出來的東西，就是老百姓他們自己脈搏的跳動，他們聽了見了，自然會感覺得親切有味而喜而樂，你的作風，你的氣派，自然就是中國的了。

由此可見，提倡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並不是要求作者從外國（或從書本上）學來的東西通通收拾起或者至少暫時收拾起，去完全全地跟在老百姓的後頭跑。只是要求作者把學來的現成方案，再針對着自己面前的實際情形來加以改進以至完全改換過一道，以求適切可行。所以這不但不是就此就

向大眾學習

香汀

不要吸收外來的東西，而且這正是最高效，最實際，最實際地，吸收外來東西的一種辦法。雖然是把這種提倡曲解成排外的，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類的說法的話，那真是牛頭不對馬嘴了。

為了加強創造這種作風，這種氣派的能力，把中國已有的權威作品研究一番，研究出它們所以為老百姓那樣的喜聞樂見之要點何在，吸取這要點到自己的作法之中來，難道不也是許可而且是必要的嗎？

當然有此必要。這就是所謂接受遺產的問題。但請注意，這和吸收外來的優良傳統也正有相同之點，就是只能成爲一種幫助，一種借鏡，切忌把這了解成爲模仿古人，抄襲成法。模仿古人和模仿外人是同樣要不得的。抄襲成法，不管是抄自外人是抄自前人，都是對於創造無補，抑且有害的。說到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時，如果不敢先確定這還是正有待於自己來創造的東西，而祇敢於就問題作風氣派到底有些怎樣的內容，且想到前人的權威作品中去找尋一些特點來作爲這內容的具體說明，這就很容易把自己束縛在前人的成規上去，以至流入傾向於復古的歧途。這裏的危險性相當大，必須深加警惕。

下幾點——

關於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我所要說的，有以

（一）什麼是中国作風，中國氣派？這很難下一個精確的，具體的定義。大體說，作風和氣派

都是一種「表現」。這種「表現」不單是內容的「表現」，也不單是形式的「表現」，而是內容和形

作風所表現的主要是動的方面，例如一個人的言動，氣派所表現的主要是靜的方面，例如一個人的風度。因此，我們可以勉強給它們下這樣的定義，即作風是做法，氣派是態度；從而中國作風就是中國人的做法，中國氣派就是中國人的態度。

(二) 什麼是中國人的做法，中國人的態度？這也不是一言半語所能說盡的。但一直到今天為止，由於主觀的，客觀的各種條件的不同，致中國人還保持着和別國人不同的特點，這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凡是中國人就應該而且也必然有他和其他國人不同的自己的做法和態度。不過中國人的做法和態度，有壞的，有好的，有舊的，有新的；有過時的，有現代的，有無益的，有有用的；有少數人的，有大眾的。我們所說的中國人的做法和態度，當然是指好的，新的，現代的，有用的，大眾的，而不是指壞的，舊的，過時的，無益的，少數人的。裏小脚，抽大煙也會普遍流行於中國，難道我們在還能把它當做中國人做法和態度嗎？固然，舊的東西不一定是壞的東西，有些舊的做法和態度，一直到現在，還可以做為中國人的做法和態度。但這是因為它是好的，有用的乃至大眾的，而不是因為它是舊的。我們決不可把一切舊的東西，都拿來代表中國人的做法和態度。

(三) 爲什麼要強調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呢？是不是因爲中國的東西都是好的，外國的東西都是壞的；要保存中國的一切東西，而排斥外國的一切東西呢？決不是。外國的東西有好的，也有壞的。我們固要排斥它的壞的部分，但也要吸收它的好部分。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那是更不得的態度。事實上，外國的東西已經有許多和中國自己的東西，融化在一起，變成中國自己的東西一部分了；

另一方面，中國的東西也或多或少爲外國所吸收。要在中國和外國之間，無條件地劃一道絕對不可逾越的鴻溝，是不可能的。現在，所以要強調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是因爲第一，有些人無條件地崇拜外國，主張什麼「全盤西化」，連那些對中國不僅無用，而且有害的東西也要搬過來，這實在不能不加糾正；第二，有些人雖然不是把外國的壞的東西而是把它的好東西，例如馬克思主義搬到中國來，但不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去運用它，而是主觀地，公式地，排演一番，結果有害無益這也是必須加以糾正的；第三，最主要的老德管中國已經吸收了許多外國的東西，中國人在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上，也受了外國的不少影響；但大多數人依然還習慣於中國的作風和氣派。他們自己的作風和氣派是中國的；他們願意別人的作風和氣派也是中國的。如果以大多數中國人爲對象而從事政治運動或文化運動的人的作風和氣派不是中國的，則運動必然失敗。過去，的確有許多人犯了這毛病，這更不能不加以糾正。總之一句話，強調中國作

文化上的民族化這個大題目，我想不是一篇短文可以說清楚的。比如我們可就內容說，那首先最要的就是現代社會生活的實際的問題，不論是以前的民族形式或現在的民族化問題，既不是復古，也不是崇外，而是辛勤地求去，去理解，去呼吸。那現代社會中生活的內容，然後才可以決定在其他一切方面的選擇（或者說拋棄）。這一點，是在今

風，中國氣派的主要目的，不在說明中國作風和氣派的本身具有什麼優點，而在指出它在中國建設新運動，文化運動的實踐上，有着什麼效用。爲此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中，在所提出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上，加了一層新的解釋，爲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是一層新解釋，其用意當在此。因此，我們一談到這問題，就應該立刻聯想到實踐和效用，不應該只是談交際字，作學究式的研究。

(四) 怎樣才算是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呢？這主要是向大眾學習，拿實際說明，決不是向書本上所找到的，只從法語中所能發現的。因爲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是可以在實際生活中發現的，他自自己的「表現」是中國的作風和氣派，他自自己的「表現」也是中國的作風和氣派，所以必須向大眾學習，你才能夠真正做到中國作風和氣派，也必須經過他接受，你才算是真正做到中國作風和氣派，不然的話，縱使你弄出一篇「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論」，說來頭頭是道，實際仍不外是隨筆敷衍而已。

中國的民族性：實際和出世 錯耳

天中國思想界急欲尋求變化的當兒必須抓緊的。所以，今天提出的民族化，就在這一點上。也比較以前民族形式問題提出得前進一步。這是一個理論問題和實踐的問題，而不只是一個理論原則的問題。——這理論原則我們在民族形式問題討論中早已已經談了的。

其次，才可以說到民族文化遺產以至國粹文化

遺產的接受問題。這也都是民族化的問題。再就形式方面說，則問題也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新形式的創造和實踐的問題，基本上，今天的舊文化和新文化的形式是可以作為這種新形式的根據的。另一方面，這也還是一個舊形式的把握和運用的問題，舊形式的運用，并不等於新形式的創造。新形式和舊形式是相對的對立的，（但却不是二元的，正像哥倫布和弟弟不是二元的一樣）這反映着中國革命的深廣度和人民文化水準的相對的矛盾，對着這個矛盾，我們必須有一套不太天真的具體辦法。既不是不要提高，也不是不要普及，而是兩者兼與，普及可以我們的提高工作擴大影響，提高可使我們普及工作加強深度，這是矛盾之中的不矛盾。

我們又可談到民族性問題，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的歷史，辯證唯物論的創始者馬克思提到「亞細亞社會」一列作社會發展史中的一個階段，不論對列各方史家的解釋都還不一致，但它反映在我們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中，我們自然會有種種獨特的人文風俗習慣，這就是所謂「民族性」了。我們的民族精神中無疑的有許多可寶貴的東西，這應該學習；也有許多要不得的東西，我們應該批判之。但怎樣批判呢？這些都是生於我們民族生活環境。像論語中，手和腳不可分，血和氣不可分，胃和脾不可分，並不是像屠戶肉甚至生理實驗室中標本解剖那樣簡單的，我們一定要先了解，了解其週詳，了解其全而圖之，然後才能決定怎樣去批判，批判什麼還是比較簡單的問題。怎樣的去批判，這當然又是一個實踐和不斷試驗的過程，所以第一，這是個樹木樁人大計，第二，要識這樁事，沒有一眼向下一，沒有一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決然是不行的。

以上是就文化上的民族化提綱上所想到的涉及

範圍，并未提具體辦法。以下我想談關於民族性的兩個比較具體的問題，第一個是實際，第二個是出世。

很多人說中國民族是很講究實際的民族，這說法我可以同意。我讀古書很少，讀的大都是些「稗官野史」，假使說它也可以反映時代的風貌的話，那麼從此也可以看出中國人講究實際的精神。紅樓夢固不消說，完全是所謂「呢呢兒女語」；想怨和爾汝」的家常瑣事。就是儒林外史，照道理，既然是「儒」總會有些高明的理想吧，然而像馬純上——馬二先生這般嚴肅的人物，所講的孔子之道，也不過是做官和立言，實在是復舊的。又像天長杜慎卿，少卿兄弟這般的名士，也不過只是在「雅」字上做了一點工夫，「雅」其實就是呆，所以也是名士這般虛實。至於水滸傳，梁山泊的「替天行道」的那個「道」字究竟是什麼，也沒有寫出一筆精闢透亮的見解來。其他西廂記，三國誌，三言兩拍，才子書之類也都是如此。在實際生活中，現代知識份子總說是有他的理想，並且實際也存在着，一種理想，但這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知識份子，而且有一些人對於理想與實際始終也是糊里糊塗的，沒有實際的理想，當然不是真正的理想。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少看到像維新，廢金金那樣激奮高思維的人物。我忽論語而風之類文風之所以盛行，緣因怕也在於對實際生活瑣碎的描寫和對日常生活

的幽怨的運用上。

對於這種民族精神我們應該怎樣辦呢？我說應該學習。我們今天有太多的做假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還未充分消化的結果。做假主義就是不實際的，我們得學習這種執著於實際的精神來豐富我們理論的血肉，來改變做假主義。搞創作的人要多多注意生活，多多注意人物心理，多多注意那些各種複雜的具體情節，不要弄一套思想——題材——主題的數學公式。搞文化的人要注意思想和人物的發展的完全詳細的考察，不要寫歷史——文化——歷史的公式。搞文藝批評的人要多多懂得生活及心理關係，不要攪些叫做「世界觀」的拙劣演繹論的公式。

但實際不是麻木，自然也不是經驗，對於中國民族性中的實際精神正也要看有在肯定中來否定的努力。把實際上昇到理論是必要的，把偏僻的實際小生活圈子中的大提醒起來，看一看廣大的世界，更不要在忘記廣大的世界，這也是完全必要的。

和實際精神對比得很有趣的，是「出世」精神。魏晉之人好游談，大家都知道，在「稗官野史」中也有這樣的一種傳統，聊齋，世說新語，都是談鬼說狐，清代的筆記小說大半也是談鬼說狐，現在是當年的癡呆幻想和荒誕神話的殘留與結合的產物，所以內容也很虛幻，中國人敬祖宗，有鬼神，但決不是他到有什麼大道理，無非也是一種出於虛幻的玄想，是爲了出世，而不是爲了入世，就是爲了「超脫」和逃避現實，就是空想。

玄想和理想不同。西洋宗教具有理想性質，而托爾斯泰是俄國人，他厚宗教氣質的代表，他們對於世界都自有一種比較完備和比較系統的看法，這些都可說是理想。但中國人信佛，有幾個人——和尚也在內——只懂得佛經的道理的？近代西洋宗教未傳來以前，中國宗教是由一類盲目愚昧的精神所有意無意支配着的，便是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國，用西洋的方法傳道，而信徒們的理解不也是非常的可憐麼？

對於這和出世的玄想應該怎樣辦呢？這是不合乎現代精神的，當然要反對。不過，之其中究竟還

是

有一些可資採錄的東西，而且要打倒也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實際和出世是不矛盾的，就像和尚對老婆也並不怎樣避世一樣。正因為中國人實際精神的被壓迫成了死板的教條主義，在路走不通的時候就不下有絕非尋常之舉。例如太平天國，他一方面確有與比較進步的意識，但總免不了經驗化的限制，一方面又因天父天兄之類就戴了單程目的迷信觀念。而反過來，這迷信觀念更加強了經驗主義的氣勢。

但在這出世的思想之中我們仍能看得到一些實際生活的痕跡，這不但是很有價值的。我以為這正是應該發揚的，從這方面看這遺產會有一些可能。關於這點，蕭軍已不容許多說（已超過二千多字了），引聯篇作消渴的一首詩來就結束吧：

「天下第一……谷，三盞清茶，喝了一盞」

怎樣接受中國的文化遺產

卓 芬

今天中國所需要的文化，不是披著西洋外衣裹著封建禮教的舊文化，而是要能適合今天環境所要求的，即是為抗戰建國服務的文化，主要的是為民族利益而奮鬥到底，有民主精神，主張客觀真理的科學思想，在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

在這個標準底下我們要怎樣來接受民族文化呢？這要用批判的眼光來整理中國文化遺產，中國文化遺產的來源有二，其一來自士大夫，其一來自民間，前者的傳統較久，中國封建時代的士大夫，有各種典型的人物，簡單可以分為三種不同的典型：一、朝是獻媚上層，酷刑民衆，在學術思想上，這

個頭，就猶如神祕主義說，說罷。
忙裏偷閒，忙裏偷閒，財源在上頭緣由：這我從這說一語，訴訴窮人比裏愁。

蕭軍！蕭軍！你是個什麼意思？我感得你這陣，怎麼再不肯和我見面？
你這陣沈沈的，端想看你俊俊的，撈着你看親親的，撈不着你着着這的，望着你的影兒般般的，想殺我了量量的，盼殺我了情情的，好怪哥恨恨的，怨殺我了可是真真的。
……（從略）

這是蕭氏「窮」做兒頭三兩中的稿紙的三三五五，這些個詞給我的印象使我常不自覺的想起了俄國現實主義的諷刺作家薩爾蒂柯夫，雖然這兩個人之間距離是那麼遠，但在某些風格方面不是相近似麼？

德觀念上，發揮其反動荒謬的見解，藉以鞏固封建制度，另一種士大夫是為自身名利打算，為了富貴榮華，他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賣國賣身在所不惜，歷史上的項蛋如宋的秦檜，明朝的張璠以至今天的汪精衛，就是極端的例子，這兩種反動思想，都是奴隸性的，都是我們應加以摒棄的，我們所應繼承的士大夫是那一隻具有優良的民族文化傳統的人物，他們的優點有：

一、高尚的民族氣節。中國歷史每當民族危亡的時候，總有一些忠貞不二的士大夫出來担任巨額，如宋代的岳飛，文天祥，如明末的史可法，瞿式

耕，黃道周等，他們為民族的獨立，百折不撓的在緊關奮鬥，到了最後又犧牲到他們的性命，這是中國民族的靈魂，這樣的民族氣節是我們今天所應要學習的。

二、中國士大夫的另一優良傳統是「學以致用」，即輕視空言立說而努力於經世致用，這種經世致用的有許多值得我們研究和採用的，政治思想上有孟子的民權論，黃梨洲的民主思想，譚嗣同的民治思想。在經濟政策上，如管仲的治齊。王安石的辦法，張民正的精理賦稅。在哲學方面有王充的無鬼神和自然說。顧炎武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都是值得我們珍視的，這都是他們的正確思想向現實的優良傳統。我們並不是生吞活剝的採用他們的恩想，但應作為建立新文化的資料。在文學上有一些士大夫對專制政治的不滿，對民間疾苦的同情，通過了藝術手腕喊出愛國愛民的聲音，如屈原的離騷，杜甫，白居易的詩，元稹的什制，明清間的平回小說雖則借士大夫的手筆，但熱情奔放，其藝術價值也是很大的。一句話說像這樣的學術思想文藝作品，誰能說不是我們今天所應發揚光大的呢？

至於民間文化的優良傳統，主要是在文藝方面，如各種歌謠，彈詞，小調等都是極其通俗的，都是用人民的語言，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情感，素樸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的東西。它沒有鋪張揚厲，沒有矯揉造作。這種形式仍為我們今天所採用的東西。我們要接受民族文化的遺產，決不是無原則的不加選擇的全盤接受，就是說要將士大夫腐敗的東西與優秀的東西區別出來，應該將優秀的士大夫文化與生動通俗的民間文化結合起來。至於使兩者結合的工作，不是要大家去鑽古籍，鑽古典，而是要一般可能進行研究的同志分門別類，進行研究，使在神如燭海的中國文化中，煥發出精華來。

民族化斷想

東君

「一樓『民族化』，就想到『遺毒』，好像我們這
個民族只有過去，（啊，黃金盛世的過去呀！）而
現在的一切，並非民族的似的。這或者是因為過去
的東西有積可稽，有憑可考，容易下筆着手，而實
際的事物，無端可尋，無柄可把，難以理出頭緒的
緣故吧。然而，照我想來，最民族的，莫如我們這
些老百姓了。就講『遺毒』吧，民族的成員總算是
民族遺留下來的東西中最寶貴的了，怎麼好不談？」

一講起「文化」，就推崇「固有」，好像人類
中是最好的大腦，最商明的手，都叫我們祖先長絕
了，別人在生活和勞動中，再也想不出造不出更好
的東西來。既然一切「舊已有之」，我們最關緊要
的任務就在他保存發揚起來。因此，所謂民族文
化者，就不是創新，而是復古了。於是祖述孔孟，
追仿程朱，引經據典，泥泥拌拌，一切都沾上一股
木乃伊氣。

歷史上的優秀傳統的可貴，在於它可以幫助我
們創新的文化，而決不在於用它來代替創新的文
化。

政治上的民族化，是要使革命更其中國的，而
所以如此，為的是要使中國更其革命的。文化上的
民族化，是要使科學更其中國的，而所以如此，為
的是要使中國更其科學的。前者是民主。後者就

是現代化。

革命所以更其中國的，是要把一切人民都動
員到抗戰中來，讓每一個人喊出他們的權利，要求
和希望。揭露出最細微的矛盾，在抗戰建國的過程
中，由更多的人民來加以調正和解決。科學所以更
更其中國的，是要把幾千年來積累下來種種思想上
的泥垢（從士大夫的天命觀到農夫們的巫術迷信）
，都能加以澈底的清理。果能如此，那中國就更能
民主，更現代化。

很難劃定出普遍的民族化範圍來，說我們一般
地要怎樣怎樣才是民族化。正如很難規定岷水、嘉
陵江、黔江、漢水，湘水，贛江、淮水都怎樣流才
可以匯合成長江一樣。

確實的民族化道路，是在各個認真從事的事業
上。一個地方革命者，認真地法因結更多的羣衆到
抗戰中來，一個公務員認真地法更有效而順利地辦
成一件公務，一個詩人認真地法寫成一首更爲老百
姓感動的詩，一個演員認真地法創造一個叫老百姓
會心動情的姿態手勢。……每個勤着的人都找他
最能動，動得最順利的道路，於是我們就有了民族
化。

民族化的作（實踐）如此，民族化的說（理論）

「重要如此。『空談無補於實際』，下定義，裁註
陶，尤其可笑。只有具體地從自己所最熟悉的一件
工作，最有研究的一門學問想進去，說出來，不斷
嘗試和改正，才會感到民族化的面。」

如果不要新的東西代替舊的，如果不要想外
來的化做自己的，就無所謂民族化。爲什麼呢？原
來的東西本來就是最民族化的。天足是新的也是
跟着歐美文明一同來的，然而你不能說他比小脚更
不民族化——。附說小脚原來是最民族化的。

由此可見，民族化者，實在是在儘量推動和加強
民族進步的因素更進步的意思。——這並不是定義
，只是辨明最容易爲好人誤會壞人利用的一面罷了
。其目的在防止以退爲進——把倒退說成最徹底的
民族化。

放脚，雖然失去了那條漢民族「特有的」，「固
有的」其不可磨滅的綫索，然而它是民族化。
孝道，雖然保存了那條漢民族「特有的」，「
固有的」其行爲百行先的道德律，然而它不是民族
化。

前者是民族化，因爲它是民族的「進化」，
後者非民族化，因爲它是民族的「腐化」。
然而，放了脚穿高跟鞋，却顯然不是民族化。

這不只是因爲它是外來的，主要是因爲它不適合現代中國婦女（特別是勞動婦女）生活的要求，甚至妨礙婦女的行動和發育。

簡短，絕對個人主義到像同人那樣連媽媽也不管，也不是民族化。這不只是因爲那是外來的，主要是因爲我們所給與的是人和人之間互相關切愛護，而不是在人和人之間打壓隔絕。

原來，民族化與否可以用理性來根據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來判斷的。

能把這些問題解答得最好的，就是最成功的民族化。

民族化的實行早於民族化的口號。

方頭淺臉，平底帶綽的布鞋是民族化。大多數天足的婦女早已經穿着它了。

既能獨立建家，又能奉養父母是民族化。大多數勞動人民早已經實行着他了。

幼以及人之幼」。因爲那是人和人當中較合理的關係。

「民族化」普遍而且澈底地實現了的日子，也就有了「國際化」。

民族化是整風的發展。

消極的克己明理的態度與批評檢討後所獲得的成功，一定是積極的隨時隨地適應時合上的不斷的創造。

既然放大了腳，又不肯穿高跟鞋，那麼究竟穿什麼鞋好呢？

既然打毀了孝道，又不肯行禮敬個人主義，那麼究竟怎樣對待父母宗族呢？

民族化問題討論特輯

編者按：馬列主義中國化，民族形式，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等一系列的問題提出已經很久，但始終沒有經過很好的討論，爲了彌補這一個缺點，我們發動了這一次筆談，讓對於這一個問題有興趣或有研究的朋友各抒己見。現在，這一個問題還在討論當中，我們希望我們這一種能引起各方面熱烈的討論，使得這一個問題的討論和研究能廣泛而深入，過早的結論倒不是我們所求的。因爲接到的稿件太多，決定分爲兩期發表；我們希望讀者們就是在討論時結束了以後還能繼續的給我們關於這一個問題的稿件；只要有具體內容的，本刊無不樂於發表。

紅棉屋札存 (續完)

林柏

四 不可破句讀書

明末陳建著了一部學語通辨(註)，專門駁斥王陽明所編的「朱子晚年定論」故意顛倒朱子文章的年代，證明朱陸(象山)的哲學見解始終不同，並指出陸王(陽明)之學，都淵源於禪學的。陸王的哲學包含有禪學要素確是事實，我們沒有爭道統的興趣，可以不去管它。至於陸王哲學乃至禪宗哲學是否能夠站得住，這裏也不談。我們覺得有趣的，是其續編上所引朱子語類如次的一則：

「朱子曰：汪端明少從學於焦提先生。汪既達，時從宗杲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宗杲。宗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

朱子答孫敬甫書中有一段關於宗杲的說話：「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某老(按即宗杲)與張侍郎(按即張子韶)名九成，號無垢」書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隱尋幽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自來，難以自託於儒者。……(朱子文集)上引宗杲向焦提所提示(「舉」)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話，原出在周易繫辭傳上。大概因為「接引後來學者」的心切吧，所以使見焦提後，便用了那「改頭換面」的這一套，不覺它的上

下文說得什麼，甚且刪去「感而遂通」的下半句「天下之故」兩個字，結果成了那牢記着章句的焦老先生的釘子——「和尚不可破句讀書！」——弄得本教而散。

其實，即就「寂然不動」這兩句來說，「破句讀書」也不自宗杲始，周濂溪早就說過：「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通書聖第四)的話。不過因周子為道學先進，朱子不曾給與打破，有幸有不幸吧了。

為什麼要截去半句呢？自然為的是便於拿去形容所謂「本體」、「真如」之類。而且，還得「斷章取義」地解釋。如果和上下文連在一起，仍是講不通的。繫辭上這一節的原文是：

「……易有聖人之道四：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這一節分明是在讚美聖人易道的神妙，說明君子用易的四種方法。自「易，无思也」至「其孰能與於此」這一小段，正是詳說「以下筮者尚其占」那一句，說卜筮之所以神妙。假如我們有機會到城隍廟之類的寶卦攤子上去，還可以從賣卦者的口裏聽到類似這樣的談話，那裏有一些兒「本體」的氣味？這不是我們信口談論，請聽聽宋人楊誠齋的解釋吧。他在誠齋易傳裏說：

「……易道之神如此，君子將推而用之。何從而用之？其道有四：內器用之於一身，吾之一言一動，非尊夫易之辭與變不可也；外器用之於萬事，吾之一器一機，非尊夫易之數與占不可也。……尊之之謂也。……吾將決一疑乎？不敢以私意決也，必卜筮於易之占。蓋吾有思也，有思則惑；有為也，有為則妄。至於易之道，縱於天地之間，而著於聖人之書，无思无為，而寂然不動，然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理固存也。吾將以吾之疑，質(按質問也)易之占，有質則惑，有惑則應，天下萬事皆凶之故，雖然而應，渙然而通，如指諸掌，如啓鑰，无驚懼之憂，无頃刻之疑；孰為此者，易之神也。故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以下筮者尚其占」也。」(商務本，頁二二六—二二七)

周易這部書，本來是談卜筮的道理和方法的，自然免不了有些迷信的神秘的談話，可供玄學先生們的影射和附會。而繫辭傳等所謂「十翼」又相傳是孔子的作品，更可以利用聖人的大帽子去掩住人們的嘴巴和眼睛。所以，不肖宗杲之流，要利用它去作「改頭換面」的工具，就是周程等道學先生們也想像借它來做「攻乎異端」的武器。這種謬妄的作風遂流傳了數百年。直到現在，我們還可以在熊先生的新唯理論中看到它的「揚貝」。真是可惜，我們並不反對吸收各派的見解，消化它，綜合

它，用來構成自己的哲學體系；我們反對的是「破句讀書」，歪曲附會，強使古人就己的接受遺產方法，因為這樣做，不但重誣古人，而且徒使思想系統混亂起來，反而成爲學術進步的障礙。何苦給學術史上多留一個話柄呢。

就拿繫辭傳本身來說，自歐陽修的「易童子問」揭發「……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紛紜，亦非一人之言也」以來，經濟及近人郭頤諸先生的考證，此說已成定案。如果愛好玄學的先士們肯虛心把繫辭傳細細地研究一番，一定會發見許多說話，不敢引爲同調的。比方說：如「易與天地準，故能彌論天地之道」；如「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之類的謬論的見解，不測和他們的玄學觀點立於正反的地位嗎？從此可見玄學的迷霧，不知掩蓋了學術上多少好遺產。而「不可破句讀書」這句話，確是提供了做學問的一個指南針，它可以使我們不至自己陷入泥淖之中，同時也可以使我們擺脫妄人所散佈的煙霧。

註：繫辭通辨這部書，着手於嘉慶二十一年，完成於嘉慶二十七年，（即西曆一五四二至一五四八年），共費七年工夫，雖免不了有些門戶之見，但對於隨王學派和禪宗關係的資料，蒐集頗富，可供研究宋明道學史者的參攷。

五 太極原義不指本體

周濂溪作太極圖說，替宋明道學家建立了宇宙論的輪廓。其「無極而太極」一語，在宋時曾一

度引起了朱陸間劇烈的論爭，但後來却成爲玄學家談本體論時所愛用的術語，最近且以另一姿態出現於「新理學」，足足影響了中國哲學八百多年。所謂「無極」，自是和道家有密切的關係；而所謂「太極」，則分明採自易繫辭傳「易有太極」章的用語。這也是「斷章取義」不啻上下文的用法的一個透例。因爲繫辭傳這一章，本來說的是「揲書求卦」的筮法，既不是敘述「畫卦」的過程，更不是說明宇宙發生的道理。周子雖說末尾雖大略說着「太極易也，斯其至矣」，可是這一章中所用的「太極」的意義，却和他的用法，毫不相干，豈不奇怪！

偶讀清初胡祖明（渭）的「易圖明辨」，見到他在二百三十餘年前，對於這個問題——「易有太極」竟爲揲書求卦說——已有過精確透澈的論證，「何快如之」！現在先引一節繫辭傳原文，然後抄易圖明辨幾段文字，以代說明。繫辭傳云：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胡氏引「仲氏易」：「蕭山毛錫齡，善言易，早卒。其季奇齡述之爲仲氏易。」曰：

「此爲揲書三致意也。……舊以太極、兩儀指天地，則於「易有太極」，「易有四象」，「易有八卦」，「易有九卦」，「易有六十四卦」，並無由一而三而四之法。……揲書有合：一、謂是伏義畫卦時，則畫卦是作卦，不是生卦。繫辭凡言「生」，如生變化，生吉凶，生情儀，生利害，皆是畫卦，非畫卦也。二、伏義畫卦，是由乾而坤，而六子，（按指震、巽、坎、離、兌六卦首。）而

因爲以重六十四卦，……並無由一而三而四之法。三、太極既中而不分之氣，（按即上文「未揲之先，合五十之數。聚而不分，有大中之道

焉」的意思。）而爲圖爲說，聚散不決，此必不可爲讀者；四、四象從來無解；五、且後文「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與下文「所以告」、「所以斷」同。若指畫卦首，則陰、陽、老、少、但畫時取畫之象，豈可以示世，告世，斷吉凶乎？」

仲氏易這段說話，最堅強處在於「畫卦」和「筮卦」截然分開，認定「畫卦」作卦，不是生卦，從繫辭傳中找到「凡言生，皆指畫卦，非畫卦」的內證，證明「易有太極」云云與畫卦無關；再從文從上推證「所以示」和「所以告」、「所以斷」何例，因而證明畫卦時所取畫之象，不可以示世、告世和斷吉凶，遂斷定「易有太極」一語，僅指畫卦三致意。至於他怎樣以揲書求卦，與合本來的具體解釋，大體和季剛主的見解一樣，……胡氏說得頗滿，故從略。其大是胡氏引「易圖明辨」（據）與毛太史（奇齡）說易書，略云：

「易有太極」一語，……，反覆思之，不解。以兩儀爲天地，……，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不解也。四坤，陰陽也，亦豈能生天地乎？……，二不解也。四象爲木火金水等說，……，或乾坤之上，先以木火爲主宰，……，若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不啻有許多物件也；三不解也。繫辭曰：「天以氣立，而易行於其中」，則易者從乾坤六子而名者，……，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

李氏原書後半，主張太極和仲氏易相同。故胡氏附註云「仲氏易與主卦，後集卷之三見，故有此說。毛鷲其固合，答濂溪太極圖說。」可見真確所在，是常有「其難所見皆同」，即所謂「聞合」的一樣

自是引引何氏易看來，「易有太極」的「太極」，（這是宋明道學所謂「太極」的唯一的一家），還有統攝「本體」的氣息嗎？以下為胡氏自己的見解：

「四象，余舊主東坡漢上（宋震有「漢上易傳」）之說，乾坤為老陽老陰，三男三女（按即六子）為少陽少陰。以四象即八卦，八卦即六十四卦也。歲庚辰，客京師，因金素公得交於李君（剛主）晨夕過從，聞以此說說正。李君曰：「八卦原該六十四卦，但經明云四象生八卦，今乃以四象即八卦，是八卦生八卦矣，似不通也。」因出訊易并仲氏易以示余。余參酌其說而為之。謹按：（繫辭傳）「天地二」至「存乎德行」四章，大抵言揲者求卦之事。此節上文曰：「蓍之德圓而神」，而繼之曰：「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是卦爻即揲者之所得，非易書已然之畫也。故又曰「神以知來」，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皆指蓍言也。故唐一行以三變皆謂為太陽，三變皆柔為太陰。宋于謙此節，亦兼主揲者。易之解良是。但以分而為二為四，揲之以四為四象，則其義猶未愜當。蓋分而為二，不過分四十九策為左右，即不合一為太極，其將不可分乎？安見此兩為一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過以左右手四四而數我策，即不分而為二，其將不可數乎？安見此四為兩之所生乎？且太極，形而上者也，兩儀、四象、八卦，皆形而下者也。八卦雖然成列，則兩儀四象亦必顯然成列，當分二揲四時，正在手中揲運，其所謂天地、三才、四時、萬物者，特取譬之假象耳。

若夫兩儀四象，則參伍錯雜之餘，變通而成文者也。四營（按四營指「分二」掛「揲四」）「歸奇」也，均見繫辭。未畢，格中無奇偶之數，三變未終，版上無老少之爻，又安見為兩儀四象哉？展轉尋繹，終未豁然。竊思所謂太極者，一而已矣，命筮之初，奇偶未形，即太極。迨夫四發而成易，合掛扚之策，置之於格，或五、或四，則為奇，或九、或八，則為偶；是謂「太極生兩儀」。至於三變而成爻，畫之於版，三奇為日，曰老陽，三偶為x，曰老陰，一奇二偶為一，曰少陽，一偶二奇為一，曰少陰；是謂「兩儀生四象」。至於九變而為三畫之小成，十八變而得二體之貞悔；是謂「四象生八卦」。由是而各占其所值之卦爻，是謂「八卦定吉凶」。由是吉者趨而凶者避，是謂「吉凶與大業」。故下文結言之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脈絡分明，雖皆融澈，其為揲者之序何疑？總之，四象二字，若無定說。今從一行之剛柔太少，而更推得其所由然，始知「四象」與單稱「象」者不同：單稱象者，即易書已然之畫，「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四象」則著策過揲之數，爻所用之九六，及不用之七八是也。故下文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章中兩言四象，朱子以前四象為聖人畫卦自然之次第，以後四象為揲者所得陰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且同在一章之中，豈有二解哉？太極兩儀四象之遞生，其為揲者之序，益洞然而無疑矣。解成，以復於李君。李君答曰：「拙解成，然清夜思之，尚未自信，以舍一分二揲四相連之

事，非相生之物也。今得妙解豁然，真是相生之序矣，真是生生之易矣。何快如之！」（上引均見易圖明辨卷一）

六 「斷章取義」與「還而體會」

會

一提起「斷章取義」，就聯想到賦詩。大概「斷章取義」的作風是源於賦詩吧。胡適在傳來，可以看到許多關於賦詩的記載。說得有聲有色的多半是胡適與會中「賦詩見志」的故事，像「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隱三年傳）之類的詩本事，却不多。這種宴會中的賦詩，實例是各人就現成的詩中找一首合適的叫樂工唱，用來表達自己對於對方的情意。只要與當前的環境調和，與本人的身分恰合，詩中的辭句有足以表達自己意思，就行；做詩的人的真意怎樣，可以不管的。所以，「襄裝」雖是一首情詩，但于太叔可以在公儀儲宜子的席上，用它來表示他願意親習，韓宣子也覺得很為滿意。（昭十六年傳）這種風氣發展開來，就請求、許納、說調等等，什麼都可以由賦詩來表示。盧蒲葵討了同姓要人魯舍的女兒做太太，有人問他為什麼不「聘（禮）宗」，他却老着脸皮答道：「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襄二十八年傳）——「斷章取義」和賦詩就有這樣的淵源。

賦詩見志，本來是在用詩。詩對於他們，不過像一句成語，一隻格言，只要說來動聽，可以達到目的，詩人的本意原不在計慮之中。「斷章取義」，似乎還無傷大雅。但若用來說詩，就要不得了。說詩，為的是闡發詩人的真意；讀詩，為的是要與名家學習，不明白詩人的意志情感，就無從學起。雖然詩人的真意往往不容易得到，但解詩的人總不能不細心體會，有心也厚，以期不至曲解詩人。所以，孟子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以意逆志」就是「細心體會」。

可是有人却主張以「斷章取義」為讀詩的方法。明鍾惺的「詩論」就說過：「詩，活物也。游以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不必有當於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為物，不能不如此也。何以明之？讀孔子及弟子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異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者乎？夫詩，取斷章也。斷之於彼，而無損於此。說詩者盈天下，屢變屢遷而詩不知，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為詩自如也，此時之所以為經也。」（引文「詩」字都指詩經）……（見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一引）這是誤以用詩的一種方法於說詩。這樣做去，勢將全拿自己的意思隨便解釋別人的作品，結果必至於亂說一頓，而強古人（或者今人）以就已。自然也就不會虛心地從詩裏去了解詩人的真意志真情感了。這樣讀詩，怎能得益；可謂損人而不利己的了。

用「斷章取義」的眼光去讀詩說詩，固然要害了詩，而用着同樣的方法去引詩或其他文字，假借

它來做自己的論據，來駁點自己的學術，一定也要害了學術。一切混亂、詭妄、曲解、附會等毛病，都會從這裏發生出來。宋明以來，談道釋者每喜援用儒家言語，假借聲光以街機博，其實却害了學術，使人認不清古人的真正面目。門戶固不可死爭持，終系却必須弄清楚。所以，戴東原要駁斥彭允初不應該「援」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為心宗之大源；不應該「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為不得而分」之道；而認為「此非語言之虛空論也，宜還而體會」的。他說：

「『上天之載』二語，在詩承「駿命不易」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順而信之。』在『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聲臭以與民接也。」

又說：

「『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於天」為言。天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聞，（按古字「丕」「不」通用）「不」，大也。」文王之德之純」：其取義也主於不已，以見至誠無息之配天地。於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深遠也。譬君之於賢臣一再錫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歎其深遠，引之者豈不可曰此君之所以為君也？」（都見答彭進士書）

說了許多，似乎在翻舊賬，其實不然。請舉今例，以見彭進士的作風還活着，他的「斷章取義」的引

詩法，還在被運用着。例一：

「我國古詩有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這裏所謂天，不是宗教家所謂神或帝的意思；而是用為最極的真實之代語。命者，流行義。於穆者，深遠義。不已者，生滅滅生，恆相續起，無有斷絕也。此言真實的力用之流行，實是生滅相續，無有已止。所以曉其深遠也。」（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卷上，頁一〇四。按：據原作者用法：「真實」為「本體」的別名。）

例二：

「中庸」一書，孔氏之遺言也。其謂德性云。詩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喻者，微義。毛，輕微義。倫，迹也。上者，絕對義。上天，謂性體。載者，存義。此引詩言，以明性體沖微無形。若擬其輕微如毛乎，毛則猶有倫迹也。無可相擬。其實，性體不可觀其存，而實恆存。惟其存也無形。乃至聲臭俱泯焉。其可執之以為有物乎。夫無聲無臭，空寂極矣。而有存焉。則空者，空其有相之執身。非果空無也。涅槃如幻之云，何與此聲臭耶。」（按：據原作者用法，「性體」亦為「本體」之別名。這兩段文字的標點，都依原書。本段見「新唯識論」卷中，頁二四。）

療治這種「斷章取義」的老毛病，借用戴氏的話，是：「宜還而體會！」

三二、六、二八。

本期零售二元

內政部重發新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東川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要目

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宣言

希特勒的七月攻勢

于懷

大後方農村經濟之特質

和改善途徑

吳清遠

論中國民族的新文化的建立

沈友各

論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借刊）

三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目錄

時
勝利途中的嚴厲考驗
從敵議會看敵寇國內危機
加強責任，痛切反省
論保障佃農
重慶區行政會議

特載

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宣言

專論

希特勒的七月攻勢
大後方農村經濟之特質和改善途徑

(二) 民族化討論特輯

論中國民族的新文化的建立
論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創造新風氣
民族化雜談
民族化和接受文化遺產
從幾首歌謠來看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信箱

論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

(三〇九)
(三〇九)
(三一—)
(三一—)
(三二—)

(三一四)

于懷 (三一七)
華西園 (三二一)
沈友谷 (三二七)
遠庸 (三三〇)
谷谿 (三三四)
德君 (三三五)
黃磷 (三三七)
正文 (三三八)

編者 (三四〇)

群衆

第八卷 第十二期

三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

編譯者 群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各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每期零售 二元
六期 十一元
十二期 二十元
廿四期 三十八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加

勝利途中的嚴厲考驗

六月二十九日蘇聯紅軍機隊擊破「紅星報」發表了一篇題名「必須以一切努力爭取勝利」的社論，指出德國侵略者不可輕視的力量，絕大多數的敵軍還投擲在蘇聯戰場，隨時準備着新的冒險，因之他的結論是：「每天每天，公眾上說是最無敵大變化，但是變化是在任何時刻都可能發生時，鬥爭在繼續中，勝利將歸主這着最嚴厲的考驗」。在六月已趨過去，德寇這準備着新的冒險，而歐洲還祇有一條破線的時候，我們相信「蘇聯報」的結論不偏對本國人民，同時對全歐盟邦也還是「一切切實時宜而有實效的發言」。

爲着德先驅機心毒的網羅，利用時機，在一九四三年內使歐洲戰場基本的形勢，這已經是全世界有識人士公認的。同盟國當前的最急迫的問題。過去幾年希特勒曾修言「閃電」，最近更增修已經改變口吻，預言「持久戰」對德有利了，漢密「外訊報」指出「德國敵人的最大危險在於無限期的持久作戰」，這句話一方面固然可以解釋德寇後德的謊言，但是另一方面也何嘗不可以看出今後納粹政略中心之所指。德寇在歐戰和北非慘敗之後，主要目標是在拖延時日，以便於其增強防禦和準備新的攻勢而養精蓄銳，這已經不是明白的事實，而在今天，要使盟國進攻歐洲的時日遲延，這在「德寇報」的希特勒是敢於安放在離盟國國境遠一政略的攻勢上了。

據德國報，這是在德寇選擇北非戰場出來的「

種惡毒的指責，而在盟邦，我們也正不必諱言，內外外還存在着一些即使用小但也是足以延緩決定性軍事攻勢的弱點。六月三十日英首相邱吉爾對倫敦市民發表的演說，就直率地說及了這一些問題。英美兩國政策之協同與聯合一致，實爲世界前途之所繫，其重過任何任何其他因素，；如此兩大陣中這批陣，步人命運以外之歧途，則其所引起之悲慘混亂，將無窮盡」。當他堅定的申明了「事實上現在與吾人共同作戰之此一夫國，或現與吾人共同作戰之其他任何大小國家，吾人皆與之友好無間」，和熱烈地讚揚了中蘇兩大盟邦堅忍作戰的努力之後，他雖然有感，說：「然而現有使大不安之事實，使英美民主國家陷於失援，吾人如通力合作，則一切國家皆可歸入安全之海港，否則勢力分散，或將深地於難濟險境之中，長夜漫漫，終至覆亡」。我們相信，這些有感而發的話都是值得全同盟國家上下一致警惕戒慎的警言。

在二月間，敵國第八十一屆議會上，希特勒人講事日程的國內兩大問題：「一、增強攻力與國內團結」；「二、隨着月來盟國形勢對日不利的發展，獲得更加嚴重起來。」

從敵議會看敵寇國內危機

法西兩國的戰爭，是國結了全世界各國不同、人種不同、政制不同、信仰不同的全人類對希特勒的法西斯野獸的戰爭；在此，因爲我們是廣遠地團結起戰的集體，所以我們之間可能對各別問題有意見的衝突，也因爲我們是民主國家的集體，所以我們之間可能存有公開的徵詢與商討，因此，祇要不一步入命運的歧途，我們同盟國家之間、之內，對這些問題發生意見並不必須隱諱的事實，祇是，當前必須發揚的是勝利的是確無疑義的，敵人的力量尙可掙扎，而他們正等待着每一個可乘的隙隙來進行顛覆的時機！六月已過去了，歐洲還沒有第二個戰場。千萬歐洲被征服的人民正在黑暗中企望着東方開來的船隻，我們東方的四萬萬人民在加緊打擊，這聲中也正在揭助着西方的更光輝的勝利，「閃電」就是力量，這是顯而易見的金言，有利於團結的必須發揚，有裨於團結的必須發揚，在今天，全世界大其心願望的是無止境地強化這備力量，儘可能的發揚這備力量。

第一：斯大林格勒之役進行，北非之北非盟軍的大勝和擴大空軍攻勢，對於德寇後方工業之破壞，歐陸第三戰線進行將實現，太平洋上盟軍對日寇的攻擊加強，離滿洲本元帥被擊斃，阿圖島敵軍時

新華一月三日

部隊的被消滅，表現盟國實力轉強，日益發揮它的龐大的生產力的威力。盟國以其優勢全力對日大舉反攻的日子，也更加迫近了。日寇在其必死的命運前面，爲了苟延殘喘，便不得不力圖增強戰力，以求倖存。

第二：在上述對日不利形勢之下，日本人民甚至一部份統治階級，對戰爭前途的悲觀和恐懼不安，益形增長。這對日本共產黨及人民反戰團結，却是有利的條件。東條之所謂「國民步調紊亂」的危險益增加了。

第三：由於德寇在歐洲之危殆，同盟國間團結愈益增強，以中野正剛、江藤源九郎爲首的敵寇（革新派左翼），重新提出了犧牲日本援助德國，以對蘇開闢「東方第二條戰線」來回答盟國在歐第二條戰線的主張。但東條一派如果現在採納了「革新派左翼」的意見，爲最狡猾的盟友德寇火中取栗，則將失去其政治上的最大聯盟者——現狀維持派——的支持，甚至要引起東條的倒台。因此東條爲了維持自己的地位，必須平服這種主張，圖謀敵國統治階級內部的團結。

爲解決上述諸問題，東條於五月十五日召開了第八十二屆臨時議會。從從當日開議會的進程看來，這些問題表面上似乎獲得解決，實際上却暴露了問題仍然嚴重存在。

此次議會以「確立決戰體制」「整備企業」「增強戰力」爲中心議題，通過了有關「整備企業」「增產糧食」的法案，和六億二千萬元的追加預算，以及預算外國庫負擔有關整備企業的資金六十餘億。但其「整備企業」的辦法，是將整編下來的和平工業的設備，資金，勞力轉用於「超重點工業」，將其停工的機器百分之四十操作廢鐵使用，其增

產糧食的辦法，是大量徵用學生，職員，停業工人及一般國民的勞力強迫義務勞作，並停止今年秋天日本全國各道府縣地方議會及農村的選舉，以免就誤農明影響收穫。這裏暴露了敵寇物資與勞力窮乏的程度，再給合其他關於敵國增產動員的消息，看這次動員可謂已達到極點。學生可以停課，商店可以閉門，病弱的女招待和妓女也驅入工場或田園的鐵器如陰溝蓋，路燈欄杆等，皆已不見。這樣的「戰力增強」，是生產工具的毀滅，是人民生活更加減低，健康之極度破壞，亦即勞動力的毀滅。敵寇以這種竭澤而漁，飲鴆止渴的辦法，來準備敵寇所謂的「連續不斷的決戰」，必然會遭到不可克服的困難。我們可以斷定敵寇軍事生產已到頂點的時期，是不會持續太久的。此後必將下降。當其海上交通破壞，資源發生枯竭，或工廠設備因空襲受損無法補充之時，其軍事生產將會發生極大的震動，而使日本整個經濟機構產生破綻。這就是「增強戰力」不可避免的危機。

其次，對於「革新派左翼」的不滿。東條企圖以這次議會所通過的上述的「決戰」動員，利用其「孤注一擲」的拚死的姿態，並在議會演說中「解放印度」「擊潰英美在印勢力」的大言，緩和「革新派左翼」的焦灼和不寧。同時藉議會之名，盜用「一億國民之心意」之名，再來通過「集中力量準備迎接美英反攻」「對蘇俄採取警覺態度」的政策。但是革新派左翼再度利用議會講壇，發動倒閣運動。急進革新派議員赤尾「大日本皇道會」的幹部，首先發難，利用戰爭的失敗痛罵東條不忠皇室，提出不信任案。雖然翼政會議員大部站在政府立場，決議開除赤尾議席，但納粹第五縱隊中野正剛

、國藤源九郎等却支持赤尾。革新派左翼倒閣的鬥爭尚有擴大之勢即令東條能渡過此關，革新派左翼的攻勢仍將層出不窮。東條之向議會提出停止今年秋地方選舉案，在政治上也是爲了避免翼政會擴大勢力，乘機進攻的樹口。敵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鬥爭，隨着戰局不利的發展，將更趨尖銳，其內部的危機正在增長着。

再次，對於日本民心的沉喪。東條企圖用大東亞戰勝必勝與其戰爭的激烈與慘酷等來營造日本人民支持他的戰爭計劃。正因其東條這種宣傳，使得到與其目的相背的効果敵寇當時成立了所謂「思想戰協力會議」，圖謀肅清厭戰反戰思想及軍部思想之禍根。並以「巨大資源急進化為戰力」「大東亞十億民衆真誠合作」等抽象的語言，來安定國民對於盟軍力量之恐懼，並高呼「追隨山本由來」「前進」的口號，以刺激人民的情緒，使敵寇英美兩國敵視心，最後並使議會通過擊潰美英的決議，以鼓動日本人民的日益低落的戰爭情緒。可是，東條這些宣傳已經失去了根據。到了今天，他已不能出所謂「赫赫戰果」以爲煽動的依據，只得將戰力竭的用壯烈的口吻說：「英軍將在緬甸新到內閣進行反攻」「情勢嚴重」戰鬥愈烈對反戰思想之危險「採取斷然嚴厲的措施」。

以上所述敵寇國內各種危機，或則尚在潛伏狀態，或則尚在醞釀過程，但今後盟國力量之增強，大反攻時間愈近，敵寇敗績愈大，則其危機的爆發，必加速到來。

（淑芬）

加強責任，痛切反省

——讀蔣委員長兩大文告

民族領袖蔣委員長，昨天發表告軍民書與告聯合國民書，在這兩個文告中，闡述了世界戰局大勢中對盟邦的四項期望，並昭告全國同胞如何來努力盡責，完成抗戰使命，全國軍民應深切來體會蔣委員長的訓導，並身體力行，無負殷切的期望！

抗戰進入第七年度，整個世界戰局充滿光明，軸心國愈來愈孤立。過去一年東西戰場的激戰，樹立了聯合國擊敗敵人的先決條件，現在正如蔣委員長所說：「是我聯合國奠定最後勝利基礎的一年」。正惟處在敵我形勢起了決定性變化的時機，從我們的使命上說，却正是最艱巨的時機。亦即是蔣委員長所說：「目前正是最後勝利以前，最大艱苦的時期」。我們處此重大關鍵時期，若稍一鬆懈，則有前功盡棄的危險，若加緊努力，則勝利可早日實現。所以抗戰局勢愈光明，我們就愈要有如履薄冰的兢兢業業心情，加緊抗戰工作，絲毫不得懈怠。

為什麼不可絲毫懈怠？因為敵人的侵略愈要掙扎，日本強盜現在軍事上還不斷在對我作狼奔豕突的進擾，經濟上瘋狂地擴充軍火生產，政治上力行民族欺騙政策，加緊奴化淪陷區人民並進行殘酷的掠奪。這一切掙扎是他形勢不利的反映，但也是必須要我們與盟邦共同警惕的。蔣委員長告聯合國民書中中指出，我們不能予日寇以時間來完成他最後的國防準備，這是至理名言。

我們不僅不能有絲毫懈怠，而且必須加強自己的責任心，來担当困難，克服困難。蔣委員長說：

「我們國家的基業，必須我們自己親自來建立，我們民族的命運，必須我們自己來創造」，從這裏應深深坐待不能勝利，勝利依靠自力奮鬥。衷心接受「更應自覺我責任的重大」這一告誡。

如何來提高責任心？必須痛切來反省自己過去所作所為。這就是說要有「尤須痛切反省我們國家對世界盡了多少責任，我們個人對國家盡了多少義務」的自省精神，使國家到個人從此除舊佈新，切切實實來執行當前抗戰的職責。

蔣委員長號召我們加緊戰鬥，創造勝利的戰績，要我們不忘記淪陷區水深火熱中的同胞迫切等待我們援救，根據這一指示，我們正面和敵後的軍隊，要更堅強主動的作戰，協力配合的作戰。我們的

論保障佃農

中國土地關係的主要特點，是土地所有的集中和使用的分散。地主占有大部分的土地既不自己耕種，也很少僱人來耕種，至於採用現代農業經營方式來發展大農經濟的，更是少而又少。最大部份的地主，都是把田地分割得很小塊，出租給佃農去耕種，以收取高額的地租。其中亦有向地主租來大批土地的大佃戶，但是這種大佃戶，極少有採用現代農業經營的租佃企業家，仍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塊，轉租給小佃戶去使用，而且這種二佃戶或三佃戶，往往比直接向地主租來耕種，要負更重的地

政府和民衆要更積極有效的來支援前線和孤懸敵後奮戰的將士。

蔣委員長號召我，要以勤勞節約來突破經濟難關，我們必須切實增加生產，泯除某些故障；特別是肅清那種畸形逸樂的陋風，樹立全國一律刻苦自勵的戰時生活。

蔣委員長號召我們發揚全民戰鬥精神，告訴我們：「全民戰鬥精神能否配合這個日益開展的局勢」，民主國家必勝的基礎，正在於全民戰鬥精神的發揚。我們中國抗戰的崇高使命，是為「全世界皆能澈底的民主化」而戰，因此這一有關抗戰與立國根基的民力的動員，是需要加緊從政治上的啓迪培植去達成的。

抗戰進入決定的年頭，讓全國力量真正團結無間，為了抗日的勝利這個共同的目的，而集中努力，全國軍民更堅強的團結得像一个巨人，向蔣委員長指示的方向，齊步邁進吧！

新華（七月八日）

租，因而地位也就更低，條件也就更加苛刻。

近幾年來，由於土地投機的盛行，地價一天天在高漲，地權一天天更趨集中。而且由於其他負擔的增加，一般小自耕農都難保有自己的土地。因為現在土地兼併的現象，或如舊地主的自相兼併，或如新地主的互相兼併，或如新舊地主兼併自耕農的土地，三種現象都同時存在，而尤以第三種現象更為厲害。這種現象，勢必增加佃農而減少自耕農，使農民佃耕地多而自耕地減少。據中國農業經濟研究所與共農黨機關的調查，以川黔黔等省後方

中十五省平均數來看，佃農與半佃農合計在民國二十五年只佔百分之五十五，到民國三十年，竟增加至百分之六十七，而自耕農在民國二十五年尚佔百分之四十五，到民國三十年竟減為百分之三十三，這就是農村關係變動的一般趨勢。

自耕農減少與佃農增加，對於發展農業經濟，增加農業生產，顯然是極不利的因素。因為租額太高，壓迫主六佃四，重則主八佃二甚至，主產物全歸地主，佃農僅得糠粃，加以押金苛重，生產成本增高，致使佃農難於維持，日趨窮困，受其痛苦，辛勞的從事，費了整天的勞力，却祇能過着牛馬般的生活，不但不努力去舉行農業上的擴大再生產，而且連單純的再生產也有不少的困難。另一方面，地主不勞而獲，坐收地租地稅，不是拿錢囤積商品，或囤積購買土地，或囤積與買地並行，就以拿錢囤積囤積的生活。至於肥料，與生產技術之改良，及病蟲害之防治，種籽肥料，與生產技術之改良，則大都不聞不問，這對於農業生產的改良與增進，顯然是一種大為的阻礙。

現在增進農業生產，對於抗戰建國，既為首要任務，而增進農業生產的責任，既為大部分是在佃農身上，那末，保障佃農，限制地租，改善租佃制度，自應為當務之急。開地政當局於此，會既就保障佃農具體辦法，送呈行政院審核，其內容要點如下：

(一) 農地地租約定以農產物繳付時，每年所繳農產物之總數之比例，依土地法第一七七條之規定（按此條規定租額不得超過正產物收穫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於農產物收穫後繳付，並不得以任何名義索取額外租費，或令佃農負擔力役。但地主供給耗產肥料或其他生產工具者，則得予以相當之報酬。

(二) 地方發生災難荒歉時，地租應依原管地方政府酌定荒歉成數比例減免之。

(三) 租佃契約無論定期或不定期，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終止：(一) 承租人死亡而無自願承作之繼承人時；(二) 承租人拋棄其耕作權利時；(三) 農地依法變更其用途時；(四) 承租人不耕種地轉租於他人時；(五) 承租人積欠地租達二年之總額時；(六) 出租人收回自耕時。至收回自耕之農地再出租時，原承租人有優先承租權。自收回自耕日起，未隔一年而再出租時，原承租人得依照原租佃條件承租之。

(四) 地主典當或賣土地，佃農有優先承購或承買權。否則，土地所有權除移轉於自耕農外，佃農有繼承權。

(五) 佃農對於耕地如有特別改良之設施，於解約時得向地主要求適當之賠償。

這些辦法如能真正付諸實行，自可稍減輕佃農痛苦，以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尤其於減低地租額，實為目前提高農業生產的主要關鍵。因為租額太高，使佃農十年辛苦所得，祇够交租，生活毫無保障，即無暇顧及擴大生產的能力。或正產物損失歸地主，佃農僅得糠粃，結果自然使佃農忽略正產物的耕耘，而只注重雜糧的栽培，這在急需增加糧食生產的現在，實為一無形的損失，所以亟須設法補救。

重慶區行政會議

四川重慶區行政會議即將閉幕。討論熱烈，收穫頗多。日前舉行的縣長座談會，尤其值得注意。張主席岳軍先生，在這次會上指出了四川省建設的總目標有二：一、民主政治之奠定；二、國立法治精神。這不僅是川省建設的總目標，也應是建國中

除此外，切實取締高利貸，改善農民方針，使貧苦佃農能得到實質的實益，亦為保障佃農所不可少的措施。因為中佃佃農不願吃沒有耕地的苦，而且吃吃之生產成本的苦。他們為要取得必要的生產成本，不得不落入高利貸的圈套。因此，減輕之後，還必須減低，或租息同時並減，改善農貸方針，才能改善佃農生活。又如改善從價徵收賦稅及方法，使地主不得轉嫁于佃農，以及改善工役措施，以耕並地土徵稅，使佃農得實利。重項負擔等毛病，均為目前中國保障佃農的重點。我們知道抗戰的主要依靠是農村與農民，而佃農尤其是支持抗戰的重要管渠。佃農地位如果真能改善提高，不僅可以大大發展農業生產，增強抗戰力量，而且也是實現國父遺教「耕者有其田」之「平均地權」的重要步驟。

新華（七月十一日）

民主政治就是中山先生遺教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的具體和實施。在今天抗法西斯主義的一個有力武器，團結抗戰，爭取勝利的途徑，其民主政治不容太容易。因為這是中國在「民國」以前還沒有有的東西，想靠新的努力來建設的東亞，民國已經卅二年了，張清軍先生講過說要「奠定」民主政治，可

見這項建設的艱苦。說雖，却也不是太難。問題還在於做，決心做，認真做和正確的做。

張岳軍先生說，要奠定民主政治。怎樣奠定呢？國名思義，要奠定民主政治就要避免和清除一切反民主不民主的東西。這是消極的一面，却也是最重要的。比如：蔣委員長在重慶實行行政會議的訓示中說，「要體恤民困」就是起碼的態度和措施。此外體察民情和傾聽民訴，也是少不得的。能够採納民意就很好了。此外更要保障民權發揮民意。蔣委員長指示說「而對各級民意機關，尤須盡力扶助，使其充實健全」這也是目前負行政責任者所應該切實執行的。

民主政治並不像有些人所願意的，是無秩序無組織的狀態。不是的。民主政治無非是以民意為基礎，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以人人關心國家大事為

(上接第三二〇頁)

一次是七月四日開始的，一次是七月十二日開始的，在兩次海戰中，日軍俱遭敗績。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次海戰中日軍出動的海軍都是屬於輕型的艦隻，因此我們還不能據此即下日軍已決定增援的判斷。沒有大規模的增援，日軍是不能長久守新喬治亞和新幾內亞的，日本究竟怎麼辦呢？日本的戰略正經歷着嚴重危機。

戰略正如此，在政略上也是如此；在政略上，日本最感困難的還在於蘇聯的威脅，以及日本本國生產力的脆弱與消化佔領區的企圖未能順利實現，這些條件，使日本統治層中親德份子，尚難佔據優勢，使日本統治者不得不更聯實力的懷然不可侵犯，美國龐大生產力多的徘徊，觀望。

希特勒的新攻勢破曉之日，敵首相東條正使供于新加坡——馬尼拉的道路上，這雖不足以具體說明日本的動向，但從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對於希特勒的新攻勢在作壁上觀；同時，東京廣播電台也把希特勒的新攻勢看做一種防禦性質的戰鬥，足見日本對於他們盟兄的新攻勢並沒有抱着多少希望，更何

與國家大事為準則的政治。這就是政策實力，就是集思廣益。可以說這是政治上自然和健康的專，中山先生和全國人民幾十年來所以全力以赴！就是這做民主政治在開始實行時也難免有不如人意之處，然積久弊除，自可日進於健全民主的境地。民主中所發生的枝節問題，祇能由民主自身去求得解決，近代先進民主國家，不少這種優良的例子。中山先生和全國人民數十年竭全力以爭取的，當然也是健全民主政治，但健全的民主政治，必須從實行民主中逐漸發展而成，這種道理是不煩言解的。

民主政治和法治精神是分不開的。民主政治離開了法治精神，便會變成混亂。法治精神離了先從行政人員中養成，否則一切沒有法律根據的行為就會層出不窮，而人民將無以措其手足。反過來說，法治精神也要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上。否則，所

況德軍的新攻勢直至今日毫無進展？不過，正如同在歐洲擺在英美盟軍面前的課題不是研究希特勒的攻勢是怎樣一種性質，而是自己發動更大規模的攻勢一樣；今天在太平洋同盟國家面前的課題，不是揣測日本是否攻蘇，而是利用眼前一切的可能，加強對日的正面作戰，果如是，太平洋戰爭的主導權是再不會落到日本手裏去的。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希望盟國加強已發動的太平洋新攻勢，加強援助中國組織反攻，加強和加速反攻緬甸的籌劃和組織。我們不僅希望英美和蘇聯聯在歐洲的東西兩面夾擊希特勒，我們更希望英美和中國能在亞洲的海陸兩面夾擊東條，一言以蔽之，我們要求在全世界的規模上來擊軸心，粉碎軸心，直至其無條件投降而後已。

希特勒的攻勢可能是包含着試探性，但是同盟國家前回答却該是無條件的從四面八方的進攻，從歐洲進攻，從亞洲進攻，從地中海進攻，從太平洋進攻。希特勒不讓這個世界喘氣快是整整四年了，現在是我們不讓他喘氣的時候了；堅決的進攻，無情的報復，「這裏沒有長橋」(但丁)。

(七月十八日)

請法治，結果也會適得其反。一般不以人民為歸，就會有不肖之徒胡作胡為，人民也就不堪其擾。張岳軍先生之所以將二者相提並論，不是沒有原因的。

談論這些問題，困難是不不少的。就在張岳軍先生提出了這兩個目標，我們爲了川省建設爲了新中國的建設，僅僅奠定民主政治的原則下，提出一點意見。我們想樹立中之法治精神，當更能鼓勵人關心國事，由法律範圍內提出他們自己的主張。川省建設的總目標是這樣明確，只要大家努力，就能够在民主政治和法治精神方面，有所表現。等這些都能够奠定和樹立，就能進一步求其發展和發展，而且，影響所及，更將廣爲全國的政治風尚。(被略)

新華(七月十五日)

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宣言

德意志同胞們！

事變要求我們當機立斷。正當致命的危險籠罩我們的國家而且威脅着她底直接生存的時候「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成立起來了。

民族委員會是由工人和作家，軍官和士兵，職工會領袖和政治家，抱持種種不同的政治觀點和信仰的人民組成的。這些人在一年以前還曾以為這種團結是不可能的呢。民族委員會表現了在前方和後方的千百萬德國人的思想和抱負，這些人都是滿心憂慮着自己祖國的命運。

當此危急時期，民族委員會有權而且理應代表德意志人民發言，明確地而且抱着和目前時機的偉大性相適應的決心來發言：

希特勒把德意志拖到深淵裏去了。

看看前方正在演變的情形罷：過去七個月來的戰役，在頓大林格勒、頓河、高加索、利比亞、突尼西亞。在德意志歷史中是無可比擬的。關於這些戰役，應由希特勒負全部責任，而他竟還出任着軍隊和國家的首長。德軍如今離開祖國很遠了，散佈在綿亙好幾千公里的戰場上，和固然沒有戰鬥力而且不可靠的盟軍糾纏在一起，他們當面遭遇着實力時時在增長的強大的聯盟。英美兩國的軍隊屹立在歐洲的大門口。從所有各方面同時一齊來打時德意志的一天就快到了。削弱的德軍，被優勢的敵軍壓迫着，不能夠維持長久的。她底崩潰的時期已近在眼前了！

看看國內發生的情形罷：德國已經變成了戰場。各城市，各工業中心和造船業中心，都遭到越過越大的破壞。我們的母親、妻子和孩子們，喪失了他們的家庭和財產。農民們的權利和自由都剝奪了，總動員使手工業者破了產。勞動人民的最後一滴血都被吮乾了。

希特勒不顧人民的願望，許多年來就準備着這和掠奪性的戰爭。他使德國陷於政治的孤立。他不負責任地向全世界提出三個最大的強國挑戰，而使他們在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毫不容情的鬥爭中團結起來了。他把整個歐洲變成德國人民的敵人，使我國人民含垢蒙羞。如今的德意志已為惡世的深仇大恨所纏繞，這是應由他負責的。就是異國敵人也從來沒有像希特勒這樣使我們德意志人陷進了這般災難深重的漩渦。

事實無可更動地證明了：仗已經打敗了！

以無可比擬的犧牲和困苦做代價，德國還能夠把戰爭拖延一些時候。然而，繼續進行毫無希望的戰爭，那就是意味着民族的劫運維迭。

但是，德意志是決不令滅亡的！

我們的祖國將來不會滅亡——這便是當前的問題。如果德國人民乘機地，帖然脫離地讓敵人把自己引到毀滅的路上去，那麼，不儘自己的力量會隨着一天天的戰爭而枯竭而耗盡，并且自己的罪孽也會更加深重的。那時，希特勒就會被反希特勒聯盟的軍隊力量所推翻的。不過，這就是意味着我們民族獨立的完結，我們作爲一個國家的生存的完結，也就是意味着我們祖國的分崩離析，那時，我們就沒有任何人可以譴責，而只有譴責我們自己了。

如果德國人民及時鼓起勇氣，由行動證明它願望做自由的人民，證明他充分決心要來把德意志從希特勒羈絆下解放出來，這樣子來爭取創造自己命運的權利，而其他各國人民也就會這樣願望着。那末，這就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直接生存自由和榮譽的唯一道路。

德國人民需要立刻和平，而且渴望和平！

但是，決沒有一個人會跟希特勒締結和平的。而且甚至決沒有一個人會跟他進行談判的。所以，我們人民的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成立真正民族的德意志政府。只有這樣的政府，才會博得人民的信任，才會博得他過去的敵國的信任。只有這樣的政府，才能帶來和平。

這個政府必須是強大的，而且擁有必要的權力，使人民的公敵——希特勒，他的保護人和奴才走狗們，都不能有害於人，斷然地制止恐怖，消滅貪污，確立安定的秩序，而以威嚴的態度，對外在的世界代表德意志。

只有由德國所有各階層的人民進行解放鬥爭的結果，這種政府才能產生。它將憑藉戰鬥集團的支持，那些戰鬥集團將聯合起來推翻希特勒。軍隊中與國家和人民效忠的勢力，將在這一方面起決定性的作用。

這種政府將立刻停止軍火行動，把德軍召回帝國邊疆，而開始議和，宣佈放棄所有一切征服的戰利品，這樣子才能達成和平，恢復德意志在平等的各民族人民中間的平等地位。

只有這個政府，會使德國人民自由表示自己的意志，在平等的情況中，使它能夠以獨立自主的態度解決國家制度的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自由的德意志

這就是目標：強大的民主國度和魏瑪制度的軟弱無能是沒有絲毫共同點的，這個民主制度，將以無情態度壓迫自由人民的權利，或對歐洲和平作任何新陰謀的未來一切的企圖。凡以民族的和種族的仇恨為基礎的一切法律，凡使我們人民感受恥辱的希特勒制度的一切設施完全取消。希特勒當局針對自由與人類建設的一切措施完全廢止。恢復其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社會福利，言論、出版、結社、意識和信教的自由，經濟、經商和貿易的自由，有保障的工作權利和合法取得財產的權利。被法西斯掠奪的財產恢復法定的所有主。犯戰爭罪的，以及戰時投機發財的那些人們的財產一律沒收。和其他國家實行物物交換，作為保障民族福利的自然基礎。立刻解放希特勒恐怖犧牲者，用物質補償他們所受的損害。正而不留情地審判戰爭真實的那些人，審判戰爭販子，審判那些從希特勒煽動戰爭並且贊助戰爭的人，審判那些把德意志驅進深淵而使他蒙羞含垢的人。但是，同時凡及時進行鬥爭表示排斥希特勒，而參加了自由德意志的所有希特勒的黨羽，一律大赦。

前進啊，德意志同胞們！去為自由的德意志而鬥爭！

我們知道：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對希特勒鬥爭越堅決，犧牲就越來得小。以德意志解放的名義所作的犧牲，一定只有因繼續鬥爭而引起的毫無意義的犧牲千分之一罷了。

在所有各戰場上的德軍官兵們！你們有兵器握在你們的手里！把它們保存好呀！在覺悟到自身的責任而和你們一同去對希特勒抗爭的指揮員們的領導之下，奮勇地為你們自己打開一條國家過太平日子的路吧！

在國內的勞動男女們！你們是大多數！用組織來使你們的力量倍增，在工廠中，在鄉村中，在勞動營中，在高等教育機關中——在你們所在的任何地方，形成戰鬥的小組。拒絕服從希特勒，不要聽人利用自己做繼續戰爭的同謀犯，用一切方式戰鬥，每一個人依照他在社會上，在國家和經濟生活中的地位，用各自的方式去戰鬥呀！

我們的歷史給了我們以偉大的榜樣。一百三十年前，當德意志以敵人的姿態站在俄羅斯國土的時候，最優秀的德人——封斯泰恩、阿靈特、克勞塞維茲、約克和其他的人，就從俄羅斯向國賊——德國統治者——倒戈，訴諸德國人民的良心，號召他們起來作解放戰爭。

我們舉他們的榜樣，當把我們的一切力量，必要時，當把我們的生命貢獻出來，喚起我們人民為自由解放鬥爭，來加速推翻希特勒。

為自由德國而鬥爭，要求勇氣，活力和決心，而最關鍵的是勇氣。時間是不等人的，必須行動，必須立刻行動！

凡是首領，備後戰，或盲目服從的人，繼續追隨希特勒，所作所為像一個懦夫，就是幫同使德意志民族遭滅絕的災難。

凡把民族的意志放在「領袖」的命令之上，而把自己的生命和榮譽獻給他的人民，光明正大地行動起來，就能幫同從嚴重的災難中拯救出他的國家。

人民和祖國萬歲！

打倒希特勒和他的犯罪的醜聞！

爭取立刻的和平！

締結人民解放同盟！

自由和獨立的德意志萬歲！

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員會

簽名：步兵第三七一師師部少校哥尼爾斯·海茲，第一〇〇輕便師少校漢遜正規軍軍官羅利奇·何曼，第四四步兵師少校多瑞恩斯的工程師赫爾伯特·斯特塞爾，第一八〇輕裝師大尉斯特勞賓的經濟學家波多·夫萊協爾，第一五二砲兵團大尉卡塞爾城教育顧問愛恩斯特·哈德爾曼博士，滿炸機第五隊第二分隊上尉杜塞爾多爾夫的正規軍官愛伯爾哈特·卡利西烏斯，第八八工兵營第一連上尉德奧斯登的正規軍官佛立德利奇·果吉爾，第三四三保安營第一連上尉柏林高級教育顧問佛利茲·呂克爾，第三戰門機隊第三分隊中尉柏林·烏登正規軍軍官亨利克·愛恩塞爾伯爵，第四二八偵察隊第四連中尉皮勞的郵局督察員愛恩斯特·凱勒爾，第一二二步兵團第四連上尉兵海德里海門的神學學者伊科布·埃肯波爾恩，第九四步兵團第二七六步兵團兵佛蘭克府城皮鞋廠工人馬克思·愛門多爾，第一二二步兵團第四連上尉兵海德里海門的神學學者伊科布·埃肯波爾恩，第九四步兵團第二七六步兵團兵小普勞恩紡織廠事務主任關蓋爾德·夫勒米特，第一三四步兵團兵士機械師罕茲·克斯勒爾，第四八五步兵團第八連下士馬特烏斯·克蘭，第二八一步兵師第三六八步兵團第五連兵士柏林工人埃利奇庫恩，第二九三砲兵團第六連隊上等兵東普魯士木材工業工人弗利茲·魯登萊特，第六九八步兵團第七連上等兵勃拉赫的營造工人阿托斯茲，第一七八步兵團第三營營部上等兵柏林店員罕斯·西伯爾，第二六七步兵團第四八七步兵團第五連上等兵下卡爾卑的農民勃奧那爾德·赫爾姆，普維特克維尼茲職工會工作者安東·阿克爾曼，柏林國會議員馬爾塔·阿倫德舍，葛尼黑作家約翰納斯·伯舍爾，漢薩作家維利·布萊德爾，魯爾區國會議員威廉·弗維倫，斯圖特加爾特國會議員埃德文·何爾恩爾，漢薩青年領袖罕斯·馬爾，柏林國會議員威廉·皮克，魯爾省國會議員職工會領袖古斯塔夫·索波特卡，柏林國會議員瓦爾特爾·烏爾不果奇特，柏林作家侯納爾特·斯圖特加爾特醫師和作家佛立爾·烏爾夫。

希特勒的七月攻勢

于懷

(一)

自三月底蘇軍宣佈冬季戰役結束以來，蘇德前線就沒有大規模的戰鬥發生。一般的說，東線無戰事，沉寂支配着東線。於是國際間就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問題：希特勒的戰略是採取攻勢呢？還是採取守勢？三月以來（自三月至六月），對於這一個問題或左或右的解答，實際上，支配了人們對於世界戰局的估計。

七月五日，希特勒在蘇德前線奧爾斯——維爾斯——比爾哥羅德戰役發動的新攻勢揭開了這世界之謎，最低限度，初步地。在今天大家已經不復問，希特勒採取攻勢還是守勢，今天大家所關心的是：希特勒的新攻勢究竟是什麼性質？這一新攻勢就是希特勒宣佈已久的夏季攻勢嗎？還是僅僅乎夏季攻勢的開始？這是一個全面攻勢的開端嗎？還是僅僅乎一個有着一定的限度的戰術乃至政略目標的局部攻勢？

在嘗試回答這一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看這一新攻勢的特徵。首先，從攻勢發動的時間上說，希特勒夏季攻勢的發動是愈來愈遲了：一九四二年希特勒的夏季攻勢發動於五月初，而這一年的夏季攻勢比之於去年，就差上了幾個月月的時間。假如我們把蘇德戰爭爆發時德軍的攻勢也看做希特勒的夏季攻勢的話，那麼，和一九四一年比較起來，今年希特勒的夏季攻勢也遲了兩個禮拜。

再從攻勢的範圍來看，希特勒攻勢的範圍愈來愈小了：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爆發時，德軍的進攻是全線的，從南到北，幾乎佔了一九四二，去年希特勒攻勢的範圍雖然由三路縮成一路，但從庫爾斯克到新托茨也達四百五百哩，而今年的攻勢展開的範圍却不得不一條線，由四百哩而為一百五十六哩了。

因此，無論從攻勢發動的時間看，或者是從攻勢展開的範圍看，希特勒的攻勢已經是個口袋，寡口袋，一代不如一代了。

誰都知道希特勒的攻勢一代不如一代，然而重要的並不在此。現在我們要問的是：希特勒的夏季攻勢為什麼要在奧爾斯——庫爾斯克——比爾哥羅德這一個地段上發動？

我們知道，蘇德戰場上的戰局形勢是：遠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莫斯科之戰以後直至去年蘇軍冬季大反攻以前，希特勒打下莫斯科的企圖雖然悲慘地失敗了；但在中路，它始終還維持着一個好像是指向莫斯科的利刃一樣的一塊突出地帶，以寇夫——格羅特斯克——維爾斯瑪在該處的突出地帶；他們在那裏建築防禦工事，集結着重兵，隨時有進攻莫斯科的可能；去年夏天，德軍之所以能比較容易地轉移兵力，集中進攻南線，在戰局形勢上未嘗不得力於此。但是由於蘇軍輝煌的勝利大反攻，一切都改變了：今天，在中路，蘇軍的突出地帶威脅着德軍的後方，而不是德軍的突出地帶威脅着蘇軍；蘇軍的勝利反攻削平了德軍的維爾斯瑪的突出地帶，建立了庫爾斯克的突出地帶，正如德軍的維爾斯瑪突出地帶過去曾威脅着蘇軍的後方一樣，現在蘇軍的庫爾斯克突出地帶威脅着德軍的後方，不管希特勒的戰路目標是在那裏：進攻莫斯科或者再趨高加索，庫爾斯克的突出地帶是必須削平的；而至於就是為了穩定東線，這一舉，在戰路上也是必要的。

戰爭在結束的地方開始。

遠在三月，蘇軍的勝利反攻達到最高峯的時候，在中路路之間，蘇軍的突出地帶比現在的大，那時它包括了庫爾斯克和哈爾科夫；哈爾科夫的創傷性內攻而庫爾斯克的創傷性則更甚。三月，德軍發動了掙扎性的局部反攻，但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它所能恢復的也不過是原來突出地帶的一半；四月，德軍在北滿魯德地方而取得最後的勝利；德軍的局勢已停頓下來了。在此後的三月中，德軍的進攻只局限於蘇軍的邊境，東北兩的德軍進攻了東南兩的比爾哥羅德，而規模都不大；空中戰鬥則在蘇軍的轟炸布列斯涅克，斯摩爾斯克和哥奧爾等地——事實上這些都是這一次戰鬥的對象；德軍的陸地進攻為了鞏固前線，蘇軍的空中進攻是為了破壞德軍

的進攻準備。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德軍這一次的新攻勢看做它的三月反攻的繼續。

希特勒的新攻勢終於發動了，以新的武器，以新的空軍加坦克戰術，新的戰鬥形式。

新的武器：這不該說希特勒發現了什麼新的武器，而是說，在這一新的攻勢中，希特勒接受了蘇德戰爭的教訓，改正了德軍過去在武器配備上所犯的錯誤。我們知道，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德軍所賴以取得勝利的坦克配備中，是從來忽視重坦克的作用的，從而羅坦克和中級坦克佔着德軍坦克的絕大比例，四十噸以上的坦克在德軍的軍械庫中是找不出許多來的，但是這一次，德軍却大規模地使用了重六十二噸，名為「老虎」的重坦克。雖然「老虎」的使用並沒有能發生希特勒所預期的作用，但是它的大規模使用却是值得注意的。

新的空軍和坦克戰術：在過去，德軍的空軍照例是執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軍的準備砲火的任務的，飛機的轟炸出現在大砲的轟擊之前，而現在，火力準備的工作却又讓位於砲兵，飛機的出動則到砲兵轟擊之後了；在過去，德軍飛機是和陸上部隊配合作戰，自有其攻勢任務的，而現在它却只有掩護其作戰部隊作戰的消極任務了；此外，空軍出擊，由過去的大規模的密集轟炸一變而為現在獨立小隊的轟炸活動也是值得注意的變化之一。在過去，德軍坦克的作戰是不依靠砲兵的，而現在却於重坦克之後增加輕動力化的砲兵了；在過去，德軍坦克的先頭部隊主要的是由中級坦克和輕坦克組成的，而現在却不得不轉而重坦克了。所有這些戰術上的變化都指明了一件事：過去德軍戰術是以發揮高度的機動性為目的的，而現在却是轉而向火力的加強中找尋出路了。

新的戰鬥形式：我們知道，一路來德軍是把勝利的希望放在運動戰上的，它希望由德軍作戰機的高度的機動性來彌補它火力和兵力方面的不足，從而直至去年的斯大林格勒之役，德軍總是希望不必用高度的火力集中，而靠運動迂迴來取得勝利；但這次一次不同了。這一次德軍在這短短的一條戰線上集中的兵力雖然不大（二五〇、〇〇〇），但是攻勢武器的集中卻達到驚人的比例（飛機二、五〇〇架，坦克四、〇〇〇輛，裝甲部隊佔總部隊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實際作戰的過程也顯示了：德軍在這裏所企圖的不是以運動迂迴以取勝，而是以高度火力集中以取勝，德軍現在所進行的是

一則言如其實的所謂器材戰，從而德軍軍事器材的損失在斯大林格勒也表現得特別嚴重。自七月五日至十四日，德軍坦克的損失每日平均在二〇〇輛以上，而飛機損失則在一〇〇架以上。十一日莫斯科廣播電台軍事評論家估計德軍每三一—四分損失坦克一輛，其速率竟連莫斯科之役中德軍坦克損失的二十倍。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希特勒這一次的新攻勢具有着怎樣和莫斯科之役不同的性質了。

然而德軍希特勒運用了新武器，採取了新的戰術和新的戰鬥形式，十二日（自五日至十六日）來，並沒有得到任何顯著的進展，攻勢開始的最初三日，他曾經在比爾哥羅德方兩邊獲得若干戰術上局部的進展，但是到最近，就連這一點進展也漸漸消失殆盡了，戰鬥還在進行當中，希特勒的目的究竟在那裏呢？這是不他的所謂夏季攻勢的本身，還僅僅是一個夏季攻勢的前哨；是一個全國的大規模的攻勢，僅僅是一個有一定限度的戰術乃至戰路目標的局部攻勢？

所謂夏季攻勢本身和夏季攻勢的前哨本來就是分不開的，從而這一個問題不必討論，現在我們要指出的是，希特勒的這一個新攻勢，在戰術上是一個試驗，在戰術上是一個試驗，在戰術上包含一個試驗。在戰術上是一個試驗；他要試一試他的新武器新戰術和新的戰鬥形式究竟怎樣；在戰術上是一個試驗；它繼續三月攻勢未能完成的任務，即回平森軍在中南路之間的突出地帶，至於回平之後的動向如何，則要看他的攻勢計劃所導的結果怎樣。在戰術上包含一個試驗：他要試一試攻勢既已發動之後，英美盟軍的動向如何？真正的開關西歐第二戰場嗎，還是僅僅一些「假不是這」的軍事行動了？對於希特勒有利的，則是讓英美盟軍永遠在五星野戰中，讓他們永遠在研究他的攻勢這一個全面攻勢，這是一個具體的攻勢，而在英美盟軍研究他的攻勢的時候，他的真而目的攻勢却是真的展開了。

假如這是一個真而目的大規模攻勢的開始，那必定是因希特勒認定了：「英美盟軍今年不獲發動大規模向歐陸之進軍，並認定在東線第三度拚命之企圖，不致妨礙其德軍盟軍在地中海不足道之軍事行動」（十月波斯頓基督教科學界報社論）。

盟軍動向如何？
(一)
希特勒攻勢發動後之五日，七月十日，英美盟軍在西西里島登陸。有如

艾薩克威爾將軍之所指出，這是「北非戰事結束，歐洲戰事（的）開始」。這是極其自然的。我們知道，遠在六月八日，在他的下院報告裏，英首相邱吉爾，還念念不忘以敵人「或將拒絕戰鬥」為慮；現在不管怎樣，希特勒的攻勢總算是發動了，於是錫山倒而洛鐘應；東線戰事展開，地中海的烽火又起。

五月初北非戰事結束，盟軍的空中攻勢即不離以西西里為其主要目標之一；六月中班、里、拉三小島的投降，將地中海盟軍的空中根據地擴展了一步；及至蘇德戰場上的戰事再起，盟軍空軍對於西西里島的轟炸實際上已經是在登陸前的準備炮火了。七月十日的登陸成功，在戰局的發展上有如水到渠成，意料中事。

截至現在為止，盟軍登陸已經五天，我們還不能確切的判斷，盟軍登陸的部隊是多是少，所知者僅僅是：西西里島的東南沿岸，從格拉利略大尼道外圍一線七處海岸或機場已入盟軍之手。至於西西里島上核心部隊究竟有多少，更是難從確據；同盟國方面估計四十萬，意軍三十萬（內中正規軍十師約十五萬）德軍十萬；但從整個意軍兵力的分佈而論，這一個數目，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太了一些。目前，盟軍目的戰鬥還未展開，戰事的發展自無從預測，雖然從整個局勢看，西西里的克服，或者投降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盟軍在西西里登陸的意義何在？這是歐洲的第二戰場嗎？英美盟軍下一步的動向何在？

假如看地圖就能解答這些問題：一個省察也會告訴你，西西里島的北面就是意大利那隻靴子的靴尖兒，西西里打完了就直取意大利，戰略假設是那樣的簡單的話，那是再方便沒有了。事實不如此。

第一，這不是第二戰場，這是不用說明的，其次這是解放歐洲戰事的開端，這也是不用說的；今天的問題是配合着東線的蘇軍，解放歐洲本身，西西里島雖然意大地的領土，但究竟還是一個海島，不是歐羅巴大陸；地中海里類似於這樣的島嶼，較大的較少還有四五個，地中海的撒丁島和科西嘉島，東地中海的克里特島和多德喀尼斯羣島，假如在地中海，也執行起「塞島戰事」那所需的時間雖不如在太平洋上的可怕，但也就相當的可觀了。地中海裏的「活島戰事」、「越島戰事」是可以想像的，而且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是必要的，但這絕不是解放歐洲的事業本身。那麼，盟軍的戰略點

向究竟怎樣呢？

正如同希特勒的攻勢在基本上是包含着試探的性質一樣，盟軍在西西里攻勢同樣包含着這樣的性質。在兩軍交鋒上有試探的性質：一、探敵心部的抵抗能力如何；二、探盟軍的新攻勢在敵心部方面所引起的反響怎樣；然而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無論如何，誰都不能否認，由於希特勒新攻勢的發動，「使戰爭縮短的可能性」空前的提高了。今天的問題不是用局部的戰爭行動來互相觀察，互相試探，而是用經濟的攻勢把戰爭的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裏。在今天對英美盟軍絕對有利的力量對比之下，希特勒試探、試探是因為他不行，對他有利，而盟軍如果眼睜睜地看，眼睜睜地試探，那就更是上了他的大當，我們相信盟軍不會這樣做。

一連串的事件證明英美盟軍是在計劃着更大的攻勢；在希特勒發動攻勢之前，七月二日盟軍決定將希臘海軍部除名的指揮部歸中東盟軍司令部，指示希臘風雨而備隨時有轉向東地中海和巴爾幹的可能性；希特勒攻勢既已發動之後，蘇聯駐美大使邁爾斯返國述職（八日），及至盟軍在西西里登陸，美陸軍長汀生又有訪倫敦之行（十一日），在這次戰局展開的千鈞一髮的關頭，所有這些佈置和會商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希特勒的攻勢發動了，然而他偏偏不說他發動了攻勢，他在進攻人家，但總却要求人家研究他的進攻，好讓人家不來攻擊；希特勒所研究的或是同盟國家所應拒絕的，今天誰在何處向盟軍而來的試探不是研究和指測希特勒的攻勢企圖，而是主動的發給更大規模的攻勢——在這裏我們完全同意軍事評論家M. 威爾遜的意見，他認為：

「荷英法聯軍與蘇軍一致行動，今夏開始廣泛之配合行動，則在今年年底以前，便可將德國打敗，為達到此目的，吾人必須進行三個月到六個月之攻勢，使英美蘇所有軍隊一律出動」（自由雜誌，十日塔斯社紐約電）。

(三)

希特勒新攻勢的目的，不但是要試探西方的英美，而且試探東方的日本。試探英美：看看他的攻勢發動之後，英美是否有認真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跡象；試探日本，看看他的攻勢發動之後，日本有無配合進攻蘇聯的意向乃至行動。從主觀的觀察上說，希特勒再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的希望日本的

配合進攻蘇聯了。
然而希特勒的主觀願望只是他的願望，面對着日本的是完全另外一套的問題。

首先在太平洋採取攻勢行動的是盟軍不是日本，如所週知，五月初美軍在阿留申羣島中的阿圖島登陸，作戰不到三個月，阿圖島上的山崎部隊被消滅，阿圖島投降了，由於阿圖島的投降，日軍在阿留申羣島中的另一個大據點——古斯卡島在實際上雖即能守，其軍事價值已降低到很可憐的程度，更何況它經常在盟軍空軍的轟炸之下，其能守與否，已大成問題了！其時蘇聯會議閉幕後之一月，六月三十日，美澳聯軍在西南太平洋又發動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攻勢，而對着日本的困難更加複雜了。

在進一步分析日軍戰略所遭遇到的危機和矛盾之前，我們先看一看盟軍的新攻勢，它的範圍，性質和趨勢。

盟軍的新攻勢是在六月廿日展開的，首先是美澳聯軍在空軍和海軍的掩護之下，在阿羅漢門羣島中的新喬治亞島和肖多瓦島登陸，這是盟軍攻勢的右翼，同時日軍又在阿羅漢門羣島北部薩拉摩亞附近新喬治亞島，而在左右翼之間則佔了特布爾島和烏德拉克兩座無人小島，從新喬治亞島的南端到阿羅漢門羣島中的新喬治亞島，從盟軍的左翼到右翼，全長共達七〇〇哩。從攻勢展開到總圍攻，這不是一個尋常的攻勢。

總圍攻，盟軍的目的在那裏呢？

地圖是最容易看的一本書：從作戰的第二目標說，盟軍右翼進攻的第一目標在新喬治亞島的東邊，盟軍左翼進攻的第一目標在新喬治亞島的薩拉摩亞和穆掃——帶區。戰爭總是在結束的地方開始，在歷史的發展上，盟軍的右翼攻勢是瓜島之戰的繼續，而其左翼攻勢則為布納——哥納之戰的繼續，我們知道，自從二月初日軍自瓜島和布納撤退以來，盟軍在這一地區再沒有採取過陸上的攻勢，經過了五個月的準備和佈署，盟軍重新採取攻勢是極其自衛的。從作戰的第二目標說，盟軍左右兩翼進攻的總方向顯然是指向新布列爾島上的拉布爾，拉布爾的北面是特魯克。拉布爾是日軍在西南太平洋東南部最大的海空軍根據地，而特魯克則是這一邊區內最大的海空軍根據地，拉布爾不克服，澳洲不能安枕，特魯克不粉碎，盟軍在西南太平洋無由展開其攻勢。盟軍的新攻勢同時具有防禦和進攻的性質，不過，在目前現實的情況下，其攻勢性質遠較其防禦性質為大。

這是太平洋戰爭一年來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英美海軍在太平洋上擁有巨大的優勢的陸海空軍根據地，而日本則擁用數量和運用上供佔優勢的陸海空軍，憑着這種優勢，在不到半年的時間之內，日本佔領了西南太平洋，建立了其有史以來最大的殖民帝國。然而，去年六月中途島一戰奪取了太平洋戰爭中力量對比的改變。到了現在，英美海軍和空軍的地位已經完全倒轉過來：今天日本擁有優勢的海陸空軍根據地，但並沒有高對優勢的海陸空軍，盟軍擁有絕對的陸海空軍優勢，而日軍則擁有絕對的陸軍優勢，盟軍擁有絕對的陸海空軍根據地。今天盟軍所企圖的正是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在更大的規模上所企圖而且完成了一樣：以優勢的陸海空軍和海軍力量，恢復第一等已經淪陷了的陸海空軍的基地和據點。從這一個意義上說，盟軍新攻勢的目的在「迅速和徹底地摧毀海空軍的基地」，用美國戰時情報局長威爾遜的話，即是「從一個根據地到一個根據地的戰爭」，「從一個軍艦打了一個軍艦的戰爭」，即是「千里攻勢的第一階段」，（七月二日同氏報告，同日紐約合衆社電）。

正因為盟軍的新攻勢具有這樣深遠的意義，日軍的形勢發生了空前的危機。

一方面由於太平洋戰爭中力量對比的變化，另一方面由於盟軍中心國家形勢的變化，從自去年年底起，日本就在西南太平洋北太平洋的強形線上，建築起以海空軍基地為骨幹的「太平洋長城」；二月初日軍自瓜島和布納的撤退，指示了這一防禦工事的建立已經達到相當完備的地步。盟軍「海上長城」的建築固具有進攻和防禦兩重性質，但更可以守。四五月間，日本空軍曾經以這些新建的空軍基地為據點，向澳洲實行過幾次較大規模的出擊，當時澳洲負責方面曾一度緊張，日軍即停飛，但是不久這呼聲又沉寂下去，這足以說明：日軍新建立的「太平洋長城」雖然在事實上同時具有防禦和進攻的性質，但在目前現實的形勢下，其防禦性質遠較其進攻的性質為大。這是極其自然的，正如同盟軍目前的企圖在以後優勢的兵力來增固據點的一樣，日本的企圖在以海空軍基地和據點的建立和加強來節省乃至彌補它的兵力的不足。盟軍的新攻勢使這一戰略，產生了危機。表現在當前問題上的是：盟軍的攻勢展開了，日本是不是準備出動海軍和空軍，掩護陸軍增援，和盟軍做一「增援的競賽」呢？還是現在為止，所企圖海軍只獲得了兩次規模大的海戰？

（下接第三一三頁）

大後方農村經濟的特質和改善途徑

華西園

緒言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戰之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告全國國民書）。

「中國為農業國家，大多數人民皆為農民，故中國之經濟基礎在於農村。抗戰期間，首宜謀農村經濟之維持，更進而加獎進，以謀其生產力之發展」（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一種特殊情況之下進行的，主要的大城市與交通線被敵佔領，抗戰的主要依據地為鄉村與農民。中國鄉村與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量，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它，尊重它，而所進行的戰爭，又能夠適合它的要求，或至少不違背它的要求，並且有正當的辦法去動員它和組織它，它就能發揮出偉大力量來支持戰爭。整整六年來的抗戰事實，他已充分證明了中國鄉村與農民，是有偉大力量來支持戰爭的。

沒有充分的兵力，不能進行長期戰爭，尤其像我們中國的工業與軍備落後的國家，如果沒有廣大兵士的血肉作長城，簡直就不能抵禦敵寇和保衛祖國，試問當兵上前線的主要成份是誰？有百分之九十五是農民。沒有足夠的糧食，也不能支持長期戰爭。試問耕手既足生產出如許多糧食的人是誰？更不消說是農民。為了抗戰的需要，在各地辛苦苦建築公路與飛機場的民工，亦有十分之九是農民。抗戰需用大量的財力，而這些財力的最後負擔者，大部分又何嘗不是農民。當然，我們不能抹煞其他社會階層對於抗戰的貢獻及作用，但農民對於社會國家出力最多最大，負擔也最重，却是不被承認的客觀事實。

犧牲和艱苦耐勞的六年，已經過去，廣大農民羣衆已經貢獻出他們所能貢獻的一切。假使他們還許多貢獻，還不能完全滿足抗戰的要求，那多半是由於動員與組織還不盡適當，態度與運用還不盡合理的緣故。因為抗戰的命運

，既然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那末對於鄉村與農民，就必須實行必要的政治方面與經濟方面的改革，即在政治方面提高他們的地位，切實給予他們以國法所許的自由和權利；在經濟方面，應該減輕封建剝削，改良農民生活，力謀生產力之發展，至少應該幫助農民，共同去克服各種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不良因素。而且「廣大強固之民心」，有賴於健全政治與與動力之培植，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們在這方面只要努力，就一定有成果。

現在抗戰正處在艱苦階段，要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還需要付出更多的犧牲代價。現在全民族的迫切任務，是增長力量，準備反攻。因此，對於農村經濟，以重新檢討和估計，看看抗戰以來，中國鄉村經濟究竟經歷了一些什麼變化，產生了一些什麼對抗戰有利和不利因素，我們應該如何把握這些有利的因素來克服危機，突破困難，覓取改善途徑，以期有利於抗戰建國的前途，是有實際意義的。本文因篇幅關係，僅以大後方農村經濟為討論對象。

土地投機與地權集中

抗戰以來，大後方農村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土地資本的畸形發展。由於戰時通貨膨脹與游資泛濫的結果，巨額的資金持有者，對於工業建設的投資，既不很感興趣，便把大量資金向兩方面傾注；一方面是囤積商品，抬高物價，另一方面即競相購買土地，以土地為投機對象，使地價扶搖直上，比抗戰前增漲一百倍到兩三百倍。這就使商業資本與地主經濟更互相勾結，妨礙工業的發展，造成地權更趨集中。這種現象約開始於抗戰第二年，以後跟着資金內流與游資泛濫的凶狂，土地投機的現象也更趨嚴重。距今兩年以前，第八戰區經濟委員會出版的「東南經濟」三十四年四月號，就已披露了這一事實的真相：「擁有大量土地及特產的地主，烽火中的暴發戶，以及一部份不惟利用地權流轉作走私和囤積居奇的非法買賣發財的豪心夥

狂者，他在困難中對法幣的懷疑，他更聰明的想到這區田地是極富的，大家不約而同的紛紛購買土地，從後方到前方，從東南到西北，彌漫了農戶爭購土地的熱潮。近兩年來，這種地價飛漲與土地投機的惡浪，是只有加重，而沒有減輕的。

在西南大後方，一方面因為比較安全，同時又是游資聚集的區域，地權變動的趨勢更為猛烈。四川的情形最為顯目，重慶與成都一帶的地價，比之抗戰以前，已經增漲兩倍以上。其他像昆明附近，以及黔西，桂東，粵北一帶，游資聚集之處，爭購土地的惡浪也非常洶湧。不僅是原來的大地主在拚命兼併，而且還增加了大批商業資本的爭購。其影響所及，就是土地兼併之風盛行，地權更趨集中。更由地價與租價的飛漲，刺激了其它物價的高漲，打擊了人民的生活，造成社會的不安。

商業資本與土地資本是無孔不入的，在地價高漲的區域，固然有它們及抽資的餘地，即連過災荒地價騰跌的地方，也可以成為它們角逐的場所。例如去年以來，河南、山東、浙江、安徽等地，由於敵寇肆虐與人專不修所造成的災荒，使廣大農民陷於水深火熱，農村生產停滯。「在災情最嚴重區域，土地價格一落千丈，有不及原價十分之一的，暴利獲得者因之大量湧進，土地兼併的現象更嚴重地滋長着」。地權的集中，意味農民喪失土地，加深了農村封建關係的鴻溝。而土地的佔有主，對於他們所佔有的土地，大部份是分割出租，收取高額地租以積聚財富，小部份是留作自己種人來耕種？此外，還有一種最壞的地主，那就是他並不把土地當作生產手段去利用，反把它當作待價而沽的奇貨，弄得許多肥沃的土地，都不能適當的使用，甚至讓地荒蕪閒置。可是，大多數地租土地使用的農民，却又苦於無法求得土地，結果就造成「地不能盡其利與人不能施其力」的不幸現象。

由此可知，土地投機與地權集中，祇便宜了少數地主和其他幾國難財的暴發戶，對於國家民族則有百害而無一利。為了抗戰建國的利益，為了社會上最大多數人民的生存權利，亟應設法加以制止和取締。

我們知道國父孫先生遺教中關於解決我國土地問題的主張，有兩大基本原則，即對於都市的土地，為抑制土地投機，以實行地價稅及土地增價全部歸公為根本主張。對於農村土地，則以實行耕者有其田為根本要求。現在土地投機的現象，不但在城市發達，在農村裏也同樣發生，如果聽其發展下去，對於抗戰建國實大有妨礙。政府必須採取堅決方針與切實步驟，嚴格徹

收地價稅，並實行土地增價全部歸公的辦法，土地與地價稅均應按原期徵收，對於大地主應多加徵收，這樣一方面可以改正負擔不合理的毛病，同時又可抑止土地投機的發展。其次，政府應與社會生產機關，均應採取積極辦法，吸收大量游資到農工業生產中去，以打擊商業資本與地主經濟的結合，藉以改善農村經濟發展的條件。

業佃糾紛的主要徵候

跟游土地投機與地權關係變動的急劇，租佃制度也較前更趨惡化了。這而業佃糾紛也就層出不窮的發生了。

前節已經提到，地權的集中，意味農民喪失土地，因而也說擴強佃農的隊伍。根據中國農業經濟研究所二十六年十二月農情報告五卷十二期，及二十九年七月第十九、二十一期農情報告的綜合研究來看，從民國二十三年到二十八年這一期間，全國平均佃農增加與自耕農減少約百分之，可謂如下表：

年 份	佃農%	半佃農%	自耕農%
二十四年	二九	二四	四七
二十五年	三〇	二四	四六
二十六年	三七	二六	三七(註)
二十七年	三八	二七	三五
二十八年	三八	二七	三五

(註)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僅係後方十五縣的平均數

根據上表，可以看出近五六年來，中國佃農與半佃農百分率的增加，與自耕農百分率減少的趨勢，是很明顯的。四川的情形，好像變動得更快些，但是佃農增加與自耕農減少的趨勢，亦可從下面所引前四川稻產改進所與金陵大學農學院的調查統計中表出來：

年 份	佃農%	半佃農%	自耕農%
二十三年	四九	一一	三〇
二十四年	五〇	一一	二九
二十五年	五二	一〇	二八
二十六年	五三	一一	二五
二十八年	五四	一四	二二

又據陳翰生先生在中興村第八卷第五，六期合刊根據朱述仁劉清議諸先生調查所作的一個粵北南雄縣農戶成分表，也可看出粵北一帶農村分化的動向：

南雄農戶的成分變動表（以百分率表示）

年 份	地主或富農	富農	中農	貧農	雇農
民廿八年	七	十二	四十	三五	六
民卅一年	十	十八	二十	四二	十

表中的明證告訴我們，地主富農與貧農雇農都在增加，只有中農是在這落，而且三年工夫，就減少了一分之二，可見它的衰落程度是相當厲害。這和地主與貧農增加而中農減少的情況，正有說明農民喪失土地的趨勢。因為在粵北一帶土地投機的風氣亦頗為厲害，不但地價高漲是促進土地集約的原因，而且由于通貨的變化異常，從而業界獲得的利潤，也多半用于購買土地，又南洋的失陷，僑胞歸國所帶回的資本，也多用于購置地產。這一來，土地價格狂漲，土地亦更集中于地主之手，中農則紛紛喪失土地而墮落佃農，地主對農民的關係是益發加強了。

地權集中與佃農增加的結果，造成了地主提高租額的條件。大抵地主變換一次，都要發生一次提租的風潮，其目的便在於增加地租或押金。同時，狡猾的地主，更把政府田賦徵收的損失轉嫁給佃農去負擔，也往往實行加租。據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與西南經濟調查合作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都可以充分看出，近年以來，大後方各省地主對佃戶的地租，不但沒有實行政府「二五減租」的法令，相反地他們還實行「二五加租」。現在地租已增加到什麼程度了呢？據該會主任陳翰生先生根據他自己調查的結果告訴我們：「川東萬縣一帶的租額，竟是一佃戶二佃戶的租額」。中國農民銀行民國三十年五月所編的調查報告也說：「萬縣一帶的谷租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區多為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較為普遍」。

在四川租佃制度中，有一種所謂大春作物全歸地主，小春作物則歸佃戶的辦法。所謂大春作物，就是由地主的正產物如谷米等，小春作物則指油菜收穫的雜糧如胡豆等。大春作物必須全歸地主所有，於是佃農辛苦一年，就只能吃點雜糧，有時於極重雜糧也與他一部分歸地主，否則就有被佃的危險。還有二種定租的辦法，叫做板板租制，就是講定租額多少，由佃戶，每一

片面積給地主，不管豐歉收成如何，都要照原定租額交租，顆粒不剩減少。於是遇到災荒的時候，明明是收成減少，或者至顆粒無收，不但佃戶一絲辛苦，毫無代價，而且還要賠出租谷，如有欠少，即以押金作抵，如果不能補繳押金，地主立刻收回田地，轉租他人，佃戶因此傾家蕩產，妻反離家，亦所在都有。

又如去年秋季鄂西附近各縣鄉村，發生業佃糾紛案件頗多。原因都是地主增收押金，往年每畝十元者，刻竟加至五百元至一千元。如此，租額二三十畝的佃戶，竟須付出一萬以至兩三萬的押金，普通佃戶哪有這筆大的負擔能力！事實上即使有付這筆高額現金的可能，亦必使佃戶減少生產資本，結果又祇有收到高利貸的剝削下原去。地主堅持地租押金而由是價值跌落，可是當佃農被同鄉環逼，將以前所付押金每畝十元，升算為目前的法幣數萬五百元或六百元，或者要求退還原付的現大洋，地主却堅不承認。這筆果要佃農獨自負擔幣值損失，而地主却可獨得好處。這不但是佃農糾紛的一面，其他如由地租地租改為實物地租，以及少數不法地主強迫佃農代繳實物等因山所引起糾紛，尚不勝枚舉。

總的說來——現在業佃糾紛的主要緣由，是在租佃制度本身的缺陷，租額高得驚人，押金亦高得驚人，地主任意提租，並把田賦征實的損失轉嫁給佃農去負擔，這一切種種，無疑都是佃農農村生產力的剝削。佃農在土地租上增加收入，却絲毫不注意農民生產的改良，而農民亦不願在租地上，又實在沒有能力去改良生產，加以租佃制度毫無保障，農民亦不願在租地上進行生產改良。由于地權集中的結果，多少自耕農已墮落為佃農，佃農在在增加，而佃農生產條件均在惡化，這在目前大後方農村經濟的腐敗中，最近經濟界與地政學界，扶助自耕農與保障佃農的口號，是極其響亮，可惜實際情形正與此背道而馳，這就值得我們注意。國父先生曾說：民生主義第三講中曾說：「照理說來，農民應該自己耕種，耕種所得的農產品，應該自己所有。現在佃農，已不耕自己的田，而且所得的農產品，所生產的農產品，大半都是被地主奪去了，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又在「耕者有其田」的演講中說：「我們要保障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否則農業生產便不能發展」。這是一針見血的話。現在抗戰時期，要發力發展農村生產，更應去租地權。讓不能立刻收回耕者有其田的佃農，至少亦必須貫徹「二五減租」或「租額不得超過其產物百分之二十五

「的決令，法令標準應行減租，以減輕佃農負擔，並須嚴禁地主無故退佃，使佃農能得放租生機。這是目前大後方農村經濟中最迫切的問題，如果對此迫迫問題不聞不理，弄一切扶助自耕農與保障佃農的主張，就都容易陷于空論。」

高利貸與農貸

戰時農村高利貸所收的利息，是比以前大為增高了，並且還在不斷地增加着。由于物價騰貴和法幣貶值，高利貸者對戰前的利率早已不能滿足，即對於公平穩健的增加也認為是「無利可圖」了！因此，許多戰前的高利貸者，轉而從事于更有利的囤積居奇或做走私生意。繼續做高利貸生意的，則注意提高貸款的利率，乘機大發其國難財。如陝南川北一帶，戰前普通的農村利率，（月利）約為百分之五左右，但至去年底，每月利率已提高到百分之三十至五十。這還有一種邊境（在陝南則稱邊集利），借款一百元，送程碼一次，付利息十元，每月元碼，共付利息九十元，幾和本錢相當，即放債一百元，一月之後，就可變為一百九十元。河南某些縣份「利率的增加更趨驚人聽聞。據說，×縣有些「聰明」的高利貸者放債給農民時，在契約上並不寫明借款的數額，只寫着「所借數額可購小麥若干斗，每月利息若干成」之類的字樣，日後到期還債時，本息俱隨高漲之姿價增加。

其次，戰時農村高利貸的借款期限，是比以戰前縮短了。戰前借款期限，通常都在一年以上，或有長至三四年的。目前則是以一年為例外，而以六個月以內為常見的現象。放債期限特別縮短，主要的是因為受物價上漲和幣值跌落的影響。他們把資金迅速收回之後，再將高利的貸放或其他營利投機的事業。

第三，戰時農村高利貸者，特別重視物品抵押。在陝南一農民向高利貸者借得國幣百元，通常須提供二倍以上物價物品（如牲畜，田產等）作為抵押。福建浙江的高利貸者放債給農民時，多由由產為抵押。「保人」在抗戰期間，已漸漸失去它的重要性。這種重視物品抵押的現象，在戰前固已存在，但沒有目前這樣的顯著和普遍。它在農村中的影響，首先是給貧苦農民負債者以生活上極大的不便，且往往妨礙他們的農業生產。

第四個特點，是貸出法幣，收進高價的實物，這是戰時農村高利貸最顯著的特點。例如江西浙江一帶，貧苦農民在冬來春初的時候，向高利貸者借

到國幣五十元，秋收後繳納白米一担，借款期限不過六個月左右。福建有些農村，高利貸者以四十元貸予農民，以田地為抵押，每年分收該田所收的早晚稻各一次，平均每次約納谷一担給債權者（見福建閩侯公民林吉平等上該省參議會請願書）。又如安徽某些農村，有一個名叫稻債的，即是春天借米一擔，秋天還稻三担。陝南一帶的地主兼高利貸者，冬天貸予佃戶小麥一斗，按當時昂貴的市價合為法幣，春季收麥後歸還小麥，其價格計算，則以春季的較低麥價為標準。

最近，在鄰近淪陷區的地方，高利貸者貸款給農民，除照常計算高利利息外，他們還利用債務者的勞力，從淪陷區去挑貨回來。因為這些高利貸者有的是錢，往往比債務者所購買的東西為多。這樣高利貸者就可收取利息，又能無報酬地利用勞力，從能達到走私牟利的目的，真所謂「一舉三得」了！

在土地集中與不合理的租佃下，農民已受了重大的損失，現在村莊以高利貸的剝削榨取，其生活的困苦，是更難于設想了。土地集中，租佃制度與高利貸這三輪轉是互為因果的。因為土地的集中，乃產生了不合理的租佃制度，使農民生活窮苦，不得不陷高利貸的魔掌；然而高利貸的發展，又反過來成為土地集中的有力因素。

政府為救濟農村金融的偏枯，曾責成農民銀行與其他金融機關，發放農貸，最近更確定農民銀行為實施農貸及管理農業金融的專業機關。據農總業先生在一當前農貸之計劃與實施（見今年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大公報）一文所說：以民國三十一年度言，由農民銀行貸款加上政府中央兩府所移交農業放款，計共達六億八千二百八十萬元。農貸補助費應在法幣放款，農田水利放款，農業推廣放款，農業儲蓄放款，農業試驗放款，農國建設放款等。這些農貸在活潑農村金融方面，自然有它一定的作用。但也正如顧景雲先生所說一樣，這些農貸多半伴與荒涼經濟性質，對於一般貧苦農民農貸，促進農業改良，及提高農民生活程度」的重要宗旨，更沒有真正實現。實完成。第二，就貸款對象來說，我們知道所有的農村貸款，都以貧苦農民為其主要對象，因為農貸機關做農村貸款第一所追求的便是資金收回的安全，即在牠們的心目中擁有相當土地的富農和地主是比較具有信用的（事實上並不如此），而且目前各農貸機關的放款是要通過信用合作社或農民借款協會，能有資格加入借款協會或合作社的，大多是農民中較富有之家，貧農和

佃農是不得其門而入的。但需要資金最迫切的，却正是由貧貧最和佃農。第三，是農貸機關的貸款手續大多太繁重，而且有些辦理人員缺乏服務農村的素養，他們處處對農民表示不耐煩，結果農民向農貸機關借款好比上衙門，他們寧願向高利貸之門求援，而不敢向農貸機關借款。於是鄉村裏的土豪劣紳便上下其手，用低利取得農貸，再以高利貸的實質貸給農民。這些毛病，都很值得我們注意，而應急謀改善的。

關於今後改善途徑，顧先生在上述文中曾提出「應以農田水利農業推廣作放款中心業務，並以農田水利辦理為功，不但農產可以增加，且可抗乾旱。農業推廣介紹優良品種，直接增加生產，非特人民受益，即政府徵實糧購較易於推行。放款需借貨給真正佃農之農民，手續應力求簡便，以符合農時」。筆者以為這後一點尤為重要，確實，在農貸對象上，今後應該有一個方向的轉變：「放款需能貸給真正佃農之農民」。過去總以為地主和豪紳是最有信用的，為求貸款收回之安全計，農貸機關都把貸款貸給他們。佃農和貧農是沒有信用的，所以雖然借款最為迫切，但如求資金之安全，亦不能將款放給他們。但事實却證明恰恰相反，最守信用的中農貧農和佃農，貸款收不回的，却多半是地主豪紳所借的（在廣西、江西、浙江辦理農貸的人，都有這種經驗）。所以無論為了安全計或造福農民計，今後的貸款對象，都應轉移其方向於農民大眾的中農貧農佃農與雇農。同時政府對於農村高利貸，必須加以嚴格的取締，限制其利率，這是發展農村經濟不可少的一環。

勞動力的缺乏與浪費

拿農業與工業作比較，農業生產方面所需要勞動力的，遠比工業為多，這還是就一般的情形而論，以目前中國農業上的耕作制度與耕作技術來講，它的全部生產過程不都是人的勞動力量來完成的。因此，農村勞動力量實上是目前農業生產力的明確指標。

中國是一個大衆的國家，過去農村勞動力量有過剩，以致造成極大的失業現象。現在各地農村却普遍的感到勞動力的缺乏，但所謂缺乏，也祇有相對的意義，因為和缺乏的同時，却又又有大批勞動力量被棄置或浪費。缺乏與浪費，這是一個矛盾，但在目前中國農村裏面，却同時存在着（在城市裏也有同樣現象，不過沒有農村裏表現得這樣厲害），這是怎樣發生的呢？

關於農村勞動力的缺乏的問題，陳翰笙先生在前年雙十節所作「三十年來的中國農村」（見中國農村第七卷第三期）一文，就曾作了一個簡要的說明。

「抗戰期中，因為許多地方兵役實施的不得法，不管有用或無用的，有業或無業的人民，一概用兵差的舊法，使他們入伍，這對於農場上的勞力，也有很大的影響，許多農民應當去服役的，常常因為害怕沒有保障而逃避兵役（他們中間很多從事私販，或其他不生產的工作）。因此，農民的勞動力銳減，這個現象反映在僱農工資的驟增川東各縣壯丁逃避兵役的很多，雇農的工資在兩年前，只是二十六元到四十元，去年也只是四十元到八十元，而今年却非一百元以上不能僱到長工。許多地方因為兵役關係是勞力減少。這是荒蕪擴大的一個主要原因。荒蕪尚且增加，當然談不到切實的去辦墾殖，因為目前很多大的墾殖公司所遇到最困難的問題，也是找不到人工的問題」。最近兩年以來，這種農村勞動力的缺乏的現象，祇有加劇而沒有減輕。例如四川有些農村，長年工資已經漲到八百元以上，浙江農村長年工資則已漲到一千元以上。自然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主要的是由於物價的騰貴，但同時却也反映了勞動力的缺乏。因為今天很多地方，是由于荒蕪而使勞動力價格上漲的，並且，有的地方，根本上有僱不到人。

第二，荒地的增多耕作技術的粗放，因而影響到單位面積收穫量的降低。例如去年春耕時浙東各地農村因為缺水，無法下種，以後却復可以有機會改種雜糧，但是依然有不少田地，任其荒蕪，即使下種或改種，也是草率經營，而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勞動力的缺乏。

第三，婦女下田耕種，投入農業生產部門的現象，正在逐漸普遍起來。以前祇有福建西康等少數省份的農村，有此現象，現在則很多農村中，都可看到此種現象。婦女從事生產，本來是一種進步現象，但也正反映了勞動力的缺乏。

第四，抗戰以前的一「送工」現象，今天沒有了，繼之而起的，是「勞動力的缺乏」的呼聲了。

然則，造成這種勞動力的缺乏的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這裏，必須着重指出，今天大後方農村中這種勞動力的缺乏的現象，祇有勞動力的相對的缺乏，而不是絕對的缺乏。這一飢餓的本身，並不是不能充實的。因為造成今天這一飢餓現象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

(一) 壯丁的出征抗敵；

(二) 壯丁的逃役，逃役；

(三) 被非農業生產部門所吸收；

(四) 被社會所棄置和浪費。

在這些原因裏面，(一)與(四)都是可以克服的。至於壯丁出征抗日，乃是為國犧牲，為中華民族生存和解放。而且出征的壯丁，事實上並不少，確統計起來，每保真正服役的人還不到十人，倒是逃役避役之壯丁比應征的還多。這就提示我們，兵役制度急需改善，戰時工作與政治動員應加強(和)；鄉政的刷新也是迫切的任務。如果後方或後方底改善，將委員長號召十萬萬子弟首先服役的命令，如果真正能實行，社會風尚立刻會改變。不但壯丁能够自願接受徵召，而且可使壯丁在乘隙時多生產，這在兵役方面是減少逃役避役，在農業生產上減少勞動力的逃亡和浪費，以保證戰時農業生產的發展。

關於農村勞動力被非農業生產部門所吸收的問題，如果其被城市工廠所吸收，或被動員去作建設公路與飛機等，都是建設國防所必需，而且所吸收的數量也並不太多。所最值得憂慮的現象，乃是除了以兵役及被工廠吸收以外，還有大批農村勞動力被迫不得不離開農業生產，有些被引去作投機小商人，有些由于生計所迫，竟被社會落後勢力如同封建迷信組織所利用，而而走險，作危險的勾當，而且數量相當可觀，這實在等于勞動力的浪費。其間還有來自社會舊傳統和運用勞動力不合理的浪費，其數量更不少。不過中國社會已經習慣這些事情，常常不經意的忽略過去。根據國家總動員法的精神，我們應該做到「沒有廢事和廢人」，對於勞動力的浪費現象，必須認真加以克服，就要政治經濟有所改革和進步，這種現象也是不難克服的。

此外還可採取許多辦法，來補救農村勞動力缺乏所造成的困難。如動員廣大農村婦女羣衆參加農業生產，動員當地駐軍和自衛兵協助農民耕種，嚴格執行免除免役的法令，動員知識份子下鄉幫助農民改良生產等等。有些已經開始執行，有些則還需要政府和社會輿論加以有力的推動。

結語

上面已經把目前大後方農村經濟的主要特徵和改善途徑，加以客觀的分

析和研究。事之無善高論，我在這裏不過陳述事實而已。我爲什麼要不懈的陳述這些事實？因爲食爲民天，足食足兵，乃古今不易之真理。現當抗戰緊急關頭，軍糧民食，稍有不差池，前後方都不免發生影響。各同盟國家所以這樣重視糧食會議，實非偶然。本來，關於吃飯問題和穿衣問題，國父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三談和第四談裏面已經說得再透澈，很詳盡。一般說來，我們祇要切實地遵照孫先生的遺教，確定步驟，努力實行，便不難獲得相當的效果。不過事實上，自抗戰軍興以來，六年之間，經濟困難頗多，此，其影響于糧食者：一方面爲物價波動情形劇烈，若干重要糧食，往往不能繼續實際需要，或改良和增產等工作，就有事倍功半之感，一方面爲和備戰的奇蹟，高利貸的猖獗，農民感受現實的困難，實無法亦無力進行擴大生產，致若干農產產量減縮，而供應不應求之勢。尤以抗戰的進行和四川的甘肅兩省爲甚，此外還有一小部分糧食產區，也有減縮的現象。這現象，有人只歸之于天時與技術條件的落後；其實人爲因素，實居於地位，上述諸端，即其重要因素。中國有句老話，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對現在的抗戰程度，雖然還不能說天時，而地利和人和，却可以用技術條件之稱謂，不過這稱謂，必須以人和作先決條件。這就是說，一切技術性的改革，必須以社會性的改革爲前提。有人一味高唱農村建設，或對機械化農場，贊美不盡，而對於今天真正阻礙農村經濟發展的人爲因素，却一字不提，亦不設法去改善，這實在不是真正負責任的態度。古有「農時」之訓，我們所要求農村經濟者很大，而真正替農村經濟打算者却不多。爲飽求足食是兵動見，我三不能不重視現階段的農業，尤不能不針對現階段的特殊現象，連謀改善途徑。

代郵

寒館先生：

謝謝您的關懷和愛護！

對於「論遺棄」的批判，我們的用意倒並不是重視作者本人，而在於幫助讀者們正確的理解和警惕這些羊頭狗下面發售着一些甚麼樣的貨色。

茲將因與加強盟國團結之當前外交政策不合，無法採用，如須退還，望見示地址。

編者

三十二年五月稿

民族化問題討論特輯 (三)

編者按：爲着加深對民族化問題的研討本刊發起了一次筆談，感謝讀者諸君的踴躍與贊助，使我們得到很多可珍貴的意見，雖然，部份文章因爲收到較遲來不及在特輯裏刊出，很多預定的文章無法和讀者見面，不能不使我們感到衷心的歉疚。民族化或中國氣派中國風問題最自然的自然是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不斷地摸索，追求，但原則上求得一些共同的意見也有助於我們地實踐的。因此，筆談就此爲止，但民族化問題却仍有待於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與研究。我們期待諸讀者諸君繼續提出關於這問題的眞知灼見，我們更願將這本刊物作爲討論的園地。

論中國民族的新文化的建立

沈友谷

文化的內容是很複雜的。但無論怎樣複雜，一種文化的內部仍是保持着一個性的，從文化的「體」到文化的「用」，從「物質文化」到「精神文化」，從具體的生活實踐到抽象的理論思想，其間固然不無或輕或重的矛盾，但在基本上總是保持着一致性的。有這種統一性，那便成爲一整套的文化。

在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是有着一整套的文化的，正像在中世紀的歐洲有着「一整套的文化」一樣。但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直到今日，這「一整套的文化」是漸漸破碎了，但並沒有能建立起新的一整套的文化來代替，——縱觀民族內部的文化生活，我們只能看到支離破碎到極點的情況。

文化的根本表現是在人民的日常生活活動中間。例如從現在社會中的婚姻生活上，我們就可看出全部文化生活是支離破碎到何種程度。在舊時代的中國，對婚姻的看法，婚姻的儀式確是一整套的。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家與觀念，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觀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聘納

采納迎拜天地的婚姻儀式，以至夫婦關係，家庭關係上的道德觀念和法律規定……其間沒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同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都各有他們的自爲一整套的婚姻生活。但如我們所說，現在中國人的婚姻制度到底是怎樣的？我們幾乎無從回答。我們不僅看不到家長社會的婚姻制度和最「自由」的婚姻制度同時並存着；而且還有一種新舊是以前完全相反的扭捏捏捏的介紹見面，「交際一下」的過程，縱然是自由戀愛與自由結婚，却又與由雙方家長出面代爲登報徵婚，當官的男女社交與自由自便的觀念互相衝突。小家庭制度和大家庭的道德觀念互相衝突，三妻四妾不以爲怪前社會習俗和不容許妾的地位的法律規定又互相衝突，文明結婚——有着主婚人介紹人的地位，又似乎否定了自由戀愛與結婚……這一切自相矛盾的地方不知有多少。一定的婚姻的儀式——沒有，一定的對於戀愛婚姻的看法——沒有，一定的在戀愛婚姻上的道德——沒有。這就是當前中國民族文化的一個具體的標本。

因爲婚姻生活的支離破碎，所以戀愛婚姻上的悲劇層出不窮。因爲全部

文化生活的支離破碎，所以在生活中苦痛煩惱找不到出路的現象就永不能消滅。

從五四以來，人們不斷地討論建設中國新文化的問題，就是因為這原因。也就因這原因，到了抗戰中的今天，更得提出文化上的民族化問題。在抗戰這最後的手段，來爭取民族的政治經濟的獨立地位的時候，我們必須建立和建國的政治經濟相符合的民族的文化。

這就是說：我們必須脫離這種支離破碎的文化生活，建立內部保持着一致性的，自成一整套的文化生活。——這樣，個人才能得到「安身立命」的支柱，整個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也才能自由活潑地向前開展。

二、

提出文化上的民族化，首先就否定了文化復古論。舊時代的文化固然是「一整套的」，但這「一整套」已無法適應於民族的新生活。所謂中國本位文化論，如馬說，以民族向前發展的新生活為根據，那固然是對的，但假如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那就不過是復古論的改名換姓，因為可以作為「本位」的文化一定是一整套的，而成為一整套的中國文化，實不過是舊中國的文化。假如解決今天中國現實的文化生活中的支離破碎，其辦法不過是把中國舊文化再建起來，那就沒有什麼民族化的問題了。

全盤西化論在一定意義上是值得重視的，因為他勇敢地指出舊文化那一整套是不能存在了，而要建立的新文化不能不是另外一套。但是全盤西化論者又把歐洲中世紀文化與十八九世紀以後的文化（那本是不同的兩套文化）混為一談，就使他們自己所說的西洋文化不成為一整套。而且怎樣使新的一套文化能夠在中國土著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現在西洋已經成熟了的那一套文化簡單地移植過來，是否可能，這又是全盤西化論者所沒有認真考慮的問題。

但復古論者和全盤西化論者所看到的還是一整套的文化，而中稱為西學為用說，中西文化折衷論，那就只是現實文化生活中的支離破碎的反映，更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倘只是從這一整套的文化中拆出一部分來，又從那一套套的文化中拆出一部分，拼湊在一起，一定是處處發生抵觸，不可能由此建立完美的文化生活。

然而，我們也決不能以為，我們今天要把西方的文化推開，把中國舊文

化拋開，從平地上開闢新天地，建立民族的新文化。事實上，無論怎樣，我們為了建立適合於民族生活向前發展進步的文化，就不能不把人類文化生活中既有的成績當做我們的庫藏。但我們並不是依傍於中國舊文化，也不是依傍於西洋的什麼文化，更不是同時依傍這二者。我們不是做既有的文化的奴隸，而是做她們的主人，我們不是消極地接收中外文化的「遺產」，而是積極地把握這些「文化遺產」都化做我們自己體內的東西。我們不是因為這東西是在民族史上幾千年來的傳統，便加以接受，也不是因為這東西在許多別的民族中無往而不宜，便加以接受。我們要有我們自家的眼光，自家的看法，我們必須要那對於我們的生存發展真有好處的東西才接受下來。於是我們說從各方面接受下許多東西，構成我們的文化生活，却仍能保持著內部的「一致性」，仍是一整套的文化。

因此，我們為了從眼前的支離破碎的民族生活中，建立新的文化，就必須有一個標準，用這個標準來取用中外文化遺產，開展新的方向。

這個標準不就是馬列主義思想自身。假如我們在評價中外文化遺產時，只是取絕對是否符合馬列主義思想而決定取捨，那麼我們就不過是馬列主義的教條主義者，中國民族今天所可能建立的新文化既然不是社會主義文化，當然也就不是馬列主義的文化。馬列主義者只能以自己的思想武器來服務於現實所需要和可能的民族文化的建立，（在這裏就有馬列主義中國化）却不能以自己的思想來做全部民族生活的根本。

假如說，這個標準就是現實的情況和由此情況中所產生的需要。那也還是馬列主義的教條。我們倘以為民族的新文化的建立只是工業化的問題，以為生產經濟工業化之後，文化上的問題自然完全解決，那就只表示我們自己沒有勇氣來正視民族的文化生活的發展，並提出確定的方針來。

那麼這到底是什麼標準呢？

三、

五四時代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標準，這二者的來源雖是歐洲的近代文化，然而以這二者為標準並不是主張「西化」。「全盤西化」論者說對於五四文化運動不滿意於其「不徹底」，雖然中體西用論和復古論又認為太激進了。在民主與科學在民族的文化生活中還沒有佔統治地位的時候，誠然民主與科學仍應是文化生活中向前發展的光輝標誌，拿這二者來做標準，我們是

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們不能不進一步問，為什麼民主與科學至今還沒有能滲透入我們全部的民族文化生活中呢？——為什麼科學與民主已經喊了二十多年，但是在實際上還沒有在牠們的基礎上，發展出一整套的文化，而成為現在全部民族的文化生活的主流呢？

要說明其原因，固然不能不提到中國民族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畸形發展——文化生活的畸形發展正是其反照，但是在這裏我們也不遑討論政治經濟生活的因素與影響，只從文化生活自身的發展規律中來討論這問題。而這種討論也是必要的。因為對於文化生活的不能健康發展，有兩套的枷鎖，一套是物質的枷鎖，一套是精神的枷鎖。解脫物質的枷鎖固然更順於於解脫精神的枷鎖，但也並不是只要物質的枷鎖一解脫，精神的枷鎖就自然解脫；我們可以說，精神的枷鎖比了物質的枷鎖常常是更加加重難返，不易於消滅消除的。

束縛民族文化生活發展的精神枷鎖，自然就是歷史傳統的賦與。因此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要提出反對舊禮教的口號。

但假如沒有新的東西來代替，對舊傳統的破壞是不能起作用的。五四時代雖然提出了民主與科學，但是結果怎麼樣？至今我們看到，舊文化生活傳統中被毀壞的，只是一些形式，牠的精神的實質却沒有動搖；反而滋進了民主與科學的形式中來，滋進了民主和科學的充分的成長，使得民主和科學只剩下虛壳。那麼我們不能不更進一步探求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實質到底是什麼。

假如我們只是從腳腳布解脫了婦女的小脚，却沒有得到婦女的精神上的解放；假如我們只是得到了「文明結婚」的儀式，却依然不能不保留着主婦人的地位使結婚當事人覺得做主的並不是自己，那麼我們得到的只是舊之而破破的壳。科學剩下了空壳就只是換個理工，民主剩下了空壳就只是選舉制度與會議儀式。假如我們只是買椟而遺珠，那麼我們其實並沒有得到什麼，也沒有解脫那歷史傳統所賦與我們的精神上的枷鎖。

四、

我們要提到在討論中國文化問題時常常要觸及的兩個問題：第一是夫與

人，第二是理與情。我想，與其說，中國傳統文化是重人的，無寧說他是重天的。所謂天是

指自然界，外於人的物質，超於人的力量。道家所看到的天是自然無為的天，儒家所看到的天是規律森嚴的天。但他們根本上的主張却都是以人從天。道家順天之性，儒家從天之理，對於他們，獨立的自覺的自作主張的人是不存在的。再加上儒道的合流，於是人的因素是更被消滅了。——老婆要服從丈夫，臣民要服從君上，那是因為丈夫和君上都是天的代表的原故；道德條例有着神聖性，萬世不易，因為道德是天意的象徵。於是在國破家亡的時候，士大夫慨嘆一下，天意如此，尙復何為？便也悄然地服從新朝了。甚至在梁山泊上起義的好漢所打的旗號，也只能是替天行道，而不是人的自覺。

其次，我想，與其說，中國傳統文化是重情的，無寧說是重理的。既然沒有獨立的自覺的人，則也就不能有情的自由發展。「梁而不淫，哀而不傷」，正是對情的自由發展的束縛，加以束縛的就是冷冰冰的理。道家享受了道家形體的束縛更是主張以理化情，消消了情在生活中的作用，雖然看起來像是消滅了情，但實質的人却完全被取消了。

一面是以天從天，一面是以理化情，於是所有的只是天理，沒有了人情。當然，我們若全稱肯定地說中國傳統的文化生活，只是死板板地壓制人情的天理，完全沒有人情那是不公道的。事實上，在中國文化史上時時發散着燦爛的火花，那正是人情衝決了天理的圍防的表現，沒有這些，我們就不能有詩人像屈原杜甫，有歷史家像司馬遷，有宗教家像玄奘，有政治家像王安石范仲淹，有歌歌的孤臣像蘇武文天祥。我們不能否認，在儒家的傳統中，有天理的一面，也有人情的一面。孔子的精神比後世的庸儒更有足多者在此，儒家的傳統中有比道教的傳統更多值得發揚者也在此。

但人情一詞，在今天，也許會引起許多歧義的聯想；那麼，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確定的名詞，是「人道主義」。

孟子上說得好：「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積，而哀為本焉；士雖有爭而行為本焉。」我們也可以說，民主與科學雖然消滅了但其一「本」却是人道主義。「置本不安者，無務豈末。」我們也可以說，人道主義倘不在人心中生根發芽，民主與科學也就不會開花結實。

人道主義不是什麼理論，却只是在生活中最簡單平易的信任和態度。但當「天理主義」壓殺了人道主義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在感情與思想上建立獨立自尊的體度，不敢有所懷疑與反抗，也就產生不出科學；就不肯把旁人也當成是和自己同樣的人，不能對旁人的悲歡喜樂有真切的感受，也就產生不出民

主。人道主義的態度不是可以做假的，而是發自衷心，自然地流露於待人接物之上。但正是民主與科學深藏在人心底裏的一粒種子。

沒有人道主義的精神，我們就只能從一種教條走到另一種教條，永遠接近不了科學；沒有人道主義的精神，我們就只能從一種專制走到另一種專制，永遠接近不了民主；沒有人道主義的精神，我們就只能用學究的理論解釋一切事件，永遠不能真切感受人民中的悲歡哀樂；沒有人道主義的精神，我們就只能像個傀儡那樣宣揚教義，永遠不能以燃燒的熱情去為所嚮往的「天國」，生死不渝地鬥爭。只有從深厚的人道主義的精神上，我們才可能實地建立以民主與科學為根本的文化生活。

人道主義啓發了人的發現。不經過人的發現，我們就仍是束縛在精神的鎖中，我們就仍是在精神上的奴隸，精神上的奴隸是沒有科學，也沒有民主的。他不能自覺是人，我們就只好奴性而沒有人性，奴性與科學民主不能並立。所以在精神方面，我們必須在生活的各方面徹底掃蕩奴性，在精神方面，必須建立獨立自負的人。這是民主科學的基礎，這是建立民族文化的根本問題。

論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遠庸

作風，是實踐過程中「作」與「爲」上所表現出的一類風格；氣派，是表現在客觀上的一類風度。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作風，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氣派，不勝枚舉；這一集團與那一集團，這一階層與那一階層，這一民族與那一民族，這一社會與那一社會，其作風，其氣派，都各有不同，都各具其自身的特點。商人，多精明而好計較，農民則多粗疏而崇尚樸實；西洋人大多注重功利，中國民族則常以誠實爲民族之美德。誠如馮友蘭先生所說：「假使一個英國人，因有某種成就，受了別人誇

獎，照英國人的規矩，他對於誇獎與獎人必容許，應該是：『多謝你的誇獎』。或：『多承誇獎，感謝不盡。』假使一個中國人，因有某種成就，受了別人的誇獎，照中國人的規矩，他對於誇獎與獎人底答復，應該是：『不敢當』，或是：『毫無成績，還承過獎。』在這種情形下，英國人的答復是承認自己已有成績，而中國人的答復，是否認自己已有成績。』（見馮著：新世訓第五篇）自己已有成績，是，并不以有成績自居，在對話中，反用「謙讓」之詞說：「錯了呀，先生！你對我的誇獎太過了。」以此表示對誇獎者的一種禮貌，這在中國說來，

正是中國民族的一種優良作風和氣派。照西洋人的習慣（不僅英國人如此），受誇獎的人以「錯於過獎」來回答誇獎的人，覺得還未免太不客氣了，其實，這就是民族與民族間的作風與氣派各不相同之故。

所謂「作風」，乃是特指爲人作事的「風格」而言；所謂「氣派」，是指爲人作事的「風度」而言。「風格」是有意識的，是主觀上有這樣一種要求，須如此作，這要求在實踐行動中經久變爲一種格調，這種格調就是我們所說某人或某民族在對待事物當中的「作風」。「風度」是無意識的，是從作風

五

由此我們可以推論說：從五四以來，就是堅持以科學與民主爲根本精神的新文化，這方向是對的。但接受了傳統的「天國」，性「人情」的文化影響，民主與科學也被看成了只是一種思想，甚至只是制度與研究方法，於是不能在全黨文化生活中蓬勃發展。現在我們要在根本上對民主與科學的文化生活，就當揚棄切的人情，自覺地入道主義，使民主與科學不是在外身外的一支獨樹的枝，隨時用時棄自己，却是發自衷心而生活發展；在這種情形下，立刻產生自覺的科學。

於是我們可以大膽地向中國舊文化接收遺產。我們所應接受的，不只是思想而應是具體的表現。在每一時代的遺產中，我們應接受的人物的身上，在這種遺產中，思想遺產，生活態度，新人的精神，人道主義的表示。我們也可以大膽地向西方文化，特別是近代文化學習，但我們應學習的，也不只是現成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成就，而主要的應是現代文化科學的科學的科學，科學的科學過程中的態度與精神。——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到與自己民族的悠久的文化傳統恢復自信，也才可能去吸收西洋文化中的精華；我們也才能不致受西洋文化和中國舊文化所俘虜；我們自由活潑地建立我們民族的新時代的文化。

中很自然流露出來的一種態度，這態度不是有意做作，而是積年累月，表現在客觀上的一種態度，這態度就是我們所指某人或某民族在對待事物當中的「氣派」。

「作風」與「氣派」，可以說是「作事」的兩面，在實踐過程中，表現在為人作事的「為」與「作」上，是「作風」；表現在為人作事的态度上，是「氣派」。一個人有某一種「作風」，必然會有某一種「氣派」，正如中國古語所說：「有語內，必形諸外」。故意做作的態度，總是很容易「露馬脚」的。在大學有這樣幾句話：「小人閉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爾說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這是說，小人陰為不善，而在表面上又想掩飾起來，殊不知「欲蓋彌彰」，想掩飾其惡，而終不得掩飾，想詐其為善，而終不得詐。某一種「氣派」，終必為某一種「作風」所決定，反之，某一種「氣派」，或多或少也可能影響到某一種「作風」。

作風與氣派，是決定於社會條件與歷史條件的因素，是可變的，是發展的；不是去重複舊的，而是要去創造新的。

上面，筆者曾指出「作風」是主觀的，有意識的作為。這理所當然，是否是個家所指的「誠意正心」所言？或者可以這樣說，主觀就是「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之謂。不過，「誠意正心」只能作一種倫理的稱謂看，絕不能作為解釋問題的一種科學根據。如果一個農民與工人，或者一個文人與商人，其心俱出之於一個「誠」字，可是，其作風，其氣派仍各有不同，又如像一個失業農民流落到都市，被人介紹到紗廠工作，也

變為工人，也同紡紗工人一樣地工作——按時上班，按時下班；他一面照顧自己的工作，一面也同時要留意與自己部門有關的工作。如此，他過去在農村中那種粗疏而迂腐的作風，結果可能漸漸地變，變為精細而明快的風度。一個窮愁潦倒的文人，如果改操筆桿而為操算盤的時候，舊時文人的氣質，也可能因此發生變化。這就是說，「作風」與「氣派」在實踐過程中，常常被一定的社會條件所制約；同時，在一定社會條件下，觀念在那裏發生變化，而「作風」與「氣派」也在那裏發生變化。

由農民作風到工人作風，由文人氣質到商人氣質，當是一個歷史的變革過程，所以，在「作風」與「氣派」的轉變過程中，社會條件是有着決定作用的，可是，歷史的習慣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影響；此點，在某些集團生活裏，如某一學校，某一工廠，或某一民族，歷史習慣的影響，是表現得特別顯著。例如，學得自由的風氣在北大，是開始於民國七八年蔡元培先生長北大的時候，距今二十餘年，此種風氣尚存在於西醫聯大，這不單是說歷史習慣的作用。又如，中國「豪俠」的風氣，實始於戰國末期，這是距今幾千年，此種風氣仍流行於某些社會階層，這也就是一種歷史習慣的作用。

上面所謂「粗疏」也，「迂腐」也，「精細」也，「明快」也，「自由研究」也，「豪俠」也，事實上，這些都不是屬於倫理的稱謂，至於論及「作風」與「氣派」的特點及其可變性，更不是屬於倫理的範疇。所以，第一，儒家「誠意正心」的觀念，絕不能解釋「作風」與「氣派」的諸多問題，因為「作風」與「氣派」既不完全屬於倫理的範疇，同時它是要受到社會條件與歷史條件的制約的；第二，正因為「作風」與「氣派」要受到社會條件

與歷史條件的制約，所以也必然會成為可變的；成為發展的東西；第三，今天我們需要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很顯然，不僅是形式的問題，同時也是內容的問題，不必去重複舊的，而應是根據社會條件與歷史條件去創造新的。

優秀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是優秀的遺產的，創造新的，是善於接受舊的遺產的，並勇於吸收外來的優尚。想從舊的遺產中找出各種典型的優良作風，更難從人民生活裏開闢新的泉源。

社會是變動的，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因此，「作風」與「氣派」也不會永遠停留在舊的階級上。昨天認為合時的，今天或許不一定合時；昨天認為優良的，也許今天認為優良之點已發生了變遷；要從前充實之，或改變之，才能適合今天的需要。儒家有所謂「中庸」之道，按照孔子的解釋，「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道。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如果我對儒家唯心的觀念加以分析，則則論的推理，僅根據一個科學家的角度來看，那末，「中庸」之道，就可以解釋為對客觀事物的不誇大，也不低估，是忠實於客觀事物之一種定理。定理，也可稱為法則，不過，「中庸」這不能稱為衡量客觀事物的一種法則，僅僅是說這法則本身為事物的一種基本態度。另一方面，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時也。」依此說，則中庸，君子之中庸，是君子能隨時以處中，小人則不然，無所忌憚，常違乎社會常理，時有過之，時有不道。以現在的話說，就是要恰合時宜，「能隨時以處中」。昨天的法則拿今天用，自然不合時宜；

君主專制時代以忠於君，忠於個人為基本道德；在民主政治的時候，還是以忠於君，忠於個人為基本道德，更不用說，是不合時宜。這正如朱熹所說：「中無定體」，社會條件變了，對待事物的觀念也得變；儒家對「中庸之道」不把它深固在一定的觀念下，只是儒家不願意接觸到這一個問題，由於它受思想上的局限，也不可能接觸到這一個問題。

我們論及今天承襲中國傳統與中國氣派的優良傳統的問題，也就更得「中無定體」的道理。一方面我們要承襲這些優良傳統，一方面我們應依據現實的社會條件與歷史條件，去充實，去改變這些作風和氣派，這就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的道理。以儒家的思想而論，從孔子一直程朱來臨王，除孔子本人而外，就不完全是孔子的思想，自黃仲舒而後，最為顯著。大體上說，儒家的思想從孔子起，無一不吸收外來思想，這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上，實有「春秋繁露」，至是用陰陽家的思想來解釋儒家的，此種思想流傳到晉魏的時候更盛。程朱在孔孟儒學，可是在他的思想體系裏却充滿了道家佛家的思想，關於這一點，王陽明倒坦白得多，他說：「佛氏本來自西，即我們所謂良知。」自己直陳與佛家思想的關係。這種吸收外來思想，在學術上說來，倒不是一件壞事，實際上，儒家思想在吸收外來思想的結果，反而發展了儒家思想，造成宋明時代有體系的學術思想，從認識論，宇宙觀，直到對社會與人關係的一般見解。而且此種發展，也是隨社會條件與歷史條件的變動而發展的，不過後世儒者，為要維持它那虛偽的道德的尊嚴，不願意承認外來思想對儒學的影響罷了。所以，我們要承襲優秀的中國傳統與中國氣派，不該要發過去，同時也發了現在，不僅只知

道中國的，同時也要懂得外國的，要把這許多足以滋補我們血肉的東西，都把它從實踐過程中統一起來，這樣才足以承受并創造中國優良作風與優良氣派。不然，不是老八股，便是洋八股；或者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組派。

這是中國優良作風與優良氣派呢？

第一，發揚樸實的作風。「樸」有兩種解釋：一是簡單，即「樸素」之謂；一種是不誇張，不過飾，即「切實」之謂。在農業社會裏面，樸實是美德，無論從簡單樸素上說，或從不誇張，不過飾上說。由農業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的工作雖趨趨簡單，可是人們的生活內容卻更複雜。一個扭螺絲釘的工人，雖然他在整天僅限於扭螺絲釘工廠各部門，如果從他的生活內容來說，不僅他的生產部門，或全國同性質的工廠可以說影響他，乃至不同性質的企業，也可以影響到他的生活。如美國的煉鋼業工人，因與他不同性質的煤礦業工人混工，煤礦業工人的生活，立時就受到了煤礦業工人的影響。這種情形，在自然經濟的社會裏是不會有的，因社會條件的限制，人們的生活內容總覺得多。社會發達的，人的生活因社會的進步也說弄得更複雜。我們在複雜的社會裏處理問題，或用說，絕不能像在自然經濟的社會裏一樣，採取了工業的方式，自流的，事事都靠自己動手。事實上，「事必躬親」，在資本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的社會都是不可能的。在複雜的社會裏處理問題，不是要簡單化，而是要條理化。像一部機器似地，不管怎樣複雜，只要組織嚴密，各部門絲絲入扣，如此，不用「事必躬親」，也可能出「分工合作」收到工作的實效。分工合作，這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處理問題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正因為「分工合作」，在

處理問題上，不誇張與不虛飾的作風，發揚樸實，也就是說，「實事求是」的作風，更須要發揚。

中國這一個民族，本處於求實精神，求實的作風，發揚現在兩方面：一方面表現在不誇張，不過飾，一方面表現在力行，發揚所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敏於事，而慎於言。」又「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君子欲其言而過其行。」這些都表現在一個「行」字。魏晉時代，士大夫趨尚清談，後世儒者以此說之；宋明儒者空言性理，清初顧炎武痛詆學究以此非之；並以「道」，詩以言志，南北朝時清談學究之詞，也為唐宋時代的文人所不取，這些都是表現在中國人是一個「求實」的民族。如果從「求實」精神與進步的科學方法相結合，那末，它才富於現實性，中國民族「樸實」的風度，才更富於現代意義。不過，在作風上說，「樸實」，在氣度上也應該是「樸實」的。

第二，培養雄偉的氣魄。中國民族是發揚雄偉的氣魄，在待人接物方面，或在文藝修養方面，常以氣魄的雄偉為人生或一個民族的美德。孔子於被圍的時候，他說：「天生德於予，桓桓其如予何？」這表示孔子雄偉不有，臨危不亂的氣魄，會子交馬背躍理，知義之所在的地方，就是千萬人，他也勇往而敵之，不稍畏怯，具有一種「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的氣魄。他如文學修養方面，有所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因杜甫詩裏的「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之句，在文學作品方面，有漢劉邦之「大風歌」，唐張王之詩或則天文，或武穆之「滿江紅」一文天祥之「正氣歌」……等。這

些都是說明中國民族對「氣魄雄偉」的一點特別珍視的地方。

氣魄也是表現在客觀方面的一種風度，所以，也有人把風度稱為「氣度」，「氣派」，乃至「氣質」。

氣魄既是人們客觀風度的一種表現，不用說，雄偉的氣魄，自有其內容存在，絕不是沒有內容的「妄自尊大」，筆者茲舉孟子之所謂「浩然之氣」為例。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依朱熹的註釋，他說：「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礙。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也就是說，凡善養浩然之氣的人，必肯在明夫「道」與「義」，正如孟子答孫丑問，「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這裏，孟子很顯然把「義」與「道」作為「浩然之氣」的主要內容，而沒有把它變為一種神秘的東西。依陰陽家的解釋，把「氣」之一字神秘化，那是以後的事。

然則，何謂「義」？朱子的答覆是「義者事之宜也」；何謂「道」？則曰「道者天理之自然」。如果「道」「義」二字用現代的語來解釋，前者可說是指宇宙的法則而言，後者是指社會的法則而言。人則要培養「浩然之氣」，第一就要了解宇宙的法則與社會的法則。第二，在實踐上並不是出之於機件，要專事合乎義，合乎自然的法則，合乎社會發展的法則，以現在來說，合乎團結抗戰的需要，合乎民主的進取。如此，自反常道，無愧於中，而浩然之氣才隨之俱生。由此，可知浩然之氣不僅不是神秘的東西，而是要根據一定的原則，在實踐

過程中把它具體化。再具體一點說，浩然之氣的培養，第一在「明辨」，第二在「尚義」。明辨，是在培養一個人的理性生活。因為宇宙間既有「我」的存在，「我」就應該有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

「我」雖然有「大我」與「小我」的區別，但兩者是對立的，同時又是統一的。「小我」并不因「大我」的存在而消滅。如果因「大我」的存在，完全忽視「小我」之獨立存在和發展，人云之，我亦云之，使一切「小我」都變成「奴隸相」，試問這有何氣魄可言，歷史上領港的幫閩文人，可以說就是一個有氣魄的。其次則曰尚義，一個人能夠明辨是非，懂得「我」有獨立的思想，不是唯唯否否的一副「奴隸相」，他也才知「義」之所在。「義」字，是中國民族待人接物的最高原則，例如，子路問孔子說：「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小人無勇而無義，義為盜。」在別的地方，孔子又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又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隨處均以「義」字作為待人接物的準繩。凡是以義為尚的人，才可能產生偉大的氣魄。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够居仁用義的人，就是至富且貴，也不能動其心，至貧且賤，也不能挫其志，雖刀鋸鼎鑊在其前，也不能變其節，這正是雄偉的氣魄，正是孟子之所謂「浩然之氣」。

因尚義之故，於是乎，在歷史上，也就產生了「重氣節」的美德，孟子謂：「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為

義而死，就是一種氣節。中國民族，是一個重氣節的民族。史家哲人常用「浩然貫长虹」之句，來形容由氣節所表現出來的氣魄。另一方面，在歷史上若于志士仁人確也在實際行動上表現出他們那種「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而無所懼」的偉大氣魄。譬如宋末的文天祥，當他被執，并處在這「生」與「義」之間的時候，結果，文天祥毫不畏怯，選擇了後一條路，為民族就「義」而死。臨死前，他會寫了這幾句話在他的衣帶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由這幾句話和天祥就義的行為來說，就正表現了文天祥那至大至剛的偉大氣魄。再如明初的方孝孺，當燕王成通他改就位詔書的時候，雖被舌焚身，而孝孺之志，仍至死不變，這「當此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和行為，也正表現出孝孺的一種偉大氣魄。凡是氣魄偉大的人，在他們的行為上，無不屬於倫理的範疇也。好，或善倫理而趨於善，都有其過人之處。此種過人之處，一方面是主觀的，一方面也是由於客觀的影響所致。孟子雖認為「志」是「氣」之歸宿，但「持其志，無暴其氣。」「氣」也可能或多或少影響到「志」，使「志」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如

以中國民族的「義」——寬厚與謙遜來說，一般庸俗的人對氣魄的了解，大多誤以為「妄自尊大」，因之，無論在主觀方面或客觀方面，都很容易表現出一種「人的」或「民族的優越感」，現在尚希特別及其影響下的日耳曼人，就可以作為此種「妄自尊大」的代表。殊不知，氣魄愈大的人，那種「妄自尊大」的作風也愈少，反之，氣魄愈小的人，「妄自尊大」的作風也愈甚。換句話說，氣魄愈大的人，更懂得寬厚和謙遜，反之，則很容易把寬厚謙遜

的作風也愈甚。換句話說，氣魄愈大的人，更懂得寬厚和謙遜，反之，則很容易把寬厚謙遜

的行為變為「鄉愿」，或者變為商業資本時代的「市儈」作風，甚或變為「自誇」的妄人。我們讀史到廉頗與蔣相如的一段故事，不能無此感慨。相如因瀾池之會，位至上卿，廉頗非常不高興，他公開說：「我見蔣相如，必當面辱他。」相如知道，避不見蔣頗，每出，望見蔣頗的車馬，則急急趨避。相如從人，都不以相如之畏蔣為然。當時相如向他的從者說：「以秦王那樣威靈，相如不懼，尤當而辱其羣臣，試問蔣頗與秦王比較如何？我何能與長庚將軍？相如惟念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只因我兩人還在，如身二附非門，兩敗俱傷，遺於秦有利，於趙則有損，我之為此，完全是先國家之意而後私也。」從相如吃此案，與蔣頗相如的故客來看，就知道相如的氣魄，遠非廉頗可比。正因為有這樣地的氣魄，廉頗在為趙抗秦的大前提下對蔣頗能有此堅忍不撓的過人的風度；相如此種堅忍實厚廉頗的趙人之處，在客觀方面更表現了相如氣魄的雄厚，而廉頗則反之。

創造新風氣

某種社會風氣常常可以表示一個國家民族在某一個時候的歷史特點，一個民族往往不容易一下改變的，也就是這種歷史傳統所形成的社會風氣。因為演變成社會風氣的，最主要的是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動，影響到人民生活習慣的方式和風俗

人情的道德觀念，歷時既久，隨演成風，這也就是所謂「世風」。因而處在這種風氣之中，由於身處其間，所以便慢慢地造成了一個民族不同於其他民族的國民的特性和風度，或者說是這個民族所特有的

作風與氣派。因之，社會風氣的好壞，對於國民性的影響非常重大。社會風氣是可以改變的，它是隨着歷史的演進而變化，不過有的時候這種變化是很容易一下看得清楚的。中國幾千年以來長期受着封建的統治，在前一歷史階段，中國社會風氣的改

、嚴謹也、堅忍精神做起。
 第三、勇於吸收外來的文化。這一點，在中國歷史上是有，並沒有在歷史上顯示出一種優越的時節，且常因門戶之見，和狹隘的民族觀念，在中國歷史上起一種阻礙的作用。雖然如此，外來的文化，在那裏，仍不斷地向中國流入，也不斷地被中國民族所吸收；在吸收的過程中，也曾促進了中國民族文化的向上發展。我們在歷史上可以找出若干顯著的例子，如以制度來說，則有趙武靈王的改制，以文學來說，則有沈約因梵文而定四聲；以藝術來說，則有唐代的音樂，與漢明帝以後中國雕塑和繪畫作風之改變；以學術思想來說，則有儒家思想因印度宗教思想之推過，反變成儒家之思想體系。這些具體的例子，是說明吸收外來文化優秀之點，變為自己的血肉，這不是一件壞事，理由在前，當曾提到過。當科學發達，世界上優秀的文化紛紛雜陳的時候，我們對外來文化更應該吸收，而且要勇敢吸收。過去，我們以為吃菠菜是富於營養，便使今天我們發現了番茄更富於營養，那末，除了吃菠菜以外，我們更要多吃番茄。如果有人放棄菠菜不吃，僅吃番茄，我們固然要譏笑其為傻子，可是，有人以為番茄是來自外國，而放棄

菜不吃，僅吃菠菜，我們同樣譏笑其人為傻子。在近代史上，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對於吸收的，當首推孫中山先生。他首先吸收了歐洲的科學思想與民主制度，並在吸收中融匯成中國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缺點；後來，他更勇敢地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思想，並在國民黨改組的時候，確立對蘇聯的外交關係，臨死更在遺囑中確定蘇聯為中國兄弟之邦。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到，吸收外來文化也須要有偉大的氣魄。在晚清高壓下，中山先生能接受民主制度，與革命方法；在民國十二年，國際反蘇潮流當中，他確立對蘇外交關係，并發覺蘇聯社會主義思想，這都是中山先生氣魄的偉大處，正是會于所說的「自取而縮，萬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像這種勇於接受外來優秀文化的氣魄，雖在我們歷史上不是一個顯著的時節，但這種優秀的作風與偉大的氣魄，我們應當盡量發揚。因為只有這樣，才使我們更接近現實，與接近真理。
 上列三點，筆者僅羅列往事，姑試論之，不過綱舉目張，能够把三者統一於實踐過程中，多在老百姓當中摸索，那更可能作出最後結論。創立新作的風與新的氣派。

谷 谿

變，就不容易一下看得很清楚。自辛亥革命以後，若和封建時代的情形一比較，就有很大不同了。中國的文風，文體雖幾經變革，但其精神一貫為宣揚孔孟之道，代聖賢立言，則沒有多少變化。這反這精神的只有一些神官野史，唐宋傳奇，宋元戲曲，明清小說，也只有從這些書裏我們還可以呼吸到一些「生民」的氣息。待到五四以後，中國文風不覺，那是大大不同了。不但文章精神已經大大不同了，而且連文字語言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對於聖賢人們敢於批評了，對於古代文物，典章制度，有的地方也敢於提出懷疑之點了，這時歐洲先進文化與中國的古老文化接觸了，文風的精神隨轉向科學與民主，文字語言由文言文改為白話文，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一大革命。可惜這事情做的並不怎麼徹底，一方面保存了「封建殘餘」的士八段，一方面生硬的搬運外來文化，自己始終沒有消化，以致走向新的偏向，產生了洋八股。在我們的工作作中，文化思想中，將的東西有，舊的東西也有，然而那樣俱不切合實際，於是便形成了一個極壞的作風，也不管是說話，寫文章，辦事，都有這種極壞的毛病。所以我們需要創造一種新的氣派和作風，這種新的氣派和作風正可以改變我們處事為人的正確的態度，同時也就是對於思想方法的根本的改造。假若每個人都能以這樣的精神來辦事，做人，那麼，也可以智識成風造成一種社會上的新風氣。這種新風氣可以推動抗戰建國的大業，急速前進，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人民，今日我們正需要朝這個方向努力。

創造新風氣，固然須要政治和社會的各種力量來配合，但今天我覺得應當首先提高人的自信力和創造力，沒有人的力量是一切事情都辦不成的。所謂新風氣，最主要的是指文章作風，工作作風，為人類態度的改變。首先要打破市儈主義的庸俗作風，講情面，不負責任，怕火燒湯自己，見面「今天天氣哈哈哈」，不關心民生疾苦，點頭彎腰，趨炎附勢

，見風轉舵，事情明明做壞了，還要故意遮掩逃避一頓。那裏敷衍塞責，麻木不仁的官僚主義作風也要不得，還有「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也一樣是得不到的，你自己不做壞事，不同流合污，固然好，但是見了壞事不批評，遇着不合理的事情不干涉，不憤慨，那無異於你同意他們做壞事。中國人現在有一個極大的毛病：就是說的多，做的少。並且說來說去，還是老一套，很少新東西。大家多年不肯動腦筋，凡事不肯用心想一下，仔細研究一下，你說左他覺得對，你說右他覺得也對，橫豎都好。這種「大而化之」的作風，最為壞事。此風一長，實事求是的精神，必然淹沒，在這情形之下只會模仿學樣，自己沒有創造性，事事仰賴他人，缺乏自信力，人云亦云。那結果，無論做人也好，說話寫文章也好，辦事也好，都造成了粗枝大葉，以一半解為滿足的「差不多」的作風。若果政府社會風氣，便是一種極壞的東西。今天我到作一個中國人，真是一點也驕傲不得，因為我到每一個人都負了一份國家民族的責任，國家大事做好做歹，我們人人都有的一份。從做人上來說：每個人當然有每個人的不同的作風和態度，但中國人應該有一個大家所共同要求的一致的中國作風與氣派。這就是說，在我們做人的態度上，首先應當胸襟開闊，眼光遠大，辦事認真，切實負責，有自信力，有創造性，肯用心，肯研究，不敷衍，不苟且，知一是一，不知二，凡事均須經過慎重的考慮，然後才可判斷其是非或是否，決不隨波逐流，不負責任的亂說一頓。用全副心腸關心民生疾苦，誠懇懇切。把國家國民的精神貫注到實際生活中去，實地到基層工作中去。不管大小事情，即如研究學術也好，只要眼睛看到，心裏想到，嘴裏說到，必要在事實上也能做到才成。我以這種種為人的態度和工作作風，正是中國今日所最需要的。

我們要求中國文風的改變，第一還是先從個人

民族化雜談

傅君

文化上的民族化問題的提出，在今天有其特別重大的意義，這意義在我們回憶起歷史上的慘痛的時候，尤其會深切地感覺到的。

今天的國難環境，與「五四」當年在某一點上是相同的：「五四」當年，中華民族長期受封建束縛與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下，不健文化上迫切地要求有一個啟蒙運動，而當時的國難環境則是列強歐戰方殷，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某種程度的抬頭，加上日寇對滿洲力的加重，民族覺醒的高漲，這種形勢是民族向上發展的一大機會。文化上反迷信反封建反剝削，主張民主，主張個性解放，主張科學學理理性這一狂瀾的捲起，確有其時代的背景。因為當時的中國正處在一種革命的時代，文化思想上這一偉大的進軍，是恰與此發生血肉相聯，相成相因的。

今天的中國，抗戰已整整六個年頭，就戰勝利的曙光已現，我們民族正站在最高的峰頂，民族復興的旗幟，但同時由於日寇佔領了廣大領土，日本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勢力的結托，維新復古武斷，一切思想文化上的極端後腐化的毒藥仍在播種，這種新舊的形勢，我們需要展開一大思想文化上的新運動。「五四」時代的啟蒙民主科學等領性與個人的解放的奮鬥精神，是今天中國所最需要的，我們今天正需要重新樹起「五四」當年文化思想上革命的大旗向前進軍。

但是，今天已不屬於「五四」當時。當時的救國必需首先來自於對封建的攻擊，對封建的後遺，克服其缺點與不足，正是今天的迫切任務。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始於「新青年」的創刊（一九一五年）結束於人生觀的論戰（一九二三年），一共共八九年。這八九年中，中國思想文化

的文章作風做態。文章作風是從人的生活態度和工作作風來的，首先要生活得「真」，能忠實於生活，方能忠實於學術，忠實於人民奮鬥的事業。什麼是好文章？切合實際，適合需要，有內容有意義，文字簡明生動，活潑有趣的文章，就是好文章。就八股，說起來人人頭痛，為什麼？因為它空虛無物，言之無味，脫離了實際，不合乎人們的需要。所以我們今後要改變文章作風，第一不切實際的文章不寫，第二不合乎人民需要的文章不寫，第三空虛無物的文章不寫，第四言之無味的文章不寫。總之，要根據實際和需要情形來寫，文字要生動活潑，簡潔了當，新鮮有趣。無須顧慮一定的格式體例，要大胆地創造新的形式，新的風格，不要墨守成法。舊的形式可以利用，外國的東西可以學習和吸收，民間的藝術精神和形式更可以大量地採用，但必須推陳出新，不能一味遷就模仿，或生吞活剝的套取，應着重努力創造新的，發展新的，完成新的風格和形式。新鮮活潑的東西，只要有生氣，人民總歸歡迎。因此，我們反對舊八股，不是完全拒絕中國舊有的古典文化，我們所要的是仍舊會有生氣，合於今日人民需要的進步的文化成份；我們反對洋八股，也不是完全排除外國的文化影響，而是吸取它的好的成果，變成爲自己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東西。中國民族文化的發展，受異族文化的影響很大，特別自漢魏六朝以來，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響很大，近代則受西歐各先進國家的文化影響，這許多外來的文化影響和中國固有文化結合起來，便形成了中國文化的不斷的新的發展。所以我們並不害怕「洋化」，外來文化只要和中國文化能夠切實結合起來，那外來的東西就已經變成中國的，而不再是「洋化」的東西了。今天我們討論的「民族化」，依個人想也就是這個意思，無論從外來文化也好，中國古典文化也好，現存的民間文化也好，我們研究這些東西，學習這些東西，其最終目的，是把這些優良的成果加以提煉和吸收，使之更切合今日

的需要，和實際密切結合起來，創造出真正的中國新文化。在這意義下，我們反對文字語言的教條主義。以爲提出了「民族化」，便認爲現在中國新文學或藝術就是「民族化」的了，這是錯誤的。比如說中國的新詩來說吧，有的人總以爲五四以後的白話詩，和現在的自由詩（或稱新詩），不是「民族化」的詩，都是外國的「歐化」形式，不錯，新詩是採用了「歐化」的形式，但它的表現內容却是中國人民的生活實際和感情，語言形式也是中國的，它決不是外國詩。由舊詩改爲新詩，開頭一定不無幼稚膚淺，甚或產生偏向，可是中國新詩它是正在沿着「民族化」的方向發展，這是不容否認的。未完成的東西，就不能說它不是「民族化」，不過它的發展還不够完全，我們要加倍努力使它完成起來，他全起來。中國新詩，我不願看有些人的意見，主張把舊詩變成變相的新詩，要寫究格調韻律，這無異於提倡復古。我同意魯迅先生前所主張的意見：中國新詩，要唸着順口，看得懂，聽得懂，爲了便於背誦，便於記憶，押大致相同的韻，音韻響亮，不用生硬澀澀的字，不用講來拘口的句子，並且盡量要便一般人都容易領會和了解，當然不降低它的藝術價值。新詩要有一定的情感意境，讀來親切有趣，方能動人。所以中國新文學的「民族化」，首先要了解中國民族生活習俗的特點，語言形式的特點，並切實研究中國人民的需要是什麼，同時對於民族文學優良傳統，如何加以發揚和利用，都是須要注重的，只有這樣細細地考察，慢慢地研究，繼續不斷地努力去做去，才能真正創造出「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無派」的新文學來。

至此，又說到關於接收文化遺產的問題。這問題已經討論過多次了，原則上已無可爭論，好的接收，壞的排絕，但事情並不這麼簡單，也不是說的如此絕對。做起來決不如說的那麼容易，好也不是絕對的好，壞也不是絕對的壞，好的當中有壞的，壞的當中有好的。這就出現了高文光芒，留下了無窮的遺憾。歐戰從宗教改革不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運動，這一長時期的思想運動過程，我們八九年來頭等完成了還是它最偉大的一點。我們由今來回顧過去許多主將們戰鬥之勇，氣概之大，是值得我們衷心敬佩的。

然而「五四」儘管有它光輝的成績，卻並沒有完成它推動歷史向前進的任務。「五四」的光輝，很快被強大的舊勢力所壓下；承接「五四」而來的新時代運動之未能完成，這固然是因爲這是一股衝動的暗潮，固然是因爲民主革命不徹底，是有很多原因的，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事實。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事實，「五四」運動的勝利，與其限度，不足影響到這一次大革命的前途的。

「五四」的缺點，在於它只注重西方運動的民主主義文化思想，而忽略了這運動，它只是把中國舊有的封建專制的鎖鏈「名義」地打斷了，它只是把中國舊有的東西，成爲中國可行的東西。它只是把封建專制的名義，而缺乏實質的批判，以至未能徹底打破思想的束縛，指示出一條具體的道路。所以說這第一筆抹殺的遺產不能從中吸取其進步的已深深影響中國人民的好部份。

「五四」最大的一個缺點，即所謂「說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五四」所發動來的運動，是十八世紀歐洲西歐民主革命時期的進步思想，這在中國當時是需要的。可是「五四」時代，已是二十世紀時代，新的時代與新的科學思想新的科學方法論，已經必須要我們藉此來了與推動中國前進。武器，這一方面，做得特別不够，以至「五四」僅僅只能是一標語口號的運動，而不能成爲真正展開一統的與解決實際問題聯繫的一個運動。十八世紀的民主思潮與理想，是決計不能解決此種解決中國問題的，所以北伐時代就顯得我們思想文化上力量貧弱

X X X

境的中有好。況且所謂「遺產」，不單是指中國舊有的文化遺產，連現在所有的也應包括在內，此外還有吸受外來文化的翻譯介紹工作，也都包括在內。我的意見，原則的正確，固然必要，但更重的是如何切實的辦法。最好能提出一些具體的辦法或意見出來，不要空談空論。我以為有幾點可以大膽說出來，也要切實去做。比如：多介紹一些好的外國作品，名人傳記，新的科學發明，介紹，或者加以改編，使適合於中國讀者的口味，可以說譯大民門等情。外國讀者的口實，不機應是民族的革命運動和生活背景而生風寫等等。關於承襲中國文化遺產的問題，不僅是對於的整理，更有實踐的，比較到實踐的，是對於歷史人物傳記，提倡民族氣節，正視感，發揚民主精神。

民族化和接受文化遺產

我想，所謂「民族化」，是把他從任何一件含有普通真理的現象，不管它是在那一個國家首先出現，也不會是什麼主義，原則，定律或方法，都拿了來，假借自己民族的裝束的具體條件，利用自己民族的人，物力和財力，造成適合於自己民族的需要的東西。他並不是說要消滅或激進外來的自己民族的東西。隨他舉例說，我們若沒有最新式的鋼鐵機器設備，這大砲的種類與好向外國買來，可說是「民族化」的。假使我，購了外國機器，請了外國技術，自己設廠造出特種鋼米，自造「民族化」了一些，可是這不徹底。只有等待我們有了自己的技術，有了本國造出的機器設備，用本國出產的原料來造特種鋼，這才算是徹底「民族化」了。不過我們的時候，不一定要一下子就把外國和外國的一樣的好，而且也不能以趕上了外國的為滿足，應該更求改進，所以民族化的工作，應該是一個長期的不間的過程。簡單地說，民族化就是普通真理在一個民族內的具體實現和繼續發展。說到接受中國文化遺產，可分歷史經驗的總結

，編述某個時代的政體思想史，文化發展史，描寫當時人民生活的狀況，描寫歷史上抗禦外侮的人民鬥爭，以及歷史上人民英雄鬥爭的經過，和現實生活向描寫，各種科學知識的介紹，中國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英勇鬥爭的故事，發揚「抗戰中的好人」。能寫小說的，就寫小說，會寫詩的，就寫詩，但一定要把舊的優良的傳統精神，和現實生活以及抗鬥鬥爭密切結合起來，並且注意自己的寫作，真正能為人民所愛好，所歡迎。這種全國都來提倡，大家切實分頭去做，又說又做，社會上新的風氣，不好的風氣就會慢慢被打倒，而創出一種新的風氣來。一旦蔚成風，對於中華民族將會有一番新的氣象展露出來，中國人民也就躍躍了他們重光復家鄉的前途！

七月十四日

黃 燾

和寶藏的發展兩方面（其實也可說是一件事）。前者需要我們整理自己民族的歷史，從通史一直到政治、經濟、哲學、藝術、科學等等分類史，後者則需要我們把這全部加以整理和治練，取出其中精華來交給大家使用。在接受民族文化遺產的口號下，嚴肅會有過一個時期，印了不少古書。可是那些古書，對於我們年青人，像一塊塊的化石一樣，簡直是無法接受和使用的（以拿時代較近而且易於民間文學系統的元人雜劇來說，其中也還有許多方言並不能完全為我們年青人所懂得）。所以我希望文化界前輩，把古書名稱慎重地選擇一翻，選出好的用現代語翻譯出來，或者在保存原作的精神下，加以改寫或刪節，並附上一些較長的序談之類的東西，對原作加以詳盡正確的論述，如像蕭軍所寫的《聖誕節故事》那樣，又如像茅盾等先生所編的《中國文學史》那樣，這對於初學者是極有價值的幫助。這也應當由比較少數的專門學者來負責，而不要由圖文化遺產的權利，則應屬於中國最優秀的大眾。

經過歷史無情的狂浪的摧殘「五四」思想前鋒的陣亡，一部分從失敗中走向「整理國故」的道路，這是一部分清談的逃避。另一部分身首異處，走上新社會科學的科學的科學，以及開始藉此來從底層研究中國社會，這當然是一大進步，而且表現了成績。可是這在整理上，也與「五四」當時無異，「做」的工作是做了，「化」的功夫則差得很，始終未能與中國實際生活血肉相連，沒有創造而只是機械套用，這結果，是使中國思想文化運動乃至政治運動受到極大的損失。

由於這一切反動的東西，不僅在「五四」，而且在本國「九一八」以來民族危亡的歷史，被侵略的書報，撫今追昔，實在感憤萬端。

過去文化思想運動上的病態在什麼地方呢？一句話說便是沒有真正的民族化。「五四」失敗固然在這裏，「五四」以後的新社會科學運動的失敗也在這裏。我們當此民族危亡的變遷已啓，世界為民主而戰的前途，萬丈光輝的現在我們必須緊要地把握住過去教訓，向民族化的道路前進了。

那末文化上的民族化，是包含什麼內容呢？

首先文化上的民族化，必須是一個新的文化思想運動的展開。我們不要只顧「五四」的民主科學性的精神，沒有這樣一個適合於中國今天所必需的，想文化運動，來輔助政治的前進，我們就無從談民族化。

其次，我們要廣泛的吸取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一切進步的思想文化，一方面接受傳統的遺產，一方面切實地中國的實際，加以創造與發揚。我們要捨棄「五四」時代的狹隘性，同時捨棄「五四」到「五卅」以後的機械搬運的方法，沒有這種態度，也就無從談民族化。

其次，是科學的文化思想運動。不僅是為大眾的，而且必須做到是大众的，大眾化應該要緊。只有科學才會有真正力量。同時我們必須處服停止在白紙黑字的階段，而從生活中去實踐，去與大眾的命運切實聯系起來。這是克服「五四」狹隘的，這是在知識份子中的缺點的一個方面，這才能使新的文化思想運動更有力量，也就能使民族化。

從幾首歌謠來看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正文

(一) 歌謠中兩種不同對照的中國作風與氣派
 中國文化的來源不外兩種：一來自士大夫；一來自民間。現在讓我先各引幾首歌謠來對照看看他們的作風和氣派。爲了篇幅，也只能引幾首，而且是隨便引的幾首。

一 屬於士大夫的

劉邦：「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思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名不利兮誰不遊，雖不遊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曹丕：「……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美哉行)

魏明太后：「臨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關關，楊花飄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臍，春去秋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楊白花)

二 屬於民間的
 唐虞時民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詩經衛風，伯兮：「伯兮殫令，邦之桀令，伯也執殫，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寤寐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騶車，會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漣。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廬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具殽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共三章，二三兩章略)

河水清且漣漣。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廬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具殽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共三章，二三兩章略)

樂府古詩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從舊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雖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纈，故人玉纖素，織纈日一疋，織素五丈餘，將絲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水滸：「赤日炎炎氣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民歌：「張打鐵，李打鐵，打把花送姐姐，姐姐惜我款，我不歇，我要回去打毛鐵，手鐵打了三斤半，娘兒手每都來看，喊你嬌，你不嬌，把你嬌子燒了蓬蓬我。」

自費某女祭夫文：「那一日叔的夫上買芥，奉來天氣熱得恨，叔的夫歸家來，設個鍋

，攪付補藥大家喫。叔的夫染了酒，炒子痛得只是抖，急忙忙，出房門，到歲把藥尋，歸來不見叔夫身，叫雲兒討魂尋，尋到茅廩才見人，忙將痰痰吐，一下倒下銀牙床，攪起來，發了氣。」

由上面幾首歌謠的對照，可以看出代詩與古詩

級的士大夫文學與屬於被統治階級民間文學的不同作風與不同氣派了。

何以見得呢？就是士大夫的詩歌，它想也

，誰能過得個人的英雄氣概。如劉邦在「大風起兮」之後便想將猛士召去守四方了。而失散與項羽，霸王爭不到手，便只有大歌共蓋世之悲劇，而曹丕則過過他的賦的詩詞，聊以忘憂而

活，而魏明太后則過過她的詩詞，聊以忘憂而

法，是絕不同於統治者口中所宣傳的那樣殺人放火的可怕，相反，張李對人民還是關心的，只有在人民不肯去躲避，遭到死傷時，那就真可奈何了。證之李自成的書牘將士書所載：「殺人父者如殺我父，淫人母者如淫我母」來看，我懷疑他們所殺之人決不比官兵要多一些，但無論如何總不會殺到十六萬人之多的。（宣傳的荒謬可笑！）

由上面的材料看，這兩種不同作風與不同的氣派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士大夫在詩歌中的作風是雄壯豪邁，空虛誇大的個人英雄氣派，或表現出他們逸豫自得的作風，而也流露出他們的悠游氣派了；在人民方面，特別是農民，表現在他們的歌謠中是樸素勤懇，與渾厚誠實的作風，而他們的氣派也是勤懇渾厚的。同時把中國民族的堅忍謙和的特點，也貫串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這在他們的歌謠中是可以看得出的。

（二）這些歌謠所顯現的民族特點底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讓我就這一點來多分析一下吧。比如唐虞時的歌謠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是農民終日勤苦的寫照。詩經上的伐檀，人民天天去砍木料，砍過後再運到河邊，如此終日不停的工作着，但努力所得的，反要供給那些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的統治者那多的物租！采。並且還要上貢一些飛禽野獸，讓它掛在屋裏優優去享受，而僅僅發生若是君子那是不會白吃的歎息！這是多末堅忍渾厚的氣派啊！

伐檀詩都是對兵役（對內的）所給予他們的痛苦而發出的一種呼號。詩的作風却表示了哀傷而不怨，渾厚而不刻薄。這種中國民族的特點，在這些歌謠中也反映了他的作風和氣派。此外如樂府古詩也示出中國婦女在遺棄中的忍耐精神。張打鐵歌也是渾厚敦樸得對統治者不涉怨言，對張李也無愛憎，只是道出他們之間的實際關係而已。自費某女的祭夫文，這是一個不學的婦女，僅僅

爲了表達她的一種情感，寫來是這樣的渾厚自然，活潑新鮮，雖與國計民生無關，但在民間文學上，這種作風與氣派，是老百姓最喜聞樂見的。

（三）接受中國文化遺產，要怎樣才能使兩種來源配合起來

接受中國文化遺產，首先要有一定的標準。標準的第一個應該是注重民族的特點，承繼民族的優良傳統，這就是民族的。標準的第二個應該是進步的發展的，而不是迷信的保守的，這就是科學的。標準的第三個應該是生動活潑，明白易懂，爲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這就是大眾的。

如上面所說，只不過把這首歌謠中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略加分析，而中國民族的特點便包含在裏面。特別表現在農民的身上。農民佔中國人口的大多數，這種作風與氣派的繼承和發揚，其本身便會爲老百姓所喜聞樂見。我認爲中國人民刻苦耐勞的堅忍精神，是幾千年民族的優良傳統，需要我們去繼承和發揚是不成問題的。但我們必須懂得忍字的另一方面，如民間所謂「百忍堂中有太和」，「守本分而安歲月」，「存天理以度春秋」，這便養成了一種過且過的心理，形成爲中國特有的中庸之道，妨害了人民大眾反抗鬥爭的精神，所以在中國歷史上，當農民忍無可忍的時候，雖也會發生過不少的暴動，但結果都遭受了失敗。其原因便在缺乏一個綱領。這就要向士大夫身上去找，甚至向世界其他民族去找。（被略）

其次山水詩一首赤日炎炎的歌謠，引出梁山泊一串串反貪官污吏可惡可泣的故事，一百零八個英雄好漢，聚義梁山泊，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幟。它與漢末桃園三結義的故事同樣值得我們注意。但在這裏，我們更向士大夫去學習，吸收他們的精華。如伯夷叔齊的義不食周粟，岳飛的驚天動地的壯烈，文天祥被俘作囚時的正氣歌，史可法抵抗外族的死戰等。流傳在他們的文章裏是雄壯豪邁，表現在他們人格上是浩然正氣，這些忠義節烈的故事，

留傳民間，便千古不絕。而諸道，樂檢，洪承疇，汪精衛之流則志不恥于人口的。這種傳統與美德，也形成了中國重氣節的作風與氣派，我們必須發揚光大這種作風與氣派，使真正的浩然正氣充滿天地。將古人「一死何慷慨」與「留得丹心照汗青」的作風與氣派，而發展成「同着千萬的人們，踏着我們的血跡前進」的作風與氣派，這才適合今天我們的要求。

最後，我們既然知道了中國文化的來源有兩種，今後的發展方向必然是面向着民間。但我們必須吸收士大夫那裏發達過飽，規模宏大，技巧優美等等好的作風與氣派，同民間的樸素誠懇與渾厚誠實的作風與氣派配合起來，才能創造圓滿的進步的新的作風與氣派；同時也要改正士大夫最易犯的浮華與誇誇其談的毛病，力糾過去文字與語言脫節的現象，反對洋八股而帶土氣的黨八股。民間是不少通俗的東西值得我們學習的，如自費某女祭夫文，便是渾厚自然的民間文學，是供我們努力大眾化的借鑒的。如果對這些舊形式而能灌輸進去的新的合乎科學的內容，使它更加新鮮活潑起來，老百姓自然會喜聞樂見的。當然我們要注意老百姓所常聞常見的一些壞的東西，如反科學的迷信，如反進步的落後意識，如不追根究底，愛聽歪曲的宣傳等。這就是說不僅要普及而且要提高。那就需要我們掌握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方法，與深刻體會中央所號召的調查研究底精神，緊緊把握中國民族的特點與中國社會的具體環境配合起來，在做人，作事，研究，作文，開會，說話各方面，都不脫離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實事求是的埋頭去幹，以高度的責任心求創造性的發揮。在這種情形下，新的作風與新的氣派自然會建立起來的。而新的作風與新的氣派，又必然會爲老百姓所喜聞樂見，進而成爲常聞常見。這必如魯迅先生所說：「正如走的路，其實本無所謂路，因走的人多了，自然便成了路。」

信箱 論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

編者先生：(上略)我們這一羣青年，平時都歡喜看雜誌、什麼雜誌都看，只要是買得到的。

你買這一種、他買那一種，大家互換着看。看後有亦不清楚的，提出來隨便談談，大家都很感興趣、也很覺得有些進步，有時，一個問題也會談上一兩個星期還談得不到結果，那就來找我先生同我們解答，這就費事了；先生很不容易找，找到了，又不一定答覆我們，到此我們的苦悶就很大。現在我們又有一個問題，這次想請你做我們的先生，替我們解答。問題提在下面，千萬勿讓我們失望。

有不少刊物上說，這次世界大戰，顯出一個民族主義；反對侵略，保障各民族都能獨立，是今天全世界的共同信念和努力的目標。今天民族主義抬頭的日子，國際主義完全破產了。這種說法，我們總覺得不以為然，但又說不出所以然來。又有的刊物上說，國際主義是想以一個主義或一個階級來統一世界，所以反對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是不是反對民族主義呢？今天是不是民族主義抬頭，國際主義破產的日子呢？(下略)

一羣願做學生的青年

一羣青年朋友們：你們的問題，提得很有意思，據我所知，提出意見了來參加你們的龍門陣，至

於要不要使你們失望，那就不敢說了。

我們首先應當弄清楚了民族主義到底是什麼，我以為民族主義有兩種有革命的民族主義與反革命的民族主義，二者應分別清楚，不可混為一談，革命的民族主義是真正的民族主義，就是不讓自己的民族的利益受到任何外力的壓迫，不讓自己的民族利益受到任何外力的壓迫，要一切力量，一切方法來保障民族的獨立，自由，爭取民族的解放，這種民族主義是反侵略主義，馬克思，列寧所講的民族自決，民族自由聯合，也是這種民族主義，馬克思所提出的大西洋憲章，主張戰後各國到底採用什麼政治形式，應由各民族自己決定，也是這種民族主義。反革命的民族主義，就是利用民族利益做幌子，使廣大人民去替少數勢力的私利冒險，替他們火中取栗，用自傲自大(和自尊自信迥然不同)教育自己人民，把自己看做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把別人看做劣等民族，因此要征服全世界，把侵略別民族，併吞別族，當做自己民族的利益，天職，歷史使命。這種民族主義是侵略主義，武士主義。歷史使命。這種民族主義是侵略主義，武士主義。歷史使命。這種民族主義是侵略主義，武士主義。

試問今天所抬頭的到底是那一種民族主義呢？是希特勒的民族主義，日本軍閥的民族主義嗎？或大什麼大什麼的民族主義嗎？那全世界今天正在

起而攻之，要把他們打倒無條件投降。顯然不能說今天是這種民族主義抬頭的日子。孫中山，列寧，馬克思，以至維希爾，邱吉爾他們在大西洋憲章上所講的那種民族主義，即主張民族獨立自立，爭取民族解放自由的民族主義嗎？那麼，這種民族主義早就在人間抬頭了，並非到今天才抬頭。

其次再來弄清楚國際主義到底是什麼。最能說出國際主義的精髓的，是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同時也是警告：「壓迫別的民族主義，其人民也無自由可言」。這就是說國際主義者，是反對自己的民族去侵略別的民族，壓迫別的民族，反過來說，凡反對以侵略別的民族，壓迫別的民族作為自己的民族的利益的，亦叫做國際主義者，所謂國際主義並非反對革命的民族主義，它所要反對的其那種反對革命的民族主義，偽的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和真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一致。如果民族主義可以說是一己私利於自己的民族，那麼，國際主義可以說是一己私利不欲，勿施於人，不願自己的民族受到侵略，受到壓迫，也不肯讓別的民族受到侵略受到壓迫。古人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民族主義就是「民族吾民族」國際主義則是「民族吾民族以及人之民族」。「己之謂忠，民族主義是也，「推己及人之謂恕」，國際主義是也，忠恕之道，一以貫之，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是水火不容的。要抬頭，就二者都抬頭，要破產，就二者都破產，說這一個抬頭的日正是那一個破產之日，這是沒有認清兩個主義到底這些怎樣內容的緣故。

編者

本期零售二元

內政部登記新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八五號
東山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第一類新聞紙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渝安誌字第九一八號審查

衆 群

期 四 三 十 第 卷 八 第

爲元首逝世誌哀

我們怎樣堅持了華北

六年的抗戰

意大利是不堪一擊的

法西斯主義的真面目

金的問題

整風二三心得

思想的漫步(二)

從民間文化論接受文化遺產

彭德懷

達戈

杜德

許滌新

石帆

胡繩

蘆蕪

版出日一十三月八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爲元首逝世誌哀

國民政府林主席於八月一日下午逝世。這是抗戰中全國人民最哀痛的事，是國父逝世後我國最大的損失。林主席臥病以來，我們每天以最關切的心情，讀着病況的公報，而每次讀到病況的公報，總是衷心歡慶早日康復。

林主席終於昨日離開了全國人民而逝世，我們敬致最悲痛的哀悼。

林主席承繼國父的遺志，畢生奉獻於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十二年來，更親自領導了抗戰建國的偉大而艱苦的事業。不僅全國敬仰，友邦亦莫不欽佩。現在正當我們的抗戰建國處於最困難的時期，同時也是更接近勝利的時期，我們需要林主席的領導，而林主席竟因爲國難中遺棄心而歿，不及親見抗戰的勝利建國的成功，當是最遺憾的事。

然而，我們可以告慰林主席，全國人民當承繼林主席的遺志，遵循林主席的遺教，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加倍努力，早日完成消滅敵寇漢奸的任務，達成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使命。

林主席給全國人民的指示很多，很寶貴，我們謹略提幾點作我們努力的方向，將我們對林主席的敬仰和哀悼，化爲對民族國家其更大職責的努力。

我們應該記住林主席在去年五月廣播中的遺教「精誠團結，一心一德」，把我們所有的一切貢獻給民族，共同從事抗戰工作。爲了克服困難，走到勝利，我們除了精誠團結，團結無間，將我們的一切，金錢，才能以至於生命，貢獻給抗戰事業，再沒有別的致勝之途。哀悼林主席，我們必當團結

，加強團結，鞏固團結！

我們也應該記住林主席在前年元旦廣播中所警惕和指示我們的話。林主席指示我們：「在這抗戰大時代的中間，由於全國的軍民，一切忠勇愛國的

余忝任國民政府主席十有二年，國難空前，時深敵愾，自中央奮起圖存，決策抗敵，委員長領導全黨同志，全國人民，統帥忠勇將士同心禦侮，效命前驅，卒使寇氛漸戢，正誼昭宣，國際同情日增，平等新約於焉締結，益見得道多助，有志竟成。曩隨國父之後，服膺主義，致力革命，原期於國於民，有以自効。現值抗戰建國同時邁進，而余以精力就衰，未能導揚盛治，目觀中興，曷勝遺憾。所望同志同胞，盡皆曉然於暴力之終應失敗，公理之決不消亡，精誠團結，淬厲奮發，一致祖述國父之遺教，服從總裁之命令，各爲國家民族盡其責任，於以驅除殘寇，再造中華，庶幾世界和平，有所保障，人類幸福，得免摧殘，躋世運於大同，奠邦基於永固，其共勉之。

事實表現，中華民族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已經是很發揚了，我們國民的民族精神，已經恢復到相當的程度。同時，更勿忘記林主席所說：「我們國內的漢奸敗類，還是不少，前方後方和敵後的一般民衆，也還沒有完全盡到國民的責任。譬如汪逆兆銘等偽組織份子，替編名號，甘心投降敵人賣國，又如後方少數不肖份子，發國難財，囤積居奇，又如前後方和敵後一些墮落份子醉生夢死不知振作等等，都是很可痛心的事實。我們應該由此而警惕，我們還得努力提高民族精神。而最重要的，就要如林主席所指示：「爲澄清抗戰陣營起見，必須加緊提高民族精神，剷除這些漢奸敗類，感化這些不肖和墮落份子。」哀悼林主席，必需發揚忠烈，剷除漢奸敗類。

我們還應該記住林主席對長權民生各問題的解決，也曾有極寶貴的指示，如「在政治方面，是用全體國民做基礎的全民政治」，如「我們應進行經濟建設，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以達到民生優裕的地步」。

（均見前年元旦廣播）

林主席的這些遺教，引導我們完成抗戰偉業，而尤爲今天之所急需。只有認真的澈底的在行動上執行這些遺教，才對得起林主席，才能安慰林主席的英靈。

林 森

不讓法西斯休息

德寇索里尼上台到今天，已快兩禮拜了，全世界人以興奮和期待的眼光凝視着歐洲，意大利和德寇治國家的人民以度日如年的心情等待着盟軍的號令，而在雷雲不雨的狀態之下，兩個禮拜過去了，無窮無盡的平靜下去全世界人民的心，又開始要過問一九四三年能不能夠打垮納粹這個老問題了。

兩禮拜的日子證明了「索里尼去了，而法西斯制度還沒有消滅」(蘇聯紅星報七月二十七日的社論)這論斷的真實。巴多格利奧一面作準備「退出戰爭」的姿勢，一面却乾吼着要「戰爭到勝利為止」，從政府機關的門口撕下一個法西斯黨標誌記不說表示法西斯制度的死滅，(被略)兩禮拜過去了，德國人還在西里，還在羅馬，還控制着意大利的心臟，在撒丁，在科西加，在布累納山隘，德國的軍事力量是強化了，兩禮拜，巴多格利奧已經替希特勒完成了爭取時間和空間的任務，十天以前被人們認為索里尼之「政敵」和「反對派」的巴多格利奧政權，已經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他「掩護法西斯政權」(中央社倫敦二日電)的真面目了!

羅斯福總統說：「法西斯主義不容許有絲毫的殘留」，邱吉爾首相說：「吾人除以大規模之最大壓力加諸意大利全境軍事目標之外，無需另作新的決定」，解決「掩護性法西斯政權」的緊要政策，幫助意大利人民起來選擇他自己的道路，「大規模的壓力」是這唯一有效的方法。意大利人民等待得太久了，希臘人民等待得太久了，法蘭西人民等待得太久了，多一天觀望等於使德國有多一天的準備，也可以說等於使全世界人多一天戰爭與奴役的災難，我們要使一九四三成為一九一八，對搖搖欲墜的軸心陣線給以決定性的打擊，今天，是時候了!

及時打擊，不讓法西斯休息!時間對於納粹德國的最後掙扎是有利的。「我們必須利用時間」：在爭取到的幾個禮拜乃至幾個月中間，可以佈置許多使敵人驚駭的事件」(柏林交易報)，這是納粹匪徒對外的公言，這兒所說的「使敵人驚駭的事件」，除出軍事行動之外，還明白，是包括着外交陰謀，妄想藉反希特勒聯盟破壞這一點的，只有及時的打擊和不讓敵人喘息的連續而勇敢的行動，才能打破這一切陰謀，才能使希特勒同時遭遇到兩條戰

五日的午夜，保衛莫斯科的一百二十尊大砲，鳴炮十二響，慶祝與勃爾和比爾哥羅德的收復。莫斯科戰例的將戒嚴推遲到午夜二時開始，人民都以最愉快和熱烈的心情，讀着斯大林的手令，以盡情的狂歡，慶祝着斯城大捷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莫斯科的砲聲把奧比爾城的收復的「震動全世界」的捷音，帶到了全世界。

震動全世界的大捷

希特勒對蘇聯的「夏季攻勢」，是短命的攻勢!在七月五日到二十三日十八天裏，他的「夏季攻勢」計劃是完全失敗了，是被蘇軍順利的解決完畢了。蘇軍對於希特勒的這次攻勢，是完全有準備

練的夾擊，而迅速的趨於毀滅!法西斯侵略戰爭爆發以來，千萬和平人民的血淚已經匯成了江河，千萬年輕有為的戰士已經化成了枯骨，萬萬千善良的的人民過着奴隸和餓殍的生活，千千萬萬的有正義感的戰士正在鐵火的戰場上冒生命的危險，一切，把這一切血、淚、汗累積起來，我們好容易才爭取到一個開戰以來可以最有效地打垮法西斯體制的黃金機會，這機會，是不容在躊躇中放過的，大膽地行動，無情地追擊，把火和鋼的壓力帶到羅馬，帶到馬賽，帶到英法海峽，帶到巴黎，整個歐洲——包括德國在內都有我們的友軍，今天，是使一九四三成為打垮納粹的年頭的重要時機!

「我告訴你，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打垮波舍魯(Borghese)——德國人」，就是說，不讓他們休息，不讓他們休息!」(威爾遜著「天下一家」中引用蘇聯馬利將軍語)，在北非在西西里担當着最大光榮的蒙哥馬利將軍，是最知道打垮法西斯的訣竅的。(新華)八月六日

的，蘇軍會把擊潰希特勒的攻勢和發動反攻聯貫起來。所以，隨着希特勒的「夏季攻勢」的慘敗，就來了蘇軍反攻的展開，終於在希特勒發動攻勢後的整整一個月的時候，收復了比奧兩城。

奧勒爾是希特勒在中部的最重要據點，也是希特勒在東線的最重要的據點。而比爾哥羅德又是德軍防禦哈爾科夫的重要基地，也是頓內茨區域的重要據點。現在這兩個重要據點，都在蘇軍手裏了。莫斯科的威脅，最後的完全解除了，希特勒在東線的釘子，被拔去了，連哈爾科夫的路，已打開了。這次大捷不僅確保了蘇軍的主動權，而且會使東線的局勢

，改何改觀。

「德國的宣傳，再不是採取守勢了，而是全線退却」。希特勒發動「夏季攻勢」之初就不敢公然自認攻勢，而以自承為防禦，先替失敗留個餘地。此次奧城之戰，先是宣傳德軍在撤退中，這奧城被蘇軍收復，便又說成「衆寡不敵」。然而，這都是胡說。真實的情況是這樣：斯城戰後，德軍去氣已趨消沉，盟軍與蘇軍一再東西夾擊後，是更不派了。「夏季攻勢」的慘敗，給了德軍軍大的打擊，而魯索里尼下台，法西斯主義的喪鐘一響，更使德軍膽怯。更重要的是，是蘇軍英勇果敢，戰術優越，就是和平的人民，也學會了戰鬥，真的是以一當十以一當百，而德軍則不識士氣消沉，且缺乏後備，既不能以人數優勢取勝，也不能以火力優勢取勝了！

奧，比爾城的收復，再一次證明蘇軍的愈戰愈強，再一次證明東西夾擊的勝利，同時，也昭告了全世界，德軍已沒有力量和方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繼續展開攻勢，並將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將是蘇軍。

奧 勒 爾 大 捷 之 後

經過了一個月的鋼鐵相擊的激烈戰鬥之後，蘇聯軍隊在布利格克前線和佛羅內茲前線再度獲得光榮的大勝，解放了奧勒爾，克復了比爾哥羅德，勝利的紅軍在燦爛的陽光下猛烈進擊，哈爾科夫和布利格斯高巴在紅軍砲火射擊內了，這幾天莫斯科，不，全蘇聯，全世界沸騰着祝捷的歡聲，受難的人民又從疲憊的臉上浮出慰安的微笑，德國

德軍顯然在力圖減少損失，並重建其防線。同時，更企圖利用第二戰場的不在，和意大利給巴多格利奧政府的成立，進行「和平攻勢」，緩和地中海盟軍的進攻，以爭取時間。然而，蘇軍是決不讓法西斯喘息的。奧、比爾城的戰果，尚未發表，然據估計在奧城二地，至少也擊潰了德軍的十二個師團。蘇軍現正乘勝西進，切斷德軍退至布列安斯克的後路，打破德軍在布列安斯結固守的企圖，另據路透社記者金氏的報道。蘇軍在若干地點，異常活躍，這些個別戰門，隨時有發展為向烏克蘭舉行大進攻的可能。這說明蘇軍是決不停止於收復奧、比爾城的。

德軍在短短的一箇月中，連續的遭受到「夏季攻勢」的慘敗，和蘇軍反攻的打擊，又折了墨索里尼的一足，這給露出軸心是更衰弱了，困難是更多了。然而，德軍還沒有被打垮。在蘇軍收復奧、比爾城，且正乘勝西進的時候，盟軍一定要堅守軸心無條件投降的原則，繼續大尼亞大捷之後，大膽的進攻，無情的追擊。現在是真正的閉關西歐第二戰場，從東、南、西三面夾擊希特勒的時候，是對軸心展開全面攻勢，擊潰希特勒的時候！
(新華)八月七日

法西斯的夏季攻勢又在紅軍的巨棒下完全粉碎了，我們感到歡欣，但在莫斯科一百二十尊大砲的鳴砲祝捷聲中，從一條戰線到另一條戰線，從一個戰役的結束到整個戰爭的展望，如何提議這次戰爭的勝利結束，如何縮短全世界人類的苦痛，這些問題重新以更嚴峻更急迫的程度，提出到我們的前面來了。

八月六日蘇聯情報部特別強調指出：在過去一個月希特勒份子的夏季攻勢期中，「德軍統帥部把自己的軍隊和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蘇德戰線，這事實就形成了複雜的有利條件，以便於我們盟軍的向歐洲大陸的順利攻勢」，但，一個月的光陰很迅速地過去了，「有利的條件」未曾有利地利用，多佛海峽依舊平靜得像一池春水，歐洲還沒有第二個戰場！本月六日「真理報」評論所長也的失望也正是全歐洲人民的失望，我們相信和蘇聯同戰地獨立支撐着一個戰場的中國人民一定會更切身地理解蘇聯人民的希望。

美國名記者史諾在一篇談蘇聯的通信後面有一段話說得非常沉痛：「一個人民往往不容易了解另一國人民的苦痛。假如，我們不把他的苦痛的經驗放到我們日常生活裡面設想，我們就不能理解蘇聯。我在這兒試圖使你感覺到蘇聯人民的苦痛給以一個觀察者的刺激，並且使你想到這個戰爭不愉快的一列有色鉛筆的箭頭所成的一張張長線線的圖畫。這，正是撕毀了千百萬人民的生活機構，使他們繼續困在死的恐怖而且時時想念着周圍死者們的一個顯示」(譯文見「文匯報」一卷十四期)。「坐在舒適的辦公室或者自由的陽光和充足的天空下的家庭裏」的人，是不會理解鐵和火的戰場上的戰士和人民的每一時每一刻的苦痛和期望的，置身於戰爭的苦痛之外，將戰爭看作一條用有色鉛筆的箭頭所構成的圖畫，有時過低有時過高地估計蘇聯的軍事力量，聽到蘇聯大捷的消息就輕易地估計蘇聯單獨地可以在歐洲消滅希特勒匪幫的武裝力量，這即使是出於過分的樂觀和好意，我們也以這為是有害於判斷，有礙於作為一個世界人的道義和責任的事情！單靠空中武裝不能使一個有強大軍事機構和

緊實生產基礎的國家潰滅，沒有兩條腿不能使希特勒無條件投降，我們歡呼鼓舞於西西里的勝利，但，從喀大尼到柏林，正像從東京到東京一樣的是一條遠道、遙遠的路程！

「不積極是嚴重的錯誤」，這是福煦大將的名言。過分的慎重可以是有利的條件消逝，我們再說

日寇的焦急和苦悶

意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的國運，不僅對於納粹德國，而且對於日本軍閥法西斯也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儘管巴多格利奧政權仍繼續着墨索里尼政權的禍國殃民的戰爭政策，但在本質上，這政策是不可繼續下去的。投降呢？還是毀滅？巴多格利奧內閣除這二條路以外，再沒有別的前途。意大利的退出法西斯侵略陣線已成爲遲早必將實現的事實。這使希特勒第三的法西斯侵略陣線折了一足，歐洲的納粹德國面臨於兩面受敵的窘境，而遠東的日本軍閥法西斯自也不能不感到德寇滅後英美回師東指的威脅。怎麼辦呢？日本軍閥法西斯當和納粹德國同樣焦急，同樣苦悶。

墨索里尼下台後，日外相重光葵會於七月二十八日和日首相東條英機作長時間的談話。談話後，重光並立即接見德駐日大使麥塔瑪，會談約半小時。據說，這是在廿四小時內，重光接見英塔瑪的第二次。東條和重光，重光和美塔瑪究竟談了些什麼？未經宣佈，我們無從知道。但從他們的會談態度，已可窺知日本軍閥法西斯如何焦急和苦悶。據八月二日東京廣播，日駐德大使大島浩上週已離柏林，到德軍總部特務長里夏特爾商

一戰，在今天，時間對希特勒的掙扎是有利的因子。野獸是受傷了，但他還沒有死，這兒需要的是及時的一擊，讓他跌進傷口是不智的事情。逝者不可追，年代，世紀是要過去的，別讓我們未來的一代不解，爲什麼他們的先行者竟不能及時地善用這一個黃金的機會？（新華）八月十日

討未來歐洲軍事情勢和德國應付計劃，連二小時之久，這更表示日本軍閥法西斯對於當前的局勢是何焦急和苦悶。它急於請教法西斯侵略陣線的總帥希特勒對於挽回局勢究竟有什麼應付計劃？這計劃是不是有効？同時，它自身也必然在變悉希特勒的計劃後，作着自己的打算。

什麼希特勒的計劃和日本軍閥法西斯自己的打算呢？在希特勒的計劃中，可能要求日本軍閥法西斯採取積極的行動，牽制英美，援助德寇，並或冒險北進，威脅蘇聯，以緩和蘇軍在東線對德軍的反攻。爲挽救德寇法西斯侵略陣線的崩潰計劃，日本軍閥法西斯是難以拒絕希特勒的要求的。但，日本軍閥法西斯還有它自己的打算。目前，在太平洋上盟軍從北到南，由海而空的攻勢，它只有招架，而沒有還手。要它採取更積極的行動，犧牲更多的實力，它是不不能不有所躊躇的。至於冒險北進，以速自身的滅亡，那是狡猾的日本軍閥法西斯決不肯輕率從事的。日本軍閥法西斯自己的打算，恐怕還是在加速地作將來決戰的準備。反法西斯的大火固已愈燃愈烈，法西斯意大利已葬身火窟，納粹德國也痛感焦頭爛額的危險，但火還沒有燒到日本

軍閥法西斯的肩毛，它還想利用這可能利用的時間，作充分的消防的準備，決不肯聽天抗去殺人。據七月二十七日東京廣播，重光葵會在當日閣議中，報告意大利政變的情形並說明日本執行戰爭的方針，並不因意大利政變而有什麼變更。又說，自日本曾在此複雜微妙的國際情勢中，無論發生何種事態，也決堅持「建設大東亞」及完成戰爭的方針。這些話雖然只是陳腔老調，但在今天，已是不含極極的意義，而且是消極的意義了。就是說，它所致力於，只是如何保持它侵略所得的戰物，並把這些戰物充實自己的力量。所謂「建設大東亞」，就是這意義。

日本軍閥法西斯的這種打算，會不難得到什麼效果呢？不會。反法西斯陣線是絕對得勝的。法西斯意大利已被火化，納粹德國也將被火化，時間不允許日本軍閥法西斯能完成它的計劃。希特勒的謊言說：「日方在太平洋上的計劃，將與英美之計，但英美開闢其後方的資源，則英美在目前立即修改其計劃之爲無。」這豈不是否言倒置？事實上，不等到希特勒完蛋，日本軍閥法西斯也將絕命之戰，而葬身火窟了。這二點，日本軍閥法西斯自身也並不是沒有感覺到。東條七月二十七

日對日經濟界各領袖人物致詞，沒講什麼話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日本正增強作戰能力，以回擊倒英美。」這一方面，表示他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正表示他對這種努力也感覺沒有把握。

日本軍閥法西斯現在正陷於焦急和苦悶中。反法西斯陣線應該乘這時機，加緊給它以重大的打擊，不留給它以喘息的餘地。特別是我們中國原是打擊它的主要力量，更應該配合盟國，積極戰鬥，準備反攻，打倒日寇。

（新華）八月五日

只有血的紐帶……

——論羅邱第六次會談

八月十日，加拿大方面宣佈：英首相邱吉爾已抵魁北克；英首相於舉行了英加會談之後，將與美總統會晤，舉行戰爭開始後第六次的羅邱會談，本年度第三次內閣部會談。

這是本年度第三次會談了。距離第二次的會談——華府會談才不過三月，而距離第一次的會談也不過是八個月，事件的奔流常常把人們帶到比預想更遠的地方，八個月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遠在年初卡海會議當時，英美本已決定了今年內九個月的作戰計劃的，然而，由於德軍在蘇俄戰場的局面部反攻，由於北非戰事出乎意料之外的迅速的結束，產生了華府會談。華府會談結束不久，由於德軍七月攻勢的慘敗，蘇軍反攻的勝利，墨索里尼的下台……又促成了這一次的會談。好像是：假如人們不能確實地估計局勢的發展，其結果只有隨着事件的屁股跑的一樣。

不過，無論如何，不管從那一個觀點看，這一次會談的意義是比過去的任何一次更重了；時也亦勢也。單單的從一個環境看，就可以看出此中的物換星移。在過去的任何一次會談中，從沒有發生過「政治解決」戰局的問題，然而這一次，由於墨索里尼的下台，這一個問題的提出，已經不是虛構了。這從七日以來華盛頓方面即不斷注意德國內部「或將發生某種重大事件」的消息，以致美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不得不公開否認這一傳聞（九日），而美總統亦不得不謂：對此事無正式情報——可

見這一陰影已經跑進了多少人的心裏。這是不是在怪，戰爭發展到決定階段，類似於這樣的變化是在意料中的；而這一步發展實際上也就是世界戰局現階段中的最基本的特徵。

政治解決還是軍事解決？雖然有許多人想望政治解決，但這是不可能的，這不但因為同盟國家不願，而且也因為客觀形勢不能——希特勒還沒有打垮，不管什麼樣形式下的政治解決是不會真正而徹底的成功的；意大利出了一個巴多格利奧而且不能解決問題，德國出了一個巴多格利奧就能解決問題了嗎？更何況德寇還沒有巴多格利奧出土？

政治解決的幻想可能影響軍事解決的進行，但決不能代替軍事解決；而為了達到真正的軍事解決，在今天首先就必須粉碎這一政治解決的幻想；怎樣粉碎呢？在這裏，我們完全同意紐約時報的議論，他說：

「希特勒對於最後必敗，將企圖利用政治武器，以離間威特彼之軍事同盟，破壞西方國家與蘇聯之關係。對此唯一之保證為盟國與蘇聯應有較前更為現實之協議」（十日同報社論）。

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加強團結固然是打垮希特勒的基礎；不過，其言不如一行，假如英美能在軍事上立即開闢西歐第二戰場，英美蘇間的團結自然也就隨之而鞏固而加強。在古代，氏族與氏族之間最嚴重的盟約，常常以飲血為盟，血

所流的實際上也只有這一條血的紐帶，一假若以本國軍隊從五十個師到六十個師的西歐第二戰場上，這是一條血的紐帶；沒有這一條血的紐帶，萬事千言也可能都是白費的。

沒有人在那原則上反對第二戰場，問題在於：怎樣實行；七月二十八日，美總統在他的廣播演說中，強調「謹慎」，他說北非之戰準備了一年，而西歐之戰也準備了六個月，好像西歐第二戰場的準備還要長得多的。沒有人反對「謹慎的計劃」，此如何沒有人否認大軍團的作戰不能不包含一些「冒險和幸運」（六月三十日，英首相演詞）的成分一樣；今天的問題不是避免犧牲，一切的軍事行動法要犧牲的，不過，這些犧牲和蘇軍兩年來在戰場上所已遭受的犧牲，千百萬歐洲人民在希特勒的統治下所已遭受的犧牲，全世界無數人民在法西斯德下所已遭受的犧牲比較起來，是多麼渺不足道，而戰爭不必要的延長一天，那犧牲，那輾轉呻吟的苦痛，那血淚模糊的海洋又是多麼千百萬倍的可怖和！

在舊之間，羅邱的第六次距離第一次會談整整的兩年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羅邱第一次會談給了這個世界一個希望——大西洋憲章，現在是把這一個「人類的明天」轉變成「今天」的時候了。

（于懷）八月十五日

我們怎樣堅持華北六年的抗戰

彭德懷

華北抗戰六年以來，日寇始終不在希望「征服」華北，以便進一步向我中原及大後方進攻，同時也企圖利用華北豐富的資源與人力補充其在太平洋戰場上的重大消耗，因此日寇不惜使用大量兵力於華北，如今就所得的敵軍即有第十七、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五十九、六十九，百一十等共十個師團，還有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及十五等旅團與偽治安軍，偽和平救國軍，偽剿共軍及偽蒙軍等至少十六萬人，其中大部民族意識尚未完全消失，亦有不少同情抗日者，表現在偽軍中的動搖不鞏固，然而被日寇與漢奸強迫為敵偵探，替日本法西斯屠殺中國人，增加敵後抗戰不少困難。

二七年初，敵企圖趕走或消滅八路軍，鎮壓剛在發動的民衆抗日戰爭，敵軍即命寺內壽一為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官，代替了原來的華北派遣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但爲時不久，於是年八月就撤換了。其時正是華北游擊戰爭蓬勃開展，總司令官香月又換了杉山元，當時抗日（被略）與游擊隊及其根據地已在全省發展與建立，對游擊隊破路伏擊截擊，予敵以極大威脅，敵寇認爲是擊滅×政權的障礙，乃於佔領武漢後回師華北，當時華北敵兵力超過了十個師團，（敵將）雖然如此，抗日根據地却未如杉山元所希望的被其消滅，敵已控制的鐵路交通仍經常爲我襲擊而中斷，如是不不能不在其就任週年紀念日（二八年九月）讀於多田駿。

多田駿到任不久，即提出所謂「因循政策」，沿鐵路公路兩側掘成深溝高牆，實行嚴密封鎖，隔絕我平原與山地交通，割裂我抗日根據地，敵寇以此佔領之點線向我各根據地推進「掃蕩」，所謂「竭澤而漁」這其意即以爲得鹿而計，但我乘敵不備，陸續擊退敵百餘個團兵力，突然指向平漢鐵路，津浦鐵路，北寧路，平綏路，正太路，同蒲路，白晉路，同時進攻，擊破其障礙，搗毀其站倉庫，炸毀其鐵路橋樑，將多出擊得之「因循政策」擊得粉碎。××集團軍不惟佔領了這些鐵道，而且進逼平津，半年後敵寇開始從鐵道交通全部恢復，這就是著名的百團大戰。沖破了敵寇「竭澤而漁」的「因循政策」的迷夢，多田駿在這一慘敗的教訓下，提出改變老一套戰法，實行所謂「牛刀子戰術」。什麼是牛刀子戰術？即集結優勢兵力，突擊一點，但結果又被我神出鬼沒，時聚時散之游擊隊所粉碎，敵後復提出所謂「分散配備，靈活進剿」，依然爲我××集團軍游擊隊民衆所擊碎，直到今日我軍仍能馳騁山間平原，如魚在大海，虎居深山，活動極爲自如。

在這種情形之下，多田駿就不能不計竭而走，宣告「退休」，於三十年七月代以號稱日本軍閥三傑之一的岡村寧次，他是屠殺朝鮮民衆及我東北同胞的血腥魔王，他到任時即提出「交通建設」，其辦法就是深挖封鎖溝，高築封鎖牆，強化鐵壁政策，於是年秋集中十萬以上大兵，指向我晉察冀區，構成寬大縱深的正面，採用所謂「鐵壁合圍」的戰術，企圖以此表裏包圍上馬廬風，可是也遭了我們游擊隊子弟兵圍而不留情的打擊，打得他入滾馬翻，焦頭爛額而退。但他並不因此罷休，復於三十一年五月以所謂「鐵桶合圍陣」用之於太行山，以「連環封鎖陣」用之於冀中及山東等地，亦均先後爲我英勇游擊隊的××集團軍及民衆所粉碎了。

這位殺人不要命的魔王岡村寧次，在華北還提出了更加毒辣的「治安強化運動」，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以殺光搶光燒光的獸行來鎮壓我們的反抗，這一方面表現其橫暴，另一方面也表示其陰險狡詐的狂妄幻想而已。在鐵路踏過的地方，雖然我們有不少美麗村莊變成了廢墟，瓦礫，有不少的男女同胞被屠殺了。安遠（岡村寧次的參謀長）誇耀在華北有一萬一千一百餘公里的封鎖溝（有如萬里長城六倍或地球外週四分之一之長度），有近萬的後備隊，但並不能嚇倒我們，相反的我們共產黨××集團軍與華北人民在敵人燒殺政策，苛征暴斂之下，更加敵愾同仇，更加英勇苦鬥，事實證明自二八年起，與河即被對鎖，我軍與大後方即告隔絕，孤懸敵後，糧彈兩缺，全靠靠自己生產和民衆協助，解決了糧食被服，依靠指戰員的英勇攻襲敵之據點堡壘，以及「反掃蕩」的勝利，奪取了敵人無數彈藥武器，補充了自己。正因爲如此，才能屹立敵後，我們能堅持敵後六年如一日，這絕非偶然，而是六年來民衆合作，共同努力，不惜犧牲，不怕艱苦，英勇奮鬥中獲得來的。許多先烈忠魂雖守，奮不顧身，創造了我中華民族光榮的史跡。我們爲「揚先烈，勵後者」繼續奮鬥，略舉數例即可顯示我大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英雄氣概，也就是顯示了共產黨××集團軍對國家民族忠貞不二的革命實。

民國二十六年平型關大捷後，敵軍犯忻州與我友軍激戰，當時敵飛機二十餘架從陽明堡起飛轟炸友軍陣地甚烈，我一二九師之一部，奉到×路軍總司令部令，用一切辦法炸毀陽明堡敵機，配合忻州友軍作戰。敵部七六九團營長趙子廷同志，將其口袋裏僅存的三元法幣換出交與公家，口中連稱：「陣亡了不爲

敵人所得，如指即擊於黃昏出發，殺入敵陣，將陽明嶺之敵轟炸二十四架全部燒燬，該營長趙子廷同志亦光榮的壯烈殉國，這證明共產黨人與×路軍對國家民族之忠實，赤胆與日月爭光。

民國三十年九月廿五日，晉察冀邊區敵軍分六路向狼牙山進攻，我某班長率全班扼守險要，擁護主力，安全轉移。敵寇數千以猛烈的炮火，擊破了我班主力的陣地，而我這一班烈士不憚完成了極大的任務，而且給予敵人十倍以上的死傷。

敵軍排所剩數人，彈盡無援，亦無法突圍，在共排長率領下，大聲呼號：「拚到底，誓死不倖存！」全排為國壯烈犧牲，使敵村民深受鼓舞，自願提出為勇士報仇，參加×路軍者倍於前。

民國三十一年正月，我特務團一部保衛太行山黃烟洞工廠的模範戰鬥，造成敵我傷亡六與一之光輝戰績，其中有十二個共產黨員在冰天雪地中與敵首之隊在敵軍血戰三晝夜，最後只剩一名，始獲命撤出。

在共產黨領導與組織起來的民眾中，也表現了至高無上的愛國熱忱與民族氣概：

(一) 如冀中國民支隊長馬本齊同志的母親，民眾稱爲「我們的馬母」。事情是這樣的：由于回民支隊在冀中經過的積極打擊敵人，敵寇恨之人骨，企圖以無恥的陰謀來破壞這支支隊，敵寇以騎兵數百突然包圍河間李莊村，將所有男女老幼驅至廣場，追索馬母，村中男女均與敵寇對峙，企圖以死威脅，當敵新殺我同胞數人，然全村民衆仍聲色不動，毫不屈服，喋喋不語，不認馬母，敵寇以爲獲得至寶，立即押解河間，灌冷水，灌辣椒水，許多馬母得死去活來，環顧村人，含淚無語。馬母見情不忍，挺身而出，毅然承認：「我就是馬母！」敵寇以爲獲得至寶，立即押解河間，灌冷水，灌辣椒水，許多馬母馬母寄信勸子投降，馬母回信：「我是中國人，我的孩子參加×路軍，一向不知道有投降兩字，現在帶部隊以及他三弟在一起，你們日本人限他去打一。賢良的馬母寧寧敵後，絕食而死。馬母這種愛國精神，不但是回民光榮，婦女的光榮，而是我偉大中華民族的無上光榮。

(二) 此次(今年五月)太行區反掃蕩戰役中，遼縣(現在民衆自動改爲左縣)一個區就有後柴城村的財政委員呂振芳，敵以開水將他全身淋濕，仍守口如瓶，始終不肯說出公糧存放地方，敵遂將他槍斃。

(三) 在河南開封的民衆代表李福全，民衆主任李信，財主任趙光德，被俘後在敵嚴刑拷打之下，始終未說出半句有利敵人的話。

(四) 上述事實可以證明華北抗日根據地人民已具有高度愛國熱忱，還不僅是有這種愛國熱忱，而且已經武裝起來，保衛家鄉的民兵造成了千千萬萬類似太行山的劉二堂神槍手，也是值得表揚的。

(一) 劉二堂的槍是百發百中：當敵人「掃蕩」時，他們的指揮官每次都被劉二堂連人帶馬打死，因此敵人恨之入骨，去年大「掃蕩」時，敵人數千，專門圍山搜捕劉二堂，他弟弟假稱劉二堂，當被殺時，當時遼縣各地民兵尚不知其真象，即自動爲劉二堂報仇，也有自稱「劉二堂」者；一時到處都是劉二堂，鬧得敵人奇怪，爲什麼殺了一個「劉二堂」，反而會產生這許多「劉二堂」。

(二) 民衆英雄英雄殺敵，類似事情在其他各地區也不勝枚舉。如在魯南沂河區有某莊，一個不滿四十家的村莊，竟和包圍的數百敵人激戰至三日，敵狗頭攻不下，最後竟無恥地放毒氣，而農民以手中浸滿毒藥在嘴上，繼續沉着應戰，小孩們很多中了毒，但母親們却仍繼續搬石頭給自衛隊，準備最後的武器，一齊堅持到彈盡時，自衛隊方乘夜掩護全村老弱婦孺轉移。

今天各根據地的民兵，在敵人掃蕩下已學會了地雷戰，在敵人掃蕩時，民衆自動的會把住屋土地以至牛糞地則所旁設地雷，所以到處都有觸發的危險。去年敵「掃蕩」太行山時，就炸斃了三千九百個地保，以每個地保平均炸死一個敵人計算這數字是多麼可觀。

在政府機關及各地方的人士中，英勇壯烈的行爲同樣的值得我們表揚，這些人真不知有多少動人的史詩，真不知有多少光榮的無名英雄，他們只知道一切爲了抗戰勝利，而不知有其他，這就是由於我在各地方開展了抗日民族教育，提高了民族自信心，發揮了至高無上的民族氣節，也就是能真正的實行民主之所致。由於廣泛的開展了民主運動，真正的發動了各階層的民衆，特別是勞動羣衆參與政事，羣策羣力，把抗日的神聖事業看是自己的責任，也就真正的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同時也由於適當的改善貧苦人民的生活，保護富有者應有的財產地權，特別獎勵生產，因此相當減少了解濟肚皮抗日的各種現象，鞏固了團結，共同對敵，這就不僅是堅決的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被略)更深刻的使我們認識到三民主義是整齊一體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被略一百四十字)

在今後，我華北的抗日政權和(被略)軍隊，都應該進一步依靠民衆組織，真正與民衆結合，成爲水乳相融的密切關係，克服我們存在的某些弱點，才能克服目前的困難，迎接近勢利，困難也越多，但勝利的定局已屬我們中國人民，勝利在望，我華北民衆更加振奮起來，不惜任何犧牲，排除一切困難，堅定意志，提高信心，團結一致，爭取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爭取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法西斯主義的眞面目

杜德

一、希特勒主義的本質

在今天，當法西斯主義已經被全世界有思想的人們所一致唾棄的時候，當法西斯的野蠻，它的強暴，它的殘忍和毒虐，它的種族歧視和民族屠戮，它的賄賂和欺騙，它的崇拜戰爭，殘酷和剝削，它的看不起人民，反對理性，毀滅文化，對於每一種人性感情的侮辱——已經成爲全世界的共同經驗的時候，再來討論法西斯的性質，看起來好像沒有必要。

事實，不然。正在事實上還有許多人不明白希特勒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性質是什麼。有一部份人只爲希特勒的統治者和德國人民沒有什麼區別，從而得出一大堆關於戰爭和侵略的結論。還有一部份人企圖把戰爭和法西斯主義分開，以爲法西斯主義中包含了些許的東西，不過他們從事戰爭却是一種政策上的錯誤，法西斯的侵略迫使人們很遺憾地非和他們對立不可。還有一些人，想從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之間找出一些共同點來，實際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絕對的對立物，它的最一貫的敵人。還有一些人想分別出「好」的法西斯和「壞」的法西斯，「極端」的法西斯和「溫和」的法西斯，德國的法西斯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所有這些不同的、錯誤的看法在實際作戰上都有極嚴重的現實後果。每一種思想上的混亂削弱了反法西斯的鬥爭。

懂得我們敵人的眞面目，是我們戰勝敵人不可缺的前提。

首先我們必須看清楚我們的敵人不是德國、意大利或日本的人民，而是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是這些統治者們爲了他們自身的目的，才把他們的人民捲進戰爭；他們的統治帶給人民以沉重的災難。

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人民是我們潛在的盟友。法西斯的統治是用暴力，恐怖和欺騙加在他們身上的，並不是人民願意他們來統治。在這些國家裏，有一些少數腐化、沒落的人滓，這些傢伙甘願爲法西斯匪幫們做工具；這些就是劊子手，流氓，僑鮮隊，小官僚……。他們替法西斯統治者服務，

藉以分得一杯羹。還有一部份青年，他們從小就受法西斯的薰陶和訓練，從來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別的事物，這些傢伙就形成了法西斯的青年流氓。不過，大多數人民生活在無比的恐怖和欺騙的統治下面，他們只是他們的統治者們不願意的同謀犯，而不是他們積極的幫兇。他們當中有少數勇敢的戰士同優秀的文化人，他們自始至終就對法西斯統治執行着堅決的鬥爭。當法西斯大軍對於法西斯軍事力量的打擊，日甚一日動搖法西斯的權威的時候，當法西斯統治下人民的苦痛日益加深，使法西斯的欺騙和欺騙無所施其技的時候，人民反對派的力量將跟着一天天增強起來。只要有一天法西斯國家的人民還服從他們的統治，爲他們工作，爲他們作戰，我們必須對法西斯統治所有的力量進行作戰，因爲他們所代表的意志是法西斯的意志，他們是法西斯的軍隊。不過，在作戰當中，我們必須時刻的注意法德兩國人民間的共同，把他們當成我們未來的盟友，儘可能早的爭取到我們這一邊來。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的英蘇協定把這一次的戰爭規定成「反希特勒主義與德國」的戰爭——這是第一次，在一個正式的政府文獻中把這一次戰爭的目的規定爲反希特勒主義的鬥爭，而不是對德國人民的鬥爭。這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納粹德國進攻蘇聯時，莫洛托夫在蘇聯宣戰書中所說的完全一致：

「這一個戰爭不是德國人民，不是德國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逼我們來打的，他們的苦痛我們完全了解的，這一個戰爭是德國吸血的、法西斯統治者強迫我們打的，他們已經奴役了法國人，捷克人，波蘭人，塞爾維亞人，挪威人，比利時人，丹麥人，荷蘭人，希臘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民族」。

同樣一九四一年八月的大西洋憲章，在描寫了「希特勒及其同謀者的武力征服的政策」以後，接着就把這一次戰爭的目的規定是：「爲人類爭取更多的自由和平，徹底消滅那種政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由斯大林和薛波爾斯基簽字的蘇波友誼協定在開

頭的一節裏也說：

「德國希特勒的帝國主義是全人類最壞的敵人，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同它妥協的。」

一九四二年正月一日簽訂的二十六國宣言也總結同盟國家對三國公約及其加緊國家的鬥爭為「爭取對希特勒主義勝利之鬥爭。」

一九四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邱吉爾在下院報告這一宣言的時候也說道：「這一次宣言是以大西洋憲章為基礎，它的目的在毀滅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上一切形式和變現的希特勒主義。」

那麼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所反對的希特勒主義究竟是什麼呢？希特勒主義是德國法西斯主義。一個法西斯的政權是和戰爭分不開的。

在法西斯主義是一個國家最強大的反動勢力（大托拉斯、地主、軍閥……）在他們所限制人民自由發展的方法都失敗了的時候，為了把人民束縛在他們的絕對的和恐怖統治之下的一種犯罪的政權，這一種統治的第二個目的就是侵略其他民族，進而壟斷世界。

希特勒主義是法西主義的總稱。希特勒主義，納粹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是同一種統治或制度的不同的名稱，它代表着近代反動統治中最高端、最殘酷和最殘酷的一種形式，它是一切民主和進步的敵人。法西斯主義是它在意大利最初被發現的名稱，它在那裏獲取了政權，因此大家用它來代表所有國家中一切法西斯傾向的東西。納粹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是希特勒德國的代表者，給它起的名字。希特勒主義是德國以外各國用來代表納粹主義或德國的法西斯主義，特別強調它獨霸世界的企圖。當法西斯主義在德國這樣強大的近代國家中獲得了政權，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就變成了全世界法西斯主義中最重要的，最強大的，最富於侵略性的一種法西斯主義，它在所有國家中建立它的哨站。反希特勒主義的鬥爭是反對世界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它代表近代社會中最反動的一種社會——政治的力量和傾向，在所有的國家中它擁有秘密或公開的附和者。

把德國人民和德國統治者及其獨霸世界的企圖混為一談，是針對我們的反希特勒的鬥爭。這一種意見認為希特勒主義的武力侵略和向外擴張是德國民族的特性，其由來已久，幾世紀來如此，甚而至于千餘年來已是如此。這一種意見的代表，是很自然的會反對我們喚起德國人民反對他們統治者，他們很自然的要求一種政策，用一種處罰性的和平條件和長期軍事佔領德國的方式來威脅德國人民。

很顯然的這一種政策的結果只有加強德國人民的抵抗，使他們深陷在希特勒的週圍，竭力阻止這種過激式的和平的出現。這種政策是那些密使德國人民革的，而反動人物提出來的；他們企圖利用這一次戰爭的勝利和全世界對於希特勒罪行的憤怒來阻止未來的人民德國的出現，維持德國的舊基礎，但實際上，這些反動份子正是泛日耳曼主義和希特勒主義的基礎。這種政策是一種反動的政策，它是和反希特勒鬥爭的真正勝利的利益背道而馳的。這一個政策的主要代表者，汪錫泰爵士在戰爭前曾希特勒的上面，在慕尼黑政策開始的幾年，他是外交部的秘書；大家知道，慕尼黑政策曾經幫助希特勒建立他的軍事力量，而毀了凡爾賽和約的。

至於這種觀點用來作為理論根據的偽造的歷史，我們只要指出一點：德國民族是資本主義時代向外侵略的民族的最主要的代表者（「幾世紀來，德國總是企圖吞併世界」——汪錫泰）的話，那麼，我們要問：為什麼，直至現在，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成就比其他列強小？拿民族性來解釋希特勒主義事實上同希特勒主義者自命為天生來統治世界的「大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性」的胡說如出一轍，一樣無聊。實際上，對於希特勒主義的民族性的解釋就是希特勒領導的一種奴隸的抄襲。

泛日耳曼主義不過是希特勒底綱領中的一部份。希特勒主義是作為一件反對德國人民革命的武器而產生出來的。實質存在：希特勒是德國國防軍參謀部為了進行政治工作訓練出來的一名小卒，這一個參謀部從帝國時代一直延續到魏瑪共和國，沒有改變。他被派送到當時的小黨「德國工人黨」去做政治工作；第一個領袖是由一個領袖的國防軍的士兵組織起來的，納粹黨的第一個機關報，「人民觀察報」是由當時慕尼黑黑國防軍的軍官馮·愛普將軍拿錢開辦起來的。希特勒和納粹黨是由德國軍事和警察當局，大企業家，舊官僚中反動的份子……一言以蔽之他們是在魏瑪共和國所有的敵人以及泛日耳曼主義——德帝國主義的擁護者保護和維持之下，確立起來的。當希特勒最後由興登堡的獨裁性的法令，違背着德國人民的意志，被擡上主席的時候，這當中的一脈相承的來路得到了象徵性的表現。希特勒，希姆萊、戈林、戈培爾、萊、和其他納粹領袖以及他們建立起來的納粹機構在本質上是德帝國主義、獨占資本的最反動的一部份底一個政治工具，一個徹底激進科學化了的政治機構，其有效遠過於舊時的皇室帝國。

希特勒主義是德國國防軍參謀部為了進行政治工作訓練出來的一名小卒，這一個參謀部從帝國時代一直延續到魏瑪共和國，沒有改變。他被派送到當時的小黨「德國工人黨」去做政治工作；第一個領袖是由一個領袖的國防軍的士兵組織起來的，納粹黨的第一個機關報，「人民觀察報」是由當時慕尼黑黑國防軍的軍官馮·愛普將軍拿錢開辦起來的。希特勒和納粹黨是由德國軍事和警察當局，大企業家，舊官僚中反動的份子……一言以蔽之他們是在魏瑪共和國所有的敵人以及泛日耳曼主義——德帝國主義的擁護者保護和維持之下，確立起來的。當希特勒最後由興登堡的獨裁性的法令，違背着德國人民的意志，被擡上主席的時候，這當中的一脈相承的來路得到了象徵性的表現。希特勒，希姆萊、戈林、戈培爾、萊、和其他納粹領袖以及他們建立起來的納粹機構在本質上是德帝國主義、獨占資本的最反動的一部份底一個政治工具，一個徹底激進科學化了的政治機構，其有效遠過於舊時的皇室帝國。

同樣不錯，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都或多或少出現了一種現象。法西斯在意大利獲得政權（在德國之前），在法國，在西班牙，在日本（一種以日本底封建帝國主義為基礎的特殊形式的軍事法西斯主義），在維琪法國（表面化在德國佔領之後，不過這在以前，法國法西斯運動就已經很強，法西斯的支持者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才組織了投降，出賣法國），在薩拉查的葡萄牙以及其他的國家。法西斯運動在英國出現（康斯萊），在美國出現（福尼希、科林斯、銀衫黨）。自從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建立起來以後，它變成了全世界法西斯中力量最強大組織最完善和最富于侵略性的一個法西斯政權，從而全世界各地的法西斯運動（佛朗哥、貝當、墨索里尼、曼納林、康斯萊等）也就或多或少的歸于德國法西斯之變成傳播德國法西斯主義影響的交通線。自然這不是說，這些法西斯運動不是直接從這些國家的同一類的沒落的反動因素產生的。當幾年前羅查米爾爵士公開宣佈支持康斯萊的時候，他並沒有有意識地去做導演一個泛日耳曼主義者的角色。

因此，我們必須認清法西斯主義是在現存社會秩序中有它根深蒂固的基礎的一種社會——政治現象，而不能認為僅能發生于一個國家的一種特殊的民族現象。

為什麼第一等工業國家中的法西斯主義首先出現于德國，是有它的歷史原因的。在一九三三年之前，有一種廣泛的理論在流行着，那好像說，法西斯主義能征服一個落後的，半農業的國家，在一個有着工人運動傳統的強大的工業國家裏，法西斯是不會當權的。因此在當時的德國和鄰近德國的國家裏就發生一種幻想，以為「那是不會在這邊發生的」。納粹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給這種幻想以一段滅性的打擊（不幸，不是最後的打擊；遲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即貝當——魏剛法西斯政變的前夜，法國社會黨的領袖還在英國工黨大會上說，他只看見從共產主義和左派方面來的危險，但看不見從右邊來的危險）。自從在德國勝利之後，納粹主義變成了所有法西斯主義底支配形態，以致形成全世界目前不能不集中全部力量來毀滅的那三頭六臂的妖魔鬼怪。

各方都承認德國將來的問題對於歐洲和世界的將來將起着決定作用；而德國問題，在事實上，自從上一次大戰以來，就像一條紅線一樣貫串着世界政治的一切問題。法西斯在德國當時的勝利，不但具有局部的和一個國家

內的原因，國際因素在這裏也起了決定的作用。

在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戰中，經過了四年又三月的激烈鬥爭，德國主義被它優勢的敵人聯盟打垮了。失敗引起了德國的人民革命，它推翻了大地主和帝國主義份子的統治勢力，那集中表現在德國皇室的那些反動勢力；但是它並沒有能鞏固它的既得利益，以後就發展到凡爾賽和約，凡爾賽和約是勝利的協約國用來束縛他們的對手德帝國主義的。

不過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革命和凡爾賽和約都未能解決德國問題。相反，所有德國內存和外在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了。只有一個真正的德國人民的革命，才能毀滅德國的軍閥和官僚的力量，粉碎德國大地主和大地企業家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奠下真正民主的基礎，為歐洲人民一勞永逸地終止德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威脅。但是德國內部的反動勢力和勝利協約國中的反動份子同樣反對這一舉。

納粹主義就是就在戰敗德國的危機和反動勢力的反革命陰謀的地盤上，繁榮起來。德國國民經濟的破壞，由于通貨膨脹而產生的中產階級的破產和沒落，給德國法西斯造成了廣大的後備軍。打碎德國最深的世界經濟恐慌給予把德國法西斯推上領導的地位。納粹主義巧妙的把那些由于德國社會解體而產生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罪惡通統算到是凡爾賽和約的賬上；這樣，他們又把德國人民欺騙到德帝國主義的圈套當中。不能想出任何積極辦法，他們想從內外危機中找尋出路的德國反動的統治勢力終于在納粹主義身上找到了他現成的工具。

這樣，一九三三、統治德國人民的權利就落到一羣吸血的冒險家，走江湖的郎中和神智不清的笨拙手裏；這一羣匪徒先在德國國內放了一把火，為的好到全世界放火；他們把德意志的英名投下羞辱的深淵，連同他一切偉大的文化和文明的傳統。

希特勒主義是一個妖精。但是使這一個妖精產生的責任不完全在德國反動者和那些幫助它乃至獻給它上台的德國人民的身上。那責任應該由所有國家中幫助它起來的反動勢力和那些沒有設法阻止這種反動政策的人民來共同擔負，正如同今天所有各國的人民應該和德國人民聯合起來毀滅那妖精的一樣。

二、法西斯主義的體系

法西斯就是戰爭。法西斯制度是和法西斯的戰爭分不開的。一開始，彼

國的納粹政變，其目的不僅在以暴力為德國統治階級，解決內在的社會和政治危機。從希特勒獲得政權的第一天起，它就有意識地準備戰爭。世界大戰的戰爭。所有納粹統治的一切措施，不單是在軍事上，就是在工業和生產方面，行政管理，文化教育和組織軍人方面，亦莫不以準備戰爭為其最高目的。

一九三六年，當時的德國總軍部新聞處處長佐斯特上尉發表一本小冊子，名字叫「納粹革命的軍事意義」；當時的總軍部長布倫納將軍在這本小冊子的序言上就說：「這本書可以說是得到當局同意的」。在這一本政府同意的的小冊子上，佐斯特上尉公開聲言，納粹主義是為發動近代總體戰爭所必需的「德國國家形式」。

「這本書的作者指出納粹國家的形式是符合于近代戰爭的要求的，近代戰爭要求動員一個國家的一切智力、人力和物力。他指出：在第一次歐戰中，正是因為人們把政治和經濟分開了，所以才忘記了戰爭的總體性。作為國家的領袖和一切武裝力量最高統帥，希特勒是德國的主人，在他手裏集中的權力之大，為德國歷史上所未見。士兵對公民，文的對武的，一切思想的對立在他一個人的身上解除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號，倫敦泰晤士報柏林通訊）。

「意大利的經濟只受制於一個目標，——就是我們的國家必須轉變為一個戰鬥體。戰爭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爆發，沒有人知道；不過命運的車輪轉動得很快。一切和國防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工業，它們的資本應該由國民認捐籌集；一切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或超資本主義的大企業必須轉變成軍事工業中的鑄造工業……我們正在向一個時代邁步前進，在那一個時代裏，所有這些工業不但沒有時間，而且也沒有能力為個人消費者生產。它們必須完全地，或者近于完全地為國家的武裝力量工作」（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墨索里尼對法西斯職工會第二次全國大會演說）。

法西斯的內外目的不能分開的。最反動的大獨占資本家的暴力統治的形式，法西斯不可避免地要把國家機構和經濟機構為侵略戰爭而組織起來。成年地，法西斯欺騙了，最低限度爭取到所有階級不反對其份可做的，有錢有勢和有實業的人們的支持。這些人誤信了法西斯，以為他們是抵抗共

產主義和民主進步的堡壘，變成了他們的辯護士和阿諛者；他們隱藏法西斯的罪惡，讚揚他們的德行。政治家，銀行家和軍火商人互相競爭着供給他們武器。而這些武器最後用來屠殺他們自己的人民的。法西斯最無恥的罪行，不讓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幾年來各國大使館和領事館所做的關於法西斯集中營的報告，一直等到戰爭爆發以後才發表出來；反納粹的電影「馬門教授」不准上演。一批批地主貴族和百萬富翁，新聞大王和官僚，教授和新聞記者年年參加納粹的集會或者到德國去參觀一家血脈流傳的上賓，這些流氓又照例送出一批一批的游人到我們這裏來，年年五月會或者盛大的游藝會他們都誠率為上賓，歡迎招待之不暇。在這兩個大會裏都有份。這些可敬可愛的先生們到現謂「精神武裝」運動和非戰主義在這裏都有份。這些可敬可愛的先生們到現在大部份還沒有退出政治舞台。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覺悟了，但是另外一些却僅僅是謹慎着不再講話，或者說着努力唱一些新的歌。不過，他們還是有力量的，他們對於生活的根本情調和看法並沒有變更；他們抓住一個適當的時機重彈起老調或者運用這一種或那一種方法再為他們的舊目標工作。危險是存在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法西斯已普遍地為人咒罵的今天，把法西斯主義的全體系加以基本的修補是必要的緣故。

此外，也還有一部份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民主份子也對於法西斯的經濟和社會組織表示驚嘆；這是因為他們把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混淆起來的緣故。他們沒有察覺清楚宣傳欺騙和事實真相的區別。社會主義的目的在解決社會中一切有關於戰爭，貧窮及其他的弊害。一切國家中的勞動階級和人民都認為這足以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是它（社會主義）同「國家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是沒有絲毫共同之點的。

社會主義的特點在社會共有生產手段消滅階級為特徵。只有把少數有產者對於生產手段的獨占消滅了，才能建立起徹底民主的條件，因為它打破了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人民的已得的民主權利再前進一步的障礙。社會共有生產手段，使得每一個人都能平均的參加社會的勞動各人按其勞力（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只按其需要）分享社會勞動的果實，這樣中止了一個社會階級剝削另一個社會階級的現象，提供了為建立普遍的自和平等的不可缺的基礎。

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却是以暴力維持階級制度的存在為其特徵，它維持了少數獨占資本家和人民大眾的對立，人民被剝奪去一切的權利，連他們在

初四年者，擁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資本的德國五十家大公司的利潤，就從一九三四年的二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一八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同期的分紅從八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加到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德國官方發表的產業股票價格指數就從一九三二年每月平均的四〇、三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一四四、八，跟着戰爭的爆發再高漲到一九四〇年的九八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一一九。

在意大利產業股票指數從一九三二年的四四、六增加到一九三八年八四、六。意大利最大一家的軍火托拉斯蒙特卡地尼公司的利潤從一九三五年的六七、四〇〇、〇〇〇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一四八、六〇〇、〇〇〇利拉。

在日本，產業股票指數，從一九三一年即滿洲事變爆發之年的一二二·九增加到一九四〇年的一三七。

戰爭加速了這一進程。從一九四〇年四月到一九四一年四月，一年之間，德國產業股票指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國際聯盟世界經濟調查，一九三九—四一年）。克盧伯的利潤從一九三九年的三九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加到一九四〇年的四二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即三一、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以上。德國鋼鐵托拉斯的利潤從一九三九年的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增加到一九四〇年的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即一九、〇〇〇、〇〇〇英鎊以上。

這就是希特勒「新秩序」，「國家社會主義的勞動集團」的真面目。法西斯大言不慚，自稱他們的國家是超出一切經濟利害的考慮之上的：

「國家不能有絲毫的經濟利害的打算。它不能是一個一羣不同經濟利害的代表者在一定的時間內爲了執行某種經濟計劃而互相商討的機關。它是一個公理性的組織，有着上一頁的統一性和協調無間的情操，它的目的只在增加人民的幸福，維持他們的種族生存，實現上天所付與它的命運。這，只有這才是國家的意義和目的」（希特勒，「我的奮鬥」，英譯本第六十九頁）。

「法西斯主義的基礎建立于它對於國家的觀念，國家的性質，責任和目的。法西斯主義認爲國家是絕對的，在它面前，所有個人或團體都是相對的，他們的地位只有依據于他們對於國家的關係而定……法西斯國家是有

着自我意識的，它自己有一個獨立的意志和人格」

「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觀認爲國家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存在」（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理論」，一九三二年出版）

這些「精神」的實質實際上是用來掩護那一批強盜貴族、軍閥、大企業家和大地主的吸血的榨取和剝削的他們選擇了法西斯流氓做他們的保護人。實際上，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在這「新秩序」中的地位是怎樣的呢？爲了爭取工人，在他們沒有掌握政權以前，法西斯不惜無限度地撒謊和欺騙。

意大利的法西斯就提出過如下的口號：消滅專制主義，消滅徵用制度，沒收教堂財產，取消交易所，解散有限公司和銀行，把產業管理權移交給技術家和工人。一九二〇年納粹黨議決採納，一九二六年黨大會宣佈爲「不可更改的」二十五條政綱第七條八地就包含了以下各點。現在我們把它舉出幾條，同時把它和實際情況對比一下：

政綱第一條：「團結一切日耳曼人，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之上形成大德意志——事實：武力征服歐洲。」

政綱第二條：「沒收不勞而獲的收入，粉碎利息奴隸制度」——事實：從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七，幾百萬以上的富翁增加一八〇名。

政綱第十二條：「沒收一切軍火利潤」——事實：克盧伯在一九四〇年的紅利達四二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政綱第十三條：「一切托拉斯收購歸有」——事實：「希特勒四年當政顯着的特徵之一在：德國重工業裏興起了許多超等的托拉斯」（克盧伯致教授）。

政綱第十七條：「對一切高利放貸及投機牟利者處死刑」——事實：大批屠殺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職工會份子。

法西斯「上台，工人們馬上就了解了所謂「新秩序」是軍閥投機牟利者和法西斯流氓的天堂，但是對人民大眾都是一座地獄，在那座地獄裏人民必須忍受無限的剝削和一切權利的剝奪。

工人在法西斯統治下的地位在德國勞動法典裏有明文規定：

第一條：「在一個企業裏雇主是領導者，工人是羣衆，他們應該爲企業本身的利益，社會和國家的共同幸福而合作」。

第二條：「在一個企業的領導者和羣衆之間，對於有關於企業的組織，領導者有決定一切之權。」（一九三四年正月公佈，勞動組織法）

自從希特勒登台之後，所有一切工會和勞工組織被解散了，他們的基金被充了公。代之而起的是「勞動戰線」，這是一個在納粹控制下聯合雇主和工人的單一組織。它的職員由納粹指定，不是由工人選出的。勞動戰線不得處理有關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的問題。勞動戰線有二千五百萬成員，徵收雇工人們從前交給工會的會費，沒收了舊工會的所有公積金，因此它的經濟來源是非常大，單在一九三七年，它的收入就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這一筆鉅大的經費歸納粹黨和勞動戰線聯合組織的財務處保管和使用；這當中只有一小部份是用在「快樂產力量」及其他所謂文化福利事業上。勞動戰線沒有物質利益給他們的會員，它給他們「精神的價值」。正如同它的領袖萊·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報告「快樂產力量」的組織時之所說：

「我們不能有物質利益給我們的工人羣衆，因為德國窮，而且是在混亂和不幸之中。增加工資或其他類似的事情在我們是不成爲問題的。因此他們必須撲滅「物質主義」，因爲物質主義要求改良工人生活，他們把工人目標轉移到國家的精神價值。」

同樣，德國工人在革命中獲得，而且在魏瑪共和時代一直維持下來的最大的勝利之一的工廠委員會也被希特勒解散了。代之而起的是由雇主從工人當中，根據「純良的政治觀點」指定的「信任委員會」。在形式上，雇主選出的名單須經工人同意；但是就是這一個形式從一九三五年起也被取消了。信任委員會的權力完全限於諮詢。

「正如同在每一個社團裏一樣，在企業裏也只能有一個領袖；只有他有決定權，對一切經濟和社會事務負責……企業的領袖決定一切，只有他需要諮詢的時候他才去找信任委員會，但這不是說他對他的決定可以負責……企業的領袖必須放在企業本身的利益之後，它必須適應於企業的經濟要求」（希爾登堡經濟區勞動信託者的宣言）。

所有關於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決定權完全在「勞動信託者」的手裏，每一區勞動信託者是納粹政府指定的獨裁者。勞動信託者是怎樣一種性質呢？這可以從克魯伯指定爲魯爾區的勞動信託者這一件事實上看得出來。

一開始，所謂單一工資就是有利於雇主的，因爲那是根據每一個企業的支持能力，實際上就是雇主自由決定的支持能力而決定的：

「運廠工資代管區域工資會將增加中小企業的競爭能力……從工資政策方面說，運廠工資的意思就是每一個企業能按照它自己支付工資的

能力來決定工資，這樣就把每一工廠的支持能力作爲一個決定因素帶進決定工資的過程。這樣，一個工作條件好的工廠的競爭能力就能得到報酬」（一九三三，二月十八日，德國國民經濟）。

雇主有絕對權決定他自己工廠裏的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只有當勞資發生糾紛的時候，勞動信託者才來干涉，在一般情況下，他是不來干涉業務的進行的），這在勞動法典中也有明文規定。根據這次立法，雇主有全權決定「工廠條例」；「工廠條例」規定：

- 一、每天開工和停工以及中斷的時間；
- 二、支付酬勞的時間及其性質；
- 三、計算工價的原則；
- 四、規定懲罰的性質，數量和徵收的方法；
- 五、在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解雇的各種條件；
- 六、根據條例，契約和法典，工人因自動解雇，而被沒收酬勞，對於此項被沒收的酬勞之處置。

看了這樣的情形，無怪乎一位美國的評論家，R. A. 布拉特教授發出如下的感慨：

「在勞工運動的所有的歷史——包括那以無望的殘酷聞名於世的英國工廠制度建立的初期——上，從來沒有過一個惡毒和無人性的雇主向政府要求過比這更多的特權的」（R. A. 布拉特，德國法西斯的精神和機構，一九三七）。

甚至至於連意大利的法西斯機關報，「法西斯之聲」在一九三四年德國開始執行勞動法典的時候——那時候德國法西斯還在水火，意大利法西斯也樂得嘲笑一下德國法西斯——也以少有的真誠，對於這一法典，寫出如下的批評：

「德國法西斯把德國工人階級套上了手鐐腳鐐，交給資本家去剝削……像中世紀的樣子……把工人階級一百年來鬥爭的成果一筆勾消了」。

法西斯的搶劫，撒謊，恐怖和戰爭的綱領是怎樣可能行得通的呢？這一種綱領只有通過政治史中沒有前例的恫嚇、胡吹、腐化……等卑劣到不齒於人的手段才能實現。有計劃的欺騙羣衆，挑撥種族仇恨和猶太主義；無限制的謊言和不顧一切浪費的宣傳，使無知者迷惑；腐化青年，收買流寇特務；

對於卑怯者的恐嚇；對於堅決的反對者的嚴刑酷法——這些就是法西斯的方

希特勒的上台不是德國人民的意志。說希特勒上台是由於德國人民支持
的詞語是一個典型的納粹的造謠。正如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一樣（那神話式
的所謂「道軍羅馬」事實上是在一輛美體的臥車裏實現的），希特勒在德國的
掌握政權是德國的統治階級這背脊人民意志幹出來的。在希特勒上台前的最
後一次自由選舉裏，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納粹黨只在五百八十四名議席中獲
得了一百九十六名議席，而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所獲得的議席，却是二百
三十一席。即便是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希特勒上台以後，共產黨被禁止，共
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停刊，恐怖像瘟疫橫行的時候，在六百四十七名的
議席裏，納粹黨所能得到的也不過是二百八十八名而已。在一九三二年六月
的總統大選裏，希特勒以一千三百四十萬票被二千三百萬票所打倒。結果，
與登納被選為總統。然後與登納運用他總統的特權，停止執行憲法，把希
特勒擁上台，這他不必經過國會通過的法令來統治德國。德國是被反動的
大地主大企業家和軍事當局陰謀違背了德國人民的民主意志送給希特勒的
既已上台之後，爲了維持他們的統治權，德國法西斯說，他們「解決了
經濟恐怖」，「征服了失業現象」。事實上，在一九三二年，全世界每一個
國家都局部的從一九二二—三二年的世界經濟恐慌的深淵裏恢復了一些；
在這一點上，德國並沒有什麼特別。而所謂「失業現象的征服」實際上不過
表示了一個事實，即德國的全部經濟力量和他巨大的技術備裝已經轉到那
龐大的備戰計劃的路上；軍用公路的建築，平時工業向戰事工業的轉變，徵
兵服役的擴大，強迫性的勞動服務，鉅大的戰費的開支到一九三七年，已經
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

一九三三—三七年間德國的備戰費用表

年	代	預算總支出	軍費支出	軍費支出
		(以一百萬馬克爲單位)		(一百萬磅)
一九三三—三四		九、七〇〇	三、〇〇〇	二五〇
一九三四—三五		一一、二〇〇	五、五〇〇	四六〇
一九三五—三六		一六、七〇〇	一〇、〇〇〇	八三〇
一九三六—三七		一八、八〇〇	一二、六〇〇	一、〇〇〇

（據「銀行家」，一九三七，二月號）

自一九三三年至三七年之間，德國公債增加三倍。

這所龐大的備戰並不能像納粹所說的解決德國經濟的矛盾。相反，它只
能準備了一個更深刻的恐慌，從這當中，他們找不到第二條出路，除非是戰
爭。一九三七年二月號的「銀行家」雜誌就說：「當備戰程序結束的時候，
失業和營養不足必然成爲德國人民的命運……德國只有從戰爭當中找尋救濟
」。
戰爭的車輪轉動着：一九三六年武裝佔領萊茵省，一九三六—三七年（九
）西班牙，一九三八年春，奧國；一九三八年秋，蘇台德區；一九三九年
春，捷克。

一九三九年春，新的經濟恐慌的象徵已經出現。納粹的領袖們描寫，唯
一的解決是發動戰爭，征服新的領土。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勞動戰線的領袖，萊·在慕尼黑的一個羣衆大
會上公開的說：
「工人們，假如你們繼續生存在這一塊狹窄的土地上，不久你們又
會互相殘殺起來，馬克斯主義又會拾起頭來……時機成熟了」。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來，納粹的征服歐洲乃至世界實際是避免德國社會經
革唯一的法門。

（譯自杜德著：世界戰線上的不列顛，一九四二年，七月出版）
（念靈譯）

代 郵

張完白先生：

蒙提示請意見至感，本刊對此亦曾一再爲文論及，上期揭載之「大後方建設
經濟之特質和改善途徑」一文即爲一例。
意稿因與本刊性質不合，不擬採用，如須退還，請即見示通訊地址

意大利是不堪一擊的

——論意大利的戰鬥力

達戈

在意大利尚未參戰以前，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法西斯的報紙——提實界報發表一篇文章，曾把意大利的國防力量誇張成爲「無法攻破」的神話。他認爲：一，意大利擁有一百二十艘潛水艇，足將將亞得利亞海峽與奧特蘭陀海峽封鎖起來；二，「八百萬把閃光的刺刀」足以保衛領土；三，意大利除擁有「強大」的陸軍外，還有一「強大」的海軍和空軍；四，有撒丁尼亞和西西里島，班特拉里亞等海峽根據地爲之屏障；五，有利比亞和厄比亞尼亞爲外應。如果意大利無可避的捲入戰爭，則將斷然採取攻勢，絕不作防禦或退却。

一九四一年八月，蓋達在意大利日報上也發表過一篇諛諛的演說辭，內稱：「……英美兩國想在意大利本土及各島嶼登陸之企圖，必歸失敗。縱然英美目前有百萬大軍，亦不足進攻意大利領土，何況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更缺乏足夠的船隻與接濟此百萬大軍之準備。」（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國際電）。

然而會幾何時，紙老虎必竟擊穿了。特爲外應的厄比亞尼亞與利比亞，早已非其所有，班特拉里亞與奧特蘭陀等島嶼不保，而今西西里島的陷落，也不過是且暮間的事了。盟軍的砲火，已響徹麥西拿海峽，羅馬才感遭轟炸，於是全國震撼，人心惶惑，墨氏乃再效秦庭之哭，甘作開門揖盜的勾當。據英方人士的推測，七月十九日希墨會晤的最重要講稿之一，當是討論如何鞏固意大利領土的防務，至少使意大利本土及西西里，撒丁尼亞不致陷落。墨氏當就此向希墨緊急呼籲，乞予以軍事上的援助，尤以空軍援助最爲迫切。這不僅表示意大利兵力之不足，也暴露其抵抗意志之消沉。

惟目前罪惡的戰爭，仍在巴多格利奧與新政府領導之下，繼續依附納粹德國，抗擊盟軍，拒絕投降，意大利今天究竟還有多大的力量，又能夠繼續掙扎多少時辰，才會甘心放下武器，「無條件的投降」？這就引起我們對意大利國防力量重新估計的興趣。

陸軍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一九四〇年三月底，法西斯部長會議上曾通過了一條關於改組陸軍的議案，根據這個議案，意大利的陸軍，應有二十一個軍團，其中有一個裝甲軍團，一個摩托化軍團，一個快速軍團，一個阿爾卑斯山岳軍團。共計有步兵六十七個師，（其中十三個特別師），五個阿爾卑斯山岳師，六個坦克軍團，一百零四個砲兵旅（？）二十三個工兵旅，及十三個騎兵旅。此外還有義勇隊，黑衫營，稅關兵團，及殖民地土著兵約五十萬人。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參戰以後，意大利軍隊約增至一百個師，二百萬人。

過去三年間，意大利統帥部根據希特勒整個戰略計劃，把這些軍隊分佈在下列這些地方，計：意大利本土，西西里，撒丁尼亞共三十個師，在蘇聯戰場十二個師，在北非十五個師，在巴爾幹及法境三十個師，在東地中海各島十三個師，這並說，意軍大部——七十個師去國外，只三十個師留本土及附近各島。

三年參戰的結果，使意大利的陸軍，大爲削弱。在希臘戰役中，損失了整整十個師團，在蘇聯戰場去年頓河中游之役，有六個師團被殲滅，羅斯托夫戰役中，有兩個師團於剛開抵前線的當時，就向紅軍投降了，北非戰役中，先後共損失五十萬大軍。統計起來，參戰三年，意軍幾乎送掉一半，雖說在年可能補充三十萬，但以前那樣先天不足的資源，那樣脆弱的工業機構，也難於爲補的把他們全副武裝起來成爲一個現代化的軍隊。有人估計目前意大利本土暨各島，或許有第一線軍隊二十五個師，及第二線七十五萬人。這並不算什麼過低的估計。觀乎巴多格利奧與新政府急於向希特勒要求調回駐巴爾幹及法境的二十二個師與向納粹乞援等情，已可斷言其國防力之空虛無疑。

空軍

意大利是「空軍至上」主義的發祥地，杜黑將軍的理論，雖未能支配實

夫利華個險時思想，然而在空軍建設方面，却絲毫未稍加輕視，這就是造成丁意國空軍在某一時期的優勢。一九三六年魯爾之役，得助於空軍不小。當時英國軍隊對意之侵略行為，加以干涉，終以地中海艦隊屬於意空軍之威脅，政體雖未決。然而由於意大利經濟條件的限制，使空軍的發展，迄今猶落在英美諸國之後。

意大利空軍的實力，據一國材的統計，截至一九三九年九月止，當時意國第一線飛機約二千二百架，連同預備機，多線機，運輸機等共約三千五百架至四千架左右。這些飛機，大概分列於下列各部份：

- 一 獨立空軍，共二百二十三個中隊，其中六十五個中隊為轟炸機，五十八個中隊為驅逐機與攻擊機，第一線飛機約一千二百架。
- 二 陸軍航空隊，三個中隊，一個獨立大隊，飛機三百架。
- 三 海軍航空隊，三十五個中隊，飛機三百三十二架。
- 四 殖民地飛行隊，五十四個中隊，飛機四百二十八架。

意大利空軍建設的發展過程，也是很平凡的，一九三一年度，空軍建設經費預算七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一九三九年度增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一九四〇年度增至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飛機製造公司有二十九家，發動機製造公司有六家，工廠五十所，從事航空工業的人員約六萬人，每月產量約為機身二百二十架，（現可出產三百五十架）發動機四百部。飛行員有六千人，意大利皇家航空協會的會員（飛行練習員）十二萬人，其中一萬五千人執有各種駕駛執照。

飛機的質也很差，一九三八年意大利僅有每小時飛行速度約二百五十哩至二百八十哩之驅逐機，重轟炸機呢，能攜帶炸彈約三噸，及攜帶重至多兩噸與裝備四挺機槍之快速轟炸機，這比之英美蘇聯各國之新式飛機，其動力動哪一千二百匹馬力以上，高度逾五千公尺，速度五百哩，當不可同日而語。且在數量上也遠不及英美為敵。

意空軍的損失，早在北非戰役中，即損失一千二百五十三架，最近西四里島之役，亦受極大損失，羅馬被炸，即忽忽北向乞援，則其實力如何，也可概見一般。

海軍

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前，意大利的海軍實力，可於下表，知其梗概，（

此表參看一九四〇年意大利海軍年鑑，及一九四一年意大利大西洋年鑑

艦別	艘數	噸位
主力艦	八	一三五、二四四
領巡洋艦	七	七九、二三〇
輕巡洋艦	一六	一三九、二六四
驅逐艦	六	一五、九五七
魚雷艇	六八	八、〇七八
外海潛水艇	四六	六、〇〇〇
濱海潛水艇	七五	一、〇〇〇
水雷艇	一四	五〇、〇〇〇
水雷艦 (M.S.)	七二	三六〇
合計	三三七	五三六、一三三

此外尚有輔助艦艇及沿海汽艇未列入表。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大國多輪戰役後，截至去年（一九四〇年）三月止，意大利尚存主力艦七艘（其中不惟用的舊式戰艦三艘）驅逐艦一〇艘，驅逐艦四〇艘，潛水艇六〇艘，其他艦艇，損失亦大。

把上面各數目字對照一下，則意大利海軍現存之實力，可概見。由於意大利重要軍用必需品的缺乏，與平時對防的限制，其造船能力的限制，這就決定了意海軍於大國多之役以後，不能不放棄海上爭奪，把保存的艦艇，留居內海，以作防守海岸之用了。

至於坦克則更無足道，想不過千餘輛，大不連七八噸者亦已不占保存所的東西了。

必需的資源

造成意大利國防力量薄弱的主要原因，而其本身極度缺乏軍用工業所必需之重要資源煤、鐵、銅、鉛、鋅、鎂，其戰時軍民必需之糧食、棉、綢、錳、石油，其中以石油為甚，從前歐戰輸入二、〇〇〇、〇〇〇噸的穀物，咖啡、糖等。從北歐輸入一、〇〇〇、〇〇〇噸的鐵與煤，這些輸入品，除一小部份運往外，都由直布羅陀海峽輸入。此外從波斯運入幾百萬的小麥與石油，從印度及西貢太平洋諸口輸入一、三〇〇、〇〇〇噸的穀物，

脂肪，牛奶，棉花，羊毛等，經過蘇彝士運河入口。參戰以後，這些來源，已大部逐漸被切斷了。可能的來源，只不過是從德意志而來的德國的煤鐵及巴爾幹諸國一小部份的穀物而已。照意大利現有的那樣的海、陸、空軍，沒有三百五十萬噸鋼和二百萬噸熟鐵，便不足以供給其軍火與裝備的補充。但，很可憐，意大利本國所能生產的熟鐵尚不及德國生產量百分之五，鋼的生產，不及德國百分之十。煤，意大利本國每年需要一千四百萬噸，而本身能生產的不過二百萬噸左右，石油每年需二百六十萬噸，而本身生產量僅七八萬噸，照上述這樣微末的生產力，要求意大利經常維持二百萬軍隊，是極端困難的，甚至就是維持一百萬軍隊也不是容易的事。既愈戰而愈弱，又無法建立新的軍隊，則繼續戰下去，不投降，即被消滅，這正是意軍的大禍。——

人的因素

除了物資貧乏，還有一個致命軍死亡的因素，那就是人的問題。在數量上，墨氏在參戰以前，曾不止一次的「大言不慚」的聲譽於世人之前，口：「假若意大利一旦捲入戰爭漩渦，意大利將有一八百萬把閃亮的刺刀」保衛國土，可是戰爭的發展，把墨氏這句廢話，完全粉碎了。將領們的大廈，會把「八百萬把刺刀」壓在泥坑裏的，何況「八百萬」這個數目？又是那被虛無縹緲呢？就讓他誇大點，就算今天的意國有四千萬人口，可能得壯丁一千三百萬，然而除前後方生產及從事軍事輔助工作的人員，及應有免役者額外，也不會超過四百萬，或者多一點。若再加上歷年的傷亡，和送給希特勒活活去服苦役的六十萬工人，再除掉現在海陸空軍的現役人員，總合起來一算，則意大利還可能繼續戰爭動員的人力，也就非常有限了。況且這些人，又是他經過法西斯政權的壓迫榨取，接受過法西斯黨徒的殘酷魚肉，他們親身體驗了「法西斯就是戰爭」，法西斯就是，就是人民的死路一條，他們並不需要血腥的侵略戰爭，如果戰爭更進一步的擴大和延續下去，對於人民將是一種新的災難，新的剝削，新的犧牲。三年來參戰的苦難，迫使意大利人民於忍無可忍之時，起來反抗，到處舉行反法西斯的遊行示威，罷工，暴動，到處組成反法西斯鬥爭團體及人民解放的游擊戰爭。在軍隊中，最近一年來，大批的逃亡，整團整師的自動放下武器向盟軍投降。已數見不鮮，（羅斯托夫一役中，意軍兩師於剛開抵前線之夜，即向盟軍投誠。）「中

央社本年七月二十二日華盛頓路透電……中路意軍，常常擊斃德軍官，遂致「投降」。據某軍事通訊員說：受命防守巴利維的墨索里尼墨衫圖已不戰而降。」

「師出有名」，「士無鬥志」，這就是意軍之所以老吃敗仗的理由。也就是意大利甘為附庸，甘讓二五、〇〇〇名德國秘密警察在羅馬橫行霸道，甘讓德軍深入腹地，控制交通飛行場，甘讓八、〇〇〇德國「專家」掌握一切主要工業機構的理由。

明乎此，其他就無足奇怪的了。

墨氏雖已坍塌，但就現時看來，意大利非再來一個政變，把政權交給人民，意軍將仍在法西斯壓迫之下，把無窮的戰爭繼續下去。盟軍在攻佔此時機，於意國政局紛亂，情勢未定之前，（據中央社倫敦十日合衆電，德將再派三十二個師團，約五十萬人，增援意大利），巴多格利奧新政府正忙於重新部署之際，其中一切力量，迅速掃清西面之障礙，直搗羅馬，佔有進攻「歐洲堡壘」之捷徑，就此開闢第二戰場，是當時也，只有當與火的打擊，才能使意大利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依目前意大利的國防力量，豈能阻擊打擊的質量尚。

代 郵

社稿，馬特，王致任諸先生：

登稿均因故，無法採用，請即賜告過謝，以便登報。

賜稿諸君：今後務望在稿末註明通訊地址。

果克先生：賜稿均已收到，本刊不擬採用，已如囑代轉。今後仍望繼續惠稿，如能對各種具體問題（如農村問題，土地問題，糧食問題……等）作深入之調查為文擲下尤所歡迎。

金的問題

許滌新

一 黃金解禁了

今年六月初，財政部分行各機關洽照，特將原頒取銷買賣黃金各項法令暫時停止施行，准許人民自由採售，惟攜帶出國及前往淪陷區，則予禁止。這一法令，給與後方市場以極大的刺激力。使人們的眼光又向射到淪陷的黃金來。幾年來淡靜沉寂的銀樓業又活躍起來了，久在黑市索摸中的金價又像中秋的錢塘潮水一般盪激壁立起來了！

我國自民國十九年起，就禁止黃金出口，但國內的自由買賣，還沒有受到限制，抗戰爆發之後，政府陸續頒佈法令，禁止人民買賣黃金，並規定價格由政府集中收購。二十六年九月所頒佈的「金類兌換法幣辦法」，就是金禁的先聲。這個法令，規定由財政部委託中交農四行，郵政局及郵政儲金匯業局及其分支行局處為兌換機關，同年十月又停止「內地幣運生金取具起運地商會證明書辦法」；二十八年八月規定，「金銀之收購專由中交農四行收兌金銀辦事處指定四行之分支行處及其委託之各地金融機關與當地郵電局所辦理，未受委託之任何團體機關個人，均不得收購金類，違者沒收」；同年十月禁止各地金融業（銀錢行號）與當業再行質押金幣金質飾物或生金；同年十一月禁止各省省立銀行或私立銀行收購生金；至二十九年財政部頒佈「查獲金類充獎辦法」，至是，金禁的體系乃告完成。政府之禁止內地黃金自由買賣是與外國政策有極密切的聯系的。抗戰初期，法幣的匯價波動特甚，政府當時的方針是穩定匯價。為了穩定匯價，必須集中準備，為了集中準備，必須限制黃金的自由買賣。何況當時國際運輸沒有大的障礙，為了取得國外物資之內運，還須集中黃金以增強對外的購買力呢。但至二十九年以後，局面不斷發生變化了。外匯問題逐漸降低其對於人們的吸引力，而國內的物價，則呈現着趨於夕貴的形勢。物價問題代替外匯問題而成為大家關心的焦點了。這就使金禁失去了一個前提。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特別是滇緬公路之宣告阻塞，國外物資無法內運了。這就使金禁失去了另一前提。金禁

的二個前提既然沒有存在，金禁的維持自屬不必要了。何況，面對着物價的飛騰上漲，面對着通貨發行量的不斷增加，繼續維持金禁，繼續支出法幣去收兌黃金，將有增加國內通貨量，促進物價上漲的作用呢？因此，我們才說，黃金解禁是適時的措施！

但是，我們如果更進一步去觀察這個問題的時候，還可以看出它的積極的意義來。它的積極的意義是什麼呢？

黃金自由買賣的積極意義有二：其一為吸收一部份法幣回籠，其二是轉移投機對象，削弱一般商品投機。

目前物價不斷上漲的原因，除了生產停滯物資缺乏之外，還有通貨發行額繼續增大一個因素。但通貨發行額之日益擴大，不一定要發生嚴重的影響，問題在於發行的通貨是否能夠回籠。如果發行出去的通貨能回到政府手裏，或者是在生產領域發生作用，則增加鈔票並不一定可怕的事情；要不然，如果發行出去的通貨變成永不復返的黃白，則問題就不能「等閒視之」了。因為通貨是以通貨之增發為發展與滋長的條件，而物價則因通貨的猖獗而更形上騰，更加波動。故設法使法幣回籠是當前戰時財政一個重要的問題。至於法幣回籠的途徑很多，增加稅收，募集公債與獎勵儲蓄，都是這一方針可以採取的步驟。但是，增加間接稅則有直接促進物價上漲之弊；增加直接稅嗎？如果不增稅稅源就要成為竭澤而漁；如果要增稅稅源，則又有「遠水救不得近火」之苦。說到公債，如果不採用重罰主義，如果對公債不採用強迫的方法，效果是不會大的。捐輸嗎？它更具有彈性。在財政的意義上是趕不上公債的。以廣大人民的實力而論，它的作用，財政方面的意義是少於政治動員的意義的。故從根本上着想，我們應重視上列這些辦法的積極作用與其重要性，但從法幣迅速回籠的觀點來，不能不進一步尋求能立刻在社會經濟上發生影響的治標辦法。

欲使法幣回籠能立刻發生效果的辦法，是到用某種物品或證券，使其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如果這些物品或證券是為一般人所珍貴的話，則游資就會

迅速地應集在這一物品或證券的週圍，如果政府能把這些爲一般人所珍貴而又無害於民生的物品大量拋出的話，則通過這種物品，法幣便可源源回籠了。三十一年下半年所發行的美金外匯期票，就是這一項辦法之措施。惜因發出的數量不大，故在市面上所發生的影響，頗屬微弱。這次黃金之解禁，可以說是一辦法之發展。因爲黃金的價格比外匯期票來得更高；黃金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比外匯期票來得更珍貴，更普遍。黃金解禁之後，在提高金價的條件下政府如能源源不絕的拋出大量黃金，那末，巨量的法幣是會應集在黃金的週圍而回到政府手裏的。這顯然是法幣回籠的一個捷徑。

使法幣回籠是穩定物價的重要辦法之一。因爲物價之上漲是以幣值之下跌爲其主的原因之一。（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生產停滯）法幣如能回籠，幣值自然稍加穩定；幣值如能穩定，物價不是跟着就可減少其波動的程度嗎？除了生產停滯與幣值低落以外，還有囤積居奇一個因素。囤積居奇是受前兩個因素的推動而又促進前兩個因素的。因爲囤積居奇是以物價看漲爲前提，而囤積居奇的結果又使物價漲得更快，把囤積居奇看成與前兩個因素沒有關係而獨特地發生作用是不對的。對於囤積居奇當用嚴格的辦法以制裁之；但若單純使用政治力量強制制止，又顯然不易於收效，必須在政治的制裁之外，輔之以因勢導利的手段。因爲在小商品生產佔優勢的國家，生產尚未集中，交通又欠便利，如果民衆的動員與組織沒有基礎的話，單純以政治力量去禁止囤積，確實是不易做到「天衣無縫」的。因此，利用黃金去吸引游資，使過去囤積的一部份資金，轉而從事於黃金買賣，乃是削減囤積一般商品的力量之有效辦法。黃金並非生活上必需之物品，其價格波動與民生無關。黃金價格波動雖可影響幣制，但現在吾國之對外經濟關係已隔絕，金價波動於我國幣制不足爲害。（見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大公報楊志信先生「對於恢復黃金自由買賣之意見」）。故恢復黃金之自由買賣，可以轉移投機幫助政府對於物價之平抑，而對於民生及幣制又無所損害。這是一個合時的措施。黃金解禁是一個適合時宜的措施，是一個能在當前經濟困難中發生良好作用的辦法，所以，我們稱贊它，同意它。

二 幾個疑點的解釋

國內關心戰時經濟的人士，對於這個問題，尚有一些地方是有疑點的，茲分別論之於下：

第一、有人懷疑大量拋出黃金將會引起金價之下跌，而金價下跌有阻礙法幣回籠之可能。他們說：「由政府拋出黃金換回法幣，如拋出之數量不大，則於事無補；如大量拋出，則將引起金價下跌；金價下跌，將使黃金之購買者減少，因而使吸收法幣回籠之目的不易達到」。我們同意前半段的說法，拋出黃金的數量不大則於事無補。如前面所說，三十一年秋間之美金外匯期票，因爲出售的數量不大，所以其影響亦小；今後黃金之拋出，若數量很微，自難收法幣回籠之效。至若說，大量拋出將會引起金價下跌，那就值得研究了。從表面上，從形式上去進行推理，這種看法或許說得通。殊不知在目前大後方情況之下，游資是龐大得可驚的。它們冒種種風險在追求極久易壞而又受到法律禁止的商品，對於價值具有普遍性，經久不壞而又合法的黃金買賣，當然不會表示冷淡的。市場上的物價，供求發生着重要的作用（我們自然是以勞動價值論爲出發點），如果黃金大量拋出而購進的人有限，即求不應供，那末，金價可能下跌；如果購進的人並不少，他們購買的興趣與能力並不稍減，「求」不但不會不應「供」，甚且呈現供不應求的時候，那末，黃金大量拋出不一定就會引起金價之下跌的。看看各地游資的數量，看看一般人對於黃金的愛好，看看黃金解禁後做這項買賣者的便利條件，黃金市場上，金價是可能挺俏直上的。如果我們把黃金投機的進款助瀾的作用放在考慮之中，則金價下跌的疑慮，似乎更可冰釋了。

第二種疑慮是以爲人民之願購買以備戰後之用，「必在戰爭將告結束之時，始能發生，在目前，則因各種理由，恐難實現。苟人民不在目前大量購進黃金而於戰事將告結束之時始大量購進，則政府拋出黃金吸收法幣以平物價之意義，即不存在」。這種看法，亦似屬過慮！正如持這一疑慮的人士所說，「購買黃金者之動機，或爲保持原有貨幣之價值，以防幣值再度下跌之損失，或爲待善價而沽，以爲獲利的手段」，難道這兩種動機只有在戰爭將告結束的時候才告發生嗎？難道購進黃金者的目的只在「戰後國際經濟關係恢復常態，黃金需要必增」的場合嗎？爲了將來戰後金價之漲而購進的可能，是有的，但不能因爲這種可能就無視其他的可能，更不能看目前物價上漲幣值下跌的景況。因此，一口斷定：人民購進黃金只在戰爭將結束一時的說法是不合事實的。黃金自由買賣到現在只有一個多月，金價不但沒有疲頓現象，反而是逐步的昂揚，各地互相盪漾的昂揚下去。本年七月一日重慶各銀樓市價，每兩收進八千四百元，售出爲九千四百元；到了同月二十日，收進

國至一萬一千五百元，售出竟漲至一萬三千元了。在這種時候，成都昆明的金市更形「香銷」。成都每兩售出竟漲到一萬八千元。重慶金價的飛漲，是受成都、貴陽與昆明各地的推動的。這種情形，證明上述那一疑慮是不合事實的了。

第三，關於轉移投機對象方面，有人懷疑黃金買賣將會引起相反的結果。他們所持的理由是這樣：拋出黃金的人，如果不是政府而為私人，則出賣黃金之人，可以將出賣法幣所得的法幣用之於囤積商品，這應一來，商品投機的恐慌不但不會削弱，反而會更加增漲了。這種看法，雖然不能說其完全沒有事實上的根據，社會上，誠然有一些人將出賣黃金所得之法幣去囤積商品，但出賣黃金的人，並不是個個都如此。以目前金價之「香銷」與囤積的困難而言，出賣黃金去進行囤積貨物的人，為數一定是不多的。而且，在黃金市場上湧出者，尚有一種人是不能忽視的，其中一種人因黃金首飾器血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生活或補救一時的支絀。凡中小人家，公務人員及一般自由職業者，均是一類人物。物價的高漲，生活的艱苦，使他們或她不得不忍痛將所積蓄的出賣其心愛的物品，甚至於是幾情的紀念品，以解決一時的週轉不靈。從其所有者說來，這種拋出，為數是不大的。說他們出賣首飾以進行囤貨，顯然將成為「天方夜譚」中所說的故事。那是不可思議的。另有一種人，是慣於在黃金市場中浮沉的投機家。他們是看漲或看跌而從事於做多頭或空頭的。他們的活動對於黃金，為黃金買賣而作黃金買賣——投機活動。他們的活動越擴大，越利害，則應集在黃金週圍的法幣亦就越多，從商品投機方面所吸引來的法幣，亦就不斷的增長了。所謂轉移投機對象的作用，是以這些人們的活動為條件的。他們的活動顯然不會促進商品投機。退一步來說，就是那些以出賣黃金所得的法幣去囤積貨物的人，亦不會增加囤積的活動；因為原來囤積的人若以其法幣或一部份法幣去買進黃金，而出賣黃金的人若又以其所得的法幣去囤積貨物，表面上似乎囤積的人數增加了，但從社會的範圍看來，從囤積的範圍看來，囤積的勢力並未增加，囤積的資金亦並未增加，不外是某甲的囤積活動，變成某乙的囤積活動而已。所以，黃金自由買賣促進商品投機的法幣是不合乎事實的。黃金之自由買賣並不具，它的削弱商品投機的作用還沒有顯出來，限於這一貿易之發展，商品投機的力量，是會受到影響的。

當論與論上對於黃金自由買賣的幾點疑慮，我們認為是可以懸然地解決

的。

三 那些應取的辦法？

為了使黃金的自由買賣能發揮其積極的效果，在金禁解除之後，必須採取一些切實的辦法。在這裏，我們提議：

第一件事是政府最好大量拋出黃金。這在法幣回籠的重要前提。因為，只有由政府拋出黃金，法幣才能回籠到政府手裏。如果拋出黃金的不為政府而為私人，則法幣只在私人之間流來流去，社會所膨脹了的法幣依然存存在着，所謂「回籠」，是談不到的了。以最近一個多月的情形而言，政府所拋出的黃金，似乎不多，在黃金市場中拋出的多屬私人，像這樣，欲使法幣回籠，欲使法幣的收縮及幣值的穩定能發生顯著的效果，顯然是不易辦到的。為了收縮通貨，為了穩定幣值，我們極贊同中央日報的主張。這就是政府「將已握有的黃金，陸續放出，以期達到「黃金歸人民，法幣歸政府」的目的」(見七月一日中央日報社論)。

第二件事是利用借款購入黃金。這是政府大量拋出黃金的條件。政府在抗戰初年收兌了不少的黃金，但用之於支持外匯匯率與購買國外重要物資之後，存量大額不多。探金局在後方雖有幾處在開採，可惜產量不大。因此，政府欲做到大量的拋出黃金，必須設法擁有大量的存金。否則，是沒法陸續拋出黃金的。對於這一點，各方人士多主張向美國借入。美國現在存有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黃金，如果商量得好，它是可以借黃金借給中國的。中央日報亦明白的主張：「倘能再向美國政府借入貸款項下，以一部分撥給黃金，輸入國內，以資利用。以黃金體小價昂，由航運運入，似不困難」(見該報本年七月一日社論)。這一主張是很中肯的。但為減少將來償還時的困難，我們認應從貸款項下撥給的黃金應明確地以美金計算，如不能直接撥給黃金，則應設法以貸款購得黃金。對於這個問題，讀者多擔心對將來償還所引起的影响。他例說：「將來於償還後歸還美國，其歸還之方式不外：(一)由政府再將國內黃金收回而以此歸還；(二)以外匯項寸撥付；(三)輸出物品抵償。第一種方式將造成戰後通貨膨脹之膨脹，因而增加戰後現通貨時之困難；第二第三兩方式將減輕我國戰後建設之資力，因而影響經濟復興工作的進行」。這種看法未嘗沒有道理。我們亦承認利用貸款購入黃金有國

雖，亦有缺點，但因難是設法克服的，缺點是設法補救的。如果因爲它
有困難有缺點就置之不顧，那是「因噎廢食」的辦法。就以論者所持的三點
而言，如果我們是用借款去贖入黃金，或從貸款撥給黃金而以美金計算，那
麼還債的時候，可以不用黃金。這是一來，由政府「再將國內黃金收回」便
成爲不必費之舉了。關於後面二點，可以將債還的時期拖長。只要我們加緊
國內團結，配合聯邦將日寇驅逐出中國去，則國際間的經濟援助，利用外資
以進行經濟建設，是不成問題的。將來的問題固須我們時時作高瞻遠矚，但
當前的困難之解決，乃是將來一切的前提。我們很同意傅孟真先生的意見，
當前的口號是「一切爲反攻」。爲反攻所需要者不論事實如何困難，如有缺陷
，皆當整頓，不論環境如何困難，如當改正則須改正」（見本年五月二日大
公報）。利用貸款贖入黃金以吸收法幣，是與反攻有深切聯繫的。故對這個
問題，應當設法克服困難補救缺點，而不應放在考慮之外！

第三件事是對於金價不宜作嚴格的限制。這是發揮黃金解決的積極作用
的條件。金價上漲過速則害，則其吸收法幣與轉移投資對象的能力亦隨之加
提高。故金價上漲乃爲吾人預期的好現象，爲了金價上漲，政府對之作若
干限制，顯然是不適宜的。有人主張政府對金價應加限制，使之上漲不致過
猛。這種主張，在立意上或可原諒，但以其實際而言，當會沖淡黃金由
買賣的積極作用。因爲要限制金價的上漲，必須進行限價或漲價，而限價
或漲價，乃是在限制金市的發展。如果這樣，金價便不能活動自如，它的
吸收法幣轉移投資對象的作用便削弱了。因此，我們認爲金價是不宜限制
的。政府所應盡力的是在金價上漲時抽出資金以吸收法幣，在金價下跌時抽
入資金以維持金價。

第四件事是擴大黃金自由買賣的區域。這是普遍穩定幣值的條件。依財
政部的規定，攜帶黃金出國外往流離區域，是在禁止之列的。攜帶黃金到論
際區去，易被敵寇與漢奸所利用。過去敵寇常利用其所規定的法幣，去奪取
外國頭寸，以後又以法幣作爲搬運內地物資的工具。如果我們對於黃金的
自由買賣給與一個缺口，那末，它到一定會乘虛而入的。況敵寇正在偽法
法幣，企圖向內地推行偽法幣，極力後方企圖呢？故對於攜帶黃金入
臨區，必須嚴格禁止。但對攜帶出的一區域，似應加以考慮。因爲只限於國
內後方，黃金的買賣仍極有限，苟將若干與我國有密切經濟關係的邊境及其
一定口岸，劃入黃金自由貿易的範圍，則黃金的買賣自會擴大了。至於故慮

將後者某些地區劃分開來而加以較嚴的設法，是有害的。因爲這是故爾所
見禁閉的事情呀！

第五件事是設立黃金交易所。這是引起人民對黃金自由貿易發生興趣的
條件。爲了使人民對黃金的貿易發生興趣，必須使其在交易上得到極大的便
利，因此，成立一個集中的交易機構是十分必要的。楊志備先生主張在後方
各大都市設立黃金交易所，我們認爲這是一件必須實行的意見。他說：「設
有黃金交易所，則凡欲買賣黃金者，皆可於交易所爲之，而免分向各金店銀
樓接洽之勞。同時，在交易所之買賣，除每月交割一次外，可隨時以現
款現貨之類。有此兩種便利，則買賣黃金者必可增多；因而轉移投資對象之
目的始易達到」。交易所所收之交易保證金，須之概存之於國家銀行，保
證金之比率，亦須提高至百分之五十以上。此外，政府更可徵收有關交
易所之各項稅款」（見本年六月廿三日大公報）。這都是很有價值的提議。
但我們認爲這是法幣制備的輔助辦法，若謂單靠這種辦法就可使法幣大量回
流，那就未免過分了。因爲依據這種辦法而歸到政府手中的法幣畢竟不多。使
法幣能退還而大量的回籠，還須待於由政府大量抽出資金。

這並其爲發揮黃金自由買賣的作用所必需的辦法，但這些辦法只能作
一定的效力。我們已經反覆的指出了「黃金自由買賣是一種治標的方法。它
不能在根本上消滅幣值上跌物價上漲的毛病，但目前的物價漲，銀根緊縮現象
，似不能歸咎於黃金之自由買賣。要平穩物價，要穩定幣值，要解決當前經
濟的困難，其本意是在發展生產，還是在執行適合於客觀的合理的財政經濟
政策」（本年八月一日新華日報社論）。

★ ★ ★ ★ ★ ★ ★ ★ ★ ★

徵購(借)準標與土地陳報工作

洪沛然

我國戰時財政，對田賦改徵實物一點：算是一大成就。兩年來的田賦徵實，在財政上，在平衡糧價上，都曾收到若干效果。現在，已進到徵實的第三年度，(關於徵購是否均改為徵借，姑不具論。)筆者僅就購(借)準標，與此標準有關之土地陳報問題略為論列。

依據四川省參議會決議，本年度四川徵購一律改為徵借，同時「徵」與「借」分別辦理。徵實標準，查參上年情形，切實改進，力求負擔公平；至於借糧標準，則以收益在一百五十市石以上之戶為起點，累進徵借；一百五十市石以下免借。此種辦法，若能見諸實施，不用說，是很好的。但若以一百五十市石收益之戶為起點，作為借糧標準，則必須以各縣土地陳報或縣總歸戶與業戶總歸戶確已辦理清楚為徵收前提，不然，收益一百五十市石以上之戶，就無從調查清楚。

當政府決定由田賦改徵實物的時候，原即擬定兩大原則：一是「公平」，一是「除弊便民」，作為推進徵實業務的準繩。為要能達到公平，政府會飭令各省市縣趕辦土地陳報，限期完成，希承報公允，無倚輕倚重；或有田無租，有租無田，或田多糧少，田少糧多之弊。此點，以四川情形而論，尤屬重要。在防區制時代，川省各軍事當局劃地為防，田賦遂無定額，多隨需要增加；同時，地方豪強，憑藉勢力，強佔公產，或據荒塚為私有；甚而強購民田，以不納賦為業，民元以後，川省賦籍之紊亂，可以說到了極點。據民三十年四川隆昌縣土地陳報辦理結果，共得田地面積七十二萬三千三百餘畝，其中田佔三十八萬四千四百餘畝，較原有面積竟溢出一萬三千三百餘畝；地佔二十八萬三千餘畝，較原有面積竟溢出十七萬五千三百餘畝。以承種面積來說，照陳報成果，應為六十六萬四千八百餘畝，但舊額僅三十七萬九千餘畝，除花戶逃避，黑地逃糧，以及飛酒等弊外，實際承種面積不滿三十萬畝，僅達應承種田地的二分之一弱，於此可見漏戶之多，與承種不均的情形。所以，力求土地陳報辦理的準確，實為達到公平負擔之基本工作，而徵購(借)亦由此得到依據。

抗戰前各省已先後呈報土地陳報，川省則開始於民國二十七年。截至今

年六月，據四川省田賦管理處報告，在全省一百三十五縣當中，先後辦完的有一百十三縣。可是，這些完成縣份，大多未辦歸戶總冊，因之，省田賦處特飭令各該縣迅速辦理，致於本年新辦陳報縣份，暫按保歸戶。本來歸戶的作用，一在便於徵收，一在便於推收；假如編查，陳報，審核，公告，給照這些應有的程序，均一一辦了，但歸戶未辦，則徵收亦必失其依據，累進制更缺乏推行的基礎。我們常常說「公平」，可是「公平」并不僅限於土地陳報的程序辦理完竣，如果歸戶未辦，新訂稅率還是採取比例制，最多使花戶逃避，黑地逃糧等弊除去，而大戶與小戶間承擔之不公，却依然存在。所以，欲求負擔公平，則必須以推行累進制度為前提，欲推行累進制，又須首先辦理業戶總歸戶；要辦理業戶總歸戶，又須有確切之土地陳報為依據，三者實為今天不可或缺的工作。此次四川各區行政會議，遂寧重慶兩區對省參議會以收益一百五十市石為借糧起點，咸表示異議，仍主張沿用去年舊例，隨賦辦理。考其原因，或係各縣土地陳報尚未辦理確實，若干縣份即使較有頭緒，亦僅在開始辦理保歸戶，或鄉(鎮)歸戶，至於縣歸戶，尤多遲未舉行。業戶總歸戶更未辦理妥貼，因此徵購(借)或累進制度徵收，亦隨之推遲。

自由賦改徵實物後，一般老百姓，特別是小租戶，總希望能做到負擔公平。因為鄉下老百姓除國稅負擔外，還有其他縣公糧與臨時稅額攤派的負擔，而這些負擔也都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老百姓對「公平」二字也就特為珍視。以兩年來各地農作物的收穫而論，雖然不算頂壞，但也不能謂之為豐收，豫粵兩省雖災情奇重，可是老百姓仍能節衣縮食，乃至賣一部份物品來繳納應繳的稅額。據報載，截至七月為止，三十一年度徵購溢額，計達三十六萬餘市石，這一方面說明鄉下老百姓的樸實風度的可愛，一方面却又說明老百姓為國犧牲，為抗戰服務的精神確值得我們尊敬。雖然如此，力求公平，還是政府的責任，不然，任其拖延，唯求實效，則很容易造成地方行政人員，卑視法令，冀圖倖倖的風氣。同時，流風所及，更有可能影響到其他政令的推行，屢來主政人員均曾以此自惕。

辦理土地陳報，客觀的困難也確實太多。如經費的不足，技術人員的缺乏，基層政治組織的不健全，地方豪強的阻撓等。但是，反過來問，各地方辦理土地陳報的人，是否曾經過更多的努力去克服上述困難？除經費一點，須上級補助增加外，其他各點是值得辦理的人多加考慮的。筆者確知有些縣份是在認真辦理，只是因經費太少，處處都會感到捉襟見肘，使土地陳報的推進延緩起來。但也有不少地方為了急切邀功，同時又不願開罪富戶，執多敷衍了事的，及到覆審的時候，漏洞百出，而反對的聲浪四起，結果，土地陳報的限期又推延下來。所以，主觀方面的弱點及努力不夠的地方，也是限期一再展緩的重大因素。

再以四川情形來說，幾年來土地陳報的推行，能利用其初成成果作為延實標準的，三十年僅有十縣，三十一年有十一縣，而且這些縣份辦理起來，都各有缺點。約言之，有下列數端：(一)同時同地辦理程序不一，有依甲種程序辦理者，也有依乙種程序辦理者；(二)稅額太重；(三)填地重複；(四)通知單與陳報單不符，常有錯誤的地方。事實上，上列四項，除第二項外，餘均應由主辦人員負其全責。雖然土地陳報本身固屬一項重要又細緻的工作，難免無一錯誤，但辦理人員應力求精細，務使錯誤減至最低限度，因稍有錯誤，即易引起地方豪強的藉口，使陳報工作發生障礙。

筆者以為，要使購(借)糧標準適當，負其公允，政府應該把土地陳報辦理的好壞與速度的快慢，作為三十二年地方行政考績的尺度之一，同時，就各地土地陳報辦理的情形，筆者再提供以下意見，俾資參考。

第一，須切實動員鄉村知識份子。土地陳報的程序，原分兩種：一是甲種程序，以分坵丈量為根據；一是乙種程序，以人民陳報面積為根據，但更使土地陳報辦理確切，仍以推行甲種程序最為適當。不過，此種辦法，既費時而又費人，同時，再要舉辦業戶總歸戶，那更是一件費時而又費人的工作。過去，各地主辦陳報的人，咸以技術人才缺乏為對，這都不是毫無根據，事實也正是如此。現在鄉村的保甲制之未臻健全，這是人人得而論之的，雖然，政府當局對此種制度頗感憂慮。當土地陳報開始辦理的時候，一般主辦人員對鄉村中的保甲長，也曾寄與莫大的希望，期其有所幫助，殊不知事與願違，根據各地情形來說，主辦人員對此咸感失望。而且若有若干保甲長不惟協助不力，反多徇袒富戶而陰事阻撓，以致造成因循，敷衍等流弊。本來，今天鄉村政權，雖自有其行政系統，倘若考諸實際，實權仍多操富戶之手，

所有保甲人員不過為地方權貴之羽翼而已。所以，在執行政令的時候，就難免不因人事之親疏而各有不同。不僅對土地陳報如此，執行其他政令，亦莫不皆然。因之今後辦理陳報的人，絕不要以保甲長為可恃，實應以最大的力量動員鄉村中的知識份子，尤其是一般不為左右袒的青年學生。筆者相信政府能夠動員許多知識份子，土地陳報，無論如何是可以如期完成的。前不久，政府對義務勞動，與高中畢業生服務會有詳細規定，其意，這正可以配合目前辦理土地陳報之需要，動員鄉村小學教師及廣大青年學生到農村服務。如此，一方面可節省開支，並加強行政效率；一方面也可使現行教育與現行政令切實配合，使之趨向實效，不致變為課堂空談。

第二，宜多採公開討論的辦法。筆者深覺多採公開討論的辦法，最為辦理土地陳報及重要之步驟。公開討論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將現有辦法，當執行經過，及所得效果，通過縣參議會，再與之交鄉民大會，或保民大會公開討論，聽取討論意見，然後向交縣參議會核辦施行，其他，或另組以自辦為義務之田賦審議委員會，把土地陳報交鄉民大會或保民大會公開討論，總結討論意見，然後再交審議委員會與縣參議會核辦。如此，一切討論公論，而糾紛自少。四川某些縣份當土地陳報辦理後，也曾採取過選本縣士紳組織審查委員會的辦法，並與縣參議會協同審核。無疑的，這種辦法，比較那些未經公開討論而遂成定則更進了一步，但人員的組織僅限大戶(實際各地派的士紳均係大戶)，似乎尚欠完善。我們知道，在推行中除大戶外，尚存在有勇於納稅的廣大自耕農戶，這些農戶，假使他們當中比較懂得更多的人被選進來的話，筆者相信，他們可以提出更多或為某些大戶所不樂道的意見——如果進後則，使土地陳報辦得更其合理。前面，筆者提出應以自耕農為基幹(這並不是說不要大戶)，原因就在這裏。

第三，建立合理之標準稅則。建立合理之標準稅則原非易事，因有關土地消長之類目過份複雜，沒有合理之等則，欲求標準稅則合理化，也很困難，所以，建立合理的原則，實為建立合理之標準稅則的前提。分等列級，以地價申報作標準，政府早有明文規定。不過，地價變動不常，純以地價申報作標準，難免沒有困難，時或有主張以地目，土質，收益，地價等項為主，以交通，灌溉排水等情況為輔，筆者深覺以此原定等則似較合理。等則既定，然後按各不同等則，依累進原則訂定統一標準，對不同等則，用記分法規

定某某則應有的分數，之後，以等則不同的畝數與同等的分數相乘，再以乘積相加，彙集總分，此總分，即相當於該種面積之總和，總和既得，果速制度由此就得了依據。舉例說，如果等則的分數，依等差級數規定之，某甲有一等一期的田三五畝，二等五期的田五〇畝，二等六期的田三四畝，三等七期的二八畝，那末，它的計算方法應如下表：

等	期	分數	畝數	乘積
一	1	18	35	18×35
	2	16	—	—
	3	14	—	—
二	4	12	—	—
	5	10	50	10×50
	6	8	34	8×34
三	7	6	28	6×28
	8	4	—	—
	9	2	—	—
總分			1560	

又假定以五〇分爲徵稅起點，并規定同徵稅的稅額，如此再劃分等級，依果總原則分別厘定稅額，這樣稅則可稱統一，而負擔堪稱公允。比例稅制，時賢早有論列，多以此種稅制，爲最不公，故都力主累進。因果果進正合糧多者多出，糧少者少出的原則，特別對一般小自耕農，是極利便。我所謂謂保護自耕農，首先就應從立法上做起。現在，各地稅則多以舊賦正稅與附加總額爲分配標準，此種分配法，各地執行亦各有分歧之處：有的以現有賦除舊賦正附稅總額，得每畝平均稅率，按平均稅率分別規定，使現有總額與舊額等，并借此減輕實地實額之舊業戶負擔；有的則以舊有畝數除舊額，得每畝平均稅率，按此平均稅率分別規定。後而一種辦法，僅以畝的負擔，雖稅額仍舊，業戶并無加重，並且國家財政的收入，反可隨賦額而增加而增加，以除舊爲例，新額即可較舊額增加一倍。不過，從某些業戶的總稅額來衡量，若與土地整理前比較，稅額確不免加重一些，四川多數業主起而攻擊稅額太重，或則嫌比而言。筆者以爲，實要做公平合理，上面兩種辦法均值得商榷。中國舊賦，不值以比例制爲稅率標準，且縣與縣間，鄉與鄉間

，乃至戶與戶間的稅額負擔多不均，時賢指責最多，並不贊成。現值就四川省而言。四川經濟滿清光緒以舊名額，「新捐輸」分攤，全額紳議以後，從此縣與縣間，鄉與鄉間的負擔，即相差很大。是時，川省財政，川北水之，川西較輕，川東最重。此種現象，至今尙可能究其源。自民九縣經費准許隨糧附加，由附加而達成之負擔差額甚於前，如以三十年前預算縣附加爲例，其輕的，僅達或百分之四五，如川西的綿竹，最高僅達正稅的百分之二十，如川北的劍閣，一般縣份，十之七八，適當正稅百分之四至到六百，由此足見四川附加之重，同時，縣與縣間負擔的差額也特別大，結果，在此種情形下，政府沒有一個合理的標準稅則，仍依舊額計算，自然會感到負擔不平，以舊除舊的平均稅率作爲新稅，自會感到負擔加重。所以，建立合理的標準稅率，亦爲政府應考慮之點。

本年度購(借)糧不能全部依土地陳報爲標準，但：各省應儘量利用辦理土地陳報繳納之縣份，迅速整理糧戶，以此作爲徵稅標準，其他縣份亦可用是項成爲，作爲改進途徑，希使負擔增加，政府與人民一致期望之公平負擔，亦得有所寄附。

更正

上期本刊發刊「論民族主義和國主義」編者答覆中，排後略有錯誤，茲特更正如下：

三四〇頁第二排，第七行「要」字下遺一「用」字。第九行反侵略主義不編排「孫中山」三字。第十三行「反革命的民族主義」下，漏「是假的民族主義。」一句。第三排九行「主義」係「的民族」三字之誤。

「大後方農村經濟的特質和改善途徑」一文中，三二五頁下排第六行「設兵役」爲「服兵役」之誤。三二六頁下排倒數第三行第一字「建」字上遺一「不」字。

整風一二三心得

石帆

反省自己和改造自己

整頓三風運動的中心意義是思想革命，是全黨端正思想方法、轉變工作作風、鍛鍊鬥爭武器的改造運動，是過去一切反對不正確鬥爭的批判繼承和新發展。爲什麼說是批判繼承和新發展？因爲這次整風運動比之於過去黨內一切反對不正確傾向的鬥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這次整風運動，不僅是全黨反對非科學意識的除毒運動，而且是每個人反省自己和改造自己的銳利武器。

中國雖然只有二十二年的歷史，但却充滿了向自己隊伍中各種機會主義作不調和鬥爭的生動記載，例如反對彭述之主義的鬥爭，反對陳獨秀主義的鬥爭，反對李立三路線的鬥爭，反對黨會議前在黨內佔領導地位的機會主義的鬥爭，以及反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等。這些鬥爭都有它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由於這些鬥爭的勝利，使黨逐漸走上健全的道路。然而這些鬥爭的前三種，雖然都有成功的一面，却也包含着不可忽視的弱點。這種弱點的主要內容，就是當時反對許多錯誤思想意識時，都沒有把它當作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即沒有同時當作反省自己和改造自己的有力武器。好像反對彭述之主義，就祇要反對彭述之及其附從者的錯誤意識和不良作風；反對陳獨秀主義，就祇要反對陳獨秀及其附從者的錯誤意識和不良作風；反對李立三路線，也祇需要反對李立三及其附從者的錯誤意識和不良作風。沒有想到這許多錯誤意識和不良作風，決不是憑空落下，也不是偶然產生，而實實在在都有它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條件，都有它的形成過程。譬如說罷，陳獨秀主義意識和陳獨秀的社會出身，以及他所依據生存的社會存在不能分離，它是我們中國民族運動底弱點和缺點的鏡子，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自高自大而又軟弱無能的反映；陳獨秀的思想立場和方法，是中國新舊士大夫思想立場和方法的集中及化身，他的家長制度是中國宗法社會的遺毒。同樣，李立三路線也和李立三的社會出身，以及他所依據生存的社會存在不能分離，它是中國民族運

動和社會運動底弱點和缺點的鏡子，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動搖性，流氓無產階級與破產農民底破壞性的反映，是半托洛斯基主義在中國化身，它用冒險盲動的左傾空談，掩蓋着右傾機會主義的消極。

這種錯誤意識和惡劣作風，所以特別在陳獨秀和李立三身上發育滋長，是由於他們的社會出身和教養以及他們的工作地位，是上述錯誤意識和惡劣作風寄生的最便當基礎，因此也就和他們的名字實結合着。中國革命不幸的地方，也正是在於它沒有真切的認識幹部和適當的選擇幹部，以致讓陳獨秀和李立三這樣渺小的人物，居然能够僥倖爬上負責的領導地位，讓他去發號施令，甚至擺佈一切，結果就使中國革命遭受了莫大的損傷。不容辯論，這種不幸的結果，既然主要是由陳獨秀主義者和李立三主義者所造成，它的責任，當然主要應該由陳獨秀主義者和李立三主義者去担負，而中國歷史也已給了他們以應有的批評和責罰，這在中國歷史上，以至世界史上，都已成爲確切的定論。

但是，雖然如此，這還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就是上述錯誤意識和不良作風，既然都有其歷史根源和社會基礎，那必須要有深入周詳的檢討和多方面的鬥爭，才能逐漸加以肅清。因爲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取簡單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辦法。否則，如果採用徒快一時的懲罰方法，不顧三七二十一，亂打一頓，或專攻別人而放鬆自己，結果，阿Q雖然被槍斃，而阿Q主義依然存在；或者，一個個解決反對阿Q的人，而自己却是一個個阿Q主義者。舉例來說，李立三不脫不算是反對陳獨秀主義的英雄，首先提議批評阿Q的還是李立三，但是李立三所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毛病，却不下於陳獨秀。尤其他表現在工作作風上的武斷專制，壓制自我批評，簡直和陳獨秀主義一脈相承。雖然他們的思想意識並不一樣，陳獨秀從右傾出發，而李立三則從「左傾」出發，但是他們的立場和方法，却是同樣的主觀主義，而結果也完全一樣，都使中國革命遭受損傷。

又如四中全会時新起的領導人，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反對李立三路線的，事實上，他們也的確是反對李立三路線的主要發難人之一，但是他們是否的正懂得立三路線之錯誤的實質呢？這就需要事實來回答，而不能單靠口上說得多麼好聽來決定。如果單從口頭上的言辭來看，那麼他們許多反對立三路線、擁護國際路線的發言和文章，倒也痛快淋漓，說得頭頭是道，但一究其實際，他們對於國際路線的了解，也實在非常膚淺，只能做教條主義的反響背誦，並不能理解它的精神和實質。同樣，他們對於立三路線的批評，也多半是從感情出發，很少從理智出發，他們對於立三路線的歷史根源和社會基礎，並沒有真正經過嚴密的分析和研究，尤其不會把它當作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他們沒有想到立三路線並非偶然產生，自有其一定的社會根源，而自己的社會出身，既然和立三大同小異，是否也有可能受類似的思想意識呢？如果專攻別人而放鬆自己，不把反對李立三路線的鬥爭，發展成爲全黨的思想革命，用嚴整的科學方法和精神去克服非科學意識，切實反省自己和改造自己，是否能夠把它肅清呢？毋庸諱言，當時對於這種根本問題，都沒有深切認識，而且表現得非常馬虎。結果，立三路線只是成了罵人的咒語，而國際路線則成了教條。至於中國革命中許多基本的實際問題，究竟應該怎樣去解決，而且究竟要怎樣才能解決，則大都一知半解，自以爲是。結果，當他們趕走了李立三，自己爬上領導地位去代替他的時候，却仍不能不拾起陳獨秀和李立三的衣服，而且擴大範圍來應用，於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都大交鴻運，成爲支配力量，其所產生的惡果，也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嚴重。尤其是從「九一八」到達蘇聯會議這一時期中，中國革命所遭反到的損傷，主要應該由他們負責。

當然，現在來揭起這些已經過去的事情，並不是再來算歷史舊賬，因爲這事非曲直，早已明如觀火，他們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功罪，也已歷早有定論。現在我所以在此重提起這些事情，主要是想拿歷史事實來證明，一個思想改造運動，乃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任務，決不是僅靠簡單的組織的鬥爭方法所能完成，也不是專攻別人放鬆自己，就能達到目的。如果不從根源上去揭發，不從思想的實質去找改造途徑，如果不能提醒大家來反省自己，而改造自己，結果就有槍斃了阿Q，而保存阿Q主義，或在口頭上反對阿Q主義，而在自己思想意識中却充滿阿Q主義的危險。

這次整風運動的一個最大特點，同時也是這次整風運動所以能够收得這

種偉大效果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澤東同志和中央在領導整風運動中，經常提醒大家要把整風文件的精神與實質貫徹貫通，作爲自己的武器，並且說：每個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在考察別人時亦是如此，必須作歷史的全面考察，避免有失的片面性。中央一再指出：明哲保身，有話不說，的態度是不對的，離開自己專攻別人的態度，也是不對的。而且再三提醒大家，我們進行整風運動的根本目的，是爲了使黨與治病救人。因此，討論批評的態度，應該是嚴正的、廣泛的、公道的，但又是應該從團結出發的，實事求是的，與人爲善的對的，而一切冷嘲熱諷、惡罵、捕風捉影、誇誇其談，都是不正確的。我們黨是希望整風運動能與過去一切思想改造運動做一比較，就可完全懂得：過去那些思想改造運動所以失敗，或半途而廢，而這次整風運動沒有做最後總結，就已收得很大的功效，完全不是偶然。我們如果要求進步，使自已對於民族與社會有更多的貢獻，那就應該緊緊把握上述「懲前毖後」與「治病救人」的原則和態度，更積極的來參加整風運動。

黨內批判是社會批判的深化過程

「我們要完成打勝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習，就沒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就會影響全民族。」整風以來的事實經過，證明我們在這方面是有成績的。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實事求是與無偏無倚的精神提高了，自以爲是與驕傲取巧的毛病減少了。一些只有書本知識的人，以前往往脫離實際，現在卻努力向實際方面發展；而一些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以前往往輕視理論，現在也懂得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了。又如一些向來粗枝大葉以感想代政策的人，現在也開始注重調查研究了。宗派主義已經大爲減弱，黨內團結已經空前加強了。

當然，缺點也還有不少的。嚴格說來，整風學習至今還沒有普遍深入。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殘餘作風，在全黨來說，雖已大爲削弱，但在某些同志與某些地方，有時表現得仍很嚴重。有許多工作，還是說的比做的多得多，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還是嚴重存在着。武斷包辦與上竊下騙的作風，還不時可以發現。吊兒郎當與麻木不仁的現象，也還沒有完全克服。至於黨八股的遺毒與老一套的作風，那更依然支配着許多人而尚待清除。諸如此類

的毛病，當然還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全改正，而有待於繼續整風學習來完成。

因此就有人覺得：整風，整風，還要繼續整風，究竟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把不正之風完全整好呢？這樣，豈不是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去進行整風，而把實際工作反而放鬆了嗎？這是我們所聽到的對於整風運動實際的第一種。又有一種朋友替我們擔心，看見我們暴露自身的弱點缺點過多，恐怕被反共的人們利用去作爲進攻我黨的工具。我們對於這種好心朋友的實誠和關心，當然應該表示感謝，但是我們却坦坦白白向他們解釋：一個政黨對於自己底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以考察這個黨是否誠實，和它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本階級與民族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發錯誤的根源，分析那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就是一個政黨負責的表徵。一個負責的政黨不應該容許自己內部有不正之風存在，正如不可在健全身體上容忍癩瘡存在一樣。而且癩瘡最容易從內部奪取的，如果我們不把自己健全起來，就有可能陷入這種不幸的命運。整風運動是愛克司光，它把我們身體內部不容易診察的病癆尋找出來，同時它又是一個照妖鏡，我們用它細心一照，就可把一切暗藏着的牛鬼蛇神，都使它顯出真面目來，王實味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另外又有一種幸災樂禍的人們，看我們七整風八整風，發現了許多毛病，就誤信我們的領導已經動搖，或已四分五裂，於是就敲鑼打鼓，或竟乘機行事，想來瓦解我們。這種人不是神經衰弱，就是誤信謠言。我們可以坦坦白白告訴他們：經過整風學習，我們的隊伍只有比以前更團結，同時，我們進行思想革命，改正作風，不償爲了自己，也爲了全民族的命運。而且老老實實說起來，我們所進行的黨內批判，正是社會批判的一種深化過程。因爲我們的隊伍不是空想的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現實的從中國社會中產生出來的。我們的隊伍的組成員（被賂）但他們都來自中國社會的各部份，現今還生活在社會中，因此某些成員多少帶來一些或者反映一些社會中的惡濁東西到我們隊伍裡面，這有什麼奇怪呢？正如一個人從污泥中爬出來，而且經常要在污泥中去混，他的身上帶有污泥，這完全不奇怪。反之，在這樣惡濁的社會中，能够產生毫無污濁的成員，這倒是很希罕的事情。我們可以說：祇要社會中還有污濁東西的存在，我們就不可能要求每個成員都潔淨無疵，不過我們決不屈服在這現實面前，所以就有修養和鍛鍊的必要，就有進行自我批判和改

造自己的必要。

我們進行這種自我批判和改造自己的目的，當然不僅爲了彌補其身，而且是要兼善天下。我們批判得越徹底，改造得越成功，那我們的隊伍就越發整齊，或者也就越發精良；我們對於民族和社會的貢獻也就越發多。而在我們這種自我批判和改造的過程中，事實上也就同時進行社會批判和改造的工作。例如我們批判主觀主義的時候，必須揭發它底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它底唯心性質——它底片面性和反科學性，這就無異批判了唯心觀念。同時也祇有這種深本窮原的批判，才能真正暴露出主觀主義原來不是根據客觀事物的一種主觀武斷，因而它與客觀真理也必然是不相符合的。又如當我們批判宗派主義的時候，也必須從它社會根源與認識根源上，去揭發它底自太性，排他性與排他性，這就無異批判了社會的自利觀念與唯我觀念。同時也祇有這種深本窮原的批判，才能真正暴露出宗派主義原來是舊社會自利觀念的反映，因而也就不難理解它與集體利益與大眾利益是不相符合的。再如當我們批判黨八股的時候，亦必須找出它的歷史根源，指出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底種種因素的反動，一方面又是五四運動消滅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這就無異對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文化運動，重新給以歷史批判，同時也祇有從歷史的批判立場出發，才使我們易於懂得黨八股乃是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要徹底根絕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餘毒，就必須連帶消滅兩者的巢穴——黨八股，因此整頓文風與整頓學風整風，乃是目前全黨反對非科學主義的三位一體的任务。

爲什麼我們的自我批判會有社會批判的意義，而且會成爲社會批判的有機部分及其深化過程呢？因爲我們身上的污濁是從社會所帶來，是社會污濁的反映。而且我們所處的社會，除了近代生活所特有的種種痛苦，還有許多舊傳的痛苦，壓迫着我們。這種種種痛苦，是古生產方法依然殘存的結果，而這種種古生產方法的殘存，自然會引起種種時代錯誤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被賂）

發揚創造精神來貫徹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是一種空前的創造，這一運動的勝利，等於宣布了教條主義的死刑。在過去，由於中國自己理論水準的低弱，由於學習態度與方法的錯誤，確實給了教條主義以發育滋長的機會。加以社會環境的影響，一般留學生

所犯剝削皮毛與學用脫節等毛病的傳染，更使消化不良的教條主義者，成了在外國的虛弱病者。他們「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結果只知生吞活剝地搬外國，而且所搬取的也是一鱗半爪，他們好比癩鬼抱天國，摸著茅尾當大柱。我曾看見一些留俄學生，他們對於黨內鬥爭都是津津有味，而且自以爲這就是馬列主義的全部。他們對於列寧、斯大林真誠接近民衆、耐性教育民衆、并虛心向民衆學習的根本態度和優良作風，竟絲毫不動於中，一點沒有學到。所以回國以後，祇會賣狗皮膏藥，把他們所剝削來的一點皮毛反芻一下，搬弄一些新名詞和新術語，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來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過去，充作自己的用人，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其實他們除了幾個新名詞和新術語以外，究竟懂得什麼，那怕只有天曉得。他們既不肯腳踏實地，研究實際事物，把他們所學到的一點理論，到實際工作中去求考驗，求檢證，求充實，更忘記了自己創造新事物的責任。他們既不肯實事求是，更不肯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教條主義者有一種反常心理，對於中國問題毫無興趣，對於新鮮事物充耳不聞，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洋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我們現在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承襲這會議以來變革精神的發揚光大。由於這一運動的勝利前進，就使黨民衆這一變革科學，更進一步的和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及中國政治實際相結合起來。這一運動表現了中國民主主義者在思想上的創造才能，以及在民族實踐上的創造才能，表現了中國民主主義者一定能夠和中國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國人民所賦予的各種歷史大任。

整風運動本身就是一種歷史創造，所以我們必須努力發揚自己的創造性積極性，走過整風運動，才能有助於自己，有助於人民，有助於民族。有些人不懂得這一根本意義，把自己完全局限在二十二個文件裏面，不敢越雷池一步，文件說一，他不敢說二，文件上沒有說的，他就不敢說。有疑問不敢提出討論，有新發現不敢提出補充。有些人看見別人提出一點新意見，就大驚小怪，趕忙拿起二十二個文件來翻尋，看他有沒有越出文件範圍，如果越出範圍，就加以制止或打擊。例如文件上康生同志的文章中，把二十二個文件和新舊的紀錄比作「一張舊皮」，這原是一個不很恰當的比喻，而且康生同志

的文章，本來是就別人提起這個問題說到的。如果以科學的眼光來看，「一張舊皮」是一種不變的死物，而文件和紀錄，則含有發展性和自覺性，它的運用更隨客觀條件的變動而有伸縮，自然不能把它看作死板的「一張舊皮」。有人提起討論和修正，這正表示他肯用腦筋，如果隨便加以制止或打擊，那就不合整風精神。因為整風發起大鳴大放指示我們：「對於任何事都像要問一個『爲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是否合乎實際，絕對不應盲目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其實，我們如果不用教條主義的眼光去看，而以整風的精神去了解，那末，二十二個文件本身，就應該看作進行動的指南，而不應把它當作教條。固然，這二十二個文件，是長期奮鬥流血經驗的結晶，內容相當豐富和豐富，我們必須作深入的研究，熱烈的討論，先把這些文件的精華與實質貫通，作爲自己的武器才能進一步推進整風運動。但是，就是這樣，我們也還不能把二十二個文件看成萬應靈丹，也還不能認爲祇要把握這些文件背得爛熟，就足以應付一切實際情形了。因爲這些文件最多只能給我們以基本方針的指示，只能提出一般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是必須依歷史進程中每個特殊時期底具體環境而變換形態的。因此，我們在整風運動中，更應該隨時隨地估計到新的生活，注意調查研究，估計到實際生活中新事物的產生，來考驗和發展我們的整風運動。應該估計到教條主義者並不直接否認整風運動底一般原理或個別結論，教條主義的罪過，是在於它企圖拘守這個原理而把它變成死的教條，以便這樣來阻止整風運動向前發展。我們要克服這種教條主義的危險，就必須在整風的發展過程中，時時以新經驗和新知識來豐富自己，並以適合於新的歷史條件的新結論和新原理來代替已經過時的個別理論和個別結論。一句話說完，我們必須發揚創造精神來貫徹整風運動，以實際創造新事物的艱巨責任。

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曹曼寫完

思想的漫步 (三)

胡繩

三 人的尊嚴

上次的「漫步」中曾談到「人道主義」——人道主義，（見本刊八卷十期）我的意思是說，真正的人道主義的精神是我們異常需要的。所謂人道主義的內涵雖然廣泛，但也可用一句話來概括：把人當做人。歐洲的人道主義思潮在十七世紀初興起，那是為了反對中世紀的專制主義，在現在又為了反對法蘭西主義而重新提出其光芒。對於我們，人道主義更是一種值得寶貴的雙眸閃爍，一面用以批判封建文化的遺毒，一面用以打碎封建法西主義所灌輸到中國來的奴才教育。

把人當做人，這是一句看來很平常的話，而且又儘只是同語反覆。但其真不假。第一個「人」字所指的不過是生理的人，但人們並不是僅把具有直立的身體和雙手雙足的人當做是真正的人的——比如中世紀的地主心目中的奴才就不過是直立的牛馬而已；在漸漸動盪中，雖是文藝大員，也自認爲沒有自覺力的奴才的。由此可見，「把人當做人」這句話中的「人」字所意味的乃是具有獨立的思想，獨立的意思，獨立的思想的人，這也就是說，不僅是過着生理的生活，而且過着精神的生活的人。由自己的感覺、意志和思想來決定自己的行爲的人才算得是一個「人」，只是由別人給感覺、意志和思想來決定自己的行爲的人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人。所以「上帝差遣，不由自主」，這是不把自己當做人的想法，「我既怎樣，你就得怎樣」，這是不把別人當做人的想法。

把自己當做人，就有了自由，把別人也當做人，就有了平等。——有自由，有平等，於是才能有民主。

也許有人說，把所謂把人當做人不過是個空想，他們以爲，在歷史中每一個時期，大多數下層的人民都是些愚民，這些愚民對於一切事務都是毫無知識的，對於自己的命運也是一無所知的，因此，對於他們，就只好，客氣一點，用命令來告訴他們如此這般，不容氣一點，用皮鞭來指揮他們向東向

四。

但其實，人類否定了這種專制主義。我們固然不必否認，在歷史上的多數時期，廣大人民是過着愚民的生活，這有礙到真正人的生活。但是首先這因爲在權力階級下他們的知識，（不是因爲他們不是人，所以才被皮鞭驅使，而因爲他們被皮鞭驅使，所以才失了做人的權利。）其次在歷史中的某些專制的時期，「愚民」也對專制階級自覺地行動起來，表示了他們畢竟是人類，不是牛馬。

假如不是如此，那麼把人當做人也必不爲空想。民主思想的根本前提就是承認我與別人同樣地具有了有決定性的手以外，更可能有所感知的「心」——這是有新思想的預備。而人的精力有高低，人的知識程度有上下，這在現實中還是不能否認的，但沒有人是在生來無智力，只應無知識，不能有所知的。民主社會的建設正是處在這種方面，不用任何的權力或威權來壓制人的感情，壓制人的思想，壓制人的知識，在積極方面，要增加知識的門向一切人打開，使每個人的感情、思想、意志得到自由的發展，使每個人都能由自己的判斷決定自己行爲。

三民主義半月刊二卷十期到了一篇從「自由法蘭西」雜誌上譯出的論文，其中說：「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常以『我的奮鬥』爲『我的奮鬥』，他對於『我的奮鬥』，知識水準低，極端盲從，沒有脫離原始時代的『我的奮鬥』。又說：『在希特勒執政以後，他即在黨中，教他這做口說：『我的奮鬥』，他利用兩根鎖鍊，使他們互相牽制，又使他們和自己聯繫，第一根鎖鍊就是忠誠，第二根鎖鍊就是恐懼。』——由這個說明，我們可以看出，法西專制統治者不僅不把民衆看做人，而且只看做是愚蠢的牛馬；而且也不把自己的黨看做人，而且只看做是貪婪的狐犬。所以這篇論文的原標題目是一連個統統與『人道』——（譯文改題爲『人的獸性時代』），原作者且加以說明道：『原來專制統治與『人道』，本是有連帶關係，決不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才如此的，因爲只有專制時代，才帶着這種殘酷的形式，表露着殘虐人道的實質，亦唯有在人的價值完全喪失的時候，才容許統治者使使

刑凌忍的惡奴，任意荼毒生靈」。

現在，我們既站在反法西斯的戰線中間，而在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歷史上，又會長期地經過君主政治和異族統治的專制時代，那麼，就更不能不強調人的尊嚴，人道主義的精神。因此就必須反對任何「蔑視人道」，不把人當人看的思想和事實。

在封建社會的等級制中，大多數人民都被排斥在受教育的圈子以外，因為大多數人民被認為是不可能具有知識的；但在民主社會中，却要實行普及的國民教育，那便是因為民主社會把一切人看做是在知識上有着平等地位的，都能獨立的思想，都能有知識。在封建社會的思想統制下，縱使對於受教育的人，也只容許他們在一定的圈子內思想，（歐洲中世紀是宗教的教義，中國古代是聖經賢傳。）不備不能有越軌的思想，而且這道這種種思想有所懷疑，想一下牠到底對不對也不許可，這在實際上仍是廢殺了思想的權利，但在民主社會中，這種情形也是不許可的了。在民主社會中必須讓人人能有懷疑、探索、思想、研究，然後得到一定的信仰。所以假如有人問，「我們只先跟着他人信仰，然後慢慢了解，也許終身不能了解，你們想我這樣聽對不對？」——（註）那麼我們必須回答，這種聽是根本不對的。

不了解而信仰，這就是盲目的信仰。只有宗教的教條，法西姆的思想，才要求人不去了解，只去信仰，因為他們那一套根本不成為思想上人們的清醒的理智去接近，就一定去聽而後去。一種站得住的思想，就一定不怕人家來懷疑，來了解，也一定是人人所能了解的。假如以為在社會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能夠了解，其餘大多數人都不能了解，只聽着別人去信仰，去幹，那就是把這大多數人排斥到人的地位以外去了。這大多數人豈不和那終身不能有什麼了解，但辛辛苦苦跟着人去幹田拉車的一樣麼？唐僧往西天取經，歷盡千辛萬苦，那是因為他先已對佛法有所了解，而去追求更多的了解，而那猴子、豬、都是對佛法並無所了解，只是跟着唐僧信仰的，但是西游記畢竟還預約了這猴子和豬將來到了西天之後也能成正果，現在假如大多數人跟着人幹了一輩子，最後還是一個不能了解，那豈不是太可憐了麼？

固然，我們不必否認，因為已有的知識程度的高下，人們對事物的了解程度也有高低，而能夠獨立地創造出完整的思想體系的人常只是個別的天才。但這些人的創造工作也並不是什麼神祕的工作。他們還是總結了某些前人的經驗和思想成果，經過自己畢生的辛勞的探索研究而完成的。而這完成了的思想，對於旁人，縱是下愚，也仍是可以完全了解的。只有法西斯主義者，才把希特勒之創造他的「理論」，描寫做是一個直覺的神祕的過程，使旁人只可能在牠前面頂禮膜拜信仰，却永不能加以任何懷疑，也不能了解。但是我們却永遠要反對任何一個人，在自己沒有了解的時候，就先去信仰。以為旁人不能了解，只能跟着自己信仰，這是不把旁人當做人；自己不去求了解，先去跟着旁人信仰，那是不把自己當做人。

假如有人對於馬列主義的思想毫無了解，只是因為旁人信仰了馬列主義所以也去信仰，那麼我就想勸他且慢信仰，你不妨先去想一下，假如用你自己的頭腦判定馬列主義是對的，你再信仰也不遲。對於旁的主義也是同樣。我們絕不以爲社會中只有一部分人有思想的能力和權利，而旁的人却完全沒有思想，只能盲目地信仰，跟着幹。因為假如我們這樣想法，我們就不能在反對法西斯的戰爭中，建立思想上的反法西斯陣線。

讓我們再引用三民主義半月刊中所譯載的那篇論文中的一段話來作結論：「我們必須肯定人人有一個個性，一個精神。這樣，人類始能樹立他的尊嚴，要求人人加以尊重，這是未來世界首應注意的主要條件。必須如此，才准使那些不甘心爲行政機關的工具，不願意在瘋狂的人羣中做參加份子的，和不屑與從事侵略的『低劣份子』爲伍的善良人類，可以生存於大戰以後的世界。」

「人人均應依他對於本身的認識，勉力完成他對於文明應負的任務，既不肯自認爲禽獸，又不甘自暴自棄，淪於禽獸，有了這種覺悟，自當實踐道德行爲。等到希特勒主義崩潰以後，這個蔑視人道的時代，也就從此結束了。」

註：見梁啟超：「由思想到信仰」。《中國青年八卷五期》以爲人分爲三品，第一品，第二品的人是先有思想而後信仰的，第三品的人則只能先有信仰。

四 啓發和注入

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能力和權利，都可從獨立的思想中作是非的判斷，承認這並不一定教育的作用。

既然人的知識程度有高低，智慧年齡更不會沒有長幼，當然就要以先知覺後知，以能覺覺後覺。

但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教育上的注入式與啓發式的差別。

我沒有專門研究過教育學，但我想，注入式與啓發式的差別雖然不只是教育方式上的問題，這裏表現着教育上的兩種根本不同的精神，前者是代表專制主義的，後者是代表民主主義的。

在專制主義的精神下，個人的思想，和權利既被排斥，應該思想什麼，怎樣思想，都早已規定好了。那麼所謂教育當然就不過是把既定結論，像填鴨似地灌進到受教者的腦子裏去，假使不接受，那就要用戒尺，使這種他所應該有的思想，通過那打腫打爛了的皮膚，透到他的五臟六腑裏去。所以在中國舊社會裏，塾師的工作，不過是使學生能把四書的白文和朱子的集註滾瓜爛熟地背誦下去，塾師的手里決不缺少數量的刑具，——這不能只說是所用的教育方式的錯誤，而應該指出，這種教育方式恰恰符合於那種教育的精神。

我們也不否認中國古代也有些好的符合於民主精神的思想，但那並沒有成爲普遍的國民教育的方針，而真正的國民教育是其能產生在承認個人有獨立地思想與能力的民主社會中的。從民主的精神出發，教育的功能就是啓發學生的思想與能力和思想，幫助學生獨立地進行對各種問題的思考，幫助他們得到正確的結論。——於是在教育方法上就自然要廢除刑罰，就自然要以活潑的啓發代替強迫的注入了。

至於德意志法西所施行的教育，雖然也從歐洲三百年來的民主教育的成果中偷取去一些方法，在教育中似乎夾雜着啓發的成分，但實際上，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却仍不過是把既定的結論一成不變地注入到學生的腦中，使他們相信這利安民族是該優秀的民族，猶太人是該惡劣的民族，法西斯主義是比自由民主主義更爲進步的主義等等，而在進行教育之際，仍在需要時，用棍棒戒尺更爲嚴厲的刑罰手段，——其原因，自然是在於法西斯教育的根本精神就是極權民主的，不是爲了發揚青年的思想能力而發揚青年的思想能力。

中國近新教育理論，一般的都是反對體罰的，都是反對注入式而主張啓發式的。那時候，我們也應該不儘使教育方式上的改革，而更進一步看到，這是教育上的根本精神的改革。我們更看到，新教育之所以不能不廢除刑罰

罰，不是因爲體罰容易引起學生反感，更因爲我們要尊重青年學生的人格，而獨立自尊的人格正是民主主義所需要的，不要採用注入式，也不只是因爲這種方式過於呆板，更因爲這種方式不足以啓發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思想乃是民主主義所必需的。假如不從教育上的根本的民主精神着想，則縱在教育方式上有所改革，我們是仍會繼續於被拘禁了的方式，或者會去研究如何在不用體罰的情形下得到用體罰的教育所能收到的同樣效果，如何在表面上採用啓發式的方法，實際上仍能得到與注入式同樣的效果。

供我們想到這種說法：「體罰已成過去的事，現在既不贊成施用體罰，或減至最低程度，訓練的人就必須有較大的權威以控制受訓人的行爲。——而且又說：「教員或訓練的權威必須強，服從與遵守規則必須執行，如果必須用懲罰，懲罰可以立刻隨之而來。」——人格訓練有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學生對於權威的默認，第二種是更巧妙，更有力，更偏於精神方面，這是從各種活動中實施訓練，而不靠教員管理與支配的訓練。」等等（註）這種說法是值得斟酌的。假如在教育上的着眼點依然在懲罰，控制，權威，支配，那就是把新教育的根本精神加以逆轉的靈藥了。

專制主義的教育只能造成奴才，德意志法西斯國家就是這樣做的；民主主義的教育才能養成真正的人，反法西斯國家必須這樣做，因爲在一羣奴才中是不能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民主政治下的全民教育就是承認與發展全體人民的人格，因爲承認所有的人都是獨立自尊有自主能力的人，所以在政治上也就要求實現全民的民主政治。

中山先生說：「近世各國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所得而私有也。」（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蔣委員長在其「實行憲政的序與步驟」的演說中也說：「民權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實現民主政治。——國民人民不能參加政治的話，他也就不能造成強盛的國家，所以，世界上最有力量最發達的政治，一定是建築在民意之上，一定是以人民之利害爲利害，以人民的視聽爲視聽，以人民的民權思想，是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這些話都是非常切實的。

然而我們却看到蔣委員長的一篇論文，在其根本精神上是和這些說法相反的。（註二）他的文章一開頭就說：「三權憲法其民主政治的產物，五權憲法是以民權主義爲基礎，我們更知道五權憲法與三權憲法的區別，須先

知道民權主義與民主政治有何不同之處」。但是上引蔣委員長的話中已說明民權主義就是要實現民主政治，那麼，來區別民權主義與民主政治有何意義？假如如所說的民主政治是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現行的民主制度，那麼這問題中山先生已經早已清清楚楚地回答了：「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為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要絕乎歐美之上」。但薩孟武先生顯然是對這答覆不滿意，所以他既否認民權主義之為革命人權以與天賦人權說相區別，也否認民權主義之為直接民權以與間接民權相區別，更反對民權主義之為全民政治以與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相區別，他說：「民主政治固然是全民政治，而却步步接近於全民政治。所以我們若以全民政治為民權主義的特質，而與民主政治相對立，實為一癩癩論」。

固然我們從這幾句話看來，薩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說，「民主政治」也是全民政治，正如民權主義一樣，這也就是說民權主義之為「全民政治」，正如歐美所實行的民主政治一樣。那麼，這已經歪曲了民權主義的創始人的意見了。並且，更進一步，我們可以看出，薩先生的真意其實是說：「民主政治固然是全民政治」，民權主義也並不是全民政治，所以他認為民權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根本區別乃在於民權主義「對於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設置了特別的制限」。我們知道，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民主政治下人民的基本的政治權利之一，既加以特別制限，當然就不是全民政治了。

照中山先生的意思，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否有所限制呢？確也有的。那就是在第一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說的「革命的人權決不輕授於反革命的軍閥」。這種限制正是革命人權的光輝，而無礙於其為全民的民主政治。但是薩孟武先生所主張的限制，其出發點却是：「人類固然都有利己心，但是甚麼才是自己真正的利益？大部分不知不覺的人固不會知道；次少數後知後覺的人也未必就能認識，其能明白事理，判別利害，只推極少數先知先覺之士」。於是又說「大部分的人都是不知不覺，他們不但不能認識誰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且不能知道誰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因此這「大部分的人」既不能有選舉權，也不能有被選舉權。這種「學說」實在是非常大膽的創見。固然先知先覺，後知後覺的區別是中山先生所說的，但是其原意只在說明各人才智的不同而對於國家文明，政治生活的貢獻各有不同，却並沒有用來作為根本的民主權利的限制標準，否則中山先生怎麼會主張人民可以普遍地直接地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呢？

薩孟武先生既曲解了中山先生的全民政治的思想，把「大部分的人」都看做是連自己的利益也不明白的蠢貨，都排斥到政治權利以外，因此他自己也不能不覺得，「這種方法乍看之下，實似有以於民治精神」了，而在我們看來，這不僅是似乎反於民治精神，而且根本就是和「民治精神」背道而馳的。

中山先生的民主政治的主張其實是非常明白確切的。比如他又曾說：「美國前總統的主義也有與兄弟底三民主義相合的地方，其原文為：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這句話並沒有引當的譯文。兄弟底他譯作「民有」，「民治」，「民享」，他這「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而在前引的蔣委員長的演說也明白的說：「總理的民權思想，是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這些說法也顯然和薩孟武先生的新主張根本衝突。所以薩先生也敢大膽地說：「民權主義乃如 A. Zimmerman 所言，不是林肯所說，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而是若林肯另外說，Government of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of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於是薩先生就把中山先生所說，連小學也知道的關於民權政治的意義根本推翻了。固然，林肯因為是在初期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人物，所以他雖有全民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但在實際的政治中所做到的仍只是一種代議制，——「政府只在有些時候屬於全體的人民，而經常地則只是屬於少數的人」。中山先生之所以讚賞林肯，正是讚賞他的理想，而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也就在於他要用三民主義的具體辦法來實現林肯所沒有能徹底實現的理想。但現在薩孟武先生却把中山先生的主張不從林肯的理想拉後到資產階級的實際政治，而且甚至還要拉後一點，因為林肯所說「政府有些時候，屬於全體的人民」，這正是說，在舉行普選的時候，但薩孟武先生却把「大多數的人」都排斥到選舉權以外，那就是說，政治永遠也不屬於全體的人民了。

由這里，也可看出，假如根本的觀點是輕視人民，根本的精神是否定人民的自覺的能力和權利，那麼在理論和實際上是會達到何等可怕的地步！

註一：參閱：「論訓練」（文化先鋒二卷十一期）

註二：薩孟武：「五權憲法和三權憲法」（三民主義半月刊三卷一期）

從民間文化論接受文化遺產

蘆蕪

在討論民族化或中國化與中國氣派時，我們需要以最大的注意，警惕各種偏見和各種偽裝的復古論調。有人企圖在民族化的藉口下，否定文化中間經攝取的進步成份；有人企圖把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解釋成「固有」的作風和氣派的復活，或者作排斥外來進步文化的藉口。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並不是任何一種舊作風，舊氣派的復活；也不是任何一種作風和氣派的變遷和複製；而是亟待於創造的東西，它正需要不斷的嘗試，探索，才能在實踐的過程中逐步的完成。

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或民族化所要求的，是怎樣真實生動的表现現實的中國人民活潑豐富的鬥爭生活。爲此，就必須研究大眾自己認識生活，對待生活的方式；表現感情的方式和思維的方式，這裏面滋養着中國人民的血肉，充溢着中國人民的氣息。爲着這種種的完成，傳統的優秀的東西固然要吸收，外來的東要有助於我們創造的，都應該大膽的攝取。中國今天正需要科學和民主的途途突進，決不能抱殘守缺的固守着凋萎沉滯的傳統而欣然自得。

既然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所要求表現的是現實的中國人民的生活；它的嘗試，探索，完成……就必須在深入和廣泛的人民的生活的基礎上，和人民大眾同呼吸，同愛憎，關心他們；理解他們；而不是懸隔生活，淺嚐生活。這樁才能真實的傳達出他們的思想和感情，追求和理想；這樁才真正可以成爲老百姓所喜聞樂見；也只有老百姓的喜聞樂見才是正確的檢驗的尺度。

以下準備談談範圍內的意見：

我們談民族化總就要聯系到接受民族文化遺產的問題；舊的文化遺產，不外兩個源流，一個是來自士大夫階級的。這源面又可分做不同的兩派，「載道」派以儒家思想爲其本質傳統；「言志」派以莊老思想和佛家思想爲其本質傳統。前者是入世的態度，面對現實，滲透人生；主張慎思，明辨，明義利之分；在儒家的精神哺育下，我們看到很多「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義烈之士。「埋頭苦幹的人，拚命硬幹的人，爲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

……」這些執着於生活的「歷史的脊梁」。但儒家的根本精神却往往因爲歷代的封建統治者爲了便於利用它作爲統治的工具而受到意識的歪曲。以莊老思想和佛家思想爲其本質傳統的「言志」派，根本的精神是出世和逃避現實，而且滲和着很多市儈的成份。「載道」派和「言志」派所共同表現的是上層的政治基調；大都是詠讚和頌揚其所依附的執政者；或者是向雨淋泥濘的人民作一些麻痺和說教的任務；製造一些逃避現實的幻想。這是傳統最久遠的廟堂和正統的文化。另一源流是「引車賣漿」者流所自有的民間文化；無論從藝術敘述，社會環境和生活條件講，都使得民間文化，比較士大夫的文化要單純，粗樸些；因而爲那些清高自鳴的士大夫齒冷。雖然它在人民大眾中間流行得最廣泛，爲他們所「喜聞樂見」；但對不斷的遭到擠軋，壓迫。自然，中國人民因爲長期的生活在封建的統治下，人民的意識常常受到改變，帶着極深的迷信，守舊和奴隸的落後性；在民間文化裏自然也反映出這些屬性。民間文化的特點是表現下層社會的生活基調，真實的傳達出人民大眾的煩惱，苦痛，反抗，追求……；他們生活思想的方式。民間文化是一通有力的潛流在人民中間蜿蜒的流走着；它雖然被壓迫，被阻遏；但它却永不會涸竭，被掩蔽而却有力的發展着。因此，民間文化雖然也常常被士大夫的文化所吸收，兼治，「上昇」到正統文化；但因它植根在民衆生活裏，在人民的生活裏生長，形成。所以它總能保持着樸實，繁偉，和密接人民生活的特點。

民間文化不僅常常被統治者所迫害，更時常遭到表現上層生活基調的士大夫階級文化的割裂，或者意識的對民間文化加以塗抹，竄改，惡意的諷刺。不僅在民間文學中隨時可以看到這種塗抹的「業績」；在歷史土此類例證也可以說擷拾即得；如明嘉靖的高歷年間以唐順之，歸有光爲中心的古文運動，就是士大夫階級的文化對當時流行的平話，小說等民間文化反動之最好證明。在當時「講史」小說中我們看到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這些成功的作品；此外在人民中還流行着很多如像「皇明英烈傳」（一名雲合奇蹤），「宋岳武穆王遺義」，「精忠全傳」，「穆柯聞評」……等，在民間

文化中的平話，小說，可謂盛極一時。士大夫對其面上是假借反偽，古運動，本質上却是從平話，明白的文道中建立起他們所謂的古文，猶以打學當時民間文化的滋長。自然這運動所經歷的也不是那樣順利的過程，發展到後來，「公安」，「竟陵」又給古文運動一個反動，同造成了士大夫文化中的山林文學。

民間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之間並非是截然分開，而是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金元之時，科舉久停，文士無所用心……；在移他們注意科學之心而注意於民間藝術上，而戲曲的偉大作家因此便產生了許多出來。」（引自文學大綱）。這裏的文士，自然不單指民間藝人而是士大夫階級；因為他們的注意的轉向，民間文化因之生長得更繁茂。民間文化不僅有時會被「士界」到正統或廟堂文化。很多有名的民間文學的形成，也常常受到士大夫階級的影響；先在民間的廣泛傳播，而後逐漸由市井巷傳播的「街頭文學」，「口頭文學」。而形成「筆記文學」；在藝術上也得到不斷的修飾，潤色，變得更有藝術成就。

試從民間文化中戲劇的歷史看。春秋時候雖然已有關於優伶的記載，比較成型的却在漢代。雖然戲劇的開始僅僅限於「應景滑稽」的官廳娛樂，但很快就走向民間，而且採用了人民的語言和進用了表現人民生活的通俗方式。從漢朝的歌舞，唐代的滑稽戲，一直發展到兩宋的雜劇和元曲，都具有這些優良的品質。它真正做到關切人民的生活，傳達出人民大眾的愁苦。對不良的政治，常取消遣的攻訐，或辛辣的諷刺，針砭時弊，不逞權勢。從春秋時的優孟一直到清代的寶鏡三都保持着這種敢言的傳統。中間戲的另特點是能夠不斷的吸取外來的新的東西，來充實自己，提高自己；例如舊戲裏的手勢，舞技，都是採用的外來東西（漢武帝時由北方傳入）；而且不斷的在人民大眾中吸取，歸納新的營養料；因此，它能夠經常保持新鮮活潑，為人民大眾所喜愛。此外在舊劇班的組織和劇人的生活裏也保持着很多民主的成分；在劇人犯規時執行罰則的往往老伙夫或者是職位最卑微的，小丑的被拿班等。手邊資料不多僅能以兩宋雜劇為例來看一看民間文化的優良素質。

宋代一開始就免於外侮之憂，當時北方和西北的異民族——遼，西，始終威脅着宋朝的統治。宋朝建都於汴京也就是為了避開異民族的威脅。加以內部新法之爭，吏治之腐敗。尤其是汴京為金攻破，宋南渡臨安苟安逸樂，對外侮一味苟且偷生時受協轉而向老百姓儘量壓榨以為「歲輸」。這時

在人民大眾中普遍的滋長着憤慨的情緒，無論從小說，詩詞，畫圖裏，都流露出一種憤慨和諷刺的氣息；在流行的雜劇裏，表現得更大胆而深刻，靈巧而機智。蘇軾曾以「搬演故事，出入鬼門道」記述雜劇；周密「武林舊事」載宋官本雜劇段數多至二百八十本；陶九成「輟耕錄」載金人所作院本六百九十種，可想見其流行之盛。在歷史的記載裏，可以找出他到許多敢言的實例；或就帝王而前諷刺朝政的得失，或就權貴的筵席上諷刺官場的醜聞。很多軍國大事，老百姓隱忍而無法講，大臣御史懼怕干罪而緘口結舌；一個在士大夫眼裏視為卑賤的優伶，却常常在絃歌酒宴，接杯舉觴之際，不顧生命的安危，不畏權貴之暴怒。從容不迫，以諧謔出之，雖然，批這優伶死者甚多，但這種「打諢」也時常收到諷諫的效果。

「南唐書」裡會記

「魏王知訓為宣州節，苛政致下，百姓苦之。因入魏待宴，伶人戲作綠衣大而胡人若鬼狀。傍一大問曰：「何為者？」綠衣人對曰：「吾宣州土地神，王人觀，和地皮掠來，因至於此！」

對於貪婪的官吏，這是多麼尖銳的諷刺；而又涉及多少人民大眾的憤慨和血淚。在「區範集」裏，伶人諷刺張俊貪財治生，其犀利，聰慧，較之前者亦無遜色。

「南唐書」將俱封，魯榮安當，而張翁王（凌）尤善治生。其器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千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現之。留用漢天儀設玉衡對其人觀之，見星不見人。玉衡不能辨，用鏡一文尙可。」今觀光亮，曰「帝星也。」，「秦師頓？」曰「相星也。」，「韓王？」曰「將星也。」，「張翁王？」曰「不見星。」，「只見張翁王在鏡限內坐。」，「張翁王大笑。」

雖然這是寄憤於「打諢」，而且出自優伶之口；然而可以看出人民大眾中含蘊着深沉的憤慨；如果沒有用全心靈擁抱人民的生活，關切人民的生活和愛憎，這種「應景滑稽」的人物身上，就決不會發現這樣的素質。

「齊東野語」記三十六齣，更刻毒的諷刺了重賞之流的安全投降者。故事的梗概是

「宣和，重賞用兵敗軍，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為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為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盤，曰「鄭太師家人也。」，又一滿頭為髻如小兒，曰「宣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

清曰「太祖臨崩內，比名胡天驤。」，鄭氏謂「太祖幸來就第，此名頗確鑿。」，至真氏者曰：「大玉方用兵，此三十六變也。」。

「用三十六計定爲上計」，誠其敗壞，可謂隨而廢矣。外如「倦遊雜記」就俗人丁仙取言之，亦甚多，「真宜不知俗官」，早成民間傳說的佳話。

自然這種諷刺，針砭，並不是容易的事。很多民間的藝人就常常因爲觸犯了權貴的憤怒，而受到各種迫害的。「事實類苑」記載這一事可以爲例：

「爲進不識文字，過市，見練綱戲者，駐馬問：『汝所謂何言？』僕曰：『說轉情。』進大怒曰：『汝對我說轉情，見轉情即當說我，此在道兩面之人。』即令杖之。」

在其他的稗官野史中，我們還可以找到更多的例證，就單從上面的一些引證中已經清楚而看得到：民間文化中具備着，而向人民大眾，關心人民愛憎，不畏權勢敢怒敢言的精神。同時可以看到民間文化還受到如何樣的一些無理的迫害。

我們還可以借一部大家所熟知而且喜愛的民間文學水滸傳，來看看民間文學的生長，形成中間經過了些甚麼樣的過程。

無疑的水滸傳在人民大眾中間流行得最久遠，而且輝耀着藝術的光芒。這裏只是把它作爲一個例證，而不是詳盡的對他的研究。

水滸傳的前身是南宋時流行在市民階層中的梁山濠故事。在當時市民階層的文化娛樂中被稱爲「伎藝」之一的「說話」中傳播着。據吳自牧的夢梁錄：

「灌園耐得翁的都城紀勝所記：說話有四家：『小說』，『談經』，『講史』，『合生』。講『小說』的又分爲三類，『一者銀字兒，如煙粉怪傳等；說公案，皆是擲筆捉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話流行在市井巷間，口頭講述，操此種「伎藝」的專家叫「說話人」。

○講說的故事範圍很廣，凡當時發生的一些驚動耳目的事情，或和人民大眾利害相關的事務，都可能成爲「說話人」講說的題材。「說話人」在講說時，有一個「大綱」或「底本」，稱爲「話本」。

○「說話人」並不是照着底稿朗誦，而是依據「大綱」，「底本」來發揮。同一事情，同一人物，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話本。故事的繁簡輕重，人物的性格發展，都可由「說話人」處理。久之，圍繞一個中心故事，可以產生一羣「話本」成爲某某故事的集團。南渡以後，南宋人民大眾中間流行的「小說」的最大集團，就是梁山泊的故事。

這些流傳的故事，在宋末已開始有人傳寫，至元代初年，便有人編成首尾完整的「大宋宣和遺事」。梁山泊的事蹟雖已被輯成大套有系統的故事，但只有故事梗概，不成其爲文學作品，中間人物亦僅三十六人。南宋亡後，「說話」雖然消滅，但梁山泊的故事仍在民間流行。而且不斷的在故事情節上，人物性格上獲得增補，經過大眾的修改，潤色，故事裏的人物漸漸增多，情節也漸漸複雜。至到明代中葉，才有編輯整理的大部出現，且題名叫水滸傳。這裏可以看出水滸傳在流傳的過程中，不僅經過人民大眾的修改，增益，而且經士大夫（明代本水滸傳爲羅貫中或施耐庵所作。）的潤色，最後形成了「藝文」的「傳奇文學」。這種演化的過程，在技巧上自然青出於藍，後者爲勝；但內容上却往往被有意識加以譴毀。

「水滸」產生的時代，正是宋代外患日深，內政腐敗，文官受辱，武官怕死」的時候；宋廷對外侮，一味委曲求和，希望以「子女玉帛」，暫時的維持自己的苟安逸樂；對人民則功取豪奪，供養大批貪婪的官吏，暴虐無窮的軍賦；對金人的「歲輸」也轉嫁在人民的身上。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會不斷的發生農民暴亂，如浙江方臘之亂，湖南種福爲首的暴亂，都經過長時間才被壓平。人民大眾雖「緘口結舌」隱忍苟活，但滿腔憤恨每每借「小說」來發洩。於是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就廣泛的流傳在民間，而成爲「說話人」最好的題材。在這羣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他們的理想和希望。殺貪官污吏，劫富濟貧，是農民的政治和經濟要求；也是市民階級的要求。受招安，征遼也正表示了人民大眾抗禦異族的願望。楊志，林冲等人在被追「落草」時，都惋惜着自己一身好武藝，「本圖在邊廷一刀一槍，爲國家出力，却被貪官污吏內害得無處可奔」。這些不正是市民階級民族思想沉痛的告白嗎？在套書裏我們隨處可以看到官吏的貪婪，橫暴，人民大眾強烈的憤恨；被侮辱被損害者的呻吟；「末路英雄」沉痛的控訴。

對於這本「叛逆」的書，士大夫階級能够輕易放過嗎？因此，到處都留下了他們塗抹的「業蹟」。自然今天的水滸傳和原本不同，就是最初的傳寫本和「大宋宣和遺事」，或口頭講述的梁山泊故事，也有很大距離。明代流行的嚴密的「水滸傳」本都說宋江等後受招安，破遼，又平了田虎，王慶，方臘（三人皆宋代農民暴動的領袖）。終於宋江又受誘而服毒自盡。與「宣和遺事」所稱宋江受招安破方臘有功封節度使的情節大體符合。這種招降殺江破田虎，王慶，方臘三「寇」，完全可以判定是意識的產物。這種招降甲

設「草寇」一打「草寇」的辦法，正是抹殺水滸諸人「替天行道」的理想，而成爲尋常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的草寇。這種歪曲企圖，無疑想使水滸在民衆中的影響。金聖嘆刪去了七十回以後各章，而自稱「得本」，并斥七十回以後爲「惡札」；不能不說是具有卓越的識見，但就在七十回本中，依然留着很多士大夫做手脚的地方。翻閱坊間流行的水滸傳，一開頭就冠了一洪太尉誤走妖魔」的楔子。企圖這樣來否定全書裏受迫害，受磨折，人民理想中「替天行道」的人物；把他們作爲「應劫而生」的一百零八個魔星，使人民大衆感覺這是劫數，同時感覺梁山泊的人物遲早總歸不歸天收的命運。

此外，像盧俊義這樣的富豪巨商在「水滸」裏總覺和別人不大相稱；他所追求的也必然和其餘的人異趣。就從情節和結構上講，「吳用智賺玉麒麟」一章，情節上最鬆懈，或者可以說是「偶然的附加和累贅」。按「宜和進軍」上，盧俊義原應作李進義，本來和林冲，楊志等十二人，同是押解花石綱的指使，并不居重要地位，也沒有特別描寫。元曲「豹子和尙自還俗」中又變成李義，也并不是了不起的人物。把盧俊義作爲「智賺」上山，不過是使大衆沖淡這些受迫害者的同情。此外如廉徐舉上山，和宋江的性格都有很多不協調的地方。

社會學命題的新提法

雖然楔子一貫我們假定爲統治者所附加；但并不是說水滸傳裏不該有這種迷惘的意識。相反地在歷代的農民運動或其他階層對統治者的抗爭中，常常假託神怪以爲號召。水滸的英雄農民的成份雖然很少，但它却寄託着市民層和農民共同的理想。如「這道村受三卷天書」，「忠義堂石碣題天書」都未始不是值得注意的事。

近代唯物論的社會學說比一切布爾喬亞的學說精確得多了，但是在進步學者的陣營中，往往也會發生機械的，唯心的，修正主義的種種歪曲，這未始不是值得注意的事。

要追究這個問題，當然要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算起。許多有階級劣根性的人或者是做了敵對階級俘虜的人，他們的錯誤，當然無須乎追溯到理論的根源上去。最奇怪的，就是在革命上素有功勳，在理論上多有建樹的人，他們也往往會造成嚴重的錯誤，這不能不追溯到理論的領域。

可能是這種種迷信意識的反映。同時，在很多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到農民或市民層落後根性的反映。黑旋風的嗜殺成性正是農民的破壞性，報復性的表現。阮小七在夢見寇的歌：「打漁一世窮兒，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嚴官都殺盡，忠誠報答趙官家」。也正表現出市民層改良主義時希望。

雖然我們不能作更詳盡的說明；但就從這裏，也不難看到民間文化生長，形成，發展的道路。這發展途徑，并不是平直的，它經過很多的險阻，曲折和痛苦。然而，它却真實的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表露出人民大衆真實的脈搏，感情，思想的方式，苦悶與抗爭，追求和理想。念蘊着很多民主的素質。正如高爾基所說的是「長期積累的民衆機智的金屑。」也是我們今天接受文化遺產的主要源泉。

但，接受決不是代替了創作，而是便創作加強深度。因此，我們談接受民族的文化遺產，要隨時警惕着別陷於把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視爲民間形式的復古論的巢臼。因爲，長期的封建壓抑下，人民的意識常常被扭曲，被改變，雖然不少被稱爲「叛逆之音」的民間文化，也常常是苦悶的呻吟，而非表示戰鬥反抗的適切形式。一方面由於封建文化的強大壓力，一方面由於創造民主主義的物質地盤還沒有存在，這些成份不是摧毀了就是被阻留在夢想的原始狀態裏面，沒有能够發展成爲認識現實，改造現實的，羣衆性的科學性的，實踐的思想體系或生活態度。因此，我們接受民間文化，就需要「擷取其民主性的精華，揚棄其封建性的糟粕」。而且隨時警惕統治者的買收和歪曲。接受也并不是拆散和消解，而是經過批判，經過吸收，消化；這才可以成爲今天創造新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滋養。

有光

考近代唯物論的創立，第一個有功的人當推費爾巴哈，他曾經說過：「思想對存在的真實關係如下：存在（Being）爲主，思想（Thinking）則爲客。」

換句話說：是存在決定思想，不是思想決定存在。費爾巴哈的這個命題拿來解決哲學上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已經是轉有餘裕的。然而費爾巴哈也有他的缺點，就是他只看到孤立的個人，而沒有看到互相聯繫的人，即社會的人。因此馬克思對於這一點曾經痛下批判。（見費爾巴哈論綱）後來他自己也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改成如下的命題：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自己的存在，反是自己的社會的存在決定自己的

意識」。

許多不深研馬克思主義的人們，往往針對這一個簡單的公式而發生誤解與歪曲的意見，善意的變成了機械論，惡意的斥之為宿命主義，其實，這都是厚汚馬克思的行爲。

的確，一個理論體系之移入頭腦中，決不像一杯水飲入肚裏那末簡單，往往是差以毫釐便謬以千里的。我以為要更好的解決這個問題，應該從區別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着手。

什麼叫做自然現象呢？布魯諾下面的一段話，是相當精采的。他說：

「例如不管人類存在與否，水總是不絕地受着太陽的熱力而蒸發，含有水分的空氣，撞着山壁，便會上昇，膨脹，冷卻，以致降雨。不管人類存在與否，流水總是彫刻山谷，作成瀑布而剝削山崖；河水所搬運着的岩屑，一俟水流遲緩，而成為沖積圓錐地，成為三角洲。不管人類存在與否，徐徐移動的冰河，能使粗大的河牀，變成平滑，含着砂粒的烈風，能使沙漠的岩石變成奇形彫像；海波終於可以陷落海岸；而且地球的全面不問其為陸地或沉落的，因着上部的自然作用，終必發生變化。」

因此，他歸納到即凡不感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即不受人類意志所左右的現象就是自然現象。

那末，什麼叫做社會現象？這是很容易明白的，我們只要稍為冷靜的觀察一下就可以知道了，長在山上的樹木，如果沒有人類的努力，它決不會「成樺子，成杉子，成松子，以及其他一切用具，生在田裏的棉花，如果不經人類的紡織，決不會變成美麗的衣服，地上決生不出麵包來，飯也不會像雨點一般地在嘴裏去。這些受人類意志支配的現象，我們就叫做社會現象。其唯一特徵就是把自然按照自己的意志而加以改造。

然而人類為什麼可以改造自然呢？根據生物進化的原理，比較高級的動物，它們具備了一種生理機構就可以簡單地反映外界景色，這種作用，可以名之曰心理作用。動物進化到人類這個階段，便不僅能反映外界景色而變成一種觀念，同時還能根據自己的觀念去改變外界的物质。至此，人類不但和一般物質區別開來，並且和一般動物也不同了。人類的這種特徵可以簡單歸納為如下的命題，即：

物質的觀念化，觀念的物質化。
我們再把这个命題分析一下。第一個過程，是物質觀念化的過程，這個

過程是人與一部份動物所同具的，這還只能說是一種心理過程，而不能說是社會過程。因為前面說過，社會現象的特質是在依照人類的意志去改變自然。換句話說，就是觀念的物質化。在這一點上，唯物論者和唯心論者所不同的就是前者認為觀念物質化的可能是建築在物質觀念化的前提上，後者則認為觀念是最原始的。近代唯物論者的精神是完全建築在這個公式之上的。因此，第一，他不忽視物質的本原性而和唯心論者區別開來，第二他不忽視觀念的積極作用，因為所謂社會現象，完全是建築在觀念物質化的這個過程上。所以物質與觀念之矛盾的統一，便構成了社會現象的本質。物質與觀念之於社會現象，也就好比物質與運動之於機械現象。從物質之機械的過程說，也是沒有非運動的物質，也沒有無物質的運動。從物質之社會化的過程說，也正是沒有非觀念的物質和無物質的觀念。但是這裏還要補充一點，就是在上面的命題中，曾經把它分為兩種不同的過程。第一段是心理過程，第二段是社會過程，但這只能作為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在人類的範疇中，心理過程是統一於社會過程以內的，因為觀念化了的物質，一樣可以用重複作為觀念的素材而再度觀念化。

上面說的這一段話，現在亦加以檢證了，檢證它是否違背近代唯物論的精神而出於作者的杜撰。

一一

現在先從公式的第一段過程說起，馬克思曾經說過：

「黑格爾曾以觀念的名義將邏輯過程變成獨立的主體，在他看來，邏輯過程，乃現實的造物主，現實只是它的外部表現。在我看來，却正相反；觀念不過在人類頭腦中翻譯出來與製造出來的物質東西。」

這段話不是恰恰說明了物質觀念化的過程嗎？

再看第二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過如下的句話：

「工程師作蜂房不能好過蜜蜂，但最拙的工程師比最巧的蜜蜂不同之處就在於先有圖樣」。這一點，完全說明人類觀念的積極作用，所以人類的行為，大多是受一定的觀念指導的。工程師觀念的物質化，結果變成諸種不同的物質建築而不是空中樓閣。

又說：

先 認 識 自 己

原 平

一個人生活在這個社會裏，要能很清楚的明白自己是個什麼人，還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一件很簡單很容易的事，但實際上如果真真正正的站在客觀的立場，絲毫擺脫去那種極端寬宥自己的情感，而具有嚴正的態度，理智的眼睛，來觀察自己，分析自己，估量自己，那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因為人不單他的外部生活是複雜的，多變化的，就是那個依據於外部生活的現實所反映的內在生活——意識，亦是複雜的，能動的，多變化的。何種那聯結成人的外部生活的社會現實，更是「五花八門」的「變動不居」。

就在這「變動不居」中的「五花八門」的社會呀，又各具備着它的特殊性，具體性。

至於圍繞着這個人所組成的社會的自然現實呢，則未曾停止過它所給予人或社會的物力的影響。

歷史的鏈子，是由一連串的環境子連結成的。好像現在這個「時代的環境」，就是跟隨過去的環子連結下來的，所以說，沒有過去的歷史，就無從累積成爲目前這個時代了。

由此，我們即可以看出，人不獨是組成爲社會的一個分子，而且是歷史的產物。

所以一個人的思想、意識、感情、言語、態度、行動、做事以至日常生活上不論其精神或物質方面在文化中的領受，都脫不了必受他所生活着的社會環境所影響和歷史的根源所限制。

一個人如舉他的眼光，看不到他所生活着的具體環境和歷史所給予他的種種條件，特別是對於自己所站立的生活地位亦不大明白的話，則「自己是個什麼人呢？」必定很難於作出一個正確而圓滿的自我介紹。

論語裏面，有一條故事是這樣記載的：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其實孔子的這種說法，還不能把「自己是個什麼人」說出來。他的這種說法，不過祇在自述他的做人態度而已。大抵的說一句，孔子對於自己的理解，還不够明晰的，因爲歷史的條件，使他看不到自己的立場，對於自己的外部生活和內在意識的反映，他無可能自下一個根本的概括。這一點，只有以後代的人來給他以新的正確的評價。

諸如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四日在莫斯科自殺的革命詩人瑪耶可夫斯基，他的遺言最後的一節是這樣寫着：

用不到去檢閱，

那些苦痛，

那些不爭，

和那些相互的謬誤。

這種不能自己的詩詞，完全是由他看不到自己「是一個未來主義者，是一個最缺乏可塑性的靈魂，是一個倔強的，唯我的，狂放的好漢，而又是——一個革命者！」結果就使「這位詩人和其社會環境間」引起「一種悲劇的不調和」了。

一個人如果不明白自己的本質，和所站立的社會地位，儘管他的天資如何聰明，學識怎樣豐富，他所努力的事業，就算能達到某種程度上的成就，可是一種不自覺的意念，終於支配着他的一切，使他仍然在一個舊的本質上翻筋斗。

人的好或壞的客觀標準，並不是在於他的本質強弱，地位高低，而是看他的根本觀念，能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

如果他的本質很強，地位很高，而他的根本觀念，一向是以個人的利益爲前提，那他的最成功的一「標本」，不外像汪精衛的其自毀滅而已。

可是某一個人的觀念，如果是正確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於是還需要看他的行動，能不能和他的觀念相一致。

實際上，有許多人的觀念，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內看來是正確的，那個時間一過後，他在自任所潛藏着的毛病便發作出來了。好像汪精衛，在年青的時候，也幹過不少革命事業，發表過不少革命的言論，尤其是那條「慷慨激昂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寫得多麼動人，這麼說起來，老汪在那個時間內的觀念，似乎不能說不是正確的。到今天呢？他的行動即完全和國家民族的利益相矛盾，弄到連三歲孩子，亦看出他是漢奸，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了。

所以，一個人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內表現出正確的觀念，前進的行動，暫時，做的，看來都能一致，但還不能給予他一個最後的概括。因為這不過是他的個人生活所經過的一個階段，或一個時期而已，人生旅程的基礎，總歸不了必須受着一個根本的實所規定，如果這個實是進步的，當然他會跟着時代的潮流一同向前。如果這個實是不前進的，而沒有做到躍進另一種新質的變化，則這個人的正確的觀念，前進的行動，是具有着它的時空間性質的。

此處我們所應特別注意的，一個人的好壞，固無須等到「蓋棺」才「論定」，但亦不應受條件地讓一些假象所誘惑。年青的人，所以容易受人欺騙的，就是在此。同時年青的人，所以容易自作夜郎的道理，亦就是在此。因此，由外承履錯綜地所交織成的複雜而多變化的現實，時常使人像目迷五色，看不清自己的真形。北洋軍閥的政治生命的斷絕，距今還不到二十年。當他「雄視津滬」時，誰會承認自己是項閻。特別是袁世凱，段其瑞輩，那個肯承認是禍國殃民的封建遺毒，結果只存讓無情的歷史，把他們的真形完全昭示出來，這也許是「生命的悲劇」，然而他對無論如何，是不會了解這一點的，一個質的規定，使他「懷着滿腔頑固的意念；至死不悟。」

因此，問題的所在，並不是教你去學習什麼「虛世教育」，而是要你先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然後方能「對症下藥」地去學習做人。從古老的聖經到時髦的處世教育之類中西「名著」，只是不分身自地要人服下那如何做人的「藥湯」，畢竟人是怎麼樣的？人的素質應怎樣給予一個標準的區別？應該在什麼原則之下教人去認識自己，了解自己？這些前提的重要性，是很少在那些「教人為善」的書中看到的。

一個人的根性，如果像李林甫那樣的惡劣，而你還想教他學習什麼「為人之道」，這無異等於教他多具一副害人的本領。

閻里的惡習，未曾不「家藏萬卷」的在學習着「聖人之道」，「仁義之理」，然而他們那種害人的領本，真是使人毛骨悚然？

那狡詐百出的商人，他們最講究的是待人接物。於是怎樣「和顏悅色」，怎樣「逢迎」，怎樣「交朋處友」，以至於怎樣「銀錢口才」的一類作品，就成為他們「最良好」的讀物了。這正像飛機，大炮，坦克車之成為希脫拉的武器一樣。

工具或武器並不是禁止人去運用它。有問題的是應該讓誰去運用它；而且運用得是否合乎時代的要求。

所以最重要的一着，還是在於使這個運用「工具」的人，先認識自己，了解自己，方不徒然。

那麼，怎樣才能認識自己呢？

是不是像我國已故的哲學家李石岑先生所說：「就中不可不特加注意的，便是個人生活，因為個人生活最足以表白人生的真相。個人生活無論是對的或不對的，我們都認為有特別尊重的價值，這便是所謂觀照的人生。至於我們對於那種個人生活加以評價，便已不免落於第二義的人生。所以個人生活是應該特別看重的。次之，便是家庭生活。家庭生活雖在西洋不甚重視，但在中國却有極大的意味。再次之，便是社會生活。社會生活也是考察人生的重要部分，這無論中西都是如此。再次之，便是宇宙生活。」？

假這層層的研究方法，是以個人生活為出發點，即是一開頭便在研究自己了。雖然他說：「至於我們對於那種個人生活加以評價，便已不免落於第二義的人生。」

如果根據李石岑先生這種「路線」研究下去，能否得到一個認識自己的正確的概括，真成問題？

我們亦不否認「對於那種個人生活加以評價；便已不免落於第二義的人生。」但是這個「第二義的人生」——即是「小我」他是必應以「第一義的人生」——即是「大我」為前提的。站在個別的立場上，他是必應從「大我」認識「小我」，決定「小我」。而李先生於「特別尊重」「個人生活」的「價值」後，又降低「對於那種個人生活加以評價」。這只有在「第二義的人生」或「小我」的範圍內兜圈子。實質上，並沒有「尊重」與「落於第二

「我」之分。因為個人的存在是「小我」的那亦就是一種附屬於「第二義」的圈子裏了。要認識自己，如果是從個人生活開始，不但「落於第二義」，而且「第一義」——即大前提，亦分別不清楚，結果必定把握不住問題的中心的，而至於摸不着頭腦。因物事的存在既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它的時空聯繫性和它的發展的歷史性，人的存在亦是如此。我們要真真正正的認識自己，了解自已，就應該像軍隊要攻佔某一個據點一樣：開頭的行動便是大迂迴，接着便是緊縮迂迴，繼續下去便是達到據點的所在而把它包圍起來。最後便進行着爭奪戰了。如果你以為「個人」便是自己，自己一下子可以把握住「個人」的一切。這是一種主觀的意識，在向自己作怪。我們應該得自己的一切，是自己的眼光所不能看透的。這道理是自己所有的一切——無論是生理的，行動的，觀念的以至於物質的享受，都不是自己所創造，所產生的。一點一滴都是客觀外物的授予和反映的。這里面所包含的因果至為複雜，有的是過去的，有的是現在的，有的是自然的，有的是社會的。自己所能得自由運用的，只是一能動的意識而已。這能動的意識，假如不經過訓練，他的最高的能力，只能夠等於一位未曾研讀過軍事理論的老兵士而已。他那里能夠「運籌於帷幄之內，而決勝於千里之外」，退一萬步說，他（老兵）就算能決勝於千里之外，試問在兩陣對壘之下，能不一下子就佔據了所要爭奪的據點？自己所有的一切（生理的，行動的，觀念的以至於物質的享受）和自己的能動的意識，固然是「個人」的，然而這兩者的關係有時正像兩陣的對壘一樣。自己所有的一切，並不是一開頭就讓服服帖帖去佔有它，而且常常跟意識算起賬來。就是阿Q，有時亦感覺到苦惱的。所以意識的對於自己所有的一切，絕對不是純粹同一的。這麼一來，自己對自己的認識，假如以個人生活為起點時，即在亂處亂着第一次大釘子。偉大的辯論家都曾經說過的說過：「這是如何希奇令人驚詫的事，要認識一個人，須透過一片皮肉，而發見一個靈魂，——發見一層皮肉，而發見靈魂，官感，如味，如光，是發見所謂靈魂的幻象——經過一層皮肉，皮相，幻象，——發見人所謂靈魂。」這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現在最感覺到困難的是怎樣養成這個正確的觀念，和怎樣運用這個觀念的問題了。

我們要曉得科學或哲學的原理，以至於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的建立，沒有一件純粹是由某一個人的主觀的設想或偶然的發見而得出來的。而是人類在實際生活中，經過長時期的歷史的經驗的積累，而加以實行實踐的不斷的研究所得出來的成果或結論，所以我們應該學習——正確的觀念時，不

伯納未敢輕易為自己寫自傳。

再進一步說，如果把個人生活做出發點，然後進而推及於家庭生活，社會生活以於宇宙生活的研究，認為是客觀的，這不但把家庭，社會，宇宙完全附屬於個人，不但做成一個由主觀到客觀的反邏輯的例證，而且不清潔物質運動發展的根源。如果認為物事的發展是由低級到高級的，是由根本到枝節的，那就萬萬不可能捨本逐末的一開頭便「特加注意」於被割成孤立的「個人生活」。所以我們的研究方法，是和上述的方法不同的。應該是由宇宙的構造，到地球的形成，生物的進化，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而至於社會的分析，最後才能「特加注意」於個人生活的認識，這樣自己的真形，便會在「一面鏡子」里面照現——並不是李先生的所謂「觀照」——出來了。

不過這還藉藉着物質的發展層次的問題，不是消極地或單純地只把每一個歷程反映出來便算完事。最重要的是應該作為一個有機的聯繫的觀察的，好像當研究宇宙構造時，應立即建立起正確的宇宙觀，當研究生物的進化，人類歷史的發展與社會的組織時，亦應即建立起正確的歷史觀，社會觀和人生觀，這三種觀念的確立，不是純粹抽象的邏輯，而是具體地依於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生理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倫理學，心理學以至於各等關聯的科學的材料所抽象出來的結論。這個結論，必然具有極豐富的內容，正確的觀點，無論如何，它應該成為人類所憑藉以認識自己的最高準則，有了這個準則，而能具體地，靈活地把它運用起來，便能夠得到正確的結論。以社會之複雜，人口之衆多，要在「一本書上使每一位讀者都能獲得自己是個什麼人，這是無可能而且亦不「經濟」的事，所以正確的宇宙觀，歷史觀，社會觀，人生觀，便應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工具，只要能夠具體地，靈活地運用了它。高爾基曾有一個時間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常常列舉說起革命策略和生活的殘酷。經過一個時間的鬥爭後，他終於這樣地寫下了：「在一九一七年我是這樣想的一——而我錯了。我的回憶的這一——應該撕去。但是「用筆寫下來的字也砍不掉，」那麼「我們由錯誤中學學習吧。」」如果這位國際文壇的巨匠，沒有最健全最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那里會這麼勇敢而且誠實地指出自己的錯誤。

現在最感覺到困難的是怎樣養成這個正確的觀念，和怎樣運用這個觀念的問題了。

我們要曉得科學或哲學的原理，以至於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的建立，沒有一件純粹是由某一個人的主觀的設想或偶然的發見而得出來的。而是人類在實際生活中，經過長時期的歷史的經驗的積累，而加以實行實踐的不斷的研究所得出來的成果或結論，所以我們應該學習——正確的觀念時，不

務必重復具備客觀的態度，時時把它和自己所固有的觀念相對照，使自己的觀念和它相一致，更重要的，還是應該堅決地把自己的生活實踐交給它，使實踐能和它一致，並且時時運用它，作為對於實踐之考驗，因為正確的觀念，是屬於產生這種觀念的前進人物底，並不是經過一番工夫的研究，便能成為學習者，或研究者的。這里面還存在着一個相當遠的距離，就是：前進人物之所以能建立起正確的觀念，是完全以他的生活實踐為基礎的，學習者的生活實踐，如果跟前進人物底生活實踐在性質上是各不相同的，那在觀念方面，亦很難求得一致的，所以除非學習者堅決地下一個改造自己的大決心，把實踐交給正確的觀念，不然，是很難將這正確的觀念接受起來，運用起來的。不斷地把自己的生活和理論相對照，不斷地克服自己的錯誤，而逐步地由不健全的觀念，而進至健全的正確的觀念的建立，這樣，由於舊觀念的拋棄，新觀念的建立，自己畢竟是變什麼人呢？便可恢復什而多變化的環境里認識出來了。

但物事的發展，還不是這樣的簡單，因為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是形成了，也不一定就能夠適應環境，和適應你自己，理由是正確的觀念，總歸越一些抽象（當然有着它的具體的內容）的厚圍，這些厚圍的性質都是不一樣的，亦可以說都是大道理，而自然現象和人類的生活，是極複雜的，多變化的，在這些複雜的現象里，人們在時空兩面所佔有的地位，又都是各別的，特殊的，具體的，多變化的，所以把一般的道理，應用到特殊環境來時，如果硬硬地加入學的小學生「填字」那麼的呆板，結果一定不會看見什麼的，所以一觀念，原理或法則的運用，應該依據於特殊環境而具體地靈活地運用起來，才能把這任所要認識的對象，這是極困難的一着，有不少已具有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的人物，因為未能在特殊的環境里，具體地運用那正確的觀念來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結果弄到像托洛斯基和哈林一類的「慘劇」。

那麼，怎樣才能在特殊的環境里，具體地運用着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來認識自己呢？

第一個要着，是使自己的生活和他社會現實的最低層合在一起，而靈活地運用正確的觀點去觀察環境於自己周圍的自然和社會的底現實，進而便觀察自己的社會背景，社會立場，這里只介紹一本較為平易的著作為參考，便是石泰斯所寫的「伯納特」，這本書是用正確的觀點具體地將「一身」的兩面：一面是矛盾，一面是偉大」的矛盾反映出來，我們讀完了這本書後，多少可以幫助對於自己的特殊環境的觀察及分析。

其次就是對於自己的生活（包括意識，行動等）給予詳細的分析，并推究出那種生活的特質。十九世紀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教育學上都有貢獻的思想

家的論，認為他的精神陷入於「乾澀沈重而愁悶中」，「曾對於自己的生活內容作過這樣的自白：「換言之，對於美德，對於幸福，我並沒有愉快的感情，對於任何其他物，我亦是這樣。虛榮心與功名心的源泉，與愛他心的源泉一樣似乎已經在我心中乾涸。」當時我曾想到：我已經在太過年輕的時候，得多少虛榮心的滿足；在名譽與地位發露成爲動機以前，我已有了若干名譽，覺得自己已有相當的地位。我所得的雖極少，但覺得的大學了，像享樂過早一樣，使我對於名譽地位的追求，像吞服倦而無味。因此，利己的快樂，既不是我的快樂，不刊己的快樂，亦不是我的快樂，我的心，此時已有非常濃厚的分析性，要改造我的性靈，——這是一條極難之途，對於自己的特質，很坦白地說出來了：「我這顆心，在這種時空之下，雖能說是自我主義的，是由自我幸福而幻想極端富貴的，在人類一般的命運，亦確實是永遠在我思想中，不能與我自己的命運分離。我這顆心，我一個人在生活上的缺陷，必定是生活本身上的缺陷，問題是，如果社會的改善者能達到目的，如果社會每一個人都能自由，那麼物質上安樂的生活，試問，不自由奮鬥與苦難維持的人生快樂，是否還是快樂。我又覺得，如果我不是我這顆心到一條路，對人類一般幸福，我生比這更優良的期望，我的期望是必定會繼續下去的，只要我能達到那樣一條出路，我就會對世界樂觀；我對自己說，我只要在人類一般命運中有一個相當的部分，那麼無論多少，我都是滿足的。」這可說，是由自我主義到汎愛主義的矛盾發展的一個特質。

綜合了上述多點，即是運用正確的觀點，在其環境里，認識環境於自己的自然的和社會的處境，自己的社會背景，社會立場，進而分析自己的生活及推究出這個生活的性質，這樣，一個所認識的自己，畢竟是「什麼人呢？現在可以以呈現出來了。從此之後，要怎樣去學習做人，怎樣去迎接社會，怎樣去負起時代的使命，一定能夠胸有成竹的」了。好像「迎接從進化論的立場，轉到階級論的立場，而站在前進大眾的集團里，真正的成爲勞動大眾的人，被帝反對建國的民族解放鬥爭」亦就是抗日的民族革命鬥爭的戰士的時候，就那麼確信的自認着：「好像『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自己在替大眾受罪似的』。

「歷史是殘酷的極點」，一切不願意認真真正的認識自己的人們，只有像生長在快樂枯死的林木上的寄生植物那樣的可悲，可惜，這些人物的生活態度，正如高爾基所說：「一切許多的事物，都阻止着人們去過他們所需要的那種『習以為常』的生活，人們所渴望的，倘若有所渴望的話，不是社會習俗的根本改革，而是獲得某些附和的習慣，大多數人的實踐和訴苦的主旨，總是一『不要干涉我們的習慣了的生活方法』」。

紅棉屋札存

林柏

七 因明沒有脫離認識論的立場

「因明」為印度五明之一，約略和現今的邏輯相同。什叫做因明？「因」，是指宇宙萬有的所以然之故，人們所據以主張一個論旨的。「明」，是通徹這種「故」，明了無礙，所以叫做明，含有學術的意味。——因明這種邏輯有許多特點，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沒有脫離認識論的立場。

「因明入正理論」——印度因明改革者陳那的弟子陳那所著，唐玄奘帶回譯成華文，他的弟子親本師說作「因明入正理論疏」(即所謂「大疏」)，成為國人研究因明的重要典籍。——開宗明義的頌文，於包含着這個意思：頌說

「能立與能破，及似唯悟他，現量及比量，及似唯自悟。」

這四句頌文，前二句說明「顯正破邪」的軌則，後二句指示求理了悟的途徑。前後聯貫起來，成為一種有機的邏輯體系。由於建築於求真理的基礎之上，故它既不偏於內容的形式，不脫離認識論的立場。

「能立」，是說立論者建立一個論旨，沒有錯誤，能站得住。「能破」，是說能揭發論敵的謬誤而推翻他的論旨。前一個「似」字，說完整時，就是「似能立」和「似能破」。建立論旨，因含有謬誤而立不了，叫做似能立；駁斥他人論旨，沒由把必覆誤揭穿，或它原無謬誤等而破不了，叫做似能

破。為什麼要立要破呢？目的都在於「悟他」人。

故云：「唯悟他」。立破的目的雖然一樣，但真似的效果却不同。這裏顯出邏輯對於論辯的重要了。然而，真正的「能立」「能破」，它的最可靠的依據，不是邏輯，而是真理。應以真理「悟他」，必先對真理有先能「自悟」——即自己先能認識真理。而認識真理的途徑，不外乎①感性的認識，和②理性的認識。而理性的認識，又必須以感性的認識為基礎。所謂「現量」，——印度所謂「量」，是度量規定的意思，凡構成知識過程及知識本身，都叫做量。——就是五官對於外物的感覺，所謂「比量」，就是依據感覺而邏輯地推演的過程。兩者構成知識的總量。後一個「似」字，是說指「似量」和「似比量」說的。五官發生毛病，就不能如實地感覺事物，所得到的就是似現量；邏輯運用不好，就不能客觀地反映真理，所得到的就叫做似比量。「自悟」本在求「真」，但不注意時也可能得「似」。故云「現量及比量，及似唯自悟」。現量及比量，雖屬於認識的事，但大部也離不了邏輯。

由此可見：因明之宗旨，不僅限於研究思維和論辯的理論，同時也兼重真理的追求；不僅限於研究正確的推理，同時也注重準確的感覺。換句話說，在因明的整個體系裏面，邏輯並沒有和認識論分離。

這樣的見解，在它關於邏輯的部分，也表現得很明顯。自陳那改革以後，因明的論式，概採「宗」「因」「喻」的「三支作法」。從虞世先生的因

明學律儀一個例吧：

宗——金剛石可燃。

因——炭素物故。

喻——若炭素物，見彼可燃，如薪油等；若不可燃，見非炭素物，如冰雪等。

這一論式，很合於論辯立言的自然程序。如果我們把宗、因、喻的順序倒轉過來，就復原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法」。改成三段論法，就成為：

大前提——凡炭素物皆可燃。

小前提——金剛石為炭素物。

斷案——故金剛石可燃。

三段論法檢驗立論是否正確的方法，專一去查看形式上是否犯了它所應遵守的五條規則；而那五條規則，又專注意於形式上的問題，不管立論的內容怎樣。但是因明的三支作法却和它相反。它的正確與否，換句話說，即是「宗」之能否成立，全要視所謂「因」的「相」是否完備。而「因」的「相」，並不專從形式上着眼，還須顧到客觀的事實性。並且在「喻」支中要舉出正反兩方面的個別事物來證實「喻」義；頗有歸納法的作用，同時也免掉了三段論法的「竊取論點」之嫌。這些都是因明優長於形式邏輯的地方；同時，也是它沒有脫離認識論的結果和證據。

什麼叫做因的三相呢？「相」，是表徵的意思。因的三相，就是：①遍是宗法性，②同品定有性，③異品遍無性。我們看：

第一，「遍是宗法性」，意思是說「因」所推的事，具備遍為「宗之法」的性質。這裏所謂「宗

「，僅指宗的前陳（即「主辭」）而言，所謂「法」，即是「屬性」的意思。相親在的話說，就是「因」所表現的事，必須具有遍為宗的主辭所代表的事物的屬性之性質。拿上例來說，就是「金剛石」必須都是「因」所表現的「炭素物」。不然，這論旨就不能成立。因為「炭素物」既然是「金剛石」之所以「可燃」的原因，如果有一部分金剛石不是炭素物的話，那末，我們就不能全稱肯定地斷定「金剛石可燃」了。

第二，「同品定有性」是什麼意思呢？「品」是品類。所謂「同品」，是指具有宗的「後陳」（即「謂辭」或「表辭」）所表現的屬性的事物而言。就上例來說，凡事物具有「可燃」的屬性者，就是「同品」，沒有這種屬性者，就是「異品」。所謂「同品定有性」，就是說，「同品」於事物中，定須有些具有這因所指的事。具體地說，即可燃的東西中定有些（如薪油等）是炭素物的。能够凡屬「同品」都有，自然更好，但僅一部分「同品」有它，也無妨宗義的成立。如果「同品」無一具有這種屬性的話，我們就不能斷定宗的主辭所代表者必具有其所謂辭所表現的屬性了。拿上例來說，如果「同品」如「薪油」之類，都無一是「炭素物」，可見「炭素物」和「可燃」這兩不相隨的，我們怎能根據「炭素物」這屬性，來斷定「金剛石可燃」呢？

第三，所謂「異品遍無性」，是說凡是「異品」必須「遍無」這因所指的事。這是從反面來說明的。如果有一「異品」具有這因，安知宗的主辭所代表的不是和它一樣，雖具有這因却無宗的謂辭所代表的事？具體地說，如果「非可燃」的東西也有「炭素物」的，則安知「金剛石」不和它一樣，

又怎能斷定「金剛石可燃」呢？——可見「因內三」相「這三種檢驗法，都是不能脫離認識過程的。

由此可見：因明沒有脫離認識論的立場，無論從它整個的體系上說，或者從它的推理過程上說，都可能是接近哲學的唯識心理學的知識。客觀現實都有那樣接近哲學的唯識心理學的知識。客觀現實的發展是辯證的，在佛家能有這移的見解，並不希奇。禪宗盛行之後，因明終歸衰微，這因明的書籍也一時絕跡了。此中消息，耐人深思。

八墨家的邏輯也沒有和認識論分家

在「墨子」——這是一部墨家作品的總集——

書中，也表顯着墨家的邏輯沒有和認識論分家的許多證據。「小取」篇說：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端，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為舉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柏按：焉字作「於是」解。）

「經」上也說：「辯，爭彼也。辯辭，當也。」本章的「經說」云：「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夫。」這樣看來，「辯」是論爭的事，是開始於論爭，而歸結於真理的。所以要「當」。能「當」，纔能切實實地「明是非」，「審治亂」，「明同異」，「察名實」，「處利害」，「決嫌疑」；一句話說，能達到辯的目的，發生辯的作用。「當」是當於客觀的現實；即「立辭」要符合事物的真

相，以事實為當否的標準。因此，「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不能「俱當」，「必或不當」。如果論爭的對象，確是一頭「牛」，於是「謂之牛」者得當，而「謂之非牛」，此方說謂之「夫」者，就不當了。論爭要求達到勝利，固然必須遵循邏輯上應守的規律，但重要的還是確實把握真理，用它做立論的根據；因而需要對於客觀現實有深切的認識。所以，小取篇這節文字，於指出辯的目的和作用之後，緊接着就敘述把握真理的方法——「為舉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却把關於邏輯的運用——自「以名舉實」至「以類予」——這段說話放在後面。不如此也。它還要把「舉略萬物之然」放在「論求羣言之比」之前，還要於運用邏輯的敘述之中，顯示注重「以名舉實」的物觀態度。這些都表現出墨家邏輯沒有脫離認識論的證據。如果細細地把握墨家邏輯，就可以看到他們重實踐、重客觀的精神，貫徹着全部著作，處處可以作我們上面分析的印證。

所謂「舉略萬物之然」是什麼意思呢？「舉」，廣求也。（漢書、楊雄傳、晉書引字林。）「略」，約要也。（淮南子、本經訓、高誘注。）略，也訓「界」，（左傳、莊二十一年）「界之武公之略」注。訓「取」。（廣雅釋詁一。）「然」，即「萬物之所以然」。小取篇下文也云：「其然也，有所以然也。」——「舉略萬物之然」這句話，表明了墨家以一切客觀事物為知識的直接的基礎，來「明是非」，「審治亂」，「處利害」，「決嫌疑」。經說上云：「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可以互相印證。認識的事，從主觀能動方面來說，謂之「貌」，謂之「舉略」；若從客觀事物對於所貌的結果

上說，則為「反映」。而且，摹略也有規摹以略而約取之的意思。所謂認識是思維對於實體的永遠的無窮的接近，是智力浸漬自然的過程而使它服從主體的權力；可以說是一「摹略萬物之然」的最好的注釋。

由於這種邏輯和認識論一致的見解，使墨家在二千多年前，能够注意到光學力學等科學各方面，留下了不少光輝的成績。使他們對於歷史能有發展，例如墨子尊天明鬼的思想在墨經作者——我們認爲墨經和大小取是墨家後學的作品。——幾乎完全被放棄了；又如經下說：「堯之發也，歷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大有法後王的見解。也使他們在邏輯的本身，更重內容而輕形式，墨子本人所提倡的「三表法」，後來也沒有被繼承發展起來。關於論式沒有得到形式的規定這一點，我們認爲這不能看做墨家邏輯的缺點或幼稚；因爲邏輯是否高級，並不以論式的有無爲標準的。

九 墨經的「存」不同於公孫龍子的「藏」

「墨子」經下云：

「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

「於：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可。」

張純一先生解釋本章「存」字云：「此所謂「存」，即「公孫龍子」之「堅白論」篇「藏」之義。」這

種解釋並不正確。他沒有了解「墨經」之「堅白」與「公孫龍子」之「離堅白」有根本態度上的不同。

按本章大意在說明事物的屬性無限，不能一時盡爲人所知道。我們對於一個事物的屬性，可能有的已經知道，有的還不知道。而未爲我們所知道的這些屬性仍然存在於事物之中。故曰：「說在存。」經說則具體舉例來說，比方石是「事物，而堅和白等則構成它的可分析的整體的屬性——即所謂「二」，（注）都蘊涵於具體的石中。故曰：「而在石。」所謂「而在石」者，即解釋經文中「存」字的意義。以爲不在旁的地方，而是在石。若有人只拊之而得其堅，只知有堅，不知有白；但白仍在石，不因他不知而消滅。反之，若有人只視之而得其白，只知其白，不知其堅，則堅也在石，仍然如舊。堅白之外，尚有多種多樣的其他屬性，也在石中，等待人去認識。如果就人方面說，所知雖有多寡的不同，畢竟只是程度的差別，不能把它的屬性盡知無餘，則沒有兩樣。故曰：「有知焉，有不知焉，「可。」可見墨經之所謂「存」，是存於事物裏面的。

「公孫龍子」之所謂「藏」，則不然。借所說的藏，是共相（概念）的自藏。他是主張共相可以離開事物而獨立存在的。在「白馬論」中，他已經主張了「馬」，「白」，「白馬」是三個分離獨立的主體；在「堅白論」中，也同樣地把「堅」「白」兩共相看做分離獨立的。這是他一貫的主張。（在當時，能够這樣地作高度抽象的思維，在一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進步的。）所以「莊子秋水篇」稱其「合同異，離堅白。」「堅白論」云：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堅也二；無白得堅，其堅也二。……視

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得其所堅也；無白也，……得其所白，得其所堅，見與不見，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

公孫龍主張「離堅白」，故不以堅，白，石爲三。以爲「得其所白」時，堅即離白而藏。「得其所堅」時也一樣。而其所謂「藏」，並不是藏於石中，而是堅白的自藏。故公孫龍說：

「物自焉，不定其所白；物焉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原作焉，依陳澧校改。）石也。」

意思是說：堅白皆具普遍性，藏物而有，不拘固於一物。例如白，有白人、白馬、白羽之白；堅，有堅金、堅木、堅冰之堅，何必定於石呢？用這來說，堅白各有獨立性而自存的。（依伍非百先生注）他又說：

「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物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

意思是說，堅這種屬性，不懂和石在一起成爲它的堅，也兼和其他萬物在一起成爲它們的堅。就是不和萬物一起而成爲它們的堅，堅還是堅，沒有變易。不過，當它不和石及他物一起而成爲它們的堅時，天下就看不見這樣獨立的堅吧了，不能說沒有堅這個屬性的。故曰：「而堅藏也。」（依謝希深注）這是強調堅的獨立自存性，不因看見與否而發生問題。到了完全「不與物爲堅」的情形，堅就自藏起來，並不是什麼東西把它藏掉。故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並據張爾其相可以離開事物而獨

立著在的思想，和墨家所引存在於事物的見解，是絕無沒有共同之點的。

小取篇云：「明同異之處」；總上云：「堅白不相外也」；又經說云：「堅得白，必相盈也」；原來，墨家是主張「明同異，盈取白」的。...

而墨家所引存在於事物的見解，是絕無沒有共同之點的。...

十一 名實

論語云：「子路曰：衛君待于而後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孔子說這句話的時候，自然是指對於衛君父子爭國，弄得家父不父，子不子的時事，有對而不順，有放而無節，但另一方面，正名這種主張，也是他生平抱負的，...

孔子的本意沒有多少出入的話，那末，孔子之所稱正名，就是欲用概念法糾正事物的了。

事物是變動不居的，概念則一經定規就不容易伸縮，雖然它原先可能也是事物的反映。...

後來荀子也談正名。他在「正名篇」說：「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

但是，墨家對於名實的理解，就和這相反。他到重在「以名察實」。...

經上「而當否的標準，不在「濫奪」，不是在「名之定實」，而是客觀的事物。...

這家的孩子，對於名實，雖然也有「名者，實之實也」，「名止於實，實止於道」的說話，...

「我與若者矣？若勝我，我不若勝，我與若者矣？若果非也耶？我與若者，若不我勝，我與若者矣。」...

如果人過的是社會生活，這種態度，豈不是偏調的，因為這是一種偏偏的態度，而這種偏又怎能建設健全社會呢？...

學習文文山先生

龍泉

「指南錄」讀後感

一個人能够成功一個民族英雄，決不是偶然的。他必然在平日便有很好的修養，故當臨危受命、能持大義、堅守節操、不屈服於敵人，而能從容就義。於是自然足使「丹心貫日月」「沛然浩若其」了。

文天祥先生，這位偉大著名民族英雄，其能以身殉國的經過，我在讀指南錄之後所寫的「指南錄中的文山正氣」已經談過了。現在又說先生所談現在指南錄中的修養功夫，提出我的一點點心得。

指南錄是先生自叙其當宋末元兵入寇，直逼宋都、起兵勤王及出使北營被扣留經過之詩片四卷。第一卷起自使北營留北關外；第二卷起自北關外復還京口；第三卷起自說京口過通州；第四卷起自至海道至及嘉禾三山。

讀我分幾點來看看這些詩作中所顯現出先生的修養及爲人的作風與氣派。

一、見危授命，力担重任。我們知道當賈似道當國日在半開堂中取樂，蒙古入略，則以乞和爲能事，南宋半壁江山，不知被元兵進佔了多少？這時，先生這是一個人才于派時壯元，到呂文煥以襄陽出降之後，元兵遂大舉入寇。這時，南宋風聲危急，舉國連個安也備安不成了。先生於此時挺身而出，起兵勤王，以扶宋抗元爲己任。及到蘇州奉命入守獨松關，元兵已臨城門外了，是時，「城中兵將官紛紛

自往納降」所謂「戰守運皆不及施」。滿朝官僚，都計無所出。元兵要當國丞相往見，大家都推先生前去，以解國憂，先生遂以學士名出使，這是多末一團見危授命，愛國不愛身的精神啊！

二、敢于認錯，敢于責己。出使北營後，既不能以口舌解國憂，反使自己受累，不能有所作爲，所以先生也深悔一出之誤。在「所懷」一詩中寫道：「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而在「自歎」一詩中會引過古語「陳師伯也伯也長堪，而後自己偏有出使北營之行，所謂「予自知非不明，後卒自誤，殊不可曉」，于是自歎「乾坤增感慨，身與附庸等」。同首詩謂：「雨餘山更清」，已不勝感慨之至了。一聞故人劉小村陳師伯引兵向南，于是有「愧故人」之作，所謂「九門一夜漲風塵，何事殘兒竟誤身，但知慷慨稱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又先生曾道過至事兵救常州，而有五木之敗，致勇將尹至死難，先生遂以不知人痛責自己，我爲先生引咎自責的精神致敬！

三、恨亂賊，思義士。先生既扣北營，適與降將呂文煥同坐，急不與交談，所謂「幾疑何堪共動時，衣冠塗炭實可羞，袖中若有擊賊笏，便使渠渠面血流」。而文煥都誇其「虎頭牌子黃金裝」的威勢，洋洋自得，實先生不應罵他爲「巨賊子」，看先生的詞語：「力窮援絕，死以報國可也。汝愛身，情妾子，既負國，又隕家聲」，「女尸亂賊而

罵」！其罵事詩是這樣寫的：「不拼一死報封疆，忍使湖山牧虎狼，當日本爲妻子計，而今何面見三光」。罵得好，罵得痛快！即元將咬都亦說罵得好，可見亂賊降將在敵國大心目中的真實價值。

元兵既下宋京城，廣城賊賊餘孽，一面令學士下詔使天下州郡歸附，一面又逼宋帝拜表投降。丞相吳堅畏怯不敢爭，想和使謝安附身附命，同知劉景衡則當作是升大官的好機會，只多致謝辭，始終不肯正，頗示氣節。先生有詩記其事，措詞得很有力，寫劉景衡的一首最好：「江南浪子是何官，只當空虛難測看，撥取公卿如糞土，淋漓徒自辱衣冠」。而「留遺傳」一首，寫數國奸徒的諂媚事，衣冠楚楚地的情景，可謂淋漓盡致。但先生對家國政事是極爲佩服的，如「廷爭堂堂負直聲，賴有忠良壯此心」。尹至五木之戰，手殺七八十人，與所部同死於難，無一降者。于是先生有哭尹至之作。

先生不僅引家範的忠義自壯，尹至及部下五百人的同死國難以自豪，凡聞有義士起義抗元之舉，及在戰鬥中表示氣節的，都很爲高興。如黎甲的「所懷」「思滿塘陳」「思方將軍」，一思小村劉「一思則堂先生」。諸詩，都保很念忠義之士而作。先生這種對忠奸分明，毫不苟且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學習的。

四、慷慨對詞，不爲威屈。就在那時候，也許由於降將的獻策，也許是元人的敬愛先生，總想勸說先生爲元朝之用。當先生責問元將不放其回宋爲失信的時候，即有降將呂文煥從前來說，到文煥叔像盛了一鼻子的灰之後，咬都便親自出馬進行勸說了。其勸說的話，首先是勸以爵祿，就是說先生在宋爲狀元宰相，現在可保爲大元宰相，同作宰相官，有蓋次第，休道「國亡與亡」了，兩

不爲威屈。就在那時候，也許由於降將的獻策，也許是元人的敬愛先生，總想勸說先生爲元朝之用。當先生責問元將不放其回宋爲失信的時候，即有降將呂文煥從前來說，到文煥叔像盛了一鼻子的灰之後，咬都便親自出馬進行勸說了。其勸說的話，首先是勸以爵祿，就是說先生在宋爲狀元宰相，現在可保爲大元宰相，同作宰相官，有蓋次第，休道「國亡與亡」了，兩

威爾基先生的世界遊記

矢健

「天下一家」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美國最顯赫的政治人物，共和黨的首領威爾基先生，坐了一架「解放式」的飛機，開始了那一次波瀾壯闊的世界旅行。如果這不是在這次戰爭中最動人的事實，那麼至少也應該是這次戰爭中最動人的事實之一。這次旅行共有四十九天，渡過了四個大陸，最後到過了中國。我們還能記得那時候全中國人民的興奮的情緒。威爾基先生沒有辜負我們的期望，他的言論深深地打在愛好自由的中國人民的心上。

威爾基先生回國之後，就寫下了這一本「天下一家」的書，四十九天的旅行給了威氏以怎樣深刻的啓示，這本書週詳地說明了。我們現在也已經高興地讀到本書的中文譯本了，願在這裏表示一下我們的觀感。

在中東

威爾基先生的這次旅行是政治的旅行而不是軍事旅行。自然他也是很注意軍事問題的。他在艾爾阿拉敏巡視了當時非洲沙漠的前線，蒙哥馬利將軍主張一種積極的而非防禦的戰術，他說了這樣的壯話：「不讓他們（法西斯）休息，不讓他們休息！」這種壯話不論什麼時候都是雄偉動人的，戰爭是一種進攻的藝術而不是等待。

在中東，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力斯坦，這些國家都是在英國的統治或在英國的勢力範圍之下的。

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些國家的人民，他們對於這一次戰爭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我相信幾乎所有我到過的這些地方都有某種

酵母在發生作用。即使是最嚴格的中立也不能使戰爭不對這一區域的居民引起深刻和劇烈的變動。他們的生活在今後十年中的變化會比過去十個世紀要大。」（一六頁）這種「深刻和劇烈的變動」和它的影響的確是今天的世界一個最重要的事實，戰爭擴大了人民的眼界，洗滌了人們的胸襟，每個人都不能不這樣地思想起來：這個流了千百萬人類寶貴的鮮血的戰爭，他的結果會是怎樣的呢？世界將要變成怎樣的呢？而他們的民族和他們自己的前途又將是怎樣的呢？不論是英國人，美國人，蘇聯人，中國人，土耳其人，埃及人，都不能不這樣想。由於歷史條件的不同，各個國家所最着重地想着的問題當然也就有差異。在中東，人民們所思想的，最重要的是一個民族的問題。

禁止他們的理想是不可能的，為了戰爭的勝利還必須鼓勵他們這樣想，幫助他們這樣想。威爾基先生警覺地理解了：假使他們只是被統治者時，那麼他們是並不關心那統治他們的是什麼人的，這裏就存在着另一種戰爭的根源。別一方面，我們也能確知還有對於現行戰爭的怠工的根源。無疑這些都是不幸的事件。

一切都是很現實的考察。威爾基先生認為中東的人民有着這樣的四種需要：教育、公共衛生事業、現代化的工業、「自由和自我就給而來的更多的

先生的答覆是兩個字：「拒絕」。其次是以「樹木若千，先生答以五萬，曉都說：『使丞相在，平江必不降。』」但吳越百姓，而先生則答以「如吳越打，亦未見輸贏。」當曉都問吳越百姓，如吳越打了先生答道：「非關經濟，宋疆土萬里，億萬人民，先生答道：『既是一國，何必遠去。』這與今天所謂「東亞共榮圈」一類的話，是相去不遠的。以先生當時的答詞，並沒有失去他的立場，而且是很動人的。在陪都，先生說：「我此次是來當公開發言，採取這種辦法是可以的。再其次，派人作伴，以示同情，暗裏進行宣傳。這便是曉都常用對詩，請他請法與先生作伴的事。信也說詩詞，信當作好人看待，會稱其尚留戀宋朝。但據先生所記的談話有：「高麗土地已盡其半，一旦歸降，大元喜其不拒，併將地佔去，而高麗如故。大宋衣冠正統，降元後，當非高麗可比。」我認爲這無非是軟弱先生的一種辦法。請看今日日本不是把南京給予（？）汪賊精衛，而汪家班也不是大搖大鼓的在唱其傀儡戲麼？所幸先生志氣堅定，雖錯認了這個衣冠小人，就未上他的當。

五、敦厚的友誼，隆重的孝思。就「憶故人」及「思」各詩看，已可見先生友誼的深厚了。在患難中「人情莫不觀望，惟從哲故，雖親僕亦逃去」，這使先生不得不有「世態炎涼甚，交情貴賤分」之感。而向先生生死相從者門生金應，歷盡艱險，奔波數千里，後以熱病死於通州，先生非常痛心，哭詩有：「休戚與同情，招魂情語，歸骨事茫茫，平生不汝忘」之句。杜黃鸝子患難中依然相從，始終如一，使先生有「姓弟兄之悲，其紀念杜的詩有三首，警句有「半生誰俯仰，一死共浮沉」。

憶太夫人時：「萬里酸辛，幾負太夫人，定有今何處，新來夢寐頻」。說明先生在那時忠孝不能兩全的苦心，爲了愛國家，愛民族，不惟不能對

社會尊嚴和自信力」。這其中第四點尤其是基本重
要的。威爾基評駁了那些患民主主義的危險的主張，
從這種主張我們很少能看出和納粹主義有什麼不
同，他說：「把機會給我所見過的任何阿拉伯人，
讓他們感覺他們是自己料理自己的事！你看，他們
一定會改變他們所居住的世代的。」（二七頁）

民族主義是決不能停止的東西了。現代世界
的一個最重要的事實之一，就是為爭取自己的民族
獨立自由的民族主義者的不斷的鬥爭，威爾基先生
把它稱做「一種日趨高漲的狂熱的民族主義精神」
。並且說：「這對於一個相信世界唯一希望存在於
與此相反之途徑中的人的，是一個不安的因素」。
（一九頁）豈止是「不安的因素」呢？假使土耳其
民族已經獲得了解放，假使中國民族也就要獲得解
放，假使沙皇的民族壓迫政策是加速了牠走向死亡
，假使納粹橫蠻的民族侵略最終免不掉了要失敗，
（請看南斯拉夫，在法國，在波蘭，在希臘，在
阿爾巴尼亞，在捷克，在一切被凌辱的歐洲的旺盛
的地下戰爭吧！）那麼，民族解放和民族壓迫之間
，一定總免不掉激烈的抗爭的日子到來，為了免
掉這種不幸的陰影又籠罩了將來的和平世界，退一
步說就是為了要免掉另一個凡爾賽下面的又一個希
特勒的產生，威爾基先生的呼籲應該是所有和平文
明人類都衷誠地同感的。

在蘇聯

不久以前我們看到過維斯先生的「出使莫斯科
科記」，威氏以其特有的精明強幹的觀察洞見了蘇
聯強大力量存在的源泉，現在威爾基先生述說着對
這個國家的印象，竟然得到和威氏差不多完全相同
的結論：

「雅庫茨克的故事——就是它過去的歷史

和我自己所看到的——告訴了我比任何我讀過
的書籍更多的關於俄國革命的事情。不過，我
所看到的這些事情沒有把我變成一個共產黨人
。而實際上却使我成為美國制度的更堅定的信
仰者，而且更嚴切地為它出力。但是事情也
的確使我相信了，俄國人可不是不能相處的無
情的人，同時戰後的世界和平與繁榮，將需要
美蘇兩國人民的合作互助。」（七三頁）

所謂雅庫茨克的故事，就是在這個蘇維埃雅庫
茨克共和國革命以前革命以後二十年來的歷史
變化的故事，在這個土地上的人民怎樣從「飢寒，
獸皮和梅毒」的「人民之獄」的生活發展成「熱情
簡樸的風氣，忠厚的態度，充沛的活力」的生活的
故事。現在，雅庫茨克有「無論那一個城市都是可
以驕傲的」圖書館。革命前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是
識字的，現在倒轉過來，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民都是
能讀能寫的。從前那部被視為荒涼的土地，現在
佔到金蘇聯礦場競賽中的第三位。雅庫茨克城的
電力廠又是蘇聯各省市電廠中競賽的第一位。西北
利亞著名的木材，在一九三五年，採取了三萬五千
立方公尺。現在的計劃則是四百萬立方公尺，蘇聯
的資源是廣大驚人的，計劃中的開採量要達到八
千八百萬立方公尺。在農業中，革命前散漫原始的
小農生產供給着人民貧乏的生活，現在，現代化集
約生產的集體農莊，已佔到了全部農業生產中的百
分之九十七（以上）了。

威爾基先生還以特別尖刺的方式考驗着蘇聯社
會成員間的凝聚力，他用美國的民主的標準測量着
蘇維埃的社會制度，他一步緊一步地向着蘇維埃生
活工作着提出問題：假使你們能夠有這樣豐富的生
活收入，你為什麼不想自己擁有一個工廠或一個
農場，使你的孩子生活得比你更好呢？結果顯然並
不大好，威爾基先生解嘲地說：他聽着了不斷的「
一長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社會學理論」！這個談

母親朝朝定省，而幾至有負於母，衷心耿耿，念母
之殷，只有形諸夢寐了。這告訴我們一個榜樣，就
是當忠孝不能兩全的時候，是應當移孝母之心，從
事愛國工作的。凡能愛國家，愛民族到這地步，他
的孝思，便包括在愛民族的精神中了。像先生憶太
夫人這首詩，不己流露了他很隆重的孝思了麼？
六、艱苦萬狀，百折不回。指南錄後兩卷的詩
，都是先生敘述其北行中定計逃走的經過情形。其
間困苦萬狀，累經波折。自說京口起程之以詩者有
十之難之多。一入真州，又不見談於斯臣某，被
逼出走，從此變姓埋名，草行露宿，所謂「日與北
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迫於急」，先生
在後序中自認其遇險而死的機會有好幾次。在先生
認為：「生死，豈在事也」，但「死而後生，而境
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公非平生真有
修養如先生者，以一個狀元宰相，而能熬過這些難
關，又談何容易啊！正由於先生早抱定：「死生
片歲寒心，不指南方不肯休」的精神，故「厄運
一百日，危機九十道」。也罷，「烈士喪元心不易」
，而一心歸南，圖糾合兩淮兵力，驅逐韓子，以謀
復興中國。這種愛國家，愛民族底不折不回的精神
，正是爭取民族解放的好榜樣。

總之，先生能於危難中，毅然以國家興亡為己
任，對亂臣賊子，忠臣義士，愛恨分明。當威武下
不屈服，在勸說中不動容，患難之中猶能敦厚友誼
，不忘孝思。廢盡千災百難，既隱忍以處，而又設
計脫逃，歸南後，便担負起恢復疆土的大任。這種
修養的功夫，是一個知識份子堅定自己，完成偉大
的典範例子。正氣歌之能流傳千秋萬世，正說明這
種傳統美德的深入人心。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我們
必須把它發揚光大，將民族正氣灌輸到每個人的腦
中，這是針對日寇提倡變節的對症良藥。

指南錄錄的文山正氣，正是指南錄中任發所結
的果實。
讀了指南錄，就懂得一代民族英雄的成就，全
由任發而來。那末，先生不是我們修養很好的一面
鏡子麼？民族戰士們，起來，向先生學習！

話的神情，想起來真是有趣味的。

但其威爾基先生後來就懂得，蘇維埃社會的同心力，經過了二十幾年的艱辛締造之後，已經是完全自然而然的和諧的東西了，威爾基先生看到，在蘇聯沒有集中營，沒有官僚制度，蘇聯人民的政治生活是完全自由的，他們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階級的一致性，已與生俱來的東西了。

威爾基先生根據這一切生動的事實，下了這樣的結論：這些人「的確具有一種勢力與自信心，這些事一再使我想起當年我們已向西方發展的生產故事。我懷着一種十年以後雅爾達克會變得怎樣的強烈的好奇心離開了他。在今天也許任何訪問蘇聯一處地方的人會不喜愛它的無神論，也許會對共產主義者的理論感覺困難，但是沒有一個接觸過這些人民並和他們會過的人，不承認他們已經建立了現代最有力社會中的一個。

「蘇聯現在對美國備戰。我們必須明瞭蘇聯。這兩國得天德厚的國家，在現在和戰後世界中都必須設法合作才好。由於蘇聯目前在戰爭中作巨大的貢獻，它是決不會於戰後被忽視的。」(八二頁)

我們同意下面意見，「這些都一再使我想起當年我們自己向西方擴展的生產故事」，這就是意味在世界的道路上，蘇聯和美國的努力都是為了人類爭取向上的幸福的生活的。我們用不着害怕蘇聯，我們，共產主義既不要與人，也不要欺哄人，「對於共產主義最好的回答是一種生動的，活躍的，大無畏的民主——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民主。」爲什麼這不可以歡迎呢？民主、自由、幸福是我對所有的人類共同爭取的目標。我對熱烈地期待威爾基先生的這種崇高理想在美國未來的生活中獲得真正的成功。

在中國

威爾基先生坦白地說：多少年來，美國忽視了「日本的真正野心和能力」，忽視了這東方法西斯的狂妄的龐大的侵略計劃，自然這也就是說美國也忽視了這層負擔六個年頭戰爭的苦難，經常擔任日

這三十幾個師團的中國對於整個文明世界的重要貢獻。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這一真相才渡過重洋，成爲英美盟邦中所家喻戶曉的理由。但是，在這個時候，又發生了一些客觀的困難，漢口、蕪湖的封閉，世界戰時中歐洲第一的確定，阻礙友邦對中國的物質援助並不能如所期望地迅速提高起來。

另一方面，我應該承認，爲了加強中外的友誼了解的工作，現在還需要我們大大的努力，這在中國和盟邦，都是一樣的有責任。真誠的友誼互助不能不建立在真誠的了解之上，賽珍珠女士說得好，中國現在所急要的並不是空虛的尊敬，而是實際的援助。那麼怎樣加強中美之間的親善友誼的聯繫，其重要性是並不遜於德重開漢口蕪湖那樣的實際的援助的。威爾基先生抱着「對東方發生的一切事情，對那裏人們的看法，他們思想方法上的變化，他們依據的標準與理想而對自由所提的期望，都有更好的瞭解。」(八七頁)的願望到中國來，這真值得歡迎，這本書中所說的話，雖然還很粗淺，只是一鱗半爪的接觸，可是，大體說來，都是很正確的。

威爾基先生說到中國廣漠的西北所蘊藏的豐富資源和人力，也說到在經濟戰線上各種各樣可歌可泣的英勇奮鬥的專員，這在戰前和戰後的艱苦奮鬥，固然，有着這樣的豐富天賦，和更重要的有着那始終忍受着耐勞奮鬥的優秀人民的國家，在目前戰爭中，不論怎麼艱難都不會不盡他的職責，而在未來的民主和平的世紀中，也斷不會不使他的重要的創造力發展出來。威爾基先生大聲疾呼，要求予中國以盡量的援助，這種感情，我們永遠銘感不忘。中國人也像蘇聯人以及其他一切弱小民族一樣，在這些方面，對美國總是懷着善良好友誼的希望的。

然而我們並不否認，中國目前正遭逢着許多難以解決的困難問題，如威爾基先生所提出來的，經濟問題，物價、通貨、生產、運輸等等問題，政治問題，生活情況、不耐煩的情緒等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美國友人的大量幫助，這是毫無

疑問的事。但是，從根本說來，這些却都還不是第一等重要的問題。正因為我們的戰爭是解放的戰爭，是人民的戰爭，我們就一定能够堅決不屈的從一切困難中前進。經濟是嚴重的，但既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在向前，我們就決不會消沉，「不虛煩的情緒」並不是最普遍的事實，最普遍的事實，而是那硬是要不顧一切的打下去，一直打到勝利爲止的意志，和基於這種意志的艱苦的努力。

威爾基先生當然知道，如果美國工人對戰爭採取完全冷淡漠然的態度那仗是打不下的，如果政府和本家一味採取暴戾的鎮壓政策，那仗也是打不下的。中國情形當然也不會例外，實際上，這情形是更其懸殊，更其切要。我們不能不認真看看生死存亡的問題，我們一定要使那一切切斷的團結下去，一直到打敗了日寇，建立獨立中國，而且就是到了那時候，也還是要求永遠的團結下去的努力。

其次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與更加地信賴人民的力量問題，威爾基先生在說到怎樣解決中國經濟困難的時候，曾指出了中國人民「深沈而勇往直前的決心」，主張「使人民在這上面負起更大的責任是賢明的辦法」。(一二四頁)其實何獨經濟問題非如此才能解決，其他一切問題，中心的關鍵也正是在這裏，當前各種困難問題，毋寧說就是因爲我們還沒有充分地發揮這種民權的潛能的緣故，而解決它的道路，估計一切情勢，也只有這唯一走得通的。當然，我們所要建立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其內容當也不能不出此。

我們提出了這兩個要點，聊當作供給威爾基先生和美國友人的一點了解的資料。在未來的世界上，文化科學上密切攜手起來，共同爲民主自由幸福而奮鬥，這是毫無問題的事，我們就不多說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七日於深夜

，自海上自空中，並派水陸兩用部隊，實行登陸，決以最大之威力，盡量加諸敵國，吾人亦將通知盟軍諸將領，一體週知矣（歡呼）。意政府與人民，倘決定繼續擔任德國之壓迫，亦不至使戰爭之一般趨勢，發生嚴重影響，尤不至改變其最終之結局，唯一之後果，即意大利在今後數月內，將枯槁生危而趨滅亡。余對新政府所知甚微，或毫無所知，故不欲表示意見，但就意大利而論，其人民固須作極大之決定，余盼望形成此項決定之若干程序，除殘忍之戰爭外，再無其他壓力為其推動因素（歡呼）。此事或需相當時期，或需數段過渡時期。

除開用火與鋼壓迫意國

不必作其他新決定

以往之經驗證明，一國之政府每至變質時，必有若干階段接踵而至，迄今吾人尚未獲得政府之表示，故吾人除用火與鋼之最大壓力，施諸意大利全境之軍事目標，無需作其他新決定（歡呼）。惟余必須慎重警告諸君，即吾人不知意大利所行將發生之事件，墨索里尼既已下台，法西斯權力既確破滅而再難恢復，則吾人倘令自身喪失與意國進行總清算之方法，殊至惡劣。吾人如此而行，將使吾人之軍隊及吾人之作戰努力，負担逐項佔領全國，及強迫每軍或每區軍力逐一投降之重負，如是吾人將負起警衛及管理之艱巨工作，致而大量耗費自身之力量與時間，吾人切勿蹈德國之覆轍。德國在若干國家會儲大錯，即藉控制人民全部生活之方法，不得不逐日退而管理及於一切細微事件，以致在目前之艱苦情況下，尚須在寬闊局面今日進入動盪與滋長時期之時，以拯救責任自居之英美，倘採取破壞意國整個機構與外貌之行為，誠屬嚴重之錯誤。吾人自願降低意人之生活，使其入於混亂無政府之狀態，結果反使吾人不能得其與之進行交涉之對象，願及其生活與福利。吾人倘循此而行，則事實將證明，解放意人之美意，（吾人或即能以此美意賜與意國人民）可一變為對吾人一切工作表示憤憤之不滿。就意大利而言，余自不願移入一種造成槍決與集中營之途徑，尤不願吾人負起照顧被擊區行自願之責。因之，余在此時對下院，對全國，對聯合國，對帝國，及對吾人一切盟友之勸告至為簡明，吾人應由意人自食其果，使其自行加速其程序，以乞吾人自其政府（或自其何種有必必要權力者）獲得吾人所要求之一切必要條件，以對吾人主敵作戰之時為止，此主敵為德國，而非意大利也。為意大利及盟國之利益計，意國之無條件投降，必須為完整者而非片斷者（歡呼）。余不敢斷定此事是否將成事實。但余認處茲時期，本國及他處人民，凡對一切因素缺乏必要認識，或不能估計各項事實與因素之真正價值者，俱應在言論及寫作方面，特別慎重，以免增加吾人軍隊之辛勞與損失，致而延長世界所受之黑暗痛苦。

在處理意國問題的時候

當與美國取得一致

吾人對上述各項事件，自與美國採取最密切之一致行動，在此地中海之新行動中，美國為吾人之夥伴，亦為英勇之同志，蘇聯友人亦隨時有吾人之通知。該盟之盟方將領合作極密，英美軍隊在諸將領下，其行動有如一國之軍隊，英美政府藉兩國之外交機構，隨時磋商聯繫，余又極力贊成時內閣，亦幾逐日與羅斯福總統互通音訊。余思政府有權要求國會，對政府表示堅強之信念，吾人歷數年之危難，正進行日見成效之戰爭，與執行日見成效之政策，吾人自感值此時際，國會必不願吾人喪失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之行動自由權。今日首要之務，在國會繼續以自由身請政府，政府之執行權不應減少，亦不應要求政府對此種事件與其含義提出不合時宜，或為時過早之解釋（歡呼）。諸君曾向下院領袖提出關於辯論之問題，余或可於此次會議結束前，不儘就地中海局勢，而且就整個戰局，再有所聲明，果能如是，余自極樂於從事。但余目前不能作此諸言，余尚不知下星期內，是否果能達到某一階段，而可據以檢討一般之局勢。現在作戰中，已有若干有趣之軼事，大批記者已相率隨軍，並攜帶其攝影機，出入於槍林彈雨中，現吾人之報章中，每一小時均載有大批極饒趣味極優良極準確之消息，故余已無可增益，竟能就余與諸同僚之見解，使各種事實所佔之地位，各如其分，並對於各項事實與因素，權衡輕重，各得其宜，余願再買一詞，即審慎是也。

目前形勢雖有利於盟國

還需要更大的努力

余意以為當吾人情緒高漲之時，未必不宜如此，就戰鬥單位而言，意大利果何如乎？平情而論，其實力或僅等於德國十分之一耳，總向參政自各

方面遭受猛烈之攻擊，蘇聯戰場諸戰役，其規模之偉大均遠過於吾人與美國，迄今在陸上所參加之歷次戰役，在七月份已予德以深刻之創傷。吾人讀對德兩諸城市施以無情空前猛烈之打擊，（嗚呼）各被征服區內之革命情緒，日益高漲，德國之統治權威北角，以迄克里特島，儘感可怖與殘酷之暴行，報復與屠殺，德方擬以潛艇戰術轉移戰局之希望，其下沉之速，與潛艇等（大笑嗚呼）。希特勒與政權整個之崩潰，其整個所謂思想上之崩潰，將因此前此及將來在意大利所發生之事件而為之紛亂，為之黯淡，彼獨裁者，侵略者，及贖武者之首領，以及蒙羞含垢者之神情，即不啻為彼荷延殘喘，日暮途窮者之哀號。目前之撤退似有利於吾人，但幸勿受其蒙蔽，而竟忽視前途任務之重大，仍待努力，仍屬艱難，仍有種種障礙須待克服，德國之國力仍極偉大，德國之軍隊雖曾慘遭蘇聯三次戰役之毀傷，現仍依然完整無缺

羅斯福總統檢討戰局

——七月二十八日對全美播講——

「打倒墨索里尼及其黨徒的計劃，大部告成，但仍還要打倒希特勒、東條和他們的黨徒。」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訊）華盛頓二十八日電：羅斯福總統本日對全美發表廣播演說，檢討戰局的進展，演說節略如下：

一年中以前我曾對國會說過「柏林羅馬和東京等地的贖武者，發動這一戰爭，然而人類的集體與公憤的力量，將使這一戰爭告終東它」這一預言，現在正在實現過程中。人類的集體與公憤的力量，現在正在邁進中。這些力量，在蘇聯戰場，在廣大的太平洋洋區以及歐洲方面，現在正在向前邁進，由各方面同趨於其最終目標是柏林和東京。軸心的第一次崩裂，業已來臨，犯罪和腐敗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權，正裂為碎片。法西斯和納粹的擄奪哲學，不

希特勒所能命令之軍隊，除附庸國外，約在三百個師以上，其中四分之三，係德國部隊，泰半仍有優良之裝備，吾人刻在西班牙島與其中若干師作戰，并曾見其在於防守之陣地，從事頑強之抵抗，德國中央政府之權力掌握，並遍及德國生活之各方面，現有十餘國之資源均歸其掌握，供其利用，聞其秋收之展望頗為優良。此次之納粹戰爭，或係歐洲一可恨之惡魔，而為吾人所決欲徹底摧毀者，且吾人於處理意大利問題，亦應時存此心。余敢斷言吾人之戰略與政策，已經事實之證明，余願向國會表示，將來當更有事實，可證吾說。凡經預慮而可以避免之重大錯誤，吾人均不能犯，凡因可以避免之，虛置失當之故而造成之晦暗途程，以致吾人必須忍耐到底者，吾人均不能再使其長此延延也（嗚呼）。

堪逆境的壓迫，聯合國家在海洋空三方面的軍事優勢，已在適當的時機，顯用於適當地點。希特勒拒絕以充分的援助，拯救墨索里尼，其實西面島上希特勒的軍隊，曾盜竊意軍的摩托化裝備，致使意軍潰退維谷，除投降外，另外沒有路可走。德國又重新施行它在蘇聯戰場以及由埃及經利比亞、的黎波里，最後在突尼西亞投降的長途退却中，幾次所幹的慣技，再度出賣它意大利盟友了。墨索里尼已屆臨他所不願的結局，就是「大事去矣」！他已能見到正義的長臂的暗影了。但是他和他連的法西斯黨徒，都將遭受審判，並因他危害人類的罪行而受懲處，任何罪行，都不容以「辭職」的手段卸卸責任。我們對於意大利的條件，仍和我們對於德日的條件相同，那就是無條件投降。

不容許法西斯殘留

我們在任何方面，都不致於和法西斯主義談商，我們不容許法西斯主義有

赫壽的殘留，意大利最終必將重新建立它自己擔任這工作的，就是意大利民衆。他們將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基本原則，選擇他們本身的政府，同時聯合國家也不致遺留墨索里尼希特勒特遇它所佔領各國的方式，就是說據掠和飢饉的方式。

我們已在西西里島協助意大利民衆，我們因他們的誠誠合作，正建立並維持當地的安全與秩序。我們現在正解散使他們在法西斯暴政下的機構，我們現在正供給生活必需品，直至它完全自給爲止。今天的西西里民衆，確是多年來第一次享受它本身勞力所生產的美果，他們能食用他們所種植的，而不是爲法西斯黨徒和納粹黨徒所盜竊，在納粹法西斯或日本軍閥佔領的每一國土中，人民都已被貶至奴隸的地位，我們決心爲這些被征服的民族，恢復人類尊嚴，使爲本身命運的主宰。有言論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至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已開始進行這一語言了。

◆西西里和意大利戰事進展情形

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戰事，正在進行中，這一戰事，必須繼續進行，直至意大利民衆認識在一迷失的途徑中，繼續作戰的無益而後已。

（意大利民衆對於這一途徑，從未衷心贊助或擁護）我們計劃北非戰役以來，已一年有餘，自從我們計劃西西里戰役以來，也有六個月了，我自己承認我有一種不能忍耐的興奮，然而我認爲我能瞭解部份人士也能瞭解。在準備任何大規模海陸軍作戰方面所必需的時間是什麼？我們不能僅靠下電話機，就命令在下週發動一新戰役。舉例來說，在進攻北非軍隊之外，還有千數的船艦和飛機，保衛漫長而危險的海路，運輸兵員裝備和供應品前往進攻的地點，此外還有鐵路，與公路線運送兵員和軍火，前往登船的海港，還有工廠礦場與農場，生產各種物資，還有訓練營訓練軍隊，使能了解如何完成他們在海灘沙漠及土地上所將遭遇的奇異困難和危險的工作，在進攻西西里時，這一切工作，又須重復做。

此外，還有空軍攻擊的因素存在。因我們已能利用北非做一根據地，來「軟化」西西里的登陸地點和防禦陣線，以及意大利的供應線。最初進攻西西里的軍力，包括船艦三千艘，裝載美、英、加拿大及法國等國軍隊十六萬人，附帶車輛一萬四千輛，坦克六百輛，大砲一千八百門。此後每日每夜開往增援的軍隊以千計。計劃西西里戰役時的謹慎，目前已經獲得回報，因

爲我們在兵員船和物資各方面的損失，都極低，遠低於我們所預計的。

我們對於參加這次戰役的官兵的精良技術，與無上英勇，都覺得足以自豪。敵方最堅強的抵抗，是英國第八軍（包括有加拿大軍在內）所在的戰線上，然而這一偉大的作戰力量，並未感到任何新經驗或威脅，德軍在延遲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的一小時作戰中，都付出極重的代價。美國第十軍在西西里島外的海灘上，突然登陸之後，已經以創紀錄的速度，掠過全島，進至巴勒摩，我們的軍隊中，有若干以前都沒有作戰經驗的，然而作戰時則有如久歷沙場的戰士，戰場上各路軍隊聯繫的緊密，和全部戰役計劃的嚴密，應歸功於艾森豪威爾將軍英明機智的領導，肯寧漢、亞歷山大、泰德爾將軍的處理海陸空軍活動的複雜細節也已經竭盡了智力。

英國民衆在這一戰爭中的無畏的作戰精神，已表現在邱吉爾首相的歷史性言行，全世界都知道美國民衆對他的觀感是怎樣的。前途還有更大的戰鬥，我們和各盟友將併力以赴，一如我們進攻西西里一樣。我們將協力繼續作戰。

今天我們生產的生產，幾使人難以相信，今年我們建造商船一千九百餘萬噸，明年我們的產量，將超過二千一百餘萬噸。我們必須瞭解在這次戰爭中，我們除橫渡大西洋的航運外，還須在阿留申羣島，在遙遠的西太平洋，在印度和在南美洲海面作戰。

數月以來，我們禁擊沉的船隻，一天天少了，而我們擊沉的敵艦則一天天增加，我們希望能長此以往，但我們也不能作這樣保證，我們必可有一片刻的疏忽。

◆蘇聯抗戰拯救了世界

蘇聯抗戰拯救了世界，境進行，我們和英國對於蘇軍的攻擊，能有所貢獻力，實在使我快慰。

蘇聯的成就，證明對它作任何預言，實在是危險，這一事實，已經迫令神祕戰略的直覺大師希特勒認識了。

最初德方所發動的短促攻擊，是鼓勵德國民衆的最後孤注一擲的企圖，蘇軍不爲所惑，而逕自執行它自身進攻的計劃——就是和盟國全部攻勢戰時相配合的計劃。

蘇聯人民和軍隊，在新大林委員會長領導下所表現的熱忱，決心和自我犧牲

種的精神，是前所未見！我們對這拯救自身因而協助全世界處於納粹威脅的國家，當樂於在未來世界中和它締結良好鄰邦及誠懇的友朋。

在太平洋方面，我們現正自阿留申羣島以迄菲律賓進攻日人，我們在該區也已採取主動，並且不使它喪失。對日消耗戰的發生作用，已日益明顯，日方損失的飛機和船隻，已超過它所補充的。

繼續進行海軍的消耗戰，將使日本從緬甸暹羅海峽殖民地起，通過荷印以至新幾內亞東部所進門漫長的戰線後退，我們有理由相信日人的船隻，不足以維持其外國據地。

◆太平洋實力不斷增長中，日方在太平洋上的計劃，倘是作長久之計，以鞏固其對菲律賓羣島內的資源，那麼母寧在目前立即修改它的計劃的好，我提出這一點，是對他們有幫助的建議。

◆不消一切代價，加強援助中國。我們應以飛機和重要作戰物資，供應蔣委員長麾下的英勇的軍隊，并且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強緊縮。我們應使印度經緬甸通中國的陸軍供應線，雖然敵人想加以阻擾，但仍繼續保持，我們在緬甸上空，已從日方手中奪得主動，現在仍享有優勢地位。我們現在正轟炸日軍在中國、越南、和緬甸境內的交通與供應線及基地。

◆但我們在對日戰爭中，應主要目標遠達，我們當於一年以前，我們距離歐洲戰場的任何目標，也多麼遙遠，我們現在正向前進，佔領陣地，使我們在適當的時期，能夠從南北西東，進攻日本本島。

◆我們如欲使我們的勝利能夠經久，並且能夠在事實上獲得我們一份力量，建立無負於戰時犧牲的和平世界，那麼北非和西西里所賴以獲勝的續戰計劃，仍屬必要。

◆聯合國對於戰後世界的主要目標，大致同憲，他們也同意現時尚非對和平條件未來細節進行國談判的時候，我們必不能決定得一個界限，以及解決世界每一部分的每一政治紛爭，以致贖日持久，而給地處子敵人的壓力。目前重要的事情，是進行戰爭，獲致勝利。

◆當我們於集中全力，爭取軍事勝利的時候，我們並不忽視計劃未來，不願略使過世更能樹立良風美俗和正義的自由。

戰爭的久暫，有賴於前線和國內各方全副全副的努力，所有努力，應命一體。

美國士兵，不願有年戰的必要，但他們如果果疏忽片刻，或將喪失他已已的生命，和犧牲他同胞的生命。打倒墨索里尼及其黨徒的計劃，大部已告成功。但我們仍須打倒希特勒及其黨徒，與東條及其黨徒。我們無一人認此為輕而易舉的事，我們還須盡其本土打倒希特勒和東條。但這事更需集中全國的力量，天才配獲智，我們必須以美國的全國力量，智識和意志，力備於戰事，決非虛言。我們真正是一個大而富庶的國家，但人而富庶的程度，還不能聽命於軍事機進行，以致浪費物力和生命。

我們非獲得全面勝利，決不罷手，這是我們前線每一戰士的決心，這必是美國國內每一人民的決心，將來亦必如此。

(上接三九九頁)

不應該忘却：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盟友和從德意兩國國際盜劫的夥伴，在意大利就由希特勒軍隊和德國秘密警察特務來扮演。也不應該忘記：希特勒德國和意大利的同盟，依然存在，依然有效。墨索里尼的解職，不過是在走向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清算的路上第一步，不過是在走向這個最重要的希特勒附庸的最後軍事敗北的路上第一步。

德軍在蘇德戰場上一九四三年攻勢的清算，已給予希特勒以新的打擊。他的盟友的破產，就又給予了他一個打擊。這些打擊以後，必將接續給以超過多的打擊，直到整個希特勒統治完全崩潰而後已。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毒人——的沒落，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證明正在瀕於不可避免的總崩潰的德意聯盟中，已呈現出最深刻的裂縫。目前的形勢，迫切要求反希特勒聯盟增加對希特勒德國打擊的數量，以便使最後勝利的日子更接近些。

蘇聯報紙論：

意大利政變

墨索里尼去了

法西斯制度還存在

消息報論：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

意大利的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乘政二十一年以後「辭職」了，希特勒的意大利夥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趨於破產了。

絕不能說這件事是出人意料的，正相反，只要考慮到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民已被他們的不祥的才子——法西斯的「領袖」，引導到什麼境地來了，那麼，這事件本來就可以意料得到的，可以預先看得出來的。

墨索里尼的下野，只是顯示出法西斯陣營中的危機，已經變得那麼深刻了，希特勒的最親密的盟友，對於在他們放手幹起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軸心」強國的迫於崩潰的敗北，已經領悟到什麼程度了。

墨索里尼的下野，首先就證明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已告破產。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義在理論與實踐方面的「創始人」，就是他，把意大利帝國主義擴張的貪婪，具體表現成法西斯組合同盟國家的形式，在國內有黑衫團的獨裁，而在意大利外部，就對毫無防禦的國家，作強盜式的入侵。

由進攻剛比西尼亞，由竊佔阿爾巴尼亞，由武裝支持西班牙法西斯頭目佛朗哥，墨索里尼就僅僅于第一個開始把新的世界大戰的暴力，放縱起來了。

帝國主義的擴張，對外領土征服的計劃，妄想使那連凱撒大帝，都沒有夢想到過的，那麼大規模的大羅馬帝國復興起來的精神錯亂的迷夢，就形成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靈魂。墨索里尼的全部對內政策，以及他的所有國際

冒險，都是服從這個目標的。

到了去年秋天，意大利報紙又出面公佈了吞併主義者的要求的綱領，而「領袖」的那些狂妄叫囂的走狗們，什麼東西不要攫取呢？他們要求尼翁和薩伏瓦、科西嘉、馬爾他，和達爾馬提亞，他們要求橫貫撒哈拉沙漠的鐵道，以及從大西洋岸經過尼日利亞，由乍得湖畔通到非洲大陸內地去的大路，他們要求對巴爾幹各國以及對土耳其一部份領土的統治權。

墨索里尼製造出法西斯主義，來作為推行這種強盜帝國主義政策的工具，而且具有充分的理由，看出了希特勒在他的活動的最初階段，是他自己的學生，雖然，在胃口方面，在橫行霸道的強盜手段方面，以及在社會的煽動宣傳方面，「學生」不久就勝過他的「老師」了。

墨索里尼被譽世公認為「法西斯主義之父」，而且很有理由地曾經說過：「墨索里尼只有『跟法西斯主義一同』才會沒落的。而今，黑衫團的「領袖」已告沒落了，他在他的破產文件上，捺上他自己的鐵印，而這決不是他個人的破產。這是由廿年來的努力所建立的整個意大利法西斯制度的破產，這是整個厚顏無恥的帝國主義者的法西斯主義綱領的破產。

把意大利引導到軍事冒險的絕路上來，使意大利人民供希特勒「徧淨天」(註)的總御，這樣胡幹把領土方面的所有「收穫」，完全喪失了。恍惚到迫於崩潰的軍事總崩潰，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就崩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拚命想利用「緊急措施」來自救，當災難的魔影向著意大利的時候，墨索里尼卸除了法西斯黨的領導權，而安置一個「強有力的人物」——黑衫黨員史科薩，做法西斯機構的首長進行「清除」法西斯隊伍中的「搖動」份子，拚命想利用殘酷的報復和無情的手段，鎮壓繼續高漲的不滿情緒，妄想這樣子來挽回頹勢。然而這是無濟於事的，法西斯主義的解體，發展得更遠而且更深刻了。兵工廠中已開始罷工，農民都把谷子藏匿起來，動亂在意大利人民

大眾中正在蔓延着。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已趨於完全破產，而墨索里尼在他所建築的法西斯主義大廈勢必倒下來壓在他的身上以前，就不得不先溜之大吉了。

意大利「領袖」舞台時的局勢的特點，在於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已趨於完全破產，但是還沒有被消滅掉，決不應該懷抱着幻想，以為法西斯主義自動地隨着墨索里尼的下台，一同消滅了。須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德國的同盟，證明了對意大利是致命傷，然而，正是這種同盟，必將把希特勒擊倒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大廈，再支持住一些時候。這是因為有德軍駐在意大利的領土上，而當他們駐在那兒的時候，就形成相當的勢力，即使沒有墨索里尼，也會支持住法西斯主義的，使意大利對德唯命是從的軍事同盟，只恐還存在，希特勒就還有繼續使盟國在他的軌道內轉轉的可能性。在意大利還沒有發生過類似民主的反法西斯的政變，墨索里尼的自願「下野」，很可能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頭目，企圖由這種「自己禪位」的行動，來挽救法西斯主義，決不能認為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解體，是一件已經完成了的事實，墨索里尼想山窮水盡來拯救自己，這並不是由偉大的成功出發的，他只是想跑在事變的前面罷了。法西斯主義還沒有被消滅掉，還沒有被打垮，不過已趨於破產了。

這種破產，是由法西斯意大利在過去幾年來所一貫地受到過的，和正在受着的軍事潰敗所引起的。意軍曾在阿比西尼亞，在蘇德戰場（意大利精銳的第八軍，在那兒被打垮了，陣亡的和被俘的幾十萬的人，被遺棄在戰地上），在北非（在利比亞、的黎波里、唐尼亞、突尼西亞），連續不斷地吃敗仗，盟軍在西西里所給予的打擊，把戰爭帶到了意大利本土，這只是「領袖」迫使意大利人民吞飲的災難的血杯中的最後一滴罷了。這些軍事的潰敗，一直打中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心臟，因為正是國際強盜對外的要求，變成了它的內在的具體。

而因為意大利法西斯主義還沒有隨着墨索里尼的下野，一同被消滅掉，反希特勒聯盟的各國當前的直接任務，就是要把它解決掉，只有出盟國的兵力，不僅給予意大利，而且更給予希特勒德國——「軸心」的「元兇」，以新的強有力的打擊，才能夠把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解決掉。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崩潰，只是才開始。法西斯螺旋的第一環，被血灑破了，已經突然折斷了，必須而且一定要把希特勒集團中的其他各環也相

體折斷。

更加生動地而且充分地證實了斯大林的名言：整個「鐵幕法西斯陣營，正經歷着嚴重的危機，而向着它的崩潰」。從西方和東方，再加以幾次強有力的打擊，這鐵幕陣營，就會變為既成的事實了。

今天，希特勒的戰車，一個輪盤已經打破了，這樣勉強向前推行，它的「軸心」隨時都有突然折斷的危險。

但是，希特勒納粹主義——這個更加危險而且更加兇惡得多的敵人，表現成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者之中最富於掠奪性的帝國主義者——德國帝國主義者——沒有被打倒以前，干戈就一定繼續在世界的上面昇騰，而決沒有一個人能夠安於已得的成就的。

希特勒陣營中的危機，正在惡化而加深，紅軍給予德軍的打擊，德軍在蘇德戰場上七月攻勢的清算，使希特勒德國致命的大難臨頭的時候，更接近了。紅軍給予德軍的打擊的數量，也反映在下面的一個事實中，就是當希特勒的盟友和家臣墨索里尼處於性命攸關的時候，希特勒竟沒有能夠用軍隊去援救一下。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創造人，已遭到大難了。墨索里尼的下野，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就使反希特勒聯盟的各國，使我們的盟邦，必須加重對希特勒德國和她的附庸們的打擊的數量，以使敵人徹底敗北的時間早些到來。

（註）「濕淨天」見印度神話，威希魯神的第八化身，克里希那的稱號。每年的紀念日，用巨車載他的偶像遊行各處，相傳有信徒自伏地或被車輾死的，得昇天國。在這里借喻以人供犧牲的信仰或制度，就是指希特勒的納粹制度——譯者

紅星報論：

法西斯的制度還存在

紅星報評意大利事件稱：墨索里尼的下野，表示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但是，如果像一些外國觀察員所想的，以為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已經不復存在，那就錯誤了。法西斯主義已趨於破產，但是還沒有被消滅掉，墨索里尼——法西斯制度的建立者——已經去了，但是法西斯制度依然存在。

（下接三九七頁）

真理報論：

墨索里尼是怎樣下台的

意大利人民的血脈的壓迫者，法西斯運動的祖師，對現行戰爭的善觀和悲憤首先應受制裁的兇兇中間的一員，誰能說政治是「自由」的。法西斯的羅馬精神中心，已受到了使它傳播動搖的一個打擊，已向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滅亡和意大利人民的復活，跨上第二步。

一個人應該在心理：在法西斯的法律和實踐中。「假補」的辭彙簡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毒藥，相反地法西斯法律規定了皇權是應受法西斯大會支配的。這個皇帝，既許了而且用自己的皇權，袒護了專制的暴力，以及法西斯主義的這反民權和這反民族的政黨，已廿年了，如果說，墨索里尼就是被這個皇帝逐斥的，那麼這件事只證明已經動搖到國家命脈的真正的基礎的重大原因才越發說明。

第一個主要的而且具有決定性的原因，便是意大利所有各階層民衆的覺醒，他們都確信墨索里尼的整個政策，已經趨於完全破產了。

黑衫軍目的垮台，直接發生在希特勒軍在蘇德戰場上發動的大規模進攻失敗之後。這樣同時發生，絕不是偶然的。

意大利的危機的各個層，墨索里尼的軍隊從東非被逐退了，在利比亞邊境被打垮了，被逐勇的希臘人民打敗了，他就穿上希特勒的供役版。自從頭幾年以來，墨索里尼想挽救他的統治，獲得萬能，想挽救他自己和他的國賊，是得因爲所犯的那

惡而自食果報，他的一切希望就完全要寄托在德國帝國主義軍隊的勝利的前途上，而德國帝國主義軍隊的勝利是在德蘇兩年的過程中變弱變悲觀，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也越趨越明白地意識到困難的頭了。所有非洲殖民地的喪失，突尼西亞的敗北，最後戰爭的意大利本土的轉移，已加緊了士氣沮喪的趨向。但是，毫無疑問，到底還是一九四三年德軍夏季攻勢的失敗，以及希特勒軍隊在蘇德戰場上的處境越趨越危險了這一個事實，是在這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

參照這些事實看來，就很明顯：墨索里尼和他的政府，決不能夠指望得到總方格魯的軍事援助，來抵禦盟軍空中和陸上的進攻。當問題已這樣提出的時候，墨索里尼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他的垮台就成爲不可避免的了。

在戰爭進到意大利本土的時候，法西斯政府，面向着國內勞動羣衆和反法西斯的反抗派越趨越高漲的活動，以及前方軍隊的實力的弱點，抵抗成爲不可能了。

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會談，希特勒拒絕援助意大利，除了這個以外，成爲瓦解的直捷的原因的，還有巴爾幹的投降，和羅馬的破壞。

在全意國所有各大城市中，都舉行反政府的示威遊行。
法西兩軍依舊存在。
組織新政府的人物，並不會表現出是法西斯帶

的敵人，他們對法西斯帶是一向合作的。墨索里尼和他的匪幫，已從政治舞台上不見了，但是一點跡象也沒有表示出，在他不得不爲他的罪行受到懲罰以前，他真正不爲爲害。當意大利和德國的公約是有效的，軍事行動還在繼續着，被法西斯主義所廢止的民主自由，一種也沒有恢復，而法西斯政權形式上是被解散了，可是所有現行的組織自保保留着。新政府決定「在戰爭結束以前禁止成立新政黨」，這一件事便是根據了。

由此可見，作爲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以及作爲希特勒唯命是從的軍事力量的是個海狗頭主義，依然存在着。法西斯主義已受重頭一棒，可是離開消滅還遠得很呢。

另一方面，在國內因素必須指出。
墨索里尼多格涅奧元帥聲明「戰爭繼續」，這是不夠的，必須要有法法打仗。但是，從這極端點看來，法西斯意大利就絕對沒有辦法。軍隊正在解體，人民要求和平，在這種情況下給予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以決定性的一擊不振的打擊，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第二個因素，是和意大利的內部形勢有關的。墨索里尼垮台，已把阻止意大利廣大民衆階層參加鬥爭的障礙破除了。德軍儘管會命彈壓，德國在米蘭備管用砲擊羣衆，在意大利所有各城市中，實際上都發生強有力的示威遊行。

法西斯主義還沒有被殺死，它還拚命想繼續發政，但是冰已破，就要溶入水中了。
墨索里尼的垮台，使盟國有機會對希特勒德國——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的主要敵人——集中打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敗壞，爲重指出了：把希特勒的暴政迅速消滅的任務，是一定辦得到的。

意大利人民的聲音

意五政黨聯合宣言
倒退的路是沒有的！
意共產黨正為民族解放而奮鬥

意共產黨等五政黨聯合宣言

主張嚴懲法西斯罪魁

(合衆社二十六日伯爾尼電)米蘭科里亞報的社論說：昨晚米蘭城沒有二個人睡著。示威隊伍經過報館的門口。示威隊的代表要求本報請政府立刻釋放政治犯。都靈通訊社第一版發表了意大利憲政民主黨、共產黨、自由復興黨和社會黨的聯合宣言，主張嚴懲墨索里尼和其他主要法西斯領袖。

(新華日報莫斯科二十七日專電)伯爾尼訊，據德意志電台「自由米蘭」於七月二十六日廣播說：我們兩年來鬥爭的兩個目的之中的第一個，已經達到了。這是意大利解放的第一步。墨索里尼倒了。這個人對我國的一切不幸和災難負有責任，他把我們拖入戰爭，他對我國的敗仗和飢餓負責，他現在是從政府之中撤出來了。墨索里尼是被人民的怒火，軍隊和全國的憤怒所淹沒的。墨索里尼倒台的日子是全國的吉慶節日。全國各地，自由地表示你們的熱烈的慶祝吧。為了紀念勝利，高舉國旗，走到大街上和廣場上，在一切鄉村和城市里組織羣衆的歡樂的示威游行吧。墨索里尼的暴政已經結

束了。意大利的再生開始了。現在必須完成意大利的再生。

我們向勇敢的羣衆致敬，你們爲了和平，以示威游行，以國防工潮的停止工作，罷工和破壞行動來反對法西斯政府，抵抗法西斯殺人犯，逼使專制魔王下台。我們向西西里省的官兵致敬，你們拒絕墨索里尼和德寇的誘惑，舉起白旗，表現了全體國民的意志，加速了解放時刻的到來。我們向一切了解民衆的意志的人們致敬，你們以上層行動幫助了推翻專制魔王。有是時，我們忘記，我們在鬥爭之中所得到的勝利並沒有完結。除非我們能將德寇和平，我或是不會得救的。在我國重新獲得我們一切自由以前，勝利是不完全的。

我們現在亦向對德寇的危險：德寇方面會逼迫我們繼續戰爭，第一切代價來阻止我們議和，甚至準備佔領我們的國土。第二個危險則是國內的法西斯黨徒，希特勒的走狗以及殺人犯對於意大利的威脅，他們不願意屈服於民族的意志之下，準備以暴力恢復墨索里尼的權力，迫使意大利繼續爲德國而戰，直至最後的一滴血。

開始和平談判。這是對人民政府的第一個要求。

第二、現在在意大利的一切僑國大必須離開我們的祖國，在德國的一切意國兵士和工人必須召開，必須採取嚴緊迫的步驟。

第三、要粉碎德寇法西斯統治，墨索里尼復辟，做開大門給德國人的一切企圖。法蘭西必須解散，民衆必須解散並組織。爲外國服務的一切人，從墨索里尼起，必須逮捕。除非做了這些事，人民是不會相信新政府，對將來有自信的。

公民們，兵士們！成立聯軍，佔領法西斯黨的機關，驅逐德寇法西斯的人和外國的走狗，把德國人趕出意大利，爲了停戰，和平和自由，立刻清算敵心！

倒退的路是沒有的！

——意人向新政府提出最後要求——

(新華日報莫斯科七月三十一日專電)伯爾尼訊，「自由米蘭」電台廣播說：在對德寇墨索里尼倒台五天之後，巴多格利奧政府又開始了對德寇利爲止的危險的老調了，這是不應許的，不能容忍的事實。巴多格利奧和意王是不應許的，不應許的，全國的意志，繼續墨索里尼時代的政策的政策呢？如果國家元首和部長們的主張是打倒墨索里尼的，那麼全國人民決不會讓自已不滿意，決不屈服，而且一定要以一切手段，爭取立即停戰。

始知平談。

戰爭有什麼要緊？去呢？爲了要讓法蘭西和巴爾幹諸民族，繼續服從德寇嗎？但是這不可恥的強盜政策是墨索里尼的政策，它把戰爭帶到了我們的家門口，而人民和軍隊是反對戰爭的。墨索里尼復辟之後的意大利，在邊境之外的各國中並沒有要緊的事實。必須趕速使政府以及爲德國的利益服務的警察制度。必須和法蘭西和巴爾幹諸民族建立友誼

的關係，設法重新取得德國所奪去的市場，由於法西對德助，德國奪去了我們的市場，使我們的工業受到極大的損害。

爲了什麼要繼續戰爭呢？也許是爲了援助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一部份，而以德國的幫助來肅清道路，使貪污賣國的高官厚爵的人們取得權力吧？全國人民將像一個人那樣站起來，手執刀槍，反對這種企圖，將墨索里尼王退位，巴多格利奧下台。統治者們必須懂得：倒退的路是沒有的，走不掉的。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義必須斬草除根，它的領袖們必須審判定罪。解放法西的混亂人物就是罪惡，是違反全國公意的，人民絕不允許。

希特勒的命運至少要和墨索里尼相同。納粹軍國主義是對於意大利的致命的威脅，這個威脅正在千鈞一髮之際，特別是因爲法西斯的統治機構早已變成德國的附庸，它在納粹匪徒之前開放了意國的邊境。一切爲了消滅德國的威脅，爲了削弱德國帝國主義！希特勒主義是德國傳統的征服和劫掠政策的最明顯的表徵，必須以我國人民的力量來協助掃滅希特勒主義。

巴多格利奧政府所說的「戰爭至勝利爲止」，是對於意大利民族和英勇的人民的莫大侮辱。把墨索里尼掃進垃圾堆的，是人民。意大利今天唯一可行的政策，是和平和廢棄使我們陷入的，我們要求進行罷工，必要時就戰鬥。人火待發，準備一奉命令，在數分鐘內，就可開出德國牢籠的屈辱的條約。爲了保持意大利的主權，民必須把覺悟性提高到最高限度。皇帝及其政府必一般都相信這一定是準備在投降時免爲德方所和爲了使意大利恢復成爲自由的強國，就必須立即和

意國共產黨 正爲民族解放而奮鬥

（新華日報莫斯科八日專電）伯爾尼訊，自由米爾電台廣播說：全國許多地方，主要是都靈和羅馬的民衆，對意大利共產黨頗爲關切。我們有鑒於此，特請某著名領袖解釋該黨的現狀。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官方羅馬電台發動宣傳，說是我國有赤化的危險，你的意見如何？」他答道：「這是法西斯的花樣。廿年以來，我國人民一直在高壓之下，民族中最莊嚴的感情在屈辱中。而現在，當全國起來結果罪惡的匪徒，以爭取自由的時候，有的人以爲這是共產主義。這些人正是胆怯、意志薄弱而荒謬地自相驚擾的人們，就在這些人之中，墨索里尼會找到同謀犯，而墨索里尼也就由於這些人而依然還有權力。今天，現政府也似乎在這把鬼話作爲唯一的手段，以引起人民之間的混亂，破壞民族解放和意大利復興而戰鬥的許多力量。國會盡一切力量以掃除法西斯主義，使它成爲垃圾堆。黨站在这个鬥爭的最前列，深感榮幸。但是和黨站在一起鬥爭的，有幾代表現在一切黨派的人民和團體。因此，把最近給予法西斯主義的打擊認爲是共產主義運動，這是荒謬的。這是一個民族運動。在這之中，黨也盡着一切力量，而且將繼續盡一切力量以加深這個運動的本質，那就是說，要把全國一切活躍健康的力量團結在這個運動之中。黨並沒有稱霸。他們爲了民族的利益，在這個運動的隊伍之中作戰，唯一的目的是在團結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現在人民運動並未停頓，人民的迫切要求也並沒有滿足。」回答另外一個問題的時候，他說：「黨的主張，也就是誠實地希望從奴隸之中救出意大利的人們的主張。爲了解放，我們必須結束戰爭和法西斯主義。這就是黨的主張，也是唯一的主張。誰要嚴厲地以爲這今天爲社會革命而作戰，他就錯了。黨希望在締結和平和消滅法西斯主義之後，意大利應該有民主政治，允許民族和人民決定並指導國家的命運。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和其他一切民主和民族的力量在現在和將來聯合戰鬥的緣故。而首要的事務，就是和平必須成立，法西斯統治的一切殘餘必須消滅。這是人民的意志，也是我們的意志。假如誰要散佈無稽之談，設法引起對我們的不信任，使我們孤立在其他民族力量之外，這樣來阻礙民衆運動，來繼續爲了希特勒而作戰，來在意大利全國保存法西斯主義，那麼他是算錯了。這是不行的。法西斯的欺騙和說謊的時代已經永遠地過去了。」

了。最好的保證，就是立即和同盟國媾和，廢棄鋼鐵協定。在這之前，人民將仍舊留在大街上和廣場上，停止工作，不惜任何代價爲和平而戰鬥。

（中央社瑪德里七月三十一日合衆電）據法蘭西方面所傳意大利境消息，意大利北部若干城市，續有要求和平的示威運動，俾佛倫倫、羅馬、那不勒斯等處德意軍隊之間所發生的事件更甚了，軍官之間，也多發生衝突。示威運動有婦女參加，其中還有抱小孩兒的。他們高呼「國王呀！我對和平，這席談判。巴多格利奧呀！立即行動，我們不願城市再受轟炸」。傳羅馬人特別感覺非政府向意投降，否則必無法脫除轟炸的危險。羅馬各教堂每日廿四小時都掛滿羣衆祈求和平。請傳意海軍已將各軍艦衛兵的數目增加一倍，並且都已升

在數分鐘內，就可開出爲了使意大利恢復成爲自由的強國，就必須立即和

蘇聯「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

論第一二戰場

目前的形勢，是愛好自由的人民可能在最近的將來戰勝希特勒德國。這個變化是在戰爭的過程之中獲得的。只要下列幾件事實就夠了：紅軍冬季攻勢的光輝成果，德軍在斯大林格勒、在頓河、在高加索的受挫，希特勒的「同盟國」軍隊在蘇德戰場上被擊潰，突尼西亞德意軍隊的敗北，同盟軍在西西里島的成功，墨索里尼的倒台，表示着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和打擊意大利，使它退出戰爭的前途，希特勒對蘇夏季攻勢的失敗，以及紅軍在奧勒兩方面的成功。敵人的陣營之中正經歷着重大的危機。最後勝利的先決條件已經造成了。自從戰爭開始以來，擊敗希特勒德國的條件，從沒有像今天那樣有利。

戰爭史知道坐失良機是什麼意思。在那種情形之下，勝利化為烏有，戰爭拖長了，人民不得不從事無盡期的不必要犧牲。而今天，全世界千百萬人民以極大的關心問着一個問題：及時地利用打敗希特勒德國的可能性的事情，都已經做了沒有？這也就把歐洲第二戰場的問題明顯地擺出來了。

希特勒侵略歐洲那邦及蘇聯，使蘇英美成立了聯盟。任何軍事聯盟的目的，是爲了擊敗共同的敵人而採取共同的武裝鬥爭。而反希特勒聯盟的成立，是爲了反對法西斯及其合作者，擊潰它們，以獲得永久的正義的和平而進行武裝鬥爭。應該希望聯盟各國能夠共同地進攻敵人。至於反希特勒聯盟共同鬥爭的道路，是由德國的地理和軍事形勢，由反對德國侵略的總的歷史經驗來決定的。那就是說要從西方和東方以鐵鉗夾擊希特勒德國，逼迫它兩線作戰，分散它的兵力和後備隊。

已經三年了，蘇聯單獨地對抗着希特勒的主力軍。由於歐洲沒有第二戰場，使德軍能够在蘇德戰爭的初期獲得暫時的成就。歐洲第二戰場沒有開闢，使法西斯德國在一九四二年免於敗潰。不僅如此。沒有第二戰場，這使希特勒能够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把所有的後備隊投入蘇德戰場，在實力方面造成很大的優勢，在西南線到達斯大林格勒和格羅茲尼附近。最後，德軍所以能在今年還敢作新的夏季攻勢，唯一的原因就是沒有歐洲第二戰場，使他們能够

把一切力量集中到東線。

雖然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間，莫洛托夫和英美政府領袖在倫敦和華盛頓的談判所發表的兩次正式公報中曾經宣佈「關於在一九四二年內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緊迫任務，會成立完全的協議」，但是第二戰場在一九四二年內並沒有開闢。當時曾經有過肯定，說是無論如何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季將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然而一九四三年春季到了，第二戰場並未開闢。英美軍隊僅限於在北非掃蕩德意軍隊。一九四三年二月間，邱吉爾在下院報告他和羅斯福會談的結果以及卡港會議的決定，說道：「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詳盡的行動計劃，以決定武裝部隊的配備和戰鬥的方向，而且我們打算在今後九個月內按照我們的政策實現這計劃。」由此可見，在卡港會議中，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間的盟國軍事計劃中，英美盟國曾經決定在今年十月以前實行「詳盡的行動計劃」，其中自然包括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九個月快要過去了，然而歐洲還是沒有第二戰場。

蘇聯人民實際上單獨地抗擊着侵略歐洲的希特勒的一切異常巨大的戰爭機構及其附庸，曾經在鬥爭的祭壇上爲了盟國共同的目的，供獻了重大的犧牲。德軍官兵消滅在蘇德戰場上的數目，遠比其他任何反抗希特勒鬥爭的場所爲多。過低估計我們盟軍所進行的軍事活動，過低估計英美空軍多次襲擊德軍的很多重要性以及我們盟國對我們的軍用品和軍糧援助的重要性，那是錯誤的。雖然，在利比亞前線，和盟軍對抗的僅不過四個德國師團和十個意大利師團，而在西西里，只有兩個德國師團和若干個意大利師團。這些數字說明了我們英美盟軍還沒有真正地和希特勒德軍交鋒，說明了組織第二戰場的事情尚未實現。

有些人努力企圖證明不但第二戰場已經實現，而且「第三」甚至還有「第五」「第六」戰場（包括潛艇和空戰等）都已經實現了，那是不必多加討論的。歐洲第二戰場是斯大林格勒在一九四二年秋天所說的戰場，要能够牽制德國約六十個師團，德國的盟軍約二十個師團。第二戰場的意義，就是說我

們的盟軍要能够在歐洲大陸的軍事行動中逼迫希特勒以分散其有效部隊，在西線牽制其總上部隊的三分之一或至少四分之一。

歐洲第二戰場可以劇烈地改變戰局，在德境內立刻保證我們的實力大大地超出德軍，這也就是歐戰第二戰場可以決定地縮短戰爭時間，是歐洲第二戰場是一九四三年內打垮希特勒的關鍵。

有許多藉口，迴避着西歐第二戰場的遲不開始，譬如有人討論着事實上不存在的「大西洋堡壘」，有人討論着所謂「無法解決的」德奧問題和「登陸的冒險」。可是「大西洋堡壘」的「不可克服性」僅不過是存在在那種相信這種新發明的人們的想像之中，如此而已。至於某些人對於討論的德奧問題，甚至說話的人也未必確信，已經一再被事實本身，被同盟國特別是美國船隻的急劇增加，被發表出來的數字所駁倒了。在盟國軍隊和軍器去年在北非的登陸以及在西西里登陸作戰的輝煌成就之後，關於德奧問題的一切論據都應該消失了。關於「登陸的冒險」，一年多以來曾一再有人提起，但這種論據是不能說給希特勒了兩年餘的軍隊擔荷，這個軍隊擔荷着反希特勒戰爭機器的鬥爭的全部重量，爲了同盟國的共同目標，在任何犧牲之前決不躊躇。某幾方面人士——很少是真的——簡直對迅速結束戰爭一節不感興趣，這是不能否認的。

但是按理論說起來，在這樣重要的國家內，對於把私人的自私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顧廣大民衆的利益，不顧在希特勒奴役之下受苦受難的淪陷國家利益的軍火製造商以及其他人們，是決不能給以太多的自由的。幾年以前，在英國職工大會席上，據說有一個當時的部長薩爾·勃拉巴特曾作提議，大意就是讓蘇聯軍隊持有兩敗俱傷，英國不妨坐山觀鬥。這之後不久，英國政府就把這個部長撤掉了。可見他的意見並不是不被注意，而且很明顯地，也並不是沒有正當的估計。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破產，不做證明了希特勒在歐洲的最大盟國的崩潰。雖然崩潰的過程尚未完畢，各種小丑還在意大利舞台上跳躍，但意大利的事變最顯有力地刺破了希特勒的國內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分崩離析，使希特勒獨霸歐洲，獨霸全世界的政權從此更容易走絕路。今年，希特勒德國在蘇德戰場上遭逢空前的困難，紅軍連三地給敵人有力的打擊。但軍佔領西西里快要完成了。意大利除了完全投降之外，沒有別的路。不如此，決不能忘記我們盟軍在地中海可能有顯著的成就，首先是由於紅軍兩年以來對我們共同敵人的主力的英勇鬥爭，由於無畏的盟軍在蘇德戰場上進行的英勇鬥爭。

敵人實施最顯有力的措施。

歐洲第二戰場的問題是這樣重要，因為戰爭是否將延長，新的巨大的犧牲是否難免，都要看這個問題是否解決。

歐戰第二戰場的開闢之點，意思就是說在目前有利的情況下，反希特勒聯盟應採取什麼決定，決計要消滅希特勒暴政以及希特勒加在各民族頭上的戰爭，就是說英美蘇聯盟盟決不允許戰爭延長，決不允許新的巨大的犧牲。人民的覺悟將達到此目的，人民決不讓希特勒不屈不撓的暴政，希特勒永遠剝奪萬民的希特勒以及他所推測他們身上的戰爭。

(莫斯科專電，以浦譯)

投稿簡約

一、本刊歡迎讀者投稿，其內容性質略如下述：

- 1. 發達及解釋抗戰建國的各種政策。
- 2. 對當前國內國際局勢的理論分析。
- 3. 各種學術論著(政治的、經濟的、歷史的、哲學的、文學的……)。
- 4. 對於時局的批評及專評。
- 5. 大後方各地動盪和敵後淪陷區各種鬥爭實況的報導(包括各種建設黨業和抗敵戰況)。

二、每篇字數最好在三千字至六千字之間，最長不應超過一萬字。

三、來稿本刊編者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四、來稿若不能刊登，如附有足額郵票者，一律退還。

五、來稿用何署名隨便，惟須註明真實姓名與詳細住址。

六、來稿一經登載，概以現金奉酬。

七、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請稿附原稿或詳細註明原稿原稿、期數、用版處及著作人姓名，重要稿件請附原稿，以免遺失。

八、來稿請寄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本刊編輯部。

羣衆半月刊

定閱章程

- (一) 定期至少三個月，定費先惠，購票代送，十足通用，價以一元以上者爲限，省用郵票及印花不收。
- (二) 按定請註明期數，否則，由款到後之最近期起寄發。
- (三) 滿期前專函通知，滿期時尚未款定者，即停止送寄。
- (四) 更改地址或查詢，務請將定戶姓名，定單號碼詳細寫明。
- (五) 如因故須暫時停止，請將定單號碼定戶姓名來函通知本社，當即照辦。如有存款，俟以後補寄本刊或即時退款悉聽尊便。但如要退款，必須將原定單寄回，否則，不能照辦。
- (六) 送寄本刊如有遺漏延誤錯亂等情，請即來函通知，以便查明原因，設法補救。
- (七) 非常時期，物價不斷上漲，爲減少虧累，必要時恐須增加定價，惟增價之時，當專函通知讀者，以便補寄定費，如不願補寄定費者，即將期數縮短，幸祈見諒。
- (八) 國內定戶，平寄郵費一律免收，但掛號航空及國外定戶，郵費仍當照加。
- (九) 本市，市郊，直接定閱，專差送達。

優待簡章

- (一) 凡報館書店雜誌通訊社等同行定閱者八折。介紹者九折。
- (二) 本報同人介紹者八折，自定贈他人者六折。
- (三) 凡新華日報定戶，憑定單號碼定閱本刊者九折，本刊定戶，憑定單號碼定閱新華日報者九折，同時定閱本刊及新華日報者，一律九折，以示優待。
- (四) 工友經確實證明由本社聘可者，可另予優待。
- (五) 一次定閱五份以上者八折，一次定閱十份以上者七五折，滿期後個別定閱，不能享此優待。
- (六) 一次介紹本刊五份以上，定期在三個月以上者，除照第四條辦理外，另贈介紹人本刊一份；一次介紹定本刊十份以上，定期在三個月以上者，除照第四條辦理贈介紹人本刊一份贈送時間與介紹定所閱期數相同外，另贈新華日報一份，期限一月，以示優待。

★本章程簡章本外埠均可通用，惟以直接向新華日報總館及各營業分處定閱爲限★

新華日報總館：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電話：四一〇三九 電報掛號：三七七〇

營業分處：成都：新豐街八十八號 桂林：桂林路二十六號

信箱

物價漲落與貨幣數量

游新先生：

很久沒見到你，近來很好吧！

我一位學校裏的朋友，他們弄了一個私朋友的讀書會，常常討論許多問題，很滿意。最近討論二個經濟上的問題，得不出結果，要我設法為他們找人解決，所以只好請你給他們一個詳細的解答了，他們是非常感謝的。問題寫在下面。

1. 信用交易是在怎樣情形下產生的？要有些什麼條件？

2. 物價的漲落可由貨幣數量來決定（不完全是貨幣數量多，物價會漲，反之則落（當然亦不是整個條件）。同樣在信用交易產生後，信用交易大，則物價漲（是否？）反之則落。信用交易數量多，物價亦漲，反之則落（是否？）假如社會上貨幣數量不變，信用交易增大，則物價漲（是否？）信用交易既大，則因信用而吸收的準備金亦大，準備金大，則末社會上的貨幣的數量因而減少，這時的物價該如何來決定呢？

請你詳細的賜予解答，因為他們是需要這樣的。此致
宗峻仁敬上

宗峻仁兄：

你的信收到很久了，因為種種原因，延宕到現在才答覆你，真是對不住得很！

所問二題，敬答如下：

(一) 信用交易，是在商品流通更進一步發展的情形下發生的，是在具有不同情況的商品生產者處在二道的情形之下產生的。要談到條件，那是各色各樣的，以最簡單的關係而言，有一些商品生產者

要較長的時間，則一些商品則較短，有一些商品依賴這些季節，那一些商品則依賴那些季節，有一些商品在市場所在地生產，另一些商品則不能不從遠方的市場輸入，有的商品所有者可以在別一個商品所有者成為買者之光成為賣者，這都是商品生產條件制約着商品售賣條件的最簡單的例子，更詳細說，發生信用交易之條件，須要有貨幣，商品流通擴大了，具有不同生產條件的商品生產者都捲入同一市場，互相發生關係，這是指經濟史上的道理而言的。到了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信用交易成為商場中一種擴大經營的辦法，那就非我們所談的範圍以內了。

(二) 物價的漲落，不應單從貨幣數量一方面去求得解決，在商品生產本身上具有極大關係，而談到貨幣，必須區別硬幣與紙幣之別，以紙幣而言，祇有當它流通量大過於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的場合，才比例着它的數量而下降，要了解物價問題，只作片面的着眼，是不對的。信用交易發生後，物價之漲跌，除了生產條件與貨幣價值之外仍看市場上的供求情形，供過於求則跌，求過於供則漲，如果買賣裏邊有一部份是信用交易，其影響於物價之處，與其說是由於信用，不如說他是由於供求。信用與經濟學上叫做信用通貨，信用通貨是可以節省貨幣之用途的。依這個道理，你所推論的「貨幣數量不變，信用交易增大則物價漲」之說，如果單從支付手段一點做出發，我想，是不合事實的。至於說到貨幣數量因信用的擴大，因準備金之擴大而減少以後的物價，那就要看當時生產的情形與市場上供求的關係了。

游新

羣衆

第八卷 第十三四期

三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理 新華日報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各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局

本刊價目

本期零售	四元
六期	十一元
十二期	二十元
廿四期	三十八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本期零售四元

內政部登記新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東山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渝安路字第一〇六號



勝利的道路

關於每天的報紙，從歐洲戰場到亞洲戰場，我們反動心國的軍事捷報是接連而來，這是戰局光明的轉射；假使從政治的角度去看，我們又未始不於大局光明中看見一抹暗淡。一個正視現實的人，不會只是去那調頭掠影浮光，但亦決不故意抹煞它，而放會用全副心腸去辨別去探究，最後是去消滅它。

就拿昨天報紙所載消息來說，二十五日，蘇聯駐美大使館發表「戰爭與工人階級」的一篇文章說：「戰時的徹底勝利，和平的永久確立，我們已有共同的原則。問題的關鍵究竟在那裏呢？一句話，問題在於如何精誠去實踐這些原則。」

威爾基在「天下一家」裏，有一段對第二次歐戰大勝的沉痛敘述：「在我國進行那一次戰爭之際，我總以為或定說，我們是為着最高的目的而戰，我們大元帥威爾遜曾用流利的詞句和表明我們的目的。……但是等到把這實現現在和約中時，一個革命的障礙便顯出來了。我們發現我們和我們的盟國並沒有真正同意於那個目的，我們的盟國中有些個已捲入一些秘密條約之中，行傳說的縱橫捭闔外交。在另一方面，我也沒能真誠地效忠於我。昭告天下的目的，如我使全世界相信的言談。最後的結果便是大家對戰爭原要爭取的目的，棄若敝屣。」

威爾基這番話，是一個很慘痛的教訓，使我們遭過第二次大流血的命運的人們，要深切覺悟到：光有原則和目的，不能保障勝利，只有精誠的實踐，才能使人類從古未有的劇中贏得新生。

如何來精誠實踐我們最高的目的？我們還應引威爾基的話來說：「我們今天所希望的是：一個聯合

現在反民主和半法西斯份子，正在企圖挑撥與蘇聯敵對的狂妄計劃，阻止蘇聯參加戰後世界和平組織」。二十六日倫敦路透社電訊：「前駐美大使格蘭第，傳已抵里斯本，和英國代表談論停戰事宜」。這消息是緊接著賀爾與佛朗哥談判之後。除此之外，還有以力的和而造謠，廿六日安哥拉路透電也這轉播着：「穩健之胡安薩拉子刻正謀與莫斯利自山德意志委員會接觸。李德諾夫及邁爾基之奉召返國，皆為雙方接洽開端一坦途也」。

像這樣一類的報端，幾乎每天都可以發現，這是我說的光明中的暗淡。特別是非與切實事實，是重要的，但還不夠，我們最迫切需要的還不是那一件一件孤立的來作評論，而是須要分析一切造成這類問題的根源，找出敵人所能利用的誘惑中的細滴資本，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而光明中的某些暗淡，使抗戰走向徹底勝利，永久的和平能夠確立。

問題的根源在那裏呢？我。戰爭沒有一個共同一致贊成的崇高目標嗎？有！我。有三十二個國家贊同的大西洋憲章。我。沒有具體戰敗敵人的堅決誓言嗎？有！我們有敵人無條件投降的莊嚴誓詞。

魁北克宣言

魁北克會議已告結束。羅邱於二十四日發表正式宣言。雖然說此次會議的決定，「僅能在作戰行動中實現」，正式宣言實際上已經把會議的主要內容和決定，向全世界公佈了。

魁北克會議，原來就是英美會議。從宣言看來，此次參謀會議中之軍事討論，大部傾其注意於對日作戰，並實施對中國之有效援助，並決定接受聯合參謀部關於歐亞軍事計劃的建議；對與戰爭有關的政治問題獲得協議；本年底以前將再行協議，可能舉行英美蘇三國會議，關於對德意戰爭決定之各項報告，將提供蘇聯政府；對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之關係，亦曾加以考慮。

據說宣言內容，表現此次會議，一、在英美的團結和一致上，是有收穫的，二、從更多的注意東亞戰場和援助中國說來，是向前邁進了一步。三、從同盟國的世界戰略，英、美、蘇的團結和戰略戰略的一致上說來，則可說和應說的話，確實不少！

這話怎麼說呢？關於第一點，會議的規模和進程及宣言的內容，都是明顯的說明，可不多說。

關於第二點，以此大會和羅邱以往的五次會議比較，從前，中國沒有被邀參加過羅邱會議，而此次則宋外長會於最後一天，參與了羅邱的「軍事午會」，進行了長談。從前，參謀會議和正式公報中，中國戰場問題，實居於不大重要的地位，而此次則在宣言中明確的說明英美對日作戰和援華問題。

八月的太平洋戰場和歐洲一樣，是不平靜的月份，是盟軍節節勝利的月份。從北太平洋到西南太平洋，幾乎每天都傳來了令人興奮的捷報。

盟軍曾在過去二十天中，一再把轟炸帶到日本本土千島羣島，曾三度遠征婆羅洲，作了打破紀錄的二千五百哩遠程飛行，使日寇在西南太平洋區域主要油港峇厘巴板港受到重大損失，而投彈萬枚，毀敵機二百五十架以上的，對威克島的轟炸，更是西南太平洋最大的一次空襲。更曾在艱苦的戰鬥中佔領了蒙達和維拉維拉島。這些偉大的戰績，說明了盟軍空中攻勢的猛烈，空軍力量的優越。而蒙達和維拉維拉島的佔領，更將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這使盟軍獲得了空軍基地，而縮短了對日寇重要海空基地的距離。如果盟軍摧毀了拉布爾的日寇基地，那對日寇在西南太平洋上防禦系統的一個重大打擊，而盟軍佔領了拉布爾，則對日寇海軍的威脅，就更大了。同時，盟軍此次通過過科隆加而攻佔維島，更足以證明麥克阿瑟將軍並不守「梯形島嶼須逐級攀登」的「逐島戰」的作戰成規，這就證明了「越島戰」所能獲得的成就。

太平洋盟軍勝利

今天在西南太平洋上採取攻勢的是盟軍。日寇是處於防禦地位。然而，今天盟軍的攻勢，主要的還是空軍，空中攻勢的目的，暫時也還是在破壞敵人的基地，配合海陸軍攻佔敵人的基地，破壞敵人的資源。

氏上將所說「盟軍以主力進攻敵人的，所以太平洋之戰」真是一如一般所說的「制敵」，以太平洋戰局本身而言，正是美國海軍長諾克斯在答覆記者所問：「目前戰局唯一作用，是在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交通線」時所說：「此項推測甚佳，足下的推測一如我所推測者」。

從太平洋上的現狀看來，日寇維持交通線更困難了，海空的損失的補充，也更困難了，盟軍則日益佔着優勢，力量有了顯著的增長。現在盟軍應該加強空中攻勢，使日寇本土遭受不斷的轟炸，使它的資源，遭受不斷的破壞。也應該大膽的展開「越島戰」，切斷日寇的交通，因威島嶼上的敵軍。更應該隨時空中攻勢，給南洋淪陷區的人民以振奮，帶給他們以希望。要針對日寇在南洋進行的民族收編政策，向南洋人民明確宣示盟軍的真正的民族自決的原則。也就是說，要展開空中的政治攻勢！

同時，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對日作戰最後的關鍵在中國！」（金氏上將語）盟軍在太平洋上的勝利，當能更興奮和鼓勵我們，我們應該深自惕勵，加緊努力（被略）。我們今天的責任，是在前線和敵後的戰場上，用血和肉來爭取我們在世界戰場上應佔的地位。我們是最先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也就應該永遠保持世界戰場上的先鋒的光榮。（被略）要靠我們認真的積極戰鬥，殺敵效果，要靠我們能認真學習我國和盟國的戰鬥經驗，求得前線各軍及前線與敵後的配合合作。我們要以不斷的捷報，來粉碎敵人的謠言，和回答關心我們者的批評。我們祝賀盟國的勝利，更要善盡自己的責任。

（新華）八月二十一日

題。英美重視蘇東，積極援華，頗令人興奮（被略）至於英美對中國的「有效援助」，也在羅斯福總統和宋外長的談話中，說得清清楚楚，就是將以「足量之運輸機」，可飛空運，來「維持駐於中國西南之有限空軍」，將戰爭之破壞力盡帶到日本的工業區，「甚至收復緬甸前即行爲之」。總之一句話，增加對駐華有限空軍的援助，加強轟炸。這的確是一個進步。這是英美盟邦對遠東的積極，我們不應忽視。然而，我們覺得重視對日作戰和實施對華有效援助的滿腹，應該比這個更多些，至少要把收復緬甸也明確的規定出來。這話意思，在英美（被略）人看來，（被略）也許要說我們太不估計收復緬甸的困難，把運緬甸的收復和使用看得太容易，然而，我們認爲從大大的增加運輸量，認真準備我國反攻力量，以至於解放被日寇壓迫的緬甸說來，我們還是要重申此意。而且，事在人爲，成與不成，在於做與不做。對日作戰最後勝利的關頭就在中國，在中國是否有充分的力批反攻。這雖然是老生常談，却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關於第三點，爲什麼說從世界戰略和從英、美、蘇的戰略戰路來說，我們對此次會議，還有許多話要說呢？今天歐洲的軸心，一個意大利，已趨崩潰，一個德國，雖然力量還強，也在走上沒落的道路。英美爲了自身在歐洲戰場上的徹底勝利，爲了解除今後的威脅，也應該把握時機，從西歐登陸，和蘇聯配合，夾擊並擊潰希特勒。而魁北克會議至少也要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同等重要的問題，趕快決定具體的迅速而大膽的進攻計劃。我們在宣言中却還看不到這種精神或暗示。我們從宣言中可以確定的知道的，是參謀會議提出了一種建議，一種大帥們其注意於對日援華的情勢下所擬具的建議。

這個建議和蘇聯的戰略的配合性和適應性，似乎還有待於三國「或將舉行之會議」。英美對這種情況，如果沒有更有益的說明及更有效的作戰行動，會給人一種印象，認爲英、美、蘇間尚欠協調，軸心國家對魁北克會議可以感覺輕微，可以不必兩兩相愛，甚至於竟會增強其某種的意願。果如宣言中所表現，似乎正像人們想加重的打擊一個強盜，而讓另一個行將就縛的強盜喘息和掙扎。我們但願這是

切實消滅囤積居奇

政府由限價政策而爲限價與議價的并行政策，這確是一個較合理的辦法。但是，最近三個月，物價的變動，確實失去了常態，一般物價增漲的速度，平均在一倍左右，內中尤以食物與衣着兩項上漲最速。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有些人都以物資之有無作爲物價升高的唯一詮釋，事實上並不盡然。譬如食物類中之米，雖非進口物品，可是五月份內

米價的增漲最快，增漲的原因，是否由於民糧缺乏呢？我們看八月初中央社發表西昌天主教團米三百餘石的消息，就可以知道米價之增漲，實另有原因。其次，再以衣着類中之棉花與棉紗而論，雖過去一部份仰賴於外來進口，但爲數不多，內地產紗仍以三斗坪與陝棉爲進口大宗。本年二月中旬，由渝市匯往三斗坪及其他進口市場的貨款，會達一千餘萬元，四五兩月匯往西安爭購棉花的巨商，每家動輒以百萬計，以至造成渝市一時銀根吃緊的現象。試問巨量貨款匯出，而由此貨款購入的貨物又在流離地方去了？我們不能不把物價上漲的一個重

把要，但是，事關全局，心所謂危，說不盡不說。我們對魁北克會議決定加強對日、增強援華、除與德和益加自勉努力作戰外，希望羅邱在日內即將到訪而有切實的說明和措施。希望羅邱在日內即將發表的演說中，對歐洲戰場的戰路及對蘇關係，有切實而有益的說明，並望儘快舉行以討論開闢第二戰場爲中心的三國會談，使同盟國能有作戰勝利的戰路，以達到德意日無條件投降的目的。
(新華)八月二十八日

大原因，歸到囤積居奇上去。

物價政策，既是採取限價與議價并行，那麼，對忽視民族國家利益，而以囤積牟利爲業的好商，就應予以嚴密的注意和制裁。

無論限價和議價，都容易受到市場價格的影響，而市場價格又常受通貨供求因素的影響而變動。我們拋開通貨的因素不談，單就供求的因素而論，目前我國市場上物品的供應，一是依靠國外的輸入，一是依靠國內的生產，自滬甯路斷後，國外的輸入甚少，所以主要的靠國內的生產。如果國內有充分的生產，且能順暢的到達消費者的手裏，那就供求適意，沒其問題。如果生產量不充足，而中間商又只顧私利，利用這點而囤積，則市場上必然造成一種人爲的恐慌，迫使物價上漲，不管政府採取議價或限價，都只有變爲物價上升的阻礙者

自由的呼吸

——給自淪陷區歸來的青年們——

好幾年來，你們在敵人的魔手蹂躪之下生活着。你們曾身受過：特種浪人的監視、侮辱、漫罵和毒打，你們也曾目睹過：成千成萬的愛國青年遭了逮捕、酷刑，甚至於槍斃或活埋。同時，你們還又看到了那些賣國賊、叛徒、漢奸的漢奸們，在敵人的面前表示卑躬屈節和奴顏媚骨，是如何的荒淫和無恥！

敵人無時無刻不仇視你們，了解你們是一粒粒自由中國的種子，也無時無刻不在設法「感化」你們，想把你們一個個變成馴服的奴隸。他也懂得，只有你們，只有你們集中營，並不能征服得了中華民族的兒女。你們是自由的，一切含有少許民族思想和正義理想的青年，他逮捕了許多，暗害了許多，但你們的知識份子。在「肅正思想」的口號之下，你們在報刊上，只看到民族叛徒對所謂「王道樂土」的歌頌，只看到敵寇特務們的（被略）欺騙的宣傳。除了在極秘密的知己之前，你們很難得聽到一點中國人的真誠的聲言。敵人強迫你們學習日語，想使你們受着大和民族的「同化」；還要強迫你們讀經，想把你們的思想帶回到荒蕪的古代。總之，敵人要使你忘記你自己的祖國，要使你對自己的有聲「狂心」。

了！你們並沒有被敵人欺騙到和麻木到。這不僅因為你們的血管裏是充滿着中華民族的血液，而且還有敵人對我的殘暴的專制教育，嚴密的監視，嚴密的監視，嚴密的監視，要把你們和自由的祖國永遠隔絕起來，可是你們的心總是嚮往着祖國，

渴望早日脫離使你們感覺窒息的地獄，渴望早日得享受到自由的呼吸！

不惜冒險受苦，忍心辭親別友，你們終於回到自由的祖國的懷抱來了。政府關懷着你們，大後方全體同胞也都關懷着你們。可是，我——包括一切安居在大後方的人們——應該反省自己，對你們的關切還不夠啊！政府今年撥了兩千萬元來幫助你們，（被略）讓你們能安心讀書或就業；（被略）讓你們能把自己的心力，完全貢獻於民族解放的事業；這是很重要的，如像一個久別家鄉遠道歸來的遊子一樣，你們需要得在這些家人的親切溫情的精神的安慰，你們需要得能自由的呼吸！

在你回到自由祖國的懷抱以後，也許所見聞到的一切，並不完全符合於你。在淪陷區時所懷的理想。自然，有些地方我們是應當憐憫的，我還沒有作到至善的努力，以求早日能把淪陷區之下的同胞解放出來。但我們應該理解到，我國因為近百年來的積弱和落後，一旦對抗強敵，只有在持久抗戰中來消除自己的弱點，生長新生的力量，才能擊破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不過，因為困難重重，使我們的行動總是顯得迂迴曲折，過於遲滯。同時我們更應理解到，不論在面的現象怎樣，我們民族新生的力量是在不斷地增長，強大，而我們每個人都就是這有生力量組成的一部份。讓我們共同負起民族解放事業而努力奮鬥吧！只有我們的民族得到完全徹底的解放後，我們才能享盡情的自由的呼吸！

（新華）八月二十五日

。是在民國二十八年政府採用對價政策的時期，近如各地糧價將推行而未推行的時候，就有不少中間商利用機會，大舉囤積，先造成入市的恐慌，迫使物價上漲，進而迫使糧價提高（從四月起，糧市物價的騷動，即變為一般性）。所以，我們以為今天要使限價與漲價都推行得好，消滅囤積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不願否認，過去對囤積商的消滅，曾有若干努力，但是，據一般熟習商情者談，真正囤積者仍鑽進法外，悠然自得。

因之，要消滅囤積現象，使物價政策推行得更好，對此等人即不宜稍存優待，應予以嚴厲制裁，不憚，損賊不擒其主，後患終不可免。

其次，對物價政策的厘定，事前亦應考慮周詳，一經確定便應澈底執行。屢次屢變，則很容易使囤積商人乘隙漁利，更進而輕視法令的執行。物價政策只要有一次變動，物價即有一次增漲，數年以來，我無例外。為要樹全政府的威信，這一點也值得注意。

當然，我們不能說對密審徵收政策，與嚴格執行法令，就可以消滅囤積現象。因囤積也還有其客觀的因素的，假使糧糧不通，國內生產不增加，幣值小就穩定，囤積的現象即難完全消滅，所以，除了嚴懲囤積奸商外，還要從積極方面加緊努力。

（新華）八月二十七

敵後抗戰的戰略自白

劉伯承

我國國民政府與蔣委員長，自全國抗戰，已六年於茲。本師在朱彭總司令直接指揮之下，深入敵後，且現已與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廣大民衆，血肉結合，堅持敵後抗戰，成爲敵人所不可摧毀的力量。

我 與 敵 人 鬥 爭 的 過 程， 總 可 分 爲 三 個 時 期：

第一時期——從「七七」抗戰起至武漢失守（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止。

這一時期，即敵人所稱「堂堂陣戰」的正面抗戰的時期。當它由平津淞滬抗戰擴大到石友莊、太原、濟南等處以後，其重點就轉移到徐州、武漢的會戰去了。牠向寧止進攻時，主要「依托鐵路，進行「突貫攻擊」與「分進合擊」，及佔領一地後，則注重於鞏固後方交通，並逐步進佔其根據地游擊戰的根據地，先之以大砲火，繼之以飛機轟炸，或立爲偽軍，或立爲治安維持會，以圖割斷我軍，破壞我根據地。

這一時期，我軍在平津淞滬抗戰中，即以配合正面友軍的防禦。其間以冀察兩省，我軍陽明侯等處，即在正太路兩側之七寶村黃崖底等處，所進行的游擊戰，曾給敵人以很大助力。迄太原失守，國軍一軍向南撤退，而冀北、察北、魯北人民共存亡」的口號，實行堅持以後，加以「友軍合作戰」。此時，本師即一面堅持晉冀魯豫所有根據地與敵苦戰，另一方面分遣部隊，更深入敵後，實行「晉北出擊」，特別着重於長城一帶游擊戰，摧毀敵後交通，以便友軍得以從容轉移，殺時作戰。迄武漢失守之日爲止，本師在晉東兩省戰，最著名爲破爛了正太路，粉碎了敵人對晉東兩省之九路進攻，即留了敵人增調徐州會戰的兵力。同時，擴大晉冀魯豫西北的根據地，亦結合當地民衆，毀壞了各處敵據，並冀察政權時地，變了顏色的冀南，即於此被敵軍克復，並消滅了偽軍及土匪會鬥武裝約七萬人，策應徐州與武漢會戰，並曾出擊平漢路清浦津浦線的大破十餘次，截斷敵人在徐州會戰中的接濟。我軍這樣地在晉冀魯豫與民衆結合抗戰，特別是民衆抗日武裝起義等，驅逐敵人，遂開始建立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而在國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與日寇尖銳對立，肉搏鬥爭。

第二個時期——從武漢失守至華北「百團大戰」（民國二十九年）止。

這一時期，即華北敵酋杉山元所稱「治安肅正」時期，也說牠對我國行所謂「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總力戰」的時期，而其在政治經濟上，着重於挑撥抗戰的團結，在軍事上則用師增援華北（據在本區周圍者已達八萬），強化交通，創設我後方，建立治安軍警備隊，進行所謂分散配區奇襲「牛刀子頑術」的掃蕩戰。其目的在徹底消滅我軍。由「治安肅正」進入華北殖民地秩序的建設，以便進攻西安、重慶、昆明。

這一時期，我軍結合華北民衆，對敵進行全面的奮鬥，人民給予我軍以「人民子弟兵」的光榮稱號。在軍事上，即以主要的游擊戰間以運動戰，進行頑強的「掃蕩」與破壞交通線上之敵。當時本師在「粉碎敵人囚籠政策」口號之下，粉碎了敵人大約「掃蕩」萬有十處之多，而游擊戰則更趨熱烈，

冀南的交通門爭甚至到民國二十九年的全年進行着，其中尤以阻滯敵人修德石路爲最殘酷。在山西，則收復了邯長公路，截擊了白河鐵路。有名的「百團大戰」，曾痛擊了華北敵人，打斷了他進攻西安、重慶、昆明的陰謀。

第三個時期——民國三十年到現在。

這一時期，即敵人在「百團大戰」震撼之後所謂「治安強化」的時期，也就是總力戰強化時期。現敵人已進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特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人更提出完成大東亞「兵站基地」、建立華北「參戰體制」的方針，加強人力物力財力的掠奪（尤其是壯丁糧食的掠奪），建設偽軍，整頓偽組織，求其「淨化」，對我邊地則躍進蠶食，對我腹地則「鐵壁合圍」，所到之處，顯明的交通線封鎖與潛伏的特務活動都構成網狀，以期實現其搶光、殺光、燒光的政策。這才爲敵酋岡村寧次的「傑作」。

這一時期，我抗日的民主政治的建設日有成績，因而各階級團結對敵的力量逐日加強。在「精兵簡政」之後，我們正規軍游擊隊人民武裝等結合人民而成的羣衆性的游擊戰爭，正發揮黨政軍民一元化鬥爭的威力。在三十年與三十一年兩年中，就本師作戰來說，即進七九七六次（冀南較多），而其中有十九次是大的反「合圍」「掃蕩」戰。至於反蠶食與交通門爭，則成爲日常工作。我游擊隊進入敵佔區，結合民衆，作反奴役反配給與反徵糧抓壯丁的鬥爭，同時對敵佔區內部進行政治攻勢，收效很大。

現在敵佔區與抗戰區的游擊性同時增大，形或相互插在夾雜鬥爭的情勢，我們相信，我軍能與華北人民永遠血肉結合，更能够一致進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結成一元化的對敵鬥爭，一定能够堅持這一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以與友軍呼應作戰，直到反攻階段的到來。

我們概述的三個時期鬥爭經驗，可以提出某些戰術原則的歸納來。

第一、戰術社會性的擴大。

這裏又包含兩個問題，一個是抗戰鬥爭的成員問題，另一個是鬥爭的戰術問題。

由於抗日戰爭是全民族擺脫亡國奴命運的殘酷鬥爭，所以參加鬥爭的成員，必須是每一個中國人，而不單是某些少數人，尤其不是幾個軍人。幾個軍人，只能是側重於武裝鬥爭的成員。但他又不能限於武裝鬥爭。爲了動員廣大的民衆成爲鬥爭的成員，一定要在民族抗戰中建設民主政治，把廣大民衆的利益與民族利益結合一致，否則是不能成功的。因爲廣大民衆願意進行自作主人成員的抗戰，而不願少數人阻斷抗戰。現在我們全體的羣衆性的游擊戰爭，就是由抗戰與民主結合發動起來的，今後更應循此途徑，發揮全民族的力量，走到抗戰勝利。

戰術被運用的範圍，不應只局限於武裝鬥爭，而且應普及於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鬥爭。軍事戰術與政治策略的含義本來就是一樣的。今天抗戰鬥爭的成員增多了，要對敵人的軍事、政治、文化、特務等「總力戰」「殲滅戰」的鬥爭，也錯綜複雜起來了。我們抗戰的每一成員，必須掌握各種鬥爭的戰術，不過各人都應抓緊各人鬥爭業務，而側重於掌握其自己的某一鬥爭的戰術，並一般的及其他鬥爭的戰術，以便與之結合（如戰爭、生產、教育等）而成一元化的鬥爭。單純軍事觀點，脫離廣大民衆的軍人，已成過時的人物了。

第二、「敵進我進」。

「敵進我進」，就是我軍敢於脫離自己的後方，進入到敵人的後方，與廣大民衆結合，作鬥爭的行動。當敵寇進攻佔華北，友軍南退，人民塗炭，我軍曾在戰略上進入敵後華北，結合民衆鬥爭，掩護友軍，因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據地——即日寇痛呼爲「首陽炎」者。假若不是這樣，要想敵人不去進攻西安、重慶、昆明，不在華北完成殖民統治的秩序，那是不可思議的事。又假若我們在反「蠶食」反「掃蕩」中，在敵後戰術上，不以一部或主力到敵人側背作戰，強化游擊與政治攻勢，而能鞏固根據地，也是不可思議的事。不過，「敵進我進」是結合敵後廣大民衆作解放鬥爭的戰術，而且我軍在大後方又領不到餉彈已四年於茲，「敵進我進」的戰術，對於我們實成爲爲己爲國、至大至剛的行動，原非脫離民衆、空談愛國者所能做到的。

日寇的作戰見解，是建築在「敵退我進」之上的，故在抗戰之初，以爲我軍只是掩護主力，收容部隊之散兵，其次則認爲游擊隊尙可聚攏，以後才喊出

「X路軍在佔領區如此滋蔓，實乃皇軍心腹之患」，這是由於日寇的作戰要務令上並無「敵進我進」的條文。

第三、「羣衆性游擊戰爭」消滅中的威力。

毛澤東同志曾給我們英明的指示：「基本的游擊戰，不放整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我們一般是執行了這一指示，因而取得了相當的勝利。我們在上述的第一個時期，在發動羣衆游擊戰爭中，特別在日寇用兵狂妄的有利條件下，會常以正規軍隊大踏步的進退，取得了運動戰的勝利。在第二個時期，在地方軍隊人民武裝初步建立時，在敵人增兵北屬行「掃蕩」，實施「囚籠政策」的條件下，會以主要的游擊戰間以運動戰，取得了反「掃蕩」與破擊戰的勝利。在至今第三個時期，在地方部隊人民武裝逐次壯大，在敵人強化交通與封鎖溝牆，躍進「蠶食」合圍「掃蕩」的條件下，則一般是以反「掃蕩」羣衆性游擊戰爭。但這並不是說，在羣衆性游擊戰中不抓到敵人分散的弱點而不給以消滅的打擊，相反地，正需要而且正容易抓到敵人分散的弱點給以消滅的打擊。只有如此，才能制止日寇狂妄的分散。不是在這裏戰鬥的機動性是日益加強了，尤其是指揮員，在敵軍利害時機變換很快，而上級又無法及時指示的條件之下，必須發揮我軍機斷行事的優良傳統。冀南五月在館陶給予網內王七填的游擊部隊，於一小時內乾脆的消滅了敵偽軍一百餘人，是够機斷行事的本領。

無論敵人在其「蠶食」與「掃蕩」中會提出許多花樣，如「捕捉奇襲」、「反轉電擊」、「鑿壁合圍」、「縱橫掃蕩」、「假轉撲朔」，最近又添上了「釜底抽薪」、「三角合攏」、「及」前進與截擊」、「包圍與掃蕩」之類，然而異族正黑軍協同動作的特質，不絕在這羣衆游擊戰爭高日監視之下，遭到無規律而準確的襲擊。也無不以進展其長，其傷亡於冷槍冷砲地雷的人馬，也通常大於正規對敵的數目。因其兵力如集結過大，則易遭我隨時分遣的消滅，如分散過小，則易遭我隨時集結的消滅。日寇軍中一句諺語：「皇軍大大的去，X路軍小小的有；皇軍小小的去，X路軍大大的有」，這就是日寇無可奈何的呼聲。

然而，羣衆性游擊戰爭威力之大，並不只限於戰鬥，而且還有政治攻勢。政治攻勢不只是燃起了敵佔區同胞的抗日熱潮（日寇正感歎：三軍可奪帥也，中華民族不可奪志也），而且也燃起了日軍反戰熱潮。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日寇十八次太行作戰，正是他懼於政治攻勢的表現。

第四、「交通門爭」。

交通門爭，就是敵我兩方各自打通自己的交通，打斷對方的交通，日寇海陸兩地遠圖異策，爲作戰輸送的需要計，爲控制佔領區據點人力物力計，海陸交通已成爲不可打斷的生命線，如被打斷，必演成支解的死亡，但在我們看來，則成爲或者是讓日寇交通線斷裂，或者是破壞交通線的問題。

現日寇倡導大陸作戰的戰術，以開發生產，打通交通線而確保之爲主。去年十月華北敵軍參謀長安達也說：「華北佔領已達成了七千七百餘個，這些地方也修成一萬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長，實爲自山海關經張家口至寧夏之外長城線的六倍，地球外圍的四分之一。」最近敵佔區城市鐵道，敵軍團入據據地，拚命搶運運走，這些都證明敵人對交通門爭到了如何緊張的程度。

敵人的交通線和通斷如此之長，儘量如此之多，確在確保交通與束縛我游擊與運動戰而消滅之。然而這長這多的工事，陷入於中國的人山人海之中，更形兵少防寬，就不能不以一個日本兵監視幾個僞軍來守備。於是日寇防止中國人的敵視僞軍與防止日本兵反戰等問題出來了。

我們一面在政治攻勢上捆綁了這個問題，另一面則以軍隊的戰鬥力，結合廣大民衆的勞動，進行了大衆的破壞與技術的破壞。是以民國二十九年一年破路而論，本師破壞鐵路公路即已達一萬二千餘里之長。從此交通門爭即成爲此修彼破彼修此破的狀態。——這種狀態不到打出日寇的那一天將不會停止的。

第五、對現代技術兵器的門爭。

日寇是具有很強軍、裝甲車隊、砲兵、和毒氣等現代化的軍隊，唯武備論者會誇大其作用，以造成過恐日病。我軍是由人民在革命武裝鬥爭中生長成的軍隊，武器與敵且久不得彈藥的接濟，然而竟能在敵後堅持抗戰者，除結合羣衆鬥爭外，在作戰上會根據敵人諸技術兵種的性能，抓其弱點，利用和改造了地形，也利用天候與時間，特別發展了自己軍隊對於「機動」與「堅決」的增長，不但防禦了日寇的技術兵器，而且也摧毀或奪取了這些技術兵器，迄抗戰第

六週年為止，本師毀傷擊落了敵人飛機四十二架（其中以襲擊傷及長治時為較多），也毀了敵人裝甲汽車三十七輛，坦克二十輛，汽車一千二百零十七輛（其中尤以碾擊、香城固與破擊正太路諸戰鬥為較多）。至於日寇使用毒氣，也是經常的事，而尤以在涇縣、榆社兩次戰鬥使用者為多。但是總的說來，仍於當時在我軍堅決攻擊之下收復回來了。我們現有的砲兵部隊，大多數是來自日寇而成立的。其他如機關槍步槍之類，則悉自日寇者為尤多。這足以說我的武裝來武裝自己，將來也會有的，而且在其時也會更多的。

第六、「偵察」與「防諜」。

「偵察」使我們瞭解敵情，「防諜」是遮蔽敵人耳目，並束縛其爪牙，使其無法危害抗戰。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而重點應放在偵察之上。

我們必須進行經常性的游擊戰爭，軍民都應明瞭敵情，尤須專防日寇特務機關、憲兵、警察、新民會等各方面的陰謀萬狀無惡不作之種種活動。一般人所知道的，如日寇有封持大批民衆作偽軍者，有以抗戰面目誘騙陷人者，有混入經派系統作偽軍者，有偽組織中作偽軍者，有偽軍武裝挺身隊潛入我後方破壞者，然而這還不過略舉一斑而已。我們的偵察部隊，應成為大衆的運動，並在士農工商各階級中，甚至學校的偵察防諜，因此，首先應使民衆尤其是民衆武裝和營兵部隊深瞭了解：偵察防諜乃羣衆性游擊戰爭有力保障，並知道如何察防敵人的種種活動，甚至學校的偵察防諜，軍事訓練，及防諜訓練等。特別是營兵部隊，應嚴守軍事秘密，才其能盡其責。我們是抗戰軍人，即使被日寇漢奸叛徒進行任何威脅，甚至以死相威脅，亦不應洩露半點軍事秘密。對於營兵部隊與人民武裝，應分別定出嚴密防諜守則，以資遵守。特別要警惕民族烈士堅定不移寧死不洩露軍事秘密的光榮行為。

我們在日寇後方所謂「兵站基地」——華北堅持鬥爭，是站在全國軍隊前線。在日寇被擊敗之前，我們與敵人肉搏的羣衆性游擊戰爭，必然是極其殘酷與極其複雜的。本師第六週年，全年戰鬥統計約四千次，而今年第六週年，全年則增加約八千次。於此可以預見今後敵我鬥爭的嚴重情形，敵我的戰術戰爭的嚴重情形，敵我的戰術變遷將隨之而更新更豐富的發展，急需我們在鬥爭中注視研究與發展戰術。

（完）

與人民結合的軍隊

是不可戰勝的武力！

穿插在溝壕中的游擊戰爭

星羅棋佈的點線

六年來冀中平原的游擊戰爭，隨着敵寇反復「掃蕩」，分割，由大塊變為無數小塊，由集中到分散，越來越緊張，越來越殘酷，逐漸普及，積極深入，沿着這一規律一直向前發展着。空前殘酷的鬥爭磨練着冀中的軍民，一方面積累着仇恨，一方面增長着經驗，越鬥越強，六年如一日，堅持着祖國最前線的反攻陣地，準備反攻的創舉。

盤據在天津的敵寇，深刻感到冀中的游擊戰爭是它的心腹大患。從民國二十七年底開始圍攻冀中後，經常以兩個師團及一個混成旅團的兵力，踏在冀中周圍的鐵路線上和分佈在冀中內部。極力在冀中的敵偽兵力，始終不下四五萬人。在大「掃蕩」時，更從其他地區大量抽調游擊兵力。六年來冀中敵寇想盡方法竭其全力消滅冀中游擊戰爭，而其結果，都是得不償失，沒有一次能實現這一夢想。

二十七年十一月至二十八年間，敵寇對冀中進行了六次大圍攻，建立了二十七個據點。

二十九年四月間敵寇集中四萬餘游擊兵力，對冀中進行了連續五十天的大「掃蕩」，並於去年底增設了三六七個據點和崗亭。

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四月，敵人推行了「清鄉」政策，依鐵道線由外向內逐次進食。經過十六個月激烈的進食與反進食的鬥爭，敵寇在我周圍增加了五八五個據點和崗亭，修築了四八七六里封鎖溝。

三十一年五月到七月，華北敵寇圍村下，破大決心，集中一〇、四一、二七等三個師團及第八、九兩個混成旅團的游擊兵力，共約五萬餘人，配以大量現代化兵器與兵種，於五月一日對冀中展開了大「掃蕩」。到七月初「掃蕩」結束，敵寇以傷亡二〇、七八七人的重大代價，擴展了六二八個據點和崗亭，增修了三、七〇三里的封鎖溝。

三十一年止，敵寇在冀中共計建築了一七五三個據點與崗亭。原有和增

呂正操

修的鐵路共一、五三九里，公路為一五、一六六里，共計鐵路公路二六、七〇五里，平均每六、五平方公里，即有一里鐵路或公路，挖掘了八、三七三里封鎖溝，平均每一、二平方公里即有一里封鎖溝，溝寬均在兩丈以上，乃至三四丈不等。點線溝壩互相聯絡，中間空隙，平均在五里左右，最大空隙沒有超過十五里以上。定縣南郊和唐河兩岸，每隔兩里，即修一條溝壩五里相聯絡計算，全冀中即被分割成二、六七〇小塊，在這些小塊中，還有交叉公路和封鎖溝。打開冀中地圖來看，就像一張極不規則的棋盤，溝壩像繁星一樣釘着，又像一件破衣，上面有無數的釘，還有無數的小孔和裂縫。這就是六年來敵人欠下冀中人民一筆巨債的記錄。六年來敵寇在冀中傷亡三、一〇一人，傷軍傷亡二〇、一七四人，這不過是敵人償還的一小部份。

反清剿鬥爭

敵人對冀中的分割包圍，首先是由北平、平漢、津浦三鐵路形成的。二十九年，修通石家莊至德州鐵路，對冀中構成四面包圍。在冀中內部，最初以點線進行分割包圍，最後普遍清鄉，形成點線分割與嚴密封鎖，企圖以此限制我游擊隊活動的自由，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這就激發了游擊隊，我抗日政權，建立黨組織，深入特種工作，開展游擊之抗日鬥爭，開闢游擊根據地，甚至每個抗日組織家都登記了全副姓名搜捕，徹底破壞。

敵寇在其分割封鎖以及清鄉工作深入進行的基礎上，便更進一步反復的「清剿」。其「清剿」的方式有三種，一種是日偽的所謂「清剿」，即由游擊隊之敵，在其守備地區，經常出動圍村搜捕。第二種是集中大游擊隊游擊兵力，對一定地區進行定期的「清剿」，包圍敵村或數十村，按村搜索。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敵寇以一千三百餘兵力包圍定縣南郭村、大定、才位等十餘村，佈成連續不斷的包圍圈，每隔一百步搭一席棚，斷絕交通，換戶搜

案，連夜「清剿」六日之久。第三種是個別「清剿」與分區「清剿」的聯繫，以守備部隊，在某一地區積極活動，以吸引我之注意力，與迷惑我之判斷，然後突然轉移方向，與其主力相配合，「清剿」另一地區，如五月二十一日，清剿定南之敵，首先以邢邑守備隊為基幹，集台附近各點敵偽軍，「清剿」沙河兩岸，次日突然轉向沙河北岸，與由定縣城出動之敵機動兵力二千餘互相配合，「清剿」沙河北岸之邵村、聖佛頭、鷄鳴台等十餘村，連獲「清剿」十餘日。聲東擊西，突然而來，這就是敵人慣用的方式。敵人「清剿」的對象：第一，合擊我之部隊；第二，捉捕我抗日幹部和青年壯丁；第三，掠奪糧食和財物；第四，是破壞秘密洞。所謂「清剿」，實際上就是「清財」。在清剿中，敵偽漢奸大發橫財，到處搜羅掘掘，敵詐勒索，發現糧食財物，盡數掠光，所謂「剿共」，就是「剿民」，見青年壯丁就抓去，有錢的人當人贖回，無力贖回的即送東北當苦工，見青年婦女即姦淫，見到成羣避難的老幼即用彈槍掃射。六月二十八日，敵寇「清剿」沙河南岸時，在河灘用機槍射殺羣衆百餘人後，復捕殺姦淫，大肆兇殘，敵寇反復的「清財剿民」，加深了冀中軍民對敵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們萬衆一心，普遍展開了反「清剿」鬥爭，這種鬥爭已成爲目前主要的鬥爭形式。

反清剿鬥爭，是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部隊轉移受到限制，羣衆生活受到摧殘，然而一切困難都難不住我們。在新的情況下，敵人的弱點是掩蓋不住的，它兵力更加分散了，每個據點或碉堡平均不過二三十人。大據點不過幾百人，小據點十數人，其中大部份又爲偽軍，敵軍不過佔四分之一。敵寇之戰鬥力與突擊力都降低了。一般小據點，缺乏獨立作戰的能力，偽軍增加了，其中很多是強迫捕去的農民，更增加其內部動搖的成分，敵人對偽軍統治的加嚴，就使敵偽矛盾更加擴大。敵人的燒殺搶掠姦淫行爲，不分青紅皂白的加在每一個中國人民頭上，因之民族矛盾空前增長，抗戰團結更加鞏固。敵寇在軍事上有着相對優勢，而我在政治上佔了絕對優勢。所有這一切，就造成了我們反對敵人「清剿」堅持游擊戰爭的根據。

在反清剿鬥爭中，首先是打破敵之分割與封鎖。爲了打破敵之分割，我部隊由團、營分散到連、排、班爲獨立活動單位，普遍分散於各地區，便於隱蔽與行動。現在其中到處有我部隊，到處又無目標，互相聯繫，互相呼應，以粉碎敵人對我各個擊破的陰謀，反擊敵人的封鎖。在年餘鬥爭中，我部隊已學會了一套穿房越脊、爬溝過路的本領；穿牆點線，截斷封鎖溝，成爲

家常便飯。敵人之封鎖溝，並不能擋住我們；只能成爲羣衆仇恨的標記。

反清剿鬥爭中，另一問題，就是反對敵人的分進合擊。分進合擊的戰術，是敵人在平原上的拿手好戲。五一「掃蕩」前，敵人對我中心區構成合擊，需三小時，五一「掃蕩」後，敵之分割封鎖大部完成，在一小時內到處都可構成合擊。因此，我之部隊，必須經常準備必要的反合擊戰鬥，必須保持旺盛的戰鬥意志，在兵力上必須準備以寡敵衆，以一當十；在戰術上必須靈活運用，爭取空間的速決戰（即速戰速決），與爭取時間的持久戰（即堅決固守，待機轉移），以及持久戰與速決戰的互相聯繫，猛打猛衝，堅決固守的聯繫，外線與內線的互相配合，求得部份或大部消滅敵人，以打破敵之包圍，爭取主動。三十一年五月大「掃蕩」期間，敵在深縣東南東河頭，我以一營兵力依據村落，對步騎兵五千餘、飛機五架、坦克十輛之敵人，作爭取時間的防禦，由早六時打起至晚十一時，擊退了敵人，敵人傷亡五百餘，我只傷亡三十餘人，安全轉出。同年六月八日，深縣宋莊戰鬥，我以兩連兵力對二千餘之敵人，依據村落及地道作防禦戰鬥，從正午打起堅持到十二小時之久，敵人傷亡九百餘，我傷亡四十七名，並繳獲一部步機槍，在夜半安全轉出。本年三月間，我以不足一連的兵力，在商陽東王果莊，擊退四百餘之敵偽包圍，我依村落固守與反衝鋒，將敵擊退，斃敵三十餘，俘偽軍官兵六名，繳槍五支，我僅輕傷一名。三月二十日，我三個班在文安大舖附近敵偽二百餘包圍，我以兩個班牽制敵人一個連，向敵衝鋒，將敵擊潰，安全轉出。後又在敵新路上伏擊，敵人增援汽車一輛，將敵大尉以下官兵十名完全消滅，繳獲全部槍砲。由於敵偽戰鬥力與戰鬥情緒日益下降，此種輝煌戰例，日益增多，本年上半年五個月中，反合擊戰鬥共計二十五次，斃傷敵偽軍四九一名，俘敵偽軍亦很多，並繳獲鋼砲一門，機槍九挺，長短槍二八五支，我僅傷亡五十七名。

在反清剿鬥爭中，反對敵人的分區「清剿」，我仍採用一套老辦法，就是轉到敵人後面，從敵之側後向敵進攻，或開闢新地區，擴大圍攻區。敵人也知道我們這一套，但由於其兵力不足的矛盾無法解決，就不能阻止我們避實撲虛，周轉週旋。

在反清剿鬥爭中，羣衆爲了反對敵人的掠奪與殺捕，堅壁空室與儲藏物資已有一套豐富經驗，很難被敵人發覺。人人挖洞，村村有洞，已成爲公開的秘密，青年婦女都有自己的秘密洞，平時嚴守秘密，互不告知，緊急時可

以互相使用，並於洞口埋有手榴彈地雷，一旦為敵發覺，即以此與敵搏鬥。敵人明知到處有洞，但也無從搜查。

由敵人兵力的極度分散與不足，個別「清剿」易遭我各個擊破，分區「清剿」則顯此失彼，戰爭的局面此起彼落，此起彼落，形成補綻縫連的鬥爭。不管敵人如何瘋狂，「清剿」鋒芒一過，「雨過天晴」，敵人留下了仇恨，人們增長了經驗，堅持鬥爭更加頑強。

爭取時間與空間

冀中區自被分割割後，敵我距離極近，加以敵我均處在分散狀態，互相穿插，來往頻繁，我之活動時間與空間，較之大塊根據地時代相對縮小了。從總的形勢上看，是敵我平分天下的局面，敵我雙方誰的活動積極，誰就能取得更多的活動時間與空間，縮小對方的時間與空間，因之勝壓敵人之活動，擴大我之活動時間與空間，便是堅持游擊戰爭的重大問題。「五一」大「掃蕩」後，部隊在新形勢下，缺乏小部隊獨立作戰的經驗，曾有一個時期，敵偽之活動極其瘋狂，部隊站腳困難，甚至災難嚴重。自青紗帳期提出轉變戰術思想，並展開對敵攻勢後，才將敵偽的鐵鎖壓下去，打開了新的局面。經驗證明：分散的小部隊，只有不斷的向敵進攻，找敵人打，才能得到活動的自由。我其分區游擊戰術發展最普遍，最活躍，敵人吃虧最多，因之敵人也最不敢放肆。我其分區專打敵偽最活躍的機關，出來就打，打得敵人膽戰心驚，傷重更不敢輕易出來。本年上半年五個月中，我大隊以上部隊向敵進攻的戰鬥，共計四百一十次，斃傷敵軍二千九百五十七名，俘軍二千零十九名，共計繳獲偽三千九百七十六名。而小隊單獨戰鬥尚未統計在內。若以每一區小隊每月一次戰鬥計算，則五月中，當在千次以上。由於積極戰鬥的結果，目前在冀中游擊區和游擊根據地，能够爭取下半天一整夜的活動時間，個別地區因敵人空虛，可以整天整夜的活動。一般地說，在上半天需要避免戰鬥，爭取時間進行教育，因上半天戰鬥時間容易拖長，敵人容易增援，我則容易陷入完全被動地位，不易解決戰鬥，戰鬥後轉移亦頗困難。絕大部份村莊，為我之游擊區或游擊根據地，敵人只能佔據點線。而我部隊駐在敵佔點線內，已經成為習慣，而不是什麼希奇的事情了。目前我之活動區域，正向新老敵佔區擴大。沒有這些千百次的進攻戰鬥，冀中今天的形勢是

不可想像的。

全民大團結

冀中區，在大塊根據地時代，經過兩次普選，已經實現了民主的政權，實行了減租減息，增加工資，提高生產等政策，因而以團結各階層共同抗戰，僅有少數不明大義的（被賂），暗中破壞抗戰，破壞團結。「五一」大「掃蕩」時，這些人乘勢抬頭，企圖假借敵人力，破壞抗日政權及各地抗戰政策，但敵人的掠奪濫淫的獸行，對他仍是一律看待，反而因為這些人都屬於富有者，受害更重。這些事實，促使他們中間尚志愛國良的人，悔過自新，重新回到團結抗戰的陣營。滹沱河，沙河流域，流行着兩句諺語：「有×路恨×路，沒×路想×路」，這就是那些人心理的寫照。定縣一個頑固份子受到敵人打擊以後，公開當着抗日幹部說：「我今天明白過來了，過去我對抗戰說沒作多大壞事，但也沒有掏出良心來，從今後掏出良心給大家看看。」這就是頑固份子的懺悔錄。

今年舊曆年，我規定舊曆元月為全冀中的「團圓日」，由元日到元宵節為「團結週」，號召全冀中軍民大團結前，不記私仇，前仇後讎，團結對敵。並根據敵人搶掠殺劫等實，說明敵人打不走，窮富都活不成。首先由一家做起，推及全村，吃酒聚餐，社釋前嫌。父子母女兄弟姊妹互相勸助，全家團結；共同對敵；長幼鄰里互助勸勉，人人團結，村村團結，全民團結；共同對敵。這一號召，在冀中引起了普遍的響應，抗戰團結更加鞏固。今天冀中軍民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一國仇事大，眾志成城。小團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不如此，就不能活下去。全民大團結，就是冀中游擊戰爭的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任憑敵人怎樣瘋狂毒辣，終必被我們團結的團結力所粉碎。

勝負取決於民

我們能在任何殘酷環境下堅持游擊戰爭，就是因為我們始終依靠着羣眾，和羣眾保持着血肉的联系。敵寇深知此點，幾年來苦心焦慮，努力於「匪民分離」的工作，但敵寇這一口號喊的越響，作的越起勁，廣大羣眾與本軍的團結更加緊密，敵寇之陰謀着着失敗。

敵寇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他是野蠻的法西斯侵略者，是羣衆的死對頭。他對羣衆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欺騙宣傳，厚待臉皮消滅抵抗，要算敵人的特長。然而敵寇除了一貫的欺騙宣傳、壓榨掠奪外，沒有辦過一件人事給羣衆看，不能也不會給羣衆一點實惠。因之敵寇的欺騙宣傳，已在羣衆面前破產了。另一種辦法是殘酷鎮壓，威脅羣衆與他分離，但敵寇鎮壓越厲害，羣衆對敵仇恨也越深，反抗也就越頑強。當其鎮壓開始時，羣衆還有些駭怕受驚，不與本軍打仗，怕給他惹禍，但鎮壓繼續下去，羣衆無法生活，就逐漸不怕敵人，希望本軍替他除害。到最後羣衆忍無可忍，無所遷懼，就起來與敵作鬥爭，並要求本軍多多打仗。羣衆在大「掃蕩」後，曾有一時期羣衆不願本軍在村打仗不敢接近本軍，怕敵人找盒子，到去年底，羣衆就要本軍到本村或自己家中去住，但對打仗還有些猶疑，及至今年，羣衆就不怕受損失，到處要求打仗。羣衆說：「X路軍不在村時，我們打仗，到那裏去打？唯恐到天上打仗嗎？只要打鬼子，死也甘心。」

在敵寇，貫的高壓鎮壓之下，羣衆深以感到，沒有X路軍，就無法生活，這使羣衆越發與本軍打成一片，堅決與敵作鬥爭。今春敵人包圍安平某村時，毒打被圍羣衆，妄圖威脅羣衆指出抗日幹部，結果沒有一個羣衆出頭指認。敵人惱羞成怒，硬拉出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嚴刑拷打，逼令指出幹部，當時小孩的母親在旁邊喘着氣兒「不准說」。敵人乃將小孩母親拘至院中，這位母親母親邊哭邊喊：「孩子可別說呀！咱媳婦就是死在一塊，也不能留罵名！」堅決的孩子死去活來連五次之多，終未透出一字。敵寇無奈，最後指着羣衆說：「沒法子，你們都是八路軍的！」便垂頭喪氣的滾蛋了。「五一」大「掃蕩」時，一個早已投到本軍的日本兵，在反「掃蕩」中負了傷，放在羣衆家裡撫養，一位老太太就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掩藏了半年，始終未被敵人搜去，後來這位日本弟兄感激流淚的說：「中國老太太都是母親」。六年來有許多老頭老婆男女兒童，爲掩護本軍與幹部而從容就義，英勇犧牲。這些驚天動地的舉動，爲我民族正氣的結晶，無論敵寇如何兇暴，也不能壓下去的。

本軍之所以有力量，就因為我們能認清羣衆的願望，和羣衆呼吸相通，把羣衆利益看作了自己的利益。在每一個戰鬥行動中，我們都照顧到羣衆的切身利益。自始至終，和羣衆站在一起，沒有羣衆，我們就不能存在於冀中。

民衆之所以有力量，就因為我們實現了「由老百姓作主」的主張。羣衆得到了民主，能够自由發表抗敵意見，這些意見集中起來，就成爲廣大羣衆一致的要求，然後再經過羣衆的組織力量，變成羣衆自己的行動去實現他。沒有民主，羣衆就不能起來，沒有組織，羣衆就沒有力量。羣衆有沒有力量，就是勝負的關鍵。

環境越困難，鬥爭越殘酷，羣衆越感到需要抗日政權，維護本身利益；而要求民主及參加政權，更加積極。冀中於「五一」「掃蕩」後，抗日政府和各級民衆機關，由村代表會到縣議會迅速恢復，羣衆自動要求開會解決問題，要求組織進行鬥爭，在「五一」「掃蕩」前，羣衆對開會還有少數不去的，及「掃蕩」後，一經通知，無不踴躍到會，問題一經解決，羣衆就認真去做，因之抗敵法令能够貫徹到底，抗日政權得到羣衆愛護。冀中抗日政權，山村劃專署，在羣衆面前都是公開的，甚至某些區區漢奸也明知抗日政權的存在，而無可如何。事實證明：當着羣衆起來，成爲有組織的力量時，任何狡猾的敵人也是沒有辦法的。

在今天，冀中的部隊彈藥不繼，用刺刀手榴彈與全副武裝的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冀中的人民因飢餓狂掠奪與破壞，衣食不足，過着空前飢寒交迫的生活，因此捉捕與燒殺，安居不得，過着半穴居半露宿的生活，然而全體軍民都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就是從鬥爭中證實了只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就一定能够把游擊戰爭堅持下去，一直到最後反攻勝利時期的到來。

代 郵

孟晉先生：

寄奉之信被郵局退回。請即見示通訊處以便寄奉稿費。

便寄奉稿費。

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定思

希特勒他們那一幫，常常說他們的主義是民族主義，其實，他們是法西斯主義，但法西斯主義不是民族主義，即和民族主義有些血緣的關係，但它也是從民族主義演進出來的。因此，歐戰爆發時，法西斯主義的人，歡喜過份給大民族重要性的，常常會走上革命的康路，甚至會陷入法西斯的泥坑裏面去。

民族，是一個歷史範疇，不簡單是一個歷史範疇，而且是一定時代中，即上升資本主義時代中的歷史範疇。「封建制度消滅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就是人的組織成爲民族的過程」。而在思想上作爲推動人去進行消滅封建制度和發展資本主義鬥爭的動力之一的民族主義，也就在這過程中產生出來，成熟起來。

「市場，是資產階級學說以爲第一的學校」。

資本主義在西歐各國（英、法、德、意等）開始抬頭的時候，封建制度消滅了，幣制不統一，關卡隨意橫征暴斂，等等，都是銷售商品上的老大難。其次，爲了要利便民族的資產階級銷售商品，須對自己商品保證有「自家的」市場。這就不僅不要有制統一民族國家，爲了要鼓勵生產力的提高，須與企業家自由競爭的權利，這也要求打破封建社會的封建制度。這一些情形，都使西歐各國打破封建制度，發展資本主義的過程，同時也是形成民族的過程，「同時也就是民族變成獨立民族國家的過程」。

所以，在那個時代中，民族主義是一項革命的主義。

到了東歐，情形就有點不同。在那個時候的東歐，封建制度還未消滅，資本主義尚少發展，有些被擱在後面的民族，還求及在經濟上未結成完全的民族。所以西歐各民族發展成爲獨立民族國家時，在東歐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國家，即由幾個民族組成的國家。例如在奧國，政治上設法把那些德意志人，他們也就把地地各民族合併成爲一個國家的事業。在匈牙利，最適應於國家組織的，那時是馬基亞斯人，他們也就成爲匈牙利各民族的中樞，負擔起統一匈牙利的歷史任務。在俄國，那時是以在歷史

上形成的強有力的有組織的貴族軍事官僚爲首的俄羅斯人，担負了各民族統一的作用。

然而，資本主義畢竟也要在東歐各國中逐漸發展起來。商業和交通道路日益發展了，巨大城鎮陸續產生了，各民族在經濟上畢竟也在逐漸團結起來，形成起來了。這種個人被擱在後面的各民族安插生活中心，資本主義，終於把這些民族喚醒了，使它們動作起來。「報紙和議院之發展，「列依哈斯」（奧國的國會）和「杜馬」（俄國的國會）之活動，都在促進「民族意識」之加強」。新起的智識界被「民族意識」所浸透，也就在這種方向活動起來。可惜的是它已來晚了，它雖然已經覺醒起來而趨向於獨立生活，但它們已經不能形成爲獨立民族國家了。因爲它們在自己的道路上，遇着那統治民族中早已居於國家領導地位的「階級」方面極力有反的反抗。例如那時奧國境內的捷克人，波蘭人等等，匈牙利境內的阿爾瓦特人等等，俄國境內的哥薩克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阿比明尼亞人等等，就定這樣形成起來的民族。

民族主義就在這些東歐年輕民族中抬頭起來，推動它們去進行解脫統治民族壓迫的鬥爭，形成東歐的民衆解放運動。

這種鬥爭，本來不是在整個民族與整個民族之間開始和開展的，而是在統治民族的統治階級（有時是地主，如在波蘭的烏克蘭人）與被擱在後面的民族的統治階級之間開始和開展的。這階級的主角也是資產階級。他們也是要求銷售自己的商品，也是要求保證自己有一「自家的」市場，有一「本民族的」市場，他們的基本問題也是市場。

但顯然的，問題自然不會止於市場。統治民族中的統治階級，必然要採取許多反對「異己」資產階級階級限制辦法，以至於變成高壓手段的辦法，於是鬥爭就由經濟範圍轉入政治範圍，如遷移自由之限制，語言之拘束，選舉權之限制，學校之減少，宗教之拘束以及其他等等，就紛至沓來地落到「異己」的頭上。於是被壓迫民族中在各方面受排擠的資產階級，自然就要起來反抗。這種鬥爭，「它就訴諸「本民族」的下層羣衆」，並開始高喊「祖國」，把自己本身的事情，宣稱爲全民的事情，由「同胞」中間召募自己的軍隊以利於「祖國」。

「下層羣衆」，尤其工人羣衆，對於這種號召，是否總是袖手傍觀，認為他們不應當爲反對民族壓迫政策而起來鬥爭呢？不是的，由上層來的高壓手段，也觸及他們，例如限制遷移自由，剝奪選舉權利，拘束語言，減少學校，拘束宗教，以及其他種種高壓手段，其觸及工人的程度，並不少於——如果不多於——觸及資產階級的程度。所以在鬥爭中間也瀰漫着不滿的情緒，所以他們也就在「祖國」旗幟之下集合起來。

這樣興起的民族運動，其內容，當然不能像西歐各國的民族運動似的，到處一樣，它完全要由運動所提出的各種不同要求來決定。而這運動到底帶着多少程度的羣衆性質，也就看所提要求的不同而不同。但一般的講來，這裏的民族運動，到底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前進運動，因而這裏的民族主義，基本上也是革命的。

在其他各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依賴國裏，也發生着與此類似的民族運動與民族主義。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紀，換句話說，到了資本主義老的時期，（被略）民族運動——從而民族主義——的面目及其內容，就完全改變。這時，在西歐各國和美國，民族運動早已完成，因為民族主義也就成爲過去了的東西。而在其他各國以及像德意志之類的國度裏面，民族運動和民族主義就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開去。一個是向着革命的方向，可以舉列寧、斯大林對民族問題的問題提法和解決法，與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爲例證；一個是反革命的方向，可以舉奧國社會民主黨和崩得（立陶宛，波蘭和俄羅馬猶太工人總同盟會）的獨存主義，與納粹法西斯主義爲例證。

列寧、斯大林認爲這個時期的民族運動，乃是一個反對民族壓迫的運動。這種反對民族壓迫的運動，不但是被壓迫民族中的廣大人民有此要求，壓迫民族中的廣大人民也同樣有此要求。因爲壓迫別的民族的民族，其人民也是不能自由的。因此，（一）這時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整個人類解放運動的一部份，其主角，也就不能像過去民族運動那樣是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而是廣大人民即勞動人民大衆；（二）這時的民族解放運動是要以完全民主化爲前提或預備條件，而要達到使所有一切民族（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在經濟上）極密切接近而更加融合的共同目的。或者可以換句話說，這時的民族運動就是各民族人民之間的民主團結運動。要達到這樣一個共同目的

，「就顯然要走彼此不同的具體道路，這正好像從一張紙的左右兩邊走向這張紙的中心點一樣」。就是說，在壓迫民族中的人民尤其是工人大衆，其工作重心，必須在於由他們來宣傳並堅持被壓迫民族的分立自由，這樣來幫助被壓迫民族中廣大人民的解放鬥爭。如果強大的，壓迫的，併吞的民族中的革命政黨只是一般的鼓吹民族融合，而同時却忘記——那怕就是一分鐘忘記——「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佐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張與小民族「融合」（即併吞）——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融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融合」等等——那麼，這樣的革命政黨實際上就是壓迫主義併吞主義的幫兇，我們就有理由鄙視它，視之爲惡棍。反之，小民族裏的革命政黨却應當以「自願聯合」這一公式中的第二個字（即聯合）爲其工作重心；它可以既贊成本民族的政治獨立，又贊成本民族加入鄰近X、Y、Z等國家（當然不是壓迫別的民族的國家）；它無論如何應當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孤獨思想，而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主張使部分利益服從全體利益。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對於民族運動的看法，基本上也是與此相同的。他認爲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力軍是人民大衆，他要喚起民衆共同奮鬥，他說，如果得不到工農大衆來參加，則像中國這樣的民族解放鬥爭是無法成功的。他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當然是指這種民族中的廣大人民）共同奮鬥。他認爲在國際要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在國內也要一切民族完全平等。

針對着這種對民族問題的革命觀點，我們恰恰看到了和一方面主張自由分立另一方面又主張自願聯合正相反對的兩種反革命的民族主義。和自由分立正相反對的是法西斯併吞主義，和自願聯合正相反對的是狹隘的獨存主義。

奧國社會民主黨曾通過一個決議，這決議是要求按民族標準劃分的各區域聯盟的，因此就把前此統一的黨，分裂成爲六個獨立的社會民主黨團——德意志人集團，捷克人集團，波蘭人集團，烏克蘭人集團，意大利大集團以及南斯拉夫人集團。崩得則曾主張：「民族」概念對於猶太人民也是適用的，因而猶太人雖然散居各地，也應有完全的自治權，這樣來使猶太人民從整個的革命隊伍中脫離出去。不過這種狹隘民族主義觀點的獨存主義，不久就被歷史的教訓所粉碎，所以現在可一表過不提。我們且來看看法西斯的民族主義到底有些什麼內容。

（下接四三一頁）

自由中國青年的意志

劉光

不久以前與一位美國朋友閒談時，突然他向我發出一個問題：「你們中國青年很能打仗，很會打日本鬼子，可是你們除了打仗以外，還想些什麼，希望些什麼呢？例如對自己的前途，對自己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的願望與理解，究竟是些什麼呢？你可以拿各個青年層的生活實例，來回答我的問題嗎？」

這一問可使我爲難了，很有點一言難盡的感覺。事實上要解答他的問題，不作比較詳盡的解說，恐怕這位帶點「好奇」神情的友人是不會滿意的吧。當這位朋友提出這個問題的瞬間，一個思想就像觸電似的襲擊着我，我想我們中國的青年，比起世界上任何一種青年來，算是最痛苦，最頑強，也是最能忍耐一種可怕程度的。在這半個世紀以來，尤其這廿幾年中間，中國青年爲了自己的祖國，所貢獻出的力量，所付出的代價，不能說不大，可是關於他們的生活環境和要求，關於他們奮鬥的艱苦和困難的性質，通常不是人們（外國朋友包括在內）所能够體念到的。

從外表上看來，一個國家青年的言行，教育和生活的現狀，是少可以反映出這個民族國家在一個特定期限的發展動趨與趨勢的。不過本質的說來，一個國家的青年生活與前途，是與其本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特點及其規律，是密切相關聯着的。我可以坦白的說，這應當是解答上面問題的方法和出發點，否則就會摸不到問題的真實之所在。

中國青年究竟在想什麼，希望什麼呢？我想我們那一個個青年同胞，都能以作一個肯定明白的答覆：即設大多數的中國青年的想法和希望，完全是一種現代人，進步人類的想法和希望，他們正像美青年一樣，希望自己做一個獨立民族的青年，希望自由，希望民主自由的，進步的和幸福的生活。而什麼侵略主義，獨裁主義，野蠻主義，復古主義等反民主的法西斯思想，這與我們愛好和平自由的中國青年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中國青年有這種特性，就是不容易相信「花言巧語」，或盲目「崇拜偶像」，或承認什麼「恩惠」的。也從不打算屈服於所謂「武威權」的面前，相反地，他「所最關心的，倒是如何去更實在的貢獻出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更快的擺脫這入地獄之命運——半殖民地奴役環境，封建殘餘勢力的束縛。也許人家要反問我們：「抱這種種理想和願望的，恐怕只是青年中的小部份吧」。不，這是全國各階層的青年，大家所共有的意志，儘管他們今天不能夠和不時常在嘴巴上吹吹插插，或在報章雜誌上大書特書的談自誇這個意志。

從五四運動起，這中國青年第一次以羣衆的行動，表現出自我覺醒和民族覺醒的開端，後經過五卅運動，北伐戰爭，抗戰前的北平學生運動，一直到今天的抗戰，這中間是有着不可割斷的線索貫串其中的。當民國四年創刊的「新青年」(那時這個刊物的編輯者還是前進的革命的)，號召全國的青年做一個現代的青年，做一個「自立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讓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新青年以後，中國的青年已經更清楚的認識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的責任與力量。他們開始着手打碎緊繫的套在他們身上的鎖鍊，開始拋棄所謂青年要「少年老成」，「安分守己」，「三從四德」等舊的教條，他們更果敢的追求真理，追求新的生活和人生。這正像當時李守常先生所說的：「青年之自覺，在衝決過去歷史之羈絆，破壞陳腐學說之圍困，勿使死屍枯骨，束縛現在活潑潑地之我，進而發現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讓讓明日青春之我。一若脫絕浮世虛偽之機械生活，以特立獨行之我，立於行健不息之大機軸，和楊柳和去來之變，全其優美高尚之大，不僅以今日青春之我，進發今日自覺之我，並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發來日自覺之我。此而人生唯一之新聲，青年唯一之責任也。」

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爆發，德，奧，俄，匈等國家的社會和民族被這起風暴與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進步之潮之影響，加上國內的危機，北洋軍閥政治的黑暗，中國青年就當這運動的搖籃到爲民族獨立，爲民權自由的偉大門爭之中。五四運動正是中國青年這一鬥爭的起點，象徵和標誌。五四運動所代表的精神即是民族自覺自立的提高，民主和科學思想的發揚，青年思想和個性的解放。以及青年開始重視和珍貴自身的團結，重視和珍貴與勞苦工農大眾的結合。這樣，五四就好比一盞光芒萬丈的燈塔，永遠照耀着中國青年行進的道路。

記得在五卅以後不久，孫中山先生在去年冬天

，在上海廣東路中國學生會演講「救中國之方法」，

演講要點：「四萬萬同胞！……青年們須自決

定其所願欲，苟有所欲，必得成就。諸君或自疑以

為無力，但請君須知中華民國約法上，諸君為國民

之主人，君等苟知所以用其力量者，決不思力之

不足。……我願今女學生運動，不過因激發而興，而於

此運動之期間，收絕倫之效果，可知諸君皆即也

。如使諸君即以正當方法，求求國民政治治下

，向復諸君之權，吾輩當諸君之必成功……

如由諸君所可傳授，則救國之業，儘出他一人之

手，則革命是也。……或曰：革命何難，吾人於革命

尚未厭乎？夫一匪人以革命命人只知破壞，不知

建設，此大誤也。……吾輩之，只具其急於建設，

不能待破壞之完成，所以無用舊物，尙多留意，未

能破壞。吾人雖革去滿清皇統，而尙留陳腐之官僚

多了，我將來我的知識去到社會上當教員，當機

師，當議員，當總長……那不是我為社會的利益麼

。……這正是錯了。我後來仔細想，這種想法不

如閉門說：「為帝國主義，為寄生階級而求知識，

恰當得多……我現在可以大膽的向大家說一句：

我現在求知識的目的，除掉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

放外，沒有別的目的。……這是我與知識青年，用自

己坦白的言語，所說露出的自己的意志。……思想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列強壓迫

迫，封建的束縛，使使中國的青年和學生，一般的

覺着深厚的反抗性和革命性。……所以民國廿七年五月

來蘇俄世界學運的代者柯爾斯滿先生說：「我所碰

到的各國青年中，中國的青年算是政治覺悟最高，

政治，更更同胞的一部份」。……這是有其真確的，不

過這在中國青年看來，倒不是中國青年有什麼「種

族上的優越性」，只是因為他們生在中國，承担着

全人類的。其實，個人的幸福或是倒懸，比較千百

萬同胞的幸福或者受苦來，那是渺小的不足道的。

所以中國的青年把自己的利益和前途，看成人類

大眾的利益和前途是不可分割的部份。……所以中國青

年而然自愛自愛，更更他，更敬自己的民族，

更愛護有利於民族的事業。……一個平凡的人，因

以在中國青年看來，所謂「個人」，「英雄」，「可

以創造一切，決定一切的一個人」，其價值不過是

希圖利己的資料而已。……所以中國青年最痛恨中

國青年「晚進民族」要「同胞又去」的遺教，因

為工農大眾是反對封建的勢力，和反對中

國的柱石。

在今天，中國青年正面臨着一個最嚴厲而又最

艱苦的鬥爭，就是要打倒一個日本帝國主義，要完

成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

國的建設。……在這個鬥爭中，他們承了五四以來中

墨子的思想

郭沫若

這是郭先生最近寫成的一篇研究墨子思想的文章，目的在使大家就此來「平心靜氣的研究研究」。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目前還沒有達到做最後結論的時候，因此對於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上的一些問題，也就很難得出一個最後的定論；特別是對於墨子的思想問題，各家不同的意見很多。郭先生這篇文章提出一個觀點，我們希望今後在我國學術許可的範圍之內，能够繼續發表一些對於這一個問題有不同見解的文章，因為我們相信只有在實事求是的討論中，真理才能顯現出來。

編者

墨子始終是一位「救家」，他的思想充分的帶有反動性——不科學，不民主，反進化，反人性，名雖兼愛而實偏愛，名雖非攻而實美攻，名雖非命而實致命。像他那樣痛窮的士公夫人，一腦袋的鬼神上帝，極端專制，極端保守的宗教思想，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爲了「工藝革命」的代表！我這樣說，有的朋友替我「着急」：（大約因爲我與小強，不識道理），也有的朋友說我「袒護儒家」，我還要與朋友們不必加「着急」，我還是平心靜氣的來研究研究，讓「我」所見到的根據，看究竟是不是偏的。

要談墨子的思想，我首先須得規定資料。墨子自己並不著書，現存的「墨子」一書是漢人所纂集的，其中有些是儒家弟子的著錄，有些是遠不是儒家的東西，所以我們還不好抱着一部「墨子」便細統的來談墨子。要談墨子本人，最好是根據「墨子」書中的左列十篇：

(一)尚賢 (二)尚同 (三)兼愛 (四)非攻
 (五)節用 (六)節葬 (七)天志 (八)明鬼
 (九)非樂 (十)非命

這十篇是各列上中下三篇的，而每三篇的內容都大同小異，只是一番談話的三種紀錄。據家說，根據「非子」一書學「節用」的說法，是分爲「和里氏相夫氏鄧陵氏」三派的。莊子「天下篇」所說的分派情形也太相和同。這十篇各具三篇，正是墨家三派各派的底本彙輯。因此在這十篇之中所含有的思想，

想，比較完備地保存着墨子思想的真相。在這十篇以外的東西呢，那就只好認爲是後來的附益或者發展了。

一凡入必必探探從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言淫泆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暴虐則語之兼愛非攻。

魯論篇中的墨子的這一段話，也正說明這十篇是墨子的「十誠」——是他們的一種主張，而我們則要論墨子本人是不好任意跳出這個範圍之外的。

這十篇之中來研究墨子，墨子究竟是怎样一個面貌呢？

第一，請談談我來研究墨子：

墨子「天志」爲他的法儀，請聽他說：「我言天志，譬若論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天志上）。這是他的一切學術思想的一根香柱。他信仰上帝，更信仰鬼神，上帝是宇宙中的全能全智的至高無上，鬼神要次一等，是上帝的輔佐。上帝鬼神都是有情有感識的，能殺人，能賞人，能罰人。這上帝鬼神是存是無，是不容許懷疑的，但假如要問他何以證明上帝鬼神是存是無，他便告訴你：古書上是這樣說，古史上有過這樣這樣的記載。這

種見解，我認爲是科學的嗎？

據說墨子的人也知這墨子思想的這一個大弱點，便盡力的替他掩飾，以爲他「神道設教」。然而「神道設教」乃是儒家的辦法，在這兒是不好張冠李戴的，墨子也不高興領這一番盛情的呀！或又把經上經下說上說下說經中的一些初步的科學現象披拾來，盡量的故吹誇示，以爲是怎樣怎樣的

程深博大。其書那些粗淺的常識，一部份在造字的當時已經發見了的东西，一部份則已經融會於日常生活中而成了家喻戶曉的事，絲毫也值不得誇示。而且那幾篇究竟是不是墨子的東西，這是一個疑問。即使差吧，但那又何補於墨子思想之為非科學的呢？近代的宗教家每每以科學為其外衣政策之工具，如明末以來的天主教徒，在傳教之外不是同時在傳播歐洲的天文地理醫藥等科學知識嗎？然而科學知識自科學知識，宗教思想自宗教思想，我們是不好混同的呀。

第二，讀讀我來說他不民主：

他的十篇中，幾個在替「王公大人」說話，開腔一聲「王公大人」，閉腔一聲「王公大人」，我替他統計了一下，他所喊的「王公大人」的次數一共有六十七次：

	下	中	上	賢尚
3	19	12	2	同尚
3	1	2		愛兼
1	1			攻非
6	4	2		用節
	闕			葬節
3	3	闕	闕	志天
6	3	3		鬼明
2	2	闕	闕	樂非
8	闕	闕	8	命非
5	3		2	
67				

在這里除掉原來「闕」了的不能計入之外，其中雖有二篇不見「王公大人」的字樣，然都有「士君子」或「天下之士君子」，這「士君子」又每每與「王公大人」連文而為「王公大人士君子」，就是當時的官僚或統治階級的意思。據此，你，以知道，墨子究竟是屬於那一個階級的。

墨子，他是承認舊有的一切階層秩序，而在替統治者畫治策的呀。上下貴賤貧富強弱智愚等一切的對立都是被承認着，而在這些對立下邊施行他的說教。他把國家人民社稷刑政都認為是王者所私有，請看他說「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情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尚同中)，你就可以明瞭了。因而一切的刑政都是自上而下的，在墨子的腦筋中根本沒有由下而上的那種觀念。所以他說「無

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天志上)，又說「自貴且尊者為政乎，自賤且卑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自貴且尊者則亂」(尚賢中)。智愚不亂由於天賦，貴了必然智，賤了必然愚，故貴智與賤愚必相聯帶。因所以貴者智者統天下的思想，便是墨子的政治理想。所謂「一同天下之義，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上同而下不比」(尚同上)。不許你有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甚至行動的自由。要「美善在上而怨謗在下，寧樂在君而憂戚在臣」，「君有難則死，出亡則從」。簡直是一派極端專制的奴才道。但在這兒，推崇墨子的人不用說又替墨子找了一個安全瓣，便是說墨子「是主張民約論的人。根據呢？有的，在「尚同上」與「尚同中」的兩篇。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尚同上)

「……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衆知辯惠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尚同中)

到底是什麼人「明」，什麼人「選擇」呢，可惜文章沒有主格。在民約論者看來，自然「明」者是人民，「選擇」者也是人民，故爾墨子也就成了二千餘年前的中國盧梭。然而在「尚同下」裏面，這同一的文句的主格却明明顯顯出的是「天」。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

明明是「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的鄭一奎老看法，那裏有什麼民約的痕跡？此外也還有不少的證據呢，例如：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政長也……」(尚同中)

「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其為政乎天下也，衆而愛之，從而利之，又舉天下之萬民以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尚賢中)

「三代聖王禹湯文武……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衆而愛之，我所利衆而利之……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天志上)

「吾所以知天之愛人之厚者有矣，曰……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天志中)

照道理上講來正應該是這樣，因為墨子是一位極端的神權論者，他的天必是他的法儀規矩，那有在楚國都立政長這樣重大的節目上，才沒有上帝出來管事的？然而民約論者說自己的主觀拿來給墨子換了根柱之後，於是在經與說裏面也就我尋着民約論的根據了。左邊，我且引列梁啟超的「墨經校釋」裏的一章：

(經)君：臣明(同氓)通約也。

(說)君：以君(？)名者也。(若疑當作約，音近而譌。)

(釋)君同氓云「明乎民之無正長：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立以為天子。……天子既已立矣，選擇天下賢良置以為三公：……諸侯：……遠至乎鄉里才長」。言國家之起原由於人民相約而言，君乃命臣。與四方近世民約說頗相類。

關於這種見解，我在二十年前(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已經做了一篇文章來駁斥過(題名「梁梁任公墨子新社會之組織法」，初發表于創造週報，後收入「文藝論集」)，然而大約因為我不是專家，一直沒有引起讀者的注意，而梁說則深人人心，至今流傳不可拔。其實「臣明通約」，通者統也，約者束也，就是臣民統束，也就是臣民統管，那裏是什麼民約呢？「君以若名」，太簡略，不能保無誤，無法強解。即便要強作解人，與其說「若疑當作約」，無寧說「若疑當作若」。說文「蓋讀若威」，墨子明鬼下「敬謹以取羊(群)」，正直接假為威字。「君以威名者也」，那是很合乎墨子的思想的實際的。

墨子不僅沒有廢除民約論，而且也沒有儒家的禪讓說，他的「王公大人」是「傳子孫，業萬世」的。那他的「一同天下之義」的主張，儘管說的是一「仁君」，但「仁君」是如何產生呢？儘管是秦王如桀紂兩厲，當其時處其世，誰不自以為是「仁人」，為其臣下者又誰不奉之如神明，視如天帝？故爾墨子的所謂「尚賢」，「尚同」，結果只可能流而為極權政治。

第三，論說我來說他反進化：

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由質而文，是一般進化的公例。對於過分的繁文縟禮，如厚葬久喪，而加以反對，這是進化的，但如一味的以不費為原則，以合用為標準，而因陋就簡，那只是阻撓進化的契機。墨子的專門強調節用，除節用之外沒有任何積極的增加生產的辦法，這不僅證明他的經濟思想

的貧困！像「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領缶」的民間音樂，也在所說的之例，簡直是不知道精神文化為何物的一種狂信罷了。

一般人高興的一謂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勿為」的話，以為他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要王公大人的生活以平民為標準。王公大人誰會聽信他的話呢？即便都肯聽信他的話，試問，於老百姓的生活又有什麼改進？真正的革命的主張，我須要知道，並不是要王公大人客氣一點，也來過過平民的生活，而是要把平民的生活提高起來，使平民同等地得到王公大人們般的享受。教王公大人節用，這不是替老百姓說話，而替王公大人說話。他是怕老百姓看了眼紅，起來鬧亂子啊。老百姓定節用可節的，用不着再聽你的什麼節用的教條，即使你就要反對音樂吧，然而在一春耕夏耘，秋斂冬藏之餘也還是需要敲鼓士餘，擊擊瓦缶以舒舒筋骨的。王公大人呢？又誰聽信了你來？他倒樂得你使一些不安分的人更不安分了，多謝了你這位黑衣教士的苦口婆心呀！

第四，說我來說他反人性：

墨子的見解有許多地方不近人情，譬如他主張無情欲，謂「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貴義篇)。不必說這樣的事情不可能，試問愛欲去盡，「仁義」又從那裏來？主張「去愛」的人同時又是主張「兼愛」的人，這矛盾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解決。大約對於一切都愛了也便是等於沒有愛了的吧？

但是最近近人情的是他所定的男女婚嫁之年。他說「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節用上)。丈夫二十歲家裏還可以說得過去，女子十五歲人，那實在太說不過去了。十五歲他的收入有限，當然不到十五歲便可以事人。事未通，自身的六育都還沒有完全的女子便要叫她去做母親。墨子真可以算是沒有人情的忍人！

墨子思想的根本罪惡是把人民當成王公大人的所有物，也就給王公大人所有的五穀六畜一樣，五穀番熟，六畜豐肥，那自然便替王公大人增加了財產。他把人民看成為兩重的生產工具，一重是生產衣食，二重是生產兒女。拚命強迫，不准偷惰，趕快耕，趕快織，衣食的生產便可以增加。拚命早婚，不准延宕，趕快生，趕快育，人口的生產便可以加倍。人口增加了，同時也就是生產工具增加了。他主張非攻，主要的理由之一即是損失人口。他主張短喪，主要的理由之一也就是「敗男女之交」。這樣只把人民看成

工具的及人性的宗教思想家，竟被人認為是「工藝革命的代家」，我真不知道這根帶是從哪地方看出來的！

第五，怎麼說他名雖兼愛而實偏愛？

墨子的「兼愛」的主張最動人，也最奇特。本來儒道兩家都主張愛與慈，但沒有墨子的「兼愛」。大約墨子在這兒是有點發瘋心理的：「愛吧，愛吧，你還比我更愛！這就把愛推廣到無限了，其實也就把愛沖淡到沒有了。所以墨子一面主張「兼愛」，一面又主張「非愛」，大約在他的內心中或者下意識中，是把「兼愛」作為「非愛」的手段吧？

這些我們且不必管它，我的且問「兼愛」究竟要怎樣才可以辦到？

墨子是把這問題看得非常簡單的，一句話歸宗，便是所謂「行下效」。他「苟有欲之，則求為之」，在「兼愛」一篇中翻來覆去的不知道說了多少遍。然而問題是這樣簡單的嗎？

在我看來，墨子只是在那裏唱高調，唱人。他的最大的矛盾是承認着一切既成秩序的差別對立而要叫人去「兼」。他「兼」了，則「強不擾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兼愛中)。真天下太平呀。然而我問他，天下的人，是強者衆者富者貴者多呢？還是弱者寡者貧者賤者多呢？人的生活，是強者衆者富者貴者多呢？還是弱者寡者貧者賤者多呢？不用說這前未安樂於後者。既承認着這一切的差別，教人「兼愛」，豈不是叫多多的不安樂者去愛那少數的安樂者？而少數的安樂者也不妨作一點愛的施予而受着大多數人的愛了。請問這所謂「兼愛」豈不是個愛？

第六，怎麼說他名雖非攻而實美攻？

墨子是把攻當成盜竊來看待的。他是承認着私財財產，承認着國家的對立而立出他的「非攻」的見解的。在儒的範圍內的「非攻」便是在家的範圍內的「非盜」。他把私產看成為不可侵犯的財產，故剛對國家後學竟主張出「殺盜非殺人」的理論。所以他的「非攻」論，我且先不必問他可能不可能，僅照他的理論的推衍，必然會流而為對於攻伐的讚美。果然，請看在一「非攻下」那便有一段話

「今遠夫好攻伐之者又飾其說以非于墨子曰：以攻伐之為不義，非利物歟？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而何故也也」

「于墨子曰：于未辯吾言之類，未明其說者也。彼非所謂也，謂誣也。」

就這樣只要換一個名詞或口說，那征伐便又成爲「聖王」的事了。我們不必說許墨子的自相矛盾，因爲他的理論總該是這類的。因爲你既承認着私產，當然沒有方法非盜，你既承認着國界，當然也沒有方法非戰。問題只是戰與非戰的不同，墨子所謂「誣」大約就是非戰，所謂「攻」就是非戰戰吧，但主張攻伐的人雖個又肯承認他自己是非戰戰呢？墨子代罪，大家都能够振振有辭，總之攻與非戰，日寇之攻中國英美，不都是都有「番大戰」的口實嗎？墨子的「非攻」只是在替侵略者製造和平攻勢的烟幕而已。

由「非攻」更演進而爲「無門」，那更等於定判了被侵略者的武器。耕柱篇裏面有左列一段話：

「子夏之徒問於墨子曰：君子有門乎？墨子曰：君子無門。子夏之徒曰：狗彘猶有門，惡有士而無門乎？墨子曰：優矣哉，言則稱於湯武，行則賢於桀紂，傷矣哉！」

人總是人，受了非攻的侮辱，爭取應享的權利，當然要鬥，湯武不是也還在「誣」嗎？我真不知道何以「誣」得起來。在這兒且引一段故事：

「魯君謂于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也乎？墨子曰：可。願主君之上者，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備四隣，請候，敵以而事齊，庶可救也。非此，則無可爲者。」(魯公篇)

這簡直可以說此無條件的投降主義！「非攻」而走到這樣的極端，不正是在鼓勵侵略者的攻伐嗎？

第七，怎麼說他名雖非命而實命？

墨子的主張最能引起現代人的同情的可以說就是他的「非命」。他的「非命」是對抗儒家學說而發的，但是儒家主張有命說的本意和墨子所非的却正相反對。儒家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那是教人聽命權威而浮雲富貴。生命的修短作爲自有定數，並不有意求長，也不存心怕短，因此世俗的生殺之權也就不足以及威脅一個人的意志。富貴視爲偶來之物，並不有意求榮，也不存心避辱，因此世俗的予奪之權也就不足以左右一個人的出處。在這樣的信念之下，一個人可以保持着他自己的尊嚴，可以自由自在地「殺身成仁」而「舍生取義」，可以自由自在地不淫於富貴，不移於貧賤，不屈於威武。試以孔子的態度爲證吧。

猛烈地反對了墨家。管子非墨亦非儒，墨子春秋則盡了祖墨的能事，此外的事實則非所知悉。

在我看來墨子的失傳則是由於自己瓦解。第一是由於墨家後學多數逃入了儒家道家而失掉了墨子的精神，第二是由於墨家後學過分接近了王公大人而失掉了民衆的基礎。

何以見得墨家後學多數逃入了儒家道家呢？這在墨子書中便可以取證。第一篇的「親士」就是稱讚儒家與道家的理念而成，第二篇的「修身」，更完全是儒家的口吻。經上經下，說上說下，大取小取諸篇是受了名家的影響，但名家是起源於道家的。像這樣拜倒別人的衣鉢，把墨子的本來是「不文」，「不辯」的主張粉飾了起來，那嗎何須乎還要你墨子呢？理論系統比較更完整的儒家道家具有，因而墨家便同化了一大半。

何以見得墨家後學過分接近了王公大人呢？這見且把兩段故事先引在下邊。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子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無朋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敵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言，則請先死以除路。遺屍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曰：傳鉅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呂氏春秋上德篇）

「腹髻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孟憲王曰：先中之年老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毋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髻對曰：墨子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毋爲之賜而令吏毋誅，腹髻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氏春秋去私篇）

就孟勝的故事來看，事情真是壯烈，確確實實是實踐了墨子的主張：「君有難則死」，而表現了「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精神。但這樣的殉死不

正是奴隸道德嗎？而且所死的陽城君是爲攻殺一國的大臣而犯了國法的人，墨者之氣爲什麼只以私誼死而忘記了「上同」的大義呢？更值得討論的是墨起的被殺。吳起在當時是革命的政治家，他輔佐楚悼王「毋不急之官，發公族疏遠者，以擔養戰鬥之士」，因而遭了「貴戚」的衆怒，而被「宗室大臣」射死了。可見射死吳起的「宗室大臣」或「貴戚」都是一些反革命派，陽城君也正是這「革命派」的一人。孟勝是陽城君的先生，而吳起是出於儒家，呂氏當樂篇稱其「學於曾子」，史記儒林傳稱其「學於子夏」。那嗎孟勝所教於陽城君的不也就可以想見了嗎？而且在這一段故事後面不也就可以反映出墨子思想的實質了嗎？

再就腹髻的故事看，也真可以說是大義滅親，但在國法之外，有墨者的私法，這和墨子「尚同」之義似乎也相違背。但我在這故事裏面又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暗影。秦惠王稱腹髻爲「先生」，可知這位鉅子也是國師的頭一個人，頗受尊禮。但秦惠王也是以同一的反動勢力而車毀了商鞅的角色，而這位「墨者鉅子」又正是他的「先生」，真是未免太巧了！

墨家有「鉅子」，大概等於後世宗教的教祖，莊子天下篇說：「以且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可知且子或鉅子的地位是很崇高的。本來墨子的學說素以「王公大人」爲其對象，故在墨子生前，他的勢力已就不小，他可以派他的弟子出到各國去做官，而且有時還可以派人去「求諸地也的職位。齊楚宋越衛魯，都有他安置的人，他的教團的維持實也靠這些弟子們的捐款。他的派頭似乎比孔子還要來得大。更看他死後的遺囑，一位做楚陽城君的老師，一位做秦惠王的先生，他們的上下工作，可見得是做得並不弱。就這樣，歷代的教祖們都和「王公大人」接近，他們和民的關係，不是就愈見疏離了嗎？

在這兒有更進一步的見解，便是墨家有擁護秦的嫌疑，近人方授楚著「墨學源流」一書，論到墨學之亡，有着這樣的一項。他的說解我覺得頗爲透闢，今摘錄之如下：

「秦滅六國，本與墨家非攻之義不相容也，然秦於內實尚同之義則有相近者。且自孝公以來甚排斥魯魯之儒術，而若書以禮樂詩書諸事爲六藝，荀卿之答應侯范雎既譽秦風俗之善，而終曰「其殆無儒耶？」（強國篇）李斯雖爲荀卿弟子，秉政則焚詩書，可見其與儒家之不相容矣。當昭王時秦尚無儒，而在秦惠王時則墨者鉅子腹髻已居秦而與惠王接

近，又有清廷果在王左右，是秦已有墨也。其後關係如何，無從考證，然實有烟瘴之痕跡。如墨家之徒謂子與儒家之徒達無心相見講道，雖不稱墨家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論衡福虛篇）。本書明鬼篇秦託為鄉，九十作十九，則以本書為是也。……竊疑秦國已盛之後，仕秦而墮落之墨者，造之以烟瘴王也。（墨學源流上卷二〇八）

方氏云：「陳涉與賈之起也，儒者實曾參加」，於此引史記儒林傳為證：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精神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變其業，憤怨而憤憤於陳王也。」

又云：「墨家則雖參加，似不為顯者」，於注中標出墨論論喪葬第十九大夫及文學的對語以為附證。

其大夫曰：「成不陳勝……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楚魯諸儒精神之徒、肆其長衣，……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為臣。孔甲為涉博士，卒俱死陳，為天下笑。」

其文學曰：「陳王赫怒，爪牙為天下首事，遺蹤因而儒墨或干之者，以其無王久矣，道術不得行，自孔子以至子孫，而秦復重禁之，故憤憤於陳王也。」

案此文措辭立意完全是抄襲史記，而在「儒」之外加上了「墨」，但其本身已足以證明是抄襲者的妄作聰明，實屬添足。試問：墨者何以也會「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呢？故儒墨家對於陳吳革命的參加，實屬莫須有的事。方氏的說法頗新穎而有見地，但可惜他是服膺墨學的人，雖然「讀醫得問」，但不肯重傷墨家，故爾未能探跡的闖入。據我看來，這兒是大有開發的餘地的。

根據鉅子腹某的故事可知秦惠王時墨家已有集中於秦的實際，此外還有田鳩鉅子等人可為佐證。

「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

道乃之楚乎？」（呂氏首時篇，又淮南道應訓）

此田鳩兩見於韓非子，一見外儲說左下篇，應楚王問墨子「言多而不辯」之故；又一見問田篇，係答徐渠之問，無與宏旨。漢書藝文志墨家有「田棟子三篇」，班固注云「先韓子」，蓋即以韓非子即是田鳩。近人錢穆謂田棟亦即田秦，一名一字（見所著「墨子」百科小叢書本）。考呂氏常樂稿謂「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秦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可知許犯田秦均墨門之顯學。余亦許犯即孟勝，而雅雅謂「犯勝也」，名犯字孟勝，義甚相應。田秦即田鳩，亦即田棟子，緊與鳩一勝之聲，與子當為字。竊疑為續，何也？義與韓非子，由韓轉鳩，由鳩轉棟。稱「宋之田棟子」者，乃孟勝傳鉅子位時喪于居於宋，不必即是宋人。如是，則墨家鉅子可得一傳授系統，墨子為第一代，禽子為第二代，孟勝即許犯為第三代，田棟子即田秦田鳩為第四代，嚴譚為第五代。田鳩入秦當早於釐子，蓋老于秦，而傳鉅子于釐。故田鳩入秦，實即墨學的中心移到了秦國。

其次是謝子入秦的故事：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說，時時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感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悅，遂辭而行。……惠王失所以為聽矣。……此史實所以得傳墨以人，罪莫不辜，罪莫不亂，國幾大危也。……今惠王之志也，形實皆皆焉。』」

此事見呂氏首時篇，亦見淮南子脩務篇，唐姑果作唐姑梁，又見說苑，謝子作謝子，唐姑果則作唐姑。考惠王在位凡二十八年，三時受說，則為王年尚不及五十歲。呂氏以為「衰老」，蓋其人實未老先衰，所謂「一少主」實指惠王之後嗣者，舊注以為指惠王，大謬。

唐姑果當即謝子之弟子，即弄鬼的史實大約也是同門，彼輩類而及，這些都是「仕秦而墮落之墨者」。此時釐子或已死，唐姑果既見「親」於王，而東方之墨者復不遠千里入秦以事說說，此可見墨學之盛。墨者入秦，目的自然是望奉行其學說，不用說也是認秦為可以行其學說的。在這些地方和儒家正相反，儒家不高興秦，秦也不高興儒家，儒墨學說的相異，即此也。是以想見的。墨者與秦王既相和，我們更說秦法之中有墨法注入，絕不會認為是無稽之談吧。

秦自惠王車裂商鞅以後，歷代的丞相如張儀，樞星疾，甘茂，魏冉，范

行由即速於威權，行直則歸於德。侯（韓子顯學高）。會子也。曾聞大勇於未平矣。自反而不縮（直），唯相寬博者不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假使儒家也要認任德為其嫡義，難道又說不認德而認勇而認德自備，任德自任快，古人並不會混同，我們也不好任意混同的。大抵在儒學之中均曾有任快者流參加，倒是實在的情形。看呂氏春秋的章句論吧：

「子張魯之鄰家也，趙源乘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胆也，學於子夏。高句，魏國之勇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隱多，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者，刑戮死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於學也。」

這些未成爲儒學之師的六位先生，應該才是所謂任快，此外還有屈將子的一段故事，見平御覽四百三十三所引的「胡非子」佚文，也是以證明儒與快的關係，不拍麻煩，把它抄抄在下邊：

「胡非子修學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門，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胡非子曰：『將聞先生非門，而將好勇，有幾則可，無幾則不可。』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持棒，折兇豹，持熊羆，此一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斬蛟龍，掃毒蠱，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就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遊匠之勇也。關必刺，視必殺，此武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愛之，三日不食。曹翹聞之，鳴佩而往，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過師則可，不退，臣請擊頭以血滅君矣。』桓公懼，知所持。管仲乃勸甲之而退。中曹翹曰：夫，甘步之上，在衣柔服之，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千之亂，亦君子之勇也。』胡非子曰：『公將何處？』屈將悅，乃解長劍，解危冠，請請弟子焉。」

這兒所說的「五刑之勇」應該就是「以武犯禁」的任快之勇，這是爲墨者所不取的。而屈將子「解長劍，解危冠，而請爲弟子」，也可以見到，墨家的約束，平常是不帶劍不帶危冠。光顧韓子五等所說的「亂法者罪，而將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墨者以私刑裁」，可知胡先生不一定盡指墨，而墨者中決不會包含墨子，認快爲是，也不過是在替墨子爭門面，然而大非事實。

（三十二年八月六日）

（上接四二〇頁）

法西斯民族主義，一方面是大民族「融合」小民族的併合主義，另一方面又是教唆各小民族自相殘殺的挑撥離間的分化主義。這種分化主義，爲的正是便利於它去把那些分化了的小民族一一「融合」於自己。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德國就存在着一種大國的社會沙文主義。在那時，德國的民族運動實際上早已完成，而當威風第二却還在向外「發展」——侵略，去「融合」比利時等等時，沙文主義者不去反對這種併合主義，反而要德國的工人大衆跟着威風第二，保衛他的「祖國」。這可以說是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將道者。希特勒更利用戰敗後的德國人民對凡爾賽和約的不滿情緒，拚命鼓吹大日耳曼主義，妄想由此來建立他德意志帝國的「新秩序」。他一面「融合」了奧地利與捷克，同時又對波蘭的普魯士的小民族使之互相對立，互相仇視，終於破他一一「融合」了。法西斯也是同一伎倆，它一方面說日本和中國是同文同種，要與中國「融合」，乃至「融合」，同時又說黃種人和白種人不能並存，要把白種人趕出亞洲乃至太平洋，以便利它來把太平洋上的各小民族一一「融合」了去。它對蒙古，鼓吹大蒙古主義，結果是泰國波克「融合」去了；它對蒙古，又鼓吹大蒙古主義，大同族主義等等，妄想使蒙古，西藏等，離開中國而去與它「融合」。一句話，法西斯民族主義，首先是把它自己這個民族捧上天去，說古今中外只有它這個民族文化最高，品質最優。其次是把別的民族壓抑一頓，說它們中的任何一個無論如何，總有某一方面在它自己之下。其自然的結語，當然是它這民族決不願有，也不會有融合於別民族的地方，只有別民族融合於它自己，或者說，別的民族，無論如何是終於要融合於它的。至於民族中的廣大人民，那當然在民族運動中不會有什麼地位的，他們只有無條件的跟着領袖跑而已。

這樣的法西斯民族主義，不但和孫中山，列寧，斯大林對民族問題的看法完全正相反對，就是和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也是背道而馳的。

太平天國反清戰爭的戰略研究

華 崗

黑暗中的躍步——向阻力
最小的地方進軍——北伐
和西征——楊韋享變後的
太平軍——戰略的結論

黑暗中的躍步

太平天國革命是民主性民族性的農民戰爭，是以反清戰爭的雄師出現的。因為自滿清入主中國，在中國就形成了一種變質的封建專制與民族奴役關係：一方面地主豪紳、高利貸者與商業資本構成了剝削農民與手工業工人的三位一體，而滿清皇帝就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地主，他直接掠奪漢族人民的土地，把所掠奪的土地一部分歸自己管轄，稱為皇室莊田；一部分分給皇族王公，是為宗室莊田（或稱封地）；另一部分分給滿州軍隊，變成所謂旗地。此外，尚有所謂駐防莊田、屯田、官田、學田、寺廟地產等等。滿清政府又利用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以積累財富，供給自己的揮霍享樂，因而助長了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參與封建剝削，使農併土地更趨嚴重。

同時，滿清政府對於漢、回、蒙、藏、苗、苗諸民族，採取奴役壓迫政策，施行殘酷的屠殺，所謂「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不遠是傳聞至

今的兩個較大的流血慘劇；其實，有清一代，類似這樣大規模的虐殺，正不知有多少。如果說清室的實際就是利用漢族諸被壓迫民族人民殷紅的鮮血所染成，也決不能說是過分。

加以鴉片戰爭之後，清庭無恥媚外和壓抑人民自救運動，廣更人民自救抗敵的平英團，遂慘遭撲滅。而且清庭既到地賠款，因益加重苛捐雜稅，而貪官污吏橫行，結果「官逼民反」，中國遍地就盜匪如毛了。當時廣東廣西連年災荒，哀鴻遍野，富者創履練以自固，而貧民「客家」飢寒交迫，呼籲無門，這就是促成太平天國革命的直接原因。

沒有如上所述這樣深厚的社會根源與民憤因素，太平天國革命不可能取得這樣豐富的力量，進行這番規模廣大的摧掃中國的民族戰爭。因為滿清政府是當時黑暗的化身和一切矛盾的集中體，是幾萬萬中國人民痛苦怨憤的對象，所以這一民主性民族性的農民戰爭，就以反清的姿態而出現。

爲了便於活動與借助宗教對於羣衆的凝聚力，

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等太平領袖，就以上帝會傳教說有的根據。武備。到道光末年，因洪、馮、楊等走清廷的結果，上帝會信徒日增，遍及桂平、武宣、象州、藤縣、藤川、博白各州縣，形成一種很大的政治勢力。圍繞着楊仗術的上帝會徒，上帝會則以「客家」會衆爲剝削、燒炭工人的精神團結以爲對抗，於是水火自盡，爭鬥益趨劇烈。適慶遠、思恩、南寧等處盜匪猖獗，清政府令向榮、張必勳馳往鎮剿，上帝會乃利用時機，從容佈置準備起義。

到一八五〇年，即道光三十年，滿清官吏逮捕上帝會徒馮雲山、韋昌輝等，並加緊勒索燒炭工人，於是上帝會忍無可忍，遂由馮雲山領導起義於金田村。最初金田村起義的農民與燒炭工人雖只有一千三四百人，但石達開在白沙，黎日綱在博白，蕭朝貴在陸川，亦同時起事，而貴縣林鳳翔、李開芳，大黃江的龐大綱等，亦分別率領起義人民趕到金田村會合，合計就有一萬六千人。

金田村起義是中國漢族人民在當時滿清黑暗統治之下奮起鬥爭的一大躍步。滿清政府一直用殘酷的手段屠殺反抗滿清統治的漢族人民，以鞏固其反動統治。但在滿清政府殘暴的壓迫之下，中國人民，特別在農民羣衆反對滿族地主豪紳的鬥爭，遂在太平天國以前就已興起，並發展成爲連綿不斷的農民戰爭。這些農民戰爭，正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最先的先驅。這些先驅運動，最著名的有一七七四年山東高唐的王倫起義，一七八一年甘肅回民馮明心的起義，一七九三年至一八〇二年北方五省的白蓮教起義，一八〇〇年的海盜起義，一八一三年天理教的起事及稍後發動，一八二二年河南救民黨的暴動，一八三三—一八三五年湖南武岡的農民起義，一八三八年貴州黔北的農民起義等。這些農民起義的政治目標，都是反對滿清政府，但它在組織方面都沒有提出更明確的主張，而且缺乏組織性。太平天國一方面繼承了這些起義的英勇鬥爭，同時又把中國農民戰爭提到更高的階段。

向阻力最小的地方進軍

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韋昌輝等在金田村開始起義，其勢即不可侮。清政府因廣西督辦劉長祜不力，罷其職，改派同榮爲廣西提督，劉長祜爲副提督，移兵桂林，遣光緒三十年十一月洪楊起義，清副將伊克坦布被殺。洪楊既得初步勝利，乃於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一月進佔大黃江，分攻武宣、桂平、貴縣、平南諸邑，前鋒及到象州，都基向阻力最小的地方進軍。

滿清政府感到恐慌，派賽尚阿爲欽差大臣。八月，賽尚阿攻太平軍，烏蘇泰與向榮分道追擊，而太平軍改趨大黎。這時烏蘇泰被阻山內，清軍勢力分散，太平軍乃反擊向榮軍，遇雨，官軍無鬥志，而太平軍攻其所不守，向榮軍大敗仗，閏八月

太平軍打進永安州。至此，太平軍開始建立政權，號太平天國，洪秀全被推爲天王，楊秀清被封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各王均受東王楊秀清節制。此外，又封洪大全爲天德王，秦日綱、胡以洗等爲丞相軍師。這一天是清咸豐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太平軍改元爲太平天國元年正月元日，亦即西曆一八五二年二月四日。

滿清政府見太平軍聲勢日大，益感恐慌，急命欽差大臣賽尚阿，調集清軍數萬圍攻永安州，向榮統北路，烏蘇泰統南路。太平軍因這時向不利與清軍作戰，祇能以游擊戰和運動戰取勝，即於太平元年二月衝出重圍，北趨陽朔。清軍腰擊於山岡，天德王洪大全被捕，壯烈犧牲。適遇大雨，清軍得不到糧餉的接濟，太平軍乃集合力量猛擊清軍，殺清總兵、副將等，盡光甲、鄭鶴齡，清軍敗退。太平軍因得補給，三月進佔桂林，烏蘇泰跟蹤追擊，至六塘墟，離桂林僅六十里，太平軍奮力反擊，清軍復大敗，烏蘇泰中砲死。

太平軍乘勝佔桂林，因向廣防守堅固，太平軍圍攻不克。四月，官兵去興安，攻克全州，入湖南境。軍事指畫多藝術，就在一旦發覺敵方防守實力復強，而自己的力量還不足以壓倒敵人，就另選目標，向阻力較小的地方進軍，讓敵人來應付你，而你的可運動自如，「乘人之所不及」（孫子）；而且迅速和流轉是運動戰中爭取主動的要件，太平軍拾桂林而攻興安全州，是運用這一戰略的成功例子。

太平軍既入湖南境，乘湘水盛漲，擬順流直取長沙，南王馮雲山乘舟先行，大軍隨後。清軍江忠源看到這一着，急提裝衣渡，渡口很狹，夾岸多林木，伐木爲堰，張旗幟疑兵。太平軍果被江下，忠源振聲之，擊斃兩營夜，太平軍挫敗，南王馮

雲山陣亡，太平軍損失了一個優秀的領袖。於是太平軍在戰略上不能不改攻郴州，進佔江華、永明、嘉禾、藍山、桂陽、郴州，軍勢復振。這次太平軍的吃虧，是出於自己戰略意圖與敵方所從悉，走入敵方的圈套，以致上當。幸而他已够機靈，從危急中拔出自己的力量，攻取道州，把江華、永明、嘉禾、藍山、桂陽、郴州、這一塊地盤，變爲自己的活動範圍，依然保持了攻擊的優勢。

太平軍由郴州進駐永興，徘徊未進，西王蕭朝貴獨率死士數千人，克安仁、醴陵，進攻長沙，以兵力單薄不能合圍。清軍援兵至，而楊秀清以蕭未進軍，不予援助，蕭大憤，力攻南門，中砲陣歿。洪楊乃率全軍大圍長沙，以地無險可守，被清軍決三次，但清軍堅守，終未攻克。長沙久攻不下，清援軍四集，太平軍轉被包圍，糧草斷絕，軍心渙散，逃亡者日衆。

這時候，太平軍真到了一個困難關頭，幸而楊秀清想出了一條避重就輕、避險就安的妙計，趁着清軍幾十萬都聚長沙，太平軍乃於一牛解開去，渡湘水而西，故意分小隊走湘潭，清軍遂盡向湘潭追擊，而大隊從容走寧鄉、益陽，出臨澧口，渡洞庭湖，逼岳州。岳州文武官棄城不守，太平軍不戰而佔岳州。盡取舊城吳三桂軍械砲位，增強太平軍武裝，分乘大小木船五千隻，蔽江而東，破漢陽，佔漢口，以鐵索繫船爲浮橋，渡江而攻武昌。太平二年（一八五二）十二月十二日（陰曆初八日）

以地雷轟擊了城，遂克武昌省城。這時一方面摧毀了反革命的軍事堡壘，一方面擴大了革命軍羣衆中的影響，新加入戰鬥的羣衆多至五十萬，滿奴以謂五十萬男婦盡是俘虜，這簡直是將太平軍神話化了，太平軍這一次行軍的神速與戰略戰術的成功，

在世界戰爭史上都佔着很光榮的位置。進軍應選擇阻力最小的地方，什麼地方阻力最小呢？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阻力最小，敵人最想不到地方阻力最小。所以擒虛與擒實，為收效最大的軍事行動。孫子十三篇曾說過：「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又說：「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戰略的用處，正是使便每一次戰鬥中，能在時間上空閒上，都使自己處於最有利的環境，而強迫對方處在最不利的形勢之下。如果太平軍死死圍困長沙，不知道改變方針，必然會陷於被清軍內外夾攻，或竟有被撲滅的危險。所以太平軍這一避實擊虛西擊東的戰略，不僅挽救了太平軍，而且發揮了運動戰的長處。太平軍又常常使用運動及巧妙的側背威脅代替正面戰鬥而取得勝利。所以太平天國的士兵說：「我們的天王東王發明了一種新的作戰方法，他不用我們的槍打仗，却用我們的腿打仗。」

一八五三年一月太平軍率五十萬人，沿江而下，在武穴擊敗兩江總督陸建瀛所部官軍，下九江，佔安慶。二月十日下午南京，即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國政府，并改稱南京為天京。太平軍自廣西金田起義，到佔領南京，為時不過兩年三個月。出廣西，走湖南，破湖北，歷江西，經安徽，入江蘇，橫掃千里，雖有幾次遭遇挫折，結果均能轉敗為勝。

太平軍在初期所以有這樣大的勝利，是因為太平軍是新型的革命軍隊，代表當 被壓迫民族（漢族）和被壓迫的人民，反滿和反對封建官地主的民族仇恨和革命情緒，是異常高的。太平軍各將領都能發揚革命的優越，發揚革命軍的進取精神。在決定戰略戰術時，一般說來，尚不被動，而能主動，軍事行動不遲緩，而能迅速和機動；不採取消極的防禦，而採取積極的進攻。加以太平軍很

少損害人民的利益，反之，人民對於太平軍得到了些利益。因此，人民擁護太平軍，軍民關係尚好。如陳恭祿所云：「太平軍自湘入鄂，勢如破竹，掠取城市財物，絲絲有餘，不擾鄉民，反而分恤貧苦之人，又豁免三年錢糧，貧人爭先附之。」（見陳著中國近代史第一四六頁）。反之，清軍與人民關係惡劣，清軍官兵在營中吸食鴉片，聚賭賭博，出營強奪人民的財產，編募民間婦女。「清軍湖南人湘，姦淫搶掠，湘民恨之切骨，稱頌太平軍之不姦殺焚掠。張德昌於賊情彙編曰：賊至爭先迎之，官軍至皆罷市」（同上），可見當時清軍與人民關係之惡劣到如何程度。

北伐和西征

一八五三年二月，太平軍攻下南京，在政治上設府定都，制定了種種新的法令和制度，如天朝田賦制度等，凡「清季之廢科舉，尚新學，禁吸煙，重衛生，戒鴉片，崇女教，民團之易服制，均屬擬法，提倡新思潮等，莫不於是時會集一度之試驗」（見太平天國野史序）。在軍事上，則派敵進兵北伐和西征，分兩路進軍：第一路為林鳳翔、李開芳所統率，先後攻陷鎮江、瓜州、揚州，即留會立昌部隊據守揚州，林李自己則率比伐軍於三月渡江入皖北，進臨淮關。四月，克鳳陽。府，與吉文元合軍入河南，克永城。五月，破歸德府，殺清參將正倫，知縣呂贊揚等。進攻開封，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不克攻城，而清將派軍圍四

圍，乃解圍去。過朱仙鎮，破中牟、鄭州、滎水、鞏縣、渡黃河圍攻懷慶。為清軍總辦羅綱所害，鞏縣大將吉文元、林李乃長趨而西，破曲沃，克平陽府，清軍驍將之，鳳翔開芳求援於天京，楊秀清派

朱錫珪、黃益善往援。黃六合，中伏兵敗。於是錫珪率軍入河南，而黃益善則率眾走山東。此時會立昌亦已奉命率部北伐，抵山東，黃益善合力佔臨曹縣，以眾寡不敵，被清軍打敗，會立昌黃益善俱戰死於黃河。

朱錫珪入河南，勢稍振，會鳳翔開芳被困於鹿，往援之，是時鳳翔已攻陷深州，距北京只有六百里。既而被清將勝保所擊退，乃收斂天津，不克還據海。更分兵屯駐獨流楊柳青等處，以為犄角之勢。時值大雪，南兵不習寒，又因軍糧不足，不克渡河。於林鳳翔自軍連頓，李開芳與朱錫珪率部合攻高唐州。清軍見林李分兵，乃命僧格林沁率大軍圍連頓，鳳翔因勢孤無援，軍士疲餓至不能戰。僧格林沁乃移師圍高唐州，開芳錫珪以糧盡突圍進據高唐州。僧格林沁不敢與戰，竟擱開運河水淹死太平軍，李開芳朱錫珪也。鳳翔之後，為清軍所殺。

太平軍北伐的失敗，是由於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在軍事上沒有實行以攻為守的方針，沒有集中自己的主力去圍攻清軍的最後根據地——北京，沒有乘敵人慘敗之際，迅速殲滅其人。當時清軍派林鳳翔李開芳統率兵力去進行北伐，後來雖然派出了朱錫珪、會立昌、黃益善去援，但兵力亦很少，前後兩次出師，共計不到十萬人。而且當林李轉戰北方數省之際，並沒有不斷給他們以補充接濟，聽任林李孤軍深入，至犯兵家大忌，因以失敗。正像林鳳翔被捕後供詞所說：「吾孤軍深入，犯兵家之所忌，取敗宜也，且我為漢族戰而死，死亦得所。」這話說得多有條理！他真是真正為漢族解放而戰，他目的與血是為太平天國的理想而戰，可是

身當敵，每有得到天以應有的援濟和補充，結果是因孤軍苦戰而失敗。他以為必能而戰死，死固得所，但是北伐軍一旦失敗，清廷即可重振旗鼓，集中力量來對付天京，這未必不是太平天國後心腹沒的一大因素。

林李北伐師出發後，太平天國以武漢為天京上游，不宜委棄於清廷。於是東王楊秀清自將征湖北，任石祥貞為前鋒。同時更分遣胡以洗等四將，繞道安徽，下桐城，破集賢關，於一八五三年五月再克安慶。八月陷九江，九月入湖北，是時太平軍乘日趨部更由安徽的桐城逼進蘄州，胡以洗復率軍會攻，與清軍大戰，清軍健將江忠源戰死。湖北的黃州亦有大戰，太平軍大破清軍，鄂督吳文鎬死於亂軍之中。又敗清水軍，殺其統將唐樹義，遂乘勝於一八五四年元月復取漢陽，楊秀清命石祥貞率步兵趨武昌而上，破岳州，而以漢陽兵攻武昌。五月石祥貞自岳州還，會攻省城，城守軍譚以，巡撫青應無力固守，六月太平軍繼進而登，遂克武昌。時湘軍初興，初當大敵，隨軍敗於岳州，會國藩自將的水師，也敗於靖港。一會國藩自以兩次失敗，破無希望，憤而投水，從者救之，得免於死，喪氣歸於長沙（見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第一五七頁），可見當時湘軍敗壞的情形。

太平軍自克武漢，楊秀清即遣天京，命石達開赴長江上游代督征軍。一八五四年七月，湘軍調練成功，乘太平軍統帥調動的機會，猛力奪取岳州並進攻武漢。石達開一到蕪湖，即聞武漢失守。湘軍乘機進逼九江，便與太平軍名將石達開相逼。兩軍大戰，湘軍水師輕進，一部被封鎖於鄱陽湖內，內湖外江，湘軍水師被分隔，不能協同動作，陸軍

也戰敗。太平四年十月，石達開逃往新昌、瑞州、臨江、安福、分宜、萬載、袁州、吉安、進攻南昌。清將周鳳山解九江圍，率勁旅數萬人往援。時達開兵才數千，餘兵盡分赴旁邑，左右都主將撤退，達開却不慌不忙一面張燈火於山谷則偽疑兵，同時趕快把自己的兵力集中起來，以疾風迅雷的速襲乘夜猛扑清軍前陣陣地——樟樹。清軍索來督石達開，見他晨夜來襲，又不知他兵力究有多少，於是周鳳山部隊竟發生混亂。石達開就利用這個混亂，收殮其另一部分，依然使用全力，弄得周鳳山部首尾不顧。這樣，石達開就把敵人的各個擊破，因而得到勝利。這是兵法上以少勝多的巧妙運用，在戰術史上是一個光輝的典範。

石達開打破了周鳳山，又和蔡日綱聯合打敗了會國藩，會手下健將潘澤南因此戰死。於是江西七府一州五十餘縣，都為太平軍所有，惟南昌、廣信、贛州、南康、南安、五都未下。國藩孤軍居敵中，屢向湖北乞援，胡林翼乃分軍四千回援江西，於是國藩規復武漢的計劃，又生一挫折。

當一八五三年二月十九日太平軍佔南京時，清軍向榮部亦自長江上游尾追至南京城外，受清廷命為欽差大臣，駐軍於東孝陵衛，是為江南大營，同時琦善亦受命為欽差大臣，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由河南進據揚州。當時揚州已為鳳翔所陷，琦善遂與開學士勝保，督陳金綬分營揚州城外，是為江北營。當時清軍在長江下游與太平軍對峙，採取觀望態度，既不能阻止太平軍北出中原，也不能阻止西軍沿江而上，去攻打並擊敗湘軍。

到一八五六年春，北伐戰爭雖已遭受失敗，而勝利，大破湘軍。東王楊秀清遣都將李秀成與陳玉成，兩路進逼江北大營，同年四月江北大營垮台，太平軍再克揚州。太平軍攻陷江北大營後，回師江南，進取江南大營，於同年五月在鎮江附近大敗清軍，鎮江遂為清軍所圍。向榮回營，遣張國棟馳救，秀清乃悉調援軍進天京，國棟亦返大營。秀清遣密使與向榮率領江兵趨天京，掩回軍之背，更命陳金綬等處之兵，橫擊秀山。秀清自率勁旅，出鎮江門，援江軍大營，先命悍將李士聰以挑之，向榮感其營兵，赴前敵。併力激殺。太平軍忽敗，向榮乘機圍攻鎮江，鎮江大營益虛，鎮江兵遂至絕望，營中空虛，縱火焚之，守兵驚散，前敵清軍看見大營火起，知已中計，但已無所顧，倉卒亦潰，太平軍乘機左右攻之，清軍死者數萬人，向榮張國棟亦丹陽，八月向榮氣憤而死。

楊韋事變以後的太平軍

這一戰役的成功，是太平軍運用「強迫敵人改變陣容，調動敵軍力量，切斷敵人聯絡」這一戰術的成功。善用兵者，應使人編造，使它發生錯誤，更應誘而用之，兵法上所謂「多方以誤之」，「用敵變化而後勝者為上策」。太平軍這一戰役的成功，或多或少受這一上策的指示。其後清軍亦因楊韋事變而瓜分鎮江，進軍秣陵，復立江南大營之後，即由丹陽攻下常州、蘇州，松江和嘉興，各地民衆紛紛響應，而天京無險可守二年。

當一八五六年春及夏初，太平軍在長江上游下游的進攻，皆獲勝利，這時亦可乘勝再與北伐之軍

，直搗北京，以推翻清政府，而建立民族獨立自由的新中國。然而，在這時候，忽然發生了太平軍內部的分裂，發生了一八五六年七月的楊韋事變，致石達開所說「吾儕以三世祖職，方期兄弟同心，討賊滅逆（指清），底定天下」的太平天國志願，不得不歸於泡影。

當太平天國建都南京時，天王洪秀全深居宮中，矜于紫色，自趨于腐化。朝中軍政大權，幾全操于東王楊秀清之手。楊秀清起義有功，為人精悍，善於用兵，但不免於驕矜，被同僚所嫉忌，尤以韋昌輝反楊最烈，因韋昌輝本為商人，素無出身，祇想從中取利，不願革命深入發展，加以時人好細侯候芳等從中挑撥，致楊韋之間時起磨擦。而天亦心懷不悅，不相信東王，於一八五六年七月，暗與北王韋昌輝合謀，計殺東王，并殺東王親信部一萬餘人，當即與石達開在安慶，開鑿馳歸天京，資昌輝殺太甚。昌輝不悅，又謀殺達開，達開得悉，黑夜縋城逃出，回至安慶，而達開在南京的全家老少，竟被昌輝所害。達開至安慶，發兵增難。天王身達開，乃殺昌輝，把昌輝首級傳送遠開，以謝達開。達開出兵，親往南京，與天王商議善後。這天天王又不信任達開，恐達開掌握軍政大權，竟任用私人，把政權交給無能的天王兄洪仁發，洪仁發操縱，以牽制韋王。韋王既痛「外侮未平，爾輩禍也」，又恐「此為彼輩，尋仇未已」，（均指達開與天王言），不願「捲入是非之門」，乃自領兵，西往湖廣自滯，雖然也相當牽制了清軍進攻南京的力量，但終究損害了戰略的協同。

因楊韋事變，太平軍官和殘殺的結果，損失了革命的元氣，內部又發生了分裂，分散了兵力。并且東王死後，軍權不集中，指揮亦不統一。因之，太平軍由優勢開始變為劣勢，由向上發展開始轉為向不衰落，由戰略的進攻開始轉為戰略的防禦。反過來說，楊韋事變對於清軍和整個滿清政府却是有利的，因為它使滿清政府削弱了太平軍的力量，客觀形勢便變得對清軍有利。會同審判到了這點，立刻決定了開始了戰略的反攻，而且決定了戰略反攻的中心目標是南京。

湘軍為清軍反攻太平軍，決定反攻的軍事計劃是：第一步先取武漢和九江，第二步得到安慶，第三步再從長江上下游及浙江三路圍攻南京。在楊韋事變後三個月，即一八五六年十一月，湘軍即開始反攻武漢，湘軍在胡、劉指揮之下，於十一月克武昌，兩湖總督文亦於同日克漢陽，湘軍反攻計劃的第一步得以部分實現。湘軍攻陷武漢後，分兵進窺江西，進兵九江城外，包圍九江的太平軍，至一八五八年四月，九江亦被湘軍攻下。從此形勢為之一變，清軍由劣勢轉為優勢，由戰略的防禦較快轉為戰略的進攻，中間沒有經過比較長期的戰略相持階段，這不能不說是楊韋事變對清軍及整個滿清統治階級幫了很大的忙。

於是戰爭進入新階段，清軍的反攻計劃，在上方方面，以湘軍曾國荃為主將，反攻安慶。在下游方面，以和春、張國樞為主將，反攻南京。太平軍的防禦計劃，在下游方面，以李秀成為主將，保衛南京；在上游方面，以陳玉成為主將，保衛安慶。這時候，石達開帶着一部份精銳的太平軍，已由浙江轉江西，過福建，經湖南，入廣西，至一八五九年到了黔桂邊界地帶，已不能與長江上下游太平軍配合作戰，因此，太平軍甚感保衛南京與安慶的兵力不敷與兵力分散。

但這並不是說太平軍在這以後就節節敗退了，不是的，太平軍就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之下，也還創造了很光輝的戰史紀錄。一八五八年五月，和春張國樞進逼南京，江南大營勢復振。是年六月，李鴻章克九江，曾國荃克吉安，太平軍在江西之勢又墮。時湘軍作戰計劃：陸軍渡江，先皖北而後江西，水師先安慶而後南京。自七月至年底，清軍連克太湖、濟山、桐城、舒城四縣，進取三河，距廬州僅五十里，兩方面戰，殺傷相當。而秀成王成自廬州至，連營數十里，抄湖北後路，李鴻章敗死，而太平軍之勢力一振。但自江南大營再振後，南京復被圍，秀成乃與李世賢、陳玉成、黃文金、楊輔清、劉官芳等百餘將領，開軍事會議於桐城縣東南之檇陽鎮，商討攻守方略，決定先取杭州，以斷張國樞餉道，使其分兵來攻，再返而與共不意之。

後，李秀成即自率精銳千餘，襲破溧陽防軍，遂克溧陽。二月，進攻廣德、泗安、克之，由安吉武康進兵，很快就把杭州攻下。清廷聽到杭州危急，即令和春會督浙江軍務，抽出包圍南京的五分之二兵力，派提督張玉良率領往援杭州，至則省城已破。李秀成知道這時清軍包圍南京的力最已經削弱，趕快率所部風馳而西，陳玉成率領黃楊輔清各率所部會于東壩，並克溧陽之固金壇。這樣一來，戰爭主動權，被太平軍扭轉回來。因為清軍包圍南京的大營兵力十幾萬人，每有需要補給百餘萬兩，先由蘇浙供給。現在杭州既被太平軍攻下，蘇杭一帶都變為太平軍的活動範圍，清軍大營的糧餉就沒有着落了，兩月不能發餉，兵士戰鬥力立刻減低。後清軍聽到蘇州告急，又抽出營兵力去常州圍援。李秀成抓住了這個好時機，立刻回師天京攻清軍大營，清軍發生兵變，王浚軍先逃，和春部下糧之，清軍大營幾乎全軍覆沒。和春狼狽走丹陽，張國樞是而嘆曰：「八年心力，不圖敗於李秀成之手」，亦被捨錢都退守丹陽。李秀成不讓他們安慶

，數十萬兵員追到丹陽。國樞拒戰，軍死亂流中，和春亦嘔血死。時張玉良回救江南大營不及，與太平軍戰於常州，又大敗。於是清軍江南兩師三百餘營，悉與為平地，連下常州、蘇州而太平軍的勢力又為之一振。

這一戰鬥的勝利，證明李秀成保衛南京的戰略計劃，完全正確，因為它不是消極的陣地防禦而是積極的運動防禦。同時在實際運用中，證明李秀成領導藝術的成功，真不愧為天才的戰略家，因為他真正做到了戰略上的四大原則，即：(一)強迫敵人改變陣容；(二)分散並削弱敵人的力量；(三)切斷敵人的給養線；(四)切斷敵人的歸路。當時的形勢，清軍精銳都集中在南京城下，李秀成採取消極防禦路線，提出「不許離開陣地一寸土地」的嚴厲口號，和清軍陣地對峙，使清軍大受挫折，像太平天國後編者所曾遭受的一樣，有了後而這一失敗的經驗，更加反映出李秀成的偉大。

但是，由於楊韋事變的惡果，清軍反革命力量的增長，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總趨勢已經走向下坡，所以李秀成這一偉大的成功，也祇能暫時挽救太平天國的命運，而不能根本扭轉大局的發展。這時湘軍淮軍等反革命力量是一天天地增長，而外國侵略者亦開始援助清軍的反攻。當一八六〇年春，江南江北大批圍困南京時，長江上游的湘軍亦於同時反攻安慶，戰爭益為緊張。湘軍于一八六一年春夏間，屢敗陳玉成援安慶之師，多隆阿又敗之於桐城西南的枞車河，鮑超再敗之於安慶北境樂賢關，玉成親到枞林被擒，精銳損失殆盡。一八六二年八月，曾國荃以地帶破安慶，守將葉芸來以下戰死者一萬六千人，陳玉成全軍焚死，乃退走廬州，又為多隆阿所敗，因此時太平軍東西兩方軍事連絡已被截斷，陳玉成卒也。被殺。

這時太平軍在安徽、湖北、江西皆失利，反革命勢力異常猖獗，加以外人幫助李鴻章訓練的常勝軍，已直接參加太平天國的戰爭，而太平天國的力

量，即一天天削弱下去，漸至不能支持，到一八六四年一月南京失陷，洪秀全李秀成相繼死難，於是堅持十五年的太平天國反清戰爭，不幸竟以失敗而結束。

戰略的結論

總觀太平天國十五年反清戰爭的經過，不僅在政治上開闢了人民戰爭的新道路，使當時在滿清政府重壓迫之下的苦難人民武裝起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進行要求自求解放與中華民族自救運動的正義戰爭，而且在當時歷史條件之下，創造了許多新的軍事組織與作戰方法，在戰略戰術上給予我許多有益的經驗。本來，戰爭是用流血來解決的重大利害衝突，是政治用另一手段的繼續。而「政治即開道于千百萬軍家所在的地方，也祇有在這裏才發生嚴重的政治」。一切民族壓迫會引起民族底廣大羣眾的反抗，而被壓迫民族人民底一切反抗的趨勢就叫做「民族起義」。太平軍在金田村的發動，正是這種民族起義的猛烈火花。

大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說：「戰爭之本來的動機就是政治目的」。這個政治目的就成為尺度，也適用於戰爭行動的進度目標上，也適用於戰術力量底必要程度上。不過，政治目的，單靠你自己，還不能成為尺度。要聯繫到對面的國家雙方，因為政治目的會影響到對面的國家雙方。只有政治目的影響到大眾的時候，才成為尺度。因為政治目的必須動員大眾，因此，必須考慮大眾底性質。同一個政治目的，會跟着國內大眾而面有加強行動的動機，或有削弱行動的動機，而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見克勞塞維茨論第一節第一章十一節)。

克勞塞維茨是不敢直說的民主主義者，他所謂「大眾裏面有加強行動的原理」，就是民主的原理

；反之，他所謂「削弱行動的原理」，就是反民主的原理。太平天國反清戰爭是在民主的原理之下發動起來的；反之，滿清政府則滅太平天國的戰爭，却是在反民主的原理之下進行的。所以太平天國反清戰爭在第一階段非常順利，而滿清軍隊則節節敗退。但是太平天國的民主原理並沒有貫徹到底，在戰爭中途發生事變，由於自相殘殺，削弱了自已的力量，再加上其他的不利因素，就不得不由戰略的進攻轉為戰略的防禦，以至完全失敗。

克勞塞維茨又說：「因為戰爭在現實的國家生活裡面，接觸着許多事物，許多力量許多關係底複雜錯綜，因為戰爭有各種矛盾關係，有各種性質的要素混雜在內，這些要素的要素，有它們的笨重(阻力)和相互作用，有各種可能性和偶然性底周轉曲折，各種條件，同時有種種恐懼關係等阻礙着戰爭底自然傾向之趨於比之激發發展，所以戰爭之發展的一貫性受着阻礙，抽象的戰術概念與實際的運動，也只在停頓在那些東西底複雜錯綜中間曲折之中，不能簡單地達到理論的結論」。這和國語論云「激發發展雙方都有，或者一方獨有。總之，戰爭就其性質說，是個極其複雜的形狀，反而成為不透明的謎之一貫性的東西」。這在太平天國反清戰爭的發展過程中，也可得到充分的事實證明。

太平天國反清戰爭之政治目的本身的研究，不能在這裏展開。本文的任務，只想在太平天國戰史的綜合研究中，求得一點戰術戰術的經驗和教訓。這種經驗和教訓，在前面的戰史的簡述中已經有了一些交代，現在再繼續論述。

太平天國反清戰爭區域性質上最農民戰爭，所以它軍事上比較長於游擊戰與運動戰，它知道爭取主動和阻擊力最小的地方之軍。在戰略上最有價值的幾次戰役就是馮雲山所指揮的突圍永安州之役，拾桂林而攻與安州之役；楊秀清所指揮的拾長沙而攻岳州武漢之役；石達開所指揮的襲擊樟

評梁著「屈原」

庸 島

——萃菁社叢書之一·一九四一年出版——

在寫了一篇關於屈原的詩底文章後，一位朋友便給我介紹梁宗岱先生的近著「屈原」，我深深地感到正和梁先生所說他在二十年前的情形一樣，我底所見恐怕也會是「一知半解」，所以對於別人（何況是懂得過的朋友）介紹，好或，是其所至大的興奮與感佩的，「誰知」，把這本印得精緻的書細讀了以後，一出乎意料之外，我所得的只是失望和反感。

梁先生在序言裏指陳胡適之的批評方法底錯誤，以及二十年來中國文壇或學術界底壞風氣，斥為「走外線的路」，接着便說出他那「一線一線的路」來：「和偉大的文藝作品接觸不用着媒介的。真正的理解和欣賞只有直接叩作品之門，以期直達它的堂奧。不獨作者底生平和時代可以不深究，連文義底註釋和批評，也要經過自己努力去參考前人的成績」。這先「叩作品之門」，「經過自己努力去參考前人的成績」當然很對，但這切莫僅注意了前者而忽略了後者，若然，便難免不「流入孤陋，流入偏頗，有時甚至流入「一知半解」的。

至於「作者底生平和時代可以不必深究」一語

，就前後的文字看來似乎是說深究這些（生平和時代等）身於論「煩瑣的考證」，「以讀誦誦侃古人為能」，「不惜勞逸斜出，標新立異，穿鑿附會，抹煞一切……」其實這倒也不失為切中時弊的話。只是梁先生底真意並不在此，他不過借這些話的言語來駁倒他底「一線一線的路」，簡以些說，他是不理解什麼作者底生平和時代，不慣於故紙堆中去翻檢之於註釋，和批評等等。

說這話的理山在哪裏？看梁先生自己的話吧：「我以為一個作家之所以為作家，不在他底生平和事蹟，而完全在作品」。試問作家沒有生平和事蹟，怎麼產生出作品來？如果梁先生還承認文學從生活裏來的淺淺道理，那麼研究作者底生活狀況（生平和事蹟等），是否可以作為一種有力的幫助？這幫助便和傳人作品接觸的媒介之一，此外，「底註釋」其批評則更有力，它可以使你底註釋和傳人作品溶合起來，體會得更深入細膩，你底偉大作品能介紹呢？梁先生認為「一件成功的藝術品第一個條件是能夠自立和自足」，它應以作者「所處時代和社會」底忠實的反映，因而可以從偉大在作品本身去看「作者底人生觀宇宙觀」

之役，楊秀清等所指揮的幾次打碎江南北大營的戰鬥，特別是李秀成所計劃和指揮的蕪湖杭州以解天京之圍，並進而殲滅清軍十餘萬兵力的有名戰鬥，不但給了清軍以出乎意外的打擊，爭得了太平天國反清戰爭的勝利，且挽救了自己的不利局勢，使清軍失去主動地位，而且創造了許多軍事戰術上的成功紀錄。

革命的創造，變革了所有的軍兵制度，改正了所有的陳腐的戰爭方法與習慣，廢棄了舊式的軍隊而創造了新的「民軍」和新的戰爭方法。這種創造不能單純地歸於洪秀全、楊雲山、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等少數太平領袖的自由意志的產物，而應歸於進一步了解為廣大農民與手工工人進步知識份子所解放鬥爭中的羣衆創造。

當然，這並不是說太平天國在軍事戰術上就沒有錯誤的，決不是的。太平天國反清戰爭雖然發展了這規模的規模，堅持了十五年之久，但結局還是失敗了。敗的原因自然很多，而軍事戰術上的弱點和錯誤，也是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太平天國底清戰爭，軍事上的最大錯誤，就在於攻取南京以後，沒立即派遣主力北上，猛撲天津和北京，以適應當時順利的革命形勢。推說滿清中央政府，更滿清政府者根本失去恢復或重振力量的可能，然後再回師掃蕩中華南，以徹底掃除清力量，和封建統治。太平諸領袖沒有獲得戰術的指導任務，在於決定主戰的打擊方向，採用一切方法去摧毀敵人的主力，直到剩餘敵人的「一切抵抗力」。太平諸領袖有懂得這一要着，所以在攻克南京之後，竟以主力去攻取長江上游，而派兵出林鳳翔李開芳一團文隊去進行北伐，結果徒勞無功。事實上，當時北方各省正處於動盪所瀕瀕，滿清政府正動搖之中。如果太平軍在佔領南京之後，不是派兵一個支隊北上，而是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主力去實行北伐，並與捻軍取得合作戰的同盟關係，要打垮北京滿清中央政府是完全可能的。

之役，楊秀清等所指揮的幾次打碎江南北大營的戰鬥，特別是李秀成所計劃和指揮的蕪湖杭州以解天京之圍，並進而殲滅清軍十餘萬兵力的有名戰鬥，不但給了清軍以出乎意外的打擊，爭得了太平天國反清戰爭的勝利，且挽救了自己的不利局勢，使清軍失去主動地位，而且創造了許多軍事戰術上的成功紀錄。

但任何物底矛盾都統一的，一個作者底思想情感上的矛盾也應該統一的，必有一種情感思想感勝，揚棄了另一種情感思想，如果它們（指矛盾或衝突）勢均力敵，那作者就會成一個絲毫無決斷的人，他底任何成就將被剝奪，還會有什麼文學上的建樹呢？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便是這性的一例；又比如若干文人今天寫風花雪月，明天叫革命文學，今天左傾，明天右傾，朝秦暮楚，莫知所從，便更是一個好例證。屈原決不會是這樣人，不然他的詩不能寫出來，即寫出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和社會的矛盾雖然很大，沒法解決，而且一天天加深，最後非來不得不跳水，但也因這矛盾的加深而使他愈益顯得偉大。可是他底情感上的矛盾，尤其思想上的矛盾，是相反的，它們「天天統一」，這也使屈原底思想益益偉大！梁先生說屈原「反映着當代儒家陰陽家底人生觀宇宙觀和宗教信仰」，這儒家底人生觀宇宙觀和宗教信仰有着顯著的矛盾和衝突，我承認屈原在當時或多或少地曾受過道家陰陽家思想底影響，然而比這儒家來却差得遠了，並且他終於揚棄了這道家陰陽家底思想，一切統一在儒家底思想中。試讀他的作品及他的傳記都正看見他底強烈的入世精神，那怕他的自殺我認爲也是一種入世精神的表現。但梁先生根本反對說「這些包羅萬象的詩描寫觀的或變觀的，入世的或出世的」，認爲「多麼悲斷，多麼凄涼，多麼孤作別人」！其實任何詩篇即使「包羅萬象」，各種情感都有，思想上的轉變再大，它也是具有「一種基本精神的」，即它終有一種思想情感感勝，揚棄或否定了另一種思想情感。從這話，我不能贊同梁先生把「遠遊」判斷成虛了而且認爲是詩人辭世之作的主張。在春秋戰國時代，老莊的學說不大受歡迎，它不過是淪落窮士的悲鳴而已；陰陽家的學說在政治上也沒有起多大作用，方士的盛行是在秦始皇即位以後，尤其經過漢文帝景帝太后等人的提倡努力才大起來的，以至今日的希世士大夫如梁先生者，都還受着它底深大的影響。這實在是很可惜的事。但在屈原活着的時代，屈原原樣的人能寫出「遠遊」這方士風味、漢風的詩，的確令人不敢相信。這說法好像也犯了梁先生所指示的毛病，然而我是不甘誠實的。思想的發展是時代而進行，比如社會主義思想一先經過資本主義的落落了以後，還和論調雖然不一「機械」，但誰能知其「隱衷」或「強作解人」的？

「遠遊」認爲是寫了「離國」，「招魂」等偉大作品後的絕命詩，我覺得未免有遺憾。我們底詩人，或捨棄了他底極端的光輝，如果屈原在臨死時真是一撥身一躍，「瞥見水裏的魚人，臉上泛出一種由衷的恬淡的微笑」，而絲毫無動於中，沒有一點忿忿，確如梁先生所說「自沈造成了「一種浩蕩的超有人無的飛昇」，（括弧內的話是梁先生原文，頗與「遠遊」思想相抵。）那裏他一定不會自殺了。因爲「遠遊」山林這更是一種道家思想表現，且屈原當時已作過多的隱士，足資爲法的了。面對死底恐怖，最少，對於生底留戀，我認爲偉大的詩人是會寫出「遠遊」那作品的。（梁先生也說他和死底拚扎抗拒的還有另一種強勁的內心衝動：「一種永生的願望。但這願望不會實現。梁先生所說成了幾篇成功的詩便滿足了。最低限度，他是願望他還能活下來，把楚國國政弄好，打倒秦國的。但楚國破滅了，都淪陷了，自己又無力去領導民衆作戰，便只得以身殉國了。他底自殺是一幕高升悲壯的史劇，決不啻微笑於殺身一躍而完事的。不知梁

到足與歷代人的程度，才能感滅敵人，或完全剿奪敵人的抵抗力。這樣，一方激勵着另一方，另一方的激勸着對方，這裏的主要關鍵，是看指導戰爭的兩方，誰在戰爭過程中生長最速，消滅敵人最大，誰能有最得最長最捷的勝利。

當然，所謂生長最速，決不是一句空話，而包含滿着實質的內容。它一方面對敵人的消滅，而對敵人的政治經濟所制約，另一方面又對自己的消滅，而對自己的努力來決定。借用德意志大軍官底話來說：「戰爭必須是實業的，要動員大衆，就必須考慮大衆的性質。戰爭底發動與否，有無勝利呢，實業制約着戰爭底發動與否，而戰爭底發動與否，實業制約着戰爭底發動與否。這道理是極大的。不過這和加強行動的原理，還有些微的差別，這微的差別在於：「可是有生長力量底良好條件，還必須有其目的認識與合理的運用，才更足以進行行動的原則，也即是說成現實。太平天國底戰爭是生動的革命的戰爭，得到廣大民衆底支持，手工工人與知識分子的擁護和參加，合乎「加強行動」的原理，所以取得了初期戰爭的勝利。但太平天國底補救是把這種「加強行動」的原理，加以充分運用和貫徹，有了天恩而敵國底等等進步的政策和主張，却沒有真正去實行，因此也就沒有能夠更明確地去團結民衆，更沒有採用民主方法去發動民衆的消在力量，更沒有讓民衆參加戰爭，以有了「加強行動」的原理，棄置不去運用，甚至發生揚揚得意，實行自相殘殺，以致敵人竊笑，志士寒心，石達開負氣出走，李秀成陳玉成等忠勇幹將，亦未嘗不自由發揮其才能，而貪官污吏如洪仁係洪仁德等則更趨腐敗，等子於清政府政府在太平天國內部來破壞團結和消耗力量。這就使清政府底危急中救出自己，而以太平天國底大隊伍的陣亡爲代價。歷史的錯誤不應當重復，我們研究了太平天國的失敗經驗，更應切切反省和加強努力。（完）

先生以為如何？

至於「某些作品太精太成熟，決非那時代所能產生；……」如果僅僅是這兩句話，便作為理由來否認某篇作品不是屈子所作，當然會重蹈陳侃如先生「寧肯把進化判歸楚辭本身，而不願歸之屈原一人」的同樣的錯誤，這無意否定了文學且底底偉大才能，抹殺了「特殊」而偏向了「一般」，成了公式主義。但只要不是機械的方法去過分強調「一般」性，則宇宙間道理都可以找出共通點——「一般」性的，即有「特殊」也得服從它，成為統一中的矛盾，或在原則下的小原則。若不把這二者底關係弄清楚，「定理」「例外」不分，我將見梁先生底主張則不是公式主義，然而也成了沒有定向的野馬狂奔了。

從「卜居」「漁父」兩篇時，我可以作為一個例子來講。

第一個懷疑它們為偽作的是清代的考證大家戴東望，他底理由自然是詞窮理盡，然而用他底疑却引起了很多學者底研究，其功績也不容抹殺。自然有很多大師之流不加詳究而遂指為「決非屈子代所能產生」而遭了梁先生底諷笑，但也有下過苦實的功夫，而覺得實在成問題的。梁先生認為它們「也許是和「離騷」同時或「離騷」脫離後自然形成的作品」，要同時或先後緊接寫出兩種風格不同的作品在偉大的作家「也許」可能，但「卜居」「漁父」這兩篇藝術價值極高又能清楚地表現屈原思想人格的成功傑作，若是屈原晚年寫的，做「史記」的司馬遷決不會沒有說過，讀過以後他一定要補述，更說這兩篇散氣氣息比「離騷」濃，行文流暢如江河之賦下，也不難不說「離騷」之一進退，那麼，重考他在「屈原傳」後寫着「余讀離騷」

天問、招魂、哀郢……」而獨於此兩篇不提一字

呢？並且本傳在「屈原至於江濱」以下幾乎是「漁父」底全文，他若係引滿則詩，並如此之多，足見愛之至甚，當超越他所嚮往的「天問」「招魂」「哀郢」等篇，一定要大加讚賞的，安能不著一字？故我認「史記」這一段或係可也選擇錄的淮南王劉安底「離騷傳」，（「離騷傳」已經失傳了，但「史記」本傳却引得有一些文句，不過也未註明來源，是從班固和王逸文底我對才知道的。又司馬遷寫「史記」還錄錄很多劉向所撰集的「國策」，把二者拿來比照一讀就明白了，這也足以作為一個佐證）。不然就是根據傳說故事或託漁父這一隱者與屈原的對談（也是很可能的事）而寫出屈原底「其志潔，其行廉」，這樣說來「漁父」便是史公底創作了一（史公學問淵博，自能寫詩，「史記」裏隨處詩意的散文很多，都可以算作詩。他一定能夠寫出「漁父」這樣的散文詩，比他會寫名山大川，綽綽的有餘餘多）。後人（也許是班固王逸之流吧）從「史記」裏取來加上首尾的「屈原既放」等語和漁父對唱「漁歌」一段便定了形。——這是我底意見，自信是不會「為一虛虛榮心」——一種務必有新創的心理——所玷污的，也不會故意要剽竊屈原這一詩人底著作權，而昇予司馬遷那一詩人（如果讀讀「史記」的！

至於「卜居」「漁父」底散氣氣息要比「漁父」底這些，從屈原的十六個疑難句底較着音韻這一點可以看出来，尤其「世混濁而不清」以下到「誰知吾之廉貞」正是整頓結構，益足以作為它的創作時代當在「漁父」之先底說明。（因為中國詩在周宋即逐漸散文化，而成為「楚辭」，更進而成為「賦」。郭沫若先生認為「卜居」是屈原底學生宋玉唐勒

景差之徒作的，我覺得很像。宋玉等人長於模仿

屈原底作品，屈原有「招魂」，他們便有「大招」，屈原有「九歌」，他們便有「九辨」，這首「卜居」「我認為是他們從「離騷」裏的「命靈氣為余占之」「欲從靈氣之吉占兮」等句發展而來，而「世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一段頗有模仿「懷沙」裏的「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笱兮，鸞鷖翔舞，同操玉石兮，一榮而相登。」底跡象，不過比較「大招」等作為「簡潔成熟」而已。「卜居」之所以在「史記」屈原本傳裏不見一字，連詩句都未曾被摘引，一因它不如「漁父」一樣根本是司馬遷所作，同時宋玉、景差等是寫出屈原心曲底煩亂，矛盾衝突，故被「離騷」假託問卜之事以表達出來，不一定屈原真去卜問過，（他再悲憤，也不致到了把這詩編造詩的事去和那鄉僻尹河灣的地步。「離騷」裏的假託頗多，均屬此例）。故司馬遷寫屈原生平時引述之必盡。「卜居」雖發出了十六個疑難，且比「天問」易得得多，但究竟只是一個問問，而「天問」不如「漁父」新穎，任何讀者，也都感到「漁父」要生動得多。

就以「所說，我底結論竟同於梁先生片為「武臣」「宮政」的人底結論一樣：把「卜居」「漁父」兩篇可疑的東西不放在屈原底賬上。但我以為這是無損於他底偉大的！有他在「離騷」「招魂」「九章」「天問」「九歌」裏表現的那在當時非常進步的意識思想，多樣的藝術手法，豐富的想像力，生動而細膩的描寫，和作品底內容非常一致的陰鬱沉重或輕快鏗鏘的音調，變幻的結構與句法，

情懷的宏富上話，優秀的民間形式，……尤其是……

……

……

……

……

……

……

……

……

……

……

……

……

……

是梁先生所構構的那麼優美，如何與一技超群
，或者比超「詩經」那巨著來更加一些枯枝，黃鶴
這大鳥可以棲息其上，以求高飛麼？

……

……

……

……

……

……

……

……

……

……

……

……

……

以看出思想情感底發展與變遷，這當然由於受了
活環境底影響之故。在太史公時代後還沒有「九章」
之名，大概東漢才把先後寫作的九篇合集
來的，這是不不可不察。

……

……

……

……

……

……

……

……

……

……

……

……

……

現階段蘇聯的外交政策

最高蘇維埃更調駐英美使節，並不是說蘇聯政策或他和西方盟友的關係有所改變。這種政策和關係與過去一樣，仍以英蘇條約和美蘇協定作基礎，並且仍舊持有兩項目的，就是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對德共同進行作戰，和戰後友好合作，以維持歐洲的和平，並建設歐洲，邁新基和李維諾夫的所以被召回國，是由於蘇聯當局感覺，當此對德國及其附庸國的戰爭正獲順利進展，若于關於與歐洲各國間牽涉戰後解決的政治關係等重要問題，已開始到連同盟國進行討論的成熟階段，「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所作三強會議的建議，是表示這一會議可以聯繫英美蘇三國的戰略，並給戰後合作問題打下基礎。

政治問題

蘇方人士也逐漸感覺同盟國關於各種政治問題

是這些政府應不致受根深蒂固的敵對觀念或無法改正的偏見所阻礙，而和蘇聯敵對。英美政府對於倫敦及其他各地各流亡政府的態度，已有若干方面引起此間的憂懼，其中尤以英美對待法蘭西的態度和引起這兒的不安情緒，這兒的人士至今不能瞭解英美何以不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並且在蘇聯代安去阿爾及爾的黨報護照和供應旅行便利方面，都採取阻撓策略，由此可見，美國和英國的政策，所依據的關於歐洲各國未來政體，形式的見解，和在和這兒所認為理想與可以施行的，不相符合。

（中央社魁北克廿四日路透電）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今日發表關於魁北克會議的文告，全文如下：八月十一日開始在魁北克舉行的英美作戰會議，於加拿大政府的友好之協助下，現已完成其任務，自五月底總統和首相在華盛頓會晤以來，很多令人滿意的事情。現在世界各戰場的全部形勢，都以此種事件為根據而加以檢討，並作必要的決策，以規定兩國海陸空軍的未來行動。因為這種軍力，在全世界各區對敵不斷的作戰行動中，互相關聯，所以指揮戰事的最高當局，必須保持目標和方法的完全統一。也因為美國、不列顛聯合王國和英帝國對敵作戰的努力，勢將日益擴大而且加深，將來需要再舉行會議，其間距離的時間，或較以前更短。目前不擬發表會議中所作的決定，因為這並不能有助於作戰的軍隊，這種決定，只有用行動來表現，不過現在可以說，參謀會議中的軍事討論，大部傾其注意於對日作戰，和給予中國以有效的援助。宋子文部長代表蔣委員長曾參與會議。在這一戰線，總統和首相能夠接受並核准聯合參謀部一致的建議，和在歐洲戰場的相同。潛伏在軍事行動之下，或因軍事行動而引起的政治問題，也已得到協議，會議中並已決定英美法蘇聯或將舉行三國會議外，英美當局，決定在本年年底以前，再度舉行會議。這次會議中，凡屬與對德意作戰有關的決議，都將以詳細報告提供蘇聯政府。對於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有關的問題，也會予考慮，現在已經取得諒解，若干政府將在本週末發表聲明。

羅邱聯合宣言

重大行動將在戰場揭曉

蘇聯的見解，是戰後歐洲各國的一切傀儡或沾染傀儡性質的份子，都應一掃而空，歐洲各國民族在清理本國的問題方面，應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然後各國的合乎民望與愛好和平的穩定政權，才能樹立健全的基本。英國或英美的政策中，似乎有因為害怕「革命」的發生，而企圖支持不學無術的人士與落伍制度的成份存在。並且他們有一種被這兒

有明顯化的必要，蘇聯外交政策的主旨目的是維持和平，對於戰後歐洲各國政府的形式，最注意者，認為錯誤的信念，就是認為未來的經濟關係，在這

經準備參加共同討論，並且認為從事討論的時機業已成熟，這和英美若干人士的見解似相符合，他們長期間來就認為不應在和平會議席上，確定戰爭，而以事先完成這項工作比較合乎理想。

★……戰爭綱首

這裏一般人都認為各同盟國政府怎樣答覆「實際上何人應負納粹非行之責」一項問題，是同盟國戰後對於歐洲有何意圖的試金石，蘇聯當局希望確定原則，規定國家亦不能逃卸與戰爭有關的罪行責任。但是這一責任是政治和物質方面的罪行的責任，應由違反人道和國際法執行政策的自然人去負，戰爭罪犯可以分為三大類：(一)懷有並煽動全部違反國際法的政策的，包括希特勒、戈林、赫斯、戈培爾、希姆萊、里賓特羅甫、羅森堡等(二)計劃執行這一政策的，包括納粹黨的一切大小領袖在內(三)計劃並應納粹政策的，主要的是金融和工業巨頭，鋼業大王彭斯堅就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些人都是在政府中沒有正式地位的私人，他們的罪行是剝削並壓折奴役勞工，剝奪他人的自由或財產。此外罪行當中，德國官兵的森深燒殺擄掠等等，也應包括在內，蘇聯方面認為這些協助及應惠納粹侵略的成千的德國人，都應該負侵略的一切後果的責任，而不能逍遙法外。

蘇聯紅星報論：

對局勢的清醒的估計

(新華日報莫斯科二十一日專電)霍夫曼在紅星報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對局勢的清醒的估計」文中引了星期快報所說，現在軸心在歐洲的戰線已趨潰敗和混亂，所以必需毫不遲疑的行動起來，同時作者又指出，英美報紙中除了這樣明顯的提出問題者以外，也有人以為只要以侵入西歐為威脅，即足以牽制西歐戰場的敵軍了。接着，霍夫曼引了紐約先鋒論壇報上的意見，說是同盟國已經牽制了駐在被佔領國內的德軍五十五個師團了。霍夫曼說，這種說法顯然毫無意義。這些德軍駐在那裏，目的是支持佔領國的統治和担任警衛。同時，他們的作用是訓練後備軍以增援蘇德前線。他們之中，大部分的作戰能力是有限的。被佔領國成了一種被擊潰的德國師團的補充站。可是，後備軍的需要很大，縱然在被佔領國有最低限度的德國師團，德國統帥部在異常急迫的情況下，乃不得不從這些抽調若干師團到蘇德前線去。德國統帥部所以能夠無阻礙的把軍隊從西線調到東線，正是因為同盟國沒有照他們應該做的那樣，將德軍師團牽制在西線。只靠以侵入西歐為威脅，同盟國是不能夠牽制德軍的。同盟國真正要牽制德軍，就必需在歐洲大陸上開闢地上的戰線。這樣，德國統帥部便不得不把軍隊從西線向東線調遣，相反的，還不得不從蘇德戰線調遣至幾十個師團到西線去。只有真實的，而不是潛在的西歐第二戰場存在了，才能有效的

幫助那已經單獨和希特勒暴政搏鬥了兩年多的紅軍。如果德國覺得同盟國侵入西歐的威脅是很急迫，他們至少應準備一百個師團來防禦兩千公里的海岸線——從北海到比斯開灣(包括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和丹麥)，而不是現在的四十個師團了。西線的現勢，使德國統帥部可能以最低限度的軍隊担任被佔領國的警衛，並且可以自由運用後備軍。德國統帥部自然要用一切力量來延長目前這種情況。德國統帥部在盟軍在西西里登陸後，並未在意大利增加軍隊，就是因為它要避免使這些軍隊被牽制在他們認為次要的地中海意大利戰線。這是頗有意義的事。在優勢的盟軍壓力之下，德軍撤退了並且損失了領土，目的是在保持其人力和後備，並不致於削弱蘇德戰線上的力量。

一切情況顯示出，德國將在今後的意大利的戰爭中，採取同樣的戰術。如果環境允許，他們將以少數軍力進行長期的防禦戰。雖然現在希特勒的盟友意大利遭遇着戰爭轉到本土的威脅，德國統帥部還是在意圖保持最低限度的師團。

所以，有些觀察家認為由於紅軍的勝利攻勢而造成的現勢，對開闢西歐第二戰場是異常有利，並且建議從「神靈戰」和侵入西歐的威脅，轉入實現侵入西歐，是絕對正確的。西歐戰場的存在，將使五十到六十個德國師團，從蘇德戰場調開，而真實的被牽制在西線。

內政部重慶新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重慶市警察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重慶市警察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重慶市警察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時論

「民主第一」

表示全世界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都應獲得自由。這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在法西斯侵略歐風落，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也是必要的。

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的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這首先，就必須徹底粉碎法西斯機構；根本消滅法西斯主義，完全肅清法西斯份子。華萊士說：「一般人最直接的目標是：徹底消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只有盟軍進入柏林和東京時，才能提出和平條件。兩國領袖家不許在和平會議中出現；孤立主義必須繼續破壞。」這就是說，不僅要擊破現在的法西斯機構，而且要消滅一切的法西斯機構；不僅要消滅外部的法西斯敵人，而且要肅清隱藏在自己內部的法西斯份子。對外，和法西斯的人妥協不可；對內，容讓法西斯份子存在也不可。只要法西斯機構還存在，則必然會流毒於全世界，而所謂「民主第一」的口號也就不能不折不扣地實現。

其次，要在世界範圍內，有效地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那就必須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口號。倘若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號，自己負有首先忠實履行的義務。要別人做，自己不做，在情理上說不過，在事實上也很難收效。另一方面，「民主第一」是擊破法西斯侵略的最有效的武器，拋棄這武器，則在反法西斯侵略的鬥爭上，便沒有絕對勝利的保障。即使幸而勝利

，也將被認為是「以暴易暴」，不能獲得全世界人民的擁護，而致放蕩，在不公平的待遇下，也必定會時時作報復的打算。歷史上，所以有循環不斷的戰爭，這也是原因之一。

所謂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國家都必須實行同樣的民主政治。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差別，他對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是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對之而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擁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使人民失掉自由權利。

所謂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就是說，要徹底實現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保障。自由權利，是政治的基礎條件，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這是一擊破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最後決鬥的緊要關頭。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堅定地，把握這「民主第一」這一擊破法西斯侵略的最有效的武器。（被略）（新華）九月十五日

昨天我們一窺到了兩個驚天動地的勝利消息。第一是法西兩軍在利維埃投降，人類史上這最偉大之戰的法國三英同盟終於獲勝了。第二是蘇聯紅軍以破竹之勢擊破德軍的夏季攻勢，席捲國內次登地，克復了大工業中心斯大林諾和其他許多城市。莫斯科視捷的砲聲震天價響，重慶，倫敦，聖彼得堡，莫斯科，柏林，東德蘭德，戈培爾，希特勒無聲！

聞捷所感

要來來的日子終於到來，要起來的力量終於奮起。喧嘩跳躍，飛揚跋扈了二十年的意大利法西斯強盜，終於在正義和人民的力前放下了武器。我們決不過低估計意大利降服的軍事上的意義，但更重要的是法西兩軍大規模的滅亡這個消息正像地震一般的從地層下面越過萬水千山，傳遍整個世界，而向全人類宣告了：蔑視人民力量的法西斯主義的路走不通，人類歷史是不准後退，不會停滯，祇有前進。今天，希特勒東條的運命已經可以明確地用月和平來計算，追隨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後面的一羣擬似法西斯魔如芬蘭，蘇聯之流已經無計，焦慮和試探着如何退出戰爭的機會了。可是，看，當墨索里尼進兵羅馬，蘇聯政權，乃至遠征阿比西尼亞，蘇聯西班牙，蘇聯阿爾巴尼亞……的時候，全世界有多少不信任人民力量，不相信人民力量的叛徒而色首的「政

民族正氣的勝利

——消滅偽軍，粉碎偽組織。

最近以來，敵地不斷傳來偽軍反正和我軍撲滅偽軍的消息；前者如各報所載浙西和蘇魯邊各地偽軍的陸續投誠；後者如九月七日新華日報所載魯豫邊我軍撲滅偽軍的大捷，殘傷偽軍長參謀長以下千餘人，生俘四千餘人，這一空前的勝利，尤其令人振奮！

正當日寇進行其滅華的「新政策」，扶植並進種種道義民族叛類，大批武裝偽軍，招亡納叛，利用他人在鄂西以及敵後等戰役中向我進攻，實現其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惡毒陰謀時，剿滅偽軍的捷報和偽軍反正的消息頻頻傳來，這正是給敵寇陰謀的嚴重打擊！

敵偽盤據我們失去的廣大領土，幾經六年多，在這漫長歲月的血腥統治中，它們得以維持其佔領，進行苛酷的搜括，壓榨我淪陷區同胞，抗擊我抗戰部隊，偽軍的幫兇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對這些叛國降敵特日寇幫兇的民族罪人，尤其那些罪首元惡，却絲毫不存任何的寬假。正因為這些逆賊都是手執武器的豺狼，當它們忘顧其主子時固然是馴若大羊，聽任擺佈；而它們在人民面前行兇作惡時，却是猛如豺虎，敵偽就這利用它們索向其佔領，斷我民族元氣。所以，只有堅決無情的消滅偽軍，才剷除老虎的羽翼，摧毀偽組織的最善辦法。

這批偽軍們固然是替日寇充當着兇儀，然而除了少數為己已榮祿而甘心叛國的頭子以外，誰都並

不甘願作日寇亡華的工具。他們的生活是極度悲慘的，他們在敵人的玩弄下，生殺由它，悲慘的替日寇當砲灰，拚性命。新華日報所載的山東通訊，山東日本士兵代表大會致偽軍的那封信裡，就生動的揭露了日寇那「恩威並施」，強迫偽軍作替死鬼的陰險面目，我們在那封充滿着偉大同情心的信札裡，的確看到受人蒙養的偽軍們的血淚斑斑的悲慘命運。這就給我們建立了瓦解偽軍的堅實基礎。

瓦解偽軍的這個課題，幾乎是抗戰以來大家就高喊着了的。實際上，在抗戰初期確也有過瓦解山四偽軍協軍李逆福和部的最輝煌的例子，當時在豫國抗戰的高潮中，為敵偽所利用的這封建餘孽的李逆福和部，簡直是在全國軍民抗戰鐵拳的威迫下，因刻間就土崩瓦解，元兇授首，全體偽軍倒戈來歸，這的確是如今日晉豫邊我軍撲滅偽軍同樣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情，至今還引起我們深深的回味！自然今日在前線和敵後，我們也還有許多爭取偽軍瓦解偽軍的寶貴經驗和收穫，敵後我軍經常向敵偽展開政治攻勢，實行威力的武裝宣傳，都會收到顯著的成果，這些經驗還應當普遍在各戰場上運用，創造瓦解敵偽，摧毀敵偽組織的更大成果。

最後，我們還要特別嚴重的，從這次晉豫邊我軍的撲滅偽軍的大捷中，也更使我們常說的這個真理得到輝煌的證實。這就是：只有加強對敵的作戰，只有更高更發揚「漢賊不兩立」的對漢奸賊子的憤恨，和「天下共棄之」的對偽軍的惡感而申討伐

治家們，盡嘆他的「武功」，膜膺他的主義，將他評為不世的英雄，將法西斯主義當作可以仿行於世界的政制！而今天，會歲月之幾何？已面目之不可復識，當年渴仰頂禮，連黑衫短棒也想摹擬仿效的徒輩，到今天在沛然莫之能禦的全世界民主力量前面，不是也不能言不由衷的在「祝賀」民主主義的勝利了麼？這是一個教訓，總教訓還不太遲，這教訓還有用處。

人民像江河，人民像大海。江河在平原上緩緩東流的時候，海洋在風平浪靜的日子，它們是溫順馴服，可狎戲而看不出任何力量的，可是，除出惡人和瘋漢之外，誰也不會輕視河海的力量吧。一條河遇到阻障，它可以成為萬馬奔騰的江潮，橫決千里；的洪水，更不必講匯百川而成大海。人民的潛在力量是潛在的力量，是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於是，墨爾尼尼之流的奔騰人民力量的「弄潮兒」，終於在奔騰澎湃的人民的威力中沒頂了。

意大利的投降不僅是法西斯主義的衰頹，而且是全世界愛自由和平的人民開始用自己的力量來抉擇自己的道路而顯現了無比威力的表現。繼續在意大利人民之後，巴爾幹的人民，南斯拉夫的人民，法蘭西的人民，越過大海，跨過高山，是全世界人民的民主的浪潮來衝破巴士底監獄的時候了。人民的意志是決定的意志，人民的力量是決定的力量，經過了長長的黑暗時期之後，人民終於是勝利了，法西斯必須從人類世界消滅，民主不可分，新的世界必然的要是一個由人民的意志決定的民主的世界。

（新華） 九月十日

，這才能使外強中乾，出師不戰的敵偽們經不起我們迎頭的痛擊，終於被我們打得落花流水，同時，也只有緊密的和民衆結合在一起，就能够充分發揮我們雄偉無比的潛力，在軍民一致底下，將敵偽們整個打垮。我們依據着這些，協力同心，堅決的反抗敵偽，這就使謊詐的敵偽們，任憑它們怎樣安插着陷罪，也不能陷倒我們，這尤其是根本消滅爲軍基礎的釜底抽薪的辦法。讓抗戰的火線燃燒得更熾

烈些，懸懸懸的注爲敵寇們，就會要在烈火中化爲灰燼，廣大論略區內傾軋的萬千同胞們，就能够得救。

消滅偽軍，粉碎偽組織，是進入反攻，爭取抗戰勝利到來，收復失地，從敵偽奴化統治中，解放全民族的第一步工作。我們應當加緊千百倍的努力，不斷取得新的成功和勝利！（基伊）

如何穩定戰時經濟

欲求戰後經濟的建設，必須以穩定戰時經濟爲其先決條件，這是至明的道理。但穩定戰時經濟，以目前情形而言，又首在增加生產與安定物價兩點。

增加生產，是穩定戰時經濟的積極因素；安定物價，則是穩定戰時經濟的消極因素。無論其爲積極或消極，實則兩者關係至密，安定物價，足以排除增加生產的障礙；增加生產才足以解決安定物價的困難，這已是老生常談，也是抗戰幾年來一點痛苦的經驗。

無庸諱言，我們的勝利雖然在望，可是，經濟上的困難仍是在增加着。雖是在客觀上由於我國幅員廣大，各地情況不一，一切措施難免不有若干困難發生，但人謀不臧，若干辦法尚欠合理，考慮與實施都未臻妥善，以致幾年來都在老問題下兜圈子，而且這圈子如螺旋形似地，使戰時經濟的困難，愈陷愈深化。

以增加生產來說。

本來，增加生產，實爲安定物價，與穩定戰時經濟的鎖鑰。如果生產充沛，物價自然安定，戰時在經濟上所發生的那種動盪不安的情形，也就漸次會歸於消滅。然而：「在今天，那一個部門不感到成品與原料的矛盾？那一個部門不感到資金的枯竭，進行擴大再生產的困難？那一個部門不感到銷路銳減成品停滯呢？」（本報九月八日社論）

我國的工業，原就帶有先天不足之毛病，抗戰發生後，許多工廠倉卒內遷，關於設備及原料交通等條件，遠較過去低劣。嗣後，因物價波動，致正當工業反不如正當商業，正當商業又反不如投機商人，俗語說：「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在現實經濟條件下，商業投機，竟變成了經濟生活中最熱的部門。一部份商人趨於投機，那不用說，一部份工業家也趨於投機，乃至於一部份有地位之方便的人，也看中了這一鴉片，如此下去，要想穩定戰後經濟

基礎，究竟是一件困難的事，我們更不必說，在戰事結束以後，去和先進工業國併存競爭。

我們對穩定戰時經濟，不是存在着「一種悲觀的觀念，老實說，對穩定戰時經濟，我們的態度始終是積極的，始終認爲有辦法。在本報七月十九日的社論裏曾具體的提出過，「第一必須提高直接生產者的生產熱情及其效率；第二必須鼓勵民間資本向生產作巨量投資。」要想提高生產熱情及效率，首先對佃農必須「保障其佃權以安定其耕作；對自耕農必須在賦稅上使其與大地生有利；對工人」必須設法保持其真實工資，減少物價上漲所給與的影響，必須盡可能改善工作條件，并加強其文化教育。」要想鼓勵民間資本向生產事業投資，首先對工業家的合法利潤應予以事實上的保障，使成品與原料價格不致背道而馳，此其一；稅率制定，除工商業應予分別規定外，無論屬於所得或過份利得，均應顧到保持事業之實質資產，及其應有之週轉資金，使工業再生產不因資金枯竭而受到任何困難，此其二；國家戰時財政金融政策，均應與戰時工業生產相配合，不僅要有利於一般具有規模的大工業，就是中小型工業，也應以劃定的款項獎勵扶持，此其三。只有這樣才能從積極方面來增加生產。

他如調整國營事業，緊縮開支；運用由美國借回的資金，吸收通貨，與安定幣價；加緊軍事準備，配合盟軍反攻，打通滇緬路，開闢重要物資的來源，這便可爲目前生產界減輕重壓和負擔，這些都是目前穩定戰時經濟的必要條件。

穩定戰時經濟，一方面要有適時的政策，一方面也要上下一體，協力同心去克服當前困難才有辦法。

從一條河到一條河

好像是不知道疲倦的巨人一樣，蘇軍反攻的腳步從一個城市跨到一個城市，從一條河流跨到一條河流；在輝煌的冬季大反攻中，他們從伏爾加河跨到了頓河；如今，在緊接着德軍夏季攻勢的粉飾而展開的夏季大反攻中，他們又從頓河邁向了向頓河的英雄步武；他們在中路跨過了奧勒爾，在中南路跨過了哈爾科夫，在南路跨過了斯大林諾；上百萬的法西斯匪徒被打死，千萬的蘇聯人民解放了，好像是在電影中展開的風景畫片一樣，一片片豐饒的土地又重新看見了自由的太陽；在悠長的被佔領的歲月中，土地和人民雖然受盡了莫大的創傷，不過有了土地，人民和自由，一切不是在轉瞬之間又可恢復起來嗎？是的，只要有土地，自由和人民，一切是可以恢復起來的；假如是這樣，那麼，我們閉目一想，今天蘇聯的人民該是怎樣的歡欣，怎樣的鼓舞，怎樣的感謝啊！

在這捷報頻傳聲中，十七日，中路蘇軍克復了布利揚斯克，布利揚斯克淪陷到德匪手裏快兩年了，現在終於又重新看見了自由的太陽！正如八月底哈爾科夫的克復是蘇軍南路反攻的一個新起點一樣，布利揚斯克的克復是蘇軍在中路反攻的一個新起點；由於布利揚斯克的克復，蘇軍最後削平了德軍的奧勒爾突出地帶，打通了莫斯科——布利揚斯克——庫爾斯克——哈爾科夫——斯大林諾的大動脈，德軍在蘇德戰場上的突出地帶是最後被肅清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於布利揚斯克和哈爾科夫的克復，蘇軍在中南路的反攻進展到一個新

邱吉爾廣播演說

邱吉爾首相於八月三十一日在魁北克向世界廣播演說。這是魁北克會議的首要人物在會後第一次公開演說。其重要性在於這是魁北克宣言的說明，特別是關於歐洲戰場和英、美、蘇關係問題。邱吉爾揚言了魁北克會議，「並未討論當前之軍事行動問題。」會議固然大部以加緊並加強對日作戰為討論對象，但是，這並且是「非主要的。」如果我們應該重現邱吉爾這項陳述，我們就可以說，歐洲問題，而且是歐洲的政治問題，怕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的」討論對象。

在全篇演說中，邱吉爾對英蘇關係之基礎的二十年友好互助條約，以最負責的態度，最終決的口吻，表示其信守不渝，全力支持。對「現蘇聯戰場獨負主要的重大壓力，」對盟軍在北非和西西里的勝利，若無蘇軍英勇保衛國土，而獲重大勝利，則恐難實現，「有深切的認識和崇高的讚揚。對第二戰場的重要，則表示「無論是誰均能看請第二戰場有關之必要，」並且說「余常以為西方民主國應有開闢之必要，」並且說「余常以為西方民主國應如拳師，以擊拳而非單拳作戰。」我由此可以相信，希特勒和盟邦中少數幾種份子挑撥反蘇的陰謀，是不易實現的。英美蘇的團結，並沒有根本的變化。

然而，今天的問題是加強英、美、蘇三國戰略的一致和戰略的協同。誠如邱吉爾所說：「如果反抗希特勒之三大強國對於將來之實際方略能獲一致之意見，一致之決定，並在戰略問題上獲得協同，實為每一國家之絕大利益，實亦即整個自由世界之福。」值得注意的，邱吉爾在這裏，用了「如」字。這正說明三大強國之間還有意見和決定

未獲一致的地方，戰略也還沒有協同。同時，也不難看出英美似乎把「將來之實際方略」和現在的「軍事問題上獲得協同」同時提出。好像要就是同時解決，要就是某一次成了另一次的前提或條件。我們希望這種推論不確，但在英美對此沒有更多的說明和解釋以前，却只能有這樣的推論。這裡也許正是三大強國間極待商討的問題。

我們以同盟國之一員的地位，願對這點再貢獻一些意見。今天，是「軍事第一」、「勝利第一」，英美和蘇聯的團結友好，既有了條約或協定的基礎，就應該在這個基礎上來討論怎樣「雙拳合作」，首先儘快的把共同敵人打垮。不應該因為「將來之實際方略」問題，影響到今天的作戰。將來的問題，儘可留待將來商決，更何況就是對將來的問題，也早已在大西洋憲章及其他文件中定下了原則呢？因將來而牽制了現在，對自己說是不智，對敵人却是大為有利。羅斯福和邱吉爾當然也是見到了這一點的。

為了儘快的打倒希特勒，我們認為應該由三大強國趕快討論「當前之軍事行動問題」——「西歐第二戰場問題」。從邱吉爾的演說看來，似乎英美偏重的是東兩歐，而非西歐。這大概是將來的同盟影響着現在的行動之下的軍事佈置。我們相信一旦英美以現實的精神來面商事實，而以勝利為第一時，這個和蘇聯沒有「在戰略問題上獲得協同」的佈置，是有補充或修正的必要。我們一向呼籲英美對盟邦迅速的大胆的行動。如果在行動之前，必需經過商談的話，我們更呼籲趕快有效的舉行和結束。目前時機急迫，不容緩慢時間於空談的「又一個會議」，只應有三國協同行動的有益切實的前奏！

(新華)九月二日

戰後。

兩月以來，蘇軍夏季大反攻的發展便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勝利與開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是斯摩棱斯克方面的蘇軍攻下了波爾尼雅，一方面，是基輔方面蘇軍的克復巴爾塔，而在這兩者之間的布利揚斯克方面的進展，却遠相緩慢。這是一種情形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是許可的，但是超過了一定限度，德軍在布利揚斯克方面的據守就足以阻礙反攻的展開了。現在由於布利揚斯克的克復，這一不平衡的發展是打消了；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布利揚斯克的克復，是斯摩棱斯克和基輔德軍的喪鐘，布利揚斯克雄踞在聶伯河的支流代斯那河上，假如代斯那河解放了，聶伯河上的四大名城：斯摩棱斯克，基輔，德尼伯彼得羅夫斯克和科爾松的解放，這能很遠嗎？

布利揚斯克克復了，這不僅是蘇軍在今年夏季反攻中的一個偉大勝利，而且是同盟國全體的一個大勝利；今天擺在同盟國面前的課題，是如何充分的利用和發揮這一勝利，因為從整個戰爭形勢看，對於英美，再沒有比今天從西歐開闢第三戰場，夾擊希特勒更好的形勢了。據莫斯科路透電，九月一日以來蘇軍所收復的土地約等於意大利的全土三分之一，而意大利雖已投降，由於希特勒的毒練，至今盟軍所佔的土地遠不到意大利全土三分之一，而盟軍在這次「政治解決」中所花費的時間却已經有五十幾天。這一對照就說明了：「政治瓦解敵人」的每一個可能性能應該充分利用，但今天主要的課題還是軍事第一，勝利第一。

軍事第一，那麼就應該立即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勝利第一，那麼就應該在一九四三年內予希特勒以決定性的打擊。

蘇軍在布利揚斯克的勝利，證明了，在一九四三年內開闢第二戰場，予希特勒以決定性的打擊是完全可能的。（新華） 九月十八日

魁北克會議宣佈加強太平洋作戰與加強援華以後，繼之有蒙巴頓的出任東南亞盟軍總司令。種種跡象都預示着太平洋上，特別是孟加拉與緬甸方面，軍事形勢將極端化。中國古代兵學家孫子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趁此大規模軍事行動尚未揭開之前，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日寇的種種策動和佈置，倒未始沒有意義的。

最近西南太平洋新幾內亞，新喬治亞各島戰爭，我們看出一個極有意義的事實，就是日寇對於美軍的攻勢，感到很大的焦灼。舉一個例來說，日寇參與蒙運之戰的某部隊長告訴日寇記者說：「蒙運上空連日為無數之「敵」機所蔽，誠天為之暗。担任進攻之美軍與前相異，而有相當之頑強。目前之戰事乃消耗戰，同時亦是精給戰，「敵」恃其強大空軍勢力而極力欲遮斷我補給線，日軍仍能於夜間以若干舟艇，完成補給目的。」上面這段話，是出諸

日寇怎樣在籌劃應付盟軍的攻勢

一向藐視一切自信無敵的日寇軍人之口，從他的口氣中，已充分表現日寇在西南太平洋的消耗戰中，已經喪失了制空權，已經挨打。最近日寇匆匆撤出幾個島嶼，再也聽不見日寇狂吠像阿圖島川崎聯隊那樣「悲壯」的戰至最後的消息了，這不是很清楚證明巨大的消耗戰，在日寇是吃不消的了。

軍事形勢如此不利，所以日寇應付英美反攻的策畫，特別着重於政治上的懷柔政策。我們知道，日寇宣傳要南洋各民族以「自由」「獨立」，以菲律賓的「獨立」宣傳為最早，而結果緬甸的「獨立」醜劇，却先期出現，這是什麼緣故了？這就是為了應付傳說已久的盟軍反攻緬甸戰端重開，緬甸人民能在其欺騙之下，甘為虎俛。

日寇這種政治懷柔陰謀，其活動還不僅此，對印度人民施行欺騙，近來也很厲害。日寇知道，盟

軍反攻緬甸，印度是兵站基地。為了鞏固緬甸佔領區，它對印度的陰謀自然更趨極端。日寇傳用的印奸鮑斯已在新加坡大事招兵買馬，成立所謂「印度國民軍」，常備緬甸傀儡扮演「獨立」之職，彼曾以特別來賓的資格而被招待。彼於最近訪泰緬新加坡後，發表談話說：「彼已獲得泰緬支援」，一旦「印度國民軍」進攻印度，緬甸產米豐富，可作兵站基地。並且說他正在籌議成立「印度臨時政府」，以資一旦進兵印境時，有所號召。此外，當甘地等被一週年紀念日，日寇尤復大肆宣傳，東京電台接連廣播長篇大論，所謂「協力於印度獨立之武裝鬥爭」，所謂「印度獨立運動將由外部援助之」。敵大政翼贊會與亞細亞本部，更假大東亞館召開所謂「接印獨立國民運動團體代表大會」，發表宣言，對鮑斯武力鬥爭，不惜全力「援助到底」。總裁阿部更去電激勵，這一連串事實，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日寇對緬甸印度的政治陰謀既如上述，對泰國也極盡拉攏能事。上月二十日日泰訂約，將一部份馬來領土讓與泰國，諸凡這些事實，充分證明日寇一貫的軍事與政治雙重戰略，目前日益以政治懷柔為主了。

日寇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由於政治上民族欺騙政策成功的配合，造成了暫時的軍事大勝，現在它又想藉政治欺騙來鞏固它的佔領區。一年前東方撤退的悲劇，我們相信盟國當局是不會忘記的。我們希望盟國於積極準備軍事反攻的今天，特別注意日寇的政治陰謀，迅樹對策，爭取東方數萬萬人民參加到反日寇侵略的正義戰爭的隊伍中來。大西洋燦爛的光芒，應該照向東方來了！

（新華） 九月三日

岡野進同志告日本國民書

讀者按：日本人民優秀的領袖，日共中央代表岡野進同志（真名野阪鐵），不久前經由平津化裝抵達延安。他今年五十一歲，出生在貧苦的幫工的人家裡，依靠所得供給學費，一九一七年畢業於慶應大學，一九一三年參加日本最早的工人組織「友愛會」（後改名為「勞動總同盟」）。一九一九年赴英調查工運并研究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一九二〇年英共成立時，他是首批活動者，因參加英共被當地政府驅逐出境。在二十一年前，日本共產黨成立時，他是最早的黨員。在以後的四五年中，岡野進同志被日本政府逮捕不下十餘次，到一九三〇年為止，他經過的牢獄生活凡四年之久。在日本共產黨裡歷任黨綱起草委員、中央監察委員、中央執行委員等，一九三一年奉日共中央命以代表資格出席共產國際會議，一九三二年參加起草著名的「關於日本底形勢與日本共產黨任務的提綱」，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他被選為執行委員，同時并被選為主席團之一。他很快地即返日本，一直到最近時期內，他為領導本國革命，同時由於國內反動政府追捕甚急，奔馳于本國國境周圍，指揮革命工作。無論在怎樣艱苦的時候，他始終挺立在鬥爭的最前線，不倦的發動革命鬥爭。

現在這年滿半百的老革命家，經過了無數的艱難險阻，跋山涉水的到達了延安；這不僅是東方反法西斯鬥爭史上劃時代的一件事情，而且必然會促進中日兩國的人民更緊密的聯系，為消滅共同的敵人——日本法西斯而攜手鬥爭。他用鋼鐵般的巨響告訴了我們，日本共產黨怎樣在迫害下堅持鬥爭：

「……運動在經常的進行着，民衆的情緒正在高漲，組織逐漸鞏固，一切準備着將來的應用……」

在他到達延安的消息傳出後，激後的日人反戰組織：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日本工農學校，日本反戰同盟會延安及各地支部……均一致表示熱烈的歡迎。我們可以預見這些法西斯日寇的掘墓人，將會使革命像野火樣在敵人的內部熾燃起來。聽吧！這就是他們莊嚴的誓語：

「把我們反戰的大旗，
插到日本軍隊中去！」

親愛的同胞們！親愛的士兵兄弟們！

「中國事變」爆發以來，已經過了六年悠長的歲月，這六年來，戰爭逐漸擴大，今天已波及整個東亞，將十億人民捲入戰爭的慘禍當中。這六年來，二百萬以上的我們的弟兄們，他們的鮮血，他們的一千萬家庭在痛哭，還有七百億龐大的人民財富化為燐烟，六百億圓的公債沉重地壓在國民的肩

上。這六年來，朝鮮、台灣以及中國和南洋的人民，流出了多少血淚？他們所受的損害究竟如何巨大？誰也是算不清的。

這六年來，我們日本國民大眾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壞，一天比一天窮。就連政府也發表了今年的國民生活，要比去年降低百分之十五。但實際上並不止此。勤勞者的收入，除受法律限制最低限度外，在其僅有的收入當中

將近一半要爲貯蓄、租稅、賦稅等所剝奪。現在即使有錢，但由於物資不足和統制，在街頭店內也看不到要買的東西了。此外，每大要動員作義務勞動和防空演習，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就有休息的時間，調劑精神和娛樂的場所也關閉了。並且，還有什麼「國民徵用令」，連婦女和小孩，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徵調到什麼地方去作辛苦的勞動。……這樣，在「戰場生活」的名義底下，國民生活的一切都被擱入黑暗的深淵。極度的過勞、營養不良和不安，不論都市或農村，都成了一般的現象。

看看都市的工人和一般的職員吧。在「戰域公」的口號下，他們的勞動時間無限的延長，工作可怕的繁重，但薪水却被「工資統制令」釘住了，毫無增加。工廠法實際上廢止了。工廠中經常出事，每天都有負傷的人。他們老早就沒有選擇職業和工作場所的自由。每天只是在嚴厲的監視之下，埋着頭繼續激烈的勞動。……這就是今天工人和職員們的生活。他們雖然被稱爲一產業戰士，其實和監獄工廠中的犯人有什麼地方不同呢？

再來看一看農村吧。農村的青年全被趕上戰場和軍需工廠去了。馬被徵發走了。肥料得不到手。可是佃租和戰前一樣，並未減少升合。甚至有些地方地主還乘機抬高佃租；農民如若不從，土地便要被他強迫收回去。此外，農民要被強迫着「增產糧食」，從早到晚像牛馬一樣激烈的勞動，然而辛苦苦得來的收穫，大部份被政府以賤價，強迫地收買去了。弄到農民自己種的米，自己吃不飽，越是努力生產，越是貧困挨餓，這就是今日農村的實際情形。

知識階級也是一樣。他們的學術研究、他們的職業、言論、生活，他們所有的一切，都受着嚴厲的限制。我國早已沒有科學和文化了，只是氾濫着有利於殺人、驅敵戰爭與野蠻的東西。學校中也没有了學術的自由，教科書被軍部的宣傳所代替。學生不能從事學習，軍事教練和義務勞動浪費掉許多時間。因此學生學力低下，落第者激增，雖政府也爲之吃驚，但這是當然的結果。

中小商業與和平產業，因軍需品「生產力增強」，毫無停免地犧牲了。這些工廠的機器，當作廢鐵被送給大軍需工廠了。許多小工廠和商店被迫關閉了。這些經營者，馬上失去了家業改行也不行，陷於極度的慘境。條件尚能繼續營業的，也因原料、動力、機械販賣等一切皆被嚴厲統制，難不了錢。

再轉看前線吧。和國內一樣，士兵的生活也日益痛苦，日更危險了。由於兵員不足，不能不以少數的部隊担任戰鬥或警備。所以危險大增。訓練極，規則嚴。打耳光之類的暴行甚盛，新兵沒有不哭的日子。軍隊裡，人權完全遭受蹂躪。所有的給養可怕地變壞了。連飯也吃不飽。去年，增加了薪餉。但同時酒保（軍隊內的商店）的價格也漲高了。而且，將近一半的薪餉當作貯蓄和其他用途而被扣。但恩給制度却廢止了。因此，軍隊雖在名義上加薪餉，而實際上却使士兵生活比以前更壞。這難道不是流氓和騙子所幹的事嗎？此外，戰爭快要結束，可以早日回家的希望完全破滅，故鄉的書信盡是訴說生活的痛苦。……這就是今天日本的軍隊。其實，所謂日本軍隊，就是牢獄的別名。但軍隊比牢獄還要壞。因爲成千成萬無辜的青年，在這裏並沒有判決死刑，却要變作活的槍靶。

其次，看看政治方面吧。事變以前，我們國民多少有着自由（雖然只是一點點）。工人和農民可以組織工會、農會和政黨，某種程度以內，尚可舉行改善生活的罷工、租佃鬥爭和示威運動。知識階級，在某種程度內尚可所欲言。但現在，這一切皆遭受了禁壓。全部的勤勞者，被強迫加入資本家和地主領導的「戰國會」。「戰時刑事特別法」，連人民對政府政策的批評，也當作犯罪而嚴加處罰。這樣一來，所謂保舉一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憲法條文，現在全被軍部的鐵蹄踐踏得乾乾淨淨。人民的「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在警察、憲兵、警防團、勳賞壯年團、鄰組、五人組等等的監視當中，如果稍有自由的語言行動，馬上就遭受處罰。……這些到底和監獄的囚犯生活有何區別呢？

再者，在事變以前，還有政黨，有選舉，有議會。雖然這些都並不是充分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東西，但還允許有某種程度的自由。但今天政黨被解散了。僅只有政府御用的黨政治會存在。選舉變成了只選舉軍部和戰爭讚美者的工具，議會變成了只是無條件贊成政府提出的龐大軍費預算和議案，拍手歡迎東條大將的演說的部院。選舉和議會便這樣地被軍部絞殺掉了。現在的我國，完全沒有自由和民權。人民呻吟在軍部法西斯獨裁之下。我國復活了德川封建時代的黑暗封建的專制政治。

戰爭爲着什麼？

上所說的是「中國事變」以來，我們日本國民大衆在戰爭當中所

到窮東西。這是血和淚的海，是軍費、公債、租稅的出，是過勞和衰弱，不自由和牢獄，是軍部的口號、皮鞭和刀劍，……除此以外，看得到什麼？

但是，爲什麼我們非忍受這樣的痛苦和不自由不可呢？究竟爲了什麼呢？

這都是爲了戰爭的原故，如果沒有戰爭，當然不會有這樣的事。東條在議會上也這樣說道：「國民爲了勝利，要忍受不自由，要經得起熬煎！」

本來，假使這個戰爭是真正的正義戰爭，是真正爲國民的利益和幸福而戰，是真正爲了東亞民族解放的戰爭，那麼，我們國民就有忍受任何不自由和艱難的決心。但現在軍部所進行的戰爭，究竟是不是這樣的戰爭呢？

回頭看一看「滿洲事件」吧。軍部曾經向國民說這個戰爭是爲了「建設樂土」、「建設獨立滿洲國」的戰爭，從那時起已經過了三十二年。那麼，到底在滿洲建立了什麼樣的「樂土」和「獨立國」呢？如大家所知道的，那裡僅僅建立了關東軍閣和滿洲重工委員會（鮎川、久原財閥）的樂土。「滿洲國」皇帝和政府，不過是日本顧問的傀儡罷了。這不是公開的事實嗎？「樂土」也好、「獨立國」也好，僅不過是軍部和財閥要掩蓋其真目的藉口而已。而我們國民，爲了達到他們的目的，償付了巨大的犧牲。這就是「滿洲事件」的真相。

接着「中國事變」發生了。軍部隨着戰爭的發展，提出了花樣翻新的口號。什麼「東亞和平」、「建設新秩序」、「日支共存共榮」、「從英美手中解放中國」、「中國的獨立」等等……但日本軍部實際上在中國幹了些什麼呢？殺戮了千萬無辜的人民，燒毀了無數房屋，佔領了比日本本國還大的土地，掠奪了全部重要的資源。而且在那裡引來了日本資本家，建立了「開發會社」、「振興會社」以及雜七雜八的許多會社，盡量榨取中國的資源和人力，攫取巨利，以供軍部和資本家的瓜分。的確，軍部大肆宣傳：汪精衛的「南京政府」成立了，治外法權撤廢了，中國「獨立」了。但是，這和「滿洲國」的獨立是一樣的詭計。三歲小孩也知道：「南京政府」的實權，是握在日本軍部和大東亞省的官員們手裡，汪精衛和「滿洲國皇帝」不過是異而同工的傀儡。軍部和財閥以這種裝模作樣的「獨立」來欺騙與懷柔一部份中國人民，以便更易於統治與榨取中國。但是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並沒有被這詭計所欺騙。事變以來，雖已經過了六年，但不僅抗日軍隊，就是在日軍佔領區的中國民衆，也仇恨日本統治者，不斷反抗日軍，不是現在還不能

保持「治安」嗎！……這樣看來，「中國事變」只不過是以我國國民莫大的犧牲和負擔，建立爲着軍部和財閥的利益的新秩序而已。這難道還不夠明白嗎？

再後，「大東亞戰爭」爆發了。軍部每天瘋狂地宣傳「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民族從英美帝國主義底下解放出來」……於是東條給緬甸「獨立」，答應菲律賓「獨立」。但這些「獨立」，和「滿洲國」、「南京政府」的獨立，是同樣的冒牌貨，巴茂和瓦爾加斯，是和滿洲皇帝，汪精衛一樣的軍部的傀儡。這已用不著說明了。但是拙劣的傀儡戲，馬上就要露出狐狸尾巴。且看馬來、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對這些擁有豐富資源的廣大土地，東條不是連緬甸菲律賓那樣的傀儡立也沒有給他們，反而聲明它們完全是日本的領土嗎？就這些，還不明白軍部所宣揚的東亞民族的「解放」只是一句謊話嗎？大東亞戰爭真正的目的，不是解放東亞民族，而是野蠻貪婪的日本軍部和財閥要來掠奪富饒的廣大的土地。在這戰爭中，犧牲的還是我們國民，得到的却是軍部和財閥，建立的是軍部和財閥的「共榮圈」！

軍部喊着目前的戰爭是「從英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剝削之下解放東亞民族的聖戰」。假使真的這樣，那麼軍部應立刻撤退全中國（滿洲在內）和南洋龐大的日本軍隊和官吏！將這些地方日本的權利，歸還各民族！建立各民族自行選擇的政體和政府！——這是真正的解放。軍部會這樣幹嗎？不，絕對不會！

如果軍部真想消滅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剝削，好吧，立刻給朝鮮，台灣民族完全獨立！不，在解放其他國家人民以前，首先消滅本國內軍部的獨裁和資本家地主的剝削，將我國人民從本國帝國主義的暴虐之下解放出來——但是，這樣的事情，軍部不願做也不能做。這連傻瓜也會清楚的。

因此，軍部所標榜的獨立、解放的口號，不過是爲了欺騙國內外人民，以便貫徹他自己及其黨羽的野心陰險的隱惡罷了！

同胞們！

「滿洲事件」、「中國事件」、「大東亞戰爭」……，戰爭是這樣在擴大着，而且每次軍部所掛的招牌都不同。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事實。就是這所有的戰爭，都是爲了軍部和大財閥的利益而進行的，我們日本國民大眾只是償付了難以計算的犧牲。——這就是這戰爭的事實。

看吧！大東亞資本家利用這個戰爭，一面喊着「滅私奉公」等好聽的名

詞，其實却從軍需定貨和對外投資中獲得莫大的利潤，用「統制」使中小資本家與和平產業資本家破產，在自己手中集中壟斷着巨大的財富，成為經濟的獨裁者。這是公開的事實。

還有大地主，從「食糧增產」和政府的補助金獲得巨大的利益，並因軍需投資而分享軍需景氣的恩惠，也是公開的事實。

而軍部呢，雖然喊着「排除資本主義的營利主義」，但實際上却勾結着大軍需財閥，直接間接分享他們的利潤。譬如東條大將的兒子和弟弟，就和三菱、川崎軍需財閥勾結在一起，就是一個例子。其他大小軍人在日本、朝鮮、台灣、滿洲、華北、華中、華南、南洋等地從財閥那裡得到很多好處，也是公開的秘密。現在，國民生活的一切，都遭受嚴格的統制，但只有資本家的利潤是例外的。就從這一點也可以洞悉軍部和財閥的勾結。

再者，軍部利用了戰爭，掌握着日本政治的獨裁權，將人民變成自己的奴隸，像牛馬一樣的驅使。在戰場上，高級將校以千萬士兵的枯骨，博取金牌勳章（日本最高勳章）和巨額的恩給。在中國佔領區和南洋，軍部是政治經濟一切的專制君主。

以上這些事實，不過把戰爭真實的目的和性質清清楚楚地暴露出來了嗎？軍部非常害怕我國國民知道這個真實的目的，乃用無數關於「崇高的戰爭目的」的欺騙宣傳，來蒙蔽國民耳目。

日本國內的同胞們！前線的士兵兄弟們！現在請你們所進行的戰爭以及為此而償付的無限犧牲，決不是為着「崇高的理想」，實際上只是為着日本統治階級——軍部（官僚），大財閥，大地主等等——的獨裁和利益，為着他們侵略他國，奴役他民族，——總之，是為着他們填不滿的慾望。

我們國民任何一滴寶貴的血汗，決不應該化在這種可詛咒的非正義的戰爭上面。這種強盜戰爭必須立即停止，只有早一天停止這種戰爭，才能免除我國和東亞人民無謂的犧牲。

怎樣停止戰爭

那麼，怎樣才能早日停止這種戰爭呢？

這首先就要打倒軍部。即剷除軍部在我國軍中、政治上的特權，將他們從軍事、政治的統治地位上擄走。因為軍部是個戰爭的發動者，戰爭的實行

者，從戰爭中獲得最大利益的人。因為軍部同時又是我國獨裁和反動的主要支柱，大財閥和大地主的擁護者，我國人民的吸血鬼，東亞人民的劊子手。因此，只有打倒軍部及和他勾結一道的幫兇，在我國建立起真正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為人民所支持的人民政府之後，那時戰爭才能停止，我國以及全東亞才有和平、幸福、光明、解放的前途！

立刻停止戰爭！打倒軍部！建立人民政府！——這一定要成為愛好正義的我們全體人民共同的口號。只有這才是值得我們不惜一切犧牲為它奮鬥的崇高的目的。

然而，究竟這個目的能否實現呢？能，一定能夠，一定要實現！

那麼怎樣才能實現呢？

原來我國一切的軍事、政治、經濟，都是依靠我們勞動人民的力量。如果，工廠工人停止製造軍需品，運輸工人停止輸送武器，公務員的罷工停止工作，農民拒絕向政府和地主交納糧食，前線士兵停止作戰，水兵不聽軍艦……這時，不管將軍怎樣揮動他的指揮刀，大臣和公司經理如何「陣頭指揮」（親自監督），但戰爭早已不能繼續，政治，經濟也會歸於不能運轉了。——由此可見勞動人民的力量如何偉大。

因此，如果工人、職員、農民士兵，以及知識階級，中小商工業者，其他所有戰爭的犧牲者、所有軍部反對者，——即佔我國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國民，覺醒起來，團結一致，反對戰爭和軍部，那就一定可以打倒軍部及其幫兇，一定可以立刻停止戰爭。在我國沒有任何人可以抵抗這一偉大的國民團結——人民戰線——的力量。

從何着手

要組織偉大的團結和戰線，首先應當從什麼地方着手呢？這就要從身邊眼前的事務着手。

首先，必須竭盡全力來喚起國民的自覺。國民大眾的力量是偉大的，但其力量之所以沒有實際表現出來，主重就是因為他們受了軍部宣傳的欺騙和迷惑。因此，必須使他們了解戰爭的本質，知道軍部的罪惡，進而決心為反對戰爭和軍部而鬥爭。只有這個時候，他們才能獲得不可戰勝的力量。

同時，全體國民，必須為着拒絕戰爭的負擔和犧牲，為着保衛自己的生

活和自由，團結起來進行鬥爭。這個鬥爭將喚起國民作爲勞動階級、被壓迫階級的自覺，使其加強團結，感到自己的威力，而獲得勝利的信心。這個鬥爭，將搖撼日本的戰時體制，削弱軍部的力量。這個鬥爭，就是組織廣大的人民戰線的出發點。

現在，我們國民各階層，有着非立即貫徹不可的許多的要求。這就是：
工人和職員要求——廢止薪水限制令，增加工資，廢止強制貯蓄和職金，縮短工作時間，恢復工廠法，解散產業報國會和組織工會與罷工底自由，應徵期中被給全部薪水等等。

農民要求——廢止強制收買糧食和徵收牲口，廉價供給肥料和農具，減輕和禁止收回土地，延期償付債款，廢止無報酬的義務勞動，解散農業報國會、組織農會與佃戶爭底自由等等。

知識階級要求——反對軍部對科學、藝術、文學等等的干涉，學生要求廢止義務勞動和軍事訓練，學術的自由和校內的自治，組織學生團體和體育運動底自由等等。

中小商工業者要求——反對爲大財閥利益而實施的「超重點政策」與統制，完全保障因此而犧牲的商工業者的生活等等。

應徵的士兵家屬要求——生活的完全保障，立即歸還丈夫、兄弟和兒子等等。

前線士兵要求——改善給養，嚴厲禁止打耳光和虐待、外出、贖買，集會的自由，即時遣送滿期兵士回國等等。

爲全體國民共同的要求而鬥爭

從着上述國民各階層迫切的要求而觀，是我們鬥爭的第一步，我們必須更進一步爲以下的全體國民共同的政治、經濟的要求而鬥爭。這些要求就是：從空襲危險的重要都市疏散婦孺老弱，用政府經費設置完備的防空設備，將防禦用具無代價的發給國民居民等等。

廢止強制貯蓄、徵收、強制物產，廢止義務勞動等等。

減輕物價，供給充分的物資和改革配給制度等等。

廢除國家壟斷，以此救濟戰爭的犧牲者，以此改善國民生活和提高文化，全部廢除由戰爭財的財主們負擔，過度賦稅人民租稅等等。

廢除「戰時刑事特別法」，「治安維持法」，及其他壓迫人民的各種法令，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運動的自由，立即釋放政治犯等等。

我們還必須爲剝奪戰爭和反動的元兇——軍部——所有的一切特權（權上、奏權、軍務大臣軍人制等等），爲反對軍部對於政治、經濟、文化的干涉，爲使我國軍事與政治民主化而鬥爭。

爲了使我國政治民主化，首先我們必須根本改革選舉法，即廢除關於選舉及被選舉的一切限制，至少要給二十歲以上的男女以選舉權，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的投票權。再則必須將我國憲法加以重大的改革，根據上述選舉法成立民主的議會，給此議會以全權，正式組織人民政府。這樣，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民主政治，才初步在我國實現。我們必須爲這樣的政治改革而奮鬥。

我們必須以全力爲實現以下要求而鬥爭——立即結束戰爭！立即撤退全中國和南洋諸國的日本軍隊，軍艦和官吏，廢除日本政府、資本家在其他國家的權利，保障這些國家的獨立和主權。

以羣衆鬥爭來達到目的

到今天爲止，不管政府、議會和政黨，都不顧沒有擁護上面所說的全體國民迫切的要求，而且還徹底反對。因爲這所有的機關，都被軍部、大資本家、大地主支配着。

因此，這些要求如果和平合法地向政府、議會、正當團體，是絕對不會被採納的。只有我們大衆一致團結，以羣衆的壓力爭取。除此之外，便沒有貫徹要求的方法。羣衆的威力，只有當羣衆組成了團體，起來進行統一的共同行動之時，才能充分發揮。

但是，過去我國所有自由進步的羣衆團體，全部都被軍部解散了。現存的只有軍事的、愛國主義的組織。如各種「報國會」、隣組（類似中國保甲制度的組織）、町內會、青少年團、婦人會、在鄉軍人會、壯年團、其他等等。所有這些組織，均由軍人和官吏領導，其目的在支持戰爭和軍部。不過這些東西，今天在我國都是唯一合法存在的組織，其中多數人是被強迫加入的，或者是不自覺而參加的。不管那種組織，我們勞苦大衆都是主要的會員。因此，我們不要因爲這些組織是反動的便退出來，而是要在裡面積極地活動，但我們積極地活動，決不是當軍部的走狗，而是與軍部對峙，而要求軍部對峙，而要求軍部對峙，而要求軍部對峙。

奮和痛苦、切身的要求，為解決這些問題，為反對領導者反動的、反人民的言行，為排斥他們而工作。

以這樣活動來提高羣衆的階級覺悟，使羣衆識破戰爭和軍部的本質，使羣衆勇於鬥爭，使羣衆和上層領導間的對立尖銳化，以至使團體自身喪失力量，或引導其走向崩潰的道路。

然而我們不應停止於團體內部的工作。還必須不管軍部和政府的命令，組織羣衆起來鬥爭。

我們號召：

工人恢復工會，農民恢復農會，學界恢復學生團體，商工業者重新組織自主的同業工會，士兵組織士兵委員會。——並組織這些團體的共同委員會！工人發動罷工，農民發動租佃鬥爭，商工業者發動對政府的抗議運動，士兵發動羣衆的請願運動！

從工廠、家庭、學校、兵營跑到街頭，喊着我們人民的口號，發動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為貫徹共同的目的，在全國普遍地組織町內大會、村民大會、町民大會、市民大會、以至國民大會！

這樣，當全國民衆巨大的行動，像怒濤巨浪一般，衝擊着軍部及其黨羽的時候，那麼，他們的命運到底能夠拖延幾天呢？軍部是一定要崩潰，民主的新日本是一定要出現的，新日本的人民政府就建立在這種偉大的人民衝鋒和鬥爭的基礎之上。

證明大衆的鬥爭是怎樣偉大的事實，在我國歷史上自古以來就有很多。較近的有大正七（一九一八）的「米騷動」。由於全國人民的蜂起，當時的反動（寺內）內閣倒台，其後的政府不能不同國民作許多讓步。我們國民必須從這次「米騷動」學習無限的經驗教訓。

共產黨員們，舊日本憲法黨員們，舊社會大衆黨員們，舊工會會員們，舊農會會員們，舊文化團體會員們，舊學生團體會員們，消費合作社社員們，青年團大衆，婦人會大衆，商工業同業會大衆，各種「報國會」大衆，在鄉軍人團大衆，及其他所有誠實進步的人士們！你們彼此緊密地攜起手來！團結你們一切的力量，為實現上述目的，組織一個偉大的勤勞國民運動——人民戰線！這就是我們全體國民心理對於各位的期望！事實上，我們的興亡，全在你們的肩上了！

參加到日本共產黨的隊伍中來

今天，我們勞苦大衆的雙肩，担負了偉大的歷史的使命。這就是為廢除國民共同的目的，將國民各階層各式各樣的要求和行動，統一聯合起來，結成全人民的戰線。

然而，在這運動當中，必須有推動這一運動的中心力量。這力量就是工人階級，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先進份子。而職身於完成這一任務的，就是我們日本共產黨。

我們共產黨自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成立以至今日，不管受着警察和軍部的不可名狀的彈壓和迫害，仍二十一年如一日地經常為保衛勞苦大衆的生活和自由，站在大衆前頭奮鬥。當「滿洲事件」和「中國事變」爆發的時候，不管社會民主主義的領袖如何把這些戰爭頌揚為「聖戰」，並支持了這些戰爭，但共產黨却對此非正義的戰爭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對於「大東亞戰爭」，也進行着決死的戰鬥，這從政府官吏口中也洩露了這樣的事實。

我們共產黨最後的目的，是取消資本主義制度，實現沒有階級和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黨曾向我國民宣傳這一目的。但是完成這個目的，並不是當前的任務，這是我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特別是貧農，以將來的鬥爭所應達到的目的。今天當前的任務，是為保衛勞苦大衆的生活與自由，打倒軍部，立即結束戰爭，而發動包括全部戰爭的犧牲者的一大國民運動。

現在，我們共產黨處在極端秘密的狀態下，還是弱小的。但我國勞苦大衆同情共產主義思想，支持着共產黨的綱領和政策。這是在今年春天的議會上，為大臣們公開承認的事實。假如沒有羣衆的支持，便不能存在。我國勞苦大衆和一切進步份子，特別是日本共產黨員們，舊社會大衆黨員們，舊工會會員們，舊農會會員們，應勇敢地參加進黨的陣營中來，在黨的號召之下，為完成我們光輝的使命而奮鬥！這是你們唯一正確的道路！將來是我們的！

為軍部的失敗和崩潰而鬥爭

實現我們目的最有利的條件，無論在國際國內，都正在急速地成長着。日本的盟友德國在斯大林格勒徹底全軍覆沒，北非意德軍底慘敗，歐洲第二條戰線迫近，意大利，德國國內的不安和動搖，兩國佔領區內反德，反

憲的人民武裝鬥爭的激化等等。

在東方，「解決中國事變」絕望，美軍奪回瓜達康納爾島，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戰死，阿圖島上日軍全部被殲，美英軍對日反攻準備的增強，特別是美國飛機對日本本土空襲的迫切等等。

上面所說的歐洲和東方的新形勢，表示了什麼呢？這表示反軸心同盟國的力量已壓倒了軸心國的力量，表示直到去年夏天為止還處於守勢的同盟國，已開始巨大的反攻，而戰爭的主動權已轉入同盟國手中。

同盟國的戰略，是首先擊潰希特勒德國（意大利）。為此目的，最近的將來，英美在歐洲開闢第二條戰線，協同蘇聯紅軍夾擊德軍，這時希特勒就要崩潰，這一日本軍部也承認了。而這個時機已經迫近。

其次，同盟國的戰略，是在打垮希特勒以後，集中全力於東方，來擊潰日本軍部。這時，不管軍部如何發揮其「精神力」，但毫無疑問它將屈服於同盟國方面驚人強大的武力之下。單拿太平洋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飛機和艦隊的變方的生產力來比較一下。今後一年前英美兩國的飛機生產量約十五萬五千架，造船量約二千二百五十萬噸。而日本呢，就給它多算一些，充其量飛機生產也不過一萬四千架，造船也不能超過一百萬噸（連佔領區的造船力亦在內）。這樣，同盟國和日本的力對比，飛機為十一比一，造船力為二十比一。這就好比橫綱（日本頭等摔跤力士）和小學生的角力一樣。勝敗自明。軍部重蹈希特勒的覆轍，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而這個時機，也不並是太遠的將來了。

然而，軍部向國民宣傳什麼「必須戰勝，如果失敗，便要變成美英的殖民地」！這不過是軍部照例的欺騙宣傳。誰都曉得這個戰爭並不是美英為了要將日本變成殖民地而發動起來的；倒是日本軍部及其黨羽，為了要把南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才向美英挑釁，發動了這個戰爭。現在美英和我國作戰，為的是要擊潰日本軍部。就退一萬步說，假定美英有將日本殖民地化的意思，但現在日本政府戰敗，決不會使我國變成殖民地。

且看廿五年前俄國的例子吧。大家知道，帝俄吃了德國一個大敗仗。跟着社會主義革命爆發，工人和農民掌握了政權，於是世界列強對此年青的蘇維埃俄羅斯進行了聯合的武裝干涉。然而這個俄國不是沒有成為列強的殖民國和二等國家，而今天却成了世界上的頭等強國，還擊退着強大的德國軍隊嗎？這就是因為在俄國建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所擁護的鞏固的工農政

府，因為這個政府在正確的政策之下，全國人民像鋼鐵一樣地團結起來，不惜一切犧牲和外來的敵人作戰的緣故。

這情形對日本也是一樣的，如果我國國民成立人民政府，像蘇聯人民一樣，全國一致團結，為了民族獨立，和外國侵略者英勇作戰，那麼，我國絕對不會變成殖民地等等的危險。危險的倒是戰敗的結果，在軍部政府推翻之後，人民政府不能成立，成立了資產階級政府，這時，資本家為着保持自己的地位，可能向外國出賣我們的祖國和國民。因此，為着防止這種情況，無論如何，必須建立人民政府。

我們日本人民，現在不是要政府戰勝，而是歡迎它戰敗，並必須以全力使其戰敗。理由是：進行「大東亞戰爭」的，是現政府，即軍部及其黨羽。戰敗就是他們的失敗。他們的失敗，就是他們軍事上的，政治上的倒台，就是他們的崩潰。這就給我們以最好的機會來打倒他們，建立人民政府，建設新日本。在沙皇俄國，工人和農民也利用了俄國政府的失敗而取得了天下。因此，軍部的戰敗，就是打倒軍部，人民獲得勝利的道路。相反地，如果軍部在戰爭中勝利，那就是他們力量的增強。他們之所以拚命向人民喊着「勝利！勝利！」其實也不過是要掩蓋他們的獨裁和生命罷了。

軍部的勝利就是人民的倒台，軍部的失敗，就是人民取得勝利的捷徑！全國人民大眾團結起來！你們決不能受軍部宣傳的欺騙，你們在工廠中，在鐵路和輪船上，在公事房，在鄉村，在學校，在兵營，在軍艦上，不要為着生產力的增強，而是為着它的減退，不要為着軍部的戰勝，而是為着它的戰敗，獻身地工作吧！這就是你們解放的道路！

勝利的條件在成熟着

上述歐洲和東方戰局對日本軍部的不利狀態，和大规模戰爭的長期化，給日本國內以深刻的影響。經濟力的消耗，將達到頂點。國內和佔領地的物資，幾乎已經全部動員。老弱婦孺也都動員起來了，國民的生活痛苦，也將達到頂點。雖然如此，正如大藏大臣所嘆息的，生產力是沒有增加。經濟破產的危險是增長了。

再者，統治階級內部也發生了激烈的糾紛。這從六月間召開的臨時議會中的混亂情形及翼贊政治會的分裂便可以看出。東條內閣動搖起來了。一般國民的情緒，也和開戰當初迥然不同。疲勞困頓，不平不滿，對前

遠不安，動搖，厭戰……這種情緒，在工人，農民，知識階級，中小雇工業者等當中，廣泛地傳播開來。「惡性的流言蜚語」，到處都傳播着。還有工人的罷工，不管政府如何彈壓，也沒有絕跡。這些事實，表示着民衆已開始逐漸從軍部的欺騙當中覺醒過來，開始發動軍衆鬥爭。

在前線的士兵當中，疲勞，不滿，悲觀，厭戰……的情緒，也成長起來。自殺，逃亡，反抗上級，自動投降等事件也增加了。

在這當中，日本共產黨不屈不撓的鬥爭仍在繼續，黨的影響，在軍衆當中擴大了。這一事實，連政府也在議會上也公開承認了。

還有，在日本統治下的各國，形勢也頗為不妙。軍部盡量宣傳：朝鮮，台灣，中國，南洋佔領區的民衆，感謝日本的統治，安居樂業。但這也是欺騙。感謝日本的，只是少數沒有民族意識的奴才，大多數的民衆，對暴虐的日本統治者，懷着無限的仇恨，憤慨和反抗心。朝鮮，台灣的民衆，對中國抗日戰爭如何同情，如何盡力援助，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實。而中國人民，今天依然頑強地和日本軍隊作戰，也是公認的事實。在菲律賓，馬來，爪哇，其他南洋各地，人民是怎樣在繼續反抗，也是不可掩蓋的事實。這許多人民，準備着當日本發生軍事政變的時候，一齊蜂起推翻統治者。「共榮國」不過是沙堆上的樓閣罷了。

向着勝利前進

上面所說的內外各種情況說明了什麼呢？這說明了我國人民大眾，在反戰反軍部欺騙之下，進行羣衆鬥爭的有利條件，正在迅速的增長着。

全國勞苦羣衆到了特別是它的覺悟的戰士們！

過去七十五年間被盡我國人民膏血的軍部及其黨羽，「中國事變」以來使我國生靈塗炭，將東方全體人民任意蹂躪的軍部及其黨羽，——現在，他們敗退和崩潰的時期已迫近了。他們的衰頹了。你們組織全體羣衆力量，向他們衝鋒的時期已經到來了。你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糾合同志，開始鬥爭的時期已經到來了！

由於希特勒的失敗，日本軍部在國際上已經孤立無援。相反的，我們國民却得到了億兆的盟友和援助。即執、韓、台、中、南洋各地被壓迫人民

，美、英、蘇及其他廿餘國的反法西斯陣營的人民——全世界十五億的人民，也成了你們的盟友和支持者。

而這些盟友，又正在準備給共同的敵人——日本的軍部及其盟友德意法西斯——以致命的打擊。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這種巨大的世界統一戰線的前面，日寇的戰爭狂，不過是風前之燭。他們一定失敗，我們一定勝利！

同胞們！兵士兄弟們！進軍的喇叭響了！前進吧！

高舉起全人民光輝的旗幟！在這旗幟之下戰鬥，必要時就死在這旗幟之下！這樣的死，才是真正的「名譽的戰死」！

在這旗幟上面，寫着：

立刻停止戰爭！立即從中國、南洋全境撤兵，打倒軍部！打倒戰爭政府！

建立人民政府！

建立和平自由的日本！

東方人民的共同鬥爭萬歲！

世界反侵略統一戰線萬歲！

代 郵

賜稿諸君：

以後務請註明通訊，以免延誤。

法西斯荒謬的國家理論

明 操

儘管法西斯的國家論是法西斯最黑暗最野蠻政治的核心，揭發這些荒謬的理論，使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法西斯的本質。

法西斯怎樣看國家呢？

首先是一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的問題。

自盧梭民約論出版，中世紀封建「朕即國家」的理論日益破產，民權思想普遍發展，人民是國家主人翁的觀念，就成爲人民牢不可破的信念。資本主義的發展，更在國家組織的形式上，認定了國家是爲人民服務的一種機構。實行議會政治，限制政府的專權。即使到後來，社會主義思想的出現，儘管在著法上兩者有很大差別，但有一共同點所在，即都認國家是一個人所控制運用實現某些人利益的一個機構。換句話說：國家是爲人所役使，服務於人的利益。以人爲主的，這種看法，恰恰是法西斯主義所最反對的。

法西斯主義者盲目的崇拜國家神像，視爲絕對的存在。墨索里尼曾說：

「法西斯主義視國家爲絕對的存在，一切個人或團體和國家相較，俱爲相對的。個人或團體，只有在和國家的關係上始有意義。」

法西斯御用理論家，一致吹噓這種見解，例如意大利法西斯黨理論家洛茲克就曾這樣很露骨的，反對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國家理論，爲法西斯國家論作辯護，他說：

「在舊的主義上的根本問題，是個人權利的問題。雖然自由主義者是在獲得自由的權利；民主主義者在要求爲共和政治的權利，社會主義者在主張經濟的正義的權利。要之，在所有場合，成爲問題中心的是權利或是個人的集合體的（階級的）權利。然在法西斯主義，則直截了當的只有國家的權利與個人權利的問題。」

法西斯主義者把國家絕對化起來，必然要利用最迷信的說法，來欺騙掩飾，墨索里尼（Mussolini）說得很清楚：「法西斯主義者說，上帝是最高主宰，而國家是上帝在世界上的代理人，專爲人民的良好政府，而對上帝負責。

○這就是最好的證明，在法西斯者看來，國家是不對人民負責，（因爲人民只有義務）而僅僅只對渺不可測的上帝負責的。

法西斯國家論的第二特點，則是混淆了種族，民族，國家三位一體，而特別強調種族，強調自己種族的優秀純潔。德國內政部長弗利克曾說：「種族的混合，及因種族混合而產生的種族標準的低落，爲古代文化毀滅的唯一原因。民族不會因其在戰場中失敗而被毀滅，但可因其抵抗力量的喪失而沈淪，這種抵抗的力量，只寄存於純粹的血統之中，世界上一切非優秀民族所有的東西，都是毫無價值的廢物，而所有人類的歷史，不過是驅逐異族而從事自衛的表現。」

納粹有名的理論家盧森堡的最著名貢獻，就是他認爲整個世界史，乃是一部種族鬥爭史。他認爲阿利安族是世界最優秀的種族，近代歐洲史上的鬥爭，都是阿利安族與羅馬帝國陷落後的雜亂種族相鬥爭。過去歷史上偉大的貢獻，都是阿利安種族的創造。這種荒謬的種族論，當然結晶於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之中，希特勒把人類分成文化之創造者，保護者，破壞者三種，唯有阿利安人，方足爲第一種的代表。在希特勒的分類之下，不僅我們中國被列爲劣等民族之林，就是今日軸心難兄難弟的日寇也被認爲是劣等民族的。

這種荒謬的極端唯我獨尊的種族論，是法西斯國家論的中心，希特勒在這一點上就說得很清楚地說：「民族國家的主要目的，在於保存固有之種族特質。」這就是說，法西斯國家神像，其本質就是鼓吹種族的至高至尊。法西斯國家論的第三特點，也就是引中而來的反對階級的存在，把國家描寫成超階級的，由全國公民所共同協力組織的。法西斯把這樣的國家看作是按照等級（這種等級是指人的才能）或組合原則，所組成的組合國家。所謂組合的國家，根據法西斯理論家潘恩澤阿所說：「法西斯國家的特質就是（一）政治的集中化，標準化與等級制度，換言之，就是與議會制國家相反的全體國家；（二）在企業組合的協力幫助之下，組織國家，它在企業組合與國家的相聯繫中執行組合的功能。企業組合的組合國家，與個人

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單個份子組成的國家正相反對，國家是建築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

法西斯黨這一切機構的主要根源的政黨國家。法西斯黨這一切機構的組合，強制聯合工人的自己職工組織，把他們分散到各別的組合，強制聯合工人的工廠與企業主的團體在這些組合之內，排除工人階級在政治生活中與一般政策上的任何影響。法西斯黨這一作法，就是為的制止階級鬥爭，故意宣傳中世紀的國家與行會及等級制度，以此為國家和社會組織的理想，它們把國家強調得高高在上，可以調和一切階級矛盾。

由上述各點出發，在實際法西斯政權的組織形式問題上，就表現如下幾種特點，首先是從否認人類天生平等的觀點出發，主張實行一層層領導的系統。法西斯們強調，人的才智不一，歌頌英雄統治，把人民當成牛馬。其次，法西斯更否認民意表現。他們強調地說：『用民主投票或多數方法來治理國家，絕不是良好政治，而最好的國體與制度，即以果毅的手腕，選選社會才智之士，使之處於優越地位。』這兩種特點，就是根本反對民主政治，而提倡獨裁政治，提倡領袖的權力與尊嚴，根本推翻議會制度的運用。

法西斯國家內議會便成爲替刺之銀羊，奄奄一息而無生氣了。希特勒說民主制下議會政治說：『今日民主議會之目的，不在成一種實人會議，而在集合一羣卑鄙無能之人。；實際上無所爲責任，以責任只能由一人担任，而不歸之於徒尚空談的議會。』更說：『合一百愚夫，不能成一智者，故英武之決斷，不能得之於一百庸夫。』

這種反對議會政治的論調，直接就運帶強調其獨裁政治，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露骨地說：『最善的國家形態與憲法，乃是保證國家中最卓越少數人物，自然的立於指導地位的東西。在那地方已無多數的存在，只有負責全責任的少數優秀人物。雖然有若干人物在旁邊担任顧問，然最後的決定，則只是由個人獨裁。』德國是如此，意大利亦然。對於下台以前的墨索里尼，法西斯黨也如此宣傳：『我們的領袖是神人，他的生活是神聖的，他的言論就是法律，他的意志就是最高的生活法則。』

其次，是黨與國家的混合。法西斯在意大利和德國用專斷手段攫取了政權之後，便用暴力摧殘了各種政黨的合法存在，只准法西斯黨的唯一政黨。接着便是把與國家混合起來，變成黨國不分，黨就是國，國（政府）即是黨。人民若批評法西斯黨，便認爲是反對國家，可用政府規定的法律嚴加懲罰。

這種黨國混淆的最主要特點，表現在法西斯黨機關的國家化。意大利法西斯黨最高評議會，是黨的最高機關，但它對於國家政治，事實上有着超越國

議以上的權限。一九二八年意大利新選舉法規定，凡是議員的候選名單，皆由法西斯黨最高評議會指定。這已表示它不僅是黨的私機關而是國家機關了。除了上述以外，所有王位的繼承，政府首長的特權與大權，關於意大利本土及殖民地之領土變更，取得，地產等國際條約，皆有諮詢權。並且在政府首長離職去任時，最高評議會得悉政府首長的提案，製作預備繼任者名表，呈請國王選任。國務大臣離職缺席時，也得製作繼任者的名表。這就是更明顯地表示黨的機關，可以支配政府議會乃至國王。此外另一例子，則是法西斯黨的書記長，是提出經國王任命的。

這種混淆不清，不僅是法西斯黨，所有法西斯的外圍團體，如義勇軍，少年團，法西斯職業組合，都是黨的羣衆組織，而經費皆由國庫支出，成爲國家的設施。這就是法西斯所宣傳的：一個民族一個領袖一個黨的具體表現。

我們從上面各點的說明中更可以看出，法西斯的面貌來。法西斯主義是最反動的一種統治制度，它爲金融寡頭的獨占利益服務，因此必然強調國家的神聖，高唱組合國家，尊尊秩序藉此壓榨窮困人民的反抗，維持剝削制度，以獨占資本階級利益當作全國人民的利益。爲了進行這一掠奪國內人民的計劃，他必然反對民主，不讓人民有一絲一毫政治上的自由，有的只是憲兵秘密警察，集中營和鐵絲網。

同時爲了擴大獨占資本的利益，必然鼓吹『狹義的排外愛國主義』，鼓吹戰爭，獨裁權力，和種族理論，發動對外侵略。墨索里尼說：『戰爭是一種道德，希特勒公然表示：『阿利安人所必經的途徑，已顯然表明，即征服低等民族，使之遷徙其意志與目的，在其統治之下工作。』

其次，爲了實現對內殘暴的統治，對外發動掠奪戰爭，它必須將國家組成一嚴密的戰爭機器，所以法西斯黨願全能國家體制，個人只有服從紀律與犧牲，而國家才有自由。這像克羅斯所說：『民族的全能國家的核心，可說是一種政治軍事的中樞，在嚴密的組織與紀律之中，它超越於人民之上，擔當國家大任；而成爲政治權力機構。』因此我們很可以了解，一個民主主義者，一個爲人類自由而奮鬥的志士，爲什麼要堅決的去反對這種野蠻的毀滅人性毀滅文明的法西斯匪徒的統治了。

論意大利法西斯主義

——評劉文島「法西斯主義批判」

茹純

法西斯主義底存在，就全體人類來說是一個最大的不幸和災難。法西斯主義底面目，它底淫虐和殘暴，它底蔑視人民、窒息理性、撲滅文化、糟蹋科學、反對民主和進步，嗜心進行各種蹂躪人民間的大屠殺——所有這一切，已經不是理論問題上難以索解的題目，而是常識範圍內大家都具有的共同經驗。

但說也奇怪，當法西斯主義所造成之不幸和災難正為全人類所共見共知的今天，却還有少許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把法西斯主義的面目掩藏起來，用了華麗言辭的采帛錦羅，來裝飾法西斯主義那醜惡的屍骸腐屍殘骸。很顯然，這種傾向只能削弱我們當前反法西斯的鬥爭。

我國前駐意大利大使劉文島氏在「三民主義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上以「法西斯主義批判」為題寫了一篇長文章。劉文氏共分三節，（其各小題為：「法西斯主義的來源和特點」、「馬休費爾與墨索里尼」、「法西斯國家的意識大綱和組織大綱及其批評」）主要內容則只有兩點：第一、把墨索里尼描寫成爲「愛國」的英雄，認爲「法西斯主義的來源」是出自墨索里尼對「古羅馬光榮」、「文藝復興」、「再生」的「懷舊」念頭和「反共」的「決心」。第二、把法西斯主義與戰爭分開，把它底對外和對內政策分開，一則說「意大利的行業組合主義爲一事，法西斯主義又爲一事，侵略外交更爲一事」；再則認定「行業組合主義」是法西斯主義里面好的東西，所以「不單作介紹的報告，更擬酌量採與學說，爲之剖目相看，揚棄一番。」劉氏在開頭還開明他的這種立場是「研究學術爲一事，國交好或歹又爲一事，所以客觀的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仍應站在超然，選他個本來面目」。

讓我們來看法西斯主義到底是怎樣一個「本來面目」吧！
先就第一個論點來說。

大家都知道，古羅馬社會是一個奴隸社會，倘一旦沒有從屬國奴隸和物資的供給就一日難以生存。古羅馬的社會「紀律」就是建築在這種對廣大奴隸勞動者之壓迫和剝削（即對奴隸的剝削）之上。古羅馬統治者對這種「紀律」的觸犯者，那些被生活鞭子抽打得已經挺身出來謀叛的奴隸，的確如劉氏所說，是按照「法西斯」原詞的意義（古羅馬儀仗鎧）而加以無情的「斧創」的。紀元前一四〇年西西里一次奴隸暴動中，被殺的奴隸就有二萬多人。紀元前七十四年以斯巴達卡斯爲首在意大利一帶發動的奴隸起義，也遭受了殘酷鎮壓，有六千名俘虜在羅馬大街上被凌遲處死。要是說，古羅馬光榮就在這種奴隸所有著所力圖維持的「紀律」和他所用以維持「紀律」的手段，則亦須承認墨索里尼對古羅馬光榮的「懷舊」，也就是企圖採用同樣血腥恐怖的手段來維持上次世界大戰後陷在風雨飄搖之中的意國反動社會集團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統治。這不正說明法西斯主義就是金融資本集團底直接的恐怖專政嗎？

其實，古羅馬光榮是應該歸於奴隸勞動者。差不多古羅馬在文化上的全部貢獻，它底文學藝術音樂雕刻建築都是奴隸對底勞動直接創造出來的。有許多文學家藝術家思想家都產生自奴隸階級。如大詩人荷拉斯，基督教創始者耶穌。但在法西斯統治之下，人民文化却被剝滅了。意大利法西斯統治與其說是對古羅馬光榮的「懷舊」，勿寧說是對它的一種侮辱！

法西斯主義對文藝復興更是一種絕大的侮辱。如所周知，文藝復興的歷史意義在於發現了「人」，發現了人能夠而且必須獨立自主地有所思想有所感有所言有所行。自己能够這樣就有了自由，也隨別人能够這樣就有了平等。有自由有平等，就發展了民主，滋養了科學，開創了現代文明。這是當時已在封建主義矛盾內孕育着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意大利當時因東轉在封建專制之下，還沒有能够形成爲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

新興資產階級渴望「統一」以求得民族和人民的自由和平等，這完全是進步的要求。但到了廿世紀，意大利不但早已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而且還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者，一個侵略民族。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民族和人民都失去了自由和平等。因此落在意大利人民肩上的歷史任務已不是要求甚麼空洞的抽象的「統一」，而是爭取由侵略民族轉變為自由民族。而這只有在社會變革的條件之下，在推翻帝國主義社會集團的統治之下才能做到。意大利法西斯所走的則是與這完全相反的道路。法西斯統治是意國最強大的反動社會集團（大托辣斯、大銀行家、大地主、大軍閥、大官僚等）在所有的其他限制人民向自由平等進展的方法都失敗了時候所建立起來一種實地恐怖統治的犯罪的政權。在所謂「秘密結社取締法」（一九二五年）「定期刊物取締法」（一九二六年）「新選舉法」（一九二八年）「變法而新黨最高機關為國家機關」（一九二八年）「設立國防法庭」等等法令之下，人民的一切自由平等的權利都被剝奪光了。在法西斯二十年來所奉行的窮兵黷武肆行侵略的政策之下，別的國家和民族的人民——阿爾巴尼亞的，阿比西尼亞的，南斯拉夫的，西班牙的，希臘的人民向自由平等的權利也都剝奪光了。我們不知道劉氏所說「湯氏統一以求自由平等」是墨索里尼良心深處的火炬。這句話究何所謂而云然？

劉氏在第二節中特別提出馬氏與墨索里尼的關係來印證他所發明的墨索里尼對文藝復興的「懷舊」論點。把馬氏與湯氏自由平等的抱負認定就是墨索里尼的抱負，并說墨氏的所作所為就是受了馬氏的「感動」和「影響」。其實這兩個人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正如費希特不能與希特勒相提並論一樣。首先兩個人所處的環境就不同。馬氏所處的是文藝復興時代，是封建專制把意大利弄得四分五裂而新興資產階級又已經崛起的時代。墨氏所處的則是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是意大利也已變為帝國主義侵略民族的時代。馬氏渴望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由此把當時政治上非常軟弱的意大利挽救出來以求得意大利民族和人民的自由和平等。馬氏這種思想基本上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進步傾向。墨索里尼的所作所為則完全是代表帝國主義社會集團的利益，墨索里尼——齊亞諾家族本身就是意國數一數二的大財閥，墨氏所處心積慮的不過是如何設法維持帝國主義社會集團對意國廣大人民的榨取和剝削。馬氏在當時所極力反對的是封建官僚和貴族，如劉文中所引馬氏的話，是那些「既不從事農業，又不從事其他職業……只享用其遺產

出息……除土地之外還有別墅小宮」的紳士階級，馬氏把他們看做自由平等的「天然的敵人」因而主張不惜採用一切違反道德價值的手段來「剷除」他們。墨索里尼則把整個勞動人民看做敵人，把民主和進步看做敵人而不惜採用血腥的恐怖手段來對付來彈壓。所有這些就都是馬氏與墨索里尼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點。自然，由於馬氏與墨索里尼是近代歐戰運動初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底學說還沒有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包含着非常龐雜甚至錯誤的成份，如馬氏提倡「權術」——「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對國家權力的體現者沒有站在堅定的民主政治的立場，而認為君主制度和貴族政治也可以，以及他對宗教的態度等，這一部分兒自然容易使野心家們偷竊起來，奉為至寶，當做他們「反動思想和行為的根據」。墨索里尼的「權術」此而已！

至於說到「再生」問題。如前所述，意大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已是一個侵略民族，就原有甚麼「再生」問題，這「再生」就只能是指向自由民族轉變。不知道劉氏所謂「再生」是指的意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不但毫無所獲而且承受了嚴重的損害，以致國家地位不如別人因而必須力圖恢復呢，還是指的戰後勞動發展起來的革命運動動搖了舊社會秩序的基礎因而必須力圖挽救。無論是前者或後者，或兩者都兼，不是正：說明墨索里尼是以反動社會集團保衛的資格出來，取消議會制度——這舊的統治方式，而代之以法西斯制度——這新的統治方式，以便這樣來準備國民及勢力範圍的再分割和維持舊社會秩序嗎？

應該承認，劉氏說準了一點，即法西斯是「反共」的。有一個最平凡的道理，人人總該懂得：凡是敵人所反對的我對就應該歡迎，凡是敵人所歡迎的我對就應該反對。也有一個最平凡的事實人人總該曉得：蘇聯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在蘇聯，人民生活得最幸福，而遭到法西斯強盜進攻，抵抗得也最英勇，連邱吉爾、羅斯福、威爾遜、台維斯等人讚不絕口。法西斯反共，只除非那些反對進步和民主的人，對聯合共同事業缺乏認識、信心和責任感的人才去頌揚它，鼓勵它，難道還不明白嗎？

法西斯主義是作為一件反對意國人民革命的武器而產生出來的。墨索里尼本身就是人民革命最卑劣無恥的叛徒，其最初的合作者又是那些對人民革命深懷恐懼的退伍軍人和知識份子，其後更有大量剝削階級份子參加，而到上台執政後，從墨索里尼到他手下的爪牙奴才，無不變成意國的富豪和權

。法西斯黨是在德國軍警當局，托羅斯老園，後官僚中的反動份子等人的直接指導下生長起來的，被神話化了的「向羅馬進軍」就是在「費亞特」公司的資助之下，在「輔美麗的臥車里完成的。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真正來源。而其特點則是對內用暴力來維持階級制度，對外不斷發動侵略戰爭。

墨索里尼那算得甚麼「愛國」英雄！他是意國反動社會集團的一個自覺的工具，對全人類全世界人民（包括意國人民在內），說來他是罪人，他是自由和平與進步的禍害，他必須在人民的目前，在歷史的目前，受他底末日的審判！

再來說第二個論點。

法西斯是與戰爭分不開的，它底對內對外政策也是專有連繫的。從法西斯上台執政的第一天起，它底目的就不僅在於用暴力來為意國反動社會集團解決內在的社會和政治的危機，而且還在於有意識的有計劃的進行對外侵略戰爭。所有法西斯統治的一切措施，不單是在軍事方面，而且在工業生產方面，行政管理方面，文化教育和黨組織方面，社會政策的實施方面，無不不是以準備戰爭為其最高目的。的確如劉氏所說，法西斯「鼓勵生育的，是採行了各種辦法來訓練兒童和青年的，但其目的，無非為戰爭製造炮灰，為其對外侵略製造目的作戰「機器」。可以說，法西斯的整個國家機器和經濟機構都是適應這一目的和要求而組織起來的。劉氏特別推崇的「行業組合主義」也不過是法西斯國家和社會構成的有機組織部份，是它底戰爭機構的有機組成部份。墨索里尼自己就不否認這一點。他在法蘭斯工廠工會第二次全大會上的演說中說：

「意大利的經濟（它底組織形式就是行業組合主義——筆者註）只受關於一個目標——就是我們的國家必須轉變為一個戰鬥體。……它們必須完全地或近于完全地為國家的武裝力量而工作。」

法西斯是無怪稱其國家為「行業組合」國家的。因為行業組合主義完全適合法西斯統治的目的和要求。經過行業組合，意國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的過程就加強發展起來，財政資本集團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的超額利潤就更增加了保證，而大企業家、大銀行家和大地主，更可以直接使用國家的權力來達到自己追求利潤的目的，而不需要在那裏操縱了。

劉氏關於行業組合主義的實質基礎是「互助」，這種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有，那就是「互助」其名，「榨取」其實。這種說法，與法西斯自己稱其國家是一個「絕對觀念和精神」一樣，是一種混淆黑白的謊語。

劉氏還強調行業組合主義與法西斯侵略外交的矛盾來解釋法西斯的失敗。他先肯定行業組合主義是到「自由平等之路」，繼而這樣疑問：「若說受了馬氏影響的墨索里尼渴望自由平等為不可思議，何以他建設了明明白白的行業組合？」隨後就不勝惋惜地說：「法西斯的失敗是「其侵略外交與行業組合主義相矛盾的當然結果。」照劉氏這種說法，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各民族人民為反對法西斯而流的血就算白費了。因為法西斯的失敗，原來不是侵略被侵略的各民族人民（連意國內人民在內）的英勇抵抗和打擊的結果，而是「其侵略外交與行業組合主義相矛盾的當然結果！」這種說法且不去管它。倒是劉氏這種說法，其用心之毒，值得佩服：法西斯主義是好的，法西斯主義強而的行業組合主義尤其好的，就只是侵略外交要不得，否則，法西斯主義是可以萬世不敗的，誰也把它打不倒的。所以，就在法西斯主義已經在受末日底審判的今天，也還是「不但值得介紹」一番，而且值得「對的國情與學說，為之刮目相看，揚棄一番」。所謂「揚棄」者，就是除去「侵略外交」之謂也。這種強外之毒，確是驚心動魄！

不過，客觀事實總歸是客觀事實，任何人都無法使其在自己的主觀願望。把妖魔鬼美女而拜倒在石榴裙下，把撒旦當作上帝而頂禮膜拜不已。其實不正是法西斯主義的武斷宣傳有甚麼可驚的魔力，而使人們頭腦的靈性和思想的貧乏着實到了可怕的程度。

代 郵

敬憲先生：

所謂諸問題，因種種原因，不能在本刊作製。望見示通訊地址，以便另函作答。

孔明兵法之一斑

郭化若

「孔明」這兩個字，在我們中國社會上曾經普遍地流行過，現在也還普遍地流行着。這兩個字不但是名人之名，而且時常被當作一個有力的形容詞，用來形容那種有「先見之明」、有「奇謀妙計」、而「算無遺策」的人；特別是在軍事界，這兩個字竟成了最光榮的旗幟或徽號。孔明之所以能得到這樣的推崇，自然，「三國演義」作者底生花妙筆的描寫是有關係的，清代文化政策也有一些影響，而最主要的，還是孔明確曾在當時轟立下不朽的歷史奇蹟。

關於孔明的身世事略，歷史上的記載太簡略了。況且「三國誌」——「諸葛亮本傳」，又是孔明的敵人司馬氏御用的奴僕陳壽所寫作的呢！雖然他刊也「私著有遺」，然而怕也難免陽示「光賜」而陰懷嫉妬的。這自然要使得孔明的史蹟，被剝奪去若干光澤。不過，也總算還有。至於孔明的著作，在陳壽當時所「刪餘重複，隨類相從」的，有二十四篇（計：①用命年表、②補遺、③南征、④北出、⑤計算、⑥調動、⑦樂毅上、⑧樂毅下、⑨樂毅上、⑩樂毅下、⑪書和、⑫兵要、⑬算、⑭與孫權書、⑮與孟達書、⑯與李平、⑰法檢上、⑱法檢下、⑲田科令上、⑳田科令下、㉑田科令中、㉒田科令下）。隋志諸葛集二十五卷，唐志仍有二十四卷，說明楊時修編的「諸葛武侯全集」則只有十卷了。清光緒年間，胡邦獻所編的「諸葛武侯全集」名義又有二十卷，實際上自十五卷以下便是歷代的「文選」，「表」、「銘」、「論」、「贊」……；「諸葛亮」、「碑文」、「詩」、「賦」等等，十四卷以前也還有「本傳」、「勝蹟」、「世系」等等，更有甚麼「奇門遁甲」、「二十八宿」……等等，於是真正的孔明的著作，則所餘無幾了。特別是在研究孔明的戰略上，對他的「南征」、「北出」、「計算」等篇，更為重要，可是恰恰都沒有。至於「軍令」原有三篇，今則所餘僅十五則。這樣，歷史材料的限制，使我們對於孔明兵法之研究，就很難看到其全面，而只能是「以管窺天，僅見一斑」了。

然而，這「一斑」是大的「一斑」，因之從此可想見「全豹」之偉大。孔明文武才幹之高超，與戰略思想之偉大，表現於他在「建國」、「治國」、「建軍」、「治軍」、「行軍」、「作戰」、「制作」各方面都有偉大驚人的成就。現在讓我們在歷史材料限制的範圍內，把孔明的生平事蹟，及其戰略戰術的思想與產物——分別來作幾個大略的說明。

一 「萬古雲霄一羽毛」 (杜甫詩)

首先從孔明歷史說起，使我們能有一個一般的輪廓的了解。

孔明姓諸葛名亮，別字孔明。據陳壽說他是琅琊陽都人。(「漢書春秋」

載孔明宅在襄陽西二十里許，名為隆中，有諸葛孔明宅。)生於漢靈帝「光和」四年，即西曆公元一八一年。他祖上素業耕種，會做過漢朝的一司「校尉」(官名，管理訓練使他們修書工藝技術的，領有一州，版圖很大)。

他底父親諸葛珪，做過太山郡丞(郡丞是幫助郡太守的官，有點像現在專區公署秘書長)，早死。孔明會依過叔父諸葛玄，玄死，孔明自己耕種讀書。自認爲可以比得齊國的宰相管仲，燕國的大將樂毅，當時人對不起他，只有出州平徐庶和他做好朋友。以後劉備到新野，由徐庶介紹，去拜訪孔明。劉備很謙虛地向他請教，他漸漸表了隆中的國策，他說：

「自董卓以來，豪傑并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孫權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操雖有江表，

巴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東南，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今四川省）險塞沃野，土厚，天府之士，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陽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盡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劉備，孔明就到了劉備軍中做工作了。這時孔明才二十七歲。次年，孔明代表劉備同孫權交涉，雙方合作抵抗曹操的大軍，秋，大破魏軍於赤壁。又次年，孫權分江南地給劉備，劉備南征征服了武陵四郡，獻江帶縉也帶領數萬人來投誠。劉備令孔明為軍師，管理零陵、桂陽、長沙三郡。

又過五年，劉備正在四川作戰，另一軍閥龐統在攻維嶺的戰鬥中，被流矢射死。孔明乃留關羽守荆州，自己帶領張飛、趙雲等沿江而上，略取巴東、巴西，打歸都城。

次年，孫權索取荆州，劉備開始不肯還，以後聽到曹操進攻漢中的消息，才同孫權議和。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孫權，南郡、零陵以西屬劉備。這時東吳占有湘江以東湖南湖北安徽各一部，江西、浙江、江蘇之全部，北魏河東起於海（包括朝鮮在內）西至於甘肅之酒泉、張掖，北至長城，南至淮漢。而西蜀則只占有四川及湘鄂各一部，在領土上是最小的了，因之人力物力財力也最少。

建安二十二年（又過了二年，時即西曆二一七年），劉備親自率軍進攻漢中，孔明留守成都。二十四年，備斬魏將夏侯淵，遂佔有漢中。同時關羽從荆州進攻魏大將曹仁於樊城（今湖北襄陽縣北），以水助攻，殺龐德，俘于禁。這時可算劉備最盛的時期，也在這時孔明等勸劉備即位，為漢中王。

可是，不幸的事接踵發生，曹操引兵東，使關羽之後，孫權派呂蒙以白衣（偽裝商人）襲江，進襲江陵，關羽被殺，孫權為東吳所殺，荆州大半失守。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廢漢帝，自稱帝。次年漢帝過世，劉備發喪，旋即

帝位，克為蜀漢。劉備為了報關羽之仇，親自率軍東下，進攻東吳，令孫權從關中會江州（今四川巴縣）張飛臨出發時被部下所殺。明年二月，劉備率軍進至魏寧（今湖北宜都縣西）為陸遜所敗。由陸路退到魚腹改名永安（即白帝城），故城現在四川奉節縣東，又次年劉備死，託孤於孔明。這時劉備張都病絕了。阿斗做皇帝，封孔明為丞相武鄉侯。孔明派了鄧芝去東吳通好。孫權利用這時引兵益州奪回雍州，驛柯（郡名，在貴州東北部邊境）以南，恩南石阡等府都在內，故治在現安順縣。太守朱褒，越雋彝王高定等反叛。這時孔明又兼領益州牧，一切政權歸孔明手上，孔明設法恢復農桑，休息軍士。建興（阿斗的年號）三年春三月，開始南征，五月涉過瀘水（據說在今宜賓縣西南，是即金沙江了，有的說是大渡河，也有說即是瀘州附近的大江，根據我們過去的認識，似是指大渡河），平復四郡，殺雍闓，高定。孟獲率領「蠻子」抵抗孔明，孔明七擒七縱，收服了孟獲。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水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縣為興古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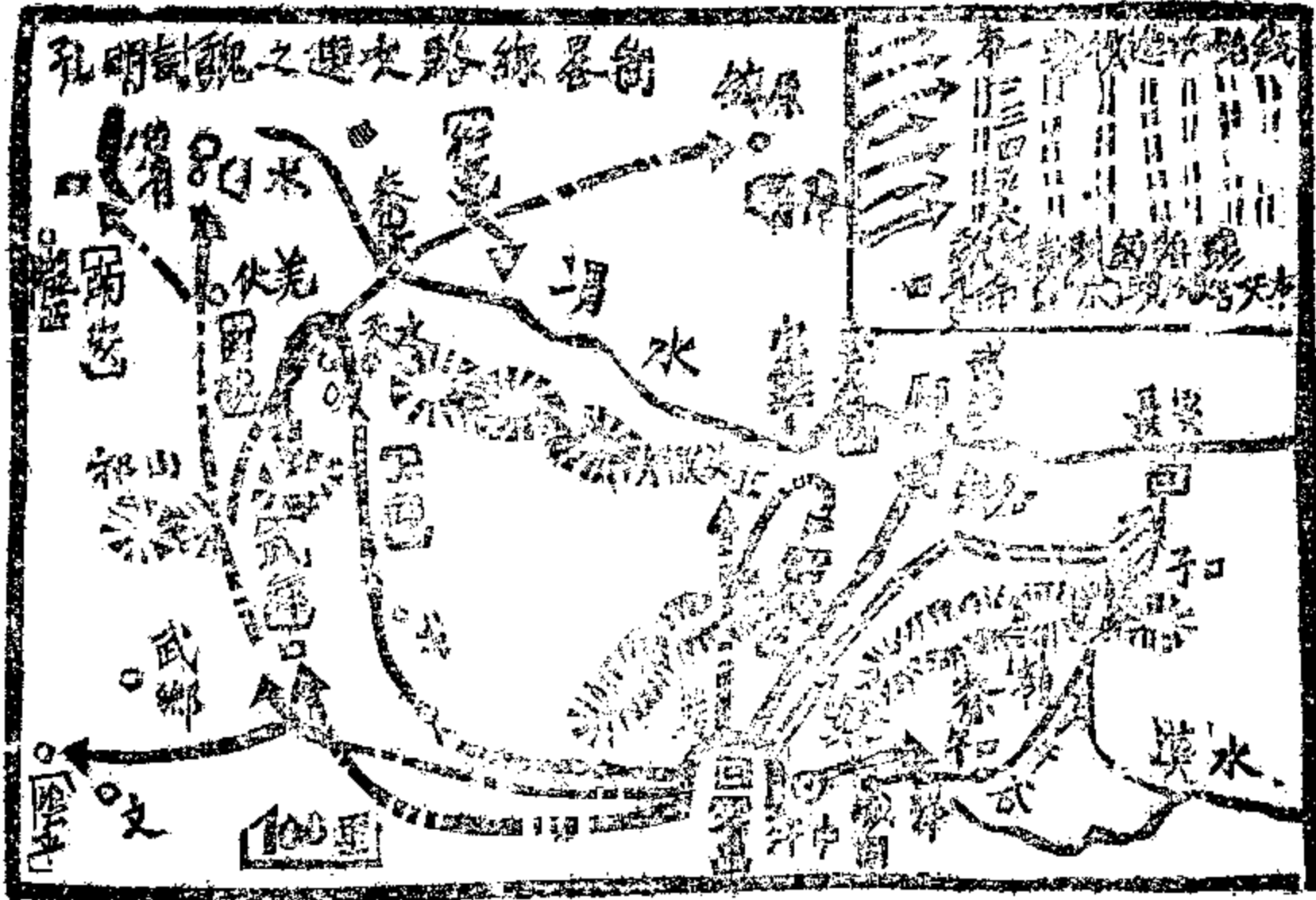
孔明既定南征，加緊整理訓練。建興五年上「出師表」，率領主力出動進屯漢中。

建興六年（西曆二二八年）春，孔明開始北伐，出祁山（今甘肅和縣西北），奪取了甘肅的南安（魏甘肅的鞏昌府之地，故城在今蘭州縣東北）、天水（在今通渭縣西南）、安定（魏甘肅省平涼府及開原州涇州之地，故城在今鎮原縣）三郡。因為委派沒有經驗的馬謖為前鋒總指揮，以致被司馬懿打敗於街亭（即得泉亭，在現在的甘肅秦州縣東北）。「亮拔西歸，十餘眾遁於漢中，魏軍以謂亮」。孔明「恐亮」。

冬，又出祁山（又名大散關，秦蜀的交通要道，關和和尚原相近，兩邊山勢皆絕，可攻可守）圍陳倉（在今寶雞縣東），後因糧盡退還，魏將王雙率軍來追，被孔明軍隊所消滅。

七年，孔明派陳式領軍攻略武都郡（包括今甘肅之武都、文、成、徽及陝西之寧羌等縣，故城在今成縣西）陰平郡（故城在今甘肅文縣西北），孔明自己率主力軍進到建威。遂平兩郡。

八年夏，曹真率大軍由斜谷分數路向南進攻，司馬懿治漢水西上，由西城（今陝西安康縣西北，即武當山附近）同曹真軍會合，向漢中進攻。孔明軍東進到城固，赤阪（今陝西洋縣龍亭山東），恰巧遇到大雨，一連個多月不停，棧道斷絕。魏軍引退。孔明派魏延、四八羌中，大破魏將費瑒、郭淮於



附錄。

九年二月，孔明又出兵祁山。用「木牛」運糧，變態放箭射敵。過旬，魏於上邽（在今甘肅天水縣西南），大敗之於街亭（今天水縣與伏羌縣之間），「移甲首三千級，玄鏑五千領」，又因糧盡退兵。殺魏之運糧將郭。十二年（西曆二三四年）三月，亮率大軍十萬，由斜谷出，用「流馬」運糧。魏將魏延也進兵北伐。四月，進到郿縣，在渭水南岸五丈原上駐兵。前鋒魏延大軍前來，渡渭澗水，背水築壘，橫梁背澗，絕無對敵。孔明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雙方相持百餘日。八月孔明病死軍中，葬在定軍山，諡忠武侯。

上面已大略說過孔明運糧，現在讓我們來談孔明的時代與環境。孔明是生於漢中的封建佃農的後裔，而正當以黃角等為首的農民運動（當時被稱為「黃巾賊」）與諸侯兵爭奪，及曹操武裝農民流離的混亂時代。後漢社會生產力是向下降的。本來前漢的生產力曾一度提高，當時冶鐵工具應用於農業中，手工業有相當的發達，手工業工場也曾有過，如：製織麻、煮鹽廠、鐵廠、漆廠、燭廠等（當時中東漢與後漢），但由於封建制的內在矛盾，到了末年已發生了很嚴重的經濟的以來的危機，王莽的改革沒有成功，「赤眉」「銅馬」等農民起義蹂躪了山東、河南等地。到了後漢時，農村經濟完全破產，農民之所食與流亡者空前之多，商業隨之亦較前運衰，貨幣流通減少，黃金幣平銷，人與用糧食和布匹當貨幣，這使幾乎完全「倒閉」到自然經濟的階段。封建的壓迫愈加加重，於是農民不得不騷亂起來。從山東開始的農民運動，蔓延到青州、徐州、豫州、揚州、冀州、豫州、（即今山東、河北、遼寧、河南、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北、湖南等省，及貴州、四川各一部）等地，許多貴族將軍與兵「討賊」，以求立功（這實為了鞏固封建貴族的統治），另有一些則利用武裝的農民，掠奪建國，以求各霸一方。農民運動被壓下去了（被賄賂）若子貴族將軍即在這要農民的運動中，高舉起他的旗幟，來鎮壓而制。曹操、劉備都同樣以討伐「黃巾賊」有功而起家。於是孔明時代的社會就由集中封建制，轉到分散的封建制了。

這就是當時的政治的經濟的描形。至於在當時的意識方面，則除了「三國志」家馬融和鄭玄的學說外，還有唯物論的玄學的學說（他著有「論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在這些材料中

雖然這看不到任何人或何種學說給予孔明內影響之大，但從孔明的戰略指導上看，王充的唯物論思想，大概確有影響於他的。

在軍事思想與戰爭方面，則有「孫子兵法」，有戰國時代的不斷戰爭，有楚漢戰爭，有……。

所有這些，就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也就是孔明的戰略產生的客觀基礎。這些條件有什麼意義呢？對孔明有什麼影響呢？有什麼關係呢？

我以為有以下幾點：

(一) 這時期是封建社會，而正當封建制度崩潰的時期，同時又是封建諸侯貴族將軍互相爭奪的時期。農民運動的洶湧，雖然起得很早，(山東「黃巾」一隅角起兵時，孔明才四歲，四川「黃巾」馬超起兵時，孔明也才八歲。)而且其主潮之一、會稽貴族將軍劉璋壓下去了，但還沒有完結。張燕所領導的「黃巾」，還在河北活動，勢力在冀魯豫晉達百餘萬(張燕是在建安十年即西曆二〇五年才被曹操農民羣衆，而投降曹操的，這時孔明已經二十五歲了)。張燕所領導的四川起兵的農民(被稱為「衆賊」)，以鬼道教農民，亦稱「天師道」，在漢中巴州一帶也活動了三十年(張燕於建安二十年即西曆二一五年，才投降曹操，這時孔明已三十五歲，并爲了劉璋的軍隊)。在這種時代這種社會中，孔明不但不參加起兵的農民方面的，而參加到劉璋農民討「黃巾」有功的劉備方面，這也不偶然。孔明曾自比于管仲、樂毅，又好爲「梁甫吟」(梁甫吟是吟三侯三士的，最後後兩句是：「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一個可與於國以後，又想做齊國的管仲晏子或燕國的樂毅，自然祇有走到劉備或其他貴族將軍方面的。孔明高興「劉皇叔」這塊招牌，所謂「帝室之胄」。孔明的政治資本以及西蜀劉關張等集團的政治目標，可以兩個字來標明，就是「尊漢」。孔明的外交方針戰略方針，都從這一出發點出發。

(二) 被賈二百六十字

(三) 雖然，我，也並不因爲封建的政治——「尊漢」，與涼州的戰爭，而否認或輕視了孔明在軍事上的偉大。孔明承受了孫子以後，後漢以前的歷代戰爭的經驗，適應了當時的實際環境，而建立了驚人的奇蹟。如果把孔明來比孫子則在軍事理論上(在孔明的著作上)，孔明雖然並沒有很多新的原則上的。增加到孫子兵法上去，但他在其戰略指導的實施方面，却有許多貴族的孫子的思想，爲孫子兵法所沒有的。那是什麼呢？我以為主要的

有如下幾項：

第一、建立與鞏固根據地的思想與行動。孫子七十三篇給吳王時，吳王已擁有新興的吳國，而孔明之遇劉備，却是在劉備新敗之餘，無家可歸的時候。這時却需要建立一個根據地，以便與北魏、吳鼎足而立，三分割據，然後才能等待時機，進取中原。孔明在隆中對策中，即已提出這一問題(雖然「隆中策」未必是孔明在隆中的思想，很可能是劉琦授意孔明以獲的思想行動，來描寫當時的應對的)，劉備也同意他底方針。他則照這樣做了，建立了荊州(今湖北湖南兩省，連襄陽漢陽兩府，貴州思南、銅仁、思州、石阡等府，及廣西之全縣、廣東之連縣，皆其地。)益州(今四川省)南州的根據地。

第二、爭取「與國」(被賈)的政策。孫子因爲未曾參預吳國的大權，所以僅談「兵法」；而孔明則爲劉備之軍師，後來更任丞相兼益州牧，在那時除西蜀二魏外，還有個東吳，於是對吳的態度問題是當時西蜀的大問題，他與東吳吳是當時兩條外交路線，也是兩條戰略路線。孔明是主張後者，即主張與吳對峙的(被賈)政策。

第三、出師的運動戰。孫子的戰略思想中主要的一部，是進攻的，速決的運動戰。孔明發展這一運動戰的思想，看重出師在運動戰中的作用，而不去走避道以守城。所以六出祁山，都是依出師進退，依出師行軍佈陣的。

第四、建軍訓練與制作。孫子未曾具體的講到建軍與訓練問題。而孔明則對於建立軍隊，都有特制。在制作，則製有「木牛」「流馬」與「連弩」等，這也是孫子所沒有的。

孔明之偉大就在這裡，孔明兵法特點也在這裡。

時代的條件是這樣的，環境的條件是這樣的，這就是孔明戰略思想與思想方法的局限性的客觀原因。在當時那樣的生產力基礎上，雖然孔明「工械技巧」。而「木牛」「流馬」自然也只能用人力推的，而不能像今天的戰重汽車，因爲當時沒有一發動機」。不過也正是因爲生產力不發達，技術落後，所以孔明之發明「木牛」「流馬」，就更顯見其高明了。又因爲當時的政治關係，哲學思想，在基本上與孫子時代都沒有大的區別，所以孔明兵法在軍事原則上，也不會有什麼特別超過孫子的地方。因爲這些種種的客觀原因，和當時三國力量的對比，所以高明的孔明，雖然艱苦奮鬥了二十八年，「鞠躬盡瘁」的結果，也只是「出師未捷身先死」而已，不過替他不快而罷。

這的，固不止那些少數的「漢族」的「英雄」們。
這就是我們對孔明生平功績的輪廓的觀察。
以下我們從他的方面來分別說明孔明的根據地思想，聯吳政策，建軍與訓練，及政治指導（大田那山）等等。

二 「國定三分掌握中」 (方孝孺詩)

這本來說明對於根據地問題的思想。

首先，孔明了解根據地重要，沒有根據地就不能「和諸戎」、「撫夷越」、「納降」、「待機以復中原」。

其次，孔明對根據地的選擇，一、要富而且險要，可戰可守之地；二、要有險可乘，可據守。他之選擇荆州與益州正是這樣。因為「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這就是說這兩州具有很好的根據地的條件。只有好的條件還不壞，如果沒有可能的條件，那就會「不可與爭鋒」或「不可圖也」了。恰好這兩州又都在無能劉表劉璋手中。荆州是「其主不能守」，益州則「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於是他們就決定這兩州了。建安十五年劉備都督荆州。十九年劉備孔明相繼到成都，劉璋馬超投降，於是劉備真「跨有荆益」了。

其次，對根據地的經營。孔明當劉備進攻漢中與東討孫權時，「常鎮守成都」，而能中區「的益州」，「足食足兵」。他的政治設施是穩健的。法正會歸過他說：「曹孟德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而虐百姓，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先降下，願殺刑地禁；以慰其望」。但是孔明不聽，緊守他的方針，他答法正書說：「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這就是說漢高祖時的「以法為治」是適合時勢的）。劉璋闇弱，自焉（劉璋）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嚴密，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施，蜀士人等，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疏。所以致此。昔今感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怨。恩愛並濟，上下和睦，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均見「蜀志」）這就明白孔明在政治方面的封建思想之一斑。雖然這樣，他的方針，

雖是認明公正的。據張裔所說：「資不遠，近不附，近不附，則不可以無功，刑不可以不嚴。」（見前書）。他又善於拉攏當時蜀中威信的人物，如法正、李嚴等。有人按法正，他反說：「如何禁止孝直（法正之別字）更不得行其意耶？」只在後來，他已懸望蜀在四川的統治之役，才駭李嚴，但仍用李嚴之子李豐。不過，無論孔明的「治國」才幹怎樣好，政治設施如何開明，西蜀的政治同北魏東吳，在基本上是沒有差別的，都是封建貴族的政體，都是壓迫與剝削農民的工具。

最後，為了鞏固根據地，他堅持南征四郡，以除後顧之憂。關於南征問題，當時大概有過很多人反對過，至今也還有反對的議論。「蜀志」載王雲諫南征，說：「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孔明後出師表中也說：「而議者謂為非計，」但是也正如孔明自己所說：「思惟北征，宜先入南」。于是才「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七擒七縱」。有人以為南征損失了蜀軍精銳，空耗了時日。其實，南征的損失是「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並沒有耗費多少時日。而且三月出師，五月渡瀘，「其秋悉平」，可見也沒有耗費多少時日。最主要的是當時的南蠻通敵，是受有當時表面上是蜀國的官吏的東吳底賄使的，不平等協約，且不講北伐，也不能鞏固東吳的聯合。所以孔明的南征是必要的，正確的。其七擒七縱，和「以夷制夷」也是適當的辦法。

三 「區區庸蜀支吳魏」 (王安石詩)

現在來講孔明聯吳的政策。

孔明是一貫主張「聯吳討魏」的，並且堅持這一政策。理由呢？據孔明自己在隆中時說：「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為援而不可圖也。」所以當曹操逼至夏口時，孔明親自詣魯代表與孫權孫權抵抗曹操了。到了「關羽被殺」，荆州失守後，劉備議東征孫權，孔明是反對的。但他的意見沒有能通過。白帝城託孤時候，孔明已掌西蜀軍政大權，但他并不主張「復仇」，反而「遣使聘吳，圖結和親，遂為與國」（蜀書諸葛亮傳）。以後孫權崩逝，蜀中「反吳派」之議論紛紛，「以為交之繼益，而名隨弗順。立顯明正統，絕其盟好。」（一書春秋一見「諸葛亮傳」）

侯余集」卷一），而孔明則堅持聯吳的方針，以為「求特角之望也」（前書「絕盟好議」）。孔明估計到「若加蜀寇，仇我必深，」（同前）那時又怎麼辦呢？那只有「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同前）那麼有什麼害處呢？孔明指出：「彼賢才尚多，將相輔睦，未可一朝定也。願兵相持，坐而待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也。」（同前）孔明的理由當時是很充足的。然而，真正的理由孔明是沒有說出的。西蜀之廣以「建國」，賴以團結者，是什麼呢？是「尊漢」兩個字。我對已滿過蜀漢的政治資本就是這個。這是封建主義的政治，在當時封建社會裡，自然也起了某種程度的作用，因此「討魏」則「名正」而「言順」。較易於團結內部與爭取同盟。如果「征吳」呢？那就失去了這一政治資本。「復仇」兩字是較難於團結內部與爭取同盟的。

孔明之聯吳并非不是「與吳」。相反地，孔明已指出與吳并非願意是「志望已滿」，乃是因為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補之不能越江，猶魏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這真是唯物論的觀察。

至於聯吳之利，孔明也說得對，他說：「若其不聽，而聽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

孔明的聯吳政策，基本上是對的。「剛而自矜」的關係，根本不了解這精神，既不聯絡東吳，又示安妥爲之備，以至聯吳大勝之餘，竟連麥城糜軍之取。

然而孔明對東吳會這盟這一點，似并未預見到。魚腹的八陣圖，是否爲防東吳，尙待查考。東吳之「反蜀」，是從未放過。先既乘曹魏進攻漢中，而「索取」湘江以東之地，橫則勾結共同的敵人——曹操，而曹魏的後方，後更乘劉備新喪之際，勾結周瑜等反蜀。這是「與國」難免的勾當，而孔明之明，似未見及此。

不過，以西蜀之西蜀，能在吳魏之間，鼎足而立，並且還能終其生站在主動的進取的態勢上，七擒孟獲，六出祁山，聯吳討魏，以保蜀漢，這就不不能不歸功於孔明政策之正確了。

至於東吳孫權、諸葛、呂蒙之輩，自光短小，見利心迷，違盟背約，襲擊荆州，雖然殺了關羽，奪取了荆州，但是削弱同盟者的結果，只是幫助了敵人。東吳既無法消滅西蜀而統一中國，相反的在西蜀「降王走將軍」之後，接着「王孫權胎下益州了」。於是乎「千載談蘇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

頭」（東吳孫權用鐵鍊橫鎖長江，被晉王濬用火炬燒斷，東吳投降。石頭城在今南京附近石頭山後，東吳的國都。）東吳的子孫同西蜀的子孫一樣做了亡國奴，得利的是共同的敵人。

四 「文武奇才八陣圖」 (明趙忠詩)

現在講孔明的建軍與訓練。

孔明出仕的時候，劉備兵力不過萬餘兩萬。要與吳魏爭雄，必先建立軍隊。而建軍首先就要有兵。當時的兵役制大概是採取徵調的。不過孔明對於徵調更是有辦法。建軍中劉表徵荆州牧，當時劉表徵荆州牧，兵員很少。其荆州人口是不不少的，因爲徵兵不得法人民多逃避兵役，著籍者很少，所以軍隊無從補充。當時孔明到劉表處，「凡有戶戶，皆使自實，因籍以益家也。」（「魏略」），「趙興」，見「諸葛忠武侯集」第三卷）這和魏同現在戶口登記差不多，使那些逃避兵役的「隱戶」自己去報名登記，然後可以按戶「徵調」。以後孔明治蜀，果然如此。是實是兵」。當時的「足兵」在封建社會裡，在軍事戰爭中，自然仍舊只是只是徵調徵徵徵的。不過孔明徵調是徵守信用的。根據「蜀記」：「魯仲孫說孔明的過事中有這麼一回事：建興九年所出魏指揮張飛和魏州涪州的精兵三十萬向孔明進攻。孔明的軍隊，十分中有二分到期要「更下」的，孔明的兵力比較少，「在者八萬」，而魏軍已進迫面前。那時許多「益州」都以爲「賊軍強盛，非力不備，宜停停下兵一月，以併後勢」，也就定說他要把「更役」的兵士留住，延長一個月時間。孔明說：「吾統武行師，以立信爲本。得原失信（見「先傳」）古人所惜。去者東裝以待期，去子信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仍然要他別走。結果應去的人都很感戴「願留一戰」，不去的人也與齊，「思效死命」。於是和魏軍大戰一場，殺了魏大將張郃，打退了句思難。

第二，講軍隊的組織、紀律與各種制度。

孔明怎樣編制軍隊，現在很難找到材料。但據「將苑」（一名「心書」見「隋書」經義志，明朝打日本的威光將軍做有序言，據說是孔明著的，陳壽三國志無此）所說，孔明把人材分別編制，「有好鬥樂戰，獨取強敵

，最為一德，名曰：「權國之士」。有氣蓋三軍，材力勇捷者，舉為一德，名曰：「突陣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舉為一德，名曰：「擊旗之士」。有善射如飛，發無不中者，舉為一德，名曰：「爭鋒之士」。有對必中，中必死者，舉為一德，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舉為一德，名曰：「橫鋒之士」。那時是否真有這編制？這編制是否有什麼優點？自然還要待考據與研究了。

軍隊編成了，就要宜他紀律「三令五申」。同時藉此建立各種制度。關於這方面的史料，大概是記載在「軍令」上中下三篇中。可惜現在找不到原本了。由「北堂書抄」和「太平御覽」收錄的僅僅十五條。不過也還可以看看。如「開播鼓音，舉白幡雜旗，大小船皆進戰，不進者斬。開金音，舉青旗，船皆止，進者斬。」又「...應前則前，應後則後，應左則左，應右則右；不聽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孔明不但這樣下命令，而且也真正這樣執行命令。馬謖失街亭被斬，趙雲在箕谷打敗被降職。這種嚴明的紀律，可與孫武媲美。不過這樣不算稀奇，當「街亭違命」，「箕谷不戒」的時候，孔明就上疏自劾，說：「...營者在原委任無方。臣明不知人，辦事多闇。春秋責備，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三國以來，將帥之「授任無方」，「明不知人，辦事多闇」以致「違命」「不戒」，喪師危國者，不知多少？然而直到今天，「上疏自劾」的有幾個呢？

關於軍隊制度方面，孔明有許多很好的辦法（對當時說）。在行軍方面來說，他的行軍「先使腹心及驍將前視...」又先「候騎」（即騎偵察員）前行，持五色旗。一見驍將黃旗，衝路揚白，水瀾楊黑，林藪揚青，野火揚赤，以奉鼓應之，立旗數合相聞見。若渡水險山，深遠林藪，精騎勇騎投梭，數里無聲，四面絕跡，高山樹旗，令人遠視，精兵四面，要處防禦。然後分兵前後，以為首尾。乃令驍將老小，次步後馬，切在在羅，防後卒。人馬無聲，步不失行，...行則魚貫，立則雁行...到「軍已近賊」時候，則「...十里之內，敵里之外，五六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視，明看驍敵之處，軍至，驍將高而前。第守見賊，驍將後第二，第三諸主者自之。凡見賊，百丈以下，伏擊驍將百丈以上，便擊驍將大呼。主者領後驍將往觀察之。」以上見「太平御覽」及「北堂書抄」及「諸葛忠武侯全集」。「兵要」篇「道有頗奇怪的规定，如：「抽出營，變赤旗，結幡旗，鳴鼓角。行三里，辟赤旗，結幡旗，止鼓角。未至營三里，夜變赤旗，結幡旗，鳴鼓角。至營

，復結幡旗，止鼓角。連令者覽。」（見前書）這種出發時候與達到宿營地時候，在三里內揚旗鼓角的辦法，自然是在「旗次行軍」時用的，大概也是對軍隊之威儀吧！

他對於宿營的規定，是：「游騎精銳，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隨師多少...其糧枚飲食，不得出表外也。」（見前書）又：「軍列營，步騎士以下，皆著兜鍪。」（兜鍪類似現在的鋼盔）「帳下及右陣，各持影排。」（影排即藤牌之類。以上出「太平御覽」見「全集」卷三）「以警戒，如果遇到「敵已來，進持圓角」（古之「鹿角」即今之「鹿砦」）則「兵悉却在連衝（障名）後；敵已附鹿角，裡兵但得進退，以矛戟刺之...」（出「北堂書抄」見「全集」卷三）

這些制度之規定在當時是很重要的，因為西蜀的軍隊是新創立的。而關羽張飛，既不是將門子弟，開始時又都沒有軍事知識，與後來的黃忠，馬超等不同。

第三，講到孔明對將的訓練。訓練軍隊首先就要有將，首先就要訓練將。孔明對於將的作用之估計，與孫武相反。孫武過于強調將，孔明則強調調兵。他說：「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出「李靖問對」見「全集」卷四及「七子兵法」或以為是阮逸所偽造）這種見解基本上是唯物論的，但不免機械些。

孔明把將材分做九種：

- 一「仁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後其說也，察其勞苦。」
 - 二「義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 三「禮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
 - 四「智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
 - 五「信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
 - 六「步將」——「足輕或馬，氣蓋下卒，善固疆場，長于劍戟。」
 - 七「勇將」——「登高履險，馳驅如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
 - 八「猛將」——「負高三軍，志氣凌厲，怯於小戰，勇於大敵。」
 - 九「大將」——「見賢者不及，從諫如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
- 又把「將」分為三等，所謂「十夫之將」，「百夫之將」，「千夫之將」，「萬夫之將」，「十萬人之將」，及「天下之將」。所有這些，都是

以封建道德的施禮和封建將軍之才來區分的。

對將軍道德上的要求，在「將苑」中說得很多。有所謂「五福」「八弊」「十五律」以及「將職」「將誠」等等。所謂「五福」是「高尚」「孝弟」「宿義」「沈慮」「力行」。內容無甚可取，故不詳抄。所謂「八弊」是：「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好賢嫉能，三曰信讒而侮，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提議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貪詐而自快，八曰較首而小以驕。」所謂「十五律」是：「一曰：慮，謂謀明也；二曰：詰，辭候也；三曰：勇，敏於不撓也；四曰：寬，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於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微，體賢能也；十曰：明，不姑息也；十一曰：謹，不違紀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殉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謙，自料也。」此外，他還說：「將不可驕，驕則失國，失國則人離；將不可吝，吝則實財不行，實財不行，則士不效命；將不可不齊，齊則實財不行，實財不行，則士不效命；將不可不德，德則實財不行，實財不行，則士不效命；將不可不勇，勇則實財不行，實財不行，則士不效命；將不可不智，智則實財不行，實財不行，則士不效命。……」這些教訓充分表現了當時社會制度的反映。這些對將軍的要求，在當時曾經是需要的，而且也是現實的，到今天自然就以剩下了形式，不過其中許多形式，如果光以新道德的內容，都還是有的而必有的。

對於將的知識才德的要求，孔明指出了「五善」、「四欲」、「八惡」、「三機」。所謂「五善」者：「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所謂「四欲」者：「戰欲奇，謀欲密，樂欲靜，心欲一。」所謂「八惡」者：「謀不能料是非，不能任賢能，政不能正刑法，寬不能容賢，智不能備末形，慮不能防微密，建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謫。」所謂「三機」者：「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作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作而不能應，非勇也。」

將對部下的關係，孔明也要求要養士卒，殷實軍饌的。他說：「軍井未汲，將不嘗湯；軍食未熟，將不嘗饌；軍火未燃，將不嘗寒；軍幕未施，將不嘗雨。」「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捨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曉而教之，勇者厲而勸之。」他說：「將能如此，所向必捷矣。」這是對的呢！

最後，孔明要求將謹「戒備」重「練習」。他說：「夫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夫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勝息……」

所有這些就是孔明對將軍的要求，——要求做一個開明的封建將軍。

第四，對軍隊的訓練，這只是他的「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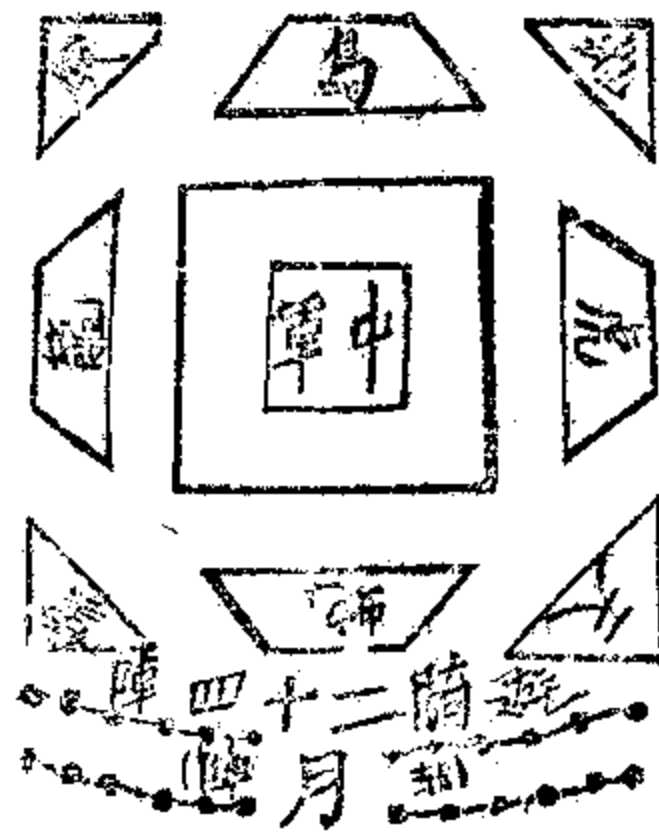
古代軍隊的訓練，對軍備戰士，主要是教他刀、槍、劍、戟等的使用，以至馳馬射箭，這是下級軍官的事。至於對部隊的訓練，則更重要的是隊形訓練，包括進攻時的展開與防禦時的配伍。古時所謂「陣法」，就是現有的隊形變法。

被庸俗所誤的「神妙莫測」的「八陣圖」實即一種戰鬥隊形而已。孔明是以此訓練部隊的。

關於「八陣圖」的說法有極多，其實都為後人所捏造。有人說孔明「八陣圖」出於一風后（傳為黃帝之祖），有的說得於「黃帝」（傳說是前二千六百九十七年），引「盤桓文」為證，實則早有人指出「盤桓文」乃係託古之著，不過「八陣圖」之註而已。馬融的「八陣圖」又是「據微文」的註而已，「李善對」早所說「八陣圖」早經蘇林指出，係阮逸的「三從」，至今可查考的只有魯班的畫與吳山下的遺跡。「八陣圖」源歷史所載有三處：「一日帝城遼陽無名，一在成都，一在雲南中。廣德記說：在雲南者六十有回，方陣法也；在成都者一百二十有八，當謂陣法也；其在雲南者，二百五十有六，下法法也。」魯班的「八陣圖」據「盤桓文」載：「在魯復無南七里，聚細石為之，各高五尺，廣十圍，凡六十四陣。」東萊縣政事會派人到魯復去考察，并繪了圖回去。據說：「……六十四陣佈於者。八陣也，二十四陣環於後者。御月陣也……」這就是關於「八陣圖」較可靠的說法。其他都不可考，確不可考。（見下頁插圖）

那麼「八陣圖」究竟是什麼呢？簡單一句話說，就是「方陣」之一種。不過這比一般的方陣複雜，它有「六十四回」，有橫寬又有縱深，後面更有所謂「御月陣」的佈置，有八個這陣法時行過路先，上面還有八個「魚復八陣圖」見「金鑑」卷九。在魯班大概是每回有八個斜出抄抄敵軍之側後的。這八陣法「正」時佈成「八卦」，如果敵軍來襲，敵小必為敵破。對陣時也用這八陣法與敵人作戰。如果敵人以簡單的方陣來攻，則必

外)，它可以由「八陣」變化，而歸附而位國障人。如果敵入衛人此方陣中，就會被包圍與殲滅。在當時這和「八陣圖」的方陣，確是一種「傑作」。所以使擁有兵勇的司馬懿也深受中懼而不敢出戰。及至孔明死後蜀軍退入漢中時，司馬懿才敢步行孔明葬營的地方去考察，結果是嘆為「天下奇才」。



圖陣八

最後，講孔明的傑作。

孔明為了建設一支精銳的軍隊，在各方面已盡其巧思的，在器械製造方面，孔明也有很多發明；最著的有「連弩」，「木牛」，「

流馬」等。據「魏略」載：「諸葛氏長於巧思，損益運巧，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九十矢俱發。」後人曾在定軍山附近掘土得到這種銅弩，但沒發矢之機。

木牛流馬都只是一般運糧食的車輛，或許因名字或許因其形狀，而被歷代相傳變成一種神話一般的東西。有人說說這單車輛。川陝甘的道路崎嶇，當時比現代自然更更厲害的。川人至今多用「背兜」揹東西，這自然是費力的事。用木牛則「人不努力，牛不飲食」，自然便宜得多。至於形狀究竟何似，現在尚不便確定。不過，木牛流馬是要用人力推的，決不許自己移動，已可確定，因為那時還沒有「發動機」的發明。

孔明雖然「巧思」過人，但也不能不受當時生產力發達水準之限制，孔明之不能發明新的攻城器具，使他限於野戰，就是最明顯的說明。

以上所說就是孔明在進軍與訓練方面的思想與成績。其中特別值得稱揚

的是「八陣圖」。杜牧的詩說：「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是相當正確的評論。

五 「指揮若定失諸習」(杜甫詩)

現在講孔明的戰術思想。

孔明關於戰術思想的著作，很少流傳，因此這裡只能根據他北伐「六出祁山」的戰術指導，來作研究的材料。

孔明北伐的方針，大致說來，以為有兩點值得談的。一是擴大根據地穩重地推進，二是主動靈活的山地運動戰。二者是有密切聯繫的。這種戰路方針是由客觀條件決定的明顯地說，由三國力量對比的結果決定的。

當時北魏定都洛陽，滄州中原，地大人多，兵多將廣。司馬懿率軍及雍涼二州人馬進攻漢中時，就有三十多萬。如果連中原人馬一起算上，當不下百萬。而西蜀人馬在孔明最後一公孫祁山時，也不過十萬人。據「通典」歷代兵制所載，西蜀兵制約只十一萬餘人，(書不在手邊，僅憑記憶，也許有錯)除留守外，自然也只能有這樣的數目了。當時兵卒也並不很強。孔明寫給他弟弟諸葛瑾的信說：「兄雖口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帝帳下白氈四方上兵也。」(出「自孔六帖」及「太平御覽」見「全集」卷一)他底上兵波濤不精，則其他更可推見了。而且連年征戰，「關羽敗，稀歸降魏」，「陸遜也失不少。孔明在後出師後中也說道：「自桓劉漢中，中興明年秀。然要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充，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雲叟(巴州的蠻子)賈亮，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出三分之二也，何以圖敵？」軍隊雖然削弱，又加「益州疲敝」，「……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出「北堂書鈔」見「全集」卷二)而且運糧不便，後方接濟極端困難。(孔明曾派他的姪子諸葛瞻，同各將領的子弟一起在谷中運糧，)這在當時蜀漢的困難，但是「事不可息」，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因此孔明只得「及早圖之」。(均見「後出師表」)這種情形，魏延是不了解的。建興六年正月，孔明討治北伐時，魏延提出出奇急進的意見說：「魏夏候禪，少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包圍五千，直撲褒中出，循褒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諸合擊，

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速，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孔明以為這是冒險，「不如安從祖道，可以平取關右，千舍必克，而無虞。」（出「魏略」見「蜀志」魏延傳註及「全集」卷廿中）所以不用魏延的方案，而決定出祁山，先略取關右。這種方針是否正確呢？我以為是正確的。因為如果照魏延的意見，直取咸陽，不但魏延所部五千人冒險，而且主力即使突進長安，但以區區十萬之家，懸軍深入敵地，對於敵人的敵人無法一下消滅，而後方接濟不上；那時真有全軍覆滅的危險。而且，如果不先略取關右，南安，天水，安定，武都，隴平等郡，則主力的北伐，其戰略左側面有被魏軍諸將威脅的危險。所以先取關右，西結羌大，轉而東向，無後顧之憂，有靈地之利；收聚人力，以補益州之疲敝，逐漸擴大根據地，逐漸擴大軍隊，逐漸削弱敵人；然後繼「狂寇」于渭水，復「舊都」于中原，這種「十全」的方針，確是弱軍對強敵必須採取的正確法辦。

這一戰略方針的另一方面，就是主動靈活的山地運動戰。孔明的北伐戰爭，共有六次戰役，（俗謂之「六出祁山」除建興「六年冬（第二戰役）圍陳倉外，其餘都是力求運動戰的。孔明的運動戰思想，是根據孫武的原則，也是進攻的，速決的。不過他有個很大的發展。這就是依山脈進退，依山脈行軍佈陣，依山脈出奇制勝的山地運動戰。這種看重山脈的「上山主義」，至今還為許多庸俗的將軍所忽視。孔明以疲憊之兵，當強大之敵，而能斬王雙，殺張郃；破郭淮于陽谿，敗司馬懿於陳倉；也都是利用山地出奇制勝的結果。

孔明戰略指導的主動性靈活性，不但見之于每次戰役都是採取主動的進攻（就是建興八年夏，曹真司馬懿大軍會攻漢中時，孔明也會派魏延入羌中，大破費瑁郭淮于陽谿），而且更明顯的表現于「乘虛」「攻瑕」與誘敵敵軍。他論「兵法」說：「知有所畏後所不足愛者，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夫善將者，以其容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堅，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中下者，是兵之有三機也。孫臏曰：「以君下驢與彼上驢，取君上驢與彼中驢，取君中驢與彼下驢……此兵成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其上也，下之不足與吾中，吾不既得勝矣乎？得之者乎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有三機也，三機也者，以一驢而敵二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擊，攻瑕則堅者壞。」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國也。」

「出」「玉海」見「全集」卷一）這不但不是孫臏故事的最好註解，也是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的思想的最早孔明（在中國說）。他雖然未能于進攻中誘敵司馬懿出來野戰，但却善于退却中誘敵司馬懿的追兵。一次殺了魏大將王雙，又一次殺了另一大將張郃，這種在退却中誘敵敵人的運動戰，也是他的特長。

孔明的戰略雖是穩健穩打，但却仍仍是速決的。因為孔明見到「益州疲敝」；見到「民窮兵疲」，所以不能「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恰巧司馬懿却針對着蜀的弱點，不取速決，而收持久，這真是「避其鋒銳，而固其不出」。結果孔明贈送他車馬糧粉，也甘受不辭，這不是孫子所說的「忿速可侮」的將帥，豈使孔明無可如何。而相持的結束，前五次戰役，孔明多因糧運不繼而退；最後一次，用了「屯田」辦法，正是「大兵已會于祁山，狂寇將亡于渭水」。（孔明與孫權書，見「藝文類聚」及「全集」卷一）可惜不詳得很，孔明就在這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以後北伐的指揮，就由姜維代替。于此可見決定成敗的基本因素（略諒），但高明的將帥，却可以在戰爭史上，表現出有聲有色的奇蹟來。孔明之高明正為杜甫所說：「指揮若定失蕭曹」啊。

在上面我們大略的介紹了孔明的聯吳討魏的戰略思想，批評是很少的，因此只能作為研究中國戰爭史的參考。（被略）

新華日報圖書課

經售中外圖書雜誌

通信郵購，辦理迅速，手續簡便，歡迎賜顧。

唯論與唯「物」的思想論

陳家慶

(一)

抗戰以來，在我們的學術叢林中，對於哲學問題的研究和討論，從來沒有停止一分鐘一秒鐘。我們並不會把哲學當作與抗戰無關的問題。反之，在我們用心和腦一再接觸抗戰實際之後，却發現了一個最本質的問題。我們發現自從新哲學運動開始以來，的確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走錯了這路。他們口頭上講唯物論，實際上所講的不是唯物論，而是唯「物」的思想。唯「物」的思想，論在實質上是什麼東西呢？揭穿了說，這仍然是唯心論，或唯思想論。不過他們所「唯」的不是叫做唯心的思想，而是叫做唯物的思想。花樣雖然翻新，唯思想的本質，並無改變。

(二)

兩年來，我們要整頓三風，要肅清以教條主義為其主要特徵的主觀主義，殊不知這種主觀主義之哲學的根源，就是唯「物」的思想。教條主義者對於「主觀」這個名的解釋詞就是不明確的。今天一提到主觀這個名詞，就有一大批人會把主觀與思想混為一談。好像離開思想，就談不到主觀。這一大批人把主觀客觀的差別，就當作思想與實際的差別來了解。很少有人明確指出客觀是物質性的，主觀同樣是物質性的。

從哲學的觀點來解釋，主觀與客觀只是一個對待的名詞。主觀與客觀是用來表示一類物質與另一類物質的關係而已。例如拿牛這一類物質為主而言，牛就是一種主觀的物質，凡牛以外的物質，對於牛而言，都是客觀的物質，再拿人這一類物質為主而言，人就是一種主觀的物質，凡人以外的物質，對於人而言，都是客觀的物質。思想是物質的運動，物質不是思想的運動，舉物質則能包括思想。舉思想並不能包括物質。最近我們在倫理問題上提出了一個意見，叫做把人當人。在哲學上也要提出一個意見叫做把人當物質，而不要把人當思想。只有如此，才能提高主觀的物質力量。

我們提倡這個意見，決非無的放矢。因為幾年來，許多知識分子把思想強調得太厲害了，以致忘記了強調思想不過物質的一種運動而已，思想不過是問做人的這一類物質的一種運動而已。思想滲透於人類的物質運動之中，這是不錯的。為研究的便利計，從人類的整個物質運動中，把思想運動單獨取出來，作為一個問題，加以討論，這也是不錯的。然而許多知識份子一旦抓住了人類的思想運動，就把人類的整個物質運動丟掉了。於是乎人再也不是物質，而是一種思想。

(三)

最使我們感覺奇怪的，就是有許多以辯證唯物論者自居的人，對於生命和生命力問題的冷淡。有些人絕口不談這個問題，有的大雖然談談，也認為不足輕重。這許多人從來沒有提到生命和生命力問題是辯證唯物論的根本問題之一。而且由於唯心論者時常談到生命問題，談到生命力問題，於是我們更不敢

談。好像談到生命與生命力問題，就犯了唯心論的嫌疑。這種不談的動機，多少是由於自怯、我們認為，沒有徹底弄清楚生命力和生命問題，也是造成「唯物的思想」論的原由之一。

如果擱下社會的範疇不提，專就自然的範疇立論，那末，生命就是物質運動達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生命本質就是物質運動的一種特殊的形態。生命力就是以生命形態表現出來的物質力量，這就是對於生命和生命力的基本解釋。以生命形態表現出來的物質運動，有許多類型。植物是一種類型，動物又是一種類型。在動物中，也有許多類型，人不過是一種類型而已。以故，專就自然的範疇而言，人類的運動，實只是物質的運動。人的生命力，也就是以人的形態表現出來的物質力量。

人類的物質運動是不可以分割的。然而是可以分析的。大體上分析起來，人類的物質運動（仍照專就自然的範疇而言）有兩大部門。第一是生理部門，第二是心理部門。（研究動物心理的人，都知道在社會心理之前，還有自然心理。）生理部門又可以分成兩個小部門，第一是飲食，第二是男女。心理部門也可以分成兩個小部門，第一是思想，第二是感情。再說一遍，這四個小部門的物質運動，是不可分割的，是整個的。假使不肯承認這四個小部門的真理，偏要從這四個小部門中，任意割取一個小部門，為其他三個小部門的出發點。這就會弄出錯誤。

最荒唐的一種辦法，就是把飲食這個小部門割取出來，解釋人類的物質運動的全部過程。把生活資料的獲得算作人類的唯一物質運動。生活資料的獲得（無論用自然的非生產的方法獲得，或用社會的生產的方法獲得），當然就是決定重要的事情。然而人類的物質運動決不止於生活資料的獲得。何況在一個有文化的社會中，生活資料也決不止於飲食一類的生活資料。在一個文化發展的社會中，遊戲和音樂也是人類的的生活資料。其次就是把男女（即性慾）這個小部門割取出來，作為人類的物質運動的主要出發點。佛羅倫薩在醫學上有過這樣傾向。我們也不否認男女也是人類物質運動的一種。但是拿男女作為重要因素來解釋飲食，解釋思想，解釋感情，就每每有種種的危險。甚至連男女之愛情，都不能完全拿情慾來解釋，何況其他。再其次就是把思想這一小部門作為人類的物質運動的主要出發點，來解釋飲食，好像為了思想才去飲食一番；來解釋男女，好像為了怕思想絕種，才去男女一番；來解釋感情，好像為了怕思想沒有光沒有熱，才去感情一番。這種一切歸

於思想的思想，根本就不就錯誤了。最後就是把感情作為人類的物質運動的主要出發點。這也是錯誤的。因為一切歸於思想的思想站腳不住，一切歸於感情的感情，同樣站不住。

人類的一切運動既然都是物質的運動，以故我們在哲學上就拿物質的運動作為人類一切運動的出發點。人類本身就是一種存在，就是一種自在，人類首先是自在的自在，然後又是社會的目的。因此，當反對唯「唯物的思想」論時，我們首先要要求把人當物質，不要把人當思想。

（四）

社會是以自然為基礎的。社會也可以說是自然的一種特殊形態。以故此會可以說起第二自然。在社會沒有出現之前，作為人類之祖先的動物，也還沒有成為人類。這時作為人類之祖先的動物就與其他的生命和生命力來完成一切可能的物質運動。由於使用工具和製造工具而出現了社會，這是不必多加解釋的。然而社會出現之後，生命與生命力的地位和作用是否消滅了呢？按照我們的回答：社會並不要求取消人類的生命和生命力。自然的生命和自然的生命力在社會中並沒有消滅，反而得到了最高的發展。只有那些把自然與社會之間的聯繫一刀切斷的人，才肯認為人類之自然的生命和自然的生命力老早就在社會中消滅了。只有那些把自然與社會完全對立起來而不能找出這兩者之明也有一的人，才肯認為自然生命和自然生命力，無法在社會中獲得最高的發展。正因為許多知識份子把自然與社會的關係在任何場合之下都對立起來，於是就使得我們無法與中國的一種反動的傳統思想作對門。這種反動的傳統思想就是所謂自然主義的思想，就是所謂反對社會，回到自然的理想。反動的自願主義者認為人類之自然的生命和自然的生命力只有在自然中才能獲得發展，決不能在社會中獲得發展。反動的自願主義在兩漢以前尚未在中國傳佈，取得優勢，魏晉以後，以何晏王弼為首的玄學家，才把這種反動的自願主義發展到了極點。直到今天，這種以老莊哲學為基礎的自願主義思想仍然在不斷作怪。自願主義者把人類的生命和生命力放在消極的自然的生活中心了。他們從未說明人類之自然的生命和自然的生命力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鬥爭中，才能獲得最高的發展。

為什麼許多偉大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屢屢讚頌在偉大的社會鬥爭中，歌頌一些偉大的生命和偉大的生命力呢？例如羅曼羅蘭，在其名著「彌蓋朗琪

羅德「裡面」就把羅德朗琪羅當「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中一個最偉大的生命和是偉大的生命力來看待。羅德歐似了人類的生命（其實這是物質的運動）和生命力（其實這是物質運動的力是），就是唯心論在作祟嗎？不是的，唯心論者之不了解生命，其原因不勝枚舉。唯心論者之唯心論無法在社會中發展人類之自然的生命與自然的生命力。

社會發展形態之決定因素乃是生產工具與生產力。這一點對於反對唯「唯物的思想」的人們，是異常肯定的。生命與生命力不是社會發展形態的決定因素，這一點也是清楚的，並且不斷的加以說明。今天沒有任何一個人不把生命和生產力代生產工具和生產力，而使其成爲社會的決定因素。然而我們的確要求偉大的社會鬥爭中考慮人類自然生命和自然生命力怎樣通過社會形態而發生作用。

人類是一種物質的存在，人類是一種物質的自在。人類是一種自然的自在，人類也是一種社會的存在。人類是一種社會的自在，人類也是一種社會的自在。這些話或顯或隱一百遍。人類成爲社會的存在而起作用，同時也作爲一種自然的自在而起作用。人類作爲一種社會的自在而起作用，同時也作爲一種自然的自在而起作用。此話我也也顯或隱一百遍。唯「唯物的思想論」者的最大毛病就是走偏鋒。偏得不亦樂乎。偏到只是強調人類是社會的自在，而忘記了人類依然是自然的自在。偏到只是強調人類之自在這受到生產關係之矛盾的束縛，而夢想不到人類之自然的自在同樣這受到生產關係之矛盾的束縛。根據人類的自然的自在同樣這受到生產關係之矛盾的束縛，於是就有人要拿他的自然生命和自然生命力來參加偉大的社會鬥爭，這就是說不惜犧牲生命。假使一個人的自然生命沒有燃燒，假使一個人的自然生命沒有爆發，他所作的社會鬥爭，也不會強烈。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行動上解釋許多許多很大的文學家和藝術家歡喜在偉大的社會中，歡喜一個偉大的生命力。

是否我們今天可以只強調人類之自然自在，而忘掉人類之社會的自在呢？當然是不可以的。我們從來沒有作過這種無謂的強調。人類之自然的自在，與人類之社會的自在，是不可以分割的。今天離開了人類之社會的自在而談也找不出任何純粹的人類之自然的自在。但這決不是說除了人類之社會的自在而外，根本沒有所謂人類之自然的自在。我們不要忘記社會是以自然爲基礎的。因而離開了人類之自然自在，同樣找不出任何純粹的人類之社會的自在。人類之社會的自在與生產關係之矛盾的束縛向來消滅的社會中，人類的自然自在，只有通過人類之社會的自在，才能鬥爭。這世也不過說今天的人類僅僅只爲社會的自在而鬥爭，因而而不爲自然的自在而鬥爭。不過，今天爲自然的自在而鬥爭，因爲社會的自在所作的鬥爭之內，以爲不容易發掘出來。一旦有人發掘出來，設成在人類的社會的自在而鬥爭之內的，還有爲自然的自在而鬥爭的鬥爭，還有生命的燃燒與生命力的昂揚，於是聚起而攻之，以爲離經叛道。

今天的生命之不能昂揚，當然不僅僅由於自然的生命之不能燃燒，自而今天要求我們的知覺份子，提高主觀的物質運動，把生命燃燒起來，把生命力量昂揚起來，認識自然的自在，以加強社會的自在而鬥爭。這決不是企圖把自然因素調到超越社會因素。反之，唯「唯物的思想」論者非備了。他們不把人類的活動（或其根據上說）當作自然的物質活動。他們不把社會的產生（或其根據上說）是出於自然物質活動的需要。他們不把人類當生產工具的主人，而把人類當作生產工具的工具。他「害怕一旦主要把人類當作生產工具的主人，就會弄到取消生產工具其作爲社會發展形態之決定因素的資格。其實，這是不必害怕的。我一方面主張人類是生產工具的主人，一方面主張生產工具是社會發展形態的決定因素。這豈不更爲合理嗎？

(五)

唯「唯物的思想」論者還有一個大毛病就是在認識論上否認了感覺。唯物的認識論是以感覺爲基礎的。沒有感覺就沒有思想。唯心論者否認其說，說他的思想是先天的，我「唯物的思想」說思想不是先天的，這與唯物的思想，也不是先天的。辯證唯物論力是說：認識宇宙有具體的、個體性的、線索，而不是一個純粹的公式。因此，我們無不承認辯證唯物論的「個體性」個宇宙，一個自然的。歷史唯物論力是說：認識歷史和社會的「個體性」的線索，同樣不是一個純粹的公式。因此，我們無不承認辯證唯物論的「個體性」個歷史，一個社會的。我「唯物的思想」說，歷史和社會，具有對於宇宙自然的實際、歷史和社會的實際、使用我「最發散的歷史、發現問題。然後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兩根線索去解決問題。

唯「唯物思想」論者誤於把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當作一種演繹的公式。我親眼看見有許多青年中了唯「唯物思想」論的大毒。這些青年，由於沒有接受好的領導，一旦讀了幾本入門大綱之後，就自以為有了「唯物的思想」，其實還差得遠。於是他們就按照自以為是的「唯物的思想」演繹一切，以致越演越糟。也許這些青年，在其沒有讀那幾本入門大綱之前，還能根據其自覺的自在和社會的自在，感覺一些問題。等到讀了幾本入門大綱之後，連原有的感覺都大掉了。更談不到該有的感覺。這種責任不能完全歸青年負。教條主義者，唯「唯物思想」論者，要負這種錯誤的責任。

由於輕視感覺，以致沒有銳敏的感覺，結果就把思想的源泉堵塞了。所以唯「唯物思想」論者們都得了思想癱瘓症。他們素以思想自豪，素以頭腦自豪，恰好他們自己的思想和頭腦都僵化了。這豈不是歷史的諷刺嗎？他們的頭腦中，只剩下幾根骨瘦如柴的乾條，大跳其軀體之舞。爲了對症下藥計，爲了真正懂得一點唯物論的精髓計，我們今天在認識論上特別強調感覺，這與我們在工作上強調調查研究，是互相配合的。我們告訴青年，不要害怕沒有思想，就怕沒有切實週密的感覺。如果你能夠對於宇宙和自然的實際，對於歷史和社會的實際，隨時隨地都使用切實週密的感覺（這是最銳敏的感覺），我們可以保證這種感覺，根據唯物論來加以思考和整理就會上升而成爲唯物的思想。

(六)

唯「唯物思想」論者在認識論上輕視感覺的錯誤，立刻轉變而成爲生活態度上的錯誤。人類的實際生活，一切具體生活都是可以感覺得到的生活。純感的生活當然是不存在的，然而純思的生活也不存在。一種完美的生活應當包括感性生活與理性生活兩者之內。馮友蘭先生勸人生活在實際的生活之中。就是生活在純思的生活之中。這種生活態度的哲學基礎完全是唯心論的，我們反對過，不幸，我們在「唯物的思想」論者的生活態度，又發現同樣的錯誤。這種錯誤生活態度之所以可怕，就在於對實際生活沒有感覺。生活於實際生活之中，而對於實際生活沒有感覺，這豈不是怪事嗎？我們的哲學家寫不出動人的論文。爲甚麼？這只要看看我們哲學家的生活態度就可以明瞭。我們的哲學家在生活的態度上就是脫離實際的。他不顧感覺到實際中每天發現的新問題。如果問問我們的哲學家說：你爲什麼不寫點文章嗎？最

可能得着這樣的回答，沒有什麼新問題可寫啦。其實，並非沒有新問題可寫，而是有了新問題，但不爲我們哲學家所感覺。我們的哲學家寧可脫離實際，而躲在自命爲唯物思想生活中度過空閒的歲月。

我們的文學家也是一樣，空門了一陣充實生活，多寫實際。然而實際在那裏呢？沒有人答覆。據說後方沒有生活，沒有實際，於是跑到前方，想不到前方也沒有生活，沒有實際，據說南方沒有生活，沒有實際，跑到北方，想不到北方也沒有生活沒有實際。據說城市沒有生活沒有實際，跑到農村，想不到農村也沒有。據說商店沒有生活，沒有實際，跑到工廠，想不到工廠也沒有。其實並非沒有生活，沒有實際，不過是出於我們的知識份子的生活態度不正確，以致感覺不到生活，感覺不到實際罷了。

有許多人說，我們的知識份子沒有感情。我認爲這是必然的結果。爲甚麼？因爲他的感覺都沒有，那裏還有感情。感情的麻木，固然可怕。但思想的僵化，其可怕的程度，也不在感情麻木之下。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乃是一天思想生命。這一點是絲毫不能錯的。如果沒有這次思想的革命，要想打倒唯「唯物思想」論，是不可能的。

(七)

也許有人會提出思想與感情之關係問題。究竟思想決定感情呢？還是感情決定思想呢？我們的答覆如下：既不是思想決定感情，也不是感情決定思想，思想與感情二者皆爲存在所決定。根據存在決定思想，而不是思想決定存在，這個基本原則，我們當然可以了解思想是爲存在所決定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懂得存在決定感情，而不是感情決定存在。強調感情，讓感情來決定思想，讓感情來領導思想，這是非常危險的。反之，感情決不能離開感覺與思想，也就是說不能離開感性生活與理性生活。真切而豐富的感性，只有在感性生活中，才能產生，只有在理性生活中，才能提高，離開了感覺與思想，離開了感性與理性，也決不會有感情。

爲了反對唯「唯物思想」論，我們提出一個最嚴格的口號，就是自在的自覺。自在是整個的，是不能分割的。無論提到自然的自在也好，提到社會的自在也好，總之，只是一個統一的自在，不是兩個自在。在階級社會之前，一切自然自在的內部的都是一致的，一切社會的自在內部，也都是是一致的，一切自然的自在與一切社會的自在之間，仍然都是一致的。在階級社會

消滅後，也是如此。唯有在階級社會之中由於社會的自在之內部不能一致，以至弄得自然的自在與社會的自在之間，也無法一致。非常顯然，一個被剝奪者的社會的自在，並不能與這被剝奪者的自然的自在趨於一致。因為一個被剝奪者根據其社會的自在所取得的惡劣地位，簡直使得這個被剝奪者的自然的自在無法生活下去。於是這種自然的自在與社會的自在之間的矛盾，就轉變而為一種動力。

宇宙間一切矛盾都是由自然與自然的矛盾開始，但並不都以自然與自然的矛盾而結束。例如作為人類之祖先的動物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就是自然與自然的矛盾。我們以下列過程表示之。

自然（主觀力量）——自然（客觀對象）
等到社會出現以後，作為自然之一部份的人類，就不再單純的運用其自然的體力和腦力來與人類之外的自然發生矛盾，而是通過社會與自然發生矛盾。我們以下列過程表示之。

自然（主觀力量）——社會——自然（客觀對象）
這個過程與前一個過程有什麼不同呢？除了通過社會而外，可以說沒有什麼不同。因此，社會出現之後，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亦即自然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並不取消。

不過，自然與社會之間，以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的確有重新估計的必要。對於作為客觀對象之自然而言，社會是一種主觀力量。對於作為主觀力量的自然而言，社會又是一種客觀對象。所以社會同時具備主觀力量與客觀對象的兩重性質。以致由自然（主觀力量）經過社會到自然（客觀對象）的過程，實際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 自然（主觀力量）——社會（客觀對象）
第二階段 社會（主觀力量）——自然（客觀對象）

這兩個過程的第二階段如何發展，完全依據第一階段來決定，所以不必多加討論。應該討論的却是第一階段。

如果我們把這個過程的第二階段叫做社會與自然的矛盾，那末，就不妨把第一階段叫做自然與社會的矛盾。為什麼？因為生產工具不能脫離勞動力。勞動力毫無疑義的是社會的產物。但作為勞動之物質基礎的體力和腦力都屬於自然的產物。屬於自然產物之內的體力和腦力與屬於社會產物的勞動力之間，就有極大的矛盾，人類無時無刻不在企圖以最小的體力和腦力造成

最大的社會勞動力，這就是一種矛盾。再者，社會勞動力的提高，依據於生產工具的提高。以故屬於自然產物的體力和腦力永遠不會滿足於社會勞動力的水準以及生產工具的水準。體力和腦力永遠要求生產工具的提高，以便提高社會勞動力。這種自然（主觀力量）與社會（客觀對象）的矛盾，從作為人類之祖先的動物開始以其體力和腦力轉變而為社會勞動力的那一天起，從作為人類之祖先的動物開始使用以及製造生產工具的那一天起，就已存在。而且這種矛盾越來越深。這種矛盾的前途對於人類是有利的。假使人類在自然與社會的矛盾的階段之上（即在第一階段上），獲得勝利，那末，他們在社會與自然的矛盾的階段上（即在第二階段上），定能獲得勝利。不過在這中間能起決定作用的，當然是生產工具，沒有生產工具，人類之自然的體力和腦力，也決不能轉變而為社會勞動力。至於人類之自然的體力和腦力雖然不能起決定作用，但仍有主動的作用。假使沒有人類的自然的體力和腦力，不但勞動力無從生產，就連生產工具也無從使用與製造。

自然與社會的矛盾（第一階段）以及社會與自然的矛盾（第二階段），無論在甚麼形態的社會中，都是存在的。在生產關係毫無矛盾的社會中，這兩種類型的矛盾，當然存在，而且佔主導的地位。至於在生產關係具有矛盾的社會中，同樣存在，但是不佔主導地位。因為在生產關係具有矛盾的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矛盾，必然是生產關係的矛盾。

為甚麼要詳細研究自然與社會的關係呢？這無非為了證明以生命形態表現出來的自然的物質運動，乃是社會主動的因素。思想決不是主動的因素。作為人類之祖先的動物之所以使用生產工具，製造生產工具，以致於創造社會，都是由於自然的需要。生理的需要是自然的需要。心理的需要也是自然的需要。有了這自然的需要，不見得就能使用生產工具，製造工具，以及創造社會。如果沒有自然的需要，那麼決不能使用生產工具，製造生產工具，以致創造社會。人類的需要由於社會的發展提高了。人類的需要固然不等於作為人類之祖先的動物的需要。但是人類的需要，即令由於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提高，最後還是以自然的需要為基礎。假如人類的自然需要一旦消滅了，建築在人類自然需要之基礎之上的一切社會需要，都會隨之消滅。這是一個人類不能再得平凡的真理。同時根據這一平凡的真理，我們認為在階級社會消滅之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必然隨之消滅。在那個時候，社會的動力乃是人類的需要（自然的需要以及建築在自然需要之上的社會需要）與生產力（包括生產工具與社會勞動力在內）之間的矛盾。於是人類才真正做了

社會的主人，歷史的主人。

人類是以自然的需要以及建築在自然需要之上的一切社會需要為出發點的。代表人類的人民，同樣是以自然的需要以及建築在自然需要之上的一切社會需要為出發點的。有一小部份人由於其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使然，即令他們也有自然的需要，以及建築在自然需要之上的一切的社會需要，却產生不出革命的需要的。反之，還有反對革命的需要的。但是，絕大多數的人民，同樣由於其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使然，於是就不能不根據他們的自然需要，以及在建築在自然需要之上的一切社會需要，而產生革命的需要的。至於革命的性質，係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決定的，則是另一問題。我們今天所注意的問題，乃是革命的出發點的問題。人民以革命的需要為出發點而要求革命。由於有了革命的需要的產生革命思想。這就叫做自在的自覺。有許多知識份子把問題顛倒過來。他們以為先有了革命的思想，然後產生革命的需要的。他們以思想為自覺，以自以為為是。唯物思想自覺，而對於人類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漠不關心。他對於只有自在的需要，而還沒有高度自覺的人民，採取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好像天下的蒼生，都在等候他老先生這一點思想上的霖雨。他們根本反省一下我們這種可寶貴的唯物思想，乃是根據自在的需要，革命的需要的，以及人民的需要所產生的。沒有自在，便沒有自覺。自覺再豐富，仍然不會比自在更豐富。思想再豐富，仍然不會比物質更豐富。以故不以物質為主，而以思想為主，是不會有好的結果的。補充一句，以唯物的思想為主，固然不會有好結果，以自以為為是。唯物的思想為主，也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思想既然是物質的產物，所以思想必須跟着物質的運動而運動，必須跟着物質的變化而變化。物質的運動比思想的運動更強烈，物質的變化比思想的變化更豐富。思想的運動一旦脫離了物質的運動，思想的變化一旦脫離了物質的變化，就會萎縮，就會僵死。唯「唯物的思想」論者的錯誤在於使我們最可寶貴的唯物的思想，脫離了物質的運動，脫離了物質的變化。我們今天強調人是物質，並非輕視思想，強調自在並非輕視自覺，而是為了使我們有更活潑的思想，有更活潑的自覺。

不根據自在的自覺來創造思想，而根據思想來創造思想，這是一條最危險的道路。唯「唯物的思想」論者反駁說，根據唯心思想來創造思想是危險的，但根據唯物的思想來創造思想，便不危險。這句話也令人難於同意，試問唯物的思想又是怎樣創造出來的呢？難道不是根據自在的自覺而創造出來的嗎？要懂得全部馬克思列寧主義都是根據無產階級之自在的自覺而創造出來的。為什麼我們主張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創造呢？正因為馬克思列寧

主義是根據無產階級之自在的自覺而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們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換句話說，我們根據無產階級之自在的自覺來主張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並非只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根據無產階級之自在的自覺。假使中國沒有無產階級之自在自覺這一條的根據，我們敢說誰也無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搬到中國來。這難道不是一對風血之論嗎？這難道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唯「唯物的思想」論者，口頭上與我們一樣，主張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實則却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基礎的階級之自在和自覺，完全拋掉。這不叫做畫龍點睛，而叫畫龍捉睛。唯物論本來是一條龍，經過唯「唯物的思想」論者這番把持之後，就成了一條死龍。十多年來，唯「唯物的思想」論者，不根據中國無產階級之自在自覺，而根據自以為為是。唯物的思想，來創造新思想，來創造新文化，結果弄得教條主義滿天飛，這就根據思想來創造思想的弊端。

根據思想來創造思想，又是一個最容易犯錯誤的道路。因此唯「唯物的思想」論者，不根據自以為為是。唯物的思想來創造新思想，來創造新文化則已，一旦創造出來，就錯誤百出，於是就創造出馬克思主義，只好把幾根骨頭如柴的教條，硬塞進去，一篇一篇的文章，一本一本的書在外面。讀者一經長談，就覺得唯物的思想與歷史唯物論的實質弄錯了。這就是唯「唯物的思想」論者，沒有想到自己把唯物的思想與歷史唯物論的實質弄錯了。這些馬克思主義文章許多錯的唯「唯物的思想」論者，反而不如馬克思主義文章對無產階級，只要根據其自在的自覺出發，還能合乎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根據自在的自覺，才來得親切有味，這是不清再說明了。如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外。的優秀文化傳統，亦非以自在的自覺為根據不可。因為接受優秀傳統，無論是中国優秀傳統也好，西洋的優秀傳統也好，最後都入主出奴的毛澤東。最慎於有把這些優秀傳統接過來，反而被這些優秀傳統所接受過去。馬克思列寧主義，女青年人看了紅樓夢想做黛玉。如果為了接受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優秀傳統，以羨弄傅男女青年想做黛玉，豈不是糟。至於接受傅家的優秀傳統（傅說說傅家有優秀傳統的）就傅家孔子，接受墨家的優秀傳統就當墨子，這與想當黛玉、想當紅玉，又有什麼區別。至於接受傅家的優秀傳統，接受傅氏比而願傅氏比而也不完全妥當。中國與新中國的其倫，中國的沙氏比而，這是不錯的。但我們仍熱希望中國的新傳統不是英國的傅氏倫，中國的新傅氏比而，不是英國的傅氏比而。這些比而無非是為了說明一點，即說明今天中國新文化的創造，必須根據自在的自覺來創造，不能根據自以為為是的思想來創造。

反對學術上的宗派傾向

念華

從前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這樣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這意思就是說，對於一個所授業的先生，當然是可敬愛的，我們應當尊重先生所給予我們的意見；不過，如果先生所發表的意見與客觀的真理離得很遠，甚至於不是真理；那末，我們就不能因為他是我的先生，就隨便附和着他的意見。

這也就是：愛先生是愛先生，愛真理是愛真理，愛先生是私人情誼，愛真理則是為學的根本態度。如果抹煞客觀的事實，盲目地跟着先生跑，這就容易犯主觀上的錯誤，同時也就容易形成宗派傾向。這樣，不僅真理無從獲得，也就失了求真理的態度。

且真理是向前發展的，是隨時代，隨客觀事實之發展而發展的。即使原來先生所發表的意見是真理，然而到了學生的時代，就不見得仍然是真理；因為時代不同了，所反映出來的道理也自不同。我們不能死抱着門戶之見，堅持原來先生的意見。這樣，也就把真理視為無發展的，某種永恆的東西了。

亞里士多德的這種「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精神，是對的，是嚴整的科學精神。

今日中國許多研究學術的朋友，對於學術的主張，抱有不同的見解，有時還因了見解之不同而不免有形成門戶的地方，例如關於文藝與歷史諸問題的論爭，其中固然有着原則問題的分歧，但也確實存在着或多或少宗派傾向。有這種宗派傾向的人，往往不肯尊重別人的意見，也不肯虛心傾聽別人的批評。往往為了他自己小圈子的利益，不惜吹吹拍拍，拉拉扯扯。而對於不屬於他們小圈子的人，則往往加以歧視。那怕對方的主張可取，也不肯放棄成見。

這種發展的结果，自然妨礙着學術上互相切磋琢磨的進行，因而也就阻礙着學術的進步，真正懂得學術民主，為真理而奮鬥的人便不是這樣的。

比如清代的大哲學家戴東原，他的思想不是在清代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嗎？他的致力於學問，便不問什麼派系，也反對開派系。錢大昕曾這樣稱讚着他說：「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潛研堂集跋）是，戴東原的做學問的態度就是如此，他自己這樣說：

「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共獲二，非持譽前人以自表揚，即依傍者賢以附驥尾。私智穿鑿者，或非盡持擊以自表揚，積非成是而無從知，

進步眼光看美國

勝利及以後的後感

著者：白勞德

一九四二年九月紐約版

本書敘述美國進步人士對於世界戰爭和美國國內情勢的見解，強調聯合國家的相互團結和內部團結。對於我們中國人特別有益的，是分析美國內部的各派。因為我們需要了解我們盟邦的情況，尤其是現在中美兩國的邦交日益親睦的時候。

書中對領導美國政治的民主共和兩大政黨有極其精闢的意見。

美國的兩黨制度由來已久，演化到現在，兩黨內各有着不同的主張。雖然掌握美國大權的不是民主黨人，就是共和黨人，但我們對於這兩個黨不能存有太固陋而單純的看法。美國政府對外交談的簡單，包含着複雜的內容，其複雜性和其他國家的政治一樣。在政治戰鬥中，兩黨的陣線並不明朗，兩黨內部對於當前每一問題都沒有十分一致的見解。

譬如，威爾遜是共和黨名義上的領袖。但威爾遜對各項問題的見解，和民主黨魁羅斯福相近，而共和黨中據有實際領導權的人們相反。很顯然地，「典型的」共和黨的見解是沒有的。

但這並不是說不能追根窮源，找出許多政策的線索。過去，共和黨是孤立派的大本營，現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還有對德和妥協的傾向。代表這個傾向的，有前總統胡佛，一九三六年總統候選人羅斯福，一九四〇年和威爾遜競爭作候選人的參議員塔夫

先入為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東原文集答鄭用牧書）

一班開宗派的人，就是這樣的，「非指擊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前賢以附驥尾」，都不是在求真理，都失了求真理的態度，只圖一時之名，顯出自己的脚色而已。我們真正的為學，就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就是不開宗派，不憑主觀，完全以客觀的事實為主，從客觀的事實中求出它的來。因此，我們今日從事學術研究的朋友也應當想想，我們在評論事物與理論探討中，是不是犯着「以人蔽己」或「以己自蔽」的毛病呢？是不是不顧具體的事實而專肆來指擊某個人以自表暴或依傍某名流以附驥尾呢？犯了的話，就應該從求真理的一點上着想，就應該改正過來，應該學習學習戴東原的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清代的學者當中，不獨戴東原有這樣的精神，就拿在戴東原前一個時期的大師王船山來說吧，他的為學，態度也是如此。他自己這樣說：

「天下之物理無窮，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隨時以變，而皆不失於正；但信諸己而即執之，云何得當；況其所為信諸己者，又或因習氣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漸漬以爲己心乎！」（後解）

他的這種反對「守一先生之言」，就是反對開宗派，「俱信諸己而即執之，云何得當」，就是反對憑主觀，他認為只有從客觀事實的演變中（物理……隨時以變）來把握它的真理，才「不失於正」，才能真正的求出它的定來。

且在各種學術的研究中，我們不但不反對開宗派，反對憑主觀，我們還應該和衷共濟，真正地來爲追求真理而奮鬥。儘管各人在學術的見解上有所不同，我們還是要能互愛互助，我們不要因了這一點，彼此便不坦白起來。當了面，不是置各人所研究的於不談，便是彼此諷刺譏笑；轉過背，則大放厥辭，不是說某人不懂學術或所研究的太膚淺，就說某人的研究犯了怎麼怎麼的錯誤，這都是不對的，這都是所謂「文人相輕」的老毛病，失了求真理的態度。

我們看看宋代吧；陸子靜和朱晦菴，他們在理學的見解上儘管有所不同，但他們當了面還是和衷共濟的，還是把各人所研究的提出來供大家討論。有名的鵝湖之會，就是他們親愛精誠熱烈討論的具體表現。且陸子靜於會後還這樣寫着詩道：「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養養轉深沉。」這可見他們問的真理愈討論而愈精密了。

所以各人的見解儘管有所不同，但各人所研究的意見必得提出來討論，不要留在那裡，以爲將來可以「獨家經營」；這樣，即可以「獨家經營」，我想，也未見得是什麼好貨。

就在學術的見解方面，某人的見解是某人的見解，我們不可因某人的見解尚未發表或已發表而偷偷地據爲己有而發表出來，彷彿此見爲自己所獨創，可以在社會上傳得一時聲譽。據說康有爲之寫「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如此，都是抄襲了廖季平的是時尚未發表的「闢劉勰」和「知聖篇」上的意見，而將廖季平的名字提都沒有提一提，都是不對的。唐氏雖然因這兩書在當時獲得了一些聲譽，但到今日這是要被人發覺的。

說等人。這些人的領袖者，是紐約州長杜威。

威爾基主張全國團結，勝利第一，在共和黨的下層中雖然一天比一天高，但在黨的領袖機關中還受日益增漲的阻力。雖然，杜威他們總是避免和威爾基作尖銳的鬥爭，因爲不敢。

那是因爲孤立派在很久以前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中作戰略的撤退，不得不接受威爾基這獨立派的提案。但這是撤退，並不是投降。

至於當權的民主黨，也沒有「典型的」見解。和共和黨一樣，它一方面得到北方工人羣衆的支持，一方面也包圍南方諸州對黑人毫不容氣，對內政外交問題持保守意見的人們。除羅斯福總統以外，在國會和政府中最有力的是南方來的一羣官員。

現實的深刻變化，使美國方面對政治問題的不同意見，並不存在於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而在於兩黨內部之間，有兩大陣營：民主黨的羅斯福總統和華萊士副總統，共和黨的威爾基，作者自認德自己以及成千成萬有遠見的資本家，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們，這是一方面。民主黨中竭力反對羅斯福的如黨領袖法萊和參議員萊諾，共和黨的杜威胡佛之流，托洛斯基信徒，專門挑撥美國內部團結的社會黨領袖諾門。托麥斯以及少數近視的然而勢力還是雄厚的大富翁及其家臣們，這是另一方面。關於戰爭的本質，前者如華萊士就認爲「這是奴隸世界和自由世界的戰爭。正像一八六二年的美國在南北戰爭中，不能一半是奴隸的，一半是自由的，一九四二年的世界也一樣。」他們以爲這戰爭是爲了爭取民主自由的戰爭。後者則反對這意見，其中一部份人認爲這是爭取世界霸權的戰爭，一部份人簡直不願意打敗法西斯，但不敢公開反對戰爭，只好把「這戰爭是維護共產主義的戰爭，還是反對共產

我們要學習的，是英國的達爾文和瓦雷斯，他們在研究生物學中獲得了同一的見解；可是見解雖一致，但達爾文的研究在前，而瓦雷斯發表著論在前，爲了此，他們之間還互相讚美了一番。

達爾文認爲瓦雷斯的論著既發表在前，當然此一發現的功績應當歸功於瓦雷斯；而在瓦雷斯的一方面，認爲達爾文的研究既在前，且他的研究又較自己的爲精密，這一功績還是應當歸功於達爾文吧！這是何等偉大的一番讚美之風！

我想，如果他們之間要小氣一點的話，那瓦雷斯就要說，我的論著發表在前，當然這一發現的功績是我的。對於達爾文，不是說他只是同情於我的見解的後生小子，便是說他抄襲了我的見解。瓦雷斯既如此說，當然達爾文也不會放鬆，他就要說，瓦雷斯雖然發表在前，但我的研究在前，同時我的研究比他的精密，功績當然是我的。或許還要罵着說：瓦雷斯算什麼呢？膚淺之徒，他不懂生物學，他偷了我的見解拿去發表的。

這樣，就失了求真理的態度，也不能成爲達爾文和瓦雷斯他們的偉大。

因爲，求真理，就只在求真理之發現，不會這真理是張三發現的也好，李四發現的也好，張三發現的歸張三，李四發現的歸李四。張三發現的，李四的功績也並不會抹煞；李四發現的，張三的功績也不會抹煞，大家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都是盡了力量的。

並且學術是公物，並非私產，大家都可以致力，大家在致力的過程中，求出了它的結果的也好，沒有求出它的結果的也好，或者完全錯誤了的也好，只要他不是像法西斯的幫兇一樣來有意歪曲，功績都是存在的。猶之乎我們今日的對日抗戰，如果我們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也不能說是誰的功績，或某幾個人的功績，而是全民族的集體力量所獲得的成果，是全民的功績。

我們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兩人之研究人類社會之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歷史，都具有不朽的功績。不過，我們看起來，好像其中的功績有誰比誰大；又好像恩格斯的研究，全然是爲了幫忙馬克思個人，因爲恩格斯所寫的「自然辯證法」和「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都是馬克思所想要完成而未得完成的方面；且馬克思死後，他的尚未成訂的傑作——資本論，又是由恩格斯代他編輯而成的，彷彿恩格斯全然在那裡幫忙馬克思；其實不然，恩格斯所幫忙馬克思的，並不是在幫忙馬克思，而是因爲兩人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道理有了一致的見解，大家都在爲這一一致的見解而努力。總之，不是幫忙馬克思，而是在完成馬克思主義。

所以大家爲了真理，就只知真理，只知如何把這一真理的工作來完成，並沒有計較到誰的功績會比誰的大，也沒有計較到我是在幫忙你，完成你的名望和地位，或是你在幫助我，完成我的名望和地位，如果這樣來計較，不獨真理求不出來，並且也不配求真理，這只是專門朝個人的名望和地位上着想的一班俗物。我想，恩格斯就從沒有這樣計較過。

並且真正爲真理而奮鬥的人，就不計較到個人的名望，不會因此來把個人擺在第一位，把個人擺在第一位的人，也求不出什麼真理。

主義的戰爭？」這類問題嚇唬民衆，千方百計鼓勵人們對戰爭怠工。關於對我國的態度，前者主張積極從事，希望我國早日打收日寇，很關心我國的團結。後者如最近鮑爾文的言論，竟說「中國不過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對於我國並沒有善意的關切，而且很怕我國成爲完全獨立的國家。關於對蘇聯的態度，前者認爲戰後美國和蘇聯可以和平共存，因此現在努力加強美蘇之間的互信和合作。後者則如胡佛，認爲美國和蘇聯在戰後一定勢不兩立，還不如早一點撒手爲妙。關於對英國的態度，前者主張英美合作，後者認爲「美與世紀」已經來到。關於種族問題，前者主張種族平等，後者保持着「白優越論」。關於對羅斯福的態度，前者擁護羅斯福，後者說羅斯福赤化了。

然而決定美國的命運的，將決不是後者，而是前者。因爲歷史的軌跡，是不能歪曲也不容歪曲的。

作者是工人出身，對工業經濟問題有切實的見解。他認爲計劃經濟和定量分配制是解決當前美國經濟問題的鎖鑰。據書中摘引的官方統計材料說，一九四一年底美國全國製造業的工廠之中有一七四〇〇〇家是沒有軍火生產合同的，一〇〇〇〇〇家有軍火生產合同，但這其中全數合同的百分之八十三握在一〇〇家工廠手里，這其中的半數又握在十家工廠的手里。本來可以用在戰爭工業上的多數小廠家開起和被迫關門，又引起工人大批跳廠的現象，這自然對反法西斯戰爭沒有好處。作者因此建議美國政府毅然實行計劃經濟，以消滅這些不健康的現象。關於物價的上漲，只有切實的定量分配制才能遏止。斯福羅提議每人每年收入不得超過二萬五千元，作者認爲贊成，而且說，美國技術很發達，實施計劃經濟和定量分配，困難決不在技術方面，而在當局的心。 (以沛)

又與實料

邱吉爾在魁北克演說

魁城會議為加強對日作戰

並望英美蘇舉行初步會商

魁北克八月三十一日路透電：英首相邱吉爾今晚在古堡中對全世界發表廣播演說，檢討戰局，其全文如下：

從七月初，我開始感覺有和美國總統舉行新的會談的必要。羅斯福總統以愉快的心情，親請以魁北克為會議地點，我們都很高興。

魁北克，以大海空軍國使其日益增强的陸軍取得更密切的接觸，對共同的敵人採取更直截的壓迫的適當地點。在這里，在法蘭西加拿大（按加拿大從前有一部份屬法國）的首府和中心，應該想到在苦痛中的法國人民，採取解放他們的新的步驟，而且傳個信息到大西洋的彼岸，告訴他們，我們並沒有忘記他們，也沒有忘記他們在人類智慧和人權的行進之中對於文化和文明所貢獻的力量。

四十年以來，我深信着法蘭西的偉大和美德。在黑暗和遭受挫折的時日，我也並不動搖，從一九〇四年英法協定以來，我總是積極地為了高尚的目的和法國人一起服務和工作。因此，我不僅要把許多鼓勵和信任的話說給在希特勒掌握之外而和我們一起前進的法國人，而且要把這些話說給期待獲得自由，擺脫希特勒奴役和恥辱的廣大法國民眾。

我們可以確定，一切會變好的。我們可以確信自由、統一和獨立的法國一定會重新崛起，和其他國家一起保衛人類的寬宏的氣度和光明的機會，那是我們要獲得並改變的事情。

我有幸和加拿大總理金氏會談，他會領導加拿大立即一致參加戰爭。我參加了幾次加拿大內閣會議，英國和加拿大的參謀人員也會共同討論全盤戰局。

加拿大在這重要時期，對大英帝國共同努力的貢獻，已經深深地感動了祖國和我們廣大的各邦和各處。

自從最黑暗的時日起，加拿大陸軍一年年擴大起來，在保衛英國本土使免得遭受侵略的工作中，起了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作用。它現在在日益廣大的戰場上作戰，卓著勳績，獲得為人成就的帝國空軍訓練計劃，就是在加拿大開始實施的，而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的廣大機隊，將聯同加拿大的英軍飛行人員，歡迎他們和本地的飛行員並肩作戰。

加拿大在戰爭過程之中變成了一個重要的海軍國，建造了許多種戰艦和商船，有些艦輪已經在幾千噸之外出堅強的加拿大海員駕駛着，保護大西洋的艦隊和我們遠涉重洋的生命線。

加拿大的軍火工業在我們的戰爭經濟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加拿大並不受法律的約束，減輕了我們軍火生產的負擔至少二十萬萬元。這並不由於條約或形式上的義務，而完全出自自發的、感情上的、傳統上的、仁慈的決心，爲了解救人類的將來。我願代表英國，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對偉大的自治領加拿大致敬。

我只希望將來能有一天到澳洲、紐西蘭和南非洲去，把我們對他們已經做了的和決定做的事務的感想當面告訴那邊的人。這是我責任。

我剛才說起英法兩國在將近四十年以前和法國訂立協定。直至今日，我們仍遵守這協定，並且將繼續遵守。而現在我們又和另一個大國締結了神聖的條約。我們和蘇聯締結了二十年友好互助條約。你們一定會知道，我們英國決心以一切力量全體的堅決來支持這個條約。

這次英法會議並未討論牽涉到地中海及其他地方的武裝部隊的當前作戰問題，這次會議雖非主要的，但大部討論有關加強對日本作戰的問題，而蘇聯政府和日本是有互不侵犯條約的，因此蘇聯如派代表參加，似乎不大適宜。如果邀請蘇聯參加，會使它不安。但羅斯福總統和我都願和斯大林元帥舉行三方面的會議。如果這會議尚未實現，那一定並不是因爲我們沒有盡力，或不願排除一切障礙而採取遠大迅速的步驟以達到此目的。這是由於斯大林元帥，直接指揮着勝利的蘇軍，目前不能離開戰場，而他正在這戰場上指揮戰鬥，這戰鬥不僅和德國猛烈進攻的蘇聯生死攸關，也和一切聯合國國家的共同目的有關。

從最近蘇聯戰場上傳來的消息判斷，斯大林元帥一定並不在浪費時間。爲了蘇聯輝煌的夏季攻勢，

爲了收復大片國土和消滅成千成萬的侵略者的哈爾科夫和塔根羅格的勝利，整個大英帝國謹向他致敬。

羅斯福總統和我都將繼續努力和斯大林元帥，而同時，最必要和最緊迫的事情，似乎是英美蘇三國外長或這三個國家的負責代表應該在適當的地點舉行會談，不但探討與將來世界安全有關的各種重要問題，而且更討論的情形達到能使三國政府的首長可以參加的地步。

我十分願意蘇聯代表在英美地中海戰事引起政治問題上和我合作。事實上，在這次戰爭中，我們所採取的步驟和我國所採取的步驟，都願意和蘇聯以完全勝利的態度加以討論。如果反希特勒的三大強國對於將來實際的戰略能獲得一致的見解，一致的決定，並且在戰略上獲得協同，實在是在各國的絕大利益，也是每個自由世界之福。

在最近兩年之中，我已經到了許多關於在法國西部分建立所謂第二戰線以對付德國的談話。上河大都能到戰事有採取巨大行動的必要。現在蘇聯單獨能負擔起這主要的和最艱難的壓力，他已不辭勞苦，並不掩飾其不滿意至責難，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決不責難他的談話。

他打得好，他會給德國的軍事力量以這種重大的創傷，以對付我們的戰略和我們在遠戰爭中迄今爲止能起的作用沒有公平的批評，這會使我們誤會，會使我們減少對他的英武和勤奮的讚賞。

開闢一個一打就垮的戰場要比重新建立一個戰場來得容易。我們在法國曾經有過一個良好的戰線。它是垮了。現在有一天英美作戰部隊將以充分的實力跨越英吉利海峽和法國境內的德國侵略者交鋒。你們自然不希望我告訴你們這事情將在什麼時候實現和實現時期的將近，但一旦重大的打擊實現了，你們可以斷定的有良好的前途和繼續不斷的成功，而不論我們兵士的生活一定會按照軍事計劃而擴大，而不致浪費在何種政治性的考慮上面。

是由我們兩人認爲在實際上是最好的戰略而促成的，這可以委託聯合國軍和歷史來裁判。這是一場而大膽的戰略，可以對付每一能爲英美所發動的運動力量，考慮到海洋上船隻的限制，海陸戰事的特殊條件以及開戰以來我們所徵集的精壯的性質和訓練情形。

以個人而言，我常常想第三戰場外還想到第三戰場。我常常以爲西方民主國應該和蘇聯一樣，以優厚作戰而不以單拳作戰。我相信在羅斯福總統和英帝政府（我認爲代理人）的權力之下所造成進兵北非這一偉大行動的事。這一行動已經有了豐富的效果。非洲的動了，所有在非洲的德軍部隊都消滅了，至少有五十萬俘虜落入我們手中。在三十八萬六千光輝戰役中，我們佔領了軸心軍四十萬人以上防線的西面里。

墨索利尼被推翻了。意大利的戰爭衝動反消滅了，這個可憐的國家由於自身容許被引入歧途，付出了驚人的代價。

大批德軍最近從法國調到意國或駐紮意大利人，米德爾利德變成戰場，使戰爭進到德國本土。德國空軍一大部分已自蘇聯戰場調回，正和不斷增進的英美加空軍日表作戰，被消耗着。

在地中海上，在我們在空中對德國的攻擊中能，我們都卓著成績。空中轟炸削弱了希特勒的防禦，而且（即首領說到這里，說得很慢而在深思熟慮狀），空襲的規模和準確性，都將一天天地增加。

我準備承認，如果沒有蘇聯的偉大勝利，上述各點是無從實現的。人類自有政府以來，從沒有像蘇聯政府那樣之利希特勒加於蘇聯的深重而殘酷的創傷而依然存在的。而由於斯大林元帥的領導，由於英國人民當年的獨力作戰，由於美國各種軍火的接濟，蘇聯不但不僅救而復元，而且正在了福國軍事以全世界其他軍隊做不到而做到的。歐洲正在發生的重大而驚人的事件，是蘇聯勝利的結果。而且，我相信，也是英美軍隊對意大利

自由米蘭「電台廣播

號召意人武裝抗德

要求政府，倚靠人民，信賴人民，把民族中一切健康的力量，團結在政府的周圍。

(新華日報莫斯科十三日專電) 伯爾尼訊：秘魯的「自由米蘭」電台于九月十日廣播如下：

意大利人，同胞們！

現在對你們說話的聲響，代表着不同社會階層不同黨派的人們。三年以來，他們每天號召你們反對法西斯專制和外國侵略者，以解救我們的國家。在七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勝利以後，把意大利從法西斯和墨索里尼手里解放出來以後，現在又得到了第二次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我國再不是希特勒德國的附庸國了，我國再不和偉大的民主國家打仗了，他們正在爲了擊潰德帝國主義，爲了消滅法西斯主義而作戰。

我們以深深的感激，向我們的愛國同胞致敬，他們不屈不撓，不曾自由犧牲或生命危險，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戰鬥了兩年多。我們嚮往過去數星期內和法西斯匪徒作戰而倒在米蘭和其他城市的巷戰中的人們致敬。這些英雄！偉大的自由和堅強的意大利人民萬歲！意大利終於參加到歐洲的自由國家羣中來了。

以感謝之情，我們嚮往民主國家的武裝部隊弟兄們的救護，他們幫助我們給法西斯主義以致命的打擊，他們現在在我們的領土上前進，以結束反對希特勒專制軍隊的戰鬥，以保護我們的和平。我們

特別向偉大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致熱烈的敬禮，他們的軍隊英勇地戰鬥了兩年多，給希特勒及其附庸國的戰爭機構以致命的打擊，爲全世界的勝利、自由和平準備了基礎。我們決不能忘記，要沒有莫斯科、斯大林格勒、頓河、奧勒爾和頓巴斯

的勝利，我們今天是不會自由的。同胞們，我們經歷了艱難痛苦的鬥爭和犧牲的道路，現在瞻望前途，充滿希望。我們務必達到最後的目的。這目的就是我國的完全自由和平，完

德寇還霸佔着國土

全國人民緊急動員起來

跟盟國軍隊並肩對德國侵略者作戰

武裝同胞們！這是做不到的！武裝同胞們！和德軍作戰，努力在我們的國土上驅逐並消滅他們，在我們的邊境上擊退他們的攻擊……這是目前全意大利人民的迫切需要和神聖責任。只要我們不荒廢時間，我們是能移攬回我國的自由，獨立，和平和光榮的。只要我們拿槍武器起來和民主盟國的軍隊並肩對德國侵略者作戰，自由和光榮的道路依然敞開在意大利之前。

全消滅法西斯暴政的一切殘餘，在真正民主的條件之下復興我們的國家。這是今天大家必須奮鬥的目標！

希特勒的軍隊還在我們的國土上，在受到痛擊而狂怒之下，他派遣了新的部隊來對付我國，攻擊我們的邊境，佔領我們的鐵路、海港、工廠和城市。希特勒打算利用我國作爲他保衛德國的基地，蹂躪我國。希特勒打算恢復法西斯暴政。這是決不可

以的！也做不到的！公民們！爲了驅逐德軍，並且給法西斯暴政以致命的打擊，爲了迅速獲得和平，這就有新的普遍動員和武裝全國國民的必要。爲達到此目的，我們要求從政府和軍事統帥起至最低的國家機關止，每個人都有採取緊要步驟的必要。動員全民族，驅逐外國侵略者，消滅共在我們國內的奸細。要救意大利要在反德鬥爭中有決心、勇氣和紀律。這些就是今天的口號。

意大利今天需要的政府，是公開而毫不遲疑地保衛意大利，反對希特勒侵略的政府。如果巴多格利奧採取保衛民族的政治路線，人民是擁護它的。但我們有權利要求政府要倚靠人民，信賴人民，把民族中一切健康的力量團結在政府的周圍。政府的一切措施，其目的要是真正在組織反法西斯鬥爭。都必定會得到一切公民的擁護。同時，我們希望政府以激烈的辦法來根絕法西斯和德方的第五縱隊。我們希望政府立即恢復民主自由，這樣，人民才能夠組織起來，發展爭取國家生存的鬥爭的主動性：立即把墨索里尼、齊亞諾、博台、格爾第以及其他一切法西斯黨國賊處死，激烈地洗刷軍隊和國家機構，驅逐法西斯第五縱隊，立即沒收我國內的德人及其走狗的一切財產，採取和民主盟國英蘇美友善和合的實質政策，反對意大利的敵人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

公民們、工人、知識份子、農人、婦女們，團結起來！組織全民族的堅強陣線，要求自由、要求聲援並消滅法西斯主義，反對德國人站在我們的國土上。在各城、各鄉、各港口，在鐵路上，在邊境上，要把你們自己的主動性拿出來，採取一切辦法擊潰德軍，驅逐德軍，消滅德軍。拿起刀槍，和我們的軍隊一起，組織巷戰和游擊戰，實行牽制行動以粉碎德國的戰爭機構。無情地消滅賣國賊！

工會和工廠委員會領袖以及工人大眾們，站定在為民族自由而鬥爭的適當的崗位上。農人們，前進！團結在我們的政治組織和職工會周圍，爭取我國的獨立和光榮。趕走外國人！救國家！打倒賣國賊法西斯們！意大利人民團結、自由和獨立萬歲！正在起來勝利地走向復興的意大利萬歲！

真理報論：

意大利投降的前因和後果

意政府帶着它的武裝力量，根據經由大不列顛、美利堅合眾國、和蘇聯批准的軍事條款，無條件地投降了。盟國武裝力量有意大利之盟約的敵對行動已經停止。

這個具有偉大軍事和政治重要性的事件首先和蘇德戰場上紅軍的英勇鬥爭有關，和它的勝利有關。這個事件在時間上和紅軍在頓內次盆地對輝煌勝利不謀而合，這決不是偶然的。

在自我犧牲的英雄鬥爭中紅軍給予希特勒作戰機構以堅強的一擊不振的打擊。大家都知道：在紅軍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夏季攻勢期間，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一下德國法西斯軍隊吃了戰史中最大的敗仗的結果，蘇軍已使敵人受了無可彌補的損失。在冬季戰役期間，希特勒軍隊所損失的人員，單說陣亡的和被俘的就有一百二十萬。在一九四三年夏季戰役的兩個月中，希特勒軍隊的官兵已死傷了一百五十萬。

在蘇德戰場上，不僅使德軍，而且更使希特勒附庸國軍隊——意軍，匈軍和羅馬軍中最精銳的部隊，也都受了最嚴重的打擊。在蘇德戰場上，意軍已把它的精銳的「拉之那」師，「塞雷爾」師，「卡塞利西」師，「斯福塞斯卡」師，「帕蘇比奧」師和「托寧諾」師等等都喪失了，約有廿萬精銳的意軍永遠不能從蘇德戰場上重返意大利了。這就是意味：不僅只是希特勒德國的，而是整個德意聯盟的人員和裝備，已在蘇德戰場上消耗過半了，相繼毀滅了。

蘇聯人民和它的紅軍的英勇鬥爭，曾使整個歐洲的發展中產生了第三個高潮。法西斯陣營不覺已陷在嚴重危機的支離之下。

德國軍隊在斯大林格勒的慘敗，使我們盟軍在非洲的勝利有了可能，這使到了打擊意大利的必需要先決條件。當盟軍在西西里登陸，直接的威脅直向希特勒的時候，墨索里尼不能得到希特勒德國的任何援助，因為德軍的主力，他到最後優秀的部隊，都動員到蘇德戰場上來了。紅軍使那些被盟軍到蘇德戰場上來的希特勒軍隊所受的打擊，已使希特勒德國的作戰機構受了重創，這就使她不可能給予強盜軸心中她的伙伴以任何實質上的援助。

希特勒德國對於她的一九四三年夏季攻勢，作了決定性的孤注一擲。紅軍在奮不顧身的鬥爭中，粉碎了希特勒的夏季攻勢計劃，並且自己改取了攻勢。在奧勒爾和比爾哥羅德，希特勒軍隊所受到的打擊，把墨索里尼從馬上打落下來了。在法西斯意大利，這使希特勒不得不派手把他的意大利盟友希特勒一任命為去擺佈。

意大利所處的國際形勢，以及國內發生的形勢，事實上已使意大利沒有興趣，一步陷在希特勒德國一邊參戰的可能性。巴多格利奧與此時不會獲得外來的希特勒德國方面的任何助力。同時，巴多格利奧也決不能指望國內的支持，因為意大利人民已十分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意志，要對聯合國國家停戰。墨索里尼上台以後變得特別明顯起來的內部政治緊張，不管巴多格利奧與政府採取了一切措施，始終沒有緩和過。反法西斯和反德示威，在米蘭都雅和意大利其他各城市中連續不停。他們的口號便是：「把德寇逐出意大利！」

英蘇工人聯合起來打倒法西斯！

蘇聯職工中央總書記雪維爾尼克在英國工會第七十五次大會上的演講詞

我代表蘇聯工人，謹經由工會大會向英國工人階級致兄弟的敬禮。

蘇聯工會代表團參加大會的工作，是要把蘇聯人民的英勇鬥爭和蘇聯工會在工作告訴英國工人，要在自己這面多多了解英國工人和人民在生產上的努力。這將使蘇聯加強英蘇兩國的工會和工人階級之間的聯系，將更加團結迅速擊潰法西斯，使法西斯侵略者無條件投降的力量。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捩點。如果希特勒德國打敗了蘇聯，那意思就是德國法西斯在全歐洲的勝利，希特勒暴政獲得世界跳板。但希特勒及其助手過份估計了自己的實力。希特勒以驚人地巨大的軍事上的優勢開其罪惡的攻擊。在初期，蘇聯未能利用其強大的實力。動員起來會需要若干時間。在那個時候，我們盟國英美能給我們以精神上的支持。邱吉爾首相的宣言是有歷史意義的，蘇聯人民永遠感謝這個宣言。蘇聯總統的演講會說明了蘇聯人民在反法西斯鬥爭中是並不孤獨的。但當時盟國由於自己剛剛閉殆大量生產軍火，所以並不能迅速地給我們物質上的援助。

在一九四一年的夏季戰役中，紅軍遭受了嚴重的挫折。但這些挫折並不等於紅軍打敗。實戰最高統帥部的計劃，紅軍抵住了大規模的攻勢，在這一

頑強的防禦戰中消耗了並摧滅了大量的敵軍。到一九四一年冬天，紅軍取得了主動權，在莫斯科附近擊潰了德國法西斯部隊。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的第一次大敗仗。雖然，蘇聯人民並沒有因此得到結論說德軍完了，勝利會很容易地取得。蘇聯人民確實地估計敵方的實力，知道敵人依然強大，敵軍僅僅在東線作戰，依然可能集結充分的力最，進行新的冒險。

而一九四二年夏天，果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利用歐洲沒有第二戰場，德方從西線抽調了十個精銳的師團到蘇德戰場，這樣在西南方和南方造成了實力上巨大的優勢。結果，德軍終於獲得某些戰術上的成就。然而在伏爾加河斯大林格勒城附近，紅軍給予法西斯軍隊以歷史上空前未見的打擊。斯大林格勒的史詩，將永遠以蘇聯人民的英勇和堅毅，以最高統帥斯大林和蘇聯戰術而照耀青史。這樣，希特勒德軍在第二年的戰鬥中在人員和配備上有巨大的損失，而並沒有得到領土。

在冬季攻勢之中，由於紅軍的打擊，希特勒的戰爭機噐開始崩潰，開始動搖了。希特勒就不得不拚命設法避絕他的軍隊的災難。利用了歐洲大陸沒有第二戰場，他又從西歐抽調三十多個師團，以補充他在哈爾科夫被打垮了的部隊，這樣來使他避免災難。紅軍的一九四二——四三年冬季攻勢，是登

復明顯的，在這種情況下，當盟軍採取正當的措置時，意大利是決不能夠抵抗的。英美軍隊在意大利本土上登陸，巴多格利奧政府及其武裝力量接濟就無條件投降了。

意大利已不再充當希特勒德國的盟國，這就給予希特勒聯盟以一蹶不振的打擊。毫無疑問，意大利的無條件投降，必將對那些依然停留在希特勒的損益聯盟中的歐洲他的盟友和幫兇犯造成極端強烈的印象。意大利的命運，便是對他們警告的榜樣。當他們遭到困難的時期，他們也同樣會被人拋棄，一任自己聽天由命。希特勒德國的威信已經一落千丈，而且今後更要弄到威信掃地，這是她正在蘇德戰場上吃虧敗仗的結果。

意大利本來一心指望能夠輕易地盜取贖物，所以才站在希特勒德國一邊參戰，如今已被打得退出戰爭了。希特勒聯盟的計劃繼續崩潰。意大利的投誠更加深了希特勒德國的國際孤立，使她的軍事和戰略形勢尖銳地趨於惡化，紅軍的最重大的勝利，以及英美軍隊的勝利，已造成了給予希特勒德國致命打擊的一切先決必要條件，已造成了從速爭取勝利的一切先決必要條件，意大利的無條件投降，使這個任務的實現更加容易了。

蘇聯人民因為紅軍在頓內次盆地對德寇取得了新的偉大勝利，都感到正當的喜悅和榮譽。如今已為盟國武裝力量給予共同敵人——希特勒德國以決定性的打擊，造成了空前有利的條件。關於紅軍在頓內次盆地取得新勝利的捷報，和關於意大利投降的喜訊同時到來，這個事實就指示出，敵人已經越趨越窮了，他正經歷着嚴重的危機，他正瀕於完全的破滅。蘇聯人民確信：對敵人取得最後勝利的日子已越過越近了。（塔斯社稿）

個戰爭的轉捩點，明顯地表明了蘇德戰場上力量對比的变化。不請希特勒如何進行「總」動員，他無須補損失。

德軍把很大的希望寄託在今年的攻勢上，然而也失敗了。蘇軍不但不對進攻攻勢早有準備，而且進行了反攻。現在蘇軍進行攻勢，崩潰了許多城市，把飢餓和奴役之中的蘇聯公民從法西斯暴政下解放出來。蘇聯大砲吼聲已經到達萊茵河兩岸了。

紅軍的成就和德軍攻勢的失敗，不僅對於蘇德戰場是重要的，對整個戰爭，也有巨大的影響。這一次說明了力量的對比，究竟對哪方面有利。

這就是二十六個月來蘇聯人民和勇敢的紅軍的鬥爭和勝利的情形。

蘇聯人民在廣大的戰場的成就上，不過是他們英勇無比鬥爭中的一部份。決定前線的勝利的，是後方。紅軍所以能夠得到全世界現在都知道了的勝利，是由於無私地勞動着和全心全力支持着前線的後方。從戰爭的第一天起，斯大林就要求後方去參加和平時候的清潔，轉入以戰爭為基礎的工作上。蘇聯工會把一切活動重新組織，保證以一切為勝利所必需的東西供給前線。

蘇聯工會工人和工程師們組織在不斷增加勞動生產率的鬥爭中。它領導的全國性的社會主義工作競賽激發了工人和工程師的主動性。在增加勞動生產率方面，蘇聯工業獲得了輝煌的成就。不妨舉兩個例子：生產坦克、飛機、大砲、機關槍、迫擊砲和彈藥的工廠，現在產量要比以前多許多倍。光是去年一年，飛機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軍火工業增加百分之十五，重機器製造工業增加百分之十一，坦克工業百分之三十八

，電氣工業百分之二十七，製衣及製鞋工業多至百分之五十。

除了工業的改進和軍火產量的增加，我們特別在戰爭第一年中中的艱鉅任務是要把許多工廠從前線區域疏散到內地。英國工會代表齊特林，哈里遜和索萊當一九四一年訪問蘇聯的時候，曾經見到遷移的情形。而在他們最近一次訪問蘇聯的時候，他們看到了這一疏散的工廠早已在後方開工。蘇聯工會對這個極其重要的任務，曾費過很大的氣力。

我國也有供應勞動力和訓練新工人的困難問題。工會積極地解決着這些問題。蘇聯工會在加強紅軍戰鬥力方面起着直接的作用，例如，全國的休養所和療養院是工會支配的，因此工會為成千成萬的紅軍負傷官兵組織的醫院。關於這一點，我對英、國工人階級和工會經由蘇聯職工中央送給蘇聯的藥品和醫療器械的援助，深感感佩之意。哈里遜和戈德神父在訪問我們的醫院的時候，已經看到了這些東西的用途。這些東西是完全用在負傷戰士的身上的。醫院和工會的工作，可以用下列數字來表示：負傷戰士之中有百分之八十六是完全康復之後又上前線戰線的。

工會援助了一些紅軍和紅海軍部隊，以自己的經費，工會建造了許多飛機隊和坦克隊。光是今年，他捐助了一萬二千五百萬盧布，作建造飛機和坦克之用。

工會擔任將來紅軍戰士的體格訓練的工作。譬如工會今年舉起的夏季越野賽跑，就有約九百萬人參加。去年冬天，工會的運動團體訓練了一百萬個滑雪家。至於工會對於工人發明，生產合理化，生產會議，國庫行，社會保險，勞動安全，兒童康樂，俱樂部等等的貢獻，不必詳細列舉了。

工會活動的主要目的只有一個——加速打敗侵略德國及其附庸。

蘇聯二十六個月以來的反希特勒戰鬥有些什麼成果呢？由於蘇德戰場上的戰鬥，德國帝國主義以侵蘇聯人民的賭博計劃完全失敗了。過去一年，德軍未獲得任何成就，反而在蘇德戰場上，在埃及、里比亞、的利波里、厄尼西亞、西西里以及現在在意大利遭受了很大的軍事失利。不僅如此，今年德軍在蘇德戰場上攻勢的失敗，蘇聯軍上兩次多季攻勢勝利的果實，這證明了希特勒德國的軍事力量在基本上被削弱了，證明了德軍現在遭受着嚴重的危機。在德國內部，德國人停止相信希特勒的神話，在歐洲淪陷國家內，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爭一天天擴大規模。法西斯德國在國際上日益孤立，法西斯國家正在崩潰的邊緣上。

反希特勒聯盟的蘇美英法組成了。兩年多以來，希特勒德國的主力兩百多個德國師團和三十個附屬國師團被牽制在東線，蘇聯給予英美以發展軍火生產、動員人民和建立大軍的可能。這樣，在過去兩年的戰爭中，軍事、政治和國際局勢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德軍在嚴重的危機中，英蘇美聯盟的人民和政府應該使德軍的危機變成崩潰。紅軍今天牽制着德軍主力的勝利戰鬥，為我們盟軍向歐洲大陸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造成了比今年春天更有利的條件。

因此勝利的遲早和戰爭時間的長短，就要看盟國對歐洲本土的攻勢作戰的遲早而定。換句話說，歐戰第二戰場開闢得愈早，戰爭時間愈短，反希特勒聯盟的犧牲也愈小。這不是因為沒有第二戰場，希特勒德國早在一九四二年就被打垮了。由於希特勒沒有西線後顧之憂，他才能在今年年初把三十多

個精銳師團抽調到哈爾科夫區域以補充其打垮了的部隊，這樣避免了倒臺。戰爭將拖延，希特勒德國的崩潰將延遲，如果一九四三年內不開始歐陸第二戰場。

對於蘇聯堅持歐陸第二戰場，也許有人會不大清楚吧？那是容易說得明白的。英蘇美聯盟成立之初，就是東西夾擊希特勒德國的戰鬥同盟，兩年以來，爲了英蘇美共同的勝利和歐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蘇聯在奮勇作戰之中承受着德軍的主力，犧牲了數百萬最優秀的兒女。兩年以來，幾千百萬蘇聯人民在德軍蹂躪之下受着極端的痛苦。他們對第二戰場怎能漠不關心呢？因此，當你們的齊特林，哈里遜和皮萊來到蘇聯，他們到處聽到人們談論着第二戰場問題。

英蘇工會委員會今年在莫斯科開第三屆會議的時候，曾經討論過第二戰場的問題。其時蘇聯代表團認爲開闢第二戰場的最有利的條件是存在着，而第二戰場的開闢，不惟對蘇聯人民有利，對希特勒蹂躪下的千百萬痛苦的歐洲淪陷區人民，也是有利的。要沒有歐陸第二戰場，打敗希特勒德國是不可能的。蘇聯人民很感佩盟軍在北非、西西里以及今天在意大利南部所處之勢。他們密切注意着英美的盟國空軍對德國工業區的大轟炸。他們以誠意的感激來接受盟國的軍火及食糧援助。然而蘇聯人民並不以爲孤立的空中攻勢就是第二戰場。我們對第二戰場有個具體概念，就是如斯大林遠在一九四二年秋天所說的要牽制約六十個德國師團以及一些德國「盟國」的師團的西線戰場。因此，我們說第二戰場，並不是牽制敵軍八個師團或十個師團的戰場，而是從東線牽制去敵軍三分之一或至少四分之一個戰場。

有鑒於軍事、政治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英蘇工會委員會第三屆會議也討論過加強活動的問題。蘇聯工會認爲英蘇工會委員會必須加強活動，特別是關於團結反希特勒聯盟國家內的工人階級，以迅速打垮希特勒德國及其助手的事情。英蘇工會委員會必須邀請北美美洲的國家以及希特勒奴役之下而其人民是和英蘇美聯盟站在一起的國家如南斯拉夫、波蘭、法國、捷克、比利時、荷蘭、挪威、希臘等工會加入英蘇工會委員會。

關於擴大英蘇工會委員會成份的問題，已經有許多國家的人提出，他們以爲不惟爲了迅速擊敗共同敵人希特勒主義，這是必要的，爲了工會積極參加解決戰後問題，這也同樣是重要的。工人階級在戰時相互的了解和團結，使英蘇工會委員會覺得戰後關係的重要的先決條件已經造成了。愛好自由的國家內的工人們不止一次地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看到必須團結力量，儘速擊敗共同敵人，造成戰後友誼關係的順利條件。工會及其領袖們必須使他們滿足。

在戰爭中，各國工會，特別是英國和蘇聯的工會積蓄了極多的政治經驗，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些經驗來加速擊敗敵人。盟國工會的積極參加聯合工會，將使我們更增加戰時生產，使希特勒奴役之下的國家更積極和法西斯暴政鬥爭。而盟國工會的聯合工作的經驗，將在世界組織和戰後建設問題提出來的時候生出果實。

我深信我們兩國的工會和工人階級將在反對希特勒暴政的決定性的鬥爭中並肩作戰。我們的共同戰鬥，會每天擴大反希特勒主義的戰士的行列。
(新華日報莫斯科十四日專電，以補譯)

(上接四八三頁)

保加利亞曾經由俄國的援助而獲得解放和生存，而在過去三十年中，保加利亞會兩度被罪惡的統治者引入歧途，這反了本身的利益和意願，被迫陷入慘絕的深淵。鮑里斯的死，說明了罪惡就是死亡，足以爲後人啟鑒。
現在更應該記住南斯拉夫人民爲了保衛祖國的光榮反抗，希臘和其他國家愛國份子的工作，巴爾幹各國已經燃遍了，意大利的迅速崩潰，將形成一個因素，這因素會給予各不可征服的民族以希望和日益臨近的援助。

我展望前途，深信南斯拉夫和希臘總有一天重新獲得隨着生活的自由，決定其自己的命運和選擇其自己的政府。希臘和南斯拉夫的國民在他們的奮鬥之前決不鬆縮，我們希望他們在他們的解放了的人民的自由選擇之下恢復他們的國家。
美國、澳洲和紐西蘭的部隊現在順利地在太平洋對日軍作戰。英國的主要任務目前限於歐洲。(譯註：據英大使館新聞處電，這一句是：「英國的主要任務現在印度前線和印度洋」。)像在北非證明極其成功的聯合國總部一樣，英美在歐陸戰場已經成立的海陸空軍聯合總部。
路易士·蒙巴頓爵士已被選任爲總司令。蒙巴頓爵士確以只有四十三歲。在現代的戰爭條件下，以這樣的年輕而擔任這樣重大的軍事職位，是很難得的。凡從事軍事工作的人，如在四十三歲尚不知軍事爲何物，則將來也不至於會知道得更多，在擔任合作作戰首腦的人物的時候，蒙巴頓爵士已經表現了他的才能和機智。

凡屬人類，儘管最聰明而最精於計算的，並不能來就肯定地明白他們的利益是什麼——然而，很多簡單的人，倒是生來就明白他們每天的責任是什麼。
這就是不列顛聯合國與帝國、偉大的美利堅會衆國、廣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不屈不撓不可征服的中國人民以及一切聯合國國家遵循的道路，我們將遵循這道路，直至我們的工作完成，直至全世界所希望，以信念，以良好的情緒，以高貴的思想從戰爭轉入永久的和平。



共產國際是為加強盟國團結而解散的嗎？

編者先生：我是二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我自童年至高小畢業的過程中，由我鄰居的長一輩的同志來教育我，指導我看書學習修養，我的思想被逐漸轉變過來了，同時又覺悟起來了，至初中一年級時，我有一個很好的同志，他介紹書報刊物給我，令我

加緊學習進步，由於這樣，我就不知道什麼原故，很歡喜看理論，政治，哲學，文學的書籍，以及新華日報，貴刊的刊物，同時也很喜歡聽他講邊區的事情給我聽。

賀芳敬上八月十五日

我們對於你這種誠心求學的精神，很是感動。我們報紙和刊物特設信箱一欄，目的就是在幫助讀者解答一些問題；你或你的朋友們，假如在讀書或生活當中碰到一些問題，不能解答，大膽的寫信給我們，即是問題提錯了，也沒有什麼可笑的。你想想，假如你心裡有一個問題，即使是你那問題說穿了不成其為問題，你把它放在心裡不提出來，那不是永久還是一個問題嗎？大膽的提出問題，在研究學問的時候，是沒有什麼可笑的，因此我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向我們提問題，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我們一定會回答的；而且問題的性質不拘，書本上的問題也好，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我們也願意能經常的幫助你。

在我這裏，還有三個同志與我同時一起學習工作，研究討論問題，在我等文化水準，政治水平較低的同志在一起來學，事實上很困難，因為我等初看理論書籍，對於某一問題很難了解，甚至連名詞有許多未能清楚，又怎樣才能得到留心國際局勢！同我很好的同志，他又在城裡工作，我的學校在鄉下，距離很遠，而且我又不知道他的住址，很難去找他；但事實上，他的文化水準政治水平比我高得有限，有時我提出問題，他也不見得能解答。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怎麼辦呢？自己想想，繼續努力下去便得，但我覺得這不夠，我想起了，往往看見新華日報，與貴刊裡有信箱一欄，但我不知信箱是什麼東西，在形式上寫到，讀者向編者答，但我不知關於什麼內容的始有資料提出作為問題，現在我覺得學得不怕人家笑，硬着頭皮，應厚厚予，提出幾條問題來信請 編者先生解答！

希為原諒！

下面就是我的問題：

- (一)關於第三國際解散，為什麼應說是環境需要，可以促進盟國團結呢？
- (二)九一八以後遠東局勢如何呢？
- (三)現在邱吉爾訪羅斯福，為什麼斯大林與

賀芳先生：八月十五日的來信收到了，看了之後，我們對於你這種誠心求學的精神，很是感動。我們報紙和刊物特設信箱一欄，目的就是在幫助讀者解答一些問題；你或你的朋友們，假如在讀書或生活當中碰到一些問題，不能解答，大膽的寫信給我們，即是問題提錯了，也沒有什麼可笑的。你想想，假如你心裡有一個問題，即使是你那問題說穿了不成其為問題，你把它放在心裡不提出來，那不是永久還是一個問題嗎？大膽的提出問題，在研究學問的時候，是沒有什麼可笑的，因此我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向我們提問題，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我們一定會回答的；而且問題的性質不拘，書本上的問題也好，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我們也願意能經常的幫助你。

第一，你問，共產國際解散，為什麼應說是環境需要，可以促進盟國團結？關於這一個問題，我想你是弄錯了，共產國際的解散是因為當時的現實形勢已經改變了，共產國際這一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能適應這一個改變了的形勢，因此它有解散的必要；因此你看到：共產國際的解散並不是因為要促進盟國的團結；共產國際之所以解散有它獨特的原因（關於這一點請你看本報八卷十期于懷先生的一「共產國際的解散與世界政局」第一段）。不過，另一方面它的解散即有促進盟國團結的作用。為

什麼有這個作用呢？斯大林在他的五月九日答覆者問裡解釋得很清楚，他說「它（指共產國際解散這一舉）——引用者）把希特勒份子硬說一真對一有意要干涉他國的政治，並且有意要使他（指波蘭）維克化」的謠言暴露出來，現在把這謠言制止住了；我想你在你的週圍一定也聽過這謠言的，他到說中國共產黨是只顧蘇聯的利益，不顧中國的利益的，因為它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共產國際工具，這種話激發激尾的無根據的謠言，現在由於共產國際的解散，這種謠言不能再起作用，不是很清楚的嗎？有了這一點，那麼中國和蘇聯的邦交就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這不就是共產國際解散有促進盟國團結的作用的具體的一例嗎？

第二，你問，九一八以後的遠東局勢如何；這一個問題太大了，要詳盡的說明九一八以後的遠東局勢，非得寫一稿論文分析不可，這顯然是辦不到的。不過，九一八以後，遠東局勢的變化雖然複雜，但是一個大致的趨勢卻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說從九一八起，日本法西斯強盜已經開始了大規模的侵略行動，在這一路上，日本實在是在法西侵略者——德意日——的禍首，但當時的列強，除德意蘇聯，都沒有識破這一點，我對說沒有識破這一點，不是怪他們沒有在當時就打日本，而是說他一點，在他對可能的範圍之內用外交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去制裁日本，我們知道當時的國際力量是去不

激的實行起來，在這當中，不論在國際的會議上，本，或對日禁運的問題上，蘇聯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所以說，這一個悲劇的局勢，是站在我們這邊已經結束了。

第三，你問，邱吉爾訪羅斯福為什麼對斯大林和我們的蘇聯長不談；從表面上說，八月中的魁北克會議是英美之間的一個會議，而且主要是討論太平洋戰局的，斯大林自然不能被邀，至於我們的蔣主席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已由我外長宋子文代表參加，自然也就不再發生出席的問題；至於關於形，我們向你介紹本報八月二十七日的國際述評，在那裡，你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解答。即此說

本期零售貳元

內政部重發新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重慶市國貨雜誌社發行部
 重慶市中二路一二一〇號

衆 群

卷 1 第 1 期

目 要

臻榮聶

論敵後抗戰

正子薛

蘇德戰局的展望

若沫郭

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

谷友沈

這就算批評麼

職 林

大眾語新論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羣衆第八卷十七期

培養民力·切實救災（社論）

時論

蔣夫人論民主精神（四九四）——尊重民意（四九四）——糧食徵借與庫券處理（四九五）——斯摩稜斯克之捷（四九六）——東條狼狽了（四九七）——把握時機，協力作戰（四九六）

專載

論敵後抗戰

專論

聶榮臻（四九八）

論世界戰局新形勢

于懷（五〇〇）

蘇德戰局的展望

薛子正（五〇三）

研究與批判

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

郭沫若（五〇六）

中國文字音樂性的秘密

尙人傑（五一二）

大眾語新論

林曦（五一四）

這就算是批評麼？

沈友谷（五一八）

書報評介

從科學到哲學

李溥（五二四）

文獻與資料

我國憲政運動回溯

（五二七）

保加利亞往何處去？

季米特洛夫（五三〇）

社論

培養民力·切實救災

在這次參政會上，參政員們對各省的災情都發出了急迫的呼籲。從最近賑委會所公佈的救災概況裡，我們也看到全國的受災地區是相當廣泛的，中原不待言，即東南、西南與西北各省中亦有不少災區；而災情的種類，則有水旱蟲荒等等，更加上敵寇進犯，給災後的同胞受到雙重的苦難。當日時艱，想起「一家盡在秋風裡，九月衣裳未剪裁」的啼飢號寒的災區同胞們，我們實不勝其關切與繫念之情。

各省災况之重，以持續了一年多的豫災最為嚴重，旱災之後，繼之以蝗災，麥子看不到手，又遭到了黃汜，黃汜未已，又遇淫霖，瘟疫盛行，疫病蔓延，我們不難想像災胞們在飢病交加下，拚死掙扎的那一種慘慘場面。最近，河南各界為籌劃有效的救濟豫災，成立了聯合救災會，以喚起社會一般人士的注意，就可見災難還沒有離開中原，我們還必需為救災救胞而呼籲。在災荒的現象中，最值得我們關心的，是災區農村經濟情况的重大變動，一方面是災胞們再生產能力的被破壞，另一方面是高利貸的猖獗，土地的空前集中，而投機之風會不少。特別在粵東的災荒中，在這個一向缺糧的地區，官僚奸商們竟不顧人民的死活，幫助敵寇去套購糧食；而災胞們則受兒彈女，想不得一飽。從東南的粵桂閩諸省邊境，一直到西北的陝甘寧新的幾千里公路上，我們都看到災胞們顛沛流徙，去尋找自己理想中的「安樂鄉」，「老弱轉徙平溝壑，少壯散放四方」，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的農村經濟受到破壞，而農村則是支持抗戰的中心。今日，培養民力，切實救災，真應該是全國上下一致努力的迫切任務了。

過去，政府和人民對救災難也有過一些措施，如急賑的發放，豫省撥欠田賦的豁免，各省同鄉會和救災團體力竭聲嘶的呼籲，人民的踴躍捐款甚至友邦人士的關切與援助；但這一切，都還未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真是所謂「杯水車薪」，「遠水救不得近火」。以今日災區之廣與災胞之家，我們應該

怎樣有效的籌劃救濟，這不僅只是豫省各界面臨着的一個現實問題，也應該是全國共同關心，共同籌謀解決的一個問題了。

我們在新華日報上，曾經看到敵後和西北有些地區救災應有成效的一些報導，依據那些成功的經驗，可提出作為今日救災工作借鑒的是：

「救災如救火」，必須迅速的在人民中廣泛的造成熱烈的救災運動，這就可以立即防止災情的繼續發展，因此就必須將災情實況隨時報告給人民，讓該動員人民，組織人民，發揮他們「患難相助，疾病相扶」的民親友愛，來變成一個復甦的力量。這樣，就是災胞們本身，也會在潛移默化的救災熱潮中，激發他們和生合作頑強鬥爭的勞動熱忱，增加自救的信心和能力。

今日，動員全國同胞集策集力來救災，我們的確還有許多應該努力的地方——而這也是抗戰中始終存在着的一個問題，但這不是說，救災僅僅靠人民的動員就夠了；最緊要的，還是如何給予災胞們以再生產的能力。過去豫災的實地中，也曾有消極救濟之外，還有過一些發放糧食，以工代賑的辦法，但這還不足以根本解決問題；要使災胞們恢復元氣，從事再生產，那就必需：在消極方面，嚴厲的制止濫發兼併，土地集中的現象，痛懲那些靠災民發財，剝削災民，魚肉災民的吸血的人們；豁免或減輕災民的一切捐稅。而且積極方面，更應使災胞們有足供生產的糧食，種籽，工具和土地等，要拿出大量的款項來與災胞們謀生的生產事業。不容許賑災中有任何中飽舞弊，遷延時日，或移款他用的事。總之，要使災胞們的人權財產得到切實的保障。這樣，災胞們的生產熱忱自然會激發起來，在災後荒蕪的土地上，重新整頓起自己的舊家園。

救災的工作今日確實太重要了，培養民力，積蓄國力，準備反攻，實在於此。我們應該大聲疾呼：大家多把思想放在這一件工作上，多把力量集中在這一件工作上，但願社會的互助互讓的同胞愛，激發戰時生死相關的風氣，大家那伸出同情的手來，災象是一定可以消除的，災胞們是一定可以得救的！

難夫人論民主精神

根據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定，總統將在抗戰勝利一年以後再實施。也即是說，至少今後數年中，還是國民黨執政的時期。可是，就是在這個時期，人民還是時時刻刻切切需要民主的。

蔣夫人前晚在蔣主席招待國民黨政要的宴會上，曾把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美國的民主精神，帶給了國民黨政員，並且也提到中國需要的民主精神。報紙上登載的雖然很簡單，但是，已經值得注意了。

的確，今日世界有兩種政治思想，一種是民主思想，一種是軸心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這兩種制度和思想是對立的，尖銳的在鬥爭着，而且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搏鬥，二者之間是沒有中間的道路的。不民主，就是法西斯，或者，就會逐漸走上完全法西斯化的道路。「法西斯共和」是墨索里尼的把戲，是對法西斯的擁護，是對民主共和的諷刺。還是法西斯，同盟國家也是一樣反對它的。我們中國既然列入民主國家的陣線，就要認真走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我們反對軸心，就是反對法西斯主義。

關於民主精神，要說和可說的話很多。我們在這裏，祇是簡單的講幾點意思。蔣夫人在報告中說到「民主國家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以後，即可就人民的意見以施政」，同時，她還提到對政府事務要常加批評，這種批評，要負責任，也就是說，「必須於批評之後附以改正的具體意見」，「使政府接受意見而有所遵循」。這是非常正確，非常重要的。要這樣，就須解決到幾個問題：首先，人民要有意

尊重民意

今天中國最緊要的事，是打勝仗。要打勝仗，就要民主團結。今天中國最緊要的事，是打勝仗。要打勝仗，就要民主團結。今天中國最緊要的事，是打勝仗。要打勝仗，就要民主團結。

民意看來是不難懂得的。大家也都曾口裡說着「民意」，好幾人還非顯不顯民主權利了。而且，也還要保留一個議會的名義，弄一羣法西斯黨徒當議員，假設是代表「民意」的。中國歷史上也有這種假借「民意」的。比如，宋世祖徽皇帝，一定要弄些「勸進表」出來，張勳復辟時，叫溥儀做皇帝，也是弄了不少數擁護的國報出來，說這些是「民意」。這些東西，都是捏造的假民意。英美的情形就不同。不管怎樣，人民還有民主權利，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權利。各政黨（共產黨在內）可以公開活動，報紙可以自由說論和公開發行，可以批評和建議政府，可以組織人民團體，不受阻礙，還受法律保障。議會的代表，不管怎樣，是各政黨公開競選，是由人民選舉的。所以，英美的民意有多種多端表現的可能，人選民的代表，不是指派而是舉的。政府也有尊重民意的傳統。

因此單從民意這點說來，法西斯國家和民主國家是絕對相反的。在法西斯國家裏，「民意」是從上至下的製造出來的。「人民代表」是法西斯黨指派的。而真正的民意和人民代表，是不能公開存在的。在民主國家裏，民意是從下至上的自由發表和傳達的，人民代表是人民自由選舉的。也就是說，前者是假民意，真法西斯，後者是真民意，真民主。

中國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是要走上民主政治的，現在真正的民意也是存在的。中國現在雖然沒有人民選舉的國會或議會，中國人民現在享有的民主權利雖然還和英美的不一，真正的民意，却到處都有，到處都表現了出來。敵後雖然被敵人佔領了，但是，敵佔區和我抗戰部隊和人民群眾中，都有救國的熱誠。在抗戰中，在反抗敵人的鬥爭中，和在抗日根據地的建設中的言論和行動，就是真正的民意。在大後方，民意的表現就更不必說了。前方將士的忍受飢寒，浴血抗戰，人民在公開場合或相互交談中，在對各項設施所提的批評和建議中，在對團結抗戰和民主的熱烈呼籲中，都充分的表現了民意。在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建設以前，我們也一定要把眼睛睜大，眼界放寬，到人民中間去接納民意，傾聽民意，更尊重民意。自然，這種辦法還沒有英美那樣，人民享有民主權利，並建立民選的議會來得科學而良好，可是，今天要認真的談民意，却只有這種辦法才真能見到民意。

我們反對法西斯主義，所以要反對假民意，反對那種假民意，製造民意。我們需要民主政治，所以就要知道民意在那裏，怎樣去傾聽，怎樣去尊重！

見。這是不必多加討論的。人民在日常生活，接觸到政府事務的各個方面，因此總是有意見的。好的，他們會稱讚和鼓勵，壞的，他們也會批評和指責，而且，也會提出意見來。其次，要使政府「知道人民的意見」。這點就比較複雜。一方面，要人民能夠說出他們的意見來。如果有一肚子意思，沒有地方說，或者沒有辦法說，那就難免要「知道人民的意見」都無從知道起。另一方面，人民有了意思，不管他說得出不，還要政府中人願意知道才行，否則雖然人民的意見到處都是，應知道的人却還是不會知道。所以，一定要人民敢於說話，政府鼓勵人民說話，熱誠的去「知道人民的意見」才行。最後，人民敢說，政府願聽之後，還要政府積極的「就人民意見以施政」才能使人民的意見不落空。要實現蔣夫人提出的很好的意見，這些問題，是應予注意和解決的。總括以上各點，我們再着重的提出以前曾經提過的一個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和政府，都要有自尊自愛人從尊如流，勿憚改的精神。自己看自己對國家民族的責任，並在人民的立場上，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對政府事務的批評和具體建議，同時，也要願意不摻雜些毫成見的內容。別人發表他同樣經過深思熟慮後所提出來的意見。應該堅持正確的意見，不應該固執錯誤的措置。應該勇於改過，不能一誤再誤。而正確與否，又必以「人民的意見」為最高的裁判者和最後的根據。

蔣夫人提倡負責的批評和負責的接受批評，確是切中時弊的意見。我們願和全國輿論界一道，歡迎和支持這個意見，並盡力協助政府採取具體步驟，使之實現，培養起民主的風氣來！

(新華) 九月二十三日

糧食徵借與庫券處理

正當新穀登場，農戶忙於收穫的時候，一年一次的大田賦徵實，也同時開始了。

兩年來，老百姓對國家的貢獻，可算不少，而在某些徵收的地方，老百姓仍多忍饑縮食，購糧困難，這種對國家愛戴之情與熱，着實令大感奮不置。今年度，四川復以借糧為首倡，放棄三成現金的收受，全部改作庫券，把過去購糧的方式變為借糧的方式。這辦法，單以四川一省而論，使政府在國庫的開支上，就要節省六萬萬元以上。據說，截至目前為止，各省中改徵借糧為徵借的，還有桂、寧、綏、閩、滇、皖等六省。老實說，抗戰中的老百姓，特別是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實無內愧之處。

不過，糧食購山購的方式改為借的方式，那末，對糧食庫券的處理問題，却值得深加注意。過去兩年，對庫券的發放，缺點實在太多。第一，因繳糧與承兌庫券的地方不一，老百姓在甲地繳糧以後，還要到乙地去承兌庫券。如果承兌處擠兌人多，有的老百姓，往往一次兩次均未如願兌到，於是，道遠者多棄而不顧，免到手的，亦感手續麻煩。第二，因庫券等備不周，及至開兌後數月，許多地方還有未領到承兌庫券的，以致老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在費錢費時，結果仍難免徒勞往返，根據四川省府對四川各縣市糧民未領三十年度購糧券辦法看，足證迄今未領得三十年度庫券的人實不在少數。然而考其原因，都不出上述兩點。

因庫券未盡入民手，於是，各省對三十年度庫券繳還的辦法，主張不一，有主張總扣分攤者，有主張移作公糧者，有主張移作積穀者。無謂主張如何分歧，我們以為，為了顧全政府威信起見，分期繳還既成定案，在原則上，仍應依成案執行。執行

之效果如何，僅視事前之辦法是否周密而定。我們同意四川省府總扣分攤的辦法。這辦法，是將本年度應還本息的金額，由各縣倉庫於本年征得實物內一次扣撥，其倉存儲，並交自組之管理委員會管理。糧民到指定日期，即可憑庫券，或證據，向管理委員會換取五聯收據，再持據領取本息。不過，所謂證據，我們以為應包括一切能夠換取庫券之憑單而言，不僅限於承兌處之臨時收據，就是征收處之憑單也應有效，如此，才不致有失公允。

同時，今年度關於庫券的處理辦法，除應早為準備外，最好庫券與申票能同時發給，我們想，只要在事前承辦人員能詳為規劃，預計糧戶之多寡，按保接戶，妥為分配，過去承兌擁擠往返徒勞的現象，定可避免。

至於庫券可否轉讓與抵押的問題，這一點，我們以為是兩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一般糧民對庫券感受不便的地方，就在庫券的用途狹隘，流動性太小。按照四川的情形來說，小柱糧戶實居大半。過去為購糧起點，四川輿論曾多主張以一錢為標準的，省府詳查各地糧戶所担糧額，一錢以上的糧戶並不算多，因此，才改以較重五分起點。也正因為小柱糧戶太多，而這些小柱糧戶因受物價波動的影響，本身又是經濟的受壓迫者，故庫券的轉讓與抵押的問題是值得考慮的。本來，這兩年各鄉村對庫券的轉讓，已成為普遍的事實，許多小柱糧戶為了現金或救濟的急需，咸多廉價出讓，假使政府能一方面顧及大多數小柱糧戶的利益，在法令規定上使庫券的用途範圍增大，一方面更注意到由庫券所代表原被凍結的地主資金，不致因庫券用途增大而信用過份膨脹，採取一適當而合理的辦法，我們以為，這對多數小柱糧戶實堪稱捷徑，或更可使糧政趨於活。

(新華) 九月二十三日

斯摩德斯克之捷

斯摩德斯克的人民，身受了德寇二十五個月的蹂躪和壓迫，現在已經得到解放。他們見到祖國軍隊的勝利，都快樂得不可言喻，忘記了過去所受的痛苦了。

斯摩德斯克已經成了一片廢墟，德寇的罪惡，永不曾隨着人民所受的痛苦而被遺忘，相反的，將永遠深銘在受盡了痛苦的人們的心頭。斯摩德斯克光復了，蘇軍光復的是德寇在西路最重要的戰略抵抗中心地點，是動搖德寇在東線整個作戰系統的中心據點，而不是簡單的一片廢墟！

蘇軍光復斯摩德斯克，是蘇士個師團激烈血戰的收穫。只有希特勒和他的應聲蟲才無恥的說，這不是蘇軍英勇的勝利，而是德寇撤退的成功。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們都應該抗議；這是對反法西斯的最勇敢的戰士們最大的侮辱！這是對法西斯國王撒天下的大謊。侮辱和撒謊，是經不住事實的鐵錘的。看罷，路透社駐莫斯科的記者金氏提供了粉碎一切謠言的鐵錘：「蘇軍目前的攻勢，顯示了蘇軍能夠粉碎最堅強的德軍堡壘，當正面攻擊不能避

免時，紅軍的步兵在排砲的掩護之下加入戰鬥，排砲往往打到離步兵只有二百碼的地方，同時，蘇聯轟炸機丟的炸彈在砲彈的前面不過三百碼。」有人唱歌唱着「第二個斯大林格勒沒有了」，然而，正是這斯大林格勒人的「戰鬥精神和力量的進一步的發揮，把德寇打得個狼狽大敗。不要再厚顏的應聲蟲似的說蘇軍的可笑的撤退吧！這裏，是金氏提供的證據：「德軍拚命抵抗，企圖爭取時間，以建立更多的工事，以備萬一敗退時退到他們所希望的「安全」的冬季防線。」德寇是抵抗的，是拚命抵抗的，因為的確德寇現在最需要的是爭取時間

。這些都不是以說明德寇的勝利，是蘇軍強作戰

「如今，德軍在斯摩德斯克多天的嚴寒，用秋天的軟泥，用夏天的暑熱，或用春天的泥濘的道路，來阻礙他們的進攻了！」嚴寒，軟泥，暑熱，泥濘……，什麼也阻止不了蘇軍的攻勢。德寇是堅強的，德寇又那能擋住百鍊成鋼的蘇軍？更何況，蘇、英、美、的團結是更密切了。三國（還有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參加）軍事——政治委員會成立了，三國外長會議快實現了。東線蘇軍視線的砲聲，愈來愈響，西線盟軍第二戰場的實現，也會愈來愈近。「消滅德寇！」是斯大林的手令，也是同盟國當前最現實的任務。

我們聽見蘇軍大捷，總要衷心熱烈的慶祝一番。然而，視捷的砲聲。也應該振奮我們，從我們回過頭來，而向我們的現實。我們要從盟國不斷勝利中，得到些寶貴的教訓。我們最近時常接到讀者來信，期待着重慶也在什麼時候鳴砲慶祝。這種不耐的期待勝利的心情，是很普遍的。我們感奮，却也更要求反省和努力。我們除了民主團結，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增強力量？除了前線和敵後積極戰鬥，並肩殺敵，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打擊敵人？除了認真切實的求各方面的進步來準備反攻，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爭取勝利？我們今天也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消滅日寇」！為了這個目標，也只有為了這個目標，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大家不怕見到已成一片廢墟的故鄉，但願很快的到達在勝利中忘却了過去多少年所受的一切痛苦的愉快時節！

（新華）九月二十八日

把時機，協力作戰

——讀邱吉爾首相報告

邱吉爾首相對於歐洲戰局的敘說，佔了最大的篇幅。他明白表示了開闢第二戰場的決心。對於「交鋒」的時間和確切地點則稱「當我們和我們的美國盟友判斷這戰場業已成熟之日，我們也一定會開闢的。」他對於大家對第二戰場等待的不耐，亦有微詞，而對他自己的見解，則堅持不移。然而，我們願意提起注意，從邱吉爾首相對歐洲戰局的檢討中，可以得到一個寶貴教訓，就是英美對戰局的估計，過於謹慎，邱吉爾首相也承認戰局的發展，常常較估計為快，有時甚至於出乎意料之外，因此，英美的佈置，和行動，就常常失之過遲，致放棄了時機。不管這種情形是單純的由於謹慎，還是因為政治上的若干因素，影響到了軍事上的估計和行動，我們總覺得這個教訓是血肉換來的，應該深刻的記取。從這點說來，我們毋寧說英美和各盟國人民

在英下院發表戰局報告，詳盡的檢討了盟軍一年餘來戰事發展，和敵我力量對比的大變化。他證明了軸心確有利轉入不利，從強轉弱，而盟國則趨於有利地位，力量也愈來愈強。他的基本精神是謹慎的樂觀，充滿了抗戰到底的決心和最後勝利的信念。

今天世界戰局的重大問題，在歐洲英美盟國西歐第二戰場問題，這是以英、美、蘇的親密合作為基礎的。在太平洋是加強和展開盟軍對日攻勢和反攻的，加強援華，協助中國認真準備反攻的問題，這是以中、英、美的親密合作為基礎的。

東條狼狽了

目前整個戰局的發展，從歐洲到亞洲，同盟國的軍隊捷報頻傳。莫斯科的捷報，不斷在為視聽前線射擊；地中海土英美的艦艇巨艦，正將大批兵員軍火輸送亞東大南南，展開攻勢；特別是在太平洋方面，美海軍更是連戰連捷，對日聯軍事實，深重地打擊了日寇軍閥，更深刻地引起日本人民的不安惶慮，對統治者的厭恨、憤懣。在這情勢之下，東條的確是很狼狽了。

日寇統治者，一向對付日本人民的手段是欺騙和蒙蔽。在太平洋序戰階段，日寇把自己的軍隊描寫成爲「無敵」的軍隊。日寇統治者藉這誇大的欺騙宣傳，來麻醉人民，驅使人民從事瘋狂的作戰，隨後中途島珊瑚海等役，海戰的結果，日寇實際上損失極重，但是始終不願將其相揭露，反而經過情報機關製造出一大堆「勝利」「大捷」的神話，甚至把阿圖島，吉斯卡的登陸，描寫成具有難以估價的重大戰勝價值。日寇軍閥一貫就以這樣的蒙蔽欺騙誇大來誘住人民的嘴，蒙住人民的眼睛，而任意奴役。

可是，不管日寇如何欺騙，不管日寇欺騙手段如何巧妙，那接二連三而來的無情的事實，是決計蒙不住人民的眼睛，堵不住人民的嘴的，日本人民已經知道了純粹在蘇境作狼狽家突的逃脫，意大利的投降，以及盟軍在太平洋上的攻勢是一天猛似一天了。同時，南北太平洋上日寇收退的事實，即使日寇軍閥有蓮花之舌，也不能再吹噓這是勝利了。這無情的事實，怎能不使東條

「時局重大化」這一句話，已在日寇統治者嘴中代替了「勝利」。時至今日，東條不得不使他已坐臥不安的真實的嚴重局勢揭露出來，不能不說出：「英美欲於短時間內，壓倒日本而頻出於反攻之舉」。在日寇統治階級的嘴中，從勝利的謠言到局勢嚴重化的宣傳，這是一大轉變，這也正是潛藏的證明。日寇真已由曇花一現的好景轉趨死亡的這路了。

然而，在東條的廣播演說乃至敵國通過「國政週覽大綱」，以及敵情報局的宣傳加強內部破壞方針，這些都可以看出，日寇是在積極地掙扎，它爲了企圖避免死亡，正瘋狂的加緊總動員，加緊徵兵，加緊生產軍火，並加緊疏散大都市工廠和市民，以應付空襲的威脅。這種垂死前的掙扎，從我軍看，當然可以料定他不能挽救必敗的命運，但是藉此作頑強的負隅以延時日，並待局勢變化，這作用是絕對不能忽視的。所以東條的悲鳴，我們聽了，應該具有「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態度。只有這樣，才能於敵人的掙扎信心外，不存倖勝之心，而能作積極的戰鬥努力。因爲我們必須認識，敵人的困難，不一定就是我們的勝利。敵人不會自己死亡的，必須我們中英美俄等國的海陸空軍更積極作戰，才能摧毀它。現在敵人正圖掙扎，我們就必須

要求趕快開闢西歐第二戰場，是基於更精確的估計和對時機的更適當的把握。不交鋒不算不得戰場的存，而現在正是不能再延遲的交鋒的時機，要儘快的撲滅納粹暴政和管魯士軍國主義，就要求立即執行「我們爲了共同的目的，決不吝惜任何犧牲」的名言，在蘇軍向斯摩棱斯克和基輔大踏步的西進時，使盟軍踏上西歐，向東打去。既不惜任何犧牲，就請大膽的行動吧。三國外長會議，既已商定定期舉行，而年內舉行羅、邱、斯會議之議，亦已加考慮，就請英美與蘇聯以東西配合作戰來迎接和推進這些重要會議，使它獲得迅速的順利的結果，而不要把配合作戰的行動，推到會議之後，使軸心再揮到至少三個月時間！

邱吉爾首相對於太平洋戰場，追述了盟軍最近的戰績，在力量對比上盟軍對日寇的優越，和蘇巴頓上將成立東南盟軍總司令部之意義，並且給我帶來了可喜的消息，說通往中國的空中路線，現正在不斷的延伸和擴展中。然而，對於魁北克會議中曾談到收復緬甸問題，及會議後的發展，則未見提及。我們希望有機會聽到邱吉爾首相發揮魁北克會議重視遠東戰場的精神和在這個決定和精確的對中國戰場的重視和援助。而蒙巴頓上將僅談的東來，並努力取得中英美三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協調，在今天尤爲重要。讀昨日報上電訊，謂麥克阿瑟將軍發表聲明，說明他所主張的戰略，同時，從電訊中所傳麥克阿瑟將軍對蒙巴頓上將之新職「感觸頗深」，說他深信西南太平洋總部在太平洋戰略中已起至次要地位及他所主張的對日發動迅速與大規模之打擊，其「上司」已拒絕採用，而贊成經由緬甸之攻勢等等看來，中、英、美三國的戰略協商，更是刻不容緩。

正像邱吉爾首相所說，目前一切都對盟國有利，却絲毫也鬆懈不得，一有鬆懈，有利的趨勢便會停滯或消遁，生命和資財，也要受到不必要的重大耗費。現在同盟國家只有加緊團結，協同戰略，估計準確，把握時機，大膽而迅速的行動！

（新華）九月二十五日

痛敵後抗戰

聶榮臻

華北敵後之抗戰，迄今已六年多，鬥爭之殘酷實為歷史上空前所未有；就華北之一角——晉冀察邊區而論，其尖銳複雜而劇烈之鬥爭形勢實遠處大後方的人士所想像不到的。迄抗戰六週年為止共計作戰一七四五〇次，共傷敵偽俘虜敵偽三三五、三四人。我亦傷亡六四、六七〇人。一點一滴的勝利都是從一點一滴之流血鬥爭中得來的。

幾年來敵我在武裝鬥爭方面，曾經過許多發展與演變，一九三八年武漢陷落之前，敵人既已開始對我進行進攻，屢次集結優勢兵力，以正規戰術作戰，攻我一面（如阜平，涞源等地）。武漢會戰之際，敵同時大舉進攻我五台，阜平，且將掃蕩華北與進攻武漢相提并論；在戰術上改取分進合擊的數路「圍攻」方式。仍然未脫機械的軍事教條之束縛，我以游擊戰運動戰相輔對抗；因之使敵找不到我固定陣地與固定陣線，而常於撲空之餘，遭我痛擊。一九三九年，敵則集結相當優勢兵力一路，採取「長驅直入」的襲擊我之中心地區（如靈壽之陳莊及涞源之黃土嶺等役），但均受殘滅之打擊。進攻陳莊之敵，全軍覆沒。阿部中將則隨其部下葬身於黃土嶺；就是敵寇所謂「名將瀾太太行山上」。敵以屢次慘敗，故自一九四〇年起，乃實行所謂「極度分散配備」，以控制平原各大村鎮與山地各要點，以冀窒息我軍，奈兵力既感不足，再加分散配備，則弱點愈多。一九四一年百團大戰展開後，不僅敵在山地之若干據點，被我拔除，即沿鐵道，封鎖據點亦均遭我猛烈破壞。在戰術上不僅展開廣泛游擊戰，而且局部的展開對敵陣地之攻擊。於是敵之分散配備亦告失敗。乃復調集大兵「分進合擊」。向我大舉「掃蕩」，并一度侵擾我阜平。但經我運用游擊戰與運動戰配合打擊之下，使侵擾阜平之敵於彈盡糧絕之後，狼狽收場。

一九四一年敵曾圖村鑿於既往之失敗，乃謀改弦易轍，實施所謂「鐵壁合圍」戰術，以中條山與晉察冀為全年兩大戰役進攻目的。經長期之準備，企圖先蕩平中條山根據地，將敵後我軍與主力之聯系，結束後，立即轉其兇鋒指向我邊區，戰鬥一經開始即分十數路直撲而來，山溝小道，無所不至，反響「圍剿」，在戰術上則與「三光政策」并用，殺戮焚掠，兇殘無比。然經我將士之浴血抗戰卒挫敵鋒，縱敵曾圖村亦不得不承認失敗，其謂：「湯×路軍，非短時間所能奏效」。而只得「獅子撲鼠，敵力不大」等通詞聊自解嘲，其意態可想見矣。之後，敵復強調「高度之分散配備」增築碉堡及封鎖溝牆；其密度幾至逐村皆是。封鎖既成後，乃實行其對我根據地之「蠶食」政策。直到今天，「蠶食」政策亦經多次演變，初期「步步推進」，繼則「分區掃蕩」，「分割蠶食」，以達其「蠶食」之目的。一九四二年冀中區之「掃蕩」戰，即屬此種性質。然敵此種緊縮「蠶食」之目的，至今雖已付重大代價而猶未遂其所欲，且亦將永不能為所欲。至其分散配備之結果，愈使敵軍兵力之分散，由於紀律之廢弛，則其腐化，墮落，厭戰，反戰之情緒亦繼長增高，戰鬥力亦日趨低落。如此，我軍縱在堡壘如林，溝牆如網之廣大戰場上仍能縱橫馳騁，游擊戰爭之火，更廣泛燃燒於敵佔區。變敵後為前線，遠近交攻，敵我交鋒，我之鋒更早已越長城榆關而插入低滿邊境，震撼敵人之心臟。戰局之發展將益增敵寇惶恐，而促其敗亡。

六年餘敵我鬥爭之尖銳複雜之形勢，不僅表現於軍事方面；而且表現於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之綜合鬥爭。自一九四一年起敵即開始其所謂「總力戰」，此「總力戰」之表現最顯著者，即敵寇所進行之「治安強化運動」，自一九四一年起前後已舉行達六次之多。其中心則各期不同，就我邊區而言，敵則在其「治安強化」運動中，集中於人力物力之壟斷，及政治上思想上之壓迫造謠，企圖達到其「以戰制戰」之目的。敵以兵力不足到處抓壯丁，被編為

軍，充實守備軍力。現敵佔領區大部份均由偽軍防守，此等偽軍一部份為失業或流亡者之集團，其志本謀利用之於一時，結果多與頑寇，而今敵寇去之不能，欲「肅」之又不勝其「肅」。若于地區，如大清河以內，則其說是「治安區」，無寧說是偽軍統治地，另一部份偽軍，則大部為農村之莊丁，被強迫捕獲而來者，他們既無誠意，又無戰力。尤其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敵寇必敗之勢日漸明顯，遂成偽軍動搖搖搖，日寇也明知其不可信，然不得不利用之於一時，此乃其成軍之危機。敵寇對物力之掠奪，乃圖達成「以戰養戰」之目的，敵寇以「開墾資源」、「確保農產」、「勤儉增產」等類口號相號召，但實際上敵寇之所為，適得其反，敵寇到處挖溝築壩，強佔與毀壞人民田地房屋不知凡幾，而苛捐雜稅勒索勒索，層出不窮，加之莊丁之被抽走或逃亡，致使敵佔區農村或有地無人耕，或有人無地種，或有人而無心耕，終至「增產」成爲空言，經濟之危機日趨嚴重，而我對敵之經濟封鎖，更使敵寇之經濟困難有加無已。敵寇明知敵後人民是與之尖銳對立，乃極力進行所謂「思想戰」，宣揚所謂「皇道精神」，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但「七分政治」之一切欺騙假面具，早被其「三分軍事」之殘酷暴行暴露無遺。「三光政策」之下，遍地血腥，使廣大中國人民益覺與敵不共戴天之深仇，數年來，敵後軍民在對敵鬥爭中，正不知湧現幾多民族英雄，其驚天動地之壯烈事跡，傳遍人民之間，記不勝記。於是敵寇「思想戰」亦宣告破產。此外，敵寇所遺棄者乃在政治上挑撥離間，破壞我軍民中階級關係，離間我抗日軍隊之團結，更無一日放鬆，且以此爲誘餌之重要部份。我們回答敵人的，却是更千百倍的提高了我們的警惕，肅清了各種潛藏的第五縱隊份子，加緊抗日陣營的團結，粉碎敵寇的陰謀。

六、敵後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戰爭是無情的，不戰不能存，不戰更不能勝。我軍採用之戰術基本上爲游擊戰，但此種游擊戰決非零散的「游擊戰」，更非一般保守戰術救條者所可比；也不是僅守過去游擊戰的「老一套」經驗。游擊戰術發展至今日，乃是在既有的戰爭經驗基礎上，再從六年來抗日戰爭中，不斷獲得新的經驗，而高度發展之結果。斯大林說：「在戰爭中不進步者即將爲敵人所擊敗」。這雖指現代最優良之軍用裝備與作戰技術而言（我們固然沒有現代化優良裝備），但我的戰術，必須適應我現有裝備而力求改進，其理則一也。

（一）我民族自衛戰，必須爲全面性之總力戰；爲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相配合之戰爭；若根據單純軍事觀點去組織抗戰，決難收勝；尤以我軍遠處敵後與大後方隔絕，得不到任何補充，極易陷入武器與彈藥之缺乏，若各視各種鬥爭之配合，則不僅軍事上不能取勝，且從其他方面以攻我。須知敵以不窮之侵略戰，對我正義之保衛戰，政治上之優勢在我而不在敵。故我須以政治上之優勢與軍事鬥爭相配合，以對抗敵之軍事優勢，和在各種複雜鬥爭中改變敵我之優劣形勢。

（二）必須真正實現民主政治，給人民以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的生活，真正能動員組織并武裝廣大人民，才能真正發揮總力戰之力量，并使軍民成爲魚水不可分之整體；否則孤軍奮戰，必難獲勝。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即有全國總動員之號召；我們堅持敵後抗戰，六年來格遵此種號召，認真動員組織與武裝廣大人民，參加抗日各種鬥爭，故能堅持敵後作戰以至今日，且將繼續堅持下去，直到最後勝利。

（三）團結乃戰勝敵人之唯一武器，軍隊與軍隊間，軍隊與人民間，均應以抗戰第一，勝利第一爲目的，消除任何不團結的現象，反對任何割削自己力量之行為，不予敵人以任何可乘之機。

（四）堅持敵後戰爭，必須創立賴以憑依的根據地，作爲戰略基地，以遂行獨立作戰之戰鬥任務；無論武裝部隊，地方政權，民眾組織以及經濟文化等設施均必須有完善具體之整頓辦法，更須完全適合敵後鬥爭之環境，不能固於成規，固守舊習，如不明此理，武裝專行否認各種建設，則抗戰之勝利與建國之成功，無不徒託空言；我黨黨綱適行行政當局不備有其各種設施維繫敵後人心，團結並鞏固廣大人民，在保衛祖國的旗幟之下，獲得溫暖；并使敵佔區同胞心嚮祖國，精神上有所寄托，其作用亦非常巨大。

（五）在這樣殘酷的對敵鬥爭中，要能領導各階層人民團結一致的對敵作戰，這就必須有照顧各階級，各階層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我們所堅持的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精神，不但爲少數人着想，更爲大多數人着想，爲全國人民抗戰利益着想。

（六）在敵後作戰之部隊有成功者，有失敗者，因此，我們就必須有嚴正之賞罰制度；虛心檢討其成功或失敗的緣因，得與經驗與教訓。如果賞罰不明，嚴守成規的軍隊，縱令其有充裕之補給與優越之裝備，仍不免受不必要的損失；這種事實，不可不使我黨深刻反省。

當此總反攻時期愈形接近之今日，勝利雖已在望，而今猶之困難亦必更多，敵後鬥爭之艱苦程度更將十倍於往昔。因此，我們亦必須以十倍於往昔之努力以支持日益艱苦的敵後鬥爭，我深切的期望今後我不倦戰鬥之敵後部隊能獲應有之補給與援助；更望全國各黨各派全國實民能真正親密團結，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國之反攻，驅逐日寇出中國，使民主和平之新中國得以早日實現。

論世界戰局新形勢

于懷

(一)

放曠戰局，一如美總統在他的國會咨文（九月十七日）中所說：『最近幾月來，戰爭的主流對我們有利，但是我們不能以眼着這有利的潮流還浮爲已足』，這的確是千真萬確的真理，不幸的是，自從七月以來，我們所看到的却正是一些漂浮政策在左右漂浮。

七月底墨索里尼登台，一時『四分軍事六分政治』即可結束戰爭的空氣頗然高漲，這一暗潮隱隱約約一直支配到不久以前，到了九月初，英美盟軍在意大利登陸，接着巴多格利奧投降，希特勒增援意大利，芬蘭軍遇到了堅強抵抗，這一道『政治解決』的暗流才慢慢的低下頭來（自然，還沒有有死去），不過，不幸的是，代之而起的卻是另一種危機，就是長期化的危機；人們了解到了『四分軍事』解決不了法西斯，但是跟着却又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高，認爲短期內無法予敵人以決定性的打擊。『四分軍事』六分政治』的看法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低，短期內無法予敵人以決定性打擊的看法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過高；這與過高都不是一種正確的估計，作爲戰略的指導原則，這兩種估計對於戰爭的進行都是有害的。

轉瞬的間在意大利，我們從意大利開始。

九月三日英美盟軍在意大利南端登陸，事實上，就是在這一天，對英的停戰協定已經在塞拉雷斯簽了字；由於種種特殊環境的限制（請參看九月二十一日英首相在下院報告），這一停戰協定一直到八月才宣佈。停戰協定宣佈後一日，九月九日，原來在突尼西亞作戰的美國第五軍就在意大利南中部的那不勒斯一帶（薩勒諾）登陸，另一部份英軍則於大蘭多附近登陸，最初是美第五軍在薩勒諾遇到了德軍的抵抗，到了十日左右，不但德軍的抵抗日益增強，而且希特勒還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迅速的鎮壓了意軍的抵抗，佔據了羅馬及羅馬以南直到薩勒諾一帶的地區。這是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的。

德軍絕不放棄北波河流域，是人們預料得到的；但希特勒竟而不惜資本，佔領意中，却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關於這一點，英首相的演詞中雖然以德軍迅速佔領羅馬爲憾，使盟軍原定空軍降落計劃不能實現爲詞，在這裡，盟軍對敵人的估計不足，行動緩慢是不能辭其咎的。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敏感的觀察者一直到這時候都不願對盟軍的軍事行動作最後的斷語，因爲盟軍的作戰計劃可能是在意大利牽制德軍，而其主攻方向正別有所在；在意大利登陸的盟軍部隊始終沒有發現美國第七軍的番號，那麼它不是很有可能在開往巴爾幹的途中嗎？人們的目光轉移到希臘，轉移到希臘的愛琴海，轉移到愛琴海上數不清的島嶼。但是使人失望的是：喜訊未到，相反的，却是德軍捷足先登，佔領了多得略尼斯，而盟軍所得的却是多得略尼斯外圍中無關輕重的兩個小島。

十五日前後，戰局大勢已定，事實上不會有什麼驚奇的事件發生，而人們也不再期待奇蹟的降臨；接踵而至的是薩勒諾的戰況日趨激烈。十五日倫敦方面，對於這方面的戰事非常憂慮，人們說：

『這是一九四二年第八軍向開羅撤退以來聯合國國家在這一個戰場所遭遇的最危急的戰事』（同日倫敦路透電）。

這樣一直到了十七日意軍第八軍與美軍第五軍完成了會師以後，盟軍的危機才算是初步的過去；同日美海軍長諾克斯匆匆的從薩勒諾趕到倫敦，這足以說明華盛頓方面對於意大利戰事發展所抱的擔心。

戰局的前途呢？英首相說：

『薩勒諾附近的戰鬥已經有了四天，雙方勢均力敵，還有着發生大規模不幸的可能。每一寸土地都經過激烈的爭奪，生力軍並不缺乏，源源不絕地由最大限度的船隻和飛機載運登陸。戰爭在動盪中，暫時之冊，德軍把我們趕到海軍的願望是很大的』；但『我們是要拯救意大利。我們準備調大軍到意國，展開廣闊的戰場於敵人自己挑選的戰線之上，對敵作戰，必要時』

而且以日益增長的質量與精力，歷秋季冬季，以至於明年，對德維持攻勢（二十一日演詞）。

(二)

然而在目前，重要的還不是未來，而是，由於意大利戰局的發展，人們對於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估計改變了。魁北克會議雖早在八月底就已結束，但魁北克會議的結論一直到九月中才產生出來。九月十七日美總統的國會咨文和九月二十一日英首相的下院報告，可以看做有關這一結論的兩大文獻。

兩大演詞，三大結論。

第一個結論，英美領袖重申徹底擊潰法西斯的決心，對於日本，這一次的重度肯定，雖然沒有什麼更具體的內容，但是對於德國卻是更加具體了：美總統說：「但有一事，我必須闡明，就是：希特勒與納粹黨下台時，普魯士的軍人必須下台」；英首相說：「納粹主義和普魯士軍國主義是德人生活中的主要因素，而必須絕對毀滅的」。這一具體的聲明無疑的是會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的歡迎的；在事件的發展上，這一聲明結束了某些一些人政治解決，特別是通過德國國防軍的橋樑來解決希特勒及其納粹黨的幻想。

第二個結論，依然軍事第一，但是戰爭却是長期化了。關於這一點，美總統說：「自本年一月以來，我們已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路程，然而我要告訴國會，我國距離任何重要戰場上的最終勝利，還很遙遠」；英首相說：「事實上（由於不斷增長的空軍優勢），我們行將造成一種情勢，在這種情勢中，我們可能以自身較小的損失，不分晝夜，對敵方任何敵人的重要軍事目標施行轟炸，這項由英美軍力進行的破壞，在一九四四年內或者就可以實現，此種形勢一旦完成後其影響將無法估計，且必將極其深遠」，假如空軍的「無限優勢」，到一九四四年內才能或者可能的實現，戰爭的長期化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個結論，空軍第一，空軍掩蓋了陸軍；二三個個，第三戰場掩蓋了第二戰場，歐洲第二戰場不但沒有提前，而且是被推遲了。關於空軍第一，空軍掩蓋了陸軍的第一點，美總統說得特別有聲，他說：「當希特勒不得不承認其攻勢業已崩潰，而必須採取守勢時，他開始誇耀道：他已使歐洲成爲無法攻克的堡壘；但他却沒有在這一堡壘之上，建造屋頂，他在他的所謂堡壘

堡壘上也還留下其他若干脆弱之點，我們在適當的時間就將向其指出；英美空軍現在正轟炸這個無頂的堡壘，其成效與日俱增，目前我們的目標就是在建立可以轟炸德國南部和東部的根據地，並不分晝夜，以摧毀性的戰爭帶到這些區域，和我們帶到德國西部一樣」；而英首相則對空軍轟炸的效果誇張到「所有這些行動，並與從白海到黑海長達二、〇〇〇哩上正在進行的巨大努力，相提並論」。

意大利的戰爭雖然不是第二戰場，在那裡，直到現在，我們知道只有五個德國師團在作戰，那麼第二戰場呢？英首相說：

「我們起初在北非，其次在西西里，目前在意大利所開闢的戰場，我稱之爲第三戰場。至於第二戰場已經隱然存在，而且其重量在迅速增長中，只不過尚未交戰而已，但其存在則無庸諱言，我並打算暗示何時交鋒，但其業已存在，且已爲敵人心神不安的主要問題；當我們和我們的盟國友判斷這戰場業已成熟之日，我們一定會開闢的」。

一個已經「隱然存在」，但「尚未交戰」；「尚未交鋒」，但「已爲敵人心神不安」的，還沒有開闢的第二戰場是什麼樣的戰場呢？根據字面來解釋是徒勞無益的，只能有兩個意義：空中的第二戰場或者是神經上的第二戰場，英首相指，顯然是二者兼而有之。

究竟幾時開闢呢？「我們（英）和我們的美國盟友認爲成熟的時候」，而目前：

「下院可以絕對相信，政府絕不因任何主強或壓力而動搖，無論這主張如何，這壓力如何出於好意，我們決不爲了獲得政治上的一致性，被迫或被誘來違反政府認爲妥當的判斷。」

(三)

一方面是跟着潮流漂浮，一方面是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蘇軍的夏季反攻正在以巨大的步武從一條河流跨到一條河流；在冬季的大反攻裡，他們從伏爾加河跨到頓河，如今他們又從頓河跨到第伯河；第伯河怒吼已經隱隱約約的可以聽得見了。

打開地圖，請看他們反攻的步武：

九月九日蘇軍克復 巴赫馬奇
 九月十日 馬留拔倫

九月十五日 內辛

九月十六日 諾佛羅西斯克

九月十七日 布利揚斯克

九月十九日 雅特瑟佛

九月二十一日 徹爾尼哥夫

九月二十三日 波爾塔瓦

反攻的潮水湧到了聶泊河邊，聶薩克的騎兵已經在聶伯河飲馬；目前（二十一日）他距離斯摩棱斯克已不過十八哩，離基輔不過二十五哩，離第聶伯河彼得羅夫斯不道二十九哩了。

在過去兩週內，落後於蘇軍大勝利中，自然以諾勃和布城的克復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由於諾勃的克復，德軍在維爾斯草原的積頭重疊已開始崩潰，而諾勃在這一方面攻勢的展開，將終極的促成克里米亞德軍的覆沒；由於布城的克復，德軍在中路的突出地帶已被剪除，它為斯摩棱斯克和基輔的德軍敲出了最後的交鋒。

由於德軍敗退的迅速，有些人天真的問起，德軍是在敗呢？還是在退？更因為蘇軍每日所俘獲的贖利品不及夏季反攻初期之多，就有人很天真的認為這是德軍退的成份多，敗的成份少。這是不正確的，我們只要仔細的注意一下每一個戰役發展的經過，就可以知道那根本不是「自動性多」的「退」了。例如布利揚斯克之役，早在九月十三日德方就宣佈退出該城了。但布城的克復却是在四日以後的十七日實現的，而那四日却是充滿血戰的戰鬥的；假如是真正的退，為什麼不在宣佈撤退的那一天就退，這是非當權的戰術的，他們宜撤退，因為他們自己知道他們已經沒有增兵據守的能力，事先宣佈免得事後丟臉，而他們頑固不去，却又證明了他們是絕不願意撤退的，假如那是可恥的話。至於這些時候蘇軍俘獲的贖利品比較戰事初期少，那完全是因為戰爭的性質已經改變了的緣故；誰都知道德軍攻勢初期，他到是挾了巨大的器材優勢來從事進攻的，而今天他們因為再沒有發動攻勢的能力，他到自然不能再集中像初期那樣大的器材，因此蘇軍的俘獲也就不能像初期那樣豐盛了。這並不能說明戰鬥的不激烈；恰好相反，目前蘇軍所進行的每一戰鬥，都是真面目戰鬥；希特勒匪徒們知道，他們失去的將永不會再拿到手，丟

了就是丟了；蘇聯的紅軍也知道的，他們得將永不會再從他們手裡失去，他的勝利是永久的。

由於蘇軍進展的迅速，有些人就自然而然的問起，蘇軍的反攻是不是已經發展到最後的全面反攻了呢？近代戰爭有進攻的規律，即：攻勢作戰至一定限度則有一度的停歇，不一定為了一個原因；過去的蘇軍冬季大反攻有停歇，蘇軍的夏季大反攻亦不能例外。不過這是客觀的法則也好，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蘇軍的反攻是不會發展為一個最後的（意即無阻地敵人於國境之外的）全面大反攻，還要看其他的條件；首先是，敵我力量對比在作戰中所起的變化；其次是，其他的作戰條件；截至現在為止，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德軍在沒有最後退出聶泊河防線以前，大機會有一次「往脚」的企圖，而整個戰局的發展看視此一戰而定。

不過，無論如何，單靠蘇軍是不能迅速打垮希特勒的；這不僅是因為希特勒還有三分之二的部隊集中在東線，更因為蘇軍本身還是一個艱苦的戰鬥；而且，因為要迅速打垮希特勒，不僅要在戰場境內予以致命的打擊，而且需要在歐洲戰場予以致命的打擊，而這一工作是不能完全指望蘇軍來完成的。很多人懂得這一句話前半截的意思，很少人懂得這一句話後半截的意思。

要理解這句後半截的意思，英首相就不會把開闢第二戰場的要求認為僅僅是一句「主張」或是一種「壓力」了。事件的發展時常是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的；可悲的是人們只有當錯誤成了事實以後才知道犯了錯誤。

不管盟軍在意大利戰場所已受或可能受到的挫折如何，從整個力量對比看，再沒有像今天這樣對盟軍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更為有利的時機了；第二戰場取決於三國會議，儘管人們的信心是怎樣「不可動搖」，我們依然由衷地希望英美蘇三國會談能從速召開。

「漂浮」終不是辦法，「弄潮」有沒頂的危機。

蘇德戰局的展望

薛子正

目前，在反法西斯陣線上，最令人興奮，而值得大書特書的，當然要數蘇聯紅軍夏季攻勢中的豐功偉績了。兩月來——七月底至九月二十前後，紅軍沿着北起斯摩棱斯克，南迄黑海與黑海沿岸的前線，打破了德軍一切抵抗，很迅速的蕩平了聶伯爾河以東的敵人，光復了縱橫千里的祖國領土，這包括奧勒爾、哈爾科夫、蘇希、斯大林諾、塔干羅格、瑪留波爾、微爾尼科夫、波爾塔瓦、布列斯列克、諾佛羅西斯克等戰略基地，在昨天九月二十五日紅軍在中路前線，已將最重大的戰略據點——斯摩棱斯克收復了。（按斯摩棱斯克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初陷於敵手，德軍於佔領斯城之後，即在其周圍構築有廣大縱深而被視為「固若金湯」的防禦工事，希特勒把它作為進攻莫斯科的基地，且在那裏親自指導過一九四一年整個冬季攻勢作戰）。在基輔方面，紅軍已在多瑙河渡過聶伯爾河，正在夾河兩岸激戰，潰敗的德國法西斯軍隊，正沒法西竄，尋找其「預定的」「安全」防線，以圖最後掙扎。

然而希特勒無恥的宣傳機關，對於這樣滾滾西竄，欲求在任何地點站定脚跟而不可得的局面，却仍不知恥的造作些令人噴飯的謊語，硬說德軍是向後方事前準備好了的陣地，實行「自願的撤退」，但這，居然也有着相互唱和的應聲虫，替德國法西斯軍隊作掩飾失敗的宣傳。

可笑的「自願撤退」

很顯然的，如果德國法西斯軍隊，沒有體驗到紅軍今年夏季反攻打擊的重重，如果在聶伯爾河以東任何地帶還經得起紅軍第二連三次的打擊，並能站穩脚跟的話，希特勒匪徒是絕不會「自願撤退」的。尤其不願從斯摩棱斯克這樣重大的據點作「自願撤退」的行動。

在奧勒爾一役中，第一個月星期遊戰的結果，德軍所遭到的損失，要比去年攻擊斯大林格勒的最初一個時期所損失的要慘重，當時，德軍每天損失約

五千人，而在奧勒爾以南的比爾哥羅德方面的激戰中，德軍每天的損失，據一位外國記者的估計，則約在一萬人左右，這是久經消耗的德國法西斯軍隊所相當不起的。若就數目字來看，則從七月五日至八月六日的一箇月中，德國法西斯軍隊是陣亡的官兵就有一二〇、〇〇〇員名，損失坦克四、六〇五輛，大砲一二、六二三尊，飛機二、四九二架，卡車一、〇〇〇輛。在同一時期，紅軍並繳獲了坦克五二一輛，各種口徑大砲八七五尊（包括砲車）機槍二、五二一挺，各種兵站三二五處，俘虜德軍官兵一二、四一八名。若就七月五日至九月五日兩個月計算，則德軍單是人員的損失就是一、五〇〇、〇〇〇人，其中陣亡的四二〇、〇〇〇人，被俘虜的三八、〇〇〇人，若再把九月五日以後的這二十多天的殘酷戰鬥中的損失一併加起來，這個數目字，是異常驚人的。流血過多的德國法西斯，是經不住長此消耗下去的。

希特勒不會輕易放棄東線，不會甘作「自願撤退」的行動，只要不是有意歪曲事實，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懂得的。希特勒匪軍妄想永遠佔領蘇聯領土，他不僅在奧勒爾、哈爾科夫、斯大林諾、布列斯列克、諾佛羅西斯克等重大的戰略據點，築成了堅固的防禦工事，就是在一個並不十分重要的城鎮——羅斯拉福爾，也構築起極複雜的，極堅強的防線，企圖能在台斯那河沿線抗拒紅軍的進攻。然而不可能，這之所以不可能，並不是因為秋天的積泥，冬天的嚴寒，而是由於紅軍的強大，與其猛勇的進攻。由於德軍的戰鬥力的日益削弱，與其戰鬥意志的每况愈下。

在希特勒發動侵蘇戰爭之初，當時的德軍，是經過最精良的軍事訓練的軍隊，法西斯的將領，也是具有着豐富經驗和胆氣，他的士兵又經過長期武斷宣傳的麻醉，再加上在西歐戰場很順利的征服法比等十四個國家的作戰經驗和充分的軍需接濟，所以能夠在戰場上表現其機動敏捷與動作協同，能够倏倏一時的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就。今年的夏季攻勢，希特勒雖然在大體上依然使用兩年前的戰略戰術，其軍隊的機體與裝備，雖較兩年前並無遜色，然

而兵員則大大的不同了。他們的數量雖然不算少，質量方面，則完全兩樣。一個真理報戰地記者，在德所在地的戰區，獲得的實貴資料，已能說明這一點，據他說：『所有對我軍作戰的第一線德軍師團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完全由德國人組成的。所有師團中的半數，從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乃至到百分之二十五，都是波蘭人，捷克人，奧地利人和其他非德意志人。在所有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師團中，非德意志人所佔的百分比還要大些，甚至達到全體名額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這些被希特勒強迫參加德軍作戰的許多波蘭人，捷克人，奧地利人，要他們從德意志人前線周圍逃過來，雖然極其困難，然而在最近兩個月來，他們却紛紛向紅軍投誠了。』（參看塔斯社莫斯科八月七日電。）

在蘇聯戰場上德軍師團組成份子的年齡上，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德軍中由二三十歲的少壯漢子組成的精兵，已大部被掃蕩了。和過去比較起來，『德軍各師團中十七歲到二十歲的各年級的小伙子，以及三十四五歲以上的各年級的比較老的兵員更多了。一般的說來，所有年紀較老的德國兵，總有眷屬在德國，他們的士氣比年輕的更低落得多，而且更加厭戰了。』

這是從軍隊的素質說，德國法西斯軍隊吃大敗仗的原因。也正因為這，所以像堅守斯塔拉雅——盧薩那樣富有堅韌性的作戰部隊第十六軍，早已不存在了。而且在德國戰史中也永遠不會再有了。主要地，也正因為這，所以德國法西斯軍隊，才不得不作『自願撤退』的行動，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為什麼德軍會弄得這樣一蹶不振呢？這當然不是別的，而是咎由自取，由於希特勒這隻狂妄天才，這隻自高自大的豬獃，困於在西歐戰場總體的成就。在戰爭的初期，過高估計自己，而過低估計了蘇聯紅軍的力量，以致戰路上鋪成大錯。前年進攻列寧城，莫斯科不守，去年企圖佔領斯大林城好從東邊包圍莫斯科又不成，而其軍力又大量消耗於塞特，主力被殲於斯城，終于掘成了自己的墳墓。

兩軍戰略的演變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在便利的在西歐戰場上獲得戰略上的成功，他不僅征

服了疆地偏小的荷比等國，而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征服了號稱一等強國的法國，並施展其夜間空襲與潛艇攻擊作戰，把大不列顛帝國也弄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擊之力。在巴爾幹方面，剪除了南來的威脅，鞏固了向東進軍的翼側。希特勒既把各方面都安頓好了，又節省下來很大的力量，於是背信負義，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向社會主義建設的蘇聯開火了。

希特勒攻蘇的戰略，與他在一九四〇年征服荷比，進攻法國西所採取的戰略，在基本上殊無二致，也與一九一四年德軍所採用過的戰略相差不多。這個戰略，即是『速戰速決』、『閃擊』戰。

根據這一戰略方針，希特勒集中了最精銳的三百師團以上的兵力，企圖一舉而消滅紅軍主力，沿着拿破崙破塞進兵的舊道，直下莫斯科，迫使紅軍作城下之盟，這就是希特勒最理想的最美滿的幻夢。然而這種閃擊，對於運動空闊狹小的荷、比、戰備較差的挪威，和毫無準備的法國是成功的，但是對於地大物博人家的蘇聯，對於在蘇維埃聯邦共產黨所領導下的久經軍事政治訓練的紅軍，則是一種狂妄的舉動，因為紅軍有着擊破閃擊戰的一切條件。紅軍利用遼闊區域的空間，採取了持久的消耗戰以對抗進攻之敵，而且在莫斯科保衛戰中粉碎了敵人的進攻，奠定了戰爭最後勝利的基本。

一九四二年，希特勒戰略企圖不變，乘歐洲沒有第二戰場之際，希特勒把他本國的和他們的同盟軍所有一切可調的後備役，都調到東線上來，連斯大林的文告當時在東線集中了二百四十個師團的主力。以故能在一個方面形成實力上很大的優勢，這樣就在蘇聯的西滿前線發動了進攻，而且衝入了佛羅內茲區、羅斯托夫區、斯大林格勒區、諾佛羅西斯克區、五山城區和摩茲多克區。並打算於佔領斯大林格勒之後，把紅軍主力與伏爾加和烏拉爾更後方的聯絡切斷，然後猛撲莫斯科，完成從東邊包圍莫斯科的作戰計劃，於一九四二年結束東線戰事。但蘇聯紅軍在偉大的領袖，戰略家斯大林領導之下，仍本持久消耗戰的戰略方針，節節抗拒，寸土必爭，一方面固守戰略反攻的作戰基地，一方面保全將來戰略反攻的主力，『在決定戰的時間，使用有決定性的力量，用於決定性的地點』，這就是偉大的，更無前例的殲滅戰之所以成功。

今年，希特勒的夏季攻勢，妄想要消滅紅軍主力，攻佔莫斯科的野心，並沒有死去，他的作戰意圖，在首先割平蘇軍突出地帶——庫爾斯克，並佔有這個地方，這樣就可以貫通奧勒爾與比爾哥羅德間軍路鐵道，改善其後方

供應線，「這樣子來準備根據地，以便好從與勃爾作戰基地，向莫斯科發動一如往昔的大規模攻勢」。然而由於紅軍的強大力量存在，紅軍不僅粉碎了希特勒的夏季攻勢，而且有力擊退奧勒爾及其以南的比爾哥羅德的德軍實行堅決的反攻，使希特勒法西斯軍隊吃了嚴重的敗仗。

德軍只有在這嚴重慘敗之後，才深深的感覺到紅軍打擊的重量，與紅軍力量強大的存在而不可侮，從此，在東線的德軍，乃不得不改變戰略的攻勢而為戰略的防禦，首在保全自己的主力，以圖得機再起；所謂：「保全軍隊主力，目前應把他當作首要的任務，別的一切，都是從屬的。」（納粹某評論家語）

蘇軍採取了什麼樣的對策呢？憑着自己的力量，粉碎德寇的抵抗，並求得在幾個較大的迂迴殲滅戰中，消滅敵人主力，光復淪陷了的祖國領土，這在最近兩月來戰局的發展，顯示得最清楚不過的。

目前希特勒的意圖

這樣，德軍目前的戰略意圖是不難看得出來的。

第一，避免過大的犧牲，退守西伯利亞以西地區，以不付出十分大的代價，鞏固基輔，威德比斯克和德羅伯彼得羅夫斯克等重戰線據點，阻止紅軍繼續西進。

第二，萬一德軍在蘇伯河防線被突破，則力求避免紅軍的大迂迴，大包圍殲滅戰，尤其注意使基輔以南及克里米亞的德軍，不至遭受殲滅打擊之慘禍，退而守蘇波，蘇維德國界線。在這種情況下，假如西線仍無第二戰場，則一方面利用「戰後國界問題」，肆意挑撥，離間英美蘇國之關係，進行「兩面開弓」的和平攻勢。一方面以贏得時間，重建德德本土的「安全」防線，以圖持東線的戰事。

第三，假如連這種軍事政治「雙管齊下」的陰謀詭計不過，希特勒匪軍或將再度縮短防線，結集主力的全部，再向西退，據守北起維斯杜那河，南至喀爾巴阡山脈之線，並從事鞏固德德本土各附庸國之佔領，這包括挪威、丹麥、荷、比、捷克、法蘭西北部波蘭西部，以待事態之發展。在這種形勢下，紅軍或因孤軍奮戰，長途奔追的結果，亦得休息整頓，以準備新的攻勢；從軍事上說，整個戰局或有一時之沉寂，亦未可知。

何時擊敗希特勒

有人要問，照這樣說法，希特勒還有繼續存在的可能？是的，如事能萬一向不幸的方面發展下去，希特勒是會依照其預定戰略計劃在歐洲掙扎下去的。我們常說：要最終的消滅希特勒德國，需要從各方面努力，第一，紅軍繼續的艱苦作戰，這當然是最主要的條件，這一條件已完全具備；兩年來，紅軍抗擊了德國法西斯匪軍近三分之二左右的兵力，而目前則更有着輝煌的戰績。第二，西歐第二戰場適時的開闢？可是全世界人民已期望了兩年，西歐第二戰場還沒有蹤影。第三，英美大量的軍需生產，這一方面雖已有極顯著的成就，但還沒有用之於主要戰場。第四，各淪陷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生長與發展，這在南斯拉夫，在法國，在希臘，在阿爾巴尼亞的反法西斯戰爭的游擊戰（其中尤以南國的游擊戰的發展為最大。）與各淪陷國家反法西斯的罷工，怠工，示威遊行等鬥爭，起了牽制與分散法西斯力量的作用。第五，德國本國的人民革命運動的起來，自由德意志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成立，德國軍官聯席會的召集，與國內反法西斯的罷工，厭戰反戰運動的繼續高漲，已顯示了自由德國的光明前途。假如有了第二戰場來配合紅軍的反攻的話，所有這些條件將有着更高度的發展。

問題的中心在第二戰場。

從軍事上說，一旦德軍退出蘇聯，採取守勢，轉移較多兵力於歐洲，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是更加困難了；不過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由於德軍被逐出蘇聯國境，過去是蘇聯要求開闢第二戰場一面倒的形勢糾正過來了，在那種情況下，蘇聯和英美在共同擊退希特勒的問題上已立於對等的地位；從而急於開闢西歐第二戰場者，已不僅是蘇聯，英美同樣有着這一要求了；這一基本形勢的改變勝過于希特勒在歐洲幾十萬大軍的集中，它不但不致于遲延西歐第二戰場的開闢，相反，它將加速第二戰場的到來。

「單靠紅軍，是不能迅速打垮希特勒的，這不僅是因為希特勒還有三分之二的部隊在東線，東線戰事本身還是一個艱苦的戰鬥，而且因為要迅速打垮希特勒，不僅需要在蘇聯境內予以致命的打擊，而且要在歐洲戰場予以致命的打擊，而這一工作，是不能完全指望紅軍來完成的。」

（於九月二十七日脫稿）

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

郭沫若

漢書藝文志裡面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列在儒家，注云：「七十子之弟子」。又有「公孫尼一篇」，列在雜家。論道理應該是一個人。

附書經籍志裡面有「公孫尼子一卷」，也列在儒家，注云「尼似孔子弟子」。這「一卷」恐怕就是漢時列入雜家的那「一篇」。注語與班固不同，當是長孫無忌別有所據。

現在這兩篇書都遺失了，但要感謝隋書音樂志，它引列了梁武帝的恩弘古樂的詔和沈約的奏答。在這奏答裡面使我們知道「樂記取公孫尼子」，公孫尼子的一部分算在禮記中被保存着了。

「樂記」也整個被保存於史記樂書裡面，張守節正義亦云「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張說大抵根據臧熲，臧熲與沈約為同時人，兩個人的說法正可以為互證。

現在的「樂記」是禮記的第十九篇，據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鄭注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十一篇者，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樂半，有樂乙，有魏文侯。」這篇次是據劉向「別錄」，但今本樂記的次第和這不同，史記樂書的次第也有顛倒，張守節云「以緒先生升降，故今亂也」。

藝文志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承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諸者，敘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一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劉向的樂記與禹的怎樣「不同」，可惜沒有詳說，大約以一篇為一卷，只是少一卷的原故吧。藝文志樂類，兩種都有著錄，一作「樂記二十三篇」，一作「王禹記二十四篇」。

劉向的二十三篇的前十一篇即今存樂記的十一篇，其餘十二篇備存目錄。孔穎達禮記疏云：「案別錄十一篇餘次，樂記第十二（疑本作『泰樂』），即呂氏春秋的『太樂』，樂記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疑本作『音始』），即呂氏春秋之『音初』，樂記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

八（案見左傳襄二十九年），樂記第十九，樂籍第二，昭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齊公第二十三（案即周官大司樂章）是也。」

今存樂記取自公孫尼子，沈約與臧熲既同為此說，大約公孫尼子原書在梁時尚為完具。然據現存的資料，十一篇的次第已經有三篇：不知道那一篇是公孫尼子所原來有的或者都不是。而內容也有些疑問，例如樂論篇言「禮樂之情同，故明玉以相濟也」，而樂禮篇則言「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又如樂論篇言「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樂化篇言「樂極和，禮極順」，而樂禮篇則言「樂極則憂，禮極則偏」，這些似乎不像一個人的論調。樂禮篇很可疑，因為裡面有一節，差不多和易傳傳完全相同，我現在把它們並列在下邊：

（樂記）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問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薄。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撥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樂者大始，禮居成物。

（易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這無論怎樣，有一邊總是動輒，因此關於「樂記」的一節應該不是公孫尼子的東西，至少也應該懷疑。

此外樂言，樂竹，樂化，樂氣，四篇，都有與荀子樂論篇同樣的文句或章句。論時代荀子當後於公孫尼子，但荀子不至於抄前人的文字以為己有。

因此我認爲今存樂記，也不一定全是公孫尼子的東西，由於漢儒的雜抄雜纂，已經把原文混亂了。但主要的文字仍採自公孫尼子，故沈約皇侃云然耳。因此我們要論公孫尼子，就應該把這些可疑的來剔開，才比較可以得到他的真相。至於呂氏春秋，毛詩傳，漢書樂志等的抄取，那是不成問題的。我現在把三種篇次和與別書的關係列表如下：

樂本	樂論	樂施	樂音	樂禮	樂情	樂化	樂象	致幸賈	律文後	別錄	札記	樂書	備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呂氏適音，毛傳，部分採取。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漢書樂志採此，有數語與荀子同。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與易傳平行。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首節與荀子同，頗重要。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後兩節與荀子全同，略有字句更易。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首節與荀子大同小異。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關於公孫尼子本人，我們所能知道的實在太少。班固說是「七十子之弟子，即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大概是根據賈幸賈，師乙，魏文侯三篇所得到的推測。賈幸賈篇載賈幸賈與孔子論樂，師乙篇是子貢問樂於師乙，魏文侯篇

爲文侯問樂於子夏，但這些篇足以表示作者的年代不能超過孔子及其門人而已。長孫無忌別立異說，以爲「似孔子弟子」，或者長孫無忌時，「公孫尼子」一節「存」。其中有與孔子問答語語說不定。我疑心七十子禮記的「公孫尼子」，少孔子五十三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怕說定公孫尼子。禮記字誤，因有後來的公孫龍，故聯想而致誤。尼者泥之省，名泥字石，義正禮應。子石，集解引「鄭玄曰楚人」。家語作「公孫龍·衛人」，那是玉璫的自我作故。

再從「樂記」中去找內證時，樂本篇論「音，爲一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雖然在比附上不免出於牽強，但總還有沾染到五行色彩的。又如說到八音，如「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也沒有沾染到八卦的氣味（八卦及易之制作只是戰國初年之物）。

關於音的見解，也和孔子相近。樂本篇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端也（靜性端爲韻，韻者容也，今體律欲，此端樂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這和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正一脈相通，也說我不性善性惡的遺跡。有的學者特別看重這幾句以爲是近世理學的淵源（賈東漢、陳澧等），然而宋儒的理學是把理與欲分而爲二，而公孫尼子的原意卻不允以理，他是以爲好惡得其節就是理，不得其節就是滅理。所以他說「去物之感人無節，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願說是真，反說便不真，宋儒却是反說：「去人欲，存天理」。這是誤解了公孫尼子。

由這些內證上看來，公孫尼子可能是孔子直傳弟子，當比子思稍早。雖不必想後於子貢子夏，但其先於孟子荀子，是毫無問題的。魏文侯列傳的書目在魏文侯與李克之後，孟子孫卿子（荀子）之前，看來也是很有用意的。荀子在樂理上很明顯的是受有公孫尼子的影響，但荀子書中卻沒有他的名字。強國篇中有一位公孫孫士讓譏楚國子發滅蔡而斷黃的事，與樂記中「刑禁暴解嚴賢，則政均矣」的主張相近，大約就是這位公孫尼子吧。

中國禮時的所謂「樂」（岳）它的內容包含得很廣。音樂、詩歌、舞蹈、本是三位一體不可用說，繪畫、雕鏤、建築等造型美術也被包含著，甚至於通儀仗、相讓、禮儀等都可以涵蓋。所謂「樂」（岳）者，樂（音）也，凡是使人快樂，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東西，都可以廣泛地稱之爲「樂」。

「(岳)」。但它是以音樂為其代表，是毫無問題的。大約是因為音樂的享受最足以代表藝術，而它的術數是最為嚴整的原故吧。

人有感官自不能不圖享受，故「樂」之現象實是與人類俱來。然自人類進化到有貴族和奴隸的階段，則一切享受均不能平均，高度化的享受為上層所壟斷，低級者留之於下層，甚至連低級者有時亦無法享有。故到社會達到另一個階段的時候，對於這享受的分配便不免有新見解出現。

殷周是奴隸制時代，上層的貴族早就有鐘磬琴瑟笙等相當高度的音樂及其它感官的享受，但作為奴隸的人民却和他們有天淵之隔。因此在春秋戰國當時，奴隸制逐漸解體的時候，思想家對於這享受的不平衡便有了改革的反應了。

墨家是主張「非樂」的，但他並不是認為為樂(岳)不樂(洛)，而是認為費財力、人力、物力，老百姓既不能享受，貴族們也不要享受：

「于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笙簧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芻豢魚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遠宇之居以為不安也，雖心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主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于墨子曰：為樂非也。」(非樂篇)

道家也是主張非樂的，但他們更進了一步，並不是因為為樂不合實利，而是因為為樂有害。老百姓們不能享受正好，貴族尤其不應享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敗壞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防。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

「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擾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腐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莊子天地篇)

這兩派的主張，在社會的意義上來說，都可算是對於貴族享受的反對，但從學理上來說，兩家都是主張去情欲的，故對於情欲的享受也就同樣地反對了。所不同的只是墨家是主張強力疾作，道家是主張恬淡無為，墨家是蒙着頭聽着鈴，道家是閉着眼睛閉着想。

儒家却是不同，他是主張享受的。他不主張去欲，而是主張節欲，故剛享受也應該有節制。他主張「國民同樂」，貴族既能享受，老百姓也要享受

。一種學說的主張，和人的性格教養應該是有關係的。孔子是喜歡音樂的人，他也懂得音樂，自己能够彈琴鼓瑟，擊磬唱歌。「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記孔子世家有「學之」二字)你看他學習音樂是怎樣的專心。「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從美與善兩方面來批評作品，你看他是怎樣內行。「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他實際上是一位樂理家兼演奏家。真的，孔子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他自己說過「吾不試，故藝」。試者淺嘗也，他不肯淺嘗，故能够對於藝術有所深造。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縱)之，純如也，嘒如也，攄如也，以成。」

(以上對於音樂的批評。)

「于與人歌而善，必使復之而後和之。」

「于於是日哭，則不歌。」

「点，爾何如？鼓瑟希，鏗而作。……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点也。」

「于解帶於術，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子曰：以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帶手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以上音樂與孔子日常生活。)

但孔子並不是一位「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他談到樂每每要利和聯繫起來，而論樂也不僅是徒重形式：「禮云禮云，玉帛云云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云哉？」他所注重的是禮樂的精神，他要用禮樂來內以建立個人的高尚的人格，外以圖謀社會的普及的幸福。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若誠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隨，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以上禮樂與人格的修養。）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禮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鄉鄰正，佞人絕。」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以上禮樂與政治的建設。）

從「論語」裡面所描寫出的這些零章斷語，儘足以看出孔子對於音樂或藝術的態度，也就是代表儒家的態度。但他的理論卻沒有十分展開。把這理論展開了的，在事實上就是公孫尼子的「樂記」。

公孫尼子所謂「樂」，也依然是相當廣泛的，「樂記」中所論到的除純粹的音樂之外，也有歌有舞，有干戚羽旄，有綴兆俯仰。然大體上是以音樂為主，比前一兩章人的疆統，是比較更分化了。

他認為樂是抒情的精神活動，是內在的東西；這個道理他不用返返復復的說，就像以一個母題為中心的迴旋曲那樣：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成於旄，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情動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你的感情受了外界的刺激而感動了，你用聲音把它形象化出來，那你有怎樣的感情便必然有怎樣的聲音：

「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或者你應該選擇適當的樂器或音色來對於你的感情作適當的表達

「鍾聲經，經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竹聲濫（攬），攬以立會，會以聚眾。……鼓聲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眾。」

樂有「文采節奏，相應成方」，它的主要的性質是和諧，而它的功能是同化。所以你的聲音是怎樣的性質，在別人的感情上便可引起怎樣的波動，感情被聲音的傳達而生感染；同時知音的人聽見你有怎樣的聲音也就知道你怎樣的感想：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實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君子聽鐘磬則思武臣。……聽琴瑟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聲則思志士之臣。……聽笙簧箏管之聲則思耆老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音樂是你內在的生活開出來的「花」，你是什麼樹子便開出什麼花來，這是絲毫也不能虛假的。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性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偽為。」

音樂是內在生活的花，但其質也是外界生活的反映，因為感情是由於外物而動的。同時也是外界生活的批判，因為感情的發生並不是純全的被動，而有主觀的能動作用存在。

「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這幾句十分重要的話值得在這兒加以討論，據陸德明的釋文，「治世之音安」以下的三句是有三種讀法的。第一種是普通的讀法，讀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第二種是「雷讀」，是在安字、怨字、哀字下斷讀。在樂字、怒字、思字下再

斷續。這三種便是我現在所採收的「雅語」。這三句話被毛詩國風序所採收，釋文也舉了兩種讀法，「信讀」是沒有錯的。由上下文考察起來，皆以雅讀為妥當。「治世之音安」是反說，「以樂其政和」是批判。因為其治世音安，其更進一步的原故是由作家喜歡當時的政治和平。其它二句準此解釋。這就是所謂「情動於中故形於聲」，也就是所謂聲音通於政。如照着普通讀法，或常讀，那作者只是愛動的死物，如鏡如水而已，於理不合。又這幾句話亦為居氏春秋適音篇所採收，而略有更易：「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亂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聲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看這第三句的改動，可以證明居氏門下的學者也同於舊讀，因為悲怨哀，讀「悲以哀」，則其意犯複。

因此音樂又成為政治的總鑑，為政的人常傾聽民間的音樂，不僅可以知道民間的疾苦，也可以知道政治的良與不良。從這兒便可以生出政治的改革，故所以說，「審音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由於知道與政治的關係，故音樂可以成為重要的政治工具。一方面用它去感動人，另一方面須得製作良好的音樂。要怎麼才可以製作良好的音樂呢？要對於作音樂者的感情「慎所以感之」，而對於好惡的發動要「人為之節」，在這兒應與樂來了一個辯證的統一：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象法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量，制之禮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趨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樂等，廣其節義，發其文采，以備德厚，律小大之給，比終始之序，以敘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禮皆形見於樂。」

樂須得禮以為之節制，禮也須得樂以為之調和。禮是秩序，樂是和諧。禮是差別，樂是平等。禮是「禮」精神，樂是「樂」精神。兩者看來是相反的東西，但兩者調劑則可恰到好處。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禮，禮樂之事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情），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每議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論倫無慮，樂之情也，欣者誠變，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祫禘，享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論倫無慮」者玲瓏而不濇漫也，論倫實是變聲聯誼，與下中正為對文，故知當讀為玲瓏。玲瓏而不濇漫（所謂和而流）是樂的精神，它的功用便是使人欣慕欣慕，即是樂者為同而相親。中正無邪是禮的本質，他的發揮是莊敬恭順，即是禮者為異而相敬。玲瓏無濇，易何如之。中正無邪，簡何如之。欣慕欣慕，易何如之。莊敬恭順，簡何如之。「論於金石，越於聲音，所與民同」，孟子所謂「與民同樂」也。這是儒家主張禮樂的精神，他把古時「不下庶人」的禮樂，「下」了下來使大家享受，大家遵守。「不下」是皆以修身為本的把領袖階級的責任也拉到庶民身上來，把天子和庶民的身分扯平，也是一樣的道理。治平不僅是在上者的事，也是在下者的事，因為沒有健全的人民，天下國家是怎麼也不能治平的。

禮樂是政教的大端，禮樂得其正，可成政教得其平。反之，政教得其平，也就能使禮樂得其正。有不學無術者當施之以刑，用以維持政教的權威，而滅除禮樂的障礙。

「禮以道（導）其志，樂以和其性（厚修聲，據說苑改）政以一其行，將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禮動民心，樂和民性（同上），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玉道備」便可以達到刑措不用的理想的地步。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行不用，百姓無怨，天子不怒，如此則樂建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敵四海之內，如此則禮行矣。「達到這樣的和平的世界也就是禮樂的成功。」

禮樂的成功不僅可以使天下太平，而且可以使宇宙明理化。所謂「大人舉禮樂，即天地將為昭焉。天地合，陰陽相得，照臨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蓬，羽翼奮，角觝生，鱗蟲昭蘇，精者蟄伏，毛者教育，胎生者不

殞，即生者不死，則樂之道歸焉耳」。這也就是中庸的「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的意思，說得有點神秘，但也並不是絕對不可能，人的精神力量發揮到極高度的時候，對於宇宙萬物是必然要起一定程度的作用的。

更進一步是宇宙全體被看為一個音樂或一應體堂，或一應樂著音樂的莊嚴的禮堂。「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萬物皆別」。到這兒為止我們看到音樂的崇高性逐漸上升，作者的精神也逐漸充揚，把音樂的贊美推舉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很有點類似希臘皮它果拉司派的宇宙。但從這兒打一個倒提下來，便成了神秘的觀念論：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明於天地，然後能禮樂。」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這兩觀念論到了魯不韋時代便固定下去了，且把那時代的人說：「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展載，本於太一。太一生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展，滋養以形。形體虛，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就這音樂便倒立了起來。神的產生也剛好是這樣。

於是個體作樂的人也成爲聖，成爲神。「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理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致樂以治心，則易以予諫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諫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可言而信，神則不可言而成。」「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公孫尼子之後，凡談音樂的似乎都沒有人能跳出他的範圍。

尙書禮典有這類的幾句話：「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這和樂記的理論頗有平行。尙典我認爲是子思依托的，與公孫尼子同時代的人，很可以有同樣程度的思想。

再後「論語」的人如孟子，雖然很少談樂，但他談到的地方都不免有公孫尼子的氣息。如他說：「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與民同樂則王矣。」又如以音樂的詩樂來讚美孔子爲樂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業也」。又如以禮之贊爲仁義之備文，樂之實爲樂行仁義，「樂則生矣，生則思可已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之謂道也。」

荀子的樂論篇差不多是個公孫尼子的翻版。所謂「樂統同，禮辨異」，所謂「樂者天下之大齊」樂記引作「天地之合」，「中和之紀」，所謂「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樂而不樂」，我們並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

見解。
 (九月五日晚稿)

追記

本文草成後，由友人處得錢穆所著「先秦諸子繫年」一書。見其所述公孫尼子，與余所見者可云正反，今摘錄之如次，而略加以附駁：

「隋志公孫尼子一書云：『似孔子弟子』；又附書音樂志引沈約奏書，謂「樂記取公孫尼子」，禮記正義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作」。余考緇衣篇文多類荀子。樂記劉瓛謂荀子，呂覽、易繫諸書，其議論皆出荀後。則公孫尼子殆荀氏門人，李斯韓非之流亞耶？沈欽韓曰「荀子與國籍稱公孫尼子」，即其爲荀氏門人信矣。……漢志謂是「七十子弟子」者已失之，隋志乃謂其「似孔子弟子」，則所失益遠矣」。 (原書第四五九頁)

今案緇衣一沈約奏書：「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于尼子」，與此義所引劉瓛不同。緇衣文體以規之，與中庸、表記、坊記爲近，而與樂記遠相遠，可證緇衣與樂記斷非一人之作，則劉氏云實出於誤記無疑。故欲論公孫尼子，劉瓛殊不足據。(據余所見：表記、坊記、緇衣均係依記。)

其次，樂記文固有與荀子、呂覽、易繫諸書同者，然亦無緣遽可斷定樂記出於「劉瓛」。呂覽本成於雜纂，易繫亦係秦漢之際的儒者所爲。荀子雖是富有特創性的大家，但其樂論篇在全書中獨無注，且其「吾親於知而不知王道之易也」一節，同於禮記鄉飲酒義，而彼冠有「孔子曰」，此却無，則樂論篇蓋亦出於荀門之雜纂。情形如此，故與其謂樂記出於「劉瓛」，毋寧認樂論、呂覽、易繫諸書之出於劉瓛之爲宜。然爲慎重起見，余於與荀子及易繫相同之語，於文中則概予保留，蓋公孫尼子原書已失，樂記本經漢儒纂錄，究無法證明是否公孫尼子原文也。

「論語皆出荀後」一語亦有大病。即如論性一節便與荀子性惡說全異。荀子師主性惡，故對於文物術教之用均認爲外樂，而獨於樂則認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必不絕」，又謂「窮本極變，樂之情也，審誠去僞，禮之經也」，與其學說實相刺謬。然此等語在樂記中却甚爲從順，並不能感覺到有何的矛盾。

劉瓛稱的「公孫尼子」是否就是公孫尼子，還不敢斷定。但即使認其爲是，觀其徵引其說而尊稱之曰「子」與其斷定爲「荀氏門人」，何如斷定爲荀氏先輩之更爲合理呢？公孫尼子原書已失，今日所能接近者，僅樂記中所保留的斷簡殘篇，然在班固乃至長孫無忌的當時，原書尚在，前人下論必另有依據，僅據斷殘的資料與推臆而欲推翻舊說，勇則勇矣，則「失」實難保不比長孫無忌更「遠」了。

(九月八日追記)

中國文字的音樂性的秘密

尙人傑

中國文字應用於歌曲上的時候，時常發生一些不啻音樂性的感覺，但是又說不出其所以然來。因之，有人曾說過這是一類話：如果意大利語文是適宜於 *Bel Canto* 的，則中國方塊字是最不適宜的了。這種口吻，多不勝數，隨處舉例，如英詩人沙賽其至於說：『崇高的詩歌在法文裡是不可能的，正如在中國文字裡一樣。』(見 *Sonnetary, Lines, Vol. 1, P. 100*) 這種說法，都是冤枉了中國文字的，彷彿中國文字是本身異常地缺少音樂性的。

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在翻譯格律詩 (*Boyle's Odes*) 的「蘇爾梵格之歌」(*Boyle's Song*) 的歌詞為中文，又一次感到了方塊字的某種缺陷。使這翻譯不可能完成。忽爾，想到了第一句開始的一個四分音符，可以填上一「忽爾」兩個字，而唱如「*Whore*」印在一個四分音符之內儘可以唱入兩個方塊字，無須爲了這是兩個方塊字的緣故，而把一個四分音符變爲兩個八分音符。這時我才懂得「爾」這一個字原來並無母音在內，它祇是一個子音。把「爾」字用拉丁化來寫出，只是一個「*r*」而已。它是發不出喉音的。語音學的書籍中會教我們做一個實驗：我們可以把手按在喉頭的韻果核，而吐出這個「*r*」音，喉頭並不震動，假如我們吐出任何一個母音時，手指便能感覺到喉頭的震動了。

跟着我想到了中國文字中的商音字，如「子」，「斯」，「癩」，「史」，「慈」，等等是多極了，都是發不出喉音的。(*a, o, u, ai, au, au, ai, u, u*)

碰到這樣的子音方塊字的時候，我們今天的歌曲專家，也許會皺一皺眉頭吧，却常常慷慨地給這些子音以一個或甚至一個以上的音符。例如，胡適詩、趙元任曲底「也是微雲」中，這「是」字是一個子音，原來連一個音符也不能給它的，因為除非與母音結合，他自己發不出喉音的，然而趙元任給「是」字八個音符，拖了一個腔。我們因為習慣的關係，或許能聽出這是個「是」，但實際上唱出來的早已不是「是」，而是一個「是」字的聲齒底位置之下，一個「*o*」音了。其結果自然是一個不自然的「是」。

像世界各系文字一樣，中國文字有子音，但不同於其他文字的是，中國文字的子音獨立了起來，自成爲一個單字。所以父親的「父」，媽媽的「姆」，丈夫的「夫」，妻子的「妻」與「子」，伯伯的「伯」，特別的「特」，道德的「德」，孝順的「孝」，咳嗽的「咳」，都是沒有母音的單身漢而竟然獨立了起來的單字。

無須發聲，微微閉唇而吹，即得「父」，「夫」無須發聲，緊閉唇而吹即得「姆」，用舌尖略略的朝下彈一彈上齒，即得「特」；略略的朝下彈一彈上齒，即得到了「得」，「德」。它們原是子音 *i, v, m, p, t, d, b, k* 等等，但中國文字底特徵是它們本身都是單字，都各自可獲得許多個單字，牠們都含有意義，而都各自可獲得許多個不同的意義，最後，它們都儼然以有聲音自居。

語言學，語音學中，對於子音，母音的定義有種種下法，但有趣的是按照語音學說起來，其不同就在於母音可以「唱」得，母音乃是「樂音」(*musical sound*)，而子音却「唱」不得，子音乃是「*o*」音」(*Drums*)。保爾·巴西 (*Paul Pears*) 著「比較語音學概要」(勁復譯，大學叢書，商務版) 說得非常清楚：

「要把母音子音間的區別明確說出來，是件極不容易的事，但我們也能建立一個雖然粗泛可是比較正確一些的界說，若然我們說：凡是母音都是可以唱得的。可以唱得，是說將任何母音，按着音階中不同的音唱去，它的音質可以不變。(例如把一個 *a* 音，先按凡音唱，次按工音唱，次按尺音唱……音高是變了，而聽去還是個 *a*。) 這件事在子音是做不到的；若然不是一切子音都做不到，至少也該是 *i, o, u, p, k* 等音做不到。從這上面，我們可以把語音中母音與子音間的區別，與自然界一切聲音中所有的樂音與噪音間的區別，相提並論。」(頁一七)

當我譯下「蘇爾梵格之歌」時，想到在英文的 *BOYLER'S SONG* 兩字之中，只有三個母音 (*a, i, e, Diphthongs*)，可是有九個子音字——九個子音字在中國文字內一定是寫成九個單字的。而實際呢，十二個字母的兩個英文裡祇有三個樂音，或者說三個組合，同樣「蘇爾梵格之歌」六個單字也祇有三個母音，或者說三個組合。即「蘇爾」是一個組合，「梵格」是七個組合，「之歌」是一個組合。爲這樣的六個單字作曲時可只給三個音符。那三個音符是給「蘇」，「梵」，「歌」的，已經够了，當然可以給它們這三個字更多的音符，但「爾」，「格」，「之」三個字却無從給以音符，

一個音符也不能給它們。再說一遍，由於「蘇」，「梵」，「歌」三個單音中存在着母音，可以給他們更多音符，給他們拖腔；若是「蘇爾梵格之歌」被理解為六個可以獨立的音而作成的話，即「爾」，「格」，「之」也有了自已的音符，其結果不僅不自然，而且已經破壞了中國文字底音樂性。中國文字的音樂性的秘密存在於子音單字與母音單字的組合中。

現在讓我抄下前述這個歌的譯文：

忽爾冬季已過，
忽爾春季已息影；
夏季的花兒凋落，
秋季的樹葉又飄零；
但是雖然時令有變易，
我知道你要歸來，
忠實于你所答應的山盟海誓，
我在你家等待。

第一句：「忽爾」是一個組合；「冬季」是一個組合；「已」是一個組合；「過」是一個組合。按，「季」本身是一個發不出喉音的子音，他必須或者與「冬」相組合，或者與「已」相組合，才能發喉音；但我們看，習慣上「季」已經發出了音來，原來我們記得了「季」之所以有音，實在那是結合了的「季已」之聲。在這一句裡，它與「冬」結合尤宜。這一句的分組故為：忽爾——冬季——已——過。

第二句的分組如：忽爾——春季——已——息影。這裡「息影」兩字，可提出證明方塊字有不合理的行為，并且他是破壞中國文字的音樂性的罪魁。實在「息影」只是一個「醒」字的音。但「息」與「影」各有一個音，牠們如撞了頭必須硬是分開來，才不至把滑動的意義誤解為覺醒的意義。「息」字原無喉音，有音還不是依賴了依賴的「依」。可是中國單字就有不少這樣一方面依賴，一方面又不承認那「依」的性質。請看，它不肯和「影」字

結合，「影」字是「依音」——依賴聲音——的結合，「息影」唸起來必造成「醒」，我們的方塊字却硬要牠們分開了。因為一方面「息」是依賴了母音而成了音了，一方面牠又神奇地保持了牠的子音的獨立性。一個國家的文字中，乎音這樣的專制而不民主，自然這文字的音樂性受累無窮了。

所以第二句的「息影」這個組合是不合理的，聽起來一定聽成「醒」，恰與原意相反，因為這是一個試驗，它又能說明一個秘密，故不予改動。

不過說受累無窮並不是說我們的文字中就沒有了音樂性。不使子音字獨佔一個音符，使子音與母音得到組合，音樂性就可能出现了。我在譯詞中又試組合了「夏季的」（按：「的」字在口語中極爲「」而不唸爲「」，故歌中祇須視之爲「」）「花兒」，「秋季的」，「樹葉」（按：「葉」本係母音，但亦能與「樹」結合）「但是」，「時令」，「知道」，「你要」，「忠實」，「答應的」，「山盟」，「海誓」，而這些組合唱出來的效果，便不像直到現在為止底所有的歌曲，每一個單字一個音符所造成底效果底單薄而不音樂；相反的，中國文字的醇熟的，飽孕的，圓潤的，陶然的，流暢的音樂性便全部出現了。因為這是中國文字中暗藏的一個法則，依照了這個法則，大自然便向你揮灑，違反了這個法則，誰還有什麼別的道路可以捕獲文字中的閃閃發亮的音樂性了呢？

作者記得好幾次把自己的詩給作曲家譜音樂，有時她們要求我把詩翻譯成英文或者法文，那樣時作的曲便容易唱，容易唱得好。這確是如此地容易了，因為在英、法這些外國文字中，子母音是合理地組合了的，但是爲什麼我們不在中國文字中將子音的單字與母音的單字組合呢？

在中國古代文字中，原也有「複輔音」這回事，讀者如有興味，可參考「中山文化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中，蕭維新先生的一篇文章，前兩段說有人在做學術研究，這便是其一。但容許作者提及另一

件尤其重要的事，而不以學術的研討來結束。

這樣，作者大膽地說，便是中國文字的音樂性的秘密了。這是中國創作歌曲的基礎；或只能說是個新的起點！是的，因為抗戰以來，那風起雲湧的歌詠運動逐漸又比較沉寂。從技術上去再展開那歌詠，必須具有兩種條件，其一即是本文所述的子母音的組合，其另一是在應用數字簡譜時，必須取消那些「調」而一律用C調，這個我希望另有機會來討論。但我之所以提及這一件事，不過爲了要說明：在紙上解決中國文字的音樂性的問題，發現它的秘密，都不足以謂爲解決，不足以謂爲發現，那解決，那發現正寄身於歌詠運動中，也只寄身於其中。

惟有在廣泛的歌詠運動再展開之中，「藝術歌」的創造才有可能更臻完美。

這話是可以說的，在這樣的中國文字的音樂性的秘密被發現以後，中國的歌劇已經從不可能向可能走近了一步，但是要到達可能，除了創作歌劇，上演歌劇，主要的地還要着歌詠運動的展開，抗戰還沒有結束，何以救亡歌詠的聲音已不常聽到？

已經開始了的工作不能讓他停頓，且不談這停頓的另外原因，技術上使它停頓的原因是，簡譜而註明何調者的性能幾乎已發揮殆盡，今後惟有從C調簡譜走上五線譜的途徑可領，而中國文字的音樂性的發揮，前途正未可限量。繼續，我必須邀請中國的詩人們底對於這篇報告的意見。

詩人們常怪作曲家不譜樂于他們的詩，而作曲家常常苦悶于無詩可以作曲。我想首先應該讓詩人注意到這樣的子母音的組合。西方的詩論家說，文字固創造詩人，詩人尤應創造文字。中國文字的音樂性，日益豐富的話，有賴於中國詩人的尤多。

感謝那賜我的這幾分鐘時間底全國的音樂家的朋友，作者所敬重的作曲家們，我懇請你們賜我以意見。

大眾語新論

林曦

一言
文官跟白話中間的鬥法，好像已經成了定局：

白話一統天下，成了文藝的正統；文官棄甲換兵，作了舞台的軍閥，看來是再也無架可吵，無仗可打了。然而，其實却不然。羅莘田先生說得好：「從文學史上看，新舊兩派總是互相消長的，新的稍微消沉一點兒，舊的就會在那兒暗中煽動。它會借着政治勢力，利用人類的惰性，讓人們不知不覺走向復古的道路。」（國文月刊第十九期）上次參政會上，國語的爭執和不久前大一國文讀本全選文官的事實，都對我顯了出來；文官這個老軍閥，雖然表面上倒了台，實際上却和其他封建餘孽一樣，依然羽毛豐厚得很，暫時刻刻在暗地裡把活人向鬼話的世界裡拉，小看不得！

其實，要說文官的舊勢力，只是在「暗中煽動」，那也是故意閉了眼睛不看敵人的說法。我們無妨睜開眼睛大概瞧一下，就可以看到：文官的地位還是固執得很；文官的活動，也還彰明昭著得很。每天送到眼前的報紙，是文官；隨時收到朋友的來信，是文官；街上貼的佈告廣告，是文官；政府用的公文函牘，是文官；學生用的教科書大部分是文官或半文官；買兩本新文藝雜誌來看，是文官；好得很，整篇的文官少見了，可是仔細一翻，字畫

行間仍然夾雜了文官，好像菜油裡撒了桐油一樣，吃了叫你噁心嘔吐。

對於舊勢力，打倒，固然不容易；清剿，却更加困難。像文官這種陳腐的腐朽的表現方式，正天天攪混着我們民族的語言，使我們國民的意識，毒害着我們的新文學，已經是非從根到梢打我們生活中，頭腦中，作品上清刷洗不可的了。筆者以前提出清道不使話文字，主要也是指的這種文官殘餘和它與不良歐化結合的變種文官來說的。這種工作，今天我到還在還應當堅持進行下去。然而在這種消極的防禦外，要不進行更積極的攻擊，我們就無法讓它不假借政治勢力，利用人類惰性來把我們向後面拖。改革，也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難落後，誰就挨打！」

可是，要想認真而又澈底地和文官勢力鬥一鬥，白話的自身，要力求改進，却也是不行的。白話的發展，大概可分作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把舊小說的語言作模範，人人夾七夾八寫着南腔北調，而又斷不了文官的奶，五四初期的文學的語言，就是這麼個樣子。第二個階段，是指定一個地方的活語言（北平話）作標準，結果大家辦不到，仍舊是南腔北調地攪雜文官，胡亂歐化，造成「不中不西，不今不古，不文不白，非離非馬的駢字語」。

可是有人要問了，那應從一九三〇年以後，像吳其震、艾蕪、姚雪垠、沙汀以及一些新作家們的口語化文學，算不算一個階段呢？我的回答是，算！怎麼能不算呢？不過，可惜却不能算作「白話」的階段了；這時期，人們已經有意識地提出來了一個更能適合這種新語文的特質，更正確，更鮮明的名稱了，那就是「大眾話」。這是白話的一個長足的發展，然而却不就是白話。它明白確切地規定了文學應當採用現代中國工農大眾的活的語言，而不再會含混混講什麼也可像古白話，也可像知識分子的話，也可像北京話，也可像像話又不像話的「明白如話」了。

「大眾話」問題實際上是在一九三二年由宋陽（就是瞿秋白先生）提出的，起初他將之作「現代中國的普通話」。到一九三四年才由陳子展先生想到一個更簡單明瞭的名字：「大眾語」，並且下了個定義說它是：「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後來胡愈之先生主張在這個定義裡一點兒，指明必須表示「大眾的前進意識」；瞿陶行知先生又添了一點兒，主張須得加上「寫得順手」一個條件。打這兒全國響應，形成了一個廣大的運動，給現代中國文藝投下了大得不得了的光彩。這個運動最後向兩方面發展，一方面是內部起了普通話和方言的論爭，一方面是走上文字形式的具體解決，把這大討論帶上實行的道路。

採用拼音文字一點，馬上得到文化界一致地贊同（最具體的表示是蔡元培、孫科、魯迅等一千多人的擁護宣言）。除了爲着幾百分之二的小問題，四聲標不標準和國語羅馬字派起了爭論，並引起一些根本反對者的隔靴搔癢的批評以外，在學理上，並沒有多少架可吵。可是另一方面，普通話和

方言的廢除，却還留下來，直到今天還沒完全解決。

近兩年來，在創造抗戰的現實主義文學，直白地寫抗戰，寫人民，寫生活的要求下面，又把文學用什麼話寫的問題迫切地提出來了。有的作家發表經驗談（像姚雪垠、艾蕪、），有的作家提出困難和疑問（像在桂林的作家們會集時討論，記錄見文化雜誌二卷三期；吳祖湘也提出了方言創作的困難。）有些老作家像蕭軍、蕭軍、郭紹虞、茅盾等），有些語文研究者提供改進的意見（像伯韓、黃楚清、羅莘田等）同時，反對的意見也不是沒有，像胡秋原和某些雜誌編者，就堅決不承認有什麼大眾語，也反對方言文學。這些討論，雖說沒會輾轉喧天，響聲四起，却也彼此引起，你來我往，討論得切實而不寂寞。再加上國文月刊不久前發表的羅莘田、揚振聲兩教授替白話呼籲的文章，文法改革問題的討論，詩歌語言和格律的研究等等，凡這一切，都顯示出來：在抗戰迫近勝利，人民大眾的力量一天比一天昂揚，激發教育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創造達到新階段的時候，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和交換工具的語言文字的改造，已經沒法兒再就擱擱延下去了，展開廣泛深入的討論，現在正是一個好當口兒。

一一

大眾語的討論，不應當籠罩在文學語言問題的小圈子裡。語言，是人類從勞動中創造出來，經過長久歷史演進，又由現代的大眾從勞動生活裡發展和繼續創造的。在現代生活裡，我們可以看見，語言這玩意兒，主要在盡着三種功用：第一

是一般人和人中間傳達意思，表示情感的手段。凡日常生活中的接洽，應酬，解說，命令，打電話，寫信等等都是，可以叫作生活的語言。第二是知識的記載和傳達。凡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歷史記述所用的語文都是，可以叫作知識的語言。第三是對現實生活和感情的藝術地反映和傳達。這包括一切文學的語言。要一般地談大眾語，那在今天主要就是替人民大眾找到能盡這三種作用的工具，同時也是替民主的科學的意見和大眾的文學表達合適的媒介。文學語言問題在大眾語創造過程中，也許是表現得最集中、最尖銳的一方面。然而到似乎不太好用在文學上是否够格，來評斷大眾語的價值。吳稚暉老先生所說的「文學不死，大綱不止」，固然覺得偏激，然而在他強調語文改革並不限於文學這一點上，却是有獨到的見地的。

如果不但把大眾語問題看得那麼小，那麼我們的任何改造方案，就都得從現實的大眾語言生活出發。今天工業大眾說着什麼樣的語言？從廣大的農村到工商業的大都市，明明白白是存在着七語方言到普通話這一系列語言的。無論人們怎樣討厭方言，說他落後，說它是封建的，反歷史的，想死它消滅，方言却仍然是普遍地活在廣大農民層上，使你沒法離開它而建立起理想的進步的語言。無論人們怎樣不重視普通話，普通話却隨着產業的發展，交通的暢通，和戰時軍民的大移動，而一天一天地在發展，在社會生活中盡着不可缺少的功用，使我們也無法丟開它另外設想形成民族統一語的道路。是生活決定語言的。並不是由文學家的意願，而是由人民大眾在歷史上的翻身和抬頭，提出了思想和表現形式改造的必要，也決定了：活在他們嘴上的語言才是我們語言改造的基礎，創製為他們能方便使用

文字才是語文革命的目標。因此，大眾語是什麼和應當是什麼，是要從實際上什麼樣的語言在盡着上述那三種功用，和怎樣才能更有效更完美的盡着些作用的觀點來看的，不能從其他的觀點。

從這個觀點看起來：那種採用一種方言作為標準語的辦法，是撇開大眾的資產階級的辦法，是空想而不能實現的。這種強硬的，冒充的標準語，如果強制推行的話，那就會使這一方言區以外的鄉下老百姓沒法說出他們的痛苦，而吳、粵、客、閩、乃至東北、西南的各省區的參政員，在沒學會這一方言以前也將都不敢發言；連藍青官話也永遠會成為笑話。

從這個觀點看起來：請哪一種話漂亮，哪一種話特別富於表現力，因此最配作文學的語言，這種審美的觀點，也是可笑的。試問北京話雖說怪僻利索，蘇州話雖說怪和，可是給一個潮汕工人聽來，樣樣都不懂，有什麼漂亮好說呢？有什麼表現作用可講呢？

從這個觀點看起來：那種不分主從，主張揉合文言、白話、方言、外來語的純粹的所謂「民族語言」論者們是糊塗的。請你們說說看，你們的純粹和好的標準是什麼？過去「不文不白不今不古」的羅子話的作家們，難道不都自認自己所寫的是語體珠璣，字字精粹麼，為什麼那種雜拌兒今天吃不開了，弄得我們還要再來再改革呢？

既然不同意那主觀的，一思想情願的語文改革辦法，那麼對於一些作家們認真討論的意見怎樣看法呢？在近兩年來的大眾語建設方案裏，我上面說過，大體上是有兩種派別的。一派是主張現有的白話文加上一番改造，發展成爲一種普通話，請以姚雪垠先生作代表吧，他的方式是：

「知識分子的白話」不必要的歐化
文言淺近土精煉土語」×用漢字寫「活的文學語言」

另一派是提倡方言文學的，其中又有兩系。一系是方言起頭，一般文學語言收場。請以何家槐先生作代表吧，他的方式是：

「方言」必要歐化「文言精粹」×用拼音文字寫「新文學語言」

另一系是完全主張要有一種真正道地的「方言文學的」的，請以伯韓先生作代表吧，他的方式是：

（各地方言十外來語彙）×用漢字夾雜注音符號寫「方言文學」

所謂派系，自然只是筆者爲了行文方便而隨便亂加的。其實這諸位先生都是很虛心客觀提出自己的意見，並沒有門戶之見，自己也沒有列出公式來。但是這幾種意向的不同，却可以用這種方式表現出來的。

這兩方面的意見，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各各強調了現實的大眾語的一個方面，而沒有確切認明今天大眾的語言實在是從方言到普通語言這一系列的語言，單靠方言或單靠普通話都辦不了事。要想叫這種語言立時三刻就能替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就必須既然強調使用方言，又要主張促進普通話，並且使兩者互相補充、融合、不斷地改進，最後發展成民族統一語（或者就簡稱「國語」也好）。有兩種極端的意見，一直在那兒存在着。一種是用對落後的罪名，跟歷史的藉口，根本排斥方言的使用，像葉青、張海非、胡秋原之流。他們的意見，很簡單，抗聯建國革命都好，是資本家有智識的上流人的事情，農民和工人是落後的，不許參加進

來，他們的語也不算話。另一種是用不存在，不見實作理由，壓根兒否定普通話的意義，像正微、葉錦熙諸先生。在他們看來，普通話既然沒具有固定性的子音母音，一定的辭彙和語法，自然算不得一種語言。他們不知道普通話本來只是一個階段，它的所以普通，正因為它不具有固定的音、形、義、用，而是在滄合發展之中。說普通話不存在，正和說小樹不能叫做樹也不能成爲樹一樣不合理。大眾語是今天的語言，也是明天的語言。而且，一定得是在今天現實社會中就能起巨大的作用，發揮出教育、教育、團結、組織的作用的語言，才能得到充實和改進，形成明天的語言。我們唾棄那語言自然生長說，而且主張對語文的人力改造是可能和必需的。在改造過程中，我們也應該有個草圖。可是，有一點必須指明，那就是：這張草圖却得根據現實的語言和它的發展規律來起草。

三

我們不但要強調方言在文學、科學上的使用，主張促進普通話的形成，把這兩者都認作大眾語；而且更願建議，方言要不怕地方性，應當儘量是眞的方言；而普通話也要不怕普通性，應當儘量是大眾懂得的話和文字。過去我們只聽見囉囉的討論，不見放開手作的成績，就正因為吃了既重國語，又怕失彼的虧。你提一個條件，我加一個限制，戰戰兢兢，小小心心，惟恐方言太落後，而普通話又太無血色，弄到結果，不能大量產生大眾語作品來。在過去的討論中，因爲未曾把方言和普通話的使用清楚的分開又聯合起來，所以許多意見原本對於一方是好的，而內爲在另一邊行不通，就受到反對。比方：「使用方言，要使人能易於看懂，而且要在

沒有更好的東西代替的時候才用」（宋雲彬）。這意見用促進普通話上好，可是用對方言文學上就是死路一條。好的「那我們就專在普通話的發展上築附」。又像「多采方言，用多了才能普通化」（魏繼德）。「要提住大眾話中表現最深刻的，被拋棄的，而不要只提住一個模型」（楊曉），這意見正及所以用方言的理由所在，用對普通話上，結果就會阻礙通行。好的「那我們就專在提倡方言文學上築附」。想當年施耐庵、曹雪芹、跟金瓶梅的作者下筆時，大概並沒考慮到如何方言又可使人人都懂的問題，這他們才寫得來得口通，人物活現，直到今天大家還覺得得懂而且硬是要看。可見得方言文學是要放胆寫，越不怕有地方性才越能寫好的，既便方言又要普通，那寫出來，會成個什麼東西？至於大眾語的落後意識，單顧形式，我國魯迅先生的話，應該明白承認，一點也不須隱諱。然而，這是在生活中改造，並竭力介紹科學思想進去以後才能改變的，單在語文上嚴說禁寫，是沒有多少用處的。不包含落後性的詞語恐怕是沒有的，因爲他們都是歷史的遺留，而歷史是由落後進化的。可是在進步生活中用久了，這詞語落後性就會消失，進步性就會生長。比如「太陽」，現在誰還承認它是純粹之權呢？況且方言文學的對象，主要是一個方言區域的幾千萬萬或者頂小也有幾十萬的人民。寫作的目的是要叫他們喜聞樂見，至於作得好了讓別的地方的人也高興看，那是附帶的事情，正不必像個新學子，因怕別人道短長，而自己不敢吃飯睡覺。照現在的書業行情，縱然是一部老家的普通白話小說，覺得頂好，也不過幾萬本。如果一部方言著作，在一個方言區域能家傳戶誦，那作用和價值也就只會勝似，不會不如這樣白話書了。

那麼，它對於大眾文化，貢獻難道還不大嗎？至於作家，在使用任何一種方言的時候，自然有他錘煉和改進的自由。任何語言的一般體系和個別的具體使用，總是有着矛盾的。讓現代革命的、科學的思想和一個現代人對現實的親感瞭解，在一種比較後的語言中尋求表現，自然更得容許極大的自由才行。然而這種錘煉和改進，必須先尊重一個方言原有的體系，認真地要大眾瞭解，在無可代替的時候加入外來成份，新造詞語，而不是簡單的代替或壓高助長。所謂進步不進步，不光只是和別的語言比較，而且要在這種語言本身中尋求。只有順應一種語言自身發展的規律，發揚它進步的成份，壓低它落後的成份，才會是有效的錘煉和改進。一來就害怕他太地方性，太落後，不敢深入到他面，那是既沒法使它新，便他美，也沒法使它進步的。所以，在今天的境況下，我同意老舍先生（這位國語派所奉為圭臬的北平語文學家）的意見，與其寫假國語，不如要作家們青年們大膽的儘量用自己所熟悉的方言來寫作。（「文壇」第七期）

另一方面，對於普通話的作品，却又要竭力發揮普通話的長處，千方百計使它有更多的民眾可以懂得。根據現在各地方人民到一時期所使用的這種普通話，和已經流行了幾十年的紙上的白話，研究它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減去當中那一時的、偶然的、孤立的成份，發揚那最有普遍性，最能適用於共同的生活，最必需的成份，找尋出使用和創造上所應當注意的道路來。這就藉語文研究的見地，隨便提出幾點意見來供大家參考吧：

在詞彙上——儘量用各地方言中共同的或較近似的，或者那在各個方言區中雖說不一定用，可是能够懂得的詞語。但是，如果是生活所需要

的，不論哪種方言的詞語，都可採用。同時應盡事實的需要增添多音詞兒，從各方言抽取必需的詞語，關聯等虛詞，讓他通行而且標準化。

在語音上——但求音位的大致相近，不必顧音素的小小不同。甚至可採用各方言最大公約數的音位，作出一套說來不太感困難，而又互相可懂的字母表來。比方說吧，在這張字母表裡，
p, t, c, ch, s, sh, h, n, l, n, n, o, o, e, th, b, d, t, d, s, m, s, t, m, b, (在特殊情形下), en, em, in, i, ei, ... 等組的音共用一個符號，不強制不能分開的非不分。字母表不十分固定，隨時可跟着生活上流行的新的方言詞兒，添加新字母。

在語法上——就現在流行的普通話，參照古白話小說，研究出普通話法來。當中特別注意普通話中怎樣利用口語的語根，語頭，語尾形成多音段新詞的造語法，以及在方言交融跟歐化後，明白、周密、婉轉的新句法如何產生和發展的法則，在寫作上，加以利用。

在文字上——進行一種最簡便，合理而又有充分發展餘地的拼音文字。
在應用上——創造普通話新用文的典範，把最爲人民所需要的經典，歷史和古典文學翻譯成普通話。全國性的報紙全用普通話。

這樣以來，上面說的語文三種功用中間，起碼有兩個可以充分完成。至於文學的使用，在今天主要是靠着他合於泥土氣息，血汗味道的方言的，然而，普通話的文學，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一般說來，文學上的語言，可以分作兩部分，一部分是敘述的，主要是作家自己的語言；一部分是記錄的，主要是「話怎樣說，就怎樣寫」，記錄所寫人物的語言。記錄的語言要求如實，也就是說儘口逼會。

然而所謂「如實」，主要是要求合乎人物身份的典型語言，並不一定非要死死的連記某個特殊人物的語言不可。縱然是客觀的記錄語言，究竟也還是作者在替他所創造的人物說話。一個作家可能寫山南海北中國外國的人，但不一定可能或必要在作品中寫出各地各國的話。這就證明了，只要抓住典型性，用普通話來寫文學作品，也是可能的。這種如實，只是這樣寫出來的語言，究竟和翻譯一樣，再好也是第二手的。要作到恰到好处，前趨死然，恐怕比用方言要化費心血更多。從這點看起來，魯迅以來那些勉力用普通話寫作的作家，仍有許多值得我們感激和學習的地方。

實在說起來，我們今天的希望也並不過奢。如果能夠充分發揮大眾語的特長和優點，寫得有聲有色，固然好；雖然不能如此，而能夠消滅了不健康的方言成份，作到大體上合乎活的語言，而不弄是文言或新文言，也就够令人滿意了。更明白點說，那就是：我們要徹底消滅文言，改造白話，推舉大眾語。這大眾語，明白確切毫不含糊地是指今天活在工農大眾嘴上的語言說的，從方言到普通話都包括在內。方言和普通話這兩者要清楚的分開然後再聯繫起來。寫方言不怕寫得「方」，寫普通話要儘力寫得普通。我們應該確切地相信，只有使今天的大眾語能充分完成他啟發教育大眾，表現出大眾思想感情來的任務，明天的大眾語才能產生出來，發展下去。

這就算 是 批評 麼？

沈友谷

近來在好些刊物中常常可以讀到「批評」馬克思的思想與說的文章。本來，只要是真正學術研究，總是有益的事，凡繼承馬克思的思想與說的人也從來不拒絕考慮人們所提出的不同意見。但是一切學術批評在根本態度上總該遵守這起碼的兩個條件：

第一、要批評一個學說，首先對於這學說本身總該了解得很清楚。你可以不同意這個學說，但你決沒有權利把這學說的真實內容加以歪曲，改造，以達到你反對他的目的。在民主主義的生活中應該有互相尊重的精神，在學術研究上也同樣。假如在批評一個學說時，故意把他描寫成完全不是他本來的面目，那就根本失掉學術研究的態度了。

第二、批評一個學說時，假如自己並不是第一個批評者，那麼就該看看以前人們怎樣批評的，假如自己的批評並沒有超出前人的範圍，那就得看看對方有沒有答覆過。假如答覆過而自己仍不認為滿意，當然再可提出批評，但也就一定得有新的更有力的意見提出。反之，倘若說來說去，還只是把人家說過一千遍，而且還被一千遍駁倒了的話，再說第一千另一遍，其不知那他的精神縱可佩服，但和學術研究也就相差得太遠了。

我雖不敢說，今日國內一切批評馬克思的文章都有背於這二原則，但我所看到的這類文章，很遺憾的，不能不令人懷疑，這些文章究竟是出於學術研究的目的還是職業的目的呢？在這里，我只把隨時看到的這類議論，引證一點出來給大家看看。我不願意多加說明，因為這樣的批評只要一和馬克思自己寫出的文句一比較，就已顯得非常可笑了。我只想說明，用這樣的態度來進行「批評」，則雖然不是同意馬克思主義的人，只要他有志實於學術的

良心，也不能感到滿意的。

先舉一個歪曲馬克思的最笨拙的例子。

有一位勇敢的「批評」者想證明馬克思主義是「反理性與反理想的政治學說」。(註一)他說：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思想都認作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就因為他們頭腦里充滿了理性的成分」。他又抄引了恩格斯的兩段批評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文章和馬克思的一段說明他的科學研究方法的文字，於是這批評者就努力使自己相信，馬克思主義是主張在頭腦裡放逐掉理性成分的，所以馬克思主義是「反理性」的。

但這個批評者的努力是徒然的。第一，他雖也引用了恩格斯的說明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書中文句，但他並沒有讀懂這本書。在這本書中，恩格斯並沒有一句話是說因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頭腦里充滿了理性」，所以應該反對，他說的倒是：「我們所極其喜悅的却是能享用最初社會主義者天才思想的萌芽，這些思想在幻想的外殼之下，散佈於他們的著作之中，可是俗物却瞞着眼睛不見這些。」這些空想主義者敢於把一切既成制度關到「理性的審判台」前來，并想建立一個「理性及永恆的王國」，正是恩格斯的書中稱道不置的。恩格斯批評他們只是因為他們「不懂得開明在資本主義中僱傭奴役制的本質，不能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法則，也找不出能變成爲新社會創造者的社會力量」，因而也不能指示出實際的出路來實現「理性的

「王國」。因此，社會主義才有從「空想的」改造成「科學的」的必要。但這些其實都是常識問題了，我們也不犯着因為「批評者」不懂而多所申說。其次，這個批評者居然想從馬克思學說是一種科學，由而證明馬克思學說就是反理性的。他說：「反理性的成分，構成馬克思主義所謂『科學的』的特質。」——這個奇怪的說法恰恰表現了這個批評者的腦子裏，代替了理性，是有着何等混亂的東西！關於這點，倒還值得我們來多說兩句話。

原來西歐的資產階級學者也會「批評」說，馬克思主義是不合「倫理判斷」的。這意思是說：馬克思主義只說明社會的現在和將來是「如何如何的」，而並不是判斷社會應當如何如何。這個「批評」顯然不足以傷害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指出，社會並不因為人們以為應當如何便如何，總是遵循着自己的法則而進行的，所以我們第一步先用科學的方法來了解社會到底是怎样發展的，而在了解了以後，人們也就知道了應當如何努力來推進社會發展，這種「應當」才會變成現實。所以馬克思主義是把所謂「倫理判斷」和科學判斷結合在一起，假如他一點也沒有「倫理判斷」的意義，並沒有指示人們應當做些什麼，倒也不會引起資產階級那樣的反對了。西歐資產階級學者倒並不真是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意義，其所以提出這點批評却是因為他所謂認為應當的，被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所否定了。他們認為，社會應當不變，而馬克思主義却指出社會是要變的，並應當努力使牠變。但我們的「批評者」却在抄襲了這些話後，表明了他不但不懂馬克思，也不懂「批評」馬克思的西歐資產階級學者，所以他竟由此得到了結論說：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所以是「非倫理的」，也就證明他是「反理性」的了。在低能的程度上，也的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可是你既然「批評」馬克思主義因為是科學，所以是「反理性」的，那豈不恰恰證明了你自己所主張的「理性」是反科學的麼？

在今天的現實世界中，科學與反科學，理性與反理性正是分別民主與法西斯的標準。科學的分析說明了世界趨勢是向民主主義的徹底勝利前進的，但法西斯主義者不願這些，偏要胡作亂為，因此法西斯主義也就不得不反對清明的、正視現實的理性主義而提倡盲目的信仰主義了。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反理性、反科學的特性。相反的，民主主義者，就以理性與科學作為鬥爭的武器，他們在理性主義的精神下發揚科學，在科學的基礎上建立理性。理性與科學正是二位一體的。在人類對於社會的科學了解還不充分的時候，他

們的「理性」不得不蒙着「幻想的空壳」，那就是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而在已經有了充分的科學了解以後，却堅決加以排斥，並主張理性是反科學的，那豈不表明他的頭腦中有着的正是法西斯主義者的「理性」麼？那不就是揭着「理性」的招牌的反理性麼？

此地所以把這問題說得很多者，倒並不是因為這個「批評者」侮辱了馬克思的思想，（假如理性照這位先生所了解就是反科學的意義的話，那麼馬克思主義正以「反理性」為榮）而是因為他也侮辱了孫中山的思想。他在「批評」了馬克思主義以後，接着說：「三民主義並不需要假科學之名以行，主義自主義，科學自科學」。這就把三民主義解釋成是與科學無關的一種思想，是不根據科學的一種思想，是只有「理性」而沒有「科學」成分的思想。這是何等可憐的說法啊。可是這位批評者居然還是很厚的一大本闡述三民主義學說的著者，而三民主義者中尚未見有人出而批評此種謬說，所以我們就不得不說幾句了。

二、

要「批評」馬克思主義當然就不能不接觸到唯物論和辯證法。

唯物論本不是專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但能推翻唯物論，當然也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掘空了。請看他們怎樣反對「唯物論」。

有人想根本否定宇宙間物質的存在，他們說，物質歸根結底還是心。支持這見解，不外乎再搬運一些從主觀感覺論以至新康德學派的腐敗理論。但「經抄襲，不免每况愈下。所以為了證明「物之極爲心」，甚至作了這樣可笑的議論：「例如一種花從閉至放，歷時三日，而花之面積盈寸，如將此盈寸之花，放大之於銀幕之上，而將其三口過程加以縮短於一秒鐘演出之，則見此花勃然怒放，生意盎然，向之見其純爲物質者，今乃見其有精神」。

（註二）——這位先生的哲學原來不過是從電影攝影師那裡學來的。馬克思主義更把唯物論運用到歷史上去。在這方面，「批評」者以為他們找到好的進攻點了。但可惜他們所能使用的武器也都已是上了鏽的了。像把歷史的唯物論解釋成是幼稚單純的技術決定論，從而取笑之的方法那已經不值識者一顧，因為馬克思所說社會發展的決定動因是物質生活中的生產方法，而生產方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結合）本不是單純生產力，更不是生

「批評」者又說：馬克思既把物質生活當做精神生活的決定因素，那麼就可見得馬克思根本否定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精神力量——人的主觀力量。「批評者」還興奮地以為在這裏的確就是馬克思的致命傷了。他們說，假如馬克思主義承認他否定精神作用，那麼可見他主張的不過是腐敗的物質享受生活，可見他是根本否定人在歷史中的主動性的；而假如馬克思主義不承認他否定精神作用，這又和他的唯物論體系矛盾，就可證明唯物論和歷史的唯物論根本站不住了。——前舉那位「批評」者說馬克思是「反理性」，其本來意思也就是說他否定了主觀力量，而法蘭斯主義的哲學基礎正在於否定客觀事物的規律，只從主觀的意志出發來盲目地強調主觀力量。答覆這種「批評」，其實還不必馬克思主義，因為從培根以來的自然科學家已經懂得只有服從自然才能控制自然這個道理。隨便找一個忠實於他的工作的醫生，都能答覆這些「批評」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所不能通過的難關。醫生在臨牀時，根據人體有機體自身的生理歷程而進行醫治，在這點上他是唯物論者，他絕不相信他可以按照他主觀的意志而進行醫治，但他也絕不以為自己主觀作用對病人無能為力。

馬克思把唯物論從自然界發展運用到社會中，其基本原則並無不同。固然唯物論思想也有低級的，它完全忽視了人對客觀的作用，但這不是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就批評過這種唯物論說：「以前的一切唯物論——包括費爾巴赫的唯物論在內——之重大缺點，就在這種唯物論只在客觀的或直觀的形式之下，去把握對象，却不是看作人的感覺行為，不看作實踐，不是主觀地去把握。」並且說，這種唯物論是「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此人的改變是環境和教育的改變之結果，却忘記了正是人來改變環境，而教育者自己也要受教育」。(均見「費爾巴赫論綱」)馬克思把唯物論和辯證法結合起來，正是要克服那種舊唯物論的偏向。史的唯物論不是取消人的精神活動，而是給人的精神活動作了恰當的說明，並且因為史的唯物論把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揭露出來的原故，便更加強了人對社會的主觀作用和控制的能力，正如自然科學把自然現象的發展法則揭露出來，便更加強了人對自然的主觀作用和控制能力一樣。

以為承認人的主觀作用便是否定了唯物論，這更是可笑的見解。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區別並不在一個承認主觀作用，一個不承認主觀作用。恩格斯說得好：「人的行為，必須經過人的頭腦，——這是事實上所必然的。外界

對於人的作用先及於頭腦中，在其中反映成感情、思想、衝動、意志，總而言之即「心潮」，在這個形式之下便成為「心力」。如果一個人追隨「心潮」的發展並承認「心力」的影響，就算是一個唯心論者，那麼無論那一個人都算生下來就是唯心論者，如此何以世界上又有唯物論者呢？」(費爾巴赫論)原來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差別本不在此，而是在於對精神與物質的先後和依存的關係的看法上。一個唯物論者承認了物質是先於精神而存在，並且精神是物質的反映，而人的主觀行為只有在符合於客觀實際的發展趨勢時才能發揮其真實的作用，那麼他絲毫也不必取消人對環境的控制力量。

「批評」者認為主張唯物論便是精神生活的墮落，這不僅是對馬克思的侮辱，也是對一切唯物論者的侮辱。恩格斯會駁斥這種論調說：「如果有一個為追求『真理與正義的熱忱』(就這一句話的最好意義來說)而犧牲自己的生命，那就是狄德羅」。又不吝氣地揚聲說：「法利賽人(偽君子)聽見唯物論者這個名詞，便以為這就是餐餐、酒酒、縱慾、愛財、貪婪、吝嗇、舞弊、欺詐、腐而言之，即是他們自己在舊習中進行的一切無恥的罪惡。」(見同上)然後就把自己所犯的一切罪惡，不顧對方到底是否贊成他的主張，怎樣的人，一古腦兒加上去，從而使自已感到的確比對方高尚；這就是唯物論的卑劣的反對者已經使用了一千次，一萬次的老方法。但是用這樣的論證來推翻唯物論，其不自量力豈非是更有過於「螳螂撼大樹」麼？倘以有一位挺身出來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先生就在這點上，儘得了戴捕乃是聰敏的辦法。他說：「唯心，唯物，哲學史上互駁幾千年，毫無結果，再駁也不易加多，不駁也不必加少。(這七字實在不通，但我們也不必於此苛求了。——引者)只插一句，「我也不是絕對唯心主義者。」這也够態度明白了。」(註三)但他只能說出自己不是什麼，而說不出自己到底是什麼，恐怕他自己對自己也還不「够明白」吧？

三、

但這位「不是絕對唯心主義者」的先生却很有自信，要在反辯證法的基礎上露一露身手。他對辯證法的批評是：「馬克思等不講辯證法則已，講之，就不能不承認相對了。假使承認相對論，何以又要絕對唯物？……何以又講絕對的必然性？……」(註四)這樣的說明相對與絕對，只是他的杜撰，

馬克思自己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從未如此說過，這腐他有說：「我知道辯證法是從絕對的基礎上表現相對的，而克服兩者間的鴻溝」。但對於這個公開發表受意大利法西斯的「行業組合的精神與制度」(註五)的人，我們本來也不必要求其過於胡扯的什麼議論。值得我們來提一下的是這個「批評」者還有一層意思，雖然也許因為他文字能力較差，不大能表達這層原故，而說得不甚清楚。那是說：既然辯證法是講「相對中的絕對」，那麼也決不可以把牠「絕對中的應用」，使之歸化於傳統的中庸主義，那就可以使辯證「可怕」的辯證法變成溫馴的奴才了。

這一點也正是別的有些「批評」者所採取的方法。既然辯證法反對不了，何不就把辯證法拿來照自己的口味改造一下了這，正像莊子所說的，大盜在打不開箱子的時候，就運箱子一起搬運去一樣。不過太盜所運的還是箱中的財物，而他們所要的只是一個空殼。本來，辯證法也並沒有蓋着「馬克思」的印章，在哲學史上有誰辯論的辯證法，有主觀唯心論的辯證法，有客觀唯心論的辯證法，最後就有唯物論的辯證法。辯證法之所以成爲一個有力的武器，乃是因爲牠和唯物論相結合了的原故，當二者一旦結合了的時候，辯證法就不再是可以聽任主觀的願望而隨意「運用」的了。至於你硬把辯證法拉出來自由「運用」，那不過是使辯證法的生命絕滅，使牠和你自己一點關係都沒了。但你就沒有權利用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也對馬克思主義妄加損害。譬如以爲這樣一來就算打倒了馬克思主義，那不過是可笑的阿Q而已。

不過就在反辯證法者中，也有不明瞭這種偷天換日的「策略」而起來反對的。如有一位先生說：「不料近來在學術界中亦有人用辯證法來解釋三民主義的，說：『辯證法與三民主義極有相同之處，真能合辯證法者，亦唯有三民主義』。我對於這種說法，無論他的動機如何，認爲均無成立的理由。這種新奇的說法，如出普通人的口中，原可付之一笑，但出於『學者』之口，我們認爲影響很大，不能不提出討論」。(註六)在這一段話中，除了對所謂「學者」不免估價過高一點(何曾有什麼大影響？何嘗不可付之一笑？)以外，其餘我們也可同意。至於這位說話的先生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批評」也還值得一說，因爲也可代表一種「批評」方法。

這種「批評」把辯證法描寫成是從先驗的範疇與決則出發的演繹方法。比如這位「批評」者就說：「馬氏的理論是由一個固定的公式演繹出來，所以理論的簡單，十分整齊，……他們先要承認自然界有一個客觀的辯證法程

Dialectic Process的存在，而後在思維方面才可以運用這個辯證法去理解，先假定自然界有這個辯證法程序，然後從這個自然程序推演出歷史程序，從自然法則推演出歷史法則，然後天人一貫，有源有本，才能構成一套形式完備的理論。」這個「馬氏的理論」和方法的描寫，只要稍讀過一兩本馬氏的書，而不故意加以歪曲，就顯然可以看出完全出於捏造了。這段描寫用來說明黑格爾的辯證法還有點近似，但用於馬克思的辯證法却完全不合。「批評」者力說馬克思的辯證法就是從黑格爾抄來的也是枉然。因爲馬克思自己已經說過：「我的辯證法不僅在根本上和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且正相反對。在黑格爾，思維過程，——他給它以『觀念』的名稱，把它轉化爲一個獨立的主體——是現實之創造主；現實僅爲思維過程之外部現象。但在我，觀念界却不外是移植在並翻譯在人類頭腦裏的物質界。」(資本論第一卷序)所以馬克思的辯證法的方法，正和這些「批評」者所想像的相反，是從具體的現實出發，搜集材料，分析研究，然後對於現實的運動，給以法則性的說明。

「批評」者從何處來證明馬克思是由預先規定的固定的公式來說明現實的呢？顯然他是不出證明的。他只好說：「恩格斯一派的人對於夢的產生，小雞的破壳而出，亦不肯輕易放過，說這些生物都是根據自然界的辯證法則而產生的」。好的，就着恩格斯。這里所說的夢的例子，大家知道，是出於「反杜林論」一書中。但這位批評者較如真誠過「反杜林論」，而還敢如此大言不慚，就未免太厚顏了。原來恰恰就在引證夢的例子的那一章上，恩格斯那樣切實地給杜林一個教訓，因爲杜林對馬克思的辯證法的歪曲方法，正是我們這些「批評」者的洋祖宗。

杜林比我們的「批評」者還高明一點，他究竟還看過「資本論」，所以他能更巧妙的引證歪曲說，馬克思在說明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時，只是從「否定之否定」這一個預定的法則而演繹出來的。但事實上是如何呢？却正如恩格斯所回答：「當馬克思把這過程形容爲否定之否定的時候，他並不是用『否定之否定』來證明這過程的歷史必然性；相反的，他先在歷史上證明，這過程一部分已經在事實上完成，一部分一定將要完成，以後，他更指出這是循着辯證法則而完成的過程。」很明顯的，一切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用辯證法則來證明什麼東西，而是證明現實的發展過程中的辯證法則。恩格斯之於麥子的例子的時候，還特別說明：「我們只證明，否定之否定，實際上發生於動物及植物的兩個有機界中」。他似乎已預見到後世也會有人來歪

曲他舉例的意義，所以才準備下這句話；但是他沒有預料到有一等「批評」者連他的話也看不懂，或根本不打算看懂！

但我們也必須實實的說，對於馬恩的辯證法的「批評」，今日的「批評」者不能超過杜林的範圍，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除了反覆說這些話以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總而言之，對辯證法的「批評」總不外乎這二者：或努力使牠墮落為中庸主義，從而加以利用，或竭力把牠歪曲為先驗的圖式論，從而加以攻擊。二說雖亦間或發生抵觸，但是其為把辯證法和唯物論硬分離開來，增以主觀主義的汚血則一。不過假如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真是主觀主義的產物，正如牠的唯物論假如只是物質享受主義一樣，還勞諸公較盡簡單的腦子來設想出種種說法加以「批評」，以至拋頭露面，出了這許多醜態！

四、

馬克思學說還有政治經濟學這一個重要的方面，職業的「批評」家們當然也不肯放棄在這一方面出醜的機會。但是知慧能力遠比冒失的大胆落後，却是無可奈何的命運。比如有一位看來不過小學四年生程度的先生也來嘗試一下「批評」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他說：「每一商品在生產過程中，雖然有由原料及補助材料之消耗而成為商品的新價值，更有機器及其他設備——生產工具之一部分消耗而轉變為商品的新價值，但馬克思以為這些轉變，在新商品的量上沒有變化，因之不會創造新商品的價值。」（註七）說來好像馬克思是這樣糊塗，竟不知道生產產品的價值中也包含著生產地所消耗的原料和機器的價值。但實際上他是怎樣的呢？原來馬克思講剩餘價值時是在說明，新商品的價值中何以除了從原料機器及勞動力等所轉移過來的價值外，還能有多出來的一些價值，成為利潤的基礎？至於原料機器等等的價值當然又包含了生產原料機器的勞動力在內。你要反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你就得說明這形成利潤的「多出來的一些價值」從何而來？否則你就老老實實再讀讀幾年書的好，說些常識以下的話有什麼用呢？至於這批評者又說，「在流通過程中，商品價格可以增減剩餘價值量」，而這是馬克思所不懂的。但告訴這位「批評」者罷，馬克思不但說明了價值如何變成市場價格，而且還說到剩餘價值如何轉化為社會平均利潤，這些雖不是十分艱深的理論，但用小學

生的腦子來理解却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再舉另一個自以為高明的「批評」者出來看看吧，他說的是「確認真本家每月所付給雇工的工資是勞動力的合理代價，是不夠的，是錯誤的，勞動是不能有盈餘的。盈餘價值乃取自工人工資的不足與工作時間的過長，而不是勞動的盈餘，就工人壽命短促一事來說，即知勞動者不會有「盈餘勞動」以供資本家剝削了。」（註八）——這到底說了些什麼話呢？第一、馬克思從來沒有證明工資是「够」的，「合理」的，他不過是說明勞動力的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是如何決定的，正如他說明一切商品的價值是如何決定的一樣。經濟科學中的價值論的任務本是要說明各種商品價值是如何決定的，而不是主張，這些商品應當值多少錢。但這些「批評」者却以為他們可以自由主張一切商品的價值應當有多大，那不過是從非科學的立場來反對科學罷了。第二、所謂「盈餘勞動」的出現，正是表明資本家不是按照工人勞動所生產的價值來償付給工人，而只是根據工人勞動力的價值來償付。因此在工人的全部勞動時間所轉化成的價值中，有一部份相當於勞動力的價值，而另一部分則形成「盈餘勞動」，而為「盈餘價值」的基礎。「批評」者却儼乎其然地起來亂說，好像馬克思所說的「盈餘勞動」是因為工資「合理」的結果，或是因為工人身體強健的結果，那豈不是太急於要表明自己的無知了麼？

但是這樣的「批評」家還進而批評「帝國主義論」。我們實在佩服這些「批評」家的大胆，在法西斯帝國主義已經遭受着嚴重的內外患的時候，居然起來為帝國主義辯護，說帝國主義內部社會關係十分完美，說「那些先進國的工業勞工只要不為失業所逼迫，都有成為中產階級的可能」（註九）。可惜他還沒有大膽到失業的可能都加以否定。我們更不能佩服這些「批評」家的大胆，在中國進行對法西斯帝國主義抗戰，除了自己努力以外，也要盡量爭取各種外援的條件的配合（其中包括法西斯帝國主義內部人民大眾的革命力量）的時候，居然說，「帝國主義國（此地當有漏字——引者）特徵都建立在對弱小民族政治經濟的侵略壓迫剝削的基礎上，而不建立在對其國內勞工剝削的基礎上」，甚而公然說，「在日本這個新興而瘋狂的帝國主義國內，我們看不到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運動。」——是的，一個腦筋因發熱而糊塗了的人，是看不見什麼真實的東西的。但是論者假如否定了日本國內人民大眾對其統治者的政策反抗不滿，從而爆發以日本無產階級為

中心力量的革命的可能，論者又將何以解釋蔣主席歷次向日本人民的宣言文告呢？

所以這些「批評」家的大胆，雖然值得佩服，但是從大膽中不能產生「批評」，至少也還得更多有一點聰敏吧。對於這樣幼稚可憐的「批評」，本來是置之一笑也就可以的，但是因為他們都冒用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招牌，（但實際上却把三民主義解釋成爲非科學的，反社會主義的），略略加以點穿，也自有其必要。至於像那更無恥的葉青，鄭學稼之流的「議論」，我們在此地是提也不必提到的了。

註一、羅爾：「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本質的比較研究」。（中國青年八卷五期，五月十五日）

註二、胡一貫：「宇宙新論」（文化先鋒二卷十七期，九月一日）

註三、劉文島：「共產主義批判」（三民主義半月刊三卷二期，八月一日）

註四、同註三。

註五、參看本刊第十六期「論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對劉文島的「法西斯主義批判」的批判。

註六、羅爾：「論辯證法與三民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三民主義半月刊二卷十二期，六月十五日）

註七、羅克典：「總理論剩餘價值」（文化先鋒二卷十九期，九月廿一日）

註八、譚小岑：「三民主義的經濟理論基礎」，（三民主義半月刊三卷二期，七月十五日）

註九、譚小岑：「列寧帝國主義論批判」（三民主義半月刊二卷十二期，六月十五日）

（上接五二六頁）

的是作者祇敘述了基督教從一般的宗教演變爲統治中世紀歐洲的宗教的幾個階段，而沒有特別強調當時的經濟機構，爲讀者探索那本質的根源。如是，這裡就留下了十分重要的空隙。認真的讀者一定要問那是爲什麼呢？爲什麼一個原本屬於受難者們的被迫害的福音却轉向另一極端，變成了反對那極端始者的中世紀歐洲的枷鎖呢？

關於十字軍運動的原因和後果，作者幾乎有倒果爲因的傾向。作者以爲那原因是由於懼怕光明的基督教統治者，想一舉掃蕩在小亞細亞發展的阿拉伯文化。殊不知結果完全相反，帶來了他們所懼怕着的，同時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和貨幣經濟的興起。這是不確實的，商業的繁榮和貨幣的進取，正是那運動的主要原因，所謂文化不過是一個幌子罷了。

這一階段，羅爾和基督教時代這一頁自然科學史上的空白，「自然與自然科學」的作者的說明，是很遲到的。

雖然，所有這些，我們以爲都無損於這本書在今日所能發生的價值和作用。說到黑格爾的時候，哥德嘆息說：「他太少研究自然。不然，他的成功將更偉大。」如果這句含有着尊重的話無損於黑格爾的價值和地位，則我們的這一些惋惜之辭，也只是表示着相同的尊重而已。

此外，我想談談另一方面。自然與自然科學的作者頗有點兒在講堂裡的氣概，專講本題，只讓讀者從理論上去得出必然的現實的結論。「科學概論」的作者却特別抓緊着目前中國的問題，大聲疾呼，要求民主和科學，而且肯定地指出只有民主才是後者發展的前提。與此相應的是對十五世紀開始的在整個文化領域裡反獨斷和迷信的運動，和「人」的發現這一點，以及「二十世紀科學的危機」一題都作了較爲詳細的凸出的說明，同時又特別着力於鼓勵青年的讀者們勇敢地追求深厚的科學知識，這些都富有現實的教育意義，值得讀者仔細地去品味。另外，本書涉及範圍較爲廣泛，最新的材料也較爲豐富。都是值得提及的。而「自然與自然科學」，如果能就現在的規模加以擴充，想來該是一個更好的主意吧。

附上這些粗淺的意見之後，我以一個科學的初級學徒的誠懇和小心，把這兩本薄薄的書推荐给認真的讀者之前。

從科學到哲學

李溥

評兩本談科學的書

張先辰著：「自然與自然科學」

石兆棠著：「科學概論」

印行者：文化供應社

一九四二年出版

當出版界漸漸日甚一日地為一些虛情假意的西裝束，和不知所云的胡言亂語霸佔着，又正當由於現實的教訓和催迫，人們日益以更深的情緒嚮往着民主和科學的時候，這兩本以最新的觀點討論科學這個光彩奪目的問題的書之出現，是使得我們深深地歡迎的。

今日中國的文化界存在着兩個非常可慮的問題：

第一是自然科學者對社會科學和哲學。學貫專精，并非不好；但結果便難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懂對自然科學與社會和時代的關係認識不足，即對自然科學各部門的成果也缺乏綜合的理解。因此就可悲地阻礙了他們的成就和進步。

第二是社會科學者對自然科學永遠採取保留的態度，他們為自然科學的艱澀的公式和問題所阻，只好對那一部分人類的大寶藏，望洋興嘆。最嚴重的是甚至唯物論的信奉者也拋棄了實際的科學。他們漸漸不知不覺地以為哲學是先行於一切的，想着唯物論至上，到最後一個不小心，就把那個實際的「物」丟掉了。

這兩本書同樣地把握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以及哲學與科學之間的血肉相連的關係；從一個總體的解出發，去把他們融會和貫通起來。如此，它們就有力地消掃了那些狹窄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看法，和本來就甚麼也沒有看見的唯心哲學家的胡說八道。同時嚴肅地指出一條從科學到哲學的路，把那個實在的「物」結結實實地刻劃了出來，那是方具有極大的價值的。

「自然與自然科學」是作者根據他在廣西大學文法學院「自然科學概論

「課上的講義改寫的，全書總地不過一百七十八面，分為一二兩篇。第一篇「自然的體系」，介紹了近代自然科學的最重要的成果，說明了自然的本體。從物質之客觀的存在和運動，說明宇宙和生物的起源，又從生物進化的過程說明了人類發生的歷史。最後又有專門的一章說明了這個最叫人奇怪的問題：精神作用的物質基礎。所有這種對物質的認識，根源於從化學上得到的兩個定律。一步一步發展下去，最後便不可避免地引導到這樣的認識和結論：「宇宙間的絃絃萬象，由電子，原子，分子，結晶體，有機的細胞，思維的頭腦，到各種的物體，是物質發展不同的階段；而九十二種不同的元素，若干萬種不同的化合物，各種各樣的礦物植物動物以及氣體，液體，固體，則是物質在不同的組織配合中與不同的外在條件之下所表現的形態。物質的各個發展階段，物質的各種表現形態，各有其特殊的性質。這種特殊的存在，即是宇宙間物質之多樣性的根源。」（第二十二面）而這，就正是唯物世界觀的論據。

絲毫沒有什麼神秘地，世界的本體像太陽開闢了黑夜從東方昇起來一樣，以它的無比的威力掃蕩了愚妄和迷信，給我們放射了萬丈尊嚴的光芒。生命也者不過是蛋白質的活動，精神不過是一種物質的屬性，而思想，那唯心論者們的蝸牛壳呢，只不過是一種高度組織了的物質的反射作用而已。

黑夜退走了。神也好，第一推動力也好，那一切荒誕古怪的假設，這你們的蛋肥。在人類思想上，代唯心論而起的必然是另一套整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了，它以生龍活虎的姿態，為人類的理智開拓無限的前途。辯證唯物論的定律是從自然史和人類社會史中抽引出來，佛特立希說過這樣的話。他

又說：在自然科學上，他不是把這一套應用上去，而是從自然的本身去把它們找出來。近代自然科學的這些成就鐵一樣地支持着這個觀點，並且充實着和豐富着它。

然而叫黑夜和神退下去不是一回容易的事。從有歷史開始，科學和唯心論的鬥爭之間進行着的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那不是自然科學單槍匹馬的功勞，自然科學的發展有賴於社會生產的推動，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是一個社會的過程。是人類通過生產勞動去接觸自然，認識自然，把自然科學發展起來，同時徹底地唯心論的立足點被去，把神的罪惡的宮闈毀滅的。因此，第二編自然科學史論便從社會經濟發展與自然科學相互的關係上，敘述了這個勝利然而艱苦的戰鬥過程。歷史使人聰明，我們從這裡看到了科學怎樣為生產勞動所推動和制約，同時又怎樣回頭來積極影響着生產。條理分明，次序井然，這歷史敘述的本身又正是那一套整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最好的實證。

一方面抓緊了這一套世界觀與方法論，同時也就因此說明和體現了它。作為一個讀者看來，全書的嚴謹明瞭和完整，就像這問題的本身一樣。如果想起佛特立希「現代的自然科學」——只有他能算是真正的科學——那個提示來，我們就不能不深深地驚嘆於這位偉大的哲人真是說得多麼恰切好處。

「科學概論」的篇幅約比前者多三分之二，討論的範圍也廣泛得多。全書二十五講，大約地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泛論科學和科學的研究，第二部分敘述科學發展的歷史，第三部分討論自然的本體。我覺得結構頗為鬆懈，要點似乎也不十分明確。第四講「科學分類的意義」和第五講「科學方法的演進」似乎只介紹了一些較為生澀的名詞和術語。如果不能說是完全多餘的，我以為也不如參在第二部分裡說，因為分類和方法的進程，不就是科學發展的一部分嗎？第七講「文字發明後科學研究的新發展」介紹了許多零碎的符號；反之，埃及巴比倫和希臘羅馬這一段科學的歷史和社會經濟生活之間的血肉關係，却把握得不够緊密和明瞭。第二十四講「心理現象的分析」裡作了一些相當值得商榷的論述，而生命的發生和精神作用究竟是什麼這兩個極關重要的問題，却竟十分叫人惋惜地忽略了。

這是概論性質的書，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因此我想我們也許有較多的權利來在編寫的體例上嘆舌，像一個繁瑣的吹毛求疵者一樣。但是重要的不在這裡，而是在於一些較為根本的問題上。同時，從那些根本問題的探討中

，也許可以附帶地追尋一下這種結構上的美中不足之處，究竟由於什麼原因。

我們必須揀取最重要的說。

第一，雖然作者曾經指出說「知識畢竟是對客觀現象的實踐和行動的結果」而如果不「沒有感覺，就無由獲得知識的素材，也就無由構築起知識的系統來。」（第一八面）可是作者却常常流露哲學先行於科學的意思，不必更地把握哲學的作用過分誇大，因此就不免使讀者得到唯心論萬能的印象，結果却把那個實在的「物」丟掉了。在第二十五面上作者說：「科學是什麼呢？科學是唯物論的產物。」那麼，唯物論又是從那兒來的呢？

作者討論到中國科學不發達的原因時，以為「格物致知」是唯物論的，「格物」即是對客觀現象的實踐，「致知」即是將這種實踐的結果來構成知識的素材；這完全是一種科學態度。」（第二十面）可惜這個好好的道理，給一些「唯心論的蛆虫白白地蠶爛去。」（第二十四面）於是得出結論說：「科學發達的基礎，如前所述，必須首先承認有個客觀的對象存在；唯物論的立場與科學是一致的，所以唯物論促進了種種科學的發展。」然而，「不是唯物論而是唯心論發展，科學就受影響而停滯，而無由發達起來。我們中國固然是個例子，羅馬也是一個例子。」這是很成問題的看法。

唯心論壓抑和阻礙了自然科學的發展，這是事實。唯物論的立場和自然科學的立場是一致的，兩者互相闡明和啟發，這也是事實。同時，在某特定階段內自然科學已有的成果上科學家比自然科學家前進得更遠，更優越，就得更偉大，也是歷史所說明了的。但以為科學發達的基礎，必須首先在主觀上承認有個客觀對象的存在，却似乎未免強調過分了一點。「科學的興起與發展都決定於生產」，佛特立希這句名言可以給我們很好的指導。在論到自然科學家在沒有歸依辯證的思想而苦於混亂與紛擾的時候，這位哲人又說：「要走向這種歸依也有許多路子，他們純粹依據自然科學的種種發現也可以闢開一條道路，因為這些發現也並不能忍耐那舊的玄學的發而無理的荒謬了。然而這是一條艱難而痛苦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要遭遇過量的不必要的阻滯。」由此可見，自然科學沒有非預先倚靠於唯物論不可的絕對的必然，因為唯物論的辯證法也好，辯證的唯物論也好，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演繹的命題。

當然，在把握了辯證的唯物論之後，自然科學家可以成就得更顯赫和豐

豐富，能够避免許多不必要的迷途的危險和節省許多枉然的轉路的精力，那是毫無問題的。同時，唯物論既已在近代自然科學的支持和充實之下全盤勝利地鞏固了基礎，則它今後之必然要逐漸地取得對自然科學研究的指導地位，也是完全可以斷言，而且是深深地值得慶幸的。

其次，羅馬和希臘回國奴隸社會，而它的科學不發達，是因為它以戰勝者的姿態，專事掠奪，而沒有把自己的奴隸的勞動力和生產緊密地結合起來，也就沒有增進技術的必要。如果忽略了這個推動的根本的動力，不是有把「物」丟掉了之嫌嗎？

至於「格物致知」是否唯物論的，以及唯物論在中國究竟有過怎樣的歷史，這都是大可研究的問題，這兒可以不必多說了。

由此，就發生了第二個問題，以為勞動的實踐是由思想所推動，而不是推動思想的。在討論到「人類怎樣開始科學的研究」的時候，就有把人和自然對立起來的傾向，同時似乎人類之要勞動，只是為了文化與思想。作者說：「自從人類單獨保有一個發達的大腦，能够巧妙地思想以後，便一刻也不放鬆地要去思想，甚至夜以繼日地在打着，真是一病兼求之一，想他像一條豬一閒來無事便從容一盤日地躺着，那是做不到的，他要思想。同時，他有了手，也非工作不可，正像小孩子的手是空閒不得的，不是玩具就是抓餅食，否則彷彿可惜生了兩隻手一般，他會立刻哭鬧起來的，人就是如此。」其實，手和腦完全不是那樣棄乎「天性的」辛勤者，如果有別人恭恭敬敬把白米飯端上來，他們為什麼要從事那樣麻煩的勞動呢？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說：「客觀自然是個龐大無限的傢伙，牠的內容充滿了神秘和新奇的成分，……在在那板起面孔問人，要求試來推敲一下。」同時，人類社會生活，也在逼迫着人類趕快去解決客觀現實的諸問題；不然，也一天都生活不下去了，苦痛煩惱在逼迫着呢。譬如說：人類為什麼會有生老病死呢，種植為什麼會有水旱荒歉呢？天地間，日月的運行，雨露霜雪的施降又有誰在指揮呢？而尤其重要不明的是宇宙的未來，人類的前途。但是，人類却正利用腦和手來解決這些問題，為爭取人類的文化與自由，是祇有向前與自然環境作無情的鬥爭的。」

這種說法，彷彿人類一生下來，便莫名其妙地帶了一雙發癢的手和一個大腦袋，本能地追求着工作和活動。而且他們又都像那些有點兒傻氣的「哲學家」似的，一來就忙活着解釋宇宙的奧秘，為人類的自由與文化而鬥爭。至

於怎樣塞飽肚皮，怎樣生活下去這個最迫切的先行於一切的問題，却竟似乎是無關緊要的事。當然，通篇看來，我敢於相信作者絕對不是這樣的意思，也許這只是一種藉詞而已吧。

第二十二講「生命的內涵及其意義」裡，也有着這類同樣的問題。作者說生命第一有生而知之的本能，第二有學而知之的才能，却忘記證明那是從那兒來的。在有了才能和本能之後，作者進一步說：「為了要避敵人害自己而又能戰勝敵人以獲得自己的食物，於是不得不各自準備好一種萬全的軍事計劃。」首先是陣地的選擇，或樹上，或陸上，或水陸，或水中。其次是在作戰的方式，或孤獨，或羣集，或共棲，或寄生；最後是武器的選擇，攻擊的和防禦的。這裡，又不要給給人一種離奇的印象，似乎是光光的地球上原來是什麼都沒有的，忽然不知所自地來了一羣還沒有成形的生命，各自來進行他們的選擇。當然，我相信作者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想法。那麼這種表現的方法就顯得值得注意了。其次是本能和才能是只有較高級的動物才有的，後面談選擇的一大篇却把動物物素連在一起。

另一方面，在二十四講「心理現象的分析」裡，在說起自然環境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時，作者列舉了溫度，光線，氣壓，地心吸力等四項。氣壓項下是這樣：「犯罪學家認為氣壓與政治犯有不可忽略的關係，而普魯哈曾注意到因地地理關係而使政治要求也各異的現象……這種論斷自然并不很正確。但氣壓對人們的心理和行為有巨大的影響却是不容否認的。譬如說：天氣陰涼時，精神便爽快；天下雨，便生怨，酷熱，便煩惱。」把政治要求歸因於自然環境，其庸庸和惡毒是到了極點的。而作者只輕輕地說「并不很正確」，却不給以嚴正的駁斥，實在叫人覺得遺憾。這也許是必然的吧，一方面把唯物論抬得過分地高，另一方面就不免輕輕地丟掉了它。其次，自然環境對人類雖然有某些影響，但自從科學日益進步以來，人類控制并且改造自然的能力已經一天一天地增大了。作者沒有指出這一點，而這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根據於第一二兩點，以為科學產生了科學，思想推動了實踐這兩個傾向，忽視了經濟的決定的作用，如是，對歷史便沒有作緊密的唯物論的把握。

比方說，第十講「中古黑暗時代與自然科學」寫得相當生動，但是可惜（下接五二三頁）

又與實料

我國憲政運動同溯

民主，是這一次大戰勝利的指標，在今天固已成爲不可動搖的信念。

民主，須以憲法爲其基礎。我們一提到憲法，却使我們不想不到中國人民爲憲法而奮鬥的歷史，這歷史，迄今將近有四十年的光景，這四十年和別的國家比較，充不能不說是一個漫長的歲月呀。

一

中國之有憲政運動，實肇始於日俄戰爭以後。那時，一般士大夫認爲日俄戰爭勝敗的關鍵，是在於：一是君主立憲與，一是君主專制國；日俄的勝負，也可以說就是立憲與專制的勝負。雖然這道理不一定通，但他們所說，確也道出了一部份真理。譬如他們說：『因爲立憲之人民有參與政治之權利，其視國家直與自身一樣，其爲保衛國家權利而宣戰，直與保衛自身權利等。專制國則反是。俄爲全球最大之專制國，日本爲東洋新進之立憲國，日俄一役，就是專制國家和立憲國家勝負最後的判案。』以今日輸心國與同盟國的戰爭而論，情勢的演變，又何嘗沒有反映出這樣一點。

當時既有此種議論，因之新黨人士如張季直之流，乃紛紛起而響應，并以敦促立憲爲奏請。清廷在朝野人士相迫之下，才在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發佈了一個預備立憲的上諭。

清廷之發佈預備立憲，原是緩和當時朝野人士的敦促，和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民衆革命的運動，故意設置這樣一幕騙局。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以一般士大夫爲首的『國會請願同志會』，與乎『國會請願代表團』等，曾先後作了四次大請願，然而，得到的結果却很簡單，『還要準備』，準備的年限是九年，嗣後又由九年改爲五年。

這難產的胎兒——清廷憲法，畢竟還是由於辛亥革命的催生，才在武昌起義以後頒佈了『十九信條』，這『十九信條』，據憲法學者說，這要算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這是多麼難產而可憐的憲法呀！

二

『立憲者，當望之國民，不當望之君主』。這是當時『民報』的主張。如果憲法由『欽定』，斷可立立，也可以毀，此何得爲公意的表現？所以，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民主革命派并不以清廷憲法爲然，在『建立民國』的政綱下，解釋道：『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我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放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民主革命派始終堅持推翻帝制，以帝制推翻後，由國民公意產生之憲法，產生之政

廢止此憲法，此政府，才能為國民權利之保障，無何，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却落到軍閥而食之。

民衆，由臨時政府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全文共分七章五十六條，這約法雖較過去若干條文進步，在總綱上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並同時規定人民享有各種權益。可是，缺點仍多。例如：雖規定人民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沒有規定普選制與不記名的直接選舉制；雖規定人民享有自由權，但同時又對此自由權加以法律限制之附文；對非法侵犯人民自由的行為，又未提出若何禁止。所以，孫中山先生并不以這約法為滿意，他說：「至於我們民國的約法（指臨時約法——記者註），沒有規定具體的民權，在南京訂出來的民國約法裡頭，只有「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那一條是兄弟主張的，其餘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負那個責任。」

僅以此不徹底的約法來說，也竟為當時封建勢力的代表——袁世凱所不容，他向由民二國會組織之憲法起草委員會爭奪憲法公布權，并向眾議院提出增修臨時約法，企圖集國家大權於一身。袁世凱要求未遂，乃進而對憲法採取積極的破壞態度，竟不惜解散合法政黨，瓦解國會，其瘋狂的程度，可以說，於斯已極。

是時，袁世凱大權在握，復能利用銀行團借款的活動，於是，乃有「政治會議」的產生，以「政治會議」代替國會；嗣後，由「政治會議」宣佈增修臨時約法，把總統的權力擴張到最大限度，由此因人而變的「新約法」的公布，袁世凱的獨裁，才取得了「合法」（？）根據。及到袁氏稱帝，甚至連這狗屁不如的「新約法」，也變成了半文不值的廢紙了。

民六，國會再被解散，因此，才產生了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護法運動的戰爭，這戰爭進行了六年之久，直到民國十三年曹吳倒台，這戰事才暫時告了一個結束。是年底，中山先生應段祺瑞的邀請赴京，主持將在準備中的國民會議。「北上宣言」，可以說這是中山先生對國民會議召議的一個最具體的主張。

中山先生的「北上宣言」，第一，它指明了「使武力與國民結合，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的民主政體的建立；換句話說，就是要把政權與軍權都歸諸之於民；第二，它指出了解決建立政治統一的方向，首在召集真正由人民直接產生的國民會議；第三，堅持在會議召集之前，須大赦政治犯，并保障

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這些意見，在今天我們仍值得重視。

當時，對中山先生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是的主張表示過贊助的，只有中國共產黨；同時中共并發表反對段祺瑞召開善後會議的主張，因為會議的權成份子，都是政府指派的，而真正國民反無顧問之權，這樣的會議，有何民主氣息可言？故當時繼起而反對之者，各省均是。

要在封建勢力下產生一部較為合理的憲法，這與希望一個男人胎生一個嬰兒實在是一樣地不可能。

四

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曾於民國十七年十月，發表三大建設的主張，關於政治，主張「俟全國大多數省分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國家即將政權「還諸國民」。民十八年，國內人士紛紛提出「保障人權，確立法治基礎」。並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的主張。此種主張，刊載於國內各報章雜誌，民十九年，國民黨中央三屆四全大會在十二月曾通過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會議的決議。屆時，并會討論，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的約法。這約法的精神，與民元約法也多類似之點；特別關於人民之權利與義務一部份。民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國內人士咸多主張結束訓政，籌備憲政。是年十二月，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才通過「縮短訓政時期，實行憲政」的決議。翌年十二月，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又通過籌備憲政與組織國民參政會的決議，并定二十二年內召開國民參政會，二十四年內召集國民代表大會。這些會都未召集，原因是國民黨五全大會屢次展期的原故。廿四年十一月，國民黨五全大會開幕，議決國民大會於廿五年以內召集，并完成憲法草案，但是臨期，忽又再度延期，決定延至廿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誰知中國是一個多難的中國，次年「七七」，侵略的魔火在瀋陽橋燃起以後，國民大會又隨之再度延期。直到民三十七年三月國民黨臨時代會在漢口開幕，在這會上，為了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敵見，俾甚速國難起見，才議決產生一國民參政會，作為民意機關而存在。

五

雖然國民參政會不是由民選的政治機構，並且在職權上僅僅是屬於建議

的性質，但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確集中了全國各方面的人才，并能切實反映各地方人民的意見和請求，俾作政府施政決策的參考。

國民參政會前後更選過好幾次，現在算是第三屆國民參政會了。

第一屆參政會，曾通過設立省縣參議會之決議，其目的，是在完成孫中山先生內地方自治的階段。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是第三次參政會大會，曾通過周覺等五十人所提「請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案」；同年九月，第四次參政大會，并通過「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保障各抗日黨派合法權利，與集中人才改革行政機構」的決議。這決議是根據七個提案合併討論的，內容分治本與治標兩種辦法。關於治本是：(一)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製定憲法，實行憲政；(二)組織國民參政會籌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關於治標是：(一)請政府明令宣布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為適應戰時需要，政府機構應充實改進，并藉以集中全國人才，從事抗建工作。這決議，在當時曾引起全國人民熱烈的擁護，在各地促進憲政的民眾組織，有如雨後春筍。這，一方面固然證明了參政會的決議是適時而正確；但另一方面却正反映出全國人民對憲政是怎樣熱烈的期待着。

民三十一年十月，第二屆第三次參政會大會更通過「促進民治」案，該案具體辦法：(一)請政府依照既定政策，在致力抗戰之過程中，一面加緊促進地方自治，一面確切抗戰終了之時，即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俾憲法得以早日實現。(二)戰時民意機關的組織與職權，應請政府考慮，以樹立憲政基礎。(三)建國工作逐漸開展，各方建設需才孔殷，應請政府明令各機關，今後用人務擇各方賢才，以力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遺訓。(四)人民諸種自由，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抗建建國綱領，業已明白規定，應請政府明令各級執行機關，特加注意，俾人民之一切合法自由，均獲維護。

這次是第三屆第二次參政會大會。開會的前幾天，恰又是國民黨十一中全会通過抗戰結束後一年，召開國民大會與實施憲政的議案的時候。我們在憲政運動的歷史回溯中，希望這次大會秉承參政會一貫的民治精神，并符合國民致促憲政早日實施之熱望，能够提出準備立憲的一切具體步驟。

我雖并不以只要有白紙黑字之憲法為滿足，誠如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裡，對「立憲派」的批評，他說：「一曰立憲派。此派之

擬議，以為今日中國之大患，在於無法，苟能藉憲法以謀統一，則分崩離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憲法之所以能收效力，全恃民衆之有維護……故知推行憲法之先決問題，首在民衆之能維護憲法與否？會本求來，無有是處。不特此也，民衆果無組織，雖有憲法，即民衆自身亦不能運用之。縱無軍閥之摧殘，其為具文自若也。在這種中山先生很明白指出，在實行憲政之前，第一、要把憲政作為廣泛之民衆運動看，使人民能自動擁護；第二、要民衆有組織，在組織中培植人民的民主生活；第三、則應回溯到「北上宣言」中之保障言論宣傳的自由，俾藉此了解人民對憲法，對民權運用之各種意見。

這裡借中山先生的遺訓，一則是作為本文的結束，一則是對參政會與今後準備憲政應有措施之一種期望。

新華副刊

本刊內容包括文化方面問題的評論，簡短雋永的短論、書評、劇評、反映各階層人民生活的描寫以及各種文藝作品，並經常轉載敵後邊區的文藝作品與報導。茲為便利讀者保存查考當見，特每月另為印行發售，「團結」「青年生活」「婦女之路」亦均附印在內。歡迎讀者諸君，按照活期定戶辦法長期訂閱，手續簡便，並可節省郵費，如蒙賜顧，即請惠款，以憑辦理。

新華日報圖書課

保加利亞往何處去？

季米特洛夫作

——原文載九月十三日真理報

國王維利斯的突然死去，引起國際輿論對於保加利亞的政局及其目前戰爭中的作用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是很自然的事，人們會記得保加利亞雖然是一個小國，但按人口和領土說起來，却在巴爾幹佔有重要的地位，擁有主要的軍路據點，擁有尚未加入戰爭的四十萬軍隊。也應該注意，就是現在，希特勒德國正在對保加利亞實施最重大的壓迫，要它參加積極軍事行動。保加利亞到那裏去？領導並團結保加利亞親德派的國王維利斯死了以後，它的政策將是怎樣的？親德政策會把保加利亞帶入進退維谷之境和地獄的邊緣上，保加利亞人民會不會讓親德政策繼續下去呢？希特勒德國能不能依然掠奪保加利亞，並且利用它的領土，它的軍隊，它的交通，它的食糧和原料資源呢？保加利亞人民的忠實的朋友被這些問題苦惱着。

兩樁歷史事實深深地聯結着保加利亞人民和偉大的俄國人民。第一、保加利亞的民族解放，是從俄國人民手中得來的。這個事實大大地加強了保加利亞人民之中對於俄國人民的感激和熱愛的傳統。第二、保加利亞和俄國人民在反對馬其頓族企圖奴役斯拉夫族的鬥爭中，曾使斯拉夫民族的共同命運聯結起來。斯拉夫民族的血統關係，語言的相近，文化的共同以及在反對德國威勢的鬥爭中的共同利益，造成了保加利亞和俄國人民友好的不可磨滅的基礎。十九世紀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切領導人物，都是熱烈的深信着俄保友愛的羣衆，特別是在俄國軍隊解放了保加利亞以後，保加利亞人民把俄國兄弟看成解救他們和支持他們民族生存的人。在俄國人民消滅了沙皇，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之後，產生了增進兩個斯拉夫民族之中最忠實的友愛的特別有利的條件，這還用得着說麼？

然而，德索帝國主義起來了，努力以一切方法經由巴爾幹東進，反對保加利亞和俄羅斯民族之間的自然廣泛的聯系。德索帝國主義侵入巴爾幹，德國軍隊決定在保加利亞，把最惡毒和最貪污的份子圍聚在他們的周圍。過

去三十餘年以來，這些德國關係進行反保加利亞的策略，在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間的巴爾幹戰爭中，引起了保加利亞全民族的災禍，在一九一八年，由於保加利亞被拖到德國方面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引起了保加利亞更重大的災禍。十五萬以上的陣亡將士，數十萬的殘廢者和孤兒寡婦，數十萬難民，修復山河破殘引起的經濟蕭條費了五萬萬金里夫（保幣）——這是保國人民站在凱撒德國方面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代價。保國人民的民族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打擊。國王費第甫把皇冠償付了這個政策，逃到德國主人那兒去，直到今天還從主人那裏領津貼過日子。

費第甫走了，但局勢並沒有改變。保加利亞人民並沒有能在一九一八年一下子結果德國開費第甫的兒子鮑里斯登基之後，繼續着他父親的親德政策。這就是爲什麼保加利亞人民今天陷入第三次民族災禍的主要原因之一。二十五年以來，保國人民由親身的經驗領略了和德國聯盟的代價，現在又發現保國的獨立和前途又處在致命的危機之中。

鮑里斯國王登位之後，由國內最反動的份子支持着，而該國王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實行了政變，推翻斯丹姆波里斯基的憲法政府，採用了法西斯組織，實施了使保加利亞完全隸屬於德索帝國主義利益的政策。保加利亞反動統治階層整個政策的總結果，是保加利亞參加了軸心國陣營，而且變成希特勒的附庸。希特勒在保國的問題現在熱心散佈一個故事，說是德軍在一九四一年三月被允許進了保國人民，並且違反人民的意志而進入保國的時候，是正當保國沒有別的辦法的時候，保國不能不羈攔德國，因爲這是保持保加利亞和巴爾幹的和平的唯一辦法。但這完全是說謊。這個謊話在一九四一年三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的照會之中暴露出來了。關於保加利亞政府聲明德軍開入保國，是爲了保持巴爾幹的和平一節，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說：「（一）關於保國政府在上述問題中的地位，蘇聯政府並不贊同保國政府的意見，因爲不

管保國政府的願望如何，這樣的地位非但不強加和平，反而擴大了戰爭的範圍，使保國在戰爭之中，(二)有願於此，蘇聯政府應官於和平的政策，不能給予目前政策之下的保國政府以任何援助。在德方及巴爾幹的前夕，如果保加利亞政府明白地通知蘇聯政府，那裏援救俄國這一部分的和平，因而救助了保加利亞的緊要利益，無論如何這無問題是看一切可能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德軍開入保加利亞，並且駐在保國的領土上，當時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其時南斯拉夫各民衆準備反對德國，保衛自己。希臘軍隊在阿爾巴尼亞的土地上舉着意軍。保加利亞以軍隊和意軍的意志爲後盾，是能够保持中立的。要保特民族的基本利益，不是必須保持中立麼？其時保加利亞人民，不是要求把蘇保友好條約作爲保持中立的對立和巴爾幹的和平重要保證麼？然而保加利亞的統治階層拒絕了人民的要求，歸納其中心，是爲軍閥入國內。他使希特勒匪徒能够擊潰南斯拉夫和希臘軍隊，使德軍於在南斯拉夫和希臘的背後刺上一刀。此後的一切事件，表示保加利亞的統治階層的這些步驟在巴爾幹擴大了戰爭的範圍，而且把保國捲入戰爭。巴爾幹各民族的歷史毫無疑義地證明着保加利亞的獨立和進步，首先與鄰近的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最近親的友誼。因此，保加利亞統治階層的最大罪惡是使保加利亞淪爲希特勒德國的工具來反對蘇聯，出賣南斯拉夫，出賣保加利亞人民在巴爾幹的斯拉夫兄弟民族——馬其頓人、塞爾維亞人、門底內哥羅人、克羅底人和斯洛文人。

保加利亞統治階層把保國出賣給希特勒匪徒，給予民衆利益以最大的打擊。這政策的結果，保加利亞被德國人變成希特勒匪徒反蘇戰爭的兵營。黑海邊上的布加斯、發那、巴爾契克和其他港口以及多瑙河上的盧切克港如今已經在德軍手裏，被用作德艦潛艇和戰艦的根據地。不僅如此，保加利亞的海軍被德軍利用來運輸軍隊和軍需品到蘇聯作戰。保國的重要鐵路實際上都在德軍手裏，担任運輸德國陸海軍部隊和軍需品的任務。德軍在保加利亞領土上有許多飛機場和軍需庫。保國所有的飛機場都由德國軍事當局管理。德軍總部在保加利亞建築工事和戰略道路，準備把保國的領土變成希特勒匪徒的戰場。

德軍搶掠保加利亞，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更厲害。經由國營的「穀物出

口公司」，保國政府去搜集糧食和農產品運到德國去。保加利亞運到德國去的食料和原料的價值，已經超過二千萬萬里夫了。這是德國永遠不會償還的欠保加利亞國家銀行的「賬」。保國農民所受的剝削尙不以此。保國被迫供應德國軍隊，陸軍醫院，許許多多的德國機關和代表，以及德國軍隊的機關職員的眷屬。匈牙利和德國軍隊以極低價收購糧食，經常地把包圍着德國去。在經濟上，保加利亞變成希特勒德國的屬國了。外國資本投在保國的，德國資本佔百分之六十三以上。目前保加利亞統治階層的整個經濟政策附屬在德國的利益之下：這就是說閉一切對德國沒有用處的工廠，使保加利亞的農業符合德國工業的需要，使保加利亞爲德國生產原料和半製成品。這就是說收銷保國工業發展的獨立，使它變成德國的殖民地，這不可避免的就等於完全奴役保加利亞人民。

由於希特勒的要求，小小的保加利亞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對世界兩大強國英美宣戰了。保加利亞的所以沒有把軍隊運到蘇德戰場上，是由於人民和軍隊一致強烈反對這樣的步驟。但保加利亞出着希特勒在巴爾幹的急兵任務。保國軍隊以佔領軍的資格駐在南斯拉夫和希臘。國王鮑里斯把保國的軍隊放在巴爾幹的德國處置，讓德軍抽調到蘇德戰場上去。

正因為保加利亞變成了希特勒的藩邦和巴爾幹的急兵，保國的統治階層就大言不慚地「實現國家理想」了。他們安撫保國人民，說是獲得了希臘和南斯拉夫的色雷斯和馬其頓。但是保加利亞「獲得」了「馬其頓和色雷斯」，它自己却失掉了獨立。羅馬尼亞官不領統帥着馬其頓和色雷斯，而且保國財產一線地統治着保加利亞本部，而在戈培爾在柏林出版的地圖上，「保加利亞的」馬其頓和色雷斯標明是暫時在保國管理之下的德國的省份。馬其頓和色雷斯激發運動的成長，說明這些地方的人不領對希特勒的急兵，而且也對保國保加利亞漢有火一樣的憤恨。國王鮑里斯把希特勒的急兵而逃的勝利作爲他的一切謀略的根據。這些謀略都都推翻了。德軍一天天走向失敗，國王鮑里斯把保加利亞帶到崩潰的邊緣上，這已經是很明顯的事情了。破產的國王感覺到人民的日益增漲的憤怒。爲了努力找出路，他使用了各種策略，在他自己的周圍散佈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和混亂。而柏林是緊鑼密鼓着於王的動靜的。這個十分健康的人，有名的爬山家在晚年時候「雖然」死去，柏林方面顯然是出過一點力量的。

費洛夫政府聲明按照現有的保加利亞憲法行事，宣佈以鮑里斯的六歲的

兒子爲保加利亞國王。然而保加利亞的統治者只有在憲法適合他們的胃口的地方才利用憲法。他們絕對無意於實行憲法之中的召開人民大會選舉攝政會議這迫切的一點。那理由是完全容易了解的。保加利亞統治者懼怕和民衆的意志有任何的接觸。他們竭力繼續人民所痛恨的親德政策。鮑里斯的死，似乎是希特勒德國更不懷好意地干涉保國內政的很合式的藉口。到索非亞去參加鮑里斯國王葬禮的德國代表團之中有海軍大將萊德爾，陸軍元帥季德爾，陸軍大將林德門，海軍上將弗立凱，空軍大將李爾，黑衫隊上將文能傑，外交部的斯泰恩拉赫脫男爵和德國前駐蘇大使舒倫堡伯爵等人，決不是偶然的。在他們的協助之下，成立了一個毫不動搖地一定繼續親德的攝政會議。然而必須指出，目前的攝政會議並未解決政治危機，相反地，使政治危機更加深刻和尖銳化了。

絕大多數的保加利亞人民以日益增強的坦白，表示着對賣國賊絕不調和的態度。人民和德國而謀統治集團之間的鴻溝，今天比以前更深。這親德政策的罪惡和愚蠢今天比以前更明顯。時局的整個邏輯都和這個政策不符。今天夏季的蘇德戰場給德軍帶來了嚴重的挫敗。紅軍把德寇驅向聶伯河。作爲去年冬季勝利的繼續，紅軍的夏季攻勢加深了整個法西斯陣營的嚴重危機。法西斯的德意同盟在這個危機的衝擊之下倒台了。和希特勒聯盟的唯一歐洲強國意大利無力作罷了。

意大利的投降暴露了希特勒在巴爾幹的右翼。戰爭接近巴爾幹半島的海岸。巴爾幹在任何一天都可能成爲大戰的場所。德軍及其附庸的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命運正在來到。在這個情形下，當昨天的盟友和夥伴開始背棄希特勒集團的時候，保加利亞的統治者口裏神失魄，竟敢強迫保國人民積極參加破壞的希特勒匪徒方面來作戰。這似乎是眞的：當上帝要毀滅什麼人的時候，他的精神就失常了！

今天保加利亞面對着兩條路：要就繼續親德，要就和德國斷絕關係，實施獨立政策。第一條路的意思，就是保國軍隊落入德軍統帥部的手里，從事「保衛巴爾幹」。這也就等於殺滅千萬萬保國人民，把保國變成戰場，而大規模空襲，作戰以及最後軍事完全崩潰的結果所引起的全國災難，將遠比一九一八年可怕。第二條路的意思就是把保加利亞從德國守兵下面解放出來，保存保國的人力和資源，以獲得自由和獨立。只有走第二條路，保國才能絕處逢生。

保加利亞能不能走這條路呢？國內和國際的形勢表明它是能夠的，只要人民和軍隊堅決地出來攜手反對希特勒匪徒的統治，成立眞正的國民政府。這雖不是容易的事，但十分可能實現，假如保國軍隊裏面的愛國領袖們勇敢地出來領導已經存在着的人民救國運動。

德國的間諜費洛夫、歐科夫和暢科夫企圖嚇唬保加利亞人民，說如果保國拒絕希特勒德國的幫助而進行本國的獨立政策，那麼德軍就會把保加利亞完全佔領。然而這是不確的。希特勒德國的主力被牽制在東線。盟軍在歐洲登陸的直接威脅，又使希特勒不可能再把薄弱的後備隊派到保加利亞。而意大利退出戰爭以後，意軍將回到本國。如果保國軍隊和人民一起出來反對德國，希特勒將極困難地找到軍力去佔領巴爾幹或壓迫新生的保國軍隊。毫無疑義，在這種情況之下，保國人民和軍隊將得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和希臘游擊隊的充分的武裝的支持。而況即使甚至假定希特勒會決定對保加利亞軍隊採取軍事行動，那麼人民和軍隊所作的犧牲，也比保國統治者們目前的親希特勒政策所引起的犧牲小得多。無論如何，保加利亞驅逐德國侵略者，把自己從奴役之中救出來，是有着充分的可能性的，特別是在意大利投降，希特勒集團開始分裂之後。

延遲這樁事情，就是使面對着保加利亞人民的危險加重。不管保國的不斷的敵對行動，蘇聯人民迄今顯示着最大的忍耐，相信這親德政策是和保國人民沒牽涉的。蘇聯人民過去曾爲保加利亞兄弟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流血，現在担負着反對斯拉夫人歷史上的敵人——德國侵略者的主要的重担，有權利警告保加利亞：忍耐是有限度的。

假如保加利亞繼續和英美宣戰，幫助法西斯德國對蘇聯作戰，招致在德國奴役下的巴爾幹各民族的痛恨，保加利亞能希望什麼呢？蘇聯人民永遠切地關心兄弟之邦保加利亞的命運。這就是爲什麼對於保加利亞人民希望把自己的國家脫出法西斯的陣營，希望把保國從崩潰之中解救出來，希望獲得國家的光榮，自由和獨立，蘇聯人民深感滿意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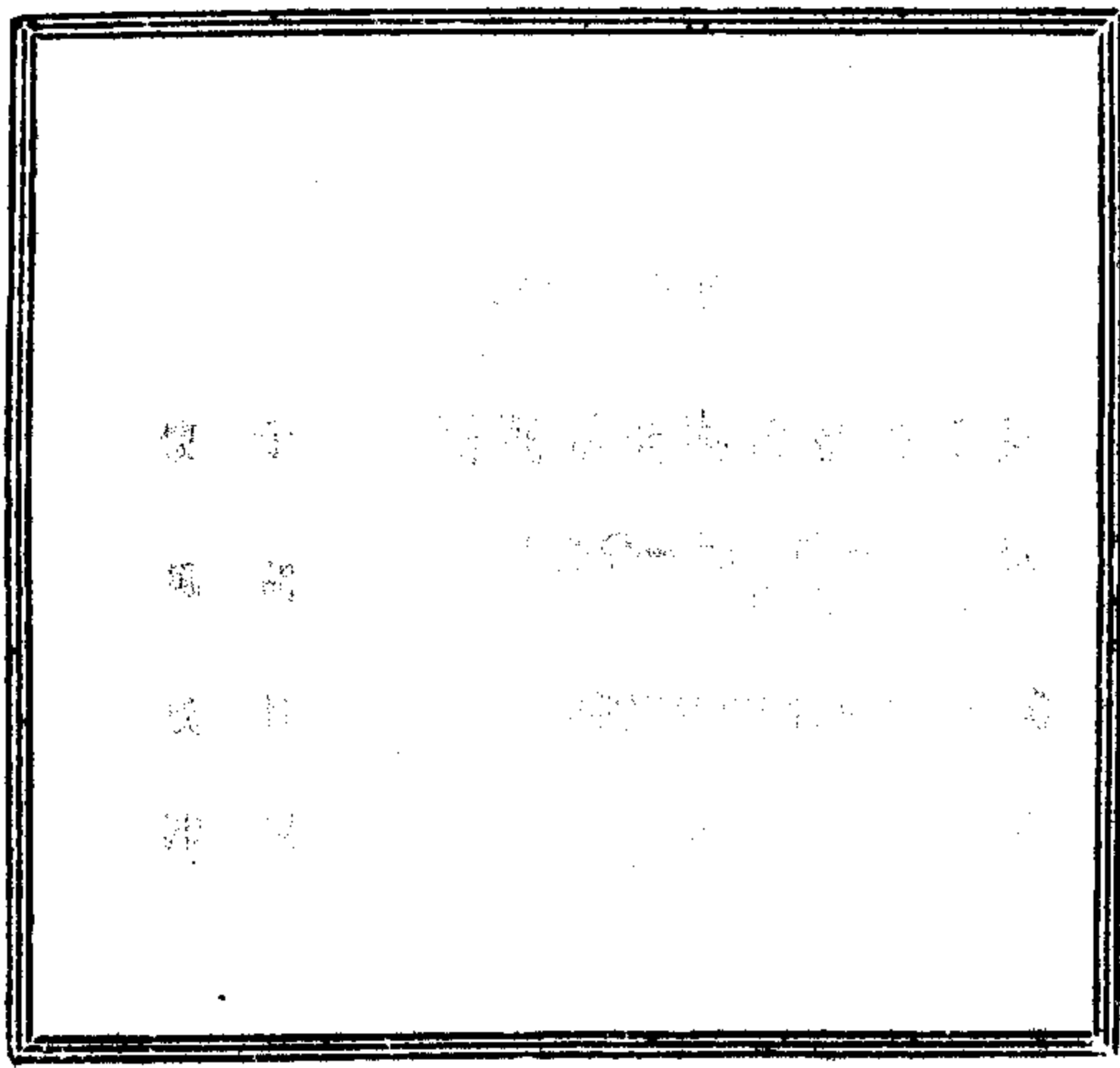
(新華日報特稿)

本期零售二元

內政部重發新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東川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爲第一類新聞紙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渝安誌字審查證第一二九六號

衆 群

卷 八 第 一 期



Copyright © 1950 by the Author



時論

我們的一點淺見(五三五)——人治，法治，民治(五三五)——工業化與利用外資(五三六)——遙念敵後軍民(五三七)——目前國內的軍事形勢(五三八)——為一個偉大的原則而鬥爭(五三九)

專論

莫斯科會議與世界戰局

于懷(五四〇)

從「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生長起來的

胡風(五四五)

研究與介紹

戊戌變法運動的思想側面

杜威(五五一)

論赤壁之役

郭化若(五五八)

田際雲與中國革命

吳哲(五六三)

論防禦戰

焦敏之譯(五六八)

書報評介

美國的陰暗面

以沛(五六三)

文獻與資料

莫斯科會議前後

消息報(五七三)

論戰爭時間的長短

「戰爭與工人階級」(五七五)

南斯拉夫內幕

普里比切維支(五七七)



我們的一點淺見

這幾天，本報與國報都在談論言論自由的問題。國報主張應儘量開闊言論自由的事，我們也願提出一點淺見。

言論自由不完全是家利和民主政治的裝飾，却是其重要的一項。其重要可知。爲什麼大自由，也包括了這一項，其重要可知。爲什麼

這自由這權利可貴嗎？因爲這是民主國家的主人——人民不能不發聲說話，及不爭，與的標誌之一。發了這自由，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只有不健全的虛假民主。

政府就應從這原民發聲事，民就難以爲主，有了言論自由的地方，政府和人即易趨於腐敗，政府的動向亦必受到阻礙和推遲，現在中外都

不一些。言論自由不存或在或受不合理的限制，像政府人民都受損失，在民國三十二年，也有許多言論的阻礙。

言論自由由來已久，如果把它給予了漢奸，投降份子，和法西斯主義，他在他的這個團體中，自由反法西斯主義團體，到處散佈毒藥，那是危險的。如果，這些份子和主義能道這自由的大事

業言論自由，而民主反法西斯的言論，享不到這種自由，那更可怕了。相反的，民主反法西斯的言論有自由，且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而漢奸，投降份子和法西斯主義的言論，不給自由，那更可怕了。

自由不僅不可怕，到是應該歡迎的合理的健全的事。所以，言論自由應有限制。而最

重要的標準，就是三民主義的原則精神，就是團結，抗日，民主，反法西斯。在這個原則之下，不許有任何的見解。

言論自由的原則，是應是檢查的標準。我們不反對戰時的言論雜誌的檢查。只要檢查且守住前線新說的動搖的標準，專心就好。因爲檢查實屬上

治民，治法，治人

在中國政論家之間，曾經歷

治人治，治法之爭。治法家的精

神，便是主張入治的。他會說爲

「有治人，無治法」之說，反之

所謂國家財產法法給。國法與

家內先導條件，便說：「不能

以法而治國」。到這年，則更明

確說：「法與爲空之說，

智能多矣，高全之道，在於

「。這說如說，治人是不可少的

；只有治法才可。治法，

超會對這話，有所聞。他說：「人而不特法者，其人亡則其政息焉。法之能立，賢智者而能神明於法以治公衆，愚不肖者亦

乘總於法，以無大尤」，這論爭，一直到現在，還在所謂政論家之間，繼續存在着。其實，如果地開別個人治和法治的具體內容不實，像拍象地，就它對二者的相互關係而論，則法治比人治重要，而治人也不可忽視。沒有治法，人將無所適從；沒有治人，法亦無從實現。二者是不可偏廢的。國人的這手却說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這則意思是很對的。這問題，在今天已沒有特別重疊的必要。今天，所應提出的問題，是所謂人治，法治究竟和民治即民主政治，具有怎樣的具體關係的問題。

不待說，那種不之屬於法治範圍以內，不立於法治基礎之上，而是和法治分離，和法治對立的治人治，當然不是最理想的治法。但即使是獨立和憲法一定法律制度的所謂法治，也未必都是民治。很顯然，法家所主張的法治，依據不外是貫徹和鞏固獨裁政治的一種手段。這種法治不是爲了保障民權，限制君權（更不應該推測君主專制政體），而是爲了使君主更有效地統治人民，使人民更能

論工業化與利用外資

野衝着當前生產事業的發達，展望將來實質建設的進展，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一句：『中國必須工業化』。國內同胞固然『人同此心』；就是國際上關心中國事情的朋友，亦何嘗不抱這種見解？

中國必須工業化，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如何走上工業化的大道呢？問題就緒多端了。在這裡，有社會制度的問題，有政治體制的問題，有經濟政策的問題，真所謂『無繚萬端』，茲所論者，僅是屬雜的問題中之一個題目而已。這就是關於外資之利用。

要建立一個生產發達衣食豐足的中國，固應本諸自力更生的精神，但外力之資助顯然是應爭取的。我們要使深埋在地下的寶藏能盡量的開發出來，要使掘發出來的礦物能自己提煉，要使重工業的建設能在全國每一個據點分佈起來，要使鐵路與公路能建築得像人身上的血管一般——這一切，在技術上，在器材上，在資金上，都是有賴於友邦之援助的。就是因為這原因，所以我們歡迎利用外資，而同時，戰後友邦對華之投資，對於他們來說，其利益亦並不是片面的。各友邦戰時的龐大的工業機械，戰後必須復員。這就是說，各友邦在戰後必定有一部分機器，成爲過剩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的機噐中，這些過剩的機器，必會加強現代社會本身所包含的矛盾。上次世界大戰後的『戰後恐慌』，就是明證。因此，消納一部分器材及資金於中國，在各

友邦說來，亦是有利的事情。綜合二方的情形來看，中國的利用外資，在實質上，乃是一個戰後國際經濟合作的問題。

爲了利用外資，就必須獎勵外人對華投資。民國二十九年公佈之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條例，曾規定：『公司股份總額過半數應爲國人所有；公司董事過半數應爲國人；公債董事長及總經理應由國人充任。』這次國民黨十一中全會通過的『確定戰後獎勵外資發展實業方針案』中，對於中外共營之專業中，本國應佔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一及總經理一職應由國人担任之條件，已經除去，此外，並准許外人，經政府許可後，得投資爲單獨的經營。這是一項關係極爲重大的修正，它對於將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將給予以無窮的影響。爲了使這個問題對於中國與友邦，對於中國經濟本身的發展，都能獲得利益，我們認爲下列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利用外資是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是促進民族工業的一種補助。離開這一個原則而談利用外資，其結果是不堪設想的。因此，利用外資必須時時刻刻着眼於民族產業之發展。所謂『在戰後經濟合作的世界中，沒有一般國家的利益觀念』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就是大西洋憲章，亦明明寫着『經濟尚未發達之國家，實行保護關稅，以掩護其幼稚工業，乃完全正當的行爲』。保護關稅既是如此看法，那末，努力於本國民族產業之培養，

何首飾之地，限於少數之少數，其目的在於政治的人，但他所要廣行的法治，是不能約束其目的。他說：『所謂聖刑者，刑無等級，自輕和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命，犯國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他雖沒有主張『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但實際上，太子犯罪，尚且不按法律的直接制裁，何況君子？君主是制定法律的，法律是保護君主權利的。『不從王命』便『罪死不赦』！他所謂法治的意義和作用是什麼？這還不夠表示得清清楚楚嗎？

不過在封建時代的所謂法治，是貫徹和鞏固獨裁政治的一種手段，而且在現代的法西斯獨裁國家，也未嘗不被弄成獨裁的法治的外衣，利用法律爲統治的工具。在德國，在意大利，在日本，都曾存在着憲法，存在着議會，存在着法律。但這決不能說明在這些國家內，實行着法治，因而也就不成爲法治。

近代民主國家的法治，所以成爲法治的內容，乃至成爲法治的條件，並不是單純因爲這些國家的政府的措施，完全根據法律，主要是因爲這些國家的法律，具有和封建的君主專制國家以及法西斯獨裁國家的法律不同的內容和作用，它是爲了保障人民的權利，爲人民自身（或人民的代表機關）所制定，並在人民的監督之下而執行的。儘管隨着歷史的發展，在現在看來，它已不能算是盡善盡美的東西，但在原則上，還沒有和法治背道而馳。因而它也就優於個人獨裁的法治。

因此，我們可以說，不建築於法治的基礎之上，則不論人治也好，法治也好，都不免成爲一種獨裁政治。只有實行法治，實行比較近代民主國家更進步的法治，使人民享有自己制定法律，修改法律，廢止法律，選任官吏，監督官吏，罷免官吏的權利，亦即中山先生所說的權接民權，才能够有法治，也才能够有治人。

今天，所應首先力求貫徹的是進步的法治即進步的民主政治。不求貫徹這民主政治，個人治固不足取，法治也無從處。（新華）十月八日

更是不成問題的了。據此，在對外國人士向中國投資的時候，儘量給與合法而優厚的利益，是應該的，是必需的，其他的問題，那就要十分小心去措理了。本市某報說得好：『我們必須以一般企業家運用資金的眼光來歡迎外資，以期在法律範圍以內密切合作』。只有以建立民族產業為着眼點，才能具有企業家運用資金的眼光去歡迎外資呀！

第二、爲了招引外資，必須提高經濟行政的工作效率。經濟行政效率之提高，乃是發展經濟事業的前提，亦爲招致外資不可缺的條件。試想想吧，如果拖泥帶水之風不加以改變，如果一件公事要留滯許多時間才能發下，急待進行的事情，不是糟了嗎？以前寬待外人而苛待華商那種作風，是不應保留的；想亦不希望以過去那種不健全的作風施及外人。

第三、在發展國民經濟之中，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的關係，已成爲各方注意之問題。在歡迎外資之下，外資既可獨立經營，則它與國營及民營間之關係如何？外資在國民經濟將佔着什麼樣的地位？這都是值得重視的。在原則上我們認爲民營事業必須與國營事業配合的發展，而外資則是以不妨礙這一原則爲前提的。

中國之有現代工業，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了。苦難的中國，到今天尚未過完苦難的日子。不知有多少職工爲生產事業流盡其血汗；還有多少有爲的企業家是在艱辛的生活中資志遠去的！爲了民族的前途，爲了這些值得懷念的志士，我們是應該好好的整理利用外資問題，好好的爲發展生產而奮鬥啊！

遙念敵後軍民

時序已經進入到『涼秋九月』，在華北的原野上，已經是青紗帳倒的時候了！從前幾天的本報上，就可看到萬惡的敵寇最近又在遭受着深深苦難的土地上，四出搶糧，火熱一般地燒門，正在一幕幕的展開。雖然經過了六年抗戰砲火鏖戰的華北英勇軍民，一定抗得住敵寇們的無恥進攻；而且，他們也已拿血奮的事實告訴了我們：他們是在保衛身家性命的生死鬥爭中，一次又一次的創造了勝利的奇蹟！但是，孤懸敵後，餉彈兩缺，醫藥不濟，在一個個戰鬥中，一面還要努力的生產，處在這樣一個艱苦的環境下，我們怎能忍心漠視，自己其關切與懷念之情！

想起了我英勇健鬥的華北軍民同胞，就更加深我們對那些十惡不赦的漢奸特務份子的切齒痛恨！最近傳來的消息：魯東南的濰縣的羊角村，被獲了一件漢奸特務份子放毒，企圖毒殺我五千居民中的人聽聞的陰謀罪行！由此就不難想像今日：在敵後的『忠奸不兩立』的鬥爭，是何等的尖銳和自熱化。逆賊漢奸愈是不斷被打垮，感覺到本身統治基礎的動搖，它就愈加兇殘無恥，逞着一切陰謀詭計。此次濰縣的毒害事件，在我軍民同胞『十手所指，十目所視』的高度警覺下，魑魅魍魎，畢竟無所遁跡；陰謀暗害，終於遭到破產，元兇伏法，大快人心；而我受毒的五千同胞，也幸喜都一一得救，只有兩位死在這個罪惡陰謀的手裡，這尤其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們要寄語敵後的軍民同胞們：從這次的教訓中，你們要更加警覺，更加防備任何一個可能到來

的襲擊！敵人是最無恥的，它慣於採取暗藏的破壞手段，使用兩面三刀，口蜜腹劍的伎倆，來掩護它一切進攻陰謀的準備和進行；萬萬的麻痺不覺，只有經常的保持警覺，我們就可以消滅它一切進行暗害的企圖和嘗試，『敵人從那里進攻，我們就讓它在那里滅亡』！這正是隨時變在我們耳邊的警語。

想起敵後軍民同胞在艱苦複雜的環境中，堅持着團結抗戰的大旗，也更鼓勵了我們對於勝利的信心。我們還記得：去年本報華北版曾經對晉冀魯豫的同胞有過『每天消滅一個敵人』的號召，是這樣積極的作戰精神，才打退敵人的『掃蕩』和『圍剿』的殘酷進攻；儘管敵人使用一切『捕捉奇襲』、『反轉電擊』、『鐵壁合圍』、『縱橫掃蕩』、『對角清剿』、『縱橫撲滅』、『牛刀子戰術』……等等層出不窮的陰謀，我們終於今日還是挺立在敵後，這的確在鼓舞人心，堅信抗戰必勝上，起了重大作用。我們敬頌你們這些不可戰勝的英傑們，我們祝賀全國都提高這種積極作戰的精神，學習你們的活榜樣！

關山千里，阻擋不住我們彼此互相激蕩的心，後方剛剛在熱烈的歡欣，度過了抗戰第七個年頭，雙十，人們也記起了在敵寇漢奸的鐵蹄下，忍辱負重，堅貞不二，艱苦鬥爭的你們，我們此刻雖然只是攜着一枝筆、一張紙，高呼着：援助敵後！但相信：在明年、後年的此時此日，強寇驅除，河山光復，那時就是我們的盛大的慶祝，來慰勞你們對於民族國家所建立的大功了！

目前國內的軍事形勢

敵寇在我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發動的殘虐的攻勢，正當希特勒在歐洲東線的慘敗與同盟國在太平洋戰場準備反攻之時，這想它採取了一種新的陰謀計劃。我們不可過低估計敵寇這種新的行動，必須用極大的警惕來注意敵寇形勢的發展。

目前的戰爭形勢，正是敵寇在戰略相持階段，這個階段我們對待敵人的戰略方針，應當是防禦中的進攻戰，持久中的速決戰，與內線中的外線戰。也就是說，在戰略任務的要求下，所預期獲得的戰後與戰鬥勝利，要藉主動的靈活的有計劃的我們去打，而不是被動的等待和避免一切戰後戰鬥上有利行動。

自從戰爭轉入相持階段，戰爭的形勢已形成正面與敵後兩種戰場。三年來在相持階段的戰爭中，證明三條戰線特點不僅適合於正面戰場的正規戰，同時也適合於敵後戰場的游擊戰，這是唯一正確的戰略方針。

正因為有唯一正確戰略方針的指導作用，所以，不論在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我們的正規戰與游擊戰在抗戰中，已創造了歷史上不可磨滅的輝煌戰績，這使得我們，例證歷歷可數，這不但對我們多加引證，而我們更要以分析的、目前形勢的形勢。

目前這總戰略的總方針，是動員全國力量，加緊軍火生產，準備決戰，也就是動員一切力量準備作戰最後的掙扎。但是，在敵寇殘暴進攻之前，我們應該正確的認識到，如...

敵寇不會放棄先解決中國的金礦。目前敵寇對華的戰略方針，也就是它的陰謀計劃，在敵寇七是發動和平攻勢，分化抗戰力量，企圖破壞我國內的團結。在軍事上是擴大正面戰場，加緊敵後掃蕩，企圖打我反攻力量。

敵寇最近不但在我蘇浙皖邊發動進攻，滇西、粵南、贛北等戰區，亦正在積極發動中。從今年七月以來，敵寇在華中正面戰場撤去若干部隊轉入敵後，在淮北、蘇中與蘇南地區，始則不斷的增兵，繼而步步進逼並逐步推進其「掃蕩」的「掃蕩」。最近復蘇蘇浙皖邊游擊戰線放案若干據點，集中敵偽兵力向我敵後游擊戰線發動「掃蕩」。九月上旬以來，華北敵寇由魯南正北兩路乘各鐵路向我晉察冀邊實行其秋季大「掃蕩」，敵門異常激進，直到最近，敵後戰場的「掃蕩」戰仍在繼續發展中。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敵寇在各戰場的進攻與「掃蕩」，情況雖有不同，實質則「掃蕩」的目的不外破壞、殺戮、和燒毀的三種行動。由正面到敵後，由敵後到「掃蕩」，敵寇的進攻掠奪。而其主要的目的企圖則在使敵後各戰場的共方限於被圍地區，失去軍事根據地，造成敵寇各個擊破的有利形勢，以達其先解決中國的金礦。

目前敵寇，蘇浙皖邊這一帶大三角地帶的進攻，正採取「掃蕩」戰，其目的在於分割我根據地，並攻佔片馬，企圖擴大到六省圍攻之勢，撲其全圍，不全是我敵後戰線，而為有計劃的打我敵後各戰區之守軍，或將我敵後各戰區之江以東。敵寇進攻得勝，可將

再冒險深入，俾使我某戰區要地。否則將攻為守，阻止我軍配合盟軍反攻綏包，以滅其側背之威脅。

總之，此次敵寇的行動，是在既定的戰略方針下進行的，決不是正面戰場一次和敵後「掃蕩」一次就沉淪下去，而是要繼續不斷的進攻與根據地不間的「掃蕩」。而且敵寇的攻勢，是互相關連互相呼應的，因此它的這些行動，更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相信接近勝利之期雖然不遠一段過於迅速，然而主要的勝利將是在於積極去打。這是在相持階段中戰線任務所決定的基本行動的方向。那裡有敵人，那裡就是進攻的方向。

現在，我們願意在戰爭的新形勢下提出我們的意見：
在戰略指導上，應當掌握住防禦中的進攻戰，持久中的速決戰與內線中的外線戰的方針，時要要在正規戰與游擊戰的採用。
在戰術運用上，應當採用「敵進我進」的方針。這新的原則，不僅適合於游擊戰也同樣適合於正規戰。

在戰後戰鬥任務上，應當主動的靈活的有計劃的我們去打，使小勝為大勝。
在戰後配合戰線上，應當動員兵力，根據根據地大小，準備進攻力量。以東部戰場之擴大，與晉察冀之重要而實，更宜增厚兵力，以防於不測。在神槍物資上，應當使遠近大後方的工廠與機關，得到充分的供給。同時在戰後戰鬥上，有決定意義的補給。敵寇的進攻，應當使遠近大後方的工廠與機關，有充分的補給，更可以增進敵後的反攻力量。

在戰爭形勢發展上，應當根據任務要求，我們除加緊準備大規模的進攻外，應當隨時準備敵寇的陰謀計劃。以有力的打擊。同時更應隨時準備在太平洋戰場上積極的與我們的積極行動取得最後一戰的配合，「我」勝後一定與「我」。

(新華) 十月二十二日

為一個偉大的原則而奮鬥

——論美國廢止限制華人入境條例

美國下院移民化委員會和法制委員會，最近通過廢止限制華人入境條例。而上院議員安德遜亦在下院提出同樣的議案。下院並將在週禮交大會討論。這延了半年多。擱置後又被提出的議案，總算打破了第一道障礙。六十一年來代表着中美不平等地位的一個條例，又向廢止的路上走了一步。

廢止限制華人入境條例，最初有下院議員甘納第和麥羅遜的兩個提案，在六月七日被移民化委員會否決了。接着，高特又提出另一新案。後來就沒有見刊下文。根據中央社華盛頓本月七日專電，則將高特案後來又為麥羅遜案所代替。據電訊所傳，現在所通過的廢止案的內容，費和高特案無大出入。其重要點是廢止一八八二年所限制條例。依照一九二四年所移居法所規定，每年准許一八九〇年在美僑民人數的百分之二移往美國，（這個定額當為一〇七人）；廢止禁止華人歸化的法律，也就是說，中國人可以入美國籍。以這個議案性質說來，就是從以前的禁止移民和歸化，改為定額移民和可以入籍。

現在美國法律准許的移民總額，是每年，十五萬三千七百七十四人。就是美國兩院都通過了廢止限制華人入境案，中國人所佔的也不到這個總額的千分之一。為什麼美國國會中對這議案的討論，都鬧得天翻地覆，這樣難得通過呢？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這是反對民族平等的美國的獨立帝國主義的

思想獨立派在作祟，華僑日報美京特派記者林君，在六月七日的報上，有這樣的報道：「下院移民委員會二十二議員中，有民主黨十二人，共和黨十人，而來自南方省份之議員佔半數以上，彼等無論屬於民主黨或共和黨，均抱有極深之種族偏見，歧視有色人種之心理已根深蒂固，此乃廢除排華律議案前途之最大障礙」。如果我們知道一八八二年的限制華人入境條例本來就是共和黨提出的，南方諸州則至今都還有虐待黑人的地方，而此表下院委員會對麥羅遜案，只是在五人沒有出席的情形下，才以六對四的票數通過，我們就不難知道這是阻撓廢止那個不平等條例的主要份子，再看着八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也曾有一篇社論，揚言和指斥獨立主義的對這個議案之意見，孤立派在紐約每日新聞上的一篇社論竟這樣的說：「讓我們把限制華人入境條例，和我們的其他的一些常識一道保存下去罷。這個條例無論如何也不是對亞細亞的保護，那對他們是保護，因為它大方的承認了中國人既強壯又敏捷，比我們能工作，比我們生活低，只

要我們給他機會，他則就會在經濟上超過了我們。」紐約時報的社論說得好，當這個報紙「要我們吞下特別有種族的獨立主義時，它的社論便總是甜言蜜語，帶着甜言而有取巧的節奏，又好聽，又塗滿了黏土。」這是孤立派放視美國和中國人民的又一證明。

我們更確切地認識這點，我們更決不能認為美國工人是反對華人入境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和以保守何退者名的退伍軍人會和母稅會一道反對廢止限制華人入境條例的事實，也不是以證明這一點。因為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格林和何爾等人，是絲毫也不能代表美國工人階級的。

現在，麥羅遜案在下院委員會通過，證明美國政府和大多數人民是急於要廢除中法邦交的歷史上的陳舊東西，趕快廢除。但是要使麥羅遜案儘早能廢除的通過上下兩院，還有待於美國人民繼續努力反對獨立派的阻撓，和我們與美國政府及人民的攜手奮鬥。而我國駐美使領當局，尤不應「始終沉默」，而應予華僑以指導和助力。我們必須知道，這不是簡單的爲了每年一百〇七個人的移民和歸化，而是爲一個偉大的原則——民族平等的實現。

（新華）十月十二日

于懷若

形勢比人還強

（滄審二二八八）

十一月七日出版

新華日報圖書課發行

莫斯科會議與世界戰局

于懷

好像行星圍繞着太陽旋轉的一樣，目前的世界戰局正圍繞着莫斯科進行。每天，每一刻，從每一個戰場，同盟國勝利消息，有如連珠，紛至沓來；然而，決定的轉捩點繫於莫斯科三國會議的結果，不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地中海裡，還是太平洋上。十九日起，三國外長會議在莫斯科開幕，大概直到閉幕為止，英美蘇官方都不會有什麼公文發表；莫斯科好像是在沉默着，但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在傾聽着來自那裡的聲音。

現在，在我們進一步分析莫斯科會議之前，讓我們從這世界的週圍走向中央；我們的旅行從東方開始。

一般的說，自從六月底盟軍在西南太平洋發動攻勢以來，東方戰局是沿着一條直線在發展的；即盟軍進展的程度來看，盟軍的勝利反攻也還沒有超過戰前階段的階段；六月底盟軍在倫多瓦島登陸，八月五日佔領新喬治亞島的蒙運機場，九月十八日克復新幾內亞的雷區，九月二十四日佔領芬斯其哈芬，十月九日佔領科隆班加拉和維拉維拉；所有這些都是盟軍在西南太平洋反攻途程上輝煌的紀念碑，其意義自然是非常重大的。不過，從整個太平洋戰爭的範圍來看，這些紀念碑是建立在一條很短的路上；打開地圖，一看所連開羅島和新幾內亞島在汪洋的西南太平洋上所佔的地位，即可知道。其時，在這當中，盟軍海軍活動的範圍比陸軍大，空軍活動的範圍又比海軍大；盟軍空軍在北面轟炸過轉運島，在中央轟炸過馬爾克斯島，在南方轟炸過斐洲。空軍活動的半徑固然大，然而有一些人的想像活動的半徑比空軍更大，從而從這些比美國最新式的長程轟炸機更得更快更遠的想像裡，就得出了一些完全不正確而且極度有害的結論，這些結論，不寧說，在我們這裡是沒有它的地位的。

東方戰局轉變的又一關鍵來自西方；由于七月底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反攻西歐的整個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因為這一轉變帶來了盟軍的勝利反攻，才有了八月間的魁北克會議。英美在魁北克會議決定加強太平洋戰線，由此而產生了東南亞盟軍聯合指揮部。英政府對盟軍採取了更加積極的政策，日本不但在西南要面對美澳的反攻，而且要在東南遭受英印的反攻了；圍繞着日本的包圍圈，這次會議是消極的，現在是快要全面的消滅了。

這之後，上月初意大利和德蘇停戰，意國海軍的完全淪為英美所掌握；加以地中海的通行無阻，日本不情不願地輸了輸心缺腿的政治危機，而且還不得不面對整個海軍力量對比改變的軍事危機。在這種形勢之下，日本在軍事上採取了守勢，政治上採取了攻勢，而在經濟上則加強了以加緊經濟和榨取為基礎的增產政策；這就決定了盟軍的攻勢。所謂軍事攻勢不是說它不再冒險進攻，特別是對於我們，所謂政治攻勢也不僅是對泰國緬甸菲律賓和印度，我們自己也包括在內；它的軍事攻勢是機動的，它的政治攻勢是全面的，徹底的。最近它的宣佈成立軍需省（十一月一日起），內閣局部改組（十月八日）召開臨時會議（十月二十五日），發動滇西攻勢和策動印緬新組織「印度臨時政府」，無一不以貫徹三大政策為目標。跟着軍事形勢的日益不可挽救，日寇將集中更大的力量於它的政治攻勢是必然的；同盟國目前就在東方所遭遇到的困難，與其說是軍事上的，毋寧說是政治的。問題在這一側面，由于東南亞新攻勢的具體化，將日趨明顯。

為了反攻日寇的這一政治陰謀，我們的盟邦發動了反攻；六月，美總統咨文國會，建議提早戰後菲律賓的獨立時期，是這一敵艦反攻的開始。我們知道：同盟國家的作戰目標，早就在一九四一年的大西洋憲章裡規定得清清楚楚了，今天成為問題的，只是它應用範圍的問題；美總統這聲明的一舉，開始把大西洋憲章的光芒投射到太平洋來。我們感覺不足的是：這一敵艦的反攻還不够全面，還不够徹底，日寇的政治攻勢，不但包含了菲律賓、緬甸和泰國，而且還包含著印度和中國，它不但給被征服者以自由獨立的假象

而且還在用盡一切的機會來分化和誘惑正在和他作戰的對手。同盟國家裡其責任到一塊險暗的地方，法西斯的細菌就會繁殖起來。爲了粉碎日寇的這一個目的，同盟國家的政略反攻，就不但需要是徹底的，而且是全面的，一個自由的國家不能一半是自由人，一半是奴隸；一個自由的世異同家不能一半是自由了，而另外一半還深深地沉淪在不自由狀態的魔下，同盟國家更不能讓一個法西斯的獨島飄浮在民主的海洋之中。

我們說：同盟國家在東方所遭到的困難與其說軍事上的，毋寧說在基本上是政治的；這不是說，在這軍事和政治已經分家，沒有關係了，不是的，恰巧相反，政治和軍事永遠是互爲因果的，政治性的困難需要用政治手段來解決，然而解決問題的基本關鍵，依舊在軍事，軍事上不能迅速的勝利，政治上的危機只有照消加深。因此我們以愉快的心情，注視着東南亞洲盟軍總指揮部的成立，以及這一方面的攻勢佈署逐步展開。

七日東南亞洲盟軍總司令蒙巴頓將軍抵達新德里，隨即召開了以佈署東南亞洲新攻勢爲目的的新德里會議，參加者除蒙巴頓和史迪威二將軍外，有從華盛頓趕到的美陸軍後方勤務部長萊姆威爾和飛外長宋子文，會議結果如何，事關軍事秘密，我們自然無從揣測。在這值得提一提的，正如前有些人士看到盟軍總指揮部成立時所感到的太平洋戰爭三個月內結束，其結果弄得想像比飛機還快的一樣；現在，是臨到軍艦了，想像當然是更快了，一會兒「迂迴緬甸」，一會兒「直下新加坡」，馳騁得不亦樂乎。實際上，當前的問題是常設同盟：當前的問題是解放緬甸，打通滇緬路。爲了完成這一工作，滇緬路上一大英印聯軍總指揮部的經驗教訓，單是陸軍作戰不夠的，必須有海軍的登陸配合；在這一點上，以印度爲基地的東南亞洲大陸的反攻，就有着和以澳洲爲基地的西南太平洋反攻相同之點。任何從澳洲出發的反攻不能越過所羅門和菲律賓內帶，不管採用的是怎樣高明的戰略；印度也有它的所羅門和菲律賓內帶，印度所羅門和菲律賓內帶是安達曼和尼科巴羣島，不管東南亞洲新反攻的第一戰略目標，是緬甸還是新加坡，盟軍必須首先以最低限度同時收復這一反攻的前哨陣地；自然這樣說，不是意味着反攻緬甸的佈署可以慢慢來，不是的，恰巧相反，我們希望的，却正是盟軍在可能的限度之內，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來從事這一戰役。我們相信，緬甸的解放和滇緬路的重開，是太平洋全面反攻中核心的一環，只有美國的孤軍派才會懷疑滇緬路重開的意義，只有完全抹殺現實的人，才會主張「迂迴

緬甸。

想像可以比軍艦和飛機更快，但戰爭的進程比人們的想像更慢；我們真心地希望盟軍在可能的限度之內，集中更大的力量，用最快的速度，來從西南太平洋的對日戰爭，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在希特勒還沒有打垮以前，東方戰局是不能發生決定的變化的；英首相邱吉爾不是三番五次的在聲明，只有等到歐洲戰事有了決定的變化之後，才能集中力量到太平洋來，和萬惡不赦的日寇算賬嗎？因此，我們除掉爭取英美在可能的範圍之內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更快的速度從事對日作戰而外，就有理由希望歐洲戰事的迅速結束。以今例昔，這是極其自然的；正如同過去東方戰局上重大的變化，是來自西方的一樣，今後太平洋戰局的發展，主要地依然要看歐洲戰局的發展。

東方望着西方。



意大利的盟軍在進展着，第五軍已經渡過了薩爾諾河，第八軍正在側擊卡塞林的左翼，羅馬快要落入了；羅馬雖然快要落入了，這一期同盟軍重大的勝利不在軍事，而在政治；在政治上盟軍一連獲得了兩重大成功，第一成功是英葡協定的成立（十二日），第二重大成功是意大利的對德宣戰（十三日）。

由於英葡協定的成立，英美盟軍得以借用葡屬亞細亞島上的軍事據點，英美盟軍橫渡北大西洋的航線因此而更加安全，同盟國家的反潛艇戰等因此而獲得了更進一步的保障，希特勒會經把他的希望放在空中，那希望幻滅了，把他的希望放在地上，那希望快要消逝了，狡兔三窟，最後一窟，把希望放在海底，現在那海底的希望也已由動搖而消逝了。英葡協定協定，當時曾有人估計希特勒將採取自然報復手段；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一八〇六年拿破崙進兵西班牙，那是因爲他還沒有碰到莫斯科的慘敗（一八一二），叫如拿破崙的莫斯科慘敗在前，他是不會出此下策的；拿破崙不會做的事情，希特勒是不敢做的。

英葡協定的意義，主要地不在軍事上，而在政治上；英葡協定的成立，表示了歐洲那些表面上維持中立而實際上不敢開罪於希特勒的國家，已經開

於此向於同盟國家的轉變，其影響所及，是不容忽視的。

英葡協定不過表示歐洲中立國家的開始轉變而已；意大利的對德宣戰，簡直是一舉由過去的盟友變而為今日的敵人。意大利這一翻身是不能和土一次歐洲大戰中意大利技術取巧的轉變相比，因為這意意大利人民意志的一個偉大勝利。在嚴格的軍事意義上，由於這一轉變，同盟國家的收獲雖然不大（巴多格利奧可資調遣的軍卒不過八個師）；但由此而獲得的政治上的成功却是巨大的。第一、這一宣戰喚起意大利人民更廣泛地展開反德鬥爭；第二、在英美蘇三國共同承認意大利為交戰國的行動裡，顯示了同盟國家步調的一致；第三、這一轉變指示了軸心國家的瓦解過程的一個新階段。

希特勒在政治上眾叛親離，在軍事上瀕臨日削，然而一方面，希特勒雖然動搖，還沒有倒下；另一方面，英美盟軍在歐洲戰場上和軍事上的成功，雖然大有助於蘇軍反攻的展開，然而在基本上，所有這些成功是以蘇軍的勝利大反攻為前提的；西歐正東歐。

如前所知，蘇軍的勝利大反攻，在上月底本月初經過了一度必要的陣地的鞏固和部隊的調遣，本月七日又以一個新攻勢的姿態展開了；蘇軍的作戰任務是艱重的，前面是奔流的瓦爾河，瓦爾河邊和河後面的森林立着德軍防所必守的堡壘的森林，近代的防禦工事在基本上是一個自由生長的地面，它有如一片海洋，從而在這裡嚴格的補給上的突破是不可能的；在防禦地帶的海洋裡，小的據點有幾千，中等據點有幾百，大的據點有幾十，而主要的鐵路樞紐，在第一線的，北中路有哥美爾，中路有基輔，而在中南路則有羅波什，更南則有米利托波爾（和克里米亞）。

然而就在這複雜的形勢之下，蘇軍新攻勢發動的第一日（七日），在鄂爾霍夫前線，他們克復了基利希，在喀利寧前線，他們克復了納維爾，在庫爾斯前線，他們克復了增曼；而在普伯河一線，則在基輔南面的三個地點渡過了普伯河。

在戰略上，蘇軍新攻勢的開始，着落在普伯河一線的南北兩端，其目的在使其不能回過普伯河一線集中；接着，空前的激烈戰鬥，就在普伯河的兩岸展開了，特別是在圍繞着哥美爾，基輔，羅波什和米利托波爾的幾個地區。七日蘇軍在基輔方面的突破，使德軍的防禦策略發生了戰術的危機，十四日羅波什的克復，則動搖了基輔以南普伯河德軍全部的陣地。在這種，對於德軍，基輔和米利托波爾有着頭等的戰略意義；基輔屏障着整個普伯河套的

德軍陣地，而米利托波爾則屏障着整個克里米亞，基輔一失，全部普伯河套的德軍就失去了屏障，他們有立即遭過渡從背後抄襲的危險；米利托波爾一失，整個克里米亞的德軍即有成為中中之難的可能，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德軍在可能範圍內，將增兵死守這兩大據點是可想而知的。明乎此，也就可以了；爲什麼蘇軍在這些天裡的進展比較緩慢的緣故，「他們出的力氣大，他們得到的果實也將格外豐饒」（歌德）

目前激烈的巷戰，正在米利托波爾進行，米利托波爾已形成了普伯河上的斯大林格勒，不過假如伏爾加河上新大林格勒的一戰，把德軍從伏爾加河趕到了頓河；那麼，普伯河上米利托波爾的一戰，就不知要把他們趕到什麼地方去了。

由於蘇軍的勝利反攻，過去那種反法西斯戰爭的原動力，雖然來自東線，但只有蘇聯和同盟國家人民要求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一面倒形勢已經變化的退去了；這主要的雖然是由於客觀形勢的發展使然，但也由於人類主觀覺醒的結果，雖然這覺醒的程度今天還無法衡量。人造形勢，形勢逼人，在歷史的這一無情邏輯之下，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終於召開了。

三

世界的東方望着西方，歐洲的西方又望着東方，我們好像是從地球的邊緣向地球的中央旅行的一樣，終於走到了這世界的中心，歷史的奇松莫利科。在兩年前的十月，莫斯科會一度屹立在世界的中心，那時放眼天涯，到處瀾天風雨；而今，它在萬目睽睽之下，又一度的站上這歷史的垃圾了，但情況是怎樣的不同；縱目所及，春城何處無花？

正如同八月間英美的魁北克會議在基本上是一個政治性的會議一樣，這一次英美蘇在莫斯科召開的三國外長會議在基本上也是軍事性的；這不是說，因爲它的性質在基本上是軍事性的，所以一切的政治問題不談了，不，恰巧相反，要談，不過是在一個原則之下談，在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原則之下談。在過去的一個禮拜裡，因爲雅伯這一個會議所可能產生的後果，東西軸心國家會大專宣佈三國外長會議的日趨主要的將爲歐洲戰後的政治局問題，他們不

斷強調英美和蘇聯之間「不可調解」的矛盾，甚至於這同盟國家中的頑固份子和孤立派也跟著飛機起飛，紛紛發表議論，不容說這些語言，這些議論是不值一駁，從而，在我們這裡是沒有它的地位的。如果問，英美和蘇聯之間有沒有政治上某種程度的距離乃至矛盾呢？無容臆言，矛盾是有的，距離更是有的是；怎麼辦呢？遙遠的沒有現實意義的放在一邊，眼前的為了勝利非解決不可的着手解決；能不能解決呢？在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原則之下是可以解決的，而且遲早必然解決的。今天國際形勢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客觀的軍事形勢逼迫得人們不得不放下一些可以放下的政治問題，而把那不能放下的在軍事第一和勝利第一的原則之下，加以合理的解決。

三個外長會議在基本上是一個軍事會議，這在今天已經不復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項既成的事實了；三個外長會議十九日開始，二十一日閉會，社就報告道：「三國會談今天開了第三次會，主要的是討論軍事問題」，這一個報告就說明了這一件事實。

既然是軍事問題，問題好像是簡單了，有如二十日倫敦泰晤士報之所說：「會議的首要目的……在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加速聯合國家主要敵人的垮台，使勝利及時而完整」，事實不然。

首先在軍事上的所謂「一切可能的方法」就有多種，最顯著的在理論上就有以空軍為主呢，海軍為主呢，還是陸軍為主的基本的軍事思想問題，而這些理論問題背後實際上都隱藏着基本的策略概念的。

海軍為主，擊敗希特勒的想法是早在一九四〇年春天跟着英首相張伯倫的下台，就被埋葬了；今天在同盟國家中恐怕再沒有任何一個人認為以海軍為主，對歐洲就可打垮希特勒的了。今天海軍方面的問題是一個針對希特勒的潛艇戰爭，英美盟邦有沒有這樣足夠的海軍力量足以阻遏希特勒的潛艇威脅，以及有沒有充足的運輸船隻維持陸軍部隊的給養，彈藥和裝備的補充；過去由於德軍潛艇的猖獗和英美船隻的不足，人們是常拿這些問題來作為不能開闢第二戰場的藉口，現在這已經不成為問題了，因為一方面英美盟邦的海軍力量（包含商船）已經有了空前的增加（「上次歐戰時，英國海軍在戰鬥艦的一級比德國超過百分之五十，而現在在軍艦的所有各級都比納粹德國超過了五倍至十倍之多」）（十一月，莫斯科，真理報，「論希特勒的海軍破產的破產」）；另一方面德國潛艇的威脅已經被盟邦的海軍和空軍克服了。

對於潛艇威脅的克服是不能絕對的，特別是在最近（十月初以來）德軍潛艇在大西洋又形猖獗的時候，更容易證實這一點；不過，這不是英美同盟國家遲延開闢第二戰場的理由，相反正是因為要徹底克服敵人的潛艇威脅，英美盟邦有從速開闢第二戰場的必要（「現在用英國本部現有的部

隊在法國登陸，其在法國給養所需要的運輸船隻比他們原來在英國本部駐紮時所需要的天不了很多；因此我們必須從速開闢第二戰場而擊敗潛艇的軍事政策轉變到為擊敗潛艇而開闢第二戰場的軍事政策」（一九四三，二月，二十日民族週刊，米徹爾「潛艇與第二戰場」）。

不過，在沒有談到以陸軍為主的第二戰場的問題以前，我們還必需清算一種軍事思想，空軍決定一切的軍事思想。從歷史的觀點看，我們可以說在張伯倫時代，英美軍事思想界的主流是海軍決定一切；而今天英美軍事思想界中則存在着力量頗為不小的另一個傾向，他們這三千人以爲空軍是能決定一切的，他們這一派的主要代表者有塞維爾斯等，這一千人在純粹的理論領域上並沒有起多大作用，但是在現實政治上，這種空軍決定論的影響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般的說，軍事思想的潮流從海軍決定論轉變到空軍決定論，是一個進步；海軍決定論的底下掩藏着一種守勢的基本傾向（例如這一次戰爭開始時頗為著名的英國軍事理論家哈特就充分的表現了這一傾向），而空軍決定論者的基本傾向無論如何是攻勢的；從守到攻這是一一個進步。不過，假如這攻勢永遠限制在空中，那攻勢依然是空的，產生不出任何決定結果來的。不僅如此，假如把這一理論運用到今天，其可能產生的悲劇結果是不能想像的。同盟國家方面有沒有這種人這樣主張呢？有，有，到處是，多得很。

隨手拈來，就是一例：例如本月十八日美國參議員頓尼就在美國國會發表過如下的議論，他說：

「英美空軍如能每月轟炸德國十次，德國必在明年二月一日以前崩潰」（十八日華盛頓路透電）。

頓尼先生算得這樣準，好像他快要看見的一樣；事實怎樣呢？伊里奧特少校說得好：

「空軍攻勢只能牽制敵人的戰鬥機，高射炮以及空襲防護圈；空中攻勢依然讓敵方的陸上部隊自由地活動在地上……」（八月十三日，紐約前鋒論壇報，伊里奧特，「今年必須開闢第二戰場」）。

事實上，海軍既不能進攻陸上的敵人，空軍也起不了決定的作用；越洋作戰，海軍運輸和空軍配合，尤其是戰術上的空軍配合都是必要的。但決定的戰鬥依然是需要陸軍來擔當，這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兩個巨大戰場上的軍事教訓都證明這一點，那就是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在這兩大戰場上，海陸空都起配合作戰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是在蘇德戰場上，決定的戰鬥是由陸軍來擔當，就是在看來好像是應以海軍為主的太平洋戰場上，決定的戰鬥同樣是而陸軍來擔當的。蘇德戰場上的每一戰役都是由坦克戰鬥開始而以大規模的步兵戰鬥告終證實了這一觀點。而在日軍攻陷太平洋的作戰期間，它

的空軍總是在遠海護送艦隊登陸的任務，而海軍則演着運輸艦隊登陸的脚色，則又從備而證實了這一點。最近美軍在西南太平洋的反攻大都以空中戰鬥開始而最後則不得不幾乎是一律地發展為從機場裡趕出日軍的「拔釘」戰鬥（史汀生用語），再度的證實了這一點。不了解這一點，西南太平洋反攻的遲緩性是不能解釋的，現狀如不能解釋，對於未來的展望也就無從確實而合理。

首先在軍事思想上確定了海陸空三軍互相配合，有主有從的關係以後，我們才能進一步的談到以陸軍為主的第二戰場的現實問題；而在沒有談到西歐第二戰場的問題以前，我們還要一談亞洲戰場和歐洲戰場的關係問題。

有人說蘇聯既然要求英美在歐洲開闢對德的第二戰場，那麼英美就得要求蘇聯在亞洲開闢對日的第二戰場，以貨易貨，你不開，我不開。

這種說法在純粹理論上，按我們所知道的，最初是出之於名軍事評論家威爾納之手，他在去年出版的「大攻勢」一書中，第一次明確的，但在純理論的形態下提出了這一個問題（一九四二，紐約，威爾納，「大攻勢」，三三四頁以下）；我們相信威爾納氏提出這一個問題，其中沒有包藏絲毫的惡意，不過任何一種本身是沒有利害關係的理論，一聽到現實裡邊來就會被人利用，是非發生了。這一個理論落到美國孤立派的手裡，英美不開歐洲第二戰場的理由，講來就振振有詞了；同盟國家某些有力者有時也不免為這樣的愚想所浸潤；但是，事實怎樣呢？我們還是認伊里奧特少校來答覆：

「參議員惠勒之流以為蘇聯應該自歐洲戰場被打敗的危險，把一部份兵力調到亞洲，儘管亞洲方面他們未必有成功的把握；這種戰略思想，恰恰和提議美國已經和它的同盟國家籌劃了如何擊敗德國，應該掉轉頭來對付日本，使德國有休養生息的機會，如出一轍。很顯然的，這使蘇聯能幫助我們對付日本，我首先就要加緊使德國受到更慘重的失敗，這使蘇聯使蘇聯自再起來」（六月四日，紐約，前鋒論壇報，伊里奧特，「美國不應不應該借用西伯利亞基地」）。戰爭的真實邏輯是：為了加強同盟國家全體對於日本的打擊力量，只有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配合蘇聯，迅速的擊敗希特勒；而這一羣孤立份子的腦袋就昏糊到一種程度，認為蘇聯在遠東不開闢第二戰場，英美就不應該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這樣的愚想在今年五月開華府會議當時，頗為流行一時，現在早已不復為人注意了；因為最近美國的五位孤立派的參議員觀察蘇聯，又將舊話重提，而且在我們中國也得到一些反響，所以我們不惜筆墨，把它提一提。

確定了歐洲戰場和亞洲戰場的真實關係，現在我們可以來看歐洲第二戰場的問題了。首先是地點的問題：意大利不是第二戰場，這不但是因為英美盟軍在那

裡牽制德軍兵力太少，還是不上五十個師最低限度的標準，而且是因為這一個戰場本身的形勢對於歐洲戰場的內線軍事不能起決定的作用；那麼，那裡是到柏林最短（軍事上，不從幾何學上）的道路呢？有人說東南歐——巴爾幹（十九日史末資將軍演說），有人說西歐——荷比法；英美一向向巴爾幹，蘇聯從來主張法比荷；何去何從，想來這是三國外長會議所應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從西歐正面登陸進攻的好處，盡人皆知；直接，迅速，有決定性；而且從登陸部隊的給養所費的運輸量來說，供給在巴爾幹作戰一師所需要的噸位可以供給在法國作戰的二十六個師（參看一九四二，三月二十三日倫敦新聞紀事報）。在這裡，唯一值得考慮的地方是正面的敵前登陸，盟軍所遭遇的抵抗要比較頑強，從而盟軍也就不得不準備作較大的犧牲，然而由這較大的犧牲所換來的戰爭時間的縮短，以及無數更大的不必要的犧牲的避免，其相差是不能以道里計的。

第二戰場的地區成問題，第二戰場開闢的時期更有問題，想來這是三國外長會議所應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二，西歐的第二戰場必須等到明年嗎？無窮無盡的技術理由可以提出來作為「一九四四論」者辯護，不過更加重要的問題是：

「目前進攻西歐五十個師危險呢？還是等到明年（一九四四年）可能對抗二百五十個師危險呢？」（十月二十日，紐約，下午報）。

從大體上看，這是一個白癡都能判斷的問題；不過，假如我們冷靜的考慮一下，問題還有，問題在於英美明年不一定對抗二百五十個師團；而這主要的要看蘇聯反攻的發展；也正是因為這一個緣故，當前還有推移的可能。

實際的客觀事實雖然並不排斥事情還有某種限度推移的可能；我們依然懷抱着比對以前任何一次會議更大的信心，希望三國外長會議能順利的解決一切問題，迅速地召開三國會議，迅速地從東西兩面展開夾擊希特勒的決定攻勢。

從東方，從西方，從亞洲和澳洲，從美洲和歐洲，從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從高山，平原，深谷，叢林，極寒；從所有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何止千百萬雙眼睛在注視着莫斯科，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是這一個世界翻身的轉捩點；我們沒有別的感情，只是山裏的希望：

團結！
作戰！
救世界！
一個世界，一個戰爭，一個勝利。

從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生長起來的

胡風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七週年及文學活動四十週年

魯迅先生逝世以後，中國人民（以及蘇聯、日本、英美等文化人）中間所湧起的哀悼的狂潮，使得許多人瞠目結舌。因為，那明顯地表現出了，他不備是一個領導的作家，一個勤懇的學者，而且是一個思想戰士，一個人民領袖，一個哲人，一個聖者。這就和他生前所受到的「尖酸刻毒」，「冷酷無情」等惡評成了一個恰恰的對照。於是有人說，魯迅被神化了；周作人就冷冷地這樣諷刺過。但周作人之流不知道，猶如人裡面有狗的存在一樣，人裡面也能够有神的存在；周作人之流當然更不知道，就算是神化了罷，但何以被神化了的單單是魯迅。

但在我們，問題當然是在另一方面。中華民族這個偉大的兒子，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奇跡，但天下却沒有無因的奇跡。魯迅這一個存在，思想戰士的、人民領袖的、哲人的、聖者的存在，到底是怎樣生長起來的？凝晶或者說反映在這個存在身上的，因而也就是從這個存在身上所放射出來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樣的特殊的光彩？

「忘掉我！」這不是反語而是先生底願望；但要滿足先生底這個願望，恐怕還得在並非太近的將來。

二

魯迅誕生在一個沒落的士大夫的家庭。

「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替稱爲乞食者」（自傳），這古國底幾千年以

來的封建社會底仁義道德的面幕就在這幼幼小者底眼前掀了開來：「有講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感，我以為在這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而且，在他自己的零星的記述里面提及了的，他還忍受了中醫底欺騙，人情底奸偽，腐敗底粉飾，迷信底陰涼（一）……對這社會用它底精神的冷水給這幼幼施了洗禮，但它却沒有料到，那效果不過皈依而是反叛底萌芽。從這洗禮受到了的凍徹骨髓的顫抖，在這個幼幼底生理機體上留下了永不痊癒的傷痛；自那以來，成了愈成長，就愈強烈的反抗的本能作用了。

另一方面，有愛他的和他愛的父母。早死的父親底嚴厲的家庭教育雖然啓發了他後來處世不苟的謹嚴的態度（二），但影響最大的當然是母親。由他自己的記述和談話，由一些接近過她的人們底報導，無疑地可以看出，母親是一個既堅強卻又慈祥而溫厚的性格底所有者，而且是一個「鄉下人」。在這樣的母親下面，對於他自己，使他底仁厚的天性，惡惡的天性，靈敏的天性，愛好藝術的天性（三）……，沒有遭受摧殘而且得到了發展，對於他和他底周圍，使他走進了農民底孩子底裡面，雖然是士族少爺（奇兒）但却用着原始的平等態度走進了那些大地底孩子們裡面。這裡，我們就接觸到了「社戲」和「救母」，尤其是「故鄉」底世界。

「故鄉」，這一東洋所產生的最美的抒情詩（四），是封建重壓下的農民底悲慘命運底控訴，那聲音底真摯和沉痛，從我們底新文藝裡面還沒有聽到過第二次。但構成這世界底起點的是兩個孩子底友誼，一個是士族孩子（作者魯迅自己）和一個佃農孩子底平等的，純情的友誼。如果沒有作者底成年以後的思想立場底形成，也許寫不出這樣的詩，相反過來看，如果作者在幼年時期所經驗的不是這種和佃農孩子底完全平等無間的夢似的情感生活，又怎能切切地感受到農民底悲慘命運呢？肯定了這，就會明白作者

底產生地的「故鄉」其實也就是後來發展成了一個廣大的世界的，他底思想要求上的「故鄉」。

所以，魯迅底仇恨封建勢力，他底人本主義（對被壓迫者的感同身受的心胸），是聯繫着他底童年的夢想，童年的苦痛，童年的哀愁；是他底肉體的成長一同成長，是溶化進了他底神經纖維裡面的。

三

魯迅產生在「帝國主義的鬼神風暴了東方文明的公主」(何凝語)的時代。

他底封建社會的遺毒了下來。抱在童年時代養成的所愛和所憎，他不得不一走異路，離開他，去尋求別樣的人們，費著作「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脫離現實世界」(「吶喊」自序)了。

自一八九八(十八歲)到一九〇一(二十一歲)，這在南京的四年求學期間，他底心的歷程，並沒有留下紀錄，所知的是他熱情地接受了新學，特別是自然科學。關於這幾個片斷的敘述(五)，也只能使我們依稀感到雲夢的奇年魯迅底血液的湧動。

但這個時期正在黑暗的清甲午戰事之後，而且經歷着「變法」、「革命」、「一季五和議」等大的變遷；袁亡國存肉思瀾當然一時勃起，而魯迅所經過的學校又正是當時最發達的留學(留學學堂)機關(水師學堂)政院底表現，所以他的不離推想，在這個強烈的變遷的童年身上，救亡圖存以至民族主義的思想一定得到了播種和滋養。這雖然只是推想，但跟着來的事實就說明了這推想是反映了實際的活的内容。

一九〇三年(畢業後的第三年)，到東京的第二年，為「浙江潮」撰文，「新巴達之現」和「說日」，並譯了科學小說「月界旅行」。這是他最初的文字工作，那日標就是科學和愛國精神。

一九〇四年進仙台醫專的學生，他底底自覺，「那時又復起了對於被壓迫(註：被中醫所壓)的病人和他的家庭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太平洋發達的極點的事實」(「吶喊」自序)，「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自傳)。

那志願，就是要用科學來救國底人民，來求得故國底更生。

到這裡，他不但用對於科學的信仰來確定了豐富了對於封建勢力的認識和仇恨，而且，通過對於科學的信仰，他把對於封建勢力的仇恨和對於祖國更生的志願統一成了一個二而一的嚴密的意識立場。

這個立場，是他底年青的生命通過了人生的痛苦和科學的追求而後達到的，這就使他和當時各種各樣的新知識份子，一較作家的紳商，士大夫底子弟們有了決定性的分歧。

而且，在這顯而易見的他底行動的志願不過是，「我的夢很簡單，我願卒業回來，教治做教父級級的被壓迫的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回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科學的信仰」(「吶喊」自序)。在這裡，一方面，不管這經過怎樣的轉折，根本上却是以和人民的血緣(對於人民的命運的關切)做紐帶的，另一方面，他底地佔自居的力量而確立嚴密的立場，也確是「做」革命軍的「革命」，也確是後來完成了的，「有一分論，蓋一分之論，集德主義的戰鬥精神。這，就使他和當時各種各樣的新知識份子，根本上就看見或者忘記了人民的，以黎天柱自居的紳、商、士大夫底子弟們有了決定性的分歧。

在這種思想形成底第一個階段，我們就看到了：思想不但是不空想，而行動意志，思想底矛盾不但是內在的尋求而而是了，思想底力量不但是內在底力量(行為底力量)。從這種的看，魯迅在一九〇三年底行動，「聯合會計過神矢，風雨如磐擊故園，密密雲星不全，我以我血獻污載，這裡面的沉重的心理。

四

但正在这時候，他底思想裡面產生了另外的成份。這個台變的第四年，即一九〇二年：

魯迅在私塾又讀了「論說書」等書。他對時常讀到三傳裏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在社會上應盡的責任？(三)它的病根何在？……(六)

這一方面反映出了他深切地關心到在幾十年的封建力底底底底底底

意識底麻痺下的人民精神狀態，另一方面說明了他對於科學的建設的追求終於使他接觸到了意識鬥爭的課題。在當時的歷史階段上，這個問題底提出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提議，幾十年的封建意識第一次碰到了致命性的挑戰。

到一九〇六年，進仙會傳導後的第三年，由於一個事件底發展，這個思想成份終於在他裡面變成了中心的地位。這故事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大事件，在這裡再引一次：

……有一回，我竟在影片上（註：教室裡放映的時事電影的影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個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同鄉的是哥倫比亞做了理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鑑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與年沒有完畢，我已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請醫如傅德金，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當然以為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

這在他底思想上引起了決定的變化，也在他底行動方向上引起了決定的變化。由於這變化，使他開闢了一個偉大的精神領域，就在那最前面，他是第一個而且最致命地抽動了幾千年的封建意識傳統的巨人。——如果不是思想願望和生命結合為一的人，變化就不會來得這樣猛烈，變化底結果也就不會這樣巨大的。

但「新生」，中國現代文藝運動底這個最初的衝鋒隊兵，產生了。這對於他，是一個不小的打擊：「我感到未曾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於是以前我所感到者為寂寞。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吶喊」自序）——然而這打擊為什麼這樣大，那就不外是由於他底對於思想願望的堅貞，思想願望和他底生命結合為一了的緣故。

「新生」潰散了，沒有能夠叫出它底志願。但在同一年的春「河南」雜誌所寫的文章（也許原是為「新生」準備的），和第二年開始的，作為「新生」底進一步工作的域外小說翻譯體面，却透露出了他底戰鬥立場。後者是

「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統（「俄國取其反抗也」），「二」是偏重波羅的海民族（「七」），而在前者裡而提出了「自覺」的命題，「自覺」的命題，每當必中於人心，清咳昭明，不同凡響」（「摩羅詩力說」）。民權解放和社會解放這兩大思想在這裡得到了具體的表現，而它們底實現只靠依靠人民底「自覺」，因而要「改變他們的精神」，使他們從封建意識的麻木裡而覺醒，起來決定自己底命運。「苟奴豈立於其前，必誠懇而觀，故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摩羅詩力說」），對於人民精神底麻木狀態的憤怒，正是發自為人民請命的愛心。他底精神狀態底轉機，到這就取得了其明確的表現了。

但域外小說底介紹工作也失敗了。在封建意識沉重的壓力還沒有遇到使動搖它的思想力量能夠發展的物质基礎以前，在譯、寫、士大夫底子弟們底「一」的「吶喊」自序」的充滿了，沒有真正深入的思想要求的時論底泛濫而前，「背時」的「吶喊」自序」的先驅的思想戰士就只有落進這「寂寞」的命運。

五

由於「新生」一屆失敗所引發的反抗，和「青年」時期的憤激激昂的意思（「吶喊」自序），這時候（一九〇八年）又在他底生命史上發生了一大事件：他加入了「光復會」。

關於這個被他自己說成是「（八）事件」，同人會以「海內孤本」的資格否認過（九），但當時的密友（十）證明了它，魯迅本人生前也承認了它，那周作人底「孤本」其實也是到改過的偽版。在魯迅自己的文字上，我們還可以找得出不少的線索來。

但這個政治集團，却曇花一現地烟消雲散了。如果它底具體內容和具體行動值得我們發掘，它底消滅情形，更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不過，有一點却可以肯定，它底消滅對於魯迅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那比從「新生」底失敗受到的還要大。他敘述過「新生」事件以後接續說，「……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哀更，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憶，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吶喊」自序），「光復會底消滅當然也是這裡面的最重要者，那在他底精神底面所留下的影響是怎樣深也就不難想見了。」

他後來屢次提到「同輩的血」，再看許多文章裡面稍稍提到過的一些烈士，這個集團曾送出了一些犧牲者是可以斷定的。但這決不是「梅哭叛徒尸首的吊客」的他「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裡的」事情。

看「新生」底失敗，是「最先就離去了若干担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吶喊」自序)，那麼，這個在困難裡面而又對着強大的對手的小集團，一定是經過了參加份子們底消滅，拆台，以至陰謀，叛離，而達到消滅的。我以為，這才是他「更寂寞，更悲哀的事」，再加上這集團底政治的性質，所以他只有「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裡的」了。五、四過後他回憶到「新青年」這個團體底散掉的時候，說：「有的高聲，有的悲戀，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股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變化』(「自選集」自序)，這『又一回』以痛苦的經驗，當是『新生』和『光復會』，在我看來特別是『光復會』了。

在只有當思想成了自己的生命機能才能算是思想的魯迅，為了實現思想信仰的政治行動，當然是一種階級式的獻身行為，他抱着一種激越的意志「而來，但他却受到了毀難。所抱的誠無比地大，所受到的失望就無比地深，在真實意義上的所謂幻滅，是多麼大的悲哀啊。

「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着，又嚼碎了自已的心」(「檢章索爾君」)；但那時他悲憤的掙扎也不能得到，只有走進了「嚼碎了自已的心」的過程，或者說，「用了種種法來麻痺自己的靈魂」(「吶喊」自序)的過程。但正確一點，應該說是走進了一個「沉思」的過程。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替業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語，授吾人出於荒寒者乎？家國荒矣，而賦感末哀歌，以訴天下貽後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賦於衆，居其一或兼其二，則中國遂以漸條。……俄文人凱羅連珂(K. Kozolentso)作末光一書，有老人教童子讀書于僻阜者，曰：書中述櫻花黃鳥，而辭卑遜寒，不有此也。翁則解之曰：此鳥即止於櫻木，引吭為好音者耳，少年乃沉思。然夫，處蕭條之中，即不誠聞其好音，亦當得先覺之證解，而先覺之聲，乃又不來破中國之蕭條也。然則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嚴羅詩力說」)

由一九〇九到一九一七的這個時期，一個漫漫的長夜，他底心的歷程我們還無法探求，但對於這個時期的形容詞，我們還是不用他自己所說的「幽暗」而改用了「沉思」。

因為，在這個時期，在他，既不能找到可以參加的運動(十一)，而他自己所信，又還只能得到「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無邊際的荒原」(「吶喊」自序)的結果。在這個時期，他經過了希望、追求、慷慨激昂、失望、痛苦的，經過了科學和行動的雙重磨練的「吶喊之心」，他又回到了對建國的故園，開始了「吸取見的風景更廣大，更光怪陸離，也更血肉模糊的建國的故園，開始了「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酸死人的血和肉」(「野草」題詞)的日子；發一切割傷，流血，向一切吸取營養；這一切痛苦和流汗流了這「吶喊之心」。

「於無野地地獨留」，一個偉大的歷史生命底過程或一個偉大的個人生命底過程，都會經過這樣的時期。

到了一定的時候，無產的詩歌就發成有聲的語言的。

六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裡面，我只想指出在魯迅身上的兩個基本的特點。

第一，只有他是帶着深刻的思想遠見來參加的。他掙着犀利的投槍刺入了在血肉的風貌上的對建國力底調閱，因而也就在當時可能的思想限度上提出了這個殘酷的鬥爭是為了什麼和為着誰的問題。例如，在「故鄉」(一九二一年)裡面，他沉痛地為封建專制下的農民提出了控訴，同時也指出了人與人之間的「高牆」；這使他早期提出的「人性」「國民性」問題取得了科學範疇上的深刻的意義。到「阿Q正傳」，他早期發覺的「裏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的沉痛的戰鬥的胸懷，就和歷史發展底要求完全一致了。在當時的關於魯迅先生和魯迅先生的觀念形態上的關係裡面，他却深深地肉搏到了歷史底中心。

其次，由於這思想遠見和過去的經驗，只有他是帶着高度的警覺性來參加的。殘酷地向敵人進攻的時候，一面還深慮地在視着自己底陣營，不能「專刺舊社會給新青年者」(「吶喊」之餘)。他最早地看出了新文化陣營裡

的分裂，而且勇敢她也是沉痛地指出了這個分裂（一一）。

這使他由參加者變成了真誠意義上的領導者。

這使他在「又經驗了一個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以後依然能夠艱苦地支持着鬥爭，雖然已經成了「佈不成陣」的「游勇」（「自選集」自序），只好採取半游擊的戰術，然而却是過去的大戰鬥底最後戰，要來的大戰鬥底前哨戰的鬥爭。

和前一時代失敗期不同，現在，雖然並不掩飾他底疲倦，但却不是「沉思」而是明確地提出了「將來」。對伙伴，對年青戰鬥者，他懷抱着希望，他傾注着愛心，他開始了用溫情、用血肉哺育年青一代的，聖神的歷程。

「而後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然而，「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轉瞬間，一個新的時代就飄蕩來了。無論是他自己的戰鬥的生命或他所開闢的精神戰線的傳統，都是這新的時代底酵母，因而一定要表現出更高的發展和更美的光華。

七

要接近魯迅這一個偉大的存在，從他底作為意識形態的思想內容的一面當然能夠取得豐富的財產，但從他底作為思想生命的人生態度的一面更能夠汲取無窮的教訓。我們現在所探求的是後者，到這裡就可以把握到一個中心的特徵，那就是，他底內在的戰鬥要求和外在的戰鬥任務的完全合一，這可以和他底造化比美的寶貴的精神。這使得他和教條專利者、智識販賣者、急功好利者、看勢立論者一切種種的新舊戲子們底生理構造沒有一絲一毫的相同。關於這，有可以借用的很好的說明：

……他之所以偉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靜與熱烈雙方都澈底。冷靜則氣宇深邃，明察萬物，熱烈則中心博愛，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實這二者是交相為用的。經過熱烈的冷靜，也就是智；經過冷靜的熱烈，才是真熱烈，也就是仁。魯迅是仁智雙修的人。唯其智，所以底視清高，觀察深刻，能夠揭破社會的黑暗，抉發民族的劣根性，這非有真冷靜不能辦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顧到那慈苦可憐的勞動社會的生活，描寫得極其逼真，而且靈動有力。他的一支

筆，從表面看，有時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實是藏著極大的同情，字中有淚的。這非有真熱烈不能辦到的。……

魯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萬言以上的創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偉大的人格底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間的至文——一篇可歌可泣光明正大的至文。這仁智雙修言行一致八個字，乃是魯迅之所以為魯迅。

（許壽裳：「悼亡友魯迅」）

第一，從這產生了思想鬥爭方法底一個基本特徵：本於真實的鬥爭要求，向着具體的鬥爭對象。前者是由於戰鬥人格底完成，後者需要對於敵情的透徹理解——直到現在，在文化戰線上還沒有誰能够像他那樣懂得舊社會底五花八門的戰法。真正的戰鬥，不能是和主觀要求客觀對象離開的「思想」，非得是這兩者底結合不可。

……最好是無論如何總要對於中國的老病刺他幾刺，譬如說天文忽然為陰曆，講生理終打醫生之類。現在老先生說「地球橢圓」，「元素七十二種」，是不反對的了。「新潮」裡裝滿了這些文章，他們或者還暗地裡高興。……現在偏要發議論而且講科學，講科學而仍發議論，庶幾乎他們依然不得安穩，我們也可告無罪於天下了。（「對於「新潮」一部份的意見」）

抓住具體對象不放的方法是從這裡來的，一刀一槍的文化批評是從這裡來的，創作上的現實主義精神也是從這裡生發起來的。在他，「專講宇宙人生的大話」（「咬嚼之餘」），是總將戰鬥要求向着具體對象的戰鬥者所不為。（一一三）

第二，從這產生了戰鬥的道德律。在寫給日本人的「陀思妥夫斯基本事」裡說：「壓迫者指為被壓迫者的不德之一，這道德律，對於同類，是惡，而對於壓迫者，却是道德的。」這正說出了他底道德律底精義。一方面是一革命之愛在大眾，一生為生民請命，對同志者的敬愛和體恤，對青年戰鬥者的愛護和培養，他底慈愛是深遠無邊的，另一方面是對於敵人的報復主義，打落水狗主義，不忍從，虛偽，到死「也一個都不寬恕」的仇恨，「每一刺都是謀殺」的殘忍。從這裡引出了「劊性戰」「整頓戰」等等「保全自己，殺傷敵人」的他底戰術特徵。所以，由一面看來，他是善行的聖者，慈祥的佛子，由另一面看來，他是尖酸、刻薄、冷酷無情的「世故老人」。

……

第三，從這引出了他底自處的態度。因為所抱者大，所愛者深，所以甘心做一木一石，「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是實事求是的工作本位主義，但那精神境界底光明決不是英雄主義者或宗教主義者所能想像萬一的。因為精神底感受著一舉一動都和全體血脈相連，所以由創作到日常對人事務，不肯有絲毫的苟且敷衍態度；這看起來好像是迂夫子底自討苦吃，但那精神境界底忠誠感決不是波德民式的英雄才子們所能想像萬一的。因為把自我擴大成了思想領域底全面，把一己的生存和整體的生存結成了一體，所以能夠在自我犧牲底行為裡面感受到心情的安慰，自己厚人，因公忘私，把他底精力，他底血液都傾注到對於戰鬥的執着和對於年青一代的愛護和培養了。

「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這原是先生在五四運動那一年為幼小的孩子們請命，向當時時時有覺醒意識的父母們說的，多少帶着有交代底傷痛的氣息，但想不到今天已成了作為思想戰士，作為聖者的他底墓銘，深深地刻印在千千萬萬的戰鬥者底心上，放散着底被煽動的光芒。

十月十九日，鄉下的朋友們曾舉行了一個小小的紀念會。我發指名說話，於是把從本文引用過的「對於『新潮』一部份的意見」所引起的感想說了一點。第二天接本刊編者來信，說本年的紀念非常沉寂，他們決意紀念一下，要我在今天以前寫一點什麼去。在這樣沉寂的時期，這意思是可以理解的，要推辭就未免太不好意思。但合筆間寫得出什麼來呢？於是就記憶得到的從全案翻譯幾處，把那天的談話擴充一下，寫成了這麼個樣子。時間太促，看書整理都不可能，這當然說不上是甚麼，就是作為速寫，恐怕有許多處畫錯了骨格，畫歪面形的。只希望他日有補過的機會。

一九四三年，十月廿四日晨五時，寫於魯郊後記。

- (一)「吶喊」自序及「朝花夕拾」等。
- (二)「朝花夕拾」裡的「五猖會」。
- (三)許壽裳先生作「年譜」及周作人作「關於魯迅」。
- (四)一個日本批評家底評語。

- (五)「吶喊」自序及「朝花夕拾」裡的「雜記」等。
- (六)許壽裳：「懷亡友魯迅」。
- (七)周作人作「關於魯迅之二」。
- (八)作者自己在閑談中間問過先生自己：「周先生加入過×××沒有？」

「沒有，我加入的是光復會，不過這事沒有人知道，他們曉得了要更不高興的。」

- (九)「關於魯迅之二」。

(十)其一，見許作「年譜」，其二，舊友之一的陶治公先生悼詩跋文云：「……距今三十七年前……同遊於魯抗章先生之門，從事民族革命，激昂慷慨，不可一世……」，徵較各種材料，當然是「光復會」，時期又與「年譜」所載相合。陶文見，王治秋著「民元前的魯迅先生」。

(十一)參看「文化備至論」(全案第一卷三八—五四頁)及何燦「魯迅雜感選集」序。

(十二)「熱風」題記，等。

(十三)參看「今春的兩種感想」(全案第七卷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〇—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〇〇)。

新華副刊

本刊內容包括文化方面問題的討論，簡短而深刻的短論、書評、劇評、反映各階層人民生活的描寫以及各種文藝作品，並經常轉載後進區的文藝作品與譯作。茲為便利讀者保存查閱起見，特每月另編印行發售，「團結」「青年生活」「婦女之路」亦均附印在內。歡迎讀者諸君，按照活期定戶辦法長期訂閱，手續簡便，並可節省郵費，如蒙賜顧，即請惠款，以憑辦理。

新華日報圖書課

戊戌變法運動的思想側面

杜威

歷史的事實，以康黨為領導者的戊戌維新運動是因戊戌政變而失敗了。但是它在文化思想上的影響却不因政治上的失敗而消滅。相反的，却因政治上的失敗，更展開了革新思想的宣傳和運動，配合了當時革命派的運動，準備並促成了辛亥的革命。所以，作為晚清以來的文化思想運動的一環，戊戌變法運動的思想側面，是值得研究的。

凡是一個時代的思想，都有它的來源，也有它的去路。它留給後代的影響，往往至於數百年。例如宋儒的理學，單就思想本身來說，它有輸入中國很久的佛家思想為它的基礎，同時有千有餘年的儒家思想的傳統；所以，理學一旦建立以後，宋之支配了宋元明三朝達五百餘年（一〇五〇至一六〇〇年）之久。而且和科學結合在一起，在滿清一代，還有反理學的所謂漢學盛極一時，然而最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還是籠罩在宋儒的思想底下，不能解放出來。「以古為鏡，可知興替」，在文化思想方面，是一樣地適用的。研究戊戌變法的思想側面，用意也在這裡；可惜手頭資料太缺乏，不能充分展開。

戊戌維新運動，是發生於太平軍革命運動失敗之後的。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落後，還沒有經過強烈的階層，革命領袖們的戰略錯誤，導出腐化和內閣，到這地步再身的官僚智識分子以及外國資本主義幫助了滿清統治者，革命政權雖然曾經達到了十七省，維持了十五年（一八五〇至一八六四年），但卒不免被清廷消滅，以失敗告終。

經過了這次的農民戰爭，中國的民族運動，不但絲毫沒有達到目的，反而由於清廷一貫的「寧購朋友不給家奴」的政策，外患日亟，英法聯軍之役，甲午中日之戰，無一不大敗輪虧，喪權失地，使中國陷於隨時有被列強瓜分的危險。同時，滿清官僚的腐敗頹頹（註一）、貪污剝削，又使戰後創痍

無由恢復，人民無以聊生。而咸同以來，曾左張李等的所謂「新政」又僅僅便有了官樣資本，甲午之役，海陸軍全歸覆滅，真相畢露。戊戌的維新運動，就是這樣的內外形勢所促成的。

戊戌運動，發動於當時愛國的智識分子及少數階級外事的士大夫。因為趨於太平軍革命失敗之後，他們都主張採取和平的手段，由上而下的變革——即「變法維新」。因為由上而下，就必須採取說服的方式，所以必須提出新變法的理論根據。這就使這一運動的思想側面，比太平軍革命的見解顯著；儘管他們所謂變法的內容並沒有太平革命那麼廣泛和豐富（註二）。可是，它到底是一個相當有計畫有體系的運動，所以和會國體的倡言「學夷技以備東」，張之洞的「西學為用」，薛福成的主張「變法」只限於商務、手工製造、火輪車等，李鴻章的提倡「洋務」只限於路、鐵、軍、兵、海、生、造、等，大不相同。正如胡不誤所說：

「中國海陸軍在甲午之役全歸覆滅，愛時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才感覺到只吸收西洋的技術，還不能定上富強與兵的康莊大道。康氏更認識西洋之所以富強與兵，自有它的哲學與其基礎，因而企圖變法維新，以實效於學術的危亡。他不僅是談及西洋的「西學」，而且接受西洋的「道」。在文化上移植西洋現代的學術思想，在政治上採取西洋的主立憲，在物質上則吸收西洋一切現代的設備。」（「清末的民族文化」，見「讀書月報」第三卷第九期）

這些，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後，都給以充分的發揮。梁氏在「致強國書」中也說：

「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變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

他又引康氏的話說：

「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變法不可，必

當變；小變不可，必致全變。」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終不獲同新。」

這就是他們和實左張季等「新政」不同的地方，也是他們用以批評張季等的技術節節的辦法為「補苴罅漏」，「愈補則愈漏」的根據。因為主張「全變」，所以他們必須找到它的理論上的根據。在當時，作為他們的根據的，主要是今文學派的公羊學說。可能得到的西洋的學術思想，雖同時也穿插了一些佛學，但那不過僅於行文，實為談助而已，對於那運思，沒有多大關係。

二

戊戌維新運動，雖說是士大夫智識份子所發動的，但更有名的有名的公羊學派，也僅僅有一千三百餘名舉子的簽名。因為當時的知識界，最大多數的讀書人，大都熱中於舉業；不要說根本變法的思想，很難得到他們的響應，就是那盛極一時的清代學術的主流——所謂漢學，也簡直和他們不發生關係的。因為清朝自順治二年（一六四五）開科，即仿明朝制度，以八股取士。所謂制義的出現，都依據四書五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詩主朱子集傳，書主蔡傳，春秋主胡安國傳，禮記主陳賡集說，宗全依禮記朱未學；楚論詩等備格而已。一般讀書人的眼光不離種朱的範圍。中間雖會停止八股，但不久即復舊。所謂變法，那是中式以後，才有少數人去研究它，和廣大的士子，可說毫不相干。洪亮吉做貴州學政時（一七九二——），曾「奏請以禮記鄭玄注易陳腐，始於師範不行」（見前「清史通史」卷中）；即此一端，可見舉業自舉業，漢學自漢學，更說不上什麼「經世致用」的了。梁啟超曾描寫科舉的毛病說：

「揣摩腔調，實類俳優；點名對簿，若待囚虜；擔簦囊囊，狀等乞食；搜索抉書，親同宰割；闢名模索，乃似賭博；舊本重書，若選鈔背。失國家之取士，取其才也，取其學也，取其行也，今以排錢鈔背者之，以因循穿窬視之，欲士之自愛，欲國家之能受其用，何可得也。」（「變法通論」一「論科舉」篇）

在科舉未廢時，這種士子，層數極多，其力量也極大，是為變法的阻礙。

梁啟超又說：

「即如八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張之洞且常與全言：以廢八股為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其上疏請廢之者，蓋恐觸怒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懼其合力以誘己而排擠己也。」（「政變原因」答客難）

在學術鼎盛時代，知識界中還有少數人在做着漢學之類的學問，到了學術衰落時，就連這點書本上的學問，也沒有人做了。吳汝綸的「天演論序」云：

「吾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學廢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為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為書。……凡為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後其教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為學，而儼子乃欲進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上下之書，吾懼其併廢而不相入也。」（「天演論序」）

最後譯者黎的天演論在光緒丙申（一八九六年），在甲日賊等之後，戊戌變法之前，但它的出版則在戊戌（一八九八年）當年，這序當作於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間，可見戊戌前後，知識界是怎樣的局氣。由這樣的士大夫去辦張季所謂「新政」，又怎能不至於失敗？王治秋先生在「民元前的魯迅先生」書中，有一段述及魯迅十八歲（一八九八年）時所考進的江南水師學堂的情形說：

「這學校（按指江南水師學堂）雖然有很高的桅杆，下面張着網，可以練習爬桅杆的技術，這可以算是有些「洋氣」了，而一個游泳池因為溺死了兩個學生便填平了，上面還特別蓋個銅帝廟，藉這錢夫子的威靈，來鎮壓水鬼。並且為着超度亡魂的關係，每年七月半還得請一羣和尚到「馬天操場」裡放炮口。魯迅先生還記得看見一位紅鼻胖大的和尚，「戴上毗盧帽，捋訣，念咒；迴喪囉，普羅耶時，噫耶時，噫，耶，時！」

所謂成同新政，就是握在這樣的士大夫——官僚的手裡。康氏所謂「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對於當時，真是一針見血的警語。此外，佔人口最大多數的農工商等，略識字的（以及不識字的）人民，則為三國、水滸、封神、西遊，乃至施公傅濟公傳等等小說的思想所支配。戊

戊政變後不久（一九〇〇年、庚子）所發生了的義和團的反帝運動，就是以這種思想為背景的。

這是晚清時代中國思想的分野。如果不看清楚個思想界的分野，而專一注意於思想的主流，即只注意於思想的縱的發展，而忽略了它的橫的分佈，是不能獲得正確的結論的。過去論清代學術的，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所以不憚煩冗地先行說述如右。

三

康黨變法維新的運動，其主要的理論根據為今文學派的公羊學說，而康有為就是這一學派的集大成者。

經今古文之辨，漢時已開過一次，那時劉歆幫助王莽，曾為古文經傳開禮、逸禮、左傳及詩至氏傳等立博士，奮爭爭議的為古文家，而晚清今古文之爭，開始以公羊傳為中心，其次乃及於他經，主觀的為今文學家。今文學派的公羊學說所以成為變法維新的根據者，是因這說有所謂「通三統」「張三世」的說法，可以證明制度當隨時因革，愈改而愈進，又有孔子受命改制之說，可以尊孔制教，以與西來的基督教對抗，而且「託古改制」的說法，也便於提出他認為適合時勢的主張。所以，康氏等漸趨為偽經考，雖仍繼續着漢學者治經的考據方法，但他所認為的孔子的微言大義，却往往是一種託古改制，在「大易傳」中，尤為顯著。所以，梁啟超說：

「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劉逢祿、龐自修、陳立等，皆言改制，而有為之說，實與彼異；有為所謂改制者，則一種政治革命社會改造的意味也。故言曾道三統；三統者，謂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也；言言張三世；三世者，謂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有為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皆本於此。有為謂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為教主，誤認歐洲之尊景教為治國之本，故

復欲辨孔子於基督，乃難引證據之言以實之；於是有意心目中孔子，又帶有神秘性矣。」（見「清代學術概論」）

公羊家言，本來就「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何休公羊傳注自序），和所謂「難辨之言」，正是同一路數，知道康氏目的在於託古改制，則難引證據，

更不足為奇了。

晚清的今文運動固由康氏集大成，並用了它去做變法的理論根據，但今文學派的勃興，却有它的歷史的根據。從思想發展的本身來說，在乾嘉時代盛極一時的漢學，實導源於明清之際諸大師如顧炎武、胡渭、閻若璩、黃梨洲等。他們感於明季空疏不學之弊，故繼承了明中葉以實反理學的思想，提倡「實事求是」；又感於宗社之變，志圖匡復，故又力主「經世致用」。後來，清清的政權漸固，壓迫日增，文字之獄屢起，學者為了免禍保身起見，漸漸趨避於「實事求是」，而放輕了「經世致用」，凡學術有備時論的都不敢講習，所以轉趨以經史研究史學地埋學的，也全趨向於考證方面，像「天下郡國利病書」之類的著作議論，早就沒有了。可是經過了乾嘉盛期之後，訓詁方面，已經許多大師發明殆盡，幾乎沒有發展餘地。而名物訓詁的考證，又以實物無存，從書本裡不容易得到一致的精確。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就無從貫徹。並且訓詁考證的學問，其最後的目的，原在於明瞭古人著書立說的真意，而真正目的考證，也非從全書前後文字去作貫串會通的解釋不可；所以，做底做去，必然漸漸趨出考證的範圍而走向經義方面去。所以，當其盛時，康黨原著「原書」及「孔子字說疏證」，已經表現了出考據走上經義之路這個傾向。稍後的無名氏的「性善解」，也是同一傾向的作品。又：康黨一面顯示人以復古，（實則以復古為解放，）一則又教人以懷疑。既可復古於夏漢，又何會不可以復於西漢，乃至直接於孔子。既可以懷疑王簡的偽古文尚書，又何會不可以懷疑殷周尚書所根據的經傳。所以嚴復要說：

「孔子之道，刻板於有明，而國初（即清初）顧、闕、錢、戴諸儒，已由名物制度，以求東漢之學。中葉以後，莊、劉、顧、魏諸儒，又從經史大義，以求西京之學。以是卜之，他日必有更進西京，以求六經者。」（「論八股存亡之關係」見「晚清文選」）

這是學術發展本身必然的趨勢，促使今文運動興起的。另一方面，自道咸以來，國步漸艱，清廷的淫威日減，漢學的煩瑣能應世變，而經世致用的必然要求也促使學者的眼光由書本而移於現實。所以學者逐漸注意於講求經言大義的今文之學，而研究今文學者如魏自珍魏源之流，也同時注意於邊疆及海外的問題。到了集今文學的大成者的康氏，即進一步用它去做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以發揮他自己託古改制的意見了。這是很自然的。這一段多

康梁氏說。

康氏最重要的著作有三種：第一為「新學偽經考」，說明劉歆所立博士的經傳如周禮逸禮左傳及詩之毛傳，都是「偽經」；都為幫助王莽，故謂之「新學」。二為「孔子改制考」，說明六經都是孔子所作，以託古改制。不但孔子這樣，周秦諸子的著作，都是託古改制的。三為「大同書」，則為自己的創作。以春秋三世之義說「禮運」，謂「升平世」為「小康」，「太平世」為大同，並雜以佛學及當時所能得到的西洋思想和知識，而貫以自己的理想，以成其一家之言的。（參看「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說：「有為繫著此書，（大同書）然秘不以示人，亦徒不以此義教學者。謂方今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而陷天下於洪水猛獸。其弟子最初得讀此書者，惟陳千秋梁啟超；讀則大樂，饒意欲宣傳其一部分，有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為；後此萬木草堂學徒多言大同矣。而有為始終謂當以小康義救今世，對於政治問題，對於社會問題，皆以維持舊狀為職志。自發明一種新理想，自認為至善至美，然不願其實現，且竭全力以抗之過之；人類秉性之奇詭，度無以過是者。」（「清代學術概論」）

這本不是康氏「秉性之奇詭」，而是他受了他的社會階層所限制。譬如他主張公羊學，却偏略去「九世復仇之義」不談，主張「保皇」，而不認為與公羊的大義矛盾，都屬於這類限制。主要原因，是害怕革命。但由他託古改制的觀點說，寧是很自然的。

康氏的今文學說及其變法的主張，當時頗能得青年智識分子的歡迎，幾乎成為維新派的共通理論。他的弟子梁啟超等不消說，當時的青年志士很多同很欣悅接受這一學說，以為組織其「仁學」的真集團。至如英國留學生後來以譯西洋哲學選輯社會科學出名的學者嚴復也受了他的影響。嚴復說：

「昔孔子有見天下之至亂，而創其會也，以行其典禮，端門受命後制百王，其教有微言，有大義，所謂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者也。傳微言之學者，有子、子思、孟子，傳大義之實者，曾子、仲弓、荀子。此二派者，孔子之時，便甘參商，迨及宋濂，截然相反。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孟子論孔子，指本於春秋；荀子言孔子，指本於禮。……漢世六經家法，雖半為荀子所傳，……故先業言孔子，雖本於禮。……漢世六經家法，雖半為荀子所傳，……故先業言孔子，雖本於禮。」

兩漢皆禮學之事，惟兼孔子之書乎也。」（「禮入世存性遺編」）這是嚴氏接受康氏學說影響最明顯的證據。嚴氏得且如此，可見康氏的今文學說在戊戌前後影響的廣大。

可是，戊戌政變以後，清廷的對外畏蕙諂媚，對內欺騙壓迫的技術，完全暴露，所以有識的愛國人士，多由變法維新而轉向於排滿革命，談及國故，則揭舉春秋九世復仇的大義，應運天下為公的理想，都是康氏所忽略所不主張實現的。對於他所樂道的通三統張三世等等，則隨同君主立憲之說不復引起青年們的興趣。至於「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的作為偽偽的考據方法方面則不然，當他發表的時候，雖沒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它（註四），可是後來得有複雜的繼承，著「史記探源」和「春秋復始」二書，引申有為之說，益加精密。民國以後，錢玄同顧頡剛等，又加以發揮，終於超越了今文學的範圍，給與研究中國古代學術者以相當重大的影響，而且方興未艾。崔適說：

「新學偽經考字字精確，自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又說：「康君為經考作於二十年前，專論經學之真偽。弟向服膺紀（昀）阮（元）段（玉裁）俞（樞）諸公書，根據確鑿，過於國初（指清初）諸儒然皆所及，亦有可駁者。康書則無之，故以為古今無比。若無此書，則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尚在夢中也。」（一九一一年給錢玄同信，見錢氏「重論經今古學問題」引：「古史辨」第五冊。）錢玄同也說：

「玄同於一九一一年二月間撰書論康，始得借讀新學偽經考，細細讀之，覺得實對於康氏之學業實不為過。」

「我因為相信新學偽經考是一部極其妥密精確的偽偽考者，故二十多年來對於青年學子講論經道及經書，認為這是清國故的人們必讀的一部要籍，無論治文學的，治歷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種種國故的，都有讀它的必要。」（都見「更論經今古學問題」）

「說到史料，不但古文經書不佳，即今文經中獲得的史料也就不多，因為其中隱藏了些隱微的「託古改制」的文章。關於這一點，最先發

明的也是康長素。他作孔子改制考，說所謂五帝三王的政制歷史都是晚周時子（孔子也在內）的「託古改制」，不虛其言。其中有一篇「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很多精闢之論。例如說：「三年為孔孟手所改」，據考我問，孔子非，膝之父兄百官皆不欲為證，皆是。雖其持論不無過當，所引證據的材料也有幾次謬誤……康氏這句創見，當時的人大都不能了解他，不肯相信他。……康氏出後越二十餘年（孔子改制考成於一八九八年），到了近來，才有幾位好學深思之士來研究這問題，以謂剛先生所判據為最多。他們的態度都是「認今文」的，但他們實在接受了康氏所發明而更進一步的探討。」（「左氏春秋考證書後」）

可以說康氏的著作對於後來的影響不在經說方面而在考證方面；而且這方面還要跟着國故的研究而展開延續下去。這恐怕是康氏始料所不及的吧。

四

自鴉片戰爭以後，外患日深，每與外力接觸，未有不敗，於是自強之士，多留心於經國致用，由經世致用而富國強兵，由富國強兵而談西方的學術思想，這是很自然的趨勢。不過對於西洋的學術思想的認識，自有深淺不同，如李鴻章張之洞等，也嘗西法，興工廠，辦翻譯，但其範圍不出於技術製造之外；又鑰藏於舊思想及本身的利害，故他們的口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同時因為輸入的西洋學術，多淺薄貧弱，偏於天算工藝，故已認識西洋的「道」者如梁、梁、譚等，也不能有深遠的成就；但西洋的思想學術構成了戊戌運動的思想上的因素則毫無可疑。梁啟超說得很明白：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譚更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蓋當時之人，無不承認歐美人類能製造能測量能駕駛能操練之外，更有其他學問，而在譯出西書中求之，亦確無他種學問可見。康有為為梁啟超譚嗣同等輩，即生肯於此種「學問體用」之環境中，其思想素，欲構成一體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賤，汲而易竭；其支細滅裂，固宜然矣。」（「清代學術概論」）

中國輸入西洋學問，原始於明季。自明徐光啟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的書，才開始把西洋學術介紹到中國，前清樸學大興，多趨天學，他研究學問的考證方法，實頗受了它的影響。而晚清時代給與譯詞翻譯等西洋學術，則大都是康長素所譯的。當時江南幾位通曉西學而能譯書者，譯有數科書三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先後受，他們的學問都有根柢，對於所譯的書，皆正心細與歐羅巴原書，所以其譯書皆可明瞭準確無比。此外，西洋在中國傳教，也還有一種譯書。光緒年間，所譯詞語彙編，大抵就是這些——明季徐光啟李之藻所譯的書及製造局所譯的三三十種教類型的教科書而已。前清多出於教士之手，自不能越出譯書所能容許的範圍，其與名理有關的，至多是「名理探」之類；後者則為實用的教科書，又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觀念之下，當然也不會有什麼高深的名哲書籍。並且，在當時中國產業的發展程度，能够接受的也只能是火算水利以及初等的格致書類；名理探稍介進來後，很少有人注意，就是這緣故。

在戊戌之前，對於西洋學術思想最能接受而應用得最有成就的，首推譚嗣同，我們可以在「仁學」中看到他成績。梁啟超說：

「嗣同幼治算學，頗深造；亦嘗盡讀所謂格致類之譯書；其當時所能有之科學智識，盡其應用。又治佛學之「唯識宗」「華嚴宗」，用以為思想之基礎，而進之以科學。又用今文學家「太平」「大同」之義，以為世法之標軌，而通之於佛學。嗣同之書，蓋取資於此三部分，而組織之以立己之意見，其較幼稚之論甚多，固無庸諱；其盡脫舊思想之束縛，而趨於新造，則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清代學術概論」）

譚氏自己在「仁學」中也說：

「凡為仁學者，於佛學當通華嚴及心宗、和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荆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龍山、劉梨洲之書。」

由此觀之，譚氏的思想實極複雜，又因當時所能吸收的西洋學術思想那樣淺顯易知，故也不免幼稚，但他的構想極偉大，規模宏大，却和他如何解決困難（注五）的精神，十分相稱，而又貫徹着他那真摯的熱情，使人今日讀了仁學只覺得它可貴而忘其幼稚。這種大膽的企圖，正如梁氏所謂「欲將科學哲學宗教治為一體，而更使適於人生之用」的。梁氏說：「此計畫（即「治

爲「一體」的計畫，雖不敢斷終無成立之望，然以現在全世界學術進步之大勢觀之，則似爲期尚早。況在朝同當時之中國耶？」這種企圖，在仁學中是失敗了，但這不是學術程度的問題，而是方法論上的問題；不但當日不能達到，就是將來也決定永遠沒有可能達到的。因爲他沒有看清科學和宗教的本質，是根本矛盾的東西，就是程朱和韓王也有他不可融和的觀點，能統治爲一體，而欲其不相反，結果只有牽強附會的了。這一層，梁氏也沒有見到。太虛論「中國今後之文化」有這樣幾句話：

「種宋宋學，……近人更有轉爲歐洲十八世紀理性派源泉，或綜飾柏拉圖、康德哲學及形式數理邏輯以爲新學體者，將謂如此之新儒統復興，即足爲新中國文化，則試爲一析言其未當。」（『大公報』九月十九日星期日評論）

對於太虛的批評的當否爲另一問題，這裡不談，但他所要批評的對象，確是最近表現出來的一種「條條」附會的作風的產物；如果可以說是梁氏亦然的「治爲一體」的作風，則這種作風應即停止，因爲由這作風是決不能轉變更來新的文化的。

那真正傳吧。在仁學中，對氏的攻擊而論，排斥名教，讚頌民主，重視科學，傾向物觀等等，都是以代表戊戌時代思想的新的方面，給與辛亥以前的革命運動及以後的歐戰運動以很大的影響。

這個方面，戊戌政變以後，由梁啟超和嚴復繼續發展了。梁啟超於政變後避居日本，仍繼續創辦雜誌，有「清議」「新民」「國風」「新小說」等報。他的目的雖在宣揚自己變法革新的主張，但對於中國後來文化的貢獻上，他的隨時發表介紹「世界學說」，却比他的政治主張要大得多。他的筆鋒常常帶情感的文字，也確能達到他自己所謂「新思想界之陳涉」了。

嚴復，——在戊戌那年，也被元緒召見，他有擬「上皇帝萬言書」，未及進呈而政變起，（收在「晚清文選」）可見到他對於變法的見解，——於政變後也不再參加政治運動，唯期翻譯，是有計畫地介紹了西洋近世的思想的第一人。這是他和梁氏不同的。所譯介紹的「天演論」，照丹斯格的「原富」，斯賓塞的「羣學肄言」，約翰穆勒的「羣己權界論」，和「名學」，羅克思的「社會通論」，孟德斯鳩的「法意」，及耶芳思的「名學釋義」等四種。這些書，除天演論出版於戊戌那一年以外，都是後來陸續出版的。就是影響最大的天演論，（註六）直接對於戊戌運動也未及發生影響。所

以嚴氏的譯書，寧可說縱着戊戌運動新思想的傾向而給以發展的。這也是將來益將發展而且應促其發展的傾向。天演論有「例言」幾條，中有云：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歸也。則達尚焉。……今是書所著本五十年西人新得之學，又爲作者既出之言，詞文原則深奧，故詞句之修飾有所難。而信矣，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則不傷本意。則曰達也。不云然也；求其信，實非正法。……凡此經營，皆以爲達；信也即所以爲信也。……信達之外，求其爾雅。此不願則以行遠耳，實則爾雅之言，用詞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難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徒言其難也。……爾雅者，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

這些話反映了當日的實情。在當時自有不便用「利俗文字」的困難，但用通俗文字便沒有人讀了。所以吳汝綸在「天演論序文」說：

「今西書多新學，爾雅之士以其與公廣博之通語，……爾雅者方爾雅而不知爾，爾雅之詞何由？此其難也。文不足爲故也。文不足爲故（嚴氏語），可與言爾雅矣。……今欲言爾雅，……一言之文，爾雅者方爾雅與爾雅則上下，……爾雅不重耶？」

何德嚴氏知爾雅這是不可以言的。故其「例言」又云：

「什法爾雅云：『爾雅者雅』，來者方多，幸勿以爲難也。實也。」

因爲他處處求「雅」，極力追摹歐陽子，所以在「有德者」能雖然風行了二十年，但讀者的範圍，究竟不廣，缺少了不少的傳播者；而且往往不免因爲求「雅」以致犧牲了「達信」，所以嚴氏的書現在已很少人讀。他所謂「爲達所以爲信也」的說法，（不云然爲近人「達信而務雅」亦拘而備信」的劣譯。所以嚴氏所謂信達雅的方法，也相當影響了後來的翻譯，直到不久之前，這個翻譯方法，才算得到了合理的解決。

五

總而言之，戊戌運動的思想，因受了當時歷史環境所限制，只有那個樣子，也只能有那個樣子。在繼承中國舊有學術方面，它把清代漢學的狹窄精神推前了一步，雖其今文學說僅可說是中國二千年來的經學的總結，而其物

偽的態度和方法却是今後治國學者所應該接受的；至於那「以復古為解放」的方式，則是應該予以拋棄的。

其次，它復活了清初經世致用的精神，由書本而實物，由「名理」而科學，由空談而實用以求真理的傾向，是值得接受的，但其牽強附會的缺點，則應該修正的。

它的接受西洋現代思想，有系統地紹介西洋的著作，以及企圖綜合東西文化的企圖，是值得接受的；但其編織拉雜，不覺對象中間有矛盾都欲冷為一爐的作風，則是應該糾正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綜合，不是混為一爐就完事，而是要批判地接受西洋現代的進步思想，消化吸收它而求其中國化，而使中國的思想現代化。今後正宜應用它那辨偽的方法於批判接受西洋思想方面，弄清它的系統區別而分別予以接受，像分別接受本國文化遺產一樣。

註一：會國藩自己批評當時的吏治說：「大學以長意為慎，以葵藿為恭。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畏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驕頑。」（曾氏全集）

註二：「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軍攻下南京，在政治上設府定都，制定了種種新的法令和制度，如天朝田賦制度等，凡「清季之廢科舉，倡新學，禁吸鴉片，重衛生，戒賭博，崇女教，民團之易服制，設陽歷，修約法，提倡新思潮等，莫不於此時會為一度之試驗」。見太平天國野史變序（一）（羣策第八卷第十五期），葉樹：「太平天國反清戰爭的戰略研究」。

註三：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云：「晚清所謂新學，其始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佛者學依（揚）文會」云云；「佛教本非厭世，本非消極，然其佛學而能赴以積極精神者，禪宗固外，殆未易一二見焉」。又云：「學佛既成爲一種時代流行，則依附以爲名高者出矣」。故佛學對於當時及以後的思想，幾乎看不出有什麼真正影響。至於軍閥遺老利用以爲激世國民的工具，像梁氏所講：「慈悲之聲，斷章取義，日日勇於爲惡，持一經一阿彌陀佛」，謂可漸披無餘」者，又當別論。

註四：「遺書剛出版（一八九一年）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似乎是會行

過兩三年的。但我敢說那時讀這書的人雖多，然懂得它的真價值的有一定極少極少。最下的，大概是因爲白翁（同蘇）潘（祖蔭）當國以來，公羊之學成爲一種時髦的東西，遺書中的材料和議論可以作他們干祿進的取資罷了。稍高的，大概是看了這書力翻二千年來的成案，覺得新奇可喜罷了。最上的，大概是因爲當時國勢危殆，對於這位俊偉卓犖的康氏欲行變法維新之策，敬其人，並敬其書罷了。至於這書在考證上的價值，他則是不合理的，……我且拿皮錫瑞做個例。皮氏是當時一位經學家，而且是一位今文學家，而且在一八九七（丁酉）到一八九八（戊戌）的時候，人皆目之爲「康黨」，……但他對於康氏「壁中古文經是劉歆偽造」這個論案，始終拿他信將信疑不敢言言的態度。皮氏且然，何況他人！」（錢玄同：「重論現今古文學問題」）

註五：「吾嘗讀史記，思之不令，以連其術決疑難。術決利祿之網羅，術決榮辱之網羅，術決貧富之網羅，術決天運之網羅，……然既可術決，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術決。」（仁學）

註六：「此論（天演論）出後，於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等思想，深中於全國學人的腦海，至今猶爲人人之口頭禪，可見其影響之大矣。」（蔣維喬：「中國近三百年思想史」）

三十二年十月二日。

三十二年十月二日。

蘇德戰爭報告文藝作品

六月在頓河

愛倫傑作——戈實撰譯

「六月在頓河」這本集子裡所收的，是愛倫傑從去年六月到九月間所發表的文字，這些文字告訴我們蘇聯人民怎樣在英勇和艱苦地抗戰，在一年多來的戰爭中已給了法西斯匪徒以嚴重的打擊。這本集子，可與「英雄們斯大林城」一書先後媲美，我們特別地推薦給我們的讀者。

上海新華書局印行

（號五八二三字號註在案）

新華日報出版

論赤壁之役

郭化若

在中國歷史上戰爭次數之多，參加人員之衆，蔓延地區之廣，經驗教訓之豐富，大概不在歐洲任何國戰之下；可惜從沒有過正確的統計與詳細的記載。雖然這中間有幾段與不詳載之分，然而如果能加以研究，則對於中華民族在戰術戰術上優良傳統之繼承與發揚，未始沒有益處。

在中國戰爭史中，以少敵多，以弱爲強，反敗爲勝的例子很多，戰略的靈巧，戰術的巧妙，出奇制勝，屢見不鮮。由於這類的戰役，火攻與水攻成爲大規模的戰役（或稱滑戰）的有利戰法。有名的曹吳赤壁之戰，就是以少勝多，出奇制勝的戰術戰術之一。同時是承戰中用火攻戰法而創始。（以後有晉吳之戰中王濬之火炬，陳梁之戰中侯景之火船等）諸戰皆見所及，提供國人研究與參考。

（一）戰前的形勢

（甲）曹操方面

曹操自從統率新編爲東郡太守後，打過很多勝仗，例如：初平三年春破旬奴，夏領兗州，與袁紹破袁術。四年又破袁術於匡亭，追至壽陵。興平之年略地至孟津，破陶謙軍。二年破呂布。建安元年，升大將軍，討武平侯，破黃巾劉表黃巾。二年春，敗張繡，秋，破袁術軍，斬其將馮就等。冬南征劉表，遷其將鄧濟，拔淅陽，下舞陰。三年夏，又大破張繡，冬大破呂布，圍下邳，決泗水灌城，生擒呂布，殺之。四年春，破陸國章，殺固，降大將。五年春擊劉備破之，又斬劉表文臣。冬大破袁紹，圍許都。六年破袁紹合亭軍。七年收復譚袁術（紹子）。八年，復敗之於黎陽。九年破袁術，降烏桓之峭王。十年正月斬袁術於南皮。降其諸城。袁紹將孫觀叛率衆數萬，以幽州降。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十餘萬降。八月斬袁術，渡洛水，逐烏桓出塞。十月用行樂平河東。十一年三月平并州。八月遣將討海賊，入海島，斬昌稀。十二年擊烏桓，東指柳城。八月破袁術，袁紹，關羽及遼西單于。十三年正月，換過關，作文武池，以驛舟師。六月爲丞相。七月南擊劉表，九月降劉琮（劉表子）。得其舟師。其時劉備辭歸當陽，從者十餘萬，日行十餘里。操以輕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

及於當陽之長坂，備與妻孥，僅數十餘人，操縱其人衆皆軍。

在赤壁之戰中，曹操雖然在戰術戰術上優良傳統之繼承與發揚，未始沒有益處。例如：初平元年，討董卓（董卓將）于彭陽許水，取虜身傷；興平元年，破呂布於濮陽，兵奔臨邑，臨邑燒手。建安三年，圍魏，不克，被魏於臨邑，前後受敗。五年魏軍於官渡，合戰不利，軍不勝，傷者十二三，遂與魏議。十三年魏軍，被魏軍所破。這些都是魏軍不復回國（指日三四國魏軍）。

然而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軍勢已大盛，乘長勝之威，破劉州，進軍江陵，入湘江東下。水陸並進，號稱八十萬，並且佔領長江以北的許多地方。

（乙）孫劉方面

再講孫劉方面。

孫劉父兄的約盟，佔據了江東六郡，水陸軍不過十萬6但是也會打過勝仗，例如建安八年「伐黃祖，破其舟軍。」十二年又「西突黃祖，據其六民以還。」

這中間還有個起着重要作用的劉備。

劉備雖然不是新敗之軍，但是他有五個長處：一、有勇將（如關羽張飛趙雲等），二、有精兵（「關羽水軍精甲萬人」——三國諸將皆勇亮等），三、新得個軍事天才孔明；四、在當時社會裡，劉備「以王侯之貴」，「衆士慕仰」，相當得到人民中的某些擁護（備劉琮時，從者十餘萬人）。

這後劉備方面人心團結，一致抗曹。

雙方對此起來，在表面上看，有以下特點：

第一、在名義上——曹操是漢相，孫權是漢臣。

第二、在兵力上——曹操統帥八十萬，吳軍不過十萬，已集中的不過三萬，劉備餘部，不過萬人，劉琦也不過萬餘。

第三、在佔領地域上——黃河南北，長城以南，長江以北，東至於海，大都屬於曹操勢力與統治範圍。而孫權只有江東六郡。劉備則連根據地都沒有建立起來。

第四、在聲勢影響上——曹操以屢勝諸雄的威風，挾大破劉備，吞併荊州，直下夏口，聲勢。孫權雖然也會打勝過黃祖，却敵不過曹操這般的聲威。劉備雖有才幹計謀，却是新敗之軍。

這樣構成了當時表面上雙方強弱懸殊，寡眾不敵的現象，這也就是主和派藉口的根據。然而這只是另一方面。至於另一方面，當時主和派卻沒有看到或不願看到，在主戰派與主和派爭論中，才由主戰派把它暴露出來。

(一) 主戰與主和的鬥爭

當曹操由江陵順江東下的時候，孫權的代表魯肅，已經會到了劉備，結交了孔明，商定了合作的方針。於是孔明就代表劉備向魯肅陳述了孫權的權。說明了要求合作的意見以後，就利用「敵討討」反孫權權，激得孫權變色生氣說：「吾不能坐坐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三國誌吳書)這話孫權就定下了初步抗曹的決心。但他們的自信心還不夠，所以他又問：「然豫州(即指劉備)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雄乎？」孔明回答說：「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這是孔明對本軍和左軍的估計。接着孔明又估計到敵軍的弱點與困難和戰地居民條件，他說：「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聞追豫州轉輸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敵兵法(指孫子兵法)忌之。曰：「……必蹙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孔明不但看到曹軍的弱點，而且還看到抗戰的前途。他又接着說：「今將軍誠能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必北走。如此則荆吳之勢，鼎足之形

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據說當時孫權大大高興起來，完全同意孔明的意見。正在這個時候，曹操送了封信給孫權，信上寫着：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取將軍會獵於吳。」

在這種「八十萬眾」的威嚇之後，來個「會獵於吳」。相當表露出奸雄得意忘形的口吻，孫權把這封信給吳國在後方的各文官看，沒有一個不嚇得「面無人色」。長史張昭(他是東吳資力最老，文官中官位最高的人)和他底下一班人，都說：「曹公討鹿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棄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劉琦門戶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強眾，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他們的意見是主張「和」，更正確說，是主張「降」，實際上這一班人就相當於「主和派」。當時文官中主戰，只有魯肅一個人。因此也就無法向他們爭論，背地機動孫權召請前將周瑜來商議。(根據通鑑「漢紀」)

歷來人說當時武官主戰，倒也不錯。周瑜在會戰中，果敢發表他的主戰的意見，說：「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附。尚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所憂，當自持久，坐等糧竭，又誰與我爭鋒乎？操可也。今北土既未平安，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操舍騎馬使舟楫，與吳爭衡，本非中國(按指中原)所長。今又盛舉，馬無草料。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先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這是根據三國誌「吳書」周瑜列傳，周瑜通鑑則作「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這一篇道理，駁倒了主和派的荒唐的意見。孫權也定下了抗曹的決心。以刀敢向曹操的「和」，請將更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這是說：誰再敢主張「和」的，就砍他的腦袋，像砍這根棒子一樣)散會後，周瑜又見孫權，說：「諸人徒見操勢大，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恃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劉表)眾亦不過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雖多，未足畏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這是根據「江表傳」及通鑑的

話)自是制之。願將軍勿慮！」

以張昭爲首的一般主和的文官，是當時的主和派(不過他們以後並沒有破壞抗曹的運動)他們「主和」(實則主「降」)原因，首先由於他們對當時雙方力量對比上，估計的錯誤，他們認爲：

第一、曹操挾天子，「征四方，拒之不順」，這在歷史記載上他們雖沒有明言曹操打勝仗的問題，却已被曹操屢勝的餘威所震動，語中也多少包含了這種意思。

第二、曹操占荊州得水軍，因此長江不是以爲險；

第三、兵力對比，相差太遠——曹操八十萬，孫權不過十萬，並且還沒有集中好。

以孔明周瑜爲代表的主戰派，對戰爭形勢的估計和意見，與此相反，他們認爲：

第一、曹操名義上雖是「漢相」，實際是漢賊。因此，抗曹是「爲國除殘去穢」，是「義戰」。

第二、曹操名義上雖是「八十萬」，實際上他的主力，「不過十五六萬」，所收編的劉表部的存糧兵，極其量也不過七八萬人。數量上並不可觀。

第三、這些軍隊，其主力「久已疲」，其降衆「尙懷狐疑」，質量亦弱。

第四、曹軍中多中原人，雖善騎馬，却不善水戰。水軍又都是俘虜兵新編的。不如吳水兵之精。

第五、天氣極冷，馬無草草，水土不服，必成疾病。

第六、曹操的後方，沒有安定，尙有其他敵人，「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不能持久也。

第七、居民雖在曹操統制壓迫下，但心裡反對他，「北土未安，操有內憂。」

以上兩派的估計，得出兩種不同的(相反的)結論——一方主和，一方主戰，在當時是正確的，主和的是錯誤的。爲什麼呢？

第一、主和派只看到曹操是「漢相」的外表，沒有看到他「漢賊」的實質。他們只看到敵人的(即投降)，不想爲「除殘去穢」。

第二、主和派對於敵人的優點的一面，只看到敵人表面上數量之多，沒有看到敵人遠近另一面，沒有從表面數量多而看出敵人內部的矛盾

和困難(俘虜成份多，相互懷疑，天時氣候不同，水土不服，後方不安等等)只看到敵人兵多，沒有看到敵軍不善水戰。因此，發生悲觀的情緒，而做出主和的濫言。

第三、主和派只看到敵人一時向來勢洶洶，沒有看到敵人內在的困難與矛盾，發生弱點，可以打破，可以捉弄。

以上這三點，主戰派與主和派不同，主戰派却全面的看到了問題。主戰派不只看清了敵軍之可以打破，並且估計到本軍和友軍之親善團結，必定可以去打他，更看到了居民條件之有利。(只是當時他們還不懂得動員與武裝民衆，和破壞敵軍的後方罷了。)

當時也許有人提到曹操屢打勝仗(所謂「豺虎」所謂「以征四方」)作爲不可抵抗的理由。不錯，曹操自與兵以來，的確打了不少勝仗——最主要的是打敗二袁，劉表與呂布，然而這幾個人和他們的軍隊，都有必敗的理由——特別是在戰爭中，主戰派的錯誤，不應把東吳和他們作比。他們這些人失敗的原因，歷史上記載不多(并常偏於個人作用的優劣)不過也可以見到一斑。例如劉表，正像列傳裏的評語所說：「威名震於外，而名實不副，表跨南陽，紹揚揚州，然背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合離變愛，至於後嗣，就接何復。……」(魏書劉表傳)袁紹在當時也是最有威望的一個，「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但是，正像曹操對他的估計：「……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寬而少威，兵多而分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爲吾率也。」這樣自然不能不敗。紹表生時，既敗於曹操，死後，兩家底兒子(紹子譚尙袁子璋)又都不能合作，其失敗，自然不足爲奇。

袁術則「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袁術列傳)。「呂布有豺虎之勇，而無英雄之謀」(呂布列傳)結果，也只造成了曹操俘虜的「威名」。這是說明曹操以前屢次勝利在於他們敵人一方面的原因。因此勝利失敗的歷史，都應該具體地考察，不應拘其理。何況曹操也還打了許多敗仗(如上文所列)呢。

(三) 戰爭的經過

在東吳方面，既然聯合了劉備劉琦，克服了主和的意見，於是移兵前進

○由周瑜督糧督率兵三萬人。船糧俱備，先行出動。臨走，孫權告訴周瑜說：「……孤當與卿共決之。」（譯成白話，是：我馬上繼續進退不如你，便這就孤，孤當與你共決之。）（譯成白話，是：我馬上繼續進退不如你，便這就孤，孤當與你共決之。）

○當時周瑜程督為左右督。魯肅為督軍校尉。率水軍沿江而上，和劉備會合於美口，一戰而捷。到赤壁（北郡縣誌：赤壁山在蒲圻四百三十里），也是長江邊上，黃蓋湖的東北邊。這地帶，是湖沼地帶。當時陸上交通不便，水軍却起了決定的作用。當時曹軍，已經發生普遍的傳染病。才一交戰，操軍不利，撤退到江北，孫權連營。孫劉軍在南岸。

戰後方針，雖早經孫權最後決定，而戰鬥計劃，却在這時候由黃蓋提出火攻的辦法。蓋說：「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曹軍方連綿，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見三國志周瑜列傳）（這和黃蓋所說的「持久」與前而周瑜所說的「持久」不同。周瑜所說的「持久」，是指敵人在戰略上不能持久，黃蓋這裡所說的「持久」，是指在戰役戰鬥中，不宜「持久」而應「速決」。兩者並不衝突，相反地却是相因相成的。）於是用了幾十艘「蒙衝鬥艦」，裡面塞滿柴草，灌上油膏，包上幕布，插上軍旗，偽裝起來。準備「走制」，（據杜祐說：「走制」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者，往返如飛，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吊在鬥艦的尾上。蓋又寫信給曹操，詐說要投降他。當時東南風急。蓋派裝柴火的「鬥艦」在前，到半江中間，扯起帆來。其餘的船都跟前前進。曹軍官兵，以為黃蓋率船來降，都出營來看。船到隔北岸二里餘，同時放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資治通鑑漢紀）燒去火船，人馬燒死的很多，周瑜劉備的軍隊，跟着前進，戰艦大震，北軍大敗。操引兵從華容道（杜祐說：古華容在竟陵郡監利縣）走，路上泥濘，又起大風，操派老弱的兵士，背草鋪路，人馬才能勉強通過。人馬退得很狼狽，很擁擠，背草的弱兵，被人馬踏死和陷入泥濘中間不少。劉備周瑜，水陸併進，急追到南郡。當時曹軍兼以飢餓瘟疫，死亡過半。曹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樂進守淝陽，自己引兵向北方走了。一場大戰，就此告一段落。

「備考」

按三國誌魏武帝傳「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備張兼救合肥，權聞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劉備戰，不利。於是大校，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說：「公船艦為備所燒。」孫盛吳國評說：「按吳誌劉備先破公軍，然後備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誌為是。」根據這些記載，似乎認為曹操水軍是弱備燒的，但蜀書「先主」一語略齊一兩傳，都認為是合力破曹。吳書周瑜傳寫得較詳細。通鑑則照吳書周瑜傳所載，太平御覽引用後漢書，也是一樣。大概孫劉合力破曹較為可信。而這一戰役的主要指揮者，則是周瑜。

（四）經驗教訓

這一偉大壯烈的會戰，出乎當時常人意料之外地結束了。孫劉以四五萬衆，對敵二十倍的敵人——統稱八十萬的曹軍，結果創造下一個古代戰史中，以少勝多，以弱敵強。出奇制勝的模範的戰例，從這一戰例中，使我們得到如下的經驗教訓：

第一、正確估計敵我力量的對比，才能定下正確的方針。張昭等只看到曹操名義上的「漢相」，外表上的常勝與強盛，而沒有看到漢賊的實質，與曹軍內部的矛盾與困難，在這種矛盾困難基礎上而必要發生錯誤與暴露出弱點，於是居然提出「迎曹」降曹的意見。留下歷史上千秋不可磨滅的污痕。所以對敵我力量的估計，應客觀地、全面地觀察。看到敵人強處時，還要看它的弱點，看到敵人的多少時，還要看它的質的優劣；看到它優勢過滿不可一世時，還要看它內部的矛盾與困難。看到自己的弱處時，也要看到自己的長處；看到自己的一時勝利時，還要看它怎樣去克服以後的困難。從歷史上觀察敵人時，應具體地考察敵人過去的勝敗，及其原因，應從敵人內部基本矛盾中，去考察敵人行動的規律，與其發展的趨勢。只有這樣，才能定出正確的方針。孔明周瑜正因為這樣，所以才堅信只要合力，必能破曹。在今天這種正確的估計，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合力抗戰，打擊主和派的錯誤意見，是這一戰役勝利的根據與原因，沒有孫劉的聯合與團結，沒有孫權那樣「拔刀欲染」地打擊主和派的主張，勝利也不可能。

第三、孫劉對魏國的戰法，應多採取巧妙的戰術，出其不意，乘其不備，避其長處，攻其弱點，爭取主動出奇制勝。……這都是孫劉對魏敵的作戰要領。技術落後的軍隊，火攻、水攻、夜攻、或為城內有料的戰法。孫武所謂：「以火佐攻者，明；（取勝明也）以水佐攻者，強。」中國古代火攻戰最成功的著名戰例中，很少以火佐攻的。水攻者，如：韓信斬魏王，曹孟德赤壁火攻者，如：曹操焚曹船糧車（所謂「火燒」），孫、劉焚曹糧車。孫武火攻的對象與手段，分為五種，「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有人把田單破燕的「火牛陣」列入火攻內（見太平御覽），如果照這辦法，今天我們對付技術落後的敵軍，特別對付在建築物與工事內的敵軍和他們的裝甲部隊用火攻，也可按其手段，分為兩種：「一曰火焚」，「二曰火炸」。所謂「火焚」就像前年我軍火焚寧都的敵軍一樣，這種辦法，隨後又用過多次。今後還可以用，並且還要大規模一試用，不過必須顧及人民。所謂「火炸」又可分為兩種：一是用「炸彈」，一是用「地雷」。敵後我軍一部，在河北肅寧縣西，汽車路旁之村莊內設伏。裝士藏在房頂，等敵人汽車進入村內時，一齊投下許多手榴彈，把敵人三十輛汽車，打毀了二十多輛，死傷敵人百多人，我方只有幾個人傷亡。這是聰明人的例子。此種例子，在抗戰中會有很多，不過配合有生力量，大規模消滅敵人的事情，只有平型關一次，是標準的例子。我想應該提倡這種辦法，來對付敵人的裝甲部隊，與有裝甲配合的部隊。在「待伏」的路上，多埋地雷，並沿途多佈置乾柴枯草引火的東西，以便等敵軍進入埋伏圈內時，給他一個爆炸與焚燒，使他那「鐵甲車」遭受演義上所謂「箭穿車」同樣的命運。為此，一切正規軍及一切游擊隊都應多製備破敵的器材與技術人員，這種器材與人材，應有計劃的準備分配與補充。

第四、人民的向背，對軍隊的勝敗，有重大的影響。也許是孫權、周瑜等不瞭解或不注意發動民衆參加破曹的戰事，也許是寫歷史的人，為時代限制，沒有政治眼光，不識民衆在戰爭中的作用，因而忽略了記載，所以我們在這裡，還找不到關於民衆參戰的具體材料來。不過在那簡單的記載中也，還可以找到一點痕跡。孔明是注意到戰爭中人民作用的。所以他指出「荊州

之民，附曹者，道兵勢耳，非心服也。」果然以後不出其所料。雖然孫、周瑜大概還沒有動員民衆「清野空舍」破壞道路，然而自然地「荊州之民」有意無意地做了一些。所以當曹操兵敗華容道時，「遇鴻溝，道不通。」「兼以飢饉，死者大半」。為什麼「荊州之民」不「箝食盡鹽」以助曹軍呢？因為曹軍不得當地人民的擁護，這就證明孔明所謂「荊州之民」，「非心服也。」的估計的正確。同時也證明了人民作用的偉大。

最後，孫、劉的合力，創造了赤壁破曹的光輝戰史。可惜以後不能繼續實行魯國的聯蜀主張。（魯國也沒有堅持自己的主張）。孔明雖堅持（聯吳討魏）的政策，但終未能達到使雙方親密合作，一致出兵北伐，以致最後為司馬氏所滅。孫、劉二氏的子孫，也都不免受臣僕屈辱的待遇。這該是歷史留給我們寶貴的教訓。

新華日報圖書

英雄的新大林城

愛國 奮鬥 勝利

每冊十元

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以至今今年一月，新華報動員了他們所有的精銳來攻斯大林城，當時他自備這個城是放在他後方的。但是英雄的紅軍却給了法西斯軍隊以頑強的打擊，消滅了希特勒三十三萬人的精銳，而這個冠了斯大林城名的城，也給希特勒一個英雄般的打擊。為什麼英雄的紅軍能保衛斯大林城和擊潰了法西斯的軍隊呢？這就說明了在愛國條的這本報告文學集中，就可以得到一個滿意的回答。這本集子，可與「六月在瀋陽」一書先後出版，請把它推薦給我們的讀者。

田際雲與中國革命運動

——史學散筆之一——

吳哲

暗流甚急；不過，由於清廷的高壓，未大規模爆發而已。可是，乾隆末年（五十八年），貴州湖南一帶苗民叛變，百運教劉之協領導的農民叛亂，民變已極其端。嘉慶時代，安南阮氏作亂，福建浙江廣東海盜騷擾，近畿又有天理教，八卦教，白陽教等的大亂；道光時代，天下大旱，天災人禍，交相煎迫，天山南路，回變又起；兼以外來資本主義入侵，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發生，結果中國一敗塗地，閉關埠，賠款，外國資本主義進來了，中國人民又加上了一節枷鎖，滿清政府加緊賠款的搜括，民生益窘。自是而後，乾隆時代的「太平盛世」過，滿清統治，愈轉直下，動亂，腐敗，墮落，

治承平，堆積「鼎盛」之世。經濟方面，商業資本發達，都市經濟繁榮，看來正是「太平盛世」，難怪乾隆皇帝住在宮中，覺得當時「四海承平，天下安寧，住在宮中無事，想起江南景物來不禁神馳」。想到江南之遊！其實，當時農村經濟受着封建地主的剝削，貪官污吏的勒索，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又腐蝕着農民，農村經濟日趨貧枯，民不聊生，滿清統治的危機早已潛伏着。

美國的陰暗面

以神

——讀「美國六十家」

著者：美國倫德堡

發行：五十年代出版社

譯者：張冀聲·葉篤莊

三十二年五月出版

了解一個朋友，我們應該不僅認識他的優點，也認識他的缺點。不然是談不到深刻認識的。

國家也是一樣。我國和美國在戰時及戰後都有密切的關係和深遠的友誼，因此我們應該認識我們的朋友的各方面。而這部「美國六十家」，敘述了美國的陰暗面，正如米爾士在紐約前鋒論壇報上所說，「對於了解我們的這個時代確有重大的貢獻」。

戰爭以前，羅斯福的「新政」稍微抑制了大富翁。政府所支出的全部戰費。但是國家實質係由全體人豪一下，就引起這「六十家」的強烈反對。美國應該加入反法西斯戰爭的時候，他們高叫安全第一，主張孤立。民衆終於把美國推入反對德日法西斯的戰爭之役，他們見風使舵，收拾起獨立的面目，埋頭於發國難財子。自然還是有口說，那叫作「美國世紀」，意思就是要獨吞勝利的果實（雖然勝利尚待努力爭取），搶奪英國的殖民地，排斥蘇聯。

以上一次世界大戰為例，「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國宣佈參戰之日起，到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最後一批遠征軍返國時止，美國政府共支付戰費美金三五、四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另一方面，美國各公司銀行從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二一年七月戰時工業生產活動結束時止，共獲純利美金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約等於

「盈利」之餘，是什麼呢？「在許多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條件方面，如資本積累的雄厚，技術水準的優越與設備的完善，資源的豐富與人力的大量等等，美國都是蓋世無雙的。然而，似乎是一個很奇怪的矛盾，大多數美國人民仍舊處於貧困狀態中；成千盈萬的人們除了家中一些簡陋的傢俱和身上的一套衣服外，幾乎一無所有。」（本書第二頁）

這箇「很奇怪的矛盾」，應該歸功於銀行大王摩根和梅隆，軍火大王杜邦和道奇，煤油大王洛克

不可挽回。

先是，廣東廣西，於鴉片戰爭後七八年，地方大亂，流亡相繼，羣盜蜂起，反滿形勢緊急；道光三十年，便有洪秀全馮雲山等的反清復明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結果是失敗了。可是接着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大敗，朝野人士憤慨萬分，和約內容又過於苛刻，因此愛國士大夫，康有為梁啟超等，起而號召變法圖強，於光緒二十四年，由光緒皇帝的支持，康梁「戊戌維新運動」就起來，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滿清皇室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激烈反對。光緒上受制于慈禧，下壓於羣臣（慈禧王奕訢榮祿等）終於被迫失敗；光緒被囚於南海的瀛台，康梁逃亡，避難日本，楊銳譚嗣同等六人被殺，稱為「六君子」，慈禧重行專政，新政悉被摧毀「百日維新」，曇花一現，滿清朝政，更趨反動了。

正當這個時期，商業資本日益發達，都市經濟繁榮。山西的票號，本來是地方金融流通機關，這時，隨着商業資本之發達，發展到上海漢口、北京，這是事實。商業資本發達，都市經濟繁榮的另一面，農村經濟被腐蝕，民不聊生，紛紛到都市謀生，地方的伶人，也跑到都市去演戲，北京是國都所在地，商人市民封建帝王貴族，紛集於此，因此徽調漢調崑腔弋腔等地方劇，都來到北京，秦腔也和票號一樣來到北京，在北京成為戲劇中之一大主劇為市民封建帝王貴族所嗜好。地方劇進入國都後，很多被引入皇宮中出演，因之伶人日與帝王往還，受帝王寵愛，本來是平民出身的伶人，現為帝王寵愛，後朝臣士大夫亦與之分庭抗禮，且有參予國事者，儼然一時人傑；皮黃秦斗羅錫唱為慈禧太后所寵幸，秦腔名伶田際雲為光緒帝所寵愛。田二人，皆清末伶界聞人，他們出入宮門，清末，所有康梁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國家政變，他們都親身經歷，且參予政變；到民國後才逝世。我們

菲勒，鋼鐵大王卡尼基，汽車大王福特等家族支配之下的美國最大的銀行大通銀行，第二大銀行花旗銀行、新海文、紐約、普爾門、南太平洋、哈特佛等鐵路公司，美國電報電話公司，通用、福特等汽車公司，美孚油公司，奇異電氣公司，美國鋼鐵公司和國際農具公司等龐大的機關。

他們擁有多少實力呢？不妨舉點例子，讓數字來答覆：

摩根——J.P. 摩根是在花旗銀行老闆，另外擁有銀行一六六家及運輸、保險、電報、電話公司等很多，經過母子公司，他管理着二七七家工廠，總值美金四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他影響之下的共有四五〇家公司，其總資本為七百七十萬萬美元，其中七百二十二萬萬投在美國，佔全美股份公司的資產四分之一以上。他擁有世界最大的電氣業托拉斯奇異電氣公司，世界最大的汽車托拉斯通用汽車公司，世界最大的鋼鐵托拉斯美國鋼鐵公司，普爾門鐵路及火車公司以及美國、加拿大和南美等地的保險、電報及電話公司等很多。（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四日新華日報）

洛克菲勒——美孚油公司老闆，大通銀行的大股東。和約翰·洛克菲勒直接聯繫的公司至少有三十六家，共有資產值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本書第三五頁）

梅隆——銀行大王兼銀業大王。光是他的一個格爾夫煤油公司，就值七萬四千三百萬美元。他的許多公司的財產總計約達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輯自「萍蹤憶語」第四九頁）

他們怎麼會有這樣大的財富呢？和他們的祖先赤手空拳幹起來並不一樣，「六十大家」中的絕大多數人的財富是由於繼承財產。作

者歷舉了十九個女子，她們從未從事任何金融，工業或商業的活動，從未發明任何事物，在生產界從未費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然而生下地來就坐享鉅大的進款。

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索羅金對於這個問題曾作一個權威的研究，證明美國的財富分配已經到達停滯階段，各大財富的主人大部份是生來就是富翁，正和封建社會中的公侯伯子男爵祿的世襲一樣。

據索羅金教授統計，前一代的美國富翁有百分之三八。三出身貧寒，而現在這一代的富翁中，只有百分之二九。六是從貧困的環境中奮鬥出來的。他指出：「現在這一代的百萬富翁，其父兄從事『發財』職業的百分比，較前一代要大得多。根據這一個事實，再加上其他材料，我們可以更有把握的說，現在美國有錢階級的圈子封鎖得愈來愈緊，普通人愈來愈難於插足其內，它已經漸漸變成一個封鎖式地固定化了的集團了。美國社會，至少是上層社會，正在蛻變為一種壁壘分明而固定化的社會。」（本書第一八頁）

為了使壁壘更其分明，利權不致外溢，豪富的家族之間盛行着相互通婚。譬如：

「銀行家詹姆士·斯帝曼的長女伊薩白嫁給斐西·洛克菲勒；他的次女愛梨西也嫁了威廉·洛克菲勒的太太。因此，威廉·洛克菲勒和花旗銀行大亨之間的金錢結合又多了一層生物學的保障。斐西·洛克菲勒和伊薩白·斯帝曼所生的女兒又嫁了道奇太太，這就使洛克菲勒和斯帝曼兩家擁有五千萬財產的道奇公司聯成一片。威廉·洛克菲勒之子J·斯帝曼、洛克菲勒和鋼鐵大王安得留·卡尼基的姪孫女南茜結婚，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安德留·卡尼基·洛克菲勒。」（本書第一〇頁）

從他們參予政變的事蹟中，可以我對中國近百年史的復多寶貴的史料。例如譚雲濤對康梁維新政變之態度與觀點，因其親近慈禧太后，且生活墮落，思想守舊，與保守官吏合流，故反對「自由與維新」，反對康梁變法激烈，筆者前已著文論述過了，田際雲這位伶人則不然，他參加光緒變法，同情自由維新；他參加義和團的「扶清滅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又參加八國聯軍之役的議和，他參加辛亥革命，一生風波，獻身革命，確為伶界之奇才。

提起田際雲這個名字，恐怕沒有想九霄這個名字來得聞名，其實，想九霄原是田際雲的外號。可是知道想九霄的多，知道田際雲的少，好像譚雲濤在上海掛牌時一樣，小叫天的名字比譚雲濤的名字號召力反而來得大，其實小叫天是譚雲濤的外號。

田際雲本是商人，幼時習戲，乃入伶籍為秦腔花旦。其人思想敏慧，能够自動編劇，藝事之工，與當時名旦侯俊山（二十二日）路玉珊（三寶）呈韻頗，且眉目富麗，人格高尚，個性剛介，據周劍雲編「菊部叢刊」伶工小傳想九霄傳云際雲「除演劇外，絕不屈節承歡於達官貴人之前，故愛之者，輒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憾，是能為伶人保存人格者」。可見田氏與眾不同，雖身列帝王貴族之林，尚少貴族習氣，對於時政，憤慨填膺，胸懷愛國大志，時時「與端王剛毅之僚，分庭抗禮，擊刺國事，氣概飛揚，儼然一時人傑」。見上相九霄傳。且與光緒純潔，對於康梁變法主張，深表同情，對於自由民主思想，雖以一介伶人，未必瞭解透徹，然其對守舊派的一貫舊政，深表不滿，故當光緒支持康梁變法時，際雲也奔波其前，幫助變法，友人效先生謂余曰：變法時光緒在宮中所着之西裝，亦為際雲從外帶進去的！際雲策助變法不遺餘力。但守舊派反動力大，維新失敗，康梁出走，光緒被囚，際雲也就逃亡離京。創雲在「想九霄傳」曾列述一二謂：

「戊戌之役，康梁謀變法，際雲蓄意維新，亦搖旗吶喊，事敗出亡，幸慈禧太后愛其藝，不咎既

這些家族的財富是愈傳愈多的，不是愈傳愈分散。據美國稅務署參事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上說：

「這是因為目前富戶的財產是那樣龐大，儘管它的一部份子孫後裔如何揮霍如土，也至多不過把他們個人所領有的進款收入用盡而已。並且，這些大財富大部份都交與信託經營，富戶們採取一切法律的和經濟的方法來防止它的分散。現在大多數大財富的經營，不但可以使它永久存在，並且一代隨着二代向前擴大。」（本書第四四頁）

像滾雪球一樣，「六十家」的財富日益擴大。他們憑藉金融資本的魔力，往往能够支配法律和政

「安德雷·梅隆在一種離奇的情況下要求和他妻子離婚。由於沒有充足理由達到其離婚的目的，他竟設法使馴服的教員議會臨時通過一個特殊法案，取消妻方在離婚案中的要求權。官出處審訊權：離婚成功後，這條法律旋即撤消。關於這個動人聽聞的消息，只有賓省北美日報發表。賓省所有其他各報——其中許多在梅隆的聯合信託公司中都有借款抵押關係——均一字不登；新聞協會所屬全國各報也一致保持緘默。」（本書第二五四頁）

又譬如前總統柯立芝（共和黨）的上台，摩根公司很出了一番氣力，募集競選經費的足摩根手下人物德外特·馬羅。據參議院拉佛特委員會法律顧問華爾士估計，那一次競選中共和黨募集的捐款不下一千五百萬美元，而民主黨只有九〇三、九〇八美元。柯立芝當政以後最顯著的變化，是德外特·馬羅一躍而為全國最有權勢的紅人，因而使摩根在白宫中取得無與匹敵的控制權。

柯立芝和摩根的交情別的不談，只談談他退任以後的事情吧：「當他退任後，紐約人壽保險公司

立刻推他為董事長，李德系的紐約前鋒論壇報對於他的投標特優款，按每字一元美金計算。一九三三年參議院銀行貨幣調查委員會發現摩根公司一九二九年「特別優待」名單上有柯立芝的名字，被優待者可以按遠低於市價的價格購買該公司股票，結果柯立芝所購股票比較市價少付三萬美元，這就等於山摩根公司奉送一筆鉅金。」（本書第一四八頁）

在金融寡頭的統治之下，大魚吃小魚是必然的事，採用的手法則不外乎威脅和高壓。例如，在前總統胡佛當政的時候，一位熱心航業事業的鮑爾曾創辦克星夫蘭至匹茲堡的航線。一九三〇年間，梅隆集團組織了一個空頭公司，三番五次向他們出收買。有一次李德特·摩根親自打電話給鮑爾，他拒絕了。但鮑爾部長則忽忽意推延訂政府與鮑爾航業公司的契約。在合同滿期的兩天以前，鮑爾去我處商議，要他將公司出頂給梅隆，同時將該公司中我一個月一千元的位置。鮑爾說他已將該公司出頂給梅隆，立刻和併入了梅隆公司的航業公司。後來鮑爾辭職接任總統，把鮑爾公司所有這些航業的航線合約一律取消。餘而梅隆依然經營着鮑爾所創的航業公司。

在回答一個參議員的詢問時，鮑爾說：「是的，參議員閣下，我確信這是一項極大的進退交易。閣下可以瞭解，我幾乎是赤手空拳開闢這條航線，為了支持這個事業，三四年內我沒有用任何形式拿到一個銅幣。幾年的苦鬥，使我在社會上有相當聲譽，同時我對這個事業他頗引以自豪。而結果竟被活生生從我手裡奪去了。」（本書第一七八頁）這真是小資產家的血淚之言！

往，故之曰也。

雖進步得幾份子的改良主義的路線，其受守舊派的強烈打擊，是必然的，而且這時民主思想已趨高潮，與中會等民主運動已開展起來，押擊康黨維新的改良主義，康有為逃亡到日本後，改良主義走不通，便倒退回動，公然號召「保皇」運動，擁護滿清封建統治。甲辰雲一個伶人，為其職業之圖于所約束，為其社會關係所限制，對於康黨之參加維新運動，他們是不能不先為之計！

陸軍回京後，救國之志未改，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北中國前農民在對峙勢人與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壓迫下，不單苦痛，起而反抗，當時外國教士來中國設教堂，傳教者很多，士大夫認為是儒佛道「國教」之異端，譴名排斥；慈禧端王等亦反對自由維新，痛恨列強，想閉關自守；農民對本來已出動了，而教士則就地激發農民，火上加油，農民發動益烈，到處引起仇殺教士的亂子。於是，太后就引農民排外運動！作「扶清滅洋」的運動，請喇嘛到北京城，燒教堂，殺教士，弄大驚，英法德俄等八國便組織聯軍，猛攻北京。結果，義和團大敗，北京陷落，慈禧光緒逃走了瀋陽，無奈，祇得跪求和，訂辛丑和約，陸軍在兵時，「和力奮」云。

「陸軍回京後，救國之志未改，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北中國前農民在對峙勢人與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壓迫下，不單苦痛，起而反抗，當時外國教士來中國設教堂，傳教者很多，士大夫認為是儒佛道「國教」之異端，譴名排斥；慈禧端王等亦反對自由維新，痛恨列強，想閉關自守；農民對本來已出動了，而教士則就地激發農民，火上加油，農民發動益烈，到處引起仇殺教士的亂子。於是，太后就引農民排外運動！作「扶清滅洋」的運動，請喇嘛到北京城，燒教堂，殺教士，弄大驚，英法德俄等八國便組織聯軍，猛攻北京。結果，義和團大敗，北京陷落，慈禧光緒逃走了瀋陽，無奈，祇得跪求和，訂辛丑和約，陸軍在兵時，「和力奮」云。

為了維持和擴大其影響，「六十家」進而要求功頌德和助助的喉舌。

美國大多數報紙是和大公司相依為命的。據詹姆斯·洛提在「我的主人的聲音：廣告」一書中的估計，現代美國報紙進款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廣告。在這種情形之下，新聞政策不能不受廣告的影響。不過，廣告對報紙的影響，總不及直接統治各報的人。

應根家族直接統治的報章，就有美國銷路最廣影響最大的三個雜誌：「時代」，「幸福」，「生活」。紐約電訊報和太陽報以及另外兩個一般性的有名雜誌哈普斯週刊和科利爾週刊的老區也是應根。此外在應根家族控制之下的新聞機關，有斯克利普斯——霍瓦德系和「新聞大王」赫斯特屬下的各刊物、通訊社和廣播電台。斯克利普斯——霍瓦德系所屬的就有合衆通訊社、聯合通訊社和三十多種報紙和雜誌，其中包括紐約時報、赫斯特特種報的三十多種日報，三個通訊社，其中包括美國新聞社，十四種雜誌，其中包括每星期銷數在二百萬份以上的家政月刊，以及廣播無線電台十餘個。在洛克菲勒家族支配之下的，有芝加哥日報、柯蒂斯——布克家族統治着星期六晚報以及每星期銷數達二百五十餘萬份的婦女家庭月刊。麥科米克家族經營着美國第二大報芝加哥論壇報和流行最廣的黃色小報紐約日報。至於共和黨能主要機關紐約前鋒論壇報，則是「六十家」之一的李德家族的私產。

老們出了錢，自然願指氣使，得罪不得。無怪乎作者很有感慨地說：「現代美國報紙在億萬巨富直接控制之下，種種限制利害關係的限制，造成了美國新聞界的一種神經質的病症。因為無論在新聞報導或社論分析方面犯忌諱與被禁止的地方太多

，所以它們的全版演說只具有局限在狹小的範圍全「圈子」之內。這種情況說明了為什麼美國報紙充滿了黃色趣味新聞，特別注意盜匪的槍劫案，女明星，棒球隊員和二三等以下政治要人的醜聞，以及各種運動比賽和次要富翁的生活活動之類的新聞報導，藉助於滑稽故事，沒有理性的「特寫」懸賞比賽，趣味小說，瑣事漫談，烹飪食譜，高爾夫球，象棋和橋牌遊戲等等無聊篇幅，來吸引讀者的經常注意。」（本書第二六三頁）

在中下層人民的推動之下，美國於一九一三年開徵遺產所得稅。美國的遺產稅也是累進制。富有錢，稅額愈重。這自然是「六十家」深感頭痛的事。於是就有千方百計逃稅的辦法，其中主要的有下列幾種：

第一是戶口冊七化整為零。譬如在戶口冊上，杜邦家族的成年人口登記了七十三個。這樣一來，在財產額和收入的登記上，就可以化成許多單位，減少應納稅。

第二是買進可以免稅的公債票。

第三是捐款給慈善事業。美國捐稅法上規定，納稅者可以把應納稅額很大的一部份免繳，轉用於慈善事業，即使這筆錢在慈善機關手中仍舊變為錢，不立即使用，亦無不可。慈善機關雖然掌管捐款的人手裡，而慈善基金又可以動用得很少或不動用，可以投資生利，這在「六十家」自然比做國庫的，因此現在美國各種慈善基金共有約十萬萬美元，其中單單卡尼奇基金一項就是三萬五千萬美元。

第四是捐款給教育機關。這種捐款也可以抵代所得稅或遺產稅。因此，據作者說：「美國最大的私立大學中如哈佛大學，統治集團是摩根家族，應

這些行動，未可謂非此種革命中之革命，但與革命之思想，未可謂非此種革命中之革命。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

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

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

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

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

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

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

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

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

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其思想，仍未能與革命之思想相結合。

近年的捐款共一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耶魯大學是摩根和洛克菲勒聯合統治的，最近捐款共九百八十八、五六五美元，哥倫比亞大學是在銀行統治的，最大捐款人有巴克、道奇、高德等富豪，最近捐款共六九、五七六、九一五美元。(本書第三二八頁)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高等教育就多少受「六十大」利益的控制。社會科學被冷落了，因為他們不喜歡。許多知名的社會科學家被排擠於學府之外，因為研究勞工問題或經濟問題，而他們認為這些都是不成其為問題的。

學生怎樣呢？一般美國大學畢業生可分為兩大類。第一種是專門技術人才，在某一特殊部門如法律、物理、化學、工程等，確是專有專長，但對於他們所專長的部門以外不是毫無興趣，便是茫無所知。第二種的典例是抹殺智慧的大學的產物，他們的思想原野只限於各種球賽、玩橋牌、看星期六晚報之類的小說畫報，研究股票市價和如何配製雞尾酒等等。後一類的人為數最多。這些人的謀生之道，大都是做股票掮客，買賣地產，推銷證券，汽車或拉保險注單，或者是當銀行和公司各部的主任。這些職務是用不着很大的聰明才氣的，而且生活安定舒適。至於前類的專門人材，雖然或許會經受到很完備的訓練，但是很少有人在一般基本思想與認識上受到啓發，使他們能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瞭解社會人生。他們認不清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不免時常對自己的工作有空虛與無助之感。而現在這樣的人材在大量生產之下，也和一般打字員和速記員一樣，感覺過剩，許多人很難找到適當的工作。(本書第三四六頁)

誠如本書的作者所說，「美國是一個充滿了矛盾

的國家。她不但培育了歷史上未之前聞的富有階級，同時也產生了一個龐大的，很可能成為永久性的赤貧隊伍。在落後的國家如印度，我們看到成千累萬的貧民聚集，自然不足為異。但是在資源豐厚，經濟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北美環境裡，這種現象確是令人難以置信。尤其是從美國建國的理想來看，這更是一個可惡的矛盾。」(本書第三頁)

然而二十世紀的歷史，是會解決這樣的矛盾的。從社會科學的觀點看，這是一部好書。因為它不但材料詳盡而確鑿，而且從具體的事實中發掘社會發展的奧秘。敘述多過論說這一點，恰恰是它的優點。

從歷史的觀點看，這也是一部好書。作者以犀利的眼光捕捉事變的脈絡，客觀地記載了一八五一年美國南北戰爭以後直到今天的許多關鍵。美國北部在南北戰爭中獲得勝利，使地主階層永遠被排擠於政治大權以外，使工業資本家取得了壓倒的優勢。而當勞動階級成長、發展、吞併、獨佔和腐朽，這便是一幅生動的圖畫。

從文學的觀點看，這部書提供了多麼豐富的現實！巴爾扎克曾以天才而精細的筆，窮畢生之力寫下了一個主題：金錢。但這薄薄的一本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抵得上一個巴爾扎克。二十世紀的現實是這樣複雜，又這樣簡單，默性是這樣醜惡，然而編有這樣多的裝點，有時甚至出乎我們的詩人們想像之外的。

誠如本書的作者所說，「美國是一個充滿了矛盾

的國家。她不但培育了歷史上未之前聞的富有階級，同時也產生了一個龐大的，很可能成為永久性的赤貧隊伍。在落後的國家如印度，我們看到成千累萬的貧民聚集，自然不足為異。但是在資源豐厚，經濟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北美環境裡，這種現象確是令人難以置信。尤其是從美國建國的理想來看，這更是一個可惡的矛盾。」(本書第三頁)

防禦戰

——譯自蘇聯「軍事思想」一九四二年第八期

P·波爾茨基諾夫旅長
焦敏之譯

「不論什麼最機動的戰爭，從來都不能缺少了陣地性的因素——隨龍戰生而設——。機動本身的保證，已在某種情況及某種條件之下要求陣地的手段的使用」。這種論斷，對於已往和今天的戰爭都是公正的。

在一切戰爭之中，連蘇聯人民抵抗德國強盜的祖國戰爭包括在內，攻擊永遠是與防禦並存。這是由許多原因而來。其中最主要的二個原因，就是不能夠在整個廣漠綿延不絕的戰線上有絕對的而且足種種方面的力量的優勢，以便在各地方同時進行攻擊戰。尤其是作戰方法的藝術，就由於這種結合防禦動作與攻擊動作爲一體的木領以保證最後的勝利。所以，防禦與防禦戰，即在最積極的攻擊戰中，亦爲戰鬥動作的必要的形式。

當全線進攻或個別戰場的進攻不可能時，抑或不利時，隨便那一次都要借助於防禦。採取防禦的，最平常的是爲了在次要的戰場上節省這類的兵力以及爲了保證把它大部分的兵力集中到業已選定的方面從事攻擊，或簡單地爲了防守重要的區域和目標。在選定攻擊的戰場上也容採取防禦；以便掩護攻擊動作的準備和掩護奉令攻擊的力氣及物資的集中，以便等候候其它方面動作的開始，以便把圍謀轉爲進攻等等的採取攻勢的敵軍預先瓦解和消耗。

在大多數場合，防禦一方必須抵抗，甚或以較小的兵力使數量上佔優勢的敵人遭受失敗。爲了這種防禦需要具備些什麼基本的手段呢？什麼是它的力量呢？

防禦一方爲了自己的利益有利用優勢地形的可能性。照例地它自己會選擇對防禦的組織較爲方便而對攻擊的敵人則爲不便的地形。擔任防禦的軍隊，在陣地設防，構築防禦，障礙物，鐵絲網，修築機動時的通道。他們預先妥爲組織防禦系統，並把它們隔阻系統聯結了起來。在戰鬥之際，防禦一方充分地掩護着不受攻擊一方的射擊，相後者則必須在防禦者眼前築起地前

進。

在防禦中所使用的各種兵器（砲兵，步槍，機關槍，擊擊小臼砲及其等）可發揮大的火力，在這種表現高壓的效率，並能給攻擊一方以重大的損害。防禦中火力的功效，比在進攻中要高得多，不能比擬的程度。因此，除此而外，攻擊一方必須充分有虛假防禦一方的力量（最好是絕對的）。用同等力量進攻，向例是法定失敗的。根據歷史以及我們祖國戰爭的經驗可知進攻者的損失總遠超過了防禦者損失的總和（比方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塞巴斯托波爾港之役的防禦）。

但防禦也有若干弱點方面。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採取防禦的一方把動作的主動性及由突然攻擊而來的優點都讓給了敵人。攻擊者照例都有可能選定一個攻擊的方向並在這種場中優勢的兵力，組織戰鬥並於他最有利的時機——而且往往是出敵不意的，開始攻擊。防禦一方普通都不能不隨時在自己的全線上準備攻擊。主動權的奪取可容攻擊一方以其打擊力及打擊的形式擊敗防禦方面。而且這可對守軍在保持高昂的士氣方面造成一大困難。福龍茲說：「進攻永遠對敵人底心理發生影響……；衝鋒本身，襲擊本身都是助長了進攻者方面並予他更多的成功的機會」。

因此，防禦要求着擔任防禦的軍隊以非常的沉着與剛毅。發着這些品德，他們就可被進攻的敵人在精神上大大地壓了下去，他們不能最有效地運用一切可能的防禦手段以阻止敵人，並從而擊潰敵人。

「現在有一種意見——昂格爾寫着——認爲兩個軍隊在戰場上對峙的時候，那個掌握了主動的軍隊，儘管之，進攻的軍隊獲得了決定的優勢。然主張這種意見的人們，似乎都是由於對少數偉大將帥和少數偉大普羅民族的崇拜或迷信之類不能抵抗的心理所致，因爲他們都是用最大的進攻者得個

們的勝利。這種意見，似乎應大加修正……世界最大戰役的歷史似乎已指出，在這種情形之下，即當被攻的軍隊沉着果敢，忍勞負重而是能保證他經久不斷的抵抗，同時攻擊一方的火力亦尚未開始變弱，消耗而且遞減亦未開始拖住他，而隨後還可採取攻擊並由自己領銜的時候，在這種條件之下，動作的防禦手段是最可靠的。但是少有人可以用這樣的話忠告他們作戰的軍隊或民族。

俄軍在他長遠的光輝的歷史上，不祇一次地證明他是那些能够順利地進行防禦戰的軍隊之一。昂格羅斯關於俄羅斯軍隊會寫着：「俄國士兵為歐洲最英勇的士兵之一……俄國步兵的方陣，於騎兵將它突破以後還能抵抗和進行長久的肉搏戰，並且永遠是易於射死俄軍而不易於登陸他向後逃遁……他以非常驚人的沉着精神為特色。」

這種公正的評論，已屢經證實，尤以俄羅斯人民在保衛祖國的名義下作戰為然。俄軍屢獲勝利，雖然他們開始作戰時是採取防禦的。一八一二年的一切會戰，終至莫斯科的放棄等，俄軍總是採取防禦，同時儘管如此，其士氣，其勝利的意志以及對最後勝利的信心却始終是不變的。俄軍所進行的防禦戰的最燦爛的範例，便是包羅丁諾會戰。無怪乎拿破崙到後來也被迫承認：「在一切險峻之中最可怕的，是我在莫斯科外國所遭遇的。在這裡法軍本已表現自己值得歌頌的勝利，但俄軍還有權成為不可戰勝者。」要獲得一完全的分析，還應對拿破崙加以補充，即：在人才名額幾乎相等的條件之下，他有的是訓練優良的軍隊，但而圖穆夫祇有三萬五千餘完全沒受過訓練的士兵。

一百二十九年之後，在莫斯科外國又發生了比包羅丁諾在規模上大許多倍的防禦戰。就是在這次會戰中，紅軍部隊也不僅保衛住了蘇維埃首都，並且疲憊和殺傷了法西斯軍隊，擊潰了他們並且自己轉為勝利的進攻。

紅軍，俄國武裝優秀傳統的繼承人，他在現今戰爭的進程中屢經證明他是那種富有沉着剛毅，積極防禦的本領以疲憊敵人然後等候良機轉向反攻的軍隊。

在一九一四年，一切參戰的軍隊都是顯明地按照進攻的原則而祇想進攻的。但到一九一四年尾的西歐戰場上以及一九一五年尾的東歐戰場上，兩方面都不得不轉到戰爭的陣地形式。防禦獲得了簡直不可抵抗的力量。這一九

一八年戰爭的其它所有各個階段，完完全全地是要追求一個實現陣地與破的

手段和方法。
這些手段，早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發現了幾種形式：是以破壞堡壘工事及殺傷防禦中的人力的強大的砲兵，特別是山砲和重砲；與步兵協同攻擊和獨立突入敵人作戰隊形後方的坦克；襲擊敵人後備兵和作戰隊形的空軍；步兵用的武器（好壘壕小白砲，營砲兵和團砲兵），步兵借助它可獨立攻擊堡壘工事（據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屢次都能利用這些手段突破防禦者抵抗的戰術地帶，但攻擊者方面却還沒有用來發展突破的必要的手段。

由那個時候起二十多年過去了。在這個期間，由於理論上的研究及經驗（連戰門經驗也包括在內），結果已認定發展突破的基本的手段，就是運動部隊。這種部隊，是由密切的在戰地與空軍協力動作的坦克及摩托化步兵的部隊組成的。

然運動部隊是不能獨立決定戰略任務的。他們必須與軍隊底基本力量如步兵協同作戰而攻擊。可為防禦方面利用的現代進攻的弱點及最危險的環節之一，就在這裡。

防禦的力量及可能性也以攻擊的同一尺度而增高。防禦一方亦如攻擊一方有其運動部隊。

自運動部隊出現以來，突破動作的可能性大加增高了，這就加重了防禦的危險。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條件，如果遵守這些條件，這種突破還是不允許的。防禦者也有着以擊者所有的諸如此類戰爭的技術工具，也有着這一類的武器，簡言之，有攻擊者所有的這一切戰爭手段。這個，就對於組織堅固的戰術防禦，造成了有利的條件。它同樣是阻止敵人攻擊，疲困敵人，殺傷他底隊伍而最後造成擊潰他的先決條件。

經驗說明，現代防禦的力量同早先一樣，首先是建立在準備必要時機性，但又不把防地放棄與敵人的軍隊的沉着上面。防禦的力量同樣也建立在各種火力系統，各種人造的障礙系統，以及在決定性反擊戰地形的巧妙適用的協同動作上面。此外，當軍隊的沉着與堡壘工事有機地相互補充起來，相互形成一個整體的時候，防禦的戰術地帶尤為鞏固。

現代的防禦必須以高度的抵抗精神為特徵——高度的抵抗精神，基本上就是軍隊底沉着，堅毅與韌性的寄託之所。堅強防禦和防禦活力產生的決定

條件就是工兵的構築，而韌性——則在於防禦的第一線突破之後造成了恢復抵抗可能性的縱深方面的足夠的區別。

如果這種防禦的要求早就存在了的話，那麼現在，它底意義是增大了。這理由基本的理由，就是在於現代部隊猛力增長著的突破力以及擊毀破壞手段的發現。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的戰爭以及祖國戰爭的經驗證實，德軍運用着兩種攻擊的形式：坦克聯隊的攻擊，這種坦克聯隊自己協同摩托化部隊一致衝鋒，突破防線並擴大突破；步兵聯隊與跟着它的發展而前進的坦克師和坦克兵團的防線的突破。

第一種攻擊形式，德軍用來對抗薄弱的而特別是伸延性較大的防線。他是計劃用出敵不意的迅速的行動。衝鋒「由行進」中舉行，即是說，應非常迅速地跟着偵察部隊和担任掃除防禦部隊的前鋒部隊的動作協同並進。這裏，德軍認為動作的敏捷性有非常大的意義；在下決心，運動以及在進入戰鬥方面都是如此。為了動作迅速，德軍不等候砲兵趕來助戰，尤其是大量的砲兵彈藥的運送。砲兵火力的薄弱，他們企圖用強大空軍對防禦軍隊的殺傷來補救。德軍重砲的火力，在這種衝鋒中通常有很大的力量，並且是集中火力轟擊。

這種攻擊形式的主力，在於集中的坦克用深遠的隊形而衝鋒——有三——四個梯隊。此外，第一線上的梯隊企圖深深地突入防禦的陣地，擾亂他底後方與軍隊的指揮；最後一線的梯隊則保證數量較少的疾行的摩托化步兵的衝鋒。

第二種攻擊形式，德軍用來抵抗強有力的而且非常堅固的防線。這裏，提到第一線的是衝鋒的週密的準備。

德軍在選定攻擊的戰場上，尤其是在主攻的方面，集結了大量的軍隊，特別是砲兵，重砲小口砲及坦克；飛機成羣地飛向觀察哨，地下室及防空射擊；法西斯帶利用着重砲及一百五十公厘口徑的大砲。他們企圖用砲兵，重砲及空軍猛烈的火力瓦解我軍防禦的火力系統，在心理上來使軍隊狼狽不安；調動坦克協助步兵向主要方向攻擊以圖突破防禦的戰術縱深，縱然是狹窄的戰線。過後，法西斯帶即企圖一下子就調出他底坦克師突破，俾向作戰的縱深擴張戰果。同時德軍向突破點兩面我軍部隊防線的後方調出不大的，然却以自動步槍手和重砲手來充實了的坦克部隊，以達到破壞

後方及指揮的目的。

在這兩種場合，希特勒軍隊在我軍防禦區域後方及地帶廣泛地實行小的坦克支隊及自動步槍支隊的楔入（infiltration），他們企圖衝至我軍最後方的交通網以達到破壞治安，供應以及通訊聯絡的目的，散佈謠言以造成衝鋒開始時期就已形成的包圍的跡象。有時且於守軍最近後方的降落小隊的空軍着陸隊以達到同一目的。

所以現代的防禦必須：（一）反坦克的，即能抵抗坦克的衝鋒的；（二）防禦的，即能抵抗攻擊一方空軍的猛烈轟炸的；（三）砲兵的，即能保證防禦軍隊的人力和火力工具而不受他大規模的砲火的損害的；（四）最後，聯級的（有生氣的，沉着的）積極的，不僅經常準備抵抗攻擊者，而且給予他一個粉碎的打擊。

為使防禦成為反坦克的起見，首先必須選擇有可能使許多坦克不能通行或不便通行的天然障礙物作防禦界；河流，溝壑，險峻的高山，沼澤，大森林等等。其次，這些障礙物的重要，不獨是在前線前面有它，而且在防禦地帶的全部縱深也要有它。

反坦克的天險，應以藝術的方法加強和充實起來，此外，再構築坦克隔阻網的連串的障礙。障礙物必須置於反坦克砲及砲兵師的火力之下，並或更大口徑的砲火之下，如若沒有這種大砲的話。反坦克障礙物，祇是當它在自己的全線上都在各種火力射擊之下時，才算完成自己的作用。因此，特別必要的，是最可靠地掩護反坦克砲的射擊坑不給毀滅人的一切武器射擊。為達成這個目的起見，最好是把它按三門到六門大砲分佈在所謂反坦克的據點——最牢穩地由各方面都用坦克穿甲彈及坦克驅逐機等所環圍起來的反坦克障礙物掩護着的據點。反坦克據點必須具有特別的堅固性和活動性。它們彼此應當佈置得使敵人坦克突入他們的中間時，陷入強大的交叉火力之下，同時不得不在火力之下去克服障礙物。

由此可見每一反坦克界必須由許多在間隔中有障礙物的據點所組成，必須要能用平射砲和機關槍的火力由各據點射擊。在防禦地帶應當構築若干向縱深成梯形的這種反坦克界以及在各界之間構築彼此銜接而交叉的反坦克界與據點系統，或以反坦克障礙物所掩護的師團砲兵的設防區域。再則，反坦克障礙物與反步兵障礙物交織得一定能夠達到這種必要的程度，以便將步兵與坦克切斷並分別消滅他的任務。

最堅固的防禦是建立在防禦地帶的防禦線上，以便在前線前面擊退坦克的衝鋒。其目的在於使坦克在防禦線之前來擊毀，同時計劃到使最猛烈的坦克的衝鋒，最終也因受設備而受阻。

步兵自身的反坦克手段以及他與坦克進行鬥爭的本領，對保證防禦的穩定性以抵抗坦克的衝鋒，也不比反坦克的意義次要些，因為祇有這樣的步兵，才可抵禦住敵人的坦克進攻並擊退坦克而來的敵軍步兵的衝鋒，把他們和坦克切斷而反坦克的防禦，汽油和反坦克步槍，經驗證明都是與坦克的衝鋒有效的手段。這人所共知，有許多時候，我軍步兵用這些手段擊退了敵軍的坦克衝鋒。

敵人對坦克進行衝鋒。他在一個地點受失敗之後，會改換攻擊的方向去尋求衝鋒的側翼。所以應當慎防敵軍的防禦線的坦克防禦。為了粉碎敵軍坦克的打擊，重要地是適時地確定他攻擊底方向而由深處向預為選定的地界推進。必須將砲兵隊逐地列為梯隊，因為砲兵是反坦克防禦系統中基本的力量。這可消滅敵軍那些突擊防禦線的坦克。

為保證火力及射擊工具不受大規模砲火的摧殘，需要防禦地帶，個別防禦工事，軍隊以及射擊工具等佈置得敵軍人不易測測和看到。為達成這個目的起見，應細心地佈置防禦地帶，各個工事，軍隊以及射擊工具。同時應佈置防禦地帶，工事，射擊工具，以圖欺詐敵人並把他底火力引到防禦地帶的區域。尤為重要者，是將他誘導到防禦線前線防禦的陣地，壓迫及擊毀在防禦線之前完全空襲他砲火與砲擊的轟炸，而到衝鋒之際毫無未備的防禦。為達成這個任務，須用一切方法阻礙敵人對防禦的偵察。所以應當對敵人對防禦的偵察（高地、森林、村莊）警戒，不使敵人窺察防禦地帶的條件。此外，還應努力造成敵人在我防禦線前線外為構築戰鬥防禦地帶的條件。為了這些目的，須在防禦線的後方，應盡可能地集結砲兵，擊毀砲兵及機槍便於援助的時機努力把砲兵擊毀防禦線前線。

防禦線防禦的組織方面，必須更深地對防禦地帶——構築全部側面的防禦。而為了用射擊工具及火力掩護防禦線後方的砲兵的機槍，構築深處的防禦線防禦的砲兵及射擊工具，在它的兩側中應構築砲兵火槍，平射砲，擊毀砲的陣地，監視砲及指揮砲，以及防舍等。每座機槍，太砲，砲兵連及擊毀砲連都必須在防禦線中有預備陣地以及擊毀預備陣地的防禦線。

必須用一切手段使敵人砲兵及擊毀砲連對防禦地帶進行詳盡的偵察，

並時刻準備對敵人最威脅的砲兵連及擊毀砲連猛烈轟擊，集中砲兵擊毀砲連與機槍火力向敵軍直衝的大砲射擊。

說到他的防禦的防禦，那與他同樣地用這些人力及火器的掩護手段來防禦。但這些措施必須佈置到全部深處中，經驗告訴空襲對軍隊作戰隊形的損害，普通比擊毀砲及步槍機槍的火力所給的損害要少，當然這是以軍隊掩護及偽裝的良好為條件的。

經驗證明，與敵軍的鬥爭，不僅是擊毀機槍，高射砲以及高射機槍的順利進行，而且那些擊毀的重機槍，手提機槍，反坦克步槍及步槍也可應用。每一指揮官由班長起，都有可能利用他所有的一切火器組織對敵軍的鬥爭。

在防禦地帶中，防禦的堅韌性都可由它深處的梯隊陣地造成。它由陣地前而的前線遠地地通到後方。梯隊及守軍的縱深必須與現代攻擊的縱深相稱。

防禦中的作戰隊形，必須排列得很深，使他們不能夠被敵人用一擊之力，而非常猛烈的一個打擊便擊破它。敵軍突入陣地的坦克及步兵，必須用火力和人力的打擊不斷地抵抗他，直至他們因損失而最後疲弱到擊毀以前。投入防禦地帶的敵人，防禦線的結果一定要他消滅，或由側面及縱深發動的反攻將他擊退。

如敵軍終於在戰地的這個地段或那個地段突破了防禦地帶，並向突破點圍攻這應作化擊擊，那防禦線的縱深，必須保證他陣地附近地段的堅強精神以及在他們保護下的準備進攻以插入的敵軍的傷亡而集中的堅強的突擊隊，而軍隊作隊形的縱深，則與突擊的運動部隊進行順利的鬥爭。所以不論團和師，都應把他們作隊形建立得不下兩個梯隊；步兵師的防禦縱深應達八公里——十公里。在兵團之中必須有強大的後備兵與敵人的坦克摩托化擊毀隊鬥爭，必須準備回插入防禦線的敵軍的步兵師反攻。軍的作戰序列以及工兵機槍的防禦地帶的縱深，應達五十公里至一百公里。

防禦地帶的防禦，這就是把軍隊佈置成梯隊式的防禦線。當兵力不敷分配到防禦的防禦地帶，那防禦線應是大胆地把軍隊隔離部署，防守某一祇能切斷回防禦方向的道路而互相制約有火力聯繫的梯隊及區域，依照這個原理建立防禦。但無論如何，不應該縮短作戰隊形及作戰序列的縱深。

防禦地帶的精神——防禦線的最重要的條件。上文所引證的福龍茲說

過襲擊自身防禦一方在心理上有所影響。祇有士氣旺盛的軍隊可於敵人成羣坦克及步兵利用砲兵、重砲及空軍幫助衝鋒之際，保持防禦的精神。

為鞏固軍隊防禦的士氣，必須在每一戰士的思想上貫注一種思想，運動的防禦手段增長了他底力量，專先特別選擇好的有組織的火力系統以及事先設防的地形和戰鬥時的掩護物（壕溝、地下室及持久的火巢）的配置，給防禦者以一可能消滅越許多倍的進攻的敵人的力量。

每一戰士須很清楚地認識，在防禦戰中，退却及撤退都是死路，所以不論遇何種困難，都要勇敢地防守陣地。全體都認識以擊者部分的勝利，往往可造成防線上個別區域及射擊坑的疲困，祇有英勇地保衛這些吸引敵人優勢兵力的被圍區域，才可容許高級指揮官組織並順利地計劃反撲並擊潰侵入陣地或侵入作戰構成縱深的敵人。

防禦的軍隊不僅必須退阻攻擊，而且本身還要給攻擊的敵人以一斷不絕的打擊。祇有在這種條件之下，防禦一方才可阻擊敵人，殺傷敵人並造成擊潰他的條件。

德國法西斯統帥部通常把他優勢的兵力集中在狹隘的戰場從事進攻，企圖從此楔入我軍的防線。與敵人這種戰鬥爭的一個良法，就是由側翼反撲而以切斷他基本部隊的突出部分為目的。

德軍用來攻擊的集中的兵力，都是抽調其它戰場，並使其它戰場突露後進行的。這個可容抽調這些戰場的防禦部隊而集中在突破之地從事反撲或還擊。在特定的條件下，方便地向敵人「突擊的」戰線轉為反攻。這可壓迫敵人分散兵力而引他到攻擊的潰敗或降低他進展的速度。

在攻擊的過程中，德軍企圖趁防線上的一个小小的隙隙利用他底自動步槍手和坦克步兵支隊進入。必須利用防禦的較小支隊的反撲迅速滅敵軍進入的支隊。

然而應當估計到用小的兵力反撲，通常祇有局部的意義；它延緩了敵人攻勢的展開，消耗了他底力量。目的在擊潰進攻部隊的決定意義的反撲，它的時機普通都是經過持久戰後來到的，有時是在兩三晝夜之後當進攻者大部分的兵力捲入戰鬥之際。在此以前，防禦一方須保留他兵力的絕大部分（後備兵）。

攻擊一方永遠想在隣近部隊（聯隊）內部側翼的銜接之地突破防線，即在防線的最易損害的銜接點突破。所以對於銜接點的防禦應特別注意。

防禦戰如同攻擊戰一樣，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切戰鬥手段的配合行動。這理由於動作的主動權操之敵人，所以配合行動的作用便益增大。在防禦中，它的作用就在於担任戰鬥的軍隊於同時同地本著同一目標一致動作。再則，步兵與砲兵，空軍與工兵向一個地點努力作戰的週密的呼應也有特別的意義。週密的配合行動提高防禦的效率，特別是對於反機動有利。

偵察必須剛勇不息。祇有組織優良的偵察，才不至於延誤了反機動與消滅敵人突然襲擊的許多優點。每一指揮官必須用他的手段從事偵察，並且將偵察的結果報告上級長官。

攻擊者比防禦者所特別具有的攻擊本性的優點也可因為對防禦戰剛勇的不倦指揮的組織而大大減少。攻擊者永遠企圖利用空襲及其它手段致使指揮機關及通訊聯絡機關陷於紊亂，以便衝鋒時破壞守軍的指揮。因此指揮應達到最高度的剛勇與靈活，為要與疏散且深遠地將指揮機關列成梯形。同時應設法破壞攻擊一方的軍隊的指揮。這個主要地可利用空軍達到；空軍可對敵人的通訊聯絡網，指揮所，監視哨以及參謀部給一打擊。某些時候，可利用空軍着陸部隊在攻擊者的後方達到這個目的。

防禦為戰鬥形式之一，且為基本的形式之一。它不僅是最大規模的攻擊戰所必要，同時不僅是次要的戰場而且在主力進攻方面也必要。

為順利進行防禦戰及防禦動作，必須第一，選擇對自己有利用而對敵人有害的地形，尤其是在反坦克，反砲兵及防空方面應當設防，組織反步兵，反砲兵，與防空的火力系統與準備反撲。第二，戰鬥隊形，軍隊的動作形式及陣地均深遠地列為梯形。第三，不顧任何困難或包圍沉着剛毅地固守陣地。第四，不僅抵禦敵人的打擊，並且打擊敵人。

但防禦所以是抱着消極的目的，是因為它在現在的戰場上這比敵人弱，或因其它的原因而必須採取消極的防禦。然一旦有可能即應轉為進攻。

德國法西斯軍隊，現在已不像意志薄弱而驚慌失措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強大了。在戰鬥過程中他日益受了很大的損失。我軍底防禦愈為堅決而有組織，我軍底反撲愈為堅強而堅決，則敵人也愈益迅速消滅。防禦——是一種可用較小兵力而抵抗敵人優勢兵力的戰鬥形式。這種防禦的優點，應最有效地利用它。我們就在勝利的防禦戰中消滅與疲困敵人的力量，創造最後擊潰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條件。

文獻與事實

莫斯科會議前夜

——十月十六日蘇聯消息報社論

近幾個月來，充滿了事件，這些事件已根本改變了世界大戰的過程。蘇德戰場上的紅軍在對德寇進行的堅強而艱苦的戰鬥中獲得的輝煌勝利，以及我們盟軍在地中海戰場上的順利作戰，已在整個軍事和政治形勢中產生了對英蘇美聯盟極端有利的新的變化。

這幾個月已提供了明如指掌的真實證據，證實了在軍事沒敗的影響之下，希特勒陣營中危機的惡化，并且已使希特勒份子聯盟瀕於解體。

同時，這幾個月，已提出了新的例證，表明在對希特勒德國及其附庸作戰中團結起來的各國正在發展的合作。

因為戰鬥的成就已使共同目標的達成更來得近些，領導者為使希特勒德國敗北而鬥爭的各國，就都感到這種合作有更進一步發展的必要，這是很自然的。

我們可以指出關於英美和蘇聯一致協調解決戰爭過程中他們當前發生的一般問題和特殊問題的重要實例。具有偉大重要性的，例如在和意大利休戰的事情中盟邦行動的協調，那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結果意大利已終於對德國宣戰了。

這種協調的存在，我們的敵人以及在種種國家中的他們的代理人看來，是頗不快意的令人驚愕的毒情。那些傢伙用一切方式醜惡關於反希特勒陣營中「軋轢」和「磨擦」的惡謠。

從發展蘇英美合作的觀點來看，根據蘇聯發起的關於成立盟國的軍事——政治委員會一事而作的決定，也是很有意義的。這個委員會不久就要開始工作了。經濟領域中的合作範圍正在擴大，這也是舉世都知道的。這一方面特別表現於蘇聯代表團也參與的在溫泉（美國）召開的國際糧食會議的工作中，表現於共同起草聯合國國家救濟與復興處的規程中。這個救濟與復興處，在從戰時情況向平時情況推移期間，一定要展開它的活動的。

英美的新聞界以及中立國的報紙，對於三國同盟的強國行將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都認為具有特別偉大的重要性，在這個會議中，英國將由外相艾登做代表，美國由赫爾做代表，而蘇聯就由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做代表。關於行將舉行的談判的大綱和性質，各方已作了無數的猜度，雖然還沒有發表正式說明，而全世界報紙的注意力已經被莫斯科會議所吸引。

蘇美英在許多方面——在軍事、政治、和經濟各方面——的合作的發展，提出了應該共同解決的若干問題。檢討也專門的共同性而引起的大問題，就成爲必要的了。見解和行動的協調，就成爲必要的了。

他們關心作戰的種種方面，外國報紙列舉了他們認爲在三強代表會中，那上應該討論的大問題。除了關於作戰，關於成立永久機構以便盟國間發生接觸，關於加強經濟聯繫的種種基本問題以外，並且也提出了無敵戰後問題，如：對被打敗的國家的態度，巴爾幹的局勢，小國的地位，以及希特勒附庸——羅馬尼亞、匈牙利、芬蘭的將來等等。

後這些問題，甚至竟支配了許多機關報的主要注意力，這些報紙準備把這些問題提出來沒有盡頭地一直討論下去，而除了真誠擁護發展對蘇聯友好邦交的人士的呼聲以外，並且也發出了自告奮勇的替德國宣傳講話的仲裁人，這些人極力辯明有對小些的誠懇不必計較的必要，這些小猛獸原來少極而希特勒的幫助犧牲蘇聯的領土以自肥的呀。

關於戰後問題，自然對於所有同盟國都具有偉大重要性，而且在如今戰時時期就已經必須準備解決戰後時期的許多問題，尤其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問題。然而，事件看他們自身的邏輯。和平時期是由多步協調的作戰和戰後的勝利結束爲前提的。當軍事政治和經濟各方面一切事情都辦好，使戰後時期更接近些，在這些條件下，戰後問題是能夠順利地解決的。

由紅軍的順利攻勢，以及由盟邦軍事力量成長和成就而引起的現在國際形勢的基本特徵，便是：它把對所有各國人民最生存攸關的問題——戰爭時期的問題，提到前面來了。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是以蘇聯的「閃電式」的攻北爲賭注的，他對歐洲的若干國家曾經那樣橫暴過。然而，紅軍已使德軍參謀本部關於「閃電式」的打算完全落空，迫使德寇進行他們不會準備的持久戰。因此，就使我們的盟邦能夠完成他們作戰機構的必要準備，而開發他們的戰爭潛能。時間的因素，變了反希特勒陣營掌握中的武器。

可是，軍事形勢已根本改變了。希特勒強盜的計劃，也已經變更了。希特勒份字被迫從攻勢改取守勢，或者說得更正確些，被迫從攻勢改爲退却，如今就拋他們的一切計劃都建築在推遲戰事上面，以便擺脫最後的攻北，而引起同盟國方面由於戰爭的曠日持久而產生的困難。所以，如今同盟國的任務便是在：將時間的武器從希特勒的手中打落，使他吃到澈底的而且具有

決定性的敗仗。迅速而堅決的行動，就成了把希特勒軍隊打敗而強行力的武器了。

紅軍和我們人民，遭遇希特勒作戰機構的差不多全部的力量，這種對敵人進行不共戴天的鬥爭，已差不多歷年半了。

軍事形勢和政治形勢，都是對我們盟國有利的。不獨用這種形勢，而延長戰爭的時間，那就是危險着：對於千百萬人民所受的無限的苦難，對於全世界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嚴重的脫節，理應負政治上的責任。

毫無疑問，關於解決縮短戰爭時間，以及關於在最短期間求得勝利問題，是在西歐開第二戰場的問題密切聯繫着分不開的。關於由戰爭的進程所提出的具有第一義重要性的問題，如果存在着默契，那麼其他一切必要的問題解決起來也一定容易些了。

希特勒陣營很害怕莫斯科會議。他們爲了要安定他們的人民，竟敢說私的里亞地噠叫說，我們盟邦間有不可調解的「矛盾」。這是，希特勒份字們這樣一心希圖同盟國陣營中的矛盾，可是因爲這種希望而自取滅亡。這不止一次了。德國要玩弄盟國矛盾的這種政策，早已過時，在戰爭期間，曾不止一次地引起了完全相反的後果。就連希特勒份字們自己也記清了這一點，例如，德國勸報部就曾說過：「三個同盟國之間的矛盾，決不會影響到問題的本質。」問題的本質，便是使希特勒德國攻北的任務。這一點，當由同盟國的共同努力來達成。這次會議，必須使這種任務的達成更趨鞏固。行將舉行的三個同盟國代表的會議，在這個任務的解決方面，以及在其它迫切的諸問題的解決方面，都要求來起重大的作用。

新華副刊九月卽出

全月十五元

經售者：新華日報圖書課

論戰爭時間的長短

——蘇聯「戰爭與工人階級」第九期社論

合衆·雷通達爾，爲聯合國日報而作成的著名戰士，最近在「美國人」雜誌上寫了一篇文章討論戰爭的前途。他把那些傾向於過估計敵人的實力的人，把那些預料「輕易的勝利」，例如以爲是空中轟炸就可以取勝的人略而不談，這無疑是對的。作者雖然從正確的前提提出幾種可能，依然是強大的，但得也結論，說是盟國在世界戰場上依然面對着至少兩年的重大戰鬥。據作者的意見，美國軍界也有這樣的見解。他寫道：「我以爲我們將在二九四五年打敗德日兩國，取得勝利。我並不認爲這段時間太長。」這樣，據雷通達爾的意見，歐洲的戰爭至少要延長到六年。他考慮到對付剛性的敵人如希特勒的頑強的戰鬥，並不認爲這段時間太長。

我們以爲這個觀點多少反映着片面的近事實的見解。自然，從狹窄的軍事技術立場上看來，訓練好一支擁有數量和技術上無敵的優勢的大軍，這之後才認識到不慌不忙地對敵決戰，這樣來進行戰爭，似乎是最好不過了。從這個角度看起來，再打兩年可能並不太長。然而，這張戰爭前途的圖畫，掩蓋了若干其他方面，而這些方面在持久的戰爭中也是同樣重要的條件。

戰爭在基本上是社會的、政治的現象，而目前的戰爭，使全世界千百萬人民動彈起來，劇烈地改變了他們的生存條件，迫使他们作有異於往日的思想和行動。戰爭使現代社會里存在着矛盾尖銳化，戰爭增強這些矛盾，引起新的尖銳的政治過程，而且在戰爭進行的時候使它更其尖銳化。當討論戰爭的要素，特別是戰爭時間長短問題的時候，這一層自然是不能忽略的。

關於戰爭時間的長短，蘇聯的立場是很明顯的。已經第三年了，我國面對着希特勒戰爭機器的差不多全部的重載，作生死的鬥爭。蘇聯最富庶的區

域曾經遭過希特勒強盜的狂暴的蹂躪，而我國大塊的領土今天依然在我们的手裏。每季的戰爭吸取了蘇聯人民的許多生命，使我國遭受了不小的損害。蘇聯的基本利益，在於迅速取得勝利，避免戰爭拖長，這需要更多的體明瞭！

從我們的英美盟國的觀點上看起來，事情是怎樣的呢？能不能假定他們對戰爭將延長多久，有點漠不關心，他們在有關戰爭時間長短的政策上有着消極呢？當然不能。

持久的戰爭所引起的許多後果之中，現在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決定戰爭的過程和結果的軍事和政治因素之間的關係，不可避地改變了戰爭持久的程度。戰爭愈延長，政治因素對戰爭的影響比純粹的軍事因素愈來得大。軍事因素——武裝部隊的作戰是在各個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而政治因素是複雜而矛盾的社會過程，受各交戰國政府的控制和影響比較小。這一個合理的論點，是從過去戰爭歷史的整個經驗中產生出來的。

我們來回憶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吧。那次戰爭打了四年。長期戰爭的結果怎樣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的結果之一以及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的政治危機，是沙皇俄國的徹底崩潰，那是戰爭的第三年就發生的事情，使國際關係起了重大的變化。在推翻沙皇制度三個月以後，當戰爭仍舊在進行，而政治危機更其尖銳化的時候，十月革命帶來了完全嶄新形式的國家——工農的國家蘇聯，它現在是反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的人民的最大的堡壘。

如全世界所週知，戰爭所產生的政治危機的後果，不僅僅是俄國的歷史事件。其他國家，特別是打敗了的國家，也發巨大的變革所動搖。在長期戰

在戰勝國之下，在德軍明顯地不能繼續抵抗的影響之下，德國的國內陣線甚至在戰勝國的軍隊進入德國之前就已經崩潰了。不管德國、意大利、匈牙利及整個中歐的情勢如何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以及戰爭轉入和平的過渡期間，有一種事情是毫無疑義的：這些事件在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方面，孕育着非常嚴重的後果。自然，不聰明的人們把人民大眾的行動歸之於失望，歸之於「惡毒的煽動者」的陰謀，這樣來聊以自慰，他們到處尋找埋伏的「手脚」。但是這在什麼地方影響過戰爭的結局呢？

不僅如此，長期的戰爭也在戰勝國中引起了極度緊張的國內政治局勢和社會關係。在一九一七年夏天，那時候說，在戰爭第三個年頭的末尾，前線及後方就已經有激烈的憤怒，使法國政府發現自己的處境非常困難。普恩加萊在他的回憶錄中把一九一七年叫作「不安靖的一年」，並不是沒有緣故的。在他的日記里，時時有後方騷亂罷工，不和平，以及前線的兵變和大批槍斃士兵的記載。同樣地，勞合·喬治提起英國當初在一九一七年的情形，寫道：「當回憶起當年鬥爭日益激烈，和平的前途日益渺茫……以及屋主們挑撥離間的態度的時候，你對國內的擾亂這樣廣泛並不感覺驚異，為英的倒台為什麼擾亂的範圍沒有擴得更大。」而邱吉爾，描寫當年戰爭結束的時候的情景，以生動的語調寫道：「奇怪的事情發生得這樣多，建立起來了的制度崩潰得這樣可怕，人民受到的痛苦這樣長久，使每一個國家組織都被地震所搖撼。」

我們回頭看看目前的戰爭吧。參加這次戰爭的國家，比一九一四——一八八年的時候多。這次戰爭是真正的世界大戰。這次戰爭的激烈性和破壞力大大地超過上次戰爭，是不容置辯的。最後，應該知道，這次戰爭已經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長了。在這些情形之下，戰爭不一定要地多拖長的每一天，每一月，都會使戰爭渦流中的國家，特別是歐洲各國的社會空氣更緊張，這難道有人會懷疑嗎？侵略者所帶來的飢餓，疫病，搶劫，荒蕪，不公平和血腥的恐怖——這是在希特勒暴政蹂躪之下的國家中千百萬人民每天的命運。在波蘭、捷克、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和丹麥、南斯拉夫和希臘，人民承受着令人難以相信的痛苦和災難，從這里生長出無邊的怨恨、失望和憤怒。這可以從南斯拉夫游擊隊英勇的鬥爭，從波蘭、法國和荷蘭抗擊對希特勒屠夫們的復仇，也可以從「和平的」丹麥的復仇行動中看得出來。自然，希特勒佔領各國的人民力求脫離戰爭，愈早愈好，力求從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奴

役下解放自己，愈早愈好。蘇聯人民正在經歷特別嚴重的考驗，但能體會到淪陷各國縮短戰爭時間，儘速擊敗希特勒暴政的希望。

同時，由於戰爭的長期性，特別由於希特勒及其附庸國日益增加的軍事上的失敗，和德國同盟的國家的不滿正在高漲。意大利的事變明顯地反映了這一節，意大利人民以火一樣的熱望要求退出戰爭。

只有失掉了勝利信心的希特勒匪徒，才高興把戰爭拖長。哈利·霍普金斯指出納粹在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之中顯示着頑強性，這無疑是對的。他寫道：「他們懼怕歐洲大眾的憤恨，蘇聯人民的激怒和聯合國家的正義的懲罰。是的，他們有一切理由這樣懼怕。很可能他們已經不再相信會勝利，希望延長戰爭，希望妥協了。」霍普金斯正確地駁斥了和納粹妥協的思慮。但這還不夠。必須從德國法西斯指長戰爭的企圖。柏林們還在攪起來，還打算從他們敵方的困難之中尋求快樂。最近「柏林公報」在一篇題名為「他們為誰工作？」的文章里說：「戰爭的延長，愈來愈使目前英美統治之下的國家陷入飢荒之中，譬如在東亞，北非和印度。」這種惡毒的注視便不過表示希特勒匪徒打算掩藏其自己感到的驚懼，感到算賬的日子快要到來而已。過去希特勒匪徒相信會勝利，相信正在獲得軍事上的成功。而現在，連切都是過去的事情了，由於紅軍在蘇德前線，從斯摩棱斯克到黑海以至亞一海的偉大攻勢的大勝利，由於英美軍隊在地中海戰場，在意大利登陸作戰的勝利，希特勒德國的軍事形勢基本地變壞了。因此，納粹現在盼望指長戰爭以覓得生路，而且使歐洲的政治危機尖銳化，從中投機。

同時，蘇聯、英國和美國今天形成了強有力的政治和軍事聯盟，擁有巨大的軍事資源，最大的軍隊以及一切必需的武器，足以阻止敵人拖延戰爭。同盟國現在擁有縮短戰爭的一切決定性的條件。現在僅僅只有配合這些條件的積極決定的問題。同盟國人民今天最關心的，是那些擔負着解決縮短戰爭的實際問題的責任的人們，對這個問題再也不能遷延了。解決縮短戰爭的問題，是同盟國迫切的共同任務。

(新華日報莫斯科專電)



南斯拉夫內幕

——美國幸福雜誌七月號

普里比切維支

納粹的分化與屠殺

一九四一年四月，南斯拉夫淪入德國手裡。南斯拉夫游擊戰就在那年夏季開始的，不投降敵人的南軍的殘餘，抱着遠大目標的共產黨，逃入森林中的農民，被迫放棄學業和職業的學生及知識分子，他們從希特勒對蘇聯自討吃香的進攻中得到了行動的機會，於是開始分別組織小集團，準備聯合行動。後來米海洛維奇上校也率領一部份人出頭，並和他們作對。

米海洛維奇的戰略是不與敵人接觸，保全實力。共產黨人，則主張立時行動，因此得到愛國的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擁護。他們開始行動之後，德軍就受到意外攻擊，倉皇退却，一直退到南國京城附近。後來他們又被德軍的裝甲部隊和飛機打退。

不幸可怕的事情又在南國別的地方——在「獨立的」克羅提亞俾德爾發生，在那兒有二百萬以上的塞爾維亞人，在奸賊巴維利區統治下，同克羅提亞人住在一起。一九四一年德國秘密警察總監希姆萊召巴維利區最倚重的克瓦特爾尼克到柏林開會。希姆萊給克瓦特爾尼克擬定了一個毒辣陰謀，要克羅提亞法西斯民軍在德國進攻蘇聯的時候，去大規模殺害塞爾維亞人，作為幫助德國的手段。克瓦特爾尼克返國之後，據說克羅提亞法西斯民軍殺了三十萬塞爾維亞人。這種殘殺雖沒有防止住南國人民的變亂，但由希姆萊達到了另一個目的——在許多塞爾維亞人中間播下了永久憎恨克羅提亞人的種子。

游擊戰爭的開始

南國左翼分子——中有塞爾維亞人，克羅提亞人、斯洛文尼亞人等，在一九四一年七月，發表宣言呼籲塞爾維亞團結起來，反對侵略者。

在塞爾維亞，一九四一年整年兩派游擊隊不斷發生個別的武裝衝突。但

就整個來說：還不算嚴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德軍飛機在塞爾維亞瓦列窩城附近把米海洛維奇打垮，他和他的部隊逃到了中部塞爾維亞的森林地帶。同時左派游擊隊，也逃往很遠的南部荒涼多山的門底內哥羅附近森林濃密的桑得萊克省。

那年冬季的一月裡，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把米海洛維奇從上校擢升為上將，後來又任命他為陸軍部長，這種擢升和任命，包藏着曖昧的目的：從此以後，一切非米海洛維奇的游擊隊都可以在名義上成為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叛徒。一九四二年三月，隱伏在桑得萊克和門底內哥羅的左派游擊隊，看見風和日暖的春季的到來，準備再對納粹採取單獨行動。米海洛維奇便動員了門底內哥羅還在家長制度中的落後的瓦索耶維支族人，突然襲擊桑得萊克的左派游擊隊，結果左派游擊隊幾乎全部被滅。

各黨派——民主黨，獨立民主黨，農民黨——的許多塞爾維亞知識份子，簽署了反對米海洛維奇的三月宣言，暴露了他協助軸心的事實。桑得萊克的劫後餘生和許多共產黨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及游擊隊員，從門底內哥羅開始向西移動，滲入意大利軍隊駐防的荒涼的墨塞奇維納。他們把自己改組成全國政治團結的統一戰線。他們從塞爾維亞人、克羅提亞人、斯洛文尼亞人和回教徒裡，動員組成一個新的軍隊——後來世界馳名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四個月功夫，主要戰場便從塞爾維亞移到了波斯尼亞、左派馬提亞和克羅提亞。

米海洛維奇在桑得萊克和中部塞爾維亞保存着他度力量業已減少了的部隊，比從前更加反對左派了，同時在他的幕僚及流亡政府內一些腐朽的塞爾維亞政客的影響之下，他底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情緒也更加強烈了。

解放軍的偉大成就

左派游擊隊在一九四二年的仲夏，曾在西部南斯拉夫，對德意軍隊和克

羅提盟法西斯民軍開始大規模行動。七月間，游擊隊的十一個大隊，共八萬六千人，會數度同時發動攻擊。一個月內，自敵人手中收復村落數百處，擊斃軸心軍萬人以上，俘虜四千七百名。到了九十月間，又開始了戰鬥。十一月，也進行了一個大的攻勢作戰。

當英國第八軍從埃及推進，蘇軍從伏爾加河推進的時候，解放軍便在一百英里長的戰線上，在統一的指揮之下分三路向西進。波斯尼亞的狄那里——阿爾卑斯山的崎嶇的峽谷進擊，並湧入薩格勒布城。巴爾幹德軍總司令——司令部設在布爾京城——急忙派了一個裝甲師去阻止縱深五十英里的解放軍的攻勢，但是在波斯尼亞耶路撒冷附近，峽谷森林裡，陷入重圍，完全覆沒。巴羅利薩投降了，得到希特勒的許可，把克羅提亞志願軍從蘇聯前線調回來攻打解放軍，結果他的軍隊卻有很多潛逃加入了解放軍。一九四三年一月初，解放軍又舉起軸心兩次反攻。據他們秘密的自山爾斯拉夫廣播電台說，自一九四二年七月以來，他們舉起軸心軍一萬七千名，俘虜三萬七千名（大部份是意軍），繳獲大砲四十五門，迫擊砲六十門，輕重機槍五百三十一挺，步槍數以千計，裝甲車一列，毀敵坦克十九輛，飛機六架。那時南國解放軍已正式編為若干師和若干旅。南國境內軸心駐軍約二十三個師，有十四個師整日忙於應付解放軍。解放軍的戰士約在十二萬至二十萬之間。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女子。

他們的戰術

德意和克羅提亞僑報紙充滿着和這些「土匪」及「共產黨大」血鬥的記載。這些報紙在論文和通訊員的報導裡說明這種游擊隊不是「烏合之眾」，却是嚴格組織的部隊，進行着「具有明確戰線和正規戰術的戰爭」。這游擊隊配有火砲、迫擊砲、和各種自動武器。它跟森林山頂和懸崖結了同盟，那兒每一尺土地都是一個堡壘，每株樹都是一個游擊隊員。一個德軍參謀觀察回去後說：「這一帶是個無邊的地獄，每個女人，每個小孩，都為土匪服務。」

軸心報紙還說，這種游擊隊把他們的衣服、鞍轡、和彈藥存在無敵沒人知道的山洞裡和山谷裡。這些東西都是從前南國陸軍秘密倉庫取來或從敵人處奪的。他們還採用了蘇聯收集機密的辦法，把一些印刷機，化學和軍火

工廠遷入森林深處。

解放區與人民政府

去年年底，一個大的解放軍統治的區域，在西部南斯拉夫建立起來。它是個長方形，各對「解放區」，面積約一萬九千方英里，佔南斯拉夫五分之一。

今年一月二十日拂曉時分，六萬五千裝備最好的德意軍隊和克羅提亞法西斯民軍沿着薩格勒布以南三十英里的地點至達爾馬提亞這個大半圓形戰線，開始進攻北部和南部的解放軍的防線。攻了十天，毫無收效。後來德軍調到土耳其參加亞丹納會議，德國調派盟軍將進兵巴爾幹，於是又加派了六個師團去南斯拉夫，內有著名的德國禁衛軍「奧根親王」師團。在裝甲、摩托化軍隊及德國空軍猛烈的衝擊之下，解放軍被迫暫時退到狄納里阿爾卑斯山，許多城市包括解放軍首府比哈克都淪於敵手。

快到了二月底時，有件奇異的事情發生了：軸心公報報告在解放軍從南斯拉夫的區域裡和「小部土匪」作戰了，作戰地點是在斯洛文尼亞、薩格勒布附近、薩格勒布至南國京城鐵路以北的巴普京山，甚而在塞爾維亞的包薩萊瓦茨和克魯塞瓦茨。三隊森林游擊隊——在阜姆和匈牙利邊界之間也出現了。突然間游擊隊似乎從解放區以外的南斯拉夫全國爆發了起來。

今年二月，在軸心軍的力量已經耗盡了的時候，他們突然在軸心軍最薄弱的地方給了一個打擊——在解放區的另一端，正對着軸心進攻的那一端，在尼古拉·比雷維支指揮之下，他們沿着六十五英里的戰線，從二十英里至四十英里的地點衝入黑塞哥維納，攻入了幾個設防的城市，切斷了薩格勒布至塞爾維亞的鐵路，斬斷了德意軍好幾千名，並繳獲了坦克十六輛和大量的軍火及食品。解放軍在後面撤退，在後面推進，把整個解放區從西北往東南推動。納粹從希臘急調空軍和援兵來破壞這種獨創的戰術計劃。

其後，解放軍收復了淪入敵手還在西北的格拉莫瓦、彼特羅瓦克、得爾瓦爾、和格拉卡茨這些城市。向東南推進的解放軍主力則過了黑塞哥維納，進了門底內哥羅。

民族的統一戰線

誠心報紙和一部分英美報紙認為南斯拉夫解放軍是「共產黨軍」。其實解放軍是個可以自豪的南國各政黨的團結體，它包括民主黨人、自由主義者、農工黨人、和共產黨人。人們總還記得西班牙政府軍曾包圍過民主黨，共和黨，和極左的政黨。南國解放軍雖不和西班牙政府軍完全一樣，却也是種族不同宗教不同的人民的大聯合。正教黨南維亞人、天主教克羅特人和斯洛文尼亞人，波斯尼亞的回教斯拉夫人都湧進了解放軍的隊伍。這種血統和種族的平等團結，就是「南斯拉夫」生命的要素。

在以前西班牙政府軍中作過戰的國聯軍隊的隊員，和從前的正規軍軍官在解放軍中佔着重要的軍事地位。但南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既不是南國陸軍軍官，也不是西班牙國聯軍隊隊員。他是個高大漂亮的名叫「鐵托」的神秘的人，去年秋季，他的名字突然在人民中間傳遍了，但是似乎誰也不知道「鐵托」究竟為何許人。在倫敦的南斯拉夫有些說他從前是克羅提亞學生，有些說他是個著名的塞爾維亞共產黨人。但毫無疑問，他是一個精通現代戰術的人。

在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方面，領導權是在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手裡。去年十一月，在波斯尼亞亞山環繞的一個小城比哈克成立了南國解放運動臨時政府（編者按——正確的名稱是「南國人民解放政治會議」）議員六十八人，主席是利巴爾博士，一個強壯的頭髮蓬鬆的克羅提亞律師。從前是民主黨員和一九三二年南國憲法會議主席。副主席是一個波斯尼亞回教徒領袖。

有三種強烈的情緒在南國人民的心裏震動着：貧困堅韌的農民大眾對軸心的憎恨和擁護解放軍的熱情；對南斯拉夫大哥——不可征服的蘇聯的崇拜，對南斯拉夫內貧困、文盲和警察特務統治的怨秩序的痛恨，並希望消滅塞爾維亞與克羅提亞的爭霸。今年二月自由南斯拉夫電台廣播的解放軍的作戰政綱，包括下列各點：從侵略者手裡解放南斯拉夫；塞爾維亞人、克羅特人、斯洛文尼亞人以及馬其頓人和其他種族人民享有聯邦民族權利，南國一切人民享有民主的自由，和有財產及經濟生活中私人創造之不可侵犯的權利；至於社會制度或政體的改變則應由人民自由選出的代表來決定。

米海洛維奇真面目

誠心，或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一年多以來，都曾有發表過公報，說明米海洛維奇究竟在何處作戰，列舉他佔領的城市或區域，公佈他俘虜敵人和由獲贖利品的數目。據說：自去年七月以來，米海洛維奇就發號在桑內茨克原始森林裡約諾威巴薩爾城的附近。

為什麼米海洛維奇不活躍呢？一般有兩種解釋：第一、等盟軍進兵巴爾幹時，再作大規模軍事行動，對於米海洛維奇更經濟更宜。第二、米海洛維奇趁解放軍對敵作戰自行消耗的時候，好保存他們的軍隊。此外還許有第三個解釋，就是米海洛維奇沒有大規模作戰的軍隊。

人民解放軍方面說，米海洛維奇軍隊一部份曾在南國西部與意軍協同進攻解放軍。

去年十二月在斯洛文尼亞活動的解放軍捉住一些俘虜，其中除意軍之外，還有米海洛維奇部下的一個上尉軍官瓦西萊維支，他證實了米海洛維奇動員了他的軍隊在斯洛文尼亞攻打南國解放軍。去年冬季從斯洛文尼亞的馬里包爾附近德國俘虜裡逃出的紐西蘭二等兵登維爾在自由南斯拉夫電台廣播，說他會親眼看見米海洛維奇的軍隊同意軍列隊走過斯洛文尼亞首府留布連納。去年軸心在波斯尼亞進行冬季掃蕩的時候，解放軍公報裡說，一起俘虜了米海洛維奇的軍隊和意軍幾百人，並說明戰鬥的日期和地點，舉出米海洛維奇部下指揮官的名字。今年一月解放會議主席利巴爾曾廣播說，蓋奇耶夫、維奇和比爾卡寧各指揮官領導的米海洛維奇部隊加入意軍，攻進薩爾馬提亞和波斯尼亞的解放軍佔領的鄉村。解放軍在桑內茨克維納今年整個春季作戰，不時受到米海洛維奇部隊的攻擊。

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官吏也暗地裡承認米海洛維奇和駐南斯拉夫意軍司令羅達將軍締結有秘密協定，從意國得到軍火接濟，條件是這支軍隊不准用來打意軍。二月二日，倫敦泰晤士報駐伊斯坦布爾記者，報道米海洛維奇和意軍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停戰」。去年十一月鮑爾溫在紐約時報裡也說：「替米海洛維奇辯護的人，并不否認米氏與意軍及納粹克（編者按——納粹克是塞爾維亞偽總理）有關係。」但是他們又指出在巴爾幹政治中，「秘密是常事。」

然而有兩件事實是無法辯護的：◎米海洛維奇一向不打意軍。◎米海洛

繼而沒有斥責過投降敵人並攻打自己同胞的部隊及其指揮官。

米海洛維奇的幕僚，如瓦西奇、茲耶維奇、莫列維奇這些人，都是一些大塞爾維亞主義的狂熱份子，和見了一點左傾就認為是赤化的瘋子。流亡政府中有些和米海洛維奇保持特殊關係的人也屬於這一類——極端保守、信奉大塞爾維亞主義的人。

流亡政府的地位

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是由七個南國政黨組織成的：一個斯洛文人，一個克羅提亞人的，五個塞爾維亞人的。有些塞爾維亞人因為深惡克羅提亞人，在戰後有個分立的大塞爾維亞，另有些人則主張恢復南斯拉夫，由塞爾維亞人居領導地位。另外三個流亡中的塞爾維亞政黨和克羅提亞及斯洛文代官人，都贊成聯邦式的南斯拉夫，但是因為忙於對大塞爾維亞主義者的鬥爭，沒有充分時間擬出一個共同綱領來。總之，就整個南國政府來說，流亡了二年之後，並不知道主張什麼好；分立的大塞爾維亞呢，塞爾維亞人統治南斯拉夫呢，還是聯邦的民主的南斯拉夫呢？

但是汎塞爾維亞組織在流亡政府中佔着支配地位。這為數寥寥的汎塞爾維亞主義者，被流亡的少數黨團所支配。他們在政府裏佔着關鍵地位。他們還得到南國外交人員的支持，這些外交人員中有五分之四是從前親軸心的南國政府服務的。流亡的汎塞爾維亞主義者居心造成南國同胞的自相殘殺。他們一面揮霍克羅提亞領袖和成爲軸心階級的馬却克，一面却偏袒塞爾維亞的賴伐爾——納第克，說「他究竟是個塞爾維亞人呀。」這些野心家懷着過去的仇恨，揚揚得意地踏進未來的迷宮，好像但丁的地獄禍臉孔朝後的可詛咒的鬼魂向前奔跑一樣。

米海洛維奇和解放軍迄未協調。流亡政府中不偏激的塞爾維亞人和其他種族的人承認在一年多以前，米海洛維奇和解放軍的對立是能够解決的，現在恐怕不能了。然而國王彼得在四月四日接見星期電訊記者時也承認「現在建立米海洛維奇的統一指揮是不可能的了。」解放軍在倫敦沒有代表，但聽說解放軍會要求米海洛維奇開闢攻打意軍的戰場作爲任何協調的先決條件。據利巴爾廣播，倘若米海洛維奇不能對敵人作大規模的戰鬥，那麼南國流亡政府應該指令他，別叫他的部隊再幫助敵人，而讓解放軍單獨地來打好了。

米海洛維奇和解放軍的矛盾不是個遠遠懸懸的巴爾幹式的糾紛。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在那兒開始，倘若不慎，第三次世界大戰又能在那兒爆發。巴爾幹是個肥沃的民主園地，我們應該拿出善意與智慧，才知道如何去耕耘。

羣衆

第八卷 第十八期

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分銷處 新華日報成都、桂林、各營業分處及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價目

本期零售	四元
六期	十一元
十二期	二十元
廿四期	三十八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本期零售二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二八六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渝字第一二八六號

衆 群

卷 1 第 9 期

目 要

(論社) 着煌輝在望希的類人

納爾威·M

的仗勝打樣怎是聯蘇

正子薛

敗成之略戰軍兩德蘇論

尼伊拉特·I

戰擊游的聯蘇

衡 石

憲立的末清

版出日五十月一十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人類的希望在輝煌着（社論）

（五八三）

特 載

斯大林報告

（五八四）

蘇軍夏季攻勢總結

（五八九）

專 論

論蘇德兩軍戰略之成敗

薛子正（五九二）

蘇聯是怎樣打勝仗的

M·威爾納（五九五）

研究與批判

蘇聯的游擊戰

熊敏之譯（六〇一）

清末的立憲

石 衡（六一三）

「新奇」的「理解」

定 思（六一七）

書報評介

紅軍史

曹至晨（六一〇）

社論

人類的希望在輝煌着

——紀念蘇聯十月革命二十六週年

蘇聯的十月革命發生以後，國父孫中山先生就對我們說：蘇聯的革命使人類有了大希望。中山先生對十月革命的這個估計確是非常英明有力。十月革命，不只它的本身，尤其是革命後蘇聯人民二十六年來英雄艱苦的奮鬥，矯健卓絕的建設業績，給人類開闢了一條新的生路，替人類歷史翻轉出一個新的頁碼。對於這樣一個偉大事業的意義，如果在開頭的幾年還有許多人不甚了解的話，那麼，到了十年以後，到了接二連三的五年計劃步步成功，表現出蘇聯制度下的人民，確具有戰勝一切困難，創造新社會的偉大能力以後，尤其是到了最近蘇德戰爭爆發，蘇聯人民表現出他們擊潰吃人野獸希特勒的驚人力量以後，全世界的聰明人士，對於中山先生對十月革命的這一估計，可說是已經豁然無間。到了今年，十月革命的二十六週年紀念，正是蘇聯人民決可以把希特勒這隻飛到花園裡來的精嘴完全逐出國境的時候，這對於我們正也在抗擊日寇，勝利在望而還需要極大的努力來爭取這個勝利的中國人民，更足具有一種特殊的激勵振奮之力。

十月革命的果實已足碩大無朋，人類這一顆大的希望，是在光芒萬丈地輝煌着！

十月革命之所以成爲人類的大希望，是因爲正在人類「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當兒，它的戰士，用他們的血肉，把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來一個天旋地轉的大翻身，在人類眼前翻出了一個「柳暗花明」的新世界。而證實這個希望的，首先是它已把沙皇時代貧窮落後的農業國一變而爲最繁榮，最健強的工業國，是它已使在沙皇統治下過着奴隸的，囚徒的生活的人民，一變而爲自由的，過着真正的，澈底的民主生活的人民，是它已把佔到全人口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文盲一掃而光，使每一個人民都飽受於高度的科學教育與文化娛樂的大海之中，是它已把民族的大牢獄一變而爲民族的融融洩洩地快樂大家庭。其次，證實這個希望的，是它在蘇聯誕生不久就相繼受到一連串頗爲嚴重的內憂外患，如武裝干涉，內戰，糧荒，等等，它於創痍滿目，疲敝不堪的苦難條件之下，竟能把全國人民團結得緊緊的來迎接這些災患的攻襲，終於戰勝了一切陰謀破壞，怠工反抗，指國家於危殆，登人民於塗炭。最

後也是最現實，最足以振奮人類地證實了這個希望的，是它已在這苦難艱苦前的戰爭中顯示了它的主人確屬人類史上最優秀的兒女，確具有不可戰勝的意志與能力。

決到兩年半的蘇德戰爭，蘇聯方面一開始就表現出了震世駭俗的力量，如救特區的保衛戰，塞瓦斯托波爾的保衛戰，列寧格勒的保衛戰，莫斯科的保衛戰，以及攔阻大量生產機和恢復其生產能力等等，其英勇神速，都是史無先例。尤其振奮人心的，是最近一年中的幾次輝煌戰果。自斯大林格勒的克復，布里揚斯克的克復，斯摩爾斯克的克復，一直到米利托波爾的克復和基輔的克復，這一連串的大戰，其規模之大，戰事之猛，不特是歐古所來聞，實亦是人間所少有，而蘇聯都一次又一次的獲得了勝利。這些輝煌的戰績，不只是表現出紅軍保衛祖國的忠勇堅強，蘇聯政府過去經濟建設的雄厚結實，而且更是表現出蘇聯埃埃攻權的固若金湯，工人階級組織力量的偉大與雄健。

到今天，蘇聯這個十月革命所產生的寧馨兒，其爲人類奇災大禍的拯救者，其爲人類和平幸福的安定力，大概是難以論定了吧。中山先生早就說了的那句話——俄國的革命使人類有了大希望，不是已經證實其確實非常英明有力了嗎？

人類的希望是在輝煌着。它的萬丈光芒不像照明燈那樣是以安穩靜寂的空氣裡透出來的，而如電光石火那樣是從猛烈凶險的戰鬥中爆發出來的。它會和武裝干涉，武裝封鎖戰鬥過，它會和鄧尼金，高爾察克等白俄匪軍戰鬥過，它會和飢餓，貧窮進行過戰鬥，它會和愚昧和落後進行過戰鬥；它會和富農，新興的門閥鬥爭，更會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暗害份子過鬥過，現在它還正在和納粹黨鬥爭鬥着，它所經過的戰鬥愈險惡，它所發出的光輝也就愈燦爛。然而，它是人類的希望，不但是其一民族某一國家的希望，凡對這個希望有信心，有熱愛的，都將決不對它自外，或怕它自外，都將用自己力量去拱衛它，用自己的戰鬥去響應它——因爲它是在輝煌着也正在和魔鬼鬥着。

斯大林報告

——十月革命二十六週年在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及莫斯科黨部和民衆組織的慶祝大會報告

同志們！今天，蘇聯各族人民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十六週年。我國在愛國戰爭的情況中紀念她的人民革命的盛節，第三次了。

一九四一年的十月，我們祖國過着艱苦的日子。敵人逼近了首都。他從國上包圍列寧格勒。我軍被迫退却。需要軍隊的驚人的努力和人民的所有力量的一致奮發，去阻止敵人，並且在莫斯科予以嚴重的打擊。

到了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對於我們祖國的危險已經變得更大。敵人那時站在距離莫斯科僅僅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已經突破到斯大林格勒去，進入高加索的山麓了。但是，就運在那些嚴重的日子裡，軍隊和人民也決不會喪胆，却堅強地忍受了一切考驗。他們獲得了力量去阻止住敵人，並且給予敵人以還擊。忠實遵守偉大列寧的遺教，他們不惜自己的精力和自己的生命，去保衛十月革命的成就。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軍隊和人民的那些努力，並不是白費的。在去年十月的那些日子以後不久，我軍就改取攻勢，首先在斯大林格勒，在高加索，在頓河中游區域，後來一九四三年初在大弓，在列寧格勒，以及在諾夫和維亞茲瑪區，給予德寇以新的強有力的打擊。自從那時以來，紅軍就開始不會讓主動權從自己的掌握中滑落。它的打擊，在今年的夏季全期間，變得越趨越強大了，它的軍事上的遠達，一個月比一個月成長起來了。自從那時以來，我軍已博得了大的勝利，德寇已吃了相繼不斷的敗仗。不管敵人怎樣苦撐，他在蘇德戰場上依然沒有獲得具有一點兒重要性的任何成就。

過去的一年——十月革命第二十五週年和第二十六週年之間的一年——標誌出愛國戰爭中的轉變。

這一年標誌出一種轉變，首先就是因為在這一年的中，紅軍對德軍貫注了夏季大攻勢，這在戰爭過程中是破題兒第一遭，在我軍的打擊下，德國法西斯軍隊不得不把他們佔領的領土倉惶放棄，胡亂逃跑，把大量的裝備、軍備和彈藥的堆棧，以及大批負傷官兵拋棄在戰場上想這不使自已免於波蘭也是數見不鮮的事。由此可見，今年下半年的我軍夏季戰役的成就，是緊接着而且完成了今年年初我軍冬季戰役的成就的。紅軍既展開着冬季戰役的成就

，在夏季給予了德軍以強有力的打擊，那麼，關於說紅軍不能勝在夏天進行順利攻勢的荒唐奇譚，如今可以認為已經終於死滅而埋葬了。過去的一年，表明了紅軍能够在夏季前進，正如在冬季一樣。

由於在過去一年間這些攻勢戰鬥的結果，我軍已能够打開進路，在戰場的中部，向前推進五百公里，在南部達一千三百公里，解放出約一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差不多相當於被敵人暫時佔領的蘇維埃領土三分之一。這要一來，敵軍就已經從夫拉基卡夫卡茲被逐退到刻格，從埃利斯達被逐退到克利特伊羅格，從斯大林格勒被逐退到基輔，從佛羅內茲被逐退到哥美爾，從維爾

茲瑪和塞夫被趕到奧爾沙和威得比斯克的外圍。

德寇對於他們在蘇德戰場上初期成就的穩定性毫無信心，早已就在事前特別是沿着大河的地方，構築強固的防線。然而，在這一年的戰鬥中，無論是在江河，無論是強大的要塞工事，都沒有使德寇得救。我軍粉碎德寇的防線，在一九四三年夏季僅僅三個月內，就巧妙地強渡了四道極其重要的水寨——北頓內次河、台斯那河、索什河和希伯河。連像在斯烏斯河一帶——羅斯托夫以西——的德軍防線，以及像摩洛治與那雅河一帶——米利托波爾附近——的德軍防線這樣的水寨，我都不說了。如今，紅軍正在希伯河的那一邊，順利地擊擊着德人。

這一年標誌出一種轉變，也因為紅軍在比較短促的時間內，就夠把德國法西斯軍隊最有經驗的老幹部殲滅了，碾碎了，而同時，在這一年的順利攻勢戰鬥中，紅軍却使自己的幹部百鍊成鋼，並且果實地增殖了。

在過去一年蘇德戰場上的戰鬥中，德國法西斯軍隊損失官兵四百萬名以上，包括陣亡的不下二百八十七萬名。在這一年的間，德寇并且損失飛機一萬四千架以上，坦克三萬五千輛以上，大炮不下四萬尊。

德國法西斯軍隊如今已決不是在戰爭爆發時那樣的了。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它擁有人數充分的經驗豐富的幹部，而今它已用最近培養的年紀青青的毫無經驗的軍官們沖淡了，德寇匆匆地把他這些小伙子拋到戰場上來，因為他們既沒有必要的後備軍官，而且也來不及訓練他們。

今天由紅軍呈現出的一幅圖畫却完全兩樣。在過去二年間蘇聯的攻勢戰鬥中，它的幹部已經成長，已經百鍊成鋼。它的戰鬥幹部的人數超過越多，而且今後必將更趨越多，因為既有必要的後備軍官存在，就有時間有機可乘去訓練青年軍官幹部，而把他們擢昇到負責的地位。

去年向我們戰場的是二百四十個師，其中一百七十九個師是德軍，今年紅軍在戰場上却向著三百五十七個師，其中二百〇七個師是德軍，這是一個顯著的特徵。德寇雖然打算增加他們師團的數量，來補救他們師團，越過越低的素質。然而，德軍在過去一年間的潰敗表明了：要由增加他們師團的數量來補救他們師團的素質方面的敗壞是不可能的。

從純粹軍事的眼光來看，這一年末尾，德軍在他們戰場上的潰敗，是由兩個大事件預先決定了的，就是：斯大林格勒的戰役和庫爾斯克的戰役。斯大林格勒戰役是這樣結束的，實力三十萬員名的德軍被包圍，被打垮

，被圍的敵軍約三分之一被俘虜了。要想像得出在斯大林格勒戰地上發生的歷史中空前無比的那種屠殺的規模，就該知道：斯大林格勒戰役過去以後，在那兒發現并且掩埋了德軍官兵屍體十四萬七千二百具，和蘇軍官兵屍體四萬六千七百具。斯大林格勒戰役表示出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沒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斯大林格勒的戰役以後，德軍始終沒有能夠恢復元氣。

至於庫爾斯克的戰役，那是這樣結束的，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兩個主力進攻兵團被打垮了，并且我軍發動了反攻，這種反攻後來就演變成紅軍強有力夏季攻勢。庫爾斯克戰役是由德軍從北面和南面向庫爾斯克的攻勢開始的。那是德寇想進行夏季大攻勢的最後的企圖，一旦成功，就好挽回他們的損失。大家都知道，這回攻勢歸於失敗。紅軍不僅擊退了德軍攻勢，而且自己改取攻勢，在夏季期間，由連續不斷的打擊，把德國法西斯軍隊逐退到希伯河的那邊去了。

如果說斯大林格勒一役已預示出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沒落，那麼，庫爾斯克一役就更使它趨過到大難。

最後，這一年標誌出一種轉變，是因為紅軍的順利攻勢已使法西斯德國的經濟形勢和軍事——政治形勢根本惡化，而使她趨遇到深刻的危機。

德寇本打算在今年夏天在蘇德戰場上進行順利的攻勢，這樣子來補救他們的損失，而挽回他們在歐洲的已經動搖的威信。但是紅軍使德寇的打算成爲泡影，擊退他的攻勢，自己發動了攻勢，進而向西猛進德軍，這樣子就更使德寇的威信掃地了。

德寇本打算採取持久戰的方針，着手構築防禦和「城壁」，而對大家揚言：他們的新陣地是固若金湯的。但是紅軍又使德寇的打算成爲泡影，突擊了他們的防禦和「城壁」，順利地繼續挺進，使他們來不及把戰爭拖延下去。

德寇本打算由「總體」動員來挽回前方的局勢。但是，在這邊，事情也使德寇的打算成爲泡影了。夏季戰役已經把「總體」動員的人消耗了三分之二，然而並看不出這種情形會使德國法西斯軍隊的處境發生什麼好轉。也許證明了有再宣佈一次「總體」動員的必要，而如果不以爲反探採取這樣的措施，不會損害於國家的「總體」崩潰，那是毫無理由的。

德寇本打算在烏克蘭把住一個堅固的立足地，以及利用烏克蘭的農業生產物，以供應他們的軍隊和民衆，并且利用頓巴斯的煤炭以供應爲德軍工作的工廠。但是，在這邊，他們也弄錯了。由於紅軍順利攻勢的結果，德寇

不僅喪失了頓巴斯煤炭，而且把烏克蘭的糧食的各州也相繼喪失，如果以為最近將來他們不會把烏克蘭的其餘部份也喪失掉，那是毫無理由的想法。所有這些錯誤的打算，自然不能不損害到，而且在事實上的確根本損害到法西斯德國的經濟形勢和軍事——政治形勢了。

法西斯德國感受到深刻的危機。她面向着大難。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如果沒有蘇維埃人民在工廠和製造廠中，在煤坑和礦山中，在運輸業和農業中的自我犧牲的勞動，紅軍的成功就一定是不可能的。在艱苦的戰時情況中，蘇維埃人民已證明了能够保證她的軍隊獲得最必要的一切，而且經常地使它的戰鬥裝備精益求精。在戰爭的全過程中，就軍備的質與量，敵人始終不會能够超過我軍。同時，我們的工業曾以數量越來越大的戰鬥裝備供應前方。

過去的一年，標誌出不僅在戰鬥的演進中，而且我們後方的工作中，也都發生了一種轉變。我們已不再遇着這樣的任務，如把企業向東方遷移，使工業轉向以製造軍備。蘇維埃國家如今已有效率強大而迅速擴張的戰爭經濟。人民的一切努力，就能够這樣子集中於增加生產，并更進一步改良軍備，尤其是坦克、飛機、大砲和自動排槍。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獲得極大的成功。由整個人民支持着，紅軍獲得了作戰裝備源源不斷的供應，以千百萬枚的飛機炸彈、擲彈和砲彈的急雨，向敵人頭上傾盆而下把千千萬萬的坦克和飛機帶進了戰鬥。

有一切理由可以說：蘇維埃人民在後方的自我犧牲的勞動，必將和紅軍的英勇戰鬥一同永垂史冊，視為人民在祖國的保衛中空前無比的勳業。蘇聯的工人們，在和平建設的年代中，建立起高度發展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在這次愛國戰爭期間，以真正旺盛的精力，積極工作，來幫助前方，表現着真正的勞動英雄主義。

人人都知道：在對蘇聯作戰時，希特勒份子不僅擁有德國的高度發展的工業，而且更有各附庸國和佔領國也頗強大的工業可以自由支配。然而，希特勒份子並沒有能够保持住他們對蘇聯開戰時在軍事裝備方面所佔的數量上的優勢。如果說敵人在坦克飛機白砲和自動步槍方面先前的優勢，已經化為烏有，如果說我軍如今並不感到兵器彈藥和裝備的嚴重缺乏，那麼，這就首先應該歸功於我們的勞動階級。

蘇聯的農民們，在和平建設的年代間，在集體耕種制度的基礎上，把落後的耕種變成新的農業，在愛國戰爭過程中表現出對國家共同利益有高度的認識，那在鄉村史中是無可比擬的。他們由自我犧牲的勞動，以幫助前方，已經表明了蘇維埃農民都對德寇進行的這次戰爭看做自己的事業，看做是為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而進行的戰爭。大家都知道：由於法西斯匪徒的入侵，我國暫時失去了烏克蘭的，頓河流域和庫班流域的重要農業區。然而，我們的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以糧食供應軍隊和國家，並沒有發生任何嚴重的阻礙。自然啦，如果沒有集體耕種制度，如果沒有男女集體農民們的自我犧牲的勞動，我們就決不能夠負起這個最艱難的任務。如果說在戰爭的第三年我們軍隊並不感到糧食有什麼缺乏，如果說民衆都有糧食供應，工業都有原料供應，那麼，這就正是集體耕種制度的勢力和活力的明證，集體農場農民愛國精神的明證。

我們的運輸業，首先是鐵道運輸業，以及內河海洋和汽車運輸業在援助前方中，已起了極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運輸業是後方和前方之間不可缺少的交通手段。一個人可以製造大量的兵器和彈藥，但是，如果運輸業不把他們及時運到前方去，那麼，就前方說來，他們或許依然是沉重的廢物。我們應該說，對於把武器彈藥被服等及時運交前方，運輸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而如果不顧戰時的種種困難和燃料的缺乏，我們始終能够用必需的一切供應前方，那麼，這就應該首先歸功於我們運輸業的工人和職員。

我們的知識分子，對於幫助前方，也并不比勞動階級和農民來得落後。蘇維埃知識分子，以獻身精神為保衛我們國家而工作着，經常地改進紅軍的軍備，改進生產的技術和組織。它幫助工人和集體農民擴張工業和農業，在戰爭的情況中，促進蘇維埃科學和文化，這就是我們知識分子的功勞。

蘇聯所有各族人民，已一致奮起，像一個巨人似地保衛自己的祖國，很正當地把現今的愛國戰爭看做不分民族，不分宗教的所有勞動人民的共同事業。希特勒政客們，曾一心希望蘇聯各族人民間發生軋轢和衝突，到了如今，那些希特勒政客們，自己也看出他們的這種希望，是多麼愚蠢得毫無希望呀。我國各族人民之間的友誼，經得起戰爭的一切困苦和考驗，而且在全體蘇維埃人民對法西斯侵略者進行共同鬥爭中，更進一步地鍛鍊過了。

這便是蘇聯的力量源泉。這便在和平建設的年代中一樣，在戰爭的日子裡，蘇維埃人民的領導和

指導的勞力，是列寧的黨，布爾塞維克的黨。絕沒有別的政黨曾經享有過或享有像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在人民大眾中間這樣的威信。而這是理所當然的。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之下，我國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曾經取得了他們的自由，而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在這次愛國戰爭中，黨站在人民面前，成為對法西斯侵略者進行全民鬥爭的授意者和組織者。黨的組織工作，已把蘇維埃人民的一切努力聯合起來，而針對着一個共同的目的，使我們所有一切人力和財力，都以便敵人敗北為依歸。在戰爭期間，黨已經更進一步地使它和人民的血液膠固起來，已經和勞動人民的廣大羣衆，建立了更密切的聯系。

這便是我力量的一種泉源。

現今的戰爭，已有力地證明了列寧的名言：「戰爭是一國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總考驗。戰史教導我們：只有證明了經濟的發展和組織說，就軍隊的經驗練達和戰鬥精神說，就戰爭全期間人民的堅忍和團結說，都比他們的國家得強些的強些國家，才能贏得這場考驗」。而我們的國家，正是這樣的一個國家。蘇維埃國家從來沒有像如今在愛國戰爭的第三年中這樣穩定，這樣堅強的。戰爭的經驗指示我們：蘇維埃制度，不僅是在和平建設的年代中，組織國家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一種最好的形式，而且，也是在戰時，為了抵抗敵人而動員人民一切力量的一種最好的形式。二十六年來所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在歷史上極短期間，已把我們國家變成一種固若金湯的堡壘。紅軍擁有全世界所有各國軍隊的後方之中，最穩定而最可靠的後方。

這便是蘇聯的力量源泉。

毫無疑問，蘇維埃國家將從戰爭中脫穎而出，必定更加強大，更加鞏固。德國正破壞着我們的國土，拚命想危害我們的國家。紅軍的攻勢，已比以前更大的規模暴露出希特勒軍隊具有野蠻盜匪的性質。德國在他們霸佔住的區域中，滅絕我們千萬萬的平民，像中世紀的蠻夷，或阿提拉股匪一樣，德國惡魔踐踏田野，焚毀鄉村和城市，夷平企業和文化機關。

德國的罪行，正是法西斯侵略者殘酷的明證，因為只有不會相信自己勝利的傢伙，才會幹出這種勾當。而希特勒分子的處境越沒有希望，他們就越惡毒地敢於暴行和劫掠。

我們人民決不饒恕了這些罪行的德國惡魔。我們一定要使德國罪人因為他們所犯的一切罪過而自食果報。

在法西斯兇手曾經有一個時期作威作福過的區域中，我們一定要復興與破壞了的都市和鄉村、工業、運輸業、農業和文化機關，一定要為那些從法西斯奴役下獲得解放的蘇維埃人民，創造正常的生活條件。經濟和文化的復興

工作，在從敵人鐵蹄下獲得解放的區域中，已經以全力進行着。但是，這只是開端。我們必須使那些從德軍佔領下獲得解放的各個區域中，把德國統治的後果，完全掃除乾淨。這是偉大的國民任務。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在短時間內貫徹這個艱巨任務。

過去的一年，已經標誌出，不僅在蘇聯的愛國戰爭中，而且在整個世界大戰中，都發生了一種轉變。

這一年間，在軍事形勢和國際形勢中發生的變化，對於蘇聯以及對於和蘇聯友好的盟邦，都是有利的，而對於德國以及對於她在歐洲行劫的同謀犯却都是有害的。

紅軍的勝利，已產生了這樣的成效和後果，遠達蘇德戰場範圍以外，他們已使世界戰爭今後的全部過程，起了變化，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國際意義。盟邦對共同敵人爭取的勝利，已經來得近些，而盟邦間的關係，他們軍隊的戰鬥之說，非特沒有削弱，而且，和敵人的預期相反，發展得更堅強而持久了。最近在報紙上公佈的蘇英美三國代表莫斯科會議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也便是關於這一方面的勝於雄辯的明證。如今，我們同盟國家，都充滿了決心，一定要給予敵人共同的打擊，結果，必將對敵人取得最後勝利。

這一年，紅軍給予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打擊，是由我們盟軍在北非，在地中海流域，以及在意大利南部的戰鬥行動支持的。同時，盟軍並且使德國的重要工業中心城市，受過而且依然受着實際的轟炸，這樣就使敵人的軍事力量大大削弱了。如果除此以外，更加上盟邦經常地用糧食和原料供給我們，那麼，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句：他們由這一切給予我們夏季戰役的成就，是顯天的便利。

盟軍在南歐目前的戰鬥行動，自然還不能視為第二戰場。然而，這個總有些像第二戰場了。歐洲真正第二戰場的開闢，并不怎麼遠了，那顯然必將大大地加速對希特勒德國取得勝利，而且必將更加鞏固。

由此可見，過去一年來的事變，表現出反希特勒聯盟是各國人民的堅定的大聯合，而且是憑藉着強固的基礎的。

到了現在，人人都明白了：希特勒匪幫由於發動這次戰爭，已使德國和她的附庸陷於絕望的難境。法西斯軍隊在蘇德戰場上的敗北，以及我們盟軍給予德意軍隊的打擊，已搖搖了法西斯集團的整個大廈，而如今就在我們的眼前搖搖欲墜了。

意大利已經脫離希特勒聯盟而永不回頭。蘇聯里尼決不能夠使任何局面變動，因為他在事實上，是德寇的一個俘虜，下一行列，就是這個聯盟中的其他盟員。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希特勒的其他附庸，都由於德國的軍事潰敗而沮喪起來，如今已終於決不相信戰爭的盟軍對他們有利，正急於想

法從希特勒把他們拖進去的泥潭中自拔出來。現在因為他們的遠征行為而自食其果的時候已經臨頭了，希特勒德國強取豪奪的同謀犯們，記得最近還對他們的主子唯命是聽的，如今都在找門路，找機會，以便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匪幫中溜了出來。

希特勒集團中的盟員們，進入戰爭的時候，一心指望趕快打勝。他們在事前就已經分派好：誰會分得什麼，誰會吃到餛飩和餅干，誰會被打得腫起癍來，眼睛被打傷成癱。他們自然都要使他的對手被打得腫起癍來，眼睛被打傷成癱，自然都要使他自己吃到餛飩和餅干。但是，現在很明白了：德國和她的附庸，都決不會吃到餛飩和餅干的，而被打得腫起癍來，眼睛被打傷成癱，他們大家却都一定有份。預料到這種無味的前途，希特勒的幫兇們現在正在傷腦筋地想辦法，儘可能被打得少腫起幾個癍，儘可能使眼睛不致被打傷成癱，這趕快說離戰爭。

意大利的例子，顯示希特勒的附庸們：他們把和德寇不可避免的破裂，拖延得越久，允許德寇在他們的國家中作威作福越長久，他們的國家受的糜爛就越厲害，他們的人民將不得不受的苦難，就越深重。意大利的例子，并且顯示出希特勒德國已不打算防護她的附庸國，而只要她能够把她的自家敗北的時間拖延下去，她總要把她的附庸國變成廢墟性的戰場。

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已經失敗，它所曾建立的血腥的「新秩序」，已在崩潰的途中。各國人民對法西斯奴隸主的憤怒的爆炸，正在歐洲被佔領的各國中醞釀着。德國先前的在她的盟國中，以及在中立國中的威信，已經掃地而無法挽回，她和中立國家間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已經毀傷。希特勒匪幫會喧嘩地狂吹說德國贏得世界霸權，那種時辰早已過去了。現在，大家都知道，德國有別的事情煩惱着，想不到世界霸權了，他們不想到怎樣使肉體和靈魂在一起。

由此可見，戰爭的過程，已經表現出：法西斯國家的同盟，過去和現在，都不是憑藉着可靠的基礎的。希特勒聯盟，是在它的分子們掠奪性的貪婪野心的基礎上形成的。只要希特勒份子們俾俾取得軍事成就的時候，法西斯的聯盟一時倒似乎是堅固的結合。但是，法西斯軍隊一經敗北，結果引起這個盜匪集團真正的解體。希特勒德國和她的附庸大難臨頭了。

同盟國家對希特勒德國取得的勝利，必將關於歐洲各國人民的國家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組織和再建的諸重大問題，提到日程上來。我國政府對這些問題的政策，始終不變。我們和我們的盟邦一同，將來必須——

第一：將歐洲各國人民從法西斯侵略者羈絆下解放出來，幫助他們重建被法西斯奴隸主割裂了的民族國家——法蘭西、比利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希臘，以及如今在德國羈絆下的其他各國人民，都必須再成

自由而獨立的人民。

第二：給予歐洲被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充分的權利和自由，以自行決定關於他們的政府形式的問題。

第三：採取措施，務使對於這次戰爭以及對於各國人民的苦難，應負責任的所有一切法西斯罪人，無論他們會藏在什麼國家中，都一定要受嚴峻的懲處，爲了他們所犯的一切罪行，而自食其果。

第四：在歐洲建立這樣的秩序，務使德國方面的新侵略完全沒有可能性。第五：在互相信任和互相幫助的基礎上，確立歐洲各國人民間經濟上政治和文化上的永久合作，以復興被德寇破壞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爲目的。

在過去一年間，紅軍和蘇維埃人民，在對德寇鬥爭中，已經博得了偉大成績。我們在戰爭中，已經達到了對德國有利的根本的轉機，如入，戰爭正向着它的最後勝利邁進。但是，安於已得的成就，因勝利而狂歡，那就不像蘇維埃人民了。如果在我們的行伍中，出現自滿的心理，勝利就會使我們提不住的。如沒有鬥爭和奮發，就決不能博得勝利。勝利是在戰鬥中取得的。如今，勝利已經靠近。但是，要博得勝利，就必須重新使用力量，就必須後方到處作自費犧牲的工作，前方紅軍必須作連續而堅決的戰鬥行動。

如果我們不利用一切機會以加速敵人的敗北，那就是祖國的敵人，就是暫時淪陷在法西斯羈絆下的蘇維埃人民的罪人，就是在德寇逼下呻吟着的歐洲各國人民的罪人。決不能給予敵人以任何喘息的機會。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必須使用我們所有一切力量，來把敵人消滅掉。

蘇維埃人民和紅軍，明確地看出今後鬥爭的困苦艱難。但是，現在已經明白了：我們勝利的日子，逐漸逼近了。戰爭已經進入了那個階段，這問題就是把德寇完全逐出蘇維埃國土，而徹底清算法西斯的「歐洲新秩序」。我們將從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列寧格勒州和加里寧州，把敵人完全驅逐，而從德寇羈絆下把克里米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摩爾達維亞和卡阿利察分列共和國的各族人民解放出來的時間，已不遠了。

同志們！爲了英蘇美戰鬥同盟的勝利！爲了從法西斯羈絆下歐洲各國人民的解放！爲了把德國惡魔完全逐出我們的國土！我們的紅軍萬歲！我們的海軍萬歲！我們剛勇的男女游擊隊員萬歲！我們偉大的祖國的萬歲！

消滅德寇！

蘇軍夏季攻勢總結

蘇聯情報部十一月五日公報

經過四個月緊張的會戰以後，紅軍已順利地貫徹了最高統帥部戰鬥的和戰略的計劃。對蘇聯的武裝力量擬定的任務，在夏季和秋季期間，把德軍驅逐到庫爾斯克、索什河、聶甫河中游和下游一線的那邊去，並且清算德軍的庫班根據地，這一任務已徹底完成了。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一九四三年的夏季戰役，是在七月五日由德國法西斯軍隊在奧勒爾——庫爾斯克，和比爾哥羅德——庫爾斯克方面，照希特勒統帥部的說法是決定性的攻勢開始的。敵人爲自己規定的任務，是要把庫爾斯克突出地帶的蘇軍包圍殲滅，深深地突進到紅軍的後方去，而保證戰爭的結局對他有利。可是夏季戰鬥的結果，已證明了德寇的這次新的戰略計劃，是沒有把雙方相對實力加以現實的估計而擬出的，已證明了從頭到尾是冒險主義的計劃，已可恥地歸於失敗了。紅軍在堅強的防禦戰中，使七月五日發動攻勢的德國法西斯軍隊的主力疲憊而且消耗殆盡。德軍受了龐大驚人的損失，但是毫無成就。

把那向庫爾斯克進犯的德國法西斯軍隊打垮，七月十二日，紅軍奉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的命令，就發動了決定性的攻勢，突破築有堅強工事的德軍防線，經過許多天猛烈會戰以後，八月五日，恰巧在德軍攻勢開始以後一個月，紅軍就把奧勒爾和比爾哥羅德收復了。敵人的奧勒爾設防作戰基地，是最強固的，而對我國是最危險的，希特勒統帥部本來打算用來做向莫斯科採取攻勢的跳板的，這麼一來，就被清算了。

第二處最重要的德軍設防作戰基地，是比爾哥羅德和哈爾科夫區域。德軍把大股坦克部隊集結在這個區域，包括精銳的。坦克師在內，並且設立龐大的軍備和戰藥堆棧，構築強固要塞防線。我軍向哈爾科夫方面發動攻勢，突破敵人的防線，粉碎他的頑強的抵抗，八月二十三日由猛攻將哈爾科夫

收復了。德軍的比爾哥羅德——哈爾科夫作戰基地，就這樣順利地被清算了。對於奧勒爾和比爾哥羅德——哈爾科夫設防作戰基地的清算，是自從在斯大林格勒。德軍大敗以來，我軍所進行的最重要的戰鬥行動。紅軍在奧勒爾和哈爾科夫區域的大捷，已爲我軍攻勢的更進一步發展，爲最高統帥部關於頓內次盆地和烏克蘭聶甫河左岸全部領土解放計劃的執行，奠定了強固的基石。

第三處最重要的德軍設防作戰基地，是頓內次盆地的東部，沿北頓內次河和密爾河兩條有主要的防線。我們南方軍隊奉最高統帥部的命令，發動攻勢，強渡密爾河和北頓內次河，突破德軍防線，在頓內次盆地對德寇得重大勝利。在我軍攻勢旺盛的攻勢六天中間，整個頓內次盆地，全國最重要的煤礦和工業區，就解放出來了。我軍展開新攻勢的成就，還不及掩耳地向西猛襲德軍，把前連海海岸實際上完全解放了出來，突進到米利托波爾和薩波羅什——在阿克里米亞去的道路上和聶甫河下游的強固設防區。

德軍統帥部既在奧勒爾，比爾哥羅德，哈爾科夫，以及在頓內次盆地，吃了嚴重的大敗仗，就拚命企圖想在台斯那河一線上阻撓蘇軍的攻勢，那線的全長都已變成強固的現代防線，是在兩年設防的，德寇認爲這一線是固若金湯的。我軍由堅決的戰鬥行動，在困難的情況下，強渡台斯那河，突破了德軍的這條防線，而在布利揚斯克以南，我軍也驅逐德軍西退，向斯摩棱斯克和羅斯拉夫爾方面進擊敵軍。我軍突破敵人強固的永久防區在聶甫河上游強渡過去，攻克西土味拿河和聶甫河之間的領土，所謂斯摩棱斯克門戶——並且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城——在西路德軍最重要的戰略防禦中心據點。我軍在庫班流域，也由決定性的戰鬥行動，在諾佛羅西斯克，在庫班河的下游，以及在塔曼半島，都打破了敵軍的抵抗。這麼一來，就清算了德軍

在東線的戰鬥上具有重要性的作戰基地，那兒的基地，本來保證他們能防守克里米亞，而且使他們有向高加索展開攻勢戰鬥行動的可能性的。

德軍在先前的各役中，既已吃了嚴重的敗仗，就企圖不顧一切，妄想在蘇伯河畔阻撓住挺進的蘇軍。德軍統帥部集結了大軍，把持住洛爾遜河和摩洛契那雅河的強固防區，打算就在對防禦有利的這條防線上站定腳跟。然而，德軍的這些估計，也完全落空了。紅軍強渡了蘇伯河最大的水壩，突破敵人的強固的永久防線而在蘇伯河的右岸上建立了若干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性的橋頭堡壘。紅軍展開攻勢，在蘇伯河河曲，使德國法西斯軍隊吃了嚴重的敗仗，而且解放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第聶伯羅代爾齊斯克——我國南方的最重要的工業中心城市，以及皮雅提哈特卡鐵路車站。同時，我軍突破摩洛契那雅河上德軍強固的防區，這個防區就它的反坦克障礙物說，以及砲兵、砲兵和坦克的集結密度說，都比在布魯斯河上德軍的防線還要強固些。由此可見，我軍已把從德波什河到亞速海濱的敵人全部防區都突破了，而突然出現在蘇伯河下游，把克里米亞前敵軍在陸上的聯絡切斷了。

遵照最高統帥部的計劃，我軍強渡了這些戰鬥行動的結果，紅軍從敵人羈絆下解放出龐大的領土，使德軍喪失了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性的區域和交通。沿着從索什河口直到黑海海濱一千二百公里的陣線，都把敵人逐退到蘇伯河的那邊去了。蘇伯河左岸的全部領土，在極短時期內，就都已從德軍羈絆下解放出來了。

在攻勢戰鬥的過程中，我軍強渡了四道重要的水壩——北頓內次河、台斯那河、索什河和蘇伯河，在這方面，表現着廣泛的機動能力和軍事上的敏捷。

由此可見，在蘇德戰場上不到四個月的攻勢中，紅軍已便在經濟上和戰略上，具有無上重要性的三十五萬公里的龐大領土，重回祖國的懷抱了。克拉斯諾達爾邊區，羅斯托夫、伏羅希洛夫格勒、斯大林諾、哈爾科夫、波爾塔瓦、蘇米、徹爾尼哥夫、庫爾斯克、奧勒爾和斯摩爾斯克各州，都已把德軍法西斯侵略者完全肅清了。德波什河、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基輔各州的大部份，也都已解放。德軍逐出自俄羅斯，已經開始了。

在三千公里長的陣線上貫澈攻勢的時候，紅軍向西推進了三百到四百五十公里，解放住民區三萬八千處以上，其中包括城市一百六十二處。千百萬蘇維埃人民已經從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

頓內次盆地、哈爾科夫、奧勒爾、塔爾諾波爾、布利揚斯克、斯摩爾斯克、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第聶伯羅代爾齊斯克、羅波羅什以及其重要工業中心城市的解放，使蘇聯的經濟資源大大地增加，而更進一步提高了紅軍的威力。由於把北頓內次河和蘇伯河之間廣大領土上的德國法西斯侵略者肅清了，紅軍就把最豐饒的穀倉，全國最肥沃的農業地帶之一，回國囉囉地抱過來了。喪失了這廣大產穀區，希特勒份子就將他們這瘋狂地抱住的糧食供應的大泉源喪失了。

紅軍從敵軍的羈絆下解放出重要的鐵路車站：斯摩爾斯克、羅波羅什、卡、納維爾、布利揚斯克、克利穆夫、烏納查、奧勒爾、胡托爾、米海洛夫、斯基、佛羅什巴、科諾托普、巴爾馬奇、內辛、哈爾科夫、波爾塔瓦、蘇米、羅曼丹、格雷班卡、台巴爾察、雅辛諾瓦、尼茲尼夫卡、巴夫洛格勒、克拉斯諾阿爾邁斯柯耶、佛羅什瓦哈、辛納爾馬科、皮雅提哈特卡、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羅波羅什及其他。由此可見，蘇聯蘇聯黨派中的有最重要的鐵路幹線：莫斯科——斯摩爾斯克、莫斯科——奧勒爾——庫爾斯克——比爾哥羅德——哈爾科夫——羅波羅什、哈爾科夫——斯大林諾——馬留波爾、莫利科——布利揚斯克——羅波羅什、庫爾斯克——佛羅什巴——達爾尼查、奧勒爾——布利揚斯克——羅波羅什、庫爾斯克、哈爾科夫——紅城（克拉斯諾格勒）——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蘇希尼查——布利揚斯克——佛什羅巴——蘇米——哈爾科夫——科諾托普、利維夫——烏納查——佛什羅巴——蘇米——哈爾科夫、巴爾馬奇——羅曼丹——波爾塔瓦、諾佛和利查——內辛——格雷班卡——左洛托諾沙、哈爾科夫——波爾塔瓦——克羅門楚格、哈爾科夫——波爾塔瓦——羅波羅什——羅曼丹——羅波羅什、斯大林諾——達爾尼查、斯大林諾——佛羅什瓦哈——波羅吉——羅波羅什、羅波羅什——米利托波爾——卡尼徹斯克、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皮雅提哈特卡等等。

由此可見，紅軍已把我國中部和南方聯絡的最重要的鐵路幹線奪回，因此，由於更進一步鬥爭，在戰鬥上——戰術上的可能性對紅軍的好轉，而使蘇軍機動的條件根本改進了。同時，德軍由於喪失了這些重要的戰略交通，就在頗大的範圍內失去了軍隊機動的有利條件，而它的戰鬥上——戰術上的可能性跟着銳減了。

在攻勢的過程中，我軍從德寇羈絆下解放的海港有：阿那巴、塔曼、塔

俄國、馬爾波爾、奧西班科(柏爾台陽斯克)以及最重要的港口和黑海艦隊基地——諾佛西斯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到十一月五日，紅軍已使德國法西斯軍隊在人員和裝備方面，都受了嚴重的損失。在這個時期內，我軍打垮敵軍一四四個師，其中包括二八個坦克師和摩托化師。所有這些師在夏季戰役期間，都曾由人、和裝備一再補充過。單說敵人喪失陣亡官兵就約有九〇〇、〇〇〇名，被俘的德軍官兵九八、〇〇〇名，而損失的人員中，一半以上是負傷的。在夏季戰鬥期間，敵軍所損失陣亡的負傷的和被俘虜的官兵，合計二、七〇〇、〇〇〇名以上。

在這期間，我軍摧毀敵人的飛機九、九〇〇架，毀損敵坦克一五、四〇〇輛，其中包括「老虎」式和「豹」式坦克八〇〇輛，裝甲車八九〇輛，消滅敵方各種口徑大砲一三、〇〇〇尊，其中包括「斐迪南」式砲車一、三五〇輛，連擊砲約一三、〇〇〇門，機槍五〇、〇〇〇挺以上，卡車六〇、五〇〇輛，油車三九〇輛，機器腳踏車二、五〇〇輛，拖拉車九〇〇輛，轎車一三、〇〇〇輛，鐵路車輛一四、〇〇〇輛以上，火車頭三〇〇輛以上，和種種地機二、〇〇〇處以上。

在這期間，我軍繳獲戰利品如下：飛機二八九架，坦克二、三〇〇輛，包括「老虎」式和「豹」式坦克二〇四輛，裝甲車一九〇輛，各種口徑大砲六、八〇〇尊，包括「斐迪南」式砲車一三五輛，連擊砲六、一八〇門，機槍三四、四六〇挺，砲彈七、七五九、〇〇〇發，彈藥二、一〇〇、〇〇〇枚，飛機炸彈三〇〇、〇〇〇枚，對付坦克和對付人員的各種地雷一、五〇〇、〇〇〇枚，普通步槍和自動步槍四五〇、〇〇〇支以上，步槍子彈一〇〇、五〇〇、〇〇〇發，各種電線共長五〇、〇〇〇公里以上，卡車一五、四二八輛，火車頭四一四輛，鐵路列車一三、二一〇輛，轎車五、四〇〇輛，軍馬三〇、四〇〇匹，我軍車八七三輛，各種軍事供應品的堆棧一、八八九處，機器腳踏車三、〇〇〇輛，口糧車一六、六八五輛，無線電台一、二〇一處。

從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到十一月五日，敵人共計損失飛機一〇、一八九架，坦克一七、七〇〇輛，大砲一九、八〇〇尊，機槍七四、四六〇挺，連擊砲一九、一八〇門，卡車七五、九八二輛。

關於各戰區戰鬥行動的調整，以及我軍所有各兵種作戰方面的協助，是

由最高統帥部代表萊奧西諾夫、弗塔諾夫元帥、朱可夫元帥、德波羅科元帥貫徹的，空軍方面是由空軍元帥高格瓦諾夫和諾維科夫以及空軍上將佛羅什高金、法拉索耶夫和胡第雅科夫貫徹的。

新華日報 蘇聯畫報

英雄的新大蘇城

蘇聯畫報社編譯

△每册十元▽

自去年九月以至今今年一月，希特勒動員了他所有的精銳，進攻斯大林城，當時他自以為這個城將落在他的手中。但是英雄的紅軍却給了法西斯軍隊以頑強的打擊，消滅了希特勒三十三萬人的精銳，而這個城了斯大林英雄的名字，也始終像一個不可戰勝的堡壘，為什麼英雄的紅軍能保衛斯大林城和擊退希特勒的軍隊呢？那我們在這本畫報的文學集中，就可以得到一個滿意的回答。這本畫報，可與「六月在頓河」一書媲美，請把它讀給我們聽。

論蘇德兩軍戰略之成敗

薛子正

希特勒法西斯軍隊自夏季攻勢慘敗後，就丟棄索甲一戰不振的敗績下去，企圖在蘇河以東任何一個地區站定腳跟而不可得的向遙遠的「安全」防線「自願撤退」了。英勇無比的紅軍，士氣邁開了大步，從一個城到另一個城，從一條河跨過一條河，跨過了頓內茲河流，也跨過了台斯那河流，而今更跨過德寇視為天塹的蘇河，突入德寇的「安全」防線，在河的上游，紅軍不憚攻克了重大鐵路樞紐斯摩爾斯克，且長驅直入白俄羅斯境，逼進了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波蘭的邊境。在空中，已先後光復了羅曼羅什，米利托波爾，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第聶伯羅代爾斯克等大城市。據點，滿地且還在河的彼岸展開，紅軍已將德寇歸路——克列斯伊羅格達達——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之鐵道線切斷，克城之收復，已為期不遠。紅軍之鉅形攻勢，已使蘇聯南部之百萬德軍陷入重圍，德放烏克蘭之戰事，已進入最後階段。

與東線戰場相呼應的意大利戰場，盟軍已經跨過了福爾都諾河，一路側擊卡塞林將軍所部之左翼，羅馬已決在望。

各被佔領國，——如南斯拉夫，法蘭西，意大利北部，丹麥，波蘭等國的反法西斯鬥爭繼續高漲，就是在德國本部的反戰職工的罷工與外籍工人反納粹法西斯運動的狂浪，也繼續增高。

希特勒德國已進入了走頭無路的死巷，它正面向着歐陸盟軍由東西夾擊的劇烈決戰之前途而顛倒，它的敗亡，已是肯定了的。

至於什麼時候希特勒德國才會最終的垮下去？這就要問什麼時候有從東西夾擊希特勒的趨向出現，如果這場面出現得愈早，則戰爭的時間愈縮短，希特勒德國的敗亡就愈快，戰爭結束也愈快，這幾乎是衆所週知的事。

希特勒為什麼失敗得這樣快呢？

從政治上經濟上的認識，在此姑置不論，這裏只從戰術技術上加以研究。這對於我們正確備清波日本法西斯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上，是少有利無害的。

一、希特勒戰術的失敗——關於這一點，蘇聯科學院會員著名的一位歷史學家在對德軍最大的失敗——文申道述中，曾指出：德軍戰略的錯誤，自一七六三年以還，一向是根據「德意志第二（法一）」的教義：「第一，普魯士的一切可能助德人之手，儘可消滅之。第二，每次長期的戰爭，都應對普魯士普魯士的生命。第三，普魯士在戰爭中，取得若干勝利，但這些是拖死人的戰爭」。德國歷代的戰術家都得到教訓，毛奇，史利芬，一向是遵照這個教訓，以謀求和長期戰爭的。但希特勒卻違背了這個教訓。希特勒戰術的失敗，滿以為「閃擊戰」可以平天下，不出三月，就可以征服蘇聯，然後再回師西向。然而希特勒竟在巨大的困難中，這部份的誇獎了自己，這部份估計了蘇聯紅軍的力量，也這部份誇大，或美化的矛盾，以致造成戰術上的失策。

二、「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希特勒由於敵我力量估計的錯誤，故當戰爭一開始，法軍就統制部就無顧慮的使用了它的備用力量，以致使人力物力過份消耗。據斯大林在紅軍二十五週年紀念節日所公佈的材料，在二十個月的戰鬥過程中，德寇官兵約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員名喪失了戰鬥力，其中陣亡者不下四〇〇〇〇〇〇員名，共計傷殘者也完全打垮。若再加上今年夏季攻勢慘敗以來的損失——兩百萬以上的死傷的數目，則確實够希特勒哭臉了。在物資方面的損失，單就夏季戰役中前兩個月——從七月五日到九月五日，飛機損失五・七二九架，坦克八・四〇〇輛，大炮五・一九二尊，卡車二八・〇〇〇輛。在同一個時期，紅軍並繳獲了敵軍坦克一・〇

四一輛，各種口徑大砲，其中包括自動推進砲共二，〇一八尊，機槍五，三八二挺，卡車七，八五三輛及其他軍用品無數。後方的生產量特別是飛機的生產也一度降低了。在夏季攻勢中，德寇空軍已不能擊退紅軍的偵察機而保守法西斯統帥部的部署秘密。德國雖有大量軍事必需的原料，如煤，鐵，鋼，鋁等，然而在民族優越感的高度動員之下，熟練工人的過份抽調，外國工人非自願的勞力與各種樣式的怠工，使生產也大為減弱，生產效率大為降低。加上盟國空軍的不斷轟炸，更造成軍火供應的最大危機。就目前形勢來看，希特勒的打算，已不是要求如何實現「我們將繼續消滅掉，以便使德寇不能再起。」或者「……直到俄寇不復擁有有組織的軍事力量而後已」，而是「保全軍隊主力」退守「安全」防線。

三、由於希特勒進行的戰爭的反動性，侵略性，和長期的消耗，使法西斯的欺騙宣傳，「大日爾曼民族優越性」，「歐洲新秩序」，「自由」，「和平」等等鬼話，已不能起任何麻醉的作用了。意大利對德宣戰後，希特勒的「同盟」更加不穩，而各附庸國與各佔領國家反納粹的鬥爭普遍發展，德軍士氣已由個別逃亡，厭戰，反戰情緒發展到拒絕作戰和整師整團的自動投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特別嚴重）在最近三個月內，各師團的非法德意志民族，士兵如波蘭人，奧地利人，捷克人他拒絕法西兩國打仗，他已經經極大的困難與危險，從德意志人前面周圍過，紛紛向紅軍投誠，這種情形，遠較一九一八年的當時要複雜得多，這正是德軍崩潰的危機，鑄成希特勒失敗原因之一。

四、在戰術方面，德國戰術思想的切實性，精確性，與德國軍官們戰術修養之深，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和不可忽視的事實。但是，它存在着最大的毛病，這就是戰術的機械論，也可說是條文主義的戰術。當他們遭受到紅軍機動的打擊時，他們就立刻變成了傻瓜。斯大林在二月二十三日紅軍二十五週年紀念節的文章中指出：「……他們的戰術是沿着常規規則，因為他們極力想使戰場上，像書本跟這一條或那一條規則吻合。當情況允許他們按照規定所要求的那樣行動時，德軍在行動方面是精確而且正確的，他們的力氣就在這一方面。可是，當情況複雜起來，而跟這一條或那一條規定開始「不符」，要求獨自果斷的適應情況，而規則上沒有規定的時候，他們就變得束手無策了。他們的弱點，就在這一方面。」為什麼德軍會這樣缺乏機動性，而變成死守成規的條文主義者呢？這就由於領導者的階級性和戰爭的反動性

使然，也就由於法西斯專制政體的惡果。
無疑的希特勒的失敗，就是紅軍的勝利，紅軍戰勝德寇之成功，斯大林戰術指導之成功。

斯大林戰術指導的成功，有下列幾個特徵：

一、斯大林戰術的第一個特徵，是一種具有傳統性的民族自衛戰爭和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的結合。斯大林一方面發揚和光大了他們先烈的「西歷山大，涅夫斯基（註二）柯西瑪·米寧（註三）亞歷山大·蘇瓦洛夫（註四）乘海文，庫杜佐夫（註五）等民族英雄們的優越的戰術思想。另一方面也創造了和發展了十月革命以來蘇聯內戰中的革命戰術思想。把這兩種戰術思想總結為一，也就是把民族戰爭的自衛性，勇敢性，堅韌性和無產階級革命戰爭的創造性，機動性，組織性結合起來，成為今天斯大林戰術思想的歷史根源。

二、斯大林戰術的第二個特徵，是根據具體的具體情況，適當的採取了「持久戰」和「消滅戰」的方針。由於斯大林非常遠的遠見，遠在十五年以前，就確定了國防工業的基礎，把全國人民的精力大多數組織在集體農場，培養了成千成萬的紅軍幹部及各兵種的專門技術人員，訓練了千百萬的自衛衛隊和自衛性的紅軍，紅海軍，紅空軍的戰鬥員。而戰爭一打，就能動員巨大的後備隊，並且控制最大的後備隊。因此他總能在大批消耗和嚴重打擊敵人之後，於具有決定性的方向和時機，使用出決定性的力量，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斯大林戰術的戰術之成功與今年夏季反攻的輝煌戰績，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一切磨礱似的孤注一擲者和突然性的投機家，無疑的經不起斯大林戰術沉重的一擊的。

三、斯大林戰術的第三個特徵，是在斯大林指導之下的生產動員的偉大成就。這不僅限於能在極忙極繁和危險的戰爭環境中，把國防工業的裝置，從遠東到西伯利亞，甚至行將陷落的城市中都搬移出來，還必須能在新的地方上恢復起來，而事實上蘇聯目前主要的工廠已在東部各洲如火如茶的進行新的生產。並不在比較安全的後方能生產，就在火線下也能生產，每天受着敵人猛烈的砲火轟炸的地方，也一樣的不斷生產。這最好的例子，要算斯大林格勒的紅十月工廠，他們——斯大林格勒人，一面戰鬥，一面戰鬥。當敵人快衝到工廠旁邊來了，他們坐上了自己修好了的坦克車，擊退了坦克車駕駛員，射擊手，渡過了自己修好了的橋樑，去擊退向工廠方面衝來的敵人。這之後，又繼續生產工作。在農業方面，據謝爾巴科夫的報告：「一九四二年耕地的比一九四一年增加了四百公頃，在戰時各種各樣的穀物也有增加。……不懂年富力強的成年人，而且連老年人和少年人也都參加了工作，公務員

，職員，學生從城市裏跑出來幫助集體農莊的農民。由於這樣的結果，在許多集體農莊上從事農場工作的人手總數，甚至比較戰前時期增加了。』因此，紅軍中決無沒有兵餉，沒有彈藥，沒有糧食而無人過問的事。全體蘇維埃人民，都以自犧牲的精神做紅軍的後盾。全體蘇維埃人民都空前的團結在布爾什維克黨和他所領導的蘇維埃蘇聯大旗周圍，而努力生產，努力戰鬥，一切為着前線。

四、斯大林戰時第四個特徵，是在德寇佔領區域內廣泛的動員了人民的抵抗。他號召居民：在被敵人佔領的區域內，必須組織游擊隊和徒步游擊隊，組織軍事破壞隊，別動軍團，到處去開展人民反法西斯游擊戰爭，炸燬敵人的橋樑，道路和倉庫，襲擊敵人的行軍縱列和運輸列車。在敵人佔領區內造成敵人及其走狗困苦不堪的條件，到處追逐他們，消滅他們，破壞他們的設施，配合紅軍主力作戰。這不僅僅是一個地區游擊隊的輝煌戰績，已可窺見一般：『白俄羅斯游擊隊，自開戰以來，大約一年的光景，共斃德寇士兵一三一、六七五名，軍官三、〇三九名，機要員三、〇三九名，共斃德寇九輛，飛機二〇五架，卡車五、〇三三輛，堆棧一八一處，擄德寇步兵聯隊司令部一九處，使德寇軍運列車一、〇七九次擄。』（參看蘇聯報三月七日塔斯社五日電）『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區，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區游擊隊在兩星期中，消滅了德寇一五〇、〇〇〇名。有七名游擊隊員榮膺蘇聯英雄頭銜，有一千六百七十名榮膺軍事勳章，一千五百六十六名榮膺愛國戰爭游擊隊士勳章。』（參看塔斯社奧勒爾十月二十二日電）目前在斯維爾蘭兩岸的游擊隊，正配合着紅軍夾擊向西潰敗的法西斯軍隊，成為紅軍有力的助手。

五、斯大林戰時的第五個特徵，表現在跟法西斯德軍進行的這種戰爭，不能看為普通的戰爭，而是整個蘇聯人民對法西斯力量進行的神聖戰爭。在保衛蘇維埃國家抵抗法西斯侵略而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目標下，不僅要消滅侵入蘇境內的法西斯力量，而且也要援助正在德國法西斯鐵蹄上呻吟的有歐洲各國的人民，因之在蘇聯政府努力之下，不僅幫助組成了波羅的海岸三個民族的民族武裝，也幫助了捷克、波蘭等國家組織了人民反法西斯的武裝。而且這種武裝力量正與紅軍肩並肩的對德國法西斯軍隊進行殊死的戰爭，最近十月十二日波蘭第一軍團的一個師，已在一個地段貫徹了關於強渡斯維爾蘭的第一次軍事任務。不久，新的波蘭師團也就要參加戰鬥了。這也證明斯大林民族政策之成功。

★
★
★
斯大林戰時指導之所以成功，因為斯大林所指揮的部隊，正是『已經獲得了解放的工藝之軍隊，無產階級專政之軍隊。』她從自己誕生之日起，就受着國際主義的精神之教育，受着尊重其他民族的精神之教育，受着愛護

和尊重工人階級的精神之教育。受着保衛和奠定國際和平的精神之教育。』（參看斯大林關於紅軍三個特徵）她之所以能冒死血戰，正因為她知道是為人民福利而戰，為國家獨立，為民族解放，為全世界和平而戰。因之她不僅有着二萬萬國內的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聯盟為後盾，且有着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一切痛恨法西斯制度的專橫野蠻的國家人民為其後盾。這就是紅軍之所以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希特勒狂妄妄為的向這樣

的軍隊挑戰，這正是自速其死。這就是希特勒之必然敗亡。
『然而，不是由此就斷定希特勒軍隊已經被置之於死地了，剩下來的工作只是由紅軍把它追趕到我國的西邊那邊去就行。』這種想法，就是意味着陷於不智的並且有害的自欺。這種想法，就是意味着把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把敵人的力量估計過低，而採取了冒險的方針了。』而事實上，迄今為止，希特勒的部隊為了阻攔紅軍的西進攻勢起見，正積極把生力軍從西線調到蘇德戰場來，並且讓蘇聯情報最近公佈：德軍步兵第三七六師團（原駐荷蘭），第八十二師團（原駐法國），第二六〇師團（原駐挪威）於九月下旬，十月初旬，先後趕到蘇聯戰場。紅軍仍向著好許的，英德的，而且迄今還算強大的敵人作戰，這就說明將領時間，犧牲，使用最大的力量決不罷手進行。要麼是消滅法西斯侵略軍，一切自滿，就忽忽自負都是極有害的。

註一 腓特烈二世，世稱腓特烈大帝，西元一七一二年至一七九六年。他迭與奧帝惡戰，得細勒西亞，又分割波蘭，擴張國土。

註二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是領導俄羅斯人民反抗德寇侵略者的民族英雄。當十三世紀日爾曼騎士沿波羅地海岸侵入俄境，到處燒殺淫掠，企圖滅絕俄羅斯民族。天才的戰略家亞力山大·涅夫斯基統率自己的軍隊，毅然宣佈了反抗德寇侵略者的祖國戰爭，而在秋德湖冰上一役，終於最終的將侵略者逐出國境。

註三 當一六一〇年波蘭地主軍隊侵入了莫斯科，到處搶劫殺戮俄羅斯人民。一六一一年，珂西瑪·米寧領導人民起來反抗外族侵略保衛祖國。

註四 亞力山大·蘇瓦洛夫將軍是一個與士兵共甘苦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

註五 來海文·庫杜佐夫——一八一二年領導俄國人民擊敗拿破崙大軍的將軍。
（十月廿七日脫稿）

蘇聯是怎樣打勝仗的？

M·威爾納

前記

偉大的十月革命二十六年了。

二十六年的時間在歷史上並不算長，但是十月革命的光照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的燦爛。

十月革命的意義在哪裡呢？

在過去，人們是照例的打開了地圖，人們知道了十月革命在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自由幸福的樂園，查一下統計，人們知道了十月革命把全人類中二萬萬的人口從奴隸的枷鎖之下解放了出來。但是地圖和統計是永遠也不會告訴你這被解放了的土地和人民對於全世界和全人類的意義是怎樣的。

今天情況就不同了，今天每一個人雖然不能用抽象的名詞告訴你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但是他們知道新大林格勒的大勝仗，他們知道沒有紅軍勝利的大反攻這一個世界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他們實際上已經懂得了十月革命的意義，十月革命的意義已經不再是抽象的東西了。

紅軍的勝利從一方面說是民主國家全體的勝利，從另一方面說，却又是十月革命的勝利，反法西斯戰爭在本質上就是一個二十世紀的民主反對中世紀的黑暗的鬥爭。

而紅軍是在勝利着，人民是在勝利着，民主是在勝利着！

蘇聯是怎樣勝利的？

風指算來這是德國法西斯背信棄義進攻蘇聯以來第三個十月革命紀念日了。前年十月革命紀念日，莫斯科正在被威魯的營中；去年此日，斯大林格勒也還未完全脫險；但曾幾何時，莫斯科穩定了，列寧城解圍了，斯大林格勒——頓河——高加索勝利了；如今，法西斯軍隊正滔滔滾滾向頓河四！

十月革命解放了人民的力量，蘇聯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人的勝利。羅科索夫斯基將軍說得好：

「蘇聯的軍隊就是蘇聯的人民，人民不是機械，它是不能被毀滅的，人民是不朽的；德國的軍隊在遭遇了嚴重的打擊之下就會解體的，它是那無生命的法西斯的產品，因此它的失敗是定命的」（一九四一年，八月）。

整個蘇德戰爭的發展證實了這一真理。

蘇德戰爭一爆發，不僅希特勒這一個狂人相信它可以在三個月以內打垮紅軍，連那些自信物質力量的人對於蘇聯的前途也抱悲觀。爲什麼呢？希特勒對有全歐洲的作戰資源，在所有重要的戰爭原料（鐵、鋼、鋁等）上，法西斯德國強於蘇聯三倍，在這樣的形勢下紅軍怎麼能夠打勝仗呢？然而紅軍打了勝仗；爲

什麼呢？完全沒有物質基礎，當然不能打仗，不勝說打勝仗，但是有了充份的物質基礎，不一定就打勝仗，而且弄得不好一定打敗仗；這當中的關鍵在人，在於人怎樣使用物質。

有了好的物質基礎就可能有更多更好的武器，在蘇德戰爭第二期中，德軍的坦克優勢曾經一時達到過危險的高度，「德軍的坦克是危險的！」在這樣的形勢之下，紅軍怎樣能夠打勝仗呢？然而紅軍打了勝仗，為什麼呢？完全沒有武器當然不能打仗，不勝說打勝仗，但是有了更多更好的武器，不一定就打勝仗，而且弄得不好，一定打敗仗；這當中的關鍵在人，在於人怎樣使用武器。

物質是重要的，武器是重要的，但是利用物質使用武器的人更加重要；十月革命解放了人民的力量，蘇聯的戰爭是反法西斯的人民自己的戰爭，蘇聯的戰爭是人用武器；德國法西斯的戰爭是違反德國人民利益的戰爭，德國的戰爭是武器用人。希特勒把戰爭變為革命化了，但是不能執行一個革命的戰爭。這就有着法西斯必敗最深奧的歷史根源。

二十六年了，在這個歡欣鼓舞的日子裡首先使我們想到，那在艱難困苦的日子裡準備萬不得已退到堪察加去的偉大的列寧；他深信：只要人的力量存在，一切都回來的；現在他的信心已再一次的為歷史所證實，他的願望在勝利的前進着。

中山先生說，蘇聯革命使人類有了希望；爲要使這希望早點到來，我們首先應該從蘇聯的今天去學習，因爲它是我們明天的保證，今天的積積。爲此，我們介紹了威爾遜的這一篇文章，他的分析在有些枝節的地方雖不無可商之處，但在大體上却是正確的。

——譯者

每一個人記得在德國法西進攻蘇聯的時候他們所用的一句話，他們說，德國軍隊要粉碎紅軍好像定刀切豆腐的一樣。但是現在是豆腐在切刀。當紅軍最初阻止了德軍的勝利，然後把戰爭形勢扭轉過來的時候，蘇軍必敗的預言搖身一變而爲對於蘇軍抵抗力的驚異了，蘇軍的抵抗好像是不可解，而且差不多有些不合理的樣子。但是蘇聯的抵抗却完全不是一項奇蹟。那是完全根據於軍事的事實，它建築於物質的力量，不斷的努力和現實的作戰計劃之上。對於紅軍，戰爭不是虛運來，戰爭的每一個轉都不是倖效的。紅軍所完成了都是事前經過縝密的估計和澈底的準備來的。蘇德戰爭中雙方力量的對比不是一成不變，它是在變化着，而這些變化大部份是有利於紅軍的。蘇聯的作戰指導是澈底的現實主義的。

紅軍是反希特勒同盟中的起着決定作用的軍隊。因此，誰過低估計紅軍的力量，誰就過低估計同盟國家的前途。紅軍不斷增強的力量已經改變戰爭力量對比使其有利於盟軍的重大的因素。

分析蘇德戰爭，不許許有絲毫幻想，蘇聯遭遇了而且正在遭遇着一種超人的任務。紅軍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條件下對一個強大的敵人作戰，對一個強大的敵人爭取勝利。這一種艱巨的任務在戰爭史中是沒有前例的。

首先，如蘇聯比較起來，德國擁有經濟上的優勢。蘇聯失去了廣大的土

地和重要的經濟中心，而德國則是獲得了廣大的土地和重要的經濟中心。蘇聯不得不對一個經濟強於歐洲大陸的經濟資源的德國作戰，其領土之廣，北起那維克南迄雅興，西起比利時東至芬蘭，而其東則一度曾達至北大林格勒。最重要的，是德國在重要的原料上具有巨大的優勢。它有多地於蘇聯三倍以上的煤炭，鐵礦，銅和鎳。它比蘇聯更多的機器，雖然它在機械工具上的優勢並不如它的原料優勢之大。德國有更多的武器生產，雖然它在這一方面優勢並不和它的機械工具生產上的優勢相稱。

總括起來說，在物質方面，比起德國來，蘇聯是處於非常不利的形勢之下的。

在戰爭的第二階段，德國法西斯還佔有軍事上的優勢。因爲德國在那時候已經完成了全部的總動員，它獲得了極大的時間；它發動戰爭的，它保有奇襲的因素，它已作戰兩年，它有作戰的經驗。在最初，德軍有更佳的攻勢作戰的訓練，它的機動性和靈敏性高，它的組織比較好。此外，他還從他的軍事傳統中得着不少的好處。自從十七世紀以來，德軍就一直是全歐洲最好的步兵。在十九、二十世紀，帝俄的軍隊是歐洲第二等的軍隊，俄國的軍事潛能是被它的政治反動性和經濟落後性所阻礙了。在戰爭開始的時候，紅軍不但要估計到敵人的物質上的優勢，而且要顧慮到敵人優良的軍事技術。

在戰爭的第一個階段裡，蘇聯被一個不斷增漲，而且看來好像是失望的危機所威脅着。德軍在初期進攻中的軍事領導逼得紅軍後退，退出土地，退出經濟上非常重要的土地。工業機器的損失削弱它的軍事能力，從而不得不作更多的撤退。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的循環：因為人的攻擊能力因而後退，一退就喪失了自己的工業中心，因工業中心之損失而引起軍事抵抗力的削弱，抵抗力削弱了從而又不得不作更多的撤退。

紅軍的領袖是了解這一個致命的危險的。他對於德軍的打擊力估計得非常正確。他們的對策是不斷削弱敵人的優勢和充分發展自己的優勢：這是一個在戰爭過程中轉變力量對比，用敵人的方法來打擊敵人的計劃。

蘇聯的作戰計劃，其目的在充分運用自己的優勢。在這裡第一件工作是，蘇聯的戰爭必須比德國的戰爭格外全面而徹底。一九四三年二月四號德國法西斯領袖的機體報：『德軍隊』寫過如下的話，它說：

「在蘇聯是沒有我們所謂後方的。敵軍到處有，全面戰爭是在每一個國民的發倉裡」。蘇聯所有可以利用的資源更加為作戰而集中了，它的利用程度比德國強得多。德國有更多的機器，但是蘇聯每千噸鋼中有比德國更多的噸數用於軍事生產。德國有更多的機器，但是所有蘇聯工廠中的機器有比德國更多的部份用於軍事原料的生產。這也就是為什麼莫洛托夫高爾基克工廠對全歐洲的工業的鬥爭是可能的道理。在蘇聯所謂全面戰爭的意思就是動員所有人民，不問是軍事的勞力的，文的武的，所有一切國民都在內的意見。正如同漢森，鮑爾文在紐約時報之所指出，蘇聯把它每一個工作人員的工作時間加強得比德國還強。它順利地解決了全面戰爭的組織任務。工業設備是適時地從佔領和被威脅的地區中搶救出來了。這一種遷移的工作絕不是一種臨時的工作，而是一種生產力的有計劃的轉移。遷出來的工廠和東部的工廠合併而成爲一種巨大的企業——這種遷移計劃的執行是那樣的快而有效，就是在戰爭最緊張的期間，生產沒有中斷過一刻。蘇聯的工業動員可以說是絕對地完成了。最近（一九四三年三月七日）蘇聯的報告說：一九四一年以後，蘇聯空軍方面飛機的生產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坦克的生產，增加了「幾倍」。自從開戰以來，軍用生產方面的增加大概在一倍以上，步兵武器方面的生產大概也差不多有一倍。在戰爭的第二年，紅軍有比德軍更多的大砲，它的步兵武器最低限度同德國一樣的好。

蘇聯戰時生產能保有這樣的增加不能不歸功於兩個因素：蘇聯巨大的機

械生產工業，這在一九三九年已經接受了德國（那時德國還未擴張），以後就是一直專門負責軍事生產而服務；其次，蘇聯在平時就已經建立起來的軍事工業，它形成了工業動員的核心。

兵力和勞力方面的動員是一個平行發展的過程。自從一九四一初秋以來，龐大的後備軍就在深遠的後方開始了訓練，準備持久戰爭。動員了的後備兵的訓練以平民中成年人口的軍事訓練爲基礎。因爲蘇聯在平時一般的軍事訓練有基礎，所以它的後備軍的訓練就不需要很多的時間和功夫。和軍事訓練同時，勞動準備軍早就很快的完成了動員來代替那些離開工廠上訓練的人們。人力的分配在蘇聯也比德國的計劃得好，更有效力。因此紅軍從沒有發生過像德軍那樣的突然和強烈的後備役的恐慌。

於一種觀察的謬誤，很多人過低估計了紅軍的實力。德軍和紅軍的兵力分配是根據不同的規則來決定的。德軍無顧慮的使用它的作戰兵和後備役，因此在前線能時常表現出巨大的打擊力。紅軍使用它的兵源却是謹慎的，不濫用的，因此它在決定性的時刻常常能保有更多的後備兵。德軍常把它的實力拿給大家看，而紅軍却常常把自己的後備兵在敵人面前掩藏起來。在前線上蘇聯雙方力量對比有時會常常把三倍於德軍，特別是在以步兵武器如坦克和飛機等，因此許多外國記者就以爲這就是蘇聯雙方力量對比的真相。這一種錯覺完全是由於雙方不同的戰略而來的，大概我們還有機會看到這種情形，蘇聯一直到最後決定的時刻控制着它的後備軍不放，而德軍却常常把它的士兵和武器投遞戰場。一九四二——四三年偉大的冬季戰役大概是第一次的顯示了蘇聯二軍實力的力量對比，而在這當中沒有誰料到，這對比對於蘇聯是這樣有利，對於德軍是這樣不利。

蘇聯的全面戰爭是人民的戰爭，這是德國所不能理解的。蘇聯的人民戰爭不僅是意味游擊戰爭，而且是意味着全體人民參加這戰爭，全民戰爭。這和全民戰爭的軍事意義在列寧格勒、莫斯科、屠拉、塞德、斯大林格勒以及其他較小城鎮的保衛戰中完全顯示出來了。一百多年以前，克勞塞維支就寫過了：

「假如一個國家的城市和鄉村能爲它的平民和農民所保衛的話，那麼，那將大大地遲緩進攻的速度。被侵略人民的武裝抵抗可以發展到一種程度，使侵略者的軍事技巧和戰鬥意志趨于癱瘓」。

蘇聯的人民戰爭形爲這樣重要的一個軍事因素不是因爲它代替了強大

和近代的正規軍，而是因為它補足了他們。不過，這一個人民戰爭不僅是在前線進行，而且是在後方，在後方工廠裡的工人鐵路工人婦女都在進行着這一戰爭。蘇聯後方的可憐和線固，德國的根本就不能比。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黑衫隊」又寫道：

「現在我們才知道，我們在蘇聯所遭過的不僅是兵力和武器，在那裡我們面對着一個地獄之火，我們在那裡遭到了千百萬人在忍受着戰時一切的困難所完成的成就……」德國是永遠也不能忍受蘇聯人民目前所忍受着的一切的。

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歷史清楚地指出了：革命戰爭在軍事上是具有非常意義的。一九四〇年法國崩潰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人民不能參加戰爭。「狙擊手」的偉大的革命傳統是沒有意識的遺忘了，魏剛不敢保衛巴黎。德國僅僅只是把軍事技術，在一定的意義上連軍事學在內，革命化了，但是它不能進行一個政治的軍事革命戰爭。

蘇聯的全面戰爭人民戰爭無疑是重要的必需的，但這是一個基礎，單靠這還不行。蘇聯作戰努力上最重要的部份是它的軍事力量，鍛鍊軍事技術，爭取軍事優勢。整個蘇聯戰爭可以看做一個爭取軍事優勢的戰爭，爭取軍事優勢的戰鬥。

蘇聯的目標是精確的估計了敵人做出的。紅軍、解德軍的作戰方法，現在的和過去的，他們專心一志的想對策。一九四三，正月三號，紅星報寫道：「預見的天才是戰略的基礎。蘇聯最高指揮部深信，德軍雖擁有初期的優勢，它的實力，它的勝利，但是它不能克服的。它知道德軍初期的成功是暫時的，造成它初期成功的一些因素是可以克服的。幾年以來紅軍就努力趕過它將來的敵人——德軍，在理論上，它們的努力是從未懈怠過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真理報寫道：

「我們絲毫也不以為我們的敵人學習為可恥。在我們的軍事學校裡，我們研究克勞塞維支，毛奇，史利芬和魯登道夫。我們努力地的工作着，在有一些地方，我們相信，我們已經超過我們的「先生們」了。因此蘇聯的最高指揮部就可以算出德軍作戰的一切可能性；它的計劃和領導上不可避免的錯誤——無論是在個別戰役或是全盤戰略上。它事前就確切的知道，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和頓河和高加索的戰役裡，德軍到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就一定要崩潰了。他們對於歷史和心理兩方面的研究都很精到。他們知道，

德國在蘇聯的戰略一定是衝動的，直覺的，根據錯誤的估計，發幹一通。蘇聯的作戰指導從一個前提出發。那就是在蘇聯的軍事必須被放到一個非常不利的形勢之下，而紅軍則必須站到一个最最有利的地位之上——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德軍是可以而且必須被消滅的。

紅軍有一些對它有利的軍事條件。第一，它有着第一流的作戰技術，就是在戰爭初起，當德軍還擁有作戰優勢的時候，它並沒有比紅軍更好的使用武器的技術。經過了兩年作戰的鍛鍊，紅軍的武器在質上絕不劣於德軍的武器，假如真是不如德軍的話，德軍早就把他們打垮了。當兩個近代的軍隊互相對峙的時候，每一方面一定有一些武器比對方的好一些，但是總括起來，它們必然是趨於平衡的。德軍雖然是有着一些較好的戰鬥機，但他們沒有一種轟炸機可以抵得上蘇聯的B-17和B-24。德軍攻擊用的加農炮可能有某些較好的性能，但是蘇聯的戰隊中却有一些更好的平射砲。雖然德軍的中型坦克有一些是不錯的，但蘇聯的重坦克却顯然是被採用得早而且有着更好的使用。德國的步兵武器固然不比蘇聯的來得更有有效。在戰爭開始後的幾個月，紅軍採用了擲彈筒和自動步兵武器，這最低限度打消了德軍在步兵武器方面的優勢，而且它還有着比德軍更多的反坦克武器。

紅軍手裡另一張王牌是戰術，它的掌握武器和近代作戰方法的嫺熟。在戰爭之前，紅軍就獲得了大量的近代作戰的知識和技能。蘇聯嚴密的注意了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德軍作戰的方法，從那裡而學得了教訓。蘇聯戰爭爆發後，紅軍更是小心翼翼的在研究德軍的戰術，而且立即設想了對策。紅星報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寫道：「不斷注意和研究敵人是作戰的重要規則之一，那拥有着防止每一種毒害的對策」。紅軍不斷的獲得新的戰術經驗，不斷的改進它的戰鬥方法。

同時，紅軍的作戰技術和戰略——這就是說計劃和各種作戰和戰役的執行和貫徹——也在改進着。紅軍不得不在費更多的時間來學會這些戰鬥方法。但是它是在近代的攻勢戰略中訓練成功的，這不自蘇德戰爭始，而是自一九三五年起即已開始，因此蘇聯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攻勢絕不僅僅是一種臨時的應急攻勢。

不過，無論如何，紅軍手中最重要的一張牌是蘇聯作戰計劃的優越性。計劃在近代全盤戰爭中的作用是空前的提高了。戰時即戰役的計劃在今天僅

計劃在近代全盤戰爭中的作用是空前的提高了。戰時即戰役的計劃在今天僅

做是總算作戰計劃中的一個組成部份。作戰計劃是全部戰爭的計劃，它意味者把一個國家的全部資源——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集中到戰爭方面來。戰術之於戰略，猶如戰略之於作戰計劃。它要對準每一個戰場的需要和戰爭進行的時間因素分配力量——那就是說要估計敵人的作戰力量，和作戰計劃，針對着它算出整個戰爭的時間。最優秀的軍事技術也是要失敗的，假如它是使用在一個錯誤的作戰計劃上。相反，假如作戰計劃是正確的，假如是實行的，那麼，軍事技術方面的個別弱點甚至於失利都是可以補償的。

蘇聯的計劃經濟，蘇聯一切的計劃性是和蘇聯的作戰計劃有着密切的相關關係的。蘇聯的作戰計劃得力於蘇聯的計劃經濟，而蘇聯的計劃經濟遠比德國的徹底，全面。而且，蘇聯可以把計劃的原則應用到一切的戰爭範圍中去。這也就是為什麼蘇聯能合理的作戰，徹底的組織和作出遠大的估計的道理。當兩個實力差不多的軍隊當中，勝利一定屬於那一個具有更好和更切實的作戰計劃的方面。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在作戰方面，特別是在大規模的戰術運動方面，德軍優於蘇軍。但是一開始紅軍就得益於它的作戰計劃。這一個現實主義的作戰計劃給紅軍以巨大的軍事利益。因為這，紅軍才能進行一個和德軍完全不同的戰爭。那是一個一位科學家和一名賭徒的鬥爭。

作戰計劃開始於所有一切因素的結合和應用，使敵人分散在一個廣大的領土上，不得不依靠於冗長的脆弱的交通線。時間對它不利。一個持久戰爭會把它拖死（附帶的說一聲，那是福煦將軍第一個指出空間和時間是戰爭中的安全因素，而蘇聯的作戰計劃是充分的利用了這兩大因素）。蘇聯的作戰計劃聯結了攻勢和守勢——用德國的術語講，那就是消耗戰和殲滅戰。因此，它所使用的的方法是多樣的，那是一個現實主義的計劃，它假定一個成功的防禦戰是一個毀滅性的攻勢戰的前提。

蘇聯指導戰爭的原則是

- 一、經濟使用現存力量，儲積後備，其目的在於到戰爭的後半期自己比敵人還強。
- 二、用守勢的和攻勢的作戰，在不斷的戰鬥中有系統地削弱敵人。
- 三、一個決定性的攻勢，毀滅敵人的主力，徹底的勝利。

根據這些原則，持久戰為的是疲困敵人，爭取時間，在這當中，同盟國家的力量可以充分的展開。蘇聯的作戰計劃在它的估計中包含了一個同盟國家的聯合作戰，在適當中反希特勒同盟方面具有物質的和戰略的優勢。持久

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敵人的閃電戰，削弱它，使它癱瘓。但是持久戰是不能無限制的進行下去的。消滅敵人，不是用消耗戰，而是要用一個巨大的攻勢運動戰，用最高的打擊力量發動集中的軍事行動，用包圍和殲滅的戰役。蘇聯的攻勢戰在基本上並無和德國的不同之處。在作戰上它們屬於同一的類型。不過它是另外一個作戰計劃中的一部份，有着不同的時間上的秩序。根據蘇聯的看法，閃電戰是在戰爭結束的時候，而不是在戰爭的開始。

蘇聯的作戰指導要在戰爭當中克服自己的弱點，加強所有方面的軍事效能。它用一切的努力達到使自己在軍事上比敵人更強的目的。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是暫時的犧牲土地和工業中心也在所不惜，假如那是必需的話。蘇聯最高指揮部以為，一個軍隊假定它還想完整而強大，是可以克服重要的經濟地區的，而一個疲憊的軍隊則不具備犧牲經濟中心，而且要在消耗之中央持了勝利。說到最後，蘇聯的作戰計劃，其目的在於在戰場上尋求軍事上的決定——它把這一切考慮之前。

在戰爭當中，蘇德雙方的戰略起了顯著的變化。德國的戰略，最初尋求軍事上的速戰速決，但是到了作戰的第二階段，已經轉變到，於低限度局部地轉變到石油戰略了。在本質上，一九四二年德軍的攻勢是用一個陸軍來執行行的強制的封鎖的戰略。它的目的在動搖蘇聯的經濟系統，切斷它的供給來源。我們可以說希特勒的戰略已經回到了英國過去的策略去了：在敵人的陣地邊緣上打擊敵人的經濟資源。（譯者按：作者的這段分析只有一部份是正確的，因為我們知道一九四二年希特勒的夏季攻勢的目標不僅是在採取高加索的石油，而且更從斯大林格勒北上，從東面去包圍莫斯科，尋求決戰，它「追蹤着兩隻兔子」；即便是在他今年的夏季攻勢中，他依然也沒有忘記從庫爾斯克進攻莫斯科，尋求決戰的意思。）相反，蘇聯的冬季大反攻却是指示着它的戰略已經通過渡到尋求決戰的戰略了，這是長期以來被認為德軍的專用品，旁人使用不得的。一九四二——四三年冬季戰役是蘇聯的軍事決定的戰略和德國石油戰略的一個鬥爭。這一次蘇聯的作戰計劃達到了它的目的，它不顧一切代價尋求軍事上的優勢，它獲得了它。

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紅軍進行和打勝了這一個戰役的，值得我們考慮一下。當時敵人離莫斯科只有一〇〇哩。蘇聯的另一個大城市是在包圍當中。蘇聯已經失去了佔有七千萬人民的土地。蘇聯的煤炭和鋼鐵中心的大部份失去了，蘇聯最肥沃的耕地也失去了大部。油田正受着威脅。蘇聯的石油路線

，也就是貫通蘇聯南北最後一條重要的交通大道被切斷了。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紅軍不但聚集了力量，而且準備了，發動了和打勝了這一次攻勢。在戰爭的編年史中從沒有一次巨大的戰役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而對着這樣強大而有技巧的敵人打勝過的。這是一個極度複雜的計劃，包含着巨大的冒險，要求着不可想像的犧牲。但是它成功了，那就證明在那時蘇軍已經掌握了軍事上的優勢。因為沒有軍事上的優勢，要在任何一個微小的戰役裡打敗德國軍隊是不可能的。

紅軍在斯大林格勒的勝利證實了蘇聯作戰計劃的成功。好的武器使用和好的戰術是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勝利由於優秀的作戰計劃。假如紅軍是在一個錯誤的作戰計劃之下作戰，而對着像德軍這樣的敵人，單靠第一流的武器和戰術技巧，它依然是要崩潰的。

假如是在德國那樣的作戰計劃之下作戰——那就是說不實行他們自己的現實主義的戰略，而一開始就不顧一切追求一種狂妄的攻勢戰略，紅軍依然會失敗，而且很快。一九四二——四三年冬季戰役顯示了蘇聯作戰指導所包含的大胆性，但它同時也顯示了紅軍遠見的計劃性和它的力量。蘇聯的作戰指導是偉大的，但那不是因為它的一切是平穩的進行了，而相反是因為它不得不克服巨大的困難和初期的失利。因此才有這無獨有偶的現象可能：紅軍打敗了一個工業上非常堅強的敵人。德軍的確定被一個工業上相當薄弱的敵人打敗了。這一個事實就證實了蘇聯在軍事上比在經濟上更強，而德國在軍事上却比它在經濟上更弱，雖然它有着深厚的軍事傳統。

紅軍這樣的成就要求做到幾件事情，在這當中，特別是關於後備軍的具有遠見的使用。重要的不僅是要適時的準備，而且要符合於戰略目標的使用。德軍的力量在那準備得不過全的攻勢中花完了，但到了最後五分鐘，蘇聯的後備軍悄悄地出乎意料之外地投進戰鬥了，而德軍此時表面上雖然是在勝利中，但實際上已遇到了危機。——這些後備軍扭轉了形勢，打勝了決定的戰役。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號紅軍奪得這後備戰略在莫斯科之戰中的運用提供了一幅生動的圖畫：

「當莫斯科前線單薄的掩護部隊在消耗希特勒的師團的時候，在後方，每十五分鐘二十分鐘出現了一列又一列的坦克，各式口徑的大砲，渴望着戰鬥的青年士兵，他們穿着溫暖的冬大衣，身上則是武裝到牙齒，兩手具備了最好的作戰技巧。沒有人知道這些成天成萬的列車裝到什麼地方，這些人，這些坦克，這些大砲倏忽不見了。他們不在前線。只有根據戰士們的直覺，前線才能猜出他們來了。成打的步兵師團和坦克旅團消滅在莫斯科周圍無邊的森林裡。到了一九四二，十二月四號，這一個鋼鐵已經緊縮到最緊張的

高度。十二月五號，所有這些後備兵在莫斯科的城門之前出現了一——他們一起舉起了鋼鐵錘擊那隻來襲的日耳曼法西斯。」

一年之後，在斯大林格勒，同樣的方法以更大的規模在被使用着。

這裏我們同樣應該談一談，紅軍是怎樣達到武器方面的優勢的。紅軍奪取坦克優勢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於在一九四一年夏季撤退中紅軍坦克嚴重損失，德軍的坦克優勢達到最高和最危險的頂點。蘇聯同時運用工業和軍事上的努力來克服這一個危機。坦克生產是用最大的力量來提高了。坦克後備則是在極度經濟地使用着。此外，紅軍得有指令，要用一切形式的反坦克武器，從步兵到空軍，給敵人以最大可能的坦克損失。蘇聯的長坦克防禦不僅是有着防禦的目的，而且是具有為蘇聯坦克優勢鋪路的任務。一個國家的坦克生產小，但是它的坦克性能可以超過敵人，假如它能使敵人的坦克損失大於它的生產。在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的冬季戰役中，紅軍的坦克已經比德軍所有的多了。它追求要使這優勢更加增高，但這一次不是用防禦的手段，而是用攻勢戰的手段，紅軍的攻勢使德軍坦克遭受巨大的損失。

但是紅軍所完成最大的成就是在它的個別戰士和戰鬥單位的作戰能力的提高上。紅軍有着比德軍更多的兵源，但它並不比所有歐洲軸心集團的兵源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夏季，紅軍在前線的士兵比德軍的少。紅軍用軍事技術的提高和後備兵的合理運用來抵銷這種不均衡。德國說他們的士兵素質好，那是絕對沒有根據的。一個人抵一個人，一個單位抵一個單位，在兩年作戰之後，紅軍絕不下於德軍，而且蘇聯作戰機械的動力性對於德軍不是一個好兆。現在德軍的作戰技巧比開戰時候低，但紅軍作戰的技巧，現在却比開戰時候高。在一九四二——四三年的冬季反攻中，在作戰技巧上紅軍決定的優於德軍。

在戰術，組織和領導各方面，紅軍在作戰過程中已經大大地改進了。正如美國陸軍指揮官，莫克奈爾中將所說：「紅軍偉大的力量，它們無與倫比的戰鬥精神，他們完備的戰略和戰術已經變成德軍的棘手了。」紅軍現在是在大踏步的爭取對德軍的優勢。德國掩護部隊的藉口——紅軍純以量勝——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德國軍隊有着那樣大的實力和那樣好的技巧，是不能完全用人多來打敗的，只有優勢的質才能在德軍強大的集中的力量之前取得勝利。紅軍在斯大林格勒勝利主要地除掉優勢的戰略而外，是不能用別的理由來解釋的。因為我們不能忘記直至現在，德軍還保有工業上的優勢，而在開戰之初，它在軍事上也還佔過上風。因此紅軍只有用優勢的軍事質量才能抵銷德軍在這些方面的優勢。

(續)

蘇聯·I·特拉伊尼作

蘇聯的游擊戰爭

焦敏之譯

(一) 論人民爭戰

關於每一戰爭的問題，須從歷史的觀點去考察，即是說須闡明它是在那一個歷史階段產生，它底經濟的真相如何，代表誰的利益，為什麼而鬥爭。祇有這種對問題的看法才有可能判斷這一戰爭是否正義而適合民衆的利益，抑或它是侵略而爲奴隸主和壓迫者謀利益的？歷史上已有不少的先例，利用欺騙政策及強迫手段而把廣大的民衆騙出作戰，但戰爭的目的，却因此就是人民的戰爭。譬如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年，白黨將領們就是把利用強迫手段動員的人們所編練的他們的軍隊，冒充爲「人民的軍隊」(或「國民軍」——譯者)。這種軍隊及他們所進行的反蘇維埃人民的這種戰爭，其違背人民的性質，是不待詳述而自明的。在根本上，希特勒黨羽——這些強盜帝國主義者——所挑動起來的戰爭，也純然是反對人民的。

蘇維埃人民抵抗希特勒主義的愛國戰爭，是爲民衆利益着想的正義的，是解放戰爭的最輝煌的範例。這個戰爭，實全體蘇維埃人民反對法西斯帝國主義強盜，奴隸主和壓迫者的戰爭。

所謂「全民者」——列寧寫過——「蓋指絕對多數人民甘願支援之運動也」(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四一頁)。

本此而論，蘇維埃人民的愛國戰爭，也是這個意義，蓋就其參與者之成分而言，抑或就其歷史的內容而言，都可譽爲真正人民的戰爭。

真正人民的戰爭，就是捍衛人民切身利益及其權利，光榮，自由與獨立

的那種戰爭。

這種戰爭——這個究竟非正義戰爭兩極相鋒的正義戰，即與那野心勃勃的國領土，奴役及屈辱別國人民，且消滅其國家獨立的戰爭而互爲對立的正義戰。

需其是在這種戰爭中，人民才益起保衛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尤以其祖國存亡延續，及其獨立自由生命做賭之際，更能發揮其天下與亡國夫有責之志。

人民戰爭中所表現的特點，就是羣衆對其事業之合於真理和正義的信心，保衛這種事業到最後勝利的決心。

以上所述一切，爲人民戰爭中戰士們軍心士氣達到高度水準的先決條件。這種精神士氣的水準建立在什麼地方呢？建立在反映人民切身利益的作戰目標的正義性上。而這個又是決定士兵們行爲道德的前提，它創造了士兵們堅定剛毅的信仰，滋生了勇敢精神以及斬荆披棘而爭取勝利的不折不撓的意志。

戰爭不啻爲人民一切精神道德，組織力量以及經濟技術力量的熔爐的考驗。因之，不僅前方的武裝力量要積極參加到反對侵略者的人民戰爭中，而且要有後方的老百姓他們的物質勞動擔當一定要保證前方的武裝及戰鬥力。人民在人民戰爭中把一切力量阻礙到他們積極抵抗的運動當中，如組織到正規軍，民兵及游擊隊是也。

在本文中，我們特先就人民戰爭這力量之一端——游擊戰——作一檢討。

游擊鬥爭尤顯明表現了戰爭的人民真諦。正規軍底絕對多數官兵通常係由被動員的人們所組成，當游擊隊員則純係自願兵。的確，自願兵可充正規軍及民兵。游擊的自願運動的特性，在於游擊隊係在敵後作戰。游擊隊——這個是敵後民衆自願的作戰組織，它證實了人民捍衛他的事業及其國家的自犧牲精神。

游擊戰爭的戰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爲使與游擊隊員鬥爭，敵人勢必在後方留守大的警備隊而抽調前方的兵力。凡游擊鬥爭獲得盛大發展之地，敵軍必須於事實上在兩面作戰。

游擊戰爭爲一切戰爭中最爲機動的一種。游擊隊員往往出沒於對他們不甚提防之地。游擊隊員出敵不意的襲擊消滅了敵軍的後方部隊，破壞了他的通訊聯絡，炸斷橋樑，鐵路，破壞卡車，糧棧及其他供給站。敵人每次運糧必被迫派武裝力量護送，在後備兵不足之際，即對他造成很大的不安。這種因感不安可累積爲一很大的困難，因游擊隊的動作打破了敵軍的計劃，而跟着他一步一步的向國內的深入，使他也愈益消耗和疲憊了起來。

游擊隊根據環境及地理條件制定了他的戰術的作戰方法。作戰的機動性，人民的機敏以及敵軍時的神出鬼沒性，往往可與敵最爲密慎的戰略計劃相對立。游擊隊並不對敵守株待兔，而是自行搜索敵人，並於埋伏中襲擊敵人。以鋼甲鐵鎗武裝起來的敵人，通常對游擊隊的機詐兵法及出沒無常性表現無能爲力。廣泛發展了的游擊運動，不僅使敵人的攻擊倍加困難，且爲他退却時的一大致命傷。

歷史上有許多人民戰爭，游擊鬥爭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游擊隊在最近幾百年來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作用，是非常偉大的。譬如十七世紀尼得蘭人民抵抗西班牙壓迫者進行的游擊戰爭就是一例。其後，西班牙人民於十九世紀初葉反對法國壓迫者時也採用了它。俄國民衆在一八一二年愛國戰爭中也採用了它。德意志個別的愛國者在一八〇八——一八一三年抵抗法國壓迫者時也企圖進行游擊戰。一八七〇——一八七二年法國「遊擊兵」(Maquisards) 從事徵發，小戰及斥候——(譯者) 抵抗德軍侵入時也採用了它。

歷史上的經驗證明，游擊戰爭的勝利不係取決於游擊隊員的人數，他底武裝以及與其它國家或軍力量聯繫，而且在乎國家怎樣來扶植全民抗敵鬥爭的組織。凡是國家在指揮戰爭方面能合乎人民的切身需要的地方，那裡的全民戰爭也就更順利地發展着，其中連游擊戰爭在內。這個命題已由反抗拿

破獲的某些民族解放戰爭中的游擊戰爭的先例證實了。同時，如蘇維埃人民的游擊戰與過去的一切游擊戰比較一下，尤可顯示出它的特點。

(二) 反對拿破崙戰爭時代的游擊戰爭

甲、西班牙的游擊戰爭(一八〇八——一八一二年)

我們就先從一八〇八年對一八一四年拿破崙時代與西班牙戰爭中的游擊戰做一簡明的敘述。這做戰爭，如不估計到法國革命及其在十八世紀末年之戰爭對西班牙的影響，是不能够了解的。在這一方面的一個特點，就是甲可賓黨人領導的法國人民，對法國內部來了一次深入的社會變革。盡人皆知，比方一七九三年六月十七日甲可賓黨人領導的國民公會就決議不用身價廢除一切封建義務，而把審明這一切義務的契約均付之一炬。因此甲可賓黨人在最廣大的民衆中造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印象：他們已有可保衛的了。甲可賓黨人爲人民戰爭解決的組織者與發動者。

「全體人民——列寧就此問題寫道——，尤以羣衆即被壓迫階級爲最——均洋溢着無限的革命熱情；全體均認爲戰爭是正義的；防禦戰，而事實上它幾乎也是如此」(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〇頁)。

法國革命的浪潮，席捲了比利牛斯山而盪漾於西班牙。比利牛斯山之陰，「農民分得貴族教會土地」一事，消息傳來，在西班牙人民廣大羣衆之間，引起了盛大的同情。真的，一七八九年君主的敕令爲對每一人的威脅；這敢放遠宣傳法國「精神」，人人均有還交宗教裁判所之虞。然這亦倍加提高了西班牙人民對法人的同情。

在一八〇六年法軍兵臨西國境內。然這却已不是昔日「分派土地」的法人。他倒是襲擊人民之民族尊嚴，劫掠人民財產，而企圖佔領與奴隸西班牙的拿破崙的軍隊。一八〇八年五月二日馬得里得的人民起義，做了舉國起義的信號。當時拿破崙佔領西班牙，消滅西班牙的獨立，並派他底兄弟弟弟爲西班牙王，於是全國人民奮起。起初由阿爾斯時里亞人起義，繼後有沙拉沙人，加里西亞人，伐倫西亞人，考耐道巴人，轉瞬全西班牙揚竿而起，游擊隊遍地。西國山脈縱橫，各地僻處一方，對游擊隊頗稱便利。山溝峽谷每爲自負不可擊敗者之士兵的墳墓。誠如馬克思所說：「法軍」必須於每分鐘準備

對敵作戰，敵軍之奔跑不息，去而復來，時而露液無蹤，不可覺察，時而遍地埋伏，風聲鶴唳者，此實每一山脈可充彼等掩蔽故也」(馬恩全集第十卷第七四三頁)。

人民戰士——海軍隊——率使法軍將領杜波偕其軍隊一萬七千人來歸彼俘。

一八〇九年沙拉哥沙的保衛戰，人民竟支持至三月之久，且使法軍士兵困憊不堪。當時法軍以重大的傷亡為代價始得於最後衝入城中，然嚴格言之，法軍亦必須以猛攻佔領每一街道，每一幢屋與房屋。

全歐皆緊張注視已開始的鬥爭。

拿氏剿伐心切，屢思將其一切新兵源源派入西班牙滿平人民運動。每當他提及游擊戰士，他必以他的將領們「剿滅破壞黨」不力致使貽誤機宜(戰事延緩)而忿怒。拿破崙曾聲稱：「我軍非由將領指揮，而此所謂將領者實郵長之英也」。一八〇八年十一月五日，拿破崙御駕親征，駕至西班牙督戰。他在一地擊破游擊部隊，然游擊隊却變化多端而聲勢益大。蘭尼將軍上奏拿破崙時寫道：「陛下，此絕非吾人在戰爭中所經見。臣從未聞若地之勇敢。災民怒不可遏，趨而走險，其慮尤不堪設想……行見此次戰爭引吾人於不寒而慄之境也。」

拿破崙對西班牙人許以「自由」，然此舉亦徒勞無益，不被聲譽。人民戰爭還是把日益更多的新的羣衆喚起來參加鬥爭。

這種風起雲湧的人民戰爭，結果雖為一悲劇，然此亦不能歸咎於七本身，而是由於它沒有應有的領導者。構成起義者基本羣衆的農民，沒有他自己的領袖。軟弱的城市資產階級沒有自行掌握領導的胆量，反把領導權拱手讓與大地主與貴族。在這種領導之下，中途產生的會議是無力組織人民的主動精神而對它加以援助的。會議底首領們甚至亦不敢嘗試立刻去建立指導運動的統一的民族的領導。最奇特的是，從西班牙人民起義爆發的頭一天起，就馬上發生了十六個「最高政務會議」。他們彼此為互相爭奪國家的領導權開始翻騰起來，但它不是以人民的名義爭論，而是以拿破崙作為人質的「國王菲丁南的附庸」的資格。從英國得到武器的塞維里「最高會議」，拒而不欲出兵援助正在激烈抵抗拿破崙的加泰洛尼亞的游擊隊。各個會議爭相以封建的稱號而自飾。在阿拉查的會議，竟擬出已廢王亞阿拉查的典章做為他活動的張本。最後，經過一八〇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長久的紛爭後，固然在阿拉

胡司召集了一次中央會議，但代表地方會議的各代表，却都是些以塞維里為里達波蘭克為首的貴族，長老和高級官員。

人民犧牲奮鬥，全為求得於法軍被逐之後恢復其自身之權利，益以農民獲得土地為然。但會議不僅不鼓勵人民的愛國熱情，而且借口「保衛祖國」左袒貴族特權，反對人民，解除了佩利游擊隊的武裝，換言之即事實上倒行逆施，採取違背人民的政策。可是人民依舊相信會議還可領導人民戰爭。馬克思寫道，人民「強迫上層階級抵抗法軍，決未要求參加對這種抵抗的領導」(馬恩全集第十五卷第七二九頁)。

各會議諸如此類薄弱之因，亦其後產生「民主」議會小敢依恃人民而與封建份子對抗之因。一八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所成立的議會，雖在決議案上句句甚為勇敢，但它一事無成未能在各地實現此項決議。抑有進者，彼等尚袒護君主及其他封建餘孽的神聖不可侵犯。及至西班牙人民積極與法國壓迫者鬥爭之際，領導者也祇知以花言巧語來欺騙，而對封建子財磨拳擦掌準備襲擊進份子，襲擊從事民族解放鬥爭之士。

西班牙極應外合，反動派的勝利，實拿破崙從中助長之故。他(拿破崙)以西班牙王斐丁南出而接受與法提攜政策及贊助西班牙親法派(者為條件，將其釋放歸國。

一八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斐丁南逃抵伐倫西亞後，即為反動份子嚴密包圍。斐丁南底一筆勾銷了憲法，召回被放逐的耶穌教派，恢復了宗教裁判所並嚴懲為國犧牲而為西班牙榮譽與獨立奮鬥的愛國志士。

自一八〇八年以來因愛國主義與愛國精神所感召而參加運動以保衛其國家獨立的人民，被國王為首的封建份子以血腥的殘暴手段平定了。

西班牙雖終於由法國壓迫下獲得解放了，然這是由於在歐洲的另一角隅——俄羅斯人民，俄羅斯人民的正規軍以及民兵和游擊隊，不獨為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而且為其他各國人民，當然西班牙人民的民族解放亦在其內，肩負着鬥爭的任務。

乙、一八一二年俄羅斯人民愛國戰爭時代的游擊戰爭
西班牙人民在其進行抵抗拿破崙的鬥爭中曾獲得外援。俄國人民則不求別人，自力更生。

在此不必細述俄國人民常反拿破崙侵入時在鬥爭中的一切演變。我們祇指出一點就夠了，就是當時俄國在經濟和文化方面是一落千丈的國家。當時千

病百孔，罪惡淵深，專制制度的一切弊端都劇烈發生，所以愛國戰爭是在農奴封建制度統治的條件下展開的。這個時代，廣大民衆幾乎都愚昧無知，農民偶有破壞地主權益之事，即被拘監禁或嚴刑懲處，判決二十五年的兵役。軍中風行以指揮棍維持紀律，軍官毫無訓練且常常爲不識識字之人，貴族軍官與人民出身的士兵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示出來了。

在法國，拿破崙最喜稱他爲「農民的皇帝」。這一口頭禪不祇是他反對貴族時打出的一張勝利牌，有時且用「民變」（農民的征討）相惆噓。然此種惆噓祇是說一說而已。

「我祇要動一動嘴，或更說句老實話吧——拿破崙向伯什麥·考斯坦尼說——我祇要動一動嘴，就可要各省貴族的命……不過我不願做一個夏卡林皇帝吧了。」

拿破崙在實際上利用農民暴衆——農民是因得恩於革命而登上歷史舞台的。但他却憎惡下層人民，看不起下層人民。他把他們當做一些砲灰，反對農民以及一般人民的主動性。

馬克思寫着：「……農民爲拿破崙特主戰者，因爲他把大革命（即指法國大革命——譯者）以及革命所賜與他的利益，統統與拿破崙的大名等同看待」（馬克思選集第二卷第四〇二頁，一九三五年版本）。

在事實上，拿破崙已甘冒天下之不韙而把農民對革命的恨念以及追憶往昔而留念甲可賓黨當朝以來所遺留的傳統風尚的依依歸附之心，一刀兩斷斬伐殆盡了。拿破崙不單是消滅了國內的革命遺產，而且也把國外的播滿已盡。

這在拿破崙闖入俄國國境而在俄羅斯所作所爲的尤爲彰明較著。譬如，在立陶瓦，拿破崙就成立了立陶瓦王公臨時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於一八一二年七月中頒佈了一道命令，宣佈一切農民均須服從地主，並照舊履行一切封建義務等等。

若拿破崙對俄國的沙皇士精充兵備，在這方面尤物較效勞，粉飾不已。這軍的總司令格羅爾特將軍於兵臨庫爾蘭時在宣言中對農民警告說：「故違，拒絕履行封建義務，必格殺勿論！」

拿破崙所企圖的是什麼？佔領全部俄國，使它步德意志之後塵，成爲德意志第二嗎？是的，最低限度，此種願望亦必須隨拿破崙和盤實現。他闖入

莫斯科者，其意就在於一舉而下，將俄國北部與南部切斷，強迫沙皇訂城下之盟，而實現其孤立英倫三島，壓倒俄國參加大陸對鎖之迷夢。他以為祇要有地主階級的實力派便可實現這個任務，因爲俄國資產階級還沒有雄厚的力量。他傲慢地瞧不起人民。拿破崙對貴族表示慰勉，密意把他們引到自己方面，維護封建統治。拿破崙早在征俄失敗後說：他本可武裝一部分俄國人民——農民——反對地主，但因親視農民也有當地不願這樣去做。

因身受法軍嘲弄人民之苦，農民均傷感不盡，拒絕供給法軍，或視法軍如仇讎。在歐洲所向無敵而欲置鄰邦普魯士於卑躬屈膝之地的敵人，却到俄國後掀起了強烈的愛國運動。考這一運動的主力就是俄國農民。

法軍之佔領莫斯科以及普魯斯的大火，直等於在人民怒火上加上加油。愛國戰爭的鬥爭人和觀察家卡爾·克勞塞維茨指出：「俄人對於法軍的進攻及其他許多名號焚燬之犧牲，習以爲常，不足爲奇，然莫斯科的大火，畢竟在他們心坎留下了深淵的印象，並加倍使反抗法軍的仇恨有如火燎原之勢。將此大火歸罪於敵人，而把這真是真正奮鬥的行動，是他罪惡的結果，是他強取豪奪壓榨的結果。」（克勞塞維茨：「一八一二年戰史」，第一三〇頁。一九三七年軍事出版社）

拿破崙在軍隊的戰敗及其物質裝備方面均有絕大的優勢。但俄軍爲自己的祖國在本土作戰，士氣則甚高昂。拿破崙愈深入俄境，後方農民的協助也愈對他危險。寫往特羅特涅行的沙皇聖諭由大第一，並於自備的呼聲，在致巴爾克萊、的、托爾斯泰的信中，也表露他欲陷普天下發動人民法法。「朕望——沙皇寫着——吾人能將西班牙人之罪定。」

所幸，俄國人民與西班牙之遭不同，其人民之抵抗外侮，誠然非得自沙皇之贊助，而係最高統帥庫圖佐夫。

吾人理應指出，庫圖佐夫獲得敬仰之處，就是他能體貼農家怒不可抑的民族思想的要求，理解人民榮譽的哀謠。

L. N. 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提到庫圖佐夫時問道：「這位老人怎能不顧一切其論的反對，單獨地擔負起領導人民這義，而從無一攻在

他全部的活動中改變他的主觀呢？」偉大的藝術家對這個問題自答道：「這種見識遠大，料事如神，而一定對將來既成事實的意義是如此的非常力量

的根源，就在於這種人民的感覺，在他（指庫圖佐夫——敏之）全部的果敢和力量中它都洋溢著。祇有認識他（庫圖佐夫——敏之）心上這種感覺，才能

使人民以他這種令人驚奇不置，而使他老人家被人斥責的手段，抉擇了一個反對沙皇意志的人民戰爭的意向。

庫圖佐夫這許多宮廷貴族於不顧，支持了人民運動。庫圖佐夫明白，就整個軍事訓練說，民兵不及正規軍的士兵。但他認定民兵與軍隊攜手，必可加強他們人民反抗的精神。庫圖佐夫與民兵接近。他呈請沙皇批准立刻將已編制就緒的各個民團加入正規軍，但頗為畏懼民兵的沙皇却回答說：「朕覺此種民團尚未有若何訓練，上述一項，實難照准。」

庫圖佐夫亦對游擊運動加以援助。「君之勝利的經驗——庫圖佐夫對丁尼生·達維道夫說——已向吾證明游擊戰爭之益，而巳予敵軍，現正予敵軍且將予敵軍以非常多之損害」(丁尼生·達維道夫：「一八一二年游擊日記」第八一頁，一九四一年國家文藝出版社版本)。

對俄國游擊隊活動恐慌不安的拿破崙，於一八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即九月三)即已在下給柏爾特的命令中，指出此種情況：「法軍於發發森林之際所損失者，實較作戰時為多。」

一八一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即十月五日)，拿破崙轉托法國前駐俄公使洛里斯頓向庫圖佐夫提議征剿游擊隊以遂其停止鬥爭之目的。庫圖佐夫就此答道：

「人民皆知今此之戰爭，不啻鞭撻之入犯，故以一切手段自衛抗敵；不獨不以此為罪，且以此為光榮神聖之事。」

繼而，拿破崙又轉請柏爾特元帥聲請庫圖佐夫依據「一切戰爭公認之作戰條例負責停止游擊戰爭」。庫圖佐夫就此照會又答覆說：

「人民際此悲痛莫名之秋，鎮壓人民之舉決難照辦。人民在其祖國腹地，未見敵犯已二百年於茲矣，故以死捍衛祖國河山亦在所不計。彼決不能分辨何者為通常戰爭中所不允，何者應為守之常規也。一八一二年十月九日(即二十一日)，塔魯基諾。」(丁尼生·達維道夫全集第三卷第五一—五六頁，一九九三年版本)。

庫圖索夫此種對人民反抗侵略者之態度以及對游擊隊之態度，大為促進一八一二年人民戰爭之勝利。這少數軍官出身的人們，庫圖佐夫祝福他們與人民一致攜手至法軍之後進行游擊鬥爭，必須獲得人民信任。丁尼生·達維道夫驚訝地指出人民游擊隊員的犧牲精神。

「……他們不管有多少人，大家都在這一些古代貴族王孫公子哥兒們面

前奮起了一——達維道夫寫着——然這些留着一鬚粗粗的八字鬍子的貴族馬刺叮鈴地騎着馬在莫斯科外國馳騁兩月後，又由莫斯科遠遠地跑到遠邊各有了——但此時他們優秀的永世不朽的祖國的父老們，正在這裡挺胸與祖國敵人的刺刀拚命，而他們則把香水在臉上洒得怪香的，舞蹈於祖國墳墓之上」(丁尼生·達維道夫一八一二年「游擊日記」第九三頁，一九四一年國家文藝出版社版本)。

游擊隊及民兵援助正規軍作戰，予拿破崙軍隊以痛切的打擊，迫使他由俄國撤退。

最後，拿破崙亟想證明，他在俄國的失敗，其原因在於有「天時之不和」人力所不能抗爭，即無法抵抗俄羅斯的寒冬。這一論證，法俄兩國的個別歷史家到後來都拾來巧辯，儼然拿破崙在征俄以前不知道俄羅斯有嚴冽的冰雪——丁尼生·達維道夫在他所著的一文「冰霜在一八一二年覆沒法軍嗎」說：

「對於我們當中的某些人，尤其是對我們俄國人之中深知入寇我國的變與真正滅亡原因的證人，以及親眼看到這一洋洋大觀的喪辱辱國的場面的當事者，能够以反覆言誦別人捏造的謊語而自矜嗎？」(丁尼生·達維道夫：「戰爭筆記」第三一一頁，一九四〇年版本)

但問愛國戰爭時代「階級是否和合」？農民是否已忘記地主們欺凌？絕對沒有！事實上，沙皇，官廷貴族以及全體貴族都深滑滑這一個。莫斯科省司令長官拉斯托不奇，就特別害怕人民武裝，雖然他也決意派兵，故對人民願意奉承。武裝農民反對地主的暴動，在莫斯科，斯摩爾斯克，和奧爾以及其它諸省都發生過。然而兄弟鬩牆，外禦其侮，人民均以外國強盜蹂躪祖國領土，殘虐人民的民族罪孽而以外國強盜復仇雪恥為至上。在戰爭時期受了驚嚇的地主亦能平心靜氣而不鬧暴動。農民的仇恨是打到匪徒長槍的在逃的貴族頭上。反之，積極投軍或加入民兵的那些貴族，却都毫不顧羞，且自甘自愛而為人民的民族解放參加抵抗外國侵略者的戰爭。

在當時，人民對自己的領袖。他對上信任，而於感憤之餘，接受對他的一切同情。農民沸騰，暴亂聲起，結果所至，那些知識階級的自由民族思想亦得覺醒，而於其後領導了十二月黨人的運動。諸優秀英才已領悟，如此繼續實不可斷。於是A、B、格里波耶道夫在俄國於一八一二年之劇本中，初則將封建武裝農奴描寫為一八一二年英勇作戰的英雄，繼則又描寫到他們

不得不歸附地主，服從奴役的封建奴制制度。貴族和知識份子中的優秀的天才，已在當時提出了改革俄羅斯國體的問題了。

丙、普魯士游擊戰爭的失敗

為對俄作戰，拿破崙必須使俄國屈服。這個目的拿破崙是達到了，因為德國英雄們，一盤散沙，因為高階級的國王對拿破崙奴顏卑膝出賣了人民的利益。

舉例說，在普魯士，「非特烈精神」就是為虎作倀，其用意就在使人民不問國事，不問國家的命運，而讓普魯士除銷閉之態。非特烈第二（一七一二—一七八六年）竟云：「和平之公民，不當知道國家為何而戰」。殘暴軍人與民族視同一體。普魯士的軍紀被譽為民族思想。

對民族利益以及對人民自身的輕視已成為一慣例。當農民聚眾以鐵鞭為武器起而保衛自己祖國的土地而抵禦異族侵入者時，普王非特烈二世勅令農民不能參加戰爭，違者並以叛國治罪。及至佛利斯蘭特居民向非特烈二世控訴法軍因彼等反抗而劫掠他們時，國王反冷笑着稱他與法軍對付的手段亦毫無二致。

非特烈二世的制度，是建基於專制主義及其官僚政治之上，建基於專與破產的窮苦農民及被鎮壓的城市市民作對的那些貪婪無厭的貴族身上。貴族依據封建法規，祇可命令，而農民祇可低頭，服從這些命令並被押入軍，軍官一職概由貴族所包辦。當戰爭順利之際，士卒服從，忍辱沉默，失敗則引起無數士兵的逃亡。紀律至嚴軍棍和耳光維持。非特烈二世的操典中說：「士兵應長隊伍長的軍棍，比敵人的子彈還要可怕」。自然，此種條件是不能促進人民及軍中的民族覺悟的發展的。下面這一句話也是非特烈二世說的：「如我國士兵已知吾人為何而戰，則吾人一次戰爭亦不能進行也」。

普魯士制度為一切愛好自由者之公敵。在這種條件之下，普魯士就遵照非特烈反動的遺囑，於一七九二年出兵反對法國的革命而最後與奧地利一同失敗了。上級指揮官雖被刺殺，但因沒有人民做後盾，結果遭受慘敗。

恩格斯述及當年的德意志時寫道：「這是腐敗不堪的烏合之眾。誰都覺得不好過。手工業與商業，工業及農業低落到了最可憐的程度。農民，商人及手工業者受着雙重的壓迫：貧得無錢的政府以及商業的不振。貴族及王公則視錢如命，縱使他們已將其臣民吮入膏血，而為其收入計，亦不肯對其財富之增益罷手」（馬恩全集第十五卷第六頁）。

一切歐國喚醒人民民族覺悟的熱心有識之士，慘遭屠殺。甚至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的非希特，普魯士英雄而遭捕。關於民族統一的亦談不到。在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祇不過是三百多個封建王國所湊合起的一堆散漫的集合體。拿破崙擊敗普軍就是利用得德軍的幫助，後者將所謂「萊茵同盟」（一八〇九年）宰殺了拿破崙。

在西（西班牙）俄（俄羅斯）兩國，人民對侵略者的抵抗表現了激烈的性質。但在普魯士却不如如此，因為它沒有廣大民衆的愛國的高潮。即就一八一三年最高漲的一瞬息而言，普魯士的人民運動亦不足為道。志願兵人數甚少，他們沒有吸收了廣大的民衆。

普魯士在拿破崙征德之際，擁護非特烈。威廉第三稱帝，然後者的政策却建築在這背信義和陰謀權變之上。恩格斯寫道，這個國王「是最蠢的人們當中的一個，他在當時不過為寶殿上的一個裝飾品而已」（馬恩全集第十五卷第十二頁）。

在一八〇五年，普王及皇后二人與被邀至普的俄皇亞歷山大第一，共同在非特烈靈位之上宣誓效忠邦交，同仇共濟。但奧斯特里茨一役（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俄軍喪失二萬餘名之後，普王則出賣了俄國。他竭力為拿破崙效勞。

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拿破崙大破普軍於耶納及奧爾什特。十三日之後，法軍已直搗柏林。刻薄的「非特烈精神」已證明其無用。耶拿一役失敗後的第二天，普王即以一封五個投地媚態自出的信件呈交拿破崙，其中說：「僕早想將吾人不知之舉置之度外，登我兩國之親善，必須維持實無疑也。陛下已嚴懲不才，而今而後，將盡其所能以再建我兩國之永久統一，而陛下以大跨之勢也」（摘自佛蘭茨、梅林格所著「軍事及軍事藝術史綱」第二七〇頁，一九三八年版本）。

耶納的敗仗，又再次證明了民族抵抗精神之不存在。一八〇六年之後，普魯士軍隊禁止超過四萬人。在德意志的某些國家，則因起初受了西班牙人民以及後來俄國人民反抗的影響，於是產生了若干游擊隊（哈佛爾，符里留特魯夫等），但這是若干各自為陣，小的部隊的鬥爭，廣大的民衆都沒有響應。

普軍中見識最為遠大的組織家們已看清，不曉得人民，而且不為這目的的組織人民，廣大民衆的抗敵是不會想象的。但為達此目的，却須實行改革

。在普魯士，某些政治家（如斯泰因及其他等人）都力主國王宣佈封禁廢除權的廢止，雖然農民在備款贖身問題未決定以前，尚須納納封地贖費。在一八一一年政府公佈，農民須取得地主同意才能贖回土地，但須留給地主所贖土地之半。

同時在軍事方面亦開始改革。在一八一一年八月，格涅維塞納提出了他的民兵組織計劃，按這一計劃，實質上就是愛國鬥爭的組織計劃。

但是普魯士對拿破崙的卑躬屈膝的奴才政策還未停止。一八一二年，當拿破崙進德而開始他征伐的戰爭之時，德意志王亦倉卒地來叩見。一八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普魯士王與拿破崙簽訂反俄同盟。為交換計，普魯士將波羅的海沿岸諸國割於普魯士。

然而一八一二年俄國人民的發起及勝利，改變了德意志的形勢。德國愛國志士在俄國人民勝利的影響之下，復興起了他們的活動。他們證明俄國的勝利帶給了德意志解放。

但顯然地，拿破崙在俄國失敗後，普魯士國王亦提心吊膽地公開反對法人了。

當俄軍追擊拿破崙而跨入德國邊境之際，普王亦「胆大」起來了。愛國志士加入運動。在他們的壓力下，普王於一八一三年三月十七日對法宣戰。俄羅斯人民大破拿破崙匪軍，在展開德意志人民愛國運動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由莫斯科退却時拿破崙大軍的覆滅——恩格斯寫着——是西方反對法蘭西稱霸暴動的信號」（馬恩全集第十六卷第二部分第二十頁）。

德意志的愛國者們企圖組織俄國人民那龐大規模的抵抗。但因為普王害怕人民，低着人民，所以沙爾費爾斯特及斯泰因就將普國理應負責組織建立後備兵的條文，加在普俄條約中（一八一三年三月十七日訂）除這一措施而外，當時又有民兵的組織，按組織者們的計劃，民兵必須在法軍後方發動起義，殺死敵人的人力並消滅他的物質部分。為提高人民精神，主張利用僱傭傳道，喚醒人民執法，號召人民反抗，「使人民記起馬加維耶夫時代的猶太人，並鼓動他們效法馬氏的榜樣」。

格涅維塞納的計劃，甚至提議民兵不穿特別的軍服。最低限度，主張紙製軍帽，無白領間的皮帶或腰帶。但計劃着重指出：「在發現優秀敵軍之際，即及處必須殺死，民兵亦須被視為國內普魯士的居民」。這樣，這個領

情了西班牙和俄羅斯經驗的計劃，就在議事日程中提出游擊鬥爭了。

普王在輿論壓迫下被迫於一八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對民兵的會令執行了。

但這一點的希望，在德意志的人民戰爭史上祇是曇花一現而已，普王對自己的事變而生畏了。昂格斯說得妙：

「普王被他親手做的事駭倒了。除國王命令而外，讓人民進行鬥爭是完全不合普魯士精神的。所以後備隊在國王醫製之時，就先已暫行擱置，但國王從未提出此種要求」（昂格斯「戰爭札記」第二七八頁，國家政治出版局一九四一年版本）。

國王反對人民參加戰爭。他怕德意志人民一旦起來，將直接變為他王朝本身存在的一大威脅。

俄國人民挽救了德意志。他在一八〇七年後挽救了它。拿破崙率領德軍，佔領了首都及一切大都市，強迫德人交出軍險參加劫奪戰爭，瓜分了德意志，與一部分德意志國家締結了反對其它國家的同盟。

格涅維塞納在一八一四年稱：「如無俄羅斯民族鑲鑽的精神，如無其抵抗異族壓迫之報仇雪恨……將見文明世界已沉淪矣，已陷於暴戾恣睢暴君專制之鐵蹄下矣。」

普魯士本身的解放，歸功於俄羅斯人民一八一二年神聖的鬥爭以及俄羅斯人民於一八一三年所予德意志的援助。

（三）蘇聯人民愛國戰爭時代的游擊戰爭

甲、蘇聯游擊隊與過渡時期的不同

一百三十年歷史的歷史車輪把我們與一八一三年的愛國戰爭分界了。這一個時期之中，我們國內在技術，經濟，整個社會生活以及人民生活方面發生了驚人的根本的變化。

在蘇維埃條件之下，人民——這個是工人、農民以及知識份子緊密的不可分割的聯合，這是些沒有剝削者和剝削階級的人民。蘇聯人民在蘇維埃民主的基礎上自行決定自己的命運，自行管理自己的國家及經濟。

在列寧——斯大林黨及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之下，蘇維埃人民在一九

八年——一九二〇年真正的人民戰爭中克服了飢寒、經濟破壞及疫病，保衛了自己的自由與國家的獨立而不自為明徒及武裝干涉者的蹂躪。

盡人皆知，外國軍事專家都預言蘇維埃國家失敗和崩潰。這些專家們尤其根據下面一種理論：「紅軍由於俄國軍事工業之落後，深感軍火之不足與惡劣，但由外國取得這種軍火是不可能的，因為俄國已被四面八方地封鎖了起來，但正因為封鎖，干涉國及白黨的軍隊却供不應求而且將有一等的武裝，彈藥及被服供應。」（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第二三三頁）。

但蘇維埃國家終於取得勝利。蘇維埃人民在國內戰爭中的這種勝利，是由於人民從蘇維埃政權身上看到保證他一切身利益的一種力量，為他祖國的自由和獨立進行正義戰的一種力量。白黨「政府」的目的及思想是違反人民利益的；白黨的軍隊，是由仇視人民的軍官及下流軍人領導的，他們企圖命令俄國勞動人民，靠他「寄生」玩弄非俄籍的各色小民族，鎮壓勞動人民革命的意志，企圖把勞動人民手裏的十月革命的果實奪去。

因此蘇維埃人民的國內戰爭就在人民的背後展開為一個人民的戰爭。在蘇軍暫時佔領的蘇維埃區域中的這些地區，生長發展為勞動人民領袖他們整個收穫及其成就的一個最重大的組成部分。蘇維埃人民的這種勝利取得了他人民鬥爭史上過人的精華（經驗），同時又表現出自己做了國家的主人翁。蘇維埃人民定遠的有作為。蘇維埃運動在抵抗外國武裝干涉者及其白黨走狗的鬥爭中開始，他開始成爲在黨領導下保衛蘇維埃國家的榮光，自由與獨立的民族自身的先鋒先覺。

民族這些自願的先鋒先覺，予蘇維埃國家基本的武裝力量——紅軍——很大的幫助，從而同心協力幫助人民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的國內戰爭中戰勝白黨及武裝干涉者。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指出，紅軍勝利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在日黨軍隊的後方，在考爾查克，古尼金，克拉斯諾夫，佛蘭哥爾的後方，卓達的兩爾塞維克黨員和菲羅索維奇進行了秘密的活動，他們發動工人和農民參加反對武裝干涉者以及反對白黨的起義，破壞了蘇維埃政權敵人的後方，從而使紅軍的挺進獲得便利。蘇聯獲得，烏克蘭，西伯利亞，遠東，烏拉爾，白俄羅斯以及伏爾加河沿岸的游擊隊破壞了白黨及武裝干涉者的後方，對紅軍有難以估量的功績。」（俄文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第二三五頁）。

蘇聯的實力在什麼地方呢？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通常都完全很正確地指

出了蘇維埃人民高度的愛國思想。這是對的。但此外還應着重指出，蘇維埃的愛國主義並非盲目的守土主義。蘇維埃的愛國主義體現到人民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精忠愛國，對其祖國成就的驕傲，以及與祖國血肉至親中；在這個祖國，人對人的剝削消滅了，公民的德育教育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頂點了。

現今蘇維埃公民與一八二二年沙俄公民的顯著的不同，尤其是在這點上。L. M. 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描寫他小說中的一個主角——尼古拉·洛斯基夫——說：

「如果有人問他，他對今天俄國的情形感覺怎樣，他一定會說他什麼事情都沒有去想過，什麼叫他庫圖佐夫和其他等人，他聽說現在各處招兵，並且說一定還要打很久的仗，照現在的情形看他們簡單地以為還得再過兩年才能招到一團的兵。」（L. M.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第四卷第十六——九二二年版本）。

當然，除尼古拉·洛斯基夫而外，在「戰爭與和平」中還可看到那些進步的人物如同情斯捷潘諾夫且幫助他提出他改革計劃的安德烈，彼爾考斯基。但在當年這就足以會上大多數不承認的一些極其聰明的人。在中等貴族階級子弟當中，當時洛斯基夫這種人是普通的一類人。

蘇維埃國家才真正是真正人民的國家，它從開國的第一天起就以她巨大的民族爲自己的任務，她包圍培養蘇維埃社會覺悟的建設者。所以蘇維埃國家在國內戰爭時期就能發動起人民勞動大眾保衛自己的果實，抵抗武裝干涉者的敵人。列寧曾說：

「照我的看法，國家要有覺悟的群眾才能強盛。它祇是當衆衆知道一切，每個人都自覺地進行一切的時候，才是強盛的。」

蘇維埃國家能保衛到國內戰爭前線上一線，也激起人民參加勞動陣線的志願，爲他驚人的收穫及成就而犧牲。蘇維埃人民復興了他本國經濟與文化，建立了新的工廠和製造廠，建立了新興的都市和鄉村，抽去了沼澤的積水，開闢了灌溉的河渠並把它與海灣通，利用水電成立水電站，開發北極，發展民族文化等等。

蘇維埃人民以自願領悟其國家社會制度不同性別，種族及民族的不同而一律提高人類的尊嚴而自誇。蘇維埃人們說當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人是一切現存資本中最寶貴的一種資本。

蘇維埃國家能把無數種族不同，質素各異的民族團結一致，在過去最落

後的人民中起起的高潮，駁斥了法西斯蒂關於「無歷史的民族」以及「下等種族」的理論。蘇維埃國家把過去最受踐踏和被人看不起的民族都抬高到歷史舞台上，把他們變為平等自由生活幸福的人民。

「國民及奴隸——斯大林同志寫著——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地提高到真正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以自己的創例瀰染了全世界的一切被壓迫民族」（列寧主義問題第一七八頁）。

在人類歷史上，人民和國家的利益被天荒的魚水相合起來，並且人民因為有自己的國家援助，得到了他依照自己的心意去改變生活的可能性。

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的羣衆的覺悟，以及他們保衛正義事業的覺悟，實人們所謂蘇維埃軍事潛在力的最重大的因素。

乙、蘇聯游擊隊——祖國的復仇者

希特勒對蘇維埃國家的許政現又喚醒蘇維埃人民保衛他的果實了。希特勒願意及殺人犯要實現他帝國主義者，即這些「所有世界上帝國主義者中最高貴最掠奪的帝國主義者」的政策。

希特勒不隱諱地說，戰爭就是搶奪，異族領土的佔領，其目的就是剝削民族的奴役及滅絕。

但除這一切以外，希特勒還利用「和引」及「和引」來，也想用「人民」的辭句來掩飾他的政策。他們約着這個目的展開了對社會的閃惑，這不啻首惡衆的勾當可說是對民衆玩弄到極點了。希特勒說：「德國人民，即各帝國主義者所壓迫所蹂躪的人民，他們底一切不幸，似乎都是因為其他民族想壓迫德國。希特勒說：『國家社會主義者』。他底「民族主義」虛偽地掩蓋着帝國主義的實質。事實上，他們底「民族主義」，是貪婪吸吮人如仇的種族主義的化身，它的作用就是要證實德帝國主義者野心奴役世界各國人民的「合法性」。爲達成此項目的起見，希特勒之流把日耳曼種族尊爲「高等的種族」，而他們想奴役的其他種族，則宣佈他爲「下等種族」。特別的是，「非雅利安族」的匈牙利人及芬蘭人，根據希特勒的「種族論」也認爲是「下等種族」。但由於希特勒份子想拉攏匈牙利人及芬蘭人參加反蘇戰爭，所以才又「赦免」他們。

希特勒黨羽爲何誘惑衆，不得不拿「社會主義」投機，因爲公開號召擁護德國皇帝主義，是不能把衆衆拉到自己方面去的。所以希特勒黨羽就把「社會主義的」假面具戴到德帝國主義野心的面孔上。

爲製造出他們的「思想」，希特勒份子就手抽去過去的反動學說，用翻竊的手段使他們與德帝國主義現今的需要相適合。在最有名的反動學說之中，希特勒主義所要抄襲的可憐的思想，我們指出其最顯著的「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以「人民的精神共鳴」口號，虛構出所謂「歷史學派」。『歷史學派』學說的政治面目，在於以「歷史」爲名實地對人民的誣視。一切弊病的合法性。馬克思說這個學派曾說過，這是一面「以昨日的卑劣以證實今日之卑劣爲合法的學派，宣佈一切反抗及進步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倘這種皮鞭——斯大林加於過去歷史上的學生——的皮鞭」（馬恩全集第一卷第三八七頁）。

格外公然地在德國宣揚說視人民的與盟的「超人」說，就這種學說而言，人民不過是保證「天授之民」的「超人」的權力意志的手段罷了。希特勒主義的思想家，竭力以這種學說爲其反動的目的。將這種學說與種族論結合一起就可對他們非有利益而宣揚帝國主義者——不僅奴役他國人民，而且奴役其他各國人民——以爲政策的合法性。

由希特勒主義反對人民的本質，產生了野蠻的「超人」說。因此，希特勒匪徒對各被佔領省的和平居民，俘虜以及婦女老幼志士的對待。尤以對海峽羣島爲然，希特勒匪徒採用着德意志軍官部所去戰爭中所犯得加倍橫蠻的形式。早在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時期，德國的當政者們就對法國保衛其祖國的民衆表現了他的「超人」手段。『對游擊隊時懲罰——柏林：Berliner Zeitung。報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凡爾賽訊——是很簡單的……大家一個緊接一個地排成一隊用子彈向頭上射擊。對於軍隊則嚴令禁止執爲俘虜，一旦發現則軍法從事，絕不寬貸』（見恩格斯「戰爭札記」第一七五頁，一九四一年國家政治出版局版本）。

普魯士軍人違背人民的傳統及暴行，由希特勒匪徒以空前未聞的淫虐狂的壓迫政策對法西所佔領國中的愛國份子繼續着。在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託夫的照會中，引證着希特勒殺人犯在其所佔領的蘇維埃區域中所犯的驚駭動人的暴行的罪跡。

暫時被淪陷區域中的蘇維埃公民，就是如何殺戮他們的親族，手無寸鐵的人們——老人妻子與兒童——，如何污辱他們的妻女、姊妹與母親，如何擄奪他們的房屋，如何蹂躪他祖國的土地以及民族分層的證人。

敵後的暴行招致衆民衆激烈的反抗。

蘇維埃人民在敵後隨時在準備防禦與偵察軍事鬥爭。在這裡，「防禦」的認識不僅是個人防禦的意義。他們在保衛自己的國家和本國的人民之際，同時也就保衛了自己。

「與法西斯德國的戰爭——斯大林同志說——不可認為普通的戰爭。它不僅是兩個軍隊之間的戰爭。它同時也是全體蘇維埃人民抵抗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戰爭」。

每一游擊隊都覺悟自己與全國人民及其利益聯繫着，不僅是保衛自己，而且也保衛人民。因此游擊隊也就是代表人民作戰。他們不僅防禦，而且也進攻，他們明白共同鬥爭的結局都山他們專業的勝利來決定。正因為如此，他們才不顧是外國報紙上有時所稱的「志願的射手」。就他們的勞動說，他們把自己的鬥爭與正規軍的鬥爭聯繫着，幫助它並貫徹着紅軍總部的命令。在為人民事業鬥爭的共同事業中，游擊隊乃紅軍士兵的同胞弟兄。

斯大林同志代表蘇維埃人民發言說有他全體的兒女們抵抗侵略者。

「在敵人佔領區——斯大林同志說——應建立游擊隊——騎兵及步兵——建立別動隊與敵軍部隊鬥爭，將游擊戰爭的烽火散佈到各處，破壞橋樑，道路，有線電報及電話，焚燒森林，地棧及卡車。在淪陷區對敵人及其一切幫兇造成不能忍受的條件，步步都追擊和消滅他們，粉碎他們的一切設施。」

游擊運動在愛國戰爭期間發展到驚人的規模。對自己祖國和人民洋溢着熱愛的蘇維埃人們，背棄棄井而為人民的自由，被人蹂躪的土地以及自己祖國的光榮奮鬥。他們為蘇維埃人民的共同正義事業而奮鬥。所以他們到處都得到感激招待。人民幫助他們，庇護他們，治療受傷的游擊隊員。在敵後，蘇維埃愛國份子所建立的無數醫院，已救活了成千成萬的游擊隊員的生命。蘇維埃游擊隊員們的生活是嚴肅的。環境對他們的要求是很高的。但大勇，不屈犧牲，堅定，以及對同志及人民的援助——這些就是知道為什麼而戰，且知道保衛什麼的人們所具有的美德。對他們要求旺盛的精神士氣，磨練工夫，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克服一切飢寒貧困而抵抗他們步步所遭遇到危險。

游擊隊員們知道敵人對他們的恐怖是殘酷的。希特勒在準備作戰之際，就知道他們一定舉動到民衆的反抗。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關於「游擊治罪法」(Kriegsverbrecher)的特別決議中，就以死刑威脅每一個游擊隊員。

希特勒匪徒在蘇德戰場上頒佈了「凡同情蘇維埃與備有秘密證據之人……斬首及槍決」的命令(見第四七法西新報)蘇聯軍團長列寧斯將軍的命令)。

法西斯說謊專家公然企圖把與人民似乎有關係的「單獨的游擊者」認為游擊隊。但事實是一活生生的證明，鬥爭的全部過程都說明游擊隊與人民不能分割的聯繫。

保衛人民，保衛祖國的游擊隊員知道他們的生命與蘇維埃祖國密切聯繫着。他們隨時準備把他們一切的力量，如果必要的話，連他們底生命一齊貢獻出來為蘇維埃祖國鬥爭。

我們蘇維埃人民就是以游擊隊員高尚的勇敢，剛毅精神為骨幹來訓練他們的勇敢堅定精神的。看了這些輝煌的剛毅果敢的楷模而鼓舞起來的成千的新的志願的戰士們，都甘願匯合到游擊運動的大流中，使它日益匯合為一支強大的勢力，晝夜不給敵人片刻的安心。游擊隊員所到之地，希特勒匪徒就感到自己是陷於重圍了。

游擊隊建立了自己的軍火庫和兵工廠。游擊隊最普遍的是用戰鬥中繳獲到的敵人的武器武裝自己。利用奪來的自動步槍及機關槍及敵人。他們使敵人遭受了很大的損失。他們破壞或焚燬敵人的倉庫，兵工廠，儲油站，橋樑，切斷電線，消滅卡車，使鐵路出軌，使裝腔作勢的敵人處於四面楚歌之境。在愛國戰爭的九個月之中，單列寧格勒游擊隊就消滅德軍官兵一萬七千人，飛機八九架，坦克九八輛，火車出軌一百二十四次，擄獲一百二十五個地棧，三百八十八個鐵道橋樑和公路橋樑(真理報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深入國內的敵人不得不分散他底兵力；他不能在重要的鐵路幹線附近建立抵抗中心。在許多區域，游擊隊在敵後公道地說：「這是在我們游擊隊的區域」。

加里寧寫道：「有時德軍寫着他們對游擊隊獲得『輝煌的勝利』，他們說他們佔領了他們後方游擊隊活動範圍內的十個到十五個人烟稠密據點。但他們却閉口不談經過一個時候，游擊隊予德國警備隊以新的打擊，又把他們打出人煙稠密的據點了」(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消息報)。

在游擊隊中，人民的機智與軍事的詭詐結合着。游擊隊有時故意在路邊拋些鴉子或豬仔以引誘希特勒匪徒來擄取它。這樣敵軍汽車夫和自動車駛

且敢於採取最果斷的時機，達到捕獲他們的自的。

自己對人民的忠誠，滋生着游擊隊的決心和英雄主義。這個也就解決了紀律問題。自願地擔任鬥爭任務的游擊隊員希望他們的紀律同紅軍的紀律一樣。所以他們的宣誓常常是徹底的紅軍士兵的宣誓。

「我，紅色游擊隊員——在一個宣誓中說——向我底戰友們宣佈游擊的誓約，我一定英勇，守紀律並無情對敵。我誓將永不退縮我的隊伍，我的指揮官，政治委員以及游擊隊同志，永遠保守游擊隊秘密，縱然需要我犧牲。我一定畢生忠於自己的祖國，我的領袖與導師斯大林同志。我如違反這個誓約的游擊隊員，甘願受最嚴厲的游擊隊的制裁。」（「紅色海軍」一九四二年九月二日）。

蘇維埃游擊隊對祖國的無上尊愛，對侵犯人民與國家自由和獨立的外國侵略者的仇恨，是與一八一二年的游擊隊有血的關係的。

「血與的法西斯精神消沉我們底精神與我們的意志。但他們忘記是與從來不肯屈膝而且將來也一定不肯屈膝的俄國人民作戰」——列寧格勒游擊隊領袖游擊隊及集體農民的新大林同志寫着。

丙、蘇聯游擊隊組織的特點
蘇維埃游擊隊具有他自一八二二年及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各個歷史階段所產生的特性的。

第一件更指出的，這就是蘇維埃游擊隊與過去各時代游擊隊在社會上的社會地位的不同。蘇維埃游擊隊員——這是蘇維埃平等的公民，自己國家及自己經濟的主人。至一八一二年的游擊隊員，則大多為封建農民及人身隸屬於貴族及地主的人們。

在過去，在這種國家如俄國，參加游擊鬥爭的主要的人物是農民。現在，進行鬥爭的則為蘇維埃的工人，農民以及由工農出身的知識份子。

在一八一二年的愛國戰爭中，尖銳地表現出社會——其中連貴族知識份子也在內——與其他各級的階級。

在蘇維埃人民的愛國戰爭中，知識份子有很大的作用，他們可不必像一八二二年專心去應付人民。他出身於人民，與工農攜手奮鬥，增多這種鬥爭的思想認識的益處。參加游擊隊的，還有教員，醫生，農學家，黨政機關及職工會等的工作人員。游擊隊底大部分人，都是在人民當中有信譽的社會工作人員。

第二，現代游擊運動與過去的不同，還在它有一切種類的現代武器及軍事技術。現代一切的作戰武器，其中連通訊聯絡工具在內（如無線電，電話，空軍通訊等等），游擊隊也都使用。現代的農民游擊隊員，已和過去單拿些棍子，斧頭和棍棒的農民游擊隊不同。這往往都是技術最好的集體農民——打禾機駕駛員，拖拉機駕駛員。來自工人手中的機器，他們都會拿來與敵鬥爭。他同時學會掌握現代的武器：他們是自動槍手，擊斃砲手和機關槍手等等。

蘇維埃游擊隊不獨用武器作戰，他們是政治的戰士，他們會宣傳鼓動，堅定人民信仰及勇氣。他發動無窮新的戰士保衛蘇維埃祖國。

在暫時被佔領的蘇維埃領土上，凡是游擊隊保持之地，都重新建立了蘇維埃的民主，恢復了蘇維埃的秩序，並使蘇維埃的法令等等重新恢復，發生效力。

「凡奪回來的區域——一掃而空說——一切政權都操在游擊隊手中。到處恢復了蘇維埃政權：各地的區委，區執行委員會以及蘇維埃都照常工作。人民對這些措施報以很高的愛國熱忱。人民不斷以很多禮品慰勞游擊隊。在居民中已收到國防基金並已交出十萬盧布的現金。昨天，本區的報紙第一期已出版了。各游擊隊都努力工作。在一切居民區成立了人民自衛隊」（莫斯科報一九四二年三月三日）。

游擊隊在最後所組織的蘇維埃法庭，首先是裁判叛徒及蘇奸——希特勒走狗，懲罰蘇維埃人民及其國家的一切敵人。

游擊隊的制裁——這就是保衛自身自由的人民的制裁。在一個判決書中說：

「游擊隊法庭代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判決前地拉機駕駛員，即現今將蘇軍通緝的讀長出賣與德軍的蘇奸希特勒希諾夫，尼古拉以及前犯盜馬，竊盜而今在鎮公所書記處內為貪圖一錢麵粉將其產黨員，蘇維埃積極份子之全家交與德軍的費道爾，克列烏蘇夫二人死刑，當即槍斃。」

主席法官 P.
法庭書記 L.

（莫斯科報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
在另一游擊隊的革命法庭紀錄中寫着：
「聽了：游擊隊長「阻父」關於前任警長 V. M. 庫爾什金對 P 村居民

嘲弄的報告。「祖父」報告說庫什金已變為德軍的傭僕，追捕游擊隊員及其家屬，參加槍斃蘇維埃主席伊同志的事件。

決鬥主文；V. N. 庫里什金，P. 村尼民，現任警長，為蘇維埃政權卑劣之賣國賊及法西斯傭僕，決判槍斃。由A. N. 兩同志押出刑場執行」（真理報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

游擊隊保衛着與守護着社會主義的財產。游擊隊在破壞可資敵軍利用之一切時，同時清理田野，埋藏了可為人民應用的一切器具，五穀以及其它公共的財物。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列寧格勒省游擊隊的活動，他們不僅協助被佔領區集體農民埋藏了食糧，且冒最大危險以紅色卡車運糧至列寧格勒。

在掃清各地的希特勒匪軍之後，游擊隊又由其隊伍中挑選出人來依照蘇維埃通常的原則組織了政權及經濟。在佔領期間，他們很詳細地研究了各區的需要，所以游擊隊幹部為復興工作中最為積極且最為能幹的份子。他們團結人民戰士，鼓勵與激發他們，幫助他們軍火供應品，援助傷病戰士的家屬，組織醫藥站等等。

以上所述一切，在在證明游擊隊為蘇維埃人民爭取蘇維埃祖國獨立與自由之鬥爭中最積極的組成部分。

希特勒一切都失算了：為實現「閃擊戰」計劃所必需的備用，坦克以及飛機等等的總數都失算了。他沒有估計到一件事，而且非常重要：人民抵抗的力量及滋長它的根源。

這些根源就在於蘇維埃的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實地粉碎着希特勒佔領軍的最大力量。

粉碎希特勒主義及建立正義和各民族之間的新關係的歷史使命，現在是落在與法西斯主義鬥爭的國家及人民肩上的。蘇維埃國家正是因為這種正義的戰爭才有以大不列顛和美國人民及其他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為首的盟友。一切愛好自由的人民日益深刻地認識今後十年的命運由蘇德戰場上決定，因為在這裡蘇維埃人民守護着與希特勒主義鬥爭的前鋒的崗位。蘇聯，大不列顛與美國的條約及協定，使他們大家欣然相信最後勝利將到來。聯合國「山口號」是在戰爭過程中產生且表現各民族與希特勒主義鬥爭中的團結的。必須在一九四二年開闢抵抗希特勒主義的第二戰場一事，倍加啓迪了各民族爭取解放的希望。而且它也更加鼓勵了最後的游擊鬥爭。斯大林同志說：

「被奴役人民反對德國法西斯強盜暴政的鬥爭，開始具有普遍的性質。在一切被佔領區之中，軍火工廠的怠工，德軍倉庫的爆炸，德軍梯隊的沒收以及德軍官兵的被殺已成爲普遍的現象。全南斯拉夫以及德軍所佔領的蘇維埃州區到處都爲游擊戰爭的烽火所瀰漫」。

游擊鬥爭在捷克斯拉夫也積極化。「海得里區的被刺以及游擊隊在山林中的活動——捷克斯拉夫軍「我們的新地」寫着——表現出了捷克斯拉夫人民的戰鬥精神」。游擊鬥爭在波蘭及挪威亦在發展中。

在各戰區對法西斯的打擊愈是頻繁，也愈是能夠喚起抵抗他們的被奴役的後方的人民！

（俄文「馬克思主義旗幟」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期合訂本）

于懷著

形勢比人還強

（渝卷二二八八號）

新華日報圖書課發行

清 末 的 立 憲

石 衡

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是一種激始激終的民主革命。所以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國內政治分野，顯然就只有兩大派：一為民主派，一為反民主派，不過在民主派中，繼承兩個傳統：——一為太平天國革命傳統；一為曾左李洋務改良傳統——發展為兩種運動：——一為國父中山先生所領導的推翻清廷的革命運動，一為康梁所領導的幻想依附清廷的立憲的改良運動，而終結為革命運動的勝利。

民主運動在形式上，便成為立憲運動，有憲法的國家，雖然不就是民主國家，但如德意志；但民主國家必然要有反映人民公意之憲法以為人民權益之保障。而且「立憲者當望之國民，不當望之君主」，當時「民報」已主張之。所以中國實質的民主運動，雖然鴉片戰爭以來就開始；而形式上的立憲運動，則只傳說始於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後，這時正是中國甲子紀年的甲辰年到乙巳年，也就是清光緒帝三十年到三十一年。

無論是實質的民主運動或形式的立憲運動，清廷——亦即反民主的統治者，當然都是反對的，當時反民主的中心勢力，是西太后及滿族王公親貴以至大小奴才臣工，光緒帝和一些立憲論者，雖然贊成立憲，但是其目的却在立憲來緩和革命運動，甚至破壞革命運動，試看梁啟超說：「數年前革命之說偏天下，自預備立憲之既既，乃如湯沃雪，」拿立憲來緩和，破壞革命運動之心，不是顯然若揭了嗎？所以反民主派之反對民主，反對立憲，是當然的；在民主、立憲運動初起，其勢尚不甚張的時候，必然要用高壓手段，對於民主派加以禁錮屠殺，但到了民主、立憲運動普遍展開，其勢不是羣衆

禁錮屠殺所能遏止的時候，它也可能把民主、立憲的旗幟給過去，帶在自己肩頭上，來一套騙局，假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一以緩和，破壞革命運動，一以加強自己的奴役統治，這是反民主的統治者今昔如一轍的。

中國在日俄戰爭以前，革命運動既未普遍，君主立憲之說，其勢亦不甚張，及日俄戰爭以後，日以立憲小國而勝，俄以專制大國而敗。於是價值向日之立憲論者振振有詞，即各方人士亦起而紛紛主張，如當時汪蘇名士視警作警德憲世凱，即他主張立憲，駐法公使孫寶琦亦在任內以立憲奏請政府，國內二三疆吏，亦相率建議立憲，中樞樞密及各部親貴，也知道立憲是無可反對的了，於是開始用「今茲未能，請遲之，且議一議」的辦法來拖延。其意若曰：「你們說立憲好嗎？好，我竟派人往立憲各國去考察一下了再說」，所以在一九〇五年六月，便有張勳、譚嗣同、徐世昌、端方、紹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論旨。（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陽門遇吳鴻之炸，結果，徐世昌、紹英退出，改派梁士詒、李盛鐸）。

自五大臣出洋考察後，清廷內外大吏，更時有奏請立憲的奏章上奏。到一九〇六年（即光緒三十二年）夏五大臣考察歸國，也相率呈請立憲，於是出御前會議決定，於本年（即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三日下詔預備仿行憲政，首先從改革官制入手，這一面仍是舊的辦法，一面且是準備立憲之破壞革命運動，并進一步排除漢人勢力。當五大臣出洋回國對峙時，極言立憲規模，宜效法日本，並論官制改革的必要，謂「循此不變，則唐之藩鎮，日本之藩閥，將復見於今日。」於是御前會議的結果，決定立憲備置官制的四大方針：一、十年或十年以後始施行立憲政治；二、大體效法日本；三、廢現

制之督撫，各省新設之督撫，其權限僅與日本府縣知事相當，財政軍事權，悉收回於中央政府；四、中央政府組織，略與日本現制相等。原來，自曾左，打平太平天國有功後，漢人亦漸有過大權者，尤其是在封疆大吏中，試看梁啟超說：「以今日論之，就緒第二政府之天津，坐鎮其間者，漢人耶？滿人耶？而北京政府諸人，不幾於皆為其傀儡耶？兩江兩湖兩廣之重鎮，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此暗指袁世凱劉坤一諸人）——乎心論之，謂今之政權在滿人掌握，而漢人不得與聞，決非忠於事實也。」惟其如此，所以假借立憲之名，改革官制，要假改革官制之名，剽奪督撫實權。這才是問題的中心，也是不易解決之難題，結果先議中央官制，把地方官制放在後面。

到本年（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日釐定官制的上諭發布了，其中具體辦法為：「軍機處為行政樞樞，雍正年間本由閣分設，取其接近內廷，每日入值，承旨辦事，較為迅速，和承至今，尙無流弊，自毋庸改革。內閣之軍機處一切規程照舊行，其各部尙書均着充參預政務大官，輪理值日，隨時召對，外務部、吏部、均着照舊，巡警為民政之一端，着改為民政部，戶部着改為度支部，以財政處併入。禮部着以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併入，學部仍舊，兵部着改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應行設立之海軍部及軍諮府未設以前，均暫歸陸軍部辦理，刑部着改為司法部，責任司法。大理寺着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工部着併入商部，改為農工商部，輪船、鐵路、電線、郵政，應設專司，着名為郵傳部，理藩院着改為理藩部，除外務部堂官缺照舊外，各部堂官，均設尙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都察院糾察行政缺失，仲理冤滯，着改為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二員，六科給事中着改為給事中，與御史各缺，均着加蓋。其餘增設者：資政院為博採羣言，審計院為核查經費，均着以次設立。其餘宗人府，內閣、翰林院、欽天監、鑾儀衛，內務府，太醫院，各依舊侍衛處，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倉場衙門，均毋庸更改。」

這種新官制發布後，立憲論者固大失所望，如當時上海時報社評說：「此次之改革，不過換一個名目，淘汰幾個無勢力之大老而已，絕無他影響。」日本朝日新聞也覺得奇怪，它說：「此等內閣組織，真各國所無有。」固然各國之官制，各有其歷史，清國政府內部，亦有外間不可想像之情形，然而此次新發表之官制，不免驚大而費小矣。」其最令人失望的，尤在新

授各官之分配：

- 一、軍機處 奕劻、世續、瞿鴻禨，
- 二、各部
 - ① 度支部尙書溥儀。
 - ② 禮部尙書溥良。
 - ③ 陸軍部尙書鐵良。
 - ④ 法部尙書魏光燾。
 - ⑤ 郵傳部尙書張蔭桓。
 - ⑥ 理藩部尙書壽春。
 - ⑦ 民政部尙書徐世昌。
 - ⑧ 農工商部尙書載振。
 - ⑨ 學部尙書榮慶。
 - ⑩ 吏部尙書鹿傳霖。

右新授十一個官中，只有四位漢人，此六部堂官分為滿漢平列，是滿三漢三，現在美其名曰不分滿漢人，實把漢人減得很少了，於是漢大臣皆大為不平。當時有一個叫譚鍾麟的說：「草皇（指順帝）初入關，朝廷大政事，皆范文通、洪文襄所定，後有漢人保登進之跡。辛丑回鑾，蓋欽內慚，始特詔漢行之法，閣部卿寺分缺，鴻漸，不相侵越。惟將軍都統專屬焉，而王公不視吏事，陽為尊之，陰為漢人保登進之跡。辛丑回鑾，蓋欽內慚，始特詔天下議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進，不深崇祖宗立憲本意，然覺滿洲人士以八旗區區一部分與我二十一行省漢人對掌邦政，其尊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勢。滿漢之界既泯，於是天演實習，豐沛故鄉，感觸而長都務，漢人之勢大張，乃不得一席地以自處。」這話可謂慨乎言之矣，但他不知道這就是滿清當時也贊成立憲的內幕。

中央官制，算是不屬不馬的來了這麼一套，但是地方官制中的督撫問題，是滿清政府的生死問題。他們雖然見到此處，但終不得一個痛快解決的辦法。到次年（即一九〇七年）五月才發佈了一個所謂外官制，將各省按察使改為提法使，增設巡警總長，裁撤分巡出守各道。又分設審判廳，易增地官辦理，命山東三省先行開辦，直隸江蘇亦擇地先為試辦，其餘各省分年分期開辦，統限十五年一律通行。但於督撫軍財大權，仍一無所動。後來他們想出兩種辦法：一面由陸軍部收攝各省督撫軍權，一面設一清運財政監理

官「吸取各督撫財權。更進一步將權勢最大的督撫調入中央，賜為尋常，陰實我抑。於是北洋四鎮改歸軍部節制的事宜，袁世凱、張之洞兩督撫，亦於一九〇七年（即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同時調入軍機。而地方官制也算有些改革了。

這都是在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三日下詔預備仿行憲政以後所幹的兩件大事！改革內官制與外官制。但還對於仿行憲政顯然是拖，而其仿行憲政的設施與陰謀也給大家看破了，尤其使立憲論者及當時立憲派人士大失所望。

不過就是在這的當中，既然構出了仿行憲政的假招牌，也多少給了立憲派人士一些較從前順利活動的餘地，於是他們對着清廷的拖行憲政，他們個個要求即刻實施憲政，而憲政運動，亦一時蓬動，一九〇七年（即光緒三十三年）前後，立憲派所組織之團體，有樂啟超蔣智由等之政聞社，有朱福詒、張壽、鄭孝胥、湯壽潛等之「預備立憲公會」，有一湖北之憲政籌備會，有「湖南之憲政公會」有「廣東之自治會」等。在一九〇八年（即光緒三十四年）六月，會山鄭孝胥領銜聯名向政府請願開國會；又以預備立憲公會名義，移書湖南憲政公會，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及豫、皖、直、魯、川、黔等省人士，約於是年（一九〇八年）七月，各派代表齊集北京，向都察院遞呈請願速開國會書，要求都察院代奏（據說當時八旗士民也有參加的）。清廷迫不得已，因於是年（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頒行一種九年預備定期（以前預備仿行憲政是無定期的，御前會議決定是十年或十年以後始施行立憲政治），這便是傳佈遐邇的所謂九年預備立憲。并將他們欽定的憲法大綱及議院法選舉法也在此時頒佈了。

這種憲法大綱純粹從日本憲法上抄來，關於君主大權比日本更無限制。試看它的條文：「一、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久尊嚴。一、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一、君上有欽定頒行法律及發交議院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議定而未經詔令批准者不能施行）一、君上有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一、君上有設官制職及黜陟百司之權。（議院不得干預）一、君上有統帥海陸軍及編定軍制之權。（調遣常備軍隊，制定常備兵額及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干預）一、君上有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及遣派使臣與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一、君上有宣告戒嚴之權。（宣戰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這便立憲派人士更大地失望。

就在這欽定憲法大綱頒佈後的兩月，亦即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陰曆十月，光緒帝和四太后先後駕崩，溥儀（即宣統）即位，載灃（宣統之父，光緒之弟）攝政，對於立憲的籌備，表面上似乎更積極一些，例如它於一九〇八年的十一月，即其駕崩後的一月，即定諭旨出軍機大臣之副摺制，這是仿照立憲國由國務總理副署共同負責的表示。到一九〇九年二月，即宣統元年二月，又特下一道諭旨宣示決行立憲的意思。一九〇九年十月各省諮議局一律成立了，十二月又頒佈自治章程及法院編治法。一九一〇年，即宣統二年九月，資政院也成立開院了，十月又派溥儀、載灃為籌備憲法大臣。而且在宣統元年二年之內，還有一個陝甘總督升允因為五奏阻立憲而開缺，甘肅布政使毛慶蕃因為玩誤憲政而革職的。這是有什麼道理呢？難道

要實行立憲政政於民嗎？不是，決不是。實由於西太后及光緒帝死後，朝局日非，滿漢矛盾益深，滿人地位更加危險，而他們的操縱時政力維殘局的手腕，又萬萬不及西太后，於是更企圖以一紙憲法遮蓋天下人耳目，假憲政的美名，來保住皇族的大權，他不僅是要假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而且是要假立憲之名，行皇族集權之實。他的皇族集權的計劃，第一着就是把持兵權。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另編禁衛軍，由攝政王親統，派載灃（載灃之弟）統帥（皇族）鎮良為專司訓練大臣」一九〇九年五月，「派載瀾王晉爵攝政公慶親王，薩鎮冰籌備海軍，一九〇九年五月「監國攝政王晉行代理大元帥並先行專設軍諮處（即今之參謀部），以毓朗管理，時又派載瀾管理。」一九一〇年八月，「命近畿陸軍均歸陸軍部管轄，裁撤近畿督練公所。」同年十一月，「改籌備海軍處為海軍部以載洵（亦載灃之弟）為海軍大臣。」一九一一年四月，「設立軍諮府，以載瀾統帥為軍諮大臣。」

這都是他把一切兵權收攬於皇族手中的事實。試看載灃、載洵、載瀾三兄弟，一個以攝政王代行大元帥親統禁衛軍，一個長海軍，一個長參謀總長一切軍務，皇族可算是已集權在握了，他們還以為是依照欽定憲法大綱「君上有統帥海陸軍及編定軍制之權」而行的，日本德國的君主也有如此大權，理直氣壯，一意孤行。殊不知憲政還沒有開始，而皇族集權倒更進一步了。清立憲的反動設施及其專制獨裁和皇族集權的陰謀在進步；立憲派的活動及其憑藉也在進步。不是在一九〇九年十月已設立了各省諮議局，一九一〇年九月又成立了全國性的資政院嗎？立憲派人士得了法定的集合機關，有所憑藉比以進更好活動。在一九〇九年的十一月（即江蘇省諮議局成立後

約一月)，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便以「外侮益劇，部伍失策，國勢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與舉，惟在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等語，通電各諮議局，不久便有蘇、浙、皖、贛、湘、鄂、閩、粵、豫、魯、直、晉、奉、黑、吉十六省的諮議局，各派代表三人集於上海，組織一個「國會請願同盟會」，約定須俟國會正式成立，始行解散。一九一〇年正月齊集北京，一面由孫洪伊領銜，以請願書託都察院代奏；一面歷訪各王公大臣，請求贊助，旋奉諭旨拒絕。這是宣統朝立憲派第一次請願。到一九一〇年四月，各省諮議局的代表，又聯合各省政團商會及海外僑商，推舉代表，組織「國會請願代表團」，孫洪伊等十人為職員，一面駐京辦理請願事務，一面派員向各處宣傳鼓吹。結果，同時以請願書託都察院代奏者共十起，旋復奉諭旨拒絕，這是宣統朝第二次的大請願。一九一〇年九月，中央資政院成立，代表請願團又向資政院上書，請提議設立責任內閣，即開國會，同時，上書攝政王，旋資政院議決上書，同時各省督撫也聯名電攝政王，主張內閣，國會，同時從速設立，於是自一九一〇年十月初，詔准籌備立憲期限縮短，於宣統五年召集國會。在國會未開以前，先將官制釐定，設立內閣。這是第三次的請願。這次因為有資政院和各督撫的幫助，算是得了一個縮短籌備期間儘先設立內閣的小結果，然而仍舊有人謀為第四次的大請願。雖經一度彈壓，制止了國會顛覆風潮，但資政院開院後，屢有督軍問軍機大臣的責任，軍機處公然以不負責任答之。於是自一九一〇年十一月起，資政院便具奏彈劾軍機大臣，說「責任不明，難資輔弼」，奉諭旨：「軍機大臣負責任與不負責任……朝廷自有權衡，非該院所應擅預，所請著毋庸議。」但到了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三月既還却也履行一九一〇年十月所許先設立內閣之諾言，頒布新內閣官制，設立新內閣。其新設各官之分配如左：

- 一、內閣總理大臣，以軍機大臣奕劻任之。
- 二、內閣協理大臣二員，以大學士那桐、徐世昌任之。
- 三、外務大臣，以外務部尚書梁敦彥任之。
- 四、民政大臣，以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任之。
- 五、度支大臣，以度支部尚書載灃任之。
- 六、學部大臣，以學部尚書唐景崇任之。
- 七、陸軍大臣，以陸軍部尚書蔭昌任之。
- 八、海軍大臣，以海軍部尚書載洵任之。

- 九、法部大臣，以法部尚書稽察任之。
- 十、農工商部大臣，以農工商部尚書溥儀任之。
- 十一、郵傳大臣，以郵傳部尚書宣統任之。
- 十二、理藩大臣，以理藩部尚書壽勳任之。

右十二個大臣之中，漢人也佔了四個，滿人佔了五個，而九個滿人中，皇族又佔了五個，因此，當時都呼之為「皇族內閣」。這是皇族集權的大暴行，同時，也說這未備立憲的「皇族內閣」。立憲派人更覺失望，因在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六月，又以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的名義，請都察院代奏，說：「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望另簡派員組織內閣。」奉旨斥以「翻砂百司，係君上大權，請員不得妄行干涉」（欽定憲法大綱如此規定）。這樣，立憲派人已走到窮途末路，清廷也走投無路了。

由宣統十年或十年以後擬定的預備立憲，到光緒的九年預備立憲，由定期的九年預備立憲，到縮短於立統五年召集國會，由官制到收撥兵權，由召開國會到先設立內閣，清廷總之「拖」一拖，「拖」一拖，立憲派人總之「要求」「罷職」，而革命派人却也在這「拖」一拖，「拖」一拖，革命的勢力便越在那裡長得「大」一「大」一點，從一九〇六年（丙午）到一九〇八年（戊申）有下列的歷史事件：一、命身變：一、丙午、蘇州之役；二、丁未潮州、黃岡之役；三、丁未惠州之役；四、丁未安慶之役；五、丁未欽廉防城之役；六、丁未鎮南關之役；七、戊午河口之役；八、武昌起義，計有左列諸役：一、戊申十月二十六日黃埔起義；二、庚戌正月初，廣州新軍變亂；三、庚戌二月汪精衛、黃復生等起義；四、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役。

以上各種革命變亂，可名之為武昌起義之「革命」，當要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役為全國的義舉，但把革命的意義引於此導火線者，則為辛亥秋間爆發的爭路風潮，爭路風潮起於粵省，起於精誠道國有把持款撥為私有，把權利撥給外人，實則對於國有政策與各省（川、粵、湘、鄂）商人的權利發生直接衝突。清末的偽立憲，本來是革命派所無端反對，稍有政治識識者都不相信的。改革官制，收撥兵權，顯與立憲不相干，至「皇族內閣」出現，不但革命黨人刻刻舉槍待發，全國人民心理都已傾向革命，立憲派亦已山窮水盡到絕望，由絕望走到革命投機，在爭路風潮之下，一般商民又憤憤無可伸雪，於是具等到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公曆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的砲聲一響，要親覺羅氏相傳二百六十八年的寶座，就此顛覆。等到辛亥九月九日，載灃再下諭，取消皇族內閣章程（下按六一九頁）。

「新奇」的「理解」

定思

近來我們很看到了一些「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真理是法不拍批評而是歡迎批評的，只要這批評是有根據的，確是追求真理的。這樣的條件起碼要有兩個。第一、要根據事實講話；第二、要對所批評的東西有平正的了解——不歪曲，不胡亂解釋，如望文生義，或隨意亂說一陣等，如果連這一點條件都沒有，那就說不上批評。但就是這種說不上批評的批評，真理不歡迎，却也不怕，因為它難於闡發真理無所補益，而它的效用，也只能暴露批評者自己的無知妄誕，決不會損害到真理的毫末。

在許多這種「批評」文章中，我「居然」在「望之儼然」的刊物上讀到一篇批評共產主義的文章，其幼稚荒誕達到使人發笑的程度，而作者自己又竟以什麼新理解為題。據說，他是有見於目前青年對這問題仍覺模糊，弄不明白清楚，所以「來一番新的探討與新的理解。」可惜他的探討與理解未免太新奇了一點，青年人看了恐怕是愈看愈疑，愈看愈弄不清楚。

且來看看這位作者對於共產主義的理解是怎麼的新法吧。據說，共產主義是「只顧分配而不顧生產」的，「所以如馬克思等的極端手段，每致因求分配而弄到破產」。據說，共產主義者自認為獨步的是分配問題。據說，共產主義者所理想「在那種因人類分工的原則而形成的奴役制度消滅以後，勞心與勞力之間的差別也就隨之消滅」，是「把勞心與勞力等智力的等差與分工，作平頭的假平等看」，弄得「在工作之時，沒有了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分」。據說，共產主義者所理想的「國家完全死亡」就是「無政府狀態」。據說，「中國的家庭，可以說是一個高度共產的典範」。據說，「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始終是『各取所需』與『各取所值』這兩種分配原則，同時並行的。要把這兩個原則分別在兩個社會發展階段去執行是違反了歷史的進化法則。而且『所謂』各取『各取』，究竟向何處去取呢？」「從社會的立

場來看，實在是「各與」而不是「各取」；「各與」才是「社會精神」，「各取」就充滿了「個人色彩」。故分配原則不應是「各取所值」，也不應是「各取所需」，而應是「各與所值」和「各與所需」同時並行，「總體之則為『各與所分』」。

如此這般，就是作者對共產主義的「新奇」理解。

反對或不信唯物主義的人，他的探討問題與理解問題，和我們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是要根據「與件」來說話（這所謂與件，或者是存在着的條件，或者是人家所寫下而為寫者自己規定了一定的含義，給與了一定的條件的條件），來推論，他們則憑着他們自己的腦子在假文章——好一點的把舊有的詞或概念在腦子裡任意排比，排出新多新「帶子」，翻奇出新，翻出新多新花樣，這樣就可以在腦子裡「探討」出自己的「新理解」來。壞一點的更莫須有地憑着腦子去「想當然」一番，想得胡天胡地，漫無邊際，得出許多多多光怪陸離的「新」判斷，而他自己還說是在「科學地判斷」呢！例如我們現在所提到的這位作者，說共產主義只顧分配不顧生產，到底是根據了什麼來說的呢？說勞心與勞力之間的差別消滅，工作之時就沒有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分，到底是根據了什麼來說的呢？說國家完全死亡就是無政府狀態，到底是根據了什麼來說的呢？說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始終是「各取所需」與「各取所值」這兩種分配原則，同時並行，說中國的家庭是高度共產的典範，說「各與」才是社會精神，「各取」乃是個人色彩，等等，到底又根據了什麼來說的呢？根據是完全可以真領有，只須「想當然」一下就行，只須作者自己以為為之就行。

尤其「新」得要使人吃驚的說法是說：「如果把這『不做工不准吃飯』的原則，澈底的嚴格地執行，那麼餓死的不僅是不勞而獲的地主資本家，而

老弱殘廢疾病等不能工作者，也完全要餓死了」說：「要一切財富都流似地湧出，湧出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能科學地來判斷，將來必有這「社會」，說「各種財富的湧出，絕不能平頭的發展，……在湧出最少的那種財富，必然不能普遍地各取所需……必然有些人得消，有些人得不消。誰能說得誰不應得……便照社會來分配……那便不是各取所需，也未必是各取所值，而可名之為各取所分」等等，更且憑着自己的腦子在隨便亂說一頓，絲毫不去理會人家所說的各取所消到底是怎樣的一番道理，也毫不理會一下那時的社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社會。

這樣的探討方法，理解方法，倒恰恰可以給我一個很好的實例，來說明非唯物主義的思想和推理是必然要離開事實幾千幾萬里，必然要弄到無稽是處。

試問共產主義是只顧分配不顧生產的嗎？我想，有一點現代常識的人，都能知道共產主義是以現代化生產力最高度的發展為先行條件的，不顧生產而談共產主義，不但是空談，簡直是瞎談。這樣一個簡明的道理，如果真心要去理解它，倒並不需要我怎樣的探討，只要在蘇聯的共產主義者在他「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上曾經做了些什麼的史實認真地讀一下就好了，只是他做過的新經濟政策和一二兩次的五年計劃認真地讀一下就好了。共產主義者是以廢除私有制度，消滅階級制度，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為其理想的，他對於社會財富的分配是很注意的。但他首先要注意到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與發展。試看蘇聯他們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和五年計劃時在提高生產力和發展生產事業上費了多大的精力，做了如何艱苦卓絕的鬥爭——他為了建立自己的重工業，曾忍受如何刻苦生活以積累資金，使自己的國家重工業化，電氣化，曾用過多少方法提高工人們的勞動熱忱，改進他的生產技術，從他當中培養出大批的管運生產的人材，他為了發展自己的農業，使之集體化，電氣化，曾動員了多少他們的優秀黨員到農村裡去，如何耐心地指導小生產的農民，如何堅韌地推行農業機器，會花了多大的力量去增加拖拉機的生產，如何推廣拖拉機的運用？為了使工業的發展能與互相配合得很好，為了改造城鄉在生產上的結合形式，他們又曾在貿易的整理上，市場問題的處理上，如何小心翼翼地，周密地運用了他們的政權，使一方面國家賴以獨立的重工業能得很快地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人民的生活又能同樣迅速

地不斷提高其水準；使一方面能充分運用了私人資本以幫助生產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生產中的社會主義成份又能在「誰勝誰」的決戰之中始終掌握住領導地位，而且一路繼續增高，終於徹底戰勝了資本主義成份？所有這一些，只要一個人願意讓開腦對事實張開，是並不難於看穿的；所有這一些，已使處於事實的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蘇聯生產事業的突飛猛進確係史無前例。乃那位作者卻偏不去看這些容易看穿的事實，偏要閉目冥思，到自已腦子裡去探討，而竟搜索出了那樣一個「新」的「理解」來，說共產主義原來是不顧生產的，真可說是「異想天開」！其實，打開天窗說亮話，作者所要求

的並不是什麼理解，而只是想會應到人的理解吧了。

勞心勞力的差別消滅，不等於智能等差的消滅，不等於工作時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分的消滅，也是明白易曉的事。在奴役制度（超經濟的剝削制度）安如磐石的社會裡，勞心勞力之間的差別是無可移易的規則，而勞心勞力之間的界限分明又正是維持這種奴役制度的必要條件。因此，勞心勞力之間的差別消滅，是阻礙奴役制度消滅而來的後果，同時又是保障奴役制度不再生產的條件。這個差別的消滅，是使每一個人都能手腦並用，心力與體力能得平衡發展，這是一個人常態的發展，也是一個人應有的權利。至於這個人和那個人之間的智能差異，那正如他們之間的體重差異或身高差異一樣，無法消除，也無須予消除的。同樣，工作時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分，是由於彼此之間生有先後，能力有差異，這和每個人都能手腦並用，心力體力平衡發展毫不衝突。這些，不是和方不同於圓那樣明白易曉嗎？然而，勞心勞力的差別消滅這句話，會使希特勒之徒生氣，甚至氣花了眼，連方不同於圓那樣明白易曉的事也看不清，而把方的和圓的看成同樣。這原因為「工之乎恆為工，士之乎恆為士」對他們是萬世不變的歷史法則，能夠勞心的始終只是少數的優秀人物，如周公，孔明之流，其餘大多數羣眾，就都只能勞力，都是一些阿斗。他們在人類學上分成優秀民族和劣等民族而萬世不變，他們的優生學又最重視一個人的族譜世系——門第問題。在他們看來，有些人（很少數）是生來就善於勞心的，有些人（絕大多數）則只能勞力，勞心的就是所謂智能高的人，也就是領導人，勞力的就是生來智能低，所以只能被人領導一輩子。他對於勞動大眾的要求，不是手腦並用，不是心力體力平衡發展，而是信仰少數人，信仰到迷信的程度，願使少數人，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因為只有這樣，他知自己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才能永久維持下去。所

以他們一聽到說勞心與勞力的差別居然應歸消滅，就不由得要生起氣來，氣得眼都花了，把方的與圓的看成同一個樣子。

既然不以奴役制度的消滅為然，自然也就不以國家的衰亡為然，而把國家的衰亡也視爲了無政府狀態。他們竟未曾想一想，國家機構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時是達到了最完備的階段，而生產上的無政府狀態却也恰恰以這個時候爲最厲害，最不容易寬服。人人的文化水準都已經很高，無需有什麼管束人民的機構存在，大家也自能在正常的軌道上自由自在地活動——這樣一種社會，對希特勒之徒的先生到是無法理解的。在他到「想」來，人的大多數既然都是阿斗，那麼，如果真有一個機構來管束他們，他們不就要亂亂亂亂，立現無政府狀態嗎？這些先生到認爲，自由是永遠不能爲大多數人民所應有的；人民一有自由就要各逞私圖而胡作亂爲起來了；最完善的社會秩序就是一層層一層的實地形的制度，也就是法西所制度，極暴戾的奴役制度。

這樣一種想法，在他到談到分配原則時表現得最爲明顯。他到認爲把絕大多數的人都當做非有人去加以管束不成的阿斗，那自然就不能讓他自己去「各取」——「各取」的便其私圖（所謂個人色彩），而只能由管束他們的人來各「與」其應得之「分」。所以說，人類歷史上從未行過，將來也行不通各取所值或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最合理的分配原則是「各與其分」。他們始終把社會分成兩類，把人類分成兩種；一種是天生英才，大聖大賢，站在治者即他們所謂領導的社會地位。這種人自然只有極少數，有時甚至到只有一兩個。另一種是既無所知又無所覺的「蠢蛋者」，站在治於人（即他們所謂階級，服從）的社會地位。這種人最多，都是些體力勞動者。所以在分配社會財富時，不能由蠢蛋者來「取」，要由大聖大賢來「與」才對。在人們腦子裡，怎麼也理解不到「各取所值」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其意義，其作用，是在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他們只能把這種原則「理解」成市儈們的鑽錢必較，因而就投心到如果把各取所值的原則「澈底的澈底地執行」起來，就要使老弱殘廢以及有疾病的人通通餓死。實在講起來他們在這種地方根本談不上什麼理解不理解的問題，他們只是直覺地感覺到「各取所值」這一類的分配原則應予加強，因爲這要便不勞而獲的地主資

（上接六六頁）
改，組內閣，命資政院立即起草憲法，解除黨禁，認革命黨爲正式政黨，下詔罪己，說是：「朕用人無方，施治無術，政地多用親貴，刑罰屢變，將事業於僉王，則動述輿論！」并頒布憲法十九條，擇期宣示太廟。但這一切的一切都做得太過，不惟毫無效力，而且只在歷史的法庭面前作了清廷三百年統治宣布死刑的罪曲證據。

這就是清末爲立憲的結局，我們可以指出如下幾個特點：

一、中國近百年來的民主革命的本質，貫串着這一整個歷史階段的，原只是激始激終的民主派與反民主派的搏鬥，但在清末政治糾紛所表現出來的嚴重性，好像成爲清廷生死問題的，倒是一個滿漢問題，清末爲立憲的一切切設施，都是集中力量在排除漢人勢力，不惟排革命黨，而且不信立憲派，甚至不相信奴性已成的漢天巨官僚及各省漢督撫。因此民主派與反民主派的搏鬥，反爲滿漢問題所掩蔽。

二、清末的爲立憲，固然在假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最後甚至走到皇族集權。但既已仿行憲政，雖然是假的，終於不能不有各省諮議局，全國性的資政院前成立，因而給了立憲派人一些「空子」，使他們有所憑藉，把立憲運動變成合法運動，把政府的法定機關變成與政府對立的機關，終於使清廷的反動統治力量不能控制。這便是清廷爲立憲也不肯放棄其目的獲結所在，而在某種條件之下合法運動也不爲革命者所忽視的道理。

三、清廷本來是想以爲立憲來延長它的統治，結果，是促成統治的加速崩潰；本來是想以爲立憲來緩和革命破壞革命，結果，是幫助了革命，促進了革命。這可以說是一切反動的沒落的統治者必然的歸結。

四、清末爲立憲的一切設施，本是要把一切都抓到自己的掌心來，就是說走向專制集權，皇族集權，結果，權力越集中，統治的一羣便越孤立。無條件的反動的集權，排斥了敵人鞏固了自己，同時，又是加多了敵人，孤立了自己。這也是一切反動的沒落的統治者所不能解決的一個矛盾和一個死結。

五、清末爲立憲的失敗，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历史裁判。凡是一個違反歷史規律，違反時代潮流的統治者，必然倒在歷史時代的血泊中。清廷是倒在違反民主潮流的血泊中，因爲支配世界與中國的政治主潮，早漫延於三十餘年前清廷統治的時代了。

史軍紅

「隊軍底聯蘇」讀——

局版出文國外科斯莫

著士博茨明·依

版出年三四九一

晨至曹

「……我們把壓迫諸國的國王，
拋入無底鴻溝，
用我們的鮮血，
救出了歐洲底榮譽，和平與自由。」

——普希金。

紅軍是在同德國侵略者的鬥爭中降生的。一九一七年十月沙皇俄國的政權落到蘇維埃手裡時，第一次世界戰爭還在繼續着。在俄國邊界上，從波羅的海岸到黑海岸上都有德國軍隊。威廉第二的德國軍隊準備向蘇維埃猛撲。蘇維埃政權預見到將來的危險，就着手建立自己的軍隊。現在，以震撼天地的威力來扭轉全人類歷史的逆流的，正是那支紅軍。而用來裝飾他們的勝利的桂冠的，就正是希特勒德國的「打不敗」的神話。那個希特勒，那個威廉第二的沒有長進的後代。

因此，這本題名為「蘇聯底軍隊」的紅軍史，就從粉碎希特勒霸佔全世界的瘋狂打算開始。作者寫這本書時，正是納粹匪徒在斯大林格勒大吃癩的時候。這是本書的第一部分，約佔全篇幅的三分之一。第二部分是關於革命初期的紅軍，及以後紅軍的改造和特點的。另有一章專論蘇芬戰爭，因為改造好了的紅軍利劍在它的初試鋒芒中給以後的對德戰爭準備了良好的經驗。末尾兩章描寫本次戰爭中正規軍和游擊戰中的最突出的英雄們的形像。

作者以報告文學者的極其生動的手法為我們講述這一切嚴肅的故事。

希特勒的計劃是奴役全世界。在一九四一年德國開始向蘇聯進攻的時候，莫爾科吉爾說：

「希特勒對俄國的侵略不過是企圖對不列顛島進攻的序幕而已。」如果蘇聯和大不列顛都解決了，「此後他將要力謀征服西半球。」

這是一點兒也不誇張的。關於這，作者引用了希特勒本人的及其匪徒們的許多材料。美洲不是他們的無底的慾望之外。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德國經濟總長芬克發表了關於「新歐洲」的經濟政策，聲明要把整個歐洲變為德國的附屬品之後，又特別提起美國，公開要求美國停止工業活動，停止商品的出品，而把整個國民財產用來購買德國商品，說是「如果美國想要來幫助恢復世界經濟之經常發展，那它就要放棄它那種要同時成爲最大輸出國的不良意向。」對美國尚且如此，其他，我們只須抄下這首詩來就夠了，因爲這的確是希特勒野獸的口吻：

「第一份是我的，這是我新應當；

第二份一定要分給我，

因爲我是獸中之王，

第三份也是我的，

因爲我比你們都強，

第四份，誰若伸爪，

誰就當場死亡。」

於是，希特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勢頭，擊了整個西歐歐洲的大陸，閃到大西洋面，又閃到非洲。但是，如果希特勒不繼續東進，前途不是屬於他的。所以他決定回到那早已製定的舊計劃——進攻蘇聯。這個計劃是在法西兩國尚未取得協定之前所製定的，並且就是因此德國帝國主義者才特別對法西兩國登台的。把蘇聯打潰，再用一切力量去收拾英、美——這就是希特勒征服世界的新打算。在蘇聯，預定的期限是一個半月，至多兩個月。

世界上還有誰能抵得住奴役了歐洲十餘個國家，所向無敵的一千二百萬法西斯軍隊嗎？——全世界正義的人們担心中。

一九四一年秋，寄居莫斯科的紐約晚報編輯於九月五日在勞働報上寫道：「美國人已經想不到，還有那一個歐洲軍隊能够抵擋住希特勒……」——想必我們都還記得，那時候蘇聯宇宙的是怎樣的一片無望的烏雲。

可是，現在讓我們高興吧。沙士比亞的話說得好：「水鳥投到自己網裡了。」

結局怎麼樣，我們是知道的。這繩不必去寫下那些經過來。讓我們引用沙士比亞戲劇中馬克白的歌，來和這位帶着萬字章的新式馬克白——希特勒開個玩笑，來為英勇的紅軍戰士們乾一杯：

「……我深深陷入了，
血風的泥潭，
使得我
後退比前進還難。

腦海中湧出了
這樣多恐怖的事，

急得我拚命冒失亂幹。」

冒失亂幹的表現之一是在每一個小據點集中巨大的兵力。而結果，只是成千成萬的屍屍來不及收殮而已。死屍腐爛起來，發出出不堪的惡臭。因此，此如說，保衛蘇聯的蘇聯指揮部便不得不設置一些很大的木牌子，上面寫道：

「向步兵第三師師長石特福爾將軍提議停止開火收殮自己兵士屍屍記。」

另一表現就是在蘇聯國內實行空前未有的殘暴恐怖。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德軍指揮部發出一號秘密的指令說：「現在，必須重新設置指出，由東方戰線特別情形所引起的基本任務。在這種比在先前一切戰線都高度的需要訓練德國兵士的殘酷無情的感覺。對於任何人，不分男女老幼所表示的任何軟弱態度，都是不容許的……應當用一切方法鼓勵和發展每個兵士以自己的行動使人在德國種族面前發揮其自衛性……宣傳人員必須訓練德軍每個軍官和兵士都感覺到戰爭對於自己是切實身物質利益的……」

這就是殘殺，殘殺，縱火和劫掠！

可是即使這樣，也還是不成功。這些獸行的本身，就預示着必然的潰敗。

那結局，我們也是知道的，莫斯科不斷轟鳴的砲聲每天給我們以新的快樂和欣喜。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是，紅軍這種無匹的力量是怎麼來的。當然，軍事的勝利只是整個國家勝利的一種表現而已。

或者說，軍隊是整個國家的一方面，一部份。因此，從對蘇聯整個國家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明瞭紅軍偉力的根源。可是另一方面，從紅軍這一部分出發，我們也可以明瞭全體。這個，就是本報所告訴我們的。從紅軍的歷史和特質中，我們能够解答

這個問題，能够大略地了解這個國家。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列寧簽署了建立工農紅軍的法令。紅軍只收工人和農民。沙皇舊制度所遺留下來的舊軍隊不能成爲編制新軍隊的基礎，列寧和斯大林解散了他們，讓兵士們回家。那不是一个承平時期的，而是在嚴重的內憂外患與混亂之中。要不是有強固的革命基礎，在那種烽火連天何等艱而解散現成的軍隊，是不可以思議的。但是列寧和斯大林深信，要讓工農軍隊在自己的經驗中信服，蘇維埃政權是保護勞動者切身利益的。此後，民衆就會以新的力量和信心來幫助蘇維埃政權反對所有各種敵人。在沒有這種經驗之前，進行徵兵義務制，是過早的。這種自願原則，在紅軍建設的初期，是不可避免和必然的步驟。

讓我們想一想，這是一個多麼不同凡響的作法。是的，那是史無前例的，因爲那整個制度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立刻，這支新建的紅軍就以自己輝煌的戰績證明了列寧和斯大林這個方向的正確性。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紅軍旗幟得勝，第一次作戰，就在彼得格勒附近擊退了德國陸軍，取得了勝利，這一天，就成了紅軍的降生節日。那時候，一個觀察紅軍兵士們的法蘭西軍官，向他的公使報告說，紅軍兵士作戰如同舊軍隊裡最好的軍隊一樣。這位軍官也許不知道，有許多兵士是第一次拿起武器。

可是，國內外的反革命勢力勾結起來。敵人派遣大軍擊擊年輕幼弱的蘇維埃國家。五十萬自願兵顯然不够，於是蘇維埃政權決定由自願轉到工人和貧農總動員制。一九一八年六月初，實行了第一次動員，此時那些需要保存自願制的原因已經消失了。回到家中的舊軍隊的兵士已休息了并且參加了

蘇維埃的建設。農民得到了土地，數百年來第一次在土地上為自己的利益而勞動。人民信服了，蘇維埃政權是保護他們切實利益的。工人和農民明白了，敵人想奪去他們的自由和土地而恢復舊的奴隸制度。不久以前還是「用腿」表決，不願意打仗而離開戰場的兵士，現在受布爾希維克黨所組織和領導的工人之積極影響，就自覺地起來反對敵人。

到處編制紅軍，其中有幾十萬布爾希維克（超過全黨三分之二），都上前線去了。黨員們以奮不顧身的犧牲精神起了決定的領導和模範作用。

關於這，列寧寫道：「我們曾把我黨最精彩的力量集中到紅軍中去；我們採取了動員我國工人最好部分的辦法；我們向我國專政最深根源所在之地去找新的力量。」沿戰線一帶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男女團員都到軍隊中去。有人到了團委會，看見門上有個字條，寫道：「停止辦公，全體都上前線去了。」

工人和農民，從工廠和農村，像潮水一樣湧到火線上去了。

如果說，在那驚濤駭浪的蘇聯的幼年期，工人和農民們就能體驗到蘇維埃政權是屬於他們自己的，而以捨身的精神護衛它，為它而戰，為它而死；那末，當現在它已經有了許多年的歷史，把那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變成了全人類理想的樂園，他們怎麼能不愛它，擁護它，為了它而奉獻一切呢？

斯大林論紅軍的三個特點時說：「我們的紅軍之第一個基本的特點，就在於它是已經獲得解放的工廠的軍隊，它是十月革命的軍隊，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軍隊。」這是一個最本質的解釋。關於這，我們還可以從紅軍兵士的生活裡介紹一些具體的情形，來加強我們的了解。

「舊軍隊乃是整個沙皇制度的縮影。在國內，地主和資本家統治工農。在軍隊中，由地主和資產者出身的軍官指揮穿軍衣的工農。」作者的這幾句話是極其精闢的。沙皇軍隊的軍官享有一切權利。而兵士毫無權利，被稱為「下等級人」。兵士乘電車時不准坐在車箱裡，只准站在車箱前邊。兵士在戰場中只准站在遊廊裡看戲。而非俄羅斯民族的兵士生活更為惡劣，使他們担任最苦的工作。在軍隊中，鞭打，關禁閉等等惡習盛行。軍官因為兵士用「側目」相視而打兵士。軍官發怒了就以打兵士消遣，強迫他們背誦上司的爵號和官銜，上自沙皇和他的親屬起而到直接的長官為止。如果背錯了，就要受罰。有一次，一個兵士叫了陸軍總長的名字而沒有說出完全的官銜，因此判了兩年徒刑。沙皇制度不准兵士參加任何團體。禁止兵士參加會議。不准兵士訂閱報紙或從公共圖書館借閱書籍。在舊營房中所採取的一切設施，都是使兵士成為沙皇制度手中的愚昧馴服的工具。

那一切的愚昧和愚昧，現在却已經成了歷史的故事。關於紅軍兵營裡的生活和文化，政治的教育，我們多少已經知道一些。這裡，只要指出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便足說明一切。

斯大林憲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中規定：「服役紅軍之公民，有與一切公民同等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指揮官，政治工作人員和戰士與蘇聯優秀公民同等參加蘇維埃國家之管理，成千的軍事服務人員被選入了各村蘇維埃，區蘇維埃，城市蘇維埃和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中，執行著國家的責任。有許多兵士在未入伍之前曾充任地方蘇維埃代表，甚至充任蘇維埃最高蘇維埃代表，即是政府的委員。他們入伍以後，仍然繼續執行其公民的職務，和自己的選

舉人通信，出席蘇維埃，執行種種委託。

文化方面說，紅軍中絕對沒有文盲，拿一九四〇年徵募的情形來看，具有高等，中等和初中（七年級）教育的佔百分之三十五點五，有四年到六年的佔百分之五十五，有四年以下的只佔百分之九。此次戰爭爆發以前，紅軍中有二千所俱樂部，和大約三百所紅軍文化宮——這是真正文化宮，建築宏大，其中設有電影和演戲的大廳，圖書館和許多研究室。文化教育工作培養着發揚着燦爛的天才，發展并擴大戰士和指揮官的文化眼界。蘇聯及由亞歷山大洛夫博士領導的紅軍歌舞團就可見一斑了。這個歌舞團曾到國外表演，它的名聲遠揚於蘇聯國境之外。參加者是紅軍中挑選出來的戰士和指揮官。除了這個基本的團體以外，還有其他同樣的十八個歌舞團。

此外，本營最後兩章說了許多極叫興奮的故事故事，所有那些英雄的形象都是值得無上敬的。對於本營來說，也是一個很有力的鮮明的配合，使我們知道在這樣的國家裡產了一些怎樣的人，和他們起了怎樣的作用。

如果說，沙皇的軍隊是沙皇俄國的縮影，那麼在敘述了這些之後，我們也許不妨說：紅軍就是蘇聯國家的縮影了。

讓我們歡欣鼓舞，一切榮譽歸於紅軍，一切榮譽歸於那國家，一切榮譽歸於那創造了這國家的領導者和人民！

英國報章寫道：「紅軍在拚命戰鬥的一年半中，不得不支持敵軍的瘋狂進攻。有史以來沒有一個軍隊像斯大林所領導的軍隊這樣堅強，無上精巧，不屈不撓地戰勝。總之說一句老實話，若沒有紅軍的英勇戰功，那末各自自由民族的命運就真正會是悲慘的。」英國無線電台廣播評論家也說蘇聯人民「應成為一切反對希特勒的人的模範。」那麼，讓我們借用沃維基的話來結束這篇短文吧：「那麼，只有願望是不够的，要動作起來，使願望實現。」

內政部、重慶新報、警字第...
重慶市、重慶新報、警字第...
重慶市、重慶新報、警字第...
重慶市、重慶新報、警字第...

本期零售二元

衆 群

第 202 卷

目 要

(論社) 人敵滅消 · 人敵擊迎

戰擊游中華

劍 茹

聯蘇與題問洲歐

若沫郭

治政代秦與韋不呂

谷友沈

「誠」論

鈞天楊

兌商想思子墨

版出日一月二十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迎擊敵人・消滅敵人（社論）

特載

（六一五）

華中遊擊戰

（六一六）

歡迎莫斯科會議的偉大成功

專論

解放日報（六三〇）

歐洲盟邦與蘇聯

茹純（六三二）

英印關係與戰爭

純毅譯（六三七）

貨幣的辯證運動

許黎新（六四三）

研究與批判

呂不韋與秦代政治（上）

郭沫若（六五〇）

論「誠」

沈友谷（六六七）

「墨子思想」商兌

楊天錫（六七三）

關於墨子的思想的討論

筱芷（六八〇）

現代的戰線

焦敏之譯（六八四）

書報評介

試評「印度之佛教」

陳家康（六九〇）

文獻與資料

莫斯科會議的成果

「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六九四）

信箱

關於中國少共解散的緣因

劉光（六九七）

社論

迎擊敵人·消滅敵人

湖北鄂西戰場，又捲進了暴風雨般的戰鬥。戰事已經延緩了一個多月之久，敵人先後佔領了南縣、公安、枝江、宜都、松滋、澧縣、安鄉、石門、臨澧等地，目前和我軍在慈利、桃源、常德、漢壽之線激戰，敵人侵略之廣，和戰事之猛烈，是不下於前次鄂西戰役的。戰局仍在繼續發展中，我們要不間的喚起國人的警惕，提高積極的戰鬥精神，打擊進犯的敵人，決不容我們有任何的猶豫和遲延了！

關於此次敵人進犯的企圖，仍不外我們一擲所擲出的：這是它害怕盟國的反攻，而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因此它時刻企圖在中國戰場消滅我軍的有生力量，使我們不能在將來的有利時機進入反攻的一貫方針。只要有自蘇浙皖鄂滇西戰事以來，敵人不斷發動新的進攻的種種措施，就可以得到證明：蘇浙皖戰役中，敵人擴大了京滬的外圍據點張浦、郎溪、宣城、廣德、安吉等地，此後就在孝豐一帶和我激戰；而滇西的敵人則在佔領片馬、宜標、高黎貢山兩側以後，還一度竄過怒江東岸；至於這次湖北鄂西的戰役，敵人首先向鄂西進犯，西犯不遠後轉鋒南向，竄擾湖南西南的地區。它的顯赫的企圖：在滇西是要破壞和阻撓我軍配合盟軍準備反攻的部署；在蘇浙皖和湖北鄂西，除了想打擊我軍主力外，還更有着掠奪糧食和物資的企圖。由這幾個方面，可以看出敵人的困難之門，是要想在和盟軍進行決戰之前，在中國戰場搗倒我軍反攻力量，以便它得以負隅東亞大陸的一套有計劃的軍事陰謀。

「海軍不忘，後事之師」，我們要從前此鄂西戰役的經驗教訓中，指出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戰鬥任務。

這一次，單就軍事方面說，我們知道，鄂西戰場在今年之內爆發了三次大戰：第一次是在二月到四月之間，敵人次人從荆河與長江之間發動了進犯，結果敵人佔領了這兩江之間的三角地帶，和長江南岸的澧市、彌陀寺、石首、藕池口、華容等據點，這樣，敵人就準備了五月間進犯的基地。而今年五六月間的第二次進犯，敵人是志在長江與洞庭湖之間的地帶，想由這裡取得補給，以解決這一帶敵軍的所謂「現地自給」問題，當時敵人的入侵很速，直到陪都門戶的石牌要塞，但終因縱深過於延長，在我陸空軍的聯合打擊下，最後還是不得不退還這個三角地區的華容、石首、公安等境，可是敵人始終也沒有放棄它的企圖，因此，就有這次湖北鄂西的進犯。所以，為了保衛濱湖穀倉，確保川湘通道，使敵人的「現地自給」和困逼我們的陰謀無從實現，今日我們正面戰鬥的任務，也就是要和敵後軍民一樣，積極的作不憚鬥爭，抱定尺寸不與敵人、與國土共存亡的決心，不容有絲毫的疏忽和遲延，去打退敵人的進犯，消滅敵人一切進攻的可能。前線的戰訊來，常聽的守軍都抱定了一寸山河一寸血肉」的決心，和敵人進行生死的爭奪，這是值得我們興奮的一項消息。

其次，我們也不難推按：敵人五六月間對鄂西的進犯，戰術上是採取一種直撲橫殺的打法，它首先將我軍吸引到澧縣以西的地區，前鋒作深入冒險的突擊，而主力則溯江西上，侵犯最遠的地方甚至到了石牌，這一種打法，其實沒有什麼稀奇，不過只是敵人技取巧巧的迂迴戰術的復原。對擊退敵人的這種攻勢，就只有我們在正面採取步步為營，和攻擊敵人側背的打法，而各戰區更應協同作戰，患難相助，主動的出擊敵人，採取「敵進我進」的打法，這樣，深入的敵人無法維持補給的交連線，首尾不能相顧，自然擊退打得落在流水，抱頭鼠竄而逃，終於會被我們殲滅，這樣的打法在敵後戰區曾經創造出不少的戰例，這樣的戰鬥經驗是值得我們吸取，和運用到目前的生死鬥爭中的。當前戰事的發展，在湘鄂邊山地一帶，從側背打擊敵軍已收了一些成效，而鄂南、湖北、鄂中、鄂北等戰區，也在不斷的配合出擊，這正是一種正確的打法，我們還應該擴充戰果，勇敢的向敵人後方進軍，才能阻擊擊敵軍的前進。

再則，我們對於前鄂西戰役的教訓，應該提出的一點：是我們應該千百倍的憎恨那些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的偽軍醜類！這些醜類聽了敵人的反臉無情，做了敵人的工具，在祖國的國土上，幹着不可饒恕的殺人放火，叛國殃民的無恥勾當，我們吃了這些民族叛徒們不少的虧。因此，我們在當前的戰鬥中，就更更須辨別忠奸，嚴明賞罰，拿出一忠奸不兩立」的斬釘截鐵的態度，來懲處這些民族叛徒，這樣，就更更能鼓舞士氣民心，增加千百倍的戰鬥力量。在湘鄂戰事的聲中，我們已經看到：在前次鄂西戰役中叛國投敵的王逆勤說，已被國府褫奪勳章，但我們還希望對這些叛徒們，更有進一步懲處，以振奮前線的軍心。

我們要從這次的湘鄂戰鬥中，考驗自己的反攻力量，揚子江在咆哮，同胞們！我們從這次湘鄂戰事，我們不禁不任要高呼：積極作戰，打退敵人的進犯！

吳中游擊戰

前記

自十月一日，敵寇在蘇浙皖的三角地帶，從蘇南、蘇北、皖南、皖北，同時向我游擊軍發動，其目的在使我們像掃蕩前的傷地，使蘇浙皖的三角地帶，成爲無主之地。那樣的期待着我們的反攻，期待着我們的反攻。我們的人民並沒有被征服；從蘇南到蘇北，從蘇北到皖南，人民的軍隊在作着不屈的鬥爭。

一個偶然的機會，敵寇在蘇浙皖的三角地帶，從蘇南、蘇北、皖南、皖北，同時向我游擊軍發動，其目的在使我們像掃蕩前的傷地，使蘇浙皖的三角地帶，成爲無主之地。那樣的期待着我們的反攻，期待着我們的反攻。我們的人民並沒有被征服；從蘇南到蘇北，從蘇北到皖南，人民的軍隊在作着不屈的鬥爭。

「掃蕩」與「反掃蕩」

六年餘之戰鬥中，敵人對我游擊部隊之「清剿」，「掃蕩」，隨時或已自汪偽粉墨登場，敵人爲加緊對游擊區域之掃蕩，「掃蕩」日益頻繁，汪偽爲如忠主子，更以「反共」，「清鄉」以爲敵寇掃蕩之前驅。戰局之緊張，鬥爭之艱苦，物質補給之困難誠爲前所未有。

去夏，敵寇以獨立十二旅兩兩浦浦爲基幹，向我長江下游蘇中蘇北區進行「掃蕩」，六月開始進取南通，海門以東地區，七月轉至靖江，如皋，泰興。八月轉至高郵，泰興。井第二度進取南通，海門各地。敵寇盡其銳利武器，水行利用裝甲汽艇，陸行利用裝甲汽車，除水陸配合外，且有大部偽軍配合行動，其兇鋒深入每一角落。我游擊軍之×師，經四個月苦戰，始於十一月初制止其「掃蕩」兇鋒。北面敵寇于九月十月之間，大舉「掃蕩」山東我××師地區。十月十一月敵以十七師團小校部隊爲基幹，徐州爲指揮中

心，大舉「掃蕩」淮海地區，及淮北，泗水地區，泗陽，宿遷，臨沂等地。敵寇既既所至，井及鳳陽，懷遠，定遠諸地。敵人力達二萬餘，時間較長。二月之久，我游擊部隊之×師，×師與×師均輪番與敵激戰，敵雖曾佔我中心地區，終在我游擊部隊之下被追撤退。去年十二月爲戰局比較安定之月份，但敵寇時時正轉移兵力進攻大別山及鄂南地區，我游擊軍當即自動配合作戰，我游擊軍之×師，及×師，×師，在淮南蘇北，及巢湖，桐城之線，不斷襲擊敵之側後。我游擊軍之×師，×師，一部亦在黃岡附近，平漢線上積極襲擊敵之側後，收效極大。敵雖曾一度佔領英山，漢川，羅山，商城，固始，立煌諸地，然歷二十餘日之激戰，終在我游擊軍抵抗，我軍配合夾擊之下，倉惶潰退。

當大別山戰役時，敵曾向我游擊軍及×師司令部部隊進逼「掃蕩」。東京報紙並述稱果廣討「掃蕩」長江下游我游擊軍之必要。且謂「給予×師部，蘇省府及我游擊軍軍部以毀滅性之打擊，是粉碎在太平洋反攻的總力戰之必要部份。」又謂：「長江下游，富於食鹽棉花糧食等戰爭物資，實不容

敵共黨匪共間，如冀其坐大，特為帝國百年大計之禍患。云云。敵寇鑒於多年「掃蕩」之失敗，轉而與汪偽協商對策，選定人員專門研究我軍採用之戰術戰術，國內戰爭之經驗等，敵寇曾據此於二月間草成進攻計劃綱要，為日後攻取所證明者，其概要如下：

敵寇制敵之總司令部，及我游擊軍均集結於淮河與射陽河中間地帶，東至黃海，西至運河及高郵湖西部，敵寇遂決心以一師團兵力，由西向東，由南向北，包圍兗州，企圖實現殲滅我軍於海濱之迷夢，敵寇計劃之毒辣于此可見。敵寇攻擊準備迅速完成後，遂於二月十二日開始進攻，共出北而南之敵，為十七師團主力，由淮陰、泗水進攻。南面之敵為第十五師團及獨立十二旅團，由興化、鹽城北犯，十七十八兩日敵寇即在阜寧城東溝林鳳各村曹甸一線上，完成其合擊計劃。我游擊軍第X師黃部與X部互為犄角，策應得力，敵部於二十日後分批突圍渡過河而進後，敵寇更以全力「掃蕩」我第三師部隊，並在整個鹽阜地區，敵方分佈偵探構成大小包圍圈，敵入大小合擊達數十次，企圖「打網收魚」一期一舉而得魚，我軍反擊突圍，時分時合，忽現忽隱，敵我雙方極盡其糾纏迂迴打之手段，當此之際，我游擊軍粟、羅、彭諸部紛紛出援助戰，打擊敵進軍之後路，在路北側翼，二月二十四日我彭部攻取泗陽之洋河鎮據點，韓部突圍路線經此間，彼此配合作戰復收協同對敵之效。韓楚鏡先生曾言：敵寇對游擊軍深感援助友軍，共同殺敵，乃屬應盡之責，要書謂：以更大更密切之配合，期將將來。二月二十三日我一師粟部攻取南河東北曹家埠、孫家密等地，我羅師乃以奇襲攻入淮陰，淮陰城內，敵寇甚多。敵寇進佔鹽阜區域，固未幾，而側翼又受威脅甚大，顧此失彼，乃被迫撤退。敵寇五揚之鹽阜、濱海「掃蕩」，遂於三月中旬結束。敵寇於三月中旬，自信其進軍之偵察，制定我游擊軍軍部西移皖中無為、桐廬之線，並以另一部南移在甯之茅山地區，敵寇不顧休養，復於三月十七日以大軍向巢縣無為之我游擊軍第二師進攻。並在蘇南茅山地區加緊其第四期「掃蕩」，此為鹽阜區大「掃蕩」之尾聲，亦即敵偽誇稱對我游擊部隊之窮追計劃。

皖東戰局，至四月初，略趨平穩，而蘇南敵偽之清鄉工作，則已進至所謂第五期矣。我游擊軍第一師，活動於蘇南地區，出沒於甯京、鎮江城下，穿插京滬線上，為我游擊部隊鬥爭最艱苦之區，一年來已經過四次「清鄉」，至今尚在堅持不懈中。

敵獨立十二旅團南浦部隊，于「掃蕩」鹽阜區後，與蘇蘇中，即于四月月初連獲我軍李X、陳X、黃X等。我游擊軍之粟師遂與配合，不分畛域，使友軍在蘇游擊地區，能自由轉移，能獲得必要之供應，X、兩師與我游擊部隊之親密合作，深為敵偽所驚視，昔者之挑撥無時或已。此種親密團結，尤應隨鬥爭之益益緊張而更加鞏固。

敵之獨立十二旅團長南浦及敵方專任之「剿共」指揮官，進駐蘇北已歷三年，三年來，無日不與我游擊軍接觸。故其傷亡亦最慘重，其五個大隊長中保田陣亡，石井負傷，部隊消滅達三分之一。發動我軍向我軍清剿，為南浦之得意「傑作」，南浦亦以此自豪，今則以清剿蘇中，無法完成任務，與偽方矛盾加多，不能協作；南浦因之去職，繼任者係為小林師團，汪偽更甘為虎謀，今後我游擊部隊在蘇中之反清剿鬥爭必更加緊，可以預測。

我游擊部隊之李師一部，活動于武漢重鎮之外圍及平漢路之兩側，北則肩膠院線，南則沿滬江，蘇州挺進，艱苦辛勤，獨力支持戰局，迄今亦已五年矣。今春二月十五日，武漢敵寇向長江與漢水間之三角地區進擊，我國軍X師王X部河陽以西地區失守，我李師即在漢川、天門之線進擊敵寇，給友軍以支援，遂三月八日，敵寇黃陂長江兩岸攻勢，于岳陽、沙市間分途渡江，進佔公安、石首、華容一帶。我李師即對敵發動全面而戰，五月中當敵轉戰於宜都、安鄉、南縣諸地之際，我軍復先後在潛江、沔陽、監利、襄陽等地，發動游擊戰，配合友軍擊敵。總之，今春敵寇對大江南北我國軍發動三次攻勢，而我李師即三度在敵後打擊敵人，其中以四月二十一日我游擊軍李師攻入麻城，三月十七日進攻黃陂柳子港陣役，對敵震撼最大，亦為當地紳民所稱譽。此外，戰後規模較大者有下列數次：

(一) 去秋，九月二十五日，南通戰門，我軍消滅保田大隊長以下日兵百餘名，偽軍三百餘名，戰鬥的經過，為伏擊敵於夢家渡，敵在鹽池被我襲擊之後，退守沿岸村莊頑抗，我繼續夜襲，放火圍燒，始克奏功。是役除生擒日人三名外，其餘敵偽全部就擒。戰後我軍檢獲敵寇大隊長保田屍首，並送至南通，以示我軍之偉大器度。敵入收屍後信感謂：「貴軍戰後歸還戰骸，寬仁厚德，誠實軍政略之勝利！」是役，我軍由奇襲轉為強攻，傷亡亦眾，這一戰之意義，在於阻止了敵偽下鄉掠奪與挺進之陰謀。

(二) 去冬，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定遠之敵，松尾中隊長率領偽軍四百餘，事前極端秘密，突然襲擊，企圖一舉而殲滅我定遠東南老人倉之駐

和黨政機關。我軍沉着應戰，予包圍之敵以反包圍，敵戰至午，定遠隊大隊來援，復陷我軍於二度圍困中，我軍奮戰至夜，始突圍而逃。其後我軍與敵偽傷亡之數目約略相等。老人倉皇淪為敵偽俘虜，然迄今仍未敢再前。又三月下旬，淮陰、淮安之敵，逐日向我淮濱區推進，企圖窺我軍根據地，四月初已進至順河高長湖蔣家之線，我軍派隊阻擊，對我作更大之危害。我軍於四月初，擊擊順河集之敵，敵退至陳集，四月十日我軍大舉進攻陳集，經一晝夜之激戰，是夜敵三路來援，復放射擊機炮性瓦斯，期以自救。十一日天明，我主動撤退，是役敵我傷亡均重，經此戰後，敵向南推進之計亦不得不自動放棄矣。

(三) 今春，敵寇「掃蕩」鹽阜區之際，二月下旬，即掃蕩鹽縣，計二月月底到三月初，在鹽阜區將鹽縣之地區，即附增鹽縣六十餘處，使我軍活動及鄉民居住遭受極大威脅。我軍為拔除這些敵據乃於三月中旬發動反擊戰，三月二十五日，我軍進擊阜寧西之陳家集，開始敵偽部隊頑抗，繼在我火攻之下，戰至天明，敵不支潰退。嗣阜寧來援之敵，亦被我軍伏擊於半途，是役敵十五師團文葆世部中隊全部被殲，為軍一部亦傷於盡。我軍亦傷亡計營長以下百五十餘名，此外，如單家港、建陽等地著名戰鬥亦使敵匪驚心，敵不得已乃緊縮其據點，將新增之六十餘處敵據至十餘處，敵寇暫佈據點，即所謂釘鐵釘之政策，我軍拔除敵據點即所謂拔鐵釘之戰術，釘鐵釘之力甚大，拔除之力必超越之，始能濟事，敵門之鬼惡殘酷可以想見矣。

(四) 三月十六日，淮海區敵寇三千餘分途包圍我駐梁山之部隊，企圖以「鐵壁合圍」戰術殲滅我軍，幸賴我軍靈活轉移，事先跳出包圍，撤除敵之跟蹤追擊。十七日敵復進行第二次合擊計劃，當即避過於鹽水老張集朱文莊一帶，激戰半日，我軍復於黃昏後突圍轉移至起出嶺，劉老莊等地。十八日晨，敵對我施行三度包圍，我軍先期部隊安全突圍，而後縱部隊仍陷入重圍。我軍勇銳田野間之交通溝進行抵抗，第一階段我軍力求突圍，屢次與敵肉搏無效，乃決心固守待援。第二階段，敵見我轉攻為守，欺我力弱，以大隊騎兵向我猛衝，為我軍擊退，其衝至防禦工事前沿之敵，下馬肉搏，均為我擊斃。第三階段，敵知我不易欺，乃選擇較遠距離重新配備火力，以機槍大砲集中放射，對我進行火力毀滅，是時敵寇知我軍已突圍無效，乃妄想降服我軍，無恥的偽軍復開始其招我投降之賊話，我軍將士堅不為動，仍從容將機槍步槍拆毀，並將文件等物付諸火焚，將忠骸掩埋後，乃集中未傷者

二十餘名，進行最後之突圍，戰至下午五時，終以彈盡力竭，全部殉國。我三師七旅十九團二營第四連該連連長向思才，副連長石學富，政治指導員李雲明，文教委員孫景明，排長尉慶忠、蔣自運、劉復甫等以下計八十二人，無一屈服者，無一生還者，其悲壯忠貞，實足以振頑起懦。敵寇雖陷我軍一連，然其損失則遠倍於我軍。後敵偽方傳出消息，敵軍對於我軍壯烈殉國之精神，深表敬佩，當地人民於敵後三日內，即將忠骸舉行公葬，題為「X軍八十二烈士之墓」，過者無不徘徊流涕。

(五) 四月十四日我軍進攻運河兩岸之洋河鎮，經六小時戰鬥，殲滅敵偽軍四百餘名，殘敵竄房屋頑抗，我軍繼以火攻，房屋全毀，敵寇無一倖免。當我軍在洋河鎮上向民衆收集火攻材料等，均照價給發，來回蘇北，戰線延長數十餘里，戰鬥前後之我軍秋毫無犯。爾後洋河偽軍給蘇垣地方信稱：洋河一戰，人心大變；並謂，我游擊部隊固不恆以力服人，且能於作戰混亂之際，表現出嚴明之紀律，如此服人，以後請不飲佩云云。

(六) 蘇南我軍，於四月十五日，奉命渡石白河（深水之西高溝以北）以西游擊，十七日進至明覺附近，當被敵寇發現，天明時，敵寇即路包圍，遂於石白湖東南前線及東王壘之線發生肉搏激戰，敵寇企圖以優勢兵力將我投諸石白湖葬身魚腹。我軍誓死抗敵，士氣倍增，激戰至夜，我軍全力突擊明覺寺方面之敵，敵不支潰退，我軍遂於當夜完成渡湖四進之計劃。

敵我戰局評衡

分兵固守佔領之點線，集中「掃蕩」其攻擊之目標，此為敵寇經常採用之戰術。全而優劣以包圍我軍之根據地，奪我軍主力決戰，此敵寇「掃蕩」初期之戰術，密佈據點，層層封鎖，逐步推進，分進合擊，以肅清其佔領地區附近之我軍，鞏固其已得領地，此敵寇「掃蕩」中期之部署也。「掃蕩」末期，則進行所謂「梳式之清鄉」，其目的在求達成打擊我軍之主力軍，藉以主力摧毀我軍之黨政民等組織，厲行其歸化運動，即所謂政治「清鄉」是也。敵寇進軍之初，先以軍事鎮壓，繼以誘降，無所不至，繼則進行其「偽柔」政策，以「反共」口號掩飾其毒計，妄圖使居民墮入其彀中。偽方上下則處處作偽善人，敵寇之分區「掃蕩」為敵寇兵力不足之證據，敵寇之「梳蕩」時期，有輪額至二月以上者，雖較過去持久，但終不能彌補其時間之中

。雖謂之應用毒氣及所謂三光政策，僅乘機等，均為敵寇外強中乾，力量不足，對我無可如何之表現；亦一年來敵寇掃蕩之規律也。敵寇之所費在於給予了我根據地以極大之破壞，予我部隊以相當之損失，但不能予我以根本之摧滅；敵寇之所謂勝利，蓋暫時之勝利，軍事上之勝利，戰術之勝利，而戰路及政治上之失敗則與日俱增。

針對敵人集中毒氣，我游擊部隊之戰術乃採用分散游擊，以削弱敵集中之優勢，集中兵力，以突擊敵之薄弱部隊。「掃蕩」初期，避其正面而趨，而予前進之敵以阻擊；「掃蕩」中期，相機擊敵而給予敵新根據地和封鎖線以適當之破壞；「掃蕩」末期，敵勢已成強弩之末，我游擊部隊必無懈擊時，敵以有力反擊，並捕獲偽軍，以剪除敵寇之羽翼，敵指偽軍之心也；且我軍抗擊敵寇有方，偽軍大部亦人心思漢，此乃真理之必然；我主力為「反掃蕩」之骨幹，靈活轉移，在適當時機予以致命打擊；各地方游擊軍之時機時現，響應互化，民兵就地游擊，就地堅持，神出鬼沒及於敵隊之以編居，構成敵寇之日常恐怖，三者互相配合，互相轉化，使敵偽難於捉摸，敵偽難，務必低首。於是，在我軍民聯合打擊之下，「清鄉」不消，掃蕩自費心，此敵寇之民論，實為對敵寇「掃蕩」之正確結論。

民衆與我游擊部隊之關係，確已做到水乳交融，合作無間，人民愛軍之精神極高，兵員補充多，人民自覺與自勵。地方紳耆對我游擊部隊作戰之英勇，紀律之嚴明，稱道備至。在鹽阜區士紳慰軍大會之傳單上有云：「運用游擊戰術，不斷打擊敵人，時分時合，神出鬼沒，或攻或守，將士甚強，民衆精神，發揚無餘；民衆鼓舞，收效甚宏，於此足證中國不亡。」阜寧國民軍之書記亦曾讚譽我英勇之游擊部隊稱：「敵寇以泰山壓頂之兵力，「掃蕩」我游擊部隊，我游擊軍能保全主力，「敵寇能可貴，不料又大舉反擊，恢復失地，足見抗戰必勝之前途。」文化界名宿X先生適來我游擊區，親見我游擊軍民合作情況指出：「我游擊部隊與士紳朋友密切配合，能於生死之際，互相信任，於敵偽高壓之下，毫無背離，此乃我游擊部隊偉大之成功，絕非語言，余不親到游擊區，余亦不信能做到的如此成功之地步。」蘇中某年逾九十之紳士亦謂：「九十年來，敵寇世變，凡大戰興起於城市，匪亂必起於鄉間，戰爭之直接損失尚小，戰事引起之兵荒匪亂，使人民受禍甚大。不料蘇北處在經常與敵寇對戰中，大軍轉移吾村，月必數至，甚有日必數至者，而鄉間秩序井然，無動匪，良民，畏寇之畏，此乃我游擊戰事之得法，戰後

之天下太平，可於此卜之矣。」各友我游擊部隊戰日如神，自或有其美，美而有其德，官兵大而無其小者，今後當愈發奮勵，以答人民之厚望。

克服困難，迎接勝利

敵寇愈接近死亡，其掙扎必愈力，今後戰局之困難，當亦十倍於往昔；我游擊地區今日已處於於狹窄，寸土必爭，進退皆非易事；不戰不能存，不戰不能勝；游而不擊者必亡，擊而無力者亦必亡；此為數年來我游擊隊以生命與血肉體之真理；故我之戰術必為既游且擊，擊必得力。然我游擊部隊在武器彈藥和補給之條件下，向強大敵寇作不信的戰鬥，故年來戰鬥之夜間性，自刃戰，流勳性，短促性，羣衆性表現最為明顯。傷者多，重傷者多死亡，因戰鬥殘酷所以致之，腐爛設備之困難，亦其重要原因之一。

對敵戰鬥之艱苦，要求於我軍之配合愈切，尤貴於發揮精神為國之精神，不使任何一弱敵弱抗戰力量之事件存在。對忠勇之將士尤應有公正之獎勵。

敵價之增漲，使部隊之給養愈益困難，我部隊更應消重自力更生，增強生產，務使豐地而水利興，耕耘多而收穫大。使士兵生活能獲改善。

我游擊部隊已在敵寇之圍攻中生長，壯大，身經數百戰，出生入死，今後自必更加堅定信心，加強戰鬥，配合反攻，爭取勝利之早日到來。

于懷著

形勢比人還強

(漁審二二八八號)

新華日報圖書課發行

歡迎莫斯科會議的偉大成功

——解放日報十一月六日社論

在莫斯科舉行的蘇英法三國外長會議，從十月十九日開始到三十一日止，開會十二天，現在已經結束，並發表了一個公報——四個宣言，其中包括中國政府代表參加簽字的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這是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對於我國的抗日民族自衛戰爭，是有絕大關係的。

三國會議最重要的成績，如公報所說，乃是確切規定了軍事行動計劃，用以縮短反對德國及其歐洲聯盟的作戰時間。這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當前時機中最大和最迫切的具體問題，是三國會議決議事項中第一項具體內容，德寇的戰艦，現在唯一的寄托在拖延戰爭。因此，希特勒匪首正在千方百計地想把戰爭拖延下去，期待在拖延的時間內，有什麼機會營謀，有什麼意外事變出來挽救他們。爲了拖延戰爭，希特勒便使其東方盟友日本法西斯，準備進攻印度，來斷英美的尾巴。爲了拖延戰爭，希特勒曾縱金圖利用英美兩國間的經濟主義者，死硬派，孤立主義者，事前破壞三國會議，使這個會議在最重要的目前軍事共同行動問題上，毫無成就或者很少成就。在三國會議開會之前與開會中間，海地社的一場叫嚷，赤裸裸的說出了法西斯匪首們的心事，這樣的心事，就是希望三國會議在當前的軍事問題上，沒有成就，而以空談戰後問題，但是，三國會議的結果與法西斯的反革命，完全相反。三國會議的公報說：「此次會議，最重要者爲討論確切的軍事行動計劃，關於此點，已有所決定。且已在準備中。」三國會議後，我們不久將看見第二次戰場的開闢，一切想破壞第二次戰場的開闢的人們，是完全失敗了。這是三國會議第一個巨大成功。

只有切實的解決了當前最重要的具體問題，——縮短戰爭時間的軍事行動問題，然後戰後保證和平的問題，才有了實際的基礎。在保證戰後和平的談判中，三國會議也有了巨大的成功。這成功表現在三國會議所公佈的四個宣言中。

三國會議所公佈的四個宣言，有政治上的特色，就是保證國際民主與國內民主。這四個宣言與國內的民主，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民主，而是建築在明確的基礎的。四個宣言所貫注的精神是：

(一) 法西斯主義及其幫勢力，必須徹底摧毀；法西斯及其幫勢力必須廢除。

(二) 只有反法西斯的力量，在將來國際普遍安全的機遇中，和各國內，可以享民主的權利，而且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不管理其能，必須享受這種權利。

(三) 各國反法西斯力量，在國際和國內的民主機遇中，所享受的權利，是根據實力與反法西斯鬥爭的實際來規定，而不是依照的什麼標準來規定。

關於法西斯主義及其幫勢力，必須徹底摧毀，法西斯及其幫勢力，必須廢除，在各個宣言中，都說到了。英美蘇中國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中，說到「各向其與作戰的軸心國家，進行戰爭，直至此種國家在無條件投降下屈服爲止之決心」，「彼等之中，凡與一共同敵人作戰者，對於所有關係人之投降及解除武裝之事項，均將採取共同行動」。這就結束了各國不得中途停戰，不得單獨行動，打擊了一切投降主義者。關於對意大利的宣言中，說到「盟方對意大利的政策，必須以一根本原則爲基礎，即法西斯主義及其所有惡勢力與其所產生的事物，應予完全消滅」，又說「法西斯政權所創立的一切機構，應予取消」，「所有法西斯或親法西斯份子，應由政府中及一切民主性的機構與組織中，排除出去」，「法西斯領袖與將領，或有罪行的嫌疑者，應予逮捕交辦」。這是一個範例。現在對意大利如此，將來對德與對日及其盟國國家也將如此，足以奮起一切法西斯國家人民繼續的鬥爭熱情，揭破一切法西斯黨徒所作「盟國將壓迫德日人民」的欺騙宣傳。

關於奧地利的宣言中，說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德國入侵而加諸奧地利的合併，完全無效」，說到「奧地利有一不能推卸的責任，此即參加希特勒德國作戰」，這也是一個範例。將來將應用到被日本法西斯吞併的地方。關於德國舉行的宣言中，說得更清楚。這裡說到，「凡從事於行的德國官兵及納粹黨員，應遵照其進行的國家內，俾能依照各該獲得解放後之國家與其自由政府之法律，加以懲處」。「三同盟國必須追尋他們至天涯海角，使其歸案法辦」。這一宣言，不但是「一個罪有應得的原則規定，而且是一個瓦解法西斯政權，使許多法西斯份子趕快離手，從法西斯營壘分裂出來的策略步驟」。這是瓦解敵軍的一項重大政治工作。

關於民主權利，應由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共同享受。這一點也在四個宣言中都貫穿了。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中，說到關於共同敵人，要採取共同行動。普遍安全的國際組織，要以各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為根據，此種國家，無分大小，均可為會員。各國是平等的，這是一個原則的規定。至於保證國內的民主，在對意大利宣言中說得極其明白，「予意大利人民以每一機會，建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政府機構與其他機構」，「意政府應容納始終反對法西斯主義之意大利人民團體之代表，而使其更民主化」，「意大利應完全恢復言論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出版與公共集會的自由，並得成立反法西斯的政治團體」。法西斯獄中所受愛國份子、反法西斯份子，應得到釋放與大赦，「地方政府之民主機關應予建立」，「意大利人民有最後選擇其政府之權利」，這都是範例，不但是對意大利，將是對一切法西斯國家的。

關於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在國際國內民主機構中所享受的權利，應視這個力量對反法西斯鬥爭所作的貢獻而定這一點，也貫澈着整個的會議。在關於奧地利的宣言之中，就把它寫出來了。

總之，德寇與民主兩大原則的具體詳細的規定，這是完全區別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賽的，帝國主義精神，一掃而盡。這種區別，是革命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的原則區別。這主要的是蘇聯參加這個戰爭的結果。世界的面貌將變化的起變化，從這幾條中，就可以看出來。

因此，三國會議在這一方面，又獲得偉大的成功，正如美國某高級政府人士所說：「這個協定是『吾人此一時代之大憲章』」。這十二天的三國外長會議與過去許多國際會議大不相同，顯明的解決了許多問題，加強了三國的團結，加強了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的團結，想便這個

會議脫離了民主合作結果必致像從前的凡爾賽及國際聯盟那樣，一無所成，目前的國際形勢，已完全變了。社會主義蘇聯與英美法各國人民已經完全團結起來了。這種國際上的範例可以告訴我們，中國的某一部分人如果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情形下不談抗戰，而高談建國，不談肅清親日派，而唱空洞的民主，那只會一事無成，建國要放在抗戰的基礎上，談民主，必須是實際兌現的，並且是親日派以外的抗日人民的民主。民主的果實，必須落在抗日人民的手裡，因為他們對抗戰的貢獻是最大的。

三國會議是一個加緊作戰的動員會議，今後不但希特勒將受到盟國東西夾擊的味道。三國會議對於歐洲被佔領國的人民，將起極大的動員作用。它將促進他們反希特勒的鬥爭，促進希特勒歐洲體系的瓦解，因此，三國會議在鋪平勝利的道路這件事上，是完成了它的任務的。

三國會議對於我國，一定會發生巨大的影響，它不僅鼓舞我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念，也更提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下略)

新華日報圖書

英雄的新大赫城

蘇德戰爭報告之傑作

每冊一元 (卷一第四二六號)

愛倫 戈 著 倫 實 譯

自去年九月以至今今年一月，希特勒動員了他所有的精銳來攻斯大林城，當時他自信這座城就在他袋中。但是英雄的紅軍却給了法西斯軍隊以頑強的打擊，消滅了希特勒三十三萬人的精銳，而這個冠了斯大林英名的城，也始終像一個英雄似的矗立着，為什麼英雄的紅軍能保衛斯大林城呢？為什麼法西斯軍隊不能攻下這座英雄的城市呢？這一切，都可以在這本英雄的新大赫城中找到答案。這本英雄的新大赫城，是蘇聯英雄們的真實記錄，也是蘇聯英雄們的真實生活。這本英雄的新大赫城，是蘇聯英雄們的真實記錄，也是蘇聯英雄們的真實生活。

歐洲問題與蘇聯

茹純

歐洲是世界的中心。
歐洲問題是世界問題的關鍵。

說歐洲是世界的中心，乃是因為：在這裡集中着全世界最大部份有着高度和中等水準的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國家。在全世界六個資本主義列強中，歐洲就佔了四個。歐洲資本主義諸國供給了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總量的百分之四十四，統治了全世界殖民地的百分之九十三·五（按照人口計算）。而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的分野也首先在這裡劃分了界線。

上次世界大戰從這裏產生，這次世界大戰也在這裡開始。（就全面性而言）。

說歐洲問題是世界問題的關鍵，乃是因為：假如把世界問題當做帝國主義間的爭權奪霸，當做帝國主義者對世界的再分割這總體來看，那末，誰做了歐洲的盟主，誰就能執世界霸權的牛耳。反之，假如把世界問題當做集體的世界和平與世界團結這總體來看，那末，和平團結能夠實現於歐洲，也才能實現於全世界。

歐洲問題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着歷史上世界政治的一切問題。

目前世界政治的主要現象就是：抱着獨霸世界夢想的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吞滅了歐洲十七個國家，並在對這些國家人民剝削與掠奪的基礎之上，擴大進行着危害世界愛好自由和平的各民族人民底生存權利的罪惡戰爭。

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盤踞在歐洲，這就形成了對全世界全人類的最威脅，對民主與進步的最大障礙。

所以，在今天的反法西斯戰爭中，歐洲戰場是主要的戰場。羅邱六次會議所堅持採取的世界戰略——把在歐洲擊潰希特勒德國當做反希特勒聯盟戰略配合與時間表上首要的問題，就是以對這種客觀形勢的嚴密而清醒的估計

和了解做根據。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羅邱二位眼光遠大、識見卓越、不愧為民主國家的英明領袖，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無論如何對客觀現實的發展都無法使之迎合自己主觀的願望。

客觀現實是嚴酷而無情的。

這次世界大戰，無論在規模上和破壞性上和在時間上，都大大的超過了上次世界大戰。

歐洲被奴役或壓迫的各國廣大人民，從這次戰爭遭受了歷史上空前無比的令人難以相信的災難和不幸。法西斯德國侵略者的鐵蹄所到之處，給他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飢餓、搶劫、鞭笞、囚禁、夜驚流行、骨肉離散、家園毀滅、苦重的勞役，集體的死亡……一句話：可怕的血腥的恐怖。法西斯德國壽命每一分鐘的延長，就是他們流血每一分鐘的增加。無邊的怨恨失望和憤怒正從他們的心理生長起根來。哪一天才能夠脫離戰爭的苦海呢？哪一天才能從法西斯的奴役之下獲得解放呢？不消說，趨早趨好。

蘇聯人民負着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部重担也已有兩年以上的時光。他們在這次戰爭中遭受了最大的犧牲，蘇聯最富庶的區域——烏克蘭、頓河流域、庫班平原、俄羅斯南部都會遭受希特勒法西斯最野蠻兇殘的蹂躪，為了支持這次戰爭，爭取這次戰爭的勝利，蘇聯人民遠比任何其他反希特勒聯盟各國付出了更多的他們優秀兒女的血和死亡。勿庸贅述來說明，蘇聯的基本利益也在於打敗希特勒德國，趨早趨好。

從英美盟國以至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的各國觀點來看，也應當如此。因此，顯而易見，今天的歐洲問題，且不論其內容如何，欲求解決，首要就要黨反希特勒聯盟各國有一切力量，都動員起來及時地給予希特勒法西斯以集中的打擊，以便縮短戰爭時間，趕早打垮希特勒的希特勒。

和華濟希特勤德爾。

這就是說，縮短戰爭時間，加速希特勒德國的敗北，這是解決歐洲問題的必要的條件。至於歐洲問題的內容一般的包括在戰爭時期中就必須準備解決的許多戰後時期的問題，特別是歐洲各國戰後的政治組織和經濟復興的問題，以及與這相關聯的希特勒聯盟各國的相互關係和政策的協調問題。但現實的本身還轉是不容推諉的：不把戰爭時間縮短，不把希特勒德國早日打垮，一切其他問題都無從談起。只要反希特勒聯盟各國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合作越充分越有效，希特勒德國越早日被打敗，將來的和平團結基礎就越會鞏固，而戰後組織問題也就越會符合所有一切盟國的利益而順利獲得解決。

解決歐洲問題的基礎已由蘇聯人民和軍隊的英勇抗戰以及英美盟軍在地中海沿岸戰區的順利行動所奠定。

戰爭形勢發展到今天，已發生了對反希特勒聯盟有利的變化。敵我戰爭力量的對比已經逆轉了過來。蘇聯的英勇的步伐正邁向西部邊疆各州，英美盟軍的攻勢鋒銳也指向了歐洲大陸。反希特勒聯盟各國的團結合作比以前更增長了和加強了。對意大利行動上的一致與協調，已使意大利從敵人的營壘裡退脫出來，變成了自己的戰友。由蘇聯發起的英美蘇法四國軍事——政治委員會也在北非成立，而英美蘇三國外長會議，日前也在莫斯科開始舉行了。

反觀敵人，則德寇法西斯聯盟已經解體，希特勒陣營正經歷着嚴重的軍事政治和國際形勢上的危機。希特勒的戰爭機已經從根本上被削弱了。希特勒德國則是越趨越「口齒西山，氣息奄奄」了。

然而，敵人仍很頑強，它企圖作垂死的掙扎。

在以前，當戰勝優勢屬於敵人的時候，由於蘇聯人民的英勇抗戰，粉碎了希特勒德國的戰略計劃，迫使希特勒來從事他毫無準備的持久戰，這就使得英美盟國能夠獲得充分的時間來完成他們的作戰準備和開發他們的戰爭潛力，因而時隔成了反希特勒聯盟掌握中的武器。到今天，戰勝優勢轉到了反希特勒聯盟手中，法西斯德國被迫由進攻改取退守，就傾心希望把它底作戰計劃放在拖延戰爭方面，以便這樣來引起反希特勒聯盟各國由於戰爭的拖延而產生的各種困難，並利用這種困難來進行挑撥離間，避免自己的敗北。

這樣，時間的武器就被敵人接去過去了。

爲了拖延戰爭時間，希特勒法西斯不僅在軍事上採取了由德軍對盟軍的計劃，而且在政治上還進行了各種挑撥離間的陰謀。這種陰謀特別針對歐洲問題上有關各國與蘇聯的關係而進行。德的不去提它，就拿這次三國外長會議來說。還在會議未舉行前，中立國甚至英美盟國的報紙都作了無意的挑撥和誹謗。在這些挑撥和誹謗中，自然不乏出自誠心和善意的，但也反映了希特勒的挑撥離間陰謀。若干中立國家的親德報紙和英美盟國的反蘇報紙，最明目張胆的是美國孤立派的報紙，如赫斯特系各報，都拚命利用這個時機來進行反蘇宣傳，在蘇聯與其盟國的關係上散播互相猜忌與懷疑的種子。

其實，就是猜疑的散播者自己也知道，不會期望有甚麼收穫。

蘇聯與被佔領國家的關係及其相應的政策來說吧。

首先試問：蘇波關係的惡化，到底該誰負責任？無疑的是波蘭政府內與希特勒有連繫的一向反對同盟國家的反動集團，就是馬圖索夫斯基、馬基埃維茲、柏萊斯基這批半法西斯份子。馬圖索夫斯基是聲名狼藉的波蘭前外長柏克上校的親密助手，曾任波蘭駐匈大使，是希特勒在波蘭的第五縱隊首腦人物。馬基埃維茲是戰前公開主張對德合作，煽動反蘇戰爭最熱心的傢伙，法國淪亡後，企圖在法國設立吉斯林或貝當式的波蘭政府的也是他。柏萊斯基是波蘭法西斯組織「國家民主黨」的領袖。這批人在波蘭政府內部結合成勢力強大的集團，從來沒有停止過他們反蘇聯反同盟的活動。他們的政治上現任都在希特勒手下供職。

這是不不可磨滅的：七月間波蘭世世的赫科爾斯基將軍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確曾抱着善意力圖建立與發展波蘇兩國邦交。在他的努力之下，蘇波兩國曾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訂立協定，恢復邦交。同年八月又爲在蘇境編組波軍訂立軍事協定及由蘇聯無息貸款給波政府以維持波軍給養和救濟波蘭難民的貸款協定。同年十二月，赫科爾斯基將軍與莫斯科，又與斯大林共簽兩國友好互助宣言。但不幸赫科爾斯基這批親蘇政策受到反動集團頑強的阻撓，而赫科爾斯基本人最後竟至被反動派所包圍，結果，波蘭政府就開始對蘇波友好合作怠起工來，以致使兩國關係趨向分裂。隨着戰爭形勢的發展，波蘭政府就越來越放棄了對蘇親睦政策而改取對蘇仇視政策。還在卡丁森林事件發

生以前，波蘭政府的行動就違反了兩國各項條約所規定的義務。如波軍統帥部拒絕調動在蘇境編組的波軍對德作戰，利用在蘇聯各地設立的救濟機關放肆進行對蘇聯的間諜活動。在波蘭大使館內發行反蘇報紙等等。卡丁森林事件不這是這一連串行重而遲延的遲延發展，表明波蘭政府甚至墮落成了希特勒法西斯的尾巴！

蘇波兩國領土糾紛，自然是影響兩國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按諸實際，這個糾紛是不能把它單單看成爲兩國疆界問題，而是直到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加入社會主義大家庭後才得到解決的一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西烏克蘭人和西白俄羅斯人在波蘭地主貴族統治下是備受壓迫與奴役的少數民族，只在他們與自己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兄弟聯合以後才得到了獨立和自由。根據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即承認世界各民族民族權利原則，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各自團結在自己民族內這個歷史權利不能認爲例外的。否則，不僅違背大西洋憲章，而且顯然更是一種法西斯帝國主義的傾向，與這次反法西斯戰爭的目的也大相逕庭。

蘇聯對波蘭的態度是明確而易解的。他始終奉行對波蘭人民和平團結的政策。蘇聯境內「波蘭愛國者聯盟」及其領導下的波軍的存在，只是說明蘇聯願意對波蘭從事反法西斯鬥爭的波蘭人民有所幫助和貢獻。蘇聯企圖在莫斯科另組波蘭政府之說，這是敵人惡意的造謠。蘇聯的見解是：打收希特勒後，期望歐洲能有一個真正獨立而強大的波蘭。這種見解，斯大林在答覆英國太晤士報記者的詢問內曾有簡明的表白。斯大林說：「戰後，波蘇關係必須奠定在堅實的鄰邦交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或者，假如波蘭人民希望，就奠定在盟國基礎上，規定互助以抵抗作爲波蘇公敵的德國。」

目前的波蘭政府雖然經過一番改組，但它所奉行的向東侵略仇視蘇聯的政策仍然沒有改變。現任外長羅美神就是在駐蘇大使任內主持反蘇間諜活動的人物，不能期望他能够促進波蘇關係的好轉。波蘭政府不但還毫無任何悔禍之心，甚至帝國主義的傾向比以前更加強烈。如波蘭的外交政綱中包括一項建立所謂「東歐聯盟」的計劃。這個新計劃包藏一個狂妄的目的，就是企圖在蘇聯的邊境上結成一連串蘇聯與歐洲隔絕起來的國牆，阻止蘇聯參加戰後歐洲的和平組織。

在波蘇兩國未來關係上，只有一點是確定了的：波蘭人民與波蘭的民團集團是走的兩條道路。不與自己人民同行，不但將受到人民的唾棄，而且在

休想得到蘇聯的友誼。

蘇聯是給予者，他把手伸給了每個與自己人民同行的歐洲其他被佔領的各國。

蘇聯與捷克，彼此拉緊着他們斯拉夫民族兄弟的手。

捷克在蘇聯駐有軍隊，這支軍隊，正與蘇軍共同奮勇抗擊德寇。在一九四二年——四三年的冬季戰役中，捷克官兵八十六名曾因建有利功而曾獲蘇聯政府的「愛國戰爭勳章」，獲希希上尉的榮譽「蘇聯英雄」頭銜。蘇聯今年五月間曾簽訂關於「由蘇聯維持捷克軍之物資供應」的協定。蘇聯是素來反對蘇德黑會談的，他曾同英法美各國一道，以正式發言向捷克提出保證：蘇尼黑會談及其影響捷克領土的任何後果都屬無效。捷克政府也是一向奉行對蘇友好親睦政策。卡丁森林事件發生後，捷克國務會議曾經過決議，譴責波蘭政府，並呼籲盟各國提高警覺以消滅波蘭內部的危機。波蘭政府的「東歐聯盟」計劃，也被捷克政府拒絕了。捷克政府曾經受慕尼黑黑反蘇陰謀的痛苦，因此他不但願與蘇聯的罪惡活動，而且還熱望與蘇聯訂立長期友好互助條約。捷克總統貝奈斯今年七月間就計劃聘請莫斯科，以便訂立這樣的條約。蘇聯對捷克政府這種願望自然是歡迎的，據說曾在原則上同意簽訂這樣的條約。惟因英國方面某些人士的反對，貝奈斯的計劃至今還未能實現。蘇聯「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曾發表對這件事情。據說：艾登與英洛託夫曾在口頭上約定，在未來雙方商議與蘇聯締結條約，不得與歐洲其他國家（其政府目前在其本國領土以外者）訂立有關戰後問題的協定。但英國政府并未就此事提出具體建議，只不過初步交換意見。說其這種協定能成，也不能一概抹殺與第三國簽訂符合英蘇雙方利益的任何條約的可能性，故只要英蘇之間成立某種諒解，蘇捷互助條約還是可能簽訂的。希特勒在波力氣，在這個問題上來挑撥蘇聯與其盟國的關係。捷克政府將由倫敦發表莫斯科的惡毒謠言，蘇捷雙方都會發表聲明予以駁斥。

蘇聯對法蘭西的法國人民，更是傾心熱誠幫助他們從希特勒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法國也在蘇聯境內駐有軍隊，其中有著名的法國「諾曼第」航空隊。這支法國空軍曾與蘇聯空軍互爭豐功偉績，受到蘇聯聯軍的欽佩與優待。法國空軍軍官並因戰功獲受蘇聯政府的「愛國戰爭勳章」。在法國民族解放

委員會未成立以前，蘇聯與波蘭的關係是蘇聯友好密切的。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之後，蘇聯也保持了與這個委員會的聯繫和接觸。今年八月二十七日蘇聯與英美中加等國共同承認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而蘇聯并未附有任何保留條件。蘇法兩國人民稱為「患難與共風雨同舟」的精神所感召，正如波蘭在德巴特城答覆提問時所說，他深信「法國人民對蘇聯人民的不幸和苦難以及偉大的精神有深切的了解，蘇聯人民對法國人民也有同樣的了解。」

希特勒法西斯自然也沒有放棄在法蘇關係上散佈一些猜疑，但這些猜疑却像露水一樣經不住陽光的照耀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南斯拉夫的內部政治問題也會經常被希特勒用來進行挑撥離間蘇聯與其盟國的關係。希特勒在南國人民反法西斯解放會議上冠以「蘇維埃政權」，在南國人民解放軍頭上冠以「共產軍」稱號，就這樣當做根本向全世界惡罵說：「這難道不是布爾塞維克對歐洲的威脅嗎？」為了這輩起見，希特勒的宣傳機關甚至還造謠說南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鐵托是蘇聯軍官，由飛機送到南國去的。曾經有個時候，在英美盟國的報紙上還可以看到這種宣傳的影響，說甚麼南國人民解放軍是在蘇聯影響下的游擊隊，而米海洛維奇的實提厄克軍則是在英美影響下的游擊隊。現在事實證明：南國人民解放運動只有一個領導中心，這就是解放會議和解放軍。米海洛維奇則是南國一個最卑劣的陰謀家和民族叛徒。自本年七月間起，英美盟方就正式承認解放軍了，路透社也開始發出解放軍的戰報了。中東盟軍總部并會與解放軍總部訂立協定，由盟方派出軍事代表團常川駐在解放軍總部，以保持雙方的接觸和聯繫。盟方并答應給予解放軍以廣泛的援助。自此，一切疑竇就都被封禁住了。

蘇聯與歐洲被佔各國的友好關係（波蘭除外），是在日益發展當中。連海蘭這樣二十多年一直沒有承認蘇聯的國家也與它建立了外交關係。

歷史的洪流是由無數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匯合起來的。從昨天可以得到教訓，在今天應該打下基礎，然後，明天才有希望。

今天，蘇聯的外交政策的出發點，還是跟他往常一樣：反對戰爭，維護和平，打擊侵略，援助弱小。蘇聯所要求的是維持和發展與反希特勒聯盟各國的友好邦交，以便大家團結一致，共同奮鬥，打倒人類的公敵——希特勒法西斯主義。

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就是互助互讓；互相商量，互相發展，互相在政治上採取一些讓步以求得步調上的一致與協調。

把歐洲問題的性質與內容和蘇聯外交政策的出發點與原則連系起來了解，便不難認清蘇聯對歐洲問題的一般的態度。

首先，就是要爭取和保證長期的和平。歐洲人民需要和平來治癒創傷，蘇聯也需要和平來恢復社會主義的建設。在這一點上，蘇聯與反希特勒聯盟各國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在蘇聯的戰後目的中，我看不出和華萊士副總統和威爾斯副總統所發表的戰後目的的一定相沖突的東西。」（麥克思·威爾納語）。但和平必須不能是德國法西斯匪幫中帝國主義強盜口頭上所說弄的和平，「德國法西斯匪幫中的帝國主義強盜們，已經用血淹沒了歐洲，用絞刑架把歐洲釘滿了，一個人能够跟德國法西斯匪幫中的帝國主義強盜講那『種的和平呢？』（斯大林語）同時也必須不能是任何改頭換面的出賣動因素宰羊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民族的和平。所謂人民的和平，就是要推翻舊有的統治，排除一切反動因素；所謂民族的和平，就是要廢棄帝國主義政策，消滅民族壓迫的根源。在這裡，絕對不能夠忽視德蘭及其附庸國家的統治階級與其人民混為一談，不能把被佔各國的民族叛徒與其人民一視同仁。在談這類的話，就對走到以反動因素宰羊的「和平」來代替和廢棄真正的人民的和平和民族的和平。換句話說，就是只限軍閥貴族地主和大地資本家的政府講和平，而不跟人民的政府講和平。這種「和平」是假和平，將必然造成更大的社會的混亂，替民主主義掘下墳墓無疑。歐洲人民不希望有這種假和平，蘇聯人民也不期望有這種假和平。假如法國、奧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的王室份子在某些人士的支持下，甚至已經提出了他們帝國復辟的和平方案的話，就不能說，假和平沒有出現的可能。不必諱言，歐洲人民在這方面存在着戒心，蘇聯人民也在這方面存在着戒心。

其次，就是要尊重各民族的獨立權利，根據自願結成民族的自由聯合——無論是世界性或區域性的。只有獨立，才有民族自由，只有自由聯合，也才有民族平等。戰後的歐洲各國的關係也只有建立在這種民族獨立存在與自由聯合的平等基礎之上，才能保證互相尊重，互相親睦和友好合作。上次世界大戰後，有許多國家都不是根據民族獨立權利和自由聯合的原則組織成的，而是按照帝國主義列強在歐洲的新的均勢，甚至按照對當時年青的蘇聯的敵視態度而組織成的。這次戰爭的發生，多少與這有關係。因此再不能單個

歷史的經驗。在這種不能把各洲的邊界問題與民族問題分別開來，當做單獨的問題來處理。只要民族問題能夠解決，邊界糾紛也才能夠解決。而戰後一切民族問題，按照大西洋憲章的原則都可以獲得合理的解決。比如蘇波蘭土糾紛，不把它單獨作為邊界問題提出來，而把它當做西烏克蘭人和西白俄羅斯人根據他們的願望自由團結在其同胞民族中的民族權利提出來，就不難迎刃而解。蘇聯與芬蘭的領土糾紛也是這樣。波羅的海三國共和國——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根據他們民族人民的願望來決定他們戰後的地位，也決不會在邊界問題上引起麻煩了。反之，假如不這樣，不但蘇波蘭芬以其他有關於蘇聯領土的問題得不到解決，甚至像波蘭現政府所計劃的「東歐聯盟」這一類對於蘇俄抱仇視的集團的實現也並非沒有可能。

第三，就是希望各國實現徹底民主，力求進步。各國人民在解決自己國家的國體和政體的時候，必須不受外來勢力的干涉而是根據人民的意志。所建立起來的政體，必須是進步的，民主的，在國內符合人民的利益，在國際上符合各國的利益。怎樣做到在國內符合人民的利益呢？這就要：實行民主政治，容納反法西斯各黨各派，實施社會改革，保障工農權利，推行普及教育……怎樣做到符合各國利益呢？這就要：採取與各國親睦友好的政策。特別是對蘇聯不抱任何受敵視與偏見應使的政策。法西斯主義在七次世界大戰後的動輒是一個值得深深記取的教訓。一個真正的人民的意大利和德國沒有能夠建立起來。這就在國內引起了深刻的社會政治危機，法西斯主義也就是在這種危機的基礎之上產生起來。在這邊，勿庸懷疑戰後將再有世界革命的危險。自從共產國際解散後，今後的各國革命問題，只能經由民族途徑來解決。戰後應該是以民主主義得到充分發揚光大的時期。一切國家在政治組織上和社會活動上的措施，都應該遵循這個方向。

第四，就是要求蘇聯爭禍首。包括所有一切對這次戰爭及各種罪行要負責任的人。斯大林在去年蘇聯十月革命紀念節的報告中，曾講到有三類人對戰爭罪行要負責任，而必須予以懲處，這就是：希特勒國家的授意人，希特勒軍隊的領袖和「歐洲新秩序」的主動人。蘇聯同英美已共同照會中立國家，不得收容戰爭禍首，這說明反希特勒聯盟已對懲辦禍首具有共同的決心。只有嚴厲懲辦戰爭禍首，才能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從生理上思想上一直消滅國家禍首。

以上四項是互相聯繫，不能分開的。不應對戰爭禍首，戰後各國在政治上不實現徹底民主，力求進步，各民族不能按照自己的願望而實行自由聯合，則和平團結就不能實現和維持。

斯大林與波蘭總理科爾斯基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共同簽字蘇波友好互助宣言中，曾有一段論到歐洲的戰後問題，這一段話，以無上的明確性闡明了蘇聯對歐洲問題的見解。茲摘引如下，作為本文的結論。

「在抗戰勝利，希特勒罪人受一定懲處後，同盟的任務，即在保證堅實持久而合乎正義的和平。唯有以民主國家聯合一致參加的堅實持久的同盟為基礎，經由國際關係的新組織，才能達到。這重以所有一切同盟國家集體力量為後盾的國際公法，應當形成產生這種新組織的決定因素。唯有在這種條件下，為德國變異所破壞的歐洲才能復興。才能造成保障，使希特勒罪人所引起的禍患永遠不致再現。」

按這篇文章是在莫斯科三國會談開幕之初草成的。時間上自不免稍嫌過時了一些。但幸而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並未超過三國會談各項決定的範圍，在原則上也頗能融合一致。三國會談的最大收穫，就是蘇聯與英美盟國在解決歐洲乃至世界問題上，已求得一致的瞭解和協議；四國安全宣言奠定了保障戰後長期和平的基礎；對奧地利的宣言，闡明了尊重各民族獨立自由權利的立場；對意大利問題的宣言，規定了從希特勒暴政下獲得解放的各國在國家措施和政治組織上所應遵循的民主原則；懲辦法西斯罪犯的宣言，表明了反希特勒聯盟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決心。按照這些決定的原則精神切實做去，我們相信，歐洲乃至世界問題一定能夠得到合理的解決。解決歐洲乃至世界問題不能摒棄蘇聯，離開蘇聯，反之，要依靠蘇聯，信賴蘇聯，也從三國會談本身得到了一個證明。無論在今天的反法西斯戰爭中，或是戰後世界人民的政治社會生活中，蘇聯都是一個重要的主導因素，這應該是誰都不能否認了。

作者附錄十一月廿日

英印關係與戰爭

I. Lemaire 作・純 毅譯

在英帝國體系下的印度

日本人之侵入緬甸，新加坡之陷落，印度洋之變為戰爭舞台和日本侵入印度之直接威脅——此皆在各方面引起英印關係以及印度在此大戰爭中地位的問題。

印度——英帝國的最大部份，面積在四百萬萬方公里以上（尼泊爾，布丹在外），即大於英吉利面積二十倍，佔不列顛帝國全面積七分之一。印度人口據一九四一年調查約共三萬八千九百萬人（見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

Great Britain and the Empire）佔英帝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八倍於大不列顛的人口，在印度的英國人，據一九三一年調查，共有十一萬六千人，其中大半為軍人。據一九三一年調查在印度與緬甸共有二百二十五種不同語言和方言，操印度語言者一萬二千萬人，操孟加拉語者五千三百萬人，在學校與上層社會裡則流行英語，印度識字人數，據一九四一年調查，佔人口百分之十二。以宗教的特徵而分，印度教人佔全人口之多數——三分之二以上（據一九三一年調查為二萬四千萬人）回教徒佔百分之二十二（七千七百萬人）佛教徒——一千二百萬人以上，基督教徒——六百萬人，錫克教徒——四百五十萬人。

印度有許多階級，自最高級——婆羅門起至最下級——不可接觸的「賤民」（Pariahs）止。

印度在行政方面分為兩部，即英屬印度和印度聯邦，英屬印度由十六省組成，大省由省長治理，小省由高級委員治理，英屬印度佔全印領土百分之四十，聯邦居民約佔全印人口四分之一，各邦藩主皆係王公，名義上似乎處

聽屬英王，印度總督經由派駐之理事官而指揮王公，許多小邦，聯合組成辦事處。一九二一年成立王公議會，隸屬總督。

英國在印度的經濟上利害關係，非常重大，一九二九年英國在印度投資達六百萬——七百萬英鎊，而印度每年對倫敦的償付為印幣利息，英國官員之年俸等，戰前總達四千萬英鎊之鉅，戰前英國對印度連同緬甸的出口等於百分之七，而印度對英的出口則為三分之一，各大國戰前在印度入口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各國輸入英屬印度佔全入口的百分比（註）	
國名	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九年
英國	四五、〇
日本	七、〇
美國	七、一
德國	六、三
法國	六、五
蘇聯	九、七
其他	三三、〇

註：見“Foreign Policy Reports” I. VI, 1940.

英國人之跨進印度，遠自十六世紀始，是在葡萄牙人達加馬第一次（一四九八年）繞行非洲發現由歐通達印度之航路以後。當十七世紀，尤其十八世紀時，印度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角逐的目標，在一六二二年本古兒（Bombay）皇帝時代，英國在印度成立了第一個貿易處，遠在一六〇〇年經英女皇依莉薩伯准許組織的東印度公司即在印度擴展其積極的軍事與貿易勢力，葡萄牙人與荷蘭人，相繼被迫退出，而英國人與法國人則成為角逐印度的兩大對手，迨至隨後在印度的英法戰爭而起的七年戰爭期內（一七五五——一七六二年）英國將法國人驅出印度。一七年戰爭之後，使東印度公司由商業勢力一變而為軍事與領土的勢力，此時實已給英國奠定了在東方現在統治權的基礎。

(見馬克新與格羅斯曼) 在差不多幾百年的過程中，一八四三——一八四九年(即印度與旁遮普)之前，英國進行了若干次的戰爭與武裝遠征，目的在最後的建立英國政權於全印領土之內，於第六十年完成中央印度之佔領，第八十年佔領緬甸，至一八五八年(自印度土著叛變之後)東印度公司始被取消，而印度從此成爲英國的殖民地，處於總督治理之下。一八七六年維多利亞女皇並兼印度皇后之尊號。自一八四九至一九〇〇年期內，在印度境內及其邊疆，曾發生一百十次的戰爭和遠征，其中有六十四次發生於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八年內，最大之戰爭與遠征，要推一八五七——五九年印度土著之叛變，征略緬甸和英阿(阿富汗)衝突等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九年法案

印度——「不列顛王冠上最輝煌的寶石」——一向惹起許多與英國競爭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別注目，尤以德國爲最，德意志帝國於一八九一——一八年的大戰時特別的虎視眈眈，關心巨測，據德意志在戰爭開始時曾謂：「吾人所有駐在土耳其及印度的領事，情報員等，應煽起煽動的火燄於回教世界之中，以反抗這些可惡的民族！如果吾人已決定流血，那麼最低限度，英屬勢必放棄印度。」大戰期內英國偵探會截獲德意志第二的長篇書翰，皆是鼓吹印度要員暴動，和呼籲一般的援助，但是德國間諜在印度製造混亂和煽動前線印軍叛變的陰謀終歸粉粹。

在抗德戰爭期內，印度予英援助至大，在印度曾徵募英約一百四十萬士兵和勞工分赴英軍的前線，甘地和國民大會其他領袖和支持遠徵兵運動，徵募的士兵，回教徒佔大多數，單以英屬印度派赴前線的六十八萬三千士兵的總數而言，其中在旁遮普駐紮三十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八人，在聯合省內徵募一十六萬三千五百七十八人，可見這兩省已佔英屬印度全部徵兵額的四分之三，而其中又以回教徒佔居民多數的旁遮普省佔全數的過半數。

印度供給近東英軍以戰費，糧秣和作戰物資，實數殊大，而印度因英國入口減小，英國政府的訂製軍火和軍事上的高度利潤，在工業擴充方面，獲得補助，如石煤消耗自一千六百萬噸(一九一三年)增至二千二百五十萬噸(一九一九年)，鋼的生產自十九萬噸(一九一四年)增至四十五萬噸(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一個連連工廠在一九二〇——二二年煉鋼達三十萬噸以上，紡織工廠的機器數自九萬二千五百部(一九二二——二三年)增至十二萬一千五百部(一九二〇年——二二年)。

這次戰爭曾給予印度民間的民族運動以強烈的刺激，因此印度事務大臣孟德吉(Montagu)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廿日代表英國政府在議會提出宣言，宣言內允給印度自治：

「英國政府的政策——宣言內稱——已得印度政府完全同意，即爲使印度人在政府各部中得以多多參加，益逐漸發展自治制度，朝能逐漸實現印度自治政府，成爲英帝國內完整一部……並應補充了即此種政策須經過漸進的階段而達到進展。」

一九一九年移孟達吉與總督契穆斯佛爾制定新法案，在序言內重申孟達吉宣言內關於「逐漸實現印度責任政府」的公式，(一九一九年印度曾以獨立國會員資格出席國聯)。

於是根據一九一九年法案成立印度議會，由兩院組織，即立法院與國務院，立法院共一四〇議員，其中一百員係由選舉產生，四十員由總督指派；國務院六十議員，其中三十四員係選舉產生，二十六員係指派，凡屬在該兩院討論的各項問題，皆由總督裁決。

一九一九年法案正值印度民族和工人運動在戰後澎湃的時候而公佈，試舉下列事實，足爲明證：如罷工浪潮的高漲(在一九一四年罷工達一百次，一九二〇年——二二〇〇次，一九二一年——三九六次，計損失七百萬工作日)，國民大會領導下廣泛的「消極抵抗」運動，一九一九年四月的阿爾里沙(Ahimsa)運動，因反抗色佛爾和約而肇始的印阿國聯運動等等。甘地領導的國民大會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宣佈不抵抗的方針，而聲望甘地即於翌月被捕，至一九二四年始獲釋出獄。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號佈的英王新憲法，曾給印督確定關於將來印度自治範圍內的問題，即指稱：結果「英屬印度將在我們自清領中居於高貴的地位」。(見西門委員會報告書)。

西門委員會(Simon Commission)與一九三五年憲法英國政府繼續在新的改革基礎上尋求進步的途徑，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印度境內印度教人與回教徒發生廣大的衝突，而促成「印、回團結」的計劃(回教聯盟與國民大會的聯席會議所預定)並無結果。

一九二七年，即一九一九年法案規定的十年期限屆滿以前，英政府權派一委員會，由西門担任主席，從事制定印度憲法，一九二八年國民大會依據自治運動者的首倡，於本會內草擬立憲計劃，名為「尼赫魯憲法」，係取名於草擬者老尼赫魯的名，該憲法內提出關於全體選舉權，在英印軍隊保護下負責任政府，英國經濟地位及聯邦的保證等要求，在下屆國會，一九二九年，尼赫魯任主席的國民大會並通過了要求印度獨立的議案。

在一九三〇——三二下，倫敦舉行三次「圓桌會議」，據模西門委員的建議，成立英印協定，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之第一次「圓桌會議」，國民大會未曾參加，當時印度境內頗大了一「人民不服從」運動（如大會會員退出立法院，排斥英貨，破壞食鹽專賣等），第二次「圓桌會議」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舉行，其地曾經過出席者當一九三二年第三次「圓桌會議」時在英印關係與統化第二次「不服從」運動的環境內，其地曾在獄中實行絕食。

一九三三年英政府公布關於改革印憲的「白皮書」，其草案經國會特別委員會自一九三三至三四年的審核，逾一九三五年八月印度新憲法，經英皇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生效，以至於今。

一九三五年憲法，其主要輪廓，究竟為何呢？該憲法內英政府實準備建立印度聯邦，將英屬印度及土著藩邦一併加入，但必須在大多數藩邦表示加入願望的場合下這聯邦制始得實現，聯邦主席應由總督充任，舉凡軍事，警察，外交，指揮藩邦，對少數民族權利的保護，英國經濟地位之保持以及制定非常法令與命令和一切法律上的否決等權，均應歸於總督之手，此外得設印度三軍統帥，由英王任命。總督之下應設立兩議會，一、國務會，由英屬印度一五六代表（其中回教徒佔三分之一）和藩邦一〇四代表組成，二、聯邦會，由英屬印度二五〇代表和藩邦一二五代表組成。這兩會的選舉權照印度人民百分之十一——十二的比例行使（一九一九年法案選舉權比例為印人百分之三），選舉時並有一定席數，分與宗教和等級的階層。總督之下應設立關員會議，對總督行使職權時，予以協助和建議，關於權利，經濟以及保儲等事項，悉由關員會議執行。

在某屬印度各省內，省長之下，亦得設置關員會議，並設立兩院制或一院制的有限全權的立法機關。根據一九三五法案，緬甸與亞丁（Aden）即不屬印度之完整一部。

然而該憲法規定的一切制度，並未見諸實施，國民大會指稱：此憲法完

全沒有滿足印度民衆的要求，並非建立在民主原則之上，且屬了印度王公和保守分子以轉讓，將政權移轉於他們的手上，而總督則取得最大無畏的全權。

回教聯盟亦起而反對謂：此憲法將使回教人建立對回教徒的霸權，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即此次大戰爆發之後，印督發表聲明謂：聯邦實現的初步，在戰事結束以前，尚不開始。因此一九一九年法案所成立的立法院，至今猶為總督下的單一代表機關。

至於各省的立法機關，一九三七年二月曾在十一省內舉行選舉，國民大會經基本上改觀憲法，但亦參加此項選舉，國民大會在一一省中的六省內獲得絕對多數，即孟買，馬德拉斯，聯合省，中央省，奧哈爾，奧里薩六省，密孟加拉，阿薩密及西北邊省內獲得相對多數，共在一千五百八十五席內取得七百五十五席，八省內（即七列之六省與西北邊省，阿薩密二省）國民大會的會員皆加入省議會工作，並於一九三七年中參加省政府工作，國民大會在此等組織政府並于與其他兩省的聯合政府，實施了若干關於改善勞工物質生活和權利地位的方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印度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九年是國際史上風雨飄搖的年代，侵略者開始侵略，發動新的世界大戰，印度的輿論急熱烈地起而反抗侵略的暴力，國民大會無畏的擁護中國，阿比西尼亞，西班牙的反抗侵略戰爭，譴責德國之侵略捷克斯拉夫，抨擊「萬里黑龍江」。

一九三九年秋在歐陸爆發的戰爭和印度以英國領地之一自動的加入此次戰爭，於是造成了新的局面。

猶在開戰前夕，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國民大會鑒於印督延遲選舉事宜而延緩立法院的權限，乃訓令所有會員，禁止參與立法院工作，自德國進攻波蘭後兩日，印督林里芝哥（Lindsay）宣佈印度為戰時抵抗中心，並頒佈保衛印度的非常法令，維持國內秩序，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國民大會亦隨實法西斯侵略者的理論和實際以後，同時聲稱：印度民族之參戰應以許與印度自由為約束。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印督林里芝哥發表宣言。（「白皮書」）內稱：英國政府一如一九一九年法案和最後之法案所規定，準備於戰後給予印度以自治領的法令，政府並願意「在戰後與印度各黨派，團體，機關的代表以及各藩邦王公進行談判，俾保證在研討將印度政府改為聯邦制的草案時取得他

們的協助與合作，那樣的改革，將是較理想的。」同時總督向國民大會與回教聯盟建議加入擴大執行委員會和由印度各黨派及王公代表組成的諮詢機關，俾統一抗戰力量，但國民大會反對林里芝哥宣言，且要求召開制憲大會，許與印度獨立，當時在英國議會內會有若干要人如克利浦斯等對林里芝哥建議之缺點，予以批評。印度國民大會並決定將所有在各省政府之閣員一概召回。

一九四〇年二月間林里芝哥與國民大會各領袖重開談判，八月八日印督復聲明英政府準備在戰後給印度以自治領法令。一九四〇年春夏間國民大會強調不能接受自治領法令，要求印度完全獨立和成立臨時國民政府，大會並授與甘地以領導「不服從」運動的全權，這「不服從」運動，首先已趨停頓，但至一九四〇年底復擴張起來，而甘地表示不願乘英國在戰爭的情況而造成本不利於英政府的困難，因此「不服從」運動僅由有限的少數人員推行並未附帶任何強迫法案和罷工行為，由於英國拒絕印度獨立和成立國民政府的要

求，國民大會曾大批人物約近一千五百人皆演說反對印度參戰，英印政府則以強壓手段對付「不服從」運動，大會若有若干領導人員因而被捕（尼赫魯，阿沙德在內）

至於真納領導的回教同盟對林里芝哥宣言的表示可歸納如下：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回教同盟對中止實現印度聯邦的一切步驟的聲明，表示歡迎，且要求完全拒絕聯邦制；而對國民大會開會退出各省政府，則表示幸樂；甚至宣佈以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定為「脫離國民大會編年的日子」。一九四〇年春，要求實現「巴基斯坦」，即是劃分印度為兩國——印度教國與回教國。回教國應包括西北邊省，旁遮普，卡什米爾，孟加拉和阿薩姆等省，以拉合爾（Lahore）為首都。（見「Foreign Policy Reports I, VI, 1940.」）

印度王公及其屬於總督下之代表——王公會——則支持英印政府反對國民大會，王公們仇視着國民大會；他們恐懼着瀕於全印的民主制改革浪潮，將波及各藩邦，使王公的封建制度，致權及其財產，一九四〇年夏，王公會議的年會，通過議案，要求與英印政府獨立及其主權，拒絕未經王公同意而對憲法的任何改革以及不許「任何黨派攫取權」等有效保證（見「Houni Kashi, Jun. 1940」）

此外若干印度團體亦與英印政府合作，依據林里芝哥宣言而參加總督會議的，有印度教大乘會，該會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瀋殖於印度教——回

教種籽的地層上，其領袖沙瓦卡爾常駁斥國民大會或回教聯盟代表對印度的發言權，還有自由黨全印聯盟，它代表着印度教的官吏，調停者以及固定工業和地主階級等的利益，並擁護政府的一切計劃。

因此那些在英國反對對印進步的政治團體，往往在自己的論證裡指印度內部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

綜觀上述，證明英國既不能走上與國民大會迎合的路，但也不能蔑視回教聯盟，因為印軍裡的士兵大多數為回教徒，又證明在抵禦外敵的情況下決不可引起印教與回教或王公與國民大會室內操戈的內戰危險；更證明如英蔣所謂不降「在橫渡激流中換馬」——不能在作戰的環境下涉及憲法上的問題。

國民大會認為自己並不是印度教的代表，而是全印的代表；據第一個統計，它統有四百五十萬會員，而另一統計則為七百萬會員，其中也有回教徒，如大會主席沙德本人即為回教徒。

回教聯盟在印回民間，具有相當勢力，反對國民大會代表全印名義的發言權。總之最近國民大會與回教聯盟間的紛歧參差，已成為英印協調途上的障礙，回教一向趨近英印政府，常予以戰爭中的援助，但它劃分印度的方針，並未博得英國官方殖民地團體的贊同。

克利浦斯之行

法西斯德國的閃擊蘇聯，和因此而形成的新的國際環境，不能不影響及印度了。印度輿論一致地同情蘇聯為爭取自衛和全民族獨立的鬥爭。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印督宣佈擴大執行委員會和成立民族國防委員會，但國民大會拒絕加入該項機構，而要求成立責任國民政府，回教聯盟則提出以許與它在每個政府機關內取得與國民大會同樣多的席次為它參加該項機構的條件。主席真納總令會員——孟加拉，旁遮普及阿薩姆等省的省長退出國防委員會，但孟加拉省長退出國防委員會以後，同時復類似抗議而退出回教聯盟，聯盟內部有真納的反對派呼籲與英國最積極地合作，與國民大會成立協調，並拒絕「巴基斯坦」。誠然，在國民大會內亦有由前任馬德拉斯省長領導的黨羽主張與英國最密切地合作，與回教聯盟於友誼的協調。

最近活動最積極的，首推自由黨，他們要求成立國民政府，將政府機關和軍隊皆印度化，並號召與英合作，與印度各黨成立協調和統一對戰爭上的

努力。

由於印度民衆主張參戰反抗侵略的怒潮，澎湃奔騰，致一向支持不抵抗政策而不抵抗侵略的政策（雖精神上譴責法西斯主義和侵略政策）者的甘地，開始失去在民間的勢力，而於一九四一年抄辭職引退，但他在國民大會仍有龐大的勢力。

此時英國政府在自己方面，開始尋求與印度協調的途徑，一九四一年秋釋放被拘的國民大會領袖和大批的政治犯，國際環境註定了英印雙方協調的必要性，軸心國無從的向印度一角投送着耽耽的虎視，他們企圖在印境展開着破壞的工作，佈置破壞的初着，他們散佈煽惑的宣傳，並盡力征募赴印的間諜。

因戰爭擴至太平洋上，越南，荷印，馬來，新加坡和緬甸的相繼失陷，造成了侵入印度的直接威脅！那時戰爭的經驗明顯地告訴我們：民主國之在馬來，荷印及緬甸的失敗，乃不僅是軍事上的且是政治上的因素的結果所致，實言之，即以當時的統帥和政府的不知完全利用反法西斯侵略的正義與自由鬥爭的有利政治環境和在從軍官與土著民衆聯絡的困難時以及動員這些民衆爲民族利益而反侵略鬥爭的工作上缺乏決心和沒有採取最有效的方法以揭穿軸心國狂謔欺騙的宣傳及爲「第五縱隊」的破壞工作等結果所致！

一九四二年二月卅吉爾政府改組，新任黨魁大臣兼下院領袖斯塔弗爾。克利浦斯出席二月二十六日國會時，涉及印度問題稱：「政府正和大家一樣，當印度面臨着威脅本土的危險時，對其力量與團結，至爲關切。」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英政府發表關於印度問題的官方聲明，并指引一九四〇年八月宣言上戰後與印度自治法全稱：克利浦斯現派赴印，謀與印度領袖進行談判，此後並將竭力「代表政府不僅從印度的多數派方面，且須從各少數派（其中以回教徒爲最多，並在國內生活各方面具有超越作用）方面取得協調的必要程度。」

三月二十日克利浦斯自與印度領袖舉行首次談話後，即在新德里記者會議席上宣示英政府的建議，其建議要點如下：

- 一、英國政府準備建立印度聯邦，名爲英帝國自治領。
- 二、軍事行動終止後，立即設立選舉機構，以備制定新憲法。
- 三、英屬印度任何省份，如不願加入新憲法，得保持其現行憲法地位，但將來仍得自動加入。

- 四、制憲機關，不得破壞英國保護種族與宗教方面少數份子的權利。
- 五、軍事行動終止後，立即實行省選舉，下院當選議員應組織選舉委員會，並籌備制憲機關的選舉事宜，印度聯邦根據居民人數比例選舉代表。
- 六、在制定新憲法以前，英國負責並保持指揮印度防務的支配權。
- 七、印度自由黨，得被邀請參與政府。

克利浦斯並在建議的註釋內指稱：新印度聯邦法令並未消除其脫離英屬的權，將在軍事行動終止以後，不論戰事已否結束，即開始制定憲法。英政府不擬滿足關於「巴基斯坦」的要求，即是分印度爲二國——印教國與回教國。

但是克氏多次談判，未收成立協調的效果；國民大會因在若干最大的問題上意見背馳，而拒絕了英國建議，並仍堅持印度獨立的公式以代自治領法令，雖然克利浦斯解釋依憲法成立的印度政府將探行退出英帝國的決議。

國民大會尤其反對建議內保留各省有不加入新憲法權利的規定，最後就駁斥聯邦加入制憲機關的反民主主義，堅持該機關的藩邦代表須由人民選舉，不得由王公指派。但是凡一切已促成談判破裂的有決定性的不調意見，不

是猶與於印度將來建設問題有關，而是發生於當前任務的障礙。

大會要求立即成立印度國民政府以負國內的一切全責，不欲受加入制憲的擴大執行委員會的拘束（該委員會現有八印度人，五英國人），大會堅持應將國防指揮權移交國民政府，對克利浦斯主張以國防上決定性的權限，擴於英國統帥如執行委員會的軍政部長之手而印人只負國防上其他任務的最後建議，不表贊同。

回教聯盟同時亦拒絕英國建議，真納聲稱：凡憲法上任何改革而未規定「巴基斯坦」者，概不同意，但他又堅決地反對成立國民政府，謂國民政府之成立，將使國民大會獲得其中的決定地位。

面對侵略威脅的印度

克利浦斯談判之無結果，自然阻礙了動員印度物資與後備力以抵禦外侮的進程，尤其阻礙了針對軸心寇謔宣傳和「失敗主義者反英情緒」的鬥爭。關於這，克利浦斯曾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廿九日在議會所作印度之行的總結內

敘述甚詳。然而不論侵略者宣傳手法如何，但顯然自克氏訪印以後印度迄未弛懈其防禦外侮威脅的努力。印度民族無疑的皆洞悉當前威脅的危機。國民大會領袖尼赫魯於四月十三日聲稱：德國與日本如獲得勝利，實為全世界的悲劇。他檢視着那些以為在爭取印度的戰爭時，印度民族可袖手旁觀的幻想，並稱：「我希望印度民族反抗日本人至最後一滴血。」他回答與英合作的問題時謂：「不管既發生的一切情形如何，吾人當然不應妨礙英國在印的軍事努力或吾人友邦美國可能在此表現的軍事努力，吾人希望軍事上努力，能最速度發展，吾人希望人民繼續工作，不背自己的崗位。」

最後，國民大會於四月二十八日宣言內聲稱：「聯合民族均應承認印度獨立，同時吾人喚起民族抵抗侵略，絕不屈服於任何情況之下。」

雖然有上述各種聲明，但印度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於五月五日通過的議案，仍充滿了甘地主義的精神和不抵抗外敵的方針。議案內稱：「如侵略果於來臨，自必予以抵抗，但只能採取非武力與不合作的方式，因為英政府妨礙了民衆本身的國防組織……，以英政府的立場而言，它並不需要吾人任何援助，只期望吾人不干擾而已。」議案內更稱：外國軍隊之抵達印度境內，使印度蒙受權利與自由上的損失。」

但此議案無論在印度本土各階層中或國外，民主國內，都未取贊同。國民大會領袖之一即前任馬德拉斯總理巴扎哥巴拉差坦亞在執行委員會常會提出第二議案的草案，要求實行新民族政策和建立抵抗侵略的國民軍，此外並要求與印回密切合作，該議案會經馬德拉斯立法會的國民大會派通過。重慶報界亦對印度國民大會上項議案予以批評，并呼籲大會與英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密切合作，勸告國內一切資源以抵抗威脅印度民族生存的侵略者。

總之，不容忽視：外間的環境是組織印度國防和動員其作戰物資的最有利的因素。一九四二年三月初，蔣委員長之訪印，顯調印度與中國民族意志團結，永遠結成弟兄一致的聯繫。同年四月四日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之抵新德里及其參加克利浦斯舉行的談判以及美國武力在印環境的表現，更皆證明美國對印度防禦日本侵略的關心，至印度民衆對蔣總統的同情是影響印度的重大因素，更不待言矣。

印度擁有無數的人力，廣大的原料和相當的國防工業資源，自戰爭以來

，其所有工業，均已軍事化：如建立新的兵工廠，尤其化學，砲彈等工廠，建立由美國人協助的航空工廠。印度並製造坦克車，裝甲車（一九四一年已造三千輛）自動車，小型兵船（一九四一年自製軍用船三艘）爆炸物，砲彈（一九四一年由印度運出六十萬砲彈），機器，大量被服（一九四一年每月達七百萬件），鞋履（每年三百萬雙靴子），以及皮質裝具降落傘等。

但是，印度本身的工業基地，對於現代國防的需要，當然不敷甚鉅。由於缺乏足量的武器，阻礙了印度軍隊的擴充。印軍在戰時一九四一年底以前，由二十三萬七千增至一百萬人，其中機械化部隊的比重，由百分之二增至百分之二十。此後印成的武裝力量且有靠着新的人力補充而不斷地增長。可能，如在一九四二年春季，每月約有五萬至五萬五千的志願兵在印軍登記。總之其在軍需上動員國內一切資源的範圍與速度關係着印度防禦當前直接侵入威脅的成續，實為鉅大！

——原文載蘇聯一九四二年世界政治與世界經濟五——六號

新華副刊

本刊內容包括文化方面問題的評論，簡短雋永的短論、書評、劇評、反映各階層人民生活的描寫以及各種文藝作品，並經常轉載後邊區的文藝作品與歌等。茲為便利讀者保存查閱起見，特每月另為印行發售，「團結」「青年生活」「婦女之路」亦均附印在內。歡迎讀者購書，按照刊期定戶辦法長期惠訂，手續簡便，並可郵寄郵費，如蒙賜顧，即請惠款，以憑辦理。

新華日報圖書課

貨幣底辯證運動

★★★

一 一件迷人的東西

在今天，研究貨幣的本質及其運動的形態，是有現實意義的。物價在昂揚，幣值在波動，這種情形，刺激人們去追求它的原因，而深刻地認識貨幣的本質及其運動，則為解剖這種現象的前提。很清楚，如果不懂得貨幣是什麼東西，那是沒法分析物價，更沒法分析幣值的。

貨幣是一件迷人的東西。「金銀非天然為貨幣，但貨幣天然為金銀」。所以，莎士比亞在描寫黃金（作為貨幣的黃金）時是這樣的寫着：「金，黃的，光澤的寶貴的金；有了它，黑的會變白，醜的會變美；邪的會變正，賤的會變貴，老的會變少；怯的會變勇。」黃金之所以有這種魔力，是因為它取得了價值的獨立形態。黃金之謎乃是貨幣之謎。所以說：「金與銀，一從地中心出來，便為人類勞動的直捷體化物。貨幣的源頭，便是由此開始的。人在社會生產過程上的原于一樣的行為，其生產關係的完全不受人支配且與個人意識行為相獨立的物的姿態，最先，是由勞動生產物一般採取商品形態這一事實情顯現出來的。貨幣拜物教的謎，即是商品拜物教的謎，不過，前者比後者還要更迷惑人的眼睛」吧了。

庸俗的經濟學者之研究貨幣，不是在揭去貨幣拜物教的黑幕，而是在使它這種神秘性更神秘，更不可理解。物價越昂揚，幣值越波動，則這些說法更加紛紛的呈現出來了。為了真理，我們實有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再說一下之必要。

從社會經濟的發展史來說亦好，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轉變來說亦好，貨幣並不是一件靜止的永無如斯的东西。有它的來源，亦有它的去向。

許滌新

★★★

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從聯想的，運動的觀點去把握這一經濟轉變的本質。儘管庸俗經濟學者中有所謂「動態學說」，但是，這種「動態」，畢竟是可憐得很的，因為他們仍在形式邏輯的泥坑中翻筋斗。在形式邏輯中翻筋斗，其所標榜的「動態」，不外是「平衡的停止」而已。把「平衡的停止」作為「動態」，還有什麼「動」之可言呢？

本文的任務，是在於使讀者對貨幣的本質，它的運動的特殊形式，有一個比較系統的了解。因此，一些屬於經濟常識的問題，暫時略而不談。因為這些問題如果一齊扯進去的話，則對於貨幣的辯證運動，反而不易弄得清楚。馬克斯運用了唯物辯證法，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內部，得出了深刻的剖折，從其中發現了這一社會的發生與滅亡的特殊法則。在其中，貨幣這一個經濟範疇，亦是辯證地發展着。但因為「資本論」及「政治經濟學批判」，都是辯證而深刻的著作，在「浩如煙海」的情況之下，是不容易找出這一根線索的，所以，作者擬把這個課題單獨提出來研究。

下面便是貨幣的辯證運動的道路。

二 貨幣是商品內在矛盾展開的產物

貨幣也是商品，不過，它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商品。貨幣之所以具有這種特殊性，它之所以成為商品中的異類，那是由於商品的內在矛盾的運動的結果。我們曉得，商品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統一體。商品中的使用價值與價值是互相依存的，但同時又是矛盾的，對立的。很明白，沒有使用價值的東西，必不能有價值，但生產者對於他所生產的商品，不能同時取得它的價值，又取得它的使用價值。這就是說，自己消費與拿去賣錢不能在同一商品內

時取得。而且使用價值與價值的運動，亦是矛盾的。「使用價值的量的增加，即是物質財富的增加……但物質財富增加時，價值量可以同時減少。這矛盾的運動，是由勞動兩重性引起的。」所謂勞動的兩重性就是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具體勞動造成使用價值，抽象勞動造成價值。商品生產的勞動之所以具有兩重性，乃是商品生產底基本矛盾的揭露。「在商品生產中，社會中每一份子底每一工作，一方面是社會勞動總額中的一部份；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各散漫的生產者底私人工作和個人勞動。」獨立生產者私人工作底社會性質中所包含的這種矛盾，就構成爲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間的矛盾，而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則是以此爲基礎的。

貨幣是測量價值的總量，是價值底物化，是抽象勞動的表現物。商品世界之所以出現這一特殊的東西，乃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結果。「交換過程之歷史的擴大與加深，又使原來在商品性質中包含着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展開來。爲商業的便利起見，這種對立，有在外部表現出來的需要。這需要，引起一個獨立的商品價值形態，且不絕進行，終於使商品分化爲商品與貨幣。勞動生產物轉化爲商品，這一特殊商品，亦就轉化爲貨幣。」貨幣之出現乃是商品的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而同時，又是商品底內部的矛盾之表現爲外的對立。「交換過程使商品分化爲商品與貨幣，引起一種外部的對立，以表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內部對立。在這種對立中，當作使用價值的商品與當作交換價值的貨幣對立着。就他方面說，對立的兩方，都是商品，都是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統一。但這種差別物的統一，是似相反的方法，表現在兩極上，並由此表現兩極的相互關係。商品實際是使用價值，其價值性，僅觀念地，表現在價格上。它亦就由價格，把對立的金，當作實在的價值形態，而與其發生關係。反之，金的物質，却只當作價值的體化物（貨幣）所以實際是交換價值。它的使用價值，僅觀念地，表現在相對價值的表現的系列中。它亦就在這系列中，把種種對立的商品，當作它的實在的使用價值的總和，與它發生關係。」由此可見，商品與貨幣的對立乃是爭奪在商品內部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在外部展開，前者以後者爲基礎的。離開這種基礎而談貨幣，則貨幣就會被視爲「莫明其妙」的東西了。

貨幣出現以後，直接的物物交換便爲商品流通所代替了。商品流通的過程是：商品——貨幣——商品。在這裡，直接生產物交換之個別的地方的限制，是被拋棄了；人類勞動的代辦機能，是發展了。但同時，因爲在商品流

通中，每一種商品在形態變化序列中盡成的循環，就是這樣與其他各種商品的循環，結着不解緣，所以商品流通發展出一個社會的自然關係的全體。這是不受當事人駕馭的，而且，在這兒，直接的生產物的交換，因使用價值轉換地位成轉換主人而逐漸，反之，流通過程却不是這樣，貨幣雖從一種商品形態變化的系列脫離，但決不因此而消滅。它會隨時在商品在流通界空出來的位上補充進去。流通使貨幣「僕僕風塵」，沒有止息。

「商品的交換過程，包含諸種矛盾的互相排斥的關係。商品的發展，不會拋棄這個矛盾，却爲這個矛盾，創造一個運動形態」。現在，讓我們把商品形態的變化底二個環節——賣與買——拿來研究一下吧！賣與買，被視爲對立二個人（商品所有者與貨幣所有者）間的相互關係，乃是同一行爲；但被視爲同一個人的行爲，則賣與買爲兩個對立的行爲。他可以在出賣其勞動生產物之後，即時購買其所需要的另一種商品；但亦可以把貨幣裝在口袋裏，不急于馬上進行購買。還麼一來，問題便發生了。因爲各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聯系，祇有經過貨幣才能實現出來，如果他不能賣掉其商品，則其私人的勞動，就不能成爲社會勞動的一部份；而同時，一種商品的形態的變化，是與他種商品的循環聯系的，沒有人買，誰亦不能賣。某一人之賣而不買，祇會使另一些人的勞動生產物賣不出去了。馬克思在分析這個問題時，這樣的寫着：「在直接的生產物交換上，本人勞動生產物的價值和他人的勞動生產物之取得，有一種直接的同一性。這種同一性，在流通中，分變爲賣與買的對立性了。說這種獨立而又互相對立的過程，形成一個內的統一，無異說，這個內的統一，是在一種外的對立上運用。內的非獨立（相互相補充之故），進爲外的獨立。這種情形發展到一定點，這個統一，便必須顯烈的，由一次恐慌來維持。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私勞動必須表現爲直接社會勞動之矛盾，特殊具體勞動必須表現爲一般抽象勞動之矛盾，物的人格化與人格的物化之矛盾，總之，這種內在的矛盾，都在商品形態的矛盾中，取得了發展的運動形態。這種運動形態，包含恐慌的可能性，但亦僅包含恐慌的可能性。」單純商品生產本身是不會發生這一矛盾的，但到了擴大的商品再生產的時候，恐慌便成爲現實的了。在那當兒，「商品的流通，立刻停頓起來；流通的工具——貨幣，轉成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及商品流通的一切法則，都顯倒置。經濟的衝突，達於極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生產力起來反對他們所已超越的生產方式」（恩格斯）；「反社林

論「中譯本三七五頁」。這是本文範圍以外的話，我們只能在此打住。單純商品流通中雖不可不備這種風暴，却可看出：恐慌的可能性了；却可看出：當矛盾採取了外的對立的形式的時候，就不可能在發展中引起自身的危機了。

貨幣好像一面鏡子，它自身上反映着社會關係底矛盾；它永不靜止，時時刻刻在自身上反映着這些矛盾。在價格形態上，不僅可以有價值與價格（貨幣表現）之費的不一致，而且可以包藏二者間的矛盾，以致貨幣雖然足商品的價值形態，但價格可以完全不表現價值。本身決非商品的東西，如良心名譽等，亦可由其所所有者，拿去換取貨幣，並由他們的價格，得得商品形態。在流通工具的機能上，它反映了互相對立互相補充的賣與買兩個階段的統一或獨立，反映了物質代謝的活躍或停滯，同時，又進一步的反映了商品生產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使商品拜物教表現得更加鮮明。這就是某些商品生產者空耗了他的勞動，原料和工具而生產出來的東西，有時竟賣不出去。在作為貯藏的貨幣的時候，它又反映了貯藏者把他的肉慾犧牲在黃金拜物教面前的矛盾。因為「貨幣貯藏的勞動，本來是無限的，從質的或形式的方面看，貨幣因為可以直接和每一種商品變換，所以是無限的，是物質財富一般的代表。但從量的方面看，則現實的貨幣額又是有限制的，祇是效力有限的購買手段。貨幣在量方面有限在質方面無限的矛盾，使貨幣貯藏者，不絕的，像西訓法斯（Sisyphus）一樣，從事於苦澀的工作。」在支付手段的機能上，它反映了債權者與債務者的對立，而且這種對立還可與商品流通相離而獨立起來。古代的階級鬥爭，主要是債權者與債務者的鬥爭。在羅馬，這種鬥爭是因平民債務者沒落為奴隸而告終結的；在中世紀，則是因封建債務者的沒落而告終結的。債權者與債務者間的貨幣關係是他們間更深刻的經濟生活條件的對立之反映。到了勞動力商品化，貨幣轉形為資本以後，貨幣的運動便反映着資本的運動，便反映着勞動力的所有者與貨幣的所有者的對立了。

如果從貨幣自身的關係來說，作為流通工具的貨幣，與作為對商品交換價值之獨立存在形態的貨幣，是對立的。因為作為貨幣的自身來看，他必須以金身或銀身出現。在這種情況之下，它是貨幣商品，不像用作價值尺度那樣，純粹是觀念的；亦不像用作流通手段時那樣，可以由他物代表。它必須凝固成爲唯一的價值形態。就以支付手段這一機能來說吧，他本身又包

含着一向直接的矛盾。「在各種支付互相抵銷時，貨幣只在觀念上有計算貨幣或價值尺度的機能，而在支付必須實行的，它並非亦作流通手段的並非充作物質代謝的暫時的媒介的形態，却是當作社會勞動的特別物化，當作交換價值的獨立存在，當作絕對的商品。這種矛盾是在名叫金融恐慌的生產恐慌商業恐慌中爆發的。」在這種恐慌中，商品與共價值形態（貨幣）的對立，激化爲絕對的矛盾。到了這種時候，「貨幣必須立即地突然地由觀念的計算貨幣變態，急變爲現款。平常的商品是不能代替它的。商品的實用價值是無價值的了；商品的價值，在它自己的價值形態之前消滅了。」

總而言之，貨幣是商品內部矛盾的運動的產物，是商品分裂爲使用價值與價值兩極的必然結果。貨幣之產生是商品的內部矛盾之解決，同時又是新的矛盾的展開。因為這樣，交換過程中的內在矛盾，便呈現爲商品過程中質與量的對立了。內部矛盾在發展中，是必定轉化爲外部對立的；內部矛盾的發展成長過程，又必形成對立體的轉化。貨幣是商品的轉化，而資本又爲貨幣的發展（當然要以勞動力的商品化爲前提）。資本主義制度一經成立，商品生產的矛盾便發展了。單純商品生產中的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發展開爲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亦就發展爲現實性，而貨幣的支付手段的機能所包含的金融恐慌的矛盾，亦就發展爲付的運額與大爲的清算組織之高度發展而發生了。這一切，都是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人形式之間的矛盾之上展開起來的。只有否定了這種資本家的佔有方式，只有生產手段的社會化，才能解除商品生產所這下來的種種矛盾。馬克思曾論及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之主張保留商品生產而又想把「貨幣與商品對立」廢除，等於廢除馬教皇而保持天主教，其原因就是如此。

貨幣與商品的對立是怎樣展開下來的，現在，讓我們進而看看貨幣運動中的質量互變的關係吧？

三 貨幣運動中質量互變的關係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馬克思對於相對價值生產一說，說到協業、分工及手工工業，機器生產及大工業的時候，指出數量上的變化，

變更了事物的質量，反過來，質量上的變化，亦變更牠們的数量。這是比較顯著的方面而言，就是在敘述貨幣的時候，亦充滿着這一法則的許多例子。

在下面，我們已經指出貨幣是商品內在矛盾的運動的結果，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在外部的展開。現在的問題是某種商品如何變成貨幣呢？商品是某種商品的自然形態，如何成了社會公認的等價形態呢？回答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商品所有者的實踐，是交換的種類與次數之增多。在生產物的直接交換的階段中，交換品還沒有與其自身使用價值或交換者個人需要相獨立的價值形態，「自加入交換過程的商品數目增大，種類增多之後，這樣獨立的價值形態，就是必要的了。」換言之，許多商品所不齊都把他們的商品與特種商品相交換。一切商品的社會行爲就使這個特種商品變成一般等價物的商品。交換品數量之增大與種類之增多，這並非變。最變的結局，產生「貨幣」，而貨幣產生起商品與商品交換過程的質變。貨幣雖然由商品世界中挑選出來，雖然它的本身原來亦是商品，但它是絕對的商品，是與其他一切商品相對待的東西。在商品與貨幣的對立之中，一切商品是作為使用價值而存在着；反之，貨幣是作為交換價值的獨立形態而存在着。故貨幣是商品而同時又是商品底否定。商品一經變成貨幣，則物物交換便變成商品流通了。「商品流通不僅在形式上，即在實質上，也是與直接的物物交換有別。」物物交換只包含二個極端二個互補的人物，而商品流通則包含四個極端和三個互補人物。這就二商品與貨幣對立（賣）和貨幣與商品（買）的對立。在第一幕中登場者有二個人，即賣者與買者，但第一幕中的賣者到了第二幕時却成了買者了。此時，他是與第三個商品所有者對立的。在這裡，生產物直接交換之個別地方的限制是被棄掉了；一個商品的循環與其他商品的循環連結着不離了。如前面所說，直接的生產物交換，因使用價值轉換地位或轉換主人而告終結，但在流通過程中，貨幣却不斷地在流通界中活躍着。這種變化，使商品生產的範圍擴大了，使人類勞動的代價機能發展了。這是質變量亦變的說明。

從貨幣機能的本身來說，亦如此。本身無價值的東西——如紙幣——可以有貨幣的機能，就是例證。由於貨幣流通的擴張，金鑄幣便以種種程度，漸次消滅。貨幣的種類與金的實體（指金鑄幣），名義上的內容與實在內容，開始分化了。這種事實，隱含着二個可能性，即，有貨幣機能的金屬貨幣，可以由他種材料造成的假幣或象徵幣來代替。輔幣就是就在這種情形之下

產生的。更進一步發展下去，金的鑄幣存在，亦可完全與其價值實體分離了，於是乎紙幣就應運而生。輔幣的金屬內容，可隨着由法律規定，牠們的名義內容是超過於其實在內容的，牠們只有在極小比例的領域內才有強人接受的資格。這都說明輔幣與正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紙幣呢？它本身是完全無價值的東西，牠的運動的規律又與金鑄幣的運動的規律並不相同。可以說：輔幣與紙幣，都是與金鑄幣異質的東西，這種異質的東西，是由於貨幣流通的擴張，由於鑄幣重量的漸次磨損而來的。這是量變引起質變。如果單以紙幣本身言之，它的發行數量，若與流通界所吸收的金幣量保持平衡，則每一單位紙幣所代表的價值，與金鑄幣本身一樣，並無軒輊；若超過流通界所吸收的金幣量，則不管超過多少，金幣的紙幣紙幣能代表這多的金幣量，從而每個單位紙幣所代表的價值，就會比例下跌了，「其結果，無異金充作價格標準的機能已經起了變化」。這又是量變引起質變的實例。質變了，新的質必定會引起量的變化的。輔幣是正幣的衛星，牠們是在正貨的數量以外，增加發行的東西。牠們在支付最小金鑄幣的尾數時，將與金同時出現。這就是說，輔幣之出現，增加了貨幣的總額。至於紙幣，它的流通法則係以紙幣代現金（或銀）的比例為根據，但歷史上的事實，却處處暗示我們：由於財政的需要，由於發行的便利，在極大多數的情況之下，紙幣之發行，總有超過流通界所能吸收的金（或銀）的一定量的傾向。從另一方面來說，輔幣之出現與紙幣之發行（在一定限度以內）是便利於商品流通的，這樣，商品流通便可更形擴張了。這是質變引起量變的證明。

從作為貨幣本身的貨幣來說，貯藏的機能亦是從商品流通之發展而產生的。「隨着商品流通的擴張，貨幣的權力是增加了。貨幣成了富的隨時可以使用的絕對社會的形態。」因而，某些人便把價值與價值形態看成一體，於是，貨幣便成爲貯藏的自的物了。爲了這目的，必須斷絕商品流通，不用作享受品的購買手段。對於購買手段說來，貯藏是一種新機能，而這種機能，乃是由於商品流通的擴張所引起的。新機能是質變，商品流通之擴張是量變。前者是以後者為基礎的。支付手段的機能，亦復如此。「商品流通的擴張，引起了若干關係，使商品的讓渡，得在時間上，與價格的實現分離。在這種情形之下，賣者成了債權者，購買者成了債務者。商品價值形態的發展，在這場合變化了，貨幣也取得一種新機能——支付手段。這又可看出，由於商品流通的擴張（發展），引起貨幣機能的質變（支付手段的顯機能）」

由於商品流通的擴張（發展），引起貨幣機能的質變（支付手段的顯機能）」

。再由此推展下去，信用貨幣（新的質）發生了；信用制度推廣了，而信用制度之推廣，又使貨幣充作支付手段的機能更加擴大。到了商品生產發展到相當高度和範圍以後，貨幣充作支付手段的機能，就擴大到商品流通領域之外，成爲契約上的「普通商品」，地租賦稅等，皆由現物支付變爲貨幣支付。這一切，都貫穿着質變互變的線索。至於世界貨幣，更明顯地是商品流通發展的結果。世界貨幣可以充作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購買手段與財富一般之絕對的社會體化物；它解除了價格標準，鑄幣、輔幣，和價值記號的地方形態，再還原爲黃金屬的條塊形態。這些特徵，與以前各種機能不能併爲一談，這是一個新的質，而這個質又是以商品流通之發展的最爲前提的。但反過來，只有到了世界貨幣的場合，貨幣的「存在方法」才能和它的概念相一致。

貨幣是資本開始時所採取的形式，但要使貨幣轉化爲資本，必須以勞動力之可以購買爲前提，必須使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儘可能支付勞動，以生產比勞動力的價值更大的生產，則資本才能現實地完成。在這種，貨幣所有者（資本家）必須擁有一定量的貨幣額。米丁對於這個問題有極簡約而扼要的說法。他說：「……誰有獲得一定量的剩餘價值，才使貨幣所有者變成資本家，因此，祇有一定量的貨幣，才能成爲資本，就是說，必須要有那麼大的一個貨幣量，它要能保證勞動底購買，能產生那麼多的剩餘價值，這些剩餘價值，除作爲資本家本生活消費之用的一部份外，還可以增加不變和可變資本。這樣看來，資本底一個新的質地，是跟一定數量相聯的。」由此可見：貨幣之轉形爲資本（質變），是以貨幣所有者之擁有一定量的貨幣（量變），購買一定量的勞動力爲契機的。資本所有者之佔有工人底未償勞動，與獨立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等價交換分明截然不同，在這裡，表現價值（數量）的新形式——剩餘價值——的產生，亦就爲資本主義社會的小商品生產所夢想不及的了。

四 貨幣是商品的否定

否定之否定這一法則，是對立統一的法則之具體化。量變質的法則告訴我們：新的質地如何發生；否定之否定法則，則指示這一新的質地如何經

過自己否定，而從舊的質中發生出來，揭開新的和舊的順次的發展階段的內幕聯繫。

貨幣商品的使用價值有二重，當作商品（金或銀），它有特殊的使用價值，但以其特殊的社會機能來說，却具有形式上的使用價值。所謂形式上的使用價值，就是作爲交換價值的獨立形態而存在着；就是作爲價值的體化物而存在着。因爲這道理，因爲貨幣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價，故它是商品而同時又是商品底否定。貨幣出現以後，商品形態的變化，便由兩個相反的運動階段所構成，即：商品與貨幣對立，商品換成貨幣；換成貨幣與另一種商品對立，貨幣換成另一種商品。「貨幣在第一階段，祇當作定形的價值結晶，爲商品轉形之所向；在第二階段，它祇當作暫時的等價形態，是逐漸消失的。」由貨幣所聯系着的這一循環，發生着一種特殊的否定之否定。一方面，商品形態爲貨幣所否定；而後，貨幣形態又重新被商品所否定。從商品所有者的觀點來說，在循環開始的時候，商品對於他並不是使用價值，（如果對他是使用價值的話，那他便不會把他的商品帶到市場去出賣了），而在循環的終點上，它却成爲使用價值（對他的而言）了。假使我們再把商品循環整個地拿來觀察時，那末，就可知道它自身又被資本循環所否定。因爲，在前一場合所表現的商品底運動，在後一場合則變爲資本的貨幣底運動了。在前一場合中，貨幣是流通工具，而另一種使用價值，則爲其目的物；在第二場合中，最終的目的則是剩餘價值，而因爲貨幣是價值一般的存在的形式，所以，在形式上說，更多的貨幣，比原來投入流通過程中更多的貨幣，便成爲這一循環的目的了。

貨幣的第一種機能是價值尺度。這種用作價值尺度的貨幣，祇是想像的貨幣。但「想像的價值尺度後面，潛伏着硬的貨幣。」「商品，固可在其實際形態（例如鐵）之旁，憑其價格，有一個觀念的或想像的金的形式，但它不能是現實的金，同時又是現實的金」。所以，從商品所有者本身說來，現實的貨幣與現實的商品是不能同時并存的。要「現實的貨幣」，就必須否定「現實的商品」。

從流通手段的機能，產生了紙幣。紙幣是金的記號或貨幣的記號。金之所以能由無價值的記號代替，是因為它充作鑄幣或流通手段的機能獨立化了。因爲「貨幣商品」可以在流通上爲價值記號所代替，所以，在這兒，我們可以說，當作價值尺度和價格標準的貨幣商品是紙幣所「否定」了。貨幣

貯藏的機能之產生與發展，則以斷絕流通，不把貨幣用作享受品的購買手段為前提的。這就是有實無買；這就是貨幣貯藏者自己因恐的否定，因此，勞動，節約成了他的主德；多買少買，成了他的全部經濟學了。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資本家之增加財富，不在於節衣縮食，而在於擴大自己的生產和週轉。早年守財奴致富之術，為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否定了；就以金銀商品之積聚而言，這在實質上，亦是與以前的守財奴絕不同的。當其支付手段單一的貨幣儲藏，否定了當作獨立致富形態的貨幣儲藏了。在支付手段的儲藏中，因為它包含着一個直接的矛盾，所以到了金融恐慌爆發的時候，「貨幣必須立即地、突然地、由觀念的計算貨幣變態，急變為現款」。『當作交換價值的獨立形態的存在，當作對等的商品』——貨幣，否定了商品的使用價值，亦否定了商品的價值。商品與其價值形態（貨幣）的對立，激化為絕對的矛盾了。至於世界貨幣，則是否定價格標準，貨幣，和價值記號的地方形態的。世界貨幣一面否定了這些地方的形態，而同時又總會的擴張了充作一般支付手段、購買手段和財富一紙之絕對的社會的體化物，充分地發揮了充當抽象人類勞動之直接社會的實現形態的作用。

貨幣是商品的否定，而資本則為商品與貨幣之被毀——勞動力的商品化與貨幣所有者之購得勞動。在前面，我們曾說到商品循環為資本循環所否定，就是這一事實之具體表現。如果以資本與貨幣與商品的關係而言，因為貨幣與商品都是資本在某一階段所採取的現象形態，因為「資本是貨幣，資本又是商品」，所以，貨幣對於商品的否定，「消費」在資本之中了。資本是「否定」了貨幣對於商品的否定的。這是否定之否定在貨幣運動中的又一種特殊形式。

在貨幣的辯證運動中，否定的否定的終點，並不是因變態的簡單的復歸。以單純的商品流通來談，循環終點的商品，並不是出發點的商品，因為對於商品所有者而言，它已從非使用價值變為使用價值了。以資本循環來說，循環終點的貨幣，在量上，比原來投進流通過程中的貨幣來得更多，在質上又包含了一些無償勞動所構成的價值，而這一循環發展下去的結果，它將會成為以無償勞動（剩餘價值）去滋養剩餘價值的運動了。以商品貨幣及資本的發展而言，資本顯然並不簡單地復歸到商品去。資本是商品又是貨幣，資本的內容比貨幣豐富，比商品更豐富了。

否定之否定不僅完成了以前的發展的進程，而且亦是以後發展所出發點，產生新的矛盾，新的「否定」的出發點。貨幣形態為資本以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便跟着展開了。資本主義的內在法則，自己造成了新的否定。到了商品生產成爲歷史上的陳跡的時候，貨幣的消滅才有着前提。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就給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他說：

「貨幣乃是社會財富的凝塊，是社會勞動的凝塊。貨幣乃是從一切勞動者身上獲得實物的憑證，一句話，貨幣是從被榨取的殘餘。能否把它一下子消滅呢？不能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前，社會主義者就說，貨幣是不能一下子消滅的。現在我們的經驗亦證實了這一點。要消滅貨幣，還需要有好些技術上和組織上的勝利，這組織上的勝利尤其困難而重要。」

這就是說，商品生產消滅的時候，貨幣的消滅雖具有前提，但要實現貨幣之消滅。還有關於生產和分配的組織有充分的計劃。業已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蘇聯，還有貨幣之存在。這不但因為蘇聯以外，還是商品資本主義生產的世界，而且因為貨幣在蘇聯已發生了質的變北。在蘇聯，已經消滅了貨幣拜物教的神秘性，已經否定了貨幣用為榨取的工具。蘇聯的貨幣是實現計劃經濟的工具，鞏固社會主義經濟的工具。貨幣的流通手段、貯藏、支付手段等機能都是有計劃的及使用的。蘇聯各工廠所實施的自給主義，就是這一貨幣的使用之成就。為建設新社會的重要樞桿——商業政策，亦是藉用貨幣而推行着。

五、幾點提示

從貨幣的辯證運動中，我們可以得到幾點提示：

第一、貨幣既然是商品生產的前提下交換過程的必然結果，那末，在商品生產仍存在的時候，企圖廢除貨幣與商品之對立的人，顯然是幼稚得可笑的。這些人，痛恨着貨幣之「做惡為非」，打算廢除貨幣而直接代以勞動券一類的東西。這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之錯誤是在於採取商品生產這個前提。馬克思在討論價值尺度時，就在註腳上指出：「貨幣為什麼不直接代表勞動時間（例如一張錢代表一小時）的問題，實際是，在商品生產基礎上，

爲什麼勞動生產物必須表現爲商品的問題。……歸根到底，又不過是私人勞動爲什麼不能當作直接社會的勞動，當作它反對物的問題。『沒有弄清商品生產的前提，則對於貨幣這個人人的東西，是沒法理解的。』

第二、因爲貨幣是價值的物化，而其特殊商品之能負這一角色，乃是它的本身，亦是抽象勞動的結晶，亦是價值之故。所以，它在用作價值尺度的時候，雖然是想像的金，但價格完全依存於貨幣材料——金或銀的價值。那些入把確立一定重量的金的計算名稱，當作確定此重量的金或銀的價值的見解，完全是錯誤的。其實，國家的權力只能用法律去規定貨幣標準的計算名稱；它怎麼能任意把一定重量的金或銀的法定名稱，給與重量較大或較小的金或銀的。犯那錯誤的人，是把價值尺度與價格標準（計算貨幣）混爲一了。

第三、因爲貨幣是與其他一切商品對立的，價格形態表現了商品本身價值與貨幣之關係，所以，物價的波動，不但要從商品的本身去求得解答，而且從貨幣這方面去求得解答。單從片而去把指問題，是不會得到正確的結論的。

第四、因爲貨幣的運動，貫穿着量質互變的法則，在一定時期內充作流通手段的貨幣總量，受着價格變動，流通商品量與貨幣流通速度所決定，故貨幣量之大小，處處顯顯到這些因素。就以貨幣流通數量與流通速度來說，在一定的物價與商品流通量的前提下，兩者是互相消長的。『貨幣流通次數增加，則流通貨幣量減少；貨幣流通次數減少，則流通貨幣量增加。當作流通手段的貨幣數量，在平均流通速度不變時，亦不變。所以，只要按一定量的金鎊鈔票流通，即可使等量的金幣從流通界退出——這是一切銀行家熟悉的辦法。』至若在不兌換券的場合，按總量的紙幣於流通界，則其反應，不是等量的紙幣從流通界退出，而是正比例於超過流通界所需的現金量之大小而漲價。如果否認這種規律，任意的膨脹下去，則紙幣便會演着暴跌的悲劇。

第五、因爲支付手段的機能中，包含着一個矛盾。這個矛盾常常引起一種過期的金屬擾亂。在這兒，商品與其價值形態（貨幣）的對立，激化爲絕對的矛盾了。貨幣否定了商品。這分明是商品生產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如果企圖以廢除某些確定的總支付日期以求避免這種紛亂，那是徒勞無功的。

這種形式上的否定，其結果不外下面二途：要麼是徒具空名；要麼是使滿種紛亂更利害（如果把支付時期拉長的話）。因爲定期支付全部所必要的支付手段量是與支付所隔開的長短成正比例的啊！

這爲作者從上面的論述中所得到的幾個提示。這些提示並非『無的放矢』，正相反，它們都是充滿着實際的意義的。讀者們，如能細細與實際生活印證一下，便可瞭然了。

一九四三、一〇、三〇、於化龍橋。

本刊啓事

茲以物價不斷高漲，本刊不得不自入

卷二十期起重行調整訂價如左，諸希

讀者鑒諒！

零售每期	四元	三個月六期	二十二元
半年十二期	四十元	全年廿四期	七十六元

專衆半月刊社謹啓

呂不韋與秦始皇代政信(上)

秦始皇

呂不韋在中國歷史上應該是一位有數的大政治家，但他在生前不幸爲他的政敵所迫害而自殺，在他死後又爲一些莫須有的史實所掩蓋，他的存在的身影已經十分稀薄，而且呈現着一個相當歪曲了的輪廓。這是呂氏的不幸，然而不在二千多年後的今日，呂氏的真面目更想被人認識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吧。

本是濮陽人而成爲秦國千金的女婿，復經紀商業於趙國的都城邯鄲，奔走於秦國都城咸陽，可知他在當時是新興的富人階層，而他的經濟活動的範圍是跨有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各省的。他在當時是真實的一位國際貿易商人。在交通梗塞的當時，在商業上能有這樣大範圍的活動，可知他絕不是一位尋常的材料，果然他在政治上投了一次機，於是便由商界一躍而進入了政界。

關於他在政治上的那一投機，史記本傳和戰國策都有紀錄，雖然它們的內容多少有點不同。當他父親還在的時候，他算於邯鄲，結識了爲質於趙的秦國的諸庶孽孫，其人，他認爲「奇貨可居」，便回到家裡問自己的父親

- 他這道這樣一段戲劇性的談話：
- (呂不韋)：「請父曰：耕田之利幾倍？」
 - (父)：「(曰)十倍。」
 - (呂)：「珠玉之利幾倍？」
 - (父)：「(曰)百倍。」
 - (呂)：「立國家之主幾幾倍？」
 - (父)：「(曰)無數。」

(呂)：「(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糧食餘食，今建國立君，溥可以遺世，願往事之。」

(據戰國策秦策)

就這樣便再往邯鄲，以金錢資助異人，爲他布置門面，另一方面又到秦國去遊說，使異人能够爭取到繼承王位的資格，結果他是成功了，算盤真果是如了意。

異人本是秦昭王的孫子，昭王享國凡五十六年，死時已經在七十歲以上。據史記：「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這就是異人的父親。但異人的兄弟是有二十幾位的，他又不居長，居長的名叫子奚。異人的母親夏姬也沒有寵，因此異人在趙定一位相當寒微的落難王孫。他受着不韋的資助而走到意想不到的紅運，對於不韋當然是要感德涕泣的。所以他後來即了王位的時候，呂不韋便做了他的丞相。

以上所述，史策都沒有什麼不同，所不同的是呂不韋返秦之年與他遊說的情況。史記所記是在昭王末年，安國君爲太子的時候。安國君的寵姬華陽夫人是楚國的人，雖有寵而無子，不韋入秦便買贈華陽夫人姊的華陽夫人進宮，華陽夫人寵從了他，便把異人立爲嫡子。國策却說在安國君已經即位以後，而不韋所買贈者却是華陽夫人之弟陽泉君。這在年代上說來，相差要在半年以上。秦始皇是異人之子，以秦昭王四十八年生於邯鄲，當時異人已經和呂不韋深相結托，大大地闊綽起來了，再隔十年昭王去世，安國君立爲孝文王，其時年已五十三，僅立一年而又死去。如把服喪期(據秦本紀只一年)除外，則「即位三日」而已。看來戰國策的年代說顯然是有所懸誤。至所買贈的華陽夫人的親人究竟是姊是弟，無關重要，或者也有姊也有弟，而史策各記其一的罷。

因此不章初入秦遊說之年當據史記，大率是在始皇生年之前，即秦昭王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之間。當然在初入秦之後也可以再入或屢次入秦，戰國策所紀的或者也怕是最後一次立異人為太子時的遊說吧。

總之呂不韋在政治上的投機是成功了，他使異人披華陽夫人認爲嫡嗣，更被定立爲太子，轉瞬之間竟公然登了王位，真可以說運氣太好，而呂不韋的政治航程從此也就一帆風順了。

但呂不韋的投機，在一般的傳記中却還有續篇。而這篇續篇自兩千多年前以來便成爲了我國中國人的差不多家喻戶曉的故事，便是說，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這故事是太普遍了，就連我自己存半個月以前也還是深信不疑，而在讀呂不韋爲陰謀家之外，於認秦始皇爲私生子一點，尤感受着一種惡意的滿足。就在漢朝秦始皇的人，我相信，也是一樣惡意的；因爲私生子多是大英雄大豪傑，孔子不是私生子嗎？耶穌不是私生子嗎？秦始皇之所以非凡，私生子不正好是一件要素？是的，的確連我自己有時都會這樣想過，我在前曾認爲秦始皇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真正的開山，但經我近年研究的結果，我弄明白當時的情形是有點兩樣的。

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這個傳說只見於史記。本傳上說：

「呂不韋取邯鄲姬絕好舞姬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即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說（悅）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以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

這傳說雖然得到了久遠而廣泛的傳播，但其本身實在是可疑的。第一，僅見史記而爲國策所不載，沒有其它的旁證。第二，和秦中君與女環的故事，如像一個翻板印出的文章，情節大類小說。第三，史記的本文即互相矛盾而無法說通。關於第三的「大期」一語須得加以解釋。

怎麼說史記本文自相矛盾呢？因爲他既說子政母爲邯鄲姬，然而在下文又說「子楚夫人，趙家女也」，這怎麼說得通呢？而且史記又說「大期生子」，那還有什麼問題呢？「大期」據傳廣說是大過十二日，據廣說大過十月。要說不足期還有問題，既是大過了十二月或十月，那還有什麼問題？所以當時的學者對於這一事也就早有懷疑，明時的湯聘尹認爲是「戰國好事者爲之」（史記），又如梁玉繩的「史記志疑」認爲是司馬遷有意

將「大期」字樣寫出，以「別嫌明微」，表示傳說的不可靠。司馬遷有沒有這樣微妙的用意不得而知，然而傳說的不可靠倒是千真萬確的。

問題更可以推廣到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說產生？對於這層，前人也有一些推測。例如王世貞的「讀書記後」便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認爲呂不韋自己有意編造，他用以暗示始皇，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父親，應請使他長保富貴。第二種是認爲呂氏的門客們洩憤，罵秦始皇是私生子，並使天下的人知道秦國是比六國先亡。事本出於推測，本來是無可無不可，不過照王氏的說法，却未免把呂不韋和他的門客們看得太下作了。我在這兒不想多作辯駁，但却想另外提出一種推測出來。我是認爲是西漢初年呂后稱制時候，呂氏之族如呂產呂誼輩做廢秦中君與女環的故事編造的。

據史記高祖紀，呂后之父「單父人呂公，嘗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單父在漢爲河內郡山陽縣（今河南修武縣），與呂不韋所食邑河南洛陽十萬戶」在秦同屬三川郡。漢初之河南洛陽郡僅爲三川郡之一部分，共「戶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九」（漢書地理志），僅及呂氏戶口之半而已。故呂后父呂公可能爲呂不韋之族人。即更考諸族姓關係，呂后族人爲使其稱制臨朝之合理化，亦宜認呂不韋爲其族祖，秦始皇爲其族父，這樣便可對劉氏黨人說：天下本是我呂家的天下，你劉家還是從我呂家奪去的。我這自然也只是一種揣測，尙無直接證據，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斷言：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的話，確實是莫須有的事。

二

秦始皇不僅不是呂不韋的兒子，而且毫無疑問地還是他的一位強有力的政敵。秦始皇和呂不韋的鬥爭，一般的人把它太看輕了，似乎認爲的確是爲了介紹嫪毐，爲了太后宜淫，所謂「中韓之聲不可道也」的嫪毐一回事。其實這是關係極大的故事，我相信，也一定有很大的歪曲。我們且根據史記，再把這一段故事作一番檢討吧。

異人即位之後便是秦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但莊襄王也只做了三年的國王便死了，接濟便是秦始皇即位，即位時僅僅十三歲，還是一個孩子，政權不用說是操在被尊爲「仲父」的

丞相呂不韋手裡的，在這初期的幾年，呂不韋在行政上應該不會有過什麼掣肘。有之，便是在這時有那怪物嫪毐的出現。始皇八年，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官室，車馬，衣服，苑囿，馳驅，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內大原郡，更為毒園。這嫪毐究竟是什麼人呢？

「始皇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禍及己，乃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信樂，使毒以其陰術輪而行，令太后親之，以昭太后。太后曰：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許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厚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腐者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下，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請客求官，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暴九年，有告嫪毐非宦者，常與太后私通，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嫪毐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逐太后於雍。嫪毐舍人皆及其家而逐之蜀。王欲誅嫪毐，爲其奉先王功，及賓客之士爲嫪毐者衆，王不忍誅。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索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復歸咸陽，而用文信侯就國河內。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督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內，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鴆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

(據史記呂不韋傳)

這故事也僅見於史記。呂不韋在這裡所演的節目也同樣可疑。首段介紹嫪毐的一節，完全像「金瓶梅」一樣的小說，還要等而下之，實在是不成話。我看，這一定是出於嫪毐的捏造反噬。

嫪毐和莊襄王后，看來很像清末的固太后與李蓮英。呂不韋演的是李鴻章的節目，嫪毐則比光緒皇帝更能夠幹，或者更有運氣，所以結果他是佔了勝利。你看嫪毐的氣派不都是嗎？賜封長信侯，家僮數千人，無聊的說客甘願爲官的舍人的也有千餘人（和明末向魏忠賢稱乾兒的一樣），而且「事無大小皆決於毒」，這不是比呂不韋的勢力還要來得專擅嗎？照情勢上看

來，他和呂不韋一定是有鬥爭的，而戰國策策上有一段文字也恰好可以作爲這一個推測的證明。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戰若，故舉曰『魏魏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廢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國讓毒。王以國贊嫪毐，則嫪毐毒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至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嫪毐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發秦而交爲天下上，天子孰不樂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舉）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深矣。」

這說人的說法正明明指出呂氏與嫪氏的對立，太后與始皇的對立。嫪毐與太后通謀，明明有篡奪王位的野心，故當他被人查獲了之後，他就首先發亂，「嫪毐得與太后私通以發謀毒及衛卒官騎戎屠君公舍人，將欲攻新牛宮爲亂」。秦始皇乃「令相國呂不韋與嫪毐平君呂文君謀毒攻毒」。這「呂不韋」與「呂文君」固然是以爲「楚之公子，立以爲相，後徙於蜀，項燕立爲荆王。史失其名。呂文君亦不知也」。考秦只有左右二相國，於時呂不韋爲相尙未廢棄，則呂文君應該就是文信侯的別號，照道理上講來文信侯是應該協助秦始皇誅嫪毐的。在這嫪毐情形之下「戰咸陽，斬首數百」，嫪毐被生擒，除掉被處死了的人數之外，還剩的舍人也有「四千餘家」。嫪毐的勢力算被全滅。但當嫪毐生擒時，他當然儘可以說認文信侯，極盡他的反噬的能耐了。

我們看，嫪毐與呂氏和嫪氏果真是同盟，在嫪氏誅滅之後，秦始皇爲什麼還能那麼容忍，在一年之後才免呂不韋的相（九年九月除相，十年十月免呂不韋），而且僅僅免他的相？等到齊人茅索替太后遊說，讓秦始皇把太后迎回之後，而同時便出文信侯就國。又再隔「歲餘」，秦始皇要文信侯與其家屬徙蜀，便是充軍實邊，而在前充軍的嫪氏舍人等文信侯一死即被由蜀詔回。這兒對立着的嫪呂二勢力之一消一漲，或適消適漲，不是很明白的嗎？茅索無幾的是中傷了呂氏。他對秦始皇所說的話，照始末本紀，備有一「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背）秦也」的這幾句，這樣不足以說動秦始皇。說死正諫應有左列一段比較詳細的紀錄：「秦始皇帝太后不諱，幸即嫪毐，封以長信侯，爲生兩子。毒專國事，授益斷者。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鬥。願自太叱曰

吾乃皇帝(案於時尙未稱皇帝)之假父也。世人子何敢乃與吾克(抗)所與鬥者走白皇帝。皇帝大怒。毒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枚車變之。取其兩毒擲殺之。取皇太后邊之於寶陽宮。……齊客茅焦乃往。上謂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盡戮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寶陽宮，有不孝之行；縱使秦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遺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皇帝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得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寶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在命道，使敗更成，安樂之此後，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如得詳細和詳細，但自然使用着小說家的筆法，茅焦所說的話也不過把史記的文句略略擴充了一下而已。照那樣的說話，不僅不能說動秦始皇，而且反令激怒他的。什麼「假父」，什麼「門弟」，秦始皇受得了嗎？故爾像這種篇小說，也是隨腳的小說。我們如細心地從歷史的清濁以及前後事實的脈絡來抽測，茅焦所以解說秦始皇的，一定是太后與嫪毐洗刷，而對於嫪毐加以中傷。這是很容易的，便說要呂氏才有篡奪的野心；而太后與嫪毐是忠於王室的人。要這樣說，才說得始皇的意念，而始皇的意念也就正轉了。故而迎回太后，即說出不孝，而且還大下逐客令。直至十二年，文信侯不章死，其賓客三千人竊葬於滎陽北芒山，「其舍人隨者，曾人也。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誅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誅，遷，勿奪爵」。而到了秋天來，則「復遷毒舍人遷蜀者」。如沒有對立相克，這事實的證據是無法說明的。時情茅焦之說，內容失傳，諒亦無法傳於外，史公只是借筆敷衍而已。

但說呂不韋有篡奪的野心，有什麼根據可以證明始皇的相信呢？有的，這根據就在「呂氏春秋」。我們研究「呂氏春秋」吧，從那兒你可以知道秦始皇和呂不韋的衝突，就在思想上已經怎麼也不能解的一個死結。

三

「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

齊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士，厚遇之，至與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歸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集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傳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請辯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呂氏春秋」這部書到現在還存在，雖然次第已經改變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內容也略略有些零佚或錯簡。這書是在一定的計劃下編成的。十二紀每紀各五篇，尾上附一篇「序意」。八覽每覽應該是八篇，但開首的「有始篇」只有七篇，可知定然脫落了一篇。序意篇也係殘文，題名下標注「一序意」，則有始篇所奪的一篇或許怕就是「康孝」。六論每論各六篇。以上合共一百六十篇，論理是應該有一百六十一篇的。古人著書，序文照例在書後，「序意」勝在十二紀之後，但就全書看來，十二紀應該依着史記的序列，是在八覽六論之後的。

呂氏輯成這部書的年代，序意篇裡邊裏邊不得很明白，便是一「維繫八年」歲在龍澤，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謂門十二紀」云云。「維繫八年」自然就是秦始皇八年，先秦列國紀年，在全文中每每有這樣的例子，如趙國的省稱「趙」作「趙十有九年」，魏公儲稱「作都正二月」，魏公平侯孟稱「作都八月」，鄧伯氏謂稱「作都八月」，鄧公宣稱「作都九月」之類。前人不明此例，又以君讓之說與後世甲子紀年之說推不合，遂多立異說，或以爲「八」乃六之訛或四之訛，又或以爲乃統莊襄王而言，都是似是就履之譌。古人大體紀年乃依實際天象而行，與後世甲子並不一致，即此也就足證明。今更以此證明而求其一貫，那真是以不狂爲狂了。

成書於八年，草創或當在六七年時。在這時候，內則始皇已近成人，而呂氏勢力日益膨大，外則六國日見衰頹，天下將趨於一統，呂氏在這時候

成這一部書，綜合百家九流，暢論天地人物，決不會像司馬遷所說，只是用於想同列國的回公，比其比其的種種虛榮心理的。這書在漢代國文志被列於「雜家」，而「雜家」中的各書事實上要以本書為代表作，所謂「兼備並蓄，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實」，正好是對這部書的批評。「雜」之為名無疑是有點惡意的。這書不僅在思想上兼收並蓄，表現得「雜」，就是在文字結構上也每每釘釘澆澆，表現得「雜」。因為篇幅有一定的限制，各篇的長短也約略相等，於是便有好些篇目明明是勉強湊成，或把一篇割裂為數篇（此例甚多），或把同一內容改頭換面而重出（例如「應同」與「召類」，「務大」與「論大」，「去尤」與「去面」），因而全書的體裁，在編制上實在也相當拙劣的。然而這書卻含有極大的政治上的意義，也會有極高的文化史上的價值；向來的學者似乎還不曾充分的認識。

首先我們要注意，自春秋末年以來中國的思想得到一個極大的開放，呈現出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是因為奴隸制度解體了，智識下移，民權上之，大家正想求得一條新的軌道，以作為新社會的綱領。儒墨先起，貴老權之，更進而有名法諸橫，陰陽兵農，各執一端，各持一術，欲競售於世，因而互相鬥爭，入主出奴，是丹非素。即在本書中對於這種情勢也有敘述：

「老耽貴素，孔子貴柔，墨翟貴廉，閔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賈貴齊，陽生貴已，孫賈貴勢，王厲貴先，兒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以上見不二篇）「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鬥爭反為因矣。吾不非鬥，不非爭，而非所以鬥，所以爭。故凡鬥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未定其是非而先疾鬥爭，此惑之大者。」（以上見安死篇，據盧文昭校，二文當銜接。）

像這樣對立爭持的局勢，在做莊子天下篇的人便抱的是一種悲觀的態度：「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術將為天下裂」。而在呂氏則企圖「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不二）。

特別是儒墨，在當時是鬥爭得最劇烈的兩派，差不多彼此之間是不以人相看待的，誠如本書所說：「日以相讎，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讎」（下賈）。然而呂氏卻竟把它們兼合了，書中單是以孔墨對舉的辭例便一共有十一處。（見其樂，尊師、不侵、諱友、慎大、順說、貴因、高義、博志、有度、

務大諸篇。）給予了這兩位大師及其徒以同等的尊敬，這決不是儒墨可以自動地所能辦得的事，也不過道家所取的兩種「二者兼談」的態度。（只「有度」一例多少露此痕跡，蓋刊落未盡者，說詳下。）

其次，它對於各家學說兼收並蓄，但卻有一定的標準，主要的是對於儒家。道家採取盡量擷取的態度，而對於墨家法家則出以批判。這是最值得注意的本書的一個原則，也可以說是呂不韋這位古人作為政治家或文化批評家的生命。而且我們還要知道，他是在秦國繼承和，在秦國習書的人，在秦國要批判墨家法家，與在秦國要推崇儒家道家，在這行為自身已經就帶有革命的意義。因為秦法自商鞅以來便採取了法家的精神，而自惠王以來又滲入了墨家的主張。墨家鉅子的腹籜是惠王的「先生」，唐姑果是惠王的親信，還有田鳩謝子這些墨者都曾先後在惠王時代入秦，故秦自惠王時已有墨，而在昭王時却還沒有儒。

荀卿，先秦儒家最後的這一位大師，在昭王時曾入秦，昭王見他時開口便說：「儒無益於人之國」（荀子備效篇）。昭王的丞相趙國侯范雎問荀卿「入秦何見？」荀子答應他：山川形勢勝，民風純樸，百吏忠實服務，士大夫不朋黨比周，朝事無留滯，然而說不上王道，其原因就是「無儒」（荀子強國篇）。這可見在昭王時儒術還沒有入秦，而道家是更無用論了。

秦王享國二十八年，武王繼之，僅四年而沒，昭王繼之，在位凡五十六年。荀子遊秦當在四一年范雎為相以後，五二年蔡澤代范雎為相以前，或者與呂不韋的初入秦是約略同時的吧。當荀子入秦後已七八十年而秦尚「無儒」，這是事實。而在這「無儒」的秦國，僅僅十年之後，呂不韋却把大量的儒者輸入了，這却也是事實。這個事實在論呂不韋的為人和政見上是最必需注意的，然而却為向來的學者所忽視了。

把這些主要的關鍵弄明白了之後我們再去讀「呂氏春秋」，你可以發覺着它並不「雜」，它是有一定的權衡，有嚴正的取舍。在大體上它是折衷着道家與儒家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尊重理性，而對於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棄的。它採取着道家的衛生的教條，遵守着儒家的修齊治平的理論，行夏時，重德政，隆禮樂，教詩書，而反對着墨家的非樂非攻，法家的嚴刑峻罰，名家的誇辯苟察。它主張虛君主制，並鼓吹着儒家的禪讓說，和「傳子孫，業萬世」的觀念根本不相容。我們了解了這些，再去讀「呂氏春秋」，你可以

幾何的每一圖每一節差不多都是和秦國的政治相反對，尤其是和秦始皇後來的政見與作爲簡直是在作正面的衝突。

要秦始皇才是呂不韋的真正的死對頭，秦始皇要除掉呂不韋可以說是理所當然而亦勢所必然。他既說要除掉呂氏，當然是「欽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而說貼意旨，替呂氏的反對黨太后與嫪毐氏說話的人，如茅焦，難道還不曉得利用這種思想的衝突，拿來作爲挑撥離間的工具嗎？茅焦或許不必就是太后黨，但他是「齊人」，他對於秦國的君臣離間，他要中傷呂不韋，在他或許也就如魏國的「或人」那樣，正是出於忠於祖國的政略。又看秦始皇對於呂不韋的彈壓，終不歸於嫪毐氏那樣放手，也足以證明他自己是有其內替，有些顧忌。那嗎，凡在呂不韋名下的一些污穢的罪跡，我們是不能無條件地認爲真正的史實的。

四

折衷論道家與儒家的那種宇宙觀和人生觀是怎樣的呢？它是宇宙萬物出於一元，這個一元叫作「太一」，又叫作「道」，更緊樸一點的時候便叫作「精氣」。由這渾沌的一元而判生天地，便分陰分陽；由這對立的陰陽兩氣的推移而生出變化，便有萬事萬物出現。一既生萬，萬復歸於一，循環返復，無有終窮。

「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沌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有始，極則復原，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大樂）

你看，它這「太一」，豈不就是身體上的太極？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所謂「分陰分陽，選用柔剛」，和這兒的話不正是大同小異？注重變化，所謂「剝極必復，復極反剝」，不也和這兒有同一的聲譽？但這「太一」却本是「道」的別名。

「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強爲之（名），謂之太一。」（大樂）

這不又完全是道家的會物？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爲道。強爲之名曰大」（道德經上二十五章）。

這「道」，這「太一」，究竟是什麼？是觀念，還是實體，從這些文句中判斷不出。看情形，似乎就是別的篇章中所說的「精氣」。

「天道圓，地道方。……精氣一上一下，周旋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圖道）

「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爲翮，集於走獸與爲尾。集於珠玉與爲寶，集於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寶。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勢之；因智而明之。」（靈敏）

這和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或者「夜氣」，顯然又有一脈的相通了。寫這些字句的人顯然在做詩，他在這些觀念中感受着高處的陶醉，他的精神在隨着宇宙的盈虛而波動，隨着精氣的上下而抑揚，他在宇宙萬物中雖然看出了音樂。

這些文辭明明地是把儒家與道家折衷了。但是從這裡我們看出變化，却看出進化，似乎宇宙萬物只是在那兒打圈子。這打圈子的觀念表現得更具體點的，是它採取了五行生勝與五德終始的說法，這表現在十二月紀和漢書禮書中。

「二月紀同於禮記中的『月令』，淮南鴻烈中的『時則』，逸周書中也有這一篇，這或許不是呂氏門下所撰錄，但不能出於戰國以前。在這裡已經採用着石申（戰國時魏人）二十八宿的完整系統，而參差着五行相生配合。」

冬	秋	中	夏	春	日
壬	庚	戊	丙	甲	帝
關	少	黃	炎	太	神
項	皞	帝	帝	皞	靈
玄	皞	后	祝	勾	音
冥	收	土	融	芒	數
介	毛	裸	羽	角	味
羽	商	宮	徵	八	臭
六	九	五	七	酸	祀
鹹	辛	甘	苦	醜	祭
朽	腥	香	焦	尸	先
行	門	中	灶	肺	性
腎	肝	心	肺	仁	春
智	義	信	禮	貌	色
施	言	思	視	青	穀
黑	白	黃	赤	麥	牲
黍	麻	稷	菽	羊	德
此	犬	牛	雞	木	
水	金	土	火		

這里中央土一項是為呂氏所沒有的，係依禮記月令所補。五性與五事只有孟夏記裡有「順」與「視」兩項，其他也是據別種資料補充的。

像這樣凡是五項為一系統的東西都整齊地配列起來，自然不足五項的要益它一下，譬如在四季之外添一中氣，在四方之內添一中央；超過五項的果損它一下，如數減去二三四，六性省去馬。沒有的，當然可以依照這個公式從新造出，如五帝五神之類都是新編的系統。這在現代看來，當然牽強附會，有些項目簡直可笑。但在秦以後，這一套觀念更作了畸形的發展，成為迷信的大本營，妖怪的淵藪，實入於最基本的的生活習慣中，就給惡性循環的實走給一樣，是足維持了二千多年的絕對權威，到現在雖然被推翻，而它的根柢依然沒有拔盡。不過這是後來的事，是對社會使這一思想走入了迷宮，沒有得到合理的發展。這一思想在它初發生的時候，我們應當說它是反迷信的，更近於科學的。在神權思想動搖了的時代，學者不滿足於萬物為神所造的那種陳腐的觀念，故而有無神論出現，有六一陰陽等新的觀念產生。對這新的觀念猶嫌其籠統，還要更分析入微一點，還要更具體化一點，於是便有這原始原子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出現。萬物的構成求之於這些實質的五個大原素，這思想應該算一大進步。這本由于思孟兩氏所傳導（見荀子非十二子篇）而為陰陽家的術衍所發展了。在二千多年前的智識水準能分析到這樣的程度已經是不容易的，而秦以後的那一大批畸形的發展，于思孟兩氏初都無任其罪，即思想本身亦不能任其罪。要打破迷信的思想，須要對封建的機噐。我們不要看見五行說後來的迷信化，遺囑於世過深，便連它發生時的進步性都推測打倒，那是不科學，不辯證的看法。譬如近代的化學在歐洲中世紀時也曾為迷信的點金術，我們並不因此點金術的歷史而推翻化學，也不因此而否認希臘的恩披多克列士（Empedocles）的四行——地氣水火——為原子論的始祖。要用比附的方法來說吧，或者于思孟兩氏等於恩披多克列士共其一派，而兩氏初如後起的德摩克里士（Democritus）吧。原子說在印度古代思想中也有，在佛教之前勝宗以四大地水火風為「種德」，為形成萬物之根。四項原素與希臘相同，而希臘為後，可能是由印度的輸入。于思孟五行雖有三項不同，而金木兩項與風絕異，應該也有他的獨創性的。

把五行配於四季，更把五德的終始作為天地剖判以來的轉移過程，這不

用說這五行的觀念論化，但它的動機也是想利用這更舊的見解來作為更舊的宇宙萬物之生成及運動的原理，但五行節季和五德終始的次第不相一致。以此值得注意的。

五行節季是以相生為序，木→火→土→金→水，而五德終始則為土→木→金→火→水，倒數上去便是相對為序的。五德終始的大略見於漢書禮書禮同篇：

「黃炎故用水火炎，共工氏固水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颶風與共，共勝者用事。」（禮書）

「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蟲大鱗，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氣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雉集於屋。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備數，將徙于土。」（禮同）

以相生的次序而運轉，五帝和五神都各有一定的時期交代，這似乎很主，這大約就是神漢說的擴大（倒過來，當然也就成為根源）。在這兒似乎每年一次的在打圈子，五行也跟著打圈子。

以相克的逆序而轉移，五帝便要用兵爭取勝後，勝者為主，各人所主的时间無定限，主得不好便要起革命。這自然是征讎說的擴大（倒過來，當然也就成為征讎的根源）。在這兒宇宙，寧可說是人事界吧，以不定的大圈子在打大圈子，五行也跟著打大圈子。

這兩套學說斷然是來自附家，「月令」成爲了儒家的重典，我認爲一定是于思孟兩氏的系統。五德終始說分明是採自荀衍，這是陰陽家的本國。荀衍的書可惜失掉了，它的大略就靠存於本書及史記孟荀列傳。雖然受了儒家的影響，但他完全是另外一個宗派。

但在這兩套學說裡而都只認得出變化而看不出進化。儒家本來有「日新」的觀念的，就是荀衍也這樣說過：「政教文質所以三教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始治之至也」（漢書嚴安列傳），雖不十分明白，可也含有進化的念頭，特在宇宙原理中似乎沒有找到方

法來說明，或者也就是那種循環的公式太固定了，涵蓋不了實際。

因此荀氏書中在討論宇宙原理的範圍之外也透露了些進化的消息：

「文（原作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實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察今）

「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弊。恃亂，不可以恃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同上）

這很明顯地與荀氏「有易則易」之說相平行，同時也接近於荀子的「法後王」之說。更如特選覽一篇，那差不多就是上舉「察今」篇的那些話的詳細的引證，今將其大略如下：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強暴，然且猶欲萬物，制禽獸，服狡蟲，蹇蹇然聽命於時，不唯（爲）先有其備，而以繁聚耶？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若道立也。……昔太古嘗無君矣，知母不知父。無親屬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禮節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器用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也。……聖人據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特選覽）

這由原始社會進出的社會進化是很合乎實際的，這當然是古代傳說得來的概念，但在周禮的後進民族中也找到直接的證佐，特選覽中也是有所陳述的，我們可以不必多事徵引了。

五

我們隨隨一步來檢閱荀氏書中的政治主張吧。我在這兒要取一個巧，只想把一些重要的文句彙集起來，無須乎多事說明，

第一，他是反對家天下制的。

「昔堯舜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貴公）

「豈君非以阿若也，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遲興過

廢也，亂離之所以時作也。」（特選覽）

「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人）也，則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死爲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長利）

「謀樂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爲，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去私）

「先王先順民心。」（順民）

「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全）

「宗廟之本在於民。」（務本）

「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精迥）

「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愛類）

「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於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爲其務故也。」（同）

「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愛民之利，險阻之害，同。」（同）

「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會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同安居。……夫以衆者，此人君之大資也。」（用衆）

「民無常用也，無不常用也，唯得其道爲可。」（用民）

「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意爲故（惠）。」（行論）

「暴虐詐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懷寵）

第三，他是贊成修齊治平的哲人政治的。

「爲國之本在於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執一）

「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榮之顯達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強者，其失之彌遠。」（論人）

「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君弗強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尊師）

「聖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學者，不於善，於

「聖人祖德厚，而成文於天下」。(同)

「聖人行德垂己，而四方咸訪于仁」。(精通)

第四，他主張神權制的。

「堯舜賢者也，皆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六國遺)

「既莫大於政。愚之意，在必自用。自用則聰明之人從而贊之。有國若此，不若無國。古之與賢，從此在矣。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治於名也，反(語)其賢也」。(士家論)

「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猶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者」。(博覽)

「君也者，德也。德則國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世執無能，故能使眾能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分職)

「善為君者無識，其大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快矣。不備不快，此官之所以廢，而邪之所從來也」。(君守)

「得道者必辭，辭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知道矣」。(同)

「大無無事而千官盛能」。(同)

「惟孝愛，因者平。惟後者道，得命之府。故任天下而不歸(主)歸」。(同)

「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任政)

「凡君也者處平巖，任德化，以道其要」。(勿躬)

「明君者非獨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專而國治也」。(知度)

「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實而不辭。夫想才意，隨處以待。不伐之言，不誇之事，無名無實，君後自謂。以不知為道，以奈何(好)則也」。(同)

「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曰我而，人先我。以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言以實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秦應覽)

「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士節)

「古之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為君者，傷形損神，愁心勞耳目，爾慮危，身愈弱，下知畏故也」。(營樂)

「天子不聽命，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博志)

「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勿躬)

「人主好以己為，則守職者會職而兩主之為矣」。(君守)

「人主以好然示能，以好唱自賢，人主以不事待位，以不從取察，是若代有司也任」。(數)

「亡國之主必自賊，必自智，必輕物。自賊則士，自智則事，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事獨位危，士無備，無備召禍，必國士。欲位無危，必得索，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道也」。(略志)

「世主之患，在於自用，好度而惡聽，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也」。(似廟)

「人主之所惡者，以其智強智，以其能強能，以其為強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而欲強強，雖不能為」。(分)

「俗去則情，故在動為亡敗。……不可得之為欲，不可足之為求，大失生本。民人愚謗，又樹之。道氣易感，隨而不固。矜勢之智，胸中欺詐。德義之緩，邪利之急。身以困窮，雖後悔之，悔矣。巧佞之近，端良之遠。國家大危，悔之之遲，猶不可及。閉言而驚，不得所出。百病悉起，亂難時至。以此若人，為身大變」。(情欲)

「天下為公」這類的話，在現在說起來，常常是習以為常的了。但在天

以政「君之所以立，出乎衆」。君必定要賢人，才可以做得，爲了要代代都是賢人，那就只好採取禪讓的方式，未成爲奴隸制前的古代社會，的確也是這樣的。但後來奴隸制成立，成爲了家天下的方式，君位竟由子孫繼承了。以子孫來繼承君位，那爲君的人便不能保證代代都是賢人。照理想上說來，自然是以恢復禪讓制爲最好，但這不是那麼容易辦得到的。而且在戰國中葉，燕國的王哈與子之演過一次禪讓的鬧劇，鬧出了笑話，自不免爲當時學者間的禪讓說的一個打擊，因而便有虛君主制的想法出來。那樣，如人君賢則好，如不賢也就不致壞事了。故儒家主張「恭己正南面，垂拱而治」，道家主張「無爲而治」，就是法家也是同樣，只是主張用「術」（手腕）而已。只有墨家不同，它是絕端主張強力推行的。

呂氏書中的關於政治理論的系統大體上是因襲儒家，雖然在君道一層頗近於道家，有時甚至有些法家的氣息（如上舉審分覺語）。無疑地，且不承本人一定是一位民主思想者，至少可以說是一位民主的政治家，不然他是不會容許這種理論在他的名下綜合起來的。

六

「行夏之時」，是孔子擬如執政時首先應施行的一條政綱。這種以孟春建寅之月爲歲首的所謂夏曆，和中國的農業社會很適應，施行起來對於一般的農民會很感覺方便，故兩孔子特別重視它。呂氏所重視的也就是這夏曆，十二月紀便是證明。十二月紀，是一部王者的年中行事或施政歷程，是儒家式的重農制度下的一套重要的典範。故呂氏即使取自成文，也可證明他把這套典範是看得怎樣寶貴。真的，呂氏本人很有意思，他的出身雖是陽翟大賈，而他却是一位重農主義者，這是值得注意的事。

「霸王有不尤耕而或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不肖之所以殊也」。

（貴當）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實其志也。民農則讓，讓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共產復（復），其產復則重從，重從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合（原作令），不

合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共產約，共產約則疆場從，疆場從則國家有慮者有慮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奸智，奸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上卷）

他所說的這些道理究竟是不是絕對正確，我們可以不必追問，但他明白地是重農，不僅是視爲重要的生產，而且是視爲重要的政略。

儒家是主張德政的，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怨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種思想也在呂氏書中流瀉着。

「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上卷）

「古之王者，備道（通）乎天地，濟（贖）乎四海；……禮以公，小民皆（借）之。其之（赴也）敬，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敬，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授）之。此之謂順情。……豈必以威刑厚賞，嚴罰厚賞，此發世之政也」。（同）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暴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用民）

「古之若人者，仁義以治之，變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五種之於地也，必順其類而蕃息於百倍」。（禮儀）

「禮類則不莊，業類則無功，令苛則不聽，業多則不行」。（同）

注意德政並不是說不用刑罰，儒家本沒有這樣的意見，呂氏也沒有這樣的意見。（假使是刑罰，那便成爲道家。）他們只是說不能專用刑罰而已。

（假使是專刑，那便成爲法家。）孔子也曾說過「必世而後仁」，又說「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故兩呂氏同時也在主張賞罰必信，賞罰須有充實。真知道並不是矛盾。

「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慎小）

「爲民綱紀者何也？殺也，惡也。何欲？何福？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綱紀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無不用矣」

（用民）

「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溪水。又復取道，其馬又不進，又倒而投之溪水。此如者三。雖造父之所以成馬，不過此矣。不特

遺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肯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得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必有所託也。不通則敗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論，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用民）

爲了調劑刑政，儒家是看重音樂的功用的，呂氏也承繼着這個傳統，在仲夏紀與季夏紀中費了不少的篇幅來討論音樂，他接受了公孫尼子的「樂記」的理論，有時還把它擴張了。在這兒同時還盡了反對墨家的能事。

「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有欲，人勢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勢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原作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用出哉？」（大樂）

刑之大者爲兵。墨家不廢刑，故亦不廢兵。孔子爲政，須「足食足兵」而「教民即成」。呂氏也承繼着這個傳統，在孟秋紀與仲秋紀中，同樣費了不少的篇幅來討論兵，他主張養兵，而反對兵非攻之說，在這兒也盡了反對墨家的能事。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怨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愆（忤）相愆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存廢也之見，政無管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諒伐不可偃於天下。……兵之所由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偕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覆言，兵也。援推，兵也。速反，兵也。修門，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備兵）

「凡爲天下之民長慮也（原作「也慮」，今乙），其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世學者多非平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則鄉（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爲天下之長慮，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振亂）

關於「非樂」與「非攻」，像這樣對於墨家的批評，可以說是相當猛烈

，而全書中所取於墨家的地方也很少，如傅賢節用，並不是墨家的特見，墨家也沒有到墨家所主張的那樣苛刻的地步。此外則墨家兼愛而呂氏不兼，他說「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愛類）。呂氏更採取儒家的孝道，在先秦諸書中首先引用「孝經」（察微）。孝道被認爲是平天下治國家之本，「夫欲一術而百善至，百惡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孝行）。對於親疏輕重而有先後，是儒家的差等愛，並非墨家的兼愛。

呂氏也主張忠，無勝忠與孝並列。「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關於忠」（勸學）。「成身莫入於學。身成則爲人子，體而孝矣，爲人臣而忠矣」（尊師）。「賢者之事也，野費不有爲，雖體不自阿，必由理然後動，必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不苟）。這和墨家「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的「尚同」之義亦不相同，故他竟能主張到「廢其非君而其行君道者」（特君）。這是墨家思想中所決不會有的。

墨家尊天明鬼，而呂氏則輕重理智，書中也有天，但它的天是道，是太一，是精神，是自然，而不是有受想行識的人格神，上帝。對於鬼神之事也採取的合理的解釋：

「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博志）

「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動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騙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故不得不然。」（觀表）

這些是極可寶貴的話，不僅對於二千多年前的墨家是絕好的附屬，就是對於二千多年後的今日的一些觀念論者，也是極好的附屬。鬼神並非真的存在，而實在是精巧和靈智的投影，無知者主觀上的產物。在這樣的認識之下對於下等所假媒介人神的工具也就不足爲怪了。

「今世，上（尙）卜筮，故疾病瘵。」（備禮）

「今夫盜（養）者，勇力。對日下盜禍，無事焉。善者必勝。」（終正）

鬼神既不足信，則妖異自當化除，書中於「明理」篇，頗有天妖人妖，妖各類的敘述，其主旨認妖之與歸本於人事的不善，故願其篇曰「明理」。

在現代看來，其所謂「明」之「達」，雖然並不怎麼「明」，但在當年總不失為是一種理性的說法，而神而化之者已大有過之。『撰大覽』篇載有「故故事之正好說明這種態度。」

「魏王游散，得二廣而問焉。曰：若（汝）國有妖乎？一廣對曰：吾國有妖。靈靈見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廣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天之大者也。」

既不承認上帝鬼神，照儒家的思想系統上說來，便當承認自然中的必然性，便是命。呂氏對於命也恰好下了一個定義：「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聖制者不得與焉。致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士知其如此，故以義為之決（判斷），而安處之」（知分）。命，這種必然性取者固然性，在自然界中總是存在的，不必對於它低頭，也不必對於它反臉，我行我素（義），隨它去！這種正是儒家的態度，而和墨家的也恰相反。故他又說：

「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發鳴震伏，有盛衰財息，人亦有困窮屈伸，有充實遺遊，此皆天之容，物（之）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故）聖人不以私傷神，命然而待之耳」（知分）

「達士達乎生死之分，達乎生死之則利害存亡身能感矣」（前）

呂氏季實重理智的色彩相當濃厚，因此它對於淫辭辯論也是反對的。它是抱着儒家「正名」的本旨，要合乎義理，合乎實用，而不像荀子，荀子「名正則治，名實則亂。使名實者說也，聽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凡亂者刑（形）名不當也，刑名異而聲實異謂」（正名）

「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辯辭，不好淫學流說，賢不肖各度（返）其實，行其情，不離其素」（知度）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辯也，士之議也非苟辯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慎論）

「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不當誠也，莊而操與于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辯者為其所論也

，所貴信者為其所論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當務）

「聖曰之章，無事之謂，外矣」（君道）

它這所反對的是當然不止名家，就是墨家後學的辯者之流也是在所反對之列的。且看「漢兵」篇所說：「緩推，兵也。……今世之以備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恃。故說雖強，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便分明排斥的是墨家；便是「兼推」二字也就是墨子「小取」篇中關於辯論上的用語：「兼也者，曰子然，我矣猶不可以然；推也者，以其所不（否）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

七

在多士濟濟的呂氏門下，我們可以相信九流百家都是有的，墨家法家名家不用說都有，但墨家似乎顯然不佔勢力。特別值得注意的呂氏書中把墨子和孔子相提並論的地方那麼多，而却處處攻擊他的學說。但攻擊他的學說時却是混合着說教的，絕不指出任何派別，任何個人的名字。如像說「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或者說「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有時甚至於連這種混合着說教的指示都不提。這裏一定是有所顧慮的，這固然可以解釋為政治家或學者們的矜持，但我相信，在呂氏門之外，墨家之墨者一定還很多，故而不好明目張膽的傷他。

道家頗佔勢力，其中莊子的門人一定很多，書中像引莊子（去左篇）「有好奇解句與莊子完全相同，如「必已」篇差不多個個都是採自莊子的「外物篇」。又如「有度」篇的左列一節，更根據莊子的主張來批評孔墨。書中指名孔墨之過而加以批評的就只有這一節，特別是批評孔子。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馳譽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效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言負担太重），以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治。聖人不執一而治，物處之也。故曰：適意之性（莊子作「徹志之動」），心之適，去之累，適道之適（通，莊作達）。貴富顯嚴名利（莊作富貴），大者皆適者也（莊作者字，下同）。容動色理氣意，六者必心者也。惡欲

惡衰樂，六者果德者也。智能去穢取會（莊作「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者也。此六四者，蓋乎胸中而止。正則辭，辭則清明（莊無滑字字，下同），滑則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故曰」以下乃莊子庚桑楚篇的末節，明明是引書，故稱「故曰」，只是沒有把莊子標明出來而已。像這些地方自然莊子之徒透露了他的門戶。自然語氣已經和平得多，只說「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沒有說「捨擊擊人……捨棄仁義」（莊子莊子篇）那樣激烈的話。大約就因為這樣，所以掩過了主編者的眼目而未被刪掉的吧？

但無論怎麼說，儒家總是佔最大勢力的，高誘序謂「不章乃集備者（原作導）使著其所聞，雖不必便是事實，但可以說得甚近似。儒家究竟有些什麼人，可惜無從查考了，我們所能知道的就只有一位李斯。史記李斯列傳：「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可見李斯頗為呂不韋所重用，在「呂氏春秋」的撰輯上他一定是盡了力的。李斯是荀卿的弟子，在初當然沒敢棄荀卿，因此呂氏之所以特別要大堆引用荀者入秦，並大量地引用荀卿著書，我相信李斯一定參加了意見，而且這意見也就是荀卿的意見。荀子強國篇中有左列一段，便是證明。

「力術止，義術行。是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歸則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秦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與秦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成敗。順者儲之，不順者而後殺之。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樂明堂於繁死而朝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據楊倞注，以為新序作「李斯問孫卿」云云，是否果為李斯所問雖不能斷定，但荀子對於秦國抱有其人的希望，希望秦能施行荀術却是事實。儒家原來是反秦的，但到荀卿時，秦的力量已經充分強大，早遲有統一中國的趨勢，故不得不改變態度的態度。他自己也曾親親自入秦，見昭王，見應侯，為儒術傳道。他的說法沒有為昭王與應侯所採用，但不久之間也就為呂不韋所採用了。呂不韋本人無論在道的距離或秦的威勢，很有可能親自和荀

子見過面，甚至於可以說，他既不定就是荀子的門人，因為荀卿與會周禮國，同趙孝成王「講兵」，於時應該就是呂不韋在邯鄲的時候。不韋入秦與荀子應該也是約略同時。但可惜我找不出直接的證據來。即使不韋不曾見過荀子或師事過荀子，而荀子的意見由李斯間接傳到，那可是毫無問題的。

這種見解對於秦國的政治是一種改革，甚至是革命，呂不韋却在這兒把它執行了起來，雖然政治上的施設沒有留下什麼，只留著表示他的政見的一部書。這大約是因為天下還沒有統一，還在不斷的用兵，而秦國的內部也有莫大的阻力的吧。阻力的初期是后黨的讒毒，其後便是秦始皇自己了。

秦始皇誅錮錐毒的時候已經二十二歲，不再是孩子了。這位未來的暴君，據史記本紀所載生來便是不十分健全的人，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顯然都有缺陷。以下是尉繚所說的話：

「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鰲顴，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縱食人。」

這所說的前四項都是生理上的殘缺，特別是「鰲顴」，現今醫學上所說的鰲顴，是軟骨症的一種特徵。「蜂準」應該就是馬鞍鼻的，「豺聲」是表明有氣管炎。軟骨症患者，骨的發育反常，故胸廓形身形都是變異，而氣管炎或氣管枝炎是經常併發的。有了這三種殘缺參驗起來，軟骨症的診斷是毫無問題的。因為有這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時一定是一位可憐的孩子，相當受了人的輕視，看他母親的跡無忌憚，又看繼母與太后謀：「王即歸，以子為後」（呂不韋傳），在他還那麼年青的時候便有人說他快死，在企圖篡取他的王位了。這樣身體既不健康，又受人輕視，精神自難健全。為了嫉妒別人的健康利國謀報復，要建立自己的威嚴，很容易地發展向殘忍的一路，更加以他是身居王位的人，要這樣發展下去也沒有什麼防礙，故爾結果他是發展向這一條路上去了。「少恩而虎狼心」，便是這種精神發展的表徵。

始皇周圍有些什麼人，可惜也不甚詳確。在秦始皇的時候有相國呂不韋昌文君，於時不韋尚未免相，昌文君應該就是不幸，而呂不韋的思想系統不明。為太后說話的齊人茅焦，被始皇稱為「仲父」，顯然是反呂不韋的，但他的思想也沒有什麼證據。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是在不韋免相的一年，他是秦王所十分敬重的，說「衣服飲食與眾同」，而且「卒用其計策」。這從

先生是有著書的，今存「尉繚子」二十四篇，內容係官兵，當即漢書藝文志兵形勢類「尉繚三十一篇」之殘，但係依托。又藝文志雜家有「尉繚二十九篇」，注云「六國時」。顏師古引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則是尉繚乃法家，可惜這書已經失傳了。但他是法家的一點，由秦始皇喜歡韓非子的書也可以作為旁證。秦始皇利用了法家的主張是毫無問題的。

法家的主張，自孝公採用商鞅的變法以來便是秦國的傳統，但有一點除孝公以外都沒有認真實行，便是法家的君道的主張。法家也是主張人君應該「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教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賞，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小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賢者正」(主道)，又說：「君執柄以臨勢，故令行禁止。兩者發生之制也，勢者君者之資也。……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經)。這也是一種虛君主制，人主只管用人，不管行政，下司則是在彌補世襲制的弊病，秦國的列君，只有孝公對於商鞅是做到了。孝公是虛君，商鞅是責任內閣的首相。但自孝公一死，惠文王便不甘於虛君之位，把商鞅車裂了。爾後武王惠王可以說都是守着惠文王的傳統，丞相時常是換來換去的。穰侯魏冉是昭王前中會經專權過一段長遠的時期，但「夫用說，身折勢奪而以受死」，而他的位置被范雎奪去了。不幾年又換成蔡澤，但都是不安於位。

惠王的這個傳統是和墨家的君道主張一致的，人君要自己動手，強力疾作，不能垂拱待治。人君要做一切的表率，苦幹到底，假使不能苦幹，那做人臣的，做人民的，便都會怠惰，國家也就因而亂亡。惠王實踐了這種主張，可能就是得到墨家的傳授。墨家鉅子腹䵍是惠王的先生，墨者唐姑果是惠王的親信，在他的一代先後有墨者集中於秦，墨家的主張對於秦的政治不能說毫無影響。當然秦國也並沒有全部採用墨術，但部分地採用了，尤其是君道，我看是毫無問題的。

到了秦始皇把這力疾躬行的君道更是實踐到了極端。侯生盧生等批評他的話最為扼要：

「始憂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

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業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節，莫敢盡忠。上不問過而日驕，下僭伏諂以取容。

秦法不得變方，不聽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

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這真是一位空前的大獨裁者，一概是自己動手，丞相大臣都是具員，博士良士僅願飯碗，天下是獄吏的天下。這和呂不韋的主張不是如像立在地球的南北兩極嗎？呂不韋要被他趕掉，甚至於被他幹掉，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事嗎？

大獨裁者的徵候在他十幾歲時一定早有些發現，呂不韋當得在替他心焦。「呂氏春秋」一書之所以遲着在八年後出，必是有意向他說教。然而結果是無效，或者反生了逆效果，亦皆成後的第三年呂氏便失足，再後年餘便被逼自斃了。

當呂不韋免相的一年，秦始皇便使天下逐客令，呂氏門下那些儒家道家當然在被逐之列。在這時那位李斯先生便受了節，有名的「諫逐客書」是論及人口的文章，但那只是一篇煽情的諷刺，絲毫也沒有儒者的氣息。文章裏面，提到秦穆公用五子，秦公用商鞅，惠王用張儀，昭王用范雎，而於莊襄王用呂不韋便絕口不提，這正表示李老夫子的聰明。在這時呂不韋正背了時，他假如要提到他，他知道，一定會要觸犯始皇的怒鱗的。他本來是呂門的人，不與呂氏同進退，而猶願以輔秦始皇，總總於祿位，這還可以稱為儒者嗎？然而近時的論者頗有人以為他是荀子的門徒，始皇用他，便是始皇用了儒術，那橡皮相的見解恰恰說到事實的反面。事實上李斯投降了秦始皇，早把自己的所學拋進毛坑埋去了。後來在他做了丞相的時候，他的先生「荀卿為之不食」(鹽鐵論毀學篇)不是沒有原因的。其實秦始皇又何嘗用了他呢？「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那裏有他的事做？他不過體貼皇帝的最大德政，然而也不過先意承志而已。到後來在二世時代與趙高爭寵失敗，還從獄中上書有一篇丑謾功，把秦自孝公以來的一切文治武功，都寫在

自己項下，甚至於說到「橫刑罰，薄賦斂，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的話，真正是誇大得可笑。

八

秦始皇這一位怪傑，在他的思想，政見和其它一切的態度上，可以說都是和呂不韋或他的一氣正相反對的。我們認得清呂不韋，也就認得清秦始皇；反過來，我們假如認得清秦始皇，那也就認得清呂不韋。他們是怎樣正反對法的呢？我們再來檢討一下秦始皇這一面的情形吧。

還是先從宇宙觀和人生觀上來說。和呂不韋是無神論者相對比，秦始皇是一位有神論者，而且沿守着秦人的原始信念，懷抱着「一個多神的世界」。史記封禪書「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以下所載，敘述得很詳，天神地祇人鬼無所不有。「唯雍四時，上帝為尊」，至上神的存在是維持着的。在他二十七年的時候「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號天極」。信宮應該就是神宮，神者仲也，仲與信古字通用。天極者，據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這太一是上帝的別名，和呂不韋的道的太一，同名而異實。故兩極廟應該就是至上神廟。

抱着那樣一種多神的宇宙觀當然懷着極厚而迷信。儘管瑛部刻石文有着這樣的話：「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誑方」，而始皇自己却是更加「假」得厲害，否，不是「假」，而是真的在迷信。你看，他不是對泰山，禱梁父，「魂信一般方士的鬼話，求神山，求仙人，求不死藥？又因「燕人盧生以鬼神事，因奏圖錄曰：『亡秦者胡也』，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擊胡」（三十二年），這迷信的程度不是可以驚人的嗎？他信仰鬼神，不僅認為鬼神可以禍福人，而且還相信可以用法術緣繫於人。「祝官宥秘祝，原有災祥，輒祝詞移過於下」。（天官書）

這就神分類的宇宙，在他的心目中，是固定不變的，因此他不僅否認進化，而且否認變化。他自己就是至上神的化身，所以他的天下也應該萬世不變，在他之後，要「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其實這都還是隱了隱的，他自己是想長生不死，一直活到「無窮」。

有趣的是他却相信了終始五德之說：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故年始制，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也。」（本紀二十六年）

「鄭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滅六國，兵伐極煩，又并至尊之日，未暇也，而亦順推五勝。而自以為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歷書）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黃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白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也。於是秦更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晉上大呂，事統上法。」（天官書）

「自齊威宣王之時，終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說。及秦帝而齊人爽之，故始皇采之。」（同上）

這終始五德的說大約就是齊人徐市或博士齊人淳于越之流。承認天地不變，皇統萬世一系的人，却又採用了這個循環變化的說，在外表上顯然是「一個矛盾，但在始皇自己大約一點也不以為矛盾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儘可以這樣想，使水德永遠支配下去，不再轉移為土德。

在採用終始說的這一點，和呂不韋的態度有部分的平行，但呂氏在原則上承認變化，而他是不承認的，呂氏同時採用了儒家相生的系統，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而他却以建亥之月為歲首。二者之間的距離可以說依然是很大的。

秦始皇的性格相當矛盾，有時也顯然在和神鬼鬥爭。例如他二十八年東行郡縣，「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閼之，楚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又例如在他要死的那一年（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國圖備，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濱齋祠百具，而自以漚時候大魚出，射之」。像這樣，他的英雄氣概顯露得而對神鬼鬥爭了。

個和神門，和神門，事實上是有這樣的神。其所以敢於和它們鬥，是因為他自己相信就是上帝的化身，在權威上還要高一等或數等。

他的人生觀自然是一位非命主義者，他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他想永遠長生，而富貴始終在他自己的手裡。他那麼不可一世的人，被幾位狡猾的方士便玩弄得和土偶一樣。三神仙沒有下落，不死藥落了空，仙人化爲了烟霞，方士們逃跑了。但等他病得要死的時候，他依然「罪言死，罪臣」也「莫敢言死事」，他老先生可以說是不覺悟的了。然而「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呂氏節喪篇)，蓋世的怪傑也敵不過大限的來臨，也只有這詔給他的長子扶蘇：「與喪會咸陽而葬」。

他同時又是一位縱欲主義者，大約因爲不相信命，所以敢於極端享樂的吧。他的兒女相當多，二世胡亥是第十八位王子，就可以證明。讀李斯的諫逐客書，可知在秦并天下之前，已經有不少的鄭衛聲色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趙女在他的周圍，在既兼并天下以後，大興土木，在咸陽北阪上仿造各國宮室，「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之」，「咸陽之旁三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充滿着「帷帳錦繡美人」。就是在他死後，二世命「先帝後宮，非有子者用蓋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真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女子。這只是他縱欲的一項。

其次是李斯所諫的「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這正是秦始皇的室前的大享樂。「治馳道」一事書於二十七年，但這工程不止是一年的事，其比較詳細的情形見蒙恬傳與賈山「至言」。

「始皇欲遊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知遊，自九原抵甘泉，盤山埋谷，千八百里。」(蒙恬傳)

這條路還沒有通成，秦始皇便死了。司馬遷自己是走過這一條路的，他在蒙恬傳後的贊語裡說，「晉道北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盤山埋谷，通直道」。這只是北邊的一條直道，大約修築最遲，事實上另外還有好幾條直道，多少替我們留下了這功紀錄的，却要應歸漢初的賈山了。他的「至言」——上漢文帝言治亂之道的奏疏是很可寶貴的文獻，那裡面說：

「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漢書賈山傳)

這規模的宏大和修築的合乎近世式，似乎就是美國的公路都不見得能趕上。這些直道在地下斷片地必然還有保存，我相信將來在田野考古上一定會有發見的希望的，這自然要期待考古工作者留意。直道的修築對於交通的溝通上一定有了莫大的貢獻，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周文的兵長驅直入，很快就到城下的，大約就是取的直道。但始皇築這條路的動機却完全爲的是遊觀，十年之間，五大巡行，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他的宮室的壯麗當然也很驚人：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殿小。乃營作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宮室也。」(本紀三十四年)

真是堂殿皇哉，前無往古。這在賈山的奏疏上也略有記述：

「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飾以帷帳不移其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雜騎，四馬爲馳，旌旗不繞。」

兩書所說的大小應數稍有出入，或者史記是據阿房前殿的大小而言，賈山是據朝宮全體而言的吧。「三輔黃圖」也有記述，大小與史記同，而於內部結構較詳。

「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錯道相屬。開道對關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絡樊川以爲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周馳爲復道，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抵宮室也。」

這「三百餘里」的數字是從史記「咸陽之旁三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而來，而更加誇大了一些，據稱爲「阿房宮」，大約是六朝人的謠言吧。這些宮殿，建起來固然不容易，燒起來却也太容易了。後來楚霸王入咸陽，一火而焚，三月不滅，想見當時四圍放火的壯觀。前有秦始皇，後有楚霸王，短期間內出了這般兩位大英雄，實在也只好說是天生一對了。但從

建設重於毀壞這一點說來，我們是應該讚美秦始皇而痛罵楚霸王。

阿房宮是毀滅了，但有名的屠人杜牧的「阿房宮賦」流傳。那雖然不

獨出於文人的空想（因為阿房宮並未完成），但却是把秦始皇窮奢極樂的精

神表現得最爲精微。

像這種極端慾欲的生活，和呂氏春秋中所主張的生活態度也真是相反到

了極端。呂氏主張養生，主張節慾，主張不可勉強。

「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其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

（重己）

「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重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

焉。長也者非短而較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

大甘大酸大辛大苦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愛大恐大哀，

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霧大毒，七者動精則生害

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靈敏）

「凡食無時，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

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飢飽，是之前去之疾。口必甘味，和精喘容，

是根本就看不起這一套。他本來就是實於勞瘁，明過謙裏，力超鳥獲，勇絕

孟賁的人「自古莫及已」，連低級的野鬼都應該向自己低頭的，誰還敢

庸聚成神聖！

新華日報圖書

英雄的新大林城

蘇德戰爭報告文學作品

△每冊十元▽（審查證第四二六號）

愛倫 倫寶 戈 寶 譯

自去年九月以至今今年一月，希特勒動員了他所有的精銳來攻斯大林城，當時他自信這個城就放在他袋子里。但是英雄的紅軍却給了法西斯軍隊以頑強的打擊，消滅了希特勒三十三更人的精銳，而這個冠了斯大林英名的城，也始終像一個英雄似的獨立着。爲什麼英雄的紅軍能保衛斯大林城和擊潰了法西斯的軍隊呢？我們在愛倫倫的這本報告文學集中，就可以得到一個滿意的回答。這本書子，可與「六月在頓河」一書後並列，特把它推薦給我們的讀者。

論「誠」

沈友谷

學者有所謂「字源之說」，儒家也常有所謂「從某一語中受用不盡」的話。自古來講道德修養的，總想能概括出一個或數個最基本的概念，把這概念當絕對的、最高的，而且不變的標準。孔子講「仁」，講「忠」、「恕」，孟子講「仁」、「義」，荀子講「禮」、「義」，都是其例。「誠」這一個字，做一個概念，也同樣是歷來儒家所津津樂道的，如宋劉安世自稱他從司馬光學了五年，所得到的就是一個「誠」字。

我們固不必否認，這種種概念中，常包含着很好的意思。但是因為這些概念是當做絕對的標準而提出的，既沒有任何附加的條件，本身也不具有確定的解釋，所以單從這一個字眼上去看，那就只是個純粹抽象的概念。這個概念必須入來加以具體的說明才行。固然可以賦與好的具體內容，從修辭的意義上來加以說明，但也未始不可以賦與壞的具體內容，從壞的意義上來加以說明。這在基本上完全相反的兩種意思，同樣包含在一個字中，這是一門來分析研究這類「一字計訣」時不能不注意的。

而且這種種概念，在其抽象的形態上，固然可以并存不悖，但既都被當作絕對的、最高的標準，於是在具體運用於實際中時，就常不免於互相抵觸，而無法解決。某一種概念，在其抽象的形態上，固然可以包含好的內容，但一進入具體的運用，因為有了特殊的條件加以限制，其所發生的作用也可能恰恰走向相反的方向。這更足把這種抽象的概念當做絕對的、不變的教條，必然產生的危險。

從「誠」這一個概念的分析中，我可以證明上述各點。

這裡，我還要作一個也許不必要的說明。當反對某一一個抽象的概念時，並不就是主張與這相反的另一概念。五四時代，人們曾嚴厲批評過「孝」，但反對「孝」的人固然是不是主張為人子者應該不孝，應該「行參軍娘」。他們只是指出在舊禮教中的「孝」這一個抽象概念實際上包含了種種壞的內容，因此他們反對把「孝」當做絕對的、不變的、最高的行為標準。既反對把孝當做絕對的、不變的、最高的標準，當然也不會贊成把孝的反面，「悖逆」當做道德的標準。有些人常弄不清這一點，一聽見反孝的主張，就羅織罪案，加以攻擊，那其實不過證明他們自己鑽在這些古老的教條中爬不出來，或在企圖利用這些教條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已。

我們，此地來分析批評「誠」這個概念，當然也並不是主張與「誠」相反的概念，主張人應該不誠，應該欺人欺己。恰恰相反，我們所要做的是，只是來分析「誠」這個概念曾經被賦與了那許多意義，並且說明我們應該怎樣來排斥其中的壞的意義，怎樣從具體的情況中來發揮其中好的意義。

「誠」——「信」

「誠」字，在普通用法，本來有不欺之意，所謂「誠實」，「誠信」是也。「說文」也說：「信，誠也。」儒家的最初一本經典——「論語」中不講「誠」，只講「信」。因為「誠」，「信」二者的意思本可相通，所以「論語」講「信」的章句，也可以用來解釋「誠」。

孔子是很重視「信」的。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輮，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為政）。「會子」的「三省」中，也有一條是，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于夏也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毋曰求學，吾必謂之學矣。」（均見「學而」）由這些話可見，其所謂「信」，就是待人接物上的表現。人與人之間，是以言語和行為來相互交接的。手裡怎樣做，口裡怎樣說，這是信實的程度，這之刻說的話，下一刻一定要兌現，這也是信實的態度。所以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

又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這都是要求，說出的一定要做得，言行一致。明末大儒朱舜水自述說：「不假生平，未有言而不能行者，未有行而不如其言者。」——

（公冶）——這都是要求，說出的一定要做得，言行一致。明末大儒朱舜水自述說：「不假生平，未有言而不能行者，未有行而不如其言者。」——

能修真正做到這程度，自然是「誠信」的極頂了。

「誠」的好的方面來說，自然應該重視「誠信」這意義。提倡「誠」的人，首先就應該對朋友「言而有信」，不欺騙朋友。假如口說「誠」，但實際上却是準備着欺騙朋友，那更是雙重的欺騙了。

不欺人固然是「誠」的意義。但欺人的時候，往往同時又是在自欺，所以「誠」的意義又包含不自欺的一面。論語中說：「孔子有一次生病很重，子路使門人先嘗「家臣」，意思大概是想高一孔子死，喪禮可以風光一點，但其實那時孔子已去世，並沒有家臣。孔子知道了這情形，就說：「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子罕）像這樣的不誠的行為，是孔老先生不肯教的。其實他無臣，却裝出是「有臣」的派頭，這固然是欺人。但也未嘗沒有人在這樣的情況中，自己已覺得有了這幾個假「臣」，好像身價立刻就抬高了一點，那便是自欺了。所謂君子遠庖廚，實際上也是自欺的表現。

能夠真正做到不自欺，當然也就不會欺人。儘管修養中講「慎獨」，也包含不自欺之意。當一個人私處的時候，固可為所欲為，不致被人看破，倘就這機會做些明知是不該做的，以為反正沒有人知道，有何妨礙，那就是自欺。以後遇見人時，當然笑矣自語，那就又是欺人了。同樣的，明知某事不該為，却用種種藉口來掩飾自己相信，偶做一二次也不大要緊，那也就是自欺，結果也必至於欺人。

欺人的人固然不一定是自欺。但常常欺人，成為習慣，也會走上自欺的道路。譬如有人成天向朋友作種種允諾，其初本於口徑一面這樣說，脚下是一面翻不來的。但說得多了，久而久之，連自己在說的時候也漸漸忘掉自己說的是假話了，於是更加可以誇誇其談，心安理得。這就發展到自欺的程度了。

不自欺也不欺人，這在律已待人上，確是很重要的事。——誠實這美德，誠信是價值極高的。

但就在這「誠實」，加以「誠信」，也仍不是把牠當做是至高無上的絕對的標準。孔子雖重「信」，但對管仲守舊的「何如斯可謂士矣？」的時候，列列了三等人，管仲是去才進：「言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哉，抑可以為次矣」。(子路)因為管仲其其做到句守信守信的程度，並不能表明已經達到生活修養的最高度。這在我們看來，是很容易明白的。壞人也未曾不可

以守信。固然實際上，壞人因為其真正的言行不能公開在光天化日之下，往往不能不是欺人乃至自欺。但如孔子與孟子都會加以諷刺的「鄉愿」就多半可以說是「守信」的君子。

而且假如把守信當做絕對的教條，施用於一切情況下，則必然發生許多困難。試就左傳上舉一故事為例。銀鑿接受楚君曾公之命去暗殺趙宣子，但他在看到宣子確是一個正派人時，便不願動手。這時他心裏發生了矛盾，他自語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按指宣子）。賊（害）民之主，不忘，棄君之命，不仁。有一於此，不如死也」。於是他就只好自殺了。（左傳宣公二年）這個矛盾在我們看來，却是很容易解決的。假如趙宣子真是一個好人，那麼他已答應了楚君的暗殺，但能斷然悔約，這種「不信」，恰恰正是值得讚美的。反之，倘仍堅守信約，那則是該受唾罵的了。在這時候，銀鑿然的，信與不信並不是行為的最高標準。銀鑿的不能引起我們的同情，正因為他把「忠」與「信」這兩個抽象概念都當做了絕對的教條，於是就在這二者的互相衝突之下，使自己成爲了犧牲品。這種教條的修養標準的種種概念之間都會發生這樣的衝突，如最常見的是所謂忠孝不能兩全。而爲了維持這些抽象教條的尊嚴，只好犧牲具體生活的人，這也是一「吃人的禮教」的一種表現。

由此也可見，有人以爲哲學學說是在說明人事關係，故爲人本主義，這種說法實在太錯誤的。即以「信」這一概念而言，同樣地從說明人與人的關係而產生的，但人與人的關係既已變換爲一個「誠」（信）字，結果這個概念便不是爲了人的實際生活而存在，恰恰相反，個人人的生活成了這個概念的附屬品，乃至犧牲品了。單純的抽象概念化做了絕對的教條，壓覆了具體的生活。這種教條主義的傾向在孔子學說中固已顯其端倪，而至宋明道學中更爲極端。而且原始的儒家雖說於歷代推尊，但後代，則不僅僅可以在此說信守的而說下進入「聖廟」，即且好大話聲聲震耳也可以使那些抽象的教條來做護符了。在這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宋末清初的一些大儒如黎洲、智庵亭林、船山等人是唯的一些能够大膽立論，轉移風氣的人。

假如我們的人本主義，就必須肯定，一切抽象概念本身是沒有絕對的權威，他們是爲了人而存在，不是人爲了牠們而存在。而人，是具體地生活在具體的生活環境中的。因此我們看來，固然也可以談論誠信的教條與精神，但必須肯定，誠信的道德標準只能歸於朋友，不能歸於敵人，只能服務於友

大人民的事業，而不僅服務於人民的敵人。對於人民的事業當然應該誠信不貳。至於在向敵人執行鬥爭的時候，鬥爭的根本精神，固然是實行一致表態如一的，但這點說，也可說是誠信不欺，但是我們却不必用誠信的抽象標準來拘束在各種特定情況與條件下的一切鬥爭方式和行動。因為在有些場合，對於敵人的不誠不信正是對於廣大人民的守誠守信。——那即是捧著誠信的抽象標準當鐵錐的教條的「忠誠」所不能想像的了。

「不誠無物」

上述是談誠信的概念上來說的。「誠」的意義固然與「信」可以相通，「信」與「誠」二概念也可以說是各有所偏重，可以互相區別。信是針對人而說，誠是更着重於對內的，對自己的一方面而言。由此也可以說，不欺人是信，不自欺是誠。所謂「誠於中而形於外」，正是說，內心是真實在在有什麼東西，那就自然會表現於外形上。反過來，也可以說，對外的表現與誠是「由中而發」的，倘若「言不由衷」，那就是不誠。因此，「誠」正是「信」的基礎。

誠是實說，「誠」自然是很好的德性，而且值得我們來追求的。本來，人的言行只是為了對付旁人而作，那就不免於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趨三避四，東搖西擺了。我們有所言，有所行，必當其誠地出於自己的內心。所謂「言實不能浮，實顯不能移，成誠不能屈」，正是因為自己的金心實力有所執著，決不以因外在環境的變動而有所變動。因此，講操守，講氣節，也與「誠」的精神有關。所謂「身在曹營心在漢」，當不始是詐欺之說。而像蘇武寧在貝加爾湖勞牧羊十九年，決不離漢事外族，却正是他對民族的感情，堅決不可撼動的表現。

我們常說，真正的詩人決不承認假話的人。因為必須是真情實感，從心底裏流瀉出來的東西，形之於語言，才能成爲感人的好作品。至於所謂公式主義的標語口號作品，那就多半只是虛偽的作品，因為作者心中本無此感情，當然只好硬拉些現成的標語口號來填充了。——所以說「方面說，無物即是不誠，胸中並無此物，形之筆端只是不誠的表現；就另一方面說，不誠也無物，既非發於真誠，也就不會產生真正的詩，真正的藝術。

沒有「誠」的基礎，也就沒有真正的信仰和事業。真正的信仰，不是爲

了趨利避害，擺在口上面上，當做幌子的；真正的事業，也不是抱着一種暫時也，失者命也」的態度去敷衍了事的。也有人自以爲是抱着一種信仰，從事某種事業，但其實不過是欺人自欺。宋明以來的道學家很多就是如此，像清初的道學家方苞、李光修之流，口中何嘗不忠孝節義，說得頭頭是道，聽其行跡，却都穢污不堪。則其信仰，並非出於至誠是可斷言的。人們因爲知力學力的差別，對於所信仰的思想的了解程度，固然可以有程度的差別，但是既成爲信仰，一定是經過他自己認真的考慮研究，斷絕其是正確的，因而用全副心力擁抱擁護，不憚不忽。固然這種思想的來源，可以由於旁人的傳授，但這種思想對於他已經不是在他外部的某種東西，而是融化在他自己血肉中的了，這時才能成爲最堅定的信仰。從事一種事業也是同樣。假如真是以真誠的態度去對付一件事業，那麼一定是無保留的貢獻一切力量去從事他。力量的大小固然因人而不同，但竭盡所能，不顧不撻地去做，却任是

何人都可做到的。做事的時候，假如只出九分力，甚至只出一分力，被舉九分來，那就正表明他並不把這事業真正當做自己的事業。所以要求誠的態度也就是要求以全心全力來執持其信仰，來實踐執行其事業。

歷史上，在每一大革命中，人民大眾在殘酷壓迫之下，仍能一呼百應，前仆後繼，斷頭流血，非達到目的不止。但正是因爲他們真誠感到這種革命的行動，求達到他們必要的。至於人民力量的偉大，統治者中常有人以爲不妨設法利用這股力量，藉此他們研究領導事業的「藝術」。但他們不曉得假使聚衆一時上當，但在聚衆並不是真誠地爲自己利益而鬥爭時，那種聚衆運動就只是虛的，不可靠的力量。以爲政治就是耍花樣，玩手段，欺騙聚衆，那是少數統治者所想法，但革命的政治家，其自身的行動固然是發於至誠，而且又是基於革命人民自覺的喚起與號召之上的。

但關於這一個意義上的「誠」，我們也必須點點思需要說明一下：

第一，誠固然是指內在的態度，但也不能脫離客觀的標準，而使之成爲抽象的教條。

我們可以說，以一個「心口如一」的忠人和一個「口蜜腹劍」的偽君子來比較，前者還使我覺得踏踏一毒，但也總不能使我覺得前者就是可親可親的人。這正是因爲對於人的言行的判斷，還有客觀的標準的原故。

前人嘗以「誠」與「明」並舉。這用我們的意義來解釋，是很必要的。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誠，而求得十分之知為明。認真的科學態度本就是「誠」的態度，有這種態度才能求得真正的「明」。能「明」也就掌握了客觀存在的法則與規律。把這種法則與規律溶化到自己內部，成為自己所堅持的專業與執著的信仰，那就是誠的精神的最高境界了。

所以倘把主觀的「誠」的精神脫離了對客觀存在的「明」，那麼所謂「誠」也可能只是武斷、迷信，但反之倘只有客觀的「明」而不能發為主觀的「誠」，只是把客觀的法則當做外在的標準，那麼雖然一時能一步一趨，但仍是勉強的，有動搖可能的。我們又可以說，符合客觀標準是求真，而發自內心，不勉強是致誠，那麼，我們所嚮往的正是既真且誠的「真誠」。

第二，歷來誠說的修養的都不會顧到，人的發展是可以有質變的。這就是說，人在發展中，可以經過新我與舊我的衝突，而最後由新我來克服舊我的過程的。經過這種過程，為了人生的進步，是必要的，然而却是苦痛與艱難的。

其所以是苦痛與艱難，正因為「舊我」有著根深蒂固的基礎，所以屬於「舊我」的一切對於「新我」是更加親切的。反之，「新我」在一定時候，比之「舊我」反而是較為生疏的。因此在爭取新生的時候，常不免或會有意識地對舊我徘徊留戀，或者無意識地流露出舊我的足跡。在這種情形下是否也可以講誠呢？假如主張真誠地表現自我來，豈不正是決堤而讓舊我氾濫麼？

在這情形下講誠，固然不應該拿來當做舊我的護符，而應該拿來當做進行新我與舊我的鬥爭的態度。既然有著這種鬥爭，那就決不掩飾在自己內部有著兩個自我的存在，不把自己當做已經是完滿無缺的人格，那麼才可能把這鬥爭發展起來。既然這鬥爭是個艱難的鬥爭，那麼也決不輕率地相信新我的勝利，好像一覺醒來，已經脫胎換骨，面目全非了；譬如這樣想法，那就仍不過是自欺。

把「誠」從這一個意義上講，自然不是道學家們所能做的。求之於魯迅的一生的生活與戰鬥，我們可以得到最光輝的範例。

我以為，提出以上兩點，是很必要的。假如肯定了人在發展中質的突變，就會把「誠」單純地看做是自我的忠實表現，那麼「誠」就變成懶惰者的藉口，當成自己留戀於故我，故步自封的理由了。再假如不看內在的「

誠」更須與外在的「真」相一致，則既阻斷了自欺改革的道路，而且更會一直引向一種唯心論的觀點。

在土地廟常常可以看到的匾額「誠則靈」正是對誠的唯心論看法的最通俗的表現。明知是荒誕不稽的迷信，偏偏向它頂禮膜拜，以為或可得到保佑，這是自欺。更進一步，以為真與自己求神之心相感，則不偶也會有靈，所祈之福就會到來，那麼更把主觀的意識當做是對於客觀現實起決定作用的了。主觀的唯心論拿來就可說是人類歷史的一個自欺方法。

封建統治者以誠來向人說教，就多半有這樣的意義。王莽臥冰，可以獲麟，——為什麼又因為他誠。愚公移山，神童助功，——為什麼又因為他誠。統治者久學後世甘願去做自己誠心祈禱的結果，這是自欺，也是欺人——欺騙人民，既使人民的美譽，又使人民相信他老長是站在自己的一面。所謂「至誠可以動天」，更是把主觀意識的作用誇大到了極點。

本來，「不誠無物」，這話是可以說的，因為不用至心全力去做什麼事，就不會有完滿的結果。但若是反過來說，「無物」的原因只是因為不誠，只要自己意誠，一切奇蹟都會出現，那却是誤導人，使人不注意現實中進行改革的必要了。

所以把「誠」這樣這樣的意思來說明，其作用就完全走到了相反的方面了。

神秘主義

由此，在誠的概念上，就可以發展唯心論的神秘主義的理論。

最初提出「誠」的神秘主義理論的，是在「孟子」與「中庸」上。譬如「論語」中說「信」，還有幾分古典的人本主義氣味，那麼在「孟子」與「中庸」中所說的便完全是不同的了。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上）「中庸」上也有類似的說法：「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在這兩段話中，以「中庸」所說的更為意義明顯。在這裡「誠」已不僅是「誠信」「忠誠」「誠實」這些說法所表示的那種意義，她已不是指一種生活態

度了！人發現靈的虛度，而是被擴大為宇宙的本性，且用以指最高的一種人生境界了。所謂「中庸」所謂「誠」字宇宙的本性，表現到人身就是聖人。聖人就是靈，不必經過思考與努力，在其天性上就已合於宇宙本性的。所以孟子又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矣。」（盡心上）「我」與萬物——宇宙為一體，故只要能夠向內探索，回復其本性，就與「天道」一致而大於誠的境界。孟子又說：「良能，人之成不學而能者；良知，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在他的體系中，「誠」和「良知」是一致的。

經過這樣的解釋，「誠」就絕對不包含用盡心盡力，進向客觀，追求真理之改作現實的意義。他一方面成爲「天人合一」的宇宙論的基本概念，一方面又把最高的知識與行爲歸於天賦的知能。因此，「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道；能盡人之道，則能盡天之性；能盡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這是說，至誠的表現就在於把個人的本性（那先天的本性的性）充分發揮出來。因爲個人的本性也就是全人類的本性，天地萬物的本性，所以只要能夠充分發揮個人的本性，個人就可贊助天地的變化的能力，而與天地並立爲三了。這不正是和上文所說的「誠信」諸義相反，恰恰定到自救救人的極端了麼？至於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中庸）那更和今日土地廟掛的「誠則靈」的招牌直接相聯的了。

「孟子」、「中庸」二書在宋以前，在儒家學說中並不佔支配的地位，其所以至宋以後，被列爲四書中的二本，成爲儒家的基本典籍，理由之一說因爲其中包含着這樣的和秘主義的宇宙論與人生論。宋明理學，其論「誠」，大體也都發源於「孟子」、「中庸」二書所論。唐代韓愈的弟子李翱首先本「中庸」中「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之說而加以發揮說：「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此非自外得者也，惟盡其性而已矣。」（「復性書」上）這顯然不過是「中庸」中的意思的重覆，而更直接地說明一切知識並不由外界得來，只要以本然的人性去感應萬物，就能「通天下之故」，——這也就是「誠」的境界。把誠實做與天地相通的人的本性，也正是宋明理學家

後儒的主張。

宋明理學家「大學」中「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語，說：「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其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伊爲象厥明德，人欲所蔽，則有昏昧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此所說的意思，和「復性書」所言在根本上，也是一樣的。於是「中庸」之所謂「誠」便和「大學」之所謂「明德」，「孟子」之所謂「良知良能」成爲同義語，同爲指天賦的人性之本然，且與「天人合一」的學說相聯。

「誠」的概念完全歸置在神秘主義之下，更和人本主義精神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誠」的概念更完全不是爲了人而存在的，却是人必須遵從的天道了。其以天道爲誠，正是把天道當做是有人格有意志的支配權力。「誠」也不是人在現實生活所培養的一種態度，而被當做是先天的本然的人性了。但是天賦的「天性」，不假後天作用的「良知良能」，這在實際上是本無法證明其存在的。假如說有，那就不過是基於生理的本能的一些感覺與行動的能力而已。孟子解釋良知良能時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而後人更甚至把「忠君愛國」也一起算作良知良能之上，但這不過是統治者爲了維持他所支配的社會秩序，把他所要求的道德事例解釋成天賦的必須遵守的天道，來更加強其強制力量而已。但實際上，無論是愛親敬長，忠君愛國都不是先天的天性，而是後天的後得物。

宋明理學家接受道家的影響把人性絕對抽象化了，也就只落得是「寂然不動，廣大清明」，「虛靈不昧」這樣的不可名狀的境界，假如「誠」的意義就是回到這種境界，那也只是把人從客觀現實中拖回來，施以麻醉而已。所以這種「誠」的神秘主義哲學，雖然看來完全是玄虛之談，然而仍是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的實際意識相聯系的。所謂「天人合一」論的作用不外乎是消滅人民大眾的自覺，所謂「犧牲救國」論的作用不外乎是消滅人民大眾的自覺的實踐。所以在長期的東方專制主義政治下，「誠」這一個本來是從說明人的合理關係而產生的概念，却在神秘的氣氛下被拾上神聖的殿堂，使人頂禮膜拜，作爲欺騙與麻醉奴隸人民的忠實工具，這是我们不能不以揭穿的。

「誠」與實踐

由以上所說，可以看到，「誠」這個字的意思，並不是完全不值得表揚的。問題在於，我們不能把牠當做抽象的、絕對至上的教條，而要從現實的具體的生活實踐中來說明牠。從當前的反法西斯的民主戰爭的實踐上說，誠的實踐對於我們，就應該是：在反法西斯的民主陣營中，各個國家，各個力量之間，應該以誠相見，以信互待，不能有任何言行不一，出爾反爾，彼欺此詐的現象；並且大家對於共同的事業，必須以全心全力，出於至誠地去從事，不能有任何口是心非，心懷三意，消極怠工的現象。從這些意義上說，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拿誠這標準去檢我們的行為準則。

因此，我們必須把從舊時代傳統所遺下來的對「誠」這概念所加上的虛妄一一加以掃清。

在知識論上把「誠」當做基本的出發點，是完全錯誤的。這樣做法就一下子召來了「誠則明」、「致良知」、「明明德」那一批亡魂。這批亡魂之反科學是異常顯著的。中山先生創知難行易說，其言有曰：「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貫之學也。凡真知難得，必從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也。」（「心理建設」）正因為中山先生堅決站在科學的立場上，也說不得反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因為陽明的知行合一論是從「致良知」說發展出來的。陽明以為一切知識不必外求，都在「我」的內心中存在著，這就是良知；而能致良知，就是行。但中山先生則以為真正的知識只是科學的知識，此外都是虛偽的東西。所以企圖把中山先生的理論和從孟子到王陽明的理論作一，正是適合併玄學與科學，結果就只是使中山先生的思想趨於墮落而已。

用中山先生對知識的看法來說明「誠」，那麼「誠」的意思正是指在科學研究中應有的「誠實」。「誠」的態度對於科學研究自然是更顯要的。在科學上是不容有一絲虛偽在內的，誠實誠實不可。你要否認水是氫一氧一相成的，你只好說科學，你要把五十年前的「北京人」遺跡來證明中國民族歷史的悠久，你也只好說科學。因為事實上水只能由這樣的成分組成，事實上北京人不過是舊人類的一類，和現代中國民族並沒有直接關係。科學上的誠的虛度首先就是尊重客觀事實的態度。

但用王陽明的「致良知」之說來說明誠，那麼誠的意義就會一變而為知識的本體。因為既認為一切知識都在人的本心中不必外求，只要反求己心，就可得萬事萬理，則「誠」就不是求知的態度，而成為知識的根源了。但我們試來實驗一下，不顧外物，但去探求自己的「良心上的知覺」，結果，不待說得，是什麼知識也得不到的。這樣做法，其實的意義無非是企圖由主觀的願望來杜撰一切知識。就這意義說，則精神之創造人種優劣論，不可謂不誠，然而那卻是科學的。把誠的概念就這意義來解釋，就必然會走到誠惡劣的地步，反而為法西斯的偽科學埋下了。

把知識論搬到行為論上去，我們應該指出，行為的基礎是什麼？從根本上說，是「太初有行」，從實踐中產生知識，也就是中山先生所說的「不知亦能行」。但在人類已經獲得相當多的知識後，則行為又必須以真實的知識為基礎。中山先生說：「情能由科學之原理，以求得其知，而行之決無所難，此已十致阿爾明證明，無可疑義矣。」（「心理建設」）這是說，行為要根據科學的知識而由發。既從科學上證明客觀的真理，我們就斷然地堅持真理，勇往直前，這也正是「誠」的態度。對於真理是堅持執著，總是用全心全力來為真理搏鬥，行為也總是有力的。「誠」的態度對行為自然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倘不把「誠」看做是行為的態度，而把牠看做是行為的動力，以為我們的行為，不必對科學的知識有所依傍，只要從主觀的直覺出發，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就好了。於是「誠」就被當做只是「決心」的意思，而決心又只是主觀的意念的產物。這樣的行為論，其結果也只好與法西斯的「行動論」異途同歸。

把宇宙社會一切都用「誠」當做基本概念來解釋，錯誤更是顯而易見的。用誠來解釋的概念來說明社會政治的動力，其意義不過是抹殺廣大人民的實，生活的要求的作用。用屬於人事範疇的觀念來說明宇宙，其意義也不過是把物質現象化為目的的精神，而完成其唯心論的體系。這些，根據以上所說是不必再詳論的了。

近代法西斯主義在其哲學基礎上，有意地增加上神秘主義的色彩，那正是因為只有在這神秘的基礎上，才能反對科學，而從主觀願望上來改造科學；才能反對理性，知識人們用唯性來考慮世界，判別行為的動力，而發動瘋狂的行為。由此，在東方專制主義下「誠」的神秘主義就和近代反動科學的、反對人民大眾的法西斯思想一脈相承，那正是我們更不能不加以揭穿的。我們否定這種神秘主義的神秘主義的內容，在實踐的生活中心發揚「誠實」「真誠」的精神，那才是我們對於民族的文化遺產所應有的態度。

編者的話

本刊十五期發表了郭沫若先生論「墨子思想」的一文，當時我們就提出「希望今後在我們篇幅許可的範圍之內，能够繼續發表一些對於這一問題抱有不同見解的文章」。郭先生的文章發表後，我們就陸續收到了一些商兌的文章。現在，我們發表了楊天錫先生與彼正先生的二文，一則就於與郭

先生，二則把這一個問題向讀者諸君提出公開討論。天錫先生和彼正先生的論點雖不同於郭先生，但在求真理的基本立場上三位先生是一致的。凡嚴格地遵守這一基本立場，有真知灼見，論點不重複，言之有物，立論有根據的，本刊無不樂予發表。在這裡我們唯一要提出大家注意的是：一、爲了把問題的討論深刻化，勢不得不涉及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就思想論思想，就墨子論墨子，是得不出科學的結論來的；因此我們希望參與討論諸君能把問題向這一方面發展。其次，本刊不是一個純粹研究性的刊物，因此發表這一類的篇幅有限，希望賜稿諸君注意。

「墨子思想」商兌

楊天錫

最近從家八卷十五期上讀到了郭沫若先生的一篇論「墨子的思想」，郭先生從他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起，就認定墨子爲反革命派；不過那時還沒有把他具體化，這篇文章就正式把他所認爲墨子反革命的意識都逐一提出來了。

郭先生一稿是我所敬佩的一位前進學者，他不獨有他的劃時代的歷史著作，還有他的使人不能忘懷的奮鬥的生活；二三十年來都爲全國青年所景仰。因而我們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當只有向郭先生多多學習，若有所意見，也不妨坦坦地向郭先生提出；尤其是有許多意見，和郭先生的相反，更不妨提出來，以就正於郭先生。

關於墨子思想的意見，我是不大同意郭先生的。

郭先生在他的這一文中，謂「墨子始終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的帶有反動性——不科學，不民主，反進化，反人性，名雖兼愛而實偏愛，名雖非攻而實美攻，名雖非命而實致命。」同時他又根據魯問篇上「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一段，認墨子「書中較爲完整保存着墨子思想的真相的，只有下列的十篇：（一）尚賢（二）尚同（三）兼愛（四）非攻（五）節用（六）節葬（七）天志（八）明鬼（九）非樂（十）非命（每篇中有的分上中下三篇均包括在內）。並認定這十篇就是墨子的十誠。其餘的各篇，只是後來的附益或者發展。這十篇是否爲墨子的十誠，我們暫不去管他，姑就這十篇的內容來說。

首先我們得了解清楚的，墨子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有人說他是「工農革命的代表」，這前，郭先生反對，我早在三年前所寫的一篇論墨子哲學思想的文章上也反對過，因爲那時（春秋戰國時代）連資本主義的影子都不見，哪裏來的工農階級的代表。這當然不是的。但郭先生又走上與此極端相反的一途，硬認爲墨子是一位宗教家，這倒，我也不能同意。雖然墨子主張天志與明鬼，但決不是一位宗教家。他原來是當時的職人，屬於奴隸之類。貴族稱說：

「子墨子，南游於楚，見魯惠王。獻書，惠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不用，使視智以老辭。穆習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習：穆習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主，天下之大王也，毋乃自賤人』之所爲而不平乎？」

大概後來獲得解放，取得自由民身份。所以得「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淮南子主術訓）。我們看魯問篇所說就可以知道：

「齊之南鄙人有與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與慮謂墨子曰：『義耳義耳，君用言之。』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苟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與慮曰：『有。』子墨子曰：『君嘗計之矣。君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得一升粟；藉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勝矣。君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大得尺布；藉而以爲得一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勝矣。君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勝矣。君以爲不若舜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而織乎而功賢於織也。』

他雖成了「誦先王之道，通聖人之言」的士人，取得了這城市國家裏的自由民的身份；但不一定就要自儗於王公大人之列來與賤人作反對，相反地，他反而自儗於賤人之一團（如他說：『若越王濞吾言，用吾道，覆度身而衣，是覆而食，比如覆而食，未敢求仕。』（見呂氏春秋高義篇））來進行賤人的解放。故他的思想雖不能說怎麼徹底，其主張雖有矛盾與不備，但在當時講來，這的確是最進步的意識，最了解當時社會改造的基點所在。

因此，我對郭先生對於墨子思想的想法，不能不有所分期：
第一，他是科學的；

關於「經上」「經下」「說上」「說下」四篇，郭先生認爲只是些初步的科學思想，似乎不必拿來據拾，我們也就把它壓下不說。不過，他的科學思想，我們仍然不能抹煞。

因爲他有科學的思想，甚而至於可以說是一位科學家，所以他對於任何事物，必定要追根究底，問他一個「爲什麼」，並不像那不科學的儒家只要知其然就算了。公孟篇說：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即予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他不獨對於事物要追根究底，要問他一個「爲什麼」，並且還有嚴整的論證事物的科學方法（「經上」「經下」「說上」「說下」的本且說）；他這種的科學方法，是爲他同時的諸家所沒有，即有之也不見得怎麼的完整。大概中國最先談得上有較完整的科學方法論的，以他爲第一人。

非命上說：
「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迷鈞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這三個法則，都是把經驗當作真理的標準。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惠，就是本前人所經歷的成果，作爲真理的標準；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就是把一般感覺的經驗，作爲真理的標準；發而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以一一般的利欲上的感覺作爲真理的標準；即發以爲刑政，百姓人民感覺是福利的，就是善；否則便是惡，便不能認作是時代真理。

他的這種三表法，不論它在我們看來，尚有怎樣的缺點與不備；但在他的那個時候，能把經驗作爲真理的準則，則在人們對於客觀社會的認識上，就不能不說是放了一線科學的曙光，就非一切宗教家的盲從與迷信可比。

因爲如此，所以他特別注重實驗，注重實驗的知識，決不以空談爲然。實踐篇說：

「今賢者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賢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賢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上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賢者與君子之不知「黑白」與「仁與不仁」，並非在名義上不知道，而是在實際上不知道，缺乏實際的知識，缺乏實踐所致。非攻下篇又說：

「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
反對徒「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這是何等的注重實際的知識呀！假如他不具有縝密的科學頭腦，哪能會這樣駁論。他又說：

「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者而常之，是濫國也。」（續柱篇）

「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者而常之，是濫國也。」（貴義篇）

這意思就是說：所有的道理，都要能拿進實驗室——自然科學的或社會科學的，都要能試驗（遷行），都要能為實際所用，才能算是真理。然而這種的歡喜實驗，正是科學家的精神和態度。

且墨子曾製造能飛的木鸞（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能載重五十石的三寸車轄（見齊俗篇），以及各種的兵器（觀備城門以下諸篇即知），假如不是一位科學家，他的工藝，又焉克臻此之？

至於墨子之所以談「天志」與「明鬼」，則有兩方面的意義。

一方面是在於進行反對「王公大人」及建立「兼愛」的社會的一點上，增進一般「賤人」對於這一改造工作上的勇氣。意思就是告訴他們，只要努力幹，天與鬼神都是幫助我們來賞善罰惡的。至於他告厲公子（見魯問篇），告歸葬（見公孟篇），告這一級有智識的人就不然了，就不以為鬼神是絕對的，它所給予人的禍福，只不過是如「百門中閉了一門」而已，渺小得很。

另一方面則有兼愛與平等的意義。

天志中說：

「且夫天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國臣萬民之相為不利哉？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同以）異此。」

法儀篇說：

「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這意思就是說：萬人在天底下都是平等的，人們應當相親相愛，不應該誰壓迫誰。所以諸凡大國攻小國，大家攻小家，強暴寡，詐謀愚，貴傲賤，都是壓迫人的舉動，失了天賦平等的意義。故為天所不欲。

「明鬼」也有平等的意思在裏面。因為在當時只認為「王公大人」死了才能為鬼，「賤民」死了是不得為鬼的。故他的「明鬼」，藉以表明賤民死了也一樣均為鬼。關於只認「王公大人」始能為鬼，我們看左傳昭七年所載

就可略知梗概：

「鄭人相將以備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鍾離之說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圍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及子產適齊，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化，其魂魄猶能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者……！』敵邑之卵，從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化，能為鬼，不亦宜乎？」

據子產的話，「王公大人」因在生時用物弘，取精厚，死了故能為鬼；而一般「賤民」當不具此資格。墨子「明鬼」的另一義，也就是打破這種的等級關係，謂無論何人死了皆得為鬼，即賤民的父母兄弟歿死了，也同樣為鬼，能享祭祀（見明鬼下）。因此，「深谿得林幽闕無人之所」，皆得有鬼（見同前）。

其實墨子本人是否真的相信有鬼，倒不一定。他曾這樣疑惑似地說：「若使鬼神請（作誠字解）有，是得其父母兄弟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天費之，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而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離聚眾，取親於鄉里。」（見明鬼下）

第二，他是民主的：

在墨子的當時，一般王公大人可謂專橫已極。如左傳昭七年載「單獻公乘親用羸」，其結果都不免為葬頭之族所殺。同情「賤民」解放的墨子看了當然過意不去，所以他一面反對王公大人專政，一面則力主平民參政。

他反對王公大人專政道：

「今王公大人其所富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尚賢下）

「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尚賢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使之。夫親戚無故富貴面目美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惡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惡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

得而知矣。」（尙賢中）

「王公大人」一味的引用無能的親戚來執政，使得國家紊亂，故他在另「血則主張選舉平民中之有才能者來參政，以求得政治上的清明。尙賢上說

「故古者聖人之爲政，則備而尙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勸予之令。……故當榮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定也）賞。……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

「無能則下之」，就是有罷官權呀！所以「官無常貴」；「有能則舉之」，就是有選舉權呀！所以「民無終賤」。因而，雖在「農與工肆之人」，只要他有才能，可以勝任，就舉他出來；如果無能力，或幹事不行，即使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也毫不客氣地罷黜。這是何等的德謨克拉斯西的政治呀！我們要說墨子不民主，真是難以說上。

不過，墨子在他所主張的選舉方式是不很够的；並沒有主張實行由下而上的真正的民選，而是推薦或傍舉。如他說，「下有善，則傍薦之」（尙同上）；「已（按即民字）有善，傍薦之」（尙同中），這是一種推薦賢能的薦舉方式。當然，就當時的社會情形而論，能够薦舉就是最民主的了，因爲那時還只是城市支配鄉村的社會呀！我們不能架上現代的眼鏡來看來作批評的。

至於墨子之所以主張尙同，也不過是爲了要實行兼愛。因爲他以為這由推薦或傍舉出來的正長、鄉長、國君和天子，都是真有才幹的好人，可以爲人民取法；人民若取法，就可以達到天下人都兼愛的目的。他並不是在那裏主張專制獨裁。你看，如果是「王公大人」和他們的親戚來把持政權，不能好好地爲人民服務，他又反對尙同了。尙同中說：

「今王公大人之爲政期反此，政以爲便賢（按即變字），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其上。」

所以他的尙同，並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是要由人民所推薦或傍舉出來的真有才幹的良好的正長，人民方肯尙同；不然，人民都「比周隱匿」，「桃之夭夭」了，還講說是要他們來尙同於他嗎？法儀篇又說：

「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師也）、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

這更可見他的「法君」，也即於他的尙同，決不是什麼絕對的。

雖然如此，但拿「尙同」以實現「兼愛」，是無法達到目的的，這是他施行的方式的不對；他應該主張人人都受集體主義的教育，方是治法。所以他應該主張「下比」。

第三，他並不反進化：

在墨子的當時，一般王公大人奢侈已極。他們「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歡樂。死又厚爲棺槨，多爲衣衾，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七患篇）並且他們「爲宮室，則……必厚作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辭過篇）像這樣，當然會要弄得「民苦於外，府庫單（盡也）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七患篇）所以墨子爲針對時弊，故反對奢侈而力主節用。我們不能因爲他力主節用，就認爲他是因陋就簡，就是阻撓進化。

其實不然。他是主張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而後提高的。非樂上說

「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笙簧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芻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遠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這就是說：雖知道樂，知道美，知道甘，知道安，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都還沒達到這個樣子，所以他反對。他是以一般老百姓的水準爲水準，並不是以王公大人的水準爲水準的。

說苑反質篇上有這麼一段話：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鐘繡繡紉，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寶也，珍寶而以爲飾；又將予子一鐘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憐！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

夫者者！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餼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也。」

據這一段話，就益發知道墨子並非違反進化，反對生活水準提高，他是要把一般老百姓的最低生活水準達到後，再求清進一步的發展。他自己已有明白表示：「先質而後文。」我們哪能說他質而不文呢？

因為他要把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準逐漸提高，所以他一面反對「王公大人」的奢侈，反對他們的「厚措斂乎萬民」，反對他們的「暴奪民衣食之財」；但在另一方面，就叫老百姓努力從事生產，能以時生財。七患篇說：「為者疾，食者寡，則歲無凶；為者緩，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又注重他們在生產上的分工，節用中說：「凡天下羣百姓：輪車、鑿船、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這些，都是逐漸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辦法呀！

第四，他並不反人性：

墨子並非不近人情，他是最近人情的。他的近人情，就在於要使得大家的生活都能獲得滿足，不要只是讓某一小部分「不與其勞，獨其質，非其所而有而取人」（天志中）和「常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常食乎入者也」（非樂上）的人來窮奢極欲。

他的反對侵略，就是認為侵略是不近人情，只圖個人的慾望之滿足，而忽略了百姓人民的痛苦，是最不義之舉。所以他說：「情欲得而思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非攻中）又說：「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而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用上）我想，如果是真情的人，肯說這樣的話嗎？

墨子倡兼愛，主張愛無差等，難道還會反對情欲的正常發展嗎？當然不會的。他之所謂「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就是要去人們情欲上的偏私。因為「王公大人」的情欲有所偏私，致使一般老百姓無法獲得滿足，他們的情欲不能普遍發展，於是就不能達到仁愛的目的。像「攻伐」，像「蓄私」像「厚措斂乎萬民」，像「暴奪民衣食之財」，都是情欲之私呀！所以墨子的幾句「必去……」的話，是針對着「王公大人」之情欲上的偏私而發的，並非是在那里主張絕情欲，並非是反人性。

至於他之主張早婚，獎勵生育以從事生產，也不能說他是反人性，是在

盡力幫助統治者。他是眼見當時的國君之互相攻伐，和他們的荒淫無恥，以致弄得人口減少，生產降低，形成社會上的一種嚴重危機。所以他的早婚的意思，是在增加人口，積極從事生產，來挽救這一危機的。

第五，他的兼愛並非偏愛：

因為墨子所談的是兼愛而不是偏愛，所以許多人都罵着他，尤其是儒家，首先如孟子就罵他為「無父」，罵他「愛無差等」；後來如荀子也罵他「有見於齊，無見於時；有齊而無時，則政令不施」（天論篇）又罵他「……慢差等，……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足以欺惑愚眾」（非十二子篇）。我想，如果墨子是偏愛，是叫多數的不安樂者去愛少數的安樂者的話，儒家的這些先生們就不會這樣罵他了。豈獨不這樣罵他，反而會要特別歡迎他，歡迎他是他們的同道，會對他這樣說：「老墨！你也和我們一樣，都是維護王公大人，維護他們的既成秩序的呀！那我們應該好好攜起手來！」不如此。

假使墨子真的偏愛，他為什麼反對「別」，為什麼要拿「兼以易別」（兼愛下）？更為什麼要把少數安樂者的不法行為——「蓄私」呀，「厚措斂乎萬民」呀，「暴奪民衣食之財」呀等等向外暴露而不一「隱惡揚善」呢？他這樣不「隱惡揚善」，難道不知道會有惡果產生嗎？就會要使得多數的不安樂者知道他們今日之所以不能安樂的原因，他們就無論墨子作怎樣的宣傳，叫他們去愛那少數的安樂者，他們再無論怎樣不會愛的了。豈獨不愛，或許還會要造起反來呢！我們看一般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員，是不是肯把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殘暴行為向外暴露呢？如果這樣，還會有人去相信他們，作他們的走狗，替他們當砲灰嗎？

郭先生說墨子承認既成秩序，我又想，如果墨子是承認既成秩序的話，為什麼非禮（他罵儒家繁飾禮樂以淫人），反對「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反對「言親疏尊卑之異」？又為什麼要反對「王公大人」呢？因為他不承認，所以他主張兼愛，主張愛無差等，藉以此來打破既成秩序，要使得「王公大人」不會常貴，老百姓不會終賤。

第六，他的非攻並非美攻：

墨子的非攻，正因為他不是「美攻」，不是「替侵略者製造和平攻勢的烟幕」，故他一面反對大國之攻小國，把侵略的大國面孔描畫給小國看。天志下說：

「今……大國之君竟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伍，以攻伐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斫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卸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擄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劫拔之，不格者則聚斂而歸，大夫以爲侯國，胥靡，婦人以爲春酋。」

這簡直是今日法西斯的猙獰面貌了。

但在另一面，又爲小國打算，叫他們作防守之道，以期防止大國之侵略。比如：他止楚攻宋（見公輸篇），他一面毀雲臺，日夜不休地趕到楚國，勸了公輸盤，又勸了楚王，勸他們不要攻宋；但在另一面，他又怕楚國的不守信義，還是要來攻宋，故叫他的「弟子高漸離等三百人」，攜帶他的「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又如他勸衛國的公良桓子畜士（見貴義篇），就是因爲衛國處於大國齊晉之間，容易遭受他們的侵略，故叫他畜士以爲之備。且他在備城門以下十四卷中各篇，和他的門弟子所講求的都是守禦之術。豈有一位「善侵略者製造和平攻勢烟幕」的人，還來爲小國打算，叫他們防備，爲他們研究「守禦之術」嗎？

所以墨子的非攻，正像今日蘇聯的武裝和平。蘇聯一面和世界各國訂立和平條約，建立友好關係；但在另一面，又恐怕有如德國法西斯野獸一樣，不講求信義，破壞和平，故不得不建立起堅固的國防。不然的話，蘇聯今日豈不爲野獸希特勒所暗算了嗎？

至郭先生所引耕柱篇「君子無門」一段，郭先生認爲這一段所談的「無門」，等於剝奪了被侵略者的武器。我以爲不然。所謂「君子」就不能說是屬於被侵略者類的。于夏之徒，都是君子之類，他們認爲狗彘猶有門，君子當然更有門；君子更有門，君子又是屬於安樂者羣，那他們自身不是侵略者，就是侵略者的幫兇。這樣，倡導兼愛平等的墨子聽了當然過意不去，不得不罵他們「言則稱於湯武，行則趨如狗彘」，是言行不一致的東西了。據此，正說明儒家是維護「王公大人」的，是「王公大人」的幫兇，而墨子之反對他，正說明墨子是同情窮賤人，幫助不安樂者羣的。

第七，他的非命並非命命：

儒家因爲要維護「王公大人」的統治，所以拿「命」來麻醉一般所謂賤人窮人。賤人，你就要賣嗚，他說你的命該如此。窮人，你想要富嗎？他說你的命該如此。總之，他拿「命」來壓服你，不使你起來和「王公大人」對

抗。所以有命者的說法，就是命運支配了你，「雖強動何益哉？」（非命上）

而墨子則不然，他是同情並幫助「賤人」解放的，所以他非命。他認爲「賤人」，只要你能身體力行，努力幹，那你雖賤，亦可爲貴，所以說「民無終賤」。因而他認爲「命」，乃是「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命下（按「窮人所術」，就是窮人受了暴王的麻醉，相信有所謂命運，於是一概幫助暴王的學者又從而祖述之的意思）如果「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辭（悖也）也；說（害也）百姓之辭者，是滅天下之人也。」（非命上）這意思就是說，如果立命，就會使百姓心悖，因爲這要使得他們永遠不能翻身，永遠作「王公大人」的牛馬，怎麼不心悖呢？把他們作牛馬，使他們心悖，就無異乎是消滅他們呀！而儒者拿「命」來「以爲道教」，叫老百姓安貧樂道，也是在殘害天下的老百姓了（非命下）。故墨子說「執有命者不仁」（非命下）。

所以墨子的非命，無論如何不是叫老百姓服命，而是叫老百姓造命，只與他們「不怠於從事」而肯努力，他們也可以堂堂地來做人呀！他們也可以憑着他們的才能而當當舉出來參政的呀！

「天志」與「明鬼」，前已說明，其主旨是在爲賤人爭平等，並不是以之作權威來壓服一般賤人的。

現在談到墨學衰絕的原因，郭先生說「一是由於墨家後學多數逃入了儒家道家而失掉了墨子的精神，二是由於墨家後學過分接近了王公大人而失掉了民衆的信仰」，我以爲二者都不是。

第一，墨家後學逃入儒家或道家並非事實。郭先生曾拿「親士」「修身」二篇爲證，殊不知此二篇已成爲公認的偽書，並不是爲證。前一篇乃道家後學所雜湊而成的作品，故多道家語。後一篇乃儒家後學的作品，如汪中說：「其言淳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裡，爲七十子後學所述。」（見所著墨子序）於此可見。所以梁任公胡適他們均認爲此三篇（包括所樂篇）全無墨家口氣，純出偽託。惟其如此，倒不但不能證明墨家後學逃入道家和儒家，反而證明道家和儒家的後學是走向墨道了。方授楚君曾說的甚爲詳細：

「雖然，墨學非真能亡也。其直接影響而發爲行動者，有許行及任俠一派。而其尙同重功利，見取於法家；節用平等，見取於道家；儒家受其影響則尤深。荀子備法篇，分俗儒、雜儒、大儒三等，其論俗儒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墨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

義而殺諸書。其衣冠行儀，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其言譎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是俗儒者也。」豈惟俗儒如此？孟子有卿想可謂雅儒或大儒矣，然司馬遷非謂其「獨儒」之遺文，明體義之統紀「耶？儒家受墨家影響之深，非可盡指，尤以易傳之文言，禮記之大學與禮運大同之說，最為彰顯。王夫之曰：「聖人之死，其氣化為數十賢人；孰謂墨子禽滑釐諸人之學，一朝而斬焉以盡，斯焉以亡也耶！」（見所著墨學源流頁二一〇）

即如禽滑釐，本來是子夏的弟子，而走向墨家，為墨家鉅子，尤為最顯著之明證。

至於「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收」「小收」六篇，前四篇有謂墨子自著，早在魯魯叔時勝在他的「墨辯注叙」上就道這樣說：「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這里，不僅明明說出惠施公孫龍一班所謂名家是祖述墨子的經學，並不是墨家後學受了名家的影響而成墨經；且說出儒家孟子都受了墨子的不少的影響，這與司馬遷所謂，孟子他們「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正同。有的又謂墨經即非墨子自著，但亦係墨家後學所著，決與所謂名家無關。此則章士釗所著「名墨體考」中言之甚詳。章氏的意思，名家是名家，墨家是墨家，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即惠施公孫龍亦不得稱為「別墨」。那麼，這樣就兩無關係，互不發生影響了。我們也不得說墨經是墨家後學受了名家的影響而成的。所以不論前說對，後說非；或後說對，前說非，均足證明前六篇無論如何不是受了名家的影響所寫成的作品。

至於郭先生的第二說，亦不能成立。當時各家爭鳴，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主張獲得實現，故都接近「王公大人」，都做上層工作。而墨家所不同的，也是最為進步的，就是如墨子所說「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夫徒步之士」（見魯問論），不獨做上層工作，還兼做下層工作。比如行「義」吧；他主張各階層都受宣傳，要「達至遠邇郊外之臣，門庭庶子，閭中之衆，四鄰之萌人，皆說為義」。（尚賢上）這一段話，據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第三十二注云：「尚賢篇以閭中之衆與四鄰之萌人分言，閭中之衆者，居於都，古謂之百姓。四鄰之萌人居於野，古謂之民，民猶奴隸也。」這可見他對於喚起民衆的工作是何等注重，與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完全兩樣了。後來他的弟子雖有一部分仍在做上層工作，但對於下層工作也還是沒有忽

略的。比如許行，據錢穆的考證，為墨子的再傳弟子，他（是時已年老，約有六七十歲）帶了幾十位徒弟，都衣褐、捆腰織席以為食的，跑到魯國，對康文公說：「願受一廛而為氓。」都願在他地做奴隸，從事奴隸生產，和奴隸們接近。這又可見墨家進步的精神，為了主張的實現，是什麼都不顧的。因為他們肯努力從事下層活動，後來荀子還這般罵著說：「以是驅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自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見荀子王霸篇）荀子之這樣罵他，可見那時墨家後學之從事下層活動對於儒家是怎樣的感到威脅。可惜中國人寫歷史，所寫的卻是帝王家譜；只寫上層，忽視下層；加之寫的人又大都為儒家學者，對於墨家不免歧視，故關於墨家後學之下層活動情形少有記載，這是不無原因的。

這樣說來，墨家自始至終是不曾忘懷於下層活動，是和民衆相接近的。故桓寬鹽鐵論褒賢篇第十九上所載墨家曾參加陳涉吳廣的革命活動是很可索的。至史記所載，備有儒墨參加，此乃由於司馬遷為儒家學者，素來極儒家捧得厲害，另一方面把墨家也捧得厲害，且還有拔墨入儒之嫌。如墨家本為當時一大派別，能與儒家爭雄者惟有墨，而司馬遷不為墨子立傳，其故若林諸墨家，於此可見。且從儒林傳上那一段文字看來，把儒家之參加陳吳革命寫的那麼有力，那麼活靈活現，就是司馬遷要確定儒家一開始就是反秦的，以提高儒家在漢朝的地位，藉以求得漢帝對於儒家之特別信任。因而我想，參加陳吳革命的，儒家或許根本沒有分，只有墨家；而鹽鐵論上之把儒家也列入，當是受了司馬遷那段文字的影響所致；在桓寬本人或許還只知道有墨家參加的。

在另一方面，墨家在秦時雖有一部分在作上層活動，但決不及儒家之盛；儒家活動的結果，還爭得了一個季孫做了始皇帝的宰相，把秦國施行陰險儒的統治二十餘年。亦於此可見，儒家除一貫的趨附「王公大人」以外，哪裏會參加陳吳的革命活動呢？

關於儒墨之專事上層活動，因而得對的情形，梁任公有一段極精辟的歷史敘述。他說：

「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嘗見重於時者也。及魏文侯受經于夏，稍以段干木田子方，於法儒教始大興於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實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當此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者為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後人以為敵孔教，實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下接六八三頁）

關於墨子的思想的討論

——就正於郭沫若先生

復 芷

關於墨子的思想問題，在錯誤的方法論的引導下，很多人會過份的強調了墨家的革命性，甚至把他看作王農革命的代表者，無疑的是錯誤的。我在「論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實驗主義的歪曲」（見民三十年出版理論與現實雜誌二卷第三期）一文中，曾經大略的給予批判，並且指出：「墨家的社會基礎既然並非真正的下層社會或工人，那麼硬要跟着托派的理論家把他作為下層社會或工人看，其結果不過是使我們感到中國歷史上的被統治者素常是溫和的，而現在也應該溫和些而已！」

最近，在羣衆第八卷第十五期上看到郭沫若先生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對於墨子思想中反動的傾向，說明得相當透澈，不過，我覺得郭先生不免過份強調了墨子的反動性，宗教性，沒有能夠給予這位古代唯物論者一個適當的評價。客觀上易於陷入與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秋澤修三在東方哲學史中一樣錯誤的結果，這結果不但使我們初學者入於迷惑，而且很可能影響到其他更遠的思想出來。

因此，我把我個人的見解略略的提供出來，希望郭先生及其他有研究者，給予一個研究上的指示。

首先，我們大體的檢討一下研究的資料問題，關於墨子一書，在清代已有過相當的考證，這種考證可以說已由胡適而集其大成，郭先生所規定的十篇，實際上也是根據這考證的成果，以及魯問篇：「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探務而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憂苦，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學，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的一段話。然而，對於清儒考證墨子的成績，我們却應該批判的接受，清儒的考證學，是在實踐主義式的機械唯物論下完成的，每每缺乏歷史的動向觀點，例如他們說「大造偽書」把軸的原因歸之於王莽

篡位的一個原因，不知儒教的完成，於其說是在兩漢之際，無寧說是在魏晉的時代（關於魏晉時代的思想，魯迅有一篇關於行教的散文，考證得相當的具體，可惜現在手頭沒有魯迅的雜文集，不能多事介紹），而在當時的作偽，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沒落的貴族想維護其封建的傳統而已。墨子一書，確是由墨家弟子的著錄，甚至有漢代的東西在內，但是就大體上講，却可以說是一篇篇可信的，其中有一部份包含着儒家以及其他派系的思想，我們應該從戰國末年各派思想的合流及其社會的背景上去解釋，如果研究整個的墨家思想，我們不能局限於某幾篇上面。不過，如果單就墨子個人而言，則郭先生所指出的十篇，以及辨莊、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都主要的材料，而其中他各篇，也有其參考的價值，問題在我們不應該專抓住幾句來研究，因為幾句也許正是別人所加進去的東西，我們如果就這幾句來研究，問題就容易得正確的解決。

第一、我們看墨子到底是不是一個宗教家，我們知道宗教家的思想體系，其主要點是在宗教的信仰，然而，在一部墨子中我們看不出來，墨子固然強調天志，然而更強調的是「天欲義而惡不義」，「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天志上）「義者，善政也」。（天志中）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出墨子強調天志的目的所在，至於墨子的明鬼，也由於「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也，聖王之遺也」。（明鬼下）而且「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離聚散取親於鄉里」。（同上）在這邊有目的強調天與鬼，和迷信着天與鬼到底不同，在宗教史上，理論論實在已經說明神的末路了，而且，理論論者絕對不可能成爲一個宗教家，「神道設教」並不是儒教註定的專利品，在墨家的墨子思想體系中，就依郭先生的研究而論，天與鬼也只是占着五分之一，至於後來的墨家，我們可以影約的看出，已經取得其他的理論依據而拋棄

了天與鬼的說法。

再就經上下，經說上下中表示的科學理論而言，的確只是「一些」粗淺的常識，但是我們如果瞭解在當時的常識並不一定像現在這樣，那我們就可

第二、我們再大略的看一下墨子的政治思想，由於當時的社會，特別由於墨子的社會背景，我們可以說墨子的確是不民主的，墨子的政治思想體系

至於說墨子是不是也有一種神聖說呢？我以為是有的，在實質上中下三篇中都有這種說法，尤其是尙賢下最為明白：「是故昔者舜斬於歷山，陶

第三、關於鑄用銅器及非樂是不是反進化的，我想我們不應該拿「沒有任何種類的增加生產的辦法」來指摘墨子，在當時又有誰曾經有過積極的增

之道，未嘗不與墨家同。至於說：「古者聖舜有孝美者，且以爲驕，且以爲

第四、在墨子的時代，生理學心理學醫學等的發展，尙不足以研究到異

第五、所謂「兼愛」，我想墨子的原義，並不是叫天下的人都擁抱擁護

去樂，去惡，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身從事於義，必為聖人。」的一段話，愈說且加「去惡」二字，以善惡樂惡惡為六辟，但是這一段話在全篇中亦不發生影響，是否為墨子的原文，是頗有疑問，這段話倒和莊子天下篇中主張「以禁攻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的宋鈞尹文相近，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宋鈞與墨子併為一派，但漢書藝文志却把尹文子歸入名家，這兩派事實上是有不同的，其情欲是宋鈞一派的主張，在墨子書中很少在其他的地位發見，我們似乎不能執着這幾句來說墨子兼愛是去愛。而且，六辟的義意，愈校詳增全，但也是一個疑問，尤沒有執着的理由。更進一步來講，則對於「去愛」的「愛」字是情欲之愛，「兼愛」的「愛」是感情之愛，義意也有分別。

第六、墨子是不是主張無條件的投降主義呢？從墨子的行為上，從對於防禦的注重上，我們都沒有理由來指墨子是一個不抵抗主義，所謂「諒」與「攻」本質上是不矛盾的，墨子對於湯武革命會有不少的敘述，這種實在是不勝枚舉。在魯國篇除了郭先生所引的第一段外，接着的第二三兩段都是止齊攻魯的話，那麼，這段話豈不是可能由於時勢的要求而發的呢？就成為一個問題了。另一方面，想類似乎有貴族篇中一段墨子的話：「衛小國也，處於齊魯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吾欲備車食賜之費，與備衣之財以高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處前，與婦人處後，熟安？吾以為不若青士之安也。」公輸若中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守宋的說法，備城門篇中「守小國」之法，都證明墨子主張有備而不攻的，不抵抗的投降主義，只是「見侮不辱」的宋鈞等的主張，我們不能併論的。

第七、至於非命是不是就承認了現實的一切強權霸道，這是應該從墨子對於實踐的態度上來決定的，墨子不管多大的阻礙而努力實踐，提倡防禦，實行技戰，我們應該給予較高的評價，而不應用形式邏輯的推論，一直把秦皇漢武的企圖長生，都歸罪於墨子的非命論。

總之，「我們不能說古代的墨子就現代的一樣」，「我們不能說墨子的論理就是現代的邏輯」，（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六十六頁）墨子的反動性實在由於其歷史的社會背景的限制所形成，我們只有從這方面去研究，方才可以得到一個適當的評價。

儘管西周社會是奴隸制還是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過渡時代也許有討論的必要，東周是封建制的社會大概是得到一般的公認了吧！（至於秋澤修二的奴

隸制論，關於牠的法西斯觀點，暫時不去管牠）。在墨子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新興的商人已經起來了，通過高利貸的過程，腐蝕了封建領主的經濟，取得土地的自由買賣權，形成了新興地主階層，這階層本身同時還是一個商人，因此，自春秋以來封建領主併吞的內戰，更趨複雜起來，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開始發展起來，基於這種形勢，表現在生產關係上的是現物地租代替了勞役地租，佃役佃耕制代替了莊園農奴制，而表現在政治上的是，法家制權的要求。儒家墨家法家以及其他學派各以不同的態度來發揚這種政治要求。

墨子的出身，據一般的考證，我們可以看出是一個奴隸的後代。但他已不是一個奴隸，而且成爲一個士大夫的階層出現。這個士大夫的階層與孔子所代表的士大夫所不同的地方，在不但是以奴隸的後代的關係，而且是以獨立對封建制中的武士階級的關係而存在。士大夫這個階層本來不能構成社會中一個獨立的階級，因此，必然是依賴着更主要的力量，然而因爲墨子有着奴隸後代的關係（而且還是這後代集團中的頭子），所以比較孔子更進步一些，對於政治上專制權權的要求更積極一些，對於實踐也更重視一些，並且是或多或少的提出一點下層階級的利益。

墨子的思想體系，因爲時間關係各方面因困難，現在沒有方法做詳細的分析，不過大體上可以歸納到下列的八點：

- 一、在認識論上是一個感覺論者，且由此而引出對物質生活的重視，政治上的表式主義，所以在基本觀點上，是繼承權權的「行唯物論」傳統的唯物論者。
 - 二、對富貴的重視，直接的現實性的意義。
 - 三、因此，在方法論中，特別在有名的三表法中，注重「觀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歸納的經驗主義」。
 - 四、政治論——「上同而下比」，注重帝王的作用和「尚賢」的主張。
 - 五、因此，以「天」「鬼」作爲一種護符，以「兼愛」「非攻」「節用」——「非樂」要求於一般人，特別是帝王。
 - 六、雖然用「天」「鬼」作爲理論上的護符，但由於◎的關係，遂從類似「神道設教」的主張走入反宿命論。
 - 七、因此，不過強調「法先王」，其最後目的要求人口的增多和生產的富足——「一個充足的社會」。
 - 八、有組織的而實踐的學派，遂發展到後期墨學更進步的思想體系出現。
- 這八點是我個人對於墨子的見解和評價，有機會當比較完整的詳細的寫出來，當然我不敢固執於個人的意見，然而，目前我還是得把這意見見地寫出來。

後，關於國家消滅的原因，似乎應該比較樞要的說一下個人的意見。

第一、是國家的社會背景的不可測和變失：士大夫這一個階層本來就缺乏着地的獨立性，這在墨子的思想體系中已明顯的可以看出，雖然說墨子會日子愈久，作為「奴隸學派」或「刑餘學派」的墨子早已不是真正地代表着奴隸（因為已沒有這一個階級而只有些殘餘而已），到漢代以後墨家之士，武士這薄弱的社會基礎也要消失了。沒有社會基礎的學派，當然無法存在的。

第二、為統治者所拋棄：「節用」「非樂」的主張本來就不及主張虛文繁禮的儒家易得統治者的歡迎，當然不會在喪失了原有的社會基礎後更取得新的社會基礎（像儒家一樣），郭先生指出墨家有相秦的嫌疑，確也可算一個原因，這使墨家不可能在漢代存在。但「節樂」並不能作為墨家反動的證據，相反的應該看作墨家思想體系中反動部份的結果。同時，因為秦是代表着中國社會在戰國中進步的力量，所以如法家等都以相秦為務的，我們尤不能過份的強調。

第三、是幹部的死亡和不易找到良好的後起者：如鉅子孟勝與二百多墨家子弟的死，我們不能說不是優秀分子的減少；同時，莊子天下篇所謂「反天下之心一論衡稱所謂「不合智者之心」，其實在魯國稱中「魯人有因于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于墨子，」云云，則在墨子遠在的時候，已有了這困難，本來，既有嚴格的紀律，又缺乏社會的基礎，這一個學派能繼續存在，當然是不可能的。

至於郭先生所舉的三點，第一是由於墨家後學多效法入了儒道兩家而失掉了墨子的精神，這種抽象的原因我本不敢贊同的，莊子中說對儒也是包含着儒家的理念，曾吸收法家陰陽家的思想實不虛證明，但都說有失掉了道家儒家的派系，何獨單單使墨家失傳呢？第二是由於墨家後學過分接近了王公大人而失掉了民衆的基礎，而如如果真為王公大人所接收，則已有了社會基礎，思想更上不缺乏沒有民衆基礎的反動理論，何獨單單使墨家失傳呢？相反的，這只是證明墨家的反動性沒有儒道兩家那樣大，而易於失傳。

其實，墨家失傳的起點一點，却可以反證墨家只是一個思想派系而不是宗教的派系，如果是宗教，不論他的基礎怎樣，決不會這樣快的失傳，在社會主義的聯邦中，宗教還有一絲的殘存，就是一例證明。

至於關於游俠與墨家的關係，我非常贊同郭先生的意見。

最後，我更希望一翻，就是希望郭先生及其地方兩的指教。

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八上接六七九頁

，國家之語，所其者，不過成其生，侯生也。等四十餘人，未嘗與儒教有關係也。曾不仇？且曾自稱之。其後書之命云：「有欲學者，以吏為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於國立學校之外，有新私黨而已。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於儒教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漢高皇帝年最壯健，有儒道，漸滋潤之，其吐繁也至矣！而魯食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垢以從之。及天下既定，諸將爭奪項，引為深患。叔孫通乃移兩古制，為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得孔學之真有利於人主。陸賈獻新語，蓋知儒上之不可以治天下。於是遂得以太牢祀孔子。嗚呼！儒學，以助後世。漢高皇帝之第三功臣也。」（見飲冰室文集卷二學術類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從任公的這一段談話中，第一說明了儒道固了上層的活動得力，從魏文侯時起，就得運起來，就獲得政治上的支持，中原經秦到漢，而勢力益加強充；這樣，當儒使得其餘各家站立不住。其次說明了秦所製書，官府書並不會完全為民間的諸子百家書籍，這可見對於其他各家的思想排斥得厲害。所以秦雖未明白地定儒術於一尊，但因為了李斯之大用，事實上，已是儒術統治天下，而墨家又為儒家動取，當然不為所容，自無從容。到了漢代，所用博士都還是故秦的，更可見秦時的儒術之盛。這說，墨家由於政治上的壓力一天天地加大，即使他是相當有組織的活動，也不能不走上衰亡的道路。

到了漢代，儒術更加獲得政治上的支持，已明定儒術於一尊，於是其餘各家都相率走上下策路。至於墨家，因見上層活動之路已斷，便流為所謂游俠，在民間鄉里中，專門從事下層的活動聯絡民衆，以為對抗這「以武犯禁」就是他們的工作之具體表現。所可惜的，一則由於他們的組織力還是薄弱，二則由於那時的統治力相當強，故不能好好活動起來。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稿

軍事學文之三

現代的戰線

卡·克·基·蒂·夫·作

原文載於『軍事學』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期

焦敏之譯

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戰爭以前，戰線是戰術的派生。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才產生了綿延千百公里的戰線。這種戰線在現今的戰爭中也有。它在現代戰爭中的意義和作用怎樣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先從戰線的構成過程來考察。

爲什麼我們今天的武裝力量不是集結爲新集結的兵隊自由在戰場上動作，而是循着戰線疏開呢？至遲幾千公里呢？這是軍事理論上最複雜的問題之一。驟然看來，戰線的存否顯然與兵力集中的原則相矛盾。要戰勝敵人應在決定的地點集中最大的兵力給敵人以一箇粉碎的打擊。但如敵軍的作戰隊形是綿長的，那麼最有益的是利用擊破的拳頭打破他。跟着坦克與空軍作用的提高，最大兵力在決定地點集中的原則便具有特殊的意義。每個人都明白，成軍動作的坦克及空軍，尤比他本身還具有一種不可比較的强有力的機動的手段，但如將其分散爲小隊的羣，它便失去它突擊的力量了。

某些有偏見的人們認爲，現在向軍隊既非軍體的，那他就不能在一個窄狹的戰場上展開，於是就拿這假論來解釋戰線產生的原因。當然，比方說要展開二百個師團——這個數字就今天的規模說是不小的——是比過去參加最大戰役的幾十個師團要求以更大的空間的。然而大規模的進攻戰爭的教訓證明一點：在攻擊地帶越集中多的師團越好。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間，在德國第十八軍進攻的地帶，一師佔有兩公里長的戰線，在其它的戰線上，師團還要更密集些。但在攻擊途中却發現了兵力的不足。

由戰術動作要求的觀點來看，兵力及物資向狹小空間的聚集，至今仍完全保存着它的意義。舉重機開槍的例來說吧，由於重機開槍約可代替六十個步兵的火，所以在一箇空間的單位，突擊力量因集中比從前的會戰中要大的多。由剛才所舉的數字來看，二百個師團應該是在四百公里長的戰線上展開。但爲實現攻擊的目的，戰鬥隊形却可建立爲幾個梯隊，將展開了的戰線的長度減少兩倍。但在一九一八年，每一交戰國方面在西戰場上大約均有二百個師，戰線的長度約爲八百公里。此外再加上作爲戰後備役的師團總數中的一部分。在一九一八年中，聯軍每師的戰線如下：英國屬形方面——三公里半的戰線，在瑟曼提（Chermside）——七公里，在洛倫——一四公里，在佛日——二一公里。

可以說在最廣闊的陣線上展開之後，對敵圍攻包圍及迂迴的機動可能性便會增大。但也是這機動才要求有一定的戰場及一定的方向的堅強突擊隊的建立。在廣大的戰線上平衡分配兵力是與機動作戰的原則相矛盾的。

非常明顯地，廣闊不絕的陣線的存在是與防禦相矛盾的。但從防禦觀點看，初視之似亦不其然，是否否在戰線邊沿可採取兵力的分散？抑或可能有另一種決定。附有強大的機動手段的防禦者，可保證自己建立龐大的突擊部隊，予進攻的敵軍以迅速的強有力的打擊。此外還有集中在最重要的方向而互爲支持協同作戰的大軍未佔領的中間。

在戰線的佈置方面，還有某一些不能理解的人們。應該說，在過去戰爭中那漫漶着機動作的精神而力圖以作戰的藝術去發展創造的軍官們，是不能與那些把大軍凍結在前線的強大思想同樣的。不以強大的機動兵隊在戰鬥中向前推動去粉碎敵人，而將其分散在這種廣漠無際的戒管線是一種最荒唐不合理的。

事。

陣地戰的陣線，非由統帥最高明地展開其兵力的意圖而產生。它倒是一個痛苦的必然性的產物。陣線是當沒有什麼更多的希望以博得自由的機動的勝利並在野戰中戰收敵人之際，才於最後形成且凍結起來。凡祇看到這種廣大戰線的外表，分散着的兵力及其技術而使軍隊在戰線中變為一些死守不動的草芥般的人們，是沒看到主要的一面的：在這些死守不動的戰線的圖案中凍結了的機動，它並不是想永遠繼續到最後，同時暫時鎖在這裡的兵力他每小時也在想準備振作起來而進行機動的鬥爭——戰爭的真正的旋風。因此在這些戰場上突然爆發了的最激烈的戰鬥，其所採取的驚人的突破計劃以及所展開了的機動的動作，祇是到陣地戰再凍結了它之後才可使它停止。那時在靜止的戰場上又籠罩着可怕的沉寂，雙方均應盼向敵人壕線的小小的推動。

戰線——凍結的，未完成的機動。如在戰線中未曾看出過去機動及戰鬥的凍結的歷史，是不可說明戰線的奇幻的意圖的。試取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中西歐的戰線可為一個例證——戰爭在整個戰爭期間它的基本的特性是穩定的。

這個戰線由法德兩國之間的舊國界起，東衝瑞士，西北直走，約在上述兩國的邊界附近直達凡爾登。它通過佛日，並以法蘭西方面的堡壘地帶為憑依，因此完成了在平時對它所預定的作用。由地便於防禦的任務，所以陣地由德軍預備兵，後備兵佔領着，或由法軍國庫區以及徒步騎兵佔領着。這道首先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月間激戰後凍結了下來，因為當時德軍企圖突破德防線，尤其是在凡爾登方面，均無成效。聖·米林斯克方面的突出，可作為對這種凍結的壓力的一件永誌不忘的事，因為德軍於一九一四年得在這種凍結的河兩岸，並奪取了整個戰線所保持的一個狹窄的戰場。祇到最後，英國軍隊對它的進攻，才消滅了這種悲劇而使盟軍大快人心。凡爾登與塞瓦斯兩面的突出，同樣也可想起一九一四年德軍的機動，那時德軍軍團自東西兩面如潮湧地包圍了德軍。在全線停戰前，德軍統帥部時刻懷抱着襲擊凡爾登的野心。在一九一六年，又擬定了這種大規模的驚人計劃。特殊的兵，在十四公里長的衝鋒地帶，雖說共祇有兩個法國的地區師，然而他們也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防禦的任務。德軍被擊潰的計有六個師，被毀大砲一、二五〇門。這種緊縮的兵力的集中，可為上次大戰中最殘酷會戰的

開始的標幟。戰線上死沉沉的地帶突然消逝了。差不多所有法國的師團及軍的大部分都要通過「凡爾登碎肉機」的細長的喉管。最後，在經過無數次的衝鋒及反攻之後，戰線又約在從前的戰線上膠凝了下來。證明這一點的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戰線不僅產生，且穩經交綫及戰鬥的結果亦屹立不動，終未引到決定的勝利！

由凡爾登迄瓦森戰線的中間部分產生了，並在德軍於一九一四年九月由馬爾恩河退走之後幾乎保持着一不變的陣線。曾經有一時，在克羅奧溪入的盟軍，威脅並沒着尚未鞏固的德軍防線，但新軍第七軍的調入作戰，卒允許德軍挽救危亡，並在埃納河以北構築綿延的防線。在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七年，法軍向香賓採取大規模攻勢以便突破敵軍防線，然當時爆發了的喋血的會戰，結果對戰線並未重大的改變。

在馬恩一區，陣線蜿蜒向北而直抵波蘭之海。假使任何一種戰略戰術的運用來說明這種陣線的彎曲性是徒勞無益的。這個陣線一直向西延長而且大約通至索姆河流域者，是最為自然的（這種情形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也是如此）。戰線的真實的淵源祇可由歷史來說明：這個戰線是由總的構成所謂「競走到海」的無數次機動與激戰（一九一四年十月到十二月）的結果而產生的。雙方竭力利用剩餘的自由空間（在瓦森以東的陣線穩定之後），向這裡調出成批的軍隊，展開包圍與迂迴機動的潮流，企圖彼此贏得連續擴張的陣線上的突擊的側翼，而進行寸土必爭的激戰。戰線決不建立在任何一方在戰略和戰術上都有利之地，而是在攻擊和機動軍隊最努力凍結之地。盡人皆知，在伊普爾之後，為爭奪每一寸土地而發起的英勇並受了多少大的損失。結果，陣線就在本城凍結。盟軍自己固守着布魯、卡羅、敦刻爾，但當然地，他們寧肯在未來的戰爭進程中握有全部比利時（由俄斯坦德與莫不魯斯）的沿岸——在這裡德軍到最後建立了潛艇的根據地。機動及戰鬥的結局規定出一條在基本上維持到停戰的戰線。

一九一八年德軍的攻勢使戰線起一變化，然它祇有地方的性質。誠將將軍一九一八年下半年的攻勢，引到了德軍所建立的突出（「袋」）形的崩潰。一九一八年十月德軍陣線的崩潰引到了德國自身的投降。

現在我們來研究現代戰爭。在這次大戰開始以前，存在着兩個不正確的僵硬的觀點。第一個觀點認為未來的戰線早已於平時由建築的防線準備齊全了。「馬奇諾防線」就是已

建築好了的一道未來的防線。在國境方面預先決定構築防線的計劃，是由戰爭的陣地戰性的思想而發的，其思想與戰術也就在這種。法國人自己完全吃了這一種思想，完全放棄了作戰的機動原理。雖然法軍統帥部也看出它不得不在尋常進程中見機而作，竭力利用防禦線，可是他底心裏無論如何還是把它與「馬奇諾防線」結合起來，在國境上的防線上注定了它應有的機動性。我雖記得，在一九一四年時，法軍最高統帥霞飛大將，他是如何勇敢地決定如某時勢需要的話，即便以巴黎及凡爾登的喪失為代價而退却至塞納河畔也是在所不惜。霞飛大將甚至把自己的期望寄託在軍力方面而不是寄託在防禦方面。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法軍統帥部沒有決定撤退凍結在「馬奇諾防線」上的龐大的兵隊。防線的意義是無可爭辯的。在某種條件之下，它可作為戰線的一個支點，如在土次大戰中在法國東南作為它的防禦地帶一樣。但切勿以為現代的戰線結果是「自己便當的機械化力量及空軍」存在的。

第二個觀點，認為現代攻擊手段——摩托機械化力量及空軍——存在的條件之下，戰線的存在，即最堅固的戰線，一般地說也不容它存在，同時機動戰也將在空中展開。這個在基本上說「閃擊戰」的理論。和不能根據這個假說而統帥部都認爲否認了戰線，這固然是非常荒謬而說說沒根據的。按照法西「閃擊戰」理論擁護者的見解，德軍有足夠的堅強手段迅速擊破陣線。

廣大而堅固的戰線的存在，在現行戰爭中是一事實。這個戰線與上次大戰的戰線不同：它的思想起了變化，在它思想上提出了新的機動性及可能性的問題。戰線形成的過程延緩了，但基本上還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相同。

試舉我國戰線上的例子。就它的長度說，它不亞於上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西歐的戰線。這個再次地指出蘇俄戰場上的戰線有多麼大的規模。宋來的德軍家不僅僅對華人的規模所驚愕，而且他們也必因極其新的陣線目標口呆。這種戰術地圍繞着廣大而稠密的森林，橫貫河流，森林地帶森林，沼澤，湖沼而轉彎的戰線，把軍隊組織成數段的陣線，是可能明瞭的。它可說明德軍對蘇聯的德軍的壓力，我軍在寒冬進攻的驚人機械化以及對頑強固守的蘇聯的殘酷戰鬥。陣線團結在我軍進攻停止之地，由於在冬季條件下運輸的極端困難，步步都要用很大的力量。蘇人兇猛防守，已看出我軍的挺進必使他滅亡。這樣就形成了連續着

的戰鬥的陣線，並且在以後的幾月中戰鬥一直進行到現在，但根本上沒有改變陣線的形勢。

戰線由北而南，其長度估計三千餘公里。這比上次大戰中俄國的戰線長倍有餘。在一九四一年德軍進攻期前戰線已經產生，但它並非無懈不絕的，而且非常流動。在戰爭的那個階段，鬥爭的目的是為了保存我們軍隊的相互連系及配合行動。德軍企圖個別擊破他們，以便個別粉碎我軍的力量。但個個他沒有成功。因此，儘管敵人奪取領土，然結果他底計劃還是失敗，紅軍以強有力的阻力的冬季反攻回答了德軍。

在戰爭的初期，軍隊地表現出了由各方面來的龐大驚人兵力的傾向。決定的戰役爆發於德軍攻擊的一定的方向。很大的中間沒駐着軍隊。但因可利用缺口以填入軍隊陣地深處從而反撲，包圍及迂迴，所以向這些間隙調動兵力，雖然爲數不多，必然產生了雙方兵力陣地伸延的過程。這個過程對攻擊一方的德軍尤爲不利。他們常常被敵軍擊破而解有突圍的側翼。爲了這個原因他們於一九四一年——四二年冬季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在戰爭第一年，比較最穩定的防禦線在北路，但這種也發生了陣線的交相更迭或大牙相錯的形勢。在一九四一年九月，開始制定了列寧格勒外國的陣線。但在南端，希特勒軍隊仍繼續攻擊，其後更加瘋狂進攻。迄一九四二年春，幾乎在全部戰線上都在基本上穩定了下來，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所開端的偉大戰役，就到夏秋兩季泥濘的期間，得到了一個暫時的沉寂，戰線停留在德軍所達之界，而以後成爲不間斷的交鋒。到這個時期，除少數戰線而外，戰線已變爲無懈不絕的了。

★ ★ ★

就本質而言，戰線均用以達成防禦的目的，雖防禦一事，亦可利用其它手段來進行——利用兵力集結的原則及機動。除這些極端的方法而外，防禦永難以防守，地形的利用及其設防的手段以作爲保證自身不受敵人攻擊的手段。這樣，這套非常合法的防禦一方，在實質上就表現爲戰線的思想。戰線不僅爲防止德軍企圖進入我軍後方的巨大的防禦線。防地不僅僅伸展爲一條形，且擴張至設防系統防禦深，要有抵抗敵人擊穿的誠實。此外，充分利用最優裕的地形條件。爲使這套系統發揮作用，必須將軍隊及武裝駐守於此。於是就在這開始與攻擊戰線的原則相矛盾，因爲戰線是要求兵力的集結攻。這一矛盾如何解決，看了下文便可知道。

但如戰線是必然性的產物，那麼現在就應問明它為什麼是可能的。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之前，將遠程部隊在傳幾百公里的陣線上，這便企圖若果遭受失敗的。祇有現代火器的出現，首先是重機關槍，才有可能給野戰戰線以那樣的堅固性，才有可能使廣大陣線的建立成為可能。並非工業本身，而是火力才構成了戰地的防禦實力。當然，即使有此種條件，每一地段軍備也還是非常薄弱不足以抵禦敵軍龐大兵力在一定期間的壓力。但與過去（在一九一四年前）的不同，是在於每一地段抵抗的力量，由於新式火器的關係而大大提高了；在有正確的組織及固守的堅毅力時，可以在防禦的後備隊調出以前以儘量敵人優勢兵力的進逼。防禦地帶的縱深尤加倍增長了作戰後備隊應得必要的時間而開到前方的機會。

在每一單個的戰場上，戰線不其不不可打破的壁壘。經驗指明，即使是最為堅強的築城（如持久的火巢）也不能保證抵抗住配備有必要的兵力及裝備的敵人的打擊。築城持久的火巢是不容易的，需要許多時間與各項缺乏的材料，最為簡便而又不是堅固的防禦，因可以迅速利用輔助的材料築成，及而在野戰中較為有益。消滅的防禦，一味盲目信賴三和土的牢固性和防禦的不可動性，結果必注定失敗。這個在過去的戰爭中已屢屢證明了。這個在現代的條件下尤為正確。但每一段防地段的抵抗力，都有一定重要的意義。

在戰線的構造方面，有允許軍隊抵抗敵人龐大兵力進攻及阻止他進動的防禦的系統；有佈置在縱深而必須對敵反攻並於最後阻退敵軍攻擊的後備兵的縱和，以便戰斷他，消滅他並恢復接連不斷的陣線。

陣線的存在，對於作戰方式有重大的影響，並改變它的性質。戰線構成的徹底完成這種陣線，雙方性質的少變動作用外，一般地是有引到不動的危險的。如雙方的兵力都集中在陣線之上，便可完全打破了攻擊及機動的基礎。但在事實上並非如此。甚至至平時的戰線上，祇有一部軍隊駐在前線。龐大的兵軍則集中於後方的第一線。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中，戰時後備隊的數量，即所謂最高統帥部的後備兵，向例是在戰爭進程中增多的。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西線的德軍，已將其總數一百九十三個師團中的八十九個師團留作最高統帥部的後備兵，聯軍的一百八十一個師團，把六十九個師團作為後備兵。駐守前線的師團，實比奉令積極動作的突擊師團，在數量上要少些，在武裝方面要弱些。戰時後備隊的作用更迭破壞了

雙方戰線的相互力量的平衡，且成為對敵進行最精微偵察的對象。

戰時後備隊向戰場上某一地段迅速而突然的集中，可有一勝利進攻的機會。這樣，大批軍力的調運終久還保存着它的效力。但在過去戰爭中，則從沒有一次——即在現今的戰爭中也如此——強大的攻擊部隊的建立，是完全教某一陣線突露而建立，雖然是頂次要的戰場。在外表上矛盾着的重兵原則及兵力集中原則是同時進行着。但它們倍加因戰線的存立困難了起來。防禦一方戰勝，而攻擊一方則必須克服重大的困難。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八年一切動作都引到了突破的動作，但它們都結果沒有收到希求的結果。這對於現代戰爭是否也是對的呢？

現行戰爭的一切動作，最低限度在最初階段是突破的動作。但在技術及軍隊戰術方面發生了那樣重大的變化了，舊的名稱已完全是另一種意義了。現今突破的手段不可比較的更堅強了。然而實現突破的困難也增加了，這也是對的。攻擊手段的實力劇烈增高，可是防禦的力量也不斷地在增高。這兩個過程永遠的競賽，在現代戰爭中也是沒有終止過的。

我們所說的困難，與過去戰爭的困難不同。更正確地說是這樣：在那種戰爭中所遇到的困難，可用現代的攻擊手段克服。但除這些而外（因為他們到現在還存在着，但是能克服了），現在則又發生了前次戰爭所未發生的困難，因為在過去戰爭中，在未與它們衝突之前就消滅突破了。現在我們就闡明這點，因為它對於理解現代戰爭非常的重要。

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德軍開始由索姆河兩岸岸攻擊（即佔領了一年以前肅清他的領土了）。兩星期後，他們底攻擊在長達一百二十五公里而縱深推進六十五公里的龐大的弧線上停止了。德軍得以在戰術上突破一切防禦。但是發展戰術的突破為戰略的突破的企圖，他卻沒有成功。德軍不能克服在戰略突破方面的一切困難。這時他們底步兵共隊克服了在防地及縱深近旁方面所遇的抵抗，聯軍亦能調動他底戰時後備隊並形成堅固的掩護以阻遏德軍的衝鋒兵力。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如德軍調出最堅強，而主要的是最機動的突擊兵隊，他們便能深入突破，並截斷由北聯結德軍防禦與不列顛防線的主要交通線。那時便可談到戰術勝利向戰略勝利的轉變，因為被切斷的盟軍可能遭受非常危險的後果。當日被任命為聯軍總司令的福煦大將，猜透了敵人的計劃，於是德軍被阻於距最重要的鐵路交點亞眠十五公里之遠了。亞眠的攻克消滅了一切困難嗎？那時的作戰思想還沒有進到某一戰術

方面陣線的突破，因為這個任務通常還是一個未能解決的問題。可是，在東戰場上却已有勝利突破的戰術經驗了。在一九一五年，德軍於格立茨突破陣線之後，即逐漸向俄軍全部戰線展開他攻勢的動作。但不問俄軍如何痛感彈藥及武裝方面的災難般的缺乏，擊潰俄軍的任務對德軍還是非常困難而力不勝任。結果，突擊的動作，祇是全部擊潰陣線所必要的整個動作的開始而已。這便發生了第一個問題，即嚴格說應當承認徹底大功告成的突破。一九一五年俄軍陣線祇未被截為數段；德奧兩國的軍隊在戰線縱深中遭遇到了秘密運來的後備軍的打擊。戰線祇是慢慢地向東推進而已。即是說，陣線的突破結果沒有成功。

戰線——交錯在防線及其後方的武裝力量。在這些武裝力量未粉碎以前，是決談不到決定的勝利的。突破之所以危險，在於向那勝利開闢了一條途徑。但這祇不過是實現非常困難任務的開端罷了。倘若以為突破為攻擊力量向一個既無防線而又無敵軍的空間找出路的話，那麼這種情形是在過去的戰爭中常有的。譬如在一九一六年的索姆河之役，這種轉變發生過兩次：起初在索姆河發生，其後是在河以北發生。但是，就在攻擊一方，在這種空前突破的條件之下，足以決定戰局的會戰當然也祇是在開始。攻擊一方甚至可集中池底後備兵到其它戰場極端薄弱之地。一九一六年的會戰（凡爾登會戰，索姆河會戰以及不魯斯洛夫的進攻）證明，突破的縱深發生了殘酷的大戰，在這個大戰中，如果環境需要，雙方都把他們底後備軍調出——直至最後所剩的新的師團。

在現代戰爭中，有坦克及空軍的援助，便有很大的可能發展戰術突破所獲得的最初的戰果，並且擴到空曠的戰場上。但這也沒有解決了陣線突破的任務，至於陣線的擊潰更是說不到的了。鬥爭祇在開始。由突破的最初動作中產生了許多新的日益激進的吸引攻擊一方進行驚人會戰的動作，那時他不得不接連調出新的後備軍；對於軍隊給養的條件，日益緊張和嚴重了起來。攻擊一方展開縱深突破的動作，可能是在種類上最為繁夥的。此外，軍事動作戰場的特性，防禦一方可憑依的防禦的存在，大人烟稠密據點及工業中心的分佈以及戰場的縱深，起重大的作用。然而不論這種動作怎樣，與在純機動條件下的動作有別。所有這些都與突破發展的任務有關，所以尚未破壞的總的廣大陣線的存在也就够它解決了。我們可以指出下列的幾種基本的動作形式。

向縱深發展突破的動作——攻擊一方利用他運動部隊配合空軍及摩托化步兵所進行的一致行動的飛速的推進，是企圖防止防禦者鋼守在新的防禦。此外，攻擊一方時時企圖把勢欲向廣大的戰場移動的兵力集中為突擊的拳頭一樣而向一定方向動作，並以進至最重要的後方中心及衝破交通線為目的。留在突破區域的敵軍部隊的消滅為動作的任務。在現代的條件之下，坦克，摩托化部隊以及傘兵部隊常常可在守軍的後方出現。但運動的攻擊力量這種向後方的突出，並非完全意味防禦軍抵抗的粉碎。後者能够沉着勇敢地繼續作戰，與鄰近部隊聯合起來恢復綿長不斷的防線。戰鬥的結局由緊張的戰鬥決定，在這種戰鬥中雙方都是處在危急存亡的境地。凡在鬥爭行動中表現高度的忍耐精神，組織能力以及藝術的一方，必可獲勝。

鞏固突破的動作——這個是最困難的動作，祇是在出現了廣大陣線的時代才產生。這裡不是說要如在上次世界大戰中於突破時所形成的縱深及「袋形」側翼方面加以鞏固。這種「口袋」本身是突破的失敗。這裡是說在突破邊沿的嚴密封鎖的建立，以便阻礙敵軍的陣線。戰場的縱深有限時——如在西方——這類任務可利用走廊兩方新防線的構築來解決。但如戰場上有廣大、縱深的話，這種任務怎樣解決呢？問題又歸結到「口袋」的形成，並在突破縱深產生新的戰線。戰場的地理特性，在這裡有着大的作用，攻擊一方總想利用它以便鞏固全部戰線土陣線的裂口。

向側翼方面擴大突破的動作。這個是與衝入陣線鄰近地帶的後方並利用其正面上隣近部隊同時一致的衝鋒來幫助其對後方實行包圍而聯繫着的動作。這種動作可無需突破敵的鞏固來進行，但那時他還是很危險的。在戰線甚長的條件下，攻擊一方却受着無止境的動作的牽系。簡直不能料想到要達成這一切動作究竟需要多麼龐大的兵力。驚人大戰的區域及規模越來越在擴大。由此可見抱着決定性目標的突破的動作，祇可在具備了充實的後備軍及物質的貯備時開始。反之，攻擊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一切都依賴於防禦的堅實與鞏固。

守軍的基本任務，在於敵軍開始突破動作的陣地上進行沉着與堅強的鬥爭。這個任務，即在攻擊一方滲入個別陣地的縱深時也發生效力。就是在被圍及切斷的陣地上突破，防禦一方的抵抗，也永遠不能說是無意義的；它可延緩敵人進攻的速度，消耗他且增多統帥部用以調動後備軍及組織回擊手段的時間。如突破終於實現，則守軍的防禦，是展開下述的動作。

在突破縱深，建立新的堅固陣線的動作。這個困難的動作需要迅速，但最主要的——還是動作的有組織。統帥部底第一個任務——選擇並指示軍隊必須建立新防線的地點。奉命趕赴指定地界的部隊，在這裡應防守到最後的一兵一卒，決不可後退一步。與鄰近側翼密切的結合，可增高新陣地鏈環的堅固性及穩定性。然即使在這個時候，敵軍個別的運動部隊還可侵入新設防界的陣線。但這決不許動搖守護者的決心。防禦的後備軍源源開入指定的防界，彌縫缺口並增援已進入戰鬥的部隊。

固守突破點的側翼異常重要。過去戰爭的經驗證明，如守軍能吃緊堅守兩翼，突破必限於一區並被消滅。一九一八年恩河的五月突破也是如此，當時法軍在瑟阿森及列姆斯區域防守，立即阻止住了突破的擴大。由側翼防線上這些設防的山岩起，順着突破邊緣構築了新防線，並與前赴指定地界的部隊結連着。自然啦，敵人一定設法用各種方法圖謀打破防軍這些固守新陣線的企圖，儘可能地迅速把自己的運動部隊向縱深推進。但是，防禦者也部署好運動手段並利用它以便成後備隊迅速的集中。在最短促的一刹那間，在自己的陣地豎立起野戰的防線及後方的防界是極爲重要的。

反撲及反攻。反撲——動作的目的就是阻止或延緩敵軍兵力的攻擊和消滅敵軍底衝鋒部隊。在採取反撲時，必須對軍隊定出顯明的目標，指示他們應該到達的地點，注意與其它防地或被敵包圍的部隊取得接觸。「一般地」向着突破的空間進行反撲，祇是把自已的部隊引上死路，這不會有實際的效果的。以在側翼及在突破的縱深而鞏固陣線及扼守新的防界爲目的的反撲，是最能收到益處的。

反攻——規模廣泛的獨立的動作，其目的在把突破消滅，在把挺進到突破縱深的敵軍的人力殲滅以及奪回敵人所佔領的領土。

可以指出，在這種鬥爭中，一切都祇賴於在突破區域中的動作。顯然，主要的損害，是落在衝鋒的陣地。但這並非是說沒有發生激烈戰鬥的陣地，便不起什麼作用。問題是在攻擊一方陣地是開始了地方性的突破動作，但也威逼他參加我們所說的全線戰線上整個的鬥爭。那時，這種計劃的龐大驚人性便很顯然了。全體都這樣或那樣參加這種鬥爭，並把自己的壓力加在全力賭勝的敵人頭上。鄰近的陣地鞏固突破點的側翼，奪取敵人侵入他後方的企圖，按照最高統帥部的命令把自己的兵力調到突破縱深方面所構築的陣線，組織反攻等等。其它戰場則藉制敵人嚴陣以待，殲滅他並在自己的戰場上

也組織反撲。在一九一六年聯軍在索姆河的攻擊，迫使德軍停止了向凡爾登的衝鋒。必須注意，敵人可能在其它的一個陣線帶來新的打擊。

★ ★

現在我們就可對現代戰線的本質及意義得出一個最完備的結論了。在戰爭延遲的條件下，必然要建立一道交織着軍事行動之一切戰場的綿長的戰線。它底線形由雙方動作所確定的界限來規定。戰線可充防界之用，軍隊可依恃它對敵掩護道路。陣線衝破後而不能重新建立，是意味着敵軍兵力的侵入廣大的後方並使防禦一方走向覆滅的結果。沒有封鎖敵人通到後方的一條連續不斷的陣線，現在是不可能作戰的。

在進行作戰時必須陣線的突破。動作可能是地方的意義，然這種場合，陣線也可立刻在新的地界上建立了起來。抱着決定性的目標的攻擊要求廣大陣線的突破，因爲這與突破才足以展開若干接續着的動作且目的在破壞整個陣線的一種決定勝負的戰鬥。備出作戰廣大區域的戰鬥行動具有機動的性質。會戰如綿綿不絕，雙方都要日益調出一切新的後備兵參加會戰。如防禦一方能將突破限於一個地域，會戰即可轉變爲消耗戰，這種消耗戰祇是當後備軍枯竭或會戰移至其它已開始了新的進攻及反攻的戰地時才能停止。在突破廣大的條件下，動作發展到縱深與兩翼陣地的附近。守軍的任務，在於保存陣線的連續性，要達到這個目的，則須固守側翼，組織反撲，而在突破的縱深，則建立新的防線。

具有決定性質的會戰，不可停止。在這種會戰中，問題是決定整個戰線的命運，即是說全國及全體人民的命運。現代的攻擊利器給突破的發展及陣線的擊潰一個可能性。然而這却需要若干次的戰鬥，龐大的兵力及物質，迅速的及毀滅性的戰鬥。防禦者的處境比較有利，因爲戰線不會對他有利的一個結實的屏障。坦克與空軍不僅對攻擊一方有用，而且可服務於防禦一方。甚至深而且廣的突破也有法可消滅。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却要求全國三軍和全國人民的犧牲努力，迅速而堅決的作戰，沉着，組織及紀律。

(原文載俄文「軍事思想」一九四二年第八期)



試評「印度之佛教」

陳家康

印順著 正聞學社出版

中國的佛學，自魏晉以來，日益發達，極盛於隋唐，而沈寂於五代兩宋。以故明清兩代學術史，幾乎沒有佛學的地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突然開放。於是又有人出來研究這種佛學說。或成政變諸子，如譚嗣同，梁啟超，對於佛學皆有獨到的見解。章太炎專治法相，並以法相思想往釋莊子的齊物論。但太炎不但認為有情世間由阿賴耶識所成，即器世間，亦無非阿賴耶之所表現。結果法相和宗的主觀唯心論，就變成了太炎的客觀唯心論。同時太炎又不滿於涅槃寂滅之說，最後仍皈依於莊周的自然主義。（按莊周的中心思想是自然主義，不是自然主義。不是自向柔弱象之後，都以自然主義為莊，故太炎從之。）是見大乘（菩薩乘）思想，已有不得不變的趨勢。幸而自來三十二年間敢於對大乘思想提出懷疑，加以抨擊的人，幾乎沒有。想不到在我們懷疑之際，還出版印順法師所著「印度之佛教」一書，使人們看到一點新鮮的見解。印順法師雖然不敢懷疑大乘，抨擊大乘。但是，在他所著的這本書中，可以看出，大乘的地位在目前中國佛學思想中，不能不開始動搖。

印順法師把印度佛教，分成五期：第一期為「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第二期為「傾向菩薩之解脫分派」。第三期為「菩薩為本之大小綜合」。第四期為「傾向如來之菩薩分派」。第五期為「如來為本之佛乘一體」。印順法師自己則認為第三期最好，因而主張以菩薩為本之大小綜合。這一點從古來對佛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太虛謂：「於佛世以來之教史，似因莊嚴『獨尊體』之主見，將大乘時代，疑成支離破碎，殊應矯正。（見印度之佛教一書附錄太虛所著印度之佛教）。印順法師的答辯說：「拙稿於大乘

中見龍樹有特勝者，非空也。言其行，則龍樹雖創權圖而事未果，其志可歸。言其學，三乘共證性空，與本教之「解脫同歸」合。惟初原際開行果，此重菩薩為異耳。無自性之緣起，其意相，十九為阿含之舊。於學派則取捨三門，批判而後實術之，非偏執亦非視為雜質也」。（見印度之佛教附錄印順著答辯印度之佛教）。據此印順法師仍以屬於大乘的性空唯名論為其立說之根據。在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所謂空有之爭。

不過，印順法師對於虛妄唯識論和其唯心論的批評，異常精確。他說：「真常唯心論之興，與彼多顯之梵文文學之復興有關。實言之，梵我論本立於與無明（幻力）二者，視為無始之存在。種種破梵我之虛性，取緣生之無明業感說。自緣生無常而達性空無我，雖欲入涅槃，即為生不生之無明說，所謂「滅者即是不可量，破壞因緣及名相」也。如以此寂滅不生為真常妙樂之存在，便與無明業感說合，則與梵我論之區別，亦有所難矣」。（見印度之佛教第十五章）。印順法師痛心疾首於此種之綜合。殊不知佛梵綜合之由來，決非一朝一夕之故。自馬勝之世已啓佛梵綜合之端。印順法師力辨大乘起信論非馬鳴所作，我完全贊同。但是說大乘起信論與馬鳴有思想上的淵源，恐亦無人反對。按照印順法師所說，真常唯心論之興，與彼多王朝梵文文學之興有關。其實，整個大乘佛教之興，都與梵文文學有關。印順法師自己說：「西北印，婆羅門文化發祥之地也；佛教傳布於此者，多以梵文寫經，亦事理之當然者。迦膩色伽王時，北印流行之大乘經，說一切有部之經論，即以梵文寫之。馬鳴之詩篇及三寶無常經，即梵文文學之傑作。笈多王朝，與梵文學階興，史家稱之為古典時代，或印度之文藝復興。如彼剎利

陀沙之史詩，戲劇雖千載以下，讀之猶令人嚮往。雕刻，建築，亦多崇高，圓熟之作。以梵文之興，梵理論之神學，數論，勝論，正理，講那諸學派，亦日見隆盛。佛教於此時，如唯心論之確立，因明之大成，則亦特較異彩者也。（見印度之佛教史三卷）是見梵文文學之復興與佛教之由繁而乘而變為菩薩乘，確有互相為用之關係。梵文文學的復興，當為佛教之發展，打開了方便之門。

印順法師對於佛道綜合，深為痛惡。但龍樹的性空，同樣是佛道綜合的產物。所謂空為不二義者，不過還有人怪他梵化得不徹底而已。印順法師已經感覺到龍樹也有佛道綜合之嫌，所以他就龍樹辯護一下。他說：「中興佛教之緣起性空（即緣起無我之深化），雖已覺梵化之漸，而意象多允當。（見印度之佛教史序）他又說：『就中龍樹菩薩，以一南方學者而深入北方佛教之堂奧，闡一切法性空而三世幻有之大乘，尤為不祧之宗。以融攝世俗，大乘經中已不無神祕，空符，表符，它力思想之潛萌，唯諸菩薩乃開為洗刷也。』（見印度之佛教史第一章）。其實龍樹本人何嘗洗刷過梵化，不過印順法師以為龍樹洗刷而已。

再者，摩竭陀帝孔雀王朝的繁榮，與佛教的隆盛，互相輝映，這是目前中國佛徒手裏所執持的論調。但孔雀王朝（即摩竭陀）之繁榮大變（即繁榮），又是目前中國佛徒所執持的論調。但是，在孔雀王朝時代，並沒有龍樹，龍樹，彌勒，維摩，世親諸位大師所謂大乘的理論體系。第二次結集之後，雖有上座大乘兩派之分，但其關係，皆出於香摩祿之聲聞弟子。上座與大眾，雖有意見不同，然不得以大乘與小乘而論。就歷史而言，孔雀王朝的繁榮，與大乘佛教，並無關係。目前中國佛徒主張者一方面拿孔雀王朝的繁榮來證明佛教的光輝，另一方面又搬出孔雀王朝繁榮時代的聲聞，反而採取孔雀王朝衰落以後的菩薩。這真有點不能自圓其說。

（就印度歷史而言，小乘佛教之改變而為大乘佛教與婆羅門之復興而為印度教約略同時，即同時開始於笈多王朝建立之前，又同時發展於笈多王朝建立之後。大乘佛教與印度教，又都是佛道綜合的產物。不過，大乘佛教係以佛為主而梵化，印度教則以婆羅門（梵）為主而佛化。我以為笈多王朝是印度封建社會之正式的開始。（按旃陀羅笈多即位於公元三二〇年，旃陀羅笈多一世，是笈多王朝）。笈多王朝之前的印度社會，仍然是奴隸社會。印度古代的摩竭陀帝國是一個大奴隸帝國。這個奴隸大帝國最隆盛的時代也

就是佛教最隆盛的時代。摩竭陀帝國的最後一個王朝是甘華王朝。甘華王朝第四世代的蘇薩曼王於公元前二十七年起至公元前二十七年起至公元後三百年止，這三百四十七年間，形成了安祿羅國與大月氏國對峙的形勢。同時，印度的奴隸社會在這三百四十七年間，也就日趨崩潰，而讓位於印度封建社會。大月氏的故鄉本在中國甘肅。西漢時，大月氏被逼於匈奴西徙，逾帕米爾而破希臘人所建之大夏國。公元後五十年左右，大月氏貴霜部征服印度河上游之犍陀羅。於是建設大月氏國。大月氏國第三代之王迦濕波伽。對佛教加以護持。於是大乘佛教也就在迦濕波伽王的護持之下，日益發展。不過，在大月氏時代，大乘佛教仍未佔得絕對優勢。所以印順法師認為這

個時代是「菩薩為本之大小綜合」。我認為大乘佛教所代表的是封建地主的舊思想，與摩竭陀帝國時代代表自由民（自由民當中，當然也有奴隸主）的佛教有本質的不同。中國的佛教，不是從摩竭陀帝國輸入，却是由大月氏國輸入的。而且一開始就輸入大乘佛教。中國譯經之最早者莫過於四十二章經。梁啟超認為此經必係「在大乘經典輸入以後，而其人頗通大乘教理者」所譯。但不承認這是漢譯。胡適於四十二章經考一文（文見胡適論學近時論一集），根據藏書上卷，牟子理惑論，後漢書等書斷定在今本四十二章經之前，另有一種更早更古的譯本。陳援庵亦有相同的意見。胡陳之說最確，就是證明被一般人認為最早最古的一本佛經的譯本，就是大乘教義。此後中國譯經多以梵文的大乘經典為主。所謂小乘在中國不過是大乘的附庸而已。這在擁護大乘的人看來，的確是一件足以自豪的事情。但是，在我看來，中國的歷代佛學大師們僅僅懂得所謂大月氏時代，笈多王朝時代，以及笈多王朝以後的佛教。他們對於摩竭陀時代的佛教，不更茫然無知。這也難怪，因為等到中國輸入佛教時，摩竭陀帝國早已滅去了。

大乘佛教與中國魏晉南北朝的文化，是完全結合在一起的。這種文化，在當時的確是一種進步，至少比東漢的陰陽五行，機祥讖緯之說，要進一大步。但在今天看來，所謂大乘文化與魏晉文化，都不過我們所需要的文化。因為這兩種文化，一就印度而言，一就中國而言，都是中古世紀的封建文化。文藝復興是復古代自由民的文化，不是復中古封建地主的文化。所以我對這兩種文化，無不加以批評，加以抨擊，而且絕對不與這種文化妥協。

摩竭陀帝國時代的佛教與大月氏時代以後的佛教不同，與笈多王朝以後

的佛教更不同。在摩揭陀帝國時代的佛教中，喬答摩本人的學說與婆羅門子弟的學說也要嚴格加以區別。中國的孔墨不自著書，喬答摩也不著書。喬答摩學說之流傳於後世者，完全依靠婆羅門子弟的記錄。這種記錄有梵文的，有巴利文的。兩種記錄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對於研究佛教的人，不可偏廢，也不可偏重。不過巴利文的記錄出現在前，用史料學的眼光看，這種記錄的價值，比起梵文來，殆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這兩種記錄，都被認為經典，視為教條，沒有人用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考據一番。究竟那些是真史料，那些是假史料，直到今天還弄不清楚。中國學者自昔即困於大乘教理，梵文經典的小圈子之內，要想真正了解佛說之發展，可謂難乎其難。

我反對大乘佛教，同時也反對小乘佛教，這兩種佛教與喬答摩本人的學說都不完全相同，甚至有相反之處。喬答摩本人以及許俊秀及門弟子的學說，在當時（不是指現在）乃是革命的。印順法師說：「所弘之正法，以『緣起無我』為本；即世間為相依相資之存在，無神我為世界之主宰；亦無神我為個人之歸宿也。以世間為無我之緣起，故於現實人生之佛教，反侵略而頌無神；闢四姓階級而道平等。於未來生天之佛教，崇善行以代祭祀禮懺，尊自勵行力以斥神力，咒力。於究竟無脫之佛教，以不苦不樂為中道行，以不輪迴者之狂禪為是，而以戒為足，以慧為目。釋尊之教化，雖以適應時代思潮，特重於出家之聲聞，然釋尊本身，則表現悲智之大乘，中和雄健，與弟子同得真解脫，而佛獨稱『十力大無』也。佛於吠陀之學流中，可謂月朗秋空，繁星失照矣。」（見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順法師於此處雖仍不免於大乘的偏見，然其對於喬答摩本人學說之重視與理解，究有獨到之見。如果他敢放棄龍樹性空的立場，對於喬答摩本人與其及門弟子的學說，加以客觀研究，其遺詣必遠在今日之上。

不過印順法師謂喬答摩為吠陀，此延舊說，實不精確。所謂吠陀應以梨俱吠陀為主，或以沙磨吠陀，夜柔吠陀附之而為一組，成三吠陀，稱吠陀時代。至於第四吠陀，即阿闍婆吠陀，已有婆羅門之傾向，此係後期產物。如以阿闍婆吠陀屬之吠陀時代，亦無不可，但須知吠陀時代究以梨俱吠陀為主，而不以其他三吠陀為主。以梨俱吠陀為主之吠陀時代表現，仍係亞利安在五河流域（印度西北部）所建立之父子氏族社會（即野蠻上期）。吠陀係以生主為其最高思想。梵（*Brahman*）的思想猶未佔優勢，我（*Atman*）的思想，更未產生。吠陀時代結束以後，纔是婆羅門時代。婆羅門時代，亞利

安族已由印度河流域發展到恆河流域。此時印度已建立了正式的奴隸社會，四姓之說發生。因而婆羅門時代，非常明顯的，乃是奴隸社會的開始。在印度奴隸社會的初期，氏族社會雖然讓位於奴隸社會，但氏族的殘餘，仍然存在。而且，舊的氏族機關就改編而為奴隸社會初期的氏族統治。婆羅門制度是以氏族統治為基礎的。婆羅門的經典是梵書。婆羅門的思想，開始是梵，其次是我。到了與義書時代便成為梵我一體的梵我論，並認為梵我至樂。喬答摩的思想主要是反對婆羅門的思想，不是吠陀的思想。反對婆羅門的思想，並不始於喬答摩。最古巴利佛典中有所謂跋耆六師，已開反對婆羅門之先河。至於瑪哈維羅所建立之耆加教派，對於婆羅門主義之攻擊，尤為激烈，對於喬答摩之影響，更至深且鉅。瑪哈維羅本人不是婆羅門族而是刹帝利族，喬答摩同族不是婆羅門族而是刹帝利族，出身相同。耆那派是以苦行主義者稱的由苦行而得解脫。喬答摩初出家時，亦修苦行。然後才反對苦行而提出自己的見解。馬哈維羅與喬答摩同時。這兩派在思想上確有淵源。懂得這兩派思想的淵源，然後懂得佛教的興起，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

為甚麼在耆那教與佛教興起的時代，出家的人有那樣多呢？這是社會的產物。因為當時婆羅門用血緣的家族制度束縛了自由思想的發展。青年人要想發展自由思想，只有首先對血緣的家族加以反抗，成為血緣家族制度的叛徒。於是就採取出家的辦法。出家的人一多，就組織出家人的團體，叫做僧團。當時在僧團中，有自由，有民主，有會議，有辯論，這是婆羅門血緣家族中所絕對看不見的東西。出家在當時印度社會中，是一種革命的行動，反叛的行動。然而社會一變，出家便成為毫無意義的事情。喬答摩出家之後，不久就組織了僧團，向婆羅門宣戰，提出「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皆苦」的三個基本命題。諸行無常就是反對婆羅門以為梵為真常。諸法無我就是反對婆羅門所謂不變之我。一切皆苦就是反對婆羅門的梵我至樂。不過我覺得諸行無常與諸法無我兩個命題必然是喬答摩的命題。至於一切皆苦是否為喬答摩的最後命題，似有疑問。因為一切皆苦，就是凡生即苦，無生不苦的意思。這是耆那教派的一個極端命題。喬答摩反對苦行，似不應有此一切皆苦的命題。喬答摩的命題應當是生為苦，另一方面又主張有生為樂。所謂人身難得，就是這個意義。如果喬答摩肯定凡生皆苦，而作出一切皆苦的命題，這與耆那派有甚麼不同，而且也不能稱為當時的「中道」。所以我懷疑在聲聞佛教中，業已離入耆那派的思想。不過，現在的佛學家一致承

認為一切皆苦這個命題，印順法師所提倡的性空，也是以凡生皆苦為立論根據。在這種我雖然不能替喬答摩把「凡生皆苦」的命題改為「有生為苦」，同時「有生為樂」的命題。但是我的懷疑也許還有幾分合乎所謂究竟義。

再根據四聖諦來說，第一為苦諦，即承認有苦的存在，第二為集諦，用以說苦的根源，第三是滅諦，提出消滅苦集根源的問題，第四是道諦，就是用以消滅苦集的方法。所謂道諦者，就是八正道。第一為正見，巴利文為 *Samma Ditthi*，英譯為 *Right view*。第二為正思，巴利文為 *Samma Sakhappo*，英譯為 *Right Aspiration*。第三為正語，巴利文為 *Samma Vaca*，英譯為 *Right speech*。第四為正業，巴利文為 *Samma Kammatto*，英譯為 *Right action*。第五為正命，巴利文為 *Samma Ajivo*，英譯為 *Right livelihood*。第六為正精進，巴利文為 *Samma Vayamo*，英譯為 *Right effort*。第七為正念，巴利文為 *Samma Sati*，英譯為 *Right Mindfulness*。第八為正定，巴利文為 *Samma Samadhi*，英譯為 *Right concentration*。根據這八正道看來，喬答摩只是以道來滅苦。因而離苦得樂。既非苦樂空，更非一切滅絕。以滅為究竟義的思想是著那派的思想，與喬答摩的思想無關。印順法師只知道大乘佛教有佛性綜合的毛病。殊不知佛性早有與苦那派思想綜合的毛病。大乘佛教中，不斷說空，不斷說有。空非滅，有亦非滅。是見大乘在基本上並不以滅為究竟義。但大乘各派，一方面既不能嚴格劃分苦那派與喬答摩學說的不同之處另一方面又墮入梵我論的泥坑。大乘學理之終無成就，亦何足怪。

喬答摩之事業，以反對婆羅門開始，也就是以反對氏族的殘餘，氏族的統治開始。喬答摩的種姓平等論，是以自由民的立場出發的。這個種姓平等論的作用，是為刹帝利 (*Kshatriya*) 和吠舍 (*Vaisya*) 兩族爭取社會地位。當時印度社會細別之雖有四種姓，大別之只有奴隸主與奴隸兩個階級。婆羅門，刹帝利，吠舍，皆係亞利安人，其中包含自由民，總稱之曰奴隸主階級，因為自由民也有蓄奴隸的權利。首陀羅族 (*Udras*) 完全充奴隸。喬答摩的種姓平等論，一方面用以削弱婆羅門的特權，一方面又用以刺激首陀羅族的反抗。所以我說他站在刹帝利與吠舍的立場，即自由民及沒有特權之奴隸主的立場，來反對氏族的統治。就其對氏族統治的反抗而言，以及爭取刹帝利與吠舍兩族所應有的自由與民主而言，喬答摩的學說足進步的，革命的。喬答摩的學說，推動印度的奴隸社會走上了一個新階段。同時幫助了摩訶陀這像奴隸階級的發展。然而當摩訶陀帝國發展起來之後，佛教也就很快的

轉變而為自己的對立物。大概在第二次結集之後，佛教就不再有進步的革命的作用，便轉變而為落後的反革命的作用。於是喬答摩與其及門的學說，不所建立的學說，也就永遠失掉了光輝。這種悲慘的歷史發展，不僅喬答摩的學說受到，耶穌的學說也遭到，孔子的學說同樣遭到。印順法師說：「敵者之摧殘不足為佛教害，受吠陀文化之薰染，即佛教致命傷也。佛說王面佛時，宣佈其反佛教之決心，燃燈種種方法，皆以不能損正法之三藏。魔末謂，吾將衣汝衣，食汝食，入佛教而行我佛法，佛為之懼然而驚。受其佛教精神之薰染，外若佛教而實非法非律，「獅子身中虫，自食獅子肉」，雖以獅子之雄猛，亦且無如之何。」（見印度之佛教第十八章）。這種魔王的例子太多了，豈止喬答摩所遇見的魔王而已。

簡 覆

求真先生：

因為來信沒有通信地址，只能在這裡作簡略的答覆。

我們很同情你的遭遇，也很贊成你這種探索，苦思不屈的追索的精神。正如你所知道的，你今天要到你所希望去的地方，是、橫互着層層的障礙，無數險峻崎嶇的青年朋友，因為這樣不能不在陰暗的日子裡，讓時時照耀他們寶貴的青春的時日。而且陰暗中不更需一灼灼火，一分溫暖來照耀和溫暖無數的夜行者嗎。到天堂的路正當從人間開始鋪築的。

提示的意見，今後我們當設法作得更多些。祝

進步

——編者

科費與缺文

莫斯科會議的成果

——「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社論

莫斯科會議，是愛好自由的人民反對希特勒聯盟中三個領導國家的權威代表齊集一堂的第一次的會議。這個會議舉行的時候，正當紅軍的輝煌勝利和英美軍隊的順利作戰，造成了同盟國聯合的力量最迅速地打敗共同敵人的可能。毫無疑義，莫斯科會議對於反對希特勒德國及其附庸的鬥爭，對於爭取戰後的長久而堅實的和平，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莫斯科會議的積極的成果，意義更大，因為它在會議前面的任務，是並不簡單和容易的。戰爭在目前階段，要求在繼續進行戰爭方面，在建立德國的戰後秩序，以保護愛好自由的人民，使不致受侵略的威脅方面，都有清楚明白的決定。大家都知道，在達到決定的道路上，會有不少的困難。

對抗希特勒的鋼鐵任務，莫斯科會議推翻了敵人及其同謀的計劃。自然而然地，會議首先就推翻了意力集中到對德進行戰爭的迫切問題以及戰後時期的比較急迫的問題上。蘇聯領袖以人所共知的勇氣所提出來的縮短戰爭的問題，由於莫斯科會議工作的結果，已經得到了同盟國政府方面的正式承認。可以預料，會議公報中所說「關於明確的軍事行動，已經作了決定，並已從事準備」一節，將推翻希特勒最後的拖長戰爭的策路。現在的問題是實際執行公報為最重要最迫切的步驟的問題。

現在是實現決議的問題，這些決議的重要性，正是由這些決議實行的極度和速度來決定的。極端重要的，是盟國過去和現在都來而如現在莫斯科會議中確定了的義務應及時履行。這方面很重要的，是若干國家的地位問題，這些國家例如土耳其，直到最近為止，還採取中立政策。這些中立國家轉而採取直接支持反希特勒聯盟，參加一切愛好自由的人民反對已經倒了的敵人法西斯主義的鬥爭，這對於解決縮短戰爭的任務，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四國對於一般安全問題的宣言，代表在戰時發表的若干類似的國際文件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和那些文件是有分別的，因為由世界上四大強國所代表的國際領導中心這一概念，這是第一次的具體表現，為了愛好自由的國家戰敗共同的敵人，為了整個國際局勢今後的健康，特別是為了使一切愛好和平的大小國家在各國自己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利益之上團結起來，四國宣言是很重要的。

必須特別注意：決議中要求在戰後成立一個國際組織，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不論大小，都可以參加這國際組織為會員。無疑地，這個組織必須從戰前數十年歷史中獲取教訓，當年由於過大的愛好和平的強國之間政策上缺乏協調，國際聯盟並沒有能夠完成作為和平安全的工具任務，這恰恰是法西侵略打開了大門。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的歷史經驗，證明了要保證歐洲的永久和平是多麼困難的事情。另一方面，目前戰爭的經驗和反希特勒聯盟的形成，表示偉大的民主國家英美蘇之間是廣泛合作，是有基礎的。過去有些消極的說法，說是美國不應參加歐洲事務之類，已經成為已往的陳跡了。三個同盟強國的共同決議，表示這三國充分了解整個歷史過程恰恰放在這三國肩上的建立國際組織的責任。

宣言中公佈將來參加國際組織的一切愛好自由的國家的最大的平等原則，這粉碎了某些人用惡劣的企圖，這些人在小國家和中等國家之中散佈不信任愛好自由的大國家空氣，這些人的企圖是希特勒匪徒及其應聲虫所策劃出來的。在這方面，波蘭流亡者的反動人士表現了特別的熱心，他們愈來愈明白地顯得自陷於人民。打算創立中東歐各國聯邦，制定各種種族種造的計劃，其來源正就是這些人士。這些計劃預定以若干流亡政府先成立若干其他的永久性的國家集團，而這些流亡政府中，大多數是和人民缺乏堅固的聯系的。不道如此，這些計劃打算把受到希特勒匪幫蹂躪的國家和幫助希特勒搶劫的國家統一在一個聯邦之中。同樣明顯地，這就是提議把針對着蘇聯的陰險的「隔離帶」以聯邦政策的形式復活起來。至於蘇聯和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國際有了明確的進步。最近數月來，蘇

聯和捷克準備簽訂以波蘇為定為範本的互助條約。簽訂這個條約的道路上的障礙，現在已經消失了，在最近的將來，捷克總統貝奈斯為了和蘇聯簽訂條約，就要到莫斯科來。

在關於意大利的宣言中，盟國確定了殺成恢復意大利的民主的立場，毫無保留地堅守着的立場，因此現在特別受到蘇聯與英美的歡迎。莫斯科以英美蘇三國的名義，宣佈了在意大利恢復民主的原則，這一決定大有助於復活意大利人民的政治生活。這原則決定三國對其他類似的事件的一般路線。

關於奧地利的宣言，是對希特勒德國的一個打擊，而且顯示了同盟國要取消希特勒變態的一切後果的決心。

莫斯科會議的成功，增加了敵人陣營里的混亂和混亂。他們現在大嚷說，盟國在莫斯科差不多把整個歐洲都讓給共產黨人了。這個聲明不啻是混賬——都是陳腐老調，不能用來掩蓋撒謊的事實，面對着事實，這些狡辯如希特勒的宣傳也無法可施的。

莫斯科會議閉會的時候，正當蘇聯與國家二十六年紀念前夕。儘管這個巧合是偶然的，却有十分深長的意義。自從蘇維埃國家誕生以來，國際上一切掠奪的和侵略的力量以及在命定後來變成侵略者的對象的國家內的幫兇們，實施了設法使蘇維埃在國際上孤立的政策。法西斯獨裁強盜和各式各樣的「綏靖份子」幫助這些匪幫，打算不使蘇聯蘇聯，而且把孤立的「罪名」移到蘇聯的肩頭上。今天在最近幾年時局的照耀中，大家都清楚了，使蘇聯不參加解決國際政策上最嚴重的諸問題全圖，僅不過有利於仇視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最基本的利益的人們而已。

自從立國以來，偉大的蘇維埃國家就成為各民族之間的堅強的和平支柱。在希特勒進攻以後，蘇聯變成鋼鐵的牆，希特勒帝國主義元鷹撞上去，已經撞破了牙齒。我國不僅經受了世界上別的國家吃不住的大難。我國曾給予敵人以這樣重大的打擊，這打擊已經顛覆了希特勒為獨霸全世界所製造起來的戰爭機構，使同盟國聯合的兵力在短期內打敗敵人有充分的可能。

莫斯科會議是領導反希特勒聯盟的三大強國事前一切合作的發展的自然結果，同時，揭開了三大強國之間的關係的新階段。現在，決要到来的勝利現出了清楚的輪廓，在解決歐洲戰爭的最重要的諸問題上，尤其是締結戰爭的問題上保證有協調的政策，而且為準備經久的和平和一般的安全而制定明確的指導性後政策的原則，主要同盟國家在這兩方面所作的努力，具有特殊的意義。忽視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產生出來的困難，這是錯誤的。但是這些困難是能夠克服的，而克服困難的保證，就是世界上三個領導強國的代表在莫斯科會議中的工作的成功。

代郵

被芷先生：請即賜告通訊處。

英文書刊

蘇聯的蘇聯	1942 (斯大林)	5.00	A.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12.00
蘇聯的蘇聯	(加里寧)	1.00	比死還強	12.00
蘇聯的蘇聯		10.00	戰爭的故事	12.00
蘇聯的蘇聯		20.00	二十五年來的蘇維埃政權	6.00
蘇聯的蘇聯		30.00	丹靈	8.00
蘇聯的蘇聯		32.00	莫斯科	4.00
蘇聯的蘇聯		26.00	斯大林格勒的反攻	3.00
蘇聯的蘇聯		26.00	曼納林德負之責	6.00
蘇聯的蘇聯		8.00	集中營的故事	4.00
蘇聯的蘇聯		8.00	強健的心	12.00
蘇聯的蘇聯		8.00	希特勒的所謂新秩序	2.00
蘇聯的蘇聯		10.00	國際文學 1942.10.12	20.00
蘇聯的蘇聯		10.00	國際文學 1943.1.3.4	25.00

莫斯科版

戰爭與工人階級	1943.4.5俄文	8.00	告世界青年 (俄文)	5.00
國際文學	1943.1.4.5法文	25.00	前線日記 (俄文)	30.00
虹 (俄文已有中譯本)		40.00	瑪麗蓮科小說集 (俄文)	55.00
音樂家 (俄文)		35.00	動物學 (俄文)	42.00
俄羅斯人物 (俄文劇本)		20.00	德俄軍事字典	350.00
蘇聯的海島 (俄文)		150.00	英俄軍事字典	450.00

最近三月來的國際形勢，變化得最迅速，也最複雜，許多重大的事件，都難免有這一些重大事件，例如魁北克會議，深開成，這些重大事件，有沒有一個法則，是每一個關心時事的人，所急於知道的。于懷先生的這一本，可以為你解答這些問題。

強還人比勢形

元十二册每，者懷于北克會議，深開成，這些重大事件，有沒有一個法則，是每一個關心時事的人，所急於知道的。于懷先生的這一本，可以為你解答這些問題。

蘇聯西部邊疆形勢圖

關心時事者不可不備 · 每幅五元

新華副刊

十五元
九月已出

- 郵購簡章
- (一) 購書人姓名、地址、書刊名稱、冊數務請詳細寫明，書款必須先行付足，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以一元以上者為限（印花或貼省用郵票不收）。
 - (二) 寄書郵費，讀者自負，包郵費用，優待免收。
 - (三) 書價時有更動，郵購以信到時門售價格為準。
 - (四) 書刊寄出，中途如有耽擱遺失，掛號快遞者均可代向郵局查詢。
 - (五) 附有款項之信件請用掛號寄下，切勿附寄錢鈔，否則若有意外，恕不負責。

新華日報圖書部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關於中國少共解散的原因

——覆一個青年的信

劉光

總明君：來信問及中國少共的轉變原因，你知道少共是為什麼緣故被解散的，以及現在是否還有類似性質的團體存在。你急於想求得答案的這個問題，別的許多朋友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寫過信或者口頭的提出過詢問。現在趁你再次來信的機會，作一次概略的公開答覆吧。

這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正式宣佈解散了。自從少共解散以來，並沒有重新組織過與少共性質相同的團體。至於抗戰後，在華北敵後新組成的抗日青年組織，這無論就其性質，任務，組織的精神來說，比起少共來，都是有原則的區別的。

一種團體的產生或者是解散，這並不是由什麼人下個命令就可以辦得到的事體，同時也不能夠說，一種團體的被解散，就證明這個團體過去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或者以為一種團體一旦被解散，人們所懷抱的高尚理想和倫理觀念，及其為事業而奮鬥着的一切進取也都得歸於滅絕。這種想法是不妥當的。其實，一種團體的產生，發展，或者是被解散，這是由歷史的特定條件和任務來決定的。一切的事物都在發展着和變動的，而一種鬥爭的組織形式，也不能是例外，它必定得隨着歷史條件的變遷，而變換着自已的形式。當着客觀的歷史條件已經具備，要求和提供着一種新的組織形式的時候，人們必定會自然而然的拿起來當作自己的鬥爭武器。同樣，當着一種舊的組織形式，變成了推進運動的障礙，已經不能適用客觀形勢發展的要求時，仍然要死守成規的不去改變舊的組織形式，這才是不可饒恕的主觀主義者。所以我們必需用歷史的客觀的眼光來觀察和處理問題，決不能單憑主觀的願望來觀察和解釋問題。這一個觀察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是我門首先要弄清楚的，否則對於中國少共的轉變問題，以及為什麼沒有重新組織同類性質的團體的問題，就不可能求得正確的答案。

當我們講到中國少共的產生時，就不能不講到它的前身——社青。跟着

中國人民和青年真正覺醒的開始——「五四」運動，便出生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社青的成立，可以說是我們青年形成自己獨立的，政治的，羣衆的組織的第一次。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上海就有幾位青年社會主義的青年，如憚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發起組織社青，接着在其他地方也先後出現了類似的青年團體，同時在法國的勤工同學如蔡和森等同志也組織了同類性質的團體。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在上海召集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自已的綱領。

它的出現，是歐戰後中國無產階級日益壯大和迅速走上政治舞台的時候，同樣也是中國青年工人和勞動青年在生產部門中作用日益重要，其生活痛苦更加難堪，而積極要求鬥爭和團結的時候。它的出現，也正是偉大的一五「四」運動之後，日寇滅亡中國之二十一條條的進攻，巴黎和會上反動政府的妥協行為把全國廣大青年——特別是知識青年推向空前覺醒和團結，全國學生開始有了「一致的聯繫，各地都產生了學生聯合會」（憚代英）的時候，它的出現，正是蘇聯偉大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即國際青年運動走向歷史上劃時代的轉變時期。

它的成長壯大，是與各種反動的思想進行殘酷鬥爭的結果。當時它被黑暗勢力視為「洪水猛獸」，青年若嚮往於新思潮，就被譏罵成「過激派」；封建軍閥對於革命青年採用極端的仇視和野蠻的壓制，他們以「逆來順受」的精神奴化青年，他們企圖用「禍福由天」，「上帝定命」的宗教來征服和消滅青年的革命精神，當時又有一批無聊的政客極力攻擊新思潮，攻擊蘇俄，污蔑孫中山先生的偉大革命人格，他們高唱所謂「尊經衛道」，「保存國粹」，和「東方文明」，以此來反對新興的青年運動，同時還有一些人在青年中間散佈獨善其身的消極思想，有些人自作聰明的提倡所謂「好人政府」，他們認為不經過羣衆的革命鬥爭，只依據上層的交涉和改良，就能實現完美的理想，諸如此類的荒謬思想和觀點，都是為了阻止中國青年的進步。中國的革命青年為了消滅這些烏煙瘴氣的毒質，曾經進行過無情的鬥爭。在它形成的初期，雖然人數還不多，可是確實是團聚了一部份優秀組

青年，正因為它是青年工人，農民，革命青年知識份子的團體，所以，也就以擁護青年切身利益為目的的團體。它很好的懂得：要獲得中國青年階級的解放和自由，非得全國民族和全國青年一致團結不能成功，因此它積極地建立和鞏固反帝民族大聯合前鋒隊，它在促進第一次民族大聯合中做過不少的努力。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廣州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正式確立了「社青」為「少共」。這一來，我們的青年運動與世界青年運動的偉大歷史潮流結下了密切的聯繫。當時偉大英同志所主辦的「中國青年」成了全國青年最愛好的讀物。青年對真理的追尋和對革命學說的研究，成爲普遍的熱潮。共產主義青年團在「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中起了不少的作用；滬上南京路沙流血的鬥爭中，北伐戰爭的每一個重要戰役，都有他們的血。大革命中中國青年受得了嚴重的鍛煉。

這以後，它無論在極端艱難的鬥爭中，都善於依據各種不同的鬥爭條件，去鼓舞起廣大青年的勇氣，引導他們向革命的進軍。他們從來沒有在困難的而屈服或解過自己的鬥爭武器。

一九一八年的砲聲開始了空前的民族危機，促進了廣大青年抗日救國的覺醒。這時他們有的英勇參加了北上的鬥爭，有的英勇參加了和援助了上海「一二八」的抗戰，有的在東北三省積極起來組織抗日游擊運動，爲救國他們作過無數壯烈犧牲和光榮的戰鬥。當日寇侵略華北五省自治的時候，他們在北平積極起來引導青年和民衆進行抗日救國的運動；結果發動了偉大的北平學生運動。北平學生這一發動，顯示了中國的真正民意，喚醒了全國民衆青年的覺醒，爲全民族團結的抗戰準備了基礎。

這就是中國少共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二十年來它爲了青年的民族和社會的解放而奮鬥的歷史道路。由此可見，它並不是憑空掉下的東西，是有着他自己產生的特殊的歷史條件的。由此可見，中國少共得產生發展到以來的環境和任務，要求它的解散。

「它過去就沒有存在的價值」，而應當說新的歷史環境和任務，要求它的解散。

時世界法西斯主義的瘋狂戰爭危險，它比任何時候都要緊張，全世界的青年，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痛苦，是極端厭惡戰爭的，他們所要求的是反對掠奪戰爭的青年大團結，他們迫切的要求民衆自由和平而奮鬥。特別是中國，在日本強盜侵略之下，民衆已被逼到了最後的關頭。現在除少數甘心做亡國奴的漢奸之外，極廣大的青年在「團結救國」，「一致抗日」的目之下，已積極的擁護民族救亡的運動，他們要求爲了民衆自由與中華民族的獨立而奮鬥。這一切民衆與青年間的鬥爭，都要求青年組織起這樣任務，就是去團結千百萬青年，開展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在中國就是團結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抗日青年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爲了要完成這

個任務，像少數的狹隘的革命的青年組織，是不能成功的，因爲願參加抗日救國鬥爭的青年，已經不是一部份的問題，換句話說，青年爲民族解放而奮鬥的社會基礎是空前的廣大了。

遠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少共發表了號召全國青年進行大聯合和實行把國本身自己組織轉變的宣言，在宣言上面寫着這樣的寫道：

「中國少共向全國各級學生們向各界青年們呼籲，一切愛國的青年同胞和青年組織大家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

「我們願與同胞們進行親密團結，共同奮鬥！而且願與我們的組織以放起來，歡迎一切贊成抗日救國的青年們加入我們的抗日救國青年團體。換句話說，以前加入我們青年團的人，一定要信仰共產主義的，現在我們改變爲抗日救國的青年團體以後，一切愛國青年，相信共產主義的也好，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也好，只要願意抗日救國的，就可以加入我們的團體了。」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中指出：「由於中國國內形勢的劇烈的變動，最廣大青年羣衆參加到救亡運動與民衆自由的鬥爭中來，在鬥爭中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團及組織形式，並轉變爲廣大青年團的新的青年組織形式，去吸收廣大青年參加抗日救國的民族統一戰線中來。」

這正是中國少共實行解散的歷史的環和根據。

中國少共的解散，這無疑的是：的，這以後在邊區和華北敵後的青年團體，也是根據着抗日，民衆和聯合的原則，來進行團結和教育青年的。他們對於蔣主席在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號召的「實行全國青年第三次大聯合」，是衷心的擁護的。

中國青年在目前的方針，這正像風暴同志在今年黃花崗紀念大會上的演講中所說的：

「目前中國青年唯一的任務，是——勝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別的要麼嗎？我們的回答是：有，敵人的弱點是爲了打勝日本，如生產，學習和工作等等，都是爲了增加打勝日本的力量。如如今，中國青年不把自己的一切工作，活動，集中於打勝日本這一目標，那是與時代的青年，與民族的青年，不相稱的。打勝日本是那樣一容易的事嗎？不是容易的，是種從容不迫的艱巨的工作。要打勝日本，首先就要使我們中國青年內部一切力量的團結。」

同樣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到了今天，青年與全國人民都團結，組織，統一，團結的一天，是日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的一天。青年們都要負起這個責任，每個青年現在必須與過去不同，一定要下一顆決心，一定要把全國青年團結起來，一定要把全國的人民組織起來，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一定要把中國改造成新中國，這正是我們所希望於你們的。」

關於中國少共解散的問題，我們的答案是如此的。假如有人認爲有不妥當的地方，非請你不客氣的來批評，如左列的疑問也可以再提出討論。

(下略)

內政部重慶新登報字號陸伍號
東川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
重慶市陝西街五十四號

本期零售八元

衆 群

卷 22 第

目 要

夫正澤鹽 務任的爭鬥戰反民國本日

操明史 本日來以爭戰日中
動變的構結濟經

夫科儒·蘇 義主國帝本日
爭戰洋平太與

敦 日 向方個幾的寇日攻進

版出日六十月二十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時 論
 嚴懲叛將，粉碎偽軍（七〇二）——保證勝利的會議（七〇）
 二）——中英美開羅會議（七〇二）——太平洋戰爭兩年（七〇三）——產業資金與證券市場（七〇四）

特 載

日本國民反戰鬥爭的任務

鹽澤正夫（七〇五）

專 論

中日戰後以來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動

史明操（七二四）

日本帝國主義與太平洋戰爭

蘇儒科夫（七二三）

進攻日寇的幾個方向

日 敷（七二六）

研 究

呂不韋與秦代政治（下）

郭沫若（七三〇）

關於利用外資（讀報隨感）

卓 芬（七三九）

文獻與資料

意義重大的聚會

消息報（七四一）

目前日本的政局

E·伊 林（七四三）



嚴懲叛將，粉碎偽軍

背叛民族，投降敵人，已經是罪該萬死了。投降敵人，又回過來說中國人，更是罪上加罪，非把他消滅不可！

敵寇以華制華，是向來就執行的毒計。現在他就利用大量的偽軍來和我們作戰。汪逆精衛成立了相當多的偽軍，而最近被我國政府宣佈的汪逆、李長江、侯如鼎、王清翰、蘇景華、李德興等等，就都是投敵之後，高升偽職，聽從敵命，反日咬夜同胞的民族罪人！然而，人民是認識民族公敵的，被敵脅參加偽軍的同胞，是不願意打自己的弟兄的，所以，我們的黨民能够很英勇的打擊偽軍，也能够很快的結束敵役，獲得全勝。這種例子，在華北敵後是更多的，現在只舉出最近的幾例事實。

國府四日免官的王清翰，於本年四月以後，即在偽滿洲國部下充軍軍長。上月中旬，豫北魯西敵寇配合孫長誠所部，進攻我冀魯豫邊境范縣、觀城、濮縣各地。我軍奮勇戰鬥，分頭截擊，經過半個月的激戰，到本月初把敵偽的「掃蕩」粉碎了。我軍乘勝追擊，攻進了孫長誠的總部，結果是把孫長誠，王清翰等全部偽軍都打垮了。消滅了數百名，俘虜了一千六百餘名。

又如，山東有名的巨匪劉桂堂，投降後就任偽軍師長。二十多年來，這個大土匪頭漢奸，曾在華北七省到處騷擾，無惡不作，橫行無忌，他毒害人民達二萬人，強姦婦女達三千人。最近，上月十五日，魯南我軍奮勇截擊，將劉匪部擊潰，向劉匪所駐地魯南西北的桂子嶺攻，一夜的功夫，結果，我軍反「掃蕩」敵大勝，生俘一千六百多人，把一個劉桂堂送上了西天。

為人民除害，為民族除奸！

還有，我軍在山東擊斃着打垮巨匪漢奸劉桂堂之後，又被動攻勢，經過了血戰，又把偽軍孫道仁部的部隊完全消滅，活捉了一個偽旅長，兩個偽團長和偽軍一千二百餘名。

這些最近的事實，說明了敵寇的毒辣，決好的無恥，也說明了敵後我軍的英勇，偽軍士氣的消沉。我們要認識的，就是這些事實都證明了一點，投降的人，一定要受到人民的最後裁罰。誰誰投降敵寇，誰投降敵人，誰就一定歸於毀滅，抗戰到底，人民將永遠消着，永遠進步和勝利！

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敵寇利用偽軍，我們打擊和粉碎偽軍的工作就顯得更重要。偽軍在敵寇的支持下，確是士氣不揚，作戰不力，可是，如果不打不他，他是不會自取滅亡的。我們的敵後部隊，在這方面做了不少事情。他們曾以有力的戰鬥，配合着對偽軍士氣的宣傳，取得了不少效果。然而，全盤說來，這工作做得還不多，這是一定要加緊努力的。一方面，要對全國軍民對叛將及偽軍的消滅。最好能將汪逆精衛所領導的偽軍擊潰，將各官人名，公佈出來，更使他們到敵後投降，毒害人民的罪跡，隨時被發覺，使他們的罪行暴露無遺，而永遠無法洗刷和隱匿。一方面要對偽軍的後方，對偽軍的後方及後方的宣傳，要對偽軍受人民打擊的宣傳，要對偽軍的後方，給予特別打擊，要對偽軍的後方，給予特別打擊，要對偽軍的後方，給予特別打擊。

總之，嚴懲叛將，粉碎偽軍，是建設今天的一項重要任務，不容許有絲毫的忽視和懈怠！

這次會議關於戰爭方面的進展決定，勝利保證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法西斯主義的末日快來臨了。新的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已現出了曙光。

這次會議，也比三國外長會議更進一步，決定要使戰後的和平是一種永久的和平，更且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這種永久和平的原則，就是：要創造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和平，就一定要使這和平能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的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好感，也要使這和平有一切決心消除侵略，以及奴役的壓迫和難堪的奴役的國家，不論大小，都一律有權利參加到民主的世界家庭裡來。這就是說，要建立戰後的永久和平，應以消除侵略、奴役、壓迫和苦難為前提，要以消除國際間的不平等為前提。也就是說，要澈底的消滅法西斯主義，不該他存留絲毫殘渣，要完全的實現國內和國際間的民主，不應有任何保留或例外。這四個協定，使任何持有帝國主義思想和法西斯、半法西斯思想的人們，受到了當頭一棒，使那些幻想在戰後繼續其法西斯和反對民主的頭目份子，聽到自己的喪鐘。這也是一個嚴重的警告。誰還想反對民主，誰就是自取滅亡！

這次會議，的確是決定着人類命運的會議，是保證民主國家勝利和奠定戰後永久和平的基石的會議。我們熱烈的予以歡迎。同時，誠如宣言中所說，所有聯合國家都是負了無上的責任。全中國人民也決不會辭解自己的責任。他將以全心的全力，以鐵身的精神，深漬日寇，並且和一切甘願自絕於大多數的法西斯，半法西斯的反民主的言論行動和人物奮鬥到底。以爭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徹底勝利，而和蘇、美、英等聯合國家，在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裡，過着和平幸福的生活。

(新華) 十二月八日

太平洋戰爭兩年

太平洋戰爭，已經兩年。兩年以前的今天，日寇突襲英美在太平洋和遠東的基地，使這些地方和那裏的人民，受到重大的損失。接着，日寇就繼續利用突襲成功的優勢，向南太平洋各地進軍，獲得了一時的戰果，使這些地方的民族，淪為日寇的奴隸。日寇的暫時成功，是依靠其軍事力量的優勢，尤其是狡猾的突襲。英美當時的挫敗，是歸於他們的軍事力量的劣勢，尤其是軍事上的沒有準備和獨的民欲政策。這種殖民地政策，使千千萬萬能動的活生生的抗敵力量，被束縛着不能動彈！

然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把法西斯侵略者和反法西斯的盟軍，最後的劃分清楚了。英美終於和已經抗戰五年的中國站在一條戰線上。南太平洋各民族，在日寇統治之下，只有更加對日寇憤恨，而成為抗日的龐大的潛藏力量。

在過去兩年的時間內，由於英美軍火生產和軍力的空前增強，由於作戰經驗的積累，由於軍隊戰鬥的英勇，再加上中國戰場上盟國空軍的活躍和我國前線若干地方的戰鬥及敵後的頑苦堅持抗戰，太平洋上的局勢，已經改變了面貌。日寇已經感覺到其局勢的嚴重。他的國內的矛盾日益增長，國內外日本人民反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運動，逐漸發展，尤其是在中國境內的日人，已經從反戰的鬥爭和組織，發展到要求成立日人民解放同盟的階段。這些情形，使日寇在完全孤立，和喪失了戰爭初期突襲的優勢之後，失去了戰爭勝利的信心，而企圖在繼續

進攻，並繼續決戰，更採取其他的方法，來爭取時間，挽救失敗。他企圖推遲失敗的日期和縮小失敗的規模。那就是在軍事上，一般的說不是採取守勢的戰略，而在政治上則採取不斷的攻勢，具體的說，就是挑撥離間同盟國關係，和盟國的內部，首先是中國的內部，並對各被奴役的民族，進行民族政策，造成各民族內部自相殘殺的慘劇。在盟國方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英美在太平洋上，已採取攻勢並已獲得一些勝利。空軍已能在全部太平洋上，從北到南，隨時出擊。海軍空的配合，也有了極大的進步。現在已經在逐島戰爭，越島戰爭，發展到規模稍大的海上運動戰。最近吉爾貝特島的戰爭，就是個最好的例子。至於盟國的團結，更是日趨緊密和鞏固。四國宣言和開羅會議，已打下了盟國在這方面有良好的發展的石。總之，現在的情況是：盟國以及對日寇的攻勢，以團結對日寇的挑戰，以日益強大的力量對日寇日益感憤恨的力量，以勝利的信心，對日寇對失敗的恐懼。

同時，却也不容否認，盟國要達到最後勝利，也還有一段艱苦的鬥爭要走，還有不少險路要填補。換句話說，盟國需要努力的地方還是很多。比如：中、英、美三國在軍事上的攻勢，還應加強。要更主動，更大胆些。軍事進展的不平衡，也要努力加以克服。以盟國之間的問題而論，中國還應該更積極的主動的作戰，來配合英美在太平洋上的攻勢，英美更應該把時時落的救復備句，採取積極，更

產業資金與證券市場

為活動產業的資金，則當局應令中交銀行及
 信託局，將證券市場各團體，等該產業證券推
 進會，並附設證券市場，向中央信託局及中央
 銀行，並發行第一期證券一萬萬元。在生產
 會，產業會應到十餘種的今日，這些措施，是
 引起各方關注的。

後方產業之證券市場，不自今日始。去年
 六月間，四川工廠聯合會曾發行「工業其
 之因難與期」，指出：後方產業，一面資金
 隨生產之區域而轉移，一面資金來源，則
 益陷枯竭。故要求「建立後方產業證券市場，以
 資其發展」。這次證券市場之建設，或許是這一建
 議的實現。

在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證券市場的確可以
 使生產事業吸收其所需要的資金以擴大其生產
 規模，在這裏，優厚的利潤是一個重要的刺激力。
 如果產業利潤不怎麼高，那末，承買股票或公司債
 的人，便不踴躍了，其間，資金之流入產業，亦
 就不多了。當然，在交易所中，除了以投資取得利
 息為目的而購買公司債或股票者之外，還有一些人
 是以「期貨」「套頭」為對象，以投機為目的的。
 他所注意的不是股票或公司債的利潤之大小，而
 是注意證券之高低漲落，從這種高低漲落中，以購
 進及拋出的辦法，求取利益。所以，證券交易所是
 帶着投機的副作用的。

在戰時的中國後方，證券交易所能否為枯渴的
 產業打通資金的道路呢？這個問題，是不能簡單地
 從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平時狀況中求得結論的。中
 國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當前又是
 戰時的經濟。這些特點是不能不考慮的。更具體的
 說，在市場上活躍的商業資本，因為囤積利潤之優
 厚，所以它們都對準這一點追逐。於是，生產事業
 在資金方面，便感到來源枯竭了。最近這一年來，
 生產是不斷地在停滯着。「關門」「出頂」與「縮

小生產規模」的現象，已成爲「司空見慣」的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生產事業的利潤，是不堪設
 想的。二三年前，年終分紅到幾十個月的現象，已
 爲回憶中的美夢了。以對照之，想那些在戰時
 所以囤積利潤，其故是可想而知的。在這些人
 等，在戰時囤積利潤，但囤積是「期貨」交易，
 其資金來源，如果說是在戰時的證券市場，其
 資金來源，則更難。我提議的證券市場，不是一
 種「期貨」市場，而是一種「實業」市場。其
 目的，是使生產事業，不至於因資金枯竭而
 停滯。至於投資信託證券，這一次只
 提「實業」市場，則完全屬於短期行為，但短期
 行為，在戰時之下，是絕對不行的。何謂「實
 業」？只有一分，其利潤，則於未知之數呢？保
 險與信託，其條件是如此的，如何能迅速使這
 一萬萬元的信託
 證券，能去呢？

從設立證券市場與發行投資證券的本質來說，
 那是很不同的，因為這些措施，總是要使生產
 生產事業的資金上的困難。不過，從實際情況而
 論，從產業資金的來源而論，這些措施的效果並
 不能估計太高。爲了使戰時後方的產業，能
 獲得合理的利潤，我們認爲主要的辦法是：政府對於產
 業界的合理要求，應予以金融上的便利。在這種
 工貸就是一項很重要的事情。今年的工貸數量比
 去年增加，但因執行工貸政策的原則是重工業，
 所以民營工業所受的惠，遠不及國營工業。而民營
 工業中，中小企業又遠不及大工業。大工業自然急
 需救濟，中小企業更是急待挽救。大工業爲民族
 的經濟命脈，中小工業亦何嘗不是抗戰建國的經濟
 戰線上的戰士？如果以重工業主義爲工貸的核心，則
 中小工業將沉淪在「求我於枯魚之肆」的悲慘命運
 之中了。這顯然並非民族國家之福。

爲了解決產業資金，重心不應放在證券市場上
 ；爲了使工貸能發揮其作用，原則不應放在重點主
 義上。
 (新華) 十二月六日

關漢羅的問題，當作一個最重要的實際問題，從
 前時和後時，走上立憲實現的道路。以中國國內
 論！前時的戰鬥，是迫於和戰後無時無刻不使
 命的存續，有適當的配合。其次，在政治上，各方
 面要求得國內的民主政治和軍事發展的措施。
 例如，在加緊反帝反封建的軍事行動時，就不
 應讓發生美國聯邦總統法西斯黨解嚴的條件
 。中國也應使民主的運動成爲政治的實際。必需
 肯定，在一個解決內戰的戰爭中，國內沒有反法西
 斯的大民國民衆政治，或不可能實現民主的動員，
 更不可能勝利。另一方面，則應使該明確的表示
 太平洋上各弱小民族有民族自決權，有自己決定命
 運的權利，並使他們以不自由的援助。使他們能
 够消滅法西斯也是他們自己的戰事，他們能够在
 積極動員努力參戰中，獲得民族獨立和自由。
 這樣，盟軍就能粉碎日寇的民族救國策，獲得
 龐大無比的力量，也從此打下了最後滅東方的基石
 。這一方面，由於盟軍沒有做到，所以自寇還有可
 能從民族救國中獲得一時的某些成就。

在太平洋戰爭兩年時，盟國在對日寇的攻
 方面，應在政治對等時，以團結抗戰之外，更
 應致力於政治的民主，適應軍事攻勢，增強國內
 團結的力量，以民族自決來動員東方各被日寇壓迫
 的民族，而粉碎日寇的民族欺騙，增強盟國和這些
 民族的團結力量。這正是在彌補以往的缺陷，走上
 必勝的大道。
 (新華) 十二月八日

日本國民反戰鬥爭的任務

鹽澤正夫

——讀岡野同志的「告日本國民書」

一 回答日本國民的要求

日本國民今天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從亡國戰爭中把祖國和同胞救了出去。

日本國民，沒有一個人不厭惡戰爭的，大多數的國民，都不相信軍部和政府所謂「聖戰」的宣傳，他們已經弄清楚了，目前的戰爭為的是什麼，為的是誰；對於戰爭的將來，也決沒有確實的前途。大多數的國民，如果在軍部和政府的宣傳中，可以找到一點足以相信的東西，那就是「日本遭過着嚴重的困難。」

軍部和政府今天對於祖國和國民，只有利用他們對於前途的恐懼心理，利用「戰敗就要亡國」的威脅，才能強迫他們去犧牲，去送死，才能繼續維持戰爭。

其實日本國民對於軍部和政府，已經憤而反抗，大多數的國民是不相信所謂「滅族奉公」的聖國的團結那一套鬼話的。他們已經瞭解，一切所謂「滅族奉公」也有，就是勞工農大衆、勤勞人民，忍受極大的犧牲。和軍部相勾結的大地產資本家，即從血汗未盡的戰場，瓜分了一切掠奪到的利益，無條件地動勞人民血汗的軍需生產，收獲了巨大的利潤。日本國民之所以能夠對他們容忍一切，只是為了願達到「如果日本戰敗，國民就感到更嚴重的不安」的緣故。

在今天，不僅日本，東西兩個侵略者所共通的優待政策，就是利用國際聯盟的威脅來壓迫國內的一切對立，利用與外國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不安心理，來掩蓋了國內「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關係。不過，軍部

及其黨羽和國民大衆之間是有種於種的利害衝突之點，對於戰爭對於黨羽及其黨羽是一番藉以擴張他們的權力的事業；戰爭之對於國民大衆，他們意識到這是引起不安的難於避免的災難。因此，怎樣使這個戰爭停止，乃是全體日本國民最切身的共同目的，而黨羽欺騙國民，使他捲入戰爭的漩渦，則是軍部及其黨羽的最大的關心問題。

我們必須明白地瞭解這種事實，日本國內的這種關係。日本國民是決不會好戰爭而為戰爭服務的，他們只不過認為這是最大的災難，認為這是難於避免的命運，企圖從其中找出解放的道路，而不知不覺地成了他們的敵人的追隨者罷了。

因此之故，「停止戰爭」——這正是今天可以把全體日本國民的憤慨和憤怒，結成一團烈火的最有力量的一口號。

因此之故，「戰爭的發動者」——這正是全體日本國民的憤慨和憤怒所集中的唯一的敵人。

「怎樣才能從亡國的深淵救出祖國和國民」——這正是為了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反對戰爭爭取和平自由的鬥爭的「問題解決的關鍵」。

關於這個問題，岡野同志在今年（一九四三）七月發表的「告日本國民書」上，已經對我們提示了極其明確的回答了。

他說：「我們國民任何一滴尊貴的血汗，決不應該花在這種可耻的非正義的戰爭上面。這種強盜戰爭必須立即停止。只有早一天停止這種戰爭，才能免除我國和東亞人民無窮的犧牲。」

他又說：「首先要打倒軍部，即剷除軍部在我國軍事、政治上的特權，將他從軍事、政治的統治地位上推定。因為軍部是這個戰爭的發動者，戰爭的實行者，從戰爭中獲得最大利益的人。因為軍部同時又是阻礙獨裁和

反對的至要支持，大財閥和大地主的擁護者，我國人民的吸血鬼，東亞人民的剝削手。」

他更進一步說：「所謂『必須戰勝』，如果失敗，便要變成美英的殖民地，這不過是軍部照例的欺騙宣傳。誰都曉得：這戰爭並不是美英爲了要將日本變成殖民地而發動起來的，却是日本軍部及其黨羽，爲了要把南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才向美英挑戰，發動了這個戰爭，現在美英和我國作戰，爲的是要擊潰日本軍部。就這一萬步說，假定美英將日本殖民地化的意思，但現在日本政府戰敗，決不會使我國變成殖民地。」並且他還舉出二十五年前俄國革命時的例子：「如果我國國民成立人民政府，像蘇聯人民一樣，全國一致團結，那麼，我國絕對不會有變成殖民地等等的危險。危險的倒是戰敗的結果，在軍部政府推翻之後，人民政府不能成立，成立了資產階級的政府，這時，資本家爲保持自己的地位，可能向外國出賣我們的祖國和國民。因此，爲着防止這種情況，無論如何，必須建立人民政府。」

把以上所說的歸納起來：第一，「反戰和民主」正是日本全體國民今天的目標；第二，軍部正是全體國民當前的敵人；打倒軍部，建立人民政府，正是停止戰爭和解放祖國和人民道路；第三，和軍部同歸於盡，正是亡國的危險。團結人民和奪取政權，正是防止亡國的道路。

現在我再來做別的把向野同志的指示拿來發揮一下。

二 當前日本人民鬥爭的目標

停止戰爭——這是今日日本國民今日的身身問題。除此而外，今天沒有能夠抓住今日日本國民的心靈的更大的問題。決定對戰爭的態度，是今日日本國民絕對不能忽視的關心的問題，因此對於這個問題的正確的回答，正是今日日本國民所熱烈擁護的，正是可以把全體國民結合在一個正確的目標之下。

所有一切其他的問題，從「決定對戰爭的態度」這一點來看，對於今天的日本國民，都不過是延遲的次要的問題，不，一切人民的問題，只有和「停止戰爭」問題起來，才能成爲活生生的現實問題。

「停止戰爭」——正是這種戰爭，才把日本全島劃分成完全兩個互不相容的

對立的立場：一個是對戰爭有利益的，因此他們對戰爭感到興趣，因此他們擁護戰爭政策的實行；另一個是爲了戰爭受到飢餓和死亡的威脅，因此他們認爲戰爭是極端的不幸，因此對於「停止戰爭」抱有很大的希望。

過去無論在那一個時代，沒有像今天一樣，能夠把全日本人民的立場，很顯明地用一個境界線來劃分開的。

而且過去無論在那一個時代，沒有像今天這樣佔絕對多數的人民，站在共同的切身利害上，和極少數站在反國民立場的人們，形成了對立的關係。

在過去，日本的勞働階級的先進分子，曾經和工農大衆結成了同盟，來和人民公敵資本家地主的政府、天皇制權力進行了鬥爭；他們反對資本家地主的可惡的榨取，爲了爭取民權，對於剝奪一切人民大眾鬥爭權利的制度進行了鬥爭。但是除了一部份先進的知識分子和一部分站在共同利害上的下層人民之外，那些相當多的人民大眾，置身事外，對於這個鬥爭不會表示積極的同情。

在過去，日本的勞働階級和成爲他們政治的中心的政黨，曾經指摘了人民公敵所製造的戰爭的危險，說明了這個切迫的戰爭，是把人民大眾做犧牲，而只爲了少數資產階級擴大他們的利益，因此就進行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但是，除了工農大眾和知識階級的前進分子之外，大多數的人民大眾還感覺不到這切身的危險，還置身事外，對於這個鬥爭，不會表示積極的關心。

因爲這樣的緣故，人民的公敵，就很容易的來蒙蔽侵略戰爭的陰謀，進行作戰的準備。因爲這樣的緣故，他們可以乘着人民大眾的認識落伍，實施欺騙政策，強迫人民忍受飢餓流血的犧牲，來發動這一次的侵略戰爭。

但是，日本人民大眾，在今天經過了親身的切實的體驗之後，已經能夠明瞭地認識戰爭的真相了。

在今天，絕大多數的日本大眾，痛切地認識到戰爭之對於全日本國民，是如何可怕的災難！不僅只被關到前線充當炮灰和被榨取得精光的工農大眾已經弄清楚，就連曾經任意被強迫徵用了作思想和技术的事奴隸的廣汎的知識階級和官廳及公司的職員，以至在所謂「超黨派主義」的獨占資本擁護者下破滅了的很多中小商工資本家——總之，除了利用戰爭，榨出着任

意圖使國民的大權，藉口爲了戰爭的必要而任意掠奪國民的血汗和財產，爲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這些血汗和財產的少數獨占財閥和大地主之外，所有的國民，不問男女老幼，都經過親身的體驗而認識到戰爭的災禍了。過去只是爲少數國民所關心的，現在廣大的國民也關心起來了；並且，過去不是這麼現實的問題，現在也成了全日本國民生死攸關的問題了。

在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在日本人民解放鬥爭上，過去不會有過的最重大最有利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即在日本人民解放史上，革命的先進分子經過了慘澹辛苦不能實現的動員全體日本人民的條件，爲了對付共同敵人，在切實的共同利害下團結人民的條件，現在都已經成熟了。

我們必須顯明地認清這個事實，這個日本國內的現實。

全日本國民，認爲戰爭是最大的災難，而希望脫離這個戰爭。甚至人民的公敵，也很明白地認清了這個事實，因此他到抓住日本人民的這種衷心的要求，假裝出他到自身也和全日本國民在共同利害上，希望「結束戰爭」。他們欺騙人民說：爲了日本的生存，中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又爲了東亞的和平，和英美的戰爭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戰勝正是結束戰爭的保證。

日本人民革命的當前問題，是徹底的推翻這種欺騙宣傳，對於真正日本國民全體所關心的「結束戰爭」問題，給以明白的正確的回答。

要這樣，全日本國民才會如「烽火燎原」的，團結在共同目標之下。

要這樣，他們才會如潮水似的，把憤怒激蕩在人民公敵的頭上。

那麼怎樣是正確的回答呢？

第一，「反對侵略戰爭」——這個戰爭不是爲求東亞和平的戰爭，而是把日本國民的血汗和犧牲做犧牲以征服大陸人民的戰爭，是企圖把東亞大陸淪爲自己獨占的市場、資源和勢力擴張的根據地的戰爭。並不是爲求東亞和平的戰爭，而是爲亂東亞和平的戰爭。引起這個戰爭的原因，是由於日本首先要征服中國，其次要破壞英美的權益，是由於日本強迫那企圖制止侵略者的橫行的英美，放棄在全遠東的權益，而自已來獨占了這些利益。

他國決並沒有威脅日本，不過是對付日本威脅的一種自衛行爲。就以今天來說，他國之所以進行這個戰爭，也決沒有威脅日本的意思，不過是爲了要毀滅日本法西斯政權，要把東亞民族從這樣非正義的戰爭中解放出來，使英美自身也能免除來自日本的威脅。那麼日本國民爲了避免成爲戰爭的犧牲，就

應該立即停止這種非正義的戰爭，和羣面諸民族及有關係的各國，結成互相關連獨立自由的和平關係。

第二，「打倒日本軍閥及其黨羽」——日本軍閥爲要達成上述的野心，把國家和國民的安危做賭注，獨斷地發動了「滿洲事變」，隨後在華北和內蒙連續地進行強盜的軍事掠奪行動，終於引起了中日戰爭。他們不顧一切國內的輿論，殘酷地迫害鎮壓反對侵略戰爭的動勞人民大眾的革命鬥爭，從五一五事件到二二六事件以來，一再騷擾暴徒，壓制國內的反對派，掌握了在實施侵略戰爭時所必要的軍事獨裁權。剝奪了工農動勞大眾的一切團結權，強制解散他們的組織，嚴厲地禁止言論的自由，好像封建時代似的在全國張佈偵探監視網，造出了除被收買的走狗的戰爭呼號之外聽不到國民之聲的黑暗時代。這種現象，他們稱之爲「舉國一致」，在這樣「舉國一致」的大帽子之下，把國民擱上前線去。因此，軍閥就是戰爭的責任者，是戰爭的執行者，非剝奪了他們的這種野蠻的獨裁權力，非取消了他們的暴力支配的地位，非奪回了國民得自由發表意志的和國民得自由團結的權力（民權），是沒有方法達到任何正義之聲，實現任何國民的要求的。除了打倒軍閥，樹立人民政府；由人民政府向東亞諸民族以及有關係各國進行交涉和平之外，其他找不出和平的道路來。如果在戰敗後（在今天戰敗是很明顯的了）進行和平交涉的時候，仍然是由使無雙的國民担起一切的負擔而讓軍閥實現自己的野心的反動政府出面的話，那是不能保障他們不再犯這種不幸的條件加在國民的身上的。所以打倒軍閥，就是全日本國民當前的目標。

第三，「和東亞各民族共同鬥爭，和世界反侵略國家及其人民共同鬥爭」——在今天，受到日本軍閥悲慘的侵略戰爭的災害的，是日本人民，是東亞各民族，特別是中國，以及在遠東有利關係的英美等國。所以中國在抗戰之初，就發表聲明：「只有日本軍閥是我們的敵人，日本人民還是我們的朋友」，號召日本人民起來參加共同的鬥爭。很明顯的，英美是以「絕無侵略主義的政權」做目標，如在大西洋海峽（並調用在大西洋）所表現的，要使戰後的世界關係，實現以各民族獨立解放和互相援助作內容的「民族自決」。日本國民是應該和它們共同行動的。但是，日本軍閥是極恐怖國際人民實行友誼聯繫的，所以在作欺騙的宣傳，說「這是家着和平的影而具的敵國思想的策謀」。我們究竟是信任剝奪了人民一切權利，逼迫利用成爲無辜

奴隸的國民，爲它們流血餓餓，以造私利的國民公敵呢？抑或信任實際和日
本國民站在共同利害上的中國種反侵略國家的聲明呢？事實告訴我們，今天
的東亞早已不是過渡在騷亂狀態的奴隸的東亞了。中國的偉大的民族解放、
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開始就不屈不撓的發展下去。由於民族革命飛躍的發
展，迫得過去亞洲的征服者，早已不得不漸次放棄其征服者的特權，而和中
國成立平等的友誼關係。這個民族革命的先進派中山先生曾經指出：爲求東
亞的解放，需要在互相尊重獨立平等的原則之下，和日本共同努力，但日本
帝國主義軍閥並不這樣做，而有系統地企圖破壞中國的民族革命，這是因爲
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對於他們獨占東亞奴隸政策的政策，有了致命的阻礙
。那麼在日本軍閥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中國民族向日本人民伸出共同鬥爭
的手，決不是一種「策謀」。無疑是一種民族自衛和東亞解放的傳統的革命
政策，是「兩民族提攜起來，絕滅共同敵人，解放全東亞」的真誠的呼聲。
而且英美等國在這強有力的「遠東自覺」之前，一變過去的「遠東政策」，建立友誼
和和平的關係以維持自己的權益，在威脅（中國在內的）其共同利益的獨占
征服者出現的時候，就來協助中國，和中國共同參加反侵略戰爭，這決不是
「侵略東亞」而是「對東亞的友誼行動」。如果英美的友誼，只是防守在「
東亞的權益」受到侵略，只是「利用革命」的話，那麼爲甚麼我們爲了打倒
日本人民的敵人，不去「利用」和我們共同敵人作戰的英美等國的戰爭呢？
而且今天的英美，特別是主要和日本作戰的英國，是在準備了一部份反動的
帝國主義者所謂「孤立派」分子的「和日本戰爭只是被遠東的革命所利用」
的主張，在美國人民有力的支持之下，爲了世界的反侵略戰爭而進行戰爭。
我們只要想到這種事實，日本人民也就能斷然和這些國家的人民進行友誼
的互助，來打倒共同的敵人。我們應促使日本軍閥打敗戰，打倒日本軍閥
，消滅全東亞共同的敵人，和這些友好的各民族以及希望建立遠東的友誼的
各國民衆，一掃過去不愉快的東亞的歷史，從戰爭的災禍中把日本和人民救
了出來。

三 日本並不會因戰敗而亡國

那麼日本會因戰敗而有亡國的危險嗎？
這個問題並非是國民表達不安的來源，因此，他們在今天雖然已經表達不

堪，還能甘受極其殘酷的國內敵人的威迫，服務於可詛咒的戰爭，而不能够
有斷然起來反抗的決心。軍閥政府正是在利用這一點來進行欺騙政策。對野
博志對於這些虛例的欺騙政策曾明白地加以指摘了。

軍閥政府在進行怎樣的欺騙呢？

第一、誰也知道，太平洋戰爭爆發約一年之後，世界變局集團的形勢，
很明顯地開始陷於致命的危機之中，因而日本軍閥及其黨羽，開始從「
赫赫的戰果」，一變而發出「悲壯」的聲調，在利用「日本遭遇到前所未
有的困難，戰敗就要亡國」的宣傳來威脅國民了。

日本軍閥在今天，已經很明白地承認，他們發動的戰爭，已遭遇到嚴重
失敗的局面。

遭到了蘇聯對人的反攻的威力，德國潰敗的徵兆是很顯明的了，北非軸
心軍的敗退，陸續着意大利的投降，更進而而歐洲第二戰線迫近的威脅，
在南斯拉夫、波蘭、法蘭西等所有納粹佔領下的國家，都燃起了無法收拾的
愛國人民戰爭的火燭。德國在這種內外交迫的危機之下，陷於孤立包圍的狀
態，它的命運如何，是不問可知的。這是明如觀火的：在歐洲戰事解決之後
，英美在歐洲的主要戰鬥力，就要集中來解決東亞的侵略者了。

日本軍閥在二年前就已感覺到中國是不可征服的了，同時它又恐怕在這
泥沼戰爭毫無止境地繼續消耗期間，東亞的反侵略戰爭漸次形成和加強，
因此又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企圖以先發制人的手段，來破壞反侵略戰爭，來
解決外強中乾的中國。但是，事實上不僅解決中國仍舊毫無希望，原來生產
力極爲貧窮的日本，雖然乘人不備在西南太平洋獲得了一時的成功，但現在
已經被以巨大的生產動員來增進反攻力的英美所壓制，喘息於破滅的消耗戰
爭之中，而不得不漸次放棄曾經一時佔領了的許多戰略要地。而且這是很明
顯的，這樣的消耗戰爭，很危險地完全破壞了日本國民的生活，傾盡了日本
的國力。戰爭的前途已經到了暗澹的狀態，何況在歐洲戰場解決後的不久的
將來，日本要一手招架英美集中起來的全盤戰鬥力，這結果如何，當然是不
問可知的。

因此之故，如像把在中國「速戰速決」變爲「長期建設」的泥沼戰爭一
樣，如像把「不介入世界戰爭」變爲「爲世界新秩序的戰爭」一樣，「動聽
的聲譽」也變爲「空前的謊言」了。

倫內閣，找到很好的例子來。在當時，全歐洲受到德意法西斯武力侵略的威脅，人民戰線的法國、蘇聯、捷克等國，根據全歐洲人民的要求，結成了反侵略的軍事同盟，這個軍事同盟存在的一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不敢發動大規模的戰爭的。但是英國的張伯倫內閣，厭惡蘇聯威信的增高，想在歐洲孤立蘇聯，始終想由英德法帝國主義者來分割和支配歐洲各民族，因而和法國的反動資產階級相勾結，破壞英法人民戰線，瓦解蘇法捷的軍事同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德意的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就開始了。很明顯地，就是由於英法支配階級和德意支配階級，企圖成立協定，排除蘇聯和全歐人民的勢力，來共同支配歐洲，歐洲大戰就是由於這個分贖協定的失敗引起來的。法國之所以迅速地敗亡，英國之所以突如陷於絕境，正是因為在帝國主義的勾心鬥角中，英法的人民不加以合作，歐洲各民族不給以些微的同情和援助。

反之，當希特勒侵略蘇聯，蘇聯發起從事反擊歐洲的暴力征服者的時候，邱吉爾很聰明地洞悉了事態的本質，聲明拋棄過去的反蘇政策，這樣一來，英國全體人民都更加以協助，同時全歐洲各民族各國人民的反侵略聯合戰線也成立起來了。德國今天所遇到的慘境，決不是單靠蘇聯強大的武力造成的，而是由於全歐各國人民的力量——因人民奮起而脫離了危險充實了實力的英法以及法國、波蘭、南斯拉夫的人民戰爭的烈烈所形成的。

在遠東也是同樣。日本軍閥今天為何陷於「空前困難」的絕境呢？因為以全遠東各民族為敵，以全太平洋的國家為敵，無限制的擴大戰線，在東亞佔領區的內部，不僅絲毫得不到各民族真正的協助，反而到處發生的游擊戰爭，破壞生產資源的開發和運輸，同時要分出巨大的兵力，來鎮壓內部的騷亂，到處受到內外敵人的反擊。加之，日本軍閥雖然已經是這樣的軟弱無力，而又不肯不一手支撐着得到全國人民奮勇協助而使巨大的生產力日益增高的英美的大壓力。

假使情形完全相反，日本是站在反侵略的立場，來和遠東海洋的侵略者作戰，那麼蘇聯就不會加以友好的支持，日本就可站在東亞各國各民族的前頭，卓絕在正面集中戰鬥力，來從事防禦侵略者的戰爭。加之，因為侵略者在國內得不到人民的協助，而削弱了戰鬥力，輿論也會起來反對侵略主義的政府的戰爭政策加以強力的攻擊，而使之陷於危機的。

我們在今天是可以斷言的：在今天的戰爭中，如果還有一部分國家還是以「反侵略」作藉口，希圖來征服日本的話，世界的現勢是決不許這樣做的；如果日本人民團結起來，為了愛護祖國，抱着不許任何侵略者前來侵犯的決心，那麼侵略者的立場就會立刻陷於上述的苦境的。本國人民會提出「我們只為了反侵略和平而戰，不為了做侵略者的犧牲而戰」，來威嚇政府；為了反侵略而戰的東方各民族，也會起來援助日本國民，共同對付「東亞的威脅」的。

所以，這是始終必要的：日本國民在今天必須團結起來，為打倒軍閥而鬥爭，為戰後的自由與和平而立即從事準備的工作。

日本國民需要團結起來，和東亞各民族和世界反侵略各國的人民一致努力，在國內進行反戰鬥爭來和他們響應外合，共同為日本軍閥的失敗和崩潰而奮鬥努力。工人在工廠，在礦坑，在鐵道、碼頭、船舶上，職員在公事廳，農人在農村，市民在每個居住區，都要提出「打倒軍閥政府，成立人民政府，即時停戰媾和」的要求，而緊密地團結起來，用團結的力量進行羣眾鬥爭，以阻礙軍閥推行戰爭；要用罷工、怠工、破壞等一切大眾的威力，來削弱破壞軍閥的作戰機構；要強迫政府賠償國民各階層在戰爭中所受到的一切損失，要反對政府的徵兵和動員法令；為了要把各階層各地區的代表組織成一個「共同目的」之下，使鬥爭擴大到全國，各階層各地區的代表需要組織一個人民鬥爭的統一中心。在前線，士兵也要按照每一部門團結起來，發動「要求停戰歸國」的鬥爭，開始集國地從前線撤退，槍口是要向着真正的人民公敵來開火的。這樣地和進行樹立人民政府的國內同胞相呼應，相合流。

軍部及其黨羽，自來就是用「國賊」這個大帽子來威嚇，用最殘酷的手段來鎮壓這樣的運動。到如今，已經有成千成萬的人民英雄，用血來染紅了人民反戰鬥爭的歷史了。在今天，究竟誰是「國賊」，誰是「人民公敵」，不是已經顯明了嗎？為了一部分特權階級而傾盡國力，而犧牲全國人民，而使日本陷入不幸的深淵的，正是日本軍閥；反之，甘冒流血的迫害，為了要把祖國和同胞從災害中救了出來而英勇鬥爭的，正是人民鬥爭中的無數的戰士——其中心的力量正是日本共產黨。所以岡野同志正在喊出「參加到日本共產黨的隊伍中來」的口號。中日戰爭以來，三輪壽壯、龜井貫一郎等無數的冒險的無產階級的指導和領導幹部們，在處弄六眾，籌款侵略戰爭，一

變而為軍部黨團體黨會和報國會幹部的時候，只有日本共產黨的幹部，堅守人民的立場，為結成「反戰的人民聯合戰線」而奮勇戰鬥。這樣的事實是不能歪曲的。國民大眾團結在日本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聯合戰線之下，正是把日本從戰爭的悲慘命運救了出來的重要條件。

四 反對破壞人民聯合戰線的鬥爭

岡野同志在向我們高呼：「高舉起來人民光輝的旗幟！在這旗幟之下戰鬥，在必要時就死在這旗幟之下！這樣的死，才是真正的『名譽的戰死』！」

誠然是這樣，人民團結在這「光榮的旗幟」之下，才能把祖國和同胞，從軍閥所釀成的亡國的慘禍中救了出來。

當然，鬥爭的道路決不是平坦的。那麼對於日本國民，在今天有什麼道路可走呢？或者是做一個奴隸而無聲無臭的死去，或者是不顧生死為了爭取人民的勝利而戰鬥？

勝利是絕對可能的，只要我們斷然採取必要的手段來爭取勝利的話。

當然，我們也要考慮到：日本軍閥及其黨羽，也會採取一切手段來防止這樣的人民鬥爭，製造層出不窮的陰謀來破壞人民鬥爭的。他們的手段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使用暴力作正面的打擊；一種是使用陰謀從內部瓦解人民鬥爭。日本人民必須鞏固自己的隊伍，粉碎敵人一切的企圖。對付從正面來的打擊，是加緊緊密的團結和集體的鬥爭，對付互角內部的陰謀，是要毫不留情地檢舉和驅逐潛入人民鬥爭組織裡的暗探。

日本的人民公敵日本軍閥，首先必然是利用殘殺和投獄的威脅，嚴禁人民的團結，封閉一切異己的言論，來壓迫對戰爭政策忘工和反對的國民。成千成萬的同胞，已經在道次的戰爭中，在國內和前後線，被那些劊子手屠殺了。那些劊子手們為了維護他們的罪行，就造出這樣的道理：「日本的國體是君民一體的，不像歐洲一樣，資本家和工人，政府和人民，是處於對立的地位。」這樣的欺騙宣傳，我們在今天已沒有再濫費筆墨加以駁斥的必要了。在事實上，我們看到日本內部的對立是很尖銳的：把一切獨裁權掌握在軍閥政府手裡，濫費國民的一切生產設備和財產以進行戰爭，把所有的國民強逼

來為戰爭服役的權力階級，和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沒有說話的自由和選舉權力之可言的人民大眾之間，是完全對立的；在這樣的獨裁權壓迫之下，國民將自己服役，掠奪國民一切的財產，一手吞沒兵士流血犧牲得來的贖金和權益，從戰爭獲得莫大的利益的大財閥，及與之相結托把國家的財政援助、補助金等收入私囊，借所謂「統制價格」的名義掠奪了農民血汗的大地產，和被剝削得精光的國民大眾之間，是完全對立的；在所謂「一將成功萬骨枯」的前線，上層將校和為造就他們的功勳而流血犧牲的下級幹部及士兵大眾之間，也是完全對立的。

人民鬥爭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首先打擊人民公敵得以強制國民大眾供其犧牲的武力的支柱，奪取他們的這種權力。人民公敵的武力支柱，就是軍閥及其權力，是天皇統帥這種任何人都不能動搖的戰爭權力機關。他們借口有使這種絕對權力圓滑行使的必要，就把行政、司法、立法等一切國家權力，從屬在他「絕對權力」之下而加以獨占把持。消滅這樣的權力，也就是解除從戰爭中來獲得權益，利用戰爭以營謀私利的反動的財閥地主等的武裝。

因此，國民不得不緊密團結。必須使全體國民澈底地弄清楚，日本國內決不是一個在共同利害下結合的「大家族」，而是一種「不共戴天的敵對關係」，在這個共同的敵人之前，國民各階層不得不緊密團結。

然而日本軍閥及其黨羽，為了破壞這樣的團結，就使一些暗探潛入人民的隊伍裡來。

第一種暗探是這樣的一套面目——他們說：「我們是為了勞動人民的利益來和資本家地主進行鬥爭的，然而在今天，已遭遇到包括資本家地主在內的民族危機，所以應該停止內爭，全日本國民都要團結一致。」舊大衆黨的遺落幹部就是屬於這一類，他們在平日戰爭發動時就表示「擁護戰爭」，現在已成了軍部的戰爭服役組織的翼贊會和報國會的幹部。他們的真面目早已暴露出來了：他們附和軍部所謂大家族主義的國家思想，他們欺騙人民說：「資本家地主和大众的鬥爭，不過是一種家族的團結之爭」，公然地謀謀出己己成了軍部的走卒。

在今天潛入人民隊伍中的最可惡的暗探乃是下述的一類，這第二類的暗探，裝出一套很「革命」的面目，裝出自己是屬於人民的一伙，他們說：「咱們是幹革命的，但是什麼反戰，無聊得很，這只是幫助了英美等國國家

「今天在日本國外喊喊反戰的傢伙，不過是同盟國的走狗，但咱們是要辦日本革命的，」日本的戰爭失敗，並不是軍閥的崩潰，也不是革命的成功，不要破壞孩子的那些俗論所欺騙吧。」總之一句話，就是要我們「不要進行反戰運動」。

在今天，究竟是日本人民的真正戰士，抑或是軍部的暗探，只消從這「暗探更分別出來」——是不是為反對戰爭而進行鬥爭。

他們的看起來像像變態的「非反戰的革命」的欺騙宣傳，完全不過是騙孩子的鬼道理。例如有人說：「為什麼戰爭失敗並非革命的勝利呢？因為日本的失敗，並不是日本反軍部的勢力所造成的，而是民主聯合國家直接行使武力的結果。」所以他們主張讓戰爭在國外進行，人民在國內進行革命。

但是，這些「非反戰的革命」向國民所宣傳的敵人是誰呢？有人說：「打倒東條也沒有用處的，問題是在軍部的少壯派。在少壯派軍人看來，東條之流乃是元老重臣的起點的代理人。所以打倒那些法西斯軍人才行。」實際上，這與革命家所指的「敵人」，如像軍部的戰爭目的，是隨時發動而不可捉摸的。照他們的說法，最近的「敵人」不是東條，而是軍部中吸取了奪取政權和軍制派的大尉和少佐一類的暴力團員；不是操縱這撥勢力團而為政權的軍部這特權的戰爭機構本身，而是某某軍人，而是少佐大尉這類軍部的爪牙了。

，而且在他們的解釋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東條和軍部財閥是一體的，所以不是法西斯，日本法西斯是財閥重臣等舊帝國主義支配階級的敵人。」

「這正是軍部所歡迎的對人民的宣傳。軍部為了奪取政權，在五·一五和二·二六事件以來，利用了人民反帝國主義支配階級的情緒，裝出人民之友的面目，把人民的革命熱情，转移到「反對財閥，打倒重臣」上面去。然而誰也知道，軍部的執行這種政策，不過是在反動政權內軍部要對財閥重臣爭奪權，不是是軍部企圖對財閥重臣加以威脅牽制，使他們來協助自己的種種的戰爭破壞的手段。結果就如今天所表現的：軍部掌握了實權，隨着所欲地擴張了內閣，造成了財閥以全力來擁護軍部的形勢（如首相獲得行政特權，設立軍需省來進新等，又如三井三菱等軍需重工業財閥的改組等），從

此軍部和財閥的聯合得到成功，成立了日本軍法法西斯的機構，過去的對立根本就消失了。因此可以明白：世界上任何的制度，能爭求得真正「打倒財閥的法西斯嗎？」實際上法西斯主義「就是帝國主義的戰爭階級」。

這類暗探，正其附和着軍部，對人民的實行欺騙宣傳，企圖擾亂人民對公敵的鬥爭。

而且這類暗探混入人民鬥爭團體內所企圖擾亂的焦點，還大體分為以下三點：

第一、裝出「革命的批判者」的面目，對於日本的人民鬥爭實行中極其蔑視，企圖打碎這個運動、組織和幹部。

第二、挑撥人民聯合組織的內部對立。

第三、挑撥民間日本人民的鬥爭和反侵略國家間的關係。

關於第一點，例如他們曾經這樣說過：「（日本革命運動有什麼力量！在這裡，如果對人民持有過高的估計，乃是一種很大的罪惡），那些所謂了首相在議會提到左翼的存在就認為自己是了不得的傢伙們，應該趕快到外國去罷！」他又說：「（用示威、罷工、怠工等手段來打倒軍部是不合成功的）如果發幾道示威、罷工、怠工的指令，就認為他完革命家的傑作們，應該到外國去罷！」在實際上，今天在國內的所謂「打倒重臣」的鬥爭的血液，連軍部將領在今年初都為此而進行重要的商談的，這些先生們正是採用了這種嚴重的事實了。

關於第二點，例如他們主張對不加在軍隊、工廠、農村的鬥爭中組織的人民反戰團體，他們借口這些「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或說「和政府的立場不同」，而主張必須組織另外的團體。他們也反對共同戰線。而且對於同鄉同志的「告日本國民書」那種最鮮明的「為人民利益的至誠」，也存加以攻擊；「戰爭使國民生活感到艱苦，那是必然的，一味地列舉戰爭生活艱苦，而把它拿來做主要的思想根據，那是落伍的了。」他認爲革命黨人是遠離國民生活的高遠的理想。然而實際說來，這正是企圖轉移國民對現實生活的注意力，企圖在觀念上製造對立，使人民鬥爭陷於分裂的一種毒藥劑。

關於第三點，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認爲「反戰運動是英美屬地國家的

工作」，可以說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說：中英美和日本人民各有各的獨自的目的，所以「劫中國」對於日本革命是沒有幫助的。他們說：「第三國際的解散」正是投機防止日本革命的「經濟的策路」。很顯明的，這正是軍閥的走卒附和了「革命運動只是民族鬥爭的準備」的思想，不過是阻止同盟國家在共同目的下互相合作的一種陰謀。

總之，今後日本軍閥敗滅的徵兆一天比一天明顯了，日本人民了命鬥爭開始形成了軍閥的重大威脅了。同時我們應充分地瞭解，這國內部極複雜的新花樣，也一定會層出不窮地產生的。

日本國民絕對不要上這些陰險的當，必須盡力防止軍閥和加緊國內聯合戰線和國際聯合戰線。日本國民在國內可以把握對國際聯合戰線所採取的賢明的政策作為很好的掩護：「首先消滅侵略者！關於戰後的問題，今後可再根據國際和平和民族自由平等的原則從長討論。」在我們的國內也應當如此：「不要中了敵人的奸謀，不要在人民鬥爭中發生間諜和對立，要首先來消滅共同的敵人軍閥及其走狗！」在人民勝利之日，然後由人民各階層，互相尊重彼此的自由和權利，根據兩地來解決人民各階層間的問題。這正是我們的「民主聯合戰線」的基本政策，這正是人民共同鬥爭的口號。

即刻停止戰爭！即刻從中國和南洋各地撤兵！打倒軍閥！打倒軍閥政府！

樹立人民政府！

建立和平自由的日本！

東方民族共同鬥爭萬歲！

世界反侵略統一戰線萬歲！

（一九四三、十、十二日·延安。）

和戰後的石油工業都恢復了，就在這種情形下，荷印每年所採煉的石油也不過八百萬噸。在美國，每年採煉的石油是一萬六千五百萬噸，即要二十倍以上。

日本企圖將大宅在太平洋戰爭中所獲得的成就的實際意義。他吹牛說，英美喪失了他們在西南太平洋的屬地，使英荷兩國的經濟受了無法補救的損失，就要完全切斷了他們底錫和橡膠進口的來源。這，當然是不足為信的。美國和英國可能從巴西得到橡皮和錫而得到錫的消費量的完全保證。美國和英國同運用的維持着親密的好友關係。對英美兩國說來，他們底西南太平洋上屬地的喪失，則持久戰爭中任何一點對英荷兩國都沒有關係。蘇俄與關島以及其他太平洋上島嶼的喪失，對美國的經濟力量沒有影響。

另一方面，日本的暫時成就就其強大的消耗了日本的武裝力量，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日本軍閥上的動搖。日本武裝，就必須在離開自己主要根據地的廣大距離上作戰，要維持對他們底戰線不斷的供給是異常困難的。為了與這些分散在整個太平洋上的在獨立的島嶼上在荷印以及其他島嶼上的軍隊維持補給線，日本不僅必須有一支巨額的艦隊，而且必須有一支龐大的運輸艦隊，用來在遠處的海上運輸上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同時，日本作戰艦隊和商船隊的損失不斷的加增實是無法補償的。

自然，英美兩國艦隊在太平洋上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損失。然而，首先這些損失並沒削弱英美在海上軍事力量；第二，單是美國造船工業的生產力就保證了以新的船隻不斷補充同類型的海軍。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所享有的那種對它有利便利的優勢，由於美國為開闢國海軍空軍所進行的全部軍火生產計劃的順利完成，就最後地歸於消滅了。

過去一年半的太平洋戰爭已確切地證明，日本帝國主義在國外的成就只有過渡的性質。目前事態的發展對日本不利至為明顯。在戰場上越趨越多展開着堅強戰鬥的長期因素，確定了英美同盟國家的最後勝利。就在現在，日本就已經必須為了把它捲入與英美這樣的列強進行困難而無望的戰爭中的日本軍閥的冒險計劃，付出高貴的代價。

日本帝國主義暫時佔領了英法美荷在太平洋上的屬地，並不能給彼長期戰爭弄得精疲力竭了的日本繼續注入新鮮活潑的力量。

中日戰爭以來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動

史明操

(一)前言

中日戰爭將要進入第八個年頭，日本帝國主義的收場日益顯著，勝利的曙光已在我們的前面，這是很可欣喜的，但是七個年頭的戰爭，我們至今尚未能透澈地了解日本，這的確是我們應該抱愧的。

七年來，日本政治變化很複雜，內閣變動了七次，政潮尤其激盪相繼，元老重臣，財閥，軍部，官僚，法西斯政客，少壯軍人，串演着不少悲劇離合起伏身沉的變化。雖然像「五一五」「二二六」那樣震動世界的流血事件是減少了，可是平沼被刺，中野正剛自殺也頗多奇觀。特別是既存政黨的解散，法西斯的過步，人民反法西斯的鬥爭，所有這些，在日本人民的生活史上，這七年確是一大激變，但是我們究竟對日本帝國主義這一演變的本質，有系統的了解沒有呢？

一個最危險的現象是倭勝論者的無視於敵情的研究和分析，而某些「專家」們憑藉「數十年研究」的老招牌，信口雌黃，胡亂謔吹，更增加了輕視客觀地去研究敵情的空氣。他們兒戲化了對敵情的判斷，把主觀願望當實事。當着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着新的冒險，千百萬人類的命運將遭災殃的時候，他們是在誇誇其談，不是大賭其頭，說日寇將要撤兵，便定誇張新加坡海防大砲的威力如何使日寇不取正視，這樣來造成一種浮薄的算命的論調，迷惑應有的嚴肅的判斷和警惕，這種「專家」真是誤導蒼生而禍不淺矣。

研究日本帝國主義，從它經濟的變動出發，這應是最好辦法，筆者從這一願望出發，來分析一下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動。這是一個大題目，以筆者學歷修養及材料的限制來說，實在是大胆的嘗試，幸而國內有許多日本反戰志士及嚴肅的研究者的許多寶貴的勞作，可供借鏡和幫助，所以也敢大膽一試，如未能稍盡一點點拋磚引玉的作用，那是極大的喜悅了。

(二)日本戰時生產的上升

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侵華戰爭，戰爭的第一年帶來了日本生產的景氣，這景氣經歷了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三個年頭，但到了一九四〇年春，生產的發展停滯了，日本經濟走上一个新的階段。

據日本經濟機關所發表的材料，日本工業生產發展的趨勢是這樣：

年份	工業總產	工人數	產量額
1937	90.622億	4,592,887人	12,257,537千元
1938	137.422億	7,768,709人	21,382,130千元

三年中工廠數，工人數資本額都有很大的增加，這種增加，不僅是表現

在量上，而且也表現在生產內容的變化上，這就是說日本工業生產的內容，因軍需景氣的刺激，和平工業生產一天天跌落，重工業生產的比重日益增高，表現如下的趨勢：

產業類別	一九三七年生產額	一九三九年生產額
金屬工業	二、二〇八、八六七千元	五、四七二、〇九〇千元
機械工業	一、七二六、三五七千元	五、四二一、三七九千元
化學工業	二、一一〇、九一五千元	四、一六〇、九七五千元
紡織工業	三、六五四、八八八千元	四、七九一、五三五千元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重工業生產的激增，而和平工業的牛耳紡織工業，雖然絕對的生產額仍有增加，但相對的比重已大為跌落，這正可以從蘇聯經濟學者伊瓦林的研究得到證明：

一九二九——一九三九日本工業生產價值的變化：

年 度	紡織工業	金屬製造	化學工業	食品工業
一九二九年	三八、八%	一七、七%	一三、九%	一四、五%
一九三六年	二七、五%	三〇、四%	一七、九%	一〇、一%
一九三九年	一九、六%	四四、七%	一七、一%	九、六%

從這一百百分比中，已顯然看出和平工業的衰落，重化工業的生產比重大為增加。倘若我們從工人數的增加情形來看，也更幫助了解。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三年間，日本產業工人增加一百一十七萬人，其中機械工業增加六十六萬九千人，金屬工業增加十八萬九千人，共計佔新增工人百分之八十四，由此可以證明。

由輕工業向重工業的轉移，這種發展，主要是依據於日本政府巨大軍需費對重化工業的支援，特別是對新興財閥的援助，同時也由於日本政府逐步加強資金投流的控制。「七七」起以後，日本政府於九月頒發臨時資金調整法，消滅防止資金流入不急需產業。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發動了總動員法第十一條，一九三九年又頒布資金融通令。我們看日本計劃資金的投放情形，可以看出如下的變化。

計劃資本比例表：

業 別	一九三五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一九三九
化學工業	三三、七%	三三、三%	三五、一%	二一、七%
機械工業	八、〇%	二二、五%	三〇、二%	三三、〇%
金屬工業	一一、七%	一九、七%	二六、一%	三三、三%
其它工業	五四、八%	二二、五%	八、八%	一三、〇%
總計金額	六八二萬萬	二、〇〇七萬萬	二、〇一七萬萬	二、〇七九萬萬

(三) 中小工業沾光

由於生產景氣，新興財閥膨脹了，中小工業也仍佔日本工業生產中一貫的重要比重。中小工業之所以能在軍需生產景氣中佔相當地位，這是有原因的。第一是由於日本重工業先天的落後性，中小工業中雖然主要是重工業，但重化工業所佔比重也一天天增加。譬如拿一九三八年為例：

中小工業在重化工業中所佔地位

業 別	工業數	工人數	佔全數百分比	生產額	佔全數百分比
鋼鐵業	16,845	94,776	18.7%	981	25.1%
化學工業	5,585	80,536	91.7%	984	27.0%

從上面的統計，足可說明在日本全部金屬、機械、化學工業生產總額中，鋼鐵業而論，中小工業佔三分之一弱。因此軍需工業的景氣，使它不至於難以維持。除此之外，還有第二個原因，這原因就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在擴張發展軍需工業之際，不得不更依賴海外軍需原料和機械的輸入，這是日本資源貧乏和技術落後的實質所規定的。日本帝國主義既然非增加原料與機械的輸入不可，那末它必須與英法美大量輸出以抵補國際收支的平衡，中小工業的製成品大部份是供輸出的。中日戰爭前，日本工業品輸出總額中三分之一屬於中小工業的出品，由此可以想見中小工業中輕工業部份在戰時軍需景氣之下，所以能維持的原因。中小工業在和平工業中所佔的地位，則上面一樣以一九三九年為例列表如下：

業 別	工業數	工人數	佔全數百分比	生產額	佔全數百分比
鋼鐵業	16,845	94,776	18.7%	981	25.1%
化學工業	5,585	80,536	91.7%	984	27.0%

在日本政府竭力援助下，軍需工業的發展，生產的向上，新興財閥與中小企業的繁榮，這造成了日本激進法西斯「革新派」巨大的經濟基礎。在日本政局動盪過程中，革新派積極侵略的主張和舊財閥保守的鬥爭，這是他們力量的一支柱。而以貿易金融與輕工業為主的新財閥，也日益展開反所屬官僚統制的鬥爭。

(四) 日本軍需生產的停滯

然而從一九三九年秋季以後，日本經濟的軍需景氣受了嚴重的打擊，生產力開始下降。於是，日本經濟結構隨着時局的變動，和生產力的停滯開始了新的變化。

由軍需景氣走向生產力停滯。一九三九年的下半年。例如一九三九

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的「經濟學」說：「等到事態經過了是處境困難，材料的不安，任何方面都感到非常濃厚。特別是歐戰爆發以後第三國對我國需要的供給，極感困難」。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東京日日新聞社論也說：「我們雖然沒有自由可以明析地檢討生產擴充的義務如何，但是戰時的關係，生產擴充方面已全面的失敗」。到了一九四〇年二月日本生產額落更為嚴重，二月以後雖有若干回復，可是始終未能恢復戰前停滯的趨勢。日本生產力停滯情形如下：

年 月	總指數	生產財指數	消費財指數
一九三七年六月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三九年八月	一一二、七	一一六、八	九一、五
十二月	一〇三、六	一一五、五	八五、八
一九四〇年六月	九七、四	一一〇、四	七八、一
六月	一〇三、一	一一一、九	七五、〇
八月	一〇六、三	一二六、五	七六、一

註：九月以後日本生產力指數禁止發表

從上述表格看出，不僅「消費財」（即輕工業）的生產額劇落，而嚴重的重工業所生產的生產財方面，生產指數也在跌落。

這種現象是一個嚴重的現象。一九三八年日本在政府強制之下，新投入重工業資金達三十萬億日元以上，一九三九年對工業新投資達三十二億日元以上，這筆巨額資金的投入，却招致相反的結果，——生產力停滯，這是多麼的嚴重。

日本經濟生產力的停滯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最大的原因在於國際局勢的變化和中日抗戰的爆發，致生產原料的困難空前嚴重。一九三七——三八年經濟景氣建築在對中國戰爭「迅速決戰」的幻想之下，然而到了一九三八年已證明中日戰爭是長期戰爭，資源的巨量消耗，因此引起日本國內人士的憂慮。但最根本的還是國際局勢變化的影響。

日本是嚴格的資源主義，它的工業建立在原料對外依賴和產品對外輸出的基礎之上。從原料方面說：中日戰爭前一年的情形，日本自海外輸入的原料，橡皮等項和鐵的廢棄品四〇〇%，石油九〇%，鐵礦石八五%，大

麻黃和亞麻八七%，鐵礦七五%，錫七一%，鑛六三%，銅五九%，棉花四〇%，糖三五%，紙二五%等等，這些原料依存海外輸入的情形，中日戰爭後並未變更。

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了，二十年前第一次歐戰時的「神風」並未重臨日本，相對於歐戰時的戰爭，軍需原料的統制更嚴，日本取得資源更困難了。尤其其是盟軍對美國的海運和對存貨空，一個最大的資源與市場，從此喪失了。歐戰與英美對日政策的具體化，不僅使原料來源成問題而輸出市場也陷絕境，南洋歐洲乃至美國南美洲這些日本經濟的命脈皆漸漸地斷絕了來往。

形成日本生產力停滯的當然還有內部的原因。一方面其連年盲目的軍需景氣，產生一種水腫現象，當原料資金電力等困難驟來時，很容易破綻百出。另一方面，則在舊財團在反抗統制中的消極鬥爭和官僚統制的破產，也加速了經濟恐慌的到來。

（五）大金融財團資本的膨脹

在日本經濟陷於困難之中，正苦於無由得救的時候，中小工業首先迅速崩潰了，新興財團也接連在困難中倒閉，舊的財團便乘機，以最低廉的價格收買股票，開始了「轉向」於軍需生產，因之一天天膨脹起來。日本政府因困難形勢底下，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對英美的壓力屈伏，一是準備擴大戰爭奪取資源，來發展日本帝國主義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軍部選擇了後者，因此爲了擴大生產以應付更大的戰爭，日本政府不得不利用權力來支持金融資本家，軍財「抱台」的進一步，在這形勢下建立下基礎。

日本十六家大財團資本的膨脹如下：

一九三六年	一九四〇年
A	B
三井 三六七	四三三
三菱 七三三	四三三
住友 五〇三	三六六
安田 四一五	九三
	四五六
	一一八
	六六〇
	七五九
	三〇六
	七二一
	五六一
	二九五

國野	二二六	一八〇	九七	二六	三四一	七一
德澤	二六一	八	五一	二四六	五七	一〇九
古澤	七七	二二	三三	一〇二	三九	一三
田村	七二	四五	一〇	六七	六五	一〇
大倉	二〇一	三	一〇	二六八	一九	一〇
野村	六七	六七	二二	七〇	六七	一六
日書	五七〇	六八	一	〇八二	一〇五	一〇
山下	七三	二	三三	二八五	二	一〇
森	八七	一〇四	一	一四二	一	一〇
日書	二〇八	六五	七〇	三六〇	六六	九四
日書	二五	一	一	一八八	一	一

我們從這一資本膨脹的表中，最顯著可以看出，雖然只是到一九四〇年為止，但財閥資本膨脹的速率，仍以大金融財閥三井三菱住友等為最。這原因，一方面是大財閥在輕工業向重工業轉移中，因其工廠設備高價較中小企業為昂，所以在輕工業日趨不利形勢下，它所受的損失最少。例如在物動計劃之下，一九三九年春季因禁止非必需品製造而受停工停產達一千一百餘廠，棉紡織業幾乎全部停頓，但大公司如三井系的錢瀨及東洋紡織會社，住友系的倉敷，三菱系的富士瓦斯紡織會社等，都很快轉變為軍火製造廠。中小工業的命運就完全不同了。它於無法掙扎之餘漸漸被大財閥所鯨吞，工廠合併的趨勢就非常迅速的發展。

年	度	合併廠數	合併各廠資本總額
一九四〇年上季	六九	一、八〇二、三五三、〇〇〇日元	
一九四〇年下季	一四三	二、〇九三、一四三、〇〇〇日元	
一九四一年上季	一七二	三、〇三二、七七〇、〇〇〇日元	

這種合併的趨勢是異常快的增加。一九四一年下季雖沒有具體材料，但從當時的報導看來，也顯而易見。有九家打鐵公司（一家，二十七家機械工具製造廠合併成爲長原和機械工業會社，六家鐵鋼公司合併爲一家，九百零五家鐵鋼成五十家。這種合併的情形，也同樣流行於金融部門。據日本財

政當局報告，商業銀行由一九四〇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間，共計二十二家。

這就其金融大財閥合併的表現。這也表現在對新興財閥的吞併上面。

(六) 新興財閥的興起到沒落

儘管新興財閥在二戰前，正處在一九三二—三五五等之間，日本國內經濟還處於嚴重的人反財閥的恐慌之中，暗潮洶湧不絕。這時候，新興財閥在軍部支持下漸漸興起。鮎川、山口、古河、淺野、藤田、久原貞島、安川、森等名字不斷出現於報紙上面，這真是新興財閥的黃金時代。

這些新興財閥的發跡，起初也未脫與舊金銀財閥的聯繫和支持，因為當時環境極端惡劣，舊財閥不得不作表面撤退。這關係久原之與三井，安田三井支持鮎川、森、日產之與三井等等。但因新興財閥在軍部支持之下有了很大發展，這發展形成了它的獨立性。所以在過去大財閥與軍部鬥爭中，新興財閥是站在與舊財閥對立的支持軍部大擴張的軍部方面的。現在由於舊金銀財閥趨於沒落，新興財閥的「轉向」以及經濟恐慌的深入影響到新興財閥的基礎，隨後也不得不屈伏於有金融資本支持的舊財閥。從一九四〇年年底起，新興財閥漸漸被併吞。

一九四一年四月號的經濟知識雜誌：「新興財閥之消滅過程，逐步進行，現已趨向於消滅的階段。」：「來到徹底整理階段。換言之：新興財閥對時局的作用，已達飽和點。如仍本舊來的方法，不僅不能保全自己，且對整個生產大進擊亦將入於極大障礙之階段。」

「在此短期內，對舊財閥之消滅發生顯著之吸收，合併，收買頂讓等作，對財閥組織日益擴大。」：「在進行國家至上命令之擴大生產一專中，担負此任務之大財閥受其地大資本家之作用，將發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道，故國家對財閥大財閥及大資本家之結合，將趨趨密切。」

「從東亞重化工業廣水淺淡的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財閥，忽忽呈現向重化工業大規模發展之動態，足可證明此種動態之根據。」

以上均見一九四一年四月號經濟知識

金融財閥一手打倒了中小企業，一手打倒了新興財閥，掌握下整個經濟中心，實行日本戰時經濟機構的全部改編，獨占資本的勢力依然支配一切。

今天代替、理研等毒氣大王地位的已是三井的「電氣化學會社」了。

大財閥獨占資本的發展，是戰爭發展的必然規律。國際形勢對日本法西侵略者的不利，使他們要熱中於擴大戰爭。三國同盟是日法大戰的借號。不久以前自殺的中野正武當時正在日比谷公園大喊其「中國事變要在世界範圍解決」。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法西軍部代官人馬淵大佐說：

「美英兩國事實上等於對日宣告經濟作戰狀態，因其封存在資金及採取南方包圍政策，以致我國生產與消費有喪失均衡之虞。故日本必須考慮突破此種包圍圈。如虛渡時日，即將使日本於不知不覺中陷入危局」。

日本法西軍部與政客要與英美包圍圈，便準備新的戰爭，便得克服經濟生產的停滯，便得在生產政策上從所謂「獨占主義」改為「重占主義」，把生產更依賴於技術優秀的工廠，因此便不得不轉而與舊財閥妥協「抱合」。由政府的力量來加速大財閥獨占資本的發展。

(七) 獨占資本披上政權的外衣

在金融財閥獨占資本發展的過程中，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日本政府通過了經濟新體制要綱，一九四一年先後成立各業統制會，這是劃時期的事件。日本產業集中的形式由此完全樹立，財閥掌握了統制的實權，政府付予以集中統制生產分配及消費的大權。倫敦「經濟學者」評論說：「這個計劃當其出現之日，已被大加刺圍，原來計劃設立的公共統制體制，現在不外是私營的加添爾換上一個名詞罷了」。

各業統制會的先後成立，這是財閥資本披上政權外衣的表現。各業統制會的會長，由政府授權具有支配其屬下產業的絕對大權，無論是資金原料的分配，產品的生產與消費的監督檢查，甚至屬下各產業人員的必要更動和合併都有權決定，而統治會長只對工商大臣負責。這正如日本官僚左近 正三所說：

「一個鋼鐵統制會會長，無異一個鋼鐵部大臣，一個石炭統制會會長，無異是一個石炭部大臣」。這是完全恰當的說明。

大財閥統制會，這是只要分析一下各業統制會的會長的出身，就可以一目了然。如鋼鐵統制會會長平生三郎是三愛人，石炭統制會會長

橋本健次郎，係三井人，海運統制會會長大谷登原，乃三菱「日本郵船會社」經理。

統制會之所以完全在大財閥手裡，這是由於統治會條例，只允許大的企業參加。譬如石炭統制會來說，規定凡每年生產量超過三十萬噸的大企業才有資格參加，日本產煤在每年產量超過三十萬噸的只有二十六家，倘有不足三十萬噸的六百家都不能單獨以會員資格參加。日本政府把全國分成七個區，每區的中小煤礦業只能連合以團體會員資格參加。不惟這樣，統制會所注重的（因為重占主義經濟政策的實施），特別是年產五十萬噸以上的煤礦公司，此類公司有十九家，佔全國產煤七七%，從全部財閥所有，三井、三菱、住友三三即佔全國產煤半數以上。誰能與之競爭過皇國呢？

經濟新體制成立後，獨占企業支配了整個日本的國民經濟，中小企業更迅速的被擠，日趨沒落。許多和平中小企業，在原料資金困難和政府禁止非必需品製造下，走上沒落的道路，而那些中小軍需企業，平日尚能苟延殘喘，至此在政府政權壓力底下，大踏步走上被財閥優待企業併吞的道路。它們從前能由於巨大軍需工業未擴充的條上下，大工廠以不利的部份讓小工場承包來發展其包工工場，操具一時，現在由於形勢的變化，它不得不買一倒，或為大財閥軍需工業中的一小部份了。日本論客清水正道說：「一面維持中小工業，一面擴充生產力是矛盾的。過去的政策意在維持中產階級以及國民中間階級，大體上也是合乎道理的，不過現在特別需要他們以大工業從業員的資格，作為國民的中堅，作為強兵的基礎」。 (見中央公論五月號)

中小工業者從此真正陷入無底的深淵，一千二百七十餘萬的中小工業工人以及連他們家屬計算，不下四千萬人的生活，陷於絕境。

中小工業的破產，只是大財閥的巨額利潤建立更大的基礎。大財閥由於披上政權外衣，掌握生產行政統制權限制了工資，更能憑藉其金融資本和強大生產技術，陷中小產業於死地，而獲得豐厚的戰時巨額利潤。

執掌實行經濟新體制的美濃部會說：

「計劃經濟並不否定利潤，因為他們所據以建立的那種各部互相調和的經濟計劃，原包括軍需生產的擴充在內，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替軍需生產增加可能獲得利潤的機會。否定利潤，不啻阻撓生產的擴充

和國富的增加。所以根據內閣決議案規定的辦法，即重要商品價格的估計，應以中廉生產費並加適當的利潤為基礎。」

儘管軍部高喊「排除資本主義的營利主義」，儘管「職權率公」的口號震天價響，但統制會的经营不排除利潤，不僅不排除利潤，而且由於所謂生產價格「應以中廉生產費並加適當利潤為基礎」的規定，對於大財閥的生產更有利，獲得利潤更多，這是必然的，因為大財閥以其生產的集中，資金的活動，技術的優良，無論如何生產費要低於所謂「中廉生產費」。

經濟新體制實施後，特別保障了財閥的利潤，這一方面是由於政府的保息的實施，另一方面法規中只有限制分紅的規定而無限制利潤的立法。一九四一年八月修正法規中雖然說：「任何公司分配紅利，除經政府許可外，一律以八厘為限」，但這種限制紅利的規定也是具文。當經濟新體制實施後一年，日本政府根據所謂「不以突然變更擾亂產業界」為理由，對於申請在法定以上分配紅利的公司，很隨便的即予批准。在一〇八二七件申請案中，只有七四七件遭否決。財閥資本之飛速膨脹，乃勢所必然的了。

(八) 國家獨占資本的性格

日本獨占資本的發展，從本質上說是大財閥的獨占資本支配一切，但從其表現形式來看，確是以國家獨占資本的形式出現，這是由於軍部上層與財閥的「抱合」，財閥的被上政權外衣與政府密切合作之下必然的發展成果。這種國家獨占資本的發展，一方面是更使資本與產業集中，財閥的獲利更厚，另一方面也是說明政權與財閥的結合更深，軍部與財閥的關係更密。

國家獨占資本的發展，是採取如下的兩種道路，一是國家資本的飛速發展，其二是財閥資本的加速國策會社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種趨勢是更明顯了。

隨着中日戰爭的發展，日本的國家資本迅速走上膨脹的道路，我們拿一九三六與一九四〇年的比較來看，列表如下：

社數	1936年		1940年	
	公資	實資	公資	實資
直采	39	1,160	916	57
中繼	5	85	68	10
			186	110

種類	2	28	18	21	115	78
總計	11	167	93	30	420	285
附註一	31	1,188	888	39	2,893	1,473
附註二	2	83	45	41	1,179	872
附註三				10	1,692	1,803
附註四				40	1,458	825
附註五				75	1,119	637

附註一、直系包括：(日銀、正金、勸銀北拓、東拓、日鐵、滿鐵、帝器、北神礦、北神石、通運、國際電、南拓、大日航、樺太開、發送電等)。

二、台灣包括：(台電、台拓及其子會社)。

三、南洋包括：(南洋實、南拓子會社)。

四、朝鮮包括：(鮮銀、殖產、信託、中央無盡、米谷倉庫及子會社)。

五、中國包括：(華北開發、華中振興、蒙疆銀行、中聯華興及其子會社)。

六、統制包括：(東北興業、日本產金、帝燃、礦務、日本石炭、帝石實振、日本肥料、米穀、木村帝國路)。

附註二、此表引用自「國際」。

從上表看來很清楚，膨脹的趨勢是國內(直系)和佔領區的同時增加。這種國家資本的膨脹是有兩種原因所促成：從國內國家經營企業的膨脹來說，是由於政權的運用，舉例說日本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皆擁有大量發鈔權，自銀行法改變後，這種發行權更為擴大。興業銀行與勸業銀行皆有發行公債十倍至二十倍的特權並應政府最低紅利的保證。至於佔領區特別是中國佔領區的日本國家資本的發展，全靠現物的掠奪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南洋廣大佔領區的獲得，以現物掠奪為資本的國家資本當然要更發展了。

但是我們特別應該注意的倒是太平洋戰爭前後，特別明顯的財閥資本與國家資本的強度結合，表現為財閥資本的國策會社化。

我們從具體的事實來觀察這一趨勢。從上面所說國家資本直系企業中，如「日鐵」，雖然國家擁有大資本(國營八幡鐵廠是其基礎)但財閥資本大

並投入了。一九四一年五月的日鐵股票，三井擁有四〇二、九〇〇股，三井擁有三九四、〇〇〇股，三友擁有一四八、六〇〇股，古河一三〇、〇〇〇股，安田一二四、三〇〇股，彼等的代表均參加日鐵的董事會。日本發送電在三井控制下。又如特種一項國家企業中，「帝然」有三井三愛住友三大財團的大量資本，會一下投入一億四千多萬，「日本產金」在三井控制下。「帝國醫藥」在三愛手中。

至於佔領區中日本國家資本的發展，同樣與國內情形一樣。滿洲的資本與經營，全掌握在久原鮎川之手這可見與大財團的關係之深。中國淪陷區的國家資本的發展如「華北開發」，「華中振興」兩大會社日本政府以現物出資一半，另一半全由三井三愛投資，而其經營權，完全落在財閥手裡。例如「華中振興」的總裁前任為兒玉謙次，現任的高島菊次郎，皆為財閥代表。

日本佔領南洋後，據密勒士報不完全的統計，投資的三分之一，全控制在財閥三井三愛手中。日本統治者不允中小企業往南洋去。在菲律賓的日軍行政顧問村田說：

「中小企業不能實現滿意的經濟發展，南洋的經濟事務要交給大公司。只有大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的工具和幹部完成這種工作。所以戰爭結束時，才能許可小企業到南洋去經營事業。」

「九一八」事件後的軍部拒絕財閥資本進入滿洲，現在軍部不得不依靠財閥，支持財閥去發展佔領區的經濟，這確是一個大的變化。

反財閥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假如說過去的大財閥成為侵略戰爭的中堅力量，現在財閥早已成為侵略戰爭的全盤支持者，戰爭帶來了巨大的利潤，大大地膨脹了自己。軍財對侵略戰爭這一點上早已一致了。

軍財的一致，不僅僅是對侵略戰爭的目標一致，而且在經濟上也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軍部竭力的支持財閥，使財閥的資本國家社會化，財閥資本與國家資本合而為一，使財閥膨脹自己的過程中，加強利用政權，頒佈徵工徵用令，以高度對日本勞動者的剝削和軍閥在戰爭中的掠奪成果自肥。這樣肥了財閥也同時肥了軍閥。這正如日共中環岡野進對日本國民黨中所說：

「而軍部呢？雖然喊着『排除資本主義發利主義』，但實際上却勾結着大軍閥財閥，直接間接分享着他們的利潤。譬如東條大將的兒子及弟弟，就和三愛川崎等軍需財閥勾結在一起，就是一個例子。其他大小軍人，在日本

、朝鮮、台灣、滿洲、華北、華中、南洋等地，從財閥那裡獲得很多的好處，也是公開的秘密。現在國民生活的一切，都受受嚴格的統制，但只有資本家的利潤是例外的。就從這一點也可以洞悉軍部財閥的勾結。」

東條政權，就是建築在軍財「抱合」的基礎之上，他藉政府的名義和權力，以擴大戰爭與加緊對人民的統制來為大財閥的獨占資本服務。東條政權恰恰表現日本真正的法西斯政權的實質。

(九) 向針尖狂奔

隨着太平洋戰局的發展，日本由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夏季的勝利，走上戰爭的頂峰，戰局長期化的趨勢益趨明顯，而納粹在蘇境的挫折，美國龐大生產力的發展影響了日寇統治者。為了應付未來盟軍強大的反攻，它必須加緊擴充軍需生產。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號收造登載松前重義一文說：

「羅馬帝國所代表的歐洲時代，是地中海的時代，英國所代表的時代是大西洋時代。地中海時代與大西洋時代之間科學技術上的相異，一個是海上帆船國上人馬的時代，一個是海上蒸汽船，陸上火車的時代。……新的歷史時代的創造背後，常常發現以這種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其基礎，今日我們是深深體驗到了。」

今天的時代是轉向太平洋時代的陣痛時期，……太平洋時代，至少應於更高的科學與技術水準上更強的生產力來幫助產婦的陣痛，孕育新歷史時代的嬰孩，這樣的生產力，在目前是支配日本歷史與亡國路的根本問題。」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本八十一屆議會席上，代議士小泉於提出所謂增強總力戰的提案時說：

「近代戰爭乃消耗之消耗戰欲在龐大的消耗戰中獲勝，則必須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始克有濟。故今年能否增強戰力，實為決定大東亞戰的關鍵。」

擴充生產力的需要，隨着戰局的變化，既已如此強調提出，而實際上生產的業績，却是相反的又陷於停滯狀態。這表現在股票的跌價上面。一九四二年九月到十二月，與政治氣氛最有關的「新東」，從一百三十餘元狂跌至百元以下，陷於極度混亂，日政府不能不乾而干涉。表示海運業的「新郵船」由九十餘元跌至七十餘元。和平產業股票跌價更不用說，就是政府每年

以鉅額資金津貼的置化工業也形勢不可樂觀。「日鐵」「滿鐵」「滿鐵」皆有跌落。

生產力的停滯與生產力擴充的急需，表現一大矛盾。這必然引起了日寇統治階層內部的鬥爭和必須的變革。

這變革採取了如下的幾重步驟和辦法：

首先是擴充生產力的政策，由重點主義，進一步發展為超重點主義。一九四三年春八十一屆議會，決定了以煤、鐵、輕金屬船舶航空機五種為超重點生產，由政府集中全力於扶植這五大生產的擴充。六月間八十二屆議會更進一步實行「企業整備」。

從超重點生產與企業整備的政策實施，表示日本政府將以金融措施、勞務對策及廢鐵收回三問題為中心。根據超重點生產的原則，日本政府不惜犧牲其它工業生產將生產資金與勞動力的轉移來加強投放於三大超重點生產，同時並澈底的「企業整備」的名義將中小工業的機器拆毀成為廢鐵，以用於五大超重點生產。日本顧客土屋清在一九四三年四月號的中央公論上就早已說出了：

「在超重點生產中，鋼鐵所佔的地位極其重要，而我們為了確保鋼鐵生產，惟有賴於收回廢鐵。因為我們要利用南方的鐵礦，必須大量的船舶以便輸送，但造船又必須用鐵。……關於此事，如果着手整理各工廠的機械，就是大量求得廢鐵的一條捷徑。所以首先對和平產業進行大規模的整理，積極的求得廢鐵，乃是「超重點生產」的大前提。」

由於超重點生產的實施，中小企業變成爲一具具屍首，大財團一步步踏過去，使他們的獨占資本愈向針尖上昇。

(九)「國家資本主義」的面貌

從法西斯金融資本獨占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在戰爭的基礎上，是必然的，納粹走的是這樣的道路，日本也走上同樣的道路，到一九四三年底，已經益明顯了。在日本，正如前面所說，由於財閥資本的趨向國家社會化，財閥資本與國家資本的聯結，本已爲這一道路鋪上良好的基礎。

日本法西斯「國家資本主義」的最特徵的表現，是政府對經濟行政控制權的擴大。從這一見地我們來觀察最近一年來日本統制經濟的演進。

日本八十一屆議會通過了「戰時行政特令法案」和「許可認可臨時特種法案」。根據「戰時行政特令法案」第二項所規定：「於必要時，對重要軍需生產擴充有關的勞務資材資金動力等職權的一部，由總理大臣親自執行之」。這樣一來，使軍需的獨裁權增大了，並解除了過去的生產行政執行的一部份阻礙。譬如過去日本日常生產行政管轄分枝，資材屬於商工省，勞務屬於厚生省，資金屬於大藏省，電力屬於遞信省，陸運屬於鐵道省，工廠基地屬於內務及農林省，統屬分立，形勢生產，現在經由這條獨裁權的擴大而解決。

十一月間，日本八十三屆議會又決定戰時行政機構進一步的改革，最要的是設立軍需省，(由東條兼任大臣)取消企劃院，同時又頒佈軍需省法案。軍需省的成立，是一方面解決了所謂統帥部與政府高度的關係，使經濟發展與戰爭的發展密切配合。而東條一再強調的政府與統帥部的關係具體化，由此達到了。至於軍需省法案，則更使政府對軍需省的統制權加強。由政府指定生產，嚴密管制業務，資金轉讓等等。必要時可以停頓和凍結執行生產不力的工場主和工人，不讓這樣自，日本內閣修正指令，改訂實施用工場主以後，財閥如大河內正敏、鈴木忠治、豐田貞次郎等數百人皆被徵用以「軍需士」地位爲生產努力。所以軍需省法案的頒佈使政府對軍需工業的統制權更爲加強。

一方面是由於政府統制生產機構的統一，另一方面由於資金勞務以及勞務管理，使國家管理生產的形式完全形成。日本統治者在企業整備的時候，曾有過如下的宣佈，正是表明這一趨勢。

「這次企業整備是帶着清算折衷辦法而來的，國家將由「脚色戲」的立場，進而成爲担当全部責任的「演出者」。

東條獨裁權的擴大，生產的國家管制化，這便是日本法西斯應付戰爭需要而擴大生產的要求之下，走向「國家資本主義」化的表現。但是儘管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出現，本質上仍無改於財閥獨占資本與軍需的共同利益的勾結內容。法西斯的「國家資本主義」恰恰更爲大財閥的利益服務。

日本廣大的勞動者因國家管理的強化和徵用令的實施，生活是更趨困難。成千百萬的勞動者在徵工令之下轉轉於礦穴中或途上，成羣的死亡。所謂「適正配給」「決勝儲蓄」之下勞動者的待遇更趨惡化，全部陷在飢餓與死亡。

隨着日本統治者的喉舌本位群臣男是怎樣在要求着日本廣大人民：

「缺乏衣料的狀態，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愈形緊迫，在沒有適當解決辦法之前，日本人民必須堅苦忍受。」

「一升米的效用，並沒有超過三合米的效用。目前分配人民二合三勺米，這完全是爲國家打算，儘可能地有效使人民消耗米糧。多給人民一些，只不過如人民用水一樣，徒費之於洗臉洗衣服洗澡，毫無預期效用。因此日本人民應該知道，分配人民以二合三勺米，完全是一種提高米的效用的手段。」

「日本人民要權力忍耐一切物品的缺乏，達到儲蓄二百七十萬萬元的目標。」

「所有從事生產者，不拘是專精生產業，不拘是三井三菱等大工廠，也不拘是最低微的工作，處在今日，全是爲國家利用，決不斤斤於私利私益。」

這就是日本人民生活的反映，這也足以證明在國家的名義之下，日本統治者更可強迫勞動者在極惡劣條件下勞動，因爲這是「國家」的需要呀！

國家管制的實施恰恰說明在國家的外衣之下，使大財閥更多吸取勞動者的汗血膨脹自己。

(十) 幾句結尾語

從日本獨占資本的發展中，已可能解答一個問題，就是法西斯極端派的必趨沒落。這批人的經濟基礎是依靠新興財閥和中小企業，而獨占資本已無情地吞併了他們。所以法西斯極端派份子的道路只有二條，不是向大財閥投降充馬前卒便只有自殺一條路，中野正剛就是例子。石原莞爾橋本欣五郎之類，今天的聲音是愈來愈微弱了。這批人的命運，恰如明治維新時武士的命運一樣，歷史注定了他們的命運是沒落。

其次，東條政權，不管他在經濟上獨裁權如何加大，他所代表的軍部法西斯右翼，是一貫走的與財閥妥協「抱合」的道路，爲大財閥利益服務，在財閥支持下造成日本法西斯政權。由於這使東條政權當政一年而未場台，其壽命之長，即中日戰爭以來（甚至更早日本內閣總理）的先聲。

再次，由於日本獨占資本的發展，一方面使日本廣大勞動者生活更陷於

悲慘，另一方面使數千萬中小企業破產，反軍部政權的統一鐵線的源泉與力量是更擴大了。日本今天反軍閥的鬥爭，已更廣泛的形成人民陣線的性質。最後，由於日本獨占資本的發展和更趨向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和生產的高度集中，這正如列寧所說，這已爲日本勞動大衆的解放，形成了物質的基礎。

一九四三、十一、三十完

特 價 書	
俄英字典	原價四九〇〇 特價三〇〇〇
塞巴斯托波爾 激戰的日子 (俄文)	原價二八〇〇 特價一五〇〇
偉大愛國戰爭 (俄文)	原價九〇〇 特價五〇〇
巴黎之陷落 (俄文)	原價七〇〇 特價四〇〇
列寧選集 (中文共五冊)	原價六〇〇 特價三〇〇
列寧主義問題 (中文)	原價四〇〇 特價二〇〇
什麼是人民之友 (中文)	原價三〇〇 特價一五〇
復仇火焰 (中文)	原價二〇〇 特價一〇〇
在皮特撒姆路上 (中文)	原價一〇〇 特價五〇

精裝本 普及本

新華日報圖書課

日本帝國主義與太平洋戰爭

——原文載「戰爭與工人階級」第二期

蘇聯歷史學博士 茹科夫作

茹 純譯

太平洋上的戰爭，已經進行了一年半了。在這個時期內，會發生過很多事，東南亞洲的形勢在許多方面都改變了。日本軍隊已經佔領了許多重要的土地，奪去了菲律賓，越南，馬來亞，緬甸，日本軍閥走近了印度洋。日本的海陸空軍曾經企圖在澳洲的外圍站穩腳跟。

某些神經過敏的觀察家得出了匆促的結論，說起日本帝國主義力量了不起及其不斷的地長。有些人拿日本所暫時佔領的土地面積來估計日本的真正實力。

讓我們來看看太平洋上現存的和一般潛在發展的軍事的情況吧。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突然襲擊美英兩國以後的最初六個月內，日本曾經在太平洋上獲得了很多成就，佔領了廣大土地。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第二階段的這些勝利是怎樣獲得的呢？這些勝利的獲得，是否日本軍力優於美英兩國為結果？是否日本比它底敵人——美國和英國在實際上還更強大？

要詳細地回答這些問題提出來，就可以立刻暴露某些人士在左祖日本帝國主義友誼關係的判斷的虛妄性。

日本曾經在太平洋戰爭第一階段獲得勝利，然而這些勝利，却是由於日本所佔領暫時擁有的便利條件，只有過渡意義的因素而形成的。

首先一個因素，就是日本打擊的突然性。日本偷偷地準備了對美英兩國根據地的進攻。日本的外交活動，在其日程上，曾經有意識地引起美英兩國錯覺，使其完全相信日本愛好和平，當日本武裝力量還沒有處在完全的作戰準備之中和沒有逼近美英根據地以便進行突襲的時候，一直把談判拖下去。

還在太平洋戰爭開始的很久以前，日本武裝力量就曾經踏上菲律賓，

定遠馬來半島，襲擊暹羅和泰國。自然地，這就在戰爭的第一個月內，給了日軍統帥部對美英兩國以廣大的便利，因為同盟國還沒有在太平洋的熱帶區域配備怎樣龐大的軍力。

日軍統帥部擁有大量海空軍作戰的頭等根據地，毫無特別困難地就佔領在比較不太的前線上的臨時集中大量的海軍和空軍。而同時，美國和英國的艦隊則被散佈在廣大的海面上。

太平洋戰爭一開始，日本軍部就把它底主要的謀略放在敵人的毫無準備上面，放在突然打擊的效果上面，放在英美遠東領土——從它們中最大部份接近日本這個觀點來看——所處的不利的地理位置上面，事實上，英國在華南的主要根據地——香港，早在戰爭開始以前，很久就被日本包圍了。菲律賓被荷蘭在日本的半島國內也已佔領很久了。日本軍隊的佔領越南，維琪法國行政當局的變成它底同謀犯，日本人在泰國的出現，就創造了必要條件來從後方進軍和從陸上佔領不列顛最重要的海上堡壘——新加坡。

所有這一切總合起來，就保證了對日本有利的形勢，而這一形勢又使美英兩國在太平洋戰爭的最初六個月內遭受了嚴重的軍事失敗。

然而，半年後，就變得對美英兩國有利了。對日本破題第一道威脅的警告，就是十九四二年的春天和夏天在珊瑚海和中途島發生的大海戰。

日本艦隊在這些戰役中所遭受的嚴重損失，就是意味着，美國和英國已從背信棄義的打擊的後果之下恢復了過來。把自己的後備力量漸漸動員起來，他們就使自己的陣地完全改善了。太平洋範圍內海戰的發展，證明了美英兩國並沒有喪失對日本艦隊的優勢。還在太平洋戰爭第一年的年底，日本所擁有的暫時優勢就消滅了。日本攻勢的暴風雨是完結了。在緬甸北部盟軍也使

日本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在澳洲的遙遠外圍展開了緊張戰鬥，在所羅門羣島和新幾內亞，採取了特別猛烈形式，最後是日軍軍隊的撤退。

在一九四三年五月，日本企圖圍攻它在北太平洋的便於未來積極作戰的根據地，遭受了嚴重的失敗，美國軍隊在阿圖島把日本人趕走了。對於阿圖島，可以說，勝利的日本軍隊未免太早就冠以日本的名字。

所有這一切，就是表示日本人不久就遇到了嚴重的猛烈抵抗。更加證明日本毫無能力把戰略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目前，在日本國內，正以高漲的驚異來觀察軍事發展中的一般的趨勢。日本無論在那裏都轉入了防禦。東京已經開始對戰爭過程中所掠奪的土地的非常不穩固性。所以，自然地，日本帝國主義今天所最關切的就是怎樣保持那樣廣大的地方，當這些地方還在日本手中的時候。爲了這，日本所力圖採取的不僅是軍事手段。

還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很久以前，日本就創造了一個理論，說是東亞各民族享有政治經濟文化的共同利益，會經發明和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

日本很早就計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建立對各國和各區域的統治。這些地方首先是中國，法屬越南，荷屬東印度，英屬馬來，菲律賓。所有這些國家，連同日本一起，應該建立一個統一的「東亞聯邦」。而且，如一個日本報紙報導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就說過的一樣，東亞集團的邊疆一般地並沒有經過這樣確定不移。它們可以無限地擴張。更新近的日本計劃，明白點說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不僅只觀望上述的幾個國家，而且還觀望印度，澳洲，新西蘭，阿拉斯加以及其他國家。日本帝國主義更狂妄的計劃是企圖佔領蘇聯的遠東領土。

日本以「大東亞聯邦」內起着領導作用的帝國主義自負，曾在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國所簽訂的醜名四強的「三強協定」中首先公開表露出來。這個協定，會規定侵略國家爲在歐亞兩洲互相幫助實行侵略政策這個目的而結成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同盟。按照這個協定，日本負有義務承認和幫助德意法阿斯在歐洲的侵略，而德國和意大利則承認和幫助日本在遠東的侵略。

日本真的可以斷定德意武力就能佔領和保持「大東亞共榮圈」的廣大

區域嗎？

甚至就是日本軍閥中其侵略性的份子也沒有懷抱過這樣的幻想。儘管他們却希望他們的侵略能夠得到滿足，只要使得亞洲人民相信日本軍閥能使他們從英美之下獲得「復興」和「解放」。因而日本曾立意煽動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緬甸以及其他東亞國家人民底抵抗意志。尤其最近日本軍閥在這種宣傳得到成功的情形下日本得以利用部份土著人民，比如印地安人反對英美。

日本用盡了一切方法來爭取勝利，企圖藉藉這作地挑撥起「黃種人」和「如居住在荷印的馬來人底種族的仇恨，來反對「白種人」——英國人，荷蘭人，美國人。日本企圖使他所佔領的各國人民相信，他們——日本人——是中國人，馬來人，菲律賓人，緬甸人以及其他一切民族的「同胞弟兄」，都是屬於黃種人。

還在它底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年代，日本就曾利用它底這種種族政策來掩護它，宣稱「援助」朝鮮從奴役的鎖鍊之下獲得「解放」。在一八九九年「九四年，中日戰爭的前夜，某些朝鮮人士會相信日本真的期望朝鮮獲得解放。幾年以後，日本就把「解放」了的朝鮮編入了自己的殖民地。

在一九三二年，日本在滿洲製造了一個新的「國家」——「滿洲國」。宣佈了它底「獨立」。事實上不是這樣。滿洲充滿了日本軍隊，所有行政經濟的重擔都無例外地操在日本人的手中。坐在滿洲國官員大官們——滿洲本地人聯運的是實際的統治者，隸屬日本關東軍的軍官，官吏和警察。在滿洲日本佔領了中國各省，情形也是這樣。日本的奴僕汪精衛在滿洲南京，自居於「中國政府」的領袖地位。而實際上他做一切事情都要聽從日本顧問的命令。

日本人說日本跟滿洲國與汪精衛傀儡政權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親善」，依照這種親善，他底想在遠東建立「新秩序」。

日本人硬說他們在遠東進行戰爭是爲了「大東亞共榮圈」的緣故。日本帝國主義認爲只有廣大的和保衛「汎亞細亞洲」這種藉口才有可能在東亞建立「新秩序」，即所謂新的廣大的殖民地帝國。「大東亞共榮圈」——這就載於日本政府文件中的日本殖民地活動的方針——從本質上說，是「南大亞細亞」，用來煽動作爲日本侵略對象的人民底抵抗的。在日本的「新秩序」的版中，殖民地所有者日本和它所奴役的人民之間的關係被描寫成爲不平等

「種族來源」不同所規定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一樣，而相反却是充滿了友誼合作與「共榮」精神的「同盟關係」——這與德國法西斯在歐洲的「新秩序」是不相同的。日本的「貴種人主義」不是從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種族來源」的差別性而恰恰是「種族來源」的同一性產生的。不可否認，日本帝國主義在這方面有點詭詐和陰險。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過剩的土地掠奪，在廣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日本廣泛利用了大亞細亞主義。如所週知，日本順利利用了東印度羣島、緬甸、印度支那部份人民對英美政策的不滿，並把這些地方人民的某些階層拉攏到了自己方面來。日本帝國主義還把不少的希望放在欺騙印度一定集團上面。

一九四二年春天，日本會特別設立了一個「大東亞省」。這個機關的任務實際上就是管理在戰爭過程中所佔領的全部土地，這些土地都是會應該包括在日本的殖民地帝國之內的。然而日本却企圖拿東亞人民「自願合作」這個公式來當做自己帝國主義的遁辭。

日本到處嘗試製造征服民族的「獨立自立」的證據。為了造成像南京汪精衛這樣的傀儡制度虛妄統治的錯覺起見，日本有計劃的組織了高級官員到其製造品那里去的鄭重其事的旅行，假借們假裝進行政治談判，簽訂協定和條約，這些對外條約的簽訂是用來造成一種關於「平等權利」這方面的印像的。

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亞不僅企圖鞏固舊的傀儡制度，而且企圖製造新的傀儡制度。比方說，感覺到自己在脆弱和單薄謀略的軍力不能站穩腳跟，日本軍閥就製造了新的細甸「政府」和新的菲律賓「政府」。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因為無論在菲律賓，或是在緬甸，都發展着越來越有力的反日游擊戰爭運動。日本知道自己的弱點並為求得在自己佔領的土地上根深蒂固起見而轉着無窮的變方法。

然而在所有被日本暫時佔領的土地上，真正的政權都是毫無例外地掌握在日本將軍的手中。阻礙着他們的是一些充當各財閥集團代理人的本國的顧問們，他們有計劃的進行着對被佔領各國自然資源的掠奪。

國內顧問們正竭盡全力加強對新獲得的而因此不穩的殖民地的掠奪。然而他們的努力却加深了國防武備的缺乏和在不穩固的企業中冒險投入大量資本的恐懼，這樣恐懼會從來就是日本大多數資本家的特點。

日本所暫時掌握在手裡的殖民地是屬於富有一類的。被日本帝國暫時佔領的土地中，尤其富有的是英屬馬來和荷屬東印度。比方在戰前，英屬馬來在錫的儲藏量及樹膠的生產量上都佔世界第一。荷屬東印度同樣在錫的生產量上佔世界第二位，在錫的儲藏量上佔世界的第三位，和在石油儲藏量上佔世界的第六位（荷印出產的石油比日本多十倍）。除此以外，荷屬東印度在茶和糖的生產量上佔世界的第三位。戰前，荷屬東印度出產了世界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世界香料產量的百分之八十。

佔領這些國家，日本就獲得了重要的原料和燃料的資源。然而這些財富使日本得不到充分的安全。英美軍隊在他們實行撤退的時期，曾把其島地內一部份有重要價值的東西加以毀滅和焚燬。一部份石油工業被毀了，礦山被抽掉了，電站，水塔，油管，水槽，機器也都被破壞了。

無疑的，日本無力迅速修復這些破壞。因此，絕對不能說，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馬來荷印緬甸以及其他被佔區域所出產的全部財富都紛紛轉移到了日本的手中。那些不少部份被掠奪的財富才落入了日本的掌握。

應該記得：在日本於一九三七年進攻中國以前，日本從中國得到的石炭鐵礦以及其他物資的數量，較之他在戰爭開始後從中國得到的並不多得多。在那些被日本軍隊佔領的中國各省里，一般的生產都大大地減縮了。

顯露，在又被日本佔領的馬來荷印和菲律賓，這種情形在程度上還要大些。在這些地方，有游擊隊在它們後方活動，阻礙了經濟的迅速恢復。

大家都知道，在戰前，日本工業依賴於原料和燃料的輸入。戰爭把平常運輸原料和燃料給日本的可能性停止了。日本進口貨物的大部份都是從英美及其屬地輸入的。戰爭不消說把交戰國間的全部貿易關係都割斷了。

然而這就是表示，目前日本掠奪的結果，還並沒有強烈地使形勢有所改變。從那些在他所暫時佔領的區域獲得的東西里，他們很難造成軍事原料與燃料的足量的儲備。這些儲備，至多只能從那些日本平常在國外從事國際貿易活動中所獲得的和戰爭開始時期所獲得的原料和燃料得到彌補。運輸的不暢，引起了日本所掠奪的物資價值經常的高漲。

一如從前一樣，日本在經濟力量 and 財富方面比它底敵人落後得多。日本國內所煉的鋼要比美國少十三倍。日本國內所出產的生鐵也比美國少十倍。日本國內戰前所採的煤也同樣比美國少十倍。就算日本也把荷印所有被破壞

進攻日寇的幾個方向

日 敦

過去人們在討論進攻日寇的時候，總是喜歡搬出非世賓，關島來，讓美國海軍空軍打下台灣，打下小笠原羣島，然後襲擊東京。再不然就搬出新加坡，香港來，拿英國海軍配合美軍一致行動。還有三種想法，是以東京四官邸的海參威做中心，轟炸機到東京跑個來回，於是日寇軍事生產完全毀滅，日本完了。

今天臨着日寇被清算的日子了。情勢也比較清楚，日寇靠着英美的熱心，兼括了南洋羣島，逼近澳洲。伸入孟加拉灣，佔領緬甸。英美在太平洋的一切前進計劃盡失，日寇的海上外國陣地到達赫爾斯島與吉蘭丹特羣島。在北方則與蘇聯訂立中立條約，並置重兵於德蘇邊境。

過去窮困的日寇，奪得南洋以後，有了較充分的作戰資源。在我東北多年的開發，也使實力得到些補充。日寇隨着多年來的傷亡慘重，但也仍舊是太平洋上強大的勢力，海軍作戰以來就沒有很大的損失，空軍力量也不小。日寇在太平洋的實力，既不能以長期作戰來消耗，又不是輕易可以摧毀。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有主張從中太平洋直搗日本的，有主張自北太平洋海空併進的，有主張自中國大陸把日寇推往海裡去的。

進攻日寇必須根據日寇的實力，必須打破日寇的防禦，奪回和佔領日寇的根據地。正因為日寇在海上外的防線那麼遠，在亞洲大陸上的防線那麼廣，日寇的實力又是那麼的分散和分佈的不平衡，所以進攻日寇的方向就顯得多而複雜。因此就有強調這一個方向的，有強調那一個方向的。就目前所存在的可能方向，有西南太平洋，中太平洋，北太平洋，自中國大陸進攻和自東南亞進攻幾個方向。現在僅就這幾個方向研究一下。

西南太平洋

對於敵人進攻，首先必須得有一個鞏固的根據地，能確保存大量的軍隊

，供應前方大量的武裝和給養，而又不怕敵人的威脅。澳洲，就是西南太平洋上這樣的一個根據地，經過長期的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羣島的戰鬥，而建立起來了。

但是很多人的懷疑，這個根據地距日寇本上太遠了，而且在通往東京的路上阻礙重重。新幾內亞所羅門羣島以北，還有新小列島羣島，加羅林羣島，馬利亞納羣島，小笠原羣島，這些都是日寇可以藉以防守的要塞。如果要從正面即從日寇的來路進攻的話，也有西伯利亞，菲律賓，到菲律賓的許多南洋諸島為絆腳石。並且從澳洲到美國的這一段海程也太長了，太平洋必須的作戰實力，包括陸軍，海軍，飛機，油料，和一切裝備物資，都要從夏威夷轉運，或美國大陸直接運來。從夏威夷到澳洲的海路，比夏威夷到東京還要遠。

可是事實又說明另外一面，英美在太平洋戰事爆發後，今日能掃出重來的，正是西南太平洋的戰爭。使英美能發揮其力量，而讓日寇感到危機嚴重的，也正是西南太平洋的戰爭。在新幾內亞羣島上，布納及哥拉納的佔領，薩拉摩和雷區芬港的收復，在所羅門羣島上，新喬治亞及我加阿爾小島上，敵人的肅清，布肯維爾島的登陸，都是英美奪取前進據點，反攻日寇的先聲。

過去為了所羅門羣島問題，曾引起熱烈的爭論。大家都感到西南太平洋的島嶼爭奪，打得太慢和太費勁了。美國的海長和羅斯福都表示過不能永久是「逐島戰爭」。但為突破敵人的防線，奪取前進必要的基地，要在某些島嶼上把敵人的驅逐或消滅是必需的。瓜達康納爾島爭奪了八個多月，的確是太長久了。可是攻佔所羅門羣島並不是戰略上的錯誤，而是美國沒有充分的準備，沒有真正拿出強大力量來。西南太平洋進度的緩慢，戰略地位困難是實情，但盟國在太平洋上的力量還不够十分充實，原因也很重要。

西南太平洋方面的進攻，必須是一個海陸空軍聯合的進攻。海軍要擔負護送軍在通往東京的重要島嶼上登陸，陸軍必須肅清島嶼上的敵人。前進據

點的奪取，為海軍獲得根據地，以便利艦艇的活動與作戰；為空軍獲得根據地，對敵艦隊及大敵飛機的有效消滅，以控制海面與準備繼續前進。這種海陸空軍配合作戰的運用，是日寇在戰爭初期獲勝的方法，也是英美盟軍在太平洋反攻必須採取的戰略。這個戰略的實行，要有完全能擊破敵人的海陸空三方面的優勢。前進的快或慢，這個優勢的大或小是重要的條件。

至於由西南太平洋前進的兩條路，穿過加羅林羣島直趨日本本土，或自新幾內亞西北進，先奪取菲律賓羣島，這不是什麼爭論的問題。後者所必需的陸地部隊或許更大一些，並且可以截斷日寇南洋資源的供給，但前者戰略的靈活性可能較大。中太平洋和東南兩方面的進攻，將與西南太平洋的前進取得配合。

西南太平洋進攻的方向，不可能是進攻日寇唯一的方向。因為通往日寇本土的路，雖不必以「逐島進攻」的方式打，但重要的島嶼，總是日寇可以據以頑抗和掩護時日的，要打日寇必須多方面的進攻。

中太平洋

有一種意見，認為盟軍不論在西南太平洋的進攻也好，中國大陸進攻也好，東南兩面進攻也好，都有點浪費，或是只能起很小的作用。打垮日本最簡便的方法是，集中優勢海軍於太平洋，消滅日寇海軍，直搗日寇本土。

太平洋戰爭已兩年的今天，美國的確已經有了超過日本的海軍實力。而且美國正在向日本海軍壓迫，可是日本海軍却始終未見主力出來。日寇並不願讓，它知道海軍出沒同優勢的美國硬拚，自己即不勝也要兩敗俱傷。

日本海軍完了，日本在太平洋上剩下的陣勢也全部完了。所以它把海軍藏著不出來，放在散佈於太平洋各處的羣島港灣裡，美國海軍如果離開根據地太遠了，或深入日本防衛圈裡去，它就可以選擇有利的洋面，一方面拿陸地起飛的優勢的空軍轟炸，一方面在英美海軍的後方交通線上打游擊。美海軍如遠離根據地，海上起飛的空軍雖能掩護，總不如陸上起飛的有力。如果空軍居於劣勢，海軍必受很大的損害。所以美海軍不敢冒險深入，而日寇又不敢冒險本海軍來。唯一的方法只有一步步的奪取前進據點，也就是對日寇防守的防線，由馬紹爾羣島，加羅林羣島，馬利亞納羣島，小笠原羣島，一節一

上去。這是中太平洋作戰唯一可能的進攻方式。

除小笠原羣島，距東京五百英里，是日寇海上的中堅防線以外，另外幾個散佈在中太平洋的羣島，總共就有一千四百多個小島，珊瑚礁還不算在內。而這些島嶼的性質全是珊瑚島火山島和兩者混合的島嶼，珊瑚島大多地勢低，一些輕型軍艦的天然港，地勢平坦，又是飛機很好的根據地。火山島地勢高，稍重軍艦，是許多天然的砲臺。所以一路攻打進去，也得費些力量和功夫。絕不是海軍單獨前進就可以佔領，也不是一下就可以把日本的海軍逼得出來。當然更不是美國優勢海軍在中太平洋一下就可把日本打得垮的。

中太平洋最使人興奮的是，最近美軍在官爾伯特島的登陸。這次登陸給中太平洋打開了一個局面。日寇海外防線已裂開了一條縫。馬紹爾羣島和加羅林羣島都受威脅了。

官爾伯特島美軍已佔領三個重要的島嶼，這是一個很成功的登陸戰。據美方公報，這一戰從敵戰鬥了七十六小時。敵人死亡六千。實際上這一戰最寶貴的價值，還在敵前登陸的組織上。這證明美國已經有了訓練優良的登陸部隊，海空軍與陸軍的配合作戰有了很熟練的技術。特別是登陸的部隊是從根據地的根據地出發的，使這一次登陸戰更有價值。由於這次成功的，中太平洋的前進會更猛烈的發展下去。

中太平洋的進攻，必將會與西南太平洋的進攻會合，目前的方向正是朝著關島日寇這一面走。

北太平洋

北方是日本防衛地形的弱點。美國的阿留申羣島頂端，直指著日本的手島列島。由阿留申羣島最西端的阿圖島到千島列島最北的樺島，傳七百二十哩。日寇曾在中途島之役以後，佔領阿圖島和普里卡島，今年五月到六月之間，先後又被盟軍收復了。

有人主張美軍應由北太平洋作主力的進攻，事實上，美國空軍除了小規模的轟炸中途島列島外，沒有更進一步的軍事活動。

北太平洋沒有進攻的原因，是由於不利作戰的氣候。冬天冰凍，十一月至五月有半年的冰凍期，不便大量艦隻活動。冬季以後又是暴風驟雨，北海

道和千島列島的艦隊，從四五月起，到九、十月才漸退。阿留申羣島的艦隊也僅是偶爾有些斷續。而且這一帶的狂風暴雨也是常臨的。對於飛行和航海，這種氣候都是威脅。科學的儀器設備或許能克服一些，但大規模的海軍空軍要作一相當時期的活動，顯然是受限制的。

由中國大陸進攻

我們已經打了六年多了，中國大陸對敵人作戰，起着多麼大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加強中國大陸對敵人作戰的力量，這是擊敗日寇決不可少的一着。中國是現有唯一能够發動對日陸地戰爭的根據地。由中國可以威脅滿洲的日軍大陸基地，可以威脅到朝鮮和日本本土。由中國沿海起飛的飛機可以轟炸日本工業中心。艱苦作戰的中國軍隊是反攻日本中人力上的保證。可是要使中國大陸發揮這種戰略上的積極作用，一方面有待於我們自己的組織反攻加強作戰，另一方面則有待於盟國武裝的援助和打開一條與盟國保持密切的通路。

在蘇美兩國空軍，已經在兩次鄂西戰爭中發揮不少的作用。中美混合空軍大隊的編成，已經創造了自大陸威脅日寇海上運輸的戰線。一部份中國軍隊已在印度，得到盟國幫助訓練。在雲南也有一部份受着訓練。軍火運輸正由盟國空中運輸隊担任着。這都是在極艱難的情況下努力的成績但是要求更大的成績，使中國戰場早日造成反攻的局勢，必須要打開滇緬鐵路。

有人曾覺得滇緬鐵路運輸有阻，打開也無大補助，不如在中國海岸打開一個港口有利。但要想打開一個港口，至少英美能自海上收復新加坡和菲律賓，才能進一步做到。事實上太平洋那樣的形勢還遠。而且有了港口，也還得陸地上強大力量保障，這也待中國陸地力量加強才能辦到。海運雖較公路運輸量大，但能努力而獲其效，總比等待時日好些。

五百架轟炸機和戰鬥機，可以把日寇驅出中國這是宣傳之談。今天空軍不能單獨在強大敵人的佔領地上，打垮敵人，這已經該是正確的結論了。空軍只有配合強大的陸上行動才能戰勝敵人。加強空軍力量當然為今日中國戰場所必需，但如果想戰勝敵人還有待於地面部隊的加強。這要看中國軍隊素質的改善和盟國增援決定。

開闢滇緬路必須解決，這是自中國大陸進攻的第一步。

由東南亞進攻

這是在魁北克會議後，英國加強遠東作戰的一個步驟。東南亞方面的指揮，是以孟加拉灣的錫蘭島為根據地，以英國地中海交通線為實力的支援，以印度的協助，中國遠征軍的配合行動，而成爲一個作戰整體的。

東南亞的戰略任務，被確定是收復緬甸；馬來，新加坡，蘇門答臘，和進攻敵人根據地的泰國，安南。結果將造成對日本佔領下的南洋羣島的威脅。這方面的進攻將要牽制日本極大的陸軍，一部份海軍和空軍。配合美國在西南太平洋的夾擊。

東南亞戰線如何進行攻勢還是秘密。但方向也不外幾條：(一)自印邊阿薩密陸上進攻，中國滇緬軍隊可以出而配合。這是三個山岳部隊的戰鬥。(二)自海上攻仰光毛淡棉，再從陸地上攻泰國曼谷，向馬來進攻。這是一個海陸空配合的海岸戰鬥。(三)自海而攻安達曼和尼可巴爾羣島再攻新加坡，並同時在蘇門答臘登陸，會攻新加坡。這是一個海上島嶼的爭奪和登陸的戰爭。

東南亞方面的進攻，不管從那一條路進攻，都需相當數量的陸軍，包括山岳部隊和森林作戰部隊，相當數量的海軍和登陸艇，相當數量的轟炸機戰鬥機。今天東南亞的總部還在籌備中。由它指揮的實力還不够大，雖然印度有相當數量的陸空軍可以使用，但海軍顯然也必須相當強大。地中海最大威脅減輕後，打垮希特勒所需的海軍力量，已富有餘裕了。

東南亞的攻勢，應當在不妨害殺死希特勒的情形下，早日出現。這一進攻方向，將有利於幫助中國大陸的攻勢，也可以增壯太平洋方面的聲勢。

多方面進攻

日寇在太平洋上有廣大的外圍陣地，有必需的資源，也有不是一下可以摧滅的陸、海、空軍實力。但是日寇也有許多弱點，那些弱點會使日寇無法挽救其失敗的命運。盟軍必須預知日寇軍事上的弱點進攻，才能早日消滅其東方法西斯強盜。

日寇的弱點首先是海陸空軍與盟軍力量比重的懸殊。雖然日寇實力也還
 不弱，可是海軍與美國比起來差遠了，如果再加上英國，相差的就更遠了。
 這種用不着舉出相比的數字，只要以太平洋戰爭第一年與第二年日美對海戰
 重慶的不同，就可以說明。美國的造艦力量更不是日寇所能比及的，日寇在
 重工業和造船技術上的落後，是使它無法與美國海軍抗衡的原因。空軍數量
 上的劣勢，更是日寇的致命傷，單在西南太平洋一隅的戰鬥，日本空軍已感
 到消耗的嚴重。據西南太平洋盟軍公報，十一月中日機就損失二四〇到二八
 〇架之間。日寇即使加強生產的號召下，使人也很難相信每月能生產飛機
 架以上（美國每月生產八千餘架）。目前的消耗使日寇已難補充，如果戰
 爭更趨劇烈，戰區更加擴大，日寇空軍將有更悲慘的命運。在陸軍方面日寇
 現在有一百多個師團兵力，與美國的七百餘萬數額的軍隊無法相比，再加上
 中國、加拿大、澳洲、印度、非洲的軍隊（有一部份據傳已到錫蘭）更無法
 相比。日寇的兵員補充問題，在戰近日本學生也要參加兵役的情況中，已經
 可以見到。在武器方面自然更難與美國現代化的裝備相比。日寇雖然在絕對
 數量下，與盟軍實力相比，形成不能挽回的劣勢，可是今天在太平洋上，盟
 軍却不能把力量充分的使出來。不只是因為西方的戰爭，就是防礙西方作
 戰的情形下，盟軍也難以在太平洋上把力量用足。所以日寇還能在相對的
 情形下，顯得很頑強，並且利用一切拖延的方法，爭取時間，加緊生產。盟
 軍應該懂得日寇的這個弱點，早日加強太平洋上的實力到可能的限度，以造
 成太平洋上絕對優勢的力量。

其次是日寇海上交通線過渡延長的弱點。船隻數量太少使日寇感到運輸
 補給的困難。有限的造船力，使日寇感到損失的嚴重。據美海軍今年九月所
 說，美方口擊沉日艦二百五十萬噸以上，其中潛艇擊沉的佔百分之七十七。
 日寇船隻不勝，已窮相畢露的在增造木船了。盟方潛艇應該更活躍起來，像
 過去德寇在大西洋中對盟軍那樣的狂猛進攻，用來打擊日寇。水底進攻的弱
 點不應該忽視的。

還有一個最大的弱點，是日寇有與盟軍空軍對峙的矛盾。日寇不能
 在每塊陸地上分配強大的兵力，因此在廣大的陣線上就感到困難。中、
 南、北太平洋數千哩的海防線，固然防守不能嚴密，廣大的亞洲大陸上也同
 樣不能到處堅強。各各方對日寇下手，它就更難處處兼顧。官制伯特

島美軍作戰空前的順利，正是一個好榜樣。因此除了現在的西南太平洋與中
 太平洋的戰爭外，東南亞海軍部應該快點動手，北太平洋也要加強攻勢。更
 重要的還是在中國大陸上進攻。這裡我們引一段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
 茲將軍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

「對日之戰而較對德之戰需要更多之特殊戰略理論。吾人攜帶各
 種武器立於龐大之圍遼邊上，比圍遼自阿留申羣島延至新幾內亞——自
 新幾內亞繞經荷印至孟加拉灣與緬甸，問題為一點攻擊或數點攻擊。另
 一問題為海陸空軍單獨攻擊或聯合攻擊。但作戰要旨為任何攻擊點及任
 何兵種須有效打擊敵人，海陸空軍單獨使用或施諸一點之壓力不足擊敗
 日本，故決定之打擊將為若干「越島進攻」完成後之海空行動與美國飛
 機大砲坦克及訓練加強後之中國軍隊之陸上行動。」

本刊啓事

茲以物價不斷高漲，本刊不得不自八卷二十期起調整訂價如左，請希
 讀者鑒諒！

零售每期 四元 三個月六期 二十二元
 半年十二期 四十元 全年廿四期 七十六元

羣衆半月刊社謹啓

秦代政治 (下)

秦代政治

(九)

秦始皇的政治主張，和呂氏的對立，還要更加明顯。

呂氏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在秦始皇則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至於萬世而為君，使中國永遠是秦姓的中國。

他是極端反對民主，不讓人民有說話的餘地的。就連學者們「馮諼詩書」那要「秦市」，「以古非今者」要夷三族。他的對民之口，比他的前輩周厲王不知道還要厲害得多少倍。

當然他反對那一套修齊治平的迂腐的理論，因為他自己就不講道德，以還放母視，醜殺嬰兒，逼死有功的重臣，毒殺有數的學者，如尉繚批評他的「少恩而多威，……得志輕食人」，是一點也不會過分。呂不韋被他逼死了，單因「竊葬」的原故，便對於他的賓客六加笞逐，「籍其門」。其實那些「竊葬」的舍人們倒應該是些有良心的忠義之士，並不因呂氏的失足而改變他們的情誼。然而這樣的人那里是他所看得慣的呢！他所樂用的是李斯那樣的變節漢，出賣朋友的專家，姚賈那樣的「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趙高那樣的獨刑之餘，該受死刑的要犯。

既以尚法為水鏡，在秦為應天承運的來殺人，當然要「專任獄吏，獄吏得稱信」，而「樂以刑殺為威」。儒家式的德政當然是水火不相容的。秦行監察制度頗為嚴密，中又有御史大夫，地方各部有監御史。本紀「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所謂「監」便是這監察御史的省稱。守治民，尉典兵，監則担任特種任務。這制度應該是承周而來，周初時對於殷之頑民有三監，金文仲義父宜銘有「諸侯監」之稱，但其詳細的情形不可考。漢初改為臨時派遺，到武帝元封五年復經常設置，更名為都察御史。據

《古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漢官典職儀云：

「御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

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

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

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

姦，制獄之，爲百姓所深。山崩石墜，妖祥詭言。

四條：二千石違者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

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

六條：二千石爲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官因察制，職雖不必仍沿秦舊，但它的性質是可以推見的。秦時這監察制度似乎一直貫到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地方治權，秦分四等，郡縣鄉亭。「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備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闕。鄉亭亦如之。」（漢書百官公卿表）鄉的三職也和守尉監相彷彿，嗇夫管理刑獄，大約就是屬於監的系統了。

天下是一面大刑獄的網，所謂政事，除遊徼，建築，南征北伐，東瀆西轉之外似乎也只是斷獄。

「秦始置獄官，遂毀先王之法，滅刑儀之官。專任刑罰，躬廉文墨，查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解石之一。而姦非並生，結衣遂路，囹圄成市。」（漢書刑法志）

這也就是本紀所說的「衡石量書，日夜有呈（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爲一百二十斤，言每日所處理之公文書以一百二十斤爲標準，若不制

標本不能停止轉動。這些「書」，當然也就是天下遠近所上陳的密報之類。要有這樣多的密報才合格，那天下的確更窮也必然大造刑獄了。

刑的嚴酷與同花樣之多，恐怕也是古今無兩的。單是死刑，儘可看見的也就有十二種之多。有棄市，有腰斬，有車裂，有坑，有磔（磔）有鑿頭，抽骨，蓋蓋，有戮尸，有梟首，有具五刑。特別是具五刑可謂集刑毀之大成。它是「先斷舌，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蓋其骨肉於市」，此外還要「夷三族」。犯了罪請實阻之罪的人是「先斷舌」，大率是斷舌以代刑或獄吧。

死刑之外有「鬼刑」，「鬼刑」等奇怪的刑名。鬼刑是三年的有期徒刑。城且是四年的有期徒刑，「論決爲鬼刑，輪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警築長城」。長城就是這種徒刑囚徒起來的，可見受刑者之多。還有所謂「籍」，是「籍沒其一門皆爲徒隸」。所謂「籍」，就是充軍。這些怕地永遠的無期徒刑吧。「君不見長城下，古來白骨相撐柱」，中國人所以不要地獄，地獄的想像那有這樣的恐怖？然而中國人也不要天堂，天堂的神秘又那有秦始皇這樣的支配者生活的玄妙呢？

你以爲他不玄妙嗎？你看，咸陽二三百里的範圍之內都有離宮別館，而且都有地下的通路所謂「複道甬道」相聯繫，秦始皇自己便是神仙中人，他的起居認真是神出鬼沒的。在他的三十四年有這樣一段故事：

「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有物寄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避）惡鬼，惡鬼辟其人。至人主所居而人不知之，則寄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風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秦始皇也真可愛，魯魯信了他的話，他說他高興與人，便自稱爲「真人」，不再講「朕」。從此他的生活便愈見秘密下去了。他所在的地方有人洩漏便犯死罪。有一次他行幸梁山宮，從山上望見李斯的车騎很多，不高興。侍從的人有的去告訴了李斯，李斯便把車騎減少了。始皇明白是有人洩漏，查問不出，便把當時侍從的人通通殺掉了。就因爲這樣極端的秘密主義，所以他在沙丘死了之後，屍身可以用鮑魚與來掩蓋，人也不疑。而他的寶貝兒子二世皇帝繼承了他的衣鉢，「當居禁中，……公卿希（稀）得朝見」，

總算把皇帝的御椅也打破了。且不幸就好像早料到會有這樣的事情一樣，他在他的書中竟早下了警告：

「先王所惡，無慮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餘皆敗，亂莫大焉。……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壹行）

像這樣一位極端的秘密主義者，極權主義者，實行萬世一系的人，他當然反對君主虛位說，而對於神權說，論理是當尤其反對的。但在說苑至公篇却有一段珍奇的傳說，因爲它太珍奇了，我要把它抄在下邊：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禪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

秦始皇帝仰天而嘆曰：吾嘗出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

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禁封之道，欲爲五帝之神，非陛下所能行也。之！不解，即死！

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汝）何以言我行禁封之道也？鮑白令之對曰：臣聞說之。陛下築台千雲，宮殿五層，建千石之鐘，萬石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廬山，宮室至雅，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駭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

始皇聞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言，乃令衆議我。遂罷談，無譚意也」。

這無異地是小說，始皇不會作那樣的異想，鮑白令之也那想那樣的異地當所斥責始皇呢？即使說認爲確有其事吧，然而秦始皇結果是家了天下，欲傳子孫以及萬世，却更是事實。

(十)

是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書坑儒這兩件大事。

焚書在三十四年，這時秦始皇天下已統八年了，原因是仍然有人懷柔郡縣，而主顯分封于功。結果在這時秦始皇投了一次機，始皇叫他裁制這件事情，他却把它搞起來，成爲了焚書的緣由。

「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備）並作，將皆遵古以爲命，雖康言以亂。人善其所私，不以非上之所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則應白而定一，私學而（乃）相與非教。人聞命下，則各以其學讀之。入則心非，出則義議。聖主以爲務，則取以爲高，率以違勝。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亂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一）史官著秦紀，皆燒之。（二）非博士官所藏，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者，悉詣尉官燒之。（三）有敢偶誦詩書，棄市。（四）以古非今者，族。（五）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六）令下三十日，不燒，黜爲城旦。（七）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八）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他這建議得到始皇的認可，或者已早發意於他而讓他出來當說，結果是在嚴刑峻法的威壓高壓之下，將天四海大燒其書，所沒有燒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藏和醫藥卜筮種樹諸書而已。博士官所藏當在中央，不久再經楚人一炬便盡皆被燒，三月不滅，燒在中央的圖書應該也就被燒光。這無論怎麼說不能不認爲中國文化史上的浩劫。書被燒後，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想的種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

焚書之後，接着便是坑儒。這事是在三十五年，起因是方士侯生盧生等騙了始皇幾年，畏罪潛逃，始皇發覺了便惱羞成怒。據他自己說：「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支士，欲以謀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後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相相告曰：『侯生等，吾嘗賜之黃金，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詭言以亂黔首。」於是他就叫御史把咸陽諸生通同捉來，問：「諸生互相告密，始是便親自問了。」「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都把他們在咸陽坑了。由這經過看來，是國方士的逃而牽怒到儒生，方士逃了而儒生陪了，這被坑者不是儒生，而是方士，我自己在前都說這樣說過，但這是事實，沒有把本紀的原文通讀清楚。被坑的這些死鬼儒生，所以始皇長

子扶蘇也才說：「諸生皆誹謗孔子，今上世重法之，臣恐天下不安」。照扶蘇的話看來，所坑的儒生是在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

關於坑儒還有另一種說法。據儒林傳正義所引衛宏的「詔定古文尚書序」云：

「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誦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餘人，乃密相與於嶺山陵谷中讀處。瓜實成，諸博士詣生說之，以言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實備極至渴，方相離不決，因發機，從上獄之以士口皆屬，終乃無餘也。」

這與四百六十餘人的被坑，不知道是傳聞的謠言，還是前後兩事。這考學校考是作爲兩事而敘述的：

「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縛相責，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嶺山，實生，命博士詣生說。爲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坑儒起召博士諸生議，是以非所實言者，又數千人。」

秦始皇對於儒生這樣下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爲他們在一切的觀點上差不多都是對立的；在日後陳勝吳廣起義的時候，儒家參加革命來得特別踴躍，也自然有他們的理由了。

就和諸生和方術士有別的一樣，儒家和陰陽家畢竟是不同的兩派。方士們是陰陽家，看盧生說秦始皇以「真人」，又說始皇的生活不「恬淡」，陰陽家顯然和道家有關係，後來的道士的做功事觀上也就是由這些方士們所傳播下來的。關於這些方士們的下落，說死灰復燃有一段後話。據說隨了四百六十餘人之後，盧生始終沒有捉到，侯生後來被捉着了。始皇說：「便升東阿之台，臨四通之橋」，打算燒一頓之棧車毀了他。但反而被侯生掙白了一陣，說始皇之淫「萬君來而才足者樂封」。秦始皇被他說得「喟然而嘆」，反而把他釋放了。這雖然是小說，或許也怕是有事實，因爲始皇自己也就是一位大陰陽家，大方士，大真人，他在焚書坑儒之後的三十六年，不結也還得使「博士爲「慎其人」，及行，所遊天下，傳令樂人效之」。嗎？所以他對儒生不許，而對於方士却寬恕。

秦始皇的精神從嚴刑峻法的一點說來是法家，從迷信鬼神佛一說說來是陰陽家，從盡力使作一嚴說來是墨家。墨家也每天右鬼，重法尚同，因其通三派的思想在他的身上中結合起來成爲一個奇妙的結晶體。而他又加上「未

流道家縱欲派的思想實踐，那光彩是更加顯耀了。因此我們要說秦始皇也先把秦諸子的大部分綜合了，這也是說得過去的。不過他所綜合的一多半是先

秦始皇的成功事實是時代湊成了他。中國自春秋以來，由十二諸侯而成七國，無論在政治上與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趨向統一的路線，而始皇承六世的餘威，處居高臨下的戰略地位，益之以六國諸侯的腐敗，故他竟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但這並不是說他的方法是用正確了。相反的，假如沿着呂不韋的路線下去，秦國依然是要統一中國的，而且統一之後斷不會僅僅十五年便迅速地澈底崩潰。

(十一)

和始皇的名字相連而被後人譏諷的是「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二十六年)，這也是李斯臨死所自誇功之一：「更冠蓋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但這與其說是「二人」的大力使然，毋寧也是時代的趨勢。據我們從金文的研究上看來，春秋戰國時代的列國鑄器，無論是在北部的秦晉燕齊，在南部的徐楚吳越，其文字結構與文章條理，並沒有什麼不同。這顯然是兩周七八百年間自然進化的成果。正統以外的文字，如隸重戈戟之類的刻文，每多不能認識，大約係由於故求苟簡，如後世的在押之類，這不僅六國有之，秦亦有之，始皇時所刻除的或者就是這些文字吧。始皇之法多沿商鞅，兵制刑名固不用說，就是度量衡的統一也是以商鞅之法為標準的。存在有商鞅就是這件事情的實質上的物證。量乃長方形，有柄。量之左側有銘：

「十八年齊造卿大夫衆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一爲升」。

這是秦孝公十八年時的器，下距秦始皇二十六年凡一百三十四年。而量之底復有始皇刻辭：

「廿六年皇帝並并兼天下，誦侯對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隸狀)籍(玉籍)：法度量則，不壹嫌疑者，皆明登之」。

此與它種權量始皇刻辭全同，足證始皇所據之量仍是商鞅量法。又銘中兩「尊」字，馮叔平先生告余云：「均即寸字。十六寸二分爲升，與下秦嘉量同」。

馮先生曾以新秦嘉量尺度量之，其容積與文相合，故斷爲寸字，而又知新秦之度量實仍周秦之舊。據此我們可以知道，書同文字，畫一度量之事，不僅李斯不能引以爲是自己的功勞，就是秦始皇也是不能居其功的。

郡縣制的設立，世人也多以爲是秦始皇的大功，然秦雖設郡，未廢侯封(詳下)，而秦郡多沿燕趙之舊，顧炎武已言之(日知錄廿二)，秦則春秋中葉已見於齊魯。宋時出土的齊侯鐘銘乃齊威公滅萊時的器，銘文有言「錫汝釐(即萊)郡又文，其縣三百」。雖其縣必甚小，然已有縣制存在固無疑。關於郡縣制的說法在呂氏書中無可考見，而於相反的一面却言「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霸；若使王霸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霸矣」(去私)，又說「多封封所以便其勢也」(權勢)，看來他是傾向於維持封土分封的說法的。這在呂氏是一個矛盾，因爲君位既主張虛立或禪讓，地方政權爲什麼要主張分封呢？但假使呂氏門下的分封說，諸侯也須禪讓舉賢，那嗎和郡縣制也就實質同名異了。

萬里長城的完成也是和秦始皇的名字聯係着的一個偉大的奇蹟。「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阻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蒙恬傳)。但這工程並不是由秦開始，戰國時燕趙秦齊均已有了長城，到了秦代僅把北部的長城聯接爲一而已。築長城的工人大抵爲受了徒刑的罪犯，其中包含有官吏。「三十四年適(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但這必居其中的一小部分，是毫無疑問的。

始皇和呂氏的重農相反，頗有重商的傾向。雖然琅邪刻石有「上農除末，黔首是富」那樣的話，李斯讓焚書時也說過「今天下既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竭力農工」，然而他那樣征伐連年，使役遍地，農業事實上是要受大影響的，而且賦斂甚重，三分取二(「收秦半之稅」)，所以弄得來「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剝麻者績，羸弱服於道，大夫策會於節，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淮南人閒訓)。而有錢的人却依然有錢，並乘著這起程的時候而大劫其國難財，這種傾向直到漢初都還存在。史記平準書云：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輸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鉤錫，而宰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不稅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騷平，高視乃令富人不得衣絲乘車，並租稅以困窮之」。

這一切是秦皇的功績，但也是兩個極端對立的例子。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顯，但也是兩個極端對立的例子。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顯，但也是兩個極端對立的例子。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顯，但也是兩個極端對立的例子。

夫嬴秦人使長，流於鄉黨，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這雖然只是兩個例子，但也是兩個極端對立的例子。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顯，但也是兩個極端對立的例子。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顯，但也是兩個極端對立的例子。

這雖然只是兩個例子，但也是兩個極端對立的例子。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顯，但也是兩個極端對立的例子。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顯，但也是兩個極端對立的例子。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顯，但也是兩個極端對立的例子。

「韓非之學與事，欲混（彼）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由西出（據）口為渠。並（平行）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

中作兩說，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問，當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

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澆澆南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秦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名曰鄭渠。

十月不學方彼免租，可知渠的開鑿必在呂不韋執政時代。而完成是在他去后以後。這渠的完成，使秦得到了軍餉的來源，所以日後連年用兵而能支持下去，終於把六國兼并了。這不真最速也錯到了好處的嗎？不過這明明是呂不韋國策策下的二項大工程，這項成功我們是應該記在呂氏項下的。

(十二)

秦始皇的武功不用說更足歸於秦人的。自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十年之間把六國次滅全滅，但這功勞差不多全是王氏父子所建立的。

年代	所滅國	將兵者
十七年	韓	內史騰
十九年	趙	王翳、蒙恬
廿二年	魏	王翳
廿四年	楚	王翳
廿五年	燕	王翳
廿六年	齊	王翳

王翳是王翳的兒子，再加上王翳的孫子王離，這兩家出了三代名將。始皇在武力上的成功，多半就依靠在這父子三代。此中戰功最大的是王翳的攻楚，在這兒是有一番波折的。史記王翳傳敘述得很詳細。

「秦始皇既滅三晉（韓、趙、魏），走燕王，而擊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昔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翳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翳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穎陽。」

李信蒙恬兩路進攻，起初雖然是連戰連捷，但後來為楚軍所大敗，七都尉陣亡，秦兵潰走。消息傳來，激得秦始皇大怒，親自騎馬跑到穎陽，向王翳謝罪，要他想辦法。他說：「吾人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吾人乎？」看他這情形是多麼着急，大有聲淚俱下的光景。的確，假使當時沒有王翳，楚兵乘勝而西，其它五國無論已亡未亡者必先後覆亡，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夢，說不定是會全盤破滅的。之謂

結果是出山了，他依然要六十萬人，始皇也就只好答應他。王翦和始皇都是了不起的名將，當王翦出師的時候，始皇還親自到關上送行，王翦當面請求了許多「美田宅園池」。始皇說：「將軍，你去吧，你還怕窮不？」王翦說：「這次出征，就有功也不會封侯，所以要趁着這個時候爲兒孫求點產業。說得秦始皇「大笑」。而且王翦到了邊關，他還連派了五批人回去請求田產。平蕪的部下就有人說：「未免過近要挾了。」王翦在這兒答覆的話很值得照原文錄出。王翦曰：

「不然。夫秦王粗而不信人，今案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謝，且恐可以見對當時秦國的鬥爭也實在彼此都長在注一擲，假使王翦這一去也打敗，秦國也就完了。幸而王翦這位將軍，究竟是身經百戰的老將，他儘管有那樣的大兵，而他採取的却是極高深的戰術，等楚將退兵之後，他才從後追擊。這兒是有經濟戰做後盾的，這樣的戰術沒有充分的糧餉，當然不能成功，王翦是成功了，可見他的後方接濟做得很好。而楚將之所以引退，也一定是軍糧匱乏的原因，因此受秦人的追擊而至於大敗，竟一蹶不振。由此再分兵北奔齊燕，南征百越，中國的局面也就歸於一統。

王翦的戰功是很輝煌的，秦始皇也畢竟有過人之處。我們看他那樣剛毅自負的人，差不多萬事都要自己動手的，獨於他自己沒有帶過一次兵。他雖然「粗而不信人」，但到情勢迫迫的時候，他還能夠對於賢能者去卑躬屈節，請罪求教。在武力征服上，這是使他成功的要素。這其實也就是一種的民主精神，看來秦始皇這人比希特勒，墨索里尼，還要高明一等。對六國百越他以全力信王翦，對匈奴他後來以同樣的全力信蒙恬，所以他在軍事上的確是成功了。他在軍事上比較關懷着民主的精神之所以成功，也就反襯着他在政治上懷抱着反民主的精神之所以失敗，假使他在政治上也能以全力信任呂不韋而走他所規畫的路線，我相信秦以後的歷史也必定是另外一種面貌。

呂不韋也並不反對用兵，東西兩端便是在莊襄王時被他滅了的。他的實權面也強調着兵的作用，並也有征服四夷的觀念。
「十里之而耳不能聞，雖離之外而目不能見，三敵之官而心不能

知，其以東至開槽，南撫多國，西服諸國，北保傅耳，若之何哉？」（任數）
這種觀念是先秦學者所公有的觀念，陰陽家最誇大，就是像流于那樣的儒家也在說「朝秦楚而撫四夷」。這觀念爲秦始皇所實踐了一部分，但他的戰勝却是錯了。

用兵南越是在二十五年與三十三年。本紀云：「二十五年，王翦定南越地，陸越者，置會稽郡」。又「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贖贖買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越。以適遣戍」（陸梁是博羅的古名）。這顯然顯示着武力上的成功，但這成功的一大半我們應該歸之於楚人，楚國在兩周八百年間的和平經營使南部中國早已半漢化，窺以武力征服之難爲時甚速，然而阻礙橫生，且成爲了日後亡國的因數。

「秦皇扶蘇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恬，楊翁子將，築修城（長城），西屬流沙，北至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維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緬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屯番禺之郡，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率擊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嘯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莽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築設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維，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淮南人開訓）

「秦之時使尉屠維擊越，又使監祿擊渠通道，越人深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用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漢書嚴助傳）

屠維的出擊當即是三十三年的一次，固然爲越人的海軍戰術所困，是打了大敗仗的。而且大兵遠戍，不償勞民傷財，國內空虛，所以便宜了陳涉吳廣的起義，且「宿兵無用之地」（史記律書），不能回師拯救。秦人的侵略，雖然收到初期的成功，從結果上看來事實上是大失敗了。南部中國以後之所以徹底漢化了歷史明燭的告訴我們，並不是採取的秦始皇式的侵略辦法。

討匈奴是在三十二年。本紀云：「燕人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蒙恬傳云「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

，用險制羣。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漢河據陽山，遠從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對上郡」。

對北的出兵和對南的性質不同，對北是防衛的反應，對南是積極的侵略。北方的游牧民族自殷代以來便是時常襲略中國的，秦始皇的北進，和趙武靈王及趙將李牧，燕將秦開等一樣，毫無疑問地是反抗侵略。但秦所採取的整個戰略是南進北守，證明明是錯了。秦南用了五十萬人，而御胡則僅三十萬，由這兵力的懸殊可知秦的主力是用於侵略。加以萬里長城的完成，更完全佈的是一個守勢陣，尤其不應該的是南北兩面同時作戰，所以弄得來供不應求，天下疲敝。假使當時不採取侵略性的南征，而集中兵力一致向北，以那築長城所耗費的人力物力來從事，我相信一定可以扼匈奴平定，不僅可以免除了今後歷史上的千餘年的長患，而北的民族早就可以與漢族合而為一了。

近時學者對於秦時代的南征北伐頗致讚美，但過細推論起來實是在是功不掩過。主要的還是侵略性的戰爭壞了事，這是無可諱言的。

秦人尚軍功，將位在相位之上，看琅琊刻石的列名次第便可以明白。

-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
- 列侯武成侯王離(?)
 - 列侯通武侯王賁
 - 倫侯程成侯趙亥
 - 倫侯昌武侯×成
 - 倫侯武信侯馮毋擇

- 丞相魏狀
- 丞相王綰
- 卿李斯
- 卿王戊
- 五大夫趙嬰
- 五大夫楊穆

從與諸於海上」。(二十八年)

「主離」應該是王翦的錯誤，此時翦尚未死，且離乃賁之子，不應發父子倒列。看這列名次第，可知武人在秦代的位置的隆崇，而秦代雖號稱郡縣制，但也未盡廢除侯封。在當時居於最高位的王翦，軍功固然不可一位，然而侵

略南方的禍首却許建他。他這人除善於帶兵之外，顯然並沒有什麼政治上的遠見的。司馬遷批評他道：

「王翦為秦將，與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自韓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倫合與容，以至滅身」。(王翦傳贊)

這批評，看來是並不過苛。

(十三)

以上所述，可見秦始皇與呂不韋，無論在思想之與同政見上，完全是立於兩絕端，為明瞭起見，我可以製一個對照表在下邊。

世界觀		政治主張		一般傾向	
呂無神	秦有神	君權神授	民權神授	君權神授	民權神授
有禍	無禍	重刑	輕刑	重刑	輕刑
重平	理等	大官	小民	大官	小民
下	下	治人	治民	治人	治民
下	下	讓位	分封	讓位	分封
下	下	極權	民主	極權	民主
下	下	嚴刑	寬刑	嚴刑	寬刑
下	下	嚴法	寬法	嚴法	寬法
下	下	嚴刑	寬刑	嚴刑	寬刑
下	下	嚴刑	寬刑	嚴刑	寬刑
下	下	嚴刑	寬刑	嚴刑	寬刑
下	下	嚴刑	寬刑	嚴刑	寬刑

像這樣絕端的對立，兩人的關係當然不能善終。但為什麼會相異到這樣呢？這兒我看並不是兩個人的對立的問題，而是兩個階層，兩個時代的對立。周秦之際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大轉換的時期，這無論從新舊的歷史觀都是是一致的，在當時以為是封建制向郡縣制的推移，而在我們以為是奴隸制向非奴隸制的推移。殷周是奴隸社會，自春秋中葉以還奴隸逐漸得到自由，向來的奴隸主夫多放棄了他的優越地位，零落了下來，在社會階層中生活上下的對流，至秦末漢初更呈出激湧的現象，而社會更起了質變。呂不韋是代表著新興階級的進步觀念而企圖把社會的發展往前推進一步的人，秦始皇則

相反，他是站在奴隸主的立場，而要把社會往後扭轉，事實上他是成功了一忽，他創造出了一個短時期的奴隸制的中心集權社會。他把六國兼併了之後，把六國的奴隸主和已經解放了的人民，整個又化爲了奴隸。

1 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2 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台下，復十二歲，聚琅邪台」。

3 二十八年：「使刑徒三萬人，伐荆山樹，赭其山」。
4 三十三年：「發謫管通亡人，監幽，賈人，略取鹽築地爲桂林、豫郡，南海，以適遺戍」（五十萬人守五嶺）。

5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6 三十四年：「陰宮刑徒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
7 三十五年：「徙三萬家蜀地，五萬家雲陽，皆不復事十歲」。

8 三十六年：「遷河北榆中三萬家」。
9 三十七年：「始皇初即位，穿治麗山，及并天下，天下徙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

像這樣大規模地掘墓或對首任意處徙謫戍，把亡人賈人趕出從軍，把大批的刑徒奴隸子拿來做苦役（稱後又拿來當兵），這不是大規模的奴隸制的復活嗎？這顯成南越的既明看是亡人監幽賈人，可知成北邊築長城的也一定是奴隸。故獄吏不直者可被適治去築長城，也可以適南越。就是陳涉吳廣等那批「閭左」，其實也就是專門任苦役的奴隸。陳吳等義了，倉卒之間秦國發不出兵來，乃「令少府章邯免罪，徙人奴隸子，悉發以擊楚大軍」，公然有好幾十萬人。（章邯後降項羽，降卒被坑於新安城南者二十餘萬，又與陳餘遠徙，有「今將軍將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之語。）

中國奴隸制向非奴隸制的轉移，姓氏的混同與普及是一個分水嶺。在古，女子有姓，男子有氏，春秋時猶然。繼則姓氏不分，男子以氏爲姓，有姓者爲貴族；故古時「百姓」實乃貴族。庶人本無姓氏，然在戰國年間，庶人抬頭，於是姓氏始見普及。陳涉吳廣之姓陳姓吳，儘管「少時嘗與人傭耕」，可見都已經解放了。自由人，然而明明在做傭人的奴隸。

因此秦始皇帝時代在是奴隸制的大道轉。他形成那樣一個短時期的中央集權的奴隸社會，由奴隸制可以爲觀光返照，由後一階段的非奴隸制言可

以比爲水達那斯前的一時鎮靜。然而在那鎮靜的外貌下有猛烈的噴擊的。果然，等秦始皇帝一死，不及一年天下鼎沸了。

近時學者頗有人陶醉於秦始皇帝的偉大，過分陶醉的結果便不顧多方爲之粉飾。有的說秦始皇帝正是實行了墨家的主張，這不但沒有做到墨家，而且也沒有懂到墨始端。有的說天下的事亂不是秦始皇帝，而是秦二世，秦二世固然不是好材料，但他做皇帝還不及一年天下就亂了，要問他來負全責未免太不公平。在陶醉中的視線是我不到焦點的，連泗炎武，章太炎那說的大學者都免不了這樣的毛病，其餘也就以不用說了。

復次，中國之被稱爲「秦」即拉丁文的「秦」希臘文的「秦」。梵文的「秦」。希伯來文的「秦」等，有人說都是「秦」的轉音，這在道理上是說得過去的。因爲中國古時和西方乃至印度的交通是靠着西北的陸路，故外來的人先知道有「秦」或知道有「秦」。但這不當始於秦始皇帝，或尚在其前。而有的學者乃竟引此以爲秦始皇帝的讚美資料。這樣假如也合邏輯，那中國又該稱爲「秦」或「秦」，是契丹的轉音，豈不是契丹也可以讚美了嗎？

(十四)

秦代政治的本質弄清楚了，呂不韋的真相也就覺得更加清晰，要他才可能算得是有數的大政治家，不幸爲強有力的政敵所迫害，被埋沒了兩千多年。關於他的事蹟，雖然有「呂氏春秋」一書存在，但我們所能知道的依然太少。他的書並不他的私事和功業，只有在「序意」篇中僅僅露了一大法和「而不幸文支殘缺」。

「維秦八年，歲在涖，秋甲子朔，朔之朝，良人謂十二紀。」

文信侯曰：昔得學黃帝之所以論顯微矣，爰（曰）有大師在上，大矩在下，或能法之，爲萬父母。蓋聞古之濟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接之天，下履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不無所遁矣。夫曰順，順難生。地曰順，固難寧。人曰信，信難察。聖人者，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難（須）循其理，平其氣。夫私親使目盲，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殷積（聚），則昏蔽由公。智不公，則禍日衰，災日隆。……

使。他叫真苦，而不使他們涉及自己的私事，不正是他的大公無私的精神嗎？說者往往說他著書的動機僅為名，而對於他的書加以罪薄，又或者說他有心，想奪取執政的席位，這些都不至是受了蒙蔽的見解。好名何必與著書的動機？他可以在始皇幼時奪取之於孤兒寡婦之手，何必要等他活到了二十二歲，再來發表和他的思想，政見，氣質，完全相反的著作呢？

呂氏是主張急學尊師的人，至少是贊成這樣。你看他說「聖人生於急學」(勸學)；「成身莫大於學」(尊師)；這就對現代也還不失為良好的教條。他把尊師和孝親一樣的提議，「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以光明」(尊師)。但他所學人尊的師「視徒如己，反己以教」(誹徒)的「尊師者」，也有那種勢利的老師是為他所斥責的。

「不能敬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復過自用，不可證移。近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殿而敬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

像這樣的醜態，在「勸學」篇中還述得有一些，足見兩千多年前的人情，和現代也相差不多麼。這樣的師當然不足為師的。

師道之所以，不用說是因為學術下移，讀書成爲了職業，教書也成爲了職業的原故。始皇尊呂氏爲「仲父」，當然是以師禮事之，拿呂氏的嘴管來說，他並不「阿而諂之」，可以說是够了師格的。同時我想，呂門的三千食客中，應該也有爲呂氏所師事的人可惜這些人都湮沒無聞了。除變了節的李斯之外，我們知道的有十二歲而爲說客的甘羅，曾爲他的少庶子，有呂氏曾請他相熟的張唐，有在呂氏失勢後出亡於趙而趙欲相之的司空馬，但這幾位似乎只是政客而不是學者。呂氏門下的那批學者，撰輯這部「呂氏春秋」的那批孔孟之徒，老莊之徒，究竟在那兒去了呢？消滅了，真是完全和烟雲一樣消滅了。然而像「呂氏春秋」這部書，我相信，是永不磨滅的。它不是被燬了秦的火，又放過了楚人的火，一直傳存於現世，已經有二千多年的壽命了。人可以滅滅，真理是絕不絕的。

但呂不韋除掉這部「呂氏春秋」之外，還有一種遺存的物件，便是他當年所造的銅戈。戈在山東臨淄陳宣王所藏，其上有銘，文爲「五年相邦食不食，耐更國，承，正實」。五年，不用說就是秦始皇的五年。相邦即

相國，漢人諱邦，始改邦爲國。昭更國，是昭縣的長吏名叫國。丞，工真，都是一職一名。何以知道是這樣的呢？因爲有上郡戈的銘文可資比證。

上郡戈藏朝鮮平壤中學，余曾得其照片。銘文爲「二十五上郡守×造，高奴工師曹，丞中，工鬼新戰」。這廿五年大約也就是始皇三十五年。上郡守的名字可惜看不清楚，或許就是蒙恬的恬吧？高奴是上郡的首縣，故城在延安東，俗呼爲高樓城。工鬼新戰者，乃受三年徒刑之人被發遣在那兒做銅匠的。

這兩件戈銘的文例完全相同，因此可以知道「昭更」當得是昭縣之吏，但不知道這昭縣是該當於現在的什麼地方。秦時縣制，縣官「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皆有丞，尉，是爲長吏」(漢書百官公卿表)。那嗎這昭更的國先生也應該是呂氏門下的一位人物，但連他的姓是什麼，可也無從查考了。

(十月三日夜脫稿)

于懷著

形勢比人還強

(原書二二八八號)

新華日報圖書課發行

讀報隨感

關於利用外資

卓芬

整個工業界在歐戰落葉的秋天，可是高瞻遠矚的人們却格外熱烈地在叫嚷「戰後實業建設」。利用外資的聲浪是更帶有刺激性的。最近輿論界熱烈地在討論這個問題。到目下，仍不斷有好多意見出現。這些意見可歸納為兩方面：一方面是贊成無條件的利用外資，一方面是在懇切的期待下，拘泥審慎的態度。現在分開來說吧。

主張無條件利用外資的人們，認為戰後的中國，須要大量的工業建設，而這些費用，我們自己難以籌措，只有求助外資，故不願在限制外資懷疑外資的心理。這種想法，是把中國戰後實業建設，主要寄托在外人投資或單獨經營的外資身上的。在這裡，民族資本自然沒有放在眼裡了。他們在過度興奮中淹沒了理智，抹殺了現實，忘記了歷史的教訓。看吧，下面就是幾個標準的例子。重慶某報載：「外人在中國投資，只要遵照中國法令規定，得政府的許可，也就可對某一企業作單獨經營，在這一原則下，將使在華投資的友邦人士，更願以中國為他們的投資市場，為他們的第二故鄉，想見戰後的來者如歸，定可在國際合作的記錄上，樹立一新新的前進的楷模。……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除投資人遵守中國法令的規定外，並無其他條件，這正可看出中國歡迎國際合作的坦懷，同時也可看出我們在戰後經濟合作的世界中，沒有一般國家的狹隘觀念。」（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日本市報）另報報紙亦用同樣的語調說：「我們以為關於戰後利用外資，所要注意者，已非外資威脅我民族資本的問題，而為如何獎勵外人投資，使之不致誤解我國策而視對華為畏途。」

這樣的歡迎外資，寬大實在是很寬大的。但是我們如果為民族產業的前途着想，則對此問題自不能這樣輕妥的下一按語。不平等條約的取消，中國的國際地位該是提高了。但是，我們不能說，取消了不平等條約，便可無限制的利用外資，因為這是要從中國的社會經濟着眼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中掙扎一百年的中國，無論在技術設備上，在本上不能不自承落後。有人說戰前有些中國紗廠與外人媲美，受淘汰的只是一小部份管理不良，內容腐敗的工廠，以此證明可以大開讓外資進來，這句話，如果出自外國朋友們口中，這不足怪；如果是一個中國人說的，那就未免太「那個」了，管理不良，內部腐敗，當然是競爭場中的犧牲品，但那些管理不怎樣不良，內部不怎樣腐敗，而資金缺乏，規模不大的廠家，如果與外國龐大的資本比賽，難道能保證不被擊敗嗎？如果這樣被擊敗，他們不是亦可目為管理不良內部腐敗呢？這些無視條件的人們不知「是誠何心」？

無原則的寬大，無計劃的大開門戶，甚至讓出

主人的地位也在所不惜，在這兒，「狹隘的國家觀念」誠然「打破」了。可是，這將置民族工業於何地呢？如果這樣，怎能談到經濟？怎能談到工業化的新中國呢？難道美麗的外衣能贏得住弱者的稱讚嗎？

要不怕外資威脅，就必須有堅強的民族工業。然而今天中國的幼稚民族產業是須要我們保護呵！從世界經濟合作的觀點看，也不應放棄我們經濟自衛的權利。大西洋憲章第五條的規定，不是像下面這樣的寫着嗎？「我們應承認經濟尚在發展的國家，實行保護關稅，以保護其幼稚工業，乃完全正當的行為」。難道這種正確的，合於國際平等互助的原則，是「狹隘的國家觀念」嗎？

如久旱的禾苗似的中國工業，撐着枯黃的小生命，在等待着甘霖的救濟，如果不專灌漑而從另一地方移植一些生機力強大的樹木來，那不把這些田禾毀殺了嗎？就是以國際互助而言，我們所最需要的，是外人的重工業器材，而不是作為外人商品傾銷的市場，更不是「獨資專主的重踏過去的覆轍」。

另一種意見，是為民族產業的幼苗打算。在幾個月前，這些關心民族前途的人士，就提出很多珍貴的意見來了。

夏孟輝先生注重外資的用途，他認「戰後利用外資發展實業，在我實業幼稚資金貧乏的狀態下，是必走的途徑；但是此種投資，必須由政府通盤籌劃與管制，務使外資儘量被我們利用，而我們的實業不會受外資的侵害」。（實業之友一卷五期戰後實業問題）

侯寶堯先生說：「利用外資，勢所必然，但同時又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辦法，自由由政府統籌支配，無論國營民營，凡要利用外資者，都由一個機關

負責，絕不能俯則接洽，尤其不能任憑外人單獨利用外資」。(新工商一書一期)「我國工商經濟發展之途徑」。

國民公報十月十七日的社論，曾這樣說：「現存國人所應注意的，乃是如利用外資的問題。因為如果利用不得其法，則外資成效未見，而緊縮發生。清末以至民國初年，政府濫借外債之惡果，迄今國人猶未能卸此一沉重的負擔，可為殷鑒。固然，今昔情勢絕不相同，戰後利用外資，其目的全在完成經濟建設，自與從前之政治借款不可同日而語。但就經濟建設言，如果未能控制外資用途，仍難收充分利用外資的效果。故戰後利用外資，應應通盤籌劃，確定原則以發揮外資在經濟上莫大的效能」。

千家駒先生著重於利用外資須顧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之自主。他說：「利用外資應遵守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基本原則：『借外債以營不生產之事業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業則有利』。與蔣珍珠在九月十日出版『生活』雜誌提到『美國過去對華的援助的部份還是財政上的。但美國必須注意使此種借款能用之中國人民並為中國人民之利益上，不應該拿來贖充私人利益之政治集團，因為中國人民有權說，這原借款將來是要他們歸還的』……因此中國利用外資，應要在中國工業化的建設上；同時本身亦政治及經濟上獨立自主，才收到利用外資的效果，——否則，如民國以來利用外資之慘痛教訓，是可駭異的」(九月二十四日浙江日報)。

谷春帆先生曾以雙關的語調，分析利用外資的正確與否。他雖然不完全贊成限制外資，但還是着重保護民族資本的。他說：「修改不平等條約，至多使外商與華商一視同仁，照從中國法律但仍不足

以保護華商，要求保證華商，提倡民族資本，只有限制外資。但如此則中國經濟不能迅速開發，無以應付未來世界大局，且外國許中國人在彼國法律經營事業，而中國反是，則不平等條約豈非倒了一頭？顯然也行不通。所以歡迎外資，在平等條約下開發中國。與保護民族資本或多或少回到閉關經濟，兩者必居其一。但照現在世界情形，閉關已不可能，所以新約在這方面，大致必可得平等。但結果民族資本無法自存，至於有政治野心的投資，自應當也大致可望「一糾正」。

這些意見都是同意利用外資的，但持着審慎的態度。所以，今天的問題，並不是應否利用外資的問題，而是怎樣利用外資的問題。這就必須聯系到民族工業本身的狀況了。過主的覆轍，是必須預防的；為了使外資在戰後起經濟幫助中國工業的作用，必須做到「在利潤方面不妨儘量予以優越的待遇，而主權方面則不可隨便放鬆」。怎樣保持主權呢？章友江先生在論「我國貿易入超及國際收支平衡」一文中關於中外合資的原則，提出下列各點：

- (一) 合資公司之股份，中國須佔百分之五十。
- (二) 中國董事須佔多數。
- (三) 董事長總經理必須由中國人充任。
- (四) 外資須設計及供給機器設備之責任。
- (五) 合資公司必須遵守中國法律。
- (六) 華股部份得酌量容納本國商股，但商人不能以抵押或轉讓與外人。

為了避免外資操縱，為了使民族產業不受摧殘，為了中國脫去破舊的古裝，為了免除半殖民地化的歷史重演，章先生的所提原則是十分中肯的。此外，尚有一個問題必須注意的，讓我引十月六

日新華日報的社論吧。「為了招引外資，必須提高經濟行政的工作效率。經濟行政效率之提高，乃是發展經濟事業的前提，也為招致外資不可缺的條件，試想吧，如果拖延宕擱之舉不加改變，如果一件事要留滯許長時間才能發下，急待進行的事情，不想辦了嗎？以前竟待外人而刻待華商的那種作風，是不應保留的，但也不希望以過去那種不健全的作風施於外人」，同時「在發展國民經濟之中，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的關係，已成為各方注意之問題，在歡迎外資之下，外資既可獨立經營，則它與國營及民營之關係為何？外資在國民經濟佔着什麼樣的地位，這都是值得重視的。在原則上我們認為民營事業必須與國營事業配合的發展，而外資則是以不妨礙這一原則為前提的」。

新約的成立，在政治法律方面使我國在國際上取得平等地位，但經濟方面，還須我們極大的努力。戰後利用外資，是民族產業發展必經的途徑，但過份依存外資的心理是有害的。經濟建設還須靠我們自力更生。這，不但是戰後的問題，而且今天抗戰的關鍵。沒有今天的努力，是難談到將來之利用外資啊！

料實與獻文

三個同盟強國的領袖

意義重大的聚會

——消息報社論

三個同盟強國領袖的會議，已經在德黑蘭舉行，在這次會議上蘇美英之間已商得了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協議。今天公佈的會議的文件，勝於雄辯地說明了斯大林、羅斯福、和邱吉爾的聚會，以及他們所通過的決定，對於整個世界的命運，都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在戰爭期間，偉大的民主國的最著名的政治代表和軍事代表，已舉行過好幾次的聚會和會議。這些國家，領導着聯合國國家反對希特勒德國及其附庸。這些聚會，在各國人民的解放鬥爭史中，已經起了最重大的作用。他們造成了對於目標和任務的共同的了解，以及共同的見地和共同的行動。

戰爭的發展，說明了有在更加擴大規模上採取共同行動的必要；諒解和善意的存在，就使全世界三個最大強國——蘇美英——更加親密地通力合作了。蘇美英始終認為行動方面最充分的協調，戰鬥的配合一致，是對共同敵人作戰中必不可少的事情。這就是英蘇美聯盟各國之間的邦交發展所遵循的方針。在去年和今年，紅軍的打擊都超出我們盟軍在北非，在地中海，以及在意大利南部的軍事行動不聲援的。紅軍的成就，以及盟軍的成就，已加速了戰爭的進程，更進一步加強了盟邦之間的戰鬥同志關係，並且使勝利更接近了。

最近三國外長的莫斯科會議，已使人信服地表現出英蘇美在相互間形成的堅定的同盟中，能够解決進行戰爭以及組織和平方面的最複雜的任務。

現在，在共同鬥爭以及合作發展的過程中，美國總統，蘇聯各族人民的領袖，以及英政府的首長第一次聚首一堂。以解決戰爭與和平的基本問題的時候，終於到來了。在四天的過程中，在圓桌會議席上，我們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們，互相觀察，交換意見，並通過決定，關於進行戰爭的問題，以及關於戰後世界組織的最重要的問題，都已商得完全一致的同意。

所有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都懷着熱烈的希望來注視這次會議。而我們的人對於這次會議，却怕得要命。

會議已討論了對德國進行戰爭的問題，以及着手徹底毀滅希特勒的法西斯問題，會議通過了關於三個強國在對德戰爭中的一致行動，以及關於戰後合作的宣言；並討論了關於伊爾的宣言。

無論什麼人，只要把羅斯福斯大林和邱吉爾簽署的三項宣言仔細讀一遍，並且考慮一下，就都會了

解：戰爭的勝負已經不能更動地注定了。三強領袖之間所商得的同意，照他們精神而說，這的確是「保證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正如大眾所知道的，自從戰爭爆發以來，美蘇英的物資資源和智能，就已經為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必須做的事情就是：為了戰爭，充分利用這些潛能，充分利用可用的資源。

實際上，在德黑蘭會議的前夕，斯大林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的報告中就說過：「紅軍的勝利已產生了這樣的成效和後果，遠達蘇德戰場範圍以外，它們已使世界大戰今後的全部進程趨於變化，而取得了偉大的國際意義。盟邦對共同敵人爭取的勝利已經來得更近了；如今，我們同盟國家，都充滿了決心，一定要給予敵人共同的打擊，結果，必將對敵人取得最後的勝利」。

這樣明確表示的信念已在德黑蘭輝煌地證實了。三強領袖在他們的聯合宣言中說，「我們已經確定了關於將德國武裝力量消滅的計劃，我們已就將從東面西面和南面進行的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時間商得完全的協議」。這個決定就是對共同敵人作戰的共同配合的戰略原則的無上的勝利。這種原則的實現，始終被認為是由共同作戰所提出的一切任務之中最困難的任務。

如今，盟邦軍事參謀把堅決戰鬥行動的計劃加以發展。就其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時間取得協議，並選得了三強領袖的批准，三強領袖對於這些計劃和時間都已贊同。決戰的時間已經決定了。這就是從東面，西面和南面對德國的總攻，就是德國武裝力量最後被消滅。

會議席上，會對敵人的力量加以充分的估計。估計之後，全世界三強最大強國的軍事首長，就他們的最新趨勢的軍事專家一起共同聲明：「人世間決沒有一種力量能阻礙我們由陸上消滅德國的陸軍，由海中消滅他們的潛艇，並且從空中消滅他們的兵工廠。我們的進攻將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來越強的」。

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必將懷着無上滿意的心情，歡迎美總統、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和英首相的莊嚴宣言中對盟邦共同政策的確定：「我們表示我們的決心：我們的國家，在戰爭方面，以及在隨後的和平方面都將共同工作」。

在後一方面，國際生活中的許多事件，已經證明了：美蘇英和其他聯合國家一同，都準備負起責任，以實現使全球各國絕大多數人民完全滿意的和平。在這一方面，盟邦的合作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堅定，更加使人鼓舞了。德黑蘭通過的三強會議的決定，也構成了這一方面的最偉大的而且影響深遠的歷史性的步驟。三強領袖表示信念：盟邦間現有的和協，必將確保永久的和平。

平。在這里，宣言中說出了新的極有希望的話：永久的和平必將到來。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這的確是人類必將以無限強烈的精神拜讀這些決定。今後人類必將以無限強烈的精神拜讀這些決定。

德國帝國主義的獸性暴力，使全世界陷於最危險的混亂中，使幾千萬種民族備受慘痛流血的磨難，使幾萬萬人民遭受無窮痛苦和厄運。對於將來無上責任，感召了偉大民主國家的領袖們作了無窮的決定。在德黑蘭，已說出了熱望着這樣的合作。

在伊期會議中通過的三強關於伊朗的宣言，已就同盟盟國家之一建立這樣的合作，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例證。這個宣言表明了盟邦承認在對共同敵人作戰方面所給予的援助的重大性，並且承認盟邦方面有給予伊朗人民以進一步經濟援助的必要，又鄭重聲明同盟盟國願意看見伊朗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

最近斯大林說過：「盟邦間的關係，他們的軍隊的戰鬥之說，非特沒有削弱，而且，和敵人的預期相反，更趨強而且更持久了。」

我，當代偉大的領袖，在德黑蘭聚會，而且能夠建立個人的接觸，這些偉大領袖們，在本國的人民的向前，以及在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的向前，對於他們的命運和他們的將來都負着關切和責任的最重大的担子。在德黑蘭，羅斯福和斯大林第一次會面。邱吉爾和斯大林的個人認識比較早些，那是在英首相訪問莫斯科的時候。三強領袖都從本國的官都長途跋涉了來聚首一堂，在完全互相了解和解和友好的氣氛中舉行會議。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英外相艾登，蓋浦金斯，大元帥伏羅希洛夫，美國的和英國的參謀總長，英美大使，三國權威的顧問和專家，都參加了這次會議。這種親近的感情，互相的了解和密切的合作，已表現在三強領袖宣言的極端強有力的結論中了：「我們懷着希望和決心來到這裡。我們成了事實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遠處分手。」

在德黑蘭舉行的歷史性的會議，滲透着同盟盟國的堅定的意志和決心，同盟盟國一定在最近的將來就以粉碎的打擊制止住法西斯主義的血腥的狂熱。而為人類開拓出一條走向永久的和平合作時期的康莊大道。三強同盟盟國領袖的宣言，必將對整個個人的將來，發生無限的積極影響。

蘇聯人民在這些決定的下面看到自己偉大領袖的簽字式，這些決議，已獲得蘇聯各蘇聯人民絕大的滿意，並且必將由蘇聯各蘇聯人民以全部意志和力量來擁護。

全世界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也必將懷着極大的滿意，來接受三強同盟盟國領袖會議的這些決議。實現這些決議，就必將使人類從希特勒的奴役下獲得解放，必將使人類享受世世代代的永久的和平。

日本目前的政局

原文載「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

E. 伊林作

很久以來，目前的日本政府就揮霍着解決「如何加強國內機構」的問題。

而對着日本的，是堅韌而且比日本許多倍的敵方，他們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交鋒之後，不僅沒有像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希望的被追趕，而且相反地，大規模地立武裝部隊，對日本的戰爭機構加以回擊。目前太平洋上的戰局並不有利於日本。軍事上的主動權，特別是在西南太平洋，已經轉入美軍手裏了。

東條在最近期的廣播中，說是目前艱苦的戰事不能輕易結束，日本因此必須勇敢迎接當前的一切困難。有鑒於這個黯淡的前途，日本政府急於規劃若于組織上的辦法，以克服危機。這些辦法顯然還不夠，而東條宣佈，日本政府正採取堅決的步驟，徹底實施「總」動員，以增加生產，滿足戰爭的要求。

英美對德國工業中心和全國各地的空襲，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不安。據東條說，日本政府不得不採取特別的步驟，來對付空襲，防衛日本各城市，特別是東京。

因此，第八十三屆議會是在一個主要口號之下舉行的，為海軍生產更多的飛機和兵艦。和英美軍火力量比較起來，日本的海空軍方面極端薄弱以及軍火的一般缺乏，使日本人發生重大的驚惶，迫使日本統治階層要利用一切可能，來擴大軍火生產。為了這個目的，軍火部創立起來了，東條兼任了軍火部長。其他的改組和大臣的更換，其目的也在於加強軍火生產。所有這些辦法，據日本統治階層的意見，是「戰爭政策和加強國內機構的主要成就」。

一天天增加着的戰時的困難流露在各方面。日本感覺到熟練的技術人員十分缺乏，原料，食糧和消費品的供應，也遭遇到嚴重的困難。囤積居奇的現象非常普遍。國內情況越來越緊張。日本統治階級設法緩和這個局面，並不限於經濟方面。關於必須提高「戰鬥精神」的言論很多。人民之中傳播着的疲憊、不穩和對勝利懷疑的氣氛，連受到劇烈的壓迫。

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東條政府倚賴最反對的所謂極端份子。這些人以隨海軍官若千方面為後台，進行「堅決行動」的戰術，促成無邊際的侵略和攫取殖民地的計劃。他們用一切手段把日本推入戰爭，不管國內經濟情況如何。他們希望法國德國在歐洲勝利，自己在日本發動各種反蘇計劃。在國內政策上，他們鼓吹日本應該在歐洲化。

議會黨派、宮廷和貴族代表的諷解和支持，這幾方面的人是主張在對外政策上採取比較穩健的策略的。在事勢的壓力之下，東條被迫對財閥、宮廷和貴族作很大的讓步；他拋棄了從前的朋友極端份子，而極端份子們所以在政府對內對外的政策中失去了影響，東條並不是沒有要過一套手段的。目前日本國內政局的特點，不僅在於東條的轉變方向，而且在於下列的事實，就是大公司的領袖們，國會政團領袖們，宮廷，貴族和影響很大的老官僚集團，代表們已經擺脫了極端份子，正在設法用他們自己的辦法，來防避災難的到來。他們現在支持東條，自己留在背後。在另一方面，極端份子明顯地對東條及其政府的「粉飾」政策不滿，因為東條政府拒絕實行極端份子的對內對外政策的計劃。最著名的極端份子們表示不給皇室以政治援助，而且和東條及其內閣展開鬥爭。

目前，大部的極端份子們在政治上失勢了。典型的例子是練號叫「日本希特勒」的中野正剛的命運。他雖然無事可作了。在日本目前的困難情況之下，他在內閣問題上的好難統治主義，統治階層是無法接受的，甚至認為危險。他在對外政策上主張和法西斯德國站在一起，今天德國在失敗的前夕，在日本的領導階層中尚且找不到支持者。更不消說人民大眾了。每個人都不想聽他唱不合時宜的、好大喜功的好話；中野更明白不再有人需要他的法西運動了。雖然他還處着危險。危機的表現之一，是中野的自殺。

第八十三屆議會對於對外政策問題，也會加以很大的注意。東條和外交重光葵的演說，對東條的戰爭和加強日本在佔領區中的地位的問題，集中了主要的注意力。重光葵在議會中宣佈了亞洲種族主義的原則，這原則引導了日本的「東亞人之東亞」的對外政策。在這個方針的背後，日本懷有單獨統治東亞一切地方的野心，那是一目了然的事情。雖然，不能以為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政策上缺乏誠實和創造性。多年的經驗，考慮到他們在東亞的政策，在中國淪陷區和其他國家中的政策的多年經驗，考慮到希特勒走向末路的歐洲「新秩序」的大張旗鼓的經驗，迅速地改用別的方法。

他們現在以生硬的力量，強迫地採用好雄主義的政策。為了爭取東亞國家間的獨立，日本在中國進行着新的「和平攻勢」，而且給菲律賓和緬甸等國以嚴重的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困難。日本政客對於在廣大的東亞的戰爭的順利結果感到信心。雖然在這些方法中，以充分保證其目的，但這些方法也反映了這一點。

第八十三屆議會中關於對外政策問題的許多演說，反映了這一點。

羣衆半月刊

定閱章程

- (一) 定期至少三個月，定費(先惠)郵票代洋，十足通用，借以一元以上者為限，省用郵票及印花不收。
- (二) 續定請註明期數，否則，由款到後之最近期起寄費。
- (三) 滿期前專函通知，滿期時如未續定者，即停止寄費。
- (四) 更改地址或在詢，務請註定戶姓名，定單號碼詳細寫明。
- (五) 如因故須暫停，請將定單號碼定戶姓名來函通知本社，當即照辦。如有存款，俟以後補寄本刊或即時退款悉聽尊便。但如要退款，必須將原定單寄回，否則，不能照辦。
- (六) 送寄本刊如有遺漏延誤錯誤等情，請即來函通知，以便查明原因，依法補救。
- (七) 非常時期，物價不斷上漲，為減少虧累，必要時應增加定價，惟增價之時，當專函通知讀者，以便補寄定費，如不願補寄定費者，即將期數縮短，幸祈見諒。
- (八) 國內定戶，平寄郵費一律免收，但掛號航空及國外定戶，郵費仍當照加。
- (九) 本市，市郊，直接定閱，專差送達。

優待簡章

- (一) 凡報館書店雜誌通訊社等同行定閱者八折。介紹者九折。
- (二) 本報同人介紹者八折，自定贈他人者六折。
- (三) 凡新華日報定戶，憑定單號碼定閱本刊者九折，本刊定戶，憑定單號碼定閱新華日報者九折，同時定閱本刊及新華日報者，一律九折，以示優待。
- (四) 工友經確實證明由本社認可者，可另予優待。
- (五) 一次定閱五份以上者八折，一次定閱十份以上者七五折，滿期後個別定閱，不能享此優待。
- (六) 一次介紹本刊五份以上，定期在三個月以上者，除照第五條辦理外，另贈介紹人本刊一份，一次介紹定本刊十份以上，定期在三個月以上者，除照第四條辦理贈介紹人本刊一份贈送時間與介紹定所閱期數相同外，另贈新華日報一份，期限一月，以示優待。

★本章程簡章本外埠均可通用，惟以直接向新華日報總館及成都，桂林兩營業分處定閱為限。

新華日報總館：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電話：四一〇三九 電報掛號：三七七〇

營業分處：成都：東大街八十八號 桂林：桂西路二十六號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群众第八卷 >

作者 =

页数 = 7 4 4

SS号 = 0

出版日期 =

正文